

第一编

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

目 录

一、树立科学的世界观	(13)
(一) 两种世界观的对立	(13)
1. 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唯物 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对立	(13)
2. 不同的世界观有不同的认识根源和社会根源	(17)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	(25)
1.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人类认识史上空前 的革命	(25)
2. 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两个显著特点	(27)
(三)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统一的	(28)
1. 哲学就是认识论	(28)
2.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的思想武器	(31)
3. 让哲学从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 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34)
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36)
(一) 实践第一的观点	(36)
1. 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 和基本的观点	(36)
2.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37)
3. 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	(41)
4.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41)

● 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41)
● 辩证唯物主义者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	(45)
(二) 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46)
1. 物质与意识	(46)
● 物质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	(46)
● 世界是可知的	(49)
● 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反作用于物质，思维与存在 具有同一性	(51)
2. 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认识过程的第一次 飞跃	(52)
●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认识过程中的两个不同的 阶段	(52)
● 感性认识必须上升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依赖于 感性认识	(56)
3. 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认识过程的第二次 飞跃，其意义更加伟大	(60)
4. 认识的目的是改造世界	(62)
5. 人类认识运动的总规律	(63)
●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物质变精神， 精神变物质	(63)
● 人类总是通过认识相对真理来逐步接近绝对 真理	(66)
6. 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 世界	(69)
7. 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71)
(三) 掌握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75)
1. 认识客观规律要经过反复实践和总结	(75)
2. 主观指导必须符合客观规律	(77)

3. 透过现象看本质，从偶然中把握必然	(78)
4. 在客观条件许可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81)
三、唯物辩证法	(83)
(一) 矛盾法则（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是宇宙的根本规律	(83)
(二)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	(86)
1. 矛盾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	(86)
2.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	(88)
(三)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91)
1. 矛盾的普遍性	(91)
● 矛盾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	(91)
● 差异就是矛盾	(93)
2. 矛盾的特殊性	(95)
● 矛盾各有其特殊性，矛盾的各方面又各有其特点	(95)
● 认识矛盾特殊性是认识事物的基础	(98)
3. 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	(100)
(四) 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104)
1. 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104)
2. 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	(106)
3. 善于捉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109)
● 捉住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09)
● 研究矛盾的各种不平衡的情况，是革命政党正确决策的重要方法之一	(110)
(五) 矛盾的同性和斗争性	(111)
1. 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	(111)

2. 矛盾的同—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	(117)
3. 矛盾斗争有对抗和非对抗两种形式，它们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	(119)
(六) 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	(122)
1. 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核心是对立统一	(122)
2. 质量互变规律	(123)
● 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	(123)
● 质变决定量变，量变促进质变；质变是飞跃	(124)
● 量变中有部分质变	(127)
3. 否定之否定规律	(129)
● 否定之否定是肯定和否定的辩证统一	(129)
●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	(131)
(七) 按辩证法办事	(133)
1. 看问题要“一分为二”，防止片面性和绝对化 ...	(133)
2. 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防止思想僵化	(141)
3.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42)
●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	(142)
● 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	(144)
4. 创造条件，促成事物的转化	(145)
四、唯物史观	(151)
(一)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	(151)
(二) 人的基本特性是社会性	(152)
(三)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154)
1. 真正强大的力量属于人民	(154)
2. 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156)

3. 应当承认领袖的作用，但领袖的作用离不开群众	(157)
(四) 社会基本矛盾	(160)
1.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160)
2.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要为经济基础服务，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	(162)
3.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	(164)
(五) 阶级、国家、革命	(167)
1. 阶级和阶级斗争	(167)
● 阶级的产生和阶级划分的依据	(167)
●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	(168)
● 在阶级社会，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没有抽象的民主、自由	(172)
● 阶级分析方法是观察社会的基本方法	(175)
2. 国家	(177)
● 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	(177)
● 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	(178)
3. 革命	(180)
● 革命是阶级矛盾激化的产物	(180)
● 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181)
● 无产阶级革命要有暴力与和平两手准备	(182)
● 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	(185)
(六) 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	(185)
1. 新的进步的东西终究要代替旧的落后的东西	(185)
2. 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	(188)
3. 阶级、政党、国家最终要消亡	(189)

五、实事求是	(192)
(一)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192)
(二) 理论联系实际	(197)
1. 真正的理论是从客观实际中抽出来，又在 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理论	(197)
2. 我们需要的是能够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的 理论家	(198)
3.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不是 教条	(201)
4. 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 最基本的原则	(202)
5. 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04)
(三) 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209)
1. 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209)
2. 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在实践中创新和发展	(211)
(四) 调查研究	(213)
1. 调查研究的重要性	(213)
●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213)
● 正确的决策来自于调查研究	(216)
● 离开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 深坑	(223)
●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224)
● 领导干部要亲自做调查研究	(226)
2. 要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	(229)
3. 调查研究的态度和方法	(234)
● 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和甘当小学生的精神	(234)

● 要坚持长期做实际调查	(235)
● 既要“走马观花”，更要“下马观花”	(236)
● 要做典型调查，解剖“麻雀”	(237)
● 开好调查会	(240)
● 在详细占有调查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和综合	(244)
(五) 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248)
1. 科学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	(248)
2. 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	(249)
3.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253)
4. 不但要有革命热忱，而且要有实际精神	(256)
5. 独立思考，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257)
6.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257)
(六) 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	(258)
六、群众路线	(270)
(一) 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270)
1. 为最广大群众谋利益，是党的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270)
2.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70)
3. 关心群众生活，切实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	(270)
(二)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274)
1.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	(274)
2. 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群众	(275)
3. 放手发动群众，把群众组织起来	(278)
4. 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281)
5. 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保护群众的积极性	(284)

（三）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	（286）
（四）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290）
1. 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290）
2. 注意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	（291）
3. 虚心向群众学习。先做群众的学生，后做群众的先生	（293）
（五）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冒险主义、尾巴主义	（295）
1. 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	（295）
2. 反对冒险主义和尾巴主义	（295）
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299）
（一）中国的问题要靠中国人独立自主解决	（299）
1. 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299）
2. 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	（300）
3. 发扬自尊、自信、自立、自主、自强的民族精神	（302）
（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302）
1. 依靠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	（302）
2. 中国革命和建设都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304）
3. 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但决不能自处孤立，要努力争取外援	（304）
（三）学习外国的经验要结合中国的实际	（309）
八、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310）
（一）必须讲究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310）

-
- (二) 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 (312)
- (三) 一般和个别相结合, 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312)
1. 共产党无论进行何项工作, 都必须采用一般和个别、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 (312)
 2. 先从个别深入, 取得经验, 再作普遍指导 (315)
 3. 通过发挥骨干和英雄模范的作用, 使领导和群众更好地结合起来 (317)
- (四) 把握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 (319)
- (五) 处理好中心工作和其他工作的关系 (320)
- (六) 善于总结经验 (322)
1. 总结经验的重要性 (322)
 2. 善于总结经验, 就是领导者的任务 (324)
 3. 正确对待成绩和缺点 (326)
 - 对待成绩与缺点要用辩证的方法 (326)
 - 错误总是难免的, 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 改正得越迅速, 越彻底, 越好 (329)
 - 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 (332)
 4. 总结历史经验, 要重视反面教员和反面经验 (333)
- (七) 开好会议 (335)
1. 会前要作充分的准备 (335)
 2. 会议要讨论实际问题, 作出决定 (336)
- (八) 领导必须要有预见 (339)
- 九、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343)
- (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每一个革命者应该学习的科学 (343)
 -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 学哲学极为重要 (345)

-
- (三) 学习文化是学习理论的基础，要学点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 (347)
- (四) 提倡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348)
- (五) 学习理论要结合实际，学会用马克思主义
 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决问题 (351)
- (六) 学习要不畏难，不自满，看不懂就“钻”，
 没时间就“挤” (355)

一、树立科学的世界观

（一）两种世界观的对立

1. 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对立

全部哲学史，都是唯心论和唯物论这两个互相对抗的哲学派别的斗争和发展的历史。一切的哲学思潮和派别都是这两个基本派别的变相。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第1页

唯心论与唯物论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呢？在于对哲学的根本问题，即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意识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之相反的回答。唯心论认精神（意识、观念，主体）为世界一切的根源，物质（自然界及社会，客体）不过为其附属物。唯物论认物质离精神而独立存在，精神不过为其附属物。从这个根本问题的相反的回答出发，就生出一切问题上的分歧意见来。

在唯心论看来，世界或者是我们各种知觉的综合，或者是我们的或世界的理性所创造的精神过程。对外面的物质世界，或者完全把它看成虚构的幻像，或者把它看成精神元素之物质的外壳。人类的认识，是主体的自动，是精神的自己产物。

唯物论相反，认宇宙的统一就在它的物质性。精神（意

识)是物质的本性之一,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发生的。自然,物质,客观世界,存在于精神之外,离精神而独立。人的认识,是客观外界的反映。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第2页

资产阶级在为了向封建阶级斗争的必要及无产阶级还没有威胁他们的时候,也曾经找到了并使用了唯物论作为自己斗争的工具,也曾经确信周围的事物是物质的产物,而不是精神的产物。直至他们自己变成了统治者,无产阶级的斗争又威胁着他们时,才放弃这个“无用”的工具,重新拿起另一个工具——哲学的唯心论。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第5页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或叫宇宙观),是辩证法的唯物论,不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或叫机械的唯物论),这一点区别,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大问题。世界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从古至今有三种主要答案。第一种是唯心论(不管是形而上学的唯心论,或辩证法的唯心论),说世界是心造的,引申起来又可说是神造的。第二种是机械唯物论,否认世界是心的世界,说世界是物质的世界,但物质是不发展的,不变化的。第三种是马克思主义的答案,推翻了前面两种,说世界不是心造的,也不是不发展的物质,而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就是辩证法唯物论。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看世界,把世界在从来人眼睛中的样子翻转了过来,这不是天翻地覆的大议论吗?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第38页

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0页

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30页

在哲学里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对立统一，这两个东西是相互斗争的。还有两个东西，叫做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也是对立统一、相互斗争的。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93页

我们公开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香花和毒草的斗争。这种斗争，要永远斗下去，每一个阶段都要前进一步。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93页

要用唯物论代替唯心论，用无神论代替有神论。

《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31页

唯心论和唯物论学说都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存在，……唯心论在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代表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起着反动的作用。唯物论则是革命阶级的宇宙观，它在阶级社会内，从对反动哲学的唯心论之不断的战斗中生长与发展起来。由此，哲学中唯心论与唯物论的斗争，始终反映着反动阶级与革命阶级在利害上的斗争。哲学中的某一倾向，不管哲学者自身意识到与否，结局总是被他们所属阶级的政治方向所左右的。哲学上的任何倾向，总是直接间接助长着他们所属阶级的根本的政治利害。在这意义下，哲学中的一定倾向的贯彻，便是他们所属阶级的政策之特殊形态。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第1—2页

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三民主义的宇宙观则是所谓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二者是相反的。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88页

有两种世界观、方法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34页

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0页

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共产主义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不是任何别的阶级的世界观。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3页

资产阶级哲学家都是为他们当前的政治服务的，而且每个国家，每个时期，都有新的理论家，提出新的理论。英国曾经出现了培根和霍布斯这样的资产阶级唯物论者；法国曾经出现了百科全书派这样的唯物论者；德国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也有他们的唯物论者。他们都是资产阶级唯物论者，各有特点，但都是为当时的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所以，有了英国的，还要有法国的；有了法国的，还要有德国的和俄国的。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9—110页

2. 不同的世界观有不同的认识根源和社会根源

各种哲学学说，都是隶属于一定社会阶级的人们所创造的。这些人们的意识，又是历史地被一定的社会生活所决定。所有的哲学学说，表现着一定社会阶级的需要，反映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人类认识自然的历史阶段。哲学的命运，看哲学满足社会阶级的需要之程度如何而定。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第1页

唯心论和唯物论的社会根源，存在于阶级的矛盾的社会结

构中。最初唯心论之发生是原始野蛮人类迷妄无知的产物。此后生产力发展，促使科学知识也随之发展，唯心论理应衰退，唯物论理应起而代之。然而从古至今，唯心论不但不曾衰退，反而发展起来，同唯物论竞长争高，互不相下，原因就在于社会有阶级的划分。一方面压迫阶级为着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发展与巩固其唯心论学说，一方面被压迫阶级同样为着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发展与巩固其唯物论学说。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第1页

使唯心论能够发达，深化，并有能力同唯物论斗争，还须在人类的认识过程中找寻其根源。人类在使用概念来思考的时候，存在着溜到唯心论去的可能性。人类思考时，不能不使用概念，这就容易使我们的认识分裂为两方面，一方面是个别的与特殊性质的事物，一方面是一般性质的概念（例如“延安是城”这个判断）。特殊和一般本来是互相联系不可分裂的，分裂就脱离了客观真理。客观真理是表现于一般与特殊之一致的，没有特殊，一般就不存在，没有一般，也不会有特殊。把一般同特殊脱离开来，即把一般当作客观的实体看待，把特殊只当作一般之存在的形式，这就是一切唯心论者所采取的方法。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第3页

一切唯心论者，即是拿意识、精神或观念来代替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体的。从这里出发，唯心论便强调着人类意识在社会实践中的能动性，他们不能指出意识受物质限制的这种唯物论的真理，却主张只有意识是能动的，物质不过

是不动的集合体。加上被阶级的本性所驱策，唯心论者使用一切方法把意识的能动性夸张起来，片面地发展了它，使这一方面在心智之中无限制的胀大成为支配的东西，掩蔽着别一方面，并使之服从，而把这一人工地胀大的东西确定为一般的宇宙观，以至化为物神或偶像。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第3—4页

我们的思维不能一次反映出当作全体看的对象，而是构成一个具有接近于现实的一切种类的无数色调的、生动的、认识之辩证法的过程。唯心论依据于思维的这种特性，夸大其个别方面，不能给过程以正确反映，反把过程弄弯曲了。列宁说：“人类的认识不是直线的，而是曲线的。这一曲线之任何一段，都可以变为一段单独的完整的直线，这段直线就有引你陷入迷阵的可能。直线性和片面性，见树不见林和呆板固执性，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这些就是唯心论的认识论的根源。”哲学的唯心论是将认识的一个片段或一个方面，片面地夸张成为一种脱离物质、脱离自然的神化的绝对体。唯心论就是宗教的教义，这是很对的。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第4页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机械唯物论）没有强调思维在认识上的能动性，仅给以被动作用，把它当作反映自然的镜子看。机械唯物论对唯心论采取横暴的态度，不注意其认识论的根源，因此不能克服唯心论。只有辩证唯物论，正确地指出思维的能动性，同时又指出思维受物质的限制。指出思维从社会实践中发

生,同时又能动地指导实践。只有这种辩证法的“知行合一”论,才能彻底地克服唯心论。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第4页

屈服于自然力之前而只能使用简单工具的原始人类,不能说明周围的事变,因而求助于神灵,这就是宗教同唯心论的起源。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第5页

人类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同周围的自然界接触,作用于自然界,变化着自然界,创造衣食住用的东西,使之适合于人类的利益,使人类深信物质是客观地存在着。

人类在社会生活中,人同人之间互相发生关系与影响,在阶级社会中并且实行着阶级斗争。被压迫阶级考虑形势,估计力量,建立计划,在他们的斗争成功时,使他们确信自己的见解并不是幻想的产物,而是客观上存在着的物质世界的反映。被压迫阶级因为采取错误的计划而失败,又因为改正其计划而成功,使他们懂得只有主观的计划依靠于对客观世界的物质性与规律性的正确的认识,才能达到目的。

科学的历史给人类证明世界的物质性及规律性,使人类觉悟到宗教与唯心论的幻想之无用,而到达于唯物论的结论。

总之,人类的实践史——向自然斗争史、阶级斗争史、科学史,在长久岁月中,为了生活与斗争的必要,考虑物质的现实及其法则,证明了唯物论哲学的正确性,找到了自己斗争的思想工具——唯物论哲学。社会的生产发展越发进到高度,阶

级斗争越发发展，科学认识越发暴露了自然的“秘密”，唯物论哲学就越发发展与巩固，人类便能逐渐从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压迫之下解放了出来。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第5页

辩证法唯物论的运动论，首先是同哲学的唯心论及宗教的神道主义相对立的。一切哲学的唯心论及宗教的神道主义的本质，在于它们从否认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出发，设想世界的运动及发展是没有物质的，或在最初是没有物质的，而是精神作用或上帝神力的结果。德国唯心论哲学家黑格尔认为现在的世界是从所谓“世界理念”发展而来的，中国的周易哲学及宋明理学都作出唯心论的宇宙发展观。基督教说上帝创造世界，佛教及中国一切拜物教都把宇宙万物的运动发展归之于神力。所有这些离物质而思考运动的说法都和辩证法唯物论根本不相容。不但唯心论与宗教，就是马克思以前的一切唯物论及现在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机械唯物论，当他们说到自然现象时是唯物论的运动论者，但一说到社会现象时就无不离开物质的原因，而归着于精神的原因了。

辩证法唯物论坚决驳斥所有这些错误的运动观，指出他们的历史限制性——阶级地位的限制与科学发展程度的限制，而把自己的运动观建设在以无产阶级立场及最发达的科学水准为基础的彻底的唯物论上面。辩证法唯物论首先指出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形式，是物质内在的属性（不是由外力推动的），设想没有物质的运动，同设想没有运动的物质是一样不可思议的事。把唯物的运动观同唯心的及唯神的运动观尖锐地对立着。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第15—16页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2页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3—284页

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5页

形而上学，亦称玄学。这种思想，无论在中国，在欧洲，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间内，是属于唯心论的宇宙观，并在人们的思想中占了统治的地位。在欧洲，资产阶级初期的唯物论，也是形而上学的。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

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于是，在资产阶级那里，除了公开的极端露骨的反动的唯心论之外，还出现了庸俗的进化论，出来对抗唯物辩证法。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0页

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增减和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于外力的推动。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0页

形而上学家认为，世界上各种不同事物和事物的特性，从它们一开始存在的时候就是如此。后来的变化，不过是数量上的扩大或缩小。他们认为一种事物永远只能反复地产生为同样的事物，而不能变化为另一种不同的事物。在形而上学家看来，资本主义的剥削，资本主义的竞争，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思想等，就是在古代的奴隶社会里，甚至在原始社会里，都可以找得出来，而且会要永远不变地存在下去。说到社会发展的原因，他们就用社会外部的地理、气候等条件去说明。他们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的原因，否认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因此，他们不能解释事物的质的多样性，不能解释一种质变为他种质的现象。这种思想，在

欧洲，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是机械唯物论，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则有庸俗进化论。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近百年来输入了欧洲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则为资产阶级所拥护。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0—301页

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1页

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后来就被形而上学所代替。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3页

为什么唯物哲学只能出现于希腊时代而不能在其以前？因为（一）对自然法则的认识有待生产技术的进步，人们才能逐渐窥知自然的性质，才能开始用一种与宗教不同的眼光去说明世界；（二）必待有了手工业与商业，有了商业奴隶主，他们有钱有时间，才能发生求高深学问的动机；（三）必待有了商品交换的经验，养成了思维的抽象能力，才能从事于哲学；（四）必

待异民族的接触，地理眼界的扩大，才能扩大精神的眼界；（五）必待自然科学的初步发达，有了知识的基础，才能据之找出一种普遍必然的因素，才能形成自然哲学。这些就是反宗教的新世界观即古代自然哲学的历史根据。在这以前，人类束缚于自然力与社会力的压迫，只能用灵魂或神的观念去解释世界，断不能出现唯物的思想。

《读李达著〈社会学大纲〉一书的批注》（一九三八年一月——三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17—218页

哲学是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集中表现。

《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一书的批注》（一九三九年五月以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10页

最初的唯心论发生于原始人的无知，后世的唯心论的发展由于统治阶级的需要。

《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一书的批注》（一九三九年五月以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22页

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68页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

1.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人类认识史上空前的革命

现代的唯物论，不是过去各种哲学学说之简单的继承者，它

是从反对过去统治哲学的斗争中，从科学地解除其唯心论和神秘性的斗争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法唯物论，不但继承了唯心论的最高产物——黑格尔学说的成果，同时还克服了这一学说的唯心论，唯物地改造了他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又不但是一切过去唯物论发展的继续和完成，同时还是一切过去唯物论的狭隘性之反对者，即机械的直观的唯物论（主要的是法国唯物论与费尔巴哈唯物论）之反对者。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法唯物论，继承了过去文化之科学的遗产，同时又给此种遗产以革命的改造，形成了一种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最正确最革命最完备的、哲理的科学。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第8页

这世界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种议论，在西洋古代的希腊就有人说过了，不过因为时代限制，还只简单地笼统地说了一说，叫做朴素的唯物论，没有（也不可能）科学的基础；然而议论是基本上正确的。黑格尔创造了辩证的唯心论，说世界是发展的，但是心造的，他是唯心发展论，其正确是发展论（即辩证法），其错误是唯心发展论。西洋十七、十八、十九三个世纪法德等国的资产阶级唯物论，则是机械观的唯物论，他们说世界是物质世界，这是对的，就是像机械一样的运动，只有增减或位置的变化，没有性质上的变化，这是很不对的。马克思继承了希腊朴素的辩证唯物论，改造了机械唯物论与辩证唯心论，创造了从古以来没有过的、放在科学基础之上的辩证唯物论，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压迫人民的革命的武器。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第38页

生活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期的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对于辩证法曾经给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他的辩证法却是唯心的辩证法。直到无产阶级运动的伟大的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综合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的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部分，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才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后来，经过列宁和斯大林，又发展了这个伟大的理论。这个理论一经传到中国来，就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变化。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3—304页

唯物主义并不等于马列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就已经有唯物主义，资产阶级曾经发挥了唯物主义，例如法国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也不是马克思发现的，例如德国过去有唯心辩证法。马克思是改造了这两种东西。他把唯物主义改造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联系的、发展的。为什么会有发展呢？因为有矛盾存在。他把辩证法改造成为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正确的反映客观世界的辩证法，这与德国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不同。

《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一九五九年二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页

2. 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两个显著特点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法唯物论的特征，在于要明确地理解一切社会意识（哲学也在内）的阶级性，公然声明它那无产阶级的性质，向有产阶级的唯心论哲学作坚决的斗争，并

且把自己的特殊任务，从属于推翻资本主义组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任务之下。在中国目前阶段上，哲学的任务，是从属于推翻帝国主义与半封建制度，彻底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并准备转变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去的一般任务之下。哲学的理论与政治的实践，是应该密切联系着的。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第2页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4页

哲学的党性包含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一书的批注》（一九三九年五月以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21页

（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统一的

1. 哲学就是认识论

唯物辩证法是惟一科学的认识论，也是惟一科学的论理学。唯物辩证法研究吾人对外界认识的发生及发展，研究由不知到

知、由不完全的知到更完全的知的转移，研究自然及社会的发展法则在人类头脑中日益深刻和日益增多的反映，这就是唯物辩证法与认识论的一致。唯物辩证法研究客观世界最一般的发展法则，研究客观世界最发展的姿态在思维中的反映形态，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研究现实事物的各过程及各现象的发生发展消灭及相互转化的法则，同时又研究反映客观世界发展法则的人类思维的形态，这就是唯物辩证法与论理学的一致。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第11—12页

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同时又是无产阶级认识周围世界的方法和革命行动的方法；它是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唯心论的马克思主义修正派认为辩证法唯物论的全部实质只在于它的“方法”，他们把方法从一般哲学的宇宙观割裂开来，把辩证法从唯物论割裂开来。他们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辩证法，不是如同黑格尔一样的唯心的辩证法，而是唯物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丝毫也不能离开他的宇宙观的。另一方面，机械唯物论者却又仅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看作一般哲学的宇宙观，割去了它的辩证法，而且认为这种宇宙观就是机械的自然科学之各种结论。他们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不是简单的唯物论，而是辩证法的唯物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这两种割裂的看法都是错误的，辩证法唯物论是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第9—10页

用辩证法唯物论去解决论理的东西和历史的東西的相互关

系的最好的模范，首先要算马克思的《资本论》。《资本论》中包含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同时又包含了这一社会的论理发展。《资本论》所分析的，是那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发展及消灭、反映出来的各经济范畴的发展的辩证法。这问题之解决的唯物论性质，在于它以物质的客观历史做基础，在于把概念和范畴当做这一现实历史的反映。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历史的一致，资本主义的社会的论理学和认识论的一致，模范地表现在《资本论》里面，我们可以从它懂得一点辩证法论理学和认识论一致的门径。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第12—13页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是认识的方法，是论理的方法，然而它就是世界观。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辩证法、认识论、论理学，也是一个东西。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第38—39页

世界上没有不能分析的事物，只是：一、情况不同；二、性质不同。许多基本范畴，特别是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6—107页

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

《关于人的认识问题》（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
第8卷第390页

2.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我们应该学习的是布尔什维克的聪明。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212页

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他们本质上是唯物论的。但由于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进步的阶级，就使得无产阶级的唯物论不同于资产阶级的唯物论，是更彻底更深刻的，只有辩证法的性质，没有机械论的性质。……辩证法唯物论，不但主张物质离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而且主张物质是变化的，成为整个完整系统的崭新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第5—6页

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历史给予无产阶级以消灭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就用辩证法唯物论作为他们斗争的精神上的武器，作为他们各种见解之哲学基础。辩证法唯物论这种宇宙观，只有当我们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去认识世界的时候，才能够被我们正确地 and 完整地把握住，只有从这种立场出发，现实世界才得真正客观地被认识。这是因为一方面只有

无产阶级才是最先进与最革命的阶级，又一方面只有辩证法唯物论才是高度的和严密的科学性、同彻底的和不妥协的革命性密切地结合着的、一种最正确的和最革命的宇宙观和方法论。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第7—8页

中国无产阶级担负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达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历史任务，必须采取辩证法唯物论作为自己精神的武器。如果辩证法唯物论被中国无产阶级、共产党、及一切愿意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人们之广大革命分子所采取的话，那末，他们就得到了一种最正确和最革命的宇宙观和方法论，他们就能够正确地了解革命运动的发展变化，提出革命的任务，团结自己和同盟者的队伍，战胜反动的理论，采取正确的行动，避免工作的错误，达到解放中国与改造中国的目的。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第8页

我们学习辩证法是为了什么呢？不为别的，单单为了要改造这个世界，要改造这个世界上面人与人、人与物的老关系。这个世界上面的人类大多数都过着苦难日子，受着少数人所控制的各种政治经济制度的压迫。在我们中国这个地方生活着的人类，受着惨无人道的双重性制度的压迫——民族压迫与社会压迫，我们必须改变这些老关系，争取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第40—41页

要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为什么要学习辩证法呢?因为辩证法是自然与社会的最普遍的发展法则,我们明白它,就得到了一种科学的武器,在改造自然与社会的革命实践中,就有了同这种实践相适应的理论同方法。唯物辩证法本身是一种科学(一种哲理的科学),它是一切科学的出发点,又是方法论。我们的革命实践本身也是一种科学,叫做社会科学或政治科学,如果不懂得辩证法,则我们的事情是办不好的,革命中间的错误无一不违反辩证。但如懂得了它,那就能生出绝大的效果。一切做对了的事,考究起来,都是合乎辩证法的,因此一切革命的同志们首先是干部,都应用心地研究辩证法。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第41页

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4页

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不合用,只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问题上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才合用。马克思创立了许多学说,如党的学说、民族学说、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文学艺术理论等等,也都应当当作合用的工具来看待。

《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63—264页

3. 让哲学从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15页

在再写文章时，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致李达》（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87页

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

《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32页

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处在领导工作岗位的同志和许多从事一般工作的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

命的认识论，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还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他们常常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既然如此这样，那他们的调查研究工作就不可能做好。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一九六三年——一九六五年），《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23页

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一）实践第一的观点

1. 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实践贯串着我们认识的全路程。

理论从实践产生，如果正确反映客观外界的发展过程，然后再应用这种理论于实践，就能在实践上实现这种理论，完成认识的路程。所以认识生活与实践的见地为认识论的第一与根本的见地，是唯物辩证法的见地。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一书的批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九三七年四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3—34页

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的理论。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4页

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4页

2.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承认离意识而独立存在于外界的物质是唯物论的基础，这一基础是人类从实践中得到的。劳动生产的实践，阶级斗争的实践，科学实验的实践，使人类逐渐从迷信与妄想（唯心论）脱离，逐渐认识世界之本质，而到达于唯物论。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第4页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其他社会成员协力，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成员，则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2—283页

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因此，人的

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3页

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6—287页

“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句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那些人在他们的实践中间取得了“知”,经过文字和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间接地“知天下事”。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

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路程，不过有些人故意歪曲地说些反对的话罢了。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7页

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经验的东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经验时是符合于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抽象”，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的事物，那末这些知识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7—288页

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8页

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0页

事非经过不知难，每一件小事却有丰富的内容，要从实际生活经验中才会知道。

《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24页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九六三年五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20页

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我们用锄头、机器等等改造世界，我们的认识就深入了。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如锄头是手臂的延长，望远镜是眼睛的延长，身体五官都可以延长。

《关于人的认识问题》（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
第8卷第390页

3. 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
283页

这种基于实践的由浅入深的辩证唯物论的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没有一个人这样解决过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唯物地而且辩证地指出了认识的深化的运动，指出了社会的人在他们的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复杂的、经常反复的实践中，由感性认识到论理认识的推移的运动。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
286页

4.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有人说，一般公认的就是客观真理（主观唯心论者波格达诺夫这样说）。照这种意见，那末，宗教和偏见也是客观真理了，因为宗教和偏见虽然实质上是谬见，可是却常常为多数人所公

认，有时正确的科学的思想反不及这些谬见的普及。唯物辩证法根本反对这种意见，认为只有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性的科学知识，才能被称为真理，一切真理必须是客观的。真理与谬说是绝对对立的，判断一切知识是否为真理，惟一的看它们是否反映客观的规律。如果不合乎客观规律，尽管是一般人都承认的，或革命运动中某些说得天花乱坠的理论，都只能把它当作谬说看待。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第25页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4页

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4页

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在前面说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认识运动中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也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2页

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自然科学家们创立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辩证唯物论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2—293页

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所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所谓“生活、实践底观点，应该是认识论底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理由就在这个地方。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3页

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63页

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68页

所谓经验，就是实行政策的过程和归宿。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

《关于工商业政策》（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86页

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90页

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对五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414页

所谓认识客观真理，即是人在实践中，反映客观外界的现

象和本质，经过渐变和突变，成为尚未经过考验的主观真理。要认识这一过程中所得到的主观真理是不是真正反映了客观真理（即规律性），还得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一九六三年——一九六五年），《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24—325页

● 辩证唯物主义者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

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68页

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73—874页

马克思主义是按客观情况办事的，客观情况就包括客观效果。群

众爱看，证明领导得好；群众不爱看，领导就不那么高明吧？

《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2页

（二）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1. 物质与意识

- 物质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

承认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是以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客观存在为前提的。隶属于唯物论营垒的第一个条件就是承认物质世界离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人类出现以前它就存在，人类出现以后也是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承认这一点是一切科学研究的根本前提。

拿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证据是多得很的。人类时刻同外界接触，还须用残酷的手段去对付外界（自然界同社会）的压迫和反抗；还不但应该而且能够克服这些压迫和反抗——所有这些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表现出来的人类社会实践的实在情形，就是最好的证据。经过了万里长征的红军，不怀疑经过地区连同长江大河、雪山草地以及和他作战的敌军等等的客观存在，也不怀疑红军自己的客观存在；中国人不怀疑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国人自己的客观存在；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也不怀疑这个大学和学生自己的客观存在；这些东西都是客观地离开我们意识而独立存在的物质的东西，这是一切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也就是哲学的物质观。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第13页

哲学的物质观同自然科学的物质观是不相同的。如果说哲学的物质观在于指出物质的客观存在，所谓物质就是说的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整个世界（这个世界作用于人的感官，引起人的感觉，并在感觉中得到反映），那末这种说法是永远不起变化的，是绝对的。自然科学的物质观则在于研究物质的构造，例如从前的原子论，后来的电子论等等，这些说法是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而变化的，是相对的。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第13—14页

辩证法唯物论的物质观，不承认世界有所谓非物质的东西（独立的精神的东西）。物质是永久与普遍存在的，不论在时间与空间上都是无限的，如果说世界上有一种“从来如此”与“到处如此”的东西（就其统一性而言），那就是哲学上的所谓客观存在的物质。用彻底的唯物论见地（即唯物辩证法见地）来看意识这种东西，那末，所谓意识不是别的，它是物质运动的一种形态，是人类物质头脑的一种特殊性质，是使意识以外的物质过程反映到意识之中来的那种物质头脑的特殊性质。由此可知，我们区别物质同意识并把二者对立起来是有条件的，就是说只在认识论的见地有意义。因为意识或思维只是物质（头脑）的属性，所以认识与存在的对立就是认识的物质同被认识的物质的对立，不会多一点。这种主体同客体的对立，离开认识论领域就毫无意义。假如在认识论以外还把意识同物质对立起来，就无异于背叛唯物论。世界上只有物质同它的各种表现，主体自身也是物质的，所谓世界的物质性（物质是永久与普遍的），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与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就是这个意思。一句话，物质是世界的一切。“一统归于司马懿”，我们说

“一统归于物质”，这就是世界的统一原理。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第14—15页

辩证法唯物论的第一个基本原则，在于它的物质论，即承认世界的物质性，物质客观实在性和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这种世界的统一原理，在前面物质论中已经解决了。

辩证法唯物论的第二个基本原则，在于它的运动论（或发展论），即承认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形式，是物质内在的属性，是物质多样性的表现，这就是世界的发展原理。世界的发展原理同上述世界的统一原理相结合，就成为辩证法唯物论整个的宇宙观。世界不是别的，就是无限发展的物质世界（或物质世界是无限发展的）。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第15页

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形式，空间和时间也是物质存在的形式。运动的物质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中，并且物质的运动本身是以空间和时间这两种物质存在的形式为前提的。空间和时间不能与物质相分离。“物质存在于空间”这句话，是说物质本身具有伸张性，物质世界是内部存在着伸张性的世界，不是说物质被放在一种非物质的空虚的空间中。空间和时间都不是独立的非物质的东西，也不是我们感觉性的主观形式，它们是客观物质世界存在的形式。它们是客观的，不存在于物质以外，物质也不存在于它们以外。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第19页

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见解，意识的来源，是由无意识的无机界发展到具有低级意识形态的动物界，再发展到具有高级意识形态的人类。高级意识形态不但同生理发展中的高级神经系统不可分离，而且同社会发展中的劳动生产不可分离。马克思、恩格斯曾经着重指出意识对物质生产发展的依赖关系，和意识同人类言语发展的关系。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第20页

真理首先是客观的。在承认了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及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之后，就等于承认了真理的客观性。所谓客观真理，就是说，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是我们的知识或概念的内容之唯一来源，再也没有别的来源。只有唯心论者否认物质世界离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这一唯物论的基本原则，才主张知识或概念是主观自生的，不要任何客观的内容，因而承认主观真理，否认客观真理。然而这是不合事实的，任何一种知识或一个概念，如果它不是反映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它就不是科学的知识，不是客观真理，而是主观的自欺欺人的迷信或妄想。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第24页

● 世界是可知的

做一个彻底的唯物论者，单承认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是不够的，还须承认意识对于物质的可认识性。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第22页

客观真理在我们感觉和概念中，虽不是一次就取完成的形态，然而不是不能认识的。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反对不可知论的见解，认为意识是能够在认识过程中反映客观真理的。认识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当未被认识的“自在之物”，反映到我们的感觉印象概念上来时，就变成“为我之物”了。感觉和思维，并不是如同康德所说的那样把我们同外界隔离开来，而是把我们同外界联系起来的，感觉和思维就是客观外界的反映。思想的东西（印象和概念）并非别的，不过是“人类头脑中所转现出来和改造过来的物质的东西”（马克思）。在认识过程中，物质世界是愈走而愈接近地、愈精确地、愈多方面地和愈深刻地反映在我们的认识中。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第23页

唯物辩证法的反映论认为我们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是无限度的，这和不可知论者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度的那种见解根本相反。但我们之接近绝对真理，却每一次有其历史上的确定界限。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第23页

物质世界是可认识的，不是不可认识的。

《读博古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一书的批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以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98页

- 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反作用于物质，思维与存在具有同一性

马克思主义继续和发展哲学中的唯物论路线，正确地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即彻底唯物地指出世界的物质性，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和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或意识对于存在的依赖关系）。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第13页

世界是物质的，不是精神的。

物质决定精神，不是精神决定物质。

《读博古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一书的批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以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96页

基本方面就是主导方面。物质对精神主导，它就包括了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五四运动之成为新文化运动是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所决定，它反过来又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原是中国资本主义本身的要求。

《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一书的批注》（一九三九年五月以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77页

当然，思维和存在不能划等号。说二者同一，不是说二者等同，不是说思维等同于存在。思维是一种特殊物质的运动形态，它能够反映客观的性质，能够反映客观的运动，并且由此产生科学的预见，而这种预见经过实践又能够转化成为事物。恩格斯举了这方面的例子。也可以拿我们的人民大会堂作一个例子。人民大会堂现在是事物，但是在它没有开始建设以前，只是一个设计的蓝图，而蓝图则是

思维。这种思维又是设计工程师们集中了过去成千成万建筑物的经验,并且经过多次修改而制定出来的。许多建筑物转化成人民大会堂的蓝图——思维,然后蓝图——思维交付施工,经过建设,又转化为事物——人民大会堂。这就说明蓝图能够反映客观世界,又能够转化为客观世界;说明客观世界可以被认识,人们的主观世界可以同客观世界相符合,预见可以变为事实。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3—104页

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只要肯定了这一条,我们就同唯心主义划清界限了。然后还要进一步解决客观存在能否认识、如何认识的问题。还是马克思说的那些话对,思维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说思维和存在不能等同,是对的,但是因此就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则是错误的。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4页

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因为思想、认识是物质运动的反映。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5页

2. 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认识过程的第一次飞跃

●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认识过程中的两个不同的阶段

认识目的在把感觉材料作论理理解,两个阶段有区别,但

不是不可逾越的。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一书的批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九三七年四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5页

感性认识：片面、现象、外的联系。

理性认识：全体、本质、内的联系。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一书的批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九三七年四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6页

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例如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两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这些就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这叫做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和印象的阶段。也就是延安这些各别的事物作用于考察团先生们的感官，引起了他们的感觉，在他们的脑子里生起了许多的印象，以及这些印象间的大概的外部的联系，这是认识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还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论理（即合乎逻辑）的结论。

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

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们普通说话所谓“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这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外来的考察团先生们在他们集合了各种材料，加上他们“想了一想”之后，他们就能够作出“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在他们作出这个判断之后，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真实的话，那末他们就能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这个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也就是理性认识的阶段。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4—286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论理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6页

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0页

什么是比较完全的知识呢？一切比较完全的知识都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第一阶段是感性知识，第二阶段是理性知识，理性知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发展阶段。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16页

我们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如果误用了他们的经验，也是要出毛病的。不错，这样的人往往经验很多，这是很可宝贵的；但是如果他们就以自己的经验为满足，那也很危险。他们须知自己的知识是偏于感性的或局部的，缺乏理性的知识和普遍的知识，就是说，缺乏理论，他们的知识也是比较地不完全。而要把革命事业做好，没有比较完全的知识是不行的。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18页

有两种不完全的知识，一种是现成书本上的知识，一种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识，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结合，才会产生好的比较完全的知识。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18页

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18—819页

● 感性认识必须上升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

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179—180页

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重复地说，论理的认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论理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
286页

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6页

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在其实践的初期——破坏机器和自发斗争时期，他们还只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只认识资本主义各个现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联系。这时，他们还是一个所谓“自在的阶级”。但是到了他们实践的第二个时期——有意识有组织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期，由于实践，由于长期斗争的经验，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的方法把这种种经验总结起来，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以教育无产阶级，这样就使无产阶级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了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这时他们就变成了一个“自为的阶级”。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8—289页

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9页

这里再重复说一说，就是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的问题。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哲学史上有所谓“唯理论”一派，就是只承认理性的

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0页

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我这里不来说经验只是所谓内省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1页

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庸俗的事务主义者不是这样，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

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1页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对于唯物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但在认识论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对于一个小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事物或一件工作的认识）是如此，对于一个大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社会或一个革命的认识）也是如此。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1—292页

三大革命运动中的科学实验，主要是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不能完全采用实验的方法。例如研究政治经济学不能用实验方法，要用抽象法，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的。商品、战争、辩证法等，是观察了千百次现象才能得出理论概括的。

《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52页

人对事物的认识，总要经过多少次反复，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要积累大量的感性材料，才会引起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道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讲清楚，列宁也没有讲清

楚。列宁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只讲清楚了唯物论，没有完全讲清楚认识论。

《关于人的认识问题》（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

第8卷第389页

3. 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认识过程的第二次飞跃，其意义更加伟大

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

292页

社会的人们投身于变革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实践中（不论是关于变革某一自然过程的实践，或变革某一社会过程的实践），由于客观过程的反映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得人们的认识由感性的推移到了理性的，造成了大体上相应于该客观过程的法则性的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然后再应用这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于该同一客观过程的实践，如果能够实现预想的目的，即将预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在该同一过程的实践中变为事实，或者大体上变为事实，那末，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然而一般地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3—294页

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

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九六三年五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20—321页

4. 认识的目的是改造世界

反映不是被动的摄取对象，而是一个能动的过程。在生产 and 阶级斗争中，认识是能动的因素，起着改造世界的作用。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一书的批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九三七年四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5—16页

哲学的研究不是为着满足好奇心，而是为改造世界。

认识世界的规律性，找到正确的理论，为着有效的指导实践，改造世界。

《读米丁等著沈志远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一书的批注》(一九三七年七月以前)，《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52页

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种根据科学认识而定下来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到达了一个历史的时节——自有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6页

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九六三年五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21页

5. 人类认识运动的总规律

●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

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践

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5—296页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6—297页

我们的头脑、思想反映客观实际，无论什么时候谁都不可能一下子就反映得完全正确，无遗无误。客观实际是错综复杂的，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的头脑、思想对客观实际的反映，是一个由不完全到更完全、不很明确到更明确、不深入到更深入的发展变化过程，同时还要随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

《同长征、艾地的谈话》（一九五六年三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6—17页

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九六三年五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21页

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问他的思想、意见、政策、方法、计划、结论、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哪里得来的,他觉得是个怪问题,回答不出来。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九六三年五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21页

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上、在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在太阳系外有无数个恒星,太阳系和这些恒星组成银河系。银河系外又有无数个“银河系”。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宇宙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电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庄子讲“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对的。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门科学就不再会发展了。如果我们的认识是有穷尽的,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认识到了,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关于人的认识问题》(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
第8卷第389页

● 人类总是通过认识相对真理来逐步接近绝对真理

真理是客观的,相对的,又是绝对的,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的真理观。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第24页

唯物辩证法在认识客观真理时,就是承认了绝对真理的。因为当我们说知识的内容是客观世界的反映时,这就等于承认了我们知识的对象是那个永久的绝对的世界。“关于自然之一切真理的认识,就是永久的无穷的认识,因此它实质上是绝对的”(恩格斯)。然而客观的绝对的真理不是一下子全部成为我们的知识,而是在我们认识之无穷的发展过程中,经过无数相对真理的介绍,而到达于绝对的真理。这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真理的表现。人类的思维,就它的本性说,能给我们以绝对真理,绝对真理乃由许多相对真理积集而成,科学发展的每一阶段,增加新的种子到这个绝对真理的总和中去。但是每一科学原理的真理界限却总是相对的。绝对真理仅能表现在无数相对真理之上,如果不经过相对真理的表现,绝对真理就无从认识。唯物辩证法并不否认一切知识之相对性,但这只是指吾人知识接近于客观绝对真理的限度之历史条件性而言,而不是说知识本身只是相对的。一切科学上的发明,都是历史的有限度的和相对的,但是科学知识跟谬说不同,它显示着描画着客观的绝对的真理,这就是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相互关系之辩证法的见解。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第25页

有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另一种是唯心论的相对论，对于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之相互关系问题都是不正确的。

形而上学的唯物论者，根据于他们“物质世界无变化”的形而上学的基本原则，认为人类思维也是不变化的，即认为在人的意识中这一成不变的客观世界，是一下子整个被摄取了。这就是说，他们承认绝对真理，而这个绝对真理是一次被人获得的，他们把真理看成不动的、死的、不发展的东西。他们的错误不在于他们承认有绝对真理——承认这一点是正确的，而在于他们不了解真理的历史性，不把真理的获得看作一个认识的过程。不了解所谓绝对真理者，只能在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中一步一步地开发出来，而每一步向前的认识，都表现着绝对真理的内容，但对于全部真理说来，它具有相对的意义，并不能一下子获得绝对真理的全部。形而上学的唯物论关于真理的见解，表现了认识论的一个极端。

认识论中关于真理问题的再一个极端，就是唯心论的相对论。他们否认知识之绝对真理，只承认它的相对意义。他们认为一切科学的发明，都不包含绝对真理，因而也不是客观真理，真理只是主观的与相对的。既然这样，那末，一切谬说就都有存在的权利了，帝国主义侵略弱小民族，统治阶级剥削劳动群众；这些侵略主义与剥削制度也就是真理，因为真理横直只是主观的与相对的。否认客观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结果，必然到达这样的结论。并且唯心论的相对论，它们的目的本来就是为着要替统治阶级作辩护的，例如相对论的实用主义（或实验主义）之目的，就在于此。

这样看来，不论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或是唯心论的相对论，都不能正确解决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只有唯物辩证法，既给思维与存在相互关系问题以正确的解答，并且随之而来又确定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再则，还同时给了绝对与相对真理以正确的理解。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的真理论。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第25—26页

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性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5页

到达了每一相对真理，就是到达了绝对真理之一部分。除开相对真理，无绝对真理，同样除开绝对真理，就无相对真理。

《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一书的批注》（一九三九年五月以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34—335页

认识能力在各个阶段是有限的，在全历史上是无限的，方能逐渐地把握绝对真理。不承认这个认识能力的历史无限性，就要陷入不可知论。

《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一书的批注》（一九三九年五月以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65—366页

事物的历史是无穷的，事物与事物的相互关系是无穷的，因而其属性是无穷的。普通所谓“全面暴露”，实只其有限的一些

部分、一些片断。

《关于人的基本特性及其他》(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81页

人的思想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着的,不是一开始就完备的,也永远不能完备。

《关于人的基本特性及其他》(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82页

事情总是不完全的,这就给我们一个任务,向比较完全前进,向相对真理前进,但是永远也达不到绝对完全,达不到绝对真理。所以,我们要无穷尽无止境地努力。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00页

绝对真理包括在相对真理里面。相对真理的积累,就使人们逐步地接近于绝对真理。不能认为相对真理只是相对真理,不包含任何绝对真理的成分,而到了一天人们忽然找到了绝对真理。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6页

6. 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在实践中实现主体与客体的辩证法的统一。

改变外界,同时又改变自己。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一书的批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九三七年四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7页

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6页

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6页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当然，剥削者的改造和劳动者的改造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改造，不能混为一谈。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3页

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也就是说，每年都在改造。我这个人从前就有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受的。我在书本上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初步地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还是在长期阶级斗争中改造过来的。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学习，才能再有一些进步，否则就要落后了。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3页

7. 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造出的。但不认识世界就不能改造世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这一方面，我们的老爷是茫然了。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须经过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的。欧洲的旧哲学家，已经懂得“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个真理。马克思的贡献，不是否认这个真理，而是在承认这个真理之后补充了它的不足，加上了根据对必然的认识而“改造世界”这个真理。“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是旧哲学家的命题。“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而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得来的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的反映（关于国内阶级关系，关于国内民族关系，关于国际各国相互间的关系，以及关于国际各国与中国相互间的关系等等情况的能动的反映）。我们的老爷之所以是主观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的一切革命图样，不论是大的和小的，总的和分的，都不根据于客观实际和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他

们只有一个改造世界或改造中国或改造华北或改造城市的主观愿望，而没有一个像样的图样，他们的图样不是科学的，而是主观随意的，是一塌胡涂的。老爷们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老爷们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

《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节选）》（一九四一年），《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43—344页

自由是“被认识了必然”，说的是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客观规律是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是和人们的主观认识相对立的。但是，人们通过实践，认识了客观规律，就能够熟练地运用这些规律，驾驭这些规律，达到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

《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记录》（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十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第28页

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一九六〇年六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98页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例如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一九二一年党的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二十四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8页

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问，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0页

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6页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一九六三年——一九六五年），《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25页

人类总是要犯一些错误才能显出他们的正确。对客观必然规律不认识而受它的支配，使自己成客观外界的奴隶，直至现在以及将来，乃至无穷，都在所难免。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不然，发展也就会停止了，科学也就会不存在了。要知道，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这是因为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人类本身（即人的身体）都是永远认识不完全的。如果说有一天认识完全了，社会全善全美了（如神学所说那样），那就会导致绝对的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一九六三年——一九六五年），《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26页

（三）掌握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1. 认识客观规律要经过反复实践和总结

语言、文字、思想是反映客观实际的，但是，客观实际的规律要反映成观念形态的规律，需要有千百次的反复，才能比较正确。

《切实执行十大政策》（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74页

规律，开始总是少数人认识，后来才是多数人认识。就是对少数人说来，也是从不认识到认识，也要经过实践和学习的过程。任何人开始总是不懂的，从来也没有什么先知先觉。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4页

认识规律，必须经过实践，取得成绩，发生问题，遇到失败，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使认识逐步推进。要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在实践中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4—105页

规律是在事物的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东西，不是偶然出现的东西。规律既然反复出现，因此就能够被认识。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5页

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6页

级差地租不完全是由客观条件形成的。“事在人为”，在土地改良里是很重要的。自然条件相同，经济条件相同，一个地方“人为”了，结果就好；一个地方“人不为”，结果就不好。例如，在河北省内，京汉路沿线的机井很多，津浦路

沿线的机井却很少，同样是河北平原，同样是交通方便，但是土地的改良却各不相同。这里可能有土地利于或不利于改良的原因，也可能有不同的历史原因，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事在人为”。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7页

人们必须在自己的实践中，精心地去寻找客观事物的固有的而不是自己主观地臆造出来的规律，并利用这种由客观反映到主观的规律，亦即客观真理转化为主观真理，就可以改造客观世界，实现人们的理想。否则是不可能的。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印发四个文件的批语》（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五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210页

2. 主观指导必须符合客观规律

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71页

人类以改变环境为目的之一切实际行动，不管是生产行动也罢，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的行动也罢，其他任何一种行动也罢，都是受着思想（知识）的指挥的，这种思想如果不适合于客观的规律性，即客观规律性没有反映到行动的人的脑子里去，没有构成他的思想或知识的内容，那末这种行动是一定不能达到目的的。革命运动中所谓主观指导犯错误，就是指的这种情

形。马克思主义所以成为革命的科学知识，就是因为它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世界的实际规律，它是客观的真理。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所以都是错的东西，就是因为他们不根据于正确的客观规律，完全是主观的妄想。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第24—25页

人们的主观运动的规律和外界的客观运动的规律是同一的。辩证法的规律，是客观所固有的，是客观运动的规律，这种客观运动的规律，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就成为主观辩证法。这个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是同一的。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3页

（另参见第五编“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和国防建设”，第1291—1296页）

3. 透过现象看本质，从偶然中把握必然

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99页

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在红军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在这种

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所以有这种抓住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00页

质是过程内在的定性，特性则表现此物与他物的关系上的这一定性。物之质的定性在物之许多特性上表现出来，如玫瑰的质之定性，在玫瑰之香气、颜色等许多特性上表现出来。

质同物之本身不可分的联系。物失掉某些特性还不失去质之定性，但如失了质的定性，就变成他物了。

质的定性表现为特殊的规律性。

只有认识了质的定性，即特殊规律性时才算认识了某物。

《读米丁等著沈志远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一书的批注》（一九三七年七月以前），《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82—183页

“物之所以然”是必然性，这必然性的表现形态则是偶然性。必然性的一切表现形态都是偶然性，都用偶然性表现。

《关于〈墨子哲学思想〉一文给陈伯达的信》（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57页

本质即为矛盾所规定的该现象的性质。矛盾体的斗争表现为现象，又规定该现象的性质。不了解矛盾，不能了解本质，也不能

了解现象的发生与变化。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在现象上是没有区别的，只在本质上有区别，这就是内部的区别。

《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一书的批注》（一九三九年五月以后），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85—386页

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而有些革命的人们也往往在一个期间内被这种外强中干的现象所迷惑，看不出敌人快要消灭，自己快要胜利的实质。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84页

一切事物，它的现象同它的本质之间是有矛盾的。人们必须通过对现象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了解到事物的本质，因此需要有科学。不然，用直觉一看就看出本质来，还要科学干什么？还要研究干什么？所以要研究，就是因为现象同本质之间有矛盾。但假象跟一般现象有区别，因为它是假象。所以得出一条经验，就是尽可能不要被假象所迷惑。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01页

本质总是藏在现象的后面，只有通过现象才能揭露本质。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5页

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

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原理、原则是结果，这是要进行分析，经过研究才能得出的。人的认识总是先接触现象，通过现象找出原理、原则来。而教科书与此相反，它所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绎法。形式逻辑说，人都要死，张三是人，所以张三要死。这里，人都要死是大前提。教科书对每个问题总是先下定义，然后把这个定义作为大前提，来进行演绎，证明他们所要说的道理。他们不懂得，大前提也应当是研究的结果，必须经过具体分析，才能够证明是正确的。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9页

4. 在客观条件许可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77页

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在人们头脑中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

《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一九六〇年六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
第8卷第197页

（另参见第五编“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和国防建设”，第1291—1296页）

三、唯物辩证法

（一）矛盾法则（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是宇宙的根本规律

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的统一法则。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一书的批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九三七年四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6页

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列宁常称这个法则为辩证法的本质，又称之为辩证法的核心。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个法则时，不得不涉及广泛的方面，不得不涉及许多的哲学问题。如果我们将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我们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这些问题是：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9页

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36页

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够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的方面去，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然而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不管在它们共居的时候，或者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尤其是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区别；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如果我们经过研究真正懂得了上述这些要点，我们就能够击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有经验的同志们整理自己的经验，使之带上原则性，而避免重复经验主义的错误。这些，就是我们研究矛盾法则的一些简单的结论。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36—337页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所谓对立统一，就是不同性质的对立的东西的统一。比如水，是由氢和氧两种元素结合的。如果没有氧，光有氢，或者没有氢，光有氧，都不能够搞成水。听说现在已经定下名称的化合物就有一百多万种，没有

定名称的还不知道多少。化合物都是不同性质的东西的对立统一。社会上的事情也是这样。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3页

两重性，任何事物都有，而且永远有，当然总是以不同的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性质也各不相同。例如，保守和进步，稳定和变革，都是对立的统一，这也是两重性。生物的代代相传，就有而且必须有保守和进步的两重性。稻种改良，新种比旧种好，这是进步，是变革。人生儿子，儿子比父母更聪明粗壮，这也是进步，是变革。但是，如果只有进步的一面，只有变革的一面，那就没有一定相对稳定形态的具体的动物和植物，下一代就和上一代完全不同，稻子就不成其为稻子，人就不成其为人了。保守的一面，也有积极作用，可以使不断变革中的植物、动物，在一定时期内相对固定起来，或者说相对地稳定起来，所以稻子改良了还是稻子，儿子比父亲粗壮聪明了还是人。但是如果只有保守和稳定，没有进步和变革一方面，植物和动物就没有进化，就永远停顿下来，不能发展了。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7页

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五个指头，四个指头向一边，大

拇指向另一边，这才捏得拢。

完全的纯是没有的，这个道理许多人没有想通。不纯才成其为自然界，成其为社会。完全的纯就不成其为自然界，不成其为社会，不合乎辩证规律。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的统一。

《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六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86页

(二)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

1. 矛盾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

仅认识过程之互相区别、互相对立的许多方面与许多属性，以及认识这些方面与这些属性之互相联结，是必要的，但是不够的；还须认识所以使过程发展之根本的矛盾，这就是自己运动的源泉。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一书的批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九三七年四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66页

任何现象自身的矛盾性引起事物发展，这是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的基本要素。

《读米丁等著沈志远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一书的批注》(一九三七年七月以前)，《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61页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自然界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

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2页

矛盾是简单的运动形式（例如机械性的运动）的基础，更是复杂的运动形式的基础。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5页

恩格斯说：“运动本身就是矛盾。”列宁对于对立统一法则所下的定义，说它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精神和社会两者也在内）的一切现象和过程都含有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趋向”。这些意见是对的吗？是对的。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5页

单纯的过程只有一对矛盾，复杂的过程则有一对以上的矛盾。各对矛盾之间，又互相成为矛盾。这样地组成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和人们的思想，并推使它们发生运动。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27页

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3页

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6页

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斗争的结果，走向自己的反面，建立新的统一，社会生活就前进了一步。

《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69页

没有矛盾和斗争，就没有世界，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73页

2.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

“物必先腐也，然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然后谗入之”。“非战之罪，乃天亡我”的说法是错误的。五次反“围剿”失败，敌人的强大是原因，但战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外交政策之罪，军事冒险之罪，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帝国主义吸引与国民党叛变，对于革命说当然是原因。外的力量，须通过内的规律性（机会主义等）才能曲折的即间接的发生影响。流水不腐，非流水腐；户枢不蠹，非户枢蠹。物之本身情况如何，是第一原因。国民党能够破苏区与红军，但必须苏区与红军存在有不能克服的弱点。若能克服弱点，自己巩固，则谁也不能破坏。红军至今没有被破坏，就因为此。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被破坏，主要的是内的原因。西路军亦然。“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九一八之不能抵御，原于一九二七

年之失败。今日国难之是否得救，决定于统一战线能不能发展与巩固，不决定于日本。国民党之不能照旧不变的存在，原于其政策与组成之弱点。资本主义之必然灭亡，原于其内在的矛盾。阶级与政党之兴亡，原于其自身之条件。人之健病、生死，原于其自身条件。机械力推动物体运动，通过物体自身的可动性。任何事物、任何过程，外力是有影响的，且是严重的影响，然必通过内的情况才起作用。决定的东西属于内力。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一书的批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九三七年四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06—109页

外因通过内因并被曲折才能发展。

不废除外因，但内因是主导的。不明内因，即无从了解发展。

《读米丁等著沈志远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一书的批注》（一九三七年七月以前），《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60页

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这样，唯物辩证法就有力地反对了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的外因论或被动论。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1—302页

单纯的外部原因只能引起事物的机械的运动，即范围的大小，数量的增减，不能说明事物何以有性质上的千差万别及其互相变化。事实上，即使是外力推动的机械运动，也要通过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植物和动物的单纯的增长，数量的发展，主要地也是由于内部矛盾所引起的。同样，社会的发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内因。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2页

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影响是时常存在的。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激动，是极其巨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的变化，同样地而且还特别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通过各国内部和中国内部自己的规律性而起的。两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决于内因。胜者或因其强，或因其指挥无误，败者或因其弱，或因其指挥失宜，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一九二七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机会主义的时候，中国革命就重新发展了。后来，中国革命又受了敌人的严重的打击，是因为我们党内产生了冒险主义。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冒险主义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又重新发展了。由此看来，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

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2—303页

（三）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1. 矛盾的普遍性

● 矛盾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

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5页

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5页

由此看来，不论是简单的运动形式，或复杂的运动形式，不论是客观现象，或思想现象，矛盾是普遍地存在着，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这一点已经弄清楚了。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6页

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

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7页

新过程的发生是什么呢？这是旧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分让位于新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分，于是新过程就代替旧过程而发生。旧过程完结了，新过程发生了。新过程又包含着新矛盾，开始它自己的矛盾发展史。

事物发展过程的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列宁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模范地作了这样的分析。这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所必须应用的方法。列宁自己也正确地应用了它，贯彻于他的全部著作中。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7页

一切过程中矛盾着的各方面，本来是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互相对立的。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过程里和人们的思想里，都包含着这样带矛盾性的方面，无一例外。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27页

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4页

矛盾是永远存在的，一万年以后还是有的。一个矛盾克服了，又一个矛盾产生了。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任何人身上，

总是有矛盾存在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66页

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

《给黄炎培的信》（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四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64页

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是充满着矛盾的。有些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没有一处不存在矛盾，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以加以分析的。如果承认一个人是不可加以分析的，就是形而上学。你看在原子里头，就充满矛盾的统一。有原子核和电子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原子核里头又有质子和中子的对立统一。质子里又有质子、反质子，中子里又有中子、反中子。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

《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32页

● 差异就是矛盾

从苏联哲学界批判德波林学派的文章中看出，德波林学派有这样一种见解，他们认为矛盾不是一开始就在过程中出现，须待过程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出现。那末，在那一时间以前，过程发展的原因不是由于内部的原因，而是由于外部的原因了。这样，德波林回到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和机械论去了。拿这种见解

去分析具体的问题，他们就看见在苏联条件下富农和一般农民之间只有差异，并无矛盾，完全同意了布哈林的意见。在分析法国革命时，他们就认为在革命前，工农资产阶级合组的第三等级中，也只有差异，并无矛盾。德波林学派这类见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不知道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劳资之间，从两阶级发生的时候起，就是互相矛盾的，仅仅还没有激化而已。工农之间，即使在苏联的社会条件下，也有差异，它们的差异就是矛盾，仅仅不会激化成为对抗，不取阶级斗争的形态，不同于劳资间的矛盾；它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巩固的联盟，并在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地解决这个矛盾。这是矛盾的差别性的问题，不是矛盾的有无的问题。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6—307页

“差别不是矛盾”的说法不对。应说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一个人坐椅摇笔濡墨以从事作文，是因人与作文这两个一定的条件把矛盾的东西暂时地统一了，不能说这些差别不是矛盾。大师傅煮饭，把柴米油盐酱醋茶在一定的条件下统一起来。店员与作家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统一起来。半工半读，可以把工、读统一起来。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的矛盾。

《关于差别和矛盾问题》（一九三七年），《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1—32页

2. 矛盾的特殊性

- 矛盾各有其特殊性，矛盾的各方面又各有其特点

各种不同的运动形式，由于有不同的性质，由于有不同的矛盾。

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

《读米丁等著沈志远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一书的批注》(一九三七年七月以前)，《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66页

物质运动之各种不同的形式。每种事物有一定的运动形态，有些有几种运动形态，但必有一种运动形式是表现该物的特质的。不同的运动形态，就是表现不同的特质或定性。

《读米丁等著沈志远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一书的批注》(一九三七年七月以前)，《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81页

首先是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特殊性。人的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因为除了运动的物质以外，世界上什么也没有，而物质的运动则必取一定的形式。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8页

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据。自然界存在着许多的运动形式，机械运动、发声、发光、发热、电流、化分、化合等等都是。所有这些物质的运动形式，都是

互相依存的，又是本质上互相区别的。每一物质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本质，为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所规定。这种情形，不但在自然界中存在着，在社会现象和思想现象中也是同样地存在着。每一种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8—309页

不但要研究每一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规定的本质，而且要研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质。一切运动形式的每一个实在的非臆造的发展过程内，都是不同质的。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着重这一点，而且必须从这一点开始。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10页

为要暴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上的特殊性，就是说暴露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就必须暴露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否则暴露过程的本质成为不可能，这也是我们作研究工作时必须十分注意的。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11页

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的矛盾。例如，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有中国社会各被压迫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有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各个反动的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情形是非常

复杂的。这些矛盾，不但各各有其特殊性，不能一律看待，而且每一矛盾的两方面，又各各有其特点，也是不能一律看待的。我们从事中国革命的人，不但要在各个矛盾的总体上，即矛盾的相互联结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研究这些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事情。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11—312页

不但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在其相互联结上，在其各方情况上，我们必须注意其特点，而且在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也有其特点，也必须注意。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14页

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须在其联结上、在其总体上去看，而且必须从各个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去看。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15页

由此看来，不论研究何种矛盾的特性——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研究所有这些矛盾的

特性，都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实行具体的分析。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17页

矛盾的多样性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是事物在历史发展中表现的多样；第二，是在空间中各种不同矛盾的并存。

《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一书的批注》（一九三九年五月以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75页

中国古代的圣人之一孟子曾经说过：“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就是说，事物的多样性是世界的实况。马克思主义也是承认事物的多样性的，这是同形而上学不同的地方。

《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四次谈话》（一九五四年十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64页

● 认识矛盾特殊性是认识事物的基础

研究从辨异入手。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一书的批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九三七年四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41页

辩证唯物论看问题，有暴露任何过程内部矛盾的特殊性之必要，同时认识过程各方面的矛盾之特殊性也是必要的。对立的两方面中，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地位，即每方的特性如何，各用怎样的具体形式同对方发生依存关系，在依存破裂时，又各用何种形式同对方斗争。研究这些问题，是我们的任务。列宁主义就是研究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各种具体形式的科学。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一书的批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九三七年四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74—75页

质是现象的定性，规定现象之特殊个性，因此使各现象能互相区别。

科学研究要从质之特点的认识入手。

《读米丁等著沈志远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一书的批注》（一九三七年七月以前），《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80—181页

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8页

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例如，数学中的正数和负数，机械学中的作用和反作用，物理学中的阴电和阳电，化学中的化分和化合，社会科学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阶级和阶级的互相斗争，军事学中的攻击和防御，哲学中的唯心论和唯物论、形而上学观和辩证法观等等，都是因为具有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才构成了不同的科学研究的对象。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9页

3. 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

固然，如果不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据；但是，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9页

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

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9—310页

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普遍性。资本主义制度所包含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是所有有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的各国所共有的东西，对于资本主义说来，这是矛盾的普遍性。但是资本主义的这种矛盾，乃是一般阶级社会发展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东西，对于一般阶级社会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说来，这是矛盾的特殊性。然而，当着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切矛盾的特殊性解剖出来之后，同时也就更进一步地、更充分地、更完全地把一般阶级社会中这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普遍性阐发出来了。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18页

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

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18页

斯大林在他的名著《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说明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的时候，他分析了列宁主义所由产生的国际环境，分析了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已经发展到极点的资本主义的诸矛盾，以及这些矛盾使无产阶级革命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并造成了直接冲击资本主义的良好的条件。不但如此，他又分析了为什么俄国成为列宁主义的策源地，分析了沙皇俄国当时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以及俄国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国际的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原因。这样，斯大林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矛盾的普遍性，说明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又分析了沙俄帝国主义在这一般矛盾中所具有的特殊性，说明俄国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策略的故乡，而在这种特殊性中间就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斯大林的这种分析，给我们提供了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互相联结的模范。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18—319页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

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

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19—320页

讲到个性与党性，党性就是普遍性，个性就是特殊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础上的。没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没有党员的个性，哪里有党性？党性是共同的性质、普遍的性质，全党每一个人都有的性质。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40页

过渡时期完结、彻底消灭了阶级以后，单就国内情况来说，政治就完全是人民内部的关系。那时候，人和人之间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以及革命一定还是会有有的，并且不可能没有。对立统一的规律，量变质变的规律，肯定否定的规律，永远地普遍地存在。但是斗争和革命的性质跟过去不同，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内部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社会制度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科学技术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2页

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

《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451页

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研究通史的人，如果不研究个别社会、个别时代的历史，是不能写出好的通史来的。研究个别社会，就是要找出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把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研究清楚了，那末整个社会的普遍规律就容易认识了。要从研究特殊中间，看出一般来。特殊规律搞不清楚，一般规律是搞不清楚的。例如要研究动物的一般规律，就必须分别研究脊椎动物、非脊椎动物等等的特殊规律。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6页

（四）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1. 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矛盾着的力量是主要的矛盾；其他的矛盾力量，例如，残存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农民小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无

产阶级和农民小资产者的矛盾，自由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矛盾，以及其他的矛盾，都为这个主要的矛盾力量所规定、所影响。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20页

半殖民地的国家如中国，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着复杂的情况。

当着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中国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战争和目前的中日战争，都有这种情形。

然而在另一种情形之下，则矛盾的地位起了变化。当着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压迫而是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就会向帝国主义投降，二者结成同盟，共同压迫人民大众。这种时候，人民大众往往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同盟，而帝国主义则往往采取间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动派压迫人民，而不采取直接行动，显出了内部矛盾的特别尖锐性。中国的辛亥革命战争，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一九二七年以后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都有这种情形。还有半殖民地国家各个反动的统治集团之间的内战，例如在中国的军阀战争，也属于这一类。

当着国内革命战争发展到从根本上威胁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内反动派的存在的时候，帝国主义就往往采取上述方法以外的方法，企图维持其统治：或者分化革命阵线的内部，或者直接出兵援助国内反动派。这时，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完全公开地站在一个极端，人民大众则站在另一极端，成为一个主要矛盾，而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发展状态。十月革命后各资本主义国家援助俄国反动派，是武装干涉的例子。一九二七年的蒋介石的叛变，是分化革命阵线的例子。

然而不管怎样，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只有一种主要的矛盾起着领导的作用，是完全没有疑义的。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20—322页

2. 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

在各种矛盾之中，不论是主要的或次要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又是否可以平均看待呢？也是不可以的。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22页

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

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就互易其位置，这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22—323页

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23页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已从旧的封建主义社会时代的附庸地位，转化成了取得支配地位的力量，社会的性质也就由封建主义的变为资本主义的。在新的资本主义社会时代，封建势力则由原来处在支配地位的力量转化为附庸的力量，随着也就逐步地归于消灭了，例如英法诸国就是如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由新的起进步作用的阶级，转化为旧的起反动作用的阶级，以至于最后被无产阶级所推翻，而转化为私有的生产资料被剥夺和失去权力的阶级，这个阶级也就要逐步归于消灭了。人数比资产阶级多得多、并和资产阶级同时生长、但被资产阶级统治着的无产阶级，是一个新的力量，它由初期的附属于资产阶级的地位，逐步地壮大起来，成为独立的和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阶级，以至最后夺取政权成为统治阶级。这时，社会的性质，就由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化成了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这就是苏联已经走过和一切其他国家必然要走的道路。

就中国的情形来说，帝国主义处在形成半殖民地这种矛盾的主要地位，压迫中国人民，中国则由独立国变为半殖民地。然而事情必然会变化，在双方斗争的局势中，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所生长起来的力量必然会把中国由半殖民地变为独立国，而帝国主义则将被打倒，旧中国必然要变为新中国。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23—324页

旧中国变为新中国，还包含着国内旧的封建势力和新的人民势力之间的情况的变化。旧的封建地主阶级将被打倒，由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这个阶级也就会要逐步归于消灭。人民则将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由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这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就会起变化，由旧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变为新的民主的社会。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24页

矛盾的两方面，可能成为主导方面的基本上只有一个。如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资产阶级是主导方面；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只有无产阶级是主导方面。中国民主革命在无产阶级幼稚时代，只有资产阶级是主导方面（同盟会）；而在无产阶级政治上觉悟了的时代，它就成了推动中国革命前进的主导方面。

《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一书的批注》（一九三九年五月以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78—379页

统一物的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有个次。……在一定的意义上，这可以比作原子里面的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一个原子分两部分，一部分叫原子核，一部分叫电

子。原子核很小，可是很重。电子很轻，一个电子大约只有最轻的原子核的一千八百分之一。原子核也是可以分割的，不过结合得比较牢固。电子可有些“自由主义”了，可以跑掉几个，又来几个。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也是对立统一，有主有次。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97页

3. 善于捉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 捉住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苏联过渡期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个矛盾不断发生的基础是富农的存在。其他一切矛盾，都受这个主要矛盾所规定。只有由于工业化及农业社会化，才能将此主要矛盾解决，但有用内部力量解决此矛盾之可能。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一书的批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九三七年四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69页

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的地位，使它们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但是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或消灭。中国和日本以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亦然。因此，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下列的任务：适当地调整国内国际在现时可能和必须调整的矛盾，使之适合于团结抗日的总任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要求和平统一、民主政治、改良生活及与反对日本的外国进行谈判种种方针之所由来。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54页

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列宁和斯大林研究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时候，列宁和斯大林研究苏联经济的时候，也告诉了这种方法。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22页

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22页

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02页

● 研究矛盾的各种不平衡的情况，是革命政党正确决策的重要方法之一

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如果不研究过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这两种情形，也就是说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那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

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或特殊性,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同时,这种具体的矛盾状况,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正是表现出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力量。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26—327页

要有坚定的方向,不要动摇。要别人不动摇,就要自己首先不动摇。要看到问题的本质方面,要看到事物的主导或主流方面,这样才能不动摇。事物的非本质方面,次要方面必须不忽略,必须去解决存在着的一切问题,但不应将这些看成事物的主流,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在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最近情况简报上写的文字》(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229—230页

(五) 矛盾的同性和斗争性

1. 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

对立的两方面相互结合,并转变到新的对立,即所谓相互渗透。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对立关系的相互渗透。

游击战争与正规战争，保存游击性与克服游击性；分配土地的土地私有与准备转变为社会主义；共产党的民族性与国际性；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战争与和平，和平与战争；同资产阶级联盟与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叛变；共产党同国民党妥协，正是加强共产党的独立性；军队的休息训练，同时即是加强战斗力；退却与防御，同时即是准备进攻；良药苦口，同时却利于病；忠言逆耳，同时却利于行；羊肉好吃，无奈烫得慌；玫瑰花儿可爱，刺多扎手；佳人却可倾国；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都是互相渗透、互相转变的对立。一切对立都是这样的。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一书的批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九三七年四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76—78页

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联结或互相合作，这些不同的名词都是一个意思，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些就是所谓同一性。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27页

原来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试想一切矛盾着的事物或人们心中矛盾着的概念，任何一方面能够独立地存在吗？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没有祸，无所谓福；没有福，

也无所谓祸。没有顺利，无所谓困难；没有困难，也无所谓顺利。没有地主，就没有佃农；没有佃农，也就没有地主。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也就没有资产阶级。没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就没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没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也就没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一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这种性质，叫做同一性。一切矛盾着的方面都因一定条件具备着不同一性，所以称为矛盾。然而又具备着同一性，所以互相联结。列宁所谓辩证法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就是说的这种情形。怎样能够呢？因为互为存在的条件。这是同一性的第一种意义。

然而单说了矛盾双方互为存在的条件，双方之间有同一性，因而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样就够了吗？还不够。事情不是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转化。这就是说，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着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二种意义。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28页

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30页

所谓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的同一性，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矛盾乃是现实的矛盾，具体的矛盾，而矛盾的互相转化也是现实的、具体的。神话中的许多变化，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所说的“羿射九日”，《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聊斋志异》中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等等，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像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这种神话中的（还有童话中的）千变万化的故事，虽然因为它们想像出人们征服自然力等等，而能够吸引人们的喜欢，并且最好的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马克思），但神话并不是根据具体的矛盾之一定的条件而构成的，所以它们并不是现实之科学的反映。这就是说，神话或童话中矛盾构成的诸方面，并不是具体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科学地反映现实变化的同一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为什么鸡蛋能够转化为鸡子，而石头不能够转化为鸡子呢？为什么战争与和平有同一性，而战争与石头却没有同一性呢？为什么人能生人不能生出其他的东西呢？没有别的，就是因为矛盾的同一性要在一定的必要的条件之下。缺乏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就没有任何的同一性。

为什么俄国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同年十月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直接地联系着，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直接地联系于社会主义的革命，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终于失败了呢？为什么蒙古和中亚细亚的游牧制度又直接地和社会主义联系了呢？为什么中国的革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

前途，可以和社会主义直接联系起来，不要再走西方国家的历史老路，不要经过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呢？没有别的，都是由于当时的具体条件。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具备了，事物发展的过程就发生一定的矛盾，而且这种或这些矛盾互相依存，又互相转化，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30—332页

苦战和休整的对立的统一，这是规律，而且是互相转化的。没有一种事情不是互相转化的。急转化为缓，缓转化为急，劳转化为逸，逸转化为劳。苦战和休整，也是如此。劳和逸、急和缓有同一性，苦战和休整也有同一性。睡眠和起床也是对立的统一。试问，谁能担保起床以后就不睡觉？反之，“久卧者思起”。睡眠转化为起床，起床转化为睡眠。开会走向反面，转化为散会。只要一开会就包含着散会的因素，我们不能在成都开一万年的会。《红楼梦》里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这是真理。散会以后，问题积起来了，又转化为开会。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72—373页

生产转化为消费，消费转化为生产。生产就是为了消费，生产不仅是为其他劳动者，生产者自己也是消费者。不吃饭，一点气力没有，不能生产，吃了饭有了热量，就可以多做工作。马克思认为，生产就包含着消费，新产品的生产就是原材料的消费，机器的消耗，劳动力的消耗。生产与消费，建设与破坏，都是对立的统一，是互相转化的。鞍钢的生产就包含消费，几十年就要更换设备。播种转化为收获，收获转化为播种。播种是

消费种子，种子播下后，就向反面转化，由种子变为秧苗，以后收获，又得到新的种子。

要举丰富的例子，搞几十个、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的统一和互相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
第373页

春夏秋冬也是相互转化的，春夏的因素就包含在秋冬中。生与死也是相互转化的，生物转化为死物，死物转化为生物。我主张五十岁以上的人死了以后开庆祝会，因为人是非死不可的，没有死就没有生，这是自然规律。

苏联出版的《简明哲学辞典》中有一条专门与我作对，它说生与死、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战争与和平相互转化是不对的。那末究竟谁对？请问，生物不是由死物转化来的，那是如何而来的呢？地球上原来只有无机物，以后才有有机物。有生命的物质都是氮、氢等十二种元素变成的，生物总是死物转化而来的。

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也是相互转化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地主和农民的关系就是这样。当然，我们这个压迫者是对旧统治者阶级而言的，而不是对老百姓讲的。这是讲阶级专政，而不是讲个人压迫者。

战争转化为和平，和平转化为战争。和平是战争的反面，没有打仗哪会有“和平”二字。三八线一打仗是战争，一停战又是和平。战争是特殊形式的政治，是政治的继续，政治也是一种战争。

总而言之，量变转化为质变，质变转化为量变。欧洲教条主义浓厚，苏联因为有伟大的成就，就产生一些缺点，总是要

转化的。现在我们讲辩证法，将来也可能产生教条主义，思想僵化的现象可能发生。如果我们工业搞成世界第一，那时就可能翘尾巴，翘得像孙行者的尾巴那样高，那时就可能转变为落后。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74页

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对方的地位转化的。

《对何其芳〈不怕鬼的故事〉序的修改和批语》（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427页

2. 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

一切过程矛盾的运动，同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这是任何过程如此。但因矛盾性质每个过程不同，内部构造每个过程不同，这种绝对性、统一性的表现方法因而各异，这是要明白的。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一书的批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九三七年四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92—93页

一切过程都有始有终，一切过程都转化为它们的对立物。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但是一种过程转化为他种过程的这种变动性则是绝对的。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32页

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33页

前面我们曾经说过，两个相反的东西中间有同一性，所以二者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这是说的条件性，即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矛盾的东西能够统一起来，又能够互相转化；无此一定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由于一定的条件才构成了矛盾的同一性，所以说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这里我们又说，矛盾的斗争贯串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33页

我们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这句话是辩证法的，是违反形而上学的。“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

在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在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在个性中存在着共性。拿列宁的话来说，叫做“在相对的东西里面有着绝对的东西”。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33页

依一时说，统一是绝对的，斗争是相对的；依永久说，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绝对谓占统治地位。

统一即事物的暂时安定。事物的安定在暂时是绝对的，在永久是相对的，这才是列宁“相对中有绝对”之意，不是什么“统一之绝对可能”。我们在一定时期内承认国家的绝对性（国家至上），而在整个历史上又否认国家的绝对性（国家是暂时的）。

《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一书的批注》（一九三九年五月以后），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374 页

看电影，银幕上那些人净是那么活动，但是拿电影拷贝一看，每一小片都是不动的。《庄子》的《天下篇》说：“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辩证法：又动又不动。净是不动没有，净是动也没有。动是绝对的，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这个规律，列宁讲得很清楚。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213 页

3. 矛盾斗争有对抗和非对抗两种形式，它们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

在矛盾的斗争性的问题中，包含着对抗是什么的问题。我们回答道：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

切形式。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34页

在人类历史中，存在着阶级的对抗，这是矛盾斗争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无论在奴隶社会也好，封建社会也好，资本主义社会也好，互相矛盾着的两阶级，长期地并存于一个社会中，它们互相斗争着，但要待两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阶级社会中，由和平向战争的转化，也是如此。

炸弹在未爆炸的时候，是矛盾物因一定条件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的时候。待至新的条件（发火）出现，才发生了爆炸。自然界中一切到了最后要采取外部冲突形式去解决旧矛盾产生新事物的现象，都有与此相仿佛的情形。

认识这种情形，极为重要。它使我们懂得，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共产党人必须揭露反动派所谓社会革命是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等等欺骗的宣传，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使人民懂得，这不但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整个人类的历史和苏联的胜利，都证明了这个科学的真理。

但是我们必须具体地研究各种矛盾斗争的情况，不应当将上面所说的公式不适当地套在一切事物的身上。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有些矛盾具有公开的对抗性，有些矛盾则不是这样。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

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34—335页

我们党内许多同志的正确思想和陈独秀、张国焘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但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目前我们党内的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如果犯错误的同志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就不会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因此，党一方面必须对于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过火的斗争，显然是不适当的。但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存在着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的可能性。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35页

经济上城市和乡村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那里资产阶级统治的城市残酷地掠夺乡村），在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域里面（那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买办大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城市极野蛮地掠夺乡村），那是极其对抗的矛盾。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在我们的革命根据地里面，这种对抗的矛盾就变为非对抗的矛盾，而当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这种矛盾就会消灭。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35—336页

列宁说：“对抗和矛盾断然不同。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这就是说，对抗只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

而不是它的一切形式，不能到处套用这个公式。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36页

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哪里有什么可以调和的矛盾？只能说有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矛盾，不能说有不可以调和的矛盾和可以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是没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没落的，所以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是前进道路上的矛盾，……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8页

（六）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

1. 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核心是对立统一

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一九六三年——一九六五年），《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26—327页

2. 质量互变规律

- 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

过程有质的一方面，还有量的一方面。

世无无量之物。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一书的批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九三七年四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50页

量与质是同时存在（非分割的），同时发展，二者是统一的。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一书的批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九三七年四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50—51页

认识质量联结不可分，认识量的发展之特性是最要任务之一。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一书的批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九三七年四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52页

量也是客观的，量的概念是现象本身所具有的那些数量关系在人的意识上的反映。科学的研究，不但在质的区别上，也应从量的复杂性上去认识它。

《读米丁等著沈志远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一书的批注》（一九三七年七月以前），《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85页

一定的特殊的质必具有一定的特殊的量，单纯的质和量是

没有的。

《读米丁等著沈志远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一书的批注》(一九三七年七月以前),《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85页

胸中有“数”。这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42页

● 质变决定量变,量变促进质变;质变是飞跃

质在过程各阶段中起变化,规定着量也起变化。

量的变化也促进质的变化。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一书的批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九三七年四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51—52页

新质规定了新量的发展。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一书的批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九三七年四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53页

因为量的变化产生了质的变化,反过来质的变化又产生了量的变化。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一书的批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九三七年四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55页

不但过程而且阶段,凡有质的变化就是飞跃。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一书的批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九三七年四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61页

与过程同一的直接的定性是质,量是过程的定性,但非与过程直接同一的,而是在某一一定时期内对过程无关重要的、外在的定性。量虽增减,质仍不变。但在一定的瞬间以后,事情就生变化,量的改变促成质的改变。

《读米丁等著沈志远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一书的批注》(一九三七年七月以前),《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84页

事物之量的变化是在与他相适应的一定的质的基础上才发生的,在一定时期内质限制量之发展。

《读米丁等著沈志远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一书的批注》(一九三七年七月以前),《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86页

量的变化是以质的定性为基础而受其限制的,但同时量的变化又反过来影响于质。这即是说,受一定的质规定的事物,只在某一瞬间以前是这样,等到量的变化达到一定的质的限度和一定的界限时,量就要求质的变化。同时这一变化,也是由质到量的变化。旧质一消灭,新量就向前发展了。

只有经过量的变化才能发生质的变化。

《读米丁等著沈志远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一书的批注》(一九三七年七月以前),《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86—187页

量的变化，在一定限度内，带着同质事物不断增长的性质。即是说在一定限度内，量虽变化，该事物仍为该事物。只有在一定阶段内，在一定条件下，量的发展才能求质的变化，事物此时就失去旧质而变到新质事物。这种质的变化过程同量的变化过程相反，量是渐渐的变，质是跳跃的变。

《读米丁等著沈志远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一书的批注》（一九三七年七月以前），《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88—189页

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一种状态的时候，它只有数量的变化，没有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好似静止的面貌。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二种状态的时候，它已由第一种状态中的数量的变化达到了某一个最高点，引起了统一物的分解，发生了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显著地变化的面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见的统一、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都是事物处在量变状态中所显现的面貌。而统一物的分解，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状态的破坏，变到相反的状态，便都是事物在质变状态中、在一种过程过渡到他种过程的变化中所显现的面貌。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32—333页

质为矛盾的统治方面所规定，质变即矛盾的被统治方面转变为统治方面。

《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一书的批注》（一九三九年五月以后），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369 页

新质就是同旧质的矛盾方面相反对的矛盾方面所规定的质，这种反对方面的量变到了最大限度，就引起整个过程的质变。

《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一书的批注》（一九三九年五月以后），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369 页

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斗争，是一个革命。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的关系，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352 页

● 量变中有部分质变

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

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

例如，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这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根本矛盾着的阶级的性质和这个社会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变化；但是，两阶级的矛盾激化了，独占资本和自由资本之间的矛盾发生了，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矛盾激化了，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即由各国发展不平衡的状态而引起的矛盾特别尖锐地表现出来了，因此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形成了帝国主义阶段。列宁主义之所以成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列宁和斯大林正确地说明了这些矛盾，并正确地作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14页

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我国现在经济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变化，是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许多部分的质变。若干年后，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那时候将完成一个飞跃，然后再继续量变的过程。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2—353页

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

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这里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

后的质变就不能来到。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7页

打垮蒋介石，这是一个质变。这个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例如，要有三年半的时间，要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蒋介石军队和政权。而这个量变中，同样有若干的部分质变。在解放战争期间，战争经过几个不同的阶段，每个新的阶段同旧的阶段比较，都有若干性质的区别。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8页

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过渡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社会主义阶段的一些东西必然是要灭亡的。就是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也还是要发展的。它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吗？难道那个时候只有量变而没有不断的部分质变吗？

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不承认“边”，就是否认质变或部分质变。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8页

3. 否定之否定规律

- 否定之否定是肯定和否定的辩证统一

否定不是破坏一切，一刀两断，不是绝对的否定，而是先

行的东西中间包含有后来的东西，后来的东西中间包含有先行的东西。没有否定的运动，也就没有肯定的运动。一切过程都是如此。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一书的批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九三七年四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21页

辩证法否定是过程发展之动因，这种否定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方面表现为扬弃，即克服旧事物之主要的不适于保存的东西；一方面表现为肯定，即把旧事物中某些还暂时适于生存的东西给以合法的地位而保存起来。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一书的批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九三七年四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24—125页

依战略的性质说，也可以说井冈山时期至第四次反“围剿”时期为一阶段，第五次反“围剿”时期为又一阶段，长征至今为第三阶段。第五次反“围剿”时人们错误地否定了以前本来是正确的方针，我们今天又正确地否定了第五次反“围剿”时人们的错误方针，复活了从前的正确方针。然而不是否定第五次反“围剿”时的一切，也不是复活从前的一切。复活的是从前优良的东西，否定的是第五次反“围剿”时的错误的东西。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31—232页

每一过程对下一过程言是肯定，对上一过程言是否定，对再上一过程言是否定之否定。

《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一书的批注》（一九三九年五月以后），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383—384 页

对斯大林的批评，我们人民中有些人还不满意。但是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这也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126—127 页

●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

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155 页

运动从没有任何矛盾的均衡发生。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一书的批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九三七年四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101 页

整个宇宙发展即无数过程的继续，是向上的、直线的；每一过程内部是前进与后退交错的、曲线的。

《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一书的批注》（一九三九年五月以后），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383 页

我们从来也没有设想过抗战应该是速胜论、直线论（一字论），而历来主张长期论与曲线论（之字论）。

《反投降提纲》（一九三九年六月），《毛泽东文集》第 2 卷第 211 页

世界上的事物，因为都是矛盾着的，都是对立统一的，所以，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太阳的光射来叫光波，无线电台发出的叫电波，声音的传播叫声波。水有水波，热有热浪。在一定意义上讲，走路也是起波的，一步一步走就是起波。唱戏也是起波的，唱完一句再唱第二句，没有一口气唱七八句的。写字也起波，写完一个字再写一个字，不能一笔写几百个字。这是事物矛盾运动的曲折性。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0页

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2页

不平衡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普遍的永久的。

平衡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不普遍的暂时的。

很多事物，以不平衡为平衡，例如人有老少、知多知少、高低肥瘦，知识的多少深浅，永远不能平衡。时代精神是有的，一致是有的，只是一个侧面。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一九五八年三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09页

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点波浪也没有，这是不可能设想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我们读书也是波浪式的，读书之前要做别的事情，读了几个钟头以后，要休息，不能无日无夜地读下去。今

天读得多，明天读得少；而且每天读的时候，有时议论多，有时议论少。这些都是波浪，都是起伏。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0—121页

平衡是对不平衡来说的，没有了不平衡，还有什么平衡？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门、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1页

（七）按辩证法办事

1. 看问题要“一分为二”，防止片面性和绝对化

常常听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务时说出来的一句话：没有把握。为什么没有把握呢？因为他对于这项工作的内容和环境没有规律性的了解，或者他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这类工作，或者接触得不多，因而无从谈到这类工作的规律性。及至把工作的情况和环境给以详细分析之后，他就觉得比较地有了把握，愿意去做这项工作。如果这个人在这项工作中经过了一个时期，他有了这项工作的经验了，而他又是一个肯虚心体察情况的人，不是一个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看问题的人，他就能够自己做出应该怎样进行工作的结论，他的工作勇气也就可以大大地提高了。只有那些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事

情的历史和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和其他事情的内部联系），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交子的。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9—290页

亡国论者看重了强弱一个矛盾，把它夸大起来作为全部问题的论据，而忽略了其他的矛盾。他们只提强弱对比一点，是他们的片面性；他们将此片面的东西夸大起来看成全体，又是他们的主观性。所以在全体说来，他们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那些并非亡国论者，也不是一贯的悲观主义者，仅为一时和一局部的敌我强弱情况或国内腐败现象所迷惑，而一时地发生悲观心理的人们，我们也得向他们指出，他们的观点的来源也是片面性和主观性的倾向。但是他们的改正较容易，只要一提醒就会明白，因为他们是爱国志士，他们的错误是一时的。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58页

速胜论者也是不对的。他们或则根本忘记了强弱这个矛盾，而单单记起了其他矛盾；或则对于中国的长处，夸大得离开了真实情况，变成另一种样子；或则拿一时一地的强弱现象代替了全体中的强弱现象，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自以为是。总之，他们没有勇气承认敌强我弱这件事实。他们常常抹杀这一点，因此抹杀了真理的一方面。他们又没有勇气承认自己长处之有限性，因而抹杀了真理的又一方面。由此犯出或大或小的错误来，这里也是主观性和片面性作怪。这些朋友们的心是好的，他们也是爱国志士。但是“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的看法

则不对，照了做去，一定碰壁。因为估计不符合真相，行动就无法达到目的；勉强行去，败军亡国，结果和失败主义者没有两样。所以也是要不得的。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58页

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

《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31—832页

我们分析一个事物，首先加以分解，分成两个方面，找出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哪些是应该发扬的，哪些是应该丢掉的，这就是批评。对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历史加以分析，这是自我批评；对别人进行分析，就是批评别人。被批评的时候总会有些不舒服和难过，这是正常的。

《时局问题及其他》（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54页

中国共产党经过多年的实践，学会了把自己做的事情加以分析，并且要从团结全党出发。从团结全党出发是第一，加以分析批评是第二，然后再来一个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方法，这就是辩证法。如果事情没有搞好，原因在

什么地方？原因就是没有照辩证法办事。邓小平同志讲：事情怎么样办？照辩证法办事。我赞成他的话。……我们有很多经验证明，搞错事情常常是因为看了这个侧面，没有看那个侧面，只听这一面的话，没有听那一面的话。人为什么要长两个耳朵，长一个岂不好吗？这很可以研究一下，我看长两个耳朵的好处是：这个耳朵听这一面，那一个耳朵听那一面。团结加上分析，对各种矛盾的意见、不对头的意见，对每个人的意见，都加以分析：或者全部是对的，只是句把话不好；或者一部分是对的，一部分是不对的；或者全部是不对的。分清是非，然后落在一个地方，就是团结。

《时局问题及其他》（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56—257页

王震同志率部南下出发时，我对他讲：第一条叫要看到光明，第二条叫要看到困难。要看到光明也要看到困难，这是辩证法，是矛盾的统一。又是光明又是困难，是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呢？讲光明就讲光明嘛，又讲什么困难？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这样的時候，只讲光明，讲不得黑暗，这不是辩证法，没有照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办事。我们讲光明，同时一定要讲困难。

《时局问题及其他》（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57—258页

干部中的片面观点总是会有的，问题是好好帮助他们学会实事求是全面分析的方法。

《致章乃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一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02页

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

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哪有这个事？应当承认，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我们党的支部书记，部队的连排长，都晓得在小本本上写着，今天总结经验有两点，一是优点，一是缺点。他们都晓得有两点，为什么我们只提一点？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1页

对任何事情都要分析，弄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因为事情都有好的光明的一面和不好的黑暗的一面。

《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64页

有一些同志就是不讲辩证法，不分析，凡是苏联的东西都说好的，硬搬苏联的一切东西。其实，中国的东西也好，外国的东西也好，都是可以分析的，有好的，有不好的。每个省的工作也是一样，有成绩，有缺点。我们每个人也是如此，总是有两点，有优点，有缺点，不是只有一点。一点论是从古以来就有的，两点论也是从古以来就有的。这就是形而上学跟辩证法。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形而上学是一点论。现在，一点论在相当一些同志中间还不能改。他们片面地看问题，认为苏联的东西都好，一切照搬，不应当搬的也搬来了不少。那些搬得不对的，不适合我们这块土地的东西，必须改过来。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0页

工作中，文章中，不可能不带片面性，但是我们应当要求：辩证法逐步地多一些，形而上学逐步地少一些。

《在宣传会议上讲话（提纲）》（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376页

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对于我们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这样看问题的人，现在在共产党里面还是不少，党外也有很多。肯定一切，就是只看到好的，看不到坏的，只能赞扬，不能批评。说我们的工作似乎一切都好，这不合乎事实。不是一切都好，还有缺点和错误。但是也不是一切都坏，这也不合乎事实。要加以分析。否定一切，就是不加分析地认为事情都做得不好，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一个伟大事业，几亿人口所进行的这个伟大斗争，似乎没有什么好处可说，一团糟。许多具有这种看法的人，虽然和那些对社会主义制度心怀敌意的人还不相同，但是这种看法是很错误的，很有害的，它只会使人丧失信心。不论是用肯定一切的观点或者否定一切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工作，都是错误的。对于这些片面地看问题的人，应该进行批评，当然要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去批评，要帮助他们。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6页

有人说，既然要整风，要大家提意见，就必然要有片面性，

提出克服片面性，好像就是不让人讲话。这种说法对不对呢？要求所有的人都不带一点片面性，这是困难的。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发表意见，有时候就难免带上一些片面性。但是，可不可以要求人们逐步地克服片面性，要求看问题比较全面一些？我看应该这样要求。如果不是这样，不要求一天一天地、一年一年地有较多的人采用比较全面地看问题的方法，那末，我们就停滞了，我们就是肯定片面性了，就是同整风的要求背道而驰了。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6—277页

所谓片面性，就是违反辩证法。我们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7页

有人说，几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杂文，怎么能作分析呢？我说，怎么不能呢？鲁迅不就是这样的吗？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7—278页

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列宁曾讲

过，不犯错误的人全世界一个也没有。我就是犯过许多错误的，这些错误对我很有益处，这些错误教育了我。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

《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30页

其实我们的支部书记是懂得辩证法的，当他准备在支部大会上作报告的时候，往往在小本子上写上两点，第一点是优点，第二点是缺点。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

《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32—333页

矛盾有正面，有侧面。看问题一定要看到矛盾的各个方面。群众运动有主流，有支流。到下面去看，对运动的成绩和缺点要有辩证的观点，不要把任何一件事情绝对化。好事情不要全信，坏事情也不要只看到它的消极一面。

《记者头脑要冷静》（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43页

列宁死后，苏联的辩证法少了。是说少了，不是说没有。他们有时强调斗争不讲统一，有时强调统一不讲斗争。这两种片面性都是形而上学，都是缺少辩证法。他们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矛盾的发展和转化，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还是矛盾，怕讲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斗争。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下卷第742—743页

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学说也是这样，总是要分化的。有革命的、科学的学说，就一定会在其内部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物，产生反革命的、反科学的学说。因为现在社会有阶级的分裂，一万年以后的社会也会有先进集团和落后集团的不同，总是要不断产生对立物的。这个理论早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各门社会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也为自然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科学和科学史本身，就是说明这种对立统一、对立斗争，因而得到发展的。

《对周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401—402页

2. 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防止思想僵化

一切皆在变化中，不应该用顽固的形式的观点，而应该用活泼的辩证法的观点，去注意一切变化。

《目前时局与党的政策》（一九四〇年七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91页

有限转化为无限，无限转化为有限。古代的辩证法转化为中世纪的形而上学，中世纪的形而上学转化为近代的辩证法。宇宙也是转化的，不是永久不变的。资本主义要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又要转变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还是要转化的，也是有始有终的，一定会分阶段的，不会固定不变的，将来或许要另起个名字。只有量变没有质变，那就违背了辩证法。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不是经过发生、发展和消灭的。猴子变人，产生了人，但整个人类最后是要消灭的，它会变成另外一种东西，那时候地球也没有了。地球总要毁灭的，太阳也要冷却的，太

阳的温度现在就比古代低得多了。二百万年以来我们处在第四纪冰河时期，冰河一来，生物就大批死亡。现在南极大陆下面有很多煤炭，可见古时候那里是很热的。

事物总是有始有终的，只有两个无限，时间和空间无限。无限是由有限构成的，各种东西都是逐步发展、逐步变动的。

讲这些，是为了解放思想，把思想活泼一下。脑子一固定，就很危险。要教育干部，中央、省、地、县四级干部很重要，包括各个系统，有几十万人。要多想，不要死背经典著作，而要开动脑筋，使思想活泼起来。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74—375页

矛盾、斗争、分解是绝对的，统一、一致、团结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有了这样的观点，就能够正确认识我们的社会和其他事物；没有这样的观点，认识就会停滞、僵化。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1页

3.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

我们从事中国革命的人，不但要在各个矛盾的总体上，即矛盾的相互联结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

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研究这些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就是说的这个意思。我们的教条主义者违背列宁的指示，从来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做起文章或演说来，总是空洞无物的八股调，在我们党内造成了一种极坏的作风。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12页

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17页

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本质），是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要点》（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1页

列宁说，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我们报纸上分析文章的缺乏，党内分析习惯的还没有完全养成，都表示这个毛病的存在。今后应该改善这种状况。

《学习和时局》（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39页

我们的同志们还要善于分析问题。我们党内过去有一个习惯，就是有一个固定的框子，无论做文章、讲话，都用这个框子去套。这个框子就是所谓党八股。我们要打破这个框子。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对具体的问题作具体的分析，这是列宁讲的，我们恰恰缺乏这一点。所以，要提倡多想，这样就可以去掉盲目性，就可以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98页

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

《中央转发邓子恢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试点情况调查报告的批语》（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605页

● 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过程变化，旧过程和旧矛盾消灭，新过程和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11页

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所解决的矛盾及其所用以解决矛盾的方法是根本上不相同的。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11页

4. 创造条件，促成事物的转化

革命斗争中的某些时候，困难条件超过顺利条件，在这种时候，困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顺利是其次要方面。然而由于革命党人的努力，能够逐步地克服困难，开展顺利的新局面，困难的局面让位于顺利的局面。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24—325页

客观事物中矛盾着的诸方面的统一或同一性，本来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暂时的、相对的东西，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这种情况，反映在人们的思想里，就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

继续统治的目的。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30页

我们是否否认亡国危险呢？不否认的。我们承认在中国面前摆着解放和亡国两个可能的前途，两者在猛烈地斗争中。我们的任务在于实现解放而避免亡国。实现解放的条件，基本的是中国的进步，同时，加上敌人的困难和世界的援助。我们和亡国论者不同，我们客观地而且全面地承认亡国和解放两个可能同时存在，着重指出解放的可能占优势及达到解放的条件，并为争取这些条件而努力。亡国论者则主观地和片面地只承认亡国一个可能性，否认解放的可能性，更不会指出解放的条件和为争取这些条件而努力。我们对于妥协倾向和腐败现象也是承认的，但是我们还看到其他倾向和其他现象，并指出二者之中后者对于前者将逐步地占优势，二者在猛烈地斗争着；并指出后者实现的条件，为克服妥协倾向和转变腐败现象而努力。因此，我们并不悲观，而悲观的人们则与此相反。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58—459页

可能性基本的只有两个，并没有多个。这是因为一事物在一过程中，只有一个基本矛盾，而这个矛盾的两方面各有一种要求，故有两种可能性。但现实性只有一个，则是因为矛盾斗争的一方面被另一方面压倒，破坏了一个可能性，故只剩下一个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也有第三种可能性的，则是因为次

要矛盾的存在，如社会中有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之故。然基本上只有两个可能性，因为基本的矛盾方面只有两方面之故。

《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一书的批注》（一九三九年五月以后），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377—378 页

这些同志，当着我党中央令其准备对付国民党的可能的破裂，对付时局发展的最坏的一种可能性的时候，他们就把别的可能性丢掉了。他们不了解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这次我们充分地准备着对付国民党的破裂，就使国民党不敢轻于破裂了。

《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一九四一年五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784 页

我们共产党过去时时指出趋势，指出可能性，为的是使大家在困难中看到光明的前途。现在同盟国的被动状况已经结束，转到了主动，所以过去只是可能性的东西，今天就要转变为现实的东西了。今天欧洲还没有开辟第二条战线，但此事成为现实，一定是不会很久的了，这是今天全世界人类努力的目标。

《英勇斗争的二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七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 3 卷第 29 页

共产党办事，不明白的时候是会犯错误的，明白了以后错误就要改正，这样做才是正确的。搞错了是坏事，但可以变成好事。

《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 3 卷第 156 页

世界是美丽的，但也不是美丽的，世界上有斗争、有矛盾。希望一切都是好的，这是我们的主观，而现实是客观。世界上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自古以来是这样，一万年后也会是这样。正因为世界上有坏的东西，我们才要改造，才要做工作。但是我们不会把一切都做好，否则我们的后代就没有工作可做了。

《不要迷信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69页

总之，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8页

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世界上最愿意改变自己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则全无所有，一则有也不多。现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将变为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在这里，决定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

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9页

在相同的条件下，拿先进和落后比，促使落后赶上先进。先进和落后是矛盾的两个极端，“比较”是对立的统一。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2页

老讲团结，就是“一潭死水”，就会冷冷清清。一潭死水好？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后浪逐前浪好？要打破旧的团结基础，经过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党是这样，阶级是这样，人也是这样。团结、斗争、团结，这就有工作做了。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73页

大多的人类，首先是无产阶级，首先是共产党人，除掉怕死鬼以及机会主义的先生们以外，总是将藐视一切，乐观主义，放在他们心目中的首位的。然后才是重视事物，重视每件工作，重视科学研究，分析事物的每一个矛盾侧面，钻进去，逐步地认识自然运动的法则和社会运动的法则。然后就有可能掌握这些法则，比较自由地运用这些法则，一个一个地解决人们面临的问题，处理矛盾，完成任务，使困难向顺利转化，使真老虎向纸老虎转化，使革命的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化，使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转化，使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转化，使年产几百万吨钢向年产几千万吨钢乃至几万万吨钢转化，使亩产一百多斤或者几百斤粮食向亩产几千

斤或者甚至几万斤粮食转化。同志们，我们就是做这些转化工作的。

《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56—457页

四、唯物史观

(一)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

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東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東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26页

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64页

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中国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抗日战争时期是大变动，解放战争时

期也是大变动。但是就性质说来，现在的变动比过去的变动深刻得多。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有几亿人口进入社会主义的改造运动。全国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都在起变化。农业和手工业方面的小资产阶级和工商业资产阶级，都发生了变化。社会经济制度变化了，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样的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存在决定意识。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中间，对于这个社会制度的大变动，有各种不同的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热烈地拥护这个大变动，因为现实生活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的惟一的出路。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7页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九六三年五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20页

（二）人的基本特性是社会性

最基本区别是人的社会性，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从事社会生产的动物，人是阶级斗争的动物（一定历史时期），一句话，人是社会的动物，不是有无思想。一切动物都有精神现象，高等动物有感情、记忆，还有推理能力，人不过有高级精神现象，故不是最基本特征。

《关于人的基本特性及其他》（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81页

原始人与猴子的区别只在能否制造工具一点上。自从人能制造石枪、木棒以从事生产，人才第一次与猴子及其他动物区别开来，不是因有较猴子高明的思想才与它们区别开来，这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分水岭。

《关于人的基本特性及其他》(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81—82页

人是物质发展的一个高级形态，不是最终形态，它将来还要发展，不是什么万物之灵。人首先是社会的动物，资产阶级总是强调人的理性（精神），我们不应如此。

《关于人的基本特性及其他》(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82页

当作人的特点、特性、特征，只是一个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的动物，自然性、动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人是动物，不是植物、矿物，这是无疑的、无问题的。人是什么一种动物，这就成为问题，几十万年直至资产阶级的费尔巴哈还解答得不正确，只待马克思才正确地答复了这个问题。即说人，它只有一种基本特性——社会性，不应说它有两种基本特性：一是动物性，一是社会性，这样说就不好了，就是二元论，实际就是唯心论。

《关于人的基本特性及其他》(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83页

自从人脱离猴子那一天起，一切都是社会的，体质、聪明、本能一概是社会的，不能以在母腹中为先天，出生后才算后天。要说先天，那末，猴子是先天，整个人的历史都是后天。

拿体质说，现在人的脑、手、五官，完全是在几十万年的

劳动中改造过来了，带上社会性了，人的聪明与动物的聪明，人的本能与动物的本能，也完全两样了。

人的五官、百体、聪明、能力本于遗传，人们往往把这叫作先天，以便与出生后的社会熏陶相区别。但人的一切遗传都是社会的，是在几十万年社会生产的结果，不指明这点就要堕入唯心论。

《关于人的基本特性及其他》(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83页

(三)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1. 真正强大的力量属于人民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39页

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和全日本人民的大团结，其力量是如何伟大，这种伟大的力量是无疑要把侵略者的力量逐渐削弱下去，最后把它打倒。因此我们坚定地说：只要我们努力，中国一定能够战胜侵略者，新中国的创立是必然的。

《在延安反侵略大会上的演说》(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90—91页

人民是有能力的，他们的力量是最伟大的，他们结成了团体，就是所向披靡、天下无敌的常胜军。

《妇女们团结起来》（一九三九年三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71页

抗日，抗日，是谁之力？离了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你就不能走动一步。谁还敢于去踢他们，谁就要变为粉碎，这又岂非成了常识范围里的东西了吗？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82页

老百姓是决不容情的，在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之时，你要反共，他们就要了你的命。这是一定的，谁要反共谁就要准备变成齏粉。如果没有决心准备变自己为齏粉的话，那就确实以不反为妙。这是我们向一切反共英雄们的诚恳的劝告。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91页

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95页

在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前，俄国国内究竟哪一方面拥有真正的力量呢？从表面上看，当时的沙皇是有力量的；但是二月革命的一阵风，就把沙皇吹走了。归根结蒂，俄国的力量是在工农兵苏维埃这方面。沙皇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希特勒不是曾经被人们看作很有力量的吗？但是历史证明了他是一只纸老虎。墨索里尼也是如

此,日本帝国主义也是如此。相反的,苏联以及各国爱好民主自由的人民的力量,却是比人们所预料的强大得多。

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提起美国帝国主义,人们似乎觉得它是强大得不得了,中国的反动派正在拿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但是美国反动派也将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证明为并没有什么力量。在美国,另有一类人是真正有力量的,这就是美国人民。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95页

2. 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唯心论历史家把英雄看成历史的创造者,唯心论政治家把政治看成万能的东西,唯心论军事家实行拼命主义的作战,唯心论革命家主张白朗基主义,蒋介石说要复兴民族惟有恢复旧道德,都是过分夸张主观能动性的结果。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第4页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790页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31页

教科书把群众的斗争只看做重要条件之一的说法，违背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历史是计划工作人员创造的，而不是人民群众创造的。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四）》（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

《我的一点意见》（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十一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15页

《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

《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248页

3. 应当承认领袖的作用，但领袖的作用离不开群众

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

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7页

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3页

刘志丹同志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群众领袖是群众封的呢？还是我们自己封的呢？季米特洛夫说，是要群众封的，是群众根据自己的经验来确认的。

《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一九四三年八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60页

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作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我们党要使人民胜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各个中央委员，各个领导机关都要有这样的认识。这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就是《国际歌》上所讲的，少奇同志在这里念过几次，“不是神仙，不是皇帝，更不是那些英雄

豪杰，全靠自己救自己。”自己救自己，他就要选举党，选举工具。

《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73—374页

不要逞英雄。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应当承认少数人的作用，就是领导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的作用的还是群众。干部与群众的正确关系是，没有干部也不行，但是，事情是广大群众做的，干部起一种领导作用，不要夸大干部的这种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01—402页

在我们的干部中，大概还有不少的人，不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懂得这一点，那就一定会到处碰钉子。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8—359页

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

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245页

(四) 社会基本矛盾

1.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人们为着要生活,就要生产生活资料,例如粮食、衣服、房屋、燃料、器具等。人们为着要生产生活资料,就要有生产资料,例如土地、原料、牲畜、工具、工场等。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就是社会的生产力。

人们为着要进行生产,就必须在生产过程中彼此发生一定的相互关系,否则就无法进行生产。因为人们的生产从来就是社会的生产,不能孤立地进行生产。这种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就是社会的生产关系,就是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为着通俗起见,所有关系在本文件中称为占有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在法律上表现为财产的所有权关系。

《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55页

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通过劳动者来讲,破坏旧的生

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在往后亿万年中，生产力性质不会不发生变化的，为了一定要适合它，生产关系也得改变，而且将有无数的改变。

《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注》（一九五八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663页

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拿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说，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简单的协作就创造了一种生产力。手工工场就是这样一种简单协作，在这种协作的基础上，就产生了资本主义发展第一阶段的生产关系。手工工场是非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一种改进技术的需要，为采用机器开辟了道路。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2页

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2页

2.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要为经济基础服务，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

社会的生产力和社会的生产关系相结合，就是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的生产方式是一切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精神生活的基础。

《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55页

在阶级社会中，一切生产关系，都是被阶级的国家权力所保护的。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就被什么样的阶级的国家权力所保护，而所谓国家权力，首先就是军队的武力。人们如果要推翻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人们就或早或迟地要推翻旧的国家权力，建立新的国家权力。

《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61—62页

法律是上层建筑。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97页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9页

上层建筑是为基础服务的，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即思想）是为经济服务的。

《在南宁会议上的结论提纲》（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26页

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政府各部门所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八年来积累起来的规章制度许多还是适用的，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必须加以修改，或者废除。……应该作出这样一个总的规定，即是在多快好省地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提下，在群众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允许并且鼓励群众的那些打破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的创举。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3页

现在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斗争通常是不流血的，但是当事物要发生质变时，就要流血了。经过长期的量变就要发展到质变。要是没有这种质变，旧的上层建筑是不会改变的。上层建筑主要指政权和军队、警察、法院等国家机器，也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上层建筑是保护经济基础的。所以首先要用暴力把国家机器这些主要的上层建筑夺取过来，加以粉碎。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上层建筑，不能用武力解决，而是要经过长期的改造。

《同澳共总书记夏基的谈话》（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97页

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是用来保护经济基础的，

当经济基础失掉保护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改变生产关系，即旧的所有制等。当然这也要经过斗争，但不一定要经过战争。

《同澳共总书记夏基的谈话》（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97页

这本教科书，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8—139页

3.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

从生产社会性与占有私人性的矛盾看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矛盾，这是根本矛盾。由这根本矛盾发生其他一切矛盾，由这根本矛盾规定资本主义的发展。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一书的批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九三七年四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67页

马克思把这一法则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的时候，他看出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于在各别企业中的生产的有组织性和在全社会中的生产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阶级表现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18页

有人觉得有些矛盾并不是这样。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25—326页

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你们讲，那个时候还有没有革命？我看还是要革命的。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当然，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

争时代的革命。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上层建筑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所谓经济基础，就是生产关系，主要是所有制。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4页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1页

不能说这本书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能说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书中有

许多观点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特别是写法不好，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来研究问题，不从历史的叙述和分析开始自然得出结论，而是从规律出发，进行演绎。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8页

（五）阶级、国家、革命

1. 阶级和阶级斗争

● 阶级的产生和阶级划分的依据

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页

在社会生产力的历史发展的某一个阶段中，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人们的生产关系，就开始由社会一切人们的共同占有关系，发展成为一部分人们的私人占有关系。少数人占有大量的生产资料，多数人丧失或只占有很少的生产资料。这样，后一种人的绝大部分就被迫为前一种人劳动，把自己劳动的结果交给前一种人，并向前一种人领取少量的报酬，作为自己的生活来源。这就是说，后一种人受前一种人的剥削，而前一种人则依靠大量地剥削后一种人作为自己的生活来源。后一种人中间的一部分，因为占有足以维持生活的生产资料，是以

进行独立劳动作为自己的生活来源的，但是他们仍然不能逃脱前一种人在某种程度上的剥削。这样，人们就分裂成为不同的阶级，分裂成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由于生产工具的发展，例如由石头工具发展到简单的金属手工工具，再发展到较精的金属手工工具，再发展到复杂的机器工具，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人们的生产关系，就发生变化。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变化，剥削阶级对于被剥削阶级施行剥削的方法也就发生变化。

《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55—56页

所谓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即财产的所有权关系。生产资料的使用，例如农民使用（租用）地主的土地，只是地主对于土地的所有关系的结果，这种所有关系表现为佃农对地主的隶属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即是生产关系。过去许多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二元论（甚至是多元论）的错误，将生产关系和使用关系并列，又将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并列，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把问题弄得很糊涂，划错了许多人的阶级成分。

《关于土地改革报告的修改》（一九五〇年六月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63—64页

●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

现时国内颇有些人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的，这是不了解人类进化史的缘故。马克思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是事实，不能否认的。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化为家长社会、封

建社会以至于今日之国家，无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阶级斗争的演进。

《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4页

我们向来读中国史，不注意阶级斗争的事实，其实四千多年的中国史，何尝不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呢？如秦二世时，起来革命的陈胜、吴广是农民。汉高祖是流氓，也是无产阶级推倒贵族阶级的革命，不过在农业社会里，他们革命成功后，又做起皇帝，自己又变成贵族阶级了。太平王洪秀全号召广西一班失业农民起来革命，大有社会革命的意义，孙总理也很佩服他。大家只知道打倒他的是清朝政府，而不知真正打倒他的主力军，却是地主阶级。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主阶级的领袖。曾国藩是练团练出身，团练即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武力，他们见洪秀全领导一班农民革命，于他们不利，遂出死力来打倒他。故太平天国之事，不是满汉的战争，实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

《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4—35页

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中，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3页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5页

记得我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

《关于农村调查》（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8—379页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87页

在人类历史上，有过几次性质不同的大的革命。

第一次，是奴隶主推翻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使人类的生产和社会大进一步。那时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不是我们现在讲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是一些氏族部落组成的原始社会，他们互相打仗，捉到了俘虏就通通杀掉。奴隶主就不把俘虏杀掉，而是拿俘虏做奴隶，虽然刺瞎他一只眼，或者弄伤他一只手，但总还是要让他做工。是把人杀掉好呢，还是不杀掉让他做工好呢？还是奴隶制好，奴隶制可以积累财富。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很低，奴隶制就大进一步。现在一讲奴隶制，人们就觉得它很坏，其实奴隶制的产生在当时是一个伟大的进步。

第二次，是封建地主革掉奴隶主的命。这次革命，在中国大概是在春秋战国时代。……总之，在春秋战国时代，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发生了大的阶级斗争、革命斗争，从那时起，开始允许土地私有，允许土地收租。大概是在鲁宣公时代“初税亩”，第一次开始收地租。鲁哀公还说过什么“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彻，即十分之一。可见当时收地租大概是收百分之二十左右。这证明当时的社会制度已经开始变革，不再是实行井田制，而是采用收土地税的办法了。过去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个时候是搞私有了。私有制曾经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第三次，是资产阶级革封建地主阶级的命，也就是民主主义革封建主义的命。在中国，就是辛亥革命。

孙中山及其一派人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一次。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还有过改良派。对改良派也应该估计有进步的一面。戊戌变法在当时受压迫，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有进步性，它受到顽固派的仇恨。孙中山比

改良派又更进一大步，他公开号召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和临时革命政府，并制定了一个《临时约法》。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说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
第6卷第344—346页

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读〈三国志集解〉批语》（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51页

● 在阶级社会，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没有抽象的民主、自由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3页

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现在封建阶级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有资本主义，佛教徒有佛教主义，基督徒有基督主义，农民有多神主义，近年还有人提倡什么基马尔主义，法西斯主义，唯生主义，“按劳分配主义”，为什么无产阶级不可以有一个共产主义呢？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87页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晌。应该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52页

“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惟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70页

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

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3卷第871页

美国英国这一类型的政府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向人民实行专政的政府。它的一切都和人民政府相反，对于资产阶级内部是有所谓民主的，对于人民则是独裁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佛朗哥、蒋介石等人的政府取消了或者索性不用那片资产阶级内部民主的幕布，是因为国内阶级斗争紧张到了极点，取消或者索性不用那片布比较地有利些，免得人民也利用那片布去手舞足蹈。美国政府现在还有一片民主布，但是已被美国反动派剪得很小了，又大大地褪了颜色，比起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的朝代来是差远了，这是阶级斗争迫紧了几步的缘故。再迫紧几步，美国的民主布必然要被抛到九霄云外去。

《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选

集》第2版第4卷第1503页

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

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8页

所谓伦理学，或道德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是讨论社会各阶级各不相同的道德标准的，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其基本对象是论善恶（忠奸、好坏）。统治阶级以为善者，被统治阶级必以为恶，反之亦然。就在我们的社会也是如此。

《对〈希腊伦理思想的来源与发展线索〉一文的批语》（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五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186页

● 阶级分析方法是观察社会的基本方法

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

《反对本本主义》（一九三〇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3—114页

要了解情况，惟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

知识。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789页

我们党做农民工作,开头没有成功。知识分子有一点气味,就是知识分子气。有这种气味,就不愿到农村中去,轻视农村。农民也看不惯知识分子。我们党当时也还没有找到了解农村的方法。后来再去,找到了了解农村的方法,分析了农村各阶级,了解了农民的革命要求。

《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32页

我们许多同志从平面看农村,不是立体地看农村,就是说,不懂得用阶级观点看农村。后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才用阶级观点看农村。原来农村不是平面的,而是有富的,有贫的,也有最贫的,有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之分。

《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32页

调查工作的纵断法和横断法。这两个名词我只用了一次,写出这篇文章之后我自己也没有再用过。我也不希望同志们以后写文章、讲话再用它,因为不好懂。纵断法的特点是什么呢?我在文章里说:“近来红军第四军的同志们一般的都注意调查工作了,但是很多人的调查方法是错误的。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账”。只是收集许多材料,没有观点,没有思想,“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你站在山顶上看城郭,只能看见很小很窄的街道,许多房屋,街道上有许多人往来。至于这些人是个什么人呢?是资本

家还是工人分不清楚,是共产党员还是非共产党员也分不清楚,甚至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分不清楚。这种调查结果是无益于实用的。这是纵断调查法。这种调查法可以作我们的辅助手段,达到一些次要的目的,不是我们的主要手段,不能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我们的调查工作,不能停止于纵断法,而要用横断法,就是要做阶级分析,要做典型调查。

《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58—259页

2. 国家

● 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

革命的阶级——工农劳苦群众,用苏维埃这个武器去对付内外一切反革命,这就是苏维埃第一个作用。因为必须战胜了这些反革命,阶级才能成为统治的阶级,政权才能成为统治的政权。

《今年的选举》(一九三三年九月六日),《红色中华》1933年9月6日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相信工具论。政府是什么东西呢?国家是什么东西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外一个阶级的机关,是个机器,是个工具。我们的政府是什么呢?是压迫反革命的工具。反革命政府是什么呢?是压迫革命的工具。总之,都是一种工具,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

《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73页

“你们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吗？”我们要，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要，我们现在还不能要。为什么？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5—1476页

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你们不仁。”正是这样。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6页

国家是暴力机关，无论奴隶制度的国家、封建制度的国家或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都是暴力机关。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离开了暴力还叫什么国家。

《同澳共总书记夏基的谈话》（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95—96页

● 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

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

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47页

军队和其他武装力量，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部分，没有它们，就不能保卫国家。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一切武装力量，如同其他权力机关一样，是属于人民和保护人民的，它们和一切属于少数人、压迫人民的旧式军队、旧式警察等等，完全不同。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57页

“军队是国家的”，非常之正确，世界上没有一个军队不是属于国家的。但是什么国家呢？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的国家，还是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国只应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中国的一切军队都应该属于这个国家的这个政府，借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有效地反对外国侵略者。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73页

世界上从有历史以来，没有不搞实力地位的事情。任何阶级、任何国家，都是要搞实力地位的。搞实力地位，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军队是阶级的实力。只要有阶级，就不能不搞军队。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0页

3. 革命

● 革命是阶级矛盾激化的产物

我们从内外政治经济的情势上，可以断定中国目前及最近之将来，必然是反动军阀支配的天下。这个期内是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恶，是必然成功一种极反动极混乱的政治的。但政治愈反动愈混乱的结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国国民的革命观念，国民的组织能力也会要一天进步一天。

《外力、军阀与革命》（一九二三年四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12页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新中华报》1939年12月30日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31页

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吗？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吗？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他连美国独立宣言也没有读过。华盛顿杰斐逊们之所以举行反英革命，是因为英国人压迫和剥削美国人，而不是什么美国人口过剩。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封建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人所以举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为俄皇和俄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至今还是土地多过人口很远的。蒙古土地那么广大，人口那么稀少，照艾奇逊的道理是不能设想会发生革命的，但是却早已发生了。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10—1511页

● 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十四年国民政府打倒杨、刘肃清反革命派的胜利，全赖对于敌人取绝对严厉的手段，不丝毫妥协，因为我们不用严厉的手段对付敌人，敌人便要用极残酷的手段对付我们了。巴黎公社，对于敌人不取严厉处置，还容许敌人占住金融机关，调集军队，所以终被敌人覆灭了。各同志要鉴往知来，惩前毖后，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这句话。我们要革命，便要从此学得革命的方法。

《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5—36页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7页

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7页

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7页

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

《今年的选举》（一九三三年九月六日），《红色中华》1933年9月6日

● 无产阶级革命要有暴力与和平两手准备

这是重大问题。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战略问题，一个是策略问题。作为战略问题来说，从长远看，用和平手段能够

消灭资产阶级政权是不可想像的。资产阶级怎么能够让工人阶级用和平手段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消灭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从策略上讲，首先可以说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表明我们不是好战的。但是如果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无产阶级就被迫不得不使用暴力。不要散布幻想，不要在精神上解除自己的武装。不作精神准备，就无法教育人民，无产阶级自己也就没有革命干劲。用和平手段也是要斗争的。其实，革命的大量日常工作都是通过和平手段进行的。但作为革命家，在用和平手段进行日常工作的同时，要想到革命时机到来时怎么办？这个问题，不要每天去讲。在重要时机才提这个问题，提两条，一定要两条：第一，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第二，假使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无产阶级被迫也得使用暴力。

《同澳共总书记夏基的谈话》(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94页

马克思主义者知道，阶级斗争不经过战争是不能最后解决问题的。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明知如此，为何又要提和平手段？因为广大人民群众还不觉悟，资产阶级就利用这一点恐吓人民群众，说共产党专讲暴力和战争。

《同澳共总书记夏基的谈话》(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94—95页

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曾经指出俄国存在用和平手段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当时俄国有两个政权并存，列宁根据那时特有的一些条件，设想布尔什维克通过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来夺取政权。后来到了七月就不行了，资产阶级政

府用武力镇压群众的革命运动，于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决定准备武装起义的方针，用暴力夺取政权。

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宁对全党讲得很清楚，写了许多文章，说明革命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不用暴力是不行的。他极力反对孟什维克主张通过议会斗争进行革命的论调。

《同澳共总书记夏基的谈话》(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95页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莫斯科会议宣言又提到这个问题，也是提两条：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但是如果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时，无产阶级被迫也要使用暴力。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法共、意共对这个问题都提两条，日共、印尼共也提两条，大多数党提两条。讲清楚两条，可使资产阶级被动。我们并不是提倡武力，我们只是说你使用武力我们才使用武力。

《同澳共总书记夏基的谈话》(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95页

这一段有问题。这里讲“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中，工人阶级通过议会和平地取得政权是有现实的可能性的。”这里说“某些”究竟是哪一些呢？欧洲的主要国家，北美洲的国家，现在都武装到了牙齿，他们能让你和平地取得政权吗？我们认为，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和革命力量都要有两手准备：一手是和平方法取得胜利，一手是暴力斗争取得政权，缺一不可。而且要看到，总的趋势来说，资产阶级不愿意让步，不愿意放弃政权，他们要挣扎。资产阶级在要命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用武力？十月革命，是准备了两手的。俄国一九一七年七月以前，列宁也曾经想用和平的方法取得胜利。七月事件说

明，把政权和平地转到无产阶级手里已经不可能，布尔什维克转过来进行了三个月的武装准备，举行武装起义，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以后，列宁还想用和平的方法，用赎买的方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资本主义。但是，资产阶级勾结十四个国家，发动了反革命的武装暴动和武装干涉。在俄国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三年的武装斗争，才巩固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至于中国革命，我们是用了革命的两手政策来对付反动派的反革命两手政策的。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1—112页

- 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

（参见第二编“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第480—482页；第三编“关于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第825—826页）

（六）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

1. 新的进步的东西终究要代替旧的落后的东西

我们常常说“新陈代谢”这句话。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依事物本身的性质和条件，经过不同的飞跃形式，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

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23页

世界是向前进的，要向后倒退是不成的；中国人的辫子没有了，他们想拖也拖不住了；旧的落后的东西只好倒下来，让新的进步的东西接替它。

《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54页

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95页

反动势力面前和我们面前都有困难。但是反动势力的困难是不可能克服的，因为他们是接近于死亡的没有前途的势力。我们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因为我们是新兴的有光明前途的势力。

《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17页

将来一万年以后，也还有唯心论，因为社会经济制度、生产关系陈旧了，就有一批人要出唯心论。新旧之间的矛盾，一万年后也还有。

《关于政协的性质和任务》（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85—386页

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国内反革命分子以及他们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等等，都不过是垂死的力量，而我们则是新生的力量，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对于他们，我们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只要想一想我们自己的历史，就会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在一九二一年刚刚建党的时候，只有几十个人，那样渺小，后来发展起来，居然把国内的强大敌人给打倒了。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93页

不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93页

我们在开始斗争的时候手无寸铁，我们的对手都是全副武装的。但是手无寸铁的人民却把全副武装的人赶跑了。几千年来历史证明，腐朽的人手里东西越多，倒得也越快。

《同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谈话》（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12页

一切受压迫的民族都要独立。

一切会有变化。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让位给新生的小的力量。力量小的要变成大的，因为大多数人要求变。美帝国主义力量大要变小，因为美国人民也不高兴本国的政府。

《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71页

一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都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每一个人都要死，因为他是发生出来的。人类是发生出来的，因此人类也会灭亡。地球是发生出来的，地球也会灭亡。不过，我们说的人类灭亡、地球灭亡，同基督教讲的世界末日不一样。我们说人类灭亡、地球灭亡，是说有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是事物发展到更高阶段。我说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这好像是怪话。但既然马克思主义说一切发生的東西都有它的灭亡，难道这话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不灵吗？说它不会灭亡是形而上学。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是有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的东西来代替它。

《关于人的认识问题》（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

第8卷第391页

2. 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

估计形势，是我们必胜，社会主义必胜，这是整个的趋势和可能性。但要等到最后取胜了才算胜利，中国革命也是一样。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毛泽

东文集》第5卷第261页

苏联的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来，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世界各国的广大人民热烈地庆祝十月革命的四十周年，因为这四十年的历史使他们确信，无产阶级必然能够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必然能够战胜资本主义，被压迫民族必然能够战胜帝国主义。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一九五

七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14页

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难道沙皇和蒋介石对于革命人民的种种迫害，不就是对于伟大的俄国革命和伟大的中国革命起了这样的促进作用吗？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15页

对于帝国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在最后说来也是如此，它们最后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

《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31页

3. 阶级、政党、国家最终要消亡

阶级的矛盾，在阶级制度未废除前，是无法消灭的。

《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99页

巩固无产阶级的专政或人民的专政，正是准备着取消这种专政，走到消灭任何国家制度的更高阶段去的条件。建立和发展共产党，正是准备着消灭共产党和一切政党制度的条件。建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进行革命战争，正是准备着永远消灭战争的条件。这许多相反的东西，同时却是相成的东西。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29页

全世界自古以来，没有任何学问、任何东西是完全的，是再不向前发展的。地球是在发展的，太阳是在发展的，这就是世界。停止了发展就不是世界。整个宇宙不晓得经过多少万万年，现在比过去是进步了。地球上出了生物，出了动物，出了人类。人类又有几十万年的历史，出了文明社会，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出了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宇宙观教给我们，要懂得将来还要进步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来还要进步，直到阶级没有了，政党也不要了，共产党、国民党一概不要，八路军、新四军也不要了。太阳、地球在很远的将来也都有一天要毁灭。旧的东西毁灭了又有新的产生。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一定要这样看问题。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9页

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不承认这一条真理，就不是共产主义者。没有读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刚才进党的青年同志们，也许还不懂得这一条真理。他们必须懂得这一条真理，才有正确的宇宙观。他们必须懂得，消灭阶级，消灭国家

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68页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事情，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消灭就是那么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页

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过渡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社会主义阶段的一些东西必然是要灭亡的。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8页

历史的规律是，只有经过革命战争才能消灭阶级，只有消灭了阶级才能永远消灭战争。不进行革命战争，要消灭阶级，我们不相信。没有消灭阶级，要消灭战争武器，这不可能。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0页

五、实事求是

（一）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红军中显然有一部分同志是安于现状，不求甚解，空洞乐观，提倡所谓“无产阶级就是这样”的错误思想，饱食终日，坐在机关里面打瞌睡，从不肯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调查。对人讲话一向是那几句老生常谈，使人厌听。我们要大声疾呼，唤醒这些同志：

速速改变保守思想！

换取共产党人的进步的斗争思想！

到斗争中去！

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

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180页

依社会运动来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如同上面已经说到的，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

294页

一切战术都以适合情况为原则，文字条文仅能作为实战的参考，不能死板应用。抗日战争中一定有许多新的可贵的经验，胜过过去文字条文的東西，希望大家共勉，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87页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像，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

《改造我们的学习》（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1页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

《改造我们的学习》（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797页

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27页

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

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3卷第853页

有一个问题必须再一次引起大家注意的，就是我们的思想要适合于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目前所处的环境是农村，这一点好像并没有什么问题，谁不知道我们是处在农村中呢？其实不然。我们有很多同志，虽然天天处在农村中，甚至自以为了解农村，但是他们并没有了解农村，至少是了解得不深刻。他们不从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被敌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这一点出发，他们就在政治问题上，军事问题上，经济问题上，文化问题上，党务问题上，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项的问题上，常常处理得不适当，或不大适当。他们带着城市观点去处理农村，主观地作出许多不适当的计划，强制施行，常常碰了壁。近几年来，由于整风，由于在工作中碰了钉子，我们的同志有了很多的进步。但是还须注意使我们的思想完全适合于我们所处的环境，然后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样样见效，并迅速见效。如果我们真正了解了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被敌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击战争的农村根据地，如果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看起来收效很慢，并不轰轰烈烈，但是在实际上，比较那种不从这一点出发而从别一点出发，例如说，从

城市观点出发，其工作效果会怎么样呢？那就决不是很慢，反而是很快的。因为，如果我们从后一点出发，脱离今天的实际情况，做起来不是效率快慢的问题，而是老碰钉子，根本没有效果的问题。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15—1016页

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训。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08页

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不合实际就错了。切合实际就是要看需要与可能，可能就是包括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干部条件。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01页

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486—487页

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河北省有个河间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说

他“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提出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当然不是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也不实事求是。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37页

（二）理论联系实际

1. 真正的理论是从客观实际中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理论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

《反对本本主义》（一九三〇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1页

近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翻译的多了，读的人也多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否就可以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已经是提得很高了呢？确实，我们的理论水平是比较过去高了一些。但是按照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一般地说来，我们的理论还不能够和革命实践相平行，更不去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的前面去。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

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你们看，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我们究有多少人创造了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算得科学形态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理论呢？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13页

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斯大林曾经说过，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空洞的理论是没有用的，不正确的，应该抛弃的。对于好谈这种空洞理论的人，应该伸出一个指头向他刮脸皮。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17页

2. 我们需要的是能够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家

对于理论脱离实际的人，提议取消他的“理论家”的资格。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才算实际的理论家。

《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4页

我们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能不能就算是有了理论家呢？不能这样说。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根据实际创造出来的理论，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总结论。我们如果仅仅读了他们的著作，但是没有进一步地根据他们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

命实际，没有企图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我们就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如果我们身为中国共产党员，却对于中国问题熟视无睹，只能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的结论和个别的原理，那末，我们在理论战线上的成绩就未免太坏了。如果一个人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样是不是就算得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呢？这还是不能算理论家的。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14页

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假如要作这样的理论家，那就要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真正领会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学说，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14页

马克思不但参加了革命的实际运动，而且进行了革命的理论创造。他从资本主义最单纯的因素——商品开始，周密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商品这个东西，千百万人，天天看它，用它，但是熟视无睹。只有马克思科学地研究了它，他从商品的实际发展中作了巨大的研究工作，从普遍的存在中找

出完全科学的理论来。他研究了自然，研究了历史，研究了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这样，马克思就成了一个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最完全的知识分子，他和那些仅有书本知识的人有根本的区别。马克思在实际斗争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概括了各种东西，得到的结论又拿到实际斗争中去加以证明，这样的工作就叫做理论工作。我们党内需要许多同志学做这样的工作。我们党内现在有大批的同志，可以学习从事于这样的理论研究工作，他们大都是聪明有为的人，我们要看重他们。但是他们的方针要对，过去犯过的错误他们不应重复。他们必须抛弃教条主义，必须不停止在现成书本的字句上。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16—817页

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同时作者们没有辩证法。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9—140页

3.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不是教条

在全党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64页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3页

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些人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话。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20页

教条主义是哪里来的？是不是从马、恩、列、斯那里来的？

不是的。他们经常在著作里提醒我们，说他们的学说是行动的指南，是武器，不是教条。人家讲的不是教条，我们读后变成了教条，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读通，不会读，我们能责备他们吗？许多人不重视理论工作，似乎这个工作不要紧。对理论工作看法的动摇是不对的。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18页

列宁告诉人们不要硬搬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话，就是它的基本原理，也要当作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当作教条。各国党应该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去创造性地运用，结合各国情况去实行。

《要学习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一九五八年四月二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14页

4. 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加强党内的马列主义的教育，理论与实际的一致。

《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一九三七年十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60页

我们的原则是革命的，但它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必须结合着实际情况来解决问题。

《对陕北公学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一九三八年三月三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09页

共产主义者是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即有革命彻底性。三民主义者除了那些最忠实于革命和真理的人们之外，是理论和实践不一致的，讲的和做的互相矛盾，即没有革命彻底性。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88页

我们要用钻研的方法来分析客观,分析阶级。对实际问题不应当熟视无睹,应当捣毁“牛皮公司”,应当经过自己头脑深思熟虑,应当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关于农村调查》(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81页

有什么办法使这种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这样就可以达到目的。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16页

要把理论和实际行动联系起来,把文件上讲的东西和自己的行动联系起来。什么是实际?个人的历史实际,机关工作的历史实际,各个同志所想的、做的都是实际。对它们可以先来一个研究,在研究中、在检查中来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能够达到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目的。

《关于整顿三风》(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15页

必须使各级党的领导骨干都懂得,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94页

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90页

5. 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反对本本主义》（一九三〇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1—112页

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4页

到今天为止，我们可以自信地说，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年的斗争中，不但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我们不但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政治问题，而且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战争问题；不但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党会治国的有力的骨干，而且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军的有力的骨干。这是无数先烈的热血浇灌出来的革命的鲜花，不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光荣，而且是世界共产党和世界人民的光荣。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48页

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7页

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

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改造我们的学习》（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796页

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改造我们的学习》（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1页

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

《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4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19—820页

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如果只是口头上讲联系,行动上又不实行联系,那末,讲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20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93页

过去,在民主革命中,我们受主观主义的害时间很长,受了很大的惩罚,根据地差不多丧失干净,革命力量丧失百分之九十以上,一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开始觉悟。经过延安整风,着重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90页

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16页

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教训就是理论和实践相脱离。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这个道理没有运用到经济建设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唯物论；二者是对立的统一，也就是辩证法。为什么硬搬，就是不讲辩证法。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66页

马克思和列宁都曾说过，他们的理论仅仅是行动的指南，是指导方向的，不能当作教条。但我们有些同志就是不懂得这一点，后来受了损失，吃了苦头，才明白了。长征中我们走了很多路，用两条腿走的，全部路程等于地球的轴心，从中国钻进去，从美国出来，有一万二千五百公里。那时我们犯了错误，蒋介石就逼着我们走这么多路，走到北方来了。这以后我们就得到了教训，知道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是应该相信的，但是要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后来一结合就灵了，就打胜仗了。

《同黑非洲青年代表团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83页

中国的党一贯遵守马列主义的原则，因为它是普遍的真理。这是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的问题。

《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一九五九年二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5—6页

(三) 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1. 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受过种种打击，被认为是毒草。现在它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还在继续受打击，还被认为是毒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不同了。但是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0页

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0—231页

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

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于辩证法的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9—280页

人们历来不是讲真善美吗？真善美的反面是假恶丑。没有假恶丑就没有真善美。真理是同谬误对立的。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任何时候，总会有错误的东西存在，总会有丑恶的现象存在。任何时候，好同坏，善同恶，美同丑这样的对立，总会有的。香花同毒草也是这样。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对立的统一，对立的斗争。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而且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0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不怕论战的，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对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稿的修改》（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12页

2. 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在实践中创新和发展

实践是发展的，理论也应是发展的。

《读米丁等著沈志远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一书的批注》(一九三七年七月以前)，《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44页

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

《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3页

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

《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4页

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用这个理论和策略搞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斯大林接着又搞了三个五年计划，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我们要按照同样的精神去做。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7—408页

关于辩证法，列宁说过：“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

释和发展。”解释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要解释，我们现在解释太少了。还要发展，我们在革命中有丰富的经验，应当发展这个学说。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92页

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1页

中国应当是辩证法发展的国家。

《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91页

我们党里有人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是错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〇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〇八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

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9页

(四) 调查研究

1. 调查研究的重要性

●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反对本本主义》(一九三〇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
第109页

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

要不得!

要不得!

注重调查!

反对瞎说！

《反对本本主义》（一九三〇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09页

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

《反对本本主义》（一九三〇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0页

我们的口号是：

- 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
- 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一九三一年四月二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67—268页

“瞎子摸鱼”，闭起眼睛瞎说一顿，这种作风，是应该废弃的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或者说，“研究时事问题须先详细占有材料”，这是科学方法论的起码一点，并不是什么“狭隘经验论”。

《研究沦陷区》（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48—249页

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

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789页

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的发言权的。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791页

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还不知道，不但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调查研究，是如何的无微不至，就是国民党对于国内外情况，亦比我党所了解的丰富得多。还不知道，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

义及其走狗的统治。

《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60—361页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就有同志要问:“十样事物,我调查了九样,只有一样没有调查,有没有发言权?”我以为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末,仍旧是没有发言权。

今天中国主要的矛盾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成为次要的。西安事变前主要矛盾在国共两党之间,而西安事变后,主要矛盾则在中日之间。因此,今天无论解决任何问题,都应该以这个主要矛盾作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假若丢掉主要矛盾,而去研究细微末节,犹如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仍是无发言权的。

所以,我们做综合工作时,不要陷于狭隘的经验论。

《关于农村调查》(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82页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大家都熟悉了。这个口号,就是那时候提出来的。这一次有两个问题,一个手工业问题,一个商业问题,因为没有调查,我就没有发言权。我总是不相信没有调查会有发言权的。

《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60页

● 正确的决策来自于调查研究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

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

《反对本本主义》（一九三〇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0页

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他恼火，请求调动工作，理由是“才力小，干不下”。这是懦夫讲的话。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一定要出门吗？也不一定，可以召集那些明了情况的人来开个调查会，把你所谓困难问题的“来源”找到手，“现状”弄明白，你的这个困难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反对本本主义》（一九三〇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0页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反对本本主义》（一九三〇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0—111页

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

《反对本本主义》(一九三〇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3页

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是非错不可的。非常明显,争取贫民一件事,一般同志不感觉它的重要,高级指导机关感觉它的重要了,却始终不能给同志们以行动上的具体策略,尤其是不能把具体工作方法指示出来。这不是由于不了解城市是什么东西才弄成这种现象吗?

《寻乌调查》(一九三〇年五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131页

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

《〈兴国调查〉前言》(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54页

据我们历来的想法,所谓对于情况的估计,就是根据我们对于客观地存在着的实际情况,加以调查研究,而后反映于我们脑子中的关于客观情况的内部联系,这种内部联系是独立地存在于人的主观之外而不能由我们随意承认或否认的。它有利于我们也好,不利于我们也好,能够动员群众也好,不能动员也好,我们都不得不调查它,考虑它,注意它。如果我们还想改变客观情况的话,那就可以根据这种真实地反映了客观情况内部联系的估计,规定行动方针,转过去影响客观情况,把它

加以改造。这时，如果客观情况是有利于我们前进的，我们就向群众说：你们前进吧！如果是不利于我们前进的，我们就向群众说：你们暂停吧（近乎“等待主义”），或说：你们退却吧（大有“机会主义”嫌疑）！据我想，这就叫做马克思主义的起码观点呢！

《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节选）》（一九四一年），《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39页

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列宁、斯大林也同样做了许多调查。

《关于农村调查》（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8页

在任何群众运动中，群众积极拥护的有多少，反对的有多少，处于中间状态的有多少，这些都必须有个基本的调查，基本的分析，不可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问题。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43页

我们讲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要有这三条。

第一条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着手。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34页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做调查研究比较认真一些，注意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通过调查研究，情况明了

来下决心，决心就大，方法也就对。方法就是措施、办法，实现方针、政策要有一套方法。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35页

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情况不明，政策就不正确，决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对头。医生看病是先诊断，中医叫望、闻、问、切，就是先搞清病情，然后处方。我们打仗首先要搞侦察，侦察敌情、地形，判断情况，然后下决心，部署队伍、后勤等等。历来打败仗的原因大都是情况不明。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

《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53页

那个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上级的东西就认为是好的。比如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那个东西你拿来如何实现呢？你如果不搞些具体措施，是很难实现的。不要说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有部分的原则性错误，即使都是正确的，没有具体措施，没有调查研究，也不可能实现。现在我们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

《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57页

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在第二次反

“围剿”的时候，兵少觉得很不好办，开头不了解情况，每天忧愁。我跟彭德怀两个人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察看地形，看了很多地方。我对彭德怀说，红一军团的四军、三军打正面，打两路，你的红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去。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如何打法。调查研究就会有办法，大家回去试试看。

《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61页

这篇文章还提出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所谓策略路线是包括很宽的，包括政治路线的。比如，依靠些什么阶级，联合些什么阶级，打倒些什么阶级，就属于策略路线的问题。文章讲到商业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对这两个阶级我们的认识始终模糊，就是写文章这个时候，还是模糊的，对他们没有具体的政策，没有正确的政策，因为我们没有做这方面的调查。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则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如果没有伦敦图书馆，马克思就写不出《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现在印出来是一个薄薄的本子，他研究的原始材料，比这本书不知厚多少倍。列宁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他用好几年时间研究哲学史才写出来的。列宁写这本书是为了批判当时的唯心主义造神派的“经验批判主义”。我那篇文章批评社会科学研究专从书本里面讨生活是危险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正是失败的时候，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一些知识分子倒退了，蜕化了，变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他们专从书本里讨生活，不到工人、农民、社会中去调查，不到群众中去调查，不在斗争中逐步深入调查研究。没有那些胜利和

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

《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62—263页

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

《给张平化的信》（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72页

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这件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点。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5页

到一个单位去了解情况，要了解运动的全过程，开始怎样，后来怎样，现在怎样，群众是怎么搞的，领导是怎么搞的，发生过一些什么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人们的认识有什么发展，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要认真总结经验》（一九六九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0页

● 离开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

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92页

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

《反对本本主义》（一九三〇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2页

你不相信这个结论吗？事实要强迫你信。你试试离开实际调查去估量政治形势，去指导斗争工作，是不是空洞的唯心的呢？这种空洞的唯心的政治估量和工作指导，是不是要产生机会主义错误，或者盲动主义错误呢？一定要弄出错误。这并不是他在行动之前不留心计划，而是他于计划之前不留心了解社会实际情况，这是红军游击队里时常遇见的。那些李逵式的官长，看见弟兄们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这不是红军里常见的吗？

《反对本本主义》（一九三〇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2页

必须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才能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

能洗刷唯心精神。

《反对本本主义》（一九三〇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2页

过去许多地方往往忽视实际事实的调查，只凭自己空想去决定工作计划，去指导下级工作，结果计划是行不通的，指导是错了的。

《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一九三一年四月二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66页

我们在接收石家庄的工厂时就有教训。我们派去的干部不能在业务上给予帮助，又不作具体调查研究，只是大讲了三天反帝反国民党的大道理，讲完了又没有新的，人家就不愿意听，不赞成你。他们后来重新当学生，和工人一起学习、劳动，调查研究，开展对敌斗争，业务上成为内行，才成了工人的贴心人，谈话别人也爱听了。我们有许多同志，对新情况、新事物不作调查研究，自己又不懂得，就在那里办事，不懂货就不识货，这怎么能办好事情呢？

《同绥远负责人的谈话》（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1页

●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我提倡做调查研究，但我到陕北后开始在这方面就没有调查研究，现在我们有了调查研究。同时希望在南方、在北方、在东方、在西方工作的地方同志多提出意见。我们要把窗户打开，让空气流通，听听消息，听听舆论，有缺点有错误的改正一下。这一条搞不好就不行。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44页

多想多读，多谋善断。谋之于主席、副主席、总书记，谋之于秘书、部长助理、副部长、司局长，谋之于省地县社直至生产小队长，谋之于反对派即不同意见的同志，这一点很要紧。就是说，认真地做调查研究工作。

《对赵尔陆关于重工业生产建设方面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批语》（一九五九年五月三十日、六月十七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280页

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33—234页

到会各同志，应利用目前这一段时间，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耕牛、农具大队有好还是队有好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十天至十五天苦功夫，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便五月会议能比较彻底地完成上述任务。

《给邓小平的信》（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68页

我在这里还有一个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內，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

《给李井泉、陈正人的信》（一九六一年五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70页

调查研究，我们从前做得比较好，可是进城以后，不认真做了。一九六一年我们又重新提倡，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在领导干部中间，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有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有一些省委书记，到现在还没有下去蹲过点。如果省委书记不去，怎么能叫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蹲点呢。这个现象不好，必须改变过来。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3页

● 领导干部要亲自做调查研究

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

《反对本本主义》（一九三〇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7页

为着了解农村情况，为着进行土改，区党委书记以下，政治部主任以下，必须亲自调查几个区乡的土改工作，否则，就不可能正确地领导土改。

《新解放区土改斗争策略》（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9页

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然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明证。

《彻底纠正“五风”》（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20页

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又要调查农村又要调查城市，这就要好好部署一下。去做调查，就是要使自己心里有底，没有底是不能行动的。了解情况，要用眼睛看，要用口问，要用手记。谈话的时候还要会谈，不然就会受骗。要看群众是不是面有菜色，群众的粮食究竟是很缺，还是够，还是很够，这是看得出来的。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33页

调查研究极为重要，要教会所有的省委书记加上省委常委、省一级和省的各个部门的负责同志、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做调查研究。他们不做调查，情况就不清楚。公社

内部平调的情况，公社的党委书记不一定都知道。一个公社平均有三十个生产队左右，他怎么会知道那么多呢？不可能嘛！但是，有一个办法，三十个生产队他调查三个就行了，一个最坏的，一个中等的，一个最好的。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34页

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

《反对两个平均主义》（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50页

我的那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也请同志们研究一下，那里提出的问题是作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因此建议同志们研究一下。可以提出反对意见，但不要置之不理。

《反对两个平均主义》（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51页

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省委第一书记要亲自做调查研究，我也是第一书记，我只抓第一书记。其他的书记也要做调查研究，由你们负责去抓。只要省、地、县、社四级党委的第一书记都做调查研究，事情就好办了。

《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52页

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书面报告也可以看，但是这跟自己亲身的调查是不相同的。自己到处跑或者住下来做一个星期到十天的调查，主要是应该住下来做一番系统的调查研究。农村情况，只要先调查清楚一个乡就比较好办了，再去调查其他乡那就心中有数了。

《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53页

我和大家相约，搞点副食品基地的调查研究，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报表。……报表有一点也可以，统计部门搞统计需要报表，可是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靠报表，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

《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53—254页

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都要亲身出马。我讲得很宽，那个时候也有点无法无天了。一定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我们那个时候得到经验了，知道不能单靠书面报告。

《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59—260页

2. 要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

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

《致周世钊信》（一九二〇年三月十四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4页

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

《给林彪的信》（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74页

当前的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它有什么规律性？如何指导这个运动？这些都是实际的问题。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懂得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也还没有懂得中国的全部。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4—535页

一部分同志曾在这个伟大斗争中跌下了或跌下过机会主义的泥坑，这仍然是因为他们不去虚心领会过去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共产党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来的。

《〈共产党人〉发刊词》（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11页

一般地说，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

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特殊地说，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791页

像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虽则对于国内和国际的现状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绩，但是对于国内和国际的各方面，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二十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

《改造我们的学习》（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796—797页

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

《改造我们的学习》（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797页

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具体情况，不愿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

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这种主观主义的作风，不是还在许多同志中间存在着吗？

《改造我们的学习》（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797—798页

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检来的。

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

《改造我们的学习》（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798页

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

《改造我们的学习》（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1页

为要认识中国现存社会的性质是什么，就必须对中国社会的过去状况与现在状况加以科学的具体的分析，懂得它既不同于独立的封建社会（第一条战线上的斗争），也不同于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第二条战线上的斗争），然后才可作出综合的结论，

说它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独立的）半封建的社会。又如要认识现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就必须从中国社会是特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一点出发，加以科学的分析，懂得它既不同于没有民族压迫只有封建压迫而无产阶级又未觉悟的国家，如像二百年前的法兰西那样，是由资产阶级领导推翻封建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第一条战线上的斗争），也不同于由于无产阶级觉悟而在推翻封建阶级之后社会条件与政治条件容许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如像十月革命时的俄国那样，是由无产阶级领导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第二条战线上的斗争），然后才可作出综合的结论，说现时的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

《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节选）》（一九四一年），《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45—346页

二十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

《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60页

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可惜很多同志常是主观主义，自以为是，完全不重视调查研究工作。

《关于农村调查》（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8页

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共党史的关系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哪一边，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国那边去就不是研究中共党史了。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如果不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发展，党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研究就不会有结果。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7页

定义是分析的结果，不是分析的出发点。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9页

3. 调查研究的态度和方法

- 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和甘当小学生的精神

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789—790页

兴国调查和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找的是乡级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790页

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790页

● 要坚持长期做实际调查

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所以，我们的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而不是幻想。同时，我们又相信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

《关于农村调查》（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8页

我们的调查工作，是要有耐心地、有步骤地去作，不要性急。我自己认识农村，就是经过好几年的工夫的。

《关于农村调查》（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8页

比如这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发下去的时候要向同志们解释一下，文章主要是讲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个方法是可取的。

《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62页

● 既要“走马观花”，更要“下马观花”

我们研究城市问题也是和研究农村问题一样，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倘若走马看花，如某同志所谓“到处只问一下子”，那便是一辈子也不能了解问题的深处。这种研究方法是显然不对的。

《寻乌调查》（一九三〇年五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132页

要把中国考察一番，单单采取新闻记者的方法是不行的，因为他们的工作带有“过路人”的特点。俗话说：“走马看花不如驻马看花，驻马看花不如下马看花。”我希望你们都要下马看花。

《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24页

有的人走遍了省分，走过二万五千里再加多少里，参加土地革命多少年，可是出一个题目给他：“什么叫富农？”他说对不起，没有研究。问他：“什么叫中农？”也没有研究。即便是走马观花，那也应该看啊，可是他走马不看花，这个花就是农民。当然下马看花是更仔细，那叫做调查研究。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09页

调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走马看花,一种是下马看花。走马看花,不深入,因为有那么多的花嘛。你们从拉丁美洲到亚洲来,是走马看花的。你们国家有那么多的花,看一看望一望就走,这是很不够的,还必须用第二种方法,就是下马看花,过细看花,分析一朵“花”,解剖一个“麻雀”。

《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34页

中央和省、直属市、自治区两级党委的委员,除了生病的和年老的以外,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开会,到处跑。应当采取走马看花、下马看花两种方法。哪怕到一个地方谈三四小时就走也好。要和工人、农民接触,要增加感性知识。中央的有些会议可以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去开,省委的有些会议可以到省会以外的地方去开。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4页

● 要做典型调查,解剖“麻雀”

初次从事调查工作的人,要作一两回深入的调查工作,就是要了解一处地方(例如一个农村、一个城市),或者一个问题(例如粮食问题、货币问题)的底里。深切地了解一处地方或者一个问题了,往后调查别处地方、别个问题,便容易找到门路了。

《反对本本主义》(一九三〇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7—118页

怎样找调查的典型？调查的典型可以分为三种：一、先进的，二、中间的，三、落后的。如果能依据这种分类，每类调查两三个，即可知一般的情形了。

《关于农村调查》（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83页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在一切活动中找出几个令人满意的和令人不满意的典型例子，经过深入研究，总结经验，得出具体结论，以求得必要的工作改进。这种观察实际情况，研究好的和坏的典型例子所用的时间，有时是几个星期，有时是几个月，有时甚至是几年。虽然用的时间比较多，但这种方法却使我们能同现实发展情况始终保持密切联系，能了解人民的愿望和需要，能向党内外工作出色的人学习。

《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89页

合作社大发展一批以后，区乡干部感到问题很多，担子很重，难于解决，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其实，这是不难解决的。其办法，就是在每一个乡里，抓住一个至两个问题最多的合作社，深入进去，加以研究，找出解决的办法，就可以引导该乡一切合作社迅速地仿照办理。在一个区里，只要整好几个合作社，就可以引导全区各乡的合作社迅速地仿照办理。

《农业合作社要有计划地发展和整顿》（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505页

要争取和依靠农民，就要调查农村。方法是调查一两个或几个农村，花几个星期的时间，弄清农村阶级力量、经济情况、生活条件等问题。像党的总书记这样主要的领导人员，要亲自

动手，了解一两个农村，争取一些时间去做，这是划得来的。麻雀虽然很多，不需要分析每个麻雀，解剖一两个就够了。总书记调查一两个农村，心中有数了，就可以帮助同志们去了解农村，弄清农村的具体情况。我看很多国家的党，总书记不重视解剖一两个“麻雀”，对农村懂是懂得一点，但是不深刻，因此，发出的指示不很符合农村情况。党的领导机关，包括全国性的、省的和县负责同志，也要亲自调查一两个农村，解剖一两个“麻雀”。这就叫做“解剖学”。

《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33—134页

调查研究工作，并不那么困难，时间并不要那么多，调查的单位也不要那么多。比如，在农村搞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搞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商店、一两个学校，加在一起也只有十个左右。这些调查并不都要自己亲身去搞。自己亲身搞的，农村有一两个、城市有一两个就够了。要组织调查研究的班子，指导他们去搞。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34页

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不然，对实际情况就不摸底。不摸清一个农村公社，不摸清一个城市公社，不摸清一个工厂，不摸清一个学校，不摸清一个商店，不摸清一个连队，就不行。其实，摸清这么几个单位的情况就差不多了。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37页

要从个别问题深入,深入解剖一个麻雀,了解一处地方或一个问题。全国了解两个乡,南方一个,北方一个,对中国的农村就有一个基本概念了。工业不同,要分行业。比如煤矿、冶金、机械等,各了解一个厂矿就差不多了。煤矿,中央有四百多个,你去全面彻底地了解一个就好办了,别的地方也是掘煤嘛。冶金、机械行业也是这样去了解一个工厂。这是重工业,还有轻工业,工业比农业复杂一些。深切地了解一处地方或一个问题,往后调查别处地方或别个问题,你就容易找到门路。不然就不容易找到门路。

《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60页

● 开好调查会

(1) 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

只有这样才能近于正确,才能抽出结论。那种不开调查会,不作讨论式的调查,只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的方法,是容易犯错误的。那种只随便问一下子,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席上经过辩论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

(2) 调查会到些什么人?

要是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

要，有时兵士也要，流氓也要。自然，调查某个问题时，和那个问题无关的人不必在座，如调查商业时，工农学各业不必在座。

(3) 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

看调查人的指挥能力。那种善于指挥的，可以多到十几个人或者二十几个人。人多有人多的好处，就是在做统计时（如征询贫农占农民总数的百分之几），在做结论时（如征询土地分配平均分好还是差别分好），能得到比较正确的回答。自然人多也有人多的坏处，指挥能力欠缺的人无法使会场得到安静。究竟人多人少，要依调查人的情况决定。但是至少需要三人，不然会囿于见闻，不符合真实情况。

(4) 要定调查纲目

纲目要事先准备，调查人按照纲目发问，会众口说。不明了的，有疑义的，提起辩论。所谓“调查纲目”，要有大纲，还要有细目，如“商业”是个大纲，“布匹”，“粮食”，“杂货”，“药材”都是细目，布匹下再分“洋布”，“土布”，“绸缎”各项细目。

.....

(7) 要自己做记录

调查不但要自己当主席，适当地指挥调查会的到会人，而且要自己做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可行的。

《反对本本主义》（一九三〇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6—118页

下面的材料是这样得来的：由我提出调查的纲目，逐一发问并加讨论，一切结论，都是由我提出得到他们八个同志的同

意，然后写下来的，有些并未做出结论，仅叙述了他们的答话。我们的调查会是活泼有趣的，每天开两次甚至三次，有时开至很夜深，他们也并不觉得疲倦。应该深深感谢这些同志。他们有几个是共产党员，但多数不是党员。

《〈兴国调查〉前言》（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文集》
第1卷第255页

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到会的人，应是真正有经验的中级和下级的干部，或老百姓。我在湖南五县调查和井冈山两县调查，找的是各县中级负责干部；寻乌调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他们都给了我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使我第一次懂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县作调查时该县的一个小狱吏。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790页

开调查会每次人不必多，三五个七八个人即够。必须给予时间，必须有调查纲目，还必须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790页

怎样开调查会？一个调查会不仅提出问题，而且要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参加调查会最好有三五人。我在兴国调查中，知道地主占有土地达百分之四十，富农占有土地达百分之三十，地主、富农所共有的公堂土地为百分之十，总计地主与富农占有

土地百分之八十，中农、贫农只占有百分之二十。但是，地主人口不过百分之一，富农人口不过百分之五，而贫农、中农人口则占百分之八十。一方面以百分之六的人口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另一方面以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则仅占有土地百分之二十。因此得出的结论，只有两个字：革命。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这个革命是能获得百分之八十以上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

《关于农村调查》（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
第383页

怎样使对方说真话？各个人特点不同，因此，要采取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但是，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来意究竟是否于他们有利。要在谈话过程中和做朋友的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把你当做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

《关于农村调查》（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
第383页

我在兴国调查中，请了几个农民来谈话。开始时，他们很疑惧，不知我究竟要把他们怎么样。所以，第一天只是谈点家常事，他们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也不多讲。后来，请他们吃了饭，晚上又给他们宽大温暖的被子睡觉，这样使他们开始了解我的真意，慢慢有点笑容，说得也较多。到后来，我们简直毫无拘束，大家热烈地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像自家人一样。

《关于农村调查》（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
第384页

讲调查的技术，也就是调查的方法。第一点是要开调查会，做讨论式的调查。你可提出几个方案，跟他们讨论，跟他们研究，这个方案好，还是那个方案好。要做讨论式的调查，才能得出近乎正确的结论。第二点是讲调查会到些什么人。各种人都要，经验多的人要，经验少但思想进步的人也要。从职业上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士兵也要，甚至流氓也要。第三点是讲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人多有人多的好处，但开调查会人太多了比较困难。第四点是讲调查的纲目。纲目要事先准备，按纲目发问，这就要有一定的时间。……第七点是讲要自己做记录。那个时候还是我精力充沛的时候。现在调查要我做详细的记录，也许还可以，我想试试看。自己当记录，这是调查的一个要点。不但要自己当主席，适当地指挥调查会的到会人，而且要自己当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

《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59—260页

● 在详细占有调查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和综合

到底如何才能使调查所得的材料真实正确呢？

第一，必须建立对这一工作的深刻认识，看清楚这一工作的重要，才会以大力注意。

第二，调查的人要不怕麻烦。调查这一乡，必须找到他们的分田的人口和土地调查本子，找到这一乡的经手分田的土地委员和熟悉这一乡情形的人，先把每一家人的阶级成分和每一亩田为哪个阶级占有（属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分别清楚，再用硬算的办法统计清楚，按照实际数目填写上去。

第三，上级政府派出去指导的同志和政治部负责任的同志，须将两张表格的内容及调查时要注意之点，详细向执行这一工作的同志说清楚。特别是要说清楚：富农标准要是以剥削为他收入的相当部分。那些少量放账或借账的人还是列在中农。那些原是雇农，中间（未革命前）已经租得土地耕种的人还是列入贫农。那些全家不耕田，专靠独立劳动（做裁缝、木匠等）谋生活的才叫独立劳动者。半耕半做手艺的还是按照他的经济地位列入贫农、中农或富农里面去。自由职业者与流氓的分别，是在自由职业者谋相当正业（如医生、教员等），流氓无一定职业，生活行为亦不一定，而且都是做坏的事多。

以上各项，如果调查时不弄清楚，则自己茫无把握，必致把阶级成分弄错了，失了统计的正确价值。

《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一九三一年四月二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66—267页

关于收集材料的方法，举例如下：第一，收集敌、友、我三方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的各种报纸、刊物、书籍，加以采录、编辑与研究。第二，邀集有经验的人开调查会，每次三五人至七八人，调查一乡、一区、一县、一城、一镇、一军、一师、一工厂、一商店、一学校、一问题（例如土地问题、劳动问题、游民问题、会门问题）的典型。从研究典型着手是最切实的办法，由一典型再及另一典型。第三，在农村中，应着重对于地主、富农、商人、中农、贫农、雇农、手工工人、游民等各阶层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详细调查；在城市中，应着重对于买办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贫民群众、游民群众及无产阶级的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

系的详细调查。第四，利用各种干部会、代表会收集材料。第五，写名人列传。凡地主、资本家财产五万元以上者，敌军、伪军、友军团长以上的军官，敌区、友区县长以上的官长，敌党、伪党、友党县以上的负责人，名流、学者、文化人、新闻记者在一县内外闻名者，会门首领、教派首领、流氓头、土匪头、名优、名娼，以及在华外人活动分子，替他们每人写一数百字到数千字的传记。此种传记，要责成地委及县委同志分负责任，传记内容须切合本人实际。同时注意收集各种人员的照片。第六，个别口头询问。或派人去问，或调人来问，问干部、问工人、问农民、问文化人、问商人、问官吏、问流氓、问俘虏、问同情者，均属之。第七，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

《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61—362页

当我们观察一事物时，第一步的观察只能看到这件事物的大体轮廓，形成一般概念。好比一个初来延安的人，开始他对延安的认识只是一般的、笼统的。可是当他参观了抗大、女大以及延安的各机关学校之后，他采取了第二个步骤，用分析方法把延安的各部分有秩序地加以细细的研究和分析。然后第三步再用综合法把对各部分的分析加以综合，得出整体的延安。这时认识的延安就与初来时认识的延安不同，他开始看见的是整个的延安，现在看见的也是整个的延安，但与开始的了解不同了，现在他对延安就有了科学的认识和具体的了解。观察一个农村，也同样是如此。

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写成的，先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各部分，然后加以综合，得出资本主义运动

的规律来。

《关于农村调查》（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80页

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分析。应该是分析而又综合，就是在第二步的分析中，也有小的综合。古人说：文章之道，有开有合。这个说法是对的。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

如果我们观察问题是走马看花的，各样都弄一点，这只是空花费了时间，一事无成。

《关于农村调查》（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80—381页

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矛盾的主导方面）。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列宁研究帝国主义，都是收集了很多统计和材料，但并不是全部采取，而只是采取最能表现特点的一部分。

《关于农村调查》（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82页

如何收集和整理材料？都必须自己亲身去做，在做的过程中找出经验来，用这些经验再随时去改进以后的调查和整理材料的工作。

《关于农村调查》（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83页

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这里所讲的分析过程，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常常问题是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这样，就不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能济事。

《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39页

很多同志做了几个月的调查，开过不少的大会小会，结果对于大量存在的事物，却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原因是方法不对，找不到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

《调查研究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一九五九年三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6页

（五）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1. 科学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

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

了，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62—663页

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

《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35—836页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绝不作空想。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32页

实事求是，力戒空谈。

为《七大纪念册》的题词，《毛泽东题词墨迹选》第47页

2. 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

反对不注重实际，铺张夸功。

《对八路军军政治工作的几点意见》（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94页

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东西，表现在党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却生怕人家驳，非常胆怯，于是就靠装样子吓人；以为这一吓，人家就会闭口，自己就可以“得胜回朝”了。这种装腔作势的东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的。凡真理都

不装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做下去。

《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35页

我讲的头一条，就是壮气话，没有专讲丧气话。但是如果只讲壮气话，只讲光明、光明、光明，而事实上有缺点，有困难，那也不行。所以要告诉同志们：不要只说丰衣足食、新式武器，不要随意开支票。对同志、对战士、对人民，要讲老实话，是则是，非则非。

《时局问题及其他》（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59—260页

我们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今天再说这样一点，就是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偷就是偷东西，装就是装样子，“猪鼻子里插葱——装象”，吹就是吹牛皮。讲真话，每个普通的人都应该如此，每个共产党人更应该如此。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49页

什么叫不偷？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事情，把别人写的整本小册子，换上几个名词，就说是自己写的，把自己的名字安上就出版了。不是自己的著作，拿来说是自己的，这是不是偷？呀！有贼。我们党内也有贼，当然是个别的、很少的。这种事情历来就有的，叫做“抄袭”。这是不诚实。马克思的就是马克思的，恩格斯的的就是恩格斯的，列宁的就是列宁的，斯大林的就是斯大林的，朱总司令讲的就是朱总司令讲的，刘少奇讲的就是刘少奇讲的，徐老讲的就是徐老讲的，哪个同志讲的就是哪个同志讲的，都不要偷。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50页

什么是不装？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孔夫子的学生子路，那个人很爽直，孔夫子曾对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讲懂得一寸，不讲多了。为什么世界上会出现“装”？为什么有人感到不装不大好呢？这是一个社会现象。偷是社会现象，装也是社会现象。装的现象现在特别多，在我们党内也特别多。爱装的人，是他母亲生下他来就要他装的？他母亲怀他在肚子里就在观音菩萨面前发誓、许愿，一定要生一个会装的儿子？当然不是，这是社会现象。我们党内历来不允许装。不知道不要紧，知道得少不要紧，即使对马列主义知道得很少、马列的书读得很少也不要紧，知道多少就是多少。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50页

关于要讲真话，我们现在发一个通令，要各地打仗缴枪，缴一支讲一支，不报虚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支为一支，两支为两支，是知也。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党的作风就可以更切实了。我们一定要老老实实。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51页

还有一个是不要吹，就是报实数，“实报实销”。在座的同志不是讨论过党的历史吗？有的同志在发言中说，内战时期养成了一种习惯，向上级报告工作时，要讲好一点，夸大一

点，才像样子。其实这不解决任何问题。……“实报实销”，要求我们的情报要真实，不要扯谎。要把自己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向大家公开，让大家来参观，看我这个旅有没有马屎、驴屎、有害的微生物，如果有，就来打扫一下，洗干净，扫除官僚主义。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51页

调查应本实事求是原则，有则有，无则无，多则多，少则少，力避主观夸大，但也不要故意缩小。

《对总政布置调查美军虐待俘虏的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233页

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7页

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一百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二百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去。有一百头就是一百头，没有就是没有，搞假干什么？过去打仗发捷报，讲俘虏多少、缴获多少，也有这样的事，虚报战绩，以壮声势，老百姓看了舒服，敌人看了好笑，欺骗不了的。后来我们反对这样做，三令五申，多次教育，要老实，才不敢作假了。其实，就都那么老实吗？人心不齐，我看还是有点假的，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

虚荣。

《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46页

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就脸上无光,讲实话没有人听,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有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要进行教育,讲清楚,要老老实实,几年之内能做到就好。我看经过若干年,上了轨道,就可以比较踏实。

《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48页

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党内通信》(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50页

3.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科学没有什么谦虚不谦虚的问题。搞宪法是搞科学。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

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30页

一九五六年，斯大林受到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70页

批判斯大林，使那些迷信他的人清醒了一些。要使我们的同志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样迷信。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70页

尊重苏联同志，刻苦虚心学习。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贾桂（即奴才）是谁也看不起的。

《四海之内皆兄弟》(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六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15页

破除对西方的迷信，这是一件大事，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要进行。在我们国家也要继续破除这种迷信。

《同巴西记者马罗金和杜特列夫人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05页

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破除迷信以来，

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比如说，连睡觉也不要了，说睡觉一小时就够了。方针是破除迷信，但科学是不能破的。

《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48—449页

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

《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49页

我们东方人有一种自卑感，总觉得自己不行，白种人比我们强。这是一种迷信，要破除。既要破除迷信，又要向西方学习。破除迷信与向它们学习并不矛盾，如我们可以派留学生，进口它们的设备等。

我不是反对西方的一切，而只是反对那些帝国主义压迫人、欺侮人的东西。它们的文化科学我们要学习。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要在破除迷信的条件下学习西方。

《中尼边界要永远和平友好》(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58—159页

人常常是有很多迷信的，迷信帝国主义是其中的一种；再有一种，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觉得自己力量很小；认为西方世界很行，我们黄种人、黑种人、棕种人都是不行的，这也是一种迷信。我们怎么不行呢？我相信，白种人可以干的事，我们都可以干，而且可以比他们干得好些。因为他们人数很少，只有几亿。

《帝国主义是不可怕的》(一九六〇年五月七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75—176页

要破除迷信，不要迷信那个什么帝国主义。当然，我不是说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都要反对，也不是说帝国主义国家的技术不可以学习，而是说对帝国主义的政治的迷信，对它们那套欺骗，要破除。

《帝国主义怕第三世界》(一九七〇年七月十一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587—588 页

4. 不但要有革命热忱，而且要有实际精神

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

《改造我们的学习》(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800—801 页

无产阶级的社会存在也是一种必然性，无产阶级思想是革命热情与实际精神相结合。

《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 3 卷第 93 页

不但要有革命热忱，而且要有实际精神。

给抗大的题词,《毛泽东题词墨迹选》第 7 页

我们应当是现实主义的，当然是革命的现实主义，有理想的现实主义。斯大林告诉我们，要学习美国人的实际精神，还要有俄国人的革命气概，把二者结合起来。我们要以科学的精神、革命的现实主义，切切实实、一点一滴、一个一个地夺取敌人的阵地，这样才是比较巩固的。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19页

可能性同现实性是两件东西，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头脑要冷又要热，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筋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另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对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脑慢慢热起来。

《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57页

5. 独立思考，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参见第八编“关于党的建设”，第2111—2114页）

6.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

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

《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3页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5—276页

各级党委，特别是坚决站在中央正确路线方面的负责同志，要随时准备挨骂。人们骂得对的，我们应当接受和改正。骂得不对的，特别是歪风，一定要硬着头皮顶住，然后加以考察，进行批判。在这种情况下，决不可以随风倒，要有反潮流的大无畏的精神。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5页

（六）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

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至于党内的主观主义的批评，不要证据的乱说，或互相猜忌，往往酿成党内的无原则纠纷，破坏党的组织。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84页

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84—85页

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 attitude 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反对本本主义》（一九三〇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1页

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一书的批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九三七年四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9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地列宁和斯大林，他们对于应用辩证法到客观现象的研究的时候，总是指导人们不要带上任何的主观随意性，而必须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的条件，去看出这些现象中的具体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体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关系。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因为没有这种研究态度，所以弄得一无是处。我们必须以教条主义的失败为鉴戒，学会这种研究态度，舍此没有第二种研究法。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19页

第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

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上的墙壁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

《改造我们的学习》（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799—800页

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

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这些主观主义者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主义。

《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2页

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

六中全会对主观主义作了斗争，但有一部分同志还存在着主观主义，主要表现在延安的各种工作中。在延安的学校中、文化人中，都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同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是相对抗的。它的来源是：

（一）中国的传统，“左”的传统。

（二）外国的传统，过去共产国际如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的影响。

（三）中国是科学不发达的、存在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国家。

《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3页

主观主义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它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它是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我们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12—813页

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他们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如果不注意，如果不知道这种片面性的缺点，并且力求改正，那就容易走上错误的道路。

但是在这两种主观主义中，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因为教条主义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把他们俘虏起来，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农干部不易识破他们；也可以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我们如果把教条主义克服了，就可以使有书本知识的干部，愿意和有经验的干部相结合，愿意从实际事物的研究，可以产生许多理论和经验结合的良好工作者，可以产生一些真正的理论家。我们如果把教条主义克服了，就可以使有经验的同志得着良好的先生，使他们的经验上升成为理论，而避免经验主义的错误。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19页

我们要反对主观主义，就要宣传唯物主义，就要宣传辩证法。但是我们党内还有许多同志，他们并不注重宣传唯物主义，也不注重宣传辩证法。有些同志听凭别人宣传主观主义，也安之若素。这些同志自以为相信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却不努力宣传唯物主义，听了或看了主观主义的东西也不想一想，也不发议论。这种态度不是共产党员的态度。这使得我们许多同志蒙受了主观主义思想的毒害，发生麻木的现象。所以我们要在党内发动一个启蒙运动，使我们同志的精神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间解放出来，号召同志们对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加以抵制。这些东西好像日货，因为只有我们的

敌人愿意我们保存这些坏东西，使我们继续受蒙蔽，所以我们应该提倡抵制，就像抵制日货一样。一切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货色，我们都要抵制，使它们在市场上销售困难，不要让它们利用党内理论水平低，出卖自己那一套。为此目的，就要同志们提高嗅觉，就要同志们对于任何东西都用鼻子嗅一嗅，鉴别其好坏，然后才决定欢迎它，或者抵制它。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27页

我们党内一部分（当然只是一部分）同志所中的党八股的毒，所犯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不除去，那末，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拿不正确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而对于老八股和老教条在全国人民中间的影响，以及洋八股和洋教条在全国许多人中间的影响，也就不能进行有力的斗争，也就达不到加以摧毁廓清的目的。

《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32—833页

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58页

延安县同志们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他们的态度是积极的，在他们的思想中、行动中，没有丝毫消极态度。他们完全不怕困难，他们像生龙活虎一般能够征服一切困难。……他们对于他们所领导的延安全县人民群众的情绪、要求及各种

具体情况是充分了解的，他们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有很好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他们就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群众的艺术，他们完全没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这种情形，对于那些处理问题不根据群众要求而根据主观想像的主观主义者，对于那些完全不作调查研究，工作三年五载、下情一点不知的官僚主义者，又是怎么样呢？岂不又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吗！我们希望全边区的同志都有延安同志这样的精神，这样的工作态度，这样的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样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也学会领导群众克服困难的马克思主义的艺术，使我们的工作无往而不胜。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节选）》（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58—459页

地方要去掉官僚主义作风，军队要去掉军阀主义作风，全党要去掉教条主义作风。

在彭德怀《关于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发言记录稿上的批注（一九四四年一月十日），《毛泽东年谱（一九三三——一九四九）》中卷第492页

我们是为根据地服务，为什么不说是为全国服务呢？因为你总要落一个地方，像飞机飞上天总得飞回来要落在一个地方，不能到处飞不落地。教条主义是不落地的，它是挂在空中的。我们不要搞教条主义，要脚踏实地地为实际服务。

《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50页

我们党的发展和进步，是从同一切违反这个真理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起来的。教条主义

义脱离具体的实践，经验主义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这两种机会主义的思想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党在自己的二十四年奋斗中，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这些错误思想，使得我们的党在思想上极大地巩固了。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1094页

要反对教条主义。在政治上我们是吃过亏的。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这就是因为不从实际出发，从教条出发的原故。教条主义者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他们说中国革命是民主革命，但是又要革一切资产阶级的命。照那样办，就搞错了，那就不是民主革命，而是社会主义革命了。这个道理他们没有搞通。革命办法没有搞对，党内关系没有搞对，使革命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假使不反，革命就不能胜利。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79页

许多年来，特别是从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以来，我们在加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现在，比起整风运动以前，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已经提高了一步。但是我们还有严重的缺点。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

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16页

目前思想偏向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是否定一切，教条主义则把凡有怀疑的都一棒子打回去，肯定一切。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都是片面性，都是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去片面地孤立地观察问题和了解问题。当然，要完全避免片面性也很难。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同没有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关系。我们要用十年八年的时间来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逐步抛弃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那样，我们的思想面貌就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1页

教条主义与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都是形而上学，都是毒草，都要批判，都要以治病救人的态度去批判。

《在宣传会议上讲话（提纲）》（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375页

长时间以来，人们对于教条主义作过很多批判。这是应该的。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

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僵死的东西，这是教条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1—282页

本本主义，现在叫教条主义，赫鲁晓夫他们讲我们不反对教条主义，恰恰相反，我们从来就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是我们这些“教条主义”者反对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这个东西，只有原理原则，没有具体政策，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

《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62页

如果不是自己能够思索、能够自己动脑筋，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深知本国各阶级的准确动向，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只是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地照抄外国经验，跟着外国人的指挥棒团团打转，那就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样样都有，成为一个大杂烩，而单单没有马列主义原则性的党，这样的党，那就绝不可能进行革命

斗争，绝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绝不可能实现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

《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六三年四月、五月、六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280—281页

六、群众路线

（一）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1. 为最广大群众谋利益，是党的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参见第八编“关于党的建设”，第1876—1880页）

2.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参见第八编“关于党的建设”，第1883—1885页）

3. 关心群众生活，切实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

苏维埃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只有苏维埃用尽它的一切努力解决了群众的问题，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的生活，取得了群众对于苏维埃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为粉碎敌人的“围剿”而斗争。应该明白：长冈乡在战争动员上的伟大成绩，是与他们改良群众生活的成绩不可分离的。

《长冈乡调查》（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98页

在许多地方的苏维埃不注意社会救济工作、许多地方的互济会只知收月费不知救济群众困难的情形下，长冈乡苏维埃与

互济会的社会救济工作，是值得赞扬的。长冈乡是在最具体最实际地解决群众中的每一个困难问题。

《长冈乡调查》（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11—312页

如果我们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一点别的工作也不做，不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呢？当然不能。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同志们，那时候，我们号召群众参加革命战争，能够不能够呢？能够的，完全能够的。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36—137页

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

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38页

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国民党要来进攻红色区域，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38—139页

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39页

如果我们的党与政府不注意动员人民并帮助人民发展农工商业，则人民生活既不能改善，抗战需要亦不能供给，其结果就是军民交困。军心民心如不能巩固，一切也就无从说起了。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解放社1944年1月订正再版第9页

农业生产愈发展，农民每年收获农产品及其副产品的数量愈增多，则其交给政府的粮食税的数量在其收获总量上说来就

可愈减少。我们提议从一九四三年起，每年征收公粮十八万担。以后若干年内即固定在这个数目上，不仅在目前全边区粮食总产量约一百五十万担时是收这个数目，就是由于生产发展，总产量增至更大的数目时（据许多同志估计，就现有劳动力加以调剂，能使边区粮食总产量达到二百万担），我们也只收这个数目，这个数目以外的一切增产概归农民，使农民好放手发展自己的生产，改善自己的生活，丰衣足食，穿暖吃饱。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解放社1944年1月
订正再版第213页

部队中的负责同志要替士兵着想，机关、学校的负责同志要替大厨房着想，替杂务人员着想，所有的共产党员要替人民着想。

《切实执行十大政策》（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
3卷第71页

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应时刻注意的。

为中直军直生产展览会的题词（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解放日报》
1943年11月24日

告诉党员坚决同人民一道，关心人民的经济困难，而以实行减租和发展生产两件大事作为帮助人民解决困难的重要关键，我们就会获得人民的真心拥护，任何反动派的进攻是能够战胜的。一切仍要从长期支持着想，爱惜人力、物力，事事作长期打算，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

《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73页

各解放区有许多灾民、难民、失业者和半失业者，亟待救济。此问题解决的好坏，对各方面影响甚大。救济之法，除政府所设各项办法外，主要应依靠群众互助去解决。此种互助救济，应由党政鼓励群众组织之。

《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76页

在财政供给上，必须使自卫战争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同时又必须使人民负担较前减轻，使我解放区人民虽然处在战争环境，而其生活仍能有所改善。

《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88页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定可以做到有菜吃，有油吃，有猪吃，有鱼吃，有菜牛吃，有羊吃，有鸡鸭鹅兔吃，有蛋吃。我们应当有志气、有决心做到这一项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伟大意义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应当有信心做到这一项事情。一切为了人民利益，望各级党委接到这个指示以后，精心筹划，立即动手办起来。不但大中城市，县城及四乡集镇都要照此办起来。各级党委要有一个专门管副食品的书记或精心从事的干部。

《发展商业和副食品生产》（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70页

（二）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1.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

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

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96页

我们清醒地知道，在我们的前进道路上，还会有种种障碍，种种困难，我们应当准备对付一切内外敌人的最大限度的抵抗和挣扎。但是，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60页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23页

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九五七年七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44页

2. 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共和国的一切任务而奋斗时，共产党员应该作到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

又最能虚心体会情况，依靠群众的多数，得到群众的拥护。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63页

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

《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81页

要加强群众运动。所谓准备群众即指此。不是降低阶级斗争就能够克服投降，只有正确地开展阶级斗争，以与统一战线相配合，才能克服投降。单有统一而无斗争是非常危险的。群众是我们的最后依靠，也是抗战的最后依靠。

《反投降提纲》(一九三九年六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34页

关于群众工作不好，应通令一切党、政、军、民一齐动手做群众工作，将一齐动手打敌人，一齐动手生产自给，和一齐动手做群众工作三者结合起来。总之，一切依靠最广大群众力量去解决问题，放手将解决问题的责任交给各分区，交给广大群众。

《自己动手，克服困难》(一九四五年四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0—281页

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

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愚公移山》（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102页

过去我们什么也没有，现在都有了，不都是依靠群众才有的吗？我们从去年十一月就从劣势转为优势，这个转变不也是依靠群众的力量吗？依靠群众，就是说你当司令或是当班长必须要有一个队伍，这个队伍就是群众，没有队伍，你怎么当司令，怎么当班长呢？

《依靠群众办好铁路建设事业》（一九四九年七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06—307页

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

《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一九六八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581页

3. 放手发动群众，把群众组织起来

单是干部不能战胜敌人，没有干部也不能打败敌人。要干部去发动组织广大的人民，把成千成万的人民变为有组织的队伍；没有组织便没有力量，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没有这广大的有组织的队伍是不可能的。

《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一九三八年四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17页

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要胜利又忽视政治动员，叫做“南其辕而北其辙”，结果必然取消了胜利。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80—481页

什么是政治动员呢？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民齐心协力，贡献一切给战争。其次，单单说明目的还不够，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就是说，要有一个政治纲领。现在已经有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又有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应把它们普及于军队和人民，并动员所有的军队和人民实行起来。没有一个明确的

具体的政治纲领，是不能动员全军全民抗日到底的。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81页

只有坚决地广泛地发动全体的民众，方能在战争的一切需要上给以无穷无尽的供给。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92页

如果要把几十年来的革命做一个总结，那就是全国人民没有充分地动员起来，并且反动派总是反对和摧残这种动员。而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才有可能。

《青年运动的方向》（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64—565页

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还有什么与此相反的方针没有呢？有的。那就是缺乏群众观点，不依靠群众，不组织群众，不注意把农村、部队、机关、学校、工厂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而只注意组织财政机关、供给机关、贸易机关的一小部分人；不把经济工作看作是一个广大的运动，一个广大的战线，而只看作是一个用以补救财政不足的临时手段。这就是另外一种方针，这就是错误的方针。

《组织起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30页

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群众的劳动。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也必须学会；只要有决心，半年一年工夫就可以学

好的。他们可以帮助群众组织生产，帮助群众总结经验。

《组织起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32页

为了达到建设新中国之目的，我们的原则是放手动员群众。抗战以来我们一贯的路线是如此，而另一条路线则是束缚群众。蒋介石就是束缚群众，他在柳州会议上讲所谓精神征服。我们对同志与人民是诚诚恳恳，无所谓精神征服，对敌人则是武力征服。

《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72页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31页

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这是党的七次代表大会的方针，我们要为这个方针奋斗。中国的事情，要靠共产党办，靠人民办。我们有决心、有办法实现和平，实现民主。只要我们同全体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了，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

《关于重庆谈判》（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62页

全党必须下最大决心，努力准备一切条件，粉碎蒋军进攻，以战争的胜利去取得和平。一切游移不定及侥幸取得和平的想

法，都应扫除干净。在这个一心一意准备以长期艰苦斗争去取得和平的总方针下，我们的方法，就是从战争、从群众工作、从解决土地问题改善人民生活，从其他一切努力，去增加革命力量，减少反动力量，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充分发动群众，使我党与人民密切结合起来。只要广大人民的力量增加到我们方面，就会使敌我力量发生有利于我的变化，建立巩固根据地，使敌人无法战胜我们。

《对东北局关于东北形势及任务决议的修改意见》（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51—152页

4. 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3页

减租是农民的群众斗争，党的指示和政府的法令是领导和帮助这个群众斗争，而不是给群众以恩赐。凡不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恩赐减租，是不正确的，其结果是不巩固的。

《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10页

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

发。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实行改革，我们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否则就会脱离群众。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欲速则不达”，这不是说不要速，而是说不要犯盲动主义，盲动主义是必然要失败的。

《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12—1013页

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

《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13页

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中国解放区的人民已经争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应该争得这种自由。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70页

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

《愚公移山》（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101—1102页

人民的觉悟不是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脑子中的错误思想,需要我们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对于中国人民脑子中的落后的东西,我们要去扫除,就像用扫帚打扫房子一样。从来没有不经过打扫而自动去掉的灰尘。我们要在人民群众中间,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人民认识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动向,对于自己的力量具备信心。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31页

老区是经过多少年、多少月方才把土地分好。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群众必须在自己亲身经验中,才能教育自己,提高觉悟,认清敌人,取得胜利。

《新解放区土改斗争策略》(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7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18页

在我们一些地方的领导机关中,有的人认为,党的政策只要领导人知道就行,不需要让群众知道。这是我们的有些工作不能做好的基本原因之一。我党二十几年来,天天做群众工作,近十几年来,天天讲群众路线。我们历来主张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大家动手,反对只依靠少数人发号施令。但是在有些同志的工作中间,群众路线仍然不能贯彻,他们还是只靠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做工作。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做一件事情,总不愿意向被领导的人讲清楚,不懂得发挥被领导者的积极性和创

造力。他们主观上也要大家动手动脚去做，但是不让大家知道要做的是怎么一回事，应当怎样做法，这样，大家怎么能够动起来，事情怎么能够办好？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上当然要从思想上进行群众路线的教育，同时也要教给同志们许多具体办法。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18—1319页

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22页

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490页

5. 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保护群众的积极性

“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

《组织起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33页

只要是真正的群众运动，当我们纠正“左”的错误，即纠正干部及群众对于中农、富农及中小地主的过火行动时，应当用极大的善意与热忱去说服他们，使他们在自觉与高兴的基础之上纠正他们的错误，想出补救的办法，绝对不可泼冷水，绝对不可使他们感觉受了挫折。

《纠正群众工作中错误的几个问题》（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04页

党和群众的关系的问题，应当是：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10页

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57页

在检查工作的时候，我们对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不要泼冷水，而要帮助他们。向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泼冷水是不对的。但是发现了错误，一定要改正。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8—219页

列宁这句话，“社会主义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讲得好。我们的群众路线，就是这样的。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9页

（三）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

与民众在一道，一刻也不脱离民众，中国革命就一定能够胜利。

给杨海泉的题词（一九三九年二月二日），《毛泽东题词墨迹选》第14页

对于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以及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我们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一部分党员却不懂得这个道理，看不起愿意同我们合作的人，甚至排斥他们。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给了我们这样的根据吗？没有。相反地，他们总是谆谆告诫我们，要密切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中国共产党中央给了我们这个根据吗？没有。中央的一切决议案中，没有一个决议说是我们可以脱离群众使自己孤立起来。相反地，中央总是叫我们密切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所以，一切脱离群众的行为，并没有任何的根据，只是我们一部分同志自己造出来的宗派主义思想在那里作怪。因为这种宗派主义在一部分同志中还很严重，还在障碍党的路线的实行，所以我们要针对这个问题在党内进行广大的教育。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26页

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76页

国民党也需要老百姓，也讲“爱民”。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开老百姓。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我们不同，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的党是人民的代表，我们要使人民觉悟，使人民团结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国民党是对立的，一个要人民，一个脱离人民。

《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一九四三年八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57—58页

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如果我们的党员，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这种党员，对于中国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没有呢？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做党员。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

《组织起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33页

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

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1095页

我们的代表大会应该号召全党提起警觉，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个同志，不要让他脱离群众。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居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1095页

有许多本地的干部，现在要离乡背井，到前方去。还有许多出生在南方的干部，从前从南方到了延安，现在也要到前方去。所有到前方去的同志，都应当做好精神准备，准备到了那里，就要生根、开花、结果。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我们的同志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把和群众的关系搞好，要关心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团结广大人民，团结得越多越好。

《关于重庆谈判》(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62页

我党现时在东北有一项主观上的困难。这就是大批干部和军队初到东北,地理民情不熟。干部对于不能占领大城市表示不满,对于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艰苦工作表示不耐烦。这些情况,都是同当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相矛盾的。必须反复教育一切外来干部,注重调查研究,熟悉地理民情,并下决心和东北人民打成一片,从人民群众中培养出大批积极分子和干部。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81页

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

《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87页

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九五七年七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47页

（四）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1. 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我们的任务是提出了，从扩大红军到修桥筑路的许多计划也发布了，问题是怎样动员群众去完全地实际地实行这些任务与计划。异常紧张的革命战争，要求我们迅速地普遍地解决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脑子里头想得出来的，这依靠于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去收集各种新鲜的具体的经验，去发扬这些经验，去扩大我们动员群众的领域，使之适合于更高的任务与计划。

《长冈乡调查》（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76页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99页

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

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

《切实执行十大政策》(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71页

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我们的工作犯不犯错误,其界限也在这里。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19—1320页

我们的干部中,自以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因此,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是非常必要的。简单地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则必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这样就可以解决框框问题,即教条主义问题了,就可以不信迷信了。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一九六三年——一九六五年),《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24页

2. 注意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

苏维埃人员应该注意民众的每一要求与每一提议,而不应该忽视这些要求与提议。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红色中华》二苏大特刊第3期

每当采取一项新的措施时，党内和党外总会有一些人不大理解。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形成一种绝大多数人共同的意见，这是因为我们的党始终在注视着党内外的普遍反应，而且还根据人民的实际需要和意见，不断修改我们的措施。我们所有的党组织，从上到下都必须遵守我们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原则，这就是不脱离群众，同群众的需要和愿望息息相通。

《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88页

如果党的领导者真正是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工作，如果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是诚心诚意的，那末他们听取群众意见的机会是非常多的。我们十分注意倾听人民的意见。我们通过村、乡镇、区、县的群众大会，也就是我们区域内任何地方的群众大会，通过党员同各阶层人士的交谈，通过各种会议、报纸和群众的来电来信等等一切能听到人民呼声的渠道，总是能发现群众的真正的意见。

《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89页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做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0—291页

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但是，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3页

3. 虚心向群众学习。先做群众的学生，后做群众的先生

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2页

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这是和我自己对于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事实相关联的，并非说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791—792页

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64页

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有些文件起草出来压下暂时不发,就是因为其中还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需要先征求下级的意见。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各中央局、各前委处理问题的时候,除军事情况紧急和事情已经弄清楚者外,都应该这样办。这不会影响自己的威信,而只会增加自己的威信。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41页

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过学生的。而且就是当了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一九六三年——一九六五年),《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24页

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

《毛主席重要指示》(一九七五年十月——一九七六年一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89页

（五）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 冒险主义、尾巴主义

1. 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

（参见第八编“关于党的建设”，第2146—2160页）

2. 反对冒险主义和尾巴主义

不顾主客观条件，犯着革命的急性病，不愿意艰苦地做细小严密的群众工作，只想大干，充满着幻想。这是盲动主义的残余。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87页

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
2版第1卷第99页

我们的要求是依靠多数和照顾全局。陈独秀尾巴主义的复活是不能容许的，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降低党的立场，模糊党的面目，牺牲工农利益去适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将必然引导革命趋于失败。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64页

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我们反对尾巴主义,但又反对冒险主义和急性病。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6页

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是常有的,这是因为人的认识受了许多社会条件的限制的缘故。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

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5页

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还不了解的东西,群众也一概不了解。许

多时候，广大群众跑到我们的前头去了，迫切地需要前进一步了，我们的同志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领导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且将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95—1096页

在领导者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上，关于既反对命令主义、又反对尾巴主义的宣传，有些地区是注意了；但在许多地区却错误地强调所谓“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迁就群众中的错误意见。甚至对于并非群众的、而只是少数人的错误意见，也无批判地接受。否定了党的领导作用，助长了尾巴主义。

《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81页

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地委书记会议仅仅强调了党应当执行群众意见的方面，而忽视了党应当教育群众和领导群众的方面，以致给了后来某些地区的工作同志以不正确的影响，助长了他们的尾巴主义错误。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10页

当着群众还不觉悟的时候，我们要进攻，那是冒险主义。群众不愿干的事，我们硬要领导他们去干，其结果必然失败。当着群众要求前进的时候，我们不前进，那是右倾机会主义。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就是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不能领导

群众前进，而且反对群众前进。这些问题有许多同志还不懂得。我们的报纸要好好地宣传这些观点，使大家都能明白。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20页

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一）中国的问题要靠中国人独立自主解决

1. 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一九三六年七月、九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01页

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 and 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32页

总之，和平是必须取得与能够取得的，但主要应依靠自力而不应依赖外力。只有自力更生，自立自强，自己有办法，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国际与国内各方助我力量，方能发生作用，才是可靠地取得和平，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是危

险的。

《对东北局关于东北形势及任务决议的修改意见》（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52页

要发展自己的工业和农业。不要依靠外国。可以进口外国技术，利用外国的技术人员帮助你们训练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但是要自己搞。如果没有这个决心，帝国主义还是要整你们的。

《同苏丹政府友好代表团团长马哈古卜谈话纪要（节录）》（一九七〇年六月二十四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06页

2. 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反对本本主义》（一九三〇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5页

斯大林在同一个美国记者的一次谈话中说：“革命不能输出。”同样正确的是，革命也不能输入。中国人民为了生存，自然要采用反对日本的最好办法。

《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一九三六年七月、九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97—398页

我已说过，第二战场开辟的影响会是很广泛的，直接影响欧洲，将来亦会影响到太平洋与中国。但就目前来说，对中国的影响似乎不会很大，你们可以看见，外面情况虽然甚好，但是中国的问题还要靠中国人自己努力，单有国外情况的好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讲话》(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69页

中国的事情,要靠共产党办,靠人民办。我们有决心、有办法实现和平,实现民主。只要我们同全体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了,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

《关于重庆谈判》(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62页

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65页

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

《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一九五九年二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5页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9—300页

3. 发扬自尊、自信、自立、自主、自强的民族精神

（参见第六编“关于思想宣传工作和文化工作”，第1489—1495页）

（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1. 依靠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那末，有些什么办法呢？我们就用军民两方同时发动大规模生产运动这一种办法。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16页

中国革命是长期的，由于各种情况的原因，国际无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帮助我们，他们还料不到我们的困难来得这样早，就是料得到也没有办法，远水救不了近火。我们要做国际联络工作，做外交工作，很希望国际无产阶级和伟大的苏联帮助我们。但由于各种情况的原因而没有援助，我们怎样办？还是按照过去那样，全党团结起来，独立自主，克服困难，这就是我们的方针。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91—392页

没有国际援助，学会自力更生。没有援助有一个好处，援助太多了也有一个坏处。在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个国际主义的原则下，要学会自力更生，准备没有援助。现在对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大考验，考验我们究竟成熟了没有，有本事没有。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93页

总之，我们是一切依靠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和蒋介石的一切依靠外国，完全相反。我们是艰苦奋斗，军民兼顾，和蒋介石统治区的上面贪污腐化，下面民不聊生，完全相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是一定要胜利的。

《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88页

我们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帝国主义的国家与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组成的力量打倒我们的敌人。中国民族是一个能战斗的民族，俄罗斯人在十月革命以来所创造的战胜帝国主义与国内反动派的伟绩，中国人亦能创造出来。今后数年的时间必能证明这一点。

《我们完全有把握彻底打倒蒋介石反动集团》（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316页

不靠外援（不是不要外援），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是完全可以办到的。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和正确的政策，依靠群众，来争取战争的胜利。

《在杨家沟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330页

2. 中国革命和建设都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参见第四编“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第937—939页)

3. 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但决不能自处孤立,要努力争取
外援

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他们也一定会援助我们,因为我们和他们是休戚相关的。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国革命力量和国际革命力量被蒋介石隔断了,就这点上说,我们是孤立的。现在这种形势已经改变了,变得对我们有利了。今后这种形势还会继续向有利的方面改变。我们不会再是孤立的了。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61—162页

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不是孤立的,东方的和平与战争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日本有它潜在的盟国——例如德国与意大利。中国想要成功地反对日本,也必须争取别国的支援。但是,这并非说,没有外援,中国就无法和日本进行战争。也不是说,我们必须等到有了同外国的联盟才能开始抗日。

《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一九三六年七月、九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00页

我们深信，中国人民是不会向日本帝国主义屈服的。我们深信他们会把他们的巨大潜力动员起来，投到抗日的战场上去的，他们会全力以赴地去对付侵略者的挑战。在这场斗争中，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中国人民。如果中国单独作战，相对地说，牺牲就会大些，战争的时间也会拖得长些，因为日本是一个充分武装的强国，而且还会有它的盟国。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以最小的代价赢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中国必须首先实现国内的统一战线，其次还必须努力把这条统一战线推广到包括所有与太平洋地区和平有利害关系的国家。

《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一九三六年七月、九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00—401页

除了主要地看中国自己的力量之外，国际间所给中国的援助和日本国内革命的援助也很有关系。如果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有力地发展起来，横的方面和纵的方面都有效地组织起来，如果认清日本帝国主义威胁他们自己利益的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能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来得快，则这次战争将迅速结束，中国将迅速胜利。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

《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一九三六年七月、九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01页

没有友军，中国也是必须抗战的，而且以中国的资源与自然条件，是能够支持长期作战的。红军的十年作战史，就是活

的证据。但是我们正在找寻友军，这是因为日本已有了它的强盗同盟，中国决不能自处孤立。所以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五国建立太平洋联合阵线。这种联合阵线是援助中国的，同时也是各国互助的。

《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87页

战胜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于敌人的。

《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47页

中国的团结＋世界的援助＋日本国内的困难＝中国的胜利。这个公式是有意义的。当然，自力更生的口号是对的，但中国不能孤立也同样要注意到。

《对陕北公学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一九三八年三月三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09页

要缩短战争时间，必须加强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中国的统一战线更加巩固与扩大，这是基本的。在统一战线的方针下，各项工作须大大地发展与进步，这些工作多发展与多进步一分，战争时间就能缩短一分。第二个条件，是日本国内人民的帮助。现在这种帮助已经开始，譬如他们的士兵不愿意战争，有自杀的，有投降的，有发反战传单的，日本人民反战思想也在发展之中。如果日本的士兵与人民更多地觉悟一分，战争时间也就可以缩短一分。还有一个条件，是世界各国的帮助。我们需要世界学生的帮助，需要世界人民的帮助，也需要各国政府的帮助。如这些帮助更多更快，那末我们的战争也就会缩短。

《同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一九三八年七月二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33页

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联成一体,中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能离开世界而孤立起来。新的抗战形势中可能暂时地减少一部分外国的援助,加重了中国自力更生的意义,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但中国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脚点,而且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我们不是也不能是闭关主义者,中国早已不能闭关。现在更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主义用战争闯进全中国来,全中国人都关心世界与中国的关系,尤其关心目前欧洲时局的变动。

《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松争取外援》(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6页

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与外援的配合,主要的是和先进国家与全世界广大人民反法西斯运动之将来的配合,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松争取外援的方针,应该放在这种基点之上。

《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松争取外援》(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7页

在伟大抗战中,基本的依靠中国自力胜敌,中国的力量也正在发动,不但将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且将压倒敌人而驱除之,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同时,需要外援的配合,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

《抗战与外援的关系》(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46页

中国的外交政策，很明显的，应该是抗日的外交政策。这个政策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而所谓外援，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的情况之下，主要地是在下列的三方面：（1）社会主义的苏联；（2）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人民；（3）世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只有这些才是可靠的援助者。此外的所谓外援，即使还有可能，也只能看作是部分的和暂时的。当然，这些部分的暂时的外援，也是应该争取的，但决不可过于依赖，不可看作可靠的援助。

《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00页

我们的根本方针和国民党相反，是在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而不是如同国民党那样放弃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去依赖外援，或投靠任何帝国主义的集团。

《论政策》（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65页

“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这是错误的想法。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巩固，就是这样的，列宁和斯大林早已告诉我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三个帝国主义国家并建立各人民民主国家，也是这样。人民中国的现在和将来，也是这样。请大家想一想，假如没有苏联的存在，假如没有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假如没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假如没有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假如没有东方各被压迫民族正在起来斗争，假如没有美

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人民大众和统治他们的反动派之间的斗争，假如没有这一切的综合，那末，堆在我们头上的国际反动势力必定比现在不知要大多少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能够胜利吗？显然是不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不可能。这件事，中国人民的经验是太多了。孙中山临终时讲的那句必须联合国际革命力量的话，早已反映了这一种经验。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3—1474页

（三）学习外国的经验要结合中国的实际

（参见第四编“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第949—952页）

八、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一）必须讲究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89页

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39页

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40页

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模范工作者。同样，赣东北的同志们也有很好的创造，他们同样是模范工作者。像兴国和赣东北的同志们，他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

系起来了,他们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了。他们是认真地在那里进行工作,他们是仔细地在那里解决问题,他们在革命面前是真正负起了责任,他们是革命战争的良好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又是群众生活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40页

在干部会议中和在工作中,必须教育干部善于分析具体情况,从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条件的具体情况出发,决定当地当时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

《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31页

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40页

除了开好代表大会以外,党的各级委员会把自己的领导工作做好,是极为重要的。我们一定要讲究工作方法,把党委的领导工作提高一步。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44页

领导要能够适合客观发展的规律。如果领导得好一些,适合客观规律好一些,缺点错误就少一些,工作也就好一些。如果领导得差一些,适合客观规律差一些,工作也就差一些。所以,我们要注意领导方法,各个党派、工商联,中央同地方,都

要注意用什么方法使大家更觉悟一些。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500—501页

抓两头带中间。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方法。任何一种情况都有两头，即是有先进和落后，中间的状态又总是占多数。抓住两头就把中间带动起来了。这是一个辩证的方法，抓两头，抓先进和落后，就是抓住了两个对立面。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49页

评比不仅比经济、比生产、比技术，还要比政治，就是比领导艺术。看谁领导得比较好些。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3页

（二）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

（参见第八编“关于党的建设”，第2038—2041页）

（三）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1. 共产党无论进行何项工作，都必须采用一般和个别、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

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97页

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在组织中在斗争行动中发生正确关系的思想，正确的领导意见只能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思想，在领导意见见之实行时要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互相结合的思想，都必须在这次整风中普遍地加以宣传，借以纠正干部中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观点。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团结积极分子组成领导核心，不注重和不善于使这种领导核心同广大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因而使自己的领导变成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领导。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而欢喜主观主义地自作聪明地发表许多意见，因而使自己的意见变成不切实际的空论。许多同志，满足于工作任务的一般号召，不注重和不善于在作了一般号召之后，紧紧地接着从事于个别的具体的指导，因而使自己的号召停止在嘴上、纸上或会议上，而变为官僚主义的领导。这次整风，必须纠正这些缺点，在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中学会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并在以后应用此种方法于一切工作。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99—900页

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

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同志们在这次整风中应该这样做，在任何工作中也应该这样做。比较好的领导，就是从比较善于这样做而得到的。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00页

斗争愈是艰苦，就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要求密切地相结合，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密切地相结合，而彻底粉碎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不知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原则，极大地妨碍党的工作的发展。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必须广泛地深入地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02页

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注意计算数字，实事求是，联系群众，特别是在整风、审干、生产等方面成绩更大。主要是由于实行了首长负责、亲自动手，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等等方法。我们要使每个同志都懂得，如果作风不改变，不仅个人无成就，大则会使革命丧失前途。我们都要有这样的信心，凡是作风不好的犯错误的同志，都可以改变，都是有光明前途的。

《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97页

这个宪法草案所以得人心，是什么理由呢？我看理由之一，就是起草宪法采取了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相结合的方法。这个宪法草案，结合了少数领导者的意见和八千多人的意见，公布以后，还要由全国人民讨论，使中央的意见和全国人民的意见相结合。这就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领导和广大积极分子相结合的方法。过去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今后也要如此。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采用这个方法。这次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就得到了比较好的、比较完全的宪法草案。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5页

2. 先从个别深入，取得经验，再作普遍指导

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97页

一九四三年的整风，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和地委，除提出一般号召（全年整风计划）外，必须在自己机关中和附近机关、学校、部队中，选择二、三单位（不要很多），深入研究，详细了解整风学习在这些单位的发展过程，详细了解这些单位中若干个（也不要很多）有代表性的工作人员的政治经历、

思想特点、学习勤惰和工作优劣，并亲自指导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具体地解决各该单位的实际问题，借以取得经验。一机关、一学校、一部队内部也有若干单位，该机关、该学校、该部队的领导人员也须这样去做。这又是领导人员指导和学习相结合的方法。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这一方法必须普遍地提倡，使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学会使用。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97—898页

你们不应对于全区几十个县的一切区乡同时动手，而应选择若干条件适当的县，每县先从一至二个区做起，做出成绩，取得经验，影响他区群众，然后逐步推广。必须认识，群众工作、土改工作是极细致的工作，必须研究领导艺术。

《新解放区土改斗争策略》（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7页

我们应当坚决采用逐步推广的方法，不用普遍动手的方法。逐步推广的运动，看来很慢，其实是快；普遍动手的方法，看来是快，其实是慢。

《新解放区土改斗争策略》（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8页

普遍推广试验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导方法。这样一来，我党在领导经济方面的工作作风将迅速改观。在乡村是试验田，在城市可以抓先进的厂矿、车间、工区和工段。突破一点就可以推动全面。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49页

组织干部和群众对先进经验的参观和集中地展览先进的产品和作法，是两项很好的领导方法。用这些方法可以提高技术水平，推广先进经验，鼓励互相竞赛。许多问题到实地一看就解决了。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49页

3. 通过发挥骨干和英雄模范的作用，使领导和群众更好地结合起来

一九四二年的整风经验又证明：每一单位的整风，必须在整风过程中形成一个以该单位的首要负责人为核心的少数积极分子的领导骨干，并使这一领导骨干和参加学习的广大群众密切结合，才能使整风完成任务。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98页

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故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98页

凡属真正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领导骨干，必须是从群众

斗争中逐渐形成，而不是脱离群众斗争所能形成的。在多数情形下，一个伟大的斗争过程，其开始阶段、中间阶段和最后阶段的领导骨干，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完全同一的；必须不断地提拔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来替换原有骨干中相形见绌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许多地方和许多机关工作推不动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缺乏这样一个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经常健全的领导骨干。一个百人的学校，如果没有一个从教员中、职员中、学生中按照实际形成的（不是勉强凑集的）最积极最正派最机敏的几个人乃至十几个人的领导骨干，这个学校就一定办不好。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98—899页

无论是执行战争、生产、教育（包括整风）等中心任务，或是执行检查工作、审查干部和其他工作，除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以外，都须采取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99页

有什么好的工作方法呢？我看最近开劳动英雄大会、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大会、劳动英雄与战斗英雄大会，就是一种好的工作方法。内战时期有些脱离群众的强迫的办法是不好的。现在的英雄模范大会有新的内容，真正做到了群众化、具体化。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是群众中的模范，开这样的大会，就使首长、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同群众联系起来。过去是首长同群众相隔离，没有去团结积极分子使群众同首长结合起来。模

范工作者的标准要在群众中讨论，现在要先在几个机关中进行选举，这样就使领导同群众联系起来。

《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97页

今年边区还要开劳动英雄大会，有各区劳动英雄、战斗英雄、各方面的模范工作者参加。这是群众创造出来的好方法，这样的方法是一种好的竞赛方法，可以提高干部，联系群众，推进工作。

《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98页

从军队中、农村中、工厂中及政府机关中，用群众民主选举的方法选出优秀分子，充当战斗英雄、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给予奖励与教育，经过他们去鼓励与团结广大的群众。这种制度，对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提高农业及工业的生产力，提高政府机关及一切其他机关的工作能力，数年来的经验已经证明是极有效果的，各地应该普遍地推广这一运动。

《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
第3卷第241页

（四）把握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一个虾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它说：“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49页

我们的同志要注意，要看大的东西，要看普遍的大量的东西。许多同志往往对于普遍的大量的东西看不见，只看见局部的小量的东西。十月革命，砍掉了资本主义一只脚；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意法西斯资本主义打倒了，法国内部最坏的东西垮台了，许多小皇帝也垮台了，小国家起了变化，都进步了，这又砍掉了资本主义一只脚。这些都是大事情，必须看到这些大事情，才能正确地进行分析，才能在分析时不会犯错误。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81页

（另参见第五编“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和国防建设”，第1285—1291页）

（五）处理好中心工作和其他工作的关系

主席团要懂得抓紧每一时期内的中心工作，把这些工作提到代表会议上去讨论，而不应该只忙一些零碎事务，把中心工作丢掉了。

《乡苏怎样工作？》（一九三四年四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44页

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因此，一个地区的总负责人，必须考虑到该处的斗争历史和斗争环境，将各项工作摆在适当的地位；而不是自己全无计划，只按上级指示来一件做一件，形成很多的“中心工作”和凌乱无

秩序的状态。上级机关也不要不分轻重缓急地没有中心地同时指定下级机关做很多项工作，以致引起下级在工作步骤上的凌乱，而得不到确定的结果。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这也是在运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这些原则时，必须注意解决的领导方法问题。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01页

学会“弹钢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钢琴有人弹得好，有人弹得不好，这两种人弹出来的调子差别很大。党委的同志必须学好“弹钢琴”。

《党委的工作方法》（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42页

还必须着重提出，一切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必须养成具有照顾全面的整体观念，既要抓紧当前的中心工作，又不要放松即使不是当前的中心、然而不可缺少的工作，不要只求简单、单纯，抓住一件，放弃其余；也不要对于某一件工作进行任意解释，作不适当的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尤应注意，当一

个运动在开始的时候，集中全力，争取运动的迅速展开，这是必要的；但在运动的进行中，又应及时地了解情况，发现偏差，加以纠正，不要单凭群众的情绪和下级的要求，甚至是领导者本人的兴趣，加以放纵，或不敢纠偏，因而失去领导的责任。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纠正放松军事教育和纪律废弛现象的指示》（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22—323页

（六）善于总结经验

1. 总结经验的重要性

凡人（包括共产党员）都只能根据自己的见闻即经验作为说话，做事，打主意，定计划的出发点或方法论，故注意吸收新的经验甚为重要，未见未闻的，连梦也不会作。

《关于总结财经工作经验给谢觉哉的信》（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69页

什么事都需要经验，什么好的政策都是经验之总结。

《关于整顿三风》（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17页

你们现在正在检查工作，总结经验，这样很好。总结了反右反“左”的经验，使头脑清醒起来，你们的工作就会有改进。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21页

七大把七大以前所存在的问题都讲了，没有那一次的总结，

就不能有日本投降后的大进步。我们党现在与抗日时期不同了。那时，在一九四〇年以前，就别扭得很，在军事上，在政策上，例如群众运动、减租减息，许多地方都不一致，对党的历史上前两个时期都没有总结。七大作了总结，这才有了抗战胜利后这三年解放战争的胜利。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一九四八年九月），《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41页

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9页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它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4页

要认真总结经验。

《要认真总结经验》（一九六九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0页

2. 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

有一种人的意见是不对的，我们早已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只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反动的中国政府或反动的中国军事学校出版的那些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们不知道：这些条令仅仅是一般战争的规律，并且全是抄了外国的，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照抄来用，丝毫不变更其形式和内容，就一定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他们的理由是：过去流过血得来的东西，为什么要不得？他们不知道：我们固然应该尊重过去流血的经验，但是还应该尊重自己流血的经验。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171—172页

苏联的规律和条令，包含着苏联内战和苏联红军的特殊性，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抄了来用，不允许任何的变更，也同样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这些人的理由是：苏联的战争是革命的战争，我们的战争也是革命的战争，而且苏联是胜利了，为什么还有取舍的余地？他们不知道：我们固然应该特别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因为它是最近代的革命战争的经验，是在列宁、斯大林指导之下获得的；但是我们还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又有许多特殊的情况。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172页

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

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这是一件事。然而还有一件事，即是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这后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指导战争。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81页

虚心接受别人的经验也属必需，如果样样要待自己经验，否则固执己见拒不接受，这就是十足的“狭隘经验论”。我们的战争吃这种亏是不少的。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13—214页

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

《关于总结财经工作经验给谢觉哉的信》（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69页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前委的领导同志们，在对自己领导的各项重要工作发出决议或指示之后，应当注意收集和传播经过选择的典型性的经验，使自己领导的群众运动按照正确的路线向前发展。现在是成千万的人民群众依照党所指出的方向向着封建的买办的反动制度展开进攻的时候，领导者的责任，就是不但指出斗争的方向，规定斗争的任务，而且必须总结具体的经验，向群众迅速传播这些经验，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错误的致不致重犯。

《山西崞县是怎样进行土地改革的》（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80页

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新的革命。过去我们只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验，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但是怎样去取得这种经验呢？是用坐着不动的方法去取得呢，还是用走进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去、在斗争中学习的方法去取得呢？不实行五年计划，不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工作，我们怎么能够取得工业化的经验呢？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30页

关于总结经验，我们的经验是很丰富的，但是不能够罗列很多事情，而是要抓住重点，从实际出发，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总结。这样总结，会给我们全党一个推动力，使我们的工作比过去做得更好些。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6页

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很大的成绩。我们的工作做得正确的，但是也犯过一些错误。在这次大会上，需要把我们工作中的主要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加以总结，使那些有益的经验得到推广，而从那些错误的经验中取得教训。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15页

3. 正确对待成绩和缺点

- 对待成绩与缺点要用辩证的方法

在革命的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

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例如，成绩究竟是三分还是七分？说少了不行，说多了也不行。一个人的工作，究竟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还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必须有个根本的估计。如果是七分成绩，那末就应该对他的工作基本上加以肯定。把成绩为主说成错误为主，那就完全错了。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44页

要足够地估计成绩。我们的革命和建设，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也有。有那么多成绩，夸大是不行的，但是估低了就要犯错误，可能要犯大错误。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86页

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我们还有缺点，这个事实也要肯定。不应该肯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肯定正确的东西；同时，也不应该否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否定错误的东西。在我们的工作中间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缺点和错误也还不少。因此我们要进行整风。我们自己来批评自己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会不会使我们的党丧失威信呢？我看不会。相反的，会增加党的威信。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4页

人有十个指头，要使干部学会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或者多数指头和少数指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我们要注意抓住主

流，抓错了一定翻筋斗。这是认识问题，也是逻辑问题。说一个和九个指头，这种说法比较生动，也比较合于我们工作的情况。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7页

我们已经找到一条道路。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

《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一九六三年九月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38页

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对于自己所管区域的工作，不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一分为二，既有成绩，也有缺点错误），只研究成绩一方面，不研究缺点错误一方面。只爱听赞扬的话，不爱听批评的话。对于外省、外市、外区、别的工作，很少有兴趣组织得力高级中级干部去虚心认真地加以考察，以便和本省、本市、本区、本单位的情况结合起来，加以改进。永远限于本地区本单位这个狭隘世界，不能打开自己的眼界，不知还有别的新天地，这叫做夜郎自大。对外国人、外地人以及中央派下去的人，只让看好的，不让看坏的。只向他们谈成绩，不向他们谈缺点及错误，要谈也谈得不深刻，敷衍几句了事。中央多次对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认为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事物（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总是作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而得到发展的。这应当

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通常识。但是，中央和各地同志中，有许多人却很少认真地用这种观点去思索去工作。他们的头脑，长期存在着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而不能解脱。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否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对立斗争（两分法）、矛盾着对立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走向它们的反面，这样一个真理；就是人们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只见成绩，不见缺点，只愿听好话，不愿听批评话，自己不愿意批评（对自己的两分法），更怕别人批评。

《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47—348页

● 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对于我们的工作，对于群众的事业，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不应当否定一切。过去发生“左”的偏向，是因为大家没有经验。没有经验，就难免要犯错误。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要有一个过程。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21页

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80页

我们在座的各位是不是圣人？要说是圣人嘛，圣人就多得很；要说不是圣人嘛，我看圣人也就一个没有。人总是有缺点的，总是要犯错误的，只是不要错得太多就是了。比如当主席，说十句话错了六句，错了百分之六十，那他的主席就当不成了。要说一句话都不错，没有那回事。写文章，总是改来改去，如果不错，何必改呢？做一篇文章，往往要犯很多错误。过去我到过上海，上海那个地方很复杂，我经常走错路，总是犯错误。凡是我有了错误，希望能及时得到朋友们的批评和纠正。一个人总是会有许多缺点的。如果觉得自己一点缺点也没有，“老虎屁股摸不得”，那就不好了。要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们是靠老实吃饭，不靠摆架子吃饭。当然，在帝国主义面前，在艾德礼等人面前，还是可以“摆摆架子”的，但靠摆架子吃饭就不好了。如果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就说不得，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领导人物就说不得，那就不好了。对孔夫子，自董仲舒以来就说不得了，“非圣诬法，大乱之殃”。我们不能这样，我们要实事求是。我们对一切事情都要加以分析：好，就肯定；不好，就批评。

《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

第6卷第346—347页

犯错误是难免的。谁不犯错误呢？难道帝国主义犯错误犯得少吗？算账总有正负，对错误即负的必须批评，成功的经验即正的必须保护。错误往往是由于经验不足造成的，马克思主义总共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错误是一定会犯的，各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都会发生错误。中国将来也一定会犯错误。认真一些，就会少犯错误，少犯全国性的错误，即使犯了全国性的错误也会及早纠正。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相信唯物论

的话。人的思维不可能完全确切地反映客观实际。人类只能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逐渐克服认识的不足,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事物是十分错综复杂的,又是在发展变化的,人的思维的反映跟不上客观实际,就一定会犯错误,如果我们相信辩证法的话。

《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65—66页

我们也犯过很多错误、很大的错误。我们党内有过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高岗的右倾反党的机会主义,今后还一定会有错误,还会有如高岗等等的人。我们要使错误小一些,这是可能的。但否认我们会有错误,那是不现实的,那就不是世界,不是地球,而是火星了。

《不要迷信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70页

我们搞革命和建设,总难免要犯一些错误,这是历史经验证明了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就是个大难免论。我们的同志谁愿意犯错误?错误都是后头才认识到的,开头都自以为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当然,我们不要因为错误难免就觉得犯一点也不要紧。但是,还要承认工作中不犯错误确实是不可能的。问题是要犯得少一些,犯得小一些。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96—197页

错误还是要犯的,不可能不犯,犯错误是正确路线形成的必要条件。正确路线是对错误路线而言,二者是对立的统一。正确路线是在同错误路线作斗争中形成的。说错误都可以避免,只有

正确,没有错误,这种观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犯得少一点,犯得小一点。正确与错误是对立的统一,难免论是正确的,可免论是不正确的。只有正确,没有错误,历史上没有这个事实,这是否认对立统一这个规律,是形而上学。争取错误犯得最少,这是可能的。错误犯得多少,是高个子和矮个子的关系。少犯错误,是可能的,应该办到,马克思、列宁就办到了。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75—376页

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

《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一九六〇年六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97—198页

至于实际工作犯些错误,那是难免的。哪个政党都要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就犯过很多错误,犯过重大错误。犯了错误,改正就是了。错误能帮助人头脑清醒。

《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一九六四年七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87页

● 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

我们走过了许多弯路。但是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

《改造我们的学习》(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3页

共产党人不要怕犯错误。错误有两重性。错误一方面损害党, 损害人民; 另一方面是好教员, 很好地教育了党, 教育了人民, 对革命有好处。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如果没有什么好处, 为什么是成功之母? 错误犯得太多了, 一定要反过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物极必反”, 错误成了堆, 光明就会到来。

《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36页

犯了错误能改就行, 只要好好地去干, 错误和失败就会走向反面, 反面就是正确和胜利, 不要抬不起头来。

《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54页

4. 总结历史经验, 要重视反面教员和反面经验

失败的教训同样值得研究, 它可以使人少走弯路。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 曾给我国的革命造成很大的损失。但是他的错误对我们有帮助, 教育了党, 教育了人民, 从这一点上讲, 我本人就是他的学生。我们的教员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教员, 蒋介石是我们的教员, 犯错误的同志也是我们的教员。没有他们, 我们就学不会办事。

《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64—65页

坏事也算一种经验, 也有很大的作用。我们就有陈独秀、李

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这些人，他们是我们的教员。此外，我们还有别的教员。在国内来说，最好的教员是蒋介石。我们说不服的人，蒋介石一教，就说得服了。蒋介石用什么办法来教呢？他是用机关枪、大炮、飞机来教。还有帝国主义这个教员，它教育了我们六亿人民。一百多年来，几个帝国主义强国压迫我们，教育了我们。所以，坏事有个教育作用，有个借鉴作用。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91—92页

我们的民主革命搞的时间很长，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九年，一共二十八年。二十八年中间，我们走过很多曲折的道路，犯过多少次路线错误，使革命遭受过大的损失，吃过很多苦头，死了多少人，牺牲了多少革命的人民，牺牲了多少党员和干部。犯错误，受损失，不单是犯错误的人要负责，不犯错误的人也有责任。为什么呢？如果是我们都觉悟，我们党内的人都觉悟，干部都觉悟，那个错误路线就行不通。错误路线在一个时候能够风行，就证明我们那个时候还不觉悟，一直要到错误路线发展得非常显明、非常清楚了，我们才弄明白，才作出结论来。但是作出一个结论来也还会犯错误。所以，有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有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有张国焘路线的错误，还有王明右倾路线的错误。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经过十四年的时间，才结束了多次错误路线对全党的统治。经过延安整风，我们全党才觉悟起来。我们民主革命的时间那么长，打了那么久的仗，犯了那么多的错误，才搞出一套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我们才逐步学会如何处理党内关系，如何处理党跟非党人员的关系，如何搞统

一战线，如何搞群众路线，等等。这就是说，我们有了经验，才能写出一些文章。比如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没有经验。所以，那些失败，那些挫折，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育，没有那些挫折，我们党是不会被教育过来的。

《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00—101页

（七）开好会议

1. 会前要作充分的准备

每次代表会议只应有一个主要的问题，此外，可以有一个两个次要的问题。讨论主要问题的时间要多些，讨论次要问题的时间要少些。倘若每次提出好几个大问题来讨论，就会使会议得不到结果。

《乡苏怎样工作？》（一九三四年四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48页

必须注意每次会议时间不可太长，会议次数不可太频繁，不可沉溺于细小问题的讨论，以免妨碍工作。在会议之前，对于复杂的和有分歧意见的重要问题，又须有个人商谈，使委员们有思想准备，以免会议决定流于形式或不能做出决定。

《关于健全党委制》（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41页

开会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让大家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早作准备。有些地方开干部会，

事前不准备好报告和决议草案，等开会的人到了才临时凑合，好像“兵马已到，粮草未备”，这是不好的。如果没有准备，就不要急于开会。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43页

必须反对形式主义，每次会议要有充分准备，要有中心内容，要切实讨论工作中存在的为人民所关心的问题，要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当作一件大事去办，否则将损害党的政治威信。

《关于各地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指示》（一九四九年九月四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37页

2. 会议要讨论实际问题，作出决定

开会时要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有争论的问题，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一次不能解决的，二次再议（以不妨碍工作为条件），以期得到明晰的结论。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89—90页

第一，会议要政治化实际化。

第二，要把会议的重大意义时常对同志们提醒，尤其是新党员及工作不积极的党员。

第三，决议不要轻易，一成决议，就要坚决执行。

第四，上级机关要勤快答复下级机关的问题，不要拖延太长，失了热气。

第五，负责人事先要准备议事日程，议事日程要具体化；对

问题的内容和环境先要调查清楚，并对于怎样解决先要想一想。

第六，主席指导会议要采用很好的技术，要引导群众的讨论潮流奔赴到某一问题；但有重要意义的超出题外的发展，不但不要大杀风景地去喝止他，而且要珍重地捉住这一发展的要点，介绍给大众，成立新的议题。这样会议才有生趣，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同时会议也才真正实现了教育的意义。

第七，废止封建的会场秩序。共产党的会场要是反映无产阶级之积极活泼的爽快的精神，把这些做成秩序。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92页

不但文章里演说里有党八股，开会也有的。“一开会，二报告，三讨论，四结论，五散会”。假使每处每回无大无小都要按照这个死板的程序，不也就是党八股吗？在会场上做起“报告”来，则常常就是“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部”，会是常常从早上开到晚上，没有话讲的人也要讲一顿，不讲好像对人不起。总之，不看实际情形，死守着呆板的旧形式、旧习惯，这种现象，不是也应该加以改革吗？

《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41页

各级干部会议，必须由各地高级领导机关，在开会之前，作充分而恰当的准备，这即是事前由少数人商量（由一个人负主责），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写好成文的纲要，精心斟酌这个纲要的内容和文字（注意简明扼要，反对不着边际的长篇大论），然后向干部会议作报告，开展讨论，吸收讨论中的意见，加以补充和修改，作为定论；并将此项文件通知全党和尽可能地在

报纸上公开发表。必须反对经验主义的方法，这即是事前毫无准备，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向干部会议作精心准备的、内容文字都有斟酌的报告，而听凭到会人员无目的地杂乱无章地议论，致使会议时间延长，得不到明确而周密的结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省委和地委的领导工作中，如果存在着这种有害的经验主义方法，必须注意克服。

《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30—1331页

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不仅“班长”要这样做，委员也要这样做。不要在背后议论。有了问题就开会，摆到桌面上来讨论，规定它几条，问题就解决了。有问题而不摆到桌面上来，就会长期不得解决，甚至一拖几年。

《常委会的工作方法》（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40—1441页

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把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法更坏。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必须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去统率这些材料。材料不要多，能够说明问题就行，解剖一个或者几个麻雀就够了，不需要很多。自己应当掌握丰富的材料，但是在会上只需要拿出典型性的。必须懂得，开会同写大著作是有区别的。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6—357页

过去我们开一次会议，决议很多，以为这些决议会灵，其实并不那么灵。会议的决议，多不一定灵，少也不一定灵，关键还是在于情况明不明，决心大不大，方法对不对。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36页

（八）领导必须要有预见

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尽管往后变化难测，愈远看愈渺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估计前途的远景是必要的。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对于政治是不利的，对于战争也是不利的。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21—222页

事情是不断变化的，今天要把将来的事情统统描写出来，是不可能的，这样要求与空想社会主义差不多。凭空捏造的乌托邦，我们是不赞成的，科学地来看事情就不是如此。由旧中国到新中国，如何到法？具体的内容今天不能完全描写出来，但其大的方向是可以指出的。

《对陕北公学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一九三八年三月三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05页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战争没有绝对确实性，但不是没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确实性。我之一方是比较地确实的。敌之一方很不确实，但也有朕兆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

这就构成了所谓某种程度的相对确实性，战争的计划性就有了客观基础。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95页

有些同志希望我讲一些困难，又有些同志希望我讲一点光明。我看光明多得很，国内民主运动已经兴起，将来更有希望，苏联援助我们，美国、英国的无产阶级将来也还是要帮助我们的，这些都是光明。但是我们更要准备困难，我下面讲的困难有十七条：

……

……许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尤其是我们的高级负责干部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这些，我们都要透彻地想好。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87—392页

什么叫做领导？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斯大林说：没有预见就不叫领导，为着领导必须预见。整个人类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对于社会的发展历来没有预见，或者没有很清楚的预见。例如原始社会变成奴隶社会，奴隶社会发生革命变成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又发生革命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些革命往往是自发的。资产阶级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很多好的预见，但在社会科学方面还是盲目的。只有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才对社会发展有了预见，使人类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阶段。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它对于将来和前途看得清楚，对于社会各个阶级向什么方向发展也看得清楚。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94页

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这是斯大林讲的。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94—395页

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95页

为着领导，必须有预见。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上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96页

盲目性是没有预见的，是妨碍预见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是不可能预见的。而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因此，可以说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96页

我们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政党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觉悟，最有预见，能够看清前途。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97页

九、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每一个革命者应该学习的科学

辩证法唯物论对于指导革命运动的干部人员，尤属必修的科目，因为主观主义与机械观这两种错误的理论与工作方法，常常在干部人员中间存在着，因此常常引导干部人员违反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运动中走入歧途。要避免与纠正这种缺点，只有自觉地研究与了解辩证法唯物论，把自己的头脑重新武装起来。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第8页

讲到学习运动。古人讲过：“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就是说：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马穿了衣裳一样。什么叫“古”？“古”就是“历史”，过去的都叫“古”，自盘古开天地，一直到如今，这个中间过程就叫“古”。“今”就是现在。我们单通现在是足够的，还须通过去。延安的人要通古今，全国的人要通古今，全世界的人也要通古今，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要知道更多的古今。通古今就要学习，不但我们要学习，后人也要学习，所以学习运动也有它的普遍性和永久性。

《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77页

只学个别科学，不学基础科学（唯物辩证法）是不对的。

《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一书的批注》（一九三九年五月以后），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20页

最后一个问题是学习，我的意思是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3卷第852页

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3卷第852页

说到马克思主义修养不足，这是普遍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好好地学。

《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0页

现在要争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来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有个初步了解，而不是要求他们一下子贯通。马克思主义的创造者马克思本人，也不是一下子就全部贯通的。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出版，只是马克思主义体系形成的开始，还不是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完成。要求知识分子一下子都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个要求是不现实的。说懂得马克思主义，其实懂得的程度也不相同。我读马克思主义

书籍也不多。作为专家是要读多一点的，我们没有那么多工夫，读少一点也可以，重要的是要注意研究方法。现在很多干部没有读书的习惯，把剩余的精力放到打扑克、看戏、跳舞上面去。大家不应该把时间浪费掉。

《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4—265页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学哲学极为重要

有人说，许多人懂得实际的辩证法，而且也是实际的唯物论者，他们虽没有读过辩证法书，可是做起事来是做得对的，实际上合乎唯物辩证法，他们就没有特别研究辩证法的必要了。这种话是不对的。唯物辩证法是一种完备的深刻的科学，实际上具有唯物的与辩证的头脑之革命者，他们虽从实践中学得了许多辩证法，但是没有系统化，没有如同已经成就的唯物辩证法那样的完备性与深刻性，因此还不能洞察运动的远大前途，不能分析复杂的发展过程，不能捉住重要的政治关节，不能处理各方面的革命工作，因此仍有学习辩证法的必要。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第41页

我们要作出计划，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我们现在有许多做理论工作的干部，但还没有组成理论队伍，尤其是还没有强大的理论队伍。而没有这支队伍，对我们全党的事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国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95—396页

我劝同志们要学哲学。有相当多的人,对哲学没有兴趣,他们没有学哲学的习惯。可以先看小册子、短篇文章,从那里引起兴趣,然后再看七八万字的,然后再看那个几十万字一本的书。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96页

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与阶级斗争的学说是革命的理论,即运用这个世界观来观察与解决革命问题的理论。

马列主义应包含三部分:一、马列主义的哲学,这是理论基础;二、马列主义的经济学,这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考察经济现象的学说;三、马列主义的革命学说,比如关于阶级斗争、政党、无产阶级专政等的学说。这三部分不能分割,而应视为马列主义的三个有机联系的组成部分。

《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一九五九年二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5页

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

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关于读两本书的建议》(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五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446页

学哲学(宇宙观,方法论)极为重要。

《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一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523页

(三) 学习文化是学习理论的基础,要学点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

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虽然也能学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

《〈文化课本〉序言》(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87页

我们的工农干部要学理论,必须首先学文化。没有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就学不进去。学好了文化,随时都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我幼年没有进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套,这种学习的内容虽然陈旧了,但是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何况现在不是学的孔夫子,学的是新鲜的国语、历史、地理和

自然常识，这些文化课学好了，到处有用。我们党中央现在着重要求工农干部学习文化，因为学了文化以后，政治、军事、经济哪一门都可学。否则工农干部虽有丰富经验，却没有学习理论的可能。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18页

（三十九）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

（四十）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四十一）学点历史和法学。

（四十二）学点文学。

（四十三）学点文法和逻辑。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9页

（四）提倡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加强理论学习至少要读五本书，我向大家推荐这五本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里马、恩、列、斯的都有了。如果有五千人到一万人读过了，并且有大体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处。我们可以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一年看不通看两年，如果两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记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这个方法可以在各个地方介绍一下，我们

不搞多了，只搞五本试试。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17—418页

如果要求大家读全部马列选集，也不现实，可以挑选一些，不然书那么多，读起来也是困难。华东局印了五本，说是有人在读。如果五本不够，可以选十本，包括《联共（布）党史》、《列宁主义概论》、《帝国主义论》在内。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也可以选一些。宣传部可以研究一下，看挑些什么书好，五本不够就十本，但是不要太多，多则不灵。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一九四八年九月），《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38页

关于十二本干部必读的书，过去我们读书没有一定的范围，翻译了很多书，也都发了，现在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而我们许多高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没有共同的认识。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61页

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3页

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

《关于读书的建议》（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32页

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县、社党委成员能读政治经济学的也可以读。设法给县、社党委每年有一个系统思考问题的时间。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

《在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七月二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75—76页

军队中有文化条件的干部必须研究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研究方法，必须是为了我们的工作而去作研究，即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和国际问题的需要而去请教马、恩、列、斯，而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不是读死书，而是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

《对〈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和中央转发这一决议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四日、二十一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385页

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23页

（五）学习理论要结合实际，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决问题

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习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3页

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

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

《改造我们的学习》（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797页

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既然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

《改造我们的学习》（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798页

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

《改造我们的学习》（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2页

向各级在职干部与训练干部的学校，进行关于了解客观情况（敌、友、我三方）的教育。鼓励那些了解客观情况较多较好的同志，批评那些尚空谈不实际的同志；鼓励那些既了解情况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评那些既不了解情况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使这种了解情况、注意政策的风气，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气密切联系起来。在学习中反对不管实际只记条文的风气，反对将学习马列主义原理原则与了解中国社会情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互相脱节的恶劣现象。要提倡干部与学生看报，指导看报方法，指导他们分析时局的每一变动。要供给干部与学生关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各种情况的实际材料，把讲授与研究这些材料及其结论当作正式课程，给与必要时间，并实行考绩。

《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62—363页

现在我们党的中央做了决定，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这个责任是担在我们的身上。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14—815页

我们党校的同志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

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现在我们的党校也要定这个规矩，看一个学生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怎样看中国问题，有看得清楚的，有看不清楚的，有会看的，有不会看的，这样来分优劣，分好坏。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15页

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74页

要学习马列主义的方法，有些同志自以为马列主义很多，其实一接触到实际工作，可以说连马列主义的气味都未闻到一点。马列主义的方法，基本的是分析的方法，要讲老实话，才能纠正错误，求得进步。如果自以为是，对整个工作不加分析，只讲成绩，怕讲缺点、错误，就无法使工作进步。工作是一个整体，如加以分析，指出其成绩和缺点，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分析的方法。对工作还要做结论，即是说要综合。不作分析就无法综合，综合是分析的结果，分析是综合的手段，对事物要有解剖，才能总结。有些犯主观主义的同志，就不懂得分析的方法。

《切实执行十大政策》（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73页

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

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2页

（六）学习要不畏难，不自满，看不懂就“钻”，没时间就“挤”

说学习和使用不容易，是说学得彻底，用得纯熟不容易。说老百姓很快可以变成军人，是说此门并不难入。把二者总合起来，用得着中国一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入门既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只要有心，只要善于学习罢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81页

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5页

学习运动必要虽然必要，但是不是可能呢？我们的回答是完全可能的。但是问题又来了，并不多，只有两个，一个是大家忙得很，一个是看不懂。这两个问题完全是实情。这样忙的工作，外加生产运动，在前方的要作战，不能够学习，不但一般人如此说，甚至高级的干部也是这样说。“没有功夫”，这已

成为不要学习的理论、躲懒的根据了。共产党员不学习理论是不对的，有问题就要想法子解决，这才是共产党员的真精神。在忙的中间，想一个法子，叫做“挤”，用“挤”来对付忙。好比开会的时候，人多得很，就要挤进去，才得有座位。又好比木匠师傅钉一个钉子到木头上，就可以挂衣裳了，这就是木匠向木头一“挤”，木头让了步，才成功的。自从木头让步以来，多少木头钉上钉子，把看不见的纤维细孔，“挤”出这样大的窟窿来，可见“挤”是一个好办法。我们现在工作忙得很，也可以叫它让让步，就用“挤”的法子，在每天工作、吃饭、休息中间，挤出两小时来学习，把工作向两方面挤一挤，一个往上一个往下，一定可以挤出两小时来学习的。陈云同志有“挤”的经验，他有法子“挤”出时间来看书，来开会。

再一个问题是看不懂。这种情形确实存在，有的同志“宁可挑大粪，不愿学理论”。忙可以“挤”，这是个办法；看不懂也有一个办法，叫做“钻”，如木匠钻木头一样地“钻”进去。看不懂的东西我们不要怕，就用“钻”来对付。在中国，本来读书就叫攻书，读马克思主义就是攻马克思的道理，你要读通马克思的道理，就非攻不可，读不懂的东西要当仇人一样地攻它。现在有些人是不取攻势只取守势，那就不对，马克思主义决不会让步，所以不攻是得不到结果的。从前人称“校对”为“校仇”，校对确实很难，非以仇人对之是不胜所为的。对于难，我们要像仇人一样地进攻它，对于仇人我们是不讲感情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固然很难，如果我们以“仇人”的态度不讲感情地攻它，一定是无攻不破的，一定可以把它堡垒攻下来。过去韩文公《祭鳄鱼文》里，有一段是说限它三天走去，三天不走，五天，七天再不走，那就不客气，一刀杀掉。我们要像韩文公祭鳄鱼一样，十天不通，二十天，三

十天，九十天……，非把这东西搞通不止，这样下去，一定可以把看不懂的东西变成看得懂的。

正面搞不通，可以从旁的方面着手，如打仗一样，顽强的敌人，正面攻不下，就用旁袭侧击，四面包围，把它孤立起来，这样就容易把它攻下。学习也是一样，正面的东西一时看不懂，就从旁的东西看起，先打下基础，就可以一点一点地搞通正面的东西。

《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80—181页

工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要“钻”，用这两个法子来对付它，学习是一定可以获胜的。

《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82页

就是我们干部中间，有一些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他们以为年纪大了学习没有希望，我以为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年纪大一点谁说不行呢？有句古话：“人到五十五，才是出山虎”。那末，你若是五十四岁的话，还是青年呢，哪有不可学的道理？！

《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82页

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不要再学习了，这满足就是我们学习运动的最大顽敌，今天开会后要把它克服下去。

《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84页

我们相信，我们采取学到底的方针，一定可以克服自满的坏现象。

我们的学习运动是必要的。我们是能够学习的。学习已经看到了成绩，将来还会有更多的成绩。我们是采取学到底的方针。在干部教育部领导之下，干部学习运动的结果我相信一定很好。

《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85页

第二编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

目 录

一、中国的国情	(371)
(一) 中国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	(371)
1. 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特点	(371)
2. 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	(373)
3. 中国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演变	(374)
(二) 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378)
1. 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政治、经济、文化 特点	(378)
2. 近代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和各阶级分析	(381)
● 阶级构成	(381)
● 地主阶级	(382)
● 官僚资产阶级 (大资产阶级)	(384)
● 民族资产阶级	(385)
● 小资产阶级	(391)
● 农民 (富农、中农、贫农、雇农)	(394)
● 半无产阶级	(398)
● 无产阶级	(400)
● 游民无产者	(403)
3. 近代中国社会的矛盾和主要矛盾	(404)
4. 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 表现形式	(407)
●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国民党新军阀同人民群众的	

矛盾成为主要矛盾	(407)
●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	(408)
● 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同中国人民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	(410)
5. 近代中国是帝国主义力量在东方比较薄弱的一环	(414)
二、中国的出路在革命	(416)
(一) 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梦想的幻灭	(416)
(二) 解决近代中国社会的矛盾，使中国独立、民主、富强，不能不进行革命	(417)
(三) 认清中国国情，是认清中国革命一切问题的基本依据	(419)
三、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420)
(一) 孙中山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420)
1.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	(420)
2. 辛亥革命的性质及其历史地位	(420)
3. 由旧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	(420)
● 新三民主义同旧三民主义的联系与区别	(420)
● 新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同新三民主义的联系与区别	(424)
(二) 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429)
1. 中国人学西方迷梦的破灭	(429)
2. 国际国内条件不允许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	(431)
3. 在中国走第三条道路的想法只能破产	(434)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	(435)
(一) 由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	(435)

1. 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435)
2. 中国革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439)
3.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442)
4.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转变 (444)
- (二) 革命的领导权 (446)
 1. 领导权的问题, 是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 (446)
 2. 资产阶级不能充当中国革命的领导 者 (447)
 3. 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达到胜利 (450)
 4.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实现对革命领导权的条件 (450)
- (三) 革命的性质和前途 (452)
 1. 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 经过民主主义到达社会主义 (452)
 2. 革命第一阶段的性质是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457)
 3. “一次革命论”是错误的和有害的 (461)
- (四) 革命的对象和动力 (463)
 1. 决定中国革命对象和动力的根据 (463)
 2. 革命的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464)
 3. 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467)
- (五) 革命的纲领、路线和任务、目的 (473)
 1.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473)
 2.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和目标是推翻三座大山, 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和社会 (476)

3.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480)
(六)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482)
1. 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	(482)
2. 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85)
(七)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485)
1.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	(485)
2.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	(486)
3. 欢迎外国投资, 发展对外贸易	(492)
4. 主张由封建经济直接进到社会主义的民粹主义 是错误的和反动的	(494)
(八)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496)
五、民主革命中的农民和土地问题	(497)
(一) 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497)
1. 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497)
2. 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	(498)
3. 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 无产阶级必须同 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	(501)
(二) 土地改革在民主革命中的意义和作用	(505)
1. 彻底消灭封建和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是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	(505)
2. 实行土地改革是支持长期革命战争达到全国 胜利的基本条件	(506)
3. 土地改革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创造基本条件	(507)
(三) 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508)
1. 土地改革总路线的基本内容	(508)
2. 依靠贫雇农, 巩固地联合中农	(510)
3. 有区别地对待各种地主、富农; 地主作为一个	

阶级要消灭，作为个人要保护	(512)
4. 注意保护工商业	(517)
5. 建立土地改革的统一战线	(518)
6. 放手发动群众，反对恩赐观点	(519)
7. 反对土地分配上的绝对平均主义	(521)
8. 农村土地改革完成后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 发展农业生产	(522)
(四) 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土地政策	(524)
1. 大革命时期的土地政策思想	(524)
2.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和对富农的 策略	(525)
3. 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由没收地主土地 改为实行减租减息	(533)
4. 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政策和不同地区实施的 策略与步骤	(538)
六、民主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	(550)
(一) 统一战线是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	(550)
1. 要打败强大敌人，取得革命胜利，必须建立 广泛的统一战线	(550)
2. 统一战线要有共同的政治基础	(552)
3. 大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	(556)
4. 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	(559)
● 国共合作抗日是救亡图存、争取最后胜利的惟一 正确道路	(559)
● 政治民主是建立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 条件	(563)
●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当是全民族的，还应当是	

国际的	(569)
5. 解放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	(575)
(二) 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	(578)
(三) 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	(578)
1. 党的坚强领导是统一战线胜利的保证	(578)
2. 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 关系	(579)
3. 坚持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583)
4. 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士的 关系	(585)
● 共产党员只有同党外人士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 他们的权利	(585)
● 共产党员同党外人士合作，要采取平等态度和 民主作风，决不可独断专行	(590)
● 共产党员必须自觉地接受党外人士的批评	(593)
● 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同我们真诚合作过的友人	(595)
5. 反对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左”倾关门主义和 右倾投降主义	(596)
七、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武装斗争	(606)
(一) 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	(606)
1.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606)
2. 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 革命的特点	(608)
3. 在中国离开武装斗争就不能完成任何 革命任务	(610)
(二) 建立一支人民的军队	(612)
(三) 放手发动群众，进行人民战争	(612)

- (四) 武装斗争要同其他斗争形式相配合 (612)
- (五) 党对武装斗争的绝对领导是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保证 (612)
- 八、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613)
- (一) 革命只能首先并长期在农村发展 (613)
- (二) 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 (616)
1. 没有农村根据地，革命战争不能长期存在和发展 (616)
2. 根据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最重要的因素，夺取全国胜利的基础 (620)
3. 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基本条件 (623)
4. 建立中心区域，采取波浪式推进的战略 (629)
5. 反对敌人的“围剿”，发展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根据地 (631)
- (三) 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 (634)
1. 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必要性 (634)
2. 做好夺取城市和交通要道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637)
3. 做好接收、管理城市的准备工作 (642)
- 要把城市工作放在重要地位，迅速学会管理城市 (642)
 - 要准备大批干部，同时要利用社会现成人才 (645)
4. 城市工作的方针政策 (648)
- 不要把土地改革的办法搬到城市 (648)
 - 有步骤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同时保护外侨的合法利益 (649)
 - 没收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 (650)

● 谨慎清理和妥善处理旧的机构和人员	(650)
九、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653)
(一) 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653)
1. 各个历史时期根据地政权的性质和形式	(653)
●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民主共和国和人民共和国 ...	(653)
● 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民主统一战线政权	(658)
● 解放战争时期的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663)
2. 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665)
3. 厉行廉洁政治，严惩贪污，反对浪费	(667)
4. 建立革命法制，保护人民权利	(667)
(二) 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668)
1. 根据地必须围绕革命战争进行必要的和可能的经济建设	(668)
2. 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的总方针和财政税收政策	(675)
3. 努力发展公营和合作社经济，同时鼓励私人 和民营经济的发展	(682)
4. 农业生产是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第一位	(689)
5. 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克服困难	(692)
6. 实行精兵简政	(700)
7. 必须重视和学会经济工作	(701)
● 不但应该会办政治、办军事，也应该会办经济	(701)
● 按照根据地的特点，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 的原则	(705)
● 组织群众开展劳动竞赛，奖励成绩突出者	(707)
● 加强企业管理，实行经济核算	(708)
(三) 根据地的文化建设	(710)

（四）根据地是全国的榜样，新民主主义社会的 模型	(710)
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	(712)

一、中国的国情

（一）中国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

1. 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特点

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1页

中国虽然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虽然是一个地广人众、历史悠久而又富于革命传统和优秀遗产的国家；可是，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3页

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由以下的各个主要特点构成的:

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

二、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将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这种农民,实际上还是农奴。

三、不但地主、贵族和皇室依靠剥削农民的地租过活,而且地主阶级的国家又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并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劳役,去养活一大群的国家官吏和主要地是为了镇压农民之用的军队。

四、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末,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3—624页

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4页

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64页

2. 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5页

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3页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

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

这种情况，直至近百年来，才发生新的变化。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5页

3. 中国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演变

中国的封建社会继续了三千年左右。直到十九世纪的中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这个社会的内部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6页

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6—627页

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这个目的，曾经对中国采用了并且还正在继续地采用着如同下面所说的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一、向中国举行多次的侵略战争，例如一八四〇年的英国鸦片战争，一八五七年的英法联军战争，一八八四年的中法战争，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一九〇〇年的八国联军战争。用战争打败了中国之后，帝国主义列强不但占领了中国周围的许多原由中国保护的国家，而且抢去了或“租借”去了中国的一

部分领土。例如日本占领了台湾和澎湖列岛，“租借”了旅顺，英国占领了香港，法国“租借”了广州湾。割地之外，又索去了巨大的赔款。这样，就大大地打击了中国这个庞大的封建帝国。

二、帝国主义列强强迫中国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中国驻扎海军和陆军的权利，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并把全中国划分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

三、帝国主义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控制了在中国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并把许多通商口岸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它们直接管理的租界。它们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控制了中国的交通事业（海上的、陆上的、内河的和空中的）。因此它们便能够大量地推销它们的商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工业品的市场，同时又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帝国主义的需要。

四、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中国经营了许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并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直接地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五、帝国主义列强经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因此，它们就不但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而且在金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

六、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以便利其剥削广大的中国农民和其他人民大众。

七、于买办阶级之外，帝国主义列强又使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变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它们“首先和以前的社会制度的统治阶级——封建地主、商业和高利贷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以

反对占大多数的人民。帝国主义到处致力于保持资本主义前期的一切剥削形式（特别是在乡村），并使之永久化，而这些形式则是它的反动的同盟者生存的基础”。“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全部财政军事的势力，乃是一种支持、鼓舞、栽培、保存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官僚军阀上层建筑的力量。”

八、为了造成中国军阀混战和镇压中国人民，帝国主义列强供给中国反动政府以大量的军火和大批的军事顾问。

九、帝国主义列强在所有上述这些办法之外，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

十、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更使已经变成半殖民地的中国的一大块土地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上述这些情形，就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的新的变化的又一个方面，就是把一个封建的中国变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的血迹斑斑的图画。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8—630页

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30页

(二) 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

1. 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政治、经济、文化特点

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9页

大家知道，差不多一百年以来，中国是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国家。由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的斗争，中国还保存了一种半独立的地位。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42—143页

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反动军队中有隶属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和隶属各省军阀的所谓杂牌军这样两部分军队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88页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的不统一，影响到中国统治集团间的不统一。数国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和一国支配的殖民地是有区别的。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189页

我们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有如下的几个特点：

一、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

二、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但是，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它的大部分是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的。

三、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是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在沦陷区，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统治。

四、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的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在沦陷区，则一切被日本帝国主义所独占。

五、由于中国是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或半统治之下，由于中国实际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状态，又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平衡。

六、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

这些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

决定这种情况的，主要地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势力，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相结合的结果。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30—631页

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地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中国已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在的中国，在日本占领区，是殖民地社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而不论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都是封建半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作为统治的东西来说，这种社会的政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64—665页

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还在一百多年以前（一八四〇年中英鸦片战争时期），就开始由古代的独立的封建的社会经济形

态，逐步地改变为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社会经济形态，即是说半独立的半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在目前整个中国社会经济中，一方面，存在着外国帝国主义的经济，本国封建主义的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和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这些就是旧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另一方面，存在着新式的国家经济、被解放了的农民和小生产者的经济和在新民主国家指导下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就生产技术而论，中国存在着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事业、中小规模的机器生产事业和以家族为单位的手执简单工具以从事生产的各种小生产事业。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形态，在鸦片战争以来的长时期内占据优势。这种优势，现在正在被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所迅速地代替着。

《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57页

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3页

2. 近代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和各阶级分析

● 阶级构成

现阶段的中国社会里，有些什么阶级呢？有地主阶级，有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上层部分都是中国社会的统

治阶级。又有无产阶级，有农民阶级，有农民以外的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在今天中国的最广大的领土上，还是被统治阶级。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38页

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8页

中国这个社会两头小，但是两头强，中间大，但在政治上是软弱的。中间阶层是动摇的，无论哪个中间阶层都有它的动摇性。坚决的阶级就只有两个：无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的政治代表分别是共产党和国民党。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06页

● 地主阶级

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的社会基础，是用封建制度剥削和压迫农民的阶级，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38页

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地主剥削的方式，主要地是收取地租，此外或兼放债，或兼雇工，或兼营工商业。但对农民剥削地租是地主剥削的主要的方式。管公堂和收学租也是地租剥削的一类。

有些地主虽然已破产了，但破产之后仍不劳动，依靠欺骗、掠夺或亲友接济等方法为生，而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者，仍然算是地主。

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地主中特别凶恶者。富农中亦常有较小的土豪、劣绅。

帮助地主收租管家，依靠地主剥削农民为主要的的生活来源，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的一些人，应和地主一例看待。

依靠高利贷剥削为主要生活来源，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的人，称为高利贷者，应和地主一例看待。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九三三年十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27—128页

开明绅士是地主阶级的左翼，即一部分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地主，他们的政治态度同中等资产阶级大略相同。他们虽然同农民有阶级矛盾，但他们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亦有矛盾。他们不赞成顽固派，他们也想利用我们同顽固派的矛盾以达其政治上的目的。这一部分人，我们也决不可忽视，必须采取争取政策。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46页

● 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有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

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他们和农村中的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中国革命史上，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不是中国革命的动力，而是中国革命的对象。

但是，因为中国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分属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尖锐地对立着的时候，在革命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之下的买办阶级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参加当前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但是一到他们的主子起来反对中国革命时，他们也就立即反对革命了。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39页

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它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地作战，不积极地反汪反汉奸，有时还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变和一月十七日的命令那种地步，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

《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一九四一年五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82页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了最高峰，它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这个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这个资产阶级，叫做官僚资产阶级，即是中国的大资产阶级。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53—1254页

中国的现代性工业的产值虽然还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但是它却极为集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1页

● 民族资产阶级

中产阶级。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

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他们反对国民党联俄和容纳共产党及左派分子。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4页

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分别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有同外国资本和本国土地关系较多的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我们暂且不去估计他们的变化的可能性。问题是在没有那些关系或者关系较少的那些部分。我们认为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之下，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些部分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动摇。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他们在这二者之间动摇着。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45页

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正是因为这样，帝国主义敢于欺负他们，而这就规定了他们不喜欢帝国主义的特点。自然，我们不但不否认，并且完全承认：又是因为这一点，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容

易拿某种临时的贿赂为钓饵将他们拉了过去，而这也就规定了他们对于革命的不彻底性。可是总不能说，在今天的条件下，他们同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没有任何的分别。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47页

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所以，虽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们也还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这后者，例如在辛亥革命时期和北伐战争时期）的革命性，可以同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它们所愿意反对的敌人。这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旧俄帝国的资产阶级的不同之点。在旧俄帝国，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是侵略别人的，所以俄国的资产阶级没有什么革命性。在那里，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反对资产阶级，而不是联合它。在中国，因为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是被人侵略的，所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在这里，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不忽视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革命性，而和他们建立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统一战线。

但同时，也即是由于他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他们又保存了另一种性质，即对于革命敌人的妥协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这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两大基本任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

都不能解决。至于中国的大资产阶级，以国民党为代表，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这一个长的时期内，一直是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并和封建势力结成同盟，反对革命人民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曾在一九二七年及其以后的一个时期内一度附和过反革命。在抗日战争中，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以汪精卫为代表，又已投降敌人，表示了大资产阶级的新的叛变。这又是中国资产阶级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法国的资产阶级的不同之点。在欧美各国，特别在法国，当它们还在革命时代，那里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彻底的；在中国，资产阶级则连这点彻底性都没有。

一方面——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又一方面——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焉”的两面性。这种两面性，就是欧美历史上的资产阶级，也是同具的。大敌当前，他们要联合工农反对敌人；工农觉悟，他们又联合敌人反对工农。这是世界各国资产阶级的一般规律，不过中国资产阶级的这个特点更加突出罢了。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73—674页

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需要市场，他们也赞成“耕者有其田”；他们又多半和土地联系着，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又惧怕“耕者有其田”。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75页

自由资产阶级有更大的动摇性，但自由资产阶级现在要民主，他们要他们所想的民主，因此他们是我们的同盟军。自由

资产阶级在我们坚决的影响下，是能够中立，以至于跟我们一道走的。比如对联合政府这个口号，他们是赞成的；又比如在几次反共高潮中，他们是抱中立态度。国民党和共产党打架，他们在两边劝架，给这边说不要这样，给那边说不要那样。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18—319页

被这些阶级及其国家政权所压迫和损害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虽然也是资产阶级，却是可以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或者保守中立的。他们和帝国主义没有联系，或者联系较少，他们是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权力到达的地方，对于这些阶级，必须坚决地毫不犹豫地给以保护。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54页

自由资产阶级。这就是民族资本家和新式富农。他们占有较多的生产资料，以自由资本主义的方法剥削雇佣劳动者。在反动的国家政权下，他们受帝国主义者、地主和官僚资本家所压迫、损害或限制。

《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59页

自由资产阶级是一个软弱的动摇的阶级。但是他们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所压迫、损害或限制（这种压迫、损害或限制远较劳动人民所受者为轻），所以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时期内，他们可以参加这种革命，或者保守中立。在革命胜利以后的经济建设中，他们也可以参加这种建设。只要中国尚未进到社会主

义社会，他们是可以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一道前进的。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中，应当允许自由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团体派遣他们的代表参加工作。但是，他们中间有为数不多的一部分人，即自由资产阶级的右翼分子，是依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对人民民主革命的，中国人民对于这部分人的反动行为，必须予以警戒和揭露。但是这种政治上的警戒和揭露，应当与经济上的消灭严格地区别开来。中国人民民主革命所应当和必须消灭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不是自由资本主义。

《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60页

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在政治上非常软弱的和动摇的阶级。但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由于也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迫害和限制，他们又可以参加人民民主革命，或者对革命守中立。他们是人民大众的一部分，但不是人民大众的主体，也不是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但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性，又因为他们可以参加反对美蒋，或者在反对美蒋的斗争中采取中立的态度，因之我们便有可能和必要去团结他们。在中国共产党未产生以前，以孙中山为领导的国民党，曾经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充当过当时中国革命（不彻底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但是，中国共产党一经产生，并且表现出自己的能力以后，他们就已经不能是中国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了。这个阶级曾经参加了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运动，而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前），他们中间的不少分子，曾经附和了蒋介石的反动。但是，决不能因为这一点，就认为那个时期我们在政治上不应该争取

他们，在经济上不应该保护他们；就认为我们在那个时期内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不是冒险主义的政策。相反地，那时我们的政策，仍然应当是保护和争取他们，以便我们能够集中力量去反对主要敌人。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一九四八年三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88—1289页

● 小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如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这一类。这一个阶级，在人数上，在阶级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自耕农和手工业主所经营的，都是小生产的经济。这个小资产阶级内的各阶层虽然同处在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但有三个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有余钱剩米的，即用其体力或脑力劳动所得，除自给外，每年有余剩。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这种人胆子小，他们怕官，也有点怕革命。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和中产阶级颇接近，故对于中产阶级的宣传颇相信，对于革命取怀疑的态度。这一部分人在小资产阶级中占少数，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第二部分是在经济上大体上可以自给的。这一部分人比较第一部分人大不相同，他们也想发财，但是赵公元帅总不让他们发财，而且因为近年以来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感觉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从前的世界。他们觉得现在如果只使用和从前相等的劳动，就会不能维持生活。必须增加劳动时间，每天起早散晚，对

于职业加倍注意，方能维持生活。他们有点骂人了，骂洋人叫“洋鬼子”，骂军阀叫“抢钱司令”，骂土豪劣绅叫“为富不仁”。对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仅怀疑其未必成功（理由是：洋人和军阀的来头那么大），不肯贸然参加，取了中立的态度，但是绝不反对革命。这一部分人数甚多，大概占小资产阶级的一半。第三部分是生活下降的。这一部分人好些大概原先是所谓殷实人家，渐渐变得仅仅可以保住，渐渐变得生活下降了。他们每逢年终结账一次，就吃惊一次，说：“咳，又亏了！”这种人因为他们过去过着好日子，后来逐年下降，负债渐多，渐次过着凄凉的日子，“瞻念前途，不寒而栗”。这种人在精神上感觉的痛苦很大，因为他们有一个从前和现在相反的比较。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紧，是一个数量不小的群众，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以上所说小资产阶级的三部分，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战时，即到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我们从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和各地农民运动的经验看来，这个断定是不错的。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5—6页

城市贫民（中小商人与学生）是民权革命过程中的一个相当的力量，忽视了这个力量之争取，就无异把这个力量送给豪绅资产阶级。以后对城市中小商人及学生群众，要有深入的宣传工作去取得他们。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98页

中国的这些小资产阶级成分曾经参加过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和农民一样，他们有同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小生产的经济地位。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曾经给了他们以重大的损害，使他们中的很多人陷于失业、破产或半破产的境地。现在他们眼看就要当亡国奴了，除了反抗，再没有出路。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44页

放弃斗争，只要团结，或者不注重斗争，马马虎虎地斗一下，但是斗得不恰当、不起劲，这是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小资产阶级还有另外一种性质，叫革命性。他们革命是革的，但是有点软弱。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16页

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党内也好，党外也好，有他的动摇性，也有他的革命性。动摇性是他们坏的一方面，但是一般地说来，能够用教育的方法去克服。从党内来说，延安整风就是一个证明。艺术家和作家，对文艺座谈会这样的方法也赞成，从前他们不知道怎样做，我们党给他们指出方针，向他们进行教育工作，不是命令主义，而是逐渐使他们自觉，这就很有成效。克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要靠我们党经常地向他们进行适当的宣传，主要是靠实际行动，靠我们自己有广大的力量，有广大的解放区和军队。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18页

农民以外的独立劳动者。例如手工业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小商贩，他们都占有少量的生产资料，以自己的独立劳动为生。他们受帝国主义者、地主、官僚资本家和其他剥削阶级所直接地或间接地剥削。

《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59页

● 农民（富农、中农、贫农、雇农）

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三种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9页

富农标准要是以剥削为他收入的相当部分。那些少量放账或借账的人还是列在中农。那些原是雇农，中间（未革命前）已经租得土地耕种的人还是列入贫农。那些全家不耕田，专靠独立劳动（做裁缝、木匠等）谋生活的才叫独立劳动者。半耕半做手艺的还是按照他的经济地位列入贫农、中农或富农里面去。

《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一九三一年四月二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67页

我以为地主是以收租为主；富农是以雇工为主，自己参加劳动；中农是以不出卖劳动力为主，经营自己的土地；贫农是一定要出卖劳动力，靠自己的土地不够生活；雇农完全出卖劳动力，没有土地。当然，这是指它们的主要标志。

《关于农村调查》（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81页

农民都占有少量的生产资料，或者耕种地主的土地，或者耕种自己的土地。在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都耕种地主的土地；在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彻底完成以后，所有农民都耕种自己的土地。农民中间占有的生产资料不足维持生活，因而必须出卖部分劳动力的，叫做贫农，贫农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农民中间占有的生产资料足以维持生活，因而不必出卖劳动力的，叫做中农。在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以前，贫农占农民的大多数；在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彻底完成以后，中农占农民的大多数。在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以前，农民都受地主和其他剥削阶级所直接地或间接地剥削；只有在新民主国家实现土地制度的改革以后方才免除这种剥削。

《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58—59页

富农一般占有土地。但也有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的。也有自己全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富农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土地出租剥削地租，或兼放债，或兼营工商业。富农多半还管公堂。有的占有相当多的优良土地，除自己劳动之外并不雇工，而另以地租债利等方式剥削农民，此种情况也应以富农看待。富农的剥削是经常的，许多富农的剥削收入在其全部收入中并且是主要的。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九三三年十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28页

中国的旧式富农，带着浓厚的封建性，多兼放高利贷或出租一部分土地。他们一方面自己劳动，接近于农民；另一方面又有封建的或半封建的剥削，接近于地主。

《把打击面放在真正的封建剥削阶级范围内》（一九四八年一月），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2页

中农呢？他们的态度是游移的。他们想到革命对他们没有什么大的好处。他们锅里有米煮，没有人半夜里敲门来讨账。他们也根据从来有没有的道理，独自皱着眉头在那里想：“农民协会果然立得起来吗？”“三民主义果然兴得起来吗？”他们的结论是：“怕未必！”他们以为这全决于天意：“办农民会，晓得天意顺不顺咧？”在第一时期内，农会的人拿了册子，进了中农的门，对着中农说道：“请你加入农民协会！”中农回答道：“莫性急啦！”一直到第二时期，农会势力大盛，中农方加入农会。他们在农会的表现比富农好，但暂时还不甚积极，他们还要看一看。农会争取中农入会，向他们多作解释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0页

中农许多都占有土地。有些中农只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有些中农并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中农自己都有相当的工具。中农的生活来源全靠自己劳动，或主要靠自己劳动。中农一般不剥削别人，许多中农还要受别人小部分地租债利等剥削。但中农一般不出卖劳动力。另一部分中农（富裕中农）则对别人有轻微的剥削，但非经常的和主要的。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九三三年十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28页

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0页

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贫农，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所有最下一级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委员，在第一第二两个时期中，几乎全数是他们（衡山县乡农民协会职员，赤贫阶层占百分之五十，次贫阶层占百分之四十，穷苦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他们损伤了土豪劣绅的体面。他们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绅在地上，并且踏上一只脚。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1页

贫农有些占有一部分土地和不完整的工具；有些全无土地，只有一些不完整的工具。一般都须租入土地来耕，受人地租、债利和小部分雇佣劳动的剥削。

中农一般不要出卖劳动力，贫农一般要出卖小部分的劳动力，这是区别中农和贫农的主要标准。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九三三年十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29页

中国尚少新式的资本主义的农业。所谓农村无产阶级，是指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而言。此等雇农不仅无土地，无农具，又无丝毫资金，只得营工度日。其劳动时间之长，工资之少，待遇之薄，职业之不安定，超过其他工人。此种人在乡村中是最感困难者，在农民运动中和贫农处于同一紧要的地位。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8页

乡村手工业工人地位比雇农要高，因其自有工具，且系一种自由职业。但因家庭负担之重，工资与生活物价之不相称，时有贫困的压迫与失业的恐慌，亦与雇农差甚远。

《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中国农民》1926年第1期

工人（雇农在内）一般全无土地和工具，有些工人有极小部分的土地和工具。工人完全地或主要地以出卖劳动力为生。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九三三年十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29页

● 半无产阶级

所谓半无产阶级，包含：（一）绝大部分半自耕农，（二）贫农，（三）小手工业者，（四）店员，（五）小贩等五种。绝大部

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半自耕农、贫农和小手工业者所经营的，都是更细小的小生产的经济。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虽同属半无产阶级，但其经济状况仍有上、中、下三个细别。半自耕农，其生活苦于自耕农，因其食粮每年大约有一半不够，须租别人田地，或者出卖一部分劳动力，或经营小商，以资弥补。春夏之间，青黄不接，高利向别人借债，重价向别人余粮，较之自耕农的无求于人，自然景遇要苦，但是优于贫农。因为贫农无土地，每年耕种只得收获之一半或不足一半；半自耕农则租于别人的部分虽只收获一半或不足一半，然自有的部分却可全得。故半自耕农的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贫农。贫农是农村中的佃农，受地主的剥削。其经济地位又分两部分。一部分贫农有比较充足的农具和相当数量的资金。此种农民，每年劳动结果，自己可得一半。不足部分，可以种杂粮、捞鱼虾、饲鸡豕，或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勉强维持生活，于艰难竭蹶之中，存聊以卒岁之想。故其生活苦于半自耕农，然较另一部分贫农为优。其革命性，则优于半自耕农而不及另一部分贫农。所谓另一部分贫农，则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资金，肥料不足，土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更需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丛集，如牛负重。他们是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小手工业者所以称为半无产阶级，是因为他们虽然自有简单的生产手段，且系一种自由职业，但他们也常常被迫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其经济地位略与农村中的贫农相当。因其家庭负担之重，工资和生活费用之不相称，时有贫困的压迫和失业的恐慌，和贫农亦大致相同。店员是商店的雇员，以微薄的薪资，供家庭的费用，物价年年增长，薪给往往须数年一增，偶

与此辈倾谈，便见叫苦不迭。其地位和贫农及小手工业者不相上下，对于革命宣传极易接受。小贩不论肩挑叫卖，或街畔摊售，总之本小利微，吃着不够。其地位和贫农不相上下，其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也和贫农相同。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6—7页

● 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约二百万人。中国因经济落后，故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二百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个数量是在外资产业的奴役下。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我们看四年以来的罢工运动，如海员罢工、铁路罢工、开滦和焦作煤矿罢工、沙面罢工以及“五卅”后上海香港两处的大罢工所表现的力量，就可知工业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所处地位的重要。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哪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都市苦力工人的力量也很可注意。以码头搬运夫和人力车夫占多数，粪夫清道夫等亦属于这一类。他们除双手外，别无长物，其经济地位和产业工人相似，惟不及产业工人的集中和在生产上的重要。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7—8页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如果一部分的商人、地主和官僚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那末，一部分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就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上身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两个特殊的社会阶级来看，它们是新产生的，它们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阶级。它们从封建社会脱胎而来，构成了新的社会阶级。它们是两个互相关联又互相对立的阶级，它们是中国旧社会（封建社会）产出的双生子。但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7页

中国无产阶级中，现代产业工人约有二百五十万至三百万，城市小工业和手工业的雇佣劳动者和商店店员约有一千二百万，农村的无产阶级（即雇农）及其他城乡无产者，尚有一个广大的数目。

中国无产阶级除了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有它的许多特出的优点。

中国无产阶级有哪些特出的优点呢？

第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没有

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所以除极少数的工贼之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

第二、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革命的舞台，就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里比较最有觉悟的阶级。

第三、由于从破产农民出身的成分占多数，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于他们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

因此，虽然中国无产阶级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例如人数较少（和农民比较），年龄较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较），文化水准较低（和资产阶级比较）；然而，他们终究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44—645页

中国有产业工人数百万，有手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数千万。没有各种工业工人，中国就不能生活，因为他们是工业经济的生产者。没有近代工业工人阶级，革命就不能胜利，因为他们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们最富于革命性。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92页

无产阶级。例如新民主国家企业中的劳动者，资本家经营的机器工业、手工业、农业和商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他们都不占有私有的生产资料。但是新民主国家企业中的劳动者，按其原来状况，是无产阶级，但是按其现在状况，他们却经过了他们

们和其他劳动人民所共同支配的新民主国家，已经集体地占有国家企业中的生产资料，就是说，已经与其原来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新民主国家企业中的劳动者，已经是不被剥削的人们，他们所生产的用于扩大再生产和为全体人民谋利益的属于剩余价值的部分，不能认为被剥削。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则受资本家所剥削。

《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58页

● 游民无产者

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地的“青帮”，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8—9页

中国广大的游民群众若站在革命阶级方面，就成了革命的工具，若站在反动阶级方面，就成了反革命的工具，因此从反动阶级影响之下夺取游民群众，是党的宣传任务之一。执行宣传工作时，须注意各部分的游民生活和性质之不同，分别地对他们宣传。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99页

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国农村中和城市中的广大的失业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被迫到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找寻不正当的职业过活，这就是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的来源。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因此，应该善于改造他们，注意防止他们的破坏性。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45—646页

3. 近代中国社会的矛盾和主要矛盾

中国的大地主是中国农民的死敌，是乡村中真正统治者，是帝国主义军阀的真实基础，是封建宗法社会的惟一堡垒，是一切反革命势力发生的最后原因。

《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中国农民》1926年第1期

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外而帝国主义内而统治阶级，对于其地压迫榨取的对象主要是农民，求所以实现其压迫与榨取，则全靠那封建地主阶级给他们以死力的拥护，否则无法行其压榨。所以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惟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中国的军阀只是

这些乡村封建阶级的首领，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岂非不知道轻重本末？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7页

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的战争。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47—48页

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仅仅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49页

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

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拼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00—102页

我们不能离开阶级立场来分析,以为军阀混战会扩大下去,继续到底,要知道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联合的来进攻革命。

在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三〇年十月十七日),《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第319页

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这是半殖民地的环境,即许多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环境所造成的。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48页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当然还有别的矛盾,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31页

4. 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形式

●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新军阀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

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

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47页

一九二七年至现在的土地革命战争，是在新的情况之下进行的。战争的敌人不但是帝国主义，而且是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联盟。民族资产阶级则做了大资产阶级的尾巴。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84页

●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只是日本侵略的范围暂时还限于东北四省，就使人们觉得似乎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一定再前进的样子。今天不同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显示他们要向中国本部前进了，他们要占领全中国。现在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43页

(一) 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

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

(二)中国很久以来就是处在两种剧烈的基本的矛盾中——帝国主义和中国之间的矛盾,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一九二七年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出卖民族利益于帝国主义,造成了工农政权和国民党政权尖锐对立,以及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不能不由中国共产党单独负担的局面。

(三)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以来的形势,使这些矛盾发生了如下的变化:

甲、由一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变为特别突出特别尖锐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了完全征服中国的政策。因此,便把若干其他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推入次要的地位,而在这些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扩大了矛盾的裂口。因此,便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

.....

戊、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的地位,使它们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但是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或消灭。中国和日本以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亦然。因此,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下列的任务:适当地调整国内国际在现时可能和必须调整的矛盾,使之适合于团结抗日的总任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要求和平统一、民主政治、改良生活及与反对日本的外国进行谈判种种方针之所由来。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52—254页

在日本武力侵入中国以后，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勾结日本公开投降或准备投降的一切汉奸和反动派。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33页

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地叛变投降,也决不能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

《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一九四一年五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81页

今天中国主要的矛盾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成为次要的。西安事变前主要矛盾在国共两党之间,而西安事变后,主要矛盾则在中日之间。因此,今天无论解决任何问题,都应该以这个主要矛盾作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

《关于农村调查》(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82页

● 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同中国人民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

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老中国，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存在于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面前。

《两个中国之命运》（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25—1026页

有人提出中国可能变成美国的半殖民地，我看这个提法很对。在抗战以前近一百年中间，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统治的半殖民地。九一八事变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以后，国民党削弱了，就不得不依赖美国，这样中国就可能变成以美国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主统治的半殖民地。以美国为主控制国民党，英国可能插进一只小脚。这一变化将是一个长期的麻烦，我们共产党要好好准备，以应付这个变化。日本也许在明年就倒下去，这将是一九三一年日本进攻中国以来十六年中的大变化，这个变化对我们是有利的。把日本侵略者打跑了，可是又来了一个“特殊繁荣”的美国，它现在控制着国民党，所以我们要做国际联络工作，争取美国的无产阶级援助我们。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应该特别注意美国的情况。中国可能变成美国的半殖民地，这是一个新的变化。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87页

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这个时期如果有机会主义的话，那就是不力争，自愿地把人民应得的果实送给蒋介石。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30页

以前，世界上是法西斯和反法西斯的斗争，战后的世界变成了美国反动派和世界人民的对立，这种对立也反映在中国，就是美国支持蒋介石进行反人民的内战。因此，中国的斗争和世界有密切的联系。

《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96页

由于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代替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的地位，采取了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内战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他们就宣布他们自己和全国人民为敌，他们就将全国各阶层人民放在饥饿和死亡的界线上，因而就迫使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同蒋介石反动政府作你死我活的斗争，并使这个斗争迅速发展下去。

《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25页

蒋介石政府所长期施行的极端反动的财政经济政策，现在被空前的卖国条约即中美商约所加强了。在中美商约的基础上，美国的独占资本和蒋介石的官僚买办资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控制着全国的经济生活。其结果，就是极端的通货膨胀，空前

的物价高涨，民族工商业日益破产，劳动群众和公教人员的生活日益恶化。这种情形，迫使各阶层人民不得不团结起来为救死而斗争。

《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25—1226页

在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地结束以后，美国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地的走狗代替德国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地位，组成反动阵营，反对苏联，反对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反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反对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运动，反对中国人民的解放。在这种时候，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汪精卫一模一样，充当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将中国出卖给美国，发动战争，反对中国人民，阻止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前进。在这种时候，如果我们表示软弱，表示退让，不敢坚决地起来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中国就将变成黑暗世界，我们民族的前途将被断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地进行了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反对蒋介石的进攻。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45页

由于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蒋介石的压迫和我党坚决保护群众利益的正确方针，我党获得了蒋介石统治区域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的同情。这些群众，因为挨饿，因为政治上受压迫，因为蒋介石的反人民的内战夺去了人民的一切活路，他们就不断地掀起了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政府的斗争，他们的基本口号是反饥饿，

反迫害，反内战和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57页

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中国人民的觉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民众组织力量已经空前地强大起来了。这样，就迫使美帝国主义的当权集团不能采取大规模地直接地武装进攻中国的政策，而采取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

《别了，司徒雷登》(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91—1492页

5. 近代中国是帝国主义力量在东方比较薄弱的一环

我们不能设想，没有苏联，没有欧洲的和美国的工人运动吸引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在西方，我们中国革命也能胜利。我说，东方的空气比较稀薄，而西方的气压很重，我们就在东方冲破帝国主义力量比较薄弱的这一环。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的巩固也是一样，帝国主义是要消灭我们的，没有各国无产阶级，首先是苏联的援助，巩固是不可能的。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62页

列宁曾经说过，革命首先从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突破。十月革命时的俄国是这样的薄弱环节，十月革命后的中国也是这样的薄弱环节。俄国和中国的共同点是：都有相当数量的无

产阶级，都有大量的农民群众，都是大国。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第 88 页

二、中国的出路在革命

(一) 科学救国、教育救国、 实业救国梦想的幻灭

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消灭日本侵略者，这是谋独立。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统一的联合政府，使全国军队成为人民的武力，实现土地改革，解放农民，这是谋自由、民主和统一。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许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学家和学生们的，他们埋头于自己的工作或学习，不问政治，自以为可以所学为国家服务，结果也化成了梦，一概幻灭了。这是好消息，这种幼稚的梦的幻灭，正是中国富强的起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4卷第1080页

(二) 解决近代中国社会的矛盾， 使中国独立、民主、富强， 不能不进行革命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当然还有别的矛盾，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31页

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一面少了两件，另一面却多了两件。多了两件什么东西呢？一件是帝国主义的压迫，一件是封建主义的压迫。由于多了这两件东西，所以中国就变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现在我们全国人民所要的东西，主要的是独立和民主，因此，我们要破坏帝国主义，要破坏封建主义。要坚决地彻底地破坏这些东西，而决不能丝毫留情。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31—732页

我们应该知道，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是基础。政治好比

就是这个房子，经济就是地基。我们搞政治，搞政府，搞军队，为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破坏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政府、旧军队。日本帝国主义占了我们的地方，我们还有什么生产力可以发展？这是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力量不取消，生产力就不能解放，经济就不能发展。因此，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而我们搞政治、军事仅仅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学过社会科学的同志都懂得这一条，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我们搞了多少年政治和军事就是为了这件事。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也主要是讲的这件事，讲生产力在历史上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08—109页

中国有两大敌人、两座大山压迫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一座大山就是帝国主义，另一座大山就是封建主义，外国的压迫和中国的压迫，压得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不能抬头，破坏了我们的生产力。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应该发展的，中国应该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国家、丰衣足食的国家、富强的国家。这就要解放生产力，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束缚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不破坏它们，中国就不能发展和进步，中国就有灭亡的危险。帝国主义早在一百年前就开始侵入中国。现在我们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已经打了八年，如果从九一八事变算起，就已经有十几年了，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第一个大敌。中国内部的反动派，实际上是跟日本侵略者互相配合来压迫中国人民的。这些反动力量还很大，它们压迫全中国人民，束缚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其不能发展。革命是干什么呢？就是要冲破这个压力，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解放

中国人民，使他们得到自由。

《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演说》（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32页

（三）认清中国国情，是认清中国革命一切问题的基本依据

什么是中国的国情呢？中国的国情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问起中国国情是什么？回答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这几个字。这是经过中外许多社会科学家，研究了几十年所得出的结论。半殖民地半封建，这是病症，就是说我们中国有两种病：一种是帝国主义的压迫，一种是封建势力的压迫。

《坚持国共长期合作》（一九三九年七月九日），《党的文献》1995年第4期

我们已经知道中国现时的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33页

三、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一）孙中山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

（参见副编“对若干历史事件、人物及文献著作的评述”，第2291—2300页）

2. 辛亥革命的性质及其历史地位

（参见副编“对若干历史事件、人物及文献著作的评述”，第2185—2189页）

3. 由旧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

● 新三民主义同旧三民主义的联系与区别

现在的任务是必须为真正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这就是说，以对外抗战求得中国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以对内民主自由求得建立普选国会制、民主共和国的民权主义，以改善人民生活求得解除大多数人民痛苦的民生主义。这样的三民主义与我们的现时政纲，并无不合，我们正在向国民党要求这些东西。去年八月致国民党书中，已要求他们恢复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我们是最坚决最忠诚地为实现三民主义中国而奋斗的。即以我们过去实行土地革命政策而论，亦无非孙中

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而已。至于我们还信仰共产主义，那是不相冲突的，孙中山先生在世时曾经同意我们同时信仰共产主义，并且国民党员中有许多是信仰资本主义的，有许多还信仰无政府主义，有些人则信仰孔子主义、佛法主义、基督主义，无所不有，也无所不包。只要当前革命政纲取得一致，即构成了团结救国的基础，即可泯除一切猜疑，走上共赴国难的轨道。

《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91—492页

三民主义有它的历史变化。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曾经因为孙先生与共产党合作加以坚决执行而取得人民的信仰，成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胜利的革命的旗帜。但是一九二七年国民党排斥共产党（清党运动和反共战争），实行相反的政策，招致革命的失败，陷民族于危险的地位，于是三民主义也就失去了人民的信仰。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59页

孙先生是坚持其主义的。在他一生，他的三民主义只有发展而无弃置。孙先生从没有弃置其主义于不顾的时候，他始终坚持了三民主义，并且发展了三民主义，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就表现了三民主义的发展。对统一战线也是一样，孙先生不但坚持了而且发展了统一战线，从为着推翻清朝而联合各个革命派别与会党，发展到为着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而采取联合苏俄、联合共产党与联合工农的新政策。所有这些，同他的不怕艰难挫折、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

毅力或革命实践精神相结合，就表现了孙先生的伟大革命家模范。

《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12页

只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对于三民主义的解释才是“真释”，其他一切都是伪释。……

这篇宣言，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历史时代。在这以前，三民主义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旧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

在这以后，三民主义是新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新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新三民主义。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是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

这种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没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时期中，就都是伪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89—690页

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联俄的三民主义，决不能是同帝国主义联合反俄的三民主义。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91页

这种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

真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只有这种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才称之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才宣布“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中的政纲，即其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92—693页

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以前的三民主义，乃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乃是过时了的三民主义。如不把它发展到新三民主义，国民党就不能前进。聪明的孙中山看到了这一点，得了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助力，把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遂获得了新的历史特点，建立了三民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统一战线，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取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举行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93页

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在这以前，三民主义是和教育界、学术界、青年界没有多大联系的，因为它没有提出反帝国主义的口号，也没有提出反封建社会制度和反封建文化思想的口号。在这以前，它是旧三民主义，这种三民主义是被人们看成为一部分人为了夺取政

府权力，即是说为了做官，而临时应用的旗帜，看成为纯粹政治活动的旗帜。在这以后，出现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由于国共两党的合作，由于两党革命党员的努力，这种新三民主义便被推广到了全中国，推广到了一部分教育界、学术界和广大青年学生之中。这完全是因为原来的三民主义发展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三大政策的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之故；没有这一发展，三民主义思想的传播是不可能的。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0—701页

● 新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同新三民主义的联系与区别

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政治经济纲领。其最高的纲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和三民主义有区别的。其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亦比国内任何党派为彻底。但是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宣布的三民主义的纲领，基本上是不相冲突的。因此，我们不但不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地实行三民主义，而且要求国民党和我们一道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我们认为，共产党、国民党、全国人民，应当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59页

中国共产党在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上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若干人们对于共产党愿意实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觉得奇怪，如像上

海的诸青来，就是在上海的刊物上提出这种疑问的一个。他们以为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是不能并存的。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观察。共产主义是在革命发展的将来阶段实行的，共产主义者在现在阶段并不梦想实行共产主义，而是要实行历史规定的民族革命主义和民主革命主义，这是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根本理由。说到三民主义，还在十年前两党的第一次统一战线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就已经经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共同决定加以实行，并且已经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经过每一个忠实的共产党人和每一个忠实的国民党人的手，在全国很大的地区中实行过了。不幸在一九二七年统一战线破裂，从此产生了国民党方面十年来反对实行三民主义的局面。然而在共产党方面，十年来所实行的一切政策，根本上仍然是符合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的。共产党没有一天不在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彻底的民族主义；工农民主专政制度也不是别的，就是彻底的民权主义；土地革命则是彻底的民生主义。

《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67—368页

孙中山在这一年发表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上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又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孙中山又在其遗嘱上指出“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

同奋斗”的关于内政外交的根本原则。所有这些，就把适应于旧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改造成了适应于新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发表宣言，声明“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就是指的这种三民主义，而不是任何别的三民主义。这种三民主义即是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在新的国际国内条件下，离开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就不是革命的三民主义。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48—649页

谁人不知，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共产党是有现在的纲领和将来的纲领，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分的。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因为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相同，就狂叫“收起”共产主义，岂非荒谬绝伦之至？在共产党人，正因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有和自己的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之点，所以才有可能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才有可能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否则就没有这种可能了。这是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在民主革命阶段上的统一战线，孙中山所谓“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也正是指的这种统一战线。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86—687页

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主义比较起来，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

第一，相同部分。这就是两个主义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的基本政纲。一九二四年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中的革命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三个政治原则，同共产主义在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上是相同的。由于这些相同，并由于三民主义见之实行，就有两个主义两个党的统一战线。忽视这一方面，是错误的。

第二，不同部分。则有：（一）民主革命阶段上一部分纲领的不相同。共产主义的全部民主革命政纲中有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则没有这些部分。如果它不补足这些，并且准备实行起来，那对于民主政纲就只是基本上相同，不能说完全相同。（二）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不同。共产主义于民主革命阶段之外，还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因此，于最低纲领之外，还有一个最高纲领，即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纲领。三民主义则只有民主革命阶段，没有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因此它就只有最低纲领，没有最高纲领，即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纲领。（三）宇宙观的不同。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三民主义的宇宙观则是所谓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二者是相反的。（四）革命彻底性的不同。共产主义者是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即有革命彻底性。三民主义者除了那些最忠实于革命和真理的人们之外，是理论和实践不一致的，讲的和做的互相矛盾，即没有革命彻底性。上述这些，都是两者的不同部分。由于这些不同，共产主义者和三民主义者之间就有了差别。忽视这种差别，只看见统一方面，不看见矛盾方面，无疑是非常错误的。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87—688页

如果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那就同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没有什么基本上相同之点,因为它是旧时期的,是过时了的。如果有什么一种三民主义,它要反俄、反共、反农工,那就是反动的三民主义,它不但和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没有丝毫相同之点,而且是共产主义的敌人,一切都谈不上。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93—694页

孙先生的这种三民主义,和我党在现阶段上的纲领,只是在若干基本原则上一致的东西,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东西。我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比之孙先生的,当然要完备得多;特别是孙先生死后这二十年中中国革命的发展,使我党新民主主义的理论、纲领及其实践,有了一个极大的发展,今后还将有更大的发展。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61页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亲自领导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著名的宣言。这个宣言上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除了谁领导谁这一个问题以外,当作一般的政治纲领来说,这里所说的民权主义,是和我们所说的人民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只许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许为资产阶级所私有的国家制度,如果加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就

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了。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7—1478页

(二) 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1. 中国人学西方迷梦的破灭

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这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

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69—1470页

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1页

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13—1514页

孙先生以大半辈子的光阴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寻找救国真理，结果是失望，转而“以俄为师”，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吗？

显然不是。孙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难的中国人民，一齐被“西方的影响”所激怒，下决心“联俄联共”，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奋斗和拼命，当然不是偶然的。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15页

2. 国际国内条件不允许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

现在的国际环境，从基本上说来，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的环境，是资本主义向下没落，社会主义向上生长的环境。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首先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容许。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现在是一个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打了进来，它是要把中国变成殖民地的；现在是日本在中国发展它的资本主义，却不是什么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现在是日本资产阶级在中国专政，却不是什么中国资产阶级专政。不错，现在是帝国主义最后挣扎的时期，它快要死了，“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但是正因为它快要死了，它就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过活，决不容许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什么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因为日本帝国主义陷在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深坑之中，就是说，它快要死了，它就一定要打中国，一定要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它就断绝了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路。

其次，是社会主义不容许。这个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都是我们的敌人，中国要独立，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

无产阶级的援助。这就是说，不能离开苏联的援助，不能离开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国无产阶级在其本国进行反资本主义斗争的援助。虽然不能说，中国革命的胜利一定要在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国或其中一二国的革命胜利之后，但须加上它们的力量才能胜利，这是没有疑义的。尤其是苏联的援助，是抗战最后胜利决不可少的条件。拒绝苏联的援助，革命就要失败，一九二七年以后反苏运动的教训，不是异常明显的吗？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在这种情形下，要在中国反帝反封建胜利之后，再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岂非是完全的梦呓？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79—680页

如果说，由于特殊条件（资产阶级战胜了希腊的侵略，无产阶级的力量太薄弱），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还有过一个基马尔式的小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土耳其，那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已经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之后，就决不会再有一个土耳其，尤其决不容许有一个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土耳其。由于中国的特殊条件（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性，无产阶级的强大和革命彻底性），中国从来也没有过土耳其的那种便宜事情。一九二七年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分子不是曾经高唱过什么基马尔主义吗？然而中国的基马尔在何处？中国的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又在何处呢？何况所谓基马尔的土耳其，最后也不能不投入英法帝国主义的怀抱，一天一天变成了半殖民地，变成了帝国主义反动世界的一部分。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80—681页

那种旧式的民主,在外国行过,现在已经没落,变成反动的东西了。这种反动的东西,我们万万不能要。中国的顽固派所说的宪政,就是外国的旧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他们口里说要这种宪政,并不是真正要这种宪政,而是借此欺骗人民。他们实际上要的是法西斯主义的一党专政。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确实想要这种宪政,想要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专政,但是他们是要不来的。因为中国人民大家不要这种东西,中国人民不欢迎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来专政。中国的事情是一定要由中国的大多数人作主,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来包办政治,是断乎不许可的。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32页

中国的国家制度不应该是一个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因为这种反人民的制度,已由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的十八年统治证明为完全破产了。……中国也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企图建立一个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因为在中国,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表现得很软弱;另一方面,中国早已产生了一个觉悟了的,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表现了强大能力的,领导了广大的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民主分子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领袖——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新条件。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55页

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惟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1页

3. 在中国走第三条道路的想法只能破产

如果说，在一九四六年，在蒋介石统治下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还有一部分人怀着所谓第三条道路的想法，那末，在现在，这种想法已经破产了。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56—1257页

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要看一看。他们想，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的，看一看再说。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正是这些人，他们对美国存着幻想。他们不愿意将当权的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和不当权的美国人民加以区别。他们容易被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语所欺骗，似乎不经过严重的长期的斗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会和人民的中国讲平等，讲互利。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他们就是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们的欺骗做法在中国还有一层薄薄的基础。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85—1486页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和 新民主主义社会

（一）由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

1. 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的变化，同样地而且还特别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通过了各国内部和中国内部自己的规律性而起的。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3页

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改造我们的学习》（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796页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将世界历史划分为两个时代，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流行了。

《时局问题及其他》（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49页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世界的面目、历史的方向就变了。世界历史几千年以来都在发展着，进步着，但只有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才产生了新的方向。奴隶社会及其以后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人剥削人的社会。十月革命后的新的历史方向，就是取消人剥削人的制度。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9页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比飞机飞得还快。飞机从莫斯科到这里也不止一天吧，但这消息只要一天，即是说，十一月七日俄国发生革命，十一月八日中国就知道了。那个时候，把俄国的革命党叫做过激党。七十多年马克思主义走得那样慢，十月革命以后就走得这样快。因为它走得这样快，所以一九一九年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五四运动以后，很快就晓得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的口号。在这以前，哪个晓得提这样的口号呢？不知道！这样的口号，这样明确的纲领，从中国无产阶级产生了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起，就提出来了。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0—291页

十月革命给世界人民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十月革命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

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这条革命战线是在列宁，而在列宁死后是在斯大林的英明的指导之下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

《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57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0页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0—1471页

四十年前，苏联人民在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作为新世界的开路先锋，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

家。这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四十年来，苏联人民不但在国内进行了辉煌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而且对整个世界的和平和进步事业作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全世界劳动人民从苏联人民的身上看见自己解放和建设人类幸福社会的光明道路。我们中国人民正是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取得今天的胜利和成就的。中国人民一贯把中国革命看作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并且以此为莫大的光荣。

《欢迎、欢送伏罗希洛夫的四次讲话》（一九五七年四月、五月），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27页

苏联人民在四十年前举行的这个伟大的革命，正如革命导师列宁多次指出的，开始了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

历史上发生过各种的革命。但是，过去的任何一次革命，都不能够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相比拟。

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曾经是世界上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十月革命破天荒第一次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这个革命证明：没有了地主和资产阶级，人民完全能够有计划地建设自由幸福的新生活。同时又证明：没有了帝国主义的压迫，世界各民族完全能够和睦共处。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12—313页

世界各国人民从苏联人民所获得的成就中，一天比一天明显地看到自己的将来。苏联的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来，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世界各国的广大人民热烈地庆祝十月革命的四十周年，因为这四十年的历史使他

们确信，无产阶级必然能够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必然能够战胜资本主义，被压迫民族必然能够战胜帝国主义。当然，在人民前面还有困难和曲折。但是，列宁在三十六年前说得好，“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线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14页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最伟大的革命，它开辟了人类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时代。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全世界无产阶级、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彻底解放、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各国人民沿着这条光辉的道路胜利前进。

《毛泽东等祝贺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四周年的电报》（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六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598页

2. 中国革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它在政治上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反对把中国社会造成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它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

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因此，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47页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自从一九一四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

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

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67页

在世界资本主义战线已在地球的一角（这一角占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崩溃，而在其余的角上又已经充分显露其腐朽性的时代，在这些尚存的资本主义部分非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过活的时代，在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建立并宣布它愿意为了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而斗争的时代，在

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一天一天从社会帝国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下面解放出来并宣布他们赞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时代，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这种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经不能当作世界资本主义反革命战线的同盟军，而改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了。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67—668页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一正确的命题，还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提出来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而为当时一切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们所赞成的。不过那时这一理论的意义还没有发挥，以致人们还只是模糊地认识这个问题。

这种“世界革命”，已不是旧的世界革命，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早已完结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而是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同样，这种“一部分”，已经不是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绝大的变化，这是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68—669页

有两种世界革命，第一种是属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范畴

的世界革命。这种世界革命的时期早已过去了，还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之时，尤其是在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时，就告终结了。从此以后，开始了第二种世界革命，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这种革命，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为同盟军。不管被压迫民族中间参加革命的阶级、党派或个人，是何种的阶级、党派或个人，又不管他们意识着这一点与否，他们主观上了解了这一点与否，只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的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71页

这个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其中又分为许多小阶段），其社会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但早已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现在则更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同盟军。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71—672页

3.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

《五四运动》（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58页

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所以具有这种性质，是在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
第699—700页

中国从五四运动起，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五四运动是群众发动的，是群众的队伍在街上公开反对自己的敌人。开始只是觉悟的、先进的学生参加，发展到“六三”时，在上海已经不只是学生，而且有广大的工人、商界参

加，后来，汉口、长沙，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都卷进这个潮流里去了。五四运动有中国最觉悟的分子参加，当时的觉悟分子有陈独秀、李大钊。在五四运动中有左翼、右翼，陈独秀、李大钊是代表左翼的。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共产党，但已经有少数人有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9—290页

4.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转变

从鸦片战争以来，各个革命发展阶段各有若干特点。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共产党出现以前及其以后。然而就其全体看来，无一不是带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这种民主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社会制度，即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的前身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近百年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的社会。

《五四运动》（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59页

革命亦有新旧之分，在某一历史时期是新的东西，在另一历史时期就变为旧的了。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百年中，分为前八十年和后二十年两个大段落。这两大段落中，各有一个基本的带历史性质的特点，即在前八十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属于旧范畴的；而在后二十年，由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便属于新范畴了。旧民主主义——前八十年特点。

新民主主义——后二十年的特点。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96页

从一八四〇年和英国人打仗的鸦片战争起，到一九四五年，已经是一百零五年了。这一百多年中间，有很多很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是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前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当着资产阶级刚刚开始产生，或者稍微长大一点，或者后头更长大一点的时候，当着无产阶级还没有自己的先锋队的时候，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还不高，但是资产阶级有各种优势，它在文化上、经济上、政治经验上都占优势，它有政党，有口号，有自己奋斗的目标。而无产阶级没有这些，它是跟着资产阶级走的。只是近二十几年，无产阶级才有了自己的政党、口号和奋斗目标。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7—288页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革命的性质就起了变化，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产生以后，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三个时期里，中国人民不都是在为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吗？正是这样。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04页

没有十月革命，我们中国会不会有共产党呢？当然中国大批的无产阶级产生了以后，总会产生党的，所以不能说不会产生共产党，但要拖到什么时候才能产生，就不知道了。一九〇三年产生了布尔什维克，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就使

得全世界历史改变了方向。一九二一年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就改变了方向，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改变了方向。我们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政党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觉悟，最有预见，能够看清前途。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97页

（二）革命的领导权

1. 领导权的问题，是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

从广东出发向长江发展的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坚决地执行自己的领导权，被买办豪绅阶级夺取了领导，以反革命代替了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乃遭遇到暂时的失败。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此次失败中，受到很大的打击，中国资产阶级（非买办豪绅阶级）也受了打击。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48页

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经验，表明了当资产阶级追随着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的时候，革命是如何地前进了；及至无产阶级（由共产党负责）在政治上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的时候，革命又是如何地遭到了失败。这种历史不应当重复了。依现时的情况说来，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62页

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已经有三千多年了。直到现在，我国还是半封建的社会，封建关系仍占统治地位。现在我们要把这个社会改变成民主主义社会。在完成这一转变的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无论如何不要放弃领导权。

《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一九四三年八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56页

国民党天天反对我们动员人民，它还千方百计地破坏我们，对这些我们就要斗就要争，其中就包含着争夺领导权。中国几万万农民到底跟谁走？如果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走，中国仍是一个存在剥削和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果跟无产阶级、跟共产党走，就可以由半封建社会进入民主主义社会，由半殖民地变为独立的国家。

《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一九四三年八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58页

2. 资产阶级不能充当中国革命的领导者

同志们！这个问题的正面，已经说完了。让我再来说一说它的反面，那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些分子常常是欺骗民众的好手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们中间除了那些真正拥护人民革命事业的人们而外，有许多人在一个时期内能够以革命的或半革命的面目出现，所以他们同时就具备着欺骗民众的资

格,使得民众不容易认识他们的不彻底性以及装模作样的假相。这就增加了共产党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如果我们否认民族资产阶级在大震动中有动摇及参加革命的可能性,那也就取消了至少也减轻了我们党对于争取领导权的任务。因为,如果民族资产阶级是同地主买办一模一样,以卖国贼的狰狞面孔出现,争取领导权的任务就大可取消,至少也可以减轻了。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47—148页

中国资产阶级虽然在某种历史时机可以参加革命战争,然而由于它的自私自利性和政治上经济上的缺乏独立性,不愿意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彻底胜利的道路。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83页

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缘故。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74页

在中国共产党未产生以前,以孙中山为领导的国民党,曾经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充当过当时中国革命(不彻底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但是,中国共产党一经产生,并且表现

出自己的能力以后，他们就已经不能是中国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了。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一九四八年三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89页

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和所以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规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9页

孙中山主张“唤起民众”，或“扶助农工”。谁去“唤起”和“扶助”呢？孙中山的意思是说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但这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孙中山的四十年革命是失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在帝国主义时代，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到胜利，原因就在此。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9—1480页

我国辛亥革命的时候，无产阶级的数量还很小，还没有自己的政党。那次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跟着资产阶级走。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没有其他阶级、其他政党站在他们的前面，来同他们争夺革命的领导权。那个时候，他们最有生气。他们所办的《民报》、《苏报》、《大江报》，表现得很有朝气，很活跃。辛亥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的政

党走向堕落。正如孙中山说的：“革命功成，革命党消。”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立即积极参加民主革命，站在民主革命的前头。无产阶级代替资产阶级的地位，无产阶级政党代替资产阶级政党的地位，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的国民党没有办法，到了一九二四年只好找共产党合作。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第89页

3. 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达到胜利

（参见第八编“关于党的建设”，第1853—1865页）

4.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实现对革命领导权的条件

无产阶级怎样经过它的政党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呢？首先，是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例如我们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这样的基本口号，又提出了“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的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没有这种具体目标，是无所谓政治领导的。第二，是按照这种具体目标在全国行动起来时，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应该提起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共和国的一切任务而奋斗时，共产党员应该作到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会情况，依靠群众的多数，得到群众的拥护。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

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共产党对于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就是由执行上述这些条件去实现的。这些条件是保证自己的政治领导的基础，也就是使革命获得彻底的胜利而不被同盟者的动摇性所破坏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62—263页

从资产阶级占优势到无产阶级占优势，这是一个斗争的长过程，争取领导权的过程，依靠着共产党对无产阶级觉悟程度组织程度的提高，对农民、对城市小资产阶级觉悟程度组织程度的提高。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6页

领导权不是向人能要来的，更不是强迫就能实现的，而是要在实际利益上、在群众的政治经验上，使群众懂得哪一个党好，跟哪一个党走他们才有出路，这样来实现的。

《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一九四三年八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59页

关于革命统一战线中领导者同被领导者的关系问题，共产党要实现领导需要两个条件：第一要率领被领导者坚决同敌人作斗争，第二要给被领导者以物质福利和政治教育。

《在杨家沟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332页

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

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73页

（三）革命的性质和前途

1. 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经过民主主义到达社会主义

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中国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纲领，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的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

《井冈山的斗争》（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77页

我们的斗争目的是要从民权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我们的任务第一步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发动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政权，完成民权主义革命。由这种斗争的发展，跟着就要执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这些伟大的革命任务的完成不是简单容易的，它全靠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

《反对本本主义》（一九三〇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5页

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59页

关于民主共和国的性质和前途的问题，许多同志已提出来了。我们的答复是：其阶级性是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其前途可能是走向社会主义。我们的民主共和国，是在执行民族抗战任务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是在国际新环境之下（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世界革命新时期的前夜）建立起来的。因此，按照社会经济条件，它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但是按照具体的政治条件，它应该是一个工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盟的国家，而不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因此，它的前途虽仍然有走上资本主义方向的可能，但是同时又有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的可能，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力争这后一个前途。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63—264页

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义者不相同的。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

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6页

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我们反对尾巴主义，但又反对冒险主义和急性病。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6页

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

《五四运动》（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59页

中国将来一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这样一个定律谁都不能推翻。但是我们在目前的阶段上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是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改变中国现在的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建立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

《青年运动的方向》（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63页

中国革命，有两篇文章，上篇和下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道，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这是文章的上篇，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一篇文章，并且一定要做好这一篇文章。但是，文章还有一篇，就是它的下篇，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篇文章，我们也是一定要做的，并且也一定要做好的。目前是民族民主革命，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可能性是会要变为现实性的。不过，文章的上篇如果不做好，下篇是没有法子着手做的。

《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43—244页

中国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程。这个过程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发生的，在中国则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的社会必须经过这个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去，否则是不可能的。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47页

既然在现阶段上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一般的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而中国革命又是处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的新的国际环境中，即处在社会主义向上高涨、资本主义向下低落的国际环境中，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革命的时代，那末，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也就没有疑问了。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50页

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为此而奋斗，绝对不能半途而废。有些幼稚的共产党员，以为我们只有在现在阶段的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没

有在将来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或者以为现在的革命或土地革命即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应该着重指出，这些观点是错误的。每个共产党员须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51—652页

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65页

很清楚的，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现时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66页

没有问题，现在的革命是第一步，将来要发展到第二步，发展到社会主义。中国也只有进到社会主义时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时代。但是现在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中国现在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83—684页

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最后解放，只能在社会主义实现的时代，中国工人阶级必须为此最后目的而奋斗。但是必须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阶段，才能进到社会主义的阶段。

《〈中国工人〉发刊词》（一九四〇年二月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27页

2. 革命第一阶段的性质是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十分明显的。只有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才瞎说中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次革命没有完成，而是失败了。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领导的土地革命，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因为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并不是反资本主义。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中的革命

还是如此。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60页

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我们现在干的是什么革命呢?我们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现在还不应该破坏一般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制,要破坏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就叫做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但是这个革命,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完成,必须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这个革命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这种人民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共和国。它比起现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来是不相同的,它跟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相同。

《青年运动的方向》(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62—563页

既然中国社会还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既然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的还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既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为了推翻这两个主要敌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推翻这两个敌人的革命,有时还有资产阶级参加,即使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敌人,革命的锋芒也不是向着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是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既然如此,所以,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46—647页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它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也和社会主义的革命不相同，它只推翻帝国主义和汉奸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而不破坏任何尚能参加反帝反封建的资本主义成分。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孙中山在一九二四年所主张的三民主义的革命在基本上是一致的。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48页

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这种革命，在其进行中，因为敌情和同盟军的变化，又分为若干的阶段，然而其基本性质是没有变化的。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68页

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

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72页

为什么把目前时代的革命叫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就是说，这个革命的对象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而是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这个革命的措施，不是一般地废除私有财产，而是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这个革命的结果，将使工人阶级有可能聚集力量因而引导中国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使资本主义获得适当的发展。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74页

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所谓人民大众，是指一切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所压迫、损害或限制的人们，也即是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上明确地指出的工、农、兵、学、商和其他一切爱国人士。在宣言上所说的“学”，即是指一切受迫害、受限制的知识分子。所说的“商”，即是指一切受迫害、受限制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中小资产阶级。所说的“其他爱国人士”，则主要地是指的开明绅士。现阶段的中国革命，即是由这些人们团结起来，组成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而又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革命。所谓劳动人民，是指一切体力劳动者（如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等）以及和体力劳动者相近的、不剥削人而又受人剥削的脑力劳动者。中国现阶段革命的目的，是

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一九四八年三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87—1288页

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是主要的敌人和主要的革命者两方面。我们今天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我们今天同敌人作斗争的主要力量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一切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人民。这就决定了我们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而不同于十月革命那样的社会主义革命。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一九四八年三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88页

3. “一次革命论”是错误的和有害的

有些恶意的宣传家，故意混淆这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提倡所谓“一次革命论”，用以证明什么革命都包举在三民主义里面了，共产主义就失了存在的理由；用这种“理论”，起劲地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反对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其目的，是想根本消灭任何革命，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性，反对抗日的彻底性，而为投降日寇准备舆论。……

但是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似乎并无恶意，也迷惑于所谓“一次革命论”，迷惑于所谓“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纯主观的想头；而不知革命有阶段之分，只能由一个革命到另一个革命，无所谓“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观点，混淆

革命的步骤，降低对于当前任务的努力，也是很有害的。如果说，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是正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论。如果说，民主革命没有自己的一定任务，没有自己的一定时间，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个时间去完成的另一任务，例如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到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这个叫做“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而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84—685页

说也奇怪，有些中国资产阶级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而要转弯抹角地来说这个问题。另外有些人，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而说什么一下就可以到达社会主义社会，什么要将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毕其功于一役”。很明显地，这类现象，有些是反映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有些则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民众的欺骗手段。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60页

过去有一种说法，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说法，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是不对的；……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3—114页

（四）革命的对象和动力

1. 决定中国革命对象和动力的根据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在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页

既然中国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既然中国革命所反对的对象主要的是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和内部的封建主义，既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推翻这两个压迫者，那末，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中，有些什么阶级有些什么阶层可以充当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力量呢？这就是现阶段上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认清这个革命的动力问题，才能正确地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策略问题。

现阶段的中国社会里，有些什么阶级呢？有地主阶级，有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上层部分都是中国社会的统治阶级。又有无产阶级，有农民阶级，有农民以外的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在今天中国的最广大的领土上，还

是被统治阶级。

所有这些阶级，它们对于中国革命的态度和立场如何，全依它们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来决定。所以，社会经济的性质，不仅规定了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又规定了革命的动力。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37—638页

依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反对人民民主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少数右翼分子，他们也是革命的敌人；依附劳动人民反对反动派的民族资产阶级左翼分子以及从封建阶级分裂出来的少数开明绅士，他们也是革命者。但是这两者都不是敌人或革命者的主体，两者都不是可以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一九四八年三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88页

2. 革命的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4页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

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9页

中国的革命，它反对的是什么东西？革命的对象是什么呢？大家知道，一个是帝国主义，一个是封建主义。现在的革命对象是什么？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再一个是汉奸。

《青年运动的方向》（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62页

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那末，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究竟是谁呢？

不是别的，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因为，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中，压迫和阻止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它们二者。二者互相勾结以压迫中国人民，而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的压迫，因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

在日本武力侵入中国以后，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勾结日本公开投降或准备投降的一切汉奸和反动派。

中国资产阶级本来也是受着帝国主义压迫的，它也曾经领导过革命斗争，起过主要的领导作用，例如辛亥革命；也曾经参加过革命斗争，例如北伐战争和当前的抗日战争。但是，这个资产阶级的上层部分，即以国民党反动集团为代表的那个阶层，它曾经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这一个长时期内勾结帝国主义，并和地主阶级结成反动的同盟，背叛了曾经援助过它

的朋友——共产党、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背叛了中国革命，造成了革命的失败。所以，当时革命的人民和革命的政党（共产党），曾经不得不把这些资产阶级分子当作革命的对象之一。在抗日战争中，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以汪精卫为代表，已经叛变，已经变成汉奸。所以，抗日的人民，也已经不得不把这些背叛民族利益的大资产阶级分子当作革命的对象之一。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33—634页

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的社会基础，是用封建制度剥削和压迫农民的阶级，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

因此，作为阶级来说，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对象，不是革命的动力。

在抗日战争中，一部分大地主跟着一部分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已经投降日寇，变为汉奸了；另一部分大地主，跟着另一部分大资产阶级（顽固派），虽然还留在抗战营垒内，亦已非常动摇。但是许多中小地主出身的开明绅士即带有若干资本主义色彩的地主们，还有抗日的积极性，还需要团结他们一道抗日。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38—639页

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他们和农村中的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中国革命史上，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

级历来不是中国革命的动力，而是中国革命的对象。

……

在抗日战争中，亲日派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已经投降，或准备投降了。欧美派大资产阶级（顽固派）虽然尚留在抗日阵营内，也是非常动摇，他们就是一面抗日一面反共的两面派人物。我们对于大资产阶级投降派的政策是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坚决地打倒他们。而对于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则是用革命的两面政策去对待，即：一方面是联合他们，因为他们还在抗日，还应该利用他们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又一方面是和他們作坚决的斗争，因为他们执行着破坏抗日和团结的反共反人民的高压政策，没有斗争就会危害抗日和团结。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39页

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54页

3. 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9页

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反抗的。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一九二七年至现在的土地革命，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反日浪潮，证明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

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44页

革命的动力，基本上依然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现在则可能增加一个民族资产阶级。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60页

中国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一定的社会势力。这种社会势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就是革命的工、农、兵、学、商，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如果离开了这种根本的革命力量，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

《五四运动》(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59页

革命是什么人去干呢？革命的主体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老百姓。革命的动力，有无产阶级，有农民阶级，还有其他阶级中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人，他们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但是这许多人中间，什么人根本的力量，是革命的骨干呢？就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

《青年运动的方向》(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62页

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

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从这一方面说来，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之一。在中国革命史上，他们也曾经表现过一定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积极性。

但是又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这种情形，特别是在民众革命力量强大起来的时候，表现得最为明显。

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他们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而在另一时期，就有跟在买办大资产阶级后面，作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

在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主要的是中等资产阶级，他们虽然在一九二七年以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前，跟随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对过革命，但是他们基本上还没有掌握过政权，而受当政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所限制。在抗日时期内，他们不但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派有区别，而且和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也有区别，至今仍然是我们的较好的同盟者。因此，对于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慎重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的。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39—640页

我们现在就来分析一下各种类型的没有把农民包括在内的小资产阶级。

第一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

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数十年来，中国已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在这一群人中间，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辛亥革命前的留学生运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运动，就是显明的例证。尤其是广大的比较贫苦的知识分子，能够和工农一道，参加和拥护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大的传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但是，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

第二是小商人。他们一般不雇店员，或者只雇少数店员，开设小规模的小商店。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和高利贷者的剥削，使他们处在破产的威胁中。

第三是手工业者。这是一个广大的群众。他们自有生产手

段,不雇工,或者只雇一二个学徒或助手。他们的地位类似中农。

第四是自由职业者。有各种业务的自由职业者,医生即是其中之一。他们不剥削别人,或对别人只有轻微的剥削。他们的地位类似手工业者。

上述各项小资产阶级成分,构成广大的人群,他们一般地能够参加和拥护革命,是革命的很好的同盟者,故必须争取和保护之。其缺点是有些人容易受资产阶级的影响,故必须注意在他们中进行革命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41—642页

农民在全国总人口中大约占百分之八十,是现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

农民的內部是在激烈地分化的过程中。

第一是富农。富农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五左右(连地主一起共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十左右),被称为农村的资产阶级。中国的富农大多有一部分土地出租,又放高利贷,对于雇农的剥削也很残酷,带有半封建性。但富农一般都自己参加劳动,在这点上它又是农民的一部分。富农的生产在一定时期中还是有益的。富农一般地在农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可能参加一分力量,在反对地主的土地革命斗争中也可能保持中立。因此,我们不应把富农看成和地主无分别的阶级,不应过早地采取消灭富农的政策。

第二是中农。中农在中国农村人口中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中农一般地不剥削别人,在经济上能自给自足(但在年成丰收时能有些许盈余,有时也利用一点雇佣劳动或放一点小债),而受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剥削。中农都是没有政治

权利的。一部分中农土地不足，只有一部分中农（富裕中农）土地略有多余。中农不但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革命和土地革命，并且能够接受社会主义。因此，全部中农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是重要的革命动力的一部分。中农态度的向背是决定革命胜负的一个因素，尤其在土地革命之后，中农成了农村中的大多数的时候是如此。

第三是贫农。中国的贫农，连同雇农在内，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贫农是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贫农和中农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而无产阶级也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到达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农民这个名称所包括的内容，主要地是指贫农和中农。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42—644页

中国无产阶级除了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有它的许多特出的优点。

.....

因此，虽然中国无产阶级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例如人数较少（和农民比较），年龄较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较），文化水准较低（和资产阶级比较）；然而，他们终究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44—645页

(五) 革命的纲领、路线和任务、目的

1.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在几十年中，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是不变的。但是在这个大阶段的各个小的阶段中，情形是变化了和变化着的，我们的具体纲领便不能不有所改变，这是当然的事情。例如，在北伐战争时期，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并没有变化，但其具体纲领，三个时期中是有了变化的，这是因为我们的敌军和友军在三个时期中发生了变化的缘故。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1062—1063页

我们党的七大应该决定一条什么路线呢？一条什么政治路线呢？怎么样决定才好呢？我们想，应该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党的路线，我们党的政治路线。这里所说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就是组织我们的队伍。组织队伍干什么呢？不干别的，就是要打倒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打败以后，得来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得到全国的解放，全国人民的解放，建立一个新中国，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中国。这就是我们的总路线。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03—304页

我们的路线，我们的纲领，拿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是什么性质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因此，我们的政治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我们的经济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经济，我们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总之当前的各个革命任务，都是这样一种性质，各个革命力量都是这样一种性质。这条路线里面有一个队伍问题，有一个敌人问题，还有一个队伍的领导者、指挥官问题。这个队伍就是人民大众，这个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个领导者、指挥官就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什么呢？领导人民大众。领导人民大众干什么呢？干反帝反封建。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04页

我们的方针，我们的路线，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在这条方针里面：“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就是说的组织队伍；“在我党的领导下”，就是说的总司令、指挥官；“打败日本侵略者”，就是说的敌人；“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就是说的目标。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76页

本军是中国人民的军队，一切以中国人民的意志为意志。本

军的政策，代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主要的有如下各项：

一、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二、逮捕、审判和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內战罪犯。

三、废除蒋介石统治的独裁制度，实行人民民主制度，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自由。

四、废除蒋介石统治的腐败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

五、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兄弟等四大家族和其他首要战犯的财产，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改善职工生活，救济灾民贫民。

六、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

七、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

八、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否认内战期间蒋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债。要求美国政府撤退其威胁中国独立的驻华军队，反对任何外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和使日本侵略势力复兴。同外国订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条约。联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上述各项，就是本军的基本政策。本军所到之处，立即实施这些政策。这些政策是适合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的要求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37—1238页

全党同志必须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

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说，这个革命不能由任何别的阶级和任何别的政党充当领导者，只能和必须由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充当领导者。这就是说，由参加这个革命的人们所组成的统一战线是十分广大的，这里包括了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地主阶级分裂出来的一部分开明绅士，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民大众。由这个人民大众所建立的国家和政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各民主阶级联盟的民主联合政府。这个革命所要推翻的敌人，只是和必须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些敌人的集中表现，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13页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16—1317页

2.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和目标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和社会

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页

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内容，依国际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48页

既然现阶段上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那末，现阶段上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什么呢？

毫无疑问，主要地就是打击这两个敌人，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

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是互相关联的。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能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因为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反之，因为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而农民则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如果不帮助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就不能组成中国革命的强大的队伍而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所以，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这样两个基本任务，是互相区别，又是互相统一的。

中国今天的民族革命任务，主要地是反对侵入国土的日本帝国主义，而民主革命任务，又是为了争取战争胜利所必须完成的，两个革命任务已经联系在一起了。那种把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革命阶段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36—637页

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

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

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已经在苏联兴盛起来，并且还要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无疑将成为一切工业先进国家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统治形式；但是那种共和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75页

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老资本主义，而是新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10页

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

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就是这一个！这就是我们大会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全党的任务，这就是全中国人民的任务。

《两个中国之命运》（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26页

中国现阶段的人民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改变旧的社会经济形态、旧的生产关系以及竖立在其上面的一切社会的、政治的、精神的旧的建筑物，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生产关系以及竖立在其上面的一切社会的、政治的、精神的新的建筑物。我们的基本任务，就是如此。

《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58页

中国现阶段革命的目的，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一九四八年三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87—1288页

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的因素，而总的说来是新民主主义的。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一九四八年九月），《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45页

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

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

《将革命进行到底》（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75页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长时期内是反帝反封建。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又提出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3页

3.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政治、军事的力量，是为着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目的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经济是政治、军事的基础，政治、军事是上层建筑。地基是经济，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经济。政治、军事之所以放在第一，是因为如果

没有它们，生产力得不到解放，就没有可能谈其他问题。文化是反映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但它同时又能指导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09—110页

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54页

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就给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目的。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16页

革命是为建设扫清道路。革命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以改变，把经济制度加以改变，把政府、意识形态、法律、政治、文化、艺术这些上层建筑加以改变，但目的不在于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一个新的生产关系，而在于发展生产。

《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82页

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

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第 170 页

（六）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1. 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

新的民主共和国所包括的成分是什么呢？它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一切国内同意民族和民主革命分子，它是这些阶级的民族和民主革命的联盟。这里的特点是包括了资产阶级，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在今天的环境下，又有重新参加抗日的可能，所以无产阶级政党不应该拒绝他们，而应该招致他们，恢复和他们共同斗争的联盟，以利于中国革命的前进。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60 页

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我们现在虽有中华民国之名，尚无中华民国之实，循名责实，这就是今天的工作。

这就是革命的中国、抗日的中国所应该建立和决不可不建立的内部政治关系，这就是今天“建国”工作的惟一正确的方向。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77页

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

……社会主义的民主怎么样呢？这自然是很好的，全世界将来都要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但是这种民主，在现在的中国，还行不通，因此我们也只得暂时不要它。到了将来，有了一定的条件之后，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现在，我们中国需要的民主政治，既非旧式的民主，又还非社会主义的民主，而是合乎现在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目前准备实行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32—733页

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并且主张在推翻和废止这些之后不是建立一个旧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而是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56页

毫无疑问，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

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62页

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62页

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所谓人民大众，是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压迫和损害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以工人、农民（兵士主要是穿军服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这个人民大众组成自己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立代表国家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于人民大众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领导。这个人民共和国及其政府所要反对的敌人，是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72页

2. 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参见第三编“关于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第754—757页)

(七)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1.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

总起来说，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 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 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 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而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55—1256页

我们的社会经济呢？有人说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国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上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国营经济，在数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一九四八年九月)，《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39页

新中国的经济构成，首先是国营经济，第二是由个体向集体发展的农业经济，第三是私人经济，国营经济是领导成分。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一九四八年九月），《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40页

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3页

2.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

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53页

在中国建立这样的共和国，它在政治上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在经济上也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

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这也是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庄严的声明，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的

方针。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

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正确的口号，就是“耕者有其田”。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

这就是革命的中国、抗日的中国应该建立和必然要建立的内部经济关系。

这样的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这种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集中的表现。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
第678—679页

新民主主义的主要经济特征是土地革命。

《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83页

我们坚信,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私人资本,在战后的中国都应给予充分发展的机会,因为中国需要发展工业。在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商业关系方面,我们要以同一切国家进行自由平等贸易的政策,来代替日本把中国沦为殖民地的政策。在国内,我们要以在解放区已经实行的促进人民生产力发展、提高购买力、尽快为现代工业稳定发展创造先决条件的政策,来代替国民党政府降低人民生活水平从而阻碍国内工业发展的政策。

……凡是能够操纵国民生计的关键产业如铁路、矿山等,最好由国家开发经营,其他产业可以让私人资本来发展。为了开发利用手工业及农村小工厂的巨大潜力,我们必须依靠强大的用民主方式管理的合作社。

《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86页

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束缚着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破坏着广大人民的财产。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和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

按照孙先生的原则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在现阶段上,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而这个国家经营的所谓国家,一定要不是“少数人所得而

私”的国家，一定要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1058页

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1060页

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1060—1061页

所谓一般的资产阶级，就是指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就是中小资产阶级。孙中山讲过的“操纵国民之生计”的特殊的资产阶级，则不在其内。将来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在大城市里也要没收操纵国民生计的财产，没收汉奸的财产（这一点，我在报告里已经讲过了）。我们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没收这些财

产为国家所有的。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22页

中国也要发展资本主义。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什么性质？前边说过，世界上的资本主义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反动的法西斯资本主义，一部分是民主的资本主义。反动的法西斯资本主义主要的已经打垮了。民主的资本主义比法西斯资本主义进步些，但它仍然是压迫殖民地，压迫本国人民，仍然是帝国主义。它一方面打德国，一方面又压迫人民，打法西斯是好的，压迫人民是不好的。在它打法西斯的时候，对它的压迫人民要忍一口气。蒋介石也是这样，他打日本是好的，压迫人民是不好的，在他还打日本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忍一口气，不提打倒蒋介石。蒋介石搞的是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资本主义。我们提倡的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还有革命性。从整个世界来说，资本主义是向下的，但一部分资本主义在反法西斯时还有用，另一部分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将来还有用，在中国及欧洲、南美的一些农业国家中还有用，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84—385页

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作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对于那些查明确实是由国民党中央政府、省政府、县市政府经营的，即完全官办的工商业，应该确定归民主政府接管营业的原则。但如民主政府一时来不及

接管或一时尚无能力接管,则应该暂时委托原管理人负责管理,照常开业,直至民主政府派人接管时为止。对于这些工商业,应该组织工人和技师参加管理,并且信任他们的管理能力。如国民党人已逃跑,企业处于停歇状态,则应该由工人和技师选出代表,组织管理委员会管理,然后由民主政府委任经理和厂长,同工人一起加以管理。对于著名的国民党大官僚所经营的企业,应该按照上述原则和办法处理。对于小官僚和地主所办的工商业,则不在没收之列。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严禁侵犯。

《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一九四八年四月八日),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23—1324页

写《新民主主义论》时,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的区别在我们脑子里尚不明晰。大工业、大银行、大商业,不管是不是官僚资本,全国胜利后一定时期内都是要没收的,这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原则。而只要一没收,它们就属于社会主义部分。我们国家银行的资本,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社会主义性质这种话应该讲,但整个国民经济还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即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之下的经济体系。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一九四八年九月),《毛

泽东文集》第5卷第140—141页

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凡属私人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农场、牧场等,一律保护,不受侵犯。希望各业员工照常生产,各行商店照常营业。

《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

集》第2版第4卷第1457页

没收官僚资本。凡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经营

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铁路、邮政、电报、电灯、电话、自来水和农场、牧场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

《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57页

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9页

3. 欢迎外国投资，发展对外贸易

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中国过去未能利用外国资本使中国人真正得到好处，外国资本给群众带来很少好处，或者根本没有好处。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也只有自由的中国，由于生产性经济的广泛发展，才能够偿还这种外国投资的本金和利息。

合法的外债将得到承认。凡是为建设目的和用于建设的外债，我们都将认为是合法的。我们将不承认任何“政治借款”，也不承认任何用于打内战、打红军或其用途违背整个中国人民利益的借款。我们将承认用于建设铁路、电讯、无线电、航空线，发展工业或农业，救济灾荒等等的借款。

《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一九三六年七月、九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93—394页

国民党将其外债主要用于进行军阀内战或打红军，或者把钱浪费在其他愚蠢的行动上。它的借款给中国的政治主权造成更大的损失。人民政府如果建立起来，外国借款和外国投资应就只能被用来发展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基本生产能力——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基础工业和引进科学的农业方法和农业组织。同南京的政策相反，对影响中国独立政治权利的外国投资，一概不予承认。

《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一九三六年七月、九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94页

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对于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是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与近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纳量将是非常广大的。一个政治上倒退与经济上贫困的中国，则不但对于中国人民非常不利，对于外国人民也是不利的。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336页

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5页

4. 主张由封建经济直接进到社会主义的民粹主义是错误的和反动的

在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中国其他地区，仍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农民被土地束缚着，没有自由，彼此很少往来，过着愚昧落后的生活。这种经济是中国古代封建主义和独裁专制的基础。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可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

因此，工业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只有工业社会才能是充分民主的社会。但为了发展工业，必须首先解决土地问题。没有一场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革命，就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西方国家许多年前的发展已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我国到一九三七年为止的国内战争时期的土地革命，其性质与西方一些先进国家过去所进行的土地革命基本上相同，土地革命扫除了封建障碍，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83—184页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

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

《给秦邦宪的信》（一九四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07页

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就将我们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

《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75页

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22—323页

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只要农业来搞什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但不能由此产生误解。将来在社会主义体系中农业也要社会化。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一九四八年九月），《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39页

（八）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参见第六编“关于思想宣传工作和文化工作”，第 1551—1570 页，第 1579—1593 页）

五、民主革命中的农民和土地问题

（一）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1. 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7页

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8页

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8页

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革命，但有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

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

《工农商学联合的问题》(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第21期

斯大林说：“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这就是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现在是“上山主义”的时候，大家开会、办事、上课、出报、著书、演剧，都在山头上，实质上都是为的农民。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说“实质上”，就是说基本上，并非忽视其他部分，这是斯大林自己解释过了的。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92页

2. 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

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内中表现得最特别的尤在政治争斗这一点，这一点与都市工人运动的性质颇有点不同。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

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0—41页

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2—13页

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惟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连两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4页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说：“这是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事，虽则是糟。”总而言之，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糟”字。实在呢，如前所说，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页

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16页

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6页

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7页

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7页

3. 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无产阶级必须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

买办阶级集中的区域，全国不过香港、广州、上海、汉口、天津、大连等沿海沿江数处，不若地主阶级之领域在整个的中

国各省各县各乡。政治上全国大小军阀都是地主阶级（破产的小地主不在内）挑选出来的首领，这班封建地主首领即封建军阀利用城市买办阶级以拉拢帝国主义，名义上实际上都是军阀做主体，而买办阶级为其从属。财政上军阀政府每年几万万万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间接从地主阶级驯制下之农民身上括得来，买办阶级如银行公会等对北京政府有条件的借债，究竟比较甚少。故我总觉得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基此理由，我们的同志于组织工人组织学生组织中小商人许多工作以外，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要立刻下了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要立刻下了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8—39页

中国农民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是愿意积极地参加革命战争，并愿意使战争得到彻底胜利的。他们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然而他们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

制（一部分失业群众则具有无政府思想），所以他们不能成为战争的正确的领导者。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183页

哪些人们是革命民主派呢？除了无产阶级是最彻底的革命民主派之外，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农民的绝对大多数，就是说，除开那些带上了封建尾巴的富农之外，无不积极地要求“耕者有其田”。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1075页

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

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大量的工业品。

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他们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敌。

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

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1077—1078页

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靠几个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分子，虽然也可以抵一下，但是没有农民，谁来给饭吃呢？饭没得吃，兵也没有，就抵不过两三天。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05页

如果中国共产党在十年至二十年之内，同农民有正确关系，那就可以保证中国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如若不然，我们就要忍受二十年至四十年的白色恐怖。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如果同农民关系搞不好，那就会灭亡。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00—401页

现在我们有一百万军队，将来要有几百万军队，我们能否胜利，就看我们能否团结中国的三万万六千万农民，实质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容易经常动摇的，决心是不容易下的，所以我们就要坚持这个原则，经常说服我们的同志，一次说服不了，二次再说，要经常讲。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03页

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来得及将农民中的上层和中层造成资本主义化，但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却在几

十年中将大多数农民造成了一支半无产阶级的革命军,就是说,替无产阶级造成了一支最伟大最可靠最坚决的同盟军。

《读〈三国志集解〉批语》(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七日),《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47—148页

(二) 土地改革在民主革命中的意义和作用

1. 彻底消灭封建和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

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有:(一)使农民得解放。废除地主及一切压迫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实为本题的主要意义。(二)土地问题不解决,经济落后的国家不能增加生产力,不能解决农民的生活痛苦,不能改良土地。据俄同志调查,我国土地生产力日见衰落,全国生产力已到了一个大危机,此危机不解决,必起绝大的饥荒。土地问题不解决,农民无力改良土地,生产必至日减。故第二个意义为增加生产。(三)保护革命。革命势力目前虽见发展,但亦即到了一个危机,此后非有一支生力军必归失败。要增加生力军保护革命,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其作用,在解决土地问题后即能够解决财政问题及兵士问题。兵士能否永久参加革命,亦即在土地问题解决,因农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勇敢作战。这三点是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意义。

《在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3页

现在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可再加三项：（一）废除封建制；（二）发展中国工业；（三）提高文化。

《在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3页

中国的苏维埃与红军，是从土地革命中生长与发展起来的，广大的农民群众在地主阶级与国民党军阀的残酷压迫剥削之下，只有土地革命才能解放他们，苏维埃土地政策的原则，就在于完全推翻地主阶级与国民党军阀一切封建与半封建的剥削与压迫。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红色中华》二苏大特刊第3期

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同盟者及其统治的基础。因此，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13—1314页

2. 实行土地改革是支持长期革命战争达到全国胜利的基本条件

我们现在是处在农村中，土地问题的正确解决，是支持长期战争的重大关节，希望大家十分注意。

《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40页

坚持土地改革不至于吓跑民族资本家，但不坚持土地改革势必会丧失农民，从而丧失革命战争，也丧失民族资本家。

《在小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68页

在一切新老解放区必须坚决实行土地改革（这是支持长期战争取得全国胜利的最基本条件），发展生产，厉行节约，加强军事工业的建设，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只有这样做，才能支持长期战争，取得全国胜利。果然这样做了，就一定可以支持长期战争，取得全国胜利。

《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33页

全党必须明白，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52页

3. 土地改革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创造基本条件

“耕者有其田”，是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从而造成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因此，“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主张，并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主张，是一切革命民主派的主张，并不单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主张。所不同的，在中国条件下，只有我们共产党人把这项主张看得特别认真，不但口讲，而且实做。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1074—1075页

我们这次会议议题众多,中心的议题是将旧有土地制度加以改革的问题。大家同意刘少奇副主席的报告及中共中央建议的土地改革法草案,并对土地改革法草案作了若干有益的修改和补充。这是很好的,我为新中国数万万农村人民获得翻身机会和国家获得工业化的基本条件而表示高兴,表示庆贺。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所以工人阶级应当积极地帮助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应当赞助这种改革,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更应当采取这种态度。

《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四日、二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79—80页

(三) 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1. 土地改革总路线的基本内容

土地斗争的阶级路线,是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削弱富农,与消灭地主。这一路线的正确应用,是保证土地斗争胜利发展的关键,是苏维埃每一对于农村的具体政策的基础。因此苏维埃政府对于那些侵犯中农(主要是侵犯富裕中农)及消灭富农的错误倾向,是应该严厉的给予制裁,同时决不应该放松对于那些同地主富农图谋妥协的错误,只有反对这一切的错误,土地斗争才能走上正确的轨道。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红色中华》二苏大特刊第3期

为着坚决地彻底地进行土地改革，乡村中不但必须组织包括雇农贫农中农在内的最广泛群众性的农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而且必须首先组织包括贫农雇农群众的贫农团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以为执行土地改革的合法机关，而贫农团则应当成为一切农村斗争的领导骨干。我们的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50页

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土地改革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只能和必须是贫农。这个贫农阶层，和雇农在一起，占了中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土地改革的主要的和直接的任务，就是满足贫雇农群众的要求。土地改革必须团结中农，贫雇农必须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中农结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不这样做，贫雇农就会陷于孤立，土地改革就会失败。土地改革的一个任务，是满足某些中农的要求。必须容许一部分中农保有比较一般贫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量。……土地改革的对象，只是和必须是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剥削制度，不能侵犯民族资产阶级，也不要侵犯地主富农所经营的工商业，特别注意不要侵犯没有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中农、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和新式富农。土地改革的目的是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即消灭封建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因此，对地主必须分给和农民同样的土地

财产，并使他们学会劳动生产，参加国民经济生活的行列。……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应当是有步骤的，即是说，有策略的。必须依据环境所许可的情况，农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决定发动斗争的策略，不要企图在一个早上消灭全部的封建剥削制度。土地改革的总的打击面，根据中国农村封建剥削制度的实际情况，一般地不能超过农村户数百分之八左右，人数百分之十左右。而在老的和半老的解放区内，此项数目还要减少。离开实际情况，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是危险的。在新区，还必须分地区，分阶段。……发展农业生产，是土地改革的直接目的。只有消灭封建制度，才能取得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就给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目的。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14—1316页

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17页

2. 依靠贫雇农，巩固地联合中农

在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全部过程中，必须坚决联合中农，绝对不许侵犯中农利益（包括富裕中农在内），如有侵犯中农利益的事，必须赔偿道歉。

《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16页

土地改革中，中农表现赞成平分，这是因为平分并不损害中农利益。在平时，中农中一部分土地不变动，一部分增加了土地，只有一部分富裕中农有少数多余的土地，他们也愿意拿出来平分，这是因为在平分后他们的土地税的负担也减轻了。虽然如此，各地在平分土地时，仍须注意中农的意见，如果中农不同意，则应向中农让步。在没收分配封建阶级的土地财产时应当注意某些中农的需要。在划分阶级成分时，必须注意不要把本来是中农成分的人，错误地划到富农圈子里去。在农会委员会中，在政府中，必须吸收中农积极分子参加工作。在土地税和支援战争的负担上，必须采取公平合理的原则。这些，就是我党在执行巩固地联合中农这一战略任务时所必须采取的具体政策。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51—1252页

在土地问题上反“左”主要是反对对中农的冒险政策，哪怕只发生一户中农被错当作地主来整，我们也必须十分注意纠正。在农村中按户数计算，地主、富农只占百分之八左右，中农、贫农、雇农合占百分之九十，这个阵线不能混乱，许多同志对此没有确定的观念。

《在杨家沟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331页

必须将贫雇农的利益和贫农团的带头作用，放在第一位。我党必须经过贫雇农发动土地改革，必须使贫雇农在农会中在乡村政权中起带头作用，这种带头作用即是团结中农和自己一道行动，而不是抛弃中农由贫雇农包办一切。在老解放区中农占多数贫雇农占少数的地方，中农的地位尤为重要。“贫雇农打江

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68页

必须避免对中农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对中农和其他阶层订错了成分的，应一律改正，分了的東西应尽可能退还。在农民代表中、农民委员会中排斥中农的倾向和在土地改革斗争中将贫雇农同中农对立起来的倾向，必须纠正。有剥削收入的农民，其剥削收入占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五（四分之一）以下者，应订为中农，以上者为富农。富裕中农的土地不得本人同意不能平分。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69页

共产党要领导中农，必须率领中农和自己一道向封建阶级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消灭地主武装，平分地主土地）。如果没有坚决的斗争，或虽有斗争而没有胜利，中农就会动摇。再则，必须以地主土地财产的一部分分配给中农中的较贫困者，对于富裕中农则不要损害其利益。在农会中和乡区政府中，必须吸收中农积极分子参加工作，并须在数量上做适当规定（例如占委员的三分之一）。不要订错中农的成分，对中农的土地税和战争勤务要公道。同时，还要给中农以政治教育。如果没有这些，我们就要丧失中农的拥护。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73页

3. 有区别地对待各种地主、富农；地主作为一个阶级要消灭，作为个人要保护

富农与地主有分别，富农自己劳动，地主自己不劳动，

所以对地主取消灭的政策，对富农则取削弱的政策。因此消灭富农的倾向是错误的，同时不应该把富农成分当做地主待遇。

《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一九三三年六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69—270页

在农村中，一方面应坚定地解决土地问题，紧紧依靠雇农、贫农，团结中农；另一方面在进行解决土地问题时，应将一般富农、中小地主分子和汉奸、豪绅、恶霸分子，加以区别。对待汉奸、豪绅、恶霸要放严些，对待富农、中小地主要放宽些。在一切土地问题已经解决的地方，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应对整个地主阶级改取缓和态度。对一切生活困难的地主给以帮助，对逃亡地主招引其回来，给以生活出路，借以减少敌对分子，使解放区得到巩固。

《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87—1188页

地主富农应得的土地和财产，不能超过农民群众。但是，曾经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期间实行过的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的错误的政策，也不应重复。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50—1251页

旧式富农按照平分原则所多余的土地及其一部分财产之所以应当拿出来分配，是因为中国的富农一般地带着很重的封建和半封建剥削的性质，富农大都兼出租土地和放高利贷，其雇佣劳动的条件亦是半封建的。还因为他们所占的土地数量较多，质量较好，如不平分则不能满足贫雇农的要求。但是

按照土地法大纲的规定，对待富农和对待地主一般地应当有所区别。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51页

对地主、富农也要有些区别，《土地法大纲》已有规定，农民也会加以区别。对他们，在消灭封建剥削和平分土地问题上是没有区别的，但在处置财产问题上有区别（个别恶霸除外）。土地分配不能搞绝对平均。由于当地地主、富农太少就要同中农扯平，这也是不对的。

《在杨家沟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331—332页

地主作为一个阶级要消灭，作为个人要保护。为什么要消灭地主阶级？因为它代表的是反动的生产关系。……但废除地主阶级的私有制，并不等于连他的人也不要了。地主和旧式富农占农村人口十分之一，全国共有三千六百万人，这是社会的劳动力，是一种财富。我们分一份土地、财产给他，让他参加生产劳动，他能抬担架，能生产粮食，还能缴公粮，对国家有利。至于选举权，农民在几年之内是不愿意给他的，那末是不是永世不给了？不是的，开始先不给，过些年后经过劳动改造变成了农民就可以给了。现在工业不发达，将来工业发达了，工人从哪里来？还不是从农村来。农村劳动力多了抽到城市做工，要有几百万人到城市去。三千六百万人改造后是很大的一批劳动力，快等于一个小国家的人口了。我们对封建剥削要非常恨，但地主本人还是劳动力，经过改造过几年还有选举权。对地主要安置好，安置不好会出乱子，我们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地主

有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之分，还有反动的和开明的之分，我们应当分别情况进行处理。

《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3—24页

必须将新富农和旧富农加以区别。在减租减息时期提出鼓励新富农和富裕中农，对于稳定中农、发展解放区农业生产是收了成效的。平分土地以后，必须号召农民发展生产，丰衣足食，并劝告农民组织变工队、互助组或换工班一类的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平分土地时，对于老解放区的新富农，照富裕中农待遇，不得本人同意，不能平分其土地。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70页

对大、中、小地主，对地主富农中的恶霸和非恶霸，在平分土地的原则下，也应有所区别。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71页

应在适当时机（在土地斗争达到高潮之后），教育群众懂得自己的远大利益，要把一切不是坚决破坏战争、坚决破坏土地改革，而在全国数以千万计（在全国约三亿六千万乡村人口中占有约三千六百万之多）的地主富农，看作是国家的劳动力，而加以保存和改造。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封建制度，消灭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必须按照土地法给以不高于农民所得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71页

土地改革的目的是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即消灭封建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因此，对地主必须分给和农民同样的土地财产，并使他们学会劳动生产，参加国民经济生活的行列。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14页

所谓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制度，就是说，必须分别地主和富农，分别地主的大中小，分别地主富农中的恶霸分子和非恶霸分子，在平分土地、消灭封建制度的大原则下面，不是一律地而是有所分别地决定和实行给予这些不同情况的人们以不同的待遇。在我们这样做了的时候，人们就会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15页

除对极少数犯了重大罪行的地主，即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及坚决反抗土地改革的犯罪分子，应由法庭判处死刑或徒刑而外，对于一般地主只是废除他们的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废除他们这一个社会阶级，而不是要消灭他们的肉体。

《关于土地改革报告的修改》（一九五〇年六月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64页

第二次国内战争的后期，当时的中央曾经主张按劳力分配土地，不赞成按人口平分土地。当时“左”倾冒险路线的同志认为按人口平分土地是阶级观点不明确，群众观点不充分，对发展生产不利。实践证明错的不是按人口平分土地，而是按劳动力分配土地。因为按劳动力分配土地，对富裕中农最有利。当

时，他们还主张地主不分田。既然地主不杀掉，却不给谋生之道，地主有劳动力，却不分给他们土地，这种政策，是破坏社会、破坏社会生产力的政策。富农分坏田，也是这种性质的政策。中国的农民是寸土必争的。土地改革中贫农总是打富裕中农的主意，他们的办法是给富裕中农戴上富农的帽子，把富裕中农多余的土地拿出来。这个问题经过反复争论和实践，结果证明，按人口平分土地是符合我国民主革命阶段中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客观规律的。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5—106页

4. 注意保护工商业

必须避免对中小工商业者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各解放区过去保护并奖励一切于国民经济有益的私人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是正确的，今后仍应继续。减租减息时期鼓励地主富农转入工商业的政策也是正确的，认为“化形”而加以反对和没收分配是错误的。地主富农的工商业一般应当保护，只有官僚资本和真正恶霸反革命分子的工商业，才可以没收。这种应当没收的工商业，凡属有益于国民经济的，在国家和人民接收过来之后，必须使其继续营业，不得分散或停闭。对于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工商业征收营业税，必须以不妨碍其发展为限度。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69页

在土地改革工作中侵犯了属于地主富农所有的工商业；在清查经济反革命的斗争中，超出了应当清查的范围；以及在税

收政策中，打击了工商业。这些，都是属于对待工商业方面的“左”的偏向。现在，这些偏向也已纠正，使工商业获得了恢复和发展的可能。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07页

5. 建立土地改革的统一战线

地主富农在乡村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虽然各地有多有少，但按一般情况来说，大约只占百分之八左右（以户为单位计算），而他们占有的土地，按照一般情况，则达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因此，我们的土地改革所反对的对象，人数甚少，而乡村中能够参加和应当参加土地改革统一战线的人数（户数），则有大约百分之九十以上这样多。这里必须注意两条基本原则：第一，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务；第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只要我们掌握了这两条基本原则，我们的土地改革任务就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51页

不是宣传依靠贫雇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封建制度的路线，而是孤立地宣传贫雇农路线。不是宣传无产阶级联合一切劳动人民、受压迫的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分子（其中包括不反对土地改革的开明绅士），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民主政府，而是孤立地宣传所谓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或者说民主政府只是农民政府，或者说民主政府只应该听工人和贫雇

农的意见，而对中农，对独立劳动者，对民族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等，则一概不提。这是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

《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一日），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80页

在划分阶级成分中，在许多地方把许多并无封建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劳动人民错误地划到地主富农的圈子里去，错误地扩大了打击面，忘记了我们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可能和必须团结农村中户数百分之九十二左右，人数百分之九十左右，即全体农村劳动人民，建立反对封建制度的统一战线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战略方针。现在，这项偏向已经纠正了。这样，就大大地安定了人心，巩固了革命统一战线。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06—1307页

6. 放手发动群众，反对恩赐观点

查田运动是一个剧烈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动最广大群众热烈起来参加斗争，形成群众运动，才能保障阶级路线的正确执行，才能达到消灭封建残余势力的目的。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工作方式，是查田运动最大的敌人。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主要是讲阶级，通过阶级，没收分配，及对工会、贫农团的正确领导等。

《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一九三三年六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69页

减租是农民的群众斗争，党的指示和政府的法令是领导和帮助这个群众斗争，而不是给群众以恩赐。凡不发动群众积极

性的恩赐减租，是不正确的，其结果是不巩固的。

《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10页

减租必须是群众斗争的结果，不能是政府恩赐的。这是减租成败的关键。

《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73页

各区都有约三分之二的地方执行了中央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的指示，解决了土地问题，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是还有约三分之一的地方，必须于今后继续努力，放手发动群众，实现耕者有其田。在已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地方，还有解决不彻底的缺点存在，主要是因为没有放手发动群众，以致没收和分配土地都不彻底，引起群众不满意。在这种地方，必须认真检查，实行填平补齐，务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都能获得土地，而豪绅恶霸分子则必须受到惩罚。

《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15—1216页

土地改革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68页

土改工作主要应注意是否真正发动了群众，由群众自己动手（由上面派干部帮助）推翻地主阶级，分配土地。只要合乎这个

方向就是好的。有些偏差,例如侵犯中农,破坏工商业,划错阶级成分,消灭富农,使地主一律扫地出门以及捉人太多等等,应由省委、地委两级随时指导纠正。要求一点不出乱子是很难的,只要省、地两级掌握得好,随时纠正偏差,使农民群众高高兴兴地减了租,退了押,清了匪,反了霸,分了土地,农会、乡政权和民兵都掌握在以贫雇农为骨干的人们的手里,那就很好了。

《土改工作应注意的主要之点》(一九五一年一月),《毛泽东文集》
第6卷第138页

教科书中说:“从富农那里没收来交给贫农和中农的土地”。这说明他们的办法是政府没收,然后由政府把土地分给农民,这是一种恩赐的观点,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群众运动。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一种右倾观点。我们的办法和他们不同。我们是依靠贫农,使贫农和下中农联合起来,向地主阶级夺取土地。具体做法是:访贫问苦,发现积极分子,团结核心,进行诉苦,组织阶级队伍,开展阶级斗争。在整个过程中,党起引导的作用,反对包办代替。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第115—116页

7. 反对土地分配上的绝对平均主义

我们赞助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谁要是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那就是错误的。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

必须批判这种思想。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14页

8. 农村土地改革完成后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土地革命不但使农民得到土地，而且要使农民发展土地上面的生产力。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红色中华》二苏大特刊第3期

土地平分后要号召农民勤劳生产，改良农业技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求得农民自己生活上的改善，求得民主政府与人民解放军有足够的公粮以利于战胜反动派，并求得日益增多的当作商品出卖的粮食及原料，使城市人民与工业获得足够的农业产品。

《把打击面放在真正的封建剥削阶级范围内》（一九四八年一月），《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2—13页

发展农业生产，是土地改革的直接目的。只有消灭封建制度，才能取得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在任何地区，一经消灭了封建制度，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党和民主政府就必须立即提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任务，将农村中的一切可能的力量转移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面去，组织合作互助，改良农业技术，提倡选种，兴办水利，务使增产成为可能。农村党的精力的最大部分，必须放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和市镇上的工业生产上面。为了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和市镇上的工业生

产，在消灭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必须注意尽一切努力最大限度地保存一切可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采取办法坚决地反对任何人对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破坏和浪费，反对大吃大喝，注意节约。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必须劝告农民在自愿原则下逐步地组织为现时经济条件所许可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各种生产的和消费的合作团体。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15—1316页

将工作方向由土地改革方面，转移到团结农村中一切劳动人民并组织地主富农的劳动力为共同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而奋斗的方面去。开始组织在自愿和等价交换两项原则上的小规模变工组织和其他合作团体；准备好种子、肥料和燃料；做好生产计划；发放必要的和可能的农业贷款（以贷给生产资料为主，必须有借有还，严格区别于救济性质的赈款）；在可能的地点，做好兴修水利的计划。

《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29页

凡属封建制度已经根本消灭，贫雇农已经得到大体上相当于平均数的土地，他们同中农所有的土地虽有差别（这种差别是许可的），但是相差不多者，即应认为土地问题已经解决，不要再提土地改革问题。在这类地区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完成整党建政工作和支援前线的工作。在这类地区的部分乡村中，如果尚有土地须待分配或调剂，阶级成分须待改订，土地证须待发给者，自然应当按照实际情形完成这些工作。

《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31—1332页

（四）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土地政策

1. 大革命时期的土地政策思想

农民有了组织之后，第一个行动，便是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即是从农村的社会地位上把地主权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这是一个极严重极紧要的斗争。这个斗争是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的中心斗争。这个斗争不胜利，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等等的经济斗争，决无胜利之可能。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3页

目前我们对农民应该领导他们极力做政治斗争，期于彻底推翻地主权力。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他经济问题。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3页

所谓土地没收，就是不纳租，并无须别的办法。现在湘、鄂农民运动已经到了一个高潮，他们已经自动地不纳租了，自动地夺取政权了。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认它就得了。

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第193页

2.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和对富农的策略

一、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用下列三种方法分配之：

(一) 分配农民个别耕种；(二) 分配农民共同耕种；(三) 由苏维埃政府组织模范农场耕种。

以上三种方法，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或苏维埃政府有力时，兼用二三两种。

二、一切土地，经苏维埃政府没收并分配后，禁止买卖。

三、分配土地之后，除老幼疾病没有耕种能力及服公众勤务者以外，其余的人均须强制劳动。

四、分配土地的数量标准：

(一) 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二) 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者比不能劳动者多分土地一倍。

以上两个标准，以第一个为主体。有特殊情形的地方，得适用第二个标准。采取第一个标准的理由：

(甲) 在养老育婴的设备未完备以前，老幼如分田过少，必至不能维持生活。

(乙) 以人口为标准计算分田，比较简单方便。

(丙) 没有老小的人家很少。同时老小虽无耕种能力，但在分得田地后，政府亦得分配以相当之公众勤务，如任交通等。

五、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

(一) 以乡为单位分配。(二) 以几乡为单位分配(如永新之小江区)。(三) 以区为单位分配(如遂川之黄垵区)。

以上三种标准，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时，得适用第二第三两种标准。

六、山林分配法：

(一) 茶山、柴山，照分田的办法，以乡为单位，平均分配耕种使用。

(二) 竹木山，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但农民经苏维埃政府许可后，得享用竹木。竹木在五十根以下，须得乡苏维埃政府许可。百根以下，须得区苏维埃政府许可。百根以上，须得县苏维埃政府许可。

(三) 竹木概由县苏维埃政府出卖，所得之钱，由高级苏维埃政府支配之。

七、土地税之征收：

(一) 土地税依照生产情形分为三种：1. 百分之十五；2. 百分之十；3. 百分之五。

以上三种方法，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经高级苏维埃政府批准，得分别适用二三两种。

(二) 如遇天灾或其他特殊情形时，得呈明高级苏维埃政府核准，免纳土地税。

(三) 土地税由县苏维埃政府征收，交高级苏维埃政府支配。

八、乡村手工业工人，如自己愿意分田者，得分每个农民所得田的数量之一半。

九、红军及赤卫队的官兵，在政府及其他一切公共机关服务的人，均得分配土地，如农民所得之数，由苏维埃政府雇人代替耕种。

《土地法》（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9—

51页

按：此土地法是一九二八年冬天在井冈山（湘赣边界）制定的。这是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冬天一整年内土地斗

争经验的总结，在这以前，是没有任何经验的。这个土地法有几个错误：（一）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二）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三）禁止土地买卖。这些都是原则错误，后来都改正了。关于共同耕种与以劳力为分配土地标准，宣布不作为主要办法，而以私人耕种与以人口为分田标准作为主要办法，这是因为当时虽感到前者不妥，而同志中主张者不少，所以这样规定，后来就改为只用后者为标准了。雇人替红军人员耕田，后来改为动员农民替他们耕了。

《土地法》（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51页

按：这是前一个土地法制定后第四个月，红军从井冈山到赣南之兴国发布的。内容有一点重要的变更，就是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但其余各点均未改变，这些是到了一九三〇年才改变的。这两个土地法，存之以见我们对于土地斗争认识之发展。

《土地法》（一九二九年四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40页

依上所述，真正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人数不过百分之六，他们的土地却占百分之八十。其中富农占去百分之三十，公堂土地又有许多在富农掌握中，若不平分富农的土地，多数人土地不足的问题便难解决。中农人口占百分之二十，土地却只占百分之十五。平分土地，中农是需要的，因为他们土地不足，平分土地对于他们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土地。那些平分要损及中农的说法是不对的。

《兴国调查》（一九三〇年十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00页

分田以劳力为单位的弊病，就是凡孤、寡、老、幼、小脚妇女及一切不能耕田的人，均不够食。贫农劳力多的也抵不住富农，因为贫农不及富农的牛力、农具、资本，并且富农可以租耕孤、寡、老、幼、小脚妇女等人的田。因此，以劳力为单位只于富农有利。

……

以劳力为单位分配，富农田多，牛力、犁耙需自己用，贫农要借不可能。只有平分，贫农才能借富农的剩余农具，所以贫农要求平分。

《分青和出租问题》（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49页

正当的政策应该是“无偿得田，分亩分青”。地主家属照分，以归一律。地主钱多，另行派款。流氓照分，因为他们是劳苦的。富农反对流氓分青，是不对的。中农没有多的田分出去，不受影响。“上层贫农”耕田多的，虽受影响，但有他种利益满足他们。广大的下层贫农、手工工人、雇农，是十分拥护这个办法的。分青之后无力耕种的，准许照出租办法办理。

《分青和出租问题》（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50页

过去以村以家为单位照原耕为标准去平分，结果有利富农不利贫农。正当的办法应该是：以乡为单位，按全乡人口总数，除全乡人口原来所耕田地的总数（全乡人口原来在本乡耕的和原来在外乡耕的合计起来），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移得田动的移田（田多的村，把田推一部分给田少的村），移田不动的移民（隔远了，无法移田，只好移民）。这个办法，叫做“原耕总合

分配”。

《分青和出租问题》（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50—251页

正当的政策应该如下：

（一）贫农、雇农及失业者分了田，缺乏牛力、农具、本钱的，由政府没收富农地主的多余牛力、农具等项，分给雇农、贫农、失业人等私人使用。同时，奖励集体使用这些工具，把没收富农地主的的东西交些给合作社。再有一种办法，就是私人向富农临时借用牛力、农具，以资补助。政府裁制那些故意不借东西的富农，以赞助贫农、雇农及失业者。

（二）至于那些完全不能耕田的人，应准许他们在下列条件之下，把田租与富农中农耕种：

（甲）废除分谷制，规定固定租额，凶荒无减。

（乙）规定最低租额（百分之五十），务使富农对贫农雇农的“剥削”不得过多。

（丙）不准富农借口只耕己田，不耕人田。如富农不愿租田时，乡政府应将本乡必须出租的田，分配租与本乡富农中农，强制他们耕种。

《分青和出租问题》（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52—253页

关于田没有分定一层，在现在红色区域是个大问题。过去田归苏维埃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的空气十分浓厚，并且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使得农民感觉田不是他自己的，自己没有权来支配，因此不安心耕田。这种情形是很不好的，省苏应该通令各地各级政府，要各地政府录令布告，推促农民耕种，在令上要

说明过去分好了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了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得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以后一家的田，一家定业，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吃不完的，任凭自由出卖，得了钱来供给零用，用不完的由他储蓄起来，或改田地，或经营商业，政府不得借词罚款，民众团体也不得勒捐。那些说农民余钱剩米归苏维埃公用的话完全是谣言。农民一家缺少劳力耕田不完，或全无劳力一点不能自耕的，准许出租。租完多少，以两不吃亏为原则，由各处议定。

《关于加强春耕工作的意见》（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56—257页

对富农策略的转变基本同意，但决议上应指出，当斗争发展贫农中农要求平分富农土地时，党应赞助这一要求。富农可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过去分坏田的原则是不对的；但富农土地完全不动的原则，在苏区尤其在南方苏区也是不对的。在土地问题上，对富农策略同对中农应该有一点区别。农村中的党应善于领导与监督富农，严防为富农所领导。要指出当斗争深入时富农必然转入地主阵线，这是中国半封建富农阶层的特点。对有劳动力又破产了的小地主阶层，在群众同意下应按富农待遇。

《关于转变对富农的策略等问题给张闻天的信》（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72—373页

鉴于日本帝国主义之积极侵略，中国沦亡之危迫，全国工农及爱国志士均积极参加民族革命斗争，反对日本侵略者及其

走狗蒋介石辈；又因蒋介石等的卖国贼统治，陷中国经济于万劫不复之域——特别是农村经济，全国农民均群起反抗与暴动，富农已改变其仇视苏维埃革命而开始同情于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的斗争，苏维埃中央委员会为扩大全国抗日讨蒋之革命战线，特决定改变对于富农之政策。

（甲）富农之土地，除以封建性之高度佃租出租于佃农者，应以地主论而全部没收之外，其余富农自耕及雇人经营之土地，不论其土地之好坏，均一概不在没收之列。

（乙）富农之动产及牲畜耕具，除以封建性之高利贷出借以剥夺农民者外，均不应没收。

（丙）除统一累进税外，禁止地方政府对于富农之征发及特殊税捐。

（丁）富农在不违反苏维埃法律时，各级政府应保障其经营工商业及雇用劳动之自由。

（戊）在实行平分一切土地之区域（乡、区），富农有与普通农民分得同样土地之权。

（己）富农在违反苏维埃法令时应依法惩治之，进行反革命活动时应按暂行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之。

（庚）富农仍无权参加红军及一切武装部队（包括赤卫军在内），并无选举权。

（辛）以前颁布之土地法及一切其他法令，凡与本命令有抵触者悉废除之。

（壬）本命令自公布日起实行之（在未联系一片之区域，文到之日实行之），在本命令实行前依以前法令施行者仍属有效，不得翻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命令》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74—375页

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

《关于农村调查》（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
第379页

在土地问题上，六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认为：“在有很多失业和贫苦的农民的地方，必然发生‘平分土地’的运动，如果这一口号为大多数农民群众所拥护时，共产党应加以赞助，因为这是彻底肃清一切封建余孽的口号，并且是直接动摇私有制度的。”这些话大部分是正确的，因为它适合中国这类地少人多的情况（在北方每人平均只有三亩地，在南方每人平均只有一亩地）。这一段话里，只有最后一句不妥当，因为“平分土地”的结果，并没有动摇全部私有制，只动摇了封建主义的私有制，使之变为农民的私有制，而且在农村中仍然摆着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走社会主义道路两个前途，更不要说没有动摇城市中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了。六大决议又说，要向农民说明在现时条件下没有实行真正平等的可能，因此不要把农民引向绝对平均主义（例如侵犯中农利益，分田后不允许土地买卖，即不允许新富农产生）。临时中央违反六次大会，发明一条“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连同政治、军事、组织路线的错误，结果闹出一场革命的失败，其亦可谓“完全正确”也已矣。

《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节选）》（一九四一年），《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42—343页

在内战时期我们没有理由阻止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因为地主阶级不仅压迫他们，而且在实际上领导着反对农民的斗争。我们的党只是满足了农民在这个问题上的意愿，把他们的要求变成口号，并作为政策来实行。根据中国的条件，这种没收土地的做法是一项正确的政策。农村广大群众的基本要求始终集中在对土地所有权的渴求上。已故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先生认识到了这一点，主张实行“耕者有其田”。这是他解决民生问题纲领中的要点之一。

《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84页

3. 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由没收地主土地改为实行减租减息

为了停止国内的武装冲突，共产党愿意停止使用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而准备在新的民主共和国建设过程中，用立法和别的适当方法去解决土地问题。中国土地属于日本人，还是属于中国人，这是首先待解决的问题。既是在保卫中国的大前提之下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那末，由暴力没收方法转变到新的适当方法，就是完全必要的。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60页

为什么共产党现在又申明取消工农民主专政和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呢？这个理由我们也早已说明了，不是这种制度和办

法根本要不得，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引起了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使联合全民族各阶层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成了必需，而且有了可能。不但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为了共同反对法西斯，建立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也有了必需和可能。所以，我们主张在中国建立民族的和民主的统一战线。我们用以代替工农民主专政的各阶层联合的民主共和国的主张，是在这种基础之上提出的。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正是孙中山先生曾经提出过的政策；我们今天停止实行这个政策，是为了团结更多的人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是说中国不要解决土地问题。

《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68页

土地政策应实行部分的减租减息以争取基本农民群众，但不要减得太多，不要因减息而使农民借不到债，不要因清算旧债而没收地主土地，同时应规定农民有交租交息之义务，保证地主有土地所有权，富农的经营原则上不变动。要向党内及农民说明，目前不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时期，避免华北方面曾经发生过的过左错误。

《抗日根据地应实行的各项政策》（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20页

关于土地政策。必须向党员和农民说明，目前不是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的时期，过去土地革命时期的一套办法不能适用于现在。现在的政策，一方面，应该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方能发动基本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但也不要减得太多。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到群众要求增高时，可以实行倒

四六分，或倒三七分，但不要超过此限度。利息，不要减到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许可的程度。另一方面，要规定农民交租交息，土地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仍属于地主。不要因减息而使农民借不到债，不要因清算老账而无偿收回典借的土地。

《论政策》（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66—767页

在土地政策方面，对于十年内战前期和中期所采取的、也分配给地主一份和农民同样的土地、使他们从事耕种、以免流离失所或上山为匪破坏社会秩序，这样的正确的政策，加以否定，也是错误的。现在，党的政策必须与此不同，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也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如同一九二七年的陈独秀主义那样），而是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阶层，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但对他们中间存在着的投降敌人和反共反人民的动摇性反动性方面，又应按其不同程度，同他们作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现在的政策，是综合“联合”和“斗争”的两重性的政策。在劳动政策方面，是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和不妨碍资本主义经济正当发展的两重性的政策。在土地政策方面，是要求地主减租减息又规定农民部分地交租交息的两重性的政策。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792—793页

在土地已经分配区域，保证一切取得土地的农民之私有土地制。在土地未经分配区域（例如绥德、富县、庆阳），保证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及债主的债权，惟须减低佃农租额及债务利息，

佃农则向地主缴纳一定的租额，债务人须向债主缴纳一定的利息，政府对东佃关系与债务关系加以合理的调整。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35—336页

在土地关系上，我们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过活。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8页

在反抗外来侵略者的民族战争阶段，情况当然有所不同。民族战争可以说服农民群众不没收地主的土地，因为群众也认识到，当地主也愿意抵抗外敌的时候，没收土地的政策可能会驱使地主跑向日本人控制的城市，然后再同日本兵一起打回来重新夺走土地。

于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农民很快就了解到我们用减租的新政策代替过去没收土地的做法，具有两大好处：一是改善了农民的生活；二是吸引了地主留在乡村参加抗日。实行有利于佃农的普遍减租以及我们保证向地主交租的政策，使佃农和地主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改善，从而使日本侵略者在我们区域内简直找不到合作者了。

《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84—185页

从没收土地到普遍减租和向地主交租这一根本性的政策转变，最初是由党的下级组织的同志建议的，我们党中央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因为很明显这一建议是符合群众的愿望的。我们对这些要求进行了研究，根据这些要求制定政策，并普遍

加以实施。

《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85页

减租,各地均有成绩。但是有些地方成绩少些,明减暗不减及恩赐观点仍是存在的。另一方面,也有减得太多,或在减租之后不注意交租等现象。这两种偏向都应纠正。减租之后租约满期的,除在照顾双方利益原则下可由地主收回自种者外,应该重订新约,使农民有地可种。老区域减租未彻底的,应该查租。新区域尚未减租的,应该发动减租。租不减是不对的,减得太过火也是不对的。凡地主因被敌人摧残或其他原因而生活困难的,政府应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给以从事农工商业或参加其他工作之方便。要把这件事当做政府工作之一,借以团结他们反对共同敌人。

《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39—240页

在抗日期间,减租减息及其他一切民主改革是为着抗日的。为了减少地主对于抗日的阻力,只实行减租减息,不取消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同时又奖励地主的资财向工业方面转移,并使开明士绅和其他人民的代表一道参加抗日的社会工作和政府工作。对于富农,则鼓励其发展生产。所有这些,是在坚决执行农村民主改革的路线里包含着的,是完全必要的。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76—1077页

我们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土地政策,到抗战时期必须改变,否则就不能缓和国内矛盾和根据地内部的矛盾,发展中国人民自

己的力量，共同打日本。

《在小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70页

4. 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政策和不同地区实施的策略与步骤

抗日期间，中国共产党让了一大步，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这个让步是正确的，推动了国民党参加抗日，又使解放区的地主减少其对于我们发动农民抗日的阻力。这个政策，如果没有特殊阻碍，我们准备在战后继续实行下去，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减租减息，然后采取适当方法，有步骤地达到“耕者有其田”。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76页

在日本侵略者被消灭以后，对于日本侵略者和重要汉奸分子的土地应当没收，并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79页

今冬明春，必须在一万万人民中，放手发动减租（已经减好的照旧）。在一切新解放区一律减租，放手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地方党、地方政府与提拔地方干部，以便迅速确立我党在基本群众中的基础，迅速巩固一切新解放区。但是，绝对不可损害中农利益（中农也是基本群众）；富农除封建剥削部分实行减租外，不应加以打击；地主须使之可以过活，没收分配土地是过早的。某些地区已经分配者不再变动，但对地主必须设法救济，对富农必须设法拉拢，对中农受损害者必须补偿损失。这

些方面如不注意，将破裂农村统一战线，使我党陷于孤立，有利于国民党。

《关于日本投降后党的任务》（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55—456页

（一）国民党在美国援助下，动员一切力量进攻我解放区。全国规模的内战已经存在。我党当前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站在自卫立场上，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保卫解放区，争取和平局面的出现。为达此目的，使解放区农民普遍取得减租利益，使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取得酌量增加工资和改善待遇的利益；同时又使地主还能生活，使工商业资本家还有利可图；并于明年发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救济饥民、难民，供给军队的需要，成为非常迫切的任务。只有减租和生产两件大事办好了，才能克服困难，援助战争，取得胜利。

（二）目前战争的规模很大，许多领导同志在前方指挥，不能分心照顾减租和生产。因此，必须实行分工。留在后方的领导同志，除了作直接援助前线的许多工作之外，一定要不失时机，布置减租和生产两件大工作。务使整个解放区，特别是广大的新解放区，在最近几个月内（冬春两季）发动一次大的减租运动，普遍地实行减租，借以发动大多数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同时，在一九四六年内，全解放区的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务使有一个新的发展。不要因为新的大规模战争而疏忽减租和生产；恰好相反，正是为了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要加紧减租和生产。

《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72—1173页

目前我党方针，仍然是减租而不是没收土地。在减租中和减租后，必须帮助大多数农民组织在农会中。

《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73页

解放区现在要搞生产与减租，新区要搞大的减租运动，彻底地普遍地搞。如果做到这一条，人民群众的元气是会恢复的。对地主的土地是不是要没收？七大的方针还是减租减息，要彻底减，把地主的威风打下去。

《抗战胜利三个月来的局势和今后若干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77页

各地务必在一九四六年，在一切新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但是有领导的减租减息运动。工人则酌量增加工资。使广大群众，在此运动中翻过身来，并组织起来，成为解放区自觉的主人翁。在新解放区，如无此项坚决措施，群众便不能区别国共两党的优劣，便会动摇于两党之间，而不能坚决地援助我党。在老解放区，则应复查减租减息的工作，进一步巩固老解放区。

《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75页

三个月经验证明：凡坚决和迅速地执行了中央五月四日的指示，深入和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方，农民即和我党我军站在一道反对蒋军进攻。凡对《五四指示》执行得不坚决，或布置太晚，或机械地分为几个阶段，或借口战争忙而忽视土地改革的地方，农民即站在观望地位。各地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不论战争如何忙，坚决地领导农民群众解决土地问题，并在土

地改革基础上布置明年的大规模的生产工作。

《三个月总结》（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08页

在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中，务须团结赞成土地改革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众，孤立反对土地改革的少数封建反动分子，以期迅速完成实现耕者有其田的任务。

《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16页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土地问题，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应该继续解决，使一切无地的农民都得到土地。已经分过土地的地方，如果有多数人没有得到土地，只是少数人得到，应该考虑重分，这样可以得到多数群众的拥护。要使农民同地主撕破脸，而不是和和气气。对地主打拉了再拉，不打只拉就不好。

《对中国革命新高潮的说明》（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21页

土地政策今天可以而且需要比五四指示更进一步，因为农民群众要求更进一步，如土地推平。平分土地是一个原则，但按情况不同可以有某些伸缩，如对杜斌丞、侯外庐，但对共产党员不应该有例外。中农的土地应该不动，但在群众运动的大潮流中和中农同意的情况下，要富裕中农拿出少许土地也是许可的，这种做法不要正式写在文件上。我们的部队打到外线去以后，与其马上没收地主的土地，不如先按阶级路线摊派征税，立即实行耕者有其田势必造成强迫群众去做。

《在小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70—271页

平分土地，利益极多，办法简单，群众拥护，外界亦很难找出理由反对此种公平办法，中农大多数获得利益，少数分出部分土地，但同时得了其他利益（政治及一般经济利益）可以补偿。因此，土地会议应该采取彻底平分土地的方针，将农村中全部土地、山林、水利，平地以乡为单位，山地以村为单位，除少数重要反动分子本身外，不分男女老少，在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平均分配。不但土地、山林、水利平均分配，而且要将地主、富农两阶级多余的粮食、耕牛、农具、房屋及其他财富拿出来，适当地分配给农民中缺乏这些东西的人们，地主、富农所得的土地财产不超过也不低于农民所得。大规模的森林及水利工程不能分配者，由政府管理。

《土地会议应该采取彻底平分土地的方针》（一九四七年九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300页

目前正当各解放区开展与深入土地斗争之时，土地会议之召集，土地法大纲之颁布，给了右倾观点以严重打击，这是完全必须的。但随着斗争之深入，“左”倾现象势将发生。此项文件发至各地，决不应成为妨碍群众斗争的借口，而应在放手发动农民群众彻底平分土地的坚决斗争中，适当地纠正业已发生与业已妨碍群众利益的过左行动，以利团结雇农、贫农，坚决保护中农（这是确定不移的政策），正确地执行土地法大纲，消灭封建半封建制度。

《在土地改革中注意纠正“左”倾错误》（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322页

在抗日战争时期，为着同国民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和团结当时尚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人们起见，我党主动地把抗日以

前的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的政策,这是完全必需的。日本投降以后,农民迫切地要求土地,我们就及时地作出决定,改变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我党中央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发出的指示,就是表现这种改变。一九四七年九月,我党召集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立即在各地普遍实行。这个步骤,不但肯定了去年《五四指示》的方针,而且对于去年《五四指示》中的某些不彻底性作了明确的改正。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50页

土地改革的中心是平分封建阶级的土地及其粮食、牲畜、农具等财产(富农只拿出其多余部分),不应过分强调斗地财,尤其不应在斗地财上耗费很长时间,妨碍主要工作。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71页

每个乡村,必须有绝大多数群众认为没收分配地主、富农的土地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合理的,由群众自己批驳了落后群众中长期存在的错误思想,比如贫穷是由于命运,分土地是不道德行为等等,绝大多数群众真心愿意平分土地,然后才能行动;否则,就会犯冒险主义错误,被地主、富农及坏干部利用,乱打,乱杀,乱斗,乱分阶级,乱订成分,土地分不好,又要走回头路。必须认识,共产党员领导着缺乏精神准备、缺乏团体生活、缺乏斗争艺术的农民群众,向着诡计多端、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占优势的地主、富农作斗争,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员只有与农民群众一道,逐步完成精神准

备，逐步把自己组织起来（党的团体、群众团体、民兵、游击队、区乡政府），逐步学会斗争艺术，才能最后斗倒封建阶级，实现真正的平分土地；否则，必然被地主、富农打败，必然闹出许多危害群众的大乱子，即使平分，也是假平分。这一点不论在老区，在新区，都是如此。因此，我们应当坚决采用逐步推广的方法，不用普遍动手的方法。逐步推广的运动，看来很慢，其实是快；普遍动手的方法，看来是快，其实是慢。如果环境许可，干部又多，又有训练（必须有充分的训练），可以在全区中一切有工作团的县，每县选择一个区，同时进行土改工作，而对其他的区，则是进行准备土改的工作。

《新解放区土改斗争策略》（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7—38页

所谓环境许可，是说在新区应当分为两种地区，采取不同策略：第一种，是我军大量消灭了敌人，敌我力量对比起了基本变化，敌人以后不易再来，即使再来，也不可能久占的地区。在此种地区，应当由开仓济贫，斗恶霸，分大地主的浮财，组织农会、政府、民兵、游击队，逐步发展到没收分配地主阶级的土地，这种地区的环境，是许可我们进行土改的。第二种，是敌人还能再来，并将久占的地区。在此种地区，我们的工作，是向群众做宣传，开仓济贫，分发一部分财物，寻找积极分子，成立秘密的精干的党的组织与群众的组织，相机组织精干的游击队，并须教育群众准备敌人再来时的应付办法。在这种地区，环境还不许可我们进行土改，土改工作还要有所等待。

《新解放区土改斗争策略》（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8页

为了稳定中农之目的，老区新富农照富裕中农待遇，即不得本人同意不能平分；……

《对中央一月决定的补充意见》（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41页

我们必须按照实际情形去划分阶级，进行土改，决不可将本来不是地主、富农的人们人为地划成地主、富农，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打乱革命阵线，帮助敌人，孤立自己。这是一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必须引起全党同志的注意。

《把打击面放在真正的封建剥削阶级范围内》（一九四八年一月），《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1页

大反攻后新解放的地区。这种地区，群众尚未发动，国民党和地主、富农的势力还很大，我们一切尚无基础。因此，不应当企图一下实行土地法，而应当分两个阶段实行土地法。第一阶段，中立富农，专门打击地主。在这个阶段中，又要分为宣传，做初步组织工作，分大地主浮财，分大、中地主土地和照顾小地主等项步骤，然后进到分配地主阶级的土地。在这个阶段中，应当组织贫农团，作为领导骨干，还可组织以贫农为主体的农会（可称为农民协会）。第二阶段，将富农出租和多余的土地及其一部分财产拿来分配，并对前一阶段中分配地主土地尚不彻底的部分进行分配。第一阶段，大约须有两年时间；第二阶段，须有一年时间。太急了，必办不好。老区和半老区的土地改革和整党，也须有三年时间（从今年一月算起），太急了，也办不好。

《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一九四八年二月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78页

日本投降以前的老解放区，与日本投降以后至全国大反攻（去年九月）时两年内所占地方的半老解放区，与大反攻以后所占地方的新解放区，此三种地区情况不同，实行土地法的内容与步骤亦应有所不同，贫农团与农会的组织形式似亦应有所不同，请将你们对此种区别的意见电告。

在半老解放区，应完全实行土地法，彻底平分土地，组织贫农团与农会，而以贫农团为领导骨干，农会中贫农积极分子应占三分之二，中农只占三分之一，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但在老解放区，例如，晋绥的九十万人口或四十五万人口的老区，陕甘宁约一百万至一百二十万人口的老区，土地大体上早已平分了，即是大体上早已实行了土地法，在这里不是再来一次平分，而是调剂土地，填平补齐，……

《老区半老区实行土地法应有所不同》（一九四八年二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50页

不要性急，应依环境、群众觉悟程度和领导干部强弱决定土地改革工作进行的速度。不要企图在几个月内完成土地改革，而应准备在两三年内完成全区的土地改革。这点在老区和半老区亦是如此。

《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83页

新区土地改革应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打击地主，中立富农。又要分几个步骤：首先打击大地主，然后打击其他地主。对于恶霸和非恶霸，对于大、中、小地主，在待遇上要有区别。第二阶段，平分土地，包括富农出租和多余的土地在内。但在待遇上，对待富农应同对待地主有所区别。总的打击面，一般

不能超过户数百分之八，人口百分之十。在区别待遇和总的打击面上，半老区亦是如此。

《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83页

不要全面动手，而应选择强的干部在若干地点先做，取得经验，逐步推广，波浪式地向前发展。在整个战略区是如此，在一个县内也是如此。这在老区、半老区都应如此。

《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84页

分别巩固区和游击区。在巩固区逐步进行土地改革。在游击区只作宣传工作和荫蔽的组织工作，分发若干浮财。不要公开成立群众团体，不要进行土地改革，以防敌人摧残群众。

《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84页

新区斗争策略阶段必须分为先斗地主后斗富农两个大阶段。在第一个大阶段中，又必须分为几个步骤，从斗大地主、恶霸、反动分子开始，依据群众觉悟及组织程度逐步推广打击面（总的打击面，在一般情况下不要超过乡村人口百分之十）。这是一般原则。但这并不是说农民要求先向他们最痛恨的属于富农、小地主甚至个别中农中的保甲长、恶霸分子施行斗争，我们也不允许。特别是因为有许多乡村，没有大地主，只有中小地主及富农，应当允许农民这样做。我们打击富农、小地主中的反动的保甲长、恶霸分子，和我们在第一个大阶段中缩小打击面，对于富农、小地主中的多数人暂时不去惊动他们的策略，并不矛盾。

《新解放区土改斗争策略的运用》(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67—68页

现在的“左”的偏向,主要的是侵犯中农,侵犯民族资产阶级,职工运动中片面强调工人眼前福利,对待地主和对待富农没有区别,对待地主的大中小、恶霸非恶霸没有区别,不按平分原则给地主留下必要的生活出路,在镇压反革命斗争中越出了某些政策界限,以及不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党派,不要开明绅士,在新解放区忽视缩小打击面(即忽视中立富农和小地主)在策略上的重要性,工作步骤上的急性病等。这些“左”的偏向,在过去大约两年的时间内,各解放区都或多或少地发生过,有时成了严重的冒险主义倾向。好在纠正这类偏向并不甚困难,几个月内已经大体上纠正过来了,或者正在纠正着。但须各级领导者着重用力才能彻底纠正此类偏向。

《关于情况的通报》(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97—1298页

我们认为,经过人民法庭和民主政府,对于那些积极地并严重地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和破坏土地改革工作的重要的犯罪分子,即那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和恶霸分子,判处死刑,是完全必要和正当的。不如此,就不能建立民主秩序。但是,对于一切站在国民党方面的普通人员,一般的地主富农分子,或犯罪较轻的分子,则必须禁止乱杀。同时,在人民法庭和民主政府进行对于犯罪分子的审讯工作时,必须禁止使用肉刑。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07页

在新区,还必须分地区,分阶段。分地区,是说应当集中

力量在那些可以巩固地占领的区域进行适当的合乎当地群众要求的土地改革工作；而在那些暂时尚难巩固地占领的区域，则不要忙于进行土地改革，而只做一些可以做的按照当前情况有利于群众的工作，以待情况的变化。分阶段，是说在人民解放军刚才占领的区域，应当提出和实行中立富农和中小地主的策略，将打击面缩小到只消灭国民党的反动武装和打击豪绅恶霸分子。应当集中一切力量去完成这个任务，作为新区工作的第一个阶段。然后，依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被提高了的情况，逐步地发展到消灭全部封建制度的阶段。在新区，分浮财和分土地，均必须在环境比较安定和绝大多数群众充分发动之后，否则就是冒险的，靠不住的，有害无益的。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15页

划定土地改革工作范围。这种范围，必须是在下列三项条件下划定之：第一，当地一切敌人武装力量已经全部消灭，环境已经安定，而非动荡不定的游击区域。第二，当地基本群众（雇农、贫农、中农）的绝对大多数已经有了分配土地的要求，而不只是少数人有此要求。第三，党的工作干部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确能掌握当地的土地改革工作，而非听任群众的自发活动。

《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29页

南方各游击区应执行减租减息的社会政策及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以便联合及中立一切可能的社会力量，争取游击战争胜利，不应当过早实行分配土地的政策，致使自己陷于孤立。

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香港分局的电报（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七日），《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三——一九四九）》下卷第323页

六、民主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

（一）统一战线是战胜敌人的 三大法宝之一

1. 要打败强大敌人，取得革命胜利，必须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惟有号召全国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乃至各种各色凡属同受压迫的国民，建立严密的联合战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

《北京政变与商人》（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一日），《向导》第1集第31、32期合刊

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

《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18—19页

中国目前阶段一定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即彻底战胜日寇

与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将来阶段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即实现更进步的更完满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完成这两个革命都要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只有好好团结一切革命势力于统一战线里面，才能达到目的。

给施方白题写的赠言（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二日），《毛泽东年谱（一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 68—69 页

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

《〈共产党人〉发刊词》（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606 页

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这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所已经证明了的根本规律之一。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645 页

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就要使我们的人多一些，就要孤立敌人，当然敌人也想孤立我们，但被孤立的只能是他们自己。

《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96—197页

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57页

我们认为中国人民革命阵营必须扩大,必须容纳一切愿意参加目前的革命事业的人们。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需要有主力军,也需要有同盟军,没有同盟军的军队是打不胜敌人的。

《将革命进行到底》(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78页

我们有一个广大的和巩固的革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广大,它包含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巩固,它具备了战胜任何敌人和克服任何困难的坚强的意志和源源不竭的能力。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66页

2. 统一战线要有共同的政治基础

在目前,这个政府的基本任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这个政府的成分将扩大到广泛的范围,不但那些只对民族革命有兴趣而对土地革命没有兴趣的人,可以参加,就是那些同欧美帝国主义有关系,不能反对欧美帝国主义,却可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人们,只要他们愿意,也可以参加。因

此，这个政府的纲领，应当是以适合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个基本任务为原则，据此以适当地修改我们过去的政策。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6页

抗日需要一个坚固的统一战线，这就需要一个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这个统一战线的行动方针，同时也就是这个统一战线的一种约束，它像一条绳索，把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一切加入统一战线的团体和个人都紧紧地约束起来。这才能说得上坚固的团结。……

共同纲领是什么呢？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在八月二十五日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67页

说到统一战线的巩固，就是要实行一个共同纲领，用这个纲领来约束各党各派的行动。我们同意以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其遗嘱，作为各党派各阶层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但这个纲领至今没有为各党派所承认，首先国民党还没有承认发布这样一个全部的纲领。国民党现在已经部分地实行了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这表现在实行了对日抗战。但是民权主义是没有实行的，民生主义也没有实行，这样就使得现在的抗战发生了严重的危机。现在战争如此紧急，应是国民党全部实行三民主义的时候了，再不实行就要悔之无及了。共产党的责任，在于大声疾呼地向国民党和全国人民作不疲倦的解释和说服，务使真正革命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孙氏遗嘱，全部地彻底地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起来，用以扩大和巩固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

《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77页

我们要有一个共同纲领。为什么要有这个共同纲领呢?我们说,这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武器。打日本除了飞机、大炮、机关枪之外,还需要有这个武器;而且这个武器是管其他武器的,它是民族解放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在你们开学那一天,我曾经讲过政治方向问题。这个政治方向就是指示全国人民要走的路。政治方向好像是一个人的头,有了头其他各部分才能动作。这个政治纲领写些什么呢?少写些便是两条三条,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三民主义等;多则写他十条几十条,像十大纲领之类。

《国共两党合作问题》(一九三八年四月五日),《党的文献》1995年第4期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不但是合作抗日的基础,而且是合作建国的基础。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到争取全民族解放,其民权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到彻底地建立民主国家,其民生主义则更可能引导这个合作到很长的时期,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与政治思想保证着统一战线的长期性。

《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408页

三民主义也是一样,它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抗日过程中能够适用的原则、方针。我们要用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

主义，争取中间性的三民主义，这是在几种三民主义存在的情况下应采取的政策。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就在抗日过程中也是有区别的，但在抗日过程中二者有其一致点，即在把三民主义照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那样解释时，二者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上基本上是不相冲突的。因此，党内党外许多人轻视三民主义，认为它是根本反动的骗人的与空洞的思想或教条，是不对的。这种想法是由于没有把真三民主义与假三民主义加以区别而来。

《反投降提纲》（一九三九年六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19页

这种革命的三民主义，成了国共两党和各个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两个主义结成了统一战线。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1页

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都认为：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我们的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这是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也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个政治基础是如此巩固，以至于没有一个认真的民

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提出任何不同的意见,大家认为只有这一条道路,才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正确的方向。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63—1464页

3. 大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基本地说,是在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合作之下进行的。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184页

国民党方面,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因为它实行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援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所以它是革命的、有朝气的,它是各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联盟。一九二七年以后,国民党变到了与此相反的方面,成了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
315—316页

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中,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的南方革命势力,曾经由弱小的力量变得强大起来,取得了北伐的胜利;而称雄一时的北洋军阀则被打倒了。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
324页

中国的革命,自从一九二四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由于两党在一定纲领上的合作,发动了一九

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就是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这是两党结成了统一战线的结果。然而由于一部分人对于革命主义未能坚持，正当革命走到将次完成之际，破裂了两党的统一战线，招致了革命的失败，外患乃得乘机而入。这是两党统一战线破裂了的结果。

《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64页

十五年来的中国政局，国共两党的关系是决定的因素。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两党合作，造成了第一次革命的胜利。一九二七年两党的分裂，造成了十年来的不幸局面。

《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84—385页

在这一时期中，这种革命的三民主义，成了国共两党和各个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两个主义结成了统一战线。以阶级论，则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那时，以共产党的《向导周报》，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及各地报纸为阵地，曾经共同宣传了反帝国主义的主张，共同反对了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共同反对了封建古装的旧文学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学和白话文。在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中，曾经在中国军队中灌输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改造了中国的军队。在千百万农民群众中，提出了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掀起了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由于这些，再

由于苏联的援助，就取得了北伐的胜利。但是大资产阶级一经爬上了政权，就立即结束了这次革命，转入了新的政治局面。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1页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订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黄埔军校，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因而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扫荡了广东的反动势力，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举行了胜利的北伐战争，占领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打败了北洋军阀政府，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斗争。但是到了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正当北伐战争向前发展的紧要关头，这个代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及其一切革命政策，就被国民党当局的叛卖性的反人民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所破坏了。昨天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被看成了仇敌，昨天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被看成了同盟者。就是这样，背信弃义地向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一个突然的袭击；生气蓬勃的中国大革命就被葬送了。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35—1036页

4. 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

● 国共合作抗日是救亡图存、争取最后胜利的惟一正确道路

现在局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合作无以抗日，统一战线之能得全国拥护，可知趋势之所在了。

《致易礼容》（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7页

中国共产党向一切中国国民党人宣言：假如你们真正这样干的时候，我们是坚决地赞助你们的，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惟一正确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31—432页

诸位先生及国民党全体党员，还没有忘记上次大革命时两党合作的光荣历史吧，因为有了这个合作，一切民族压迫者与封建压迫者都在我们面前发起抖来了！那时的民族压迫者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深悉我们的合作会要进到彻底的胜利，会要使中国得到完全的解放，他们就挑拨离间威迫利诱无所不用其极，而且终于挑动了合作的一方，葬送了这个第一次的统一战线。先生们清夜扪心，也应该喟然兴叹吧！现在是谁也明白，如果那时中国国民党能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到底，那中国就决不会

有像现在这样任人宰割、沦亡及半的惨状，而决然是独立自由的中国了！现在全国人民盼望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之心是迫切到了万分，他们相信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32页

中国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新的有利的证据已经表现出来了。第一个证据，是还在中国共产党开始提出统一战线政策的时候，就立即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赞同。人心的向背，于此可见。第二个证据，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两党实行停战以后，立即引起了国内各党各派各界各军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团结状况。虽然这个团结对于抗日的需要说来还是异常不够的，特别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团结问题至今在基本上还没有解决。第三个证据，这是最为显著的，就是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这个抗战，就目前的情况说来，我们是不能满意的，因为它虽然是全国性的，却还限制于政府和军队的抗战。我们早已指出，这样的抗战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虽然如此，但是确实已经发动了百年以来未曾有过的全国范围的对外抗战，没有国内和平和两党合作这是做不到的。如果说当两党统一战线破裂的时候，日寇可以不费一弹而得东北四省，那末，当两党统一战线重新建立了的今日，日寇就非经过血战的代价不能得到中国的土地。第四个证据，就是对国际的影响。全世界工农民众和共产党，都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国共合作成立后，各国人民，特别是苏联，将更积极地援助中国。中苏已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今后两国关系有更进一步的希望。根

据上述的这些证据，我们可以判断，统一战线的发展，将使中国走向一个光明的伟大的前途，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倒和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

《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64—365页

统一战线必须坚持下去；只有坚持统一战线，才能坚持战争；只有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战争，才能有最后胜利。果然是这样，一切困难就能够克服。跨过战争的艰难路程之后，胜利的坦途就到来了，这是战争的自然逻辑。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66页

为了在目前过渡期间以及到了将来的新阶段，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是表示其对于困难之无能，而是表示其具有克服困难之伟力，就必须认真地巩固统一战线与扩大统一战线。并且应该懂得：长期的战争必须有长期的统一战线才能支持，战争的长期性与统一战线的长期性，是不能分离的。

《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400页

假如没有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建立与坚持，如此伟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之发动、持久与争取胜利，是不可能的。

《论新阶段》（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561页

只要我们能始终坚持抗战到底国策，坚持内部团结，尤其

是国共合作的方针，坚持力争全国进步的方针，那么，在有利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可以缩短时间，减少牺牲，而取得抗战的胜利。就是在更困难的形势下，我们同样可以而且一定能够克服一时困难，进而取得抗战的胜利。

《国际新形势与我国抗战》（一九三九年九月七日），《新华日报》

1939年9月7日

到了日本侵略者打入东三省以后，中国共产党就在一九三三年，向一切进攻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国民党军队提议：在停止进攻、给予人民以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这样三个条件之下，订立停战协定，以便一致抗日。但是国民党当局拒绝了这个提议。

从此以后，一方面，是国民党政府的内战政策越发猖狂；另一方面，是中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越发高涨。各种人民爱国组织，在上海和其他许多地方建立起来。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长江南北各地的红军主力，在我们党中央领导之下，经历了千辛万苦，移到了西北，并和西北红军汇合在一起。就在这两年，中国共产党适应新的情况，决定并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完整的政治路线，以团结抗日和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为奋斗目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群众，在我们党领导之下，发动了英勇的爱国运动，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把这种爱国运动推广到了全国各大城市。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国民党内部主张抗日的两派爱国分子——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联合起来，勇敢地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对日妥协和对内屠杀的反动政策，举行了有名的西安事变。同时，国民党内的其他爱国分子，也不满意国民党当局的当时政策。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当局被迫地放弃了内战政策，承认了人民的要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

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1036—1037页

● 政治民主是建立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

必须知道,为了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国内和平固然不行,没有国内民主也不行。所以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55页

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都是救亡抗战的必需条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缓的。而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抗战需要全国的和平与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没有巩固的和平与团结,没有人民的动员,抗战的前途便会蹈袭阿比西尼亚的覆辙。阿比西尼亚主要地是因为封建制度的统治,不能巩固内部的团结,不能发动人民的积极性,所以失败了。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56页

中国必须立即开始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

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这方面，应从改变国民大会的选举和召集上违反民主的办法，实行民主的选举和保证大会的自由开会做起，直到制定真正的民主宪法，召集真正的民主国会，选举真正的民主政府，执行真正的民主政策为止。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地巩固国内和平，停止国内的武装敌对，增强国内的团结，以便举国一致抗御外敌。……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战，取得保卫祖国和收复失地的胜利。当前几个月内，全国人民的民主运动，必须争取这一任务的某种最低限度的完成，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等等，都包括在内。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和人民的自由权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上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56—257页

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同抗日与和平、民主与和平互为条件一样。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4页

以抗战求国内和平团结，没有民主不能巩固和平与真正团结，抗日要全国人民参加，没有民主则老百姓不能参加，无和平团结，无人民参加，抗战成为不可能，即战亦不能保证胜利。

所以民主制度为对日抗战胜利之必要条件，非它不可。我们所以把民主问题强调起来，为的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

第1卷第500页

民主政治的实现，依赖民主运动，没有广大人民的要求与推动民主运动，则民主政治不会实现。全国各界各党派应团结起来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全国军人应该拥护民主运动，因为要挽救中国，战胜日本，避免沦为殖民地的危险，惟有实行民主政治，给予人民以参政的自由，才能实现。民主运动的具体进行，应注意国民大会的选举、召集与开会，应注意争取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与爱国救国的完全自由。这是起码的民主权利。如果整个国家向这个方向走，则统一的民主共和国是能实现的。

《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

第1卷第500页

应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以民主制度的普遍实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如果全国人民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充分自由，全国军队中官兵打成一片，军民又打成一片，全国教育也以民主精神实行之，全国经济建设发动了人民的力量并与改良人民生活相联结，全国各级政府都实行选举制度，并有各级人民的代议机关，而一切这些都是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那战胜日本就指日可期的了。

《同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一九三八年七月二日），《毛泽东文

集》第2卷第130—131页

没有革命民主政府，要领导抗日胜利是不可能的，全国广

大人民之渴望一个抗日的、给人民以自由的、民主集中制的与廉洁的政府有如望岁，故“争取民主”应在今后“反对投降继续抗战”的运动中与之联结起来。

“改良民生”的与之联结也是一样。不过，只有抗日才有实行民主可能，只有抗日与民主才有改良民生可能，这是今日政治形势中的实际，应该明白。

《反投降提纲》（一九三九年六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21页

没有民主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得到最后胜利是不能够的。亡国好还是不亡国好，我们说不要亡国好，但是要民主，没有民主一定要亡国。民主是什么东西呢？民主就是走路的自由权。有了这一条就够了，有了这一条我们可以随便走到什么地方，可以去反对法西斯、反对汉奸托派，所以这两个字一定要。

在陕甘宁边区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三日），《新中华报》1939年8月18日

共产党提出的实现民主政治，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以及改良人民生活，这些都是反封建的纲领。现在全国各地，不但工人农民，而且在小资产阶级，如广大的知识分子、学生青年、文化人，前进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军人中间，酝酿着一个很大的民主运动，问题是由于受国家的旧的政治机构所束缚，因而没有发展生长，所以，改革旧的政治机构，是一件重要的工作。毫无疑问，抗日而没有民主，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与民主是一件事的两方面。有一些人，赞成抗日，而反对民主，这种人，实际上是不愿意抗日胜利的，是要引导抗日到失败的人。

《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45页

为了打倒共同敌人以及为了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和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际关系，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洲已进入决战阶段，远东决战亦快要到来了，但是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这是苏联、美国、英国的经验都证明了的，中国几十年以来以及抗战七年以来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毫无疑问，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个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统一在军事上尤为需要，但是军事的统一，亦应建筑在民主基础上，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部分军队互相之间，如果没有一种民主生活、民主关系，这种军队是不能统一作战的。经济民主，就是经济制度要不是妨碍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而是促进其发展的。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学术思想、报纸与艺术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进其发展。党务民主，就是在政党的内部关系上与各党的相互关系上，都应该是一种民主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上，各国都应该是民主的国家，并发生民主的相互关系，我们希望外国及外国朋友以民主态度对待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民主态度对待外国及外国朋友。我重复说一句，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国内如此，新的国际联盟亦将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

《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讲话》（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69—170页

鉴于目前抗战形势之危急，而国内一般情况远未走上适合抗战需要之轨道，不论在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政治上到处都存在着严重的危机，政府与人民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军官与兵士之间、军官与军官之间、军队与军队之间无一不发生异常严重的脱节现象，全国人民皇皇不可终日，烦闷、苦恼与怨恨的情绪与日俱增，大家感觉没有出路，在此种种情况下，以致军心动摇，民心离异，以致不能停止敌人的进攻，不能配合盟国的反攻。造成这些严重危机的最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在一党独裁制度下完全没有民主。因此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不能动员与团结全国抗战力量，不能巩固军心民心，不能使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项设施符合抗战、民主与团结的需要。现在惟一挽救时局的办法，就是要求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由现在的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的代表，开紧急国是会议，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并由这个政府宣布并实行关于彻底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只有这样的新政府，但决不是请客式的、不变更一党专政实质的、不改变政策的所谓新政府，才能一新天下之耳目，才能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才能保障人民有充分民主自由的权利，才能发出积极抗战的军令与民主主义的政令，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而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增强抗战力量，停止敌人的进攻与实行我们的反攻，也才能实行真正由人民选举的国民大会与实现民主选举的政府。有了这样的新政府，国家统一也就可能实现了。如果一党专制的局面继续不变，则无法取得人民的信任，各种危机只会增大，人民不能动员，抗战不能胜利，离心离德的危险现象无法克服，国家统一断乎不能实现。

《为林伯渠起草的复王世杰、张治中的信》（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14—215页

●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当是全民族的，还应当是国际的

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民族的。这就是说，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开汉奸在外。有人说共产党倡导人民阵线，这是不对的。共产党倡导的是民族阵线，这种民族阵线比起法国或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来，范围广大得多。

《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79页

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包括资产阶级及一切同意保卫祖国的人们的，是举国一致对外的。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53页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否只限于国共两个党的呢？不是的，它是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两个党仅是这个统一战线中的一部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是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现在的统一战线事实上还停止在两个党的范围之内，广大的工人、农民、兵士、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许多爱国同胞还没有被唤起，还没有被发动，还没有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这是目前的最严重的情形。它的严重性，就是影响到前线不能打胜仗。华北以至江浙前线的严重危机，现在已经不能掩饰，也无须掩饰了，问题是怎样挽救这个危机。挽救危机的唯一道路，就是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即“唤起民

众”四个字。孙先生临终时的这个遗嘱，说他是积四十年的经验，深知必须这样做，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究竟根据什么理由一定不肯实行这个遗嘱？究竟根据什么理由在如此危急存亡的关头还不下决心实行这个遗嘱？谁也明白，统制、镇压，是和“唤起民众”的原则相违背的。单纯的政府和军队的抗战，是决然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

《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65—366页

我们曾经反复地指出，必须加强统一战线，实行革命的政策，才能进行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革命政策中特别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必须实现民主改革，以动员全体民众加入抗日战线。对于相信日本的“和平保证”，以为战争或可避免，以及相信不动员民众也可以抵抗日寇的人们，我们曾经反复地指出了他们的错误。战争的爆发及其经过，证明我们这些意见的正确。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共产党即向全国发出宣言，号召各党各派各阶层一致抵抗日寇的侵略，加强民族统一战线。不久我们又发表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政府所应采取的政策。国共合作成立之时，又发表了一个重要的宣言。这些都证明我们对于加强统一战线实行革命政策来进行抗日战争的这种方针，是坚持不懈的。在这个时期中，我们的基本口号就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73—374页

没有统一战线就不能抗日。从前，红军不能在中国各地自由走路，国共两党天天在打仗，怎么能抗日呢？有了苏联的帮

助，全世界人民特别是无产阶级的同情与援助，没有国共合作去打日本也是不成的。现在我们各方面的力量都还不够，党、政、军和人民各方面都要增强，就应该把统一战线巩固与扩大起来。国共合作，从政党上可以说是两个大拇指，但从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这个数量上说却是两个小指头，单靠两个小指头是打不倒日本的，要用两个拳头才能打倒日本。

《国共两党合作问题》（一九三八年四月五日），《党的文献》1995年第4期

在一切工作中，应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因为只有这种方针才能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才能普遍地深入地改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才能发动全军全民的全部积极性，为保卫一切未失地区、恢复一切已失地区而战，才能争取最后胜利。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13页

这个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军全民的统一战线，决不仅仅是几个党派的党部和党员们的统一战线；动员全军全民参加统一战线，才是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目的。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13页

什么叫做坚持统一战线？就是全国团结到底。只有坚持全国的团结，才能坚持抗战。现在虽然已有了全国的团结，但还

要更加团结，不但团结几个党派就行了，还须团结全国的人民。只有全国各界人民都团结在一定的组织之中，都发动了抗战的积极性，才算巩固与扩大了统一战线。

《同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一九三八年七月二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32页

抗战为什么遭受很多挫折，为什么至今还不能停止敌之进攻，实行我之反攻，除了客观原因之外，统一战线力量之不足，统一战线还没有必要的扩大与巩固，是其最主要的原因。由此可知，只有更加统一团结全民族，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支持长期战争与争取最后胜利，这是第一。

《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81页

为要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只有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全民族中的一切生动力量，这是独一无二的方针。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3页

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才有可能。孙中山先生在他的遗嘱里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位老先生死了十多年了，连同他说的四十年，共有五十多年，这五十多年来的革命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呢？根本就是“唤起民众”这一条道理。你们应该好好地研究一下，全国青年都应该好生研究。青

年们一定要知道,只有动员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才能战胜帝国主义,才能战胜封建主义。现在我们要达到战胜日本建立新中国的目的,不动员全国的工农大众,是不可能的。

《青年运动的方向》(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2卷第564—565页

所有的老百姓,所有一切抗战的爱国分子,统统组织到这个巩固的统一战线中来,这是基本的力量。所以,没有统一战线,也就没有收复一切失地的希望;要收复一切失地,就一定要组成统一战线。

《结成坚固的统一战线,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八日),《党的文献》1995年第4期

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抗日的。因此,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正向中国侵略。但是我们要求英、美、法、苏等国同情中国的抗日运动,至少不反对;在这个基点上我们愿意同这些国家建立友谊的关系。

《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79页

现在有三个反侵略的统一战线:中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统一战线,还有一个是日本的统一战线,在日本有广大人民群众不赞成他们政府侵略中国,正在组织反侵略的统一战线。这三个统一战线的目标是一样的,就是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有人说,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反侵略运动都失败了,今

天的反侵略运动也会失败。这是不对的。今天的情况和过去不同，主要因为今天不但有了全国的反侵略统一战线，而且这个统一战线恰好和历史上空前的全世界反侵略统一战线相遇合；不但能和全世界的统一战线相遇合，而且恰好又和历史上空前的日本内部矛盾相遇合，即同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相遇合。这些历史特点是从前没有的，现在恰巧都有了。所以我们说中国的打败仗是暂时的，中国的抗战一定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其根据就在这里。这三种统一战线，正如日初升，向着日益巩固日益扩大的方向走去，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们，悲观主义是没有根据的。

《在延安反侵略大会上的演说》（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90页

现在的情况与过去不同，世界上有三个统一战线——国际的、中国的以及日本国内的——可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三个统一战线互相配合起来，共同对着一个目标，我们相信一定会把情况变换，中国一定会往新的方向走。

《对陕北公学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一九三八年三月三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05页

同志们要知道，今天要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克服困难，夺取抗战胜利，获得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一切等等，都得依靠统一战线这个法宝。

统一战线是什么？是抗战的团结，是各个党派、各个阶级、各个军队、各个民族抗日的大团结，这个大团结就叫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抗日的统一战线不但要是中国的，而且要是全世界的，只有中国的是不够的。世界凡是能够反对日本侵略

的，不管他反对的程度如何，我们要统统地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抗日统一战线。我们这个统一战线有中国的力量，又有世界的力量，是一个伟大的团体。

《坚持国共长期合作》（一九三九年七月九日），《党的文献》1995年第4期

我们要收复一切失地，没有全世界的统一战线的帮助是不行的，绝不能成功的。中国是世界的一环，绝不能脱离世界而生活。当然，我们不是绝对地依靠外国，依靠人家，而不要自力更生了，我们主要的还是依靠自己，还是要自己努力。我们绝不能像有些人那样，他们的眼睛只盯着外国，而中国自己的伟大力量都看不到了。

《结成坚固的统一战线，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八日），《党的文献》1995年第4期

5. 解放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

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在农村中，一方面应坚定地解决土地问题，紧紧依靠雇农、贫农，团结中农；另一方面在进行解决土地问题时，应将一般富农、中小地主分子和汉奸、豪绅、恶霸分子，加以区别。对待汉奸、豪绅、恶霸要放严些，对待富农、中小地主主要放宽些。在一切土地问题已经解决的地方，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应对整个地主阶级改取缓和态度。对一切生活困难的地主给以帮助，对逃亡地主招引其回来，给以生活出路，借以减少敌对分子，使解放区得到巩固。在城市中，除团结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切进步分子外，应注意团结一切中间分

子，孤立反动派。在国民党军队中，应争取一切可能反对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

《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87—1188页

美蒋的上述反动政策，迫使中国各阶层人民处于团结自救的地位。这里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这是一个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它和抗日时期的统一战线相比较，不但规模同样广大，而且有更加深刻的基础。全党同志必须为这个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而奋斗。

《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13页

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

《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24—1225页

被蒋介石政府各项反动政策所压迫、处于团结自救地位的中国各阶层人民，包括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这是一个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

《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25页

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

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37页

在现阶段，民族资产阶级的多数是增长了对美蒋的仇恨，他们中间的左翼分子依附于共产党，右翼分子则依附于国民党，其中间派则在国共两党之间采取犹豫和观望的态度。这种情况，使得我们有必要和可能争取其大多数，孤立其少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对这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必须慎重地加以处理，必须在原则上采取一律保护的政策。否则，我们便要在政治上犯错误。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一九四八年三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89页

此次人民解放战争之所以胜利，是由于全国人民不畏强御，团结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一致奋起，相与协力，从而使人民解放军获得各方面的援助，使人民的敌人完全陷于孤立，胜负之数，因以判明。

《复李济深等五十六人电》（一九四九年二月二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53页

（二）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

（参见第七编“关于政策和策略”，第1783—1836页）

（三）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

1. 党的坚强领导是统一战线胜利的保证

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广泛的队伍，我们不能希望每部分都有如同共产党和红军一样程度的巩固。在他们的活动过程中，有些坏分子因为受了敌人的影响退出统一战线的事情，是会发生的。但是我们不怕这些人退出去。一些坏人受敌人的影响退出去，一些好人却会受我们的影响加进来。只要共产党和红军本身是存在的，发展的，那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然也会是存在的，发展的。这就是共产党和红军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7页

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在今天，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还带着很多的被动性和保守性，对于共产党发起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长久的时期中表示不敢接受，就是证据。这种情况，加重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责任。抗日救国的总参谋部的职务，共产党是责无旁贷和义不容辞的。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62页

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57页

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我们的军队,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军队。所谓无产阶级领导,就是经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人民大众主要就是农民。我们讲能够胜利,就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1—22页

2. 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

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9页

无产阶级的坚固的同盟者是农民,其次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同我们争领导权的是资产阶级。

对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的克服，依靠群众的力量和正确的政策，否则资产阶级将反过来克服无产阶级。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6页

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在当前的具体的政治任务中，这个问题即是说：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

为什么要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呢？这是因为：

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国民党实力上的优势，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宣言和决议对于共产党的污蔑和侮辱以及所谓“停止阶级斗争”的叫嚣，国民党关于“共产党投降”的衷心愿望和广泛宣传，蒋介石关于统制共产党的企图，国民党对于红军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国民党对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国民党七月庐山训练班提出的“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的阴谋计划，国民党对共产党干部所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某些小资产阶级急进分子在政治上的投降举动（以章乃器为代表），等等情况。

另一方面，共产党内理论水平的不平衡，许多党员的缺乏北伐战争时期两党合作的经验，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大量存在，一部分党员对过去艰苦奋斗的生活不愿意继续的情绪，统一战线中迁就国民党的无原则倾向的存在，八路军中的新军阀主义倾向的发生，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政权问题的发生，抗日民主根据地中的迁就倾向的发生，等等情况。

由于上述两方面的严重的情况，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

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91—392页

当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着分裂统一战线的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会要后退一步。

《〈共产党人〉发刊词》（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05页

（一）由于中国最大的压迫是民族压迫，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的斗争的。因此，无产阶级在这种一定的时期内，应该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地保持之。（二）又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下，它就会动摇变节。因此，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内容不能始终一致，而是要发生变化的。在某一时期有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在内，而在另一时期则民族资产阶级并不参加在内。（三）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它们所豢养的阶级。因此，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都是革命的对象。但是，由于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是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在各个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尖锐化的时候，在革命的锋芒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大资产阶级集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种一定的时期内，中国无产阶级为了削弱敌人和加强自己

的后备力量，可以同这样的大资产阶级集团建立可能的统一战线，并在有利于革命的一定条件下尽可能地保持之。（四）在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并和无产阶级一道向共同敌人进行斗争的时候，它仍然是很反动的，它坚决地反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发展，而要加以限制，而要采取欺骗、诱惑、“溶解”和打击等等破坏政策，并以这些政策作为它投降敌人和分裂统一战线的准备。

《〈共产党人〉发刊词》（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06—607页

中国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这种二重性，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的这种二重性，就不能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中国共产党的党的建设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在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中间发展起来和锻炼出来的。这里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一定时期中同资产阶级联合，党就不能前进，革命就不能发展；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如果我们党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不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武装斗争，同样党也就会瓦解，革命也就会失败。

《〈共产党人〉发刊词》（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08—609页

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时代，大资产阶级与大地主阶级也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我们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大资产阶级与大地主阶级可以成为我们的同盟军，有些时候就在我们的领导下。

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主要的不是对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而是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我们要把农民、小资产阶级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放在我们的领导之下。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12—413页

3. 坚持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与南京谈判，在红军、苏区方面以保证我们的绝对领导为原则，在两党关系方面以保证我党独立性为原则，这些方面绝对不能让步，……

给彭雪枫的电报（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第667—668页

坚持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同时，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不论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党派也好，都是这样。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在党派问题上说来，就是容许各党派互相联合，又容许各党派独立存在。如果只谈统一性，否认独立性，就是背弃民权主义，不但我们共产党不能同意，任何党派也是不能同意的。没有问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如果认为它是绝对的，就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但

是决不能抹杀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无论在思想上也好，在政治上也好，在组织上也好，各党必须有相对的独立性，即是说有相对的自由权。如果被人抹杀或自己抛弃这种相对的自由权，那就也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4—525页

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在此原则下，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8—539页

在现时，有些应该先得国民党同意，例如将三个师的番号扩编为三个军的番号，这叫做先奏后斩。有些则造成既成事实再告诉它，例如发展二十余万军队，这叫做先斩后奏。有些则暂时斩而不奏，估计它现时不会同意，例如召集边区议会之类。有些则暂时不斩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妨碍大局的事情。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40页

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既须统一，又须独立。

《论政策》（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63页

力争领导权，力争独立自主的路线，是我们党中央的路线，是反映了全党大多数同志要求的路线，是反映了全国大多数人民要求的路线。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15页

4. 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士的关系

● 共产党员只有同党外人士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

共产党员应和党外一切先进分子协同一致，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克服各种不良现象而努力。必须懂得，共产党员不过是全民族中的一小部分，党外存在着广大的先进分子和积极分子，我们必须和他们协同工作。那种以为只有自己好、别人都不行的想法，是完全不对的。共产党员对于落后的人们的态度，不是轻视他们，看不起他们，而是亲近他们，团结他们，说服他们，鼓励他们前进。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2页

我们共产党人对于一切革命的人们，是决不排斥的，我们将和所有愿意抗日到底的阶级、阶层、政党、政团以及个人，坚持统一战线，实行长期合作。但人家要排斥共产党，那是不行的；人家要

分裂统一战线，那是不行的。中国必须抗战下去，团结下去，进步下去；谁要投降，要分裂，要倒退，我们是不能容忍的。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83页

对于共产党以外的人员，不问他们是否有党派关系和属于何种党派，只要是抗日的并且是愿意和共产党合作的，我们便应以合作的态度对待他们。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一九四〇年三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42页

一部分共产党员，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还保存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作风。他们还不明白共产党员有义务同抗日的党外人士合作，无权利排斥这些党外人士的道理。这就是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要联系人民群众，而不要脱离人民群众的道理。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9页

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9页

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的人合作，

现在就应在参议会中好好实行起来。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9页

我们的同志必须懂得一条真理: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员相比较,无论何时都是占少数。假定一百个人中有一个共产党员,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中就有四百五十万共产党员。即使达到这样大的数目,共产党员也还是只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非党员。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和非党人员合作呢?对于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以及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我们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一部分党员却不懂得这个道理,看不起愿意同我们合作的人,甚至排斥他们。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给了我们这样的根据吗?没有。相反地,他们总是谆谆告诫我们,要密切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中国共产党中央给了我们这个根据吗?没有。中央的一切决议案中,没有一个决议说是我们可以脱离群众使自己孤立起来。相反地,中央总是叫我们密切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所以,一切脱离群众的行为,并没有任何的根据,只是我们一部分同志自己造出来的宗派主义思想在那里作怪。因为这种宗派主义在一部分同志中还很严重,还在障碍党的路线的实行,所以我们要针对这个问题在党内进行广大的教育。首先要使我们的干部真正懂得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使他们懂得共产党员如果不同党外干部、党外人员互相联合,敌人就一定不能打倒,革命的目的就一定不能达到。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26页

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任务是：除了汉奸及决心破坏抗战团结者外，一切阶层的抗日人民，不论是有党有派，或者无党无派，不论是同情我党的，或者只在一部分纲领上愿与我党合作的，也不论是已经与我党共事的，或者尚未与我党共事的，共产党员都必须和他们一致合作，共同为抗战建国的总目标而奋斗。

《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一九四二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94页

不论是抗日根据地的党在政府、军队、党务、民运、文化教育部门内或者是秘密党内，都存在着一部分党员及一部分党组织与党外人员之间的严重的隔离现象，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的作风并未完全扫除。这些党员与党组织，至今还不懂得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内容与意义。他们违背我党密切联系民众的原则。他们不是密切联系民众，而是孤立于民众之外；不是站在民众之中，虚心体会民众的心理，而是站在民众之上，自以为是，称王称霸。他们不愿意倾听党外人员的意见，把党外人员看作无足轻重。他们不愿向党外人员学习，反以领导者自居。他们对于愿与我党合作的党外人员，或漠不关心，不予信任，或吹毛求疵，求全责备。他们对于政权的“三三制”不愿坚决实行，对于民众团体仍取包办态度。

《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一九四二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94—395页

党外的人占百分之九十九，只有他们和我们一起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单靠党员毫无办法，是不是这样？这是不是真理？完全是真理。他们中间有领袖，有干部，我们要帮助他们，培养

人民中的优秀分子，同时尊重他们，和他们好好合作。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49页

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人应当继续执行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管什么人，哪怕昨天还是反对我们的，只要他今天不反对了，就应该同他合作，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88页

共产党人在各个地方性的联合政府的工作中，在社会工作中，应当继续同一切抗日民主分子，在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基础上，进行很好的合作。

同样，在军事工作中，共产党人应当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合作的抗日民主分子，在解放区军队的内部和外部，很好地合作。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90—1091页

全党要注意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并且要加强这个合作，使我们能联合更多的人，联合得更好。统一战线是一门专门科学，我们党内有很多人还没有学会，很多人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我们要学会这一门科学。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15页

共产党要永远与非党人士合作，这样就不容易做坏事和发生官僚主义。

《同绥远负责人的谈话》（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4页

● 共产党员同党外人士合作，要采取平等态度和民主作风，决不可独断专行

在一切有愿意和我们合作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存在的地方，共产党员必须采取和他们一道商量问题和一道工作的态度。那种独断专行，把同盟者置之不理的态度，是不对的。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6页

上述人员的分配是党的真实的政策，不能敷衍塞责。为着执行这个政策，必须教育担任政权工作的党员，克服他们不愿和不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绝不能以为我们有军队和政权在手，一切都要无条件地照我们的决定去做，因而不注意去努力说服非党人士同意我们的意见，并心悦诚服地执行。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一九四〇年三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42—743页

对参加我们政权的党外人士的生活习惯和言论行动，不能要求他们和共产党员一样，否则将使他们感到不满和不安。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一九四〇年三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43页

我们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小宗派，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

人商量问题。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10页

我们的许多同志,喜欢对党外人员妄自尊大,看人家不起,藐视人家,而不愿尊重人家,不愿了解人家的长处。这就是宗派主义的倾向。这些同志,读了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之后,不是更谦虚,而是更骄傲了,总是说人家不行,而不知自己实在是一知半解。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25—826页

共产党员自始至终都只是人民中的极少数,没有绝大多数人民了解我党主张,真心实意地愿与我党合作,我党主张便无从实现。因此,对于一切忠诚抗日的人员,共产党员只有与他们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

《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一九四二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95页

共产党员必须与党外人员实行民主合作,倾听党外人员的意见,和他们一起,共同商量问题与决定问题,共同遵守少数服从多数、局部服从全体、下级服从上级的民主集中制,并须使党外人士有职有权,敢于说话,敢于负责。

《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一九四二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96页

党员及党组织不得任意地无根据地怀疑党外人员,必须从友谊中细心了解自己周围的每个党外人员的历史和特性,细心

了解他们对人民、对我党及对工作的意见和要求。对于他们的宗教信仰、思想自由及生活习惯，必须加以尊重。须知党外人员的愿与我党合作与我党的尊重党外人员，是彼此合作中不可缺一的条件。

《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一九四二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96—397页

与我党共事的党外人员在工作中发生过失时，有关的党组织和党员必须加以慎重考虑，采取适当方式，以诤友的态度，适时地诚恳地告诉他以所犯过失的真确事实及正当理由，并与其协商改正的办法，帮助他改正过失。决不可采取缄默不言、听其积累或当面不说、背后议论的态度，须知这种态度是只会妨碍合作与不利于党外人员的。

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凡与我党共事的党外人员，在法律上是与共产党员完全平等的。在工作上，应给以必需和可能的工作条件。在学习上，凡在一切有党外人员的机关、学校中，无论在职干部教育或学校教育，党外人员均与共产党员有同样的学习权利。在物质上，不是空唤优待，而是按工作情况、工作需要及现有物质条件给以真正必需的帮助，并须使党员了解这种帮助是应该的。

《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一九四二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97—398页

共产党人必须和其他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多商量，多座谈，多开会，务使打通隔阂，去掉误会，改正相互关系上的不良现象，以便协同进行政府工作与各项社会事业。凡参加人民代表会议（参议会）工作、政府工作及社会工作的一切人员，不

问属何党派，或无党无派，应该一律被尊重，应该一律有职有权。

《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39页

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7页

● 共产党员必须自觉地接受党外人士的批评

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除了勾结日寇汉奸以及破坏抗战和团结的反动的顽固派，这些人当然没有说话资格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有说话的自由，即使说错了也是不要紧的。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9页

为了认真地彻底地纠正各种不良现象，改造党的作风，必须在党内展开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即关门主义）的斗争，

在一切地方与一切部门中展开自我批评，并将这种自我批评公开于党外人员之前，毫不姑息，毫不掩饰，以收彻底揭发与彻底纠正之效。

《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一九四二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95页

必须将关心和倾听党外人员的意见和要求及向党外人员学习，作为每个共产党员的严重责任。一切党员，都有责任经常地将党外人员的意见和要求（不论是正确的或不正确的）反映到党内及各工作部门内，而一切党组织与一切工作部门的领导人员都有责任考虑这些意见和要求，并须适时地列入议事日程，加以讨论及解决。

《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一九四二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95页

任何愿与我党合作的党外人员，对我党和我党党员及干部都有批评的权利。除破坏抗战团结者的恶意攻击以外，一切善意批评，不论是文字的、口头的或以其他方式的，党员及党组织都应虚心倾听。正确的批评，应加接受，即使其批评有不确当者，亦只可在其批评完毕，并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加以公平的与善意的解释。绝对不可文过饰非，拒绝党外人员的批评，或曲解善意批评为攻击，而造成党外人员对党的过失缄口不言的现象。党外人员对于违犯政府法令或党的政策的党员及干部，除得向法庭或行政机关依法控诉外，并有权向各级党委控告，直到党的中央。

《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一九四二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97页

● 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同我们真诚合作过的友人

我们共产党人将始终和一切真诚的三民主义者实行长期合作，除了汉奸和那班至死不变的反共分子外，我们是决不抛弃任何友人的。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94页

对于那些同我党共过患难确有相当贡献的开明绅士，在不妨碍土地改革的条件下，必须分别情况，予以照顾。其中政治上较好又有工作能力者，应当继续留在高级政府中给以适当的工作。政治上较好但缺乏工作能力者，应当维持其生活。其为地主富农出身而人民对他们没有很大恶感者，按土地法平分其封建的土地财产，但应使其避免受斗争。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70页

我们不要抛弃那些过去和我们合作过、现在也还同我们合作、赞成反美蒋和土地改革的开明绅士。例如晋绥边区的刘少白、陕甘宁边区的李鼎铭等人，在抗日战争和抗日战争以后的困难时期内，曾经给我们以相当的帮助，而在我们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他们又并不妨碍和反对土地改革，因此对他们仍应采取团结的政策。但是团结他们，并不是说将他们当作决定中国革命性质的力量来看。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一九四八年三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88页

正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需要有自己的朋友，应当记住自己的朋友，而不要忘记他们。忠实于人民革命事业的朋友，努力保护人民利益而反对保护敌人利益的朋友，在中国无疑是不少，无疑是一个也不应被忘记和被冷淡的。

《将革命进行到底》（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78页

只要人们在革命战争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贡献，又在今后多年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有所贡献，等到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时候（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人民是不会把他们忘记的，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我认为讲明这一点是有必要的，这样可以使人们有信心，不致彷徨顾虑，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们不要我了，我虽想为人民效力也没有机会了。不，不会这样的，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

《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四日、二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80—81页

5. 反对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

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关门主义的策略，是正相反对的两个不

同的策略。

一个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

一个则依靠单兵独马，去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

一个说，如果不够地估计到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行动能够变动中国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就不能够地估计到组织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如果不够地估计到日本反革命势力、中国反革命势力和中国革命势力这几方面的强点和弱点，就不会够地估计到组织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就不会采取坚决的办法去打破关门主义；就不会拿着统一战线这个武器去组织和团聚千千万万民众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卖国贼这个最中心的目标而攻击前进；就不会拿自己的策略武器去射击当前的最中心目标，而把目标分散，以至主要的敌人没有打中，次要的敌人甚至同盟军身上却吃了我们的子弹。这个叫做不会择敌和浪费弹药。这样，就不能把敌人驱逐到狭小的孤立的阵地上去。这样，就不能把敌人营垒中被裹胁的人们，过去是敌人而今日可能做友军的人们，都从敌人营垒中和敌人战线上拉过来。这样，就是在实际上帮助了敌人，而使革命停滞、孤立、缩小、降落，甚至走到失败的道路上去。

一个则说，这些批评都是不对的。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拼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因此，结论：关门主义是惟一的法宝，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策略。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3—155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革命队伍中的幼稚病。坚持关门主义策略的人们所主张的,就是一套幼稚病。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5页

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同时又向尾巴主义作斗争,是执行党的任务的必要的条件。我们党在民众运动中,有严重的关门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传统倾向,这是一个妨碍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争取多数群众的恶劣的倾向。在

每一个具体的工作中肃清这个倾向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的要求是依靠多数和照顾全局。陈独秀尾巴主义的复活是不能容许的，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降低党的立场，模糊党的面目，牺牲工农利益去适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将必然引导革命趋于失败。我们的要求是实行坚决的革命政策，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64页

为了坚持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为了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必须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任何破裂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的主张是不许可的。“左”倾关门主义仍然要防止。但是在同时，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我们和国民党及其他任何派别的统一战线，是在实行一定纲领这个基础上的统一战线。离开了这个基础，就没有任何的统一战线，这样的合作就变成无原则的行动，就是投降主义的表现了。因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94页

上面说的是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它引导无产阶级去适合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不彻底性。不克服这个倾向，就不能进行胜利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就不能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就不能保卫祖国。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95页

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为了争取中华民族和劳动群众的解放，为了使反对民族投降主义的斗争坚决有力，必须反对共产党内部和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的投降倾向，要使这一斗争开展于各方面的工作中。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96页

怎样巩固统一战线来达到“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目的呢？要用两条战线的斗争。

一条是反对关门主义，要跟从前的仇人讲亲爱，跟地主、资本家、小资产阶级统统团结起来，只要他们愿意的话。我们这里有些人，生怕资产阶级的垃圾沾上身，说他们要不得，跟他们不要讲亲爱，不要讲团结，以为自己关起门来研究研究马克思主义，抗战就可以胜利。这种人的思想是真正地要不得，我们要反对，因为关门主义是妨碍团结、妨碍统一战线的。另外还有些人，思想很糊涂，是“发国难财”、“吃磨擦饭”的家伙，这种人我们也要反对。团结的敌人便是破坏团结和不讲团结。斗争好比火线上打仗一样，打击了不讲团结的关门主义，又打击了吃磨擦饭的顽固分子，这是一条战线。

再有一条战线，还要打击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借讲“统一”要把共产党取消，并到国民党里面去，他们常说“纳共产党于国民党之道”。可是，取消共产党，对实行三民主义是有损无益的。我们对于实行民族主义（抗日战争）是最坚决的，对民权主义也实行得最彻底。陕甘宁边区就是一个例子，最近有一个美国记者参加了几天边区的参议会，他说这里的民主比美国高明得多。在全国，就是我们这里实行了民权主义与民生主

义，在其他地方，嘴里说要实行三民主义，实际上只有一民主义（抗日），而且实行得还不大好。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我们有百折不回的精神要把三民主义实行到底。人家说不要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你说可以可以，这就不对，是投降主义；人家说不要共产主义，你就唯唯诺诺，这也是投降主义。在现在，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坚决的实行者；在将来，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无条件的实行者。

《又团结，又斗争》（一九三九年二月五日），《党的文献》1995年
第4期

“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是我们党在今年的《七七宣言》里提出来的三大政治口号。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做，中国才能避免亡国，并把敌人打出去；除此没有第二条路好走。

《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91—592页

无产阶级的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组织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必须实行坚决的、严肃的两条战线斗争。一方面，要反对忽视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斗争的可能性的错误。这种错误，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看做一样，因而忽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保持这个统一战线的政策，这就是“左”倾关门主义。另一方面，则要反对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看做一样的东西，忽视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的错误。这种错误，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不但在极力影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而且还在极力影响无产阶级和共

产党，力求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力求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力求使革命果实归于资产阶级的一群一党的事实；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一到革命同他们一群一党的私利相冲突时，他们就实行叛变革命的事实。如果忽视了这一方面，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共产党人〉发刊词》（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07—608页

共产党人不许可同人家建立无原则的统一战线，因此，必须反对所谓溶共、限共、防共、制共的一套，必须反对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但同时，任何共产党员也不许可不尊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因此，一切共产党员必须在抗日原则下团结一切尚能抗日的人，必须反对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

《团结到底》（一九四〇年七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60页

在目前反共高潮的形势下，我们的政策有决定的意义。但是我们的干部，还有许多人不明白党在目前时期的政策应当和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有重大的区别。必须明白，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决不会变更的；过去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政策，现在不应当再简单地引用。尤其是土地革命的后期，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革命的长期性这两个基本特点而产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例如以为第五次“围剿”和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斗争是所谓革命和反革命两条道路的决战，在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过左的劳动政策和税收政策）和

富农（分坏田），在肉体上消灭地主（不分田），打击知识分子，肃反中的“左”倾，在政权工作中共产党员的完全独占，共产主义的国民教育宗旨，过左的军事政策（进攻大城市和否认游击战争），白区工作中的盲动政策，以及党内组织上的打击政策等等，不但在今天抗日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这种过左政策，适和第一次大革命后期陈独秀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相反，而表现其为“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除基本农民以外），实为代表两个极端政策的极明显的例证。而这两个极端的政策，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

《论政策》（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62—763页

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内，由于只知道联合、不知道斗争和过分地估计了国民党的抗日性，因而模糊了国共两党的原则差别，否认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的政策，迁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迁就国民党，甘愿束缚自己的手足，不敢放手发展抗日革命势力，不敢对国民党的反共限共政策作坚决斗争，这种右倾观点，过去曾经严重地存在过，现在已经基本上克服了。但是，自一九三九年冬季以来，由于国民党的反共磨擦和我们举行自卫斗争所引起的过左倾向，却是普遍地发生了。虽然已经有了一些纠正，但是还没有完全纠正，还在许多地方的许多具体政策上表现出来。所以目前对于各项具体政策的研究和解决，是十分必要的。

《论政策》（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65—766页

中国社会最基本特点是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党对这个问题要慎重处理。反映到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及由于这种思想而产生的错误，也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现象，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现象。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内战时期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过去在国际上也有这种现象，例如在巴黎公社时期犯“左”的布朗基主义错误，后来又犯第二国际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个规律是由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采用的政策会反映到无产阶级党内来。例如，中国资产阶级蒋介石在抗战时期采用联共政策时，我们党内容易产生右倾错误；在皖南事变时，便产生“左”倾错误，有人认为是又一次“马日事变”，主张举行全国暴动等等，资产阶级一触，我们即跳。

《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93—94页

我们的原则是孤立敌人而不是孤立自己。北伐战争时期，我们党本来是不孤立的，后来因陈独秀右倾而孤立了，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农民，脱离了军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机会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左”，先是表现在城市工作方面，不但把自己孤立了，而且到后来在城市简直立也立不住了，只好退到农村。到了农村，他们又有军事斗争方面的“左”和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方面的“左”。他们把赤白对立绝对化；对中小资产阶级实行过左政策，片面强调工人利益而把工商业很快搞垮了；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并损伤了一部分中农的利益。当然，我们党在农村中还是有群众的，不能说是在农民中完全孤立。总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实行“左”的政策的结果，我们没能孤立蒋介石，而是孤立了自己。抗战时期我们孤立了蒋介石。

石（如果在抗战胜利以后再孤立他就来不及了），我们对他采取的是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坚决同蒋介石的反人民政策作斗争，这是反右，但如果只斗争而不同他合作，不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而改为减租减息，不实行“三三制”等政策，群众就不能理解我们。党在抗战时期实行这些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过去我们吸收一些开明绅士参加政府工作是完全必要的，将来占领西安、太原、上海等地以后也还是需要的。

《在杨家沟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330—331页

七、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 ——武装斗争

（一）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 三大法宝之一

1.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7页

一、湖南的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要来制造这个暴动，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暴动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二、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湖南秋收暴动要有军队帮助》(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7页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41页

蒋介石代替孙中山,创造了国民党的全盛的军事时代。他看军队如生命,经历了北伐、内战和抗日三个时期。过去十年的蒋介石是反革命的。为了反革命,他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央军”。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这个基点,他是抓得很紧的。对于这点,我们应向他学习。在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

辛亥革命后,一切军阀,都爱兵如命,他们都看重了“有军则有权”的原则。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45—546页

外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不需要各自直接管领一部分军队。中国则不同,由于封建的分割,地主或资产阶级的集团或政党,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处在这样环境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看清问题的中心。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46页

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

煮)，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全民抗战，把劳动人民推上了战争的舞台，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这个战争的最自觉的领导者。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有人笑我们是“战争万能论”，对，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者，这不是坏的，是好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共产党的枪杆子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我们要造一个民主共和国。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46—547页

2. 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

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我们建议中央，用大力做军事运动。

《井冈山的斗争》（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79页

“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斯大林同志的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无论是对于北伐战争说来，对于土地革命战争说来，对于今天的抗日战争说来，都是正确的。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43页

中国革命战争在其历史进程的各个时期中有不相同的内容。然而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都是革命战争，都表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革命战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这一论断，完全适合于中国的情况。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44页

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半封建经济占优势而又土地广大的国家，这就不但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基本的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并且规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我们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这一特点，这一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特点，也是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或是同那些国家不相同的。

《〈共产党人〉发刊词》（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04页

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也就决定了。因为我们的敌人不给中国人民以和平活动的可能，中国人民没有任何的政治上的自由权利。……因此，那种轻视武装斗争，轻视革命战争，轻视游击战争，轻视军队工作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34—635页

3. 在中国离开武装斗争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

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二七年七月四日），《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第205页

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的和差不多开始就面对着的任务，是联合尽可能多的同盟军，组织武装斗争，依照情况，反对内部的或外部的武装的反革命，为争取民族的和社会的解放而斗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44页

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问题离开武装就不能解决。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44页

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十八年来，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这个拿血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

《〈共产党人〉发刊词》（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10页

集中一切力量为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而斗争，乃是你们最主要最主要的任务。要使干部明白，没有伟大革命武装与伟大革命根据地，抗日胜利是不可能的。

《集中力量发展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65—266页

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这是经过调查研究以后才找到的办法。这个调查研究很重要。看到人家手里拿着东西了，我们就要调查一下。他手里拿的是什么？是刀。刀有什么用处？可以杀人。他要拿刀杀谁？要杀人民。调查了这几件事，再调查一下：中国人民也有手，也可以拿刀，没有刀可以打一把。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发现了这个真理。军阀、地主、土豪劣绅、帝国主义，手里都拿着刀，要杀人。人民懂得了，就照样办理。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26—1127页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

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31页

（二）建立一支人民的军队

（参见第五编“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和国防建设”，第1185—1267页）

（三）放手发动群众，进行人民战争

（参见第五编“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和国防建设”，第1300—1319页）

（四）武装斗争要同其他斗争形式相配合

（参见第七编“关于政策和策略”，第1776—1779页）

（五）党对武装斗争的绝对领导是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保证

（参见第五编“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和国防建设”，第1200—1214页；第八编“关于党的建设”，第1853—1870页）

八、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一）革命只能首先并长期在农村发展

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革命的胜利总是从那些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首先开始，首先发展，首先胜利；而在那些反革命势力雄厚的地方，革命还是没有起来，或者发展得很慢。这是中国革命在过去长时期内已经遇到的情形。在将来，可以想到，在某些阶段里，革命的总的形势是更加发展了，但是不平衡状态还会存在着。要把不平衡的状态变到大体上平衡的状态，还要经过很长的时间，还要花费很大的气力，还要依靠党的策略路线的正确。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2—153页

为什么我们要上井冈山呢？因为下面住不得，没有法子才上山去，打游击战。我们要实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就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可是这旗帜不准我们在城内插，我们就只好到山顶上去插，永不放下。以前插在井冈山，插在雪山、昆仑山，现在插在清凉山。

《合则两利，分则两伤》（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党的文献》1995年第4期

敌人占领中国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之后，敌据城市以对我，我据乡村以对敌，乡村能够战胜城市吗？答复：有困难，但是能够的。抗日战争的长期性，不但由于敌是帝国主义国家，我是半殖民地国家，而且由于这个帝国主义又复占据我之城市，我则退至乡村以抗敌，因而造成了长期性，速胜论在此是毫无根据的。然而今天中国的城市乡村问题，与资本主义外国的城市乡村问题有性质上的区别。在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在实质上形式上都统制了乡村，城市之头一断，乡村之四肢就不能生存。不能设想，在英、美、法、德、日、意等国，能够支持长期反城市的乡村农民战争。半殖民地小国也不可能。半殖民地大国如中国，在数十年前也很困难。半殖民地大国如中国，在今天，却产生了这种可能。这里明显的是三个三位一体的条件。第一是半殖民地条件。在半殖民地，城市虽带着领导性质，但不能完全统制乡村，因为城市太小，乡村太大，广大的人力物力在乡村不在城市。第二是大国的条件。失去一部，还有一部。敌以少兵临大国，加以我之坚强抵抗，就迫使敌人发生了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困难，这样就不但给了我一个总的抗日根据地，即大后方，例如云、贵、川等地，使敌无法占领；而且在敌后也给了我以广大游击活动地盘，例如华北、华中、华南等地，使敌无法全占。第三是今日的条件。如果在数十年前中国被一个强大帝国主义国家武装侵占，例如英占印度那样，那是难免亡国的。今天则不同，今天主要的是中国进步了，有了新的政党、军队与人民，这是胜敌的基本力量。……总之，在今天的半殖民地大国如中国，存在着许多优良条件，利于我们组织坚持的长期的广大的战争，去反对占领城市的敌人，用犬牙交错的战争，将城市包围起来，孤立城市，从长期战争中逐渐生长自己力量，变化敌我形势，再配合之以世界的变动，就能把敌人驱

逐出去而恢复城市。

《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96—397页

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42页

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在这种情形下面，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由于中国土地的广大（革命势力有回旋的余地），由于中国的反革命营垒内部的不统一和充满着各种矛盾，由于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样，就使得在一方面，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而在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了革命的不平衡状态，给争取革命全部胜利的

事业带来了长期性和艰苦性。由此也就可以明白，在这种革命根据地上进行的长期的革命斗争，主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游击战争。因此，忽视以农村区域作革命根据地的观点，忽视对农民进行艰苦工作的观点，忽视游击战争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35—636页

还有一个十几年来争论的问题，就是从乡村到城市，还是从城市到乡村，争得一塌糊涂。正确路线是要先搞乡村，要研究农村情况。大家说这是正确的路线，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走路，走到哪个地方走不通就要转弯，因为那个地方走不过去。当然在乡村尽走尽走，走他几百万年，这也不叫马克思主义，而叫反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当需要在乡村时，就在乡村；当需要转到城市时，就转到城市。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32页

中国是一个大国，情况极为复杂，革命是在部分地区首先取得胜利，然后取得全国的胜利。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69页

（二）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

1. 没有农村根据地，革命战争不能长期存在和发展

我们是在伟大的革命的战争面前，我们要冲破敌人的大规

模的“围剿”，我们要把革命推广到全国去。全体革命工作人员承担着绝大的责任。大会以后，我们一定要用切实的办法来改善我们的工作，先进的地方应该更加前进，落后的地方应该赶上先进的地方。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这些就是我们的巩固的阵地。我们占据了这些阵地，我们就能从这些阵地出发去粉碎敌人的“围剿”，去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40—141页

中国革命战争虽然是处在中国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反动时期，然而能够胜利的，因为它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农民的援助。根据地虽小却有很大的政治上的威力，屹然和庞大的国民党政权相对立，军事上给国民党的进攻以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有农民的援助。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90页

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第三个问题，是建立根据地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随着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而来的。因为失地的恢复须待举行全国的战略反攻之时，在这以前，敌人的前线将深入和纵断我国的中部，小半甚至大半的国土被控制于敌手，成了敌人的后方。我们要在这样广大的被敌占领地区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争，将敌人的后方也变成他们的前线，使敌人在其整个占领地上不能停止战争。我们的战略反攻一日未能举行，失地一日未能恢复，敌后游击战争就应坚持一日，这种时间虽不能确切断定，然而无疑地是相当地长，这

就是战争的长期性。同时敌人为了确保占领地的利益，必将日益加紧地对付游击战争，特别在其战略进攻停止之后，必将残酷地镇压游击队。这样，长期性加上残酷性，处于敌后的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是不能支持的。

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无后方作战，本来是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因为它是同国家的总后方脱离的。然而，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

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在交通和技术进步的今日而企图用流寇主义获得胜利，更是毫无根据的幻想。然而流寇主义在今天的破产农民中还是存在的，他们的意识反映到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的头脑中，就成了不要或不重视根据地的思想。因此，从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的头脑中驱除流寇主义，是确定建立根据地的方针的前提。要或不要根据地、重视或不重视根据地的问题，换句话说，根据地思想和流寇主义思想的斗争的问题，是任何游击战争中都会发生的，抗日游击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也不能是例外。因此，同流寇主义作思想斗争，将是一个不可少的过程。只有彻底地克服了流寇主义，提出并实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才能有利于长期支持的游击战争。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18—419页

要把日本打出去，就要建立根据地。整个中国凡是沦

陷的地方都是抗日的根据地，大后方是根据地，华北、华中是根据地，广东、海南岛是根据地，陕甘宁边区是根据地，我们共产党在许多地方创造了抗日的根据地。有人说根据地不好，不应该有根据地，这个话不妥当。没有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就没有饭吃，没有地方出发去打敌人。什么人最恨我们的根据地？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它不喜欢我们的根据地，因为根据地在它后方把它挤出去。

《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49—150页

在确定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和部署力量之后，又在我军数量上已有广大发展之后，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必须使一切干部明白，国民党在东北一个时期内将强过我党，如果我们不从发动群众斗争、替群众解决问题、一切依靠群众这一点出发，并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细心的群众工作，在一年之内，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月的紧急时机内，打下初步的可靠的基础，那末，我们在东北就将陷于孤立，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不能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有遭遇极大困难甚至失败的可能；反之，如果我们紧紧依靠群众，我们就将战胜一切困难，一步一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群众工作的内容，是发动人民进行清算汉奸的斗争，是减租和增加工资运动，是生产运动。应当在这些斗争中，组织各种群众团体，建立党的核心，建立群众的武装和人民的政权，把群众斗争从经济斗争迅速提高到政治斗争，参加根据地的建设。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80页

2. 根据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最重要的因素，夺取全国胜利的基础

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50页

边界的红旗子，业已打了一年，虽然一方面引起了湘鄂赣三省乃至全国豪绅阶级的痛恨，另一方面却渐渐引起了附近省分工农士兵群众的希望。……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

《井冈山的斗争》(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81页

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

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97—98页

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98页

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98—99页

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城镇。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的效力。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03页

今后的问题就是在继续抗战中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这就是为着将来担负巨大工作的第一个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没有这种准备，我们就不能把日寇赶出去，就不能解放全中国。

《学习和时局》（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46页

历史上，我们只在一九三一年下半年打破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以后，江西中央区联合起来有过二十一个县城，但是还没有中等城市。二十一个小城市联在一起，最多的时候有过二百五十万人口。依靠着这些，中国人民就能奋斗那样久的时间，取得那样大的胜利，粉碎那样大的“围剿”。后来我们打输了，这不能怪蒋介石，要怪我们自己没有打好。如果这一次，大小城市几十个联成一块，有了三四五六块的话，中国人民就有了三四五六个大于江西中央区的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的形势就很可观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29—1130页

3. 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基本条件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第一，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仅仅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第二，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分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第三，小地方民众政权之能否长期地存在，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

向前发展这一个条件。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继续地向前发展，而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停顿，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是不可能的。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第五，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除了上述条件之外，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48—50页

军阀间的分裂和战争，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因此，小地方红色政权得以乘时产生出来。但军阀之间的战争不是每天不停的。每当一省或几省之间的白色政权有一个暂时稳定的时候，那一省的统治阶级或几省的统治阶级必然联合起来用尽力量来消灭这个红色政权。在为建立和坚持红色政权所必须的各种条件尚不完备的地方，便有被敌人推倒的危险。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51页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种事。我们分析它发生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有买办豪绅阶级间的不断的分裂和战争。只要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的，则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也将是能够继续的。此外，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还需要具备下列的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

《井冈山的斗争》（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57页

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这种斗争，一天比一天激烈，问题也就非常地繁复和严重。

《井冈山的斗争》（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63页

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89页

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大体不外三种：山地、平地和河湖港汊地。

山地建立根据地之有利是人人明白的，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或准备建立的长白山、五台山、太行山、泰山、燕山、茅山

等根据地都是。这些根据地将是抗日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我们必须到一切处于敌后的山岳地带去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起根据地来。

平地较之山地当然差些，然而决不是不能发展游击战争，也不是不能建立任何的根据地。河北平原、山东的北部和西北部平原，已经发展了广大的游击战争，是平地能够发展游击战争的证据。至于能否在平原地区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这一点现在还没有证明；但是建立临时的根据地和小部队的或季候性的根据地，则前者现在已经证明，后者也应该说是可能的。因为一方面，敌人兵力不够分配，又执行着前无古人的野蛮政策，另一方面，中国有广大的土地，又有众多的抗日人民，这些都提供了平原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临时根据地的客观条件；如再加上指挥适当一条，则小部队的非固定的长期根据地之建立，当然应该说是可能的。大抵当敌人结束了他的战略进攻，转到了保守占领地的阶段时，对于一切游击战争根据地的残酷进攻的到来，是没有疑义的，平原的游击根据地自将首当其冲。那时，在平原地带活动的大的游击兵团将不能在原地长期支持作战，而须按照情况，逐渐地转移到山地里去，例如从河北平原向五台山和太行山转移，从山东平原向泰山和胶东半岛转移。但是保持许多小的游击部队，分处于广大平原的各县，采取流动作战，即根据地搬家，一时在此一时在彼的方法，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至于利用夏季的青纱帐和冬季的河川结冰之季候性的游击战争，那是断然可能的。在现时敌人无力顾及和将来顾及也难周到的条件下，确定在现时广泛地发展平原的游击战争，并建立临时根据地的方针，在将来准备坚持小部队的游击战争，至少坚持季候性的游击战争，并建立非固定的根据地的方针，是完全必要的。

依据河湖港汊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客观上说来是较之平原地带为大，仅次于山岳地带一等。历史上所谓“海盗”和“水寇”，曾演过无数的武剧，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不过，各个抗日党派和抗日人民，至今尚少注意这一方面。虽然主观条件还不具备，然而无疑地是应该注意和应该进行的。江北的洪泽湖地带、江南的太湖地带和沿江沿海一切敌人占领区域的港汊地带，都应该好好地组织游击战争，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作为发展全国游击战争的一个方面。缺少了这一方面，无异供给敌人以水上交通的便利，是抗日战争战略计划的一个缺陷，应该及时地补足之。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19—421页

建立根据地的基本条件，是要有一个抗日的武装部队，并使用这个部队去战胜敌人，发动民众。所以建立根据地问题，首先就是武装部队问题。从事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必须用全副精力去建立一支以至多支的游击部队，并使之从斗争中逐渐地发展为游击兵团，以至发展成为正规部队和正规兵团。建立武装部队是建立根据地的最基本一环，没有这个东西，或有了而无力量，一切问题都无从说起。这是第一个条件。

和建立根据地不能分离的第二个条件，就是使用武装部队并配合民众去战胜敌人。凡是被敌人控制的地方，那是敌人的根据地，不是游击战争的根据地；要把敌人的根据地变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非战胜敌人无从实现，这是自明之理。就是游击战争控制的地方，如果不粉碎敌人的进攻，不战胜敌人，自

已控制的地方就要变成敌人控制的地方，也无从建立根据地。

和建立根据地不可分离的第三个条件，就是用一切力量，包括武装部队的力量在内，去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要从这种斗争中去武装人民，即组织自卫军和游击队。要从这种斗争中去组织民众团体；无论是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商人、自由职业者，都要依据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斗争情绪提高的程度，将其组织在各种必要的抗日团体之内，并逐渐地发展这些团体。民众如没有组织，是不能表现其抗日力量的。要从这种斗争中去肃清公开的或隐藏的汉奸势力；要做到这一步也只有依靠民众的力量。尤其重要的是从这种斗争中去发动民众建立或巩固当地的抗日政权。原来有中国政权未被敌人破坏的，则在广大民众拥护的基础之上去改造它和巩固它；原来的中国政权已被敌人破坏了的，则在广大民众努力的基础之上去恢复它。这个政权是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它应该团结一切人民的力量，向惟一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反动派作斗争。

一切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只有在建立了抗日的武装部队、战胜了敌人、发动了民众这三个基本的条件逐渐地具备之后，才能真正地建立起来。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23—424页

此外，还须指出的是地理和经济的条件。地理条件的问题，在说“几种根据地”时已经指出了三种不同的情形，这里只说主要的要求，即地区的广大。处在四面或三面被敌包围的中间，要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山地当然是最好的条件，但主要是须有游击队回旋的余地，即广大地区。有了广大地区这个条件，就是在平原也是能够发展和支持游击战争的，河湖港汊更不待

说。这个条件已因中国领土广大和敌人兵力不足，一般地提供于中国的游击战争了。从游击战争的可能性说来，它是一个重要的甚至是第一个重要的条件；在小国如比利时等，因没有这个条件，游击战争的可能性就很小，甚至没有。但在中国，这个条件已不是什么待争取的条件和待解决的问题，而是自然具备只待人去利用的东西。

经济条件的性质，从其自然性一方面看来，也和地理条件相同。因为现在并不讨论在沙漠里建立根据地，沙漠里也没有什么敌人，讨论的是在敌人后方建立根据地，而一切敌人能到之处，当然早就有了中国人，也早就有了吃饭的经济基础，故在建立根据地问题上，不发生选择经济条件的问题。一切有中国人又有敌人的地方，不问其经济条件如何，都应尽可能地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永久的或临时的根据地。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24—425页

要扩兵与巩固根据地，就要发动基本群众，而要发动基本群众，必须给群众以利益，必须镇压反动分子。在这里是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顾到党派的与社会的统一战线政策，要预防过左倾向，另一方面对于妨碍我们发动基本群众的反动分子，必须予以坚决的镇压（当然不是每个都杀死），否则发动群众与巩固根据地是不可能的。

《努力巩固苏北根据地》（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596页

4. 建立中心区域，采取波浪式推进的战略

在统治阶级政权的暂时稳定的时期和破裂的时期，割据地

区对四围统治阶级必须采取不同的战略。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例如两湖在李宗仁唐生智战争时期，广东在张发奎李济深战争时期，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但是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备白色恐怖到来时有所恃而不恐。若在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的时期，例如今年四月以后的南方各省，则我们的战略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这时在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地方武装）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

《井冈山的斗争》（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57—58页

有些同志在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的时期，也主张分兵冒进，甚至主张只用赤卫队保卫大块地方，好像完全不知道敌人方面除了挨户团之外还有正式军队集中来打的一回事。在地方工作方面，则完全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的基础，不顾主观力量的可能，只图无限制的推广。如果遇到什么人在军事方面主张采取逐步推广的政策，在地方工作方面主张集中力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求自立于不败之地，则谥之曰“保守主义”。他们的这种错误意见，就是今年八月湘赣边界失败以及同时红军第四军在湘南失败的根本原因。

《井冈山的斗争》（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58页

当时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和军委（陈毅为书记）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

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因为这些策略的适当，加以边界地形的利于斗争，湘赣两省进攻军队的不尽一致，于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个月的各次军事胜利和群众割据的发展。

《井冈山的斗争》（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59—60页

从游击区到根据地，是一个艰难缔造的过程，依消灭敌人和发动民众的程度如何而定其是否已从游击区过渡到了根据地的阶段。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22页

5. 反对敌人的“围剿”，发展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根据地

十年以来，从游击战争开始的一天起，任何一个独立的红色游击队或红军的周围，任何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周围，经常遇到的是敌人的“围剿”。敌人把红军看作异物，一出现就想把它捕获。敌人总是跟着红军，而且总是把它围起来。这种形式，过去十年是没有变化的，如果没有民族战争代替国内战争，那末，直到敌人变成弱小者、红军变成强大者那一天为止，这种形式也是不会变化的。

红军的活动，采取了反“围剿”的形式。所谓胜利，主要地是说反“围剿”的胜利，这就是战略和战役的胜利。反对一次“围剿”是一个战役，常常由大小数个以至数十个战斗组织而成。在一次“围剿”没有基本地打破以前，即使得到了许多战斗的胜利，还不能说战略上或整个战役上已经胜利了。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192—193页

红军的游击性，没有固定作战线，根据地的流动性，根据地建设工作的流动性，十年战争中一点也没有变化吗？有变化的。从井冈山到江西第一次反“围剿”前为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是很大的，红军还在幼年时代，根据地还是游击区。从第一次反“围剿”到第三次反“围剿”为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就缩小了许多，方面军已经建立，包含几百万人口的根据地已经存在。从第三次反“围剿”后至第五次反“围剿”为第三个阶段，游击性流动性更缩小了。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建立。长征是第四个阶段。由于错误地否认小游击和小流动，就来了一个大游击和大流动。目前是第五个阶段。由于没有战胜第五次“围剿”和大流动，红军和根据地都大大地缩小了，但又已经在西北立住了脚根，巩固了并发展了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红军主力三个方面军已经统一指挥，此事为前此所未有。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231页

在整个敌占地区，经过游击战争和敌我双方斗争的结果，可

以变为三种情况的地方：第一种是被我方游击部队和我方政权掌握着的抗日根据地；第二种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政权掌握着的被占领地；第三种是双方争夺的中间地带，即所谓游击区。游击战争领导者的责任，在于极力扩大第一、第三两种地区，而极力缩小第二种地区。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23页

为了把侵入中国的敌人围困在少数的据点，即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之内，各个根据地上的游击战争必须极力向其根据地的四周发展，迫近一切敌人的据点，威胁其生存，动摇其军心，同时即发展了游击战争的根据地，这是十分必要的。……另一方面，不可忘记根据地的巩固，而其主要的工作是发动和组织民众，以及游击部队和地方武装的训练。这种巩固，是支持长期战争所必需，也是向前发展所必需的，不巩固就不能有力地向前发展。只知道发展忘记了巩固的游击战争，经不起敌人的进攻，结果不但丧失了发展，且有危及根据地本身之虞。正确的方针是巩固地向前发展，这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好办法。只要是长期战争，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的问題，是每个游击队经常发生的问题。具体解决时应依照情况去决定。某一时期，把重心放在发展方面，这就是推广游击区、扩大游击队的工作。另一时期，则把重心放在巩固方面，这就是组织民众、训练部队的工作。因为二者的性质不同，军事部署和工作执行随之而不同，必须依情况分时期有所侧重，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25—426页

无论哪一个解放区的附近，或其较远之处，都还有许多被敌伪占领而又守备薄弱的地方，我们的军队应该进攻这些地方，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我们必须把一切守备薄弱、在我现存条件下能够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迫使敌人处于极端狭窄的城市与交通要道之中，被我们包围得紧紧的，等到各方面的条件成熟了，就将敌人完全驱逐出去。这种进攻，是完全必要的与可能的，……

《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
第3卷第236页

（三）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 向城市转移

1. 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必要性

现在要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需要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夺取大城市，准备到城市做工作，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把重心转到城市去，必须要做很好的准备。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32页

大城市是一个大量的普遍的东西，东北四千万人口也是一个大东西，但是在今天来讲，还不是一个眼前的现实问题，还不容易注意到。现在我们大会就已经指出这是明天的事，是一个大量的有普遍意义的东西。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犯了错误就不得了。如果我们对于工业问题，对于大城市问题，对于

经济问题，对于军队正规化问题，不能解决，那共产党就要灭亡。二十四年来，我们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再有二十四年还不解决，那就一定要灭亡。工业在人家手里，大城市在人家手里，机械化在人家手里，正规军在人家手里，我们都没有，过了四十八年还没有，那还不灭亡吗？我们要依靠老百姓，但总是吃小米，靠小米加步枪是不行的。不能设想，我们党永远没有大城市，没有工业，不掌握经济，没有正规军队，还能存在下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那马克思主义也就不灵了。其实，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因为没有采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是没有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些问题。农民运动，我们比较会搞，工人运动就比较生疏了。我们党走过的路是这样的，从工人运动到农民运动，再到工人运动。过去我们是从工人运动起家的，从工人运动到农民运动，比如内战时期、抗战时期都是搞农民运动，将来我们要再转到搞工人运动，搞大工业，搞正规军队等。这就是我们的预见。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95—396页

还要强调一点，就是工人运动的重要性，七大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对于过去做过工人运动的同志，我们要很好地注意他们，培养他们。有了大城市，整个情况就会起大的变化，今天还没有这个变化，我们还觉不出来。这个变化是很大的，因此要加以注意。

再就是东北的问题。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将来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

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得相当分散，各个山头、各个根据地都是不巩固的，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所以，我们要争城市，要争那么一个整块的地方。如果我们有了一大块整个的根据地，包括东北在内，就全国范围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基础，有了坚固的基础。现在有没有基础呢？有基础，但是还不巩固，因为我们没有工业，没有重工业，没有机械化的军队。如果我们有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末，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了。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10—411页

必须将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将工业生产任务和农业生产任务，放在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省委、地委和市委的领导工作的适当位置。即是说，不要因为领导土地改革工作和农业生产工作，而忽视或放松对于城市工作和工业生产工作的领导。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许多大中小城市和广大的工矿交通企业，如果各有关领导机关忽视或放松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就要犯错误。

《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33页

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城乡必须兼

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荫蔽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26—
1427页

2. 做好夺取城市和交通要道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关于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我们一向是做得很差的。如果现在我们还不争取在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中被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千百万劳动群众和市民群众围绕在我党的周围，并准备群众的武装起义，我们的军队和农村根据地就会得不到城市的配合而遇到种种困难。

《学习和时局》(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
3卷第946页

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不争取在日寇压迫下的千百万劳动群众与市民群众，瓦解伪军伪组织，并准备武装起义，不能配合军队与农村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过去人们以为从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驱逐日寇的任务，似乎只有

国民党才能胜任；现在必须改变此种观点，认为有些只有依靠我党才能胜任，有些主要依靠我党才能胜任，依靠国民党是无望的。

《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58页

日寇现在为着救死而正在向中国正面战场大举进攻，日寇正在没落过程中。西方反希特勒斗争不久可望获胜，太平洋反攻日寇今后必更开展。这一切给予我党以良好条件，一方面发展与巩固根据地，依据现有基础，建设比现在强大得多的军队与地方工作；又方面，争取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千百万群众，瓦解与争取伪军伪警，准备武装起义，以俟时机成熟，就可使二者相互配合，里应外合地进攻日寇，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里应外合的思想，是我党从大城市驱逐敌人的根本思想。

《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58—159页

要进行教育，使广大干部完全了解由我党领导里应外合地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以便最后驱逐日寇的可能性、必要性与重要性，没有此种思想教育，是不能动员全党行动的。又要使干部了解：在目前去进行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比过去有完全新的目标。在以前进行这种工作，只是为了保存组织，渡过黑暗，或是为了获取情报与购买物资。现在则是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争取伪军伪警，准备武装起义，夺取城市与交通要道。一切努力与工作都是为了这个目标，并服从这个目标。又要使干部了解：在目前为了这样的目标去进行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是切合时宜的。因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战均

已确切接近完全胜利，国民党的极端腐败与我党我军在广大敌后战场的胜利坚持，全国人民对国民党更加失望，而对我党我军则寄以无限希望，敌占区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潮，今后必然有极迅速的高涨，目前去进行这一工作，比以前有更广泛的社会条件与群众条件。因此，在以前曾经正确地不提出准备武装起义夺取大城市的任务，而在现在就必须提出。现在如果不提出，则我们将要犯一个大错误，在将来反攻时逼使我们在没有准备或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去进行争夺大城市与交通要道的斗争，使我军将来进攻城市时没有充分与必要的内应，以及在夺取城市后不能迅速发动群众建立城市的革命秩序与掌管城市。又要使干部了解：为着夺取城市与交通要道的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是一种长期艰苦而伟大的准备工作。由于中国特殊条件，城市武装起义常常只有在响应城外进攻军队的条件下，即在里应外合条件下，才有胜利可能（例如一九二七年上海起义），而没有城外军事行动配合的单独城市起义，是很难胜利的。因此在准备城市武装起义工作中，应该反对急躁病，反对轻率地举行武装起义，反对在没有城外我军配合条件下，单独地或者过早地发动起义。必须要有长时间和极端复杂忍耐的工作，决不是粗枝大叶与急躁的工作所能济事。又要使干部了解：我们进行城市工作的方针和一般策略是无法秘密的，是应该向全党传达的。但是在城市与一切敌占区的具体工作计划及具体组织工作，则应完全秘密，应在党内进行关于秘密工作的教育，每个党员及干部，只应知道他们所必须知道的事，不应知道他们所能够知道的事。

《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59—160页

由于我们的工作目标是反对民族敌人，大局有利于我，城市与要道周围或其不远地方又有我党强大军队与根据地，这种工作将有极大开展的客观条件。在敌占城市与交通要道的人民中，除开极少数死心汉奸与顽固反共分子外，大多数人是能够参加或同情各种各样抗日工作的。因此，我们在城市与交通要道的一切群众中、各界人民中，都要进行广泛而妥善的工作。在伪军伪警中，在工人苦力中，在伪政界、伪经济界、伪文化界中，以及在青年学生、儿童、妇女中，甚至各种秘密结社与流氓组织中，都要去进行工作。但应将主要注意力放在争取数十万伪军伪警和争取数百万工人苦力的工作上，因为他们是武装起义的决定力量，而这点正是各地以前所注意不够的。我们在工人苦力中的活动与组织，应与上层统一战线的活动分开进行。而上层活动一般应是为了掩护与协助下层群众中的活动。我们的活动不应与国民党组织发生任何关系，我们应在群众中揭破国民党人的反动腐败无能和只顾少数人利益、不顾民族利益，肃清大城市群众中对国民党的任何幻想。过去我们在大城市为情报及经济工作而建立的组织与关系，仍应进行情报与经济工作，只在可能情况下去进行一些上层活动与群众工作。为了广泛造成根据地同城市（特别大城市）和要道的交通联系，并为准备夺取城市和要道的军事出发地，应在城市四周与要道两侧的人民中进行充分的工作，根据地游击战争应采取各种妥善办法向城市四周与要道两侧逐渐逼近，在那里建立隐蔽的游击区，以利城市与要道工作的进行。同时，要动员城市与要道中的大批工人与革命知识分子出城出路参加游击战争，其中若干人准备在起义时派回去指导起义的武装斗争，以便里应外合，占领城市与要道。重说一次，里应外合的思想，是我党夺取城市与要道的根本思想，应从这点出发去部署一切力量，布置一

切工作。

《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61—162页

在目前,城市和要道的一切非法活动与非法斗争,以不妨碍和破坏我们的合法组织与合法斗争为限度。这点同根据地附近游击区中的合法与非法联系的斗争,是有些区别的。在游击区中的合法斗争,常常是为了掩护非法游击队的活动和存在,而在城市与交通要道则相反,非法斗争常常应该服从合法斗争。

《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64页

在沦陷区,广大人民遭受敌人的残酷压迫,渴望解放。我们必须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准备在时机成熟时,举行武装起义,配合军队的进攻,里应外合地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放我们的兄弟姊妹们。这一任务,现在必须提到和解放区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是十分迫切的工作,不管如何困难都要去做。

《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35—236页

在沦陷区,共产党人应当号召一切抗日人民,学习法国和意大利的榜样,将自己组织于各种团体中,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一俟时机成熟,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里应外合地消灭日本侵略者。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88—1089页

我们必须将沦陷区的工作提到和解放区的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必须有大批工作人员到沦陷区去工作。必须就沦陷区人民中训练和提拔大批的积极分子，参加当地的工作。在沦陷区中，东北四省沦陷最久，又是日本侵略者的产业中心和屯兵要地，我们应当加紧那里的地下工作。对于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人民，应当加紧团结他们，准备收复失地。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89页

必须放手组织武装工作队，成百队成千队地深入敌后之敌后，组织人民，破击敌人的交通线，配合正规军作战。必须放手发动沦陷区的千百万群众，立即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消灭敌人。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119页

3. 做好接收、管理城市的准备工作

- 要把城市工作放在重要地位，迅速学会管理城市

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为使我党能够担负这种责任，就要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起来，就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

《学习和时局》（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45页

我们要在根据地内学习好如何管理大城市的工商业和交通

机关，否则到了那时将无所措手足。准备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武装起义，并且学习管理工商业，这是第二个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没有这种准备，我们也就不能把日寇赶出去，也就不能解放全中国。

《学习和时局》（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46—947页

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到农村，曾经发生过许多争论，将来由农村转到城市，又会发生许多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有精神上的准备，学会做经济工作，学会做城市工作。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工作报告》（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41页

在根据地中，各级党、政、军、民的负责干部，均应切实研究与学习城市工作，研究城市的武装起义及里应外合的斗争艺术，研究建立城市革命秩序，掌管城市及大的工商业，作为将来夺取与管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准备。

《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66页

由农村转变到城市，由游击战转变到正规战，由减租减息转变到耕者有其田，这些都是民主革命阶段中因形势变化而产生的。对各方面的转变，我们要作准备，某些方面也已经有了准备。有些同志让我解释一下将来如何转变，我想现在不用多讲，就是按实际情况去学习，去准备。……到城市去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我们七大现在只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要在精神上作准备。现在可以做的具体的工作，就是派人去或者调人来训练，或者再多派一点人去训练地下军。把日本赶走以后，我们如果

占领了城市，首先要搞吃饭、穿衣的问题。在座的将军们，如果你们搞到北京，没有煤炭烧，搞到上海，没有饭吃，火车不能开，电车不能开，怎么行呢？因此，现在我们要有一种精神准备。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10页

必须尽一切可能修理和掌握铁路、公路、轮船等近代交通工具，加强城市和工业的管理工作，使党的工作的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

《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47页

今后将一反过去二十年先乡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式。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懂得在城市中善于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善于对付资产阶级，善于领导工人和组织工会，善于动员和组织青年，善于团结和训练新区的干部，善于管理工业和商业，善于管理学校、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善于处理外交事务，善于处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问题，善于调剂城市和乡村的关系，解决粮食、煤炭和其他必需品的的问题，善于处理金融和财政问题。总之，过去军队干部和战士们所不熟悉的一切城市问题，今后均应全部负担在自己的身上。

《把军队变为工作队》（一九四九年二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05—1406页

但是，乡村工作和城市工作比较起来，是易于学习的。城

市工作则较为困难，而又是目前学习的最主要方面。如果我们的干部不能迅速学会管理城市，则我们将会发生极大困难。

《把军队变为工作队》（一九四九年二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06页

- 要准备大批干部，同时要利用社会现成人才

必须有大批干部去进行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现有在城市工作的干部及过去在城市工作过的老干部，都应设法使他们仍旧担负这种工作，但应使他们吸收新经验，并在新方针下，用新方法去工作。其次，数年来在各根据地附近敌占区的两面斗争中，已经锻炼出广大而善于进行合法斗争的党与非党干部，其中许多人是具有善于应付敌人、欺骗敌人、进行合法斗争的丰富知识的，有些甚至超过我们内战时期城市工作的老干部。其中许多人，是能够到城市工人苦力中及其他各种职业中立足的，应该很好地训练培养与使用这些干部。只要这些人有办法到大城市、中等城市及交通要道立足，并能进行工作，就应抽调一些出来，加以短期训练派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及其他各种职业者，或党与非党干部均可。而这种干部，现在在各根据地是很多的。再次，就是各根据地都有一些人经常到敌占城市经商、做工、谋事，特别是在苏北与胶东，每年有数十万人到上海、杭州及满州各城市谋生。因此，应从这些人中寻找与训练出各种各样的城市工作干部。此外，在伪军俘虏中亦可训练一些干部放回去。根据地土绅到城市居住者，亦可给他以某种任务和名义到城市去活动。就是根据地中因有某种政治嫌疑而不易弄清楚者，亦可派他们到敌占城市进行某种独立活动来考察他。而在各种干部中，要特别注意培养各城各路的当

地干部,外去干部应把自己当作当地干部的引路者与保育者。在根据地中,还可以找到原来在城市及要道生长与居住过的干部,加以训练派回去。总之,我们应放手使用各种各样干部去进行各种各样工作,并使各种人的各种工作都分开进行,不混杂在一起,多头地与分路地去做。但同时又必须保持党的秘密组织之精干、纯洁与可靠,在一切大、中、小城市及铁路、公路上建立起党的多数可靠据点,作为伟大城市工作的领导骨干,形成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局面。

《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64—166页

城市工作要提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不是口头上讲讲的,而是要实际上去做的,要派干部,要转变思想。七大散了会,要把干部一批一批地派出去,在可能的条件下,一批一批地走。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33页

迅速加强城市工作,特别加强我党可能夺取与必须夺取的那些城市的工作。派大批有能力的干部到这些城市里去,迅速学会管理城市中财政、金融、经济工作,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人参加城市工作,解决维持城市秩序,坚决镇压反动派的反抗,但不可轻易杀人。兵力使用与干部使用应有重心,否则将一事无成。

《关于日本投降后党的任务》(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55页

我们已得到了一些大城市和许多中等城市。掌握这些城市

的经济，发展工业、商业和金融业，成了我党的重要任务。为此目的，利用一切可用的社会现成人材，说服党员同他们合作，向他们学习技术和管理的办法，非常必要。

《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73页

有一点请你们注意，即该电在说到企业的正式管理委员会时，只说由经理、工会代表组织管理委员会，没有提到工程师、技师及有经验的职员。须知单是经理及工人代表是不够的，必须有工程师、技师及职员参加管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应当是厂长负责制下面的管理委员会。在任何企业中，除厂长或经理必须被重视外，还必须重视有知识有经验的工程师、技师及职员。必要时，不惜付出高薪。即使是国民党人，只要有可能，也要利用。

《企业管理委员会应有工程师、技师及职员参加》（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88页

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三万至四万下级、中级和高级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五千万至一万万人口的新开辟的解放区。

《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47页

中国地方甚大，人口甚多，革命战争发展甚快，而我们的干部供应甚感不足，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第三年内干部的准

备，虽然大部分应当依靠老的解放区，但是必须同时注意从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中去吸收。国民党区大城市中有许多工人和知识分子能够参加我们的工作，他们的文化水准较之老解放区的工农分子的文化水准一般要高些。国民党经济、财政、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除去反动分子外，我们应当大批地利用。解放区的学校教育工作，必须恢复和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47页

4. 城市工作的方针政策

- 不要把土地改革的办法搬到城市

在领导方针上。应当预先防止将农村中斗争地主富农、消灭封建势力的办法错误地应用于城市，将消灭地主富农的封建剥削和保护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严格地加以区别，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同片面的、狭隘的、实际上破坏工商业的、损害人民革命事业的所谓拥护工人福利的救济方针严格地加以区别。应当向工会同志和工人群众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决不可只看到眼前的片面的福利而忘记了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应当引导工人和资本家在当地政府领导下，共同组织生产管理委员会，尽一切努力降低成本，增加生产，便利推销，达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支援战争的目的。

《关于工商业政策》(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85页

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对于土地在乡村家在城里的地主，由民主市政府依法处理。其罪大恶极者，可根据乡村农民团体的请求送到乡村处理。

《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一九四八年四月八日），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24页

“实行土地改革”一条，实行于大城市附近的种菜地有很多不适宜的地方，乡村中的土地改革办法，决不能施行于大城市附近。

《不要在约法八章等之外再发任何口号》（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46页

在大城市工作的作风，决不能搬用在乡村工作的作风。在大城市，凡事均须从新仔细考虑，一举一动都要合乎城市的情况。

《不要在约法八章等之外再发任何口号》（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47页

城市的土地房屋，不能和农村土地问题一样处理。

《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59页

● 有步骤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同时保护外侨的合法利益

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彻底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使得帝国主义者极为仇视这个革命，竭尽全力地帮助国民党。这就更加激起了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者的深刻的愤怒，并使帝国主义者丧失了自己在中国人民中的最后一点威信。同时，整个帝国

主义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是大大地削弱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反帝国主义阵线的力量是空前地增长了。所有这些情形，使得我们可以采取和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帝国主义者的这种控制权，表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我们在全国胜利以后再去解决。对于普通外侨，则保护其合法的利益，不加侵犯。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4—
1435页

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一切外国侨民各安生业，保持秩序。一切外国侨民，必须遵守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法令，不得进行间谍活动，不得有反对中国民族独立事业和人民解放事业的行为，不得包庇中国战争罪犯、反革命分子及其他罪犯。否则，当受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法律制裁。

《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59页

- 没收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

(参见本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第486—492页；第三编“关于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第771—773页)

- 谨慎清理和妥善处理旧的机构和人员

极谨慎地清理国民党统治机构，只逮捕其中主要反动分子，

不要牵连太广。

《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一九四八年四月八日），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23页

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必须妥善地予以清理和登记。

《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一九四八年四月八日），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24页

在占领城市时，除持枪抵抗及实行破坏的人们必须逮捕外，一切其他的人包括国民党的重要官吏在内，均不要由军队逮捕。应待秩序安定方可由民主政府分别情况考虑逮捕那些重要官吏和最反动的分子，务必避免多捕滥捕。

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占领城市工厂职工人员问题给东北局的电报加写的文字（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三——一九四九）》下卷第336页

我军占领的城市在其秩序安定以前，不要忙于宣布对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这种急忙宣布处理是盲目的，没有效力的，易使敌人隐藏和使自己被动。在社会秩序已经安定，我们对城市情况已经大体明了，那就必须着手有准备地有系统地处理这些反动组织。

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加写的文字（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三——一九四九）》下卷第447页

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

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责成上述人员各安职守，服从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命令，负责保护各机关资财、档案等，听候接收处理。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别录用。如有乘机破坏，偷盗，舞弊，携带公款、公物、档案潜逃，或拒不交代者，则须予以惩办。

《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58页

根据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的真理，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对于国民党的旧工作人员，只要有一技之长而不是反动有据或劣迹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维持，不要裁减。十分困难时，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已被裁减而生活无着者，收回成命，给以饭吃。国民党军起义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则，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动分子，只要悔罪，亦须给以生活出路。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12页

九、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一）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1. 各个历史时期根据地政权的性质和形式

●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民主共和国和人民共和国

苏维埃现在所处的环境，同过去有许多不同了，它有了广大的领土，有了广大的群众，有了坚强的红军，它已将许多散漫的力量集中起来（虽然还没有完全集中起来），它已经组织成为一个国家，这就是我们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国家已经有了它的地方与中央的组织，已经建立临时中央政府。这个政府是一个集中的权力机关，它依靠着广大的民众，依靠着民众的武装力量——红军。这个政府是工农的政府，它实行了工人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它对于工农是广大的民主，但绝不容许任何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参加。它是一个专政，是一个已经具有极大权力的专政，这个专政已经向着全国范围扩大它的影响，它在广大民众中间有了很大的信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
《红色中华》二苏大特刊第3期

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建立，使全国苏维埃运动得着总的领导

机关，对于中国革命有绝大的意义。两年以来，在领导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斗争中间得到了光荣的伟大的胜利。我们应该指出，中央政府在自己的组织上与工作上还存在着许多不健全与不充分的地方。为着加强中央政府对于各苏区与全国革命的总领导，必须使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在工作上划分开来，必须健全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组织与工作，必须充实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并改善他们的工作方法，必须增设必要的人民委员即如粮食委员部等，使中央政府在革命形势更加开展面前，能够充分地发挥它总的发动机作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
《红色中华》二苏大特刊第3期

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它是民众自己的政权，它直接依靠于民众。它与民众的关系必须保持最高程度的密切，然后才能发挥它的作用。苏维埃具有绝大的力量，它已经成为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而且也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它的力量的伟大，是历史上任何国家形式所不能比拟的。但它的力量完全依靠于民众，它不能够一刻离开民众。苏维埃政权需要使用强力去对付一切阶级敌人，但对于自己的阶级——工农劳苦群众，则不能使用任何的强力，而它表现出来的只是最宽泛的民主主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
《红色中华》二苏大特刊第3期

苏维埃最宽泛的民主，首先表现于自己的选举。苏维埃给予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民众以完全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女

子的权利与男子同等。工农劳苦群众对这样的权利的取得，乃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红色中华》二苏大特刊第3期

苏维埃的民主，见之于市与乡的代表会议。市乡代表会议制度是苏维埃组织的基础，是使苏维埃密切接近于广大民众的机关，两年来的进步，使我们的这一制度更加完满了。……大家都可以看见，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实在是历史上任何政治制度所不曾有的。而苏维埃依靠这一制度，同广大民众结合起来，它就使苏维埃成为最能发扬民众创造力的机关，使苏维埃成为最能动员民众以适应国内战争适应革命建设的机关，这也是历史上无论什么政府所做不到的。区以上各级苏维埃政权机关完全建筑于市乡苏维埃的基础之上，由各级的工农兵代表大会与执行委员会而组成，政府工作人员由选举而任职，不胜任的由公意而撤换，一切问题的讨论解决根据于民意，所以苏维埃政权是真正广大民众的政权。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红色中华》二苏大特刊第3期

苏维埃的民主，还见之于给予一切革命民众以完全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与罢工的自由。当着国民党统治区域剥夺一切革命民众的自由权利，施行疯狂的法西斯蒂恐怖的时候，苏维埃政府下每个革命的人民，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苏维埃并且给予一切尽可能的物质条件上的便利（会场，纸张，印刷机关等），一切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集会结社与言论出版，

苏维埃总是极力的领导着。苏维埃所不允许的，只是那些剥削分子的反革命自由。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
《红色中华》二苏大特刊第3期

苏维埃的民主精神还见之于其行政区域的划分。苏维埃取消了旧的官僚主义的大而无当的行政区域，把从省至乡各级苏维埃的管辖境界都改小了。这是什么意义？这是使苏维埃密切接近于民众，使苏维埃因管辖地方不大得以周知民众的要求，使民众的意见迅速反映到苏维埃来，迅速得到讨论与解决，使动员民众为了战争为了苏维埃建设成为十分的便利。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
《红色中华》二苏大特刊第3期

总结起来看，苏维埃具备着对于广大民众的十分宽泛的革命的民主主义，但同时就在这种民主主义中间构成了它绝大的权力——建筑于千百万工农民众坚固的信仰与自觉的需要之上的权力。苏维埃运用这种权力，形成了自己的专政，组织了革命战争，组织了苏维埃法庭，向着阶级敌人开展各方面的激烈的进攻，而苏维埃法庭则在苏维埃领土之内起了它镇压反革命活动的伟大的作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
《红色中华》二苏大特刊第3期

为什么要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呢？

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这个意义，是在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里原来就包括了，因为工人、农民占了全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我们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规定的十大政纲，不但代表了工农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了民族的利益。但是现在的情况，使得我们要把这个口号改变一下，改变为人民共和国。这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8页

人民共和国不代表敌对阶级的利益。相反，人民共和国同帝国主义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是处在正相反对的地位，它不把那些成分放在所谓人民之列。这和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仅仅代表最大的富翁，并不代表老百姓，并不把老百姓放在所谓“国民”之列，是一样的。中国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人口是工人和农民，所以人民共和国应当首先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但是人民共和国去掉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中国自由独立，去掉地主的压迫，使中国离开半封建制度，这些事情就不但使工农得了利益，也使其他人民得了利益。总括工农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虽然也住在中国的土地上，可是他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的利益是同多数人的利益相冲突的。我们仅仅离开他们这些少数人，仅仅同他们这些少数人相冲突，所以我们有权利称我们自己代表全民族的。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8—159页

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纳其他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

让这些人参加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不危险吗？不危险的。工人农民是这个共和国的基本群众。给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他拥护反帝反封建纲领的分子以在人民共和国政府中说话做事的权利，给他们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能违背工农基本群众的利益。我们纲领的重要部分应当保护工农基本群众的利益。工农基本群众的代表在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占了大多数，共产党在这个政府中的领导和活动，都保证了他们进来不危险。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9—160页

共产党还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就提出了“民主共和国”这个口号。这个口号政治上组织上的含义包括如下三点：（一）不是一个阶级的国家和政府，而是排除汉奸卖国贼在外的一切抗日阶级互相联盟的国家和政府，其中必须包括工人、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内。（二）政府的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将民主和集中两个似乎相冲突的东西，在一定形式上统一起来。（三）政府给予人民以全部必需的政治自由，特别是组织、训练和武装自卫的自由。

《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82—383页

● 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民主统一战线政权

在抗日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它既

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只要是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不问属于何党何派，都有参加这个政权的资格。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48页

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必然会有某些不同特点，但这是大同中的小异。只要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革命，其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基本上必然相同，即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在今天的中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式，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式。它是抗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又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的。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76页

“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就是我们所说的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具体内容，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就是今天我们所要的宪政。这样的宪政也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宪政。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33页

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区别的，也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区别。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一九四〇年三月六日），《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2卷第741页

（四）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五）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

（六）必须使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因为他们联系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我们这样做，对于争取小资产阶级将有很大的影响。

（七）给中间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些阶层的争取，是孤立顽固派的一个重要的步骤。目前我们决不能不顾到这些阶层的力量，我们必须谨慎地对待他们。

.....

（十）上述人员数目的分配是一种大体上的规定，各地须依当地的实际情况施行，不是要机械地凑足数目字。最下层政权的成分可以酌量变通，防止地主豪绅钻进政权机关。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一九四〇年三月六日），《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2卷第742—743页

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选举政策，应是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

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产生，应经过人民选举。其组织形式，应是民主集中制。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一九四〇年三月六日），《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2卷第743页

在抗日根据地内建立政权的问题上，必须确定这种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则还没有这种政权。这种政权，即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即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相区别的，也和严格的工农民主专政有一些区别。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应该是：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只有汉奸和反共分子才没有资格参加这种政权。这种人数的大体上的规定是必要的，否则就不能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这种人员分配的政策是我们党的真实政策，必须认真实行，不能敷衍塞责。这是大体的规定，应依具体情况适当地施行，不能机械地求凑数目字。这种规定，在最下级政权中可能须作某种变动，以防豪绅地主把持政权，但基本精神是不能违背的。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一日），《毛

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50—751页

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共产党员

在敌人后方消灭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之时，应该采取我党中央所决定的“三三制”，不论政府人员中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使其他主张抗日民主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无论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府工作。任何党派，只要是不投降不反共的，应使其在抗日政权下面有存在和活动之权。

《团结到底》（一九四〇年七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60—761页

关于政权组织。必须坚决地执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在政权机关中只占三分之一，吸引广大的非党人员参加政权。在苏北等处开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地方，还可以少于三分之一。不论政府机关和民意机关，均要吸引那些不积极反共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代表参加；必须容许不反共的国民党员参加。在民意机关中也可以容许少数右派分子参加。切忌我党包办一切。我们只破坏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专政，并不代之以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论政策》（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66页

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35页

(二) 在各抗日根据地内，政府系统、参议会系统及民众团体的各级领导机关中，均应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使愿与我党合作的党外人员占三分之二。如当选的共产党员人数不足三分之一时，党组织不得指派未当选的党员去凑足三分之一，更不得排挤当选的党外人员。……

(三) 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在政府、参议会、民众团体及其他机关中，凡须经过人民民主选出的工作人员，其任免办法均按前条“三三制”的规定。其他不需经过民主选举的工作人员任免，亦不应以是否党员为标准，而应以是否赞成抗战团结及本人能力、经验、学识与工作积极性等为标准，实行用人唯贤的正确方针。

《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一九四二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95—396页

● 解放战争时期的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像晋冀鲁豫这样大范围的政权机关不应只是代表农民的，它是应当代表一切劳动群众（工人、农民、独立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及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及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的，而以劳动群众为主体。因此，边区最高政权机关是边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政府，而不是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政府。尽管现在各解放区是农民占绝大多数，但是必须顾到工人及其他各阶层民众，在农民中则必须顾到中农。

《边区政权机关不应只代表农民》(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3页

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在贫农团和农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区村（乡）两级人民代表会议，是一项极可宝贵的经验。只有基于真正广大群众的意志建立起来的人民代表会议，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会议。这样的人民代表会议，现在已有可能在一切解放区出现。这样的人民代表会议一经建立，就应当成为当地的人民的权力机关，一切应有的权力必须归于代表会议及其选出的政府委员会。到了那时，贫农团和农会就成为它们的助手。我们曾经打算在各地农村中，在其土地改革任务大致完成以后再去建立人民代表会议。现在你们的经验以及其他解放区的经验，既已证明就在土地改革斗争当中建立区村两级人民代表会议及其选出的政府委员会，是可能的和必要的，那末，你们就应当这样做。在一切解放区，也就应当这样做。在区村两级人民代表会议普遍地建立起来的时候，就可以建立县一级的人民代表会议。有了县和县以下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县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就容易建立起来了。在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中，必须使一切民主阶层，包括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民族工商业者以及开明绅士，尽可能地都有他们的代表参加进去。当然不是勉强凑数，而是要分别有市镇的农村和没有市镇的农村，分别市镇的大小，分别城市和农村，自然地而不是勉强地实现这个联合一切民主阶层的任务。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08—1309页

县的各界代表会的成分，应包括党、政、军的代表，农民及工人的代表，革命知识分子及妇女的代表，工商业的代表，及若干开明绅士的代表。其中，共产党员及可靠的左翼分子，应

超过二分之一，保证决议的通过。中间分子及必须拉拢的少数右翼但不反动的分子，可让其占三分之一左右的数目，以便孤立反动派，利于政令的推行和群众的发动，且可发现问题及发现积极分子。省委、区党委和地委，必须积极帮助各县县委，有计划地有准备地布置和领导此种会议。这是全县性的会议，县城及各区、各乡及县一级机构，均应有代表，在县委领导下，由县政府召开。这是县的会议，至于区、乡，则照你们意见召开区的及乡的农民代表会议，但应吸收革命知识分子参加。

《开好县的各界代表会议》（一九四九年九月七日），《毛泽东文集》

第5卷第340—341页

2. 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乡的中心在村，故村的组织与领导成为极应注意的问题。将乡的全境划分为若干村，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的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的领导，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

《才溪乡调查》（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

325页

乡苏维埃下许多委员会的组织及其领导，成为乡苏工作的重要一部分，在才溪乡再一次证明了。中央政府已经采纳各地的经验，规定到地方苏维埃组织法里面。那里规定乡的委员会可以组织经常的与临时的共二十余个，依照各地工作情况，可以适当地给以增减。市区苏维埃，则须适应城市的特点，组织若干不同于乡的委员会。这一制度的明确的统一的建立，将使

苏维埃与民众的关系更加密切，将使一切苏维埃工作的执行得着雄厚的力量。一个问题，就是村亦应建立某些重要工作的委员会（各种有广大会员的民众团体，同样应建立他们的村的领导机关）。因为如果只有乡的委员会，在有一千人上下的广大居民的乡，是无法周密地进行工作的。许多村的委员会的建立，即可保证这一点。

《才溪乡调查》（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28页

乡苏维埃（与市苏维埃）是苏维埃的基本组织，是苏维埃最接近群众的一级，是直接领导群众执行苏维埃各种革命任务的机关。在国内战争环境内，战争动员工作十分紧张，群众生活需要更加改善，因此极力改善乡苏（与市苏）的工作，健全乡苏的组织与领导，使它能够完全适合发展革命战争与改善群众生活的要求，是非常重要的事。改善乡苏工作的方向，应该朝着最能够接近广大群众，最能够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最能够动员群众执行苏维埃任务，并且最能够争取任务完成的速度，使苏维埃工作与革命战争、群众生活的需要完全配合起来，这是苏维埃工作的原则。现在我们的苏区，已经有许多乡苏工作能够适合这样的原则，创造出许多好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的了。但还有许多乡苏的工作违反这样的原则或者没有完全适合这样的原则。

《乡苏怎样工作？》（一九三四年四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43页

乡苏之下，应该组织各种辅助乡苏管理各种专门工作的委员会。吸收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为委员，每个乡代表都要加入一

个或者两个委员会，在里面起领导作用。要把委员会制度看作联系广大群众推进苏维埃工作的一种重要方法，没有组织委员会的要很快组织起来。

《乡苏怎样工作？》（一九三四年四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53—354页

3. 厉行廉洁政治，严惩贪污，反对浪费

（参见第八编“关于党的建设”，第2139—2145页）

4. 建立革命法制，保护人民权利

关于人民权利。应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政府仅仅干涉在我根据地内组织破坏和举行暴动的分子，其他则一律加以保护，不加干涉。

《论政策》（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卷第768页

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除司法系统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或处罚，而人民则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35页

改进司法制度，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不重口供。对于汉奸分子，除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外，不问其过去行为如何，一

律施行宽大政策，争取感化转变，给以政治上与生活上之出路，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对于一切阴谋破坏边区的分子，例如叛徒分子、反共分子等，其处置办法仿此。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35页

（二）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1. 根据地必须围绕革命战争进行必要的和可能的经济建设

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成了极大的问题。一年以来，边界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的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红军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筹饷。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的甚多，医院伤兵，其苦更甚。这种困难，在全国总政权没有取得以前当然是不能免的，但是这种困难的比较地获得解决，使生活比较地好一点，特别是红军的给养使之比较地充足一点，则是迫切地需要的。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在敌人势力的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间的条件下，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个经济问题的相当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注意。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53页

提高苏区的各业生产，扩大对内对外贸易，发展苏区的国民经济，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这在目前激烈发展的国内战争环境下，有第一等重要意义。……拿经济建设上的胜利，去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激发群众更高的革命热忱，同时保障红军的需要以配合整个的战争动员，这对于胜利的战争是有决定意义的。

同项英等发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训令》（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八日），《红色中华》1933年5月8日

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首先是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战争的彻底胜利；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为着这一切，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这是每个革命工作人员必须认识清楚的。过去有些同志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因此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他们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要等战争最后胜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静的环境，才能进行经济建设。同志们，这些意见是不对的。抱着这些意见的同志，他们不了解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9—120页

这种以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有这种意见的人，也常说一切应服从战争，他们不知道如果取消了经济建设，这就不是服从战争，而是削弱战争。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才能使我们有力量去扩大红军，把我们的战线开展到几千里路的地方去，使我们的红军毫无顾虑地在将来顺利的条件下去打南昌，打九江，使我们的红军减少自己找给养的这一部分工作，专心一意去打敌人；也才能使我们的广大群众都得到生活上的相当的满足，而更加高兴地去当红军，去做各项革命工作。必须这样干才叫做服从战争。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20页

在全体政府工作人员中，在广大工农群众中，造成一种热烈的经济建设的空气。要大家懂得经济建设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努力推销经济建设公债，发展合作社运动，普遍建设谷仓，建设备荒仓。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21页

我们的目的不但要发展生产，并且要使生产品出口卖得适当的价钱，又从白区用低价买得盐布进来，分配给人民群众，这样去打破敌人的封锁，抵制商人的剥削。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

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22页

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那种以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在国内战争中企图进行和平的，为将来所应有而现在所不应有的，为将来的环境所许可而现在的环境不许可的那些经济建设工作，只是一种瞎想。当前的工作是战争所迫切地要求的一些工作。这些工作每件都是为着战争，而不是离开战争的和平事业。如果同志们中间有离开战争进行经济建设的想法，那就应立刻改正。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23页

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

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

《我们的经济政策》（一九三四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30—131页

在全中国卷入经济浩劫，数万万民众陷入饥寒交迫的困难地位的时候，我们人民政府却不顾一切困难，为了革命战争，为了民族利益，认真地进行经济建设工作。事情是非常明白的，只有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只有我们实行了有计划的有组织经济建设工作，才能挽救全国人民出于空前的浩劫。

《我们的经济政策》（一九三四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34页

为着冲破敌人封锁，抵制奸商操纵，保证革命战争的需要，改良工农群众的生活，苏维埃必须有计划的进行各种必要的与可能的经济建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红色中华》二苏大特刊第3期

边区有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各项重大工作，就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而不要提民主或其他什么为中心工作。

《关于总结财经工作经验给谢觉哉的信》（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69—370页

在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下，大多数人做工作，讲革命，除了经济与教育（理论教育，政治教育，军事教育，文化教育，技术教育，业务教育，国民教育，均在内）两件工作以外，究竟还有什么工作值得称为中心工作，或所谓第一位工作的呢？究竟还有什么工作是更革命的呢？不错，其他工作是有的，而且还有许多，但是中心的或第一位的工作，就目前边区条件说来，

就大多数同志说来，确确实实地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两项工作而有其意义。我们如果认真地做好了这两项工作，我们就算很好地援助了前方的战争，我们也就算很好地协助了大后方的人民。两项工作中，教育（或学习）是不能孤立地去进行的，我们不是处在“学也，禄在其中”的时代，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节选）》（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65页

如果我们的党与政府不注意动员人民并帮助人民发展农工商业，则人民生活既不能改善，抗战需要亦不能供给，其结果就是军民交困。军心民心如不能巩固，一切也就无从说起了。所以党与政府用极大力量注意人民经济的建设，乃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任务。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解放社1944年1月订正再版第9—10页

因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一方面为着革命与战争事业的物质供给上的需要，一方面为着人民的需要，都必须从事经济建设的工作，不应该也不可能等候把全部敌人打平后才去进行建设工作。加以中国地方的广大，要使全国人民都信服我们所指出的道路的正确性而拥护我们，而参加革命奋斗，需要我们拿建设的榜样给他们看，才能作得到。

《必须做好经济建设工作》（一九四四年四月三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25页

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我们要战胜日本侵略者，除其他一切外，还必须努力于经济工作，必须于两三年内完全学会这一门；而在今年——一九四五年，必须收到较前更大的成绩。

《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一九四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24页

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是支援战争、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环节。中央会议认为，必须一方面使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区域发展胜利的进攻，将战争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大量地从国民党方面和国民党区域去取给；另一方面，必须用一切努力恢复和发展老解放区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使之较现有的水平有若干的增长。只有这两方面的任务都完成了，才能够保证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否则是不可能的。

《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47—1348页

目前解放区的经济状况和财政状况，存在着很大的困难，虽然我们的困难比较国民党的困难要小得多，但是确实有困难。这主要是物资和兵员不足供应战争的需要，通货膨胀已到了相当大的程度，而我们的组织工作特别是财经方面的组织工作不够，则是形成这种困难的原因之一。我们相信这些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并且必须克服这些困难。在克服困难的斗争中，必须反对浪费，厉行节约；在前线注意缴获归公，爱护自己的有生力量，爱护武器，节省弹药，保护俘虏；在后方，减少国家机构的开支，减少不急需的人力和畜力的动员，减少开会时间，注意农

业的季节，不违农时，节省工业生产的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全党动员学习管理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做生意，尽可能地将各解放区的经济加以适当的组织，克服市场上的盲目性，并同一切投机操纵的分子进行必要的斗争。从这一切着手，我们就必能克服自己面前的困难。

《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48—1349页

2. 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的总方针和财政税收政策

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明显的效验已在闽浙赣边区表现出来，在中央区也已开始表现出来了。这一方针的着重的执行，是我们财政机关和经济机关的责任。这里必须充分注意：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基本上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单纯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位。

《我们的经济政策》（一九三四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34页

财政政策以有钱出钱和没收汉奸财产作抗日报费为原则。

《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56页

政府的财政应该放在合理负担即有钱出钱的原则上。

《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76页

关于税收政策。必须按收入多少规定纳税多少。一切有收入的人民，除对最贫苦者应该规定免征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

居民，不论工人农民，均须负担国家赋税，不应该将负担完全放在地主资本家身上。

《论政策》（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67页

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居民中除极贫者应予免税外，均须按照财产等第或所得多寡，实施程度不同的累进税制，使大多数人民均能负担抗日的经费。同时健全财政机构，调整金融关系，维护法币，巩固边币，以利经济之发展与财政之充裕。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36页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但是有许多同志，片面地看重了财政，不懂得整个经济的重要性；他们的脑子终日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打来打去，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这是一种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在这些同志的头脑中作怪的缘故。他们不知道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问题，就是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事业费的供给问题，也就是抗日的经费的供给问题。这些经费，都是由人民的赋税及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自己的生产来解决的。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91—892页

发展经济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但发展不是冒险的无根据的发展。有些同志不顾此时此地的具体条件，空嚷发展，例如要求建设重工业，提出大盐业计划、大军工计划等，都是不切实际的，不能采用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发展路线，一方面要反对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这就是党在财政经济工作中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93页

为了抗日和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人民很知道这种必要性。在公家极端困难时，要人民多负担一点，也是必要的，也得到人民的谅解。但是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这就是对人民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盐业和商业，采取帮助其发展的适当步骤和办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

有些同志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这是错误的观点。因为抗日战争如果不胜利，所谓“仁政”不过是施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于人民是不相干的。反过来，人民负担虽然一时有些重，但是战胜了政府和军队的难关，支持了抗日战争，打败了敌人，人民就有好日子过，这个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

另外的错误观点，就是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这是国民党的思想，我们决不能承袭。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93—894页

我们要批驳这样那样的偏见，而提出我们党的正确的口号，这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的口号，才是正确的口号。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虽在困难时期，我们仍要注意赋税的限度，使负担虽重而民不伤。而一经有了办法，就要减轻人民负担，借以休养民力。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94—895页

县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对前者用了苦功，对后者便轻而易举。

《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11页

在生产运动中，不注重发展经济，只片面地在开支问题上打算盘的保守的单纯的财政观点，是错误的。不注重组织党政军群众和人民群众的广大劳动力，以开展群众生产运动，只片面地注意少数政府人员忙于收粮收税弄钱弄饭的观点，是错误的。不知用全力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只知向群众要粮要款的观点（国民党观点），是错误的。不注意全面地发动群众生产运动，只注意片面地以少数经济机关组织少数人从事生产的观点，是错误的。把共产党员为着供给家庭生活（农村党员）和改善自己生活（机关学校党员）以利革命事业，而从事家庭生产和个人业余生产，认为不光荣不道德的观点，是错误的。在有根据地的条件下，不提倡发展生产并在发展生产的条件下为改善物

质生活而斗争，只是片面地提倡艰苦奋斗的观点，是错误的。不把合作社看作为群众服务的经济团体，而把合作社看作为少数工作人员赚钱牟利，或看作政府公营商店的观点，是错误的。不把陕甘宁边区一些农业劳动英雄的模范劳动方法（劳动互助，多犁多锄多上粪）推行于各地，而说这些方法不能在某些根据地推行的观点，是错误的。不在生产运动中实行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别缓急轻重，争取男女老幼和游民分子一律参加生产，培养干部，教育群众，只知把生产任务推给建设厅长、供给部长、总务处长的观点，是错误的。在目前条件下，发展生产的中心关节是组织劳动力。

《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11—912页

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还有什么与此相反的方针没有呢？有的。那就是缺乏群众观点，不依靠群众，不组织群众，不注意把农村、部队、机关、学校、工厂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而只注意组织财政机关、供给机关、贸易机关的一小部分人；不把经济工作看作是一个广大的运动，一个广大的战线，而只看作是一个用以补救财政不足的临时手段。这就是另外一种方针，这就是错误的方针。

《组织起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30页

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

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末，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国民党就是只问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以任何一点什么东西的。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也是这样，那末，这种党员的作风就是国民党的作风，这种党员的脸上就堆上了一层官僚主义的灰尘，就得用一盆热水好好洗干净。

《组织起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933页

认识贸易、金融、财政是组织全部经济生活的重要环节，离开了它们，或对它们采取了错误方针，全部经济生活就会停滞，或受到障碍。

《必须做好经济建设工作》（一九四四年四月三日），《毛泽东文集》
第3卷第125页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确定不移的财政方针。如果我们不去从根本上发展经济，而去枝枝节节地解决财政问题，就是错误的方针。如果我们努力地发展了公私经济，我们就能支持不论时间多久的战争，而使精力不至于枯竭。这一点非常重要，必须使一切工作人员及全体军民透彻地认识清楚，以便组织他们从事大规模的生产运动。

《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
第3卷第241页

为着应付最近时期的紧张工作而增重了的财政负担，在一九四六年中，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转到正常状态。人民负担太重者必须酌量减轻。各地脱离生产人员，必须不超过当地财力负担所许可的限度，以利持久。

《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76页

发展生产,保障供给,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生产和节约并重等项原则,仍是解决财经问题的适当的方针。

《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76页

在财政供给上,必须使自卫战争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同时又必须使人民负担较前减轻,使我解放区人民虽然处在战争环境,而其生活仍能有所改善。

《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88页

各地必须作长期打算,努力生产,厉行节约,并在生产和节约的基础上,正确地解决财政问题。这里第一个原则是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因此,必须反对片面地着重财政和商业、忽视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错误观点。

《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16页

调整或改订农业税(公粮)负担的标准。这种标准,必须遵守公私兼顾的原则,这即是一方面利于支援战争,一方面使农民有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兴趣,利于改善农民的生活。

《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28—1329页

3. 努力发展国营和合作社经济，同时鼓励私人 and 民营经济 的发展

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

国家经营的经济事业，在目前，只限于可能的和必要的一部分。国营的工业或商业，都已经开始发展，它们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加以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私人经济，不待说，现时是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在相当长的期间内也必然还是优势。目前私人经济在红色区域是取着小规模经营的形式。

合作社事业，是在极迅速的发展中。据一九三三年九月江西福建两省十七个县的统计，共有各种合作社一千四百二十三个，股金三十余万元。发展得最盛的是消费合作社和粮食合作社，其次是生产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的活动刚才开始。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所以，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和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应该是与奖励私人经济发展，同时并进的。

《我们的经济政策》（一九三四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33—134页

为着发展国营经济和帮助合作社经济，我们在群众拥护之下，发行了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这样依靠群众的力量来解

决经济建设的资金问题，乃是目前惟一的和可能的方法。

《我们的经济政策》（一九三四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34页

应该用极大的努力去发展对于这些工业的群众的生产合作社，将失业工人，独立劳动者，与农民，尽量组织到生产合作社来。同时应该容许并奖励私人资本家的投资，扩大苏区的这些生产。苏维埃在目前不应当企图垄断所有的生产事业，但创办并发展一些特别需要与特别有利的国有企业，则是可以而且应当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红色中华》二苏大特刊第3期

关于经济政策。应该积极发展工业农业和商品的流通。应该吸引愿来的外地资本家到我抗日根据地开办实业。应该奖励民营企业，而把政府经营的国营企业只当作整个企业的一部分。凡此都是为了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应该避免对任何有益企业的破坏。关税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和发展农工商业的基本方针相适合，而不是相违背。认真地精细地而不是粗枝大叶地去组织各根据地上的经济，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是长期支持根据地的基本环节。

《论政策》（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68页

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是应该发展的，但在目前的农村根据地内，主要的经济成分，还不是国营的，而是私营的，而是让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得着发展的机会，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制度。这是目前中国的最革命的政策，反对和阻碍这

个政策的施行，无疑义地是错误的。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793页

在劳资关系上，我们一方面扶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发展实业的政策，使资本家也有利可图。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8页

边区的经济，分为民营公营两大方面。民营经济，就是一切私人的农工商业。公营经济，就是政府、军队与机关学校所经营的农工商业。这两方面的作用与关系：民营经济是为了解决边区一百四十万人民的生活，同时以租税的形式援助政府与军队，支持抗战建国的神圣事业。公营经济是为了解决数万党政军的生活费与事业费的主要部分，以便减少取之于民，休养民力，便于将来紧急需要时的取给。在这里适用的原则，就是“公私兼顾”，或“军民兼顾”。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解放社1944年1月订正再版第9页

单靠人民交纳租税，还是不能解决抗战建国的需要；特别是在边区地广人稀的条件下，人民的租税与政府的支出之间，长期地存在着一个大矛盾。所以，我们又必须用极大注意力去经营公营经济，这是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军队与我们的一切机关学校在自己肩上担负着的一个极大的任务。数年来在这方面我们有了很大的成绩，一九四三年我们还要造出更大的成绩，以便直接解决抗战建国的需要。公营经济愈发展，则人民负担就可愈减少，这又是培养民力的一个方法。而联合与通融民营与

公营经济这两方面的工具，则是金融。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解放社 1944 年 1 月
订正再版第 10 页

地广人稀、几乎全部属于小农经济的边区，要贯彻政府的经济政策，组织与倡导人民发展经济，就必须依赖真正群众化的合作社起纽带作用。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解放社 1944 年 1 月
订正再版第 73 页

我愿各地同志注意提倡合作社的生产。部队机关学校的生产是一种合作社，农村的集体互助劳动又是一种合作社，此外还有包含各种业务在内的综合性合作社，被称为运盐队的运输合作社，工人们集体互助的手工业合作社，把这许多样式的合作社都发展起来，全体公私群众就会变为富裕的了。在敌后各根据地的目前困难状况，也就能够克服了。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解放社 1944 年 1 月
订正再版第 243 页

发展公营生产，一切军队，一切机关学校，在不妨碍作战的条件下，都要进行生产自给运动，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改善自己生活、减轻民众负担的目的。发展民营生产，共产党员深入农村，学会帮助农民做按家计划，学会帮助农民组织劳动互助团体，学会帮助农民组织合作社，达到改善群众生活的目的。陕甘宁边区及敌后许多根据地上卓著成效的公私生产运动，应该不疲倦地坚持发展下去。

《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一九四三年七月二日),《毛泽东文集》第 3 卷第 45—46 页

边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是过去的封建剥削关系，这种封建剥削关系，在有一半的地方经过土地革命已经完全破坏，另一半的地方经过减租减息也受到打击。这就是土地革命，是第一个革命。但是，如果不进行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的第二个生产关系即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进一步发展。将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加以发展，生产就可以大大提高，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如果全边区的劳动力都组织在集体互助的劳动组织之中，全边区一千四百万亩耕地的收获就会增加一倍以上。这种方法将来可推行到全国，在中国的经济史上也要大书特书的。这样的改革，生产工具根本没有变化，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变化了。从土地改革到发展劳动互助组织两次变化，这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

《切实执行十大政策》（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70—71页

目前我们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我们部队机关学校的群众生产，虽不要硬安上合作社的名目，但是这种在集中领导下用互相帮助共同劳动的方法来解决各部门各单位各个人物质需要的群众的生产活动，是带有合作社性质的。这是一种合作社。

《组织起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31页

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惟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惟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

就是经过合作社。在边区，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了许多的农民合作社，不过这些在目前还是一种初级形式的合作社，还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才会在将来发展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

《组织起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931页

我们的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的，我们的合作社目前还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这又有几种样式。一种是“变工队”、“扎工队”这一类的农业劳动互助组织，从前江西红色区域叫做劳动互助社，又叫耕田队，现在前方有些地方也叫互助社。无论叫什么名称，无论每一单位的人数是几个人的，几十个人的，几百个人的，又无论单是由全劳动力组成的，或有半劳动力参加的，又无论实行互助的是人力、畜力、工具，或者在农忙时竟至集体吃饭住宿，也无论是临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总之，只要是群众自愿参加（决不能强迫）的集体互助组织，就是好的。

《组织起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931页

除了这种集体互助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外，还有三种形式的合作社，这就是延安南区合作社式的包括生产合作、消费合作、运输合作（运盐）、信用合作的综合性合作社，运输合作社（运盐队）以及手工业合作社。

我们有了人民群众的这四种合作社，和部队机关学校集体劳动的合作社，我们就可以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

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

《组织起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932页

由于是农村，农民都是分散的个体生产者，使用着落后的生产工具，而大部分土地又还为地主所有，农民受着封建的地租剥削，为了提高农民的生产兴趣和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我们就采取减租减息和组织劳动互助这样两个方针。减租提高了农民的生产兴趣，劳动互助提高了农业劳动的生产率。……如果不是采取强迫命令、欲速不达的方针，而是采取耐心说服、典型示范的方针，那末，几年之内，就可能使大多数农民都组织在农业生产的和手工业生产的互助团体里面。这种生产团体，一经成为习惯，不但生产量大增，各种创造都出来了，政治也会进步，文化也会提高，卫生也会讲究，流氓也会改造，风俗也会改变；不要很久，生产工具也会有所改良。到了那时，我们的农村社会，就会一步一步地建立在新的基础的上面了。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16—1017页

土地制度获得改革，甚至仅获得初步的改革，例如减租减息之后，农民的生产兴趣就增加了。然后帮助农民在自愿原则下，逐渐地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及其他合作社之中，生产力就会发展起来。这种农业生产合作社，现时还只能是建立在农民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农民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的互助的劳动组织，例如变工队、互助组、换工班之类，但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量的增加，已属惊人。这种制度，已在中国解

放区大大发展起来，今后应当尽量推广。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1078页

变工队一类的合作组织，原来在农民中就有了的，但在那时，不过是农民救济自己悲惨生活的一种方法。现在中国解放区的变工队，其形式和内容都起了变化；它成了农民群众为着发展自己的生产，争取富裕生活的一种方法。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1078—1079页

4. 农业生产是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第一位

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森林的培养，畜产的增殖，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对于某些重要农产作出相当的生产计划，动员农民为着这样的计划而努力，这是容许的，而且是必须的。我们在这一方面，应该有进一步的注意和努力。

《我们的经济政策》（一九三四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
卷第131页

关于农业生产的必要条件方面的困难问题，如劳动力问题，耕牛问题，肥料问题，种子问题，水利问题等，我们必须用力领导农民求得解决。这里，有组织地调剂劳动力和推动妇女参加生产，是我们农业生产方面的最基本的任务。而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的组织，在春耕夏耕等重要季节我们对于整个农村民

众的动员和督促，则是解决劳动力问题的必要的方法。不少的一部分农民（大约百分之二十五）缺乏耕牛，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组织犁牛合作社，动员一切无牛人家自动地合股买牛共同使用，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事。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也应予以极大的注意。目前自然还不能提出国家农业和集体农业的问题，但是为着促进农业的发展，在各地组织小范围的农事试验场，并设立农业研究学校和农产品展览所，却是迫切地需要的。

《我们的经济政策》（一九三四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31—132页

在新的阶段上，我们的经济基础已较巩固，我们的经验也较多了，应确定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手工业、运输业与畜牧业为第二位，商业则放在第三位，因为商业只可救急，要建立永久基础于商业之上，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的。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节选）》（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62页

应该实行一些什么切实有效、而不是空洞夸张的政策才能达到上述要求呢？根据过去经验，下列八项政策是必须执行的：（一）减租减息；（二）增开荒地；（三）推广植棉；（四）不违农时；（五）调剂劳动力；（六）增加农贷；（七）提高技术；（八）实行累进税。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解放社1944年1月订正再版第36页

这里说的提高技术，是说从边区现有的农业技术与农民生产知识出发，依可能办到的事项从事研究，以便帮助农民对于

粮棉各项主要生产事业有所改良，达到增产目的。某些改良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已有了相当的经验，对这方面缺乏信心、缺乏热情是不对的。但夸大改良可能性，以为边区可以实行现代化的大规模农业技术，则是没有根据的。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解放社 1944 年 1 月
订证再版第 45 页

推广优良品种。有了优良品种，即不增加劳动力、肥料，也可获得较多的收成。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解放社 1944 年 1 月
订正再版第 48 页

边区留守兵团各部队中，以三五九旅的生产自给工作做得比较更好些。首先，三五九旅的领导同志掌握了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与运输业为第二位、商业为第三位的方针，利用了勤务较少的条件，又利用了南泥湾适合农业、绥德警备区适合轻工业的环境，动员了广大的人力，在三年的时间内，完成了很大的经济自给任务，建立了农业、工业、运输业与商业的一系列的比较完备的企业，打下了一个能够达到完全自给的经济基础；特别是他们掌握了农业为主这一点，使得他们的经济基础建设在稳固的地盘之上。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解放社 1944 年 1 月
订正再版第 141 页

我们用尽力量使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其目的究竟何在呢？第一个目的是使农民富裕起来，改善他们的生活；第二个目的，是使农民有力交付粮食税，帮助抗战的需要；还有第三个目的，是使农民在取得减租利益之后，发展农业生产，能够以一部分交

给地主作地租，因而便于团结地主和我们一同抗战。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解放社 1944 年 1 月
订正再版第 212—213 页

一九四三年的生产任务，一切部队、一切机关学校都要将重点逐渐转到农业、工业与运输业上去；而在我们的条件下，特别重要的是农业。因为我们在目前条件下，大部分需要的东西是农产品（正粮、杂粮、蔬菜、麻、肉食、植物油、动物油、棉花、马草、木料、柴火等）；农产品又可以出口换取工业品。如果我们再从事一部分可能与必要的手工业（纺纱、纺毛、做鞋、织毛线衣、挖炭、锯木头、榨油等）及较大的轻工业（纺织业、造纸业等），则可以很大部分地解决我们的日常需要，并可争取出卖。

《关于发展军队的生产事业》(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 卷第 690 页

如果我们的工作人员用心地研究这项工作，用极大的精力帮助农村人民展开生产运动，几年之内，农村就会有丰富的粮食和日用品，不但可以坚持战斗，不但可以对付荒年，而且可以贮藏大批粮食和日用品，以为将来之用。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1017 页

5. 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克服困难

大家知道，生产运动是为了搞饭吃，搞衣穿。穿衣吃饭，我们是十分需要的，因此，现在我们的生产运动是非常重要的。全国都要吃饭穿衣，所以它在全国也是重要的。推而广之，不但

全国，全世界也是如此。所以生产运动是有它的普遍性的。吃饭穿衣不但我们需要，我们的儿子、孙子、子子孙孙，也是要吃饭穿衣的。因此生产运动不但过去要，现在要，将来还是要，这是生产运动的永久性的根据。

《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76—177页

我们发起生产运动的直接原因是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现在虽然有一点，但是将来困难起来，就会不够吃、不够穿的，所以我们现在要预先准备。这样，穿衣吃饭问题就成了我们发起生产运动的直接原因。

《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77页

一切可能地方，一切可能时机，一切可能种类，必须发展人民的与机关部队学校的农业、工业、合作社运动，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解决吃饭、穿衣、住屋、用品问题之全部或一部，克服经济困难，以利抗日战争。

《反投降提纲》（一九三九年六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24页

我们还须要加倍努力生产运动，这是我们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克服物资困难，改善部队供给的最有力的方法。要多种菜、养猪、养羊，发展棉毛纺织，组织运输工作，我们的口号是大家动手，解决吃穿问题，达到完全自足自给的目的。

《增长力量，准备反攻》（一九四二年三月四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78页

一九三九年国民党颁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国共间的关

系不如从前了。边区的机关学校也增多，虽有外来的一点经费补助，已经分配不过来，我们处在财政供给问题的严重威胁下。由于这个原因，迫使我们不得不想到全体动员从事经济自给的运动。那时，我们在干部动员大会上曾经这样提出问题：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节选）》（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60页

五年以来，我们经过了几个阶段。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磨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但是我们渡过了困难。这不但是由于边区人民给了我们粮食吃，尤其是由于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建立了自己的公营经济。边区政府办了的许多的自给工业；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发展了以自给为目标的农工商业；几万机关学校人员，也发展了同样的自给经济。军队和机关学校所发展的这种自给经济是目前这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在其他历史条件下是不合理的和不可理解的，但在目前却是完全合理并且完全必要的。我们就用这些办法战胜了困难。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92页

应将改善机关学校工作人员、杂务人员及学生们的生活看

作重要的事情，各机关学校负责人为此应想种种办法。应提倡与指导杂务人员、工作人员、有孩子的母亲，在不妨碍工作、学习及身体条件下，在自愿原则下，进行某些手工及农作的生产劳动，但不得从事商业。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解放社 1944 年 1 月
订正再版第 206 页

党委、政府和军队，必须于今年秋冬准备好明年在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而以农业为主体。……一切机关学校部队，必须于战争条件下厉行种菜、养猪、打柴、烧炭、发展手工业和部分种粮。除各大小单位应一律发展集体生产外，同时奖励一切个人（军队除外）从事小部分农业和手工业的个人业余生产（禁止做生意），以其收入归个人所有。

《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911 页

不论党政军民男女老幼全体一律进行伟大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和日用品，准备同灾荒作斗争，将是继续坚持抗日根据地的物质基础。否则便将遇到极大的困难。

《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913 页

边区的军队，今年凡有地的，做到每个战士平均种地十八亩，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袜，住的窑洞、房屋，开会的大小礼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纸张笔墨，烧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办。我们用自己

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

《组织起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929页

为了支持战争，为了对付敌人的“三光”政策，为了救济灾荒，就不能不动员全体党政军民，一面打击敌人，一面实行生产。前方的生产，过去几年已经有了一些经验，加上今年冬天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物质准备，明年可能造成广大的运动，并且必须造成广大的运动。前方处于战争环境，还不能做到“丰衣足食”，但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则是完全可以做到，并且必须做到的。

《组织起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930—931页

多年以来全体人民在政府领导下，与贫穷现象斗争，这种现象或者已经消灭，或者已经减轻，人民的生活已有很大改善，丰衣足食的新现象已日渐推广。但是还没有普遍，更因抗战与备荒的需要，必须增加生产，因此必须号召人民于两年至三年内普遍做到每户至少有一年余粮。为改变边区童山太多现象，应号召人民植树，在五年至十年内每户至少植活一百株树。边区各项工业品年有增加，但还不能自给，特别是布、铁等项，要办到三年内完全自给，并且不仅求数量多，而且要求质量好。

《召开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的决定》（一九四四年七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80页

一九四五年，必须绝无例外地普遍举行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一切军队于作战、训练之外，必须从事生产自给，机关学校也是如此。只有特殊情形者，可以允许减少或免除生产。必须动

员人民，在自愿原则下，组织生产互助团体，例如变工队、互助组、换工班等。我们的地方工作人员，必须用绝大精力去帮助人民，组织这种互助团体，以便大规模地恢复生产与发展生产，不但应该使人民够穿够吃，而且应该使人民逐渐地有盈余。“耕三余一”的口号，除被敌人摧残厉害的地方外，就是在敌后解放区，也是可能实现的。我们解放区的工业品，必须力求自给，必须争取于数年内达到全部或大部自给之目的。由公营、私营与合作社经营这样三方面的努力，达到这个目的是可能的。

《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

第3卷第240页

我们要打击日本侵略者，并且还要准备攻入城市，收复失地。然而我们是处在个体经济的被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中，怎样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呢？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那末，有些什么办法呢？我们就用军民两方同时发动大规模生产运动这一种办法。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毛泽东选集》第

2版第3卷第1016页

由于是农村，由于是经常被敌人摧残的农村，由于是长期战争的农村，部队和机关就必须生产。由于是分散的游击战争，部队和机关也可能生产。在我们陕甘宁边区，则更由于部队和机关的人数和边区人口比较，所占比例数太大，如果不自己生产，则势将饿饭；如果取之于民太多，则人民负担不起，人民

也势将饿饭。因此，我们决定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17页

总之，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一切部队、机关，在战斗、训练和工作的间隙里，一律参加生产。部队和机关，除利用战斗、训练和工作的间隙，集体参加生产之外，应组织专门从事生产的人员，创办农场、菜园、牧场、作坊、小工厂、运输队、合作社，或者和农民伙种粮、菜。在目前条件下，为着渡过困难，任何机关、部队，都应建立起自己的家务。不愿建立家务的二流子习气，是可耻的。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18—1019页

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的机关和部队，如果有了生产自给运动，他们的战斗、训练和工作，就更加有劲，更加活跃了；他们的纪律，他们的内部的团结和外部的团结，也就更好了。这是我们中国长期游击战争的产物，这是我们的光荣。我们学会了这一条，我们就对一切物质困难都不怕了。我们将一年一年地更有生气，更有精力，愈战愈强，只有我们去压倒敌人，决不怕敌人来压倒我们。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19页

游击区能够和必须进行军民的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们要求一切解放区党政军工作人员，特别是游击区工作人员，从思想上完全认识这一点，认识这个“能够”和“必须”，事情就可以普遍地办起来。

《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一九四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23页

军队的生产自给,在我们的条件下,形式上是落后的、倒退的,实质上是进步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在形式上,我们违背了分工的原则。但是,在我们的条件下——国家贫困、国家分裂(这些都是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所造成的罪恶结果)以及分散的长期的人民游击战争,我们这样做,就是进步的了。大家看,国民党的军队面黄肌瘦,解放区的军队身强力壮。大家看,我们自己,在没有生产自给的时候,何等困难,一经生产自给,何等舒服。现在,让站在我们面前的两个部队,例如说两个连,去选择两种办法中的一种:或者由上面全部供给生活资料;或者不给它或少给它,让它全部、大部、半部或小部地生产自给。哪一种结果要好些?哪一种它们愿意接受些呢?在认真地试行一年生产自给之后,一定会认为后一种办法结果要好些,愿意接受它;一定会认为前一种办法结果要差些,不愿意接受它。这是因为后者能使我们部队的一切成员改善生活;而前者,在目前的物质困难条件下,无论怎样由上面供给,也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至于因为我们采用了这种表面上“落后的”、“倒退的”办法,而使我们的军队克服了生活资料的困难,改善了生活,个个身强力壮,足以减轻同在困难中的人民的赋税负担,因而取得人民的拥护,足以支持长期战争,并足以扩大军队,因而也就能够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达到最后地消灭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的目的。这种历史意义,难道还不伟大吗?

《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106—1107页

经济困难就学会做经济工作。我们要感谢何应钦，他不给八路军、新四军发饷，他这样一困，我们就提出了是解散，是饿死，还是自己动手搞生产的问题。解散不甘心，饿死不愿意，那剩下一条，就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发展生产，克服困难。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92—393页

6. 实行精兵简政

各抗日根据地的全体同志必须认识，今后的物质困难必然更甚于目前，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

《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九四二年九月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81页

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

《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九四二年九月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82页

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这五项，对于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关系极大。精简之后，减少了消费性的支出，增加了生产的收入，不但直接给予财政以好

影响，而且可以减少人民的负担，影响人民的经济。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95页

无论将来情况如何，我们均须精兵简政，减轻民负，方有利于解放区之巩固与坚持。

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华东局、晋冀鲁豫局、华中分局并告聂荣臻、贺龙的电报（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卷第59页

7. 必须重视和学会经济工作

● 不但应该会办政治、办军事，也应该会办经济

有许多的部队、机关、学校，在他们的生产活动中，负行政指挥责任的同志不大去管，甚至有少数人完全不闻不问，而仅仅委托于供给机关或总务处去管，这是由于还没有懂得经济工作的重要性的原故。其所以还不懂得，或则中了董仲舒们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些唯心的骗人的腐话之毒，还没有去掉得干净；或则以为政治、党务、军事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经济工作虽然也重要，但不会重要到那种程度，觉得自己不必分心或不必要多分心去管它。但是这些想法全是不对的。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节选）》（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64—465页

由于我们有许多负领导责任的同志至今还采取轻视或不很重视经济工作的态度，以致其他许多同志都学样，愿意做党政

军学工作，愿意弄文学艺术，而不愿意做经济工作。有的女同志不愿嫁经济工作者，似乎认为他们是不大名誉的人，认为与其嫁一个骡马队长，不如嫁一个政治干事，才算不辱没了她。所有这些观点，实在都是错得很的，不适合我们此时此地的条件的。我们必须重新分工。我们要有一批脱离生产事务的革命职业家，我们也要有一批医生、文学艺术工作者及其他人等，但是这些方面的人决不能过多，过多就会发生危险。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因此，大批的干部必须从现在的工作或学习的岗位上转到经济工作的岗位上去。而各级党部、政府、军队、学校的主要负责同志必须同时充分地注意经济工作的领导，要调查研究经济工作的内容，负责制订经济工作的计划，配备经济工作的干部，检查经济工作的成效，再不要将此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仅仅委托于供给部门或总务部门就算完事。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节选）》（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65—466页

特别重要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学得了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这是不能拿数目字来计算的无价之宝。我们不但应该会办政治，会办军事，会办党务，会办文化，我们也应该会办经济。如果我们样样能干，惟独对于经济无能，那我们就是一批无用之人，就要被敌人打倒，就要陷于灭亡。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节选）》（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66页

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

给人民以东西。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为着这个，我们应该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耕牛、农具、种子、肥料、水利、牧草、农贷、移民、开荒、改良农作法、妇女劳动、二流子劳动、按家计划、合作社、变工队、运输队、纺织业、畜牧业、盐业等等重要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节选）》（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67页

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一切军民人等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一切未脱离生产的农村党员，应以发展生产为自己充当群众模范的条件之一。

《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11页

我们的同志学会了组织群众的劳动，学会了帮助农民做按家生产计划，组织变工队，组织运盐队，组织综合性合作社，组织军队的生产，组织机关学校的生产，组织工厂的生产，组织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组织生产展览会，发动群众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加上旁的各项本领，我们就一定可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一定可以协同全国人民，把一个新国家建立起来。

《组织起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32—933页

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击了百分之五十八的日军、百分之九十的伪军，这方面我们是有经验、有成绩的。但是，对于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我们还不大会，可是这一门又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因此，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

《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47页

近几年中，我们开始学会了经济工作，我们在经济工作中有了很大的成绩，但这还只是开始。我们必须在两三年内，使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解放区，做到粮食和工业品的全部或大部的自给，并有盈余。我们必须使农业、工业、贸易三方面都比现在有更大的成绩。到了那时，才算学得更多，学得更好。如果哪一个地方的军民生活没有改善，为着反攻而准备的物质基础还不稳固，农业、工业、贸易不是一年一年地上涨，而是停止不进，甚至下降，便证明哪个地方的党政军工作人员还是没有学会经济工作，哪个地方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15页

我们到了粮食和工业品全部或大部自种自造自给并有盈余的日子，就是我们全部学会在农村中如何做经济工作的日子。将来从城市赶跑敌人，我们也会做新的经济工作了。中国靠我们来建设，我们必须努力学习。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20页

解放区的工作人员，必须努力学会做经济工作。……在城市驱逐日本侵略者以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必须迅速学会做城市的经济工作。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91页

有天灾经济是困难的，没有天灾经济也是困难的，所以我们要大力学做经济工作。我们曾经提出这样的口号——在两三年内学会做经济工作，要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克服困难。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91页

你们有广大的农业和手工业，也有一部分使用机器的轻工业和重工业。希望你们好好地领导这些生产事业，否则就不能算作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11—1312页

有了工业生产的条件，党如果不注意恢复及发展工业，党的领导人员如果缺乏工业方面的知识，如果不用力去学会这一方面的知识，那就会要犯错误。

《晋绥分局应将工业生产放在领导工作的重要位置》（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95页

- 按照根据地的特点，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

建立全部自给工业的统一领导，克服严重存在着的无政府状态。过去提出的“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是正确的，但

因没有切实执行，致使建厅管的财厅管的军队管的机关管的各部分工业之间，缺乏计划性，生产过于分散，又缺乏工作检查，浪费人力物力。一九四三年应由财经办事处建立统一的领导，首先要使所有公营工业，不论是属于哪一部门管理的，均须有一个统一的计划。在这个统一计划上，统一地筹划原料与粮草的供给，产量的定数，销路的衔接。在原料供给上，要解决由于地区分散、原料不集中和有些原料仰给外来，而使许多工厂随时都闹原料恐慌的现象。在粮草供给上，应由财厅经过一定的核算办法，供给各厂以所需的食粮及草料，以免各厂负责人分散其管理生产的注意力。在产量与销路问题上，应由财厅及各有关机关，在财经办事处统一计划下，给予各厂以一定数额的生产任务，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需要多少就生产多少，成品有一定机关按时接收，解决产销之间的矛盾现象。在这个统一的计划性上，要实行各业间的互相协助，消灭互相孤立甚或互相妨碍的本位主义。在这个统一的计划上，要实行统一的检查，对各业各厂有奖励，有批评，使工作差的赶上好的。总之，统一领导问题，为一九四三年改进公营工业的中心问题，必须彻底地努力地解决之。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解放社1944年1月
订正再版第125—126页

实行统一领导。切实执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所有中央一级，边区一级，专区一级，县署一级，均应建立关于统一一切生产事业的强有力的领导机关，按系统按级统一企业经营方针，统一调整各企业相互间的关系，统一检查各企业的经营方法，并在允许以相当收益归各生产单位所有的条件下，在各相当范围内，按照生产性质与经营情形，统一支配生产赢利，

务必免除各自为政，盈亏不一，苦乐不均的弊病。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解放社 1944 年 1 月
订正再版第 206—207 页

经济和财政工作机构中的不统一、闹独立性、各自为政等恶劣现象，必须克服，而建立统一的、指挥如意的、使政策和制度能贯彻到底的工作系统。这种统一的系统建立后，工作效能就可以增加。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895—896 页

由于是农村，人力物力都是分散的，我们的生产和供给就采取“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1016 页

● 组织群众开展劳动竞赛，奖励成绩突出者

为了争取工作的速度，革命竞赛的办法应该在每个乡里实行起来。乡苏是竞赛的领导者，但乡苏也只是“领导者”，因为每一竞赛，主要是群众的竞赛，不只是各村代表之间的竞赛。因此每一竞赛条约的订立，应召集村为单位的群众大会作报告，得到群众的承认，并把竞赛条约张贴出来。在生产问题等项的竞赛上，还应召集每个代表领导下的几十个居民开会作报告，得到他们的承认。一时期内检查成绩的结果，也应该召集这样的会作报告，来推动工作的前进。一切竞赛没有成绩的，都是由于只把竞赛条约放在少数人的袋子里，没有推动广大的群众。每一次竞赛，都要作出总结，并且给奖。长冈乡的两次竞赛，对

于这些都大体上做到了，所以他们得到了实际的成绩。

《长冈乡调查》(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19—320页

提高劳动热忱，发展生产竞赛，奖励生产战线上的成绩显著者，是提高生产的重要方法。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红色中华》二苏大特刊第3期

必须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大规模地发展解放区的农业、工业和贸易，改善军民生活。为此目的，必须实行劳动竞赛，奖励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91页

● 加强企业管理，实行经济核算

建立经济核算制，克服各企业内部的混乱状态。为此必须：第一，每一工厂单位应有相当独立的资金（流动的和固定的），使它可以自己周转，而不致经常因资金困难妨碍生产。第二，每一工厂单位的收入和支出，应有一定的制度和手续，结束收支不清、手续不备的糊涂现象。第三，依照各厂具体情况，使有些采取成本会计制，有些则暂不采取，但一切工厂必须有成本的计算。第四，每一工厂的生产，应有按年按月生产计划完成程度的检查制度，不得听其自流，很久不去检查。第五，每一工厂应有节省原料与保护工具的制度，养成节省原料与爱护工具的习惯。所有这些就是经济核算制的主要内容。有了

严格的核算制度之后，才能彻底考查一个企业的经营是否是有利的。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节选）》（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63页

改善工厂的组织与管理，克服工厂机关化与纪律松懈状态。首先应该改革的是工厂机关化的不合理现象。目前我们有许多工厂在组织上非常不合理，人员众多，组织庞大，管理人员和直接生产人员的分配不适当，以及将管理大工厂的制度应用到我们的小工厂上面，这些现象必须迅速改变，使一切工厂实行企业化。一切工厂，应依自己经济的盈亏以为事业的消长。一切从业员的薪给，应由工厂自己的盈利解决，而不支领公粮、公衣与公家的津贴费。其次是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及计件累进工资制，借以提高劳动热忱，增加生产。八小时工作制，是将来大工业发展时应该实行的，目前则应一律实行十小时制，应使职工们了解这是抗战的需要。平均主义的薪给制抹杀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差别，也抹杀了勤惰之间的差别，因而降低劳动积极性，必须代以计件累进工资制，方能鼓励劳动积极性，增加生产的数量与质量。军工生产暂时不能实行计件工资制，亦应有计件奖励制度。再其次，应改善职工会的工作，发展赵占魁运动于各厂。职工会工作有不适合于提高劳动纪律与劳动积极性的，必须加以改造。一个工厂内，行政工作、党支部工作与职工会工作，必须统一于共同目标之下，这个共同目标，就是以尽可能节省的成本（原料、工具及其他开支），制造尽可能多与尽可能好的产品，并在尽可能快与尽可能有利的条件下推销出去。这个成本少、产品好、推销快的任务是行政、支部、工会三方面三位一体的共同任务，各顾各地把三方面工作

分裂起来的作法，是完全错误的。三方面要组织统一的委员会，首先使行政人员、行政工作、生产计划走上正轨，而党与工会的任务就是保障生产计划的完成。再其次，工厂应奖励最有成绩的工人与职员，批评或处罚犯错误的工人与职员。没有适当的奖惩制度，是不能保证劳动纪律与劳动积极性的提高的。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节选）》（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63—464页

在公营企业中，必须由行政方面和工会方面组织联合的管理委员会，以加强管理工作，达到降低成本、增加生产、公私两利的目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也应当试行这种办法，以达到降低成本、增加生产、劳资两利的目的。工人生活必须酌量改善，但是必须避免过高的待遇。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69页

（三）根据地的文化建设

（参见第六编“关于思想宣传工作和文化工作”，第1594—1657页）

（四）根据地是全国的榜样，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模型

边区的作用，就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是最于抗日救国有利的，是抗日救国惟一正确的道路，这就是边区在全国的意义与作用。

《同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一九三八年七月二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31页

边区的方向，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方向。现在全国要办新民主主义，有没有一个样子呢？我讲已经有了。陕甘宁边区就是模范。

在陕甘宁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〇年三月四日）

判断一个地方的社会性质是不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地是以那里的政权是否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以及是否有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因此，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便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有些人以为只有实行十年内战时期那样的土地革命才算实现了新民主主义，这是不对的。现在各根据地的政治，是一切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人民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其经济是基本上排除了半殖民地因素和半封建因素的经济，其文化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因此，无论就政治、经济或文化来看，只实行减租减息的各抗日根据地，和实行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的陕甘宁边区，同样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一九四一年五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85页

中国是向前的，不是向后的，领导中国前进的是革命的根据地，不是任何落后倒退的地方。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76—877页

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胜利的伟大意义

自由解放的新中国一定要出现于东亚，并成为未来光明世界中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样的中国，不但将造福于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而且将造福于全人类。

《论新阶段》（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561—562页

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内，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还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世界的东方，在这里，共有十万万以上人口（占人类的一半）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到进攻，不能不引起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欢欣鼓舞。同时，对于正在斗争的欧洲和美洲各国的被压迫人民，也是一种援助。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44页

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8页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67页

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
版第4卷第1480页

诚如你所说，中国人民的胜利是对于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胜利。这个胜利，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进步人类对于世界帝国主义阵营所进行的总的斗争的结果之一部分，……

《答谢福斯特、但尼斯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电报》(一九四九年十月六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4页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中国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这个革命，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算起，经过了二十八年，终于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世界形势的改变，国内形势的改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以苏联为首的国际革命力量的支援，而取得了胜利。这是继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之后的第三个伟大的胜利。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产生了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产生了许多人民民主的国家。中国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东方世界的形势。这三个胜利，产生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具有八亿多人口的政治和经济的强大的阵营。资本主义阵营是大大削弱了。

《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任务》（一九五三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425页

第三编

关于从新民主主义 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目 录

-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723)
 -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
新时代，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723)
 -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从新民主主义
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开始 (725)
- 二、新中国各项基本政治制度的建立 (727)
 - (一)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治制度 (727)
 - 1. 人民民主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
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 (727)
 - 2. 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
专政 (731)
 - 3. 人民民主专政是保障革命胜利成果和社会
主义建设，反对内外敌人复辟的有力武器 (735)
 - (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制度 (739)
 - 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739)
 - 2. 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
政治组织 (743)
 - 3. 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巩固革命
胜利、建设新中国的需要 (744)
 - 4. 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749)
 - 5. 县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751)

- (三) 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754)
- (四)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757)
- 三、恢复国民经济 (759)
 - (一) 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 (759)
 - (二) 统一管理财政经济, 合理调整工商业 (761)
 - (三) 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 (764)
- 四、完成民主革命各项遗留任务 (766)
 - (一) 肃清国民党的残余势力, 将革命进行到底, 解放全中国 (766)
 - (二) 没收官僚资本为国家所有 (771)
 - (三) 完成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 (773)
 - 1. 新区土改的意义和特点 (773)
 - 2. 新区土改必须先进行减租减息, 后进行分配土地 (774)
 - 3. 新区土改对富农应由征收多余的土地财产改为保存富农经济 (777)
 - (四) 镇压反革命 (779)
 - 1. 镇反是巩固政权、伸张民气的一场伟大斗争 ... (779)
 - 2. 对反革命分子要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 (782)
 - 3. 镇反必须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 (784)
 - 4. 镇反工作要实行党委统一领导, 专门机关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方法 (786)
- 五、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 (788)
 - (一) 抗美援朝是完全必要的和正义的 (788)
 - (二) 抗美援朝要作长期打算, 一直打到我们完全胜利 (790)
 - (三) 抗美援朝的作战方针和战略战术 (793)

- (四) 对朝鲜停战谈判的估计和对策 (797)
- (五) 抗美援朝胜利的政治基础和重大意义 (800)
- 六、开展“三反”“五反”斗争，打退资产阶级的
进攻 (802)
 - (一) “三反”的意义、方针和处理贪污行为的
政策界限 (802)
 - (二) “五反”的目的、意义和处理资本家不法
行为的政策界限 (805)
 - (三) 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 (809)
 - (四) 要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 (810)
- 七、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813)
- 八、过渡时期和党的总路线总任务 (817)
 - (一) 过渡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817)
 - (二)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818)
 - (三)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 (819)
 - (四)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 (825)
- 九、社会主义工业化 (827)
 - (一) 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意义 (827)
 - (二) 实现工业化的资金主要依靠国家内部
积累，实行增产节约 (829)
- 十、个体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831)
 - (一) 农业合作化的意义 (831)
 - 1. 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惟一的道路 (831)
 - 2. 实现农业合作化才能适应工业化的需要 (834)
 - 3. 实行农业合作化才能巩固工农联盟 (836)
 - (二) 农业合作化的原则、方针、政策和方法 (839)
 - 1. 坚持自愿互利原则，反对强迫命令 (839)

2. 对农民要进行细致生动的思想政治工作 (842)
 3. 贯彻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 (843)
 4. 有准备有步骤地从低级向高级发展 (849)
 5. 坚持勤俭办社的方针 (852)
 6. 注重办社质量, 做好整顿工作 (853)
 7. 以增产增收作为检验合作社的主要标准 (856)
 8. 对单干农民采取尊重和团结态度, 帮助贫困社员解决实际困难 (857)
 9. 全面规划, 加强领导 (858)
 - (三)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861)
- 十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864)
- (一) 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 (864)
 1. 革命胜利后, 私人资本主义在中国有一个相当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和必要的 (864)
 2. 对私营工商业要采取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 (866)
 3. 正确对待私营工商业, 防止和克服“左”右两种倾向 (868)
 4. 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872)
 - (二) 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 (873)
 1. 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和平赎买政策 (873)
 2. 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877)
 3. 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 (879)
 4. 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 (881)
 5. 改造要有准备有步骤, 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886)

-
- (三) 对私营工商业者的教育、培养和改造 (889)
1. 加强教育, 从中培养一批觉悟较高的核心人物 (889)
 2. 公私合营后, 私营工商业者要继续学习, 以企业为基地进行改造 (892)
- (四) 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的重大意义 (894)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时代，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3—344页

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的先进分子，其中杰出者有如领导辛亥革命的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政府的压迫，领导广大的人民，进行了不断的斗争，百折不挠，再接再厉，到现在，终于达到了目的。当着我们举行会议的时候，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

现在是站立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
第5卷第347页

我们的会议齐心协力，按照新民主主义的原则，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于北京，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采用了义勇军进行曲为现时的国歌，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世界公元，选举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
第5卷第347—348页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中国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这个革命，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算起，经过了二十八年，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世界形势的改变，国内形势的改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以苏联为首的国际革命力量的支援，而取得了胜利。

《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任务》（一九五三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425页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开始

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15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进入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页

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之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1页

我们经过解放战争，赢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我们立即没收了占全国工业、运输业固定资产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转为全民所有。同时，用了三年的时间，完成全国的土地改革。如果因此说全国解放以后，“革命在最初阶段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只是后

来才逐渐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不对的。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3页

二、新中国各项基本政治制度的建立

（一）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治制度

1. 人民民主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

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问题的提法，在我们党内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大革命时期我们提的是“统一战线”，当时右的理论是政权归国民党，我们以后再革命。后来我们搞土地革命了，六大规定的是工农民主专政，没有估计到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在帝国主义压迫下还可以跟无产阶级合作。合作是后来发生的，因为有了日本的侵略，现在又有美国的侵略，我们又回到大革命中的正确时期。现在不是国共合作，但原则上还是“国共合作”。现在不是同蒋介石合作，是同冯玉祥，李济深合作，同民主同盟、平津学生合作，同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合作。“中间路线”、“第三方面”的主张行不通，但是我们要同有这种主张的分子合作。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我们有

广大的统一战线，我们政权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打倒它们，就要打倒它们的国家，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产生的政府来代表它的。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一九四八年九月)，《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35—136页

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6—1437页

孙中山死去二十四年了，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都大大地向前发展了，根本上变换了中国的面目。到现在为止，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这两件事：(一)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

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二）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2页

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8—1479页

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80页

中国现在有两种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跟农民阶级的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跟资本家、大学教授、高级技术人员、起义将军、宗教首领、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联盟。这两种联盟都是需要的，而且要继续下去。哪一种联盟是基础，是最重要的呢？工人阶级跟农民阶级的联盟是基础，是最重要的。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期间的讲话（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六日——十八日）

我们现在有两个联盟：一个是同农民的联盟，一个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这两个联盟对我们都很必要，周恩来同志也讲了这个问题。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工业品来换得农产品。十月革命后有一个时期，列宁就打这个主意。因为国家没有工业品去交换，农民就不拿粮食出来，单用票子去买他不干，所以列宁打算让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和国家资本主义结成联盟，为的是增加工业品来对付农村中的自发势力。我们现在搞一个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暂时不没收资本主义企业，对它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也就是为了搞到更多的工业品去满足农民的需要，以便改变农民对于粮食甚至一些别的工业原料的惜售行为。这是利用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来克服农民的惜售。同时，我们依靠同农民的联盟，取得粮食和工业原料去制资产阶级。资本家没有原料，国家有原料。他们要原料，就得把工业品拿出来卖给国家，就得搞国家资本主义。他们不干，我们就不给原料，横直卡死了。这就把资产阶级要搞自由市场、自由取得原料、自由销售工业品这一条资本主义道路制住了，并且在政治上使资产阶级孤立起来。这是讲这两个联盟的相互作用。这两个联盟，同农民的联盟是主要的，基本的，第一位的；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暂时的，第二位的。这两个联盟，在我们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现在都是必要的。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结论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

无产阶级专政要靠广大的同盟军，单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不行。中国无产阶级数量少，只有一千多万人，它要靠几亿人口的贫农、下中农、城市贫民、贫苦的手工业者和革命知识分

子，才能实行专政，不然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发动了他们的积极性，无产阶级专政就巩固起来了。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2. 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

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为什么理由要这样做？大家很清楚。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5页

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

阶级的反动行为。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6页

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像我们对俘虏军官们已经做过的那样。这也可以说是“施仁政”吧，但这是我们对于原来是敌对阶级的人们所强迫地施行的，和我们对于革命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不能相提并论。

这种对于反动阶级的改造工作，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才能做到。这件工作做好了，中国的主要的剥削阶级——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即垄断资产阶级，就最后地消灭了。剩下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就可以向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进行许多适当的教育工作。等到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即实行私营企业国有化的时候，再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6—1477页

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极权政府”的话，也有一半是说得对的。这个政府是对于内外反动派实行专政或独裁的政府，不给任何内外反动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动的权利。反动派生气了，骂一句“极权政府”。其实，就人民政府关于镇压反动派的权力

来说，千真万确地是这样的。这个权力，现在写在我们的纲领上，将来还要写在我们的宪法上。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越是反动派骂“极权政府”，就越显得是一个宝贝。但是艾奇逊的话有一半是说错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对于人民内部来说，不是专政或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这个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的工作人员对于人民必须是恭恭敬敬地听话的。同时，他们又是人民的先生，用自我教育或自我批评的方法，教育人民。

《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02—1503页

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对人民说来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我希望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都采用这种方法。

《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四日、二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81—82页

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

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们的宪法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7页

我们的专政，叫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表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7—208页

发挥群众的主动性、责任心，克服领导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领导与群众就容易打成一片了。从此形成传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在此基础上建立巩固的集中制，建立巩固的对反动派和坏人的专政。

《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92页

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在人民内部

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怎样实行领导呢?经过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无产阶级团结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和阶层,对反动阶级,或者说,对反动阶级的残余,实行专政。在我们国内,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现在反动阶级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厉害了,……但是,对于这个残余,千万不可轻视,必须继续同他们作斗争。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7页

3. 人民民主专政是保障革命胜利成果和社会主义建设,反对内外敌人复辟的有力武器

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将要犯绝大的错误。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3页

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

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我们在这方面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人民犯了法，也要受处罚，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这是若干个别的情形，和对于反动阶级当作一个阶级的专政来说，有原则的区别。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6页

宋朝的哲学家朱熹，写了许多书，说了许多话，大家都忘记了，但有一句话还没有忘记：“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即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道，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身。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项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他们就不能维持政权，他们的政权就会被内外反动派所推翻，内外反动派就会在中国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殃。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8页

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的复辟阴谋的有力的武器，我们必须牢牢地掌握这个武器。在国际上，我们必须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首先是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团结在一

起，使我们的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不致处于孤立地位。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会是永远胜利的。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4页

一切事实都证明：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

《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十一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84页

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决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已经过时”。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没有很大的强制性。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36页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将他们判罪，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都是属于专政的范围。为

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6—207页

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给我国的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开辟了道路。我们的政权的建立还不过短短几年，人们可以看到，不论在经济方面，在文化、教育、科学方面，都已经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5页

教科书说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说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都说得不完全，都没有提到对敌人的镇压，也没有提到阶级改造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不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要改造，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要改造，知识分子要改造，而且农民也要改造。我们的经验证明，改造是不容易的，不经过反复多次的斗争，都是不能改造好的。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第97—98页

专业工作是需要的，对于反革命分子，侦查、审讯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主要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特别是对于整个反动阶级的专政，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党。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8页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

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

《给李济深、沈钧儒的信》(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毛泽东文集》
第5卷第90页

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

《复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电》(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14页

召集政治协商会议的口号，团结了国民党区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于我党周围。现在，我们正在组织国民党区域的这些党派和团体的代表人物来解放区，准备在一九四九年召集中国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47页

一九四九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

《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34页

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

向全国人民提议召开的。这个提议，迅速地得到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响应。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都认为：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我们的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这是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也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个政治基础是如此巩固，以至于没有一个认真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提出任何不同的意见，大家认为只有这一条道路，才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正确的方向。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63—1464页

我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中国的胜利。包括全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各解放区、国内各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在内的新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经过慎重筹备之后，即将在九月内召开全体会议。此届全体会议除制定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选举自己的全国委员会外，并须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给阿哈买提江的电报》（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
第5卷第329页

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援助人民解放军，反对了自己的敌人，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在这个基础上，召开了今天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我们的会议之所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因为三年以前我们曾和蒋介石国民党一道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那次会议的结果是被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破坏了，但是已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次会议证明，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一道，是不能解决任何有利于人民的任务的。即使勉强地做了决议也是无益的，一待时机成熟他们就要撕毁一切决议，并以残酷的战争反对人民。那次会议的惟一收获是给了人民以深刻的教育，使人民懂得：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决无妥协的余地，或者是推翻这些敌人，或者是被这些敌人所屠杀和压迫，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很快地觉悟起来，并且把自己组织起来，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集中的代表者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一战线，援助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推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恢复了政治协商会议。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2—343页

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

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自己的议程中将要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的所在地以及采取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年号。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3页

2. 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政治组织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其选出的全国委员会，是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界民主人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组织，在全国人民中有很高的威信。我们必须巩固这种团结，巩固我们的统一战线，领导全国人民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四日、二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78页

政协的性质有别于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也不是国家的行政机关。有人说，政协全国委员会的职权要相等或大体相等于国家机关，才说明它是被重视的。如果这样说，那末共产党没有制宪之权，不能制定法律，不能下命令，只能提建议，是否也就不重要了呢？不能这样看。如果把政协全国委员会也搞成国家机关，那就会一国二公，是不行的。要区

别各有各的职权。

政协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党派性的，它的成员主要是党派、团体推出的代表。

《关于政协的性质和任务》（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84—385页

3. 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巩固革命胜利、建设新中国的需要

有人说全国胜利以后怎么办？那时还要不要统一战线？是不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下一个命令不要统一战线了？不是的。那时的问题是巩固胜利，没有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胜利就不能巩固。

《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5—26页

中国的革命是全民族人民大众的革命，除了帝国主义者、封建主义者、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而外，其余的一切人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有一个广大的和巩固的革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广大，它包含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巩固，它具备了战胜任何敌人和克服任何困难的坚强的意志和源源不竭的能力。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65—1466页

没有统一战线，革命不能胜利，胜利了也不能巩固。搞统

一战线哪能怕麻烦，怕捣乱，怕人家吃了你的饭？切不可叶公好龙。长征二万五千里不是因为有统一战线，而是因为太纯洁。这次政府的名单中，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还是一半一半好，要搞五湖四海。别人在民主革命困难时期拥护共产党，为我们说过好话，帮过忙，我们胜利了不能不要人家。

《同绥远负责人的谈话》（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4页

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要向干部讲明这个道理，并且拿事实证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是对的，是必要的。这些人中间有许多人过去是我们的敌人，现在他们从敌人方面分化出来，到我们这边来了，对这种多少有点可能团结的人，我们也要团结。团结他们，有利于劳动人民。现在我们需要采取这个策略。

《不要四面出击》（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75页

在这个远大目标上，在国外，我们必须坚固地团结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及全世界一切和平民主力量，对此不可有丝毫的游移和动摇。在国内，我们必须团结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必须巩固我们这个已经建立的伟大的有威信的革命统一战线。不论什么人，凡对于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的巩固工作有所贡献者，我们就欢迎他，

他就是正确的；凡对于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的巩固工作有所损害者，我们就反对他，他就是错误的。

《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四日、二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81页

要达到巩固革命统一战线的目的，必须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采取这种方法时所用的标准，主要是我们现时的根本大法即《共同纲领》。我们在这次会议中，即根据《共同纲领》，采取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是推动大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很好的方法，是人民国家内全体革命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惟一正确的方法。……我希望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都采用这种方法。

《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四日、二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81—82页

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一步一步地形成的，它是一个包括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在内的几万万人的统一战线，它是以工人、农民为基础的，它是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它又是采用自我批评方法的，因此，它就能够巩固地团结一致，它就能够越来越有生气，越来越有力量，它就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

《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十一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87页

统一战线中，工农联盟，是工人阶级同劳动人民的联盟，对这第一个联盟没有争论。同劳动人民的联盟，时间会很长，农

业要全部变成国营农场，工农才会只是职业上的区别，无工人农民之分。第二个联盟，也就是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的联盟。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是资产阶级问题。资产阶级是一个敌对阶级，但不同于别的敌对阶级，它同我们合作。不善于区别能合作和不能合作的敌对者，就会犯路线错误。

《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统战人士安排问题》（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九日），《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

又如统一战线，《共同纲领》中写了，现在宪法草案的序言中也写了。要有这么一个“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可以安定各阶层，安定民族资产阶级和各民主党派，安定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7页

必须指出，在强调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任务的时候，不要忘记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在民主人士中存在着的政治上的和思想上的错误倾向，必须加以分析，并在适当的时机用适当的方式向他们指出，有些应当提出批评，或加以讨论，以达帮助他们提高思想、改正错误的目的。认为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可以只要团结、不要斗争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的任务是：既要反对关门主义的“左”的偏向，又要反对同错误思想和平共居的右的偏向。

《对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五年一月十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2—3页

中国的统一战线有很久的历史，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帝反封建，到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是经过共产党领导统

一战线。我看统一战线有好处，又反帝反封建，又赞成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把人家赶走呢？是人多好些，还是把许多积极因素赶走好些呢？还是把积极因素团结起来好。要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村的、城市的）、宗教家等等都团结起来。团结了更多的人，阻碍就少些，事情就容易办得通。至于选举，不选民主人士不好，要说服选民，使他们了解这样做对劳动人民没有害处而有益处，是可以说服他们的。当然也还有“左”派，门关得紧点，对他们也可以说服。

《工商业者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88页

统一战线到底还要不要？现在经常发生这个问题。这不是一个政党（共产党或者它的中央委员会），一个集团，少数人或者个别的人，说要就要、说不要就不要这么一个问题。这是要看统一战线存在下去有好处还是没有好处，对劳动人民事业，对走社会主义道路，有利益还是没有利益来决定的。……现在证明，建立了统一战线对我们有帮助，不但对过去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有利的，对现在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也是有好处的。因此，统一战线要坚持下去，宪法上已经作了规定。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94—495页

在我们继续加强全党的团结的时候，我们还必须继续加强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继续巩固和扩大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认真地纠正在任何工作环节上的任何一种妨害党同人民团结的不良现象。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15页

4. 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从团结他们出发，对他们的错误和缺点进行认真的和适当的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他们的目的。对他们的错误或缺点采取迁就态度，是不对的。对他们采取关门态度或敷衍态度，也是不对的。每一个大城市和每一个中等城市，每一个战略性区域和每一个省，都应当培养一批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有威信的党外民主人士。我们党内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关门主义作风所养成的对待党外民主人士的不正确态度，在抗日时期并没有完全克服，在一九四七年各根据地土地改革高潮时期又曾出现过。这种态度只会使我党陷于孤立，使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巩固，使敌人获得同盟者。现在中国第一次在我党领导之下的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民主联合政府即将成立，革命即将在全国胜利，全党对于这个问题必须有认真的检讨和正确的认识，必须反对右的迁就主义和“左”的关门主义或敷衍主义两种倾向，而采取完全正确的态度。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7—1438页

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4—35页

工商联将来怎么办？也可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工商联这个名称可以保存下来。

《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71页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口号，也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这个口号并不是突然提出来的，它已经经过了好几年的酝酿。长期共存的思想已经存在很久了。到去年，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这些口号就明确地提出来了。为什么要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同工人阶级政党长期共存呢？这是因为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我在一九五〇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上，就已经这样说过：“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这里所说的，也就是各党派可以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

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各党派互相监督的事实，也早已存在，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见，作批评。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当然，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相互之间所提的意见，所作的批评，也只有在合乎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六条政治标准的情况下，才能够发挥互相监督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希望各民主党派都能注意思想改造，争取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4—235页

5. 县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三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务于九月份一律开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一律将开会情形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在广播台上公开广播。不许可有不开的，不许可不公开发表和不做口语广播。借此以使所属三万人口以上城市的党的组织和各界人民代表亲密结合，经过他们去团结各界人民，克服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并克服党的领导机关中的许多人只相信少数人的党内干部会议，不相信人民代表会议的官僚主义作风。

《三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和各县均应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33页

积极利用城市的各界代表会议及各县的全县代表会议，将一切施政中的重大问题逐一提出自己有了准备的想过了的有了办法的问题向会议作报告，并交付讨论，征求他们的意见。此种会议，党员及完全可靠的左翼分子总共超过二分之一，能保证通过我们的意见即够，以便团结大批的中间分子及一部分必须拉拢的右翼分子，使他们向我们靠拢。此种会议，城市最好每月开会一次或三月开会两次，各县似以两月开会一次为宜。新区各县的各界代表会议我们尚无经验，请你考虑选择上海附近一二个县亲自领导，开一二次会试试。

《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一九四九年九月二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36页

（一）华北局转来察哈尔省委末世电报告该省各界代表会的经验，很值得注意，请加研究。

（二）经验证明，凡未注意召开各界代表会仍然束缚于党内狭小圈子的，就走了弯路。

（三）必须反对形式主义，每次会议要有充分准备，要有中心内容，要切实讨论工作中存在的为人民所关心的问题，要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当作一件大事去办，否则将损害党的政治威信。

（四）在新解放区，各界代表会的开始若干次，代表的产生可以推派和聘请为主，由可靠民众团体的民主选举为辅，以后，即可改为由各团体、各界的民主选举为主，推派和聘请为辅。总以既能保证会议由我党领导，又能养成民主精神为原则。

（五）二万以上不足三万人的城镇，亦可开各界代表会。

《关于各地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指示》（一九四九年九月四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37页

关于召开县的各界代表会问题，自西北局提议后，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认为有益无害。而不召开各界代表会，要等到农协在乡村中建立了基础再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如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日中央复电（载在《政策汇编》）那样，则是很不利的。事实上，县的许多大政方针，例如剿匪、反霸、借粮、征粮、救济灾荒、修理堤坝、推动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协、减租减息问题、恢复和发展县范围内的工商业及文化教育问题、推行人民币及县的财政金融问题等，均以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经过讨论，取得代表们同意，然后传达推行，比较不开这种会，长期限于党内干部的讨论、传达和推行，要有利得多。

《开好县的各界代表会议》（一九四九年九月七日），《毛泽东文集》
第5卷第340页

你们看了松江县的经验后，请即通令所属一律仿照办理。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务望仿照办理，抓紧去做。并请你们选择一个县，亲自出席，取得经验，指导所属。

《开好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一件大事》（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页

必须充分注意广东全省市的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各市各县均应召开。你们必须将这种市的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看成是团结各界人民，动员群众完成剿匪反霸，肃清特务，减租减息，征税征粮，恢复与发展生产，恢复与发展文化教育直至完成土地改革的极重要的工具，一律每三个月召开一次。

《必须充分注意召开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2页

必须认真地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帮助他们解决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克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和迁就主义倾向。必须认真地开好足以团结各界人民共同进行工作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人民政府的一切重要工作都应交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并作出决定。必须使出席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们有充分的发言权，任何压制人民代表发言的行动都是错误的。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71页

（三）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57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政府。

现在时期，在乡村中可以而且应当依据农民的要求，召集乡村农民大会选举乡村政府，召集区农民代表大会选举区政府。县、市和县市以上的政府，因其不但代表乡村的农民，而且代表市镇、县城、省城和大工商业都市的各阶层各职业人民，就

应召集县的、市的、省的或边区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政府。在将来，革命在全国胜利之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应当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72—1273页

关于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问题，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过去我们叫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苏维埃就是代表会议，我们又叫“苏维埃”，又叫“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成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这是死搬外国名词。现在我们就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名词。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我们提出开人民代表大会，孙中山遗嘱还写着要开国民会议，国民党天天念遗嘱，他们是不能反对的。外国资产阶级也不能反对，蒋介石开过两次“国大”他们也没有反对。德国、北朝鲜也是这样搞的。我看我们可以这样决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一九四八年九月），《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36页

我们不采取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而采取无产阶级共和国的苏维埃制度。代表会议就是苏维埃。自然，在内容上我们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是有区别的，我们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苏维埃，“苏维埃”这个外来语我们不用，而叫做人民代表会议。苏维埃是俄国人民创造的，列宁加以发扬。在中国，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在人民中已经臭

了，我们不采用它，而采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制度。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65页

为了发扬民主，对政权组织，特别是县、乡两级，来一次全国普选，很有必要。这对促进经济建设，加强经济建设的领导有积极作用。就是对于抗美援朝也有好处，傅作义委员说可以加强抗美援朝。前天我看到艾森豪威尔的一篇讲话，他说：中国要办民主选举是不可能的。对艾森豪威尔来说，你办选举他要侵略，你不办选举他也要侵略，问题是决定于我们自己的工作。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人民民主更加发扬，经济建设搞得更好，抗美援朝的力量更加增强，那是可以使它放弃侵略的。所以，为了发扬民主，为了加强经济建设，为了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就要办选举，搞宪法。

《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几点说明》（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58—259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负有重大的任务。

这次会议的任务是：

制定宪法；

制定几个重要的法律；

通过政府工作报告；

选举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

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

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49—350页

（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区域自治问题，牵涉很广，有西藏、青海、宁夏、新疆、甘肃、西康、云南、广西、贵州、海南、湘西等处，有的须成立内蒙那样的大区域政府，有的须成立包括几个县的小区域政府，有的是一个县或一个区的政府，疆域划分，人员配备，政策指导，问题甚多，须加统筹。

《民族区域自治问题须加统筹》（一九五〇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29页

认真在各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推行区域自治和训练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是两项中心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46页

傣族在云南省有三十万人，他们组织一个自治区。在广西省的壮族有七百多万人，他们也组织一个自治区。我们还有好几十个这样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域，例如，朝鲜族、蒙古族的。我们也准备在西藏建立一个自治区。我国少数民族的种类很多，但人数总计不到四千万。

《同缅甸总理吴努的谈话》（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77页

宪法规定你们有自治权。因此，各民族的事情自己管，就像新疆维吾尔族的事情由他们自己管一样，汉人只能帮助，不

能代替他们管理。你们有人去过内蒙古，那个地方的事情是蒙古族自己管的。达赖、班禅也到过延边，那里的事情是朝鲜族自己管的。总之，实行区域自治的各民族的事情都归本民族自己管。

《接见西藏地区参观团、西藏青年参观团负责人等的谈话》（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25页

苏联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一半，他们实行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的办法。我们这里少数民族人口占百分之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办法。有些人想援引苏联的办法，在中国成立加盟共和国或自治共和国，这是不对的。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第281页

什么时候成立自治区。由筹委会变成正式的地方自治区政府，今年是不行了，我看是明年或后年。主要是个选举问题。现在先搞个选举法，搞个条例。现在积极筹备选举，准备在明年，最迟后年，开全藏人民代表大会。这个会的任务是决定自治区工作的方针、政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政策，选举自治区政府，通过一个自治区自治条例，也就是那里的基本法。

你们回去就筹备，先把县、乡两级人民政府，用选举的办法建立起来，以后就好选自治区的人民代表了。

《同班禅额尔德尼的谈话》（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218页

三、恢复国民经济

（一）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

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为了这一点，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如果我们在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28页

北方则除少数新解放区以外，是完全另外一种情况。在这里，已经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人民的统治，并且根本上解决了土地问题。党在这里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同时必须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肃清残余的反动力量，巩固整个北方，支援人民解放军。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29页

财政经济工作已成为中央和中央局的主要议程，应该认真研究财政经济问题，并进行适时的宣传，使人民了解情况和政策。有几个政策上的问题是二中全会已经确定了的，但是有些地方仍然缺乏明确的认识。在城乡关系中，哪一个为中心呢？从有城市的时候起，城市就是中心。城市的手工业，对于农业来说也是一种进步，工业更不待说。在工商关系中，应当工业是中心，因为工业是生产价值的。在公私关系中，应当国营经济是中心，因为国营经济虽然在某些地方数量较小，却是集中的和处于领导地位的。在劳资关系中，应当依靠工人阶级，而不是依靠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是不能依靠的。这些都是必须坚持的原则，我们不要为某些现象所迷惑。

《关于土地改革和财经工作》(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5—26页

整个中南六省的工作重心，已由军事转到经济与土改，希望你们于明年一月间成立中南军政委员会，集中力量领导全区经济工作，并积极准备土改条件。

《渡海作战必须注意的问题》(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3页

各中央局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亲自抓紧财政、金融、经济工作，各中央局会议必须经常讨论财经工作，不得以为只是财经业务机关的工作而稍有放松，各分局、大市委、省委、区党委亦是如此。中央政治局现在几乎每次会议都要讨论财经工作。

《省以上各级党委必须经常讨论财经工作》（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59页

“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要使省市级以上干部都明白。准备时间，现在起，还有二十二个月，必须从各方面加紧进行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43页

（二）统一管理财政经济，合理调整工商业

关于财经统一。

这个问题不需要多讲。以华北人民政府的财委会统一华北、华东及西北三区的经济、财政、贸易、金融、交通和军工的可能的和必要的建设工作和行政工作。不是一切都统一，而是可能的又必要的就统一，可能而不必要的不统一，必要而不可能的也暂时不统一。如农业、小手工业等暂时不统一，而金融工作、货币发行就必须先统一。行政上的统一，就是由华北财委会下命令，三区的党、政、军要保障华北财委会统一命令的执行。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一九四八年九月），《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37页

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几个政策问题》（一九五〇年四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9页

今后几个月内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调整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以及公私企业各个部门的相互关系方面，极力克服无政府状态。

《共同纲领》的规定，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必须充分实现，方有利于整个人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现在已经发生的在这方面的某些混乱思想，必须澄清。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52页

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统治，造成了社会经济的不正常状态，造成了广大的失业群。革命胜利以后，整个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正在重新改组，失业人员又有增多。这是一件大事，人民政府业已开始着手采取救济和安置失业人员的办法，以期有步骤地解决这个问题。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69页

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在此方针下，调整税收，酌量减轻民负。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

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70—71页）

革命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这种改组是必要的，但暂时也给我们带来很重的负担。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皇皇不可终日，很不满。失业的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

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这件事虽然现在有困难，但是我们总要想各种办法来解决。

《不要四面出击》（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74页

我们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拿出二十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我们实行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广大农民就会拥护我们。我们也要给小手工业者找出路，维持他们的生活。对民族资产阶级，我们要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

改善同他们的关系，不要搞得太紧张了。

《不要四面出击》（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74页

全国有五百万工商户，其中商业行户大约有三百万，在整个经济事业由旧的轨道转入新民主主义轨道中，当有一大批商行和手工业需要转业和改组，这是不可避免的，政府应当妥为指导这件事。

《给陈叔通的信》（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16页

（三）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

我们的情况概括地说来就是：有困难的，有办法的，有希望的。我们的财政情况是有困难的，我们必须要向人民说明我们的困难所在，不要隐瞒这种困难。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确实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既然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的事业就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情况会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估计明年要比今年好。在三年五年的时间里，我们的经济事业可以完全恢复；在十年八年的时间里，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发展。

《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4页

我们国家的财政情况已开始好转，这是很好的现象。但整个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军政费用的大量节减。这些应当争取逐步实现，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那时就可以出现

根本的好转。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52页

我们现在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的一批胜利，例如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停止膨胀和物价趋向稳定等等，表现了财政经济情况的开始好转，但这还不是根本的好转。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三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全党和全国人民均应为创造这三个条件而努力奋斗。我和大家都相信，这些条件是完全可以把握地能够在三年左右的时间之内争取其实现的。到了那时，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国家整个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了。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70页

四、完成民主革命各项遗留任务

（一）肃清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

《将革命进行到底》（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75页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正在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另一方面则正在设计使用某些既同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们，向他们进行挑拨和策动，叫他们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阵营，构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对派，以便保存反动势力，破坏革命势力。根据确实的情报，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了这样一项阴谋计划，并且已经开始在中国进行这项工作。美国政府的政策，已经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两种方式的斗争：第一种，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分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第二种，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英国和法国的帝国主义者，则是美国这一政策的拥护者。这种情形，现在许多人还没有看清楚，但是大约不要很久，人们就可以看得清楚了。

《将革命进行到底》（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74—1375页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国人民的敌人忽然竭力装作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了（请读者记着，这种可怜相，今后还要装的）。最近做了国民党行政院长的孙科，在去年六月间，不是曾经宣布“在军事方面，只要打到底，终归可以解决”的吗？这次一上台却大谈其“光荣的和平”，……美国官方人士现在不但热心于中国的“和平”，而且一再表示，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

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以来，美国就遵守着“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应该怎样来对付这些君子国的先生们呢？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而且老老实实在地认为：凡是耍着花腔，说什么要怜惜一下这类恶人呀，不然就不合国情、也不够伟大呀等等的人们，决不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

《将革命进行到底》（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76—1377页

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广大人民群众是大群大群地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我们方面来。自由资产阶级向我们找出路，跟国民党走的很少了。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代表们已经或正在成批地来到解放区。整个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崩溃，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是处在极大的混乱和崩溃的状态中。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地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〇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

不容许半途而废。我们必须在党内，在人民解放军内，在人民群众中，有说服力地进行教育工作，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中进行解释工作，使大家懂得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的理由。国民党的所谓和平谈判的阴谋必须继续地给以揭露和打击。

《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30页

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已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武装反共，转变为两面性的政策。这即是：一方面，支持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及地方军阀，继续地抵抗人民解放军；另一方面，则派遣其走狗混入革命阵营，组织所谓反对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在人民解放军接近于全国胜利时，甚至不惜用承认人民共和国的方法，以求取得合法地位，实施这一“内部破坏”的政策。对于这一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性，并坚决地将其击破。

《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31页

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荫蔽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

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27页

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他们还会要互相勾结在一起,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反对中国人民。例如,派遣他们的走狗钻进中国内部来进行分化工作和捣乱工作。这是必然的,他们决不会忘记这一项工作。例如,唆使中国反动派,甚至加上他们自己的力量,封锁中国的海港。只要还有可能,他们就会这样做。再则,假如他们还想冒险的话,派出一部分兵力侵扰中国的边境,也不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我们都必须充分地估计到。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谁要是放松这一项警惕性,谁就将在政治上解除武装,而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粉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的任何一项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65页

我们的革命工作还没有完结,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运动还在向前发展,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4页

（二）没收官僚资本为国家所有

六大到现在已经二十年。这二十年，特别是在抗战八年中，官僚资本有了很大发展。我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报告中讲到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新中国的经济构成，首先是国营经济，第二是由个体向集体发展的农业经济，第三是私人经济，国营经济是领导成分。现在不提国营经济就不能解决问题了。六大决议案没有规定没收官僚资本，而后来连小的也没收了，那是违反六大决议案的。抗战时期在对待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上是完全实行六大决议案的。内战时期“左”的错误实际上是否定了六大的有关城市政策。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一九四八年九月），《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40页

写《新民主主义论》时，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的区别在我们脑子里尚不明晰。大工业、大银行、大商业，不管是不是官僚资本，全国胜利后一定时期内都是要没收的，这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原则。而只要一没收，它们就属于社会主义部分。我们国家银行的资本，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一九四八年九月），《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40页

中国的现代性工业的产值虽然还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但是它却极为集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

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1页

没收官僚资本。凡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铁路、邮政、电报、电灯、电话、自来水和农场、牧场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其中，如有民族工商农牧业家私人股份经调查属实者，当承认其所有权。所有在官僚资本企业中供职的人员，在人民政府接管以前，均须照旧供职，并负责保护资财、机器、图表、账册、档案等，听候清点和接管。保护有功者奖，怠工破坏者罚。凡愿继续服务者，在人民政府接管后，准予量才录用，不使流离失所。

《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

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57—1458页

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过去有一种说法，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说法，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是不对的；但只就反对官僚资本来说，是可以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八比二。我们在解放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3—114页

(三) 完成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

1. 新区土改的意义和特点

这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继军事斗争以后的第二场决战。因为这次土地改革工作是在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条件下进行的，同以前在战争期间与资产阶级隔绝的情况下进行是不同的，所以需要更加谨慎，领导机关要掌握得很紧，随时了解情况，纠正偏向，以求少犯错误。土地改革将对地主和对富农分为两个阶段有好处，便于保护中农。

《关于土地改革和财经工作》(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5页

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在比过去广大得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不要四面出击》(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73—74页

我们这次会议议题众多，中心的议题是将旧有土地制度加以改革的问题。大家同意刘少奇副主席的报告及中共中央建议的土地改革法草案，并对土地改革法草案作了若干有益的修改和补充。这是很好的，我为新中国数万万农村人民获得翻身机会和国家获得工业化的基本条件而表示高兴，表示庆贺。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所以工人阶级应当积极地帮助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应当赞助这种改革，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更应当采取这种态度。

《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四日、二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79—80页

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大家多研究，多商量，打通思想，整齐步伐，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就可以领导人民和帮助人民顺利地通过这一关。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

《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四日、二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80页

2. 新区土改必须先进行减租减息，后进行分配土地

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有全盘考虑之必要。新解放区必须充分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在解放后的相当时期内，实

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口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把主要的打击对象限于政治上站在国民党方面坚决反对我党我军的重要反革命分子，如同抗日时期只逮捕汉奸分子和没收他们的财产一样，而不是立即实行分浮财、分土地的社会改革政策。因为过早地分浮财，只是少数勇敢分子欢迎，基本群众并未分得，因而会表示不满。而且，社会财富迅速分散，于军队亦不利。过早地分土地，使军需负担过早地全部落在农民身上，不是落在地主富农身上。不如不分浮财，不分土地，在社会改革上普遍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得到实益；在财政政策上实行合理负担，使地主富农多出钱。这样，社会财富不分散，社会秩序较稳定，利于集中一切力量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在一两年甚至三年以后，在大块根据地上，国民党反动派已被消灭，环境已经安定，群众已经觉悟和组织起来，战争已经向遥远地方推进，那时就可进入像华北那样的分浮财、分土地的土地改革阶段。这一个减租减息阶段是任何新解放地区所不能缺少的，缺少了这个阶段，我们就要犯错误。就是在华北、东北、西北各大解放区的接敌地区，亦须实行上述同样的策略。

《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26—1327页

南方现时还是被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在这里，党和人民解放军的任务是在城市和乡村中消灭国民党的反动武装力量，建立党的组织，建立政权，发动民众，建立工会、农会和其他民众团体，建立人民武装力量，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在乡村中，则是首先有步骤地展开清剿土匪和反对恶霸即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斗争，完成减租减息的准备工作，以

便在人民解放军到达那个地区大约一年或者两年以后，就能实现减租减息的任务，造成分配土地的先决条件；同时必须注意尽可能地维持农业生产的现有水平不使降低。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29页

我们同意以中间不动两头平的政策，作为解决河南土地问题的基点，对中农土地完全不动，而不要照土地法大纲上关于中农土地的规定。在中央政府成立后，土地法大纲须要有所修改。除上述一点外，在南方及其他新区实行改革土地制度时，必须在某些政策上（例如不要使地富扫地出门等）及工作方法上（例如要开区乡农民代表会议等）改正过去在北方土改中做得不好的地方。而且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完全掌握全部农村运动的领导，绝不许再有过去那样无政府无纪律的状态出现。除河南等若干地方外，最广大的新区，今年及明年的全年都不是实行分配土地的时期，而是准备分配土地的时期。

《同意以中间不动两头平的政策解决河南土地问题》（一九四九年八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24页

我们同意杜润生所提的方法，即首先在各县普遍发动群众，进行减租、退押、反霸及镇压反革命的斗争，整顿基层组织，将此作为一个阶段，接着转入分田阶段。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而且也是最迅速的。土地改革的正确秩序，本来应当如此。

《土地改革要有秩序分阶段进行》（一九五一年二月七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39页

3. 新区土改对富农应由征收多余的土地财产改为保存富农经济

在今冬开始的南方几省及西北某些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解决半封建富农问题。请你们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些。这样做的理由：第一是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容易发生过左偏向，如果我们只动地主不动富农，则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并防止乱打乱杀，否则很难防止；第二是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空气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显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如果我们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动他们，则将显得我们更加有理由，即是说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动权；第三是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现在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都形成了，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妥当的。

《征询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7—48页

鉴于富农出租地数量不大，暂时不动这点土地影响贫雇农所得土地的数量也不会大，现在我的意见仍以为暂时不动较为适宜。

《关于暂时不动富农出租土地问题的电报》（一九五〇年五月一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323页

在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十月这一时期内，华北、山东及东北许多地区的农民群众和我们的农村工作人员，在实施土地改革中，没有能够按照中共中央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颁发的基本上不动富农土地财产的指示，而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行动，将富农的土地财产和地主一样地没收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一时期，是中国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派双方斗争最紧张最残酷的时期。土地改革中发生偏差，也以这一时期为最多，侵犯了一部分中农的利益，破坏了一部分农村中的工商业，并在一些地方发生了乱打乱杀的现象。发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当时紧张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同时，也由于我们的大多数农村工作人员没有土地改革的经验，他们不知道正确地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方法，划错了一部分人的阶级成分，将某些富农当成了地主，将某些中农当成了富农。鉴于此种情况，中共中央乃于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颁发了《土地法大纲》，将富农和地主加以区别，但允许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同年冬季，中共中央颁发了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文件，毛主席发表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文告，任弼时同志也发表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演说。从这时起，农村中发生的某些混乱现象就停止了，土地改革走上了正轨。为了使我们的同志今后在各新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中不要重复过去的错误，指出过去的经验是有必要的。我们现在是处在完全新的情况下，我们建议的土地改革法，采取了消灭封建制度保存富农经济的方针，也是完全必要的。

《关于土地改革报告的修改》（一九五〇年六月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64—65页

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因为战争已经在大陆

上基本结束，和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的情况（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生死斗争，胜负未分）完全不同了，国家可以用贷款方法去帮助贫农解决困难，以补贫农少得一部分土地的缺陷。因此，我们对待富农的政策应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70页

我们在土地改革中实际上消灭了富农经济，在这点上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6页

（四）镇压反革命

1. 镇反是巩固政权、伸张民气的一场伟大斗争

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若干地区内采取了土匪游击战争的方式，煽动了一部分落后分子，和人民政府作斗争。国民党反动派又组织许多秘密的特务分子和间谍分子反对人民政府，在人民中散布谣言，企图破坏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企图离间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和合作。特务和间谍们又进行了破坏人民经济事业的活动，对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采取暗杀手段，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收集情报。所有这些反革命活动，都有帝国主义特别是美

帝国主义在背后策动。这些土匪、特务和间谍，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人民解放军自从一九四八年冬季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以后，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开始渡江作战起至现在为止的十三个半月内，占领了除西藏、台湾及若干其他海岛以外的一切国土，消灭了一百八十三万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和九十八万土匪游击队，人民公安机关则破获了大批的反动特务组织和特务分子。现在人民解放军在新解放区仍有继续剿灭残余土匪的任务，人民公安机关则有继续打击敌人特务组织的任务。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68页

在湘西二十一个县中杀了一批匪首、恶霸、特务，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杀一批。我以为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民气大伸。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

《关于镇压反革命》（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一九五一年十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17页

为了打落敌焰，伸张民气，对匪首、惯匪、恶霸及确有证据的重要特务和会门头子，应当放手杀几批。为了不致弄错，使自己陷于被动，对尚无证据的特务及会门头子，应当进行侦察，取得确证，而不要随便捕人杀人。分清这两种情况的界限是必要的。

《关于镇压反革命》（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一九五一年十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18页

（一）严防反革命的报复。应当肯定反革命的报复是必然会

有的，必须预先采取防制的办法，千万不可疏忽。除加强警卫外，最重要的是采取积极手段，破获反革命的组织，消灭反革命的巢穴，坚决迅速地杀掉一切应当杀掉的反革命分子，使反革命措手不及，无力施行报复手段。（二）必须认识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已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混进来，决不可认为太平无事。现在就应开始注意这个问题，考查可疑的分子，聚集材料。在地委及专署一级以上机关内，军分区及师一级以上的机关内，城市则为市、区两级机关内，特别注意考查这类可疑的分子，一有材料，就应做适宜的处置，保障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纯洁和安全，决不可优柔寡断，姑息养奸，是为至要。

《关于镇压反革命》（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一九五一年十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19页

镇反是一场伟大的斗争，这件事做好了，政权才能巩固。镇反包括：（一）社会上的反革命；（二）隐藏在军政系统旧人员和新知识分子中的反革命；（三）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镇压这三方面的反革命，当然要有步骤，不能同时并举，但是对于党、政、军的某些最重要部门特别是公安部门则须及时清理，将可疑分子预作处置，使这些机关掌握在可靠人员手里，则是完全必要的。

《关于镇压反革命》（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一九五一年十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19页

这里还讲一个镇压反革命的问题。那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你说杀不杀呀？要杀。……我们杀的是些“小蒋介石”。至于“大蒋介石”，比如宣统皇帝、王耀武、杜聿明那些人，我们一个不杀。但是，那些“小蒋介石”不杀掉，我

们这个脚下就天天“地震”，不能解放生产力，不能解放劳动人民。生产力就是两项：劳动者和工具。不镇压反革命，劳动人民不高兴。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解放以后，我们肃清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一些有严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被处了死刑。这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广大群众的要求，这是为了解放长期被反革命分子和各种恶霸分子压迫的广大群众，也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们如果不这样做，人民群众就会抬不起头来。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8页

2. 对反革命分子要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

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使社会各界没有话说。

《关于镇压反革命》（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一九五一年十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17页

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只要我们不杀错，资产阶级虽有叫唤，也就不怕他们叫唤。

《关于镇压反革命》（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一九五一年十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17页

山东有些地方存在着劲头不足的偏向，有些地方存在着草率从事的偏向，这是全国各省市大体上都存在的两种偏向，都应注意纠正。特别是草率从事的偏向，危险最大。因为劲头不足，经过教育说服，劲头总会足起来的，反革命早几天杀，迟几天杀，关系并不甚大。惟独草率从事，错捕错杀了人，则影响很坏。请你们对镇反工作，实行严格控制，务必谨慎从事，务必纠正一切草率从事的偏向。我们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错杀错。

《关于镇压反革命》(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一九五一年十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20页

镇压反革命必须严格限制在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门头子等项范围之内，不能将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国民党党团员、普通国民党军官也包括在内。判死刑者，必须是罪重者，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最主要的是捕人杀人名单的批准权必须控制在地委一级手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现在可以说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各级党委的注意力，主要应放在精细审查名单和广泛进行宣传这两点上，抓住了这两点，就不会犯错误。

《关于镇压反革命》(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一九五一年十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20—121页

反革命势力已经受到了我们一个极其严重的打击。但是他们还有残余力量没有肃清，外面还在不断派遣进来，里面的残余分子还可能发酵扩大，并且他们还在作疯狂的活动，危害人民的事业。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如果我们就此住手，不再向反革命作斗争了，那我们就会要上反革命的老当。因此我们必

须继续提高警惕性，必须继续打击反革命，只要还有反革命分子存在，我们就要彻底消灭他。

《关于镇压反革命》(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一九五一年十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23—124页

3. 镇反必须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

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不可偏废。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于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必须提高警惕性。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72页

所谓胁从不问，是指被迫参加而未作坏事，或未作较大坏事者。至于助恶有据，即是从犯，应当判罪，如主犯判死刑，从犯至少判徒刑，有些罪大的从犯应判死刑，不在胁从不问之列。

《关于镇压反革命》(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一九五一年十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18页

杀人不能太多，太多则丧失社会同情，也损失劳动力。其原则是凡有血债或其他重大罪行非杀不能平民愤者，应坚决杀掉，以平民愤而利生产。凡无血债或其他引起民愤的重大罪行，但有应杀之罪者，例如有些特务或间谍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经济界中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缓期一年或二年执行，强迫他们劳动，以观后效。如他们在劳动中能改造，则第二步可改判无期徒刑，第三步可改判有期徒刑。(凡判徒刑一年以上者，

一般都应组织他们劳动，不能吃闲饭。)这样，主动权抓在我们手里，尔后要怎样办都可以。

《关于镇压反革命》(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一九五一年十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21页

不杀匪首和惯匪，则匪剿不净，且越剿越多。不杀恶霸，则农会不能组成，农民不敢分田。不杀重要的特务，则破坏、暗杀层出不穷。总之，对匪首、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当然，对可杀可不杀的那一部分人，应当判处徒刑，或交群众监视，用劳动去改造之，不要杀。如同宽大应有边，镇压也应有边，无边是不对的，已经解决了问题，群众已经满意的地区，即不应再杀人了。

《给黄炎培的信》(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41页

关于杀反革命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内。这里的原则是：对于有血债或其他最严重的罪行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和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必须坚决地判处死刑，并迅即执行。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处死者，应当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特别是对于在共产党内，在人民政府系统内，在人民解放军系统内，在文化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内清出来的应判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一般以处决十分之一二为原则，其余十分之八九均应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如此，才能获得社会的同情；才能避免我们自己在

这个问题上犯错误；才能分化和瓦解敌人，有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势力；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有利于国家的生产建设。同时，在处决反革命问题上，乡村已达人口千分之一（在西北地区为千分之零点五）、城市已达人口千分之零点五者，应即停止大批地杀人。此外还应明确地规定：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

《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五日），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58—159页

4. 镇反工作要实行党委统一领导，专门机关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方法

整个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必须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之下。一切公安机关和有关镇压反革命的机关的负责同志，都必须和过去一样，坚决接受党委的领导。

《关于镇压反革命》（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一九五一年十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23页

目前在全国进行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激烈的和复杂的斗争。全国各地已经实行的有效的工作路线，是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吸收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统一计划，统一行动，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注意各个时期的斗争策略，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各种代表会、干部会、座谈会、群众会，在会上举行苦主控诉，展览罪证，利用电影、幻灯、戏曲、报纸、小册子和传单作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地反对草率

从事的偏向。凡是完全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完全正确的。凡是没有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错误的。凡是大体上遵照了这个路线，但没有完全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大体上正确但不完全正确的。我们认为这个工作路线是继续深入镇压反革命工作和取得完满胜利的保证。在今后镇反工作中必须完全遵守这个工作路线。

《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五日），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62页

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一）抗美援朝是完全必要的和正义的

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关于派志愿军入朝参战问题》（一九五〇年十月二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97页

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一九五〇年十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00页

（一）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

（二）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

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

(五) 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当和必须入朝参战》（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03—104页

美国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人民做了很多的欺骗宣传，一切爱国者都不应相信这些欺骗言论。美国帝国主义者侵略朝鲜，侵略中国的台湾，轰炸中国的东北，并使用各种流氓手段恐吓中国人民，一切爱国者都应有决心反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不受他们的恐吓。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军的英勇行为，是值得赞扬的。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工商业家，凡属爱国者，一致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完全正确的。

《坚决站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立场上》（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10页

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

《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十一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84页

（二）抗美援朝要作长期打算，一直打到我们完全胜利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朝鲜战争持久化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增大。过去，我们对于朝鲜战局的估计有速决和持久两种可能性。所谓速决，就是朝鲜人民军乘胜追击，把美军和李承晚的残余伪军赶到海里去。现在美国在朝鲜已经增加了它的军队，因而战争持久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增加了。朝鲜人民是可能坚持这个持久的战局的，他们动员的人力已超过一百万，朝鲜人民军队现在有十几万人，今后还能继续补充。朝鲜人民斗争很勇敢，美国飞机一面炸桥，朝鲜人民就一面修桥。开始时是白天炸黑夜修，后来则是随时炸随时修，飞机来了，朝鲜人民只在旁边躲一躲，然后还是照旧去修桥。战争开始时，美帝国主义原以为用空军一炸，朝鲜人民就会害怕，结果却碰了一个钉子。这一点也可以说明，朝鲜人民在日本长期统治和压榨之下，一旦站立了起来，就绝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再来侵略他们。朝鲜人民在日本长期的奴役之下，已经变得非常坚决了。东方其他民族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也锻炼得非常坚决了。中华民族就是这样一个坚决战斗的民族。虽然在我们的斗争过程中，有时曾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我们不是靠观音菩萨来救命，而是靠自己的双手去克服困难。在今天，朝鲜战争持久化的可能性虽然增加了，但是最后的胜利还是属于朝鲜人民的，因为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的人民对于朝鲜人民的同情已经和正在不断地增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发动中国内战

时，世界的同情就在中国人民方面，越到后来，这种同情就越到中国人民方面来。中国革命是带有世界性质的。中国革命在东方第一次教育了世界人民，朝鲜战争是第二次教育了世界人民。全世界的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朝鲜战争虽然持久不如速决的好，但持久了更可以教育朝鲜人民和世界人民。

《朝鲜战局和我们的方针》（一九五〇年九月五日），《毛泽东文集》

第6卷第92—93页

美帝国主义在今天是有许多困难的，内部争吵，外部也不一致。它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另外却有三个弱点，合起来是一长三短。三个弱点是：第一，战线太长，从德国柏林到朝鲜；第二，运输路线太远，隔着两个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战斗力太弱。……敌人是不可怕的，它的装腔作势和气势汹汹是吓唬人的。但是，美帝国主义也可能在今天要乱来，它是什么都可能干出来的。假如它要那样干，我们没有准备就不好了，我们准备了就好对付它。所谓那样干，无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打原子弹，长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长。我们中国人民是打惯了仗的，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对战争打起来的时候，不是小打而是大打，不是短打而是长打，不是普通的打而是打原子弹，我们要有充分准备。你如果一定要那样干，我们就跟上来。

《朝鲜战局和我们的方针》（一九五〇年九月五日），《毛泽东文集》

第6卷第93—94页

在志愿军的作战经验中证明，我军对于具有高度优良装备及有制空权的美国军队，是完全能够战胜的。

《我军能够战胜装备优良的美国军队》（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243页

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懂得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

《第三次战役结束后全军主力均应后撤休整》（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250页

关于打败美帝国主义的问题。我们准备打的时间要长一点，最后就是要打败它，前途是胜利的。我们已经打了两年多了，在社会上可能有些人觉得不耐烦了，觉得还是早一点结束好，停战谈判只剩下一个俘虏问题了，争执也很小了，何必为一两万俘虏还要那么坚持下去呢？这不只是一两万俘虏的问题，不能因为我们人口多，觉得丢掉几万人不要紧，俘虏一个也不能丢掉，一定要争。这个仗要打多久时间，我看我们不要作决定。它过去是由杜鲁门，以后是由艾森豪威尔或者美国将来的什么总统来决定的。这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我们就打多久，一直打到我们完全胜利！

《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三年二月七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63页

要加强抗美援朝的斗争。由于美帝国主义坚持扣留中朝战俘，破坏停战谈判，并且妄图扩大侵朝战争，所以，抗美援朝的斗争必须继续加强。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

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罢，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抗美援朝的斗争必须继续加强》（一九五三年二月七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41页

（三）抗美援朝的作战方针和战略战术

现敌军大部北进，后方空虚，建议凡人民军无法北撤者均留于南朝鲜，开辟战后战场，这在战略上是必须的而且是很有利的。如有人民军四五万人留在南朝鲜担负此项任务，则对北部作战将大有帮助。

《开辟敌后战场在战略上是必须的有利的》（一九五〇年十月十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112页

我们应当从稳当的基点出发，不做办不到的事。朝鲜战局，就军事方面来说决定于下列几点。第一是目前正在部署的战役是否能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两个、三个甚至四个伪军师（伪三师将随伪六师后跟进，伪一师亦可能增援）。……第二是敌人飞机杀伤我之人员、妨碍我之活动究竟有多大。如果我能利用夜间行军作战做到很熟练的程度，敌人虽有大量飞机仍不能给我太大的杀伤和妨碍，则我军可以继续进行野战及打许多孤立据点，……第三，如果美国再调五个至十个师来朝鲜，而在这以前我军又未能在运动战中及打孤立据点的作战中歼灭几个美国师及几个伪军师，则形势也将于我不利，如果相反，则于我有利。以上这几点，均可于此次战役及尔后几个月

内获得经验和证明。我认为我们应当力争此次战役的完满胜利，力争在敌机炸扰下仍能保持旺盛的士气进行有力的作战，力争在敌人从美国或他处增调兵力到朝鲜以前多歼灭几部分敌人的兵力，使其增补赶不上损失。总之我们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

《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07—108页

先歼灭敌人几个团，逐步扩大，歼灭更多敌人，稳定人心，使我军站稳脚跟，这个方针是正确的。对友党政策方面所指各点及采取逐步诱导说服的方针，也是对的。

《关于同意对敌作战方针给彭德怀、高岗的电报》（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六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610页

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

《中国人民志愿军必须越过三八线作战》（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14页

一、从目前朝鲜战场最近进行的战役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目前敌人的作战意图是企图与我进行消耗战。在过去一个月当中，敌人当站住阵地之后，经过调整补充，便寻找机会向我作试探性的进攻，其目的在一方面不容许我在前线作必要的休补，另一方面则利用其技术条件消耗我军。同时，敌人对朝沿海的袭扰、运输线的不间断的轰炸，均甚为积极。我军

补充物资只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能达前线，有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在途中被炸毁。在目前一个半月内，因我新军未到，老军未补充，敌人有重新进出三八线南北地区的可能。

二、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中国志愿军已决定编组三番轮流的部队，即将现在朝鲜作战的九个军三十个师作为第一番志愿部队；将正从国内调去的六个军及现在朝鲜即将补充的三个军（有两个军现在元山、咸兴地区休整）共九个军二十七师作为第二番志愿部队，约四月上旬可全部到达三八线地区，接替现在汉江前线的六个军的任务；将准备从国内调去的六个军及第一番志愿部队中的四个军共十个军三十个师作为第三番志愿部队，准备六月中调用。上述十个军中的四个军，因打了五个月，必须补充休整，在第二番志愿部队接替前线任务后，即调至平壤、元山地区休补，兼顾海防。第一番志愿部队中其他两个军，则调回国内整补。在过去四个战役中，中国志愿军战斗的与非战斗的伤亡及减员已超过十万人，正将补充老兵新兵十二万人；今明两年准备再有伤亡三十万人，再补充三十万人，以利轮番作战。

《关于志愿军实行轮番作战的方针》（一九五一年三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49—150页

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现在我第一线有八个

军，每个军歼敌一个整营，共有八个整营，这就给敌以很大的打击了。假如每次每军能歼敌两个整营，共有十六个整营，那对敌人打击就更大了。如果这样做办不到，则还是要求每次每军只歼敌一个整营为适宜。这就是说，打美、英军和打伪军不同，打伪军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的大包围，打美、英军则在几个月内还不要实行这种大包围，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即每军每次只精心选择敌军一个营或略多一点为对象而全部地包围歼灭之。这样，再打三四个战役，即每个美、英师，都再有三四整营被干净歼灭，则其士气非降低不可，其信心非动摇不可，那时就可以作一次歼敌一个整师或两个、三个整师的计划了。过去我们打蒋介石的新一军、新六军、五军、十八军和桂系的第七军，就是经过这种小歼灭到大歼灭的过程的。我军入朝以来五次战役，已完成这种小歼灭战的一段路程，但是还不够，还须经过几次战役才能完成小歼灭战的阶段，进到大歼灭战的阶段。至于打的地点，只要敌人肯进，越在北面一些越好，只要不超过平壤元山线就行了。

《对美英军目前只宜打小歼灭战》（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72—173页

在目前，多打小规模歼灭仗，削弱敌人，降低敌人士气，逐渐地进行打大规模的歼灭仗。只要我各级指挥员精心研究情况，很好地布置兵力，组织炮火，每个军一次求得歼灭敌人一两个建制连到一个建制营，是完全可以作到的。并且在目前敌人冒进情况下，是最有利于我捕歼敌人的机会。

《多打小规模歼灭战》（一九五一年六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292页

我志愿军协同人民军从九月十八日开始对全线敌军的战术性的反击作战，在一个月內，歼灭和击伤敌军三万人以上，获得重大胜利，中央和军委向你们及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此种作战，在若干个被选定的战术要点上，集中我军优势的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动作，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或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军举行反击的时机，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以大量的杀伤；然后依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

《祝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重大胜利》（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45页

（四）对朝鲜停战谈判的估计和对策

在和敌方代表准备谈判及实行谈判期间，大约有十天到十四天，请你们严格和充分地注意下列各点：（一）争取在十天內，用极大努力，加强第一线部队的人员特别是武器和弹药的补充。请高岗同志将后方应运人员、武器、弹药等，尽这十天内外运入北朝鲜境内。必须准备着一经签订停战协定，这些人员和物资就不能运输和调动了。（二）极力提高警惕。我第一线各军，必须准备对付在谈判前及谈判期內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在后方，则举行大规模的空炸，以期迫我订立城下之盟。如遇敌军大举进攻时，我军必须大举反攻，将其打败。（三）杨成武两个军及五十军，须令其迅速开到指定地点，防止敌人乘机在元山登陆，我三十八、三十九及四十二军则应准备对付敌人

可能在西边登陆。(四)请你们设想在停战协定成立以后可能发生的情况,并预备对策。

《停战谈判期间军事上应采取的对策》(一九五一年七月二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74—175页

敌人是否真想停战议和,待开城会议再进行若干次就可判明。在停战协定没有签订,战争没有真正停止以前,我军积极准备九月的攻势作战是完全必要的。

《停战前积极准备九月的攻势作战是必要的》(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296页

我们很早就表示: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耻的方法破坏和阻挠谈判的进行,则朝鲜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则就不可能成功。

《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十一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84页

不要怕拖,要准备再拖一个较长的时期才能解决问题。只要我们不怕拖、不性急,敌人就无所施其技了。

《关于同意对付敌人拖延谈判的办法给李克农的电报》(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642页

究竟打到哪一年为止,谈判到什么时候?我说,谈还是要谈,打还是要打,和还是要和。

为什么和还是要和呢?三十年战争、百年战争是不会有,因为长期打下去对美国很不利。

一、要死人。他们为扣留一万多个俘虏奋斗,就死掉了三

万多人。他们的人总比我们少得多。

二、要用钱。他们一年要用一百多亿美元。我们用的钱比他们少得多，今年比去年又减少一半。“三反”“五反”清理出来的钱，可以打一年半。增产节约出来的钱，就可以完全用在国内建设上。

三、他们国际国内都有难以克服的矛盾。

四、还有一个战略问题。美国的战略重点是欧洲。他们出兵侵略朝鲜，没有料到我们出兵援助朝鲜。

我们的事情比较好办。国内的事我们可以完全作主。但是，我们不是美国的参谋长，美国的参谋长是他们自己的人。所以，朝鲜战争是否打下去，我们和朝鲜一方只能作一半主。

总之，对美国来说，大势所趋，不和不利。

《边打边谈边稳》（一九五二年八月四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17—318页

我们同美帝国主义这样的敌人作战，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强许多倍，而我们能够打败，迫使他们不能不和下来。为什么能够和下来呢？

第一，军事方面，美国侵略者处于不利状态，挨打状态。如果不和，它的整个战线就要被打破……

第二，政治方面，敌人内部有许多不能解决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要求和下来。

第三，经济方面，敌人在侵朝战争中用钱很多，它的预算收支不平衡。

这几个原因合起来，使敌人不得不和。而第一个原因是主要的原因，没有这一条，同他们讲和是不容易的。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

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抗美援朝的胜利和意义》(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53—354页

(五) 抗美援朝胜利的政治基础和重大意义

(五) 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六) 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于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一九五〇年十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00—101页

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想法和做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最后胜利就一定得到。

《志愿军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30页

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着中国人民的伟大意志，与朝鲜人民军一道，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企图侵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进而侵入中国大陆的狂妄计划，从而鼓舞了朝鲜、中国、亚洲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使他们增加了保卫和平、反对侵略的信心。

《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十一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83页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意义的。

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

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信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取得了这一条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

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

由于以上三条，就产生了第四条：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抗美援朝的胜利和意义》(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55页

六、开展“三反”“五反”斗争， 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

（一）“三反”的意义、方针和处理 贪污行为的政策界限

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

《关于“三反”、“五反”》（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九五二年五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90页

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关于“三反”、“五反”》（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九五二年五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90—191页

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

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关于“三反”、“五反”》（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九五二年五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91页

鉴于贪污一千万以下的小贪污分子占全体贪污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五至百分之九十七，带着很大的群众性，中央已规定除对其中情节严重者应予以刑事处分外，其情节不严重一般应免予刑事处分，而由其工作机关按其情况，予以不同程度的行政处分，以示严肃。其有在革命工作中一贯表现好、偶犯贪污错误、数量甚小者，还可以免予行政处分。此外尚有一些迹近贪污、按其实际不能叫作贪污者，不应以贪污论。如此规定，大约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小贪污分子可免刑事处分（即不送法院，不判徒刑），而只给以行政处分，便于争取团结和教育改造这一批人，以利开展“三反”斗争和建设工作的。

《关于“三反”、“五反”》（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九五二年五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93—194页

大贪污犯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或朋友，故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他们肃清，而不应有丝毫的留恋或同情。

《关于“三反”、“五反”》（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九五二年五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95页

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

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现在必须向全党提出警告：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中央人民政府不久将颁布惩治贪污的条例和惩治浪费的条例，各级领导机关必须仿照实行惩治反革命条例那样，大张旗鼓地发动一切工作人员和有关的群众进行学习，号召坦白和检举，并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督促和检查。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等的处理，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直至枪决。典型的贪污犯，必须动员群众进行公审，依法治罪。

《实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08页

浪费和贪污在性质上虽有若干不同，但浪费的损失大于贪污，其结果又常与侵吞、盗窃和骗取国家财物或收受他人贿赂的行为相接近。故严惩浪费，必须与严惩贪污同时进行。浪费的范围极广，项目极多，又是一个普遍的严重现象，故须着重地进行斗争，并须定出惩治办法。

《实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08—209页

反贪污斗争和反浪费斗争的开展和深入，必将接触到各方面存在着的各种程度的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工作作风。这种作风，是贪污和浪费现象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中央要求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在此次精兵简政的工作中，在展开全国规

模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中，在进行反对贪污和反对浪费的斗争中，同时展开一个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凡在其所属机关、部队、团体、学校或企业中发生了严重的贪污现象或浪费现象，而事前毫无觉察、事后又不厉行惩治者，称为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这种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虽然没有亲手参加贪污行为或浪费行为，亦应以失职论处，决不宽恕。

为着有力地彻底地消灭贪污现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现象，必须奖励那些不贪污、不浪费和毫无官僚主义习气的模范的单位和人物，从这些单位和人物与那些贪污者、浪费者和官僚主义者之间划出明显的界限来。

《实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09页

（二）“五反”的目的、意义和处理资本家不法行为的政策界限

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违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违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

《关于“三反”、“五反”》（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九五二年五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92页

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只要形成了这个统一战线，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就会陷于孤立，国家就能很有理由地和顺利地给他们以各种必要的惩处，例如逮捕、徒刑、枪决、没收、罚款等等。

《关于“三反”、“五反”》（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九五二年五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92—193页

守法资本家和半守法半违法资本家，占着全体资本家的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只有把他们争取过来，才能使占百分之五左右的反动资本家完全陷于孤立。故对半守法半违法资本家必须严守只退不罚（更不捉人）政策，并力争早作结论。

《关于“三反”、“五反”》（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九五二年五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96页

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例如补税一般只补一九五一年的）；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望各级党委在“五反”中掌握这几条原则。

《关于“三反”、“五反”》（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九五二年五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97—198页

在“五反”目标下划分私人工商户的类型，应分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五类。就大城市说，前三类约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后二类约占百分之五左右。各个大城市略有出入，大体相差不远。中等城市则和这个比例数字相差较大。

《关于“三反”、“五反”》（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九五二年五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98页

根据城市的实际情况，我们决定将过去所定的四类工商户改为五类，即将守法户一类改为守法户和基本守法户两类，其他三类不变。在北京五万工商户（包括独立工商户，不包括摊贩）中，守法户约占百分之十左右，基本守法户约占百分之六十左右，半守法半违法户约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严重违法户约占百分之四左右，完全违法户约占百分之一左右。将完全守法户和有小问题的基本守法户分开，又将基本守法户中偷漏税较少的和偷漏税稍多的分别对待，这样做，可能发生很大的教育作用。

《关于“三反”、“五反”》（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九五二年五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98—199页

在此次“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我们必须达到下述目的：

（一）彻底查明私人工商业的情况，以利团结和控制资产阶级，进行国家的计划经济。情况不明，是无法进行计划经济的。

（二）明确划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肃清工会中的贪污现象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清除资产阶级在工会中的走狗。各地工会均发生此种走狗及动摇于劳资之间的中间分子，我们必须在斗争中教育并争取中间分子，对于有严重罪行的资本家走狗则予以开除。

(三) 改组同业公会和工商联合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们及其他业已完全丧失威信的人们出这些团体的领导机关，吸引那些在“五反”中表现较好的人们进来。除完全违法者外，各类工商业者均应有代表。

(四) 帮助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整顿民主建国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及大失人望的人，增加一批较好的人，使之成为一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并以共同纲领和“五反”的原则教育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各部分资本家的秘密结社，例如“星四聚餐会”等，则应设法予以解散。

(五) 清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经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尽量发展私人工业（只要资本家愿意和合乎《共同纲领》），逐步缩小私人商业；国家逐年增加对私营产品的包销订货计划，逐年增加对私营工商业的计划性；重新划定私资利润额，既要使私资感觉有利可图，又要使私资无法夺取暴利。

(六) 废除后账，经济公开，逐步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的制度。

(七) 从补、退、罚、没中追回国家及人民的大部分经济损失。

(八) 在一切大的和中等的私营企业的工人、店员中建立党的支部，加强党的工作。

《关于“三反”、“五反”》（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九五二年五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00—201页

各城市应照杭州那样，由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亲手审查几家大厂店，做出模型，说服干部和工人（必须适当地着重地去

说服他们),同时即向一切违法资本家宣示我们的宽大和认真的态度,显示我们的“五反”斗争,主要不是为了搞几个钱,而是为了改造社会。

《关于“三反”、“五反”》(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九五二年五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03页

(三) 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 严禁逼供信

目前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第二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账,算细账,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注意这两条,就可获得全胜。

《关于“三反”、“五反”》(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九五二年五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97页

检查违法工商户,必须由市委市政府予以严密控制,各机关不得自由派人检查,更不得随便捉资本家到机关来审讯。又无论“三反”、“五反”,均不得采用肉刑逼供方法,严防自杀现象发生,已发生者立即订出防止办法,务使“三反”、“五反”均按正轨健康发展,争取完满胜利。

《关于“三反”、“五反”》(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九五二年五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99页

必须将一切真正的贪污犯、贪污嫌疑分子和弄错了的人按照中央历次指示和政府法令认真地如实地加以判处和审查清楚,不得放纵一个坏人,不得冤枉一个好人。对赃款凡能追出者必须一律坚决追出,惟不得累及无辜家属,不得派人到农村

追赃款（除个别确有大赃存在农村、社会舆论认为应追者外），不得硬追那些本来追不出的部分。

《关于“三反”、“五反”》（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九五二年五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02页

“三反”和“五反”的胜利是极其伟大的，毫无疑问应当进行“三反”和“五反”，不进行这一正义的斗争我们会失败。现当“三反”、“五反”最后定案之际，我们必须本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严者严之应当宽者宽之的原则，好好结束这场斗争。

《关于“三反”、“五反”》（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九五二年五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03页

现当“三反”运动进至法庭审判、追赃定案的阶段，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主观主义的思想 and 怕麻烦的情绪，必须克服。这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

《关于“三反”、“五反”》（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九五二年五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04页

（四）要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

一、春耕即到，各省级、专区级和县级除对春耕作出全盘布置外，并应指定专人负责经常领导春耕工作，争取今年丰收，不得疏忽。二、春耕前及春耕中，区、乡两级均不得进行“三反”斗争，应以全力从事春耕工作（有些新区还有土改工

作)。区、乡两级的“三反”应放在春耕完成以后去做，并应在各中央局、各分局、各省委区党委的统一部署和统一号令之下进行。区、乡两级已经发动“三反”斗争者，除县级以上党委为了典型试验的少数地点外，均应停止，以防发生混乱现象。

《关于“三反”、“五反”》（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九五二年五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94—195页

各城市市委市政府均应于开展“三反”和“五反”斗争的同时，注意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如果在一个短时间内出现了不正常状态，亦应迅速恢复正常状态。

《关于“三反”、“五反”》（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九五二年五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95页

为着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除对没有问题的守法的工商户（在北京有一万户，在天津有一万几千户），应鼓励他们照常营业外，对于问题不大的半违法半守法的工商户，应于“五反”斗争开展后分作几批做出结论，安定他们。这一类工商户占全体工商户的绝大多数，在北京约占全体五万工商户的三万七千多户。他们中大多数只有偷税漏税问题，一部分有侵吞盗窃问题但不严重。对于这些人，应于发动工人店员，划清劳资界限，检举他们的偷漏、侵吞、盗窃，并多方诱导他们自己坦白其违法行为之后，给他们做出结论，叫他们补税一年，有侵吞盗窃者退出侵盗财产，宣布免予罚款。这个“只退不罚”政策，可以安定绝大多数资本家，可以组成广大的“五反”统一战线。真正的“五反”统一战线，只有在对这类资本家做出几批“只退不罚”的结论，并予公布之后，才能形成。这种结论，

大约在运动开展一个月的时候就应做出两第三批，而在一个半月至多两个月内必须做完。北京、天津两市必须于本月内做完。做迟了，很不利。

《关于“三反”、“五反”》（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九五二年五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95—196页

县、区、乡现在一律不进行“三反”、“五反”，将来何时进行及如何进行，中央另有通知。个别已在县城试做“五反”、在区试做“三反”者务须严格控制，不得妨碍春耕和经济活动。中等城市也不要同时一律进行“五反”，而要分批进行，并须在严格控制下进行。

《关于“三反”、“五反”》（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九五二年五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99页

请严格掌握广州“五反”，不使引起混乱。某些陷于停顿的经济活动，应大力注意恢复。其他城市，非有充分准备，不要轻易发动“五反”。

《关于“三反”、“五反”》（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九五二年五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00页

薄一波同志三月二十五日关于“五反”的策略和部署很好，各城市均应仿行。……尤其不误生产，极为重要，各城市凡误生产者，均应立即改变做法。

《关于“三反”、“五反”》（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九五二年五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01页

七、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这个宪法草案所以得到大家拥护，大家所以说它好，就是因为有这两条：一条是正确地恰当地总结了经验，一条是正确地恰当地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如果不是这样，我看大家就不会赞成，不会说它好。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7—328页

这个宪法草案，总结了历史经验，特别是最近五年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它总结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经验，总结了最近几年来社会改革、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政府工作的经验。这个宪法草案也总结了从清朝末年以来关于宪法问题的经验，从清末的“十九信条”起，到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到北洋军阀政府的几个宪法和宪法草案，到蒋介石反动政府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一直到蒋介石的伪宪法。这里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我们这个宪法草案，主要是总结了我国的革命经验和建设经验，同时它也是本国经验和国际经验的结合。我们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宪法类型的。我们是以自己的经验为主，也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搞起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

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我们的宪法是新的社会主义类型，不同于资产阶级类型。我们的宪法，就是比他们革命时期的宪法也进步得多。我们优越于他们。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5—326页

我们的宪法草案，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的原则贯串在我们整个宪法中。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原则。我国现在就有社会主义。……现在能实行的我们就写，不能实行的就不写。比如公民权利的物质保证，将来生产发展了，比现在一定扩大，但我们现在写的还是“逐步扩大”。这也是灵活性。又如统一战线，《共同纲领》中写了，现在宪法草案的序言中也写了。要有这么一个“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可以安定各阶层，安定民族资产阶级和各民主党派，安定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还有少数民族问题，它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共同的就适用共同的条文，特殊的就适用特殊的条文。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少数民族经济特点是什么？比如第五条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有四种，实际上我们少数民族地区现在还有别种的所有制。现在是不是还有原始公社所有制呢？在有些少数民族中恐怕是有的。我国也还有奴隶主所有制，也还有封建主所有制。现在看来，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都不好，其实它们在历史上都曾经比原始公社制度要进步。这些制度开始时是进步的，但到后来就不行了，所以就有别的制度来代替了。宪法

草案第七十条规定,少数民族地区,“可以按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點,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所有这些,都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6—327页

我们的宪法草案公布以后,将会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8页

这个宪法草案是完全可以实行的,是必须实行的。当然,今天它还只是草案,过几个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就是正式的宪法了。今天我们就要准备实行。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8页

我们的宪法有我们的民族特色,但也带有国际性,是民族现象,也是国际现象的一种。跟我们同样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国家很多,人口在世界上占多数,我们有了一个革命的宪法,人民民主的宪法,有了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

路，对这些国家的人民会有帮助的。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9页

我们的这个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还不是完全社会主义的宪法，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我们现在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和应当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宪法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9—330页

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法律是上层建筑。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我们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守革命法制，并不是只要你民主人士守法。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97—198页

八、过渡时期和党的 总路线总任务

（一）过渡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一九四八年九月），《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45—146页

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3页

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现阶段国内的主要矛盾》（一九五二年六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31页

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02页

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不是的，那时，我们还须在广大的农村中解决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那时在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有两年至三年时间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那时我们一方面在农村实行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着手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并已在过去几年中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所有这些显示着我国过渡时期头几年中的错综复杂的形象。

《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15—316页

（二）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

也不能不承认了。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4页

现实生活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的惟一的出路。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7—268页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来说，现在还能使生产力得到一定发展。但是，同社会主义制度比较起来，就很不优越，而且日益走向没落和完结。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第339页

（三）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

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会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我国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观点是可以宣传的。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一九四八年九月），《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46页

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什么？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

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过渡时期的时间多长？考虑来考虑去，讲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比较合适。根据几年来的经验，大概十年到十五年是一定需要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包括两部分性质：（一）工业化，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要超过农业。现在我国工业很落后，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汽车、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许多机器不能造。工业与农业的比重，现在说工业已占百分之二十八，是否真达到了，我还有些怀疑。什么叫国家基本工业化？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至少要达到百分之五十一，或者达到百分之六十吧！按照苏联的经验，工业的比重要达到百分之七十才算工业化，我们现在还差百分之四十二。我国的工业化，工业比重也要达到百分之七十。（二）社会主义改造，即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何时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间不好定，因此也不要宣布。但是，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肯定可以完成。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

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现在基本建设、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都有急躁情绪，比如急于要多搞合作社，“五反”后对资本家进攻没有停止，使工人阶级自己处于进退两难地位。

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

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惟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

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所谓逐步者,共分十五年,一年又有十二个月。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

过渡时期是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是用逐步过渡的方法。这对农业和手工业的集体化、合作化,比较容易懂。如何将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改造过渡到社会主义,好多人不懂。我认为,社会主义因素是逐年增长的,不是说到第十六个年头上突然没收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根据过去四年的经验,资本主义企业中社会主义因素是逐年增长的。私营商业,可以逐年挤掉。零售每年挤掉百分之五,九年挤掉百分之四十五,加上现在已挤掉的百分之三十,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达到挤掉百分之七十五;零售过渡时间长,但有十年也基本挤掉了。批发的主要部分挤掉也快,只要六七年即可办到。向两边挤:(一)商业资本家向工业挤,他们剩下的钱可以搞工业;(二)店员我们接收过来,先救济后就业。私营工业,社会主义因素也可以逐年增长。两种国家资本主义,都有社会主义因素。高级的是公私合营,是半社会主义性质,或者社会主义因素更多一点。低级的是加工订货,两头和中间都卡住了。两头即原料和购销已卡掉;中间有工缴费、品种规格检验、工会、党支部、劳资协商等,也卡得很厉害。今年我们忙不过来,明年就要抓一批私营大厂,我们派干部去。不要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十五年原封不动,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企业中是逐年增长的。

不要总把资本主义经济看成一块铁板，看成是不变化的。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十五年。一年一小步，五年一大步，三个大步就差不多了。基本上完成，不等于全部完成。讲基本上完成，是谨慎的讲法，世界上的事情总是谨慎一点好。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80页

我们的一切工作，围绕一个总目的，这就是要达到：在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在正确地执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过程中，稳定地完成过渡时期建设和改造我们国家的伟大任务，即是说，我们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

《对陈云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二十六次会议上的报告要点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三年九月四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322页

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一九五三年九月七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93页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即是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内,或者说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将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使我国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中央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决议的通知和毛泽东对决议稿的修改》(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六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365—366页

总路线,概括的一句话就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04页

一九四九年农村不能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那时农村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同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不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就是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革命。就中华民族来说,首先是中华民族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现在新的矛盾产生了,农村里产生新的资本主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区乡干部有余粮。当然他们不是资本主义分子,但不搞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倾向便要发展。所以要大大宣传总路线,宣传农业集体化。那时,城市也不能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国营经济才接收,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摊子没有摆开,没有做出榜样,优势没有形成。现在是应该也有可能大大宣传总路线和国家资本主义。

《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统战人士安排问题》(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九日),《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16页

过渡时期社会主义体系构成的两个重要分支部门：

- (1) 私人资本——国家资本主义；
- (2) 小私有制农民的征收，征购。

主体——国营工业；

一翼——国家资本主义；

又一翼——农村的互助合作和粮食的征购制。

《关于粮食统购统销问题的讲话提纲》(一九五三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383页

中央委员会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验，在我国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将要结束的时候，即一九五二年，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就是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期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以求达到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89页

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是：基本上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同时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这个过渡时期大约需要十八年，即恢复时期的三年，加上三个五年计划。

《〈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序言》（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395页

（四）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要完成这个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从一九五三年算起，到一九六七年基本上完成，加上经济恢复时期的三年，则为十八年，这十八年中已经过去了四年），那时中国就可以基本上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16—317页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

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页

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

《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51页

九、社会主义工业化

（一）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意义

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

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

《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46—147页

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

因此，工业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只有工业社会才能是充分民主的社会。

《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83—184页

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零五年的历史，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的十八年的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

点告诉了中国人民。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80页

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81页

从中国境内肃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者的集中表现），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3页

中国民族和人民要彻底解放，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而我

们已作了的工作，还只是向这个方向刚才开步走。

《军委关于部队集体转业的命令》(一九五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23页

印度是反抗帝国主义而获得独立的，我们国家也是反抗帝国主义而建立起来的。我们在一点上吃了亏，恐怕中国比印度在这点上还要差一点，那就是我们缺乏工业。我们不但要有文化，而且要有工业。中国要工业化，印度也要工业化。工业化起来，帝国主义就不敢欺侮我们了。

同印度艺术代表团的谈话（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二）实现工业化的资金主要依靠国家内部积累，实行增产节约

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336页

从一九五三年起，我们就要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了，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完成工业化当然不只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一切必要的轻工业都应建设起来。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但是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为了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就要付出很多的资金，而资金的来源只有增产节约一条康庄大道，这是应为全党同志所明

白了解的。

《实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07页

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而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因为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32—433页

十、个体农业、手工业 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农业合作化的意义

1. 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惟一的道路

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县、区的合作社的领导机关。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中国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没有合作社传统,可能使得我们遇到困难;但是可以组织,必须组织,必须推广和发展。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2页

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
版第4卷第1477页

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惟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

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这件事看作极为重要的事。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99页

就农业来说，只有在农村中一步一步地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才能使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一步一步地和普遍地获得提高。

《对中央关于统购粮食的宣传要点稿的修改》（一九五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379页

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18页

中国的情况是：由于人口众多、已耕的土地不足（全国平均每人只有三亩田地，南方各省很多地方每人只有一亩田或只有几分田），时有灾荒（每年都有大批的农田，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水、旱、风、霜、雹、虫的灾害）和经营方法落后，以致广大农民的生活，虽然在土地改革以后，比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为改善，但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仍然有困难，许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农民只占比较的少数，因此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和它的成就，正在日益促进他们的这种积极性。对于他们说来，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这种状况的农民，占全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这就是说，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29页

经过了两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三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54—455页

一切劳动农民，不论是哪个阶层，除了组织起来集体生产，是无法抵抗灾荒的。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57页

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57页

2. 实现农业合作化才能适应工业化的需要

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7页

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首先，大家知道，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四亿亩至五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问题，苏联在建设社会

主义的过程中是曾经遇到了的，苏联是用有计划地领导和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法解决了，我们也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解决它。其次，我们的一些同志也没有把这样两件事联系起来想一想，即：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其次，我们的一些同志也没有把这样两件事联系起来想一想，即：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31—432页

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相互关系问题，必须强调二者的紧密联系，而不可只强调前者，减弱后者。因为如果不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相适应，则社会主义工业化不可能孤立地完成，势必遇到极大的困难。

《中央转发辽宁省委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报告的批语》（一九五五年八月十六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304页

合作化完成了，这就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同个体农业经济之间的大矛盾。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0页

3. 实行农业合作化才能巩固工农联盟

大家知道，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工农联盟，这是建立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从地主手里取得土地分给农民、使农民从封建所有制解放出来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之上的。但是这个革命已经过去了，封建所有制已经消灭了。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和农民的同盟能够继续巩固下去吗？显然是不能够的。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

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能获得巩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这个联盟就有被破坏的危险。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37页

我们认为,只有在农业彻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逐步地巩固起来,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能够彻底地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

现在,我们还没有完成农业合作化,工人阶级还没有同农民在新的基础上结成巩固的联盟,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还是动荡不定的。过去我们同农民在土地革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个联盟,现在农民不满足了。对那一次得到的利益,他们有些忘了。现在要有新的利益给他们,这就是社会主义。现在,农民还没有共同富裕起来,粮食和工业原料还很不充足。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就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找我们的岔子,向我们进攻。几年之后,我们会看到完全新的形势:工人阶级和农民在新的基础上结成比过去更加巩固的联盟。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结论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

以前那个反地主、打土豪、分田地的联盟是暂时的联盟，它巩固一下又不巩固了。在土地改革后，农民发生了分化。如果我们没有新东西给农民，不能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共同富裕起来，那些穷的就不相信我们，他们会觉得跟共产党走没有意思，分了土地还是穷，他们为什么要跟你走呀？那些富裕的，变成富农的或很富裕的，他们也不相信我们，觉得共产党的政策总是不合自己的胃口。结果两下都不相信，穷的不相信，富的也不相信，那末工农联盟就很不巩固了。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只要合作化了，全体农村人民会要一年一年地富裕起来，商品粮和工业原料就多了。那个时候，资产阶级的嘴巴就被堵住了，资产阶级将发现自己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结论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

土地改革，使我们在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同农民结成了联盟，使农民得到了土地。农民得土地这件事，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它只破坏封建所有制，不破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这一次联盟使资产阶级第一次感到了孤立。一九五〇年，我在三中全会上说过，不要四面出击。那时，全国大片地方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农民还没有完全到我们这边来，如果就向资产阶级开火，这是不行的。等到实行土地改革之后，农民完全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就有可能和必要来一个“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使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同农民的联盟。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结论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

我们的工农联盟，已经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立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第二阶段是建立在合作化的基础上。不搞合作化，农民必然向两极分化，工农联盟就无法巩固，统购统销也无法坚持；只有在合作化的基础上，统购统销的政策才能继续，才能彻底执行。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第118—119页

(二) 农业合作化的原则、方针、政策和方法

1. 坚持自愿互利原则，反对强迫命令

中国农业现在大部分是个体经济，要有步骤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要坚持自愿原则。不去发展，就会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右倾。搞猛了也不行，那是“左”倾。要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80页

坚持自愿、互利原则，现在必须注意解决以下各项问题：

(1) 耕畜和大农具是否以迟一两年再入社为适宜，入社作价是否公道和还款时间是否过长；(2) 土地报酬和劳动报酬的比例是否适当；(3) 合作社所需要的资金如何筹集；(4) 某些社员是否可以使用自己的一部分劳动力去从事某些副业生产（因为我们现在建立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一般地还是半社会主义

性质的，所以，上述四个问题必须注意解决得恰当，才不至于违反贫农和中农之间的互利原则，只有在互利的基础之上才能实现自愿）；（5）社员的自留地应有多少；（6）社员成分问题，等等。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27页

在目前一两年内，在一切合作社还在开始推广或者推广不久的地区，即目前的大多数地区，应当是：（1）贫农；（2）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3）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几部分人中间的积极分子，让他们首先组织起来。这几部分人中间暂时还不积极的分子则不要勉强地拉进来。等到他们的觉悟程度提高了，他们对于合作社感到兴趣了，然后再分批地把他们吸收到合作社。这几部分人的经济地位是比较接近的。他们的生活或者还是困难的（贫农，他们分得了土地，比较解放前是好多了，但是还因为人力畜力和农具的不足，生活仍然感到困难），或者还不富裕（下中农），因此，他们有一种组织合作社的积极性。虽然如此，他们中间的积极性的程度，由于种种原因，仍然是不同的，有些人很积极，有些人暂时还不大积极，有些人还要看一看。因此，我们对于一切暂时还不想加入合作社的人，即使他们是贫农和下中农也罢，要有一段向他们进行教育的时间，要耐心地等待他们的觉悟，不要违反自愿原则，勉强地把他们拉进来。

至于新中农中间的上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上中农，即一切经济地位较为富裕的中农，除开若干已经有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觉悟、真正自愿加入合作社的，可以吸收他们入社以外，其余暂时都不要吸收，更不要勉强地把他们拉进来。这是因为他

们现在还没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觉悟，只有等到农村中大多数人都加入合作社了，或者合作社的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到同这些富裕中农的单位面积产量相等甚至更高了，他们感到再单干下去在各方面都对他们不利，而惟有加入合作社才是较为有利的时候，他们才会下决心加入合作社。

这样，先将经济地位贫苦或者还不富裕的人们（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按其觉悟程度，分作多批，在几年内，组成合作社，然后再去吸收富裕中农。这样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27—428页

在一切合作化还没有达到高潮，富裕中农还缺乏觉悟的地方，以首先吸收（一）贫农，（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三）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样三部分人加入合作社为适宜（并应依其觉悟程度，分作多批吸收进来，首先吸收觉悟较高的分子）。对于凡在目前不愿入社的富裕中农，即新老中农中间的上中农，则不要勉强拉入。目前许多地方发生强迫富裕中农入社，目的在打他们的耕畜、农具的主意（作价过低，还期过长），实际上侵犯他们的利益，违反了“巩固地团结中农”的原则。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决不可以违反的。至于富裕中农中间资本主义思想浓厚的一些人，在目前一切合作社初办或者还不占优势的地方，不论是把他们拉进来，或者他们自己企图钻入合作社谋取领导地位（并非由于真正的政治觉悟），或者企图组织低级社如黑龙江双城县所发现的那样，对于树立贫农和下中农的领导地位都很不利（个别公道能干政治觉悟高的富裕中农，当然不在此例），而一切合作社

是必须树立贫农和下中农的领导地位的。有人说，现在的提法似乎是放弃“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这个口号了，这是不对的，我们不是放弃这个口号，而是使这个口号按照新的情况加以具体化，即将新中农中间已经上升为富裕中农的人们，不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而将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这是按照他们的经济地位和对于合作化运动是否采取积极态度来划分的。这即是说，贫农和两部分下中农，相当于老贫农，作为依靠对象，而两部分上中农，则相当于老中农，作为巩固地团结的对象，而目前团结他们的办法之一，就是不要强迫他们入社，侵犯他们的利益。

《关于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问题》（一九五五年九月七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44—445页

使一个地方健全地达到合作化的问题是党的政策和工作方法的问题。只要我们党对于处理合作化问题上的各项政策是正确的，只要我们党当着发动群众加入合作社的时候所采用的工作方法，不是命令主义的或者简单从事的方法，而是向群众讲道理，作分析，完全依靠群众自觉自愿的方法，那末，完成合作化，并且达到增产，决不是很困难的。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48—449页

2. 对农民要进行细致生动的思想政治工作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7页

在农村工作中，一方面，必须照顾小农经济特点，党和政府不可对农民干涉太多，即必须废止各项主观主义的和命令主义的办法；另一方面，为了适当地和有力地指导农业生产，党和政府必须按照农民和国家的需要和可能，进行必要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

《中央转发莱阳地委关于物资供应工作总结报告的批语》（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253页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地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保证。这一工作是艰巨的，必须根据农民的生活经验，很具体地很细致地去做，不能采用粗暴的态度和简单的方法。它是要结合着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不能孤立地去做。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49—450页

使我国五亿多农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种惊天动地的事业，不可能是在一种风平浪静的情况下出现的，它要求我们共产党人向着背上背着旧制度包袱的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耐心的生动的容易被他们理解的宣传教育工作。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60页

3. 贯彻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

提出依靠包括原来是贫农现在已上升为新中农的人们在内

的贫农这个口号，在互助合作的对象（已取得土地的雇农、贫农、中农）范围内，即占了绝对大多数，在农村人口总数内（包括地主富农）也是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七十，在人数上也是占优势的。

《对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全国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的报告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642页

这里所说的中农是指老中农。老中农在农村人口总数中的比重，多者百分之四十，少者百分之二十，这个数目仅次于贫农，他们又有较好的经济条件，如果不好好地团结他们，挫折了他们的积极性，那就是极大的损失。

《对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全国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的报告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642页

贫农、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困难（贫农），或者他们的经济地位虽然比较解放以前有所改善，但是仍然不富裕（下中农），因此，他们是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他们是积极地响应党的合作化号召的，特别是他们中间的觉悟较高的分子，这种积极性更大。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22页

在最近几年内，在一切还没有基本上合作化的地区，坚决地不要接收地主和富农加入合作社。在已经基本上合作化了的地区，在那些已经巩固的合作社内，则可以有条件地分批分期

地接收那些早已放弃剥削、从事劳动，并且遵守政府法令的原来的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加入合作社，参加集体的劳动，并且在劳动中继续改造他们。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28页

中农是必须团结的，不团结中农是错误的。但是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农村中，依靠什么人去团结中农，实现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呢？当然只有贫农。在过去向地主作斗争、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是这样，在现在向富农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作斗争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也是这样。在两个革命时期，中农在开始阶段都是动摇的。等到看清了大势，革命将要胜利的时候，中农才会参加到革命方面来。贫农必须向中农做工作，把中农团结到自己方面来，使革命一天一天地扩大，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59页

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务管理委员会，如同过去的农民协会一样，必须吸引老下中农和一部分觉悟较高的和有代表性的新老上中农参加，但是人数不可太多，以占三分之一左右为适宜。贫农（包括现在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新下中农）委员的人数应当占到三分之二左右。社的主要领导干部，除了老下中农和若干觉悟很高、确实公道能干的新老上中农仍然可充当以外，一般应当由贫农（再说一遍，包括现在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全部新下中农）来充当。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60页

合作社的领导机关必须建立现有贫农和新下中农在领导机关中的优势,而以老下中农和新老两部分上中农作为辅助力量,才能按照党的政策实现贫农和中农的团结,巩固合作社,发展生产,正确地完成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这个条件,中农和贫农就不能团结,合作社就不能巩固,生产就不能发展,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就不能实现。许多同志不懂这个道理。他们认为建立贫农优势的问题,在土地改革时期是必要的,因为那时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五十、六十到七十的贫农,还没有上升为中农,而中农对于土地改革是动摇的,因此那时确有建立贫农优势的必要。现在是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过去的贫农大部分已经上升为新中农,而老中农的生产资料又多,没有老中农参加就不能解决合作社生产资料缺乏的问题。因此,这些同志认为,现在不应当提出依靠贫农或者建立贫农优势的口号,认为这种口号会不利于合作化。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错误的。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62—463页

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如果要用社会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制度去彻底地改造整个农村的小农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便只有依靠过去是半无产阶级的广大的贫农群众,才能比较顺利地办到,否则将是很困难的。因为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比较地不固执小农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比较地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们。他们中间的大部分现在已经变为新中农,但是他们同老中农比较起来,除了一部分新富裕中农以外,大多数在政治上有较高的觉悟,他们过去的困苦生活还是容易回忆起来。还有,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和新中农

中间的下中农比较接近，而和新老中农中间的上中农，即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中农不相同。因此，在合作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一）现在还处于困难地位的贫农，（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三）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样三部分比较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们，首先分批分期引导他们加入合作社，并且选择他们中间觉悟程度较高、组织能力较强的若干人，加以训练，组成合作社的领导骨干，特别要注意从现有贫农和新下中农里面选择这种骨干分子。这不是在农村中重新来一次划分阶级成分的工作，而是在合作化的过程中，党的支部和派到农村做指导工作的同志们应当注意掌握的一种方针，这个方针应当公开告诉农民群众。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63—464页

我们也不是说富裕中农不能入社，而是说等到富裕中农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了，他们表示愿意入社，并且愿意服从贫农（包括现在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全部新下中农）领导的时候，再去吸收他们入社，不要为了打他们的耕牛农具的主意，当着他们不愿意入社的时候强迫他们入社。已经入社而愿意留下来的，继续不变。要求退社，加以说服，愿意留的，也可以留社。生产资料少一点也可以组织合作社，很多贫农和下中农组织的合作社已经证明了。我们也不是说富裕中农一个也不能充当合作社的干部。那些社会主义觉悟程度高，公道能干，为全社大多数人所佩服的个别的富裕中农，也可以充当干部。但是，合作社必须树立贫农（再说一遍，包括现在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全部新下中农在内，他们占农村人口的多数，或者大多数）的优势。在组织成分方面，他们应占三分之二左右，中农（包括

老下中农和新老两部分上中农) 只占也应占三分之一左右。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64页

在合作社的指导方针方面, 必须实行贫农和中农的互利政策, 不应当损害任何人的利益。要做到这一点, 也必须建立贫农优势。在中农占优势的合作社里, 总是会要排挤贫农和损害贫农的利益的。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64页

农村的领导权掌握在谁的手里, 对农村的发展方向关系极大。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第115页

贫农、下中农、上中农一方面都是劳动者, 另一方面又都是私有者。但是, 他们的私有观念是各不相同的。贫农和下中农可以说是半私有者, 他们的私有观念要少些, 比较容易改变。我们从来说, 贫农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上中农的私有观念就比较浓厚, 他们历来对合作化有抵触。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第117页

4. 有准备有步骤地从低级向高级发展

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内社外都有矛盾。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是半社会主义的，社外的个体农民是完全的私有制（个体农民在供销社入了股，他这一部分股金的所有制也有了变化，他也有一点社会主义），这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互助组跟农业生产合作社不同，互助组只是集体劳动，并没有触及到所有制。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个人所有的土地、大牲口、大农具入了股，在社内社会主义因素和私有制也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要逐步解决。到将来，由现在这种半公半私进到集体所有制，这个矛盾就解决了。我们所采取的步骤是稳的，由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进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再进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将来也叫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要叫集体农庄）。一般讲，互助组还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02—303页

现有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成为引导农民过渡到更高级的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农庄）的简便形式。也就是说，这是自然地不勉强地吸引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这种形式，使个体农民和加入了互助组的农民在他们进到高级的、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组织的时候不感到突然，而是事先有了精神的和物质的准备的，因而能够避免由于突然上升而引起的种种损失。

《对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

五三年十二月十三日、二十二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
第417—418页

不打无准备的仗,不打无把握的仗。这是我党在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著名口号。这个口号也可以用到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中来。要有把握,就要有准备,而且要有充分的准备。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25页

我们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采取了逐步前进的办法。第一步,在农村中,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组织仅仅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的、几户为一起或者十几户为一起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然后,第二步,在这些互助组的基础上,仍然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组织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小型带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然后,第三步,才在这些小型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的基础上,按照同样的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进一步地联合起来,组织大型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些步骤,可以使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逐步地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程度,逐步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因而可以使他们较少地感到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好像是突然地到来的。这些步骤,可以基本上避免在一个时间内(例如在一年到两年内)农作物的减产,相反,它必须保证每年增产,而这是可以做到的。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34—435页

对于条件已经成熟了的合作社,就应当考虑使它们从初级形式转到高级形式上去,以便使生产力和生产获得进一步的发

展。因为初级形式的合作社保存了半私有制，到了一定的时候，这种半私有制就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就要求改变这种制度，使合作社成为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化的集体经营的经济团体。生产力一经进一步解放，生产就会有更大的发展。转变的时间，有些地方可能快些，有些地方可能要慢一点。大约办了三年左右的初级合作社，就基本上具有这种条件了。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501页

现在办的合作社一般地是小型社，向高级社转变的时候，应当取得群众同意，把许多小型社合并起来成为大型社。如果能够在这两年使得每个区都有一个至几个这样的合作社，并且在群众中显出它们比较初级社具有更大的优越性，那就可以使以后几年的并社升级工作，获得有利的条件。这个工作，要同发展生产的全面规划配合起来。当着人们看见了大型社和高级社比较小型社和初级社更为有利的时候，当着人们看见长期规划将给他们带来比较现在高得多的物质和文化的生活水平的时候，他们就会同意并社和升级的。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501—502页

重要的是做出榜样给农民看。当着农民看见办大型社和高级社比办小型社和低级社更为有利的时候，他们就会要求并社和升级了。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534页

5. 坚持勤俭办社的方针

“勤俭办社”这个口号很好。这是下面提出来的。要严格地节约,反浪费。现在城市里头大反浪费,乡村里头也反浪费。……要勤俭办社,就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严格节约,降低成本,实行经济核算,反对铺张浪费。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是任何一个合作社都必须做的工作。至于经济核算,那就要逐步来。合作社办大了,没有经济核算那是不行的,要逐步学会经济核算。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结论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

勤俭经营应当是全国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不,应当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几十年以后也需要执行勤俭的原则,但是特别要提倡勤俭,特别要注意节约的,是在目前这几十年内,是在目前这几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现在有许多合作社存在着一种不注意节约的不良作风,应当迅速地加以改正。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47页

合作社应当设立监察委员会,负责检查合作社的账目,对于干部的贪污盗窃行为进行严肃的斗争。党和团的支部应当严

重地注意这个问题。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51页

6. 注重办社质量，做好整顿工作

发展合作社，也要做到数多、质高、成本低。所谓成本低，就是不出废品；出了废品，浪费农民的精力，落个影响很坏，政治上蚀了本，少打了粮食。最后的结果是要多产粮食、棉花、甘蔗、蔬菜等等。不能多打粮食，是没有出路的，于国于民都不利。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00页

必须强调注重合作社的质量，反对不顾质量、专门追求合作社和农户的数目字的那一种偏向。因此，必须注重整社的工作。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23页

必须一开始就注重合作社的质量，反对单纯地追求数量的偏向。

不打无准备的仗，不打无把握的仗。这是我党在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著名口号。这个口号也可以用到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中来。要有把握，就要有准备，而且要有充分的准备。要在一个省、一个专区和一个县里面建设一批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事前做好许多的准备工作。这些工作大体是：（1）批判错误思想，总结工作经验。（2）在农民群众中，有系统地和反复

地宣传我党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在向农民作宣传的时候，不但要解释合作化的好处，也要指出合作化过程中会要遇到的困难，使农民有充分的精神准备。(3) 按照实际情况，拟定全省的、全专区的、全县的、全区的和全乡的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全面规划，从其中拟定年度规划。(4) 用短期方式训练办社干部。(5) 普遍地大量地发展农业生产互助组，并且只要有可能就促使许多互助组互相联合起来，组成互助组的联合组，打好进一步联合起来建立合作社的基础。

有了这些条件，就有可能使合作社发展的数量和质量统一的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但是还要在一批合作社建成以后，跟着就去进行整顿工作。

看一批合作社建立起来以后能不能巩固，第一就看建社以前的准备工作是不是做得好，第二就看建社以后的整顿工作是不是做得好。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25—426页

每年按照实际情况规定一次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控制数字，并且要对合作化的工作进行几次检查。这样，就可以根据情况的变化、成绩的好坏，决定各省各县各乡的每年具体发展的步骤。有些地方是可以暂停一下，从事整顿的；有些地方是可以边发展，边整顿的。有些合作社的部分社员可以让他们退社，个别的合作社也可以让它们暂时解散。有些地方应当大量地建立新社，有些地方可以只在老社中扩大农户的数目。各省各县，在发展了一批合作社之后，必须有一个停止发展进行整顿的时间，然后再去发展一批合作社。那种不许有停顿、不许有间歇的思想是错误的。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35—436页

以后在发展合作社的工作上，我们要比什么呢？要比质量，比规格。数量，或者速度，有前面所说的那个规定就行了，重点是比质量。质量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要增加生产和不死牲口。怎样才会增加生产，怎样才会不死牲口？这就要遵守自愿互利的原则，要有全面规划，要有灵活的指导。有这几条，我看就可以使合作社的质量比较好，就可以增加生产和不死牲口。

《农业合作化的全面规划和加强领导问题》（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77页

至于按照计划大发展一批合作社以后，及时地宣告停止发展，使运动转到整顿阶段，这是完全必要的。按照上述的季节规划，一年只有一季是发展的时间，其余各季都是整顿和准备发展的时间。其余各季也可以有一些零星的个别的发展，但是主要的发展时间只有一季，并且还只需一季中的两个月，这样就可以基本上避免由于漫无限制而引起的“左”倾错误，因为有了这样的有计划的发展和整顿，合作化的总的进展是好的，有一些县、一些区和一些乡，由于种种原因，合作社发展少一些，也就不要紧了，在以后几年中逐步地跟上去就好了，不要怕被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从现在起，全国各地的要求，主要是合作社的质量问题，而不是数量问题。因为数量问题已经引起全党注意，而质量问题则还没有引起全党注意。

《农业合作社要有计划地发展和整顿》（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505—506页

7. 以增产增收作为检验合作社的主要标准

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生产上，必须比较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决不能老是等于单干户或互助组的产量，如果这样就失败了，何必要合作社呢？更不能减低产量。已经建立起来的六十五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都增加了农作物的产量，这是极好的情况，证明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是高的，合作社胜过互助组，更胜过单干户。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26页

一切合作社，都要以是否增产和增产的程度，作为检验自己是否健全的主要的标准。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49页

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0页

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1页

8. 对单干农民采取尊重和团结态度，帮助贫困社员解决实际困难

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的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同时不要轻视和排斥不愿参加这个运动的个体农民。

《逐步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80页

在解决了有关农业互助合作的许多问题之后，党中央认为必须重复地唤起各级党委和一切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和非党积极分子的注意，要充分满腔热情地没有隔阂地去照顾、帮助和耐心地教育单干农民，必须承认他们的单干是合法的（为共同纲领和土地改革法所规定），不要讥笑他们，不要骂他们落后，更不允许采用威胁和限制的方法打击他们。农业贷款必须合理地贷给互助合作组织和单干农民两方面，不应当只给互助合作组织方面贷款，而不给或少给单干农民方面贷款。在一个农村内，哪怕绝大多数农民都加入了互助组或合作社，单干农民只有极少数，也应采取尊重和团结这少数人的态度。

《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152页

一切合作社有责任帮助鳏寡孤独缺乏劳动力的社员（应当吸收他们入社）和虽然有劳动力但是生活上十分困难的社员，解

决他们的困难。目前，有许多合作社，缺乏帮助困难户的社会主义的精神，甚至根本排斥贫农，这是完全错误的。目前，政府已经设立了贫农基金，可以帮助贫农解决耕牛农具的困难，但是还不能解决贫农中有些户缺乏劳动力的困难，也不能完全解决有些户在青黄不接时期缺乏生活资料的困难，这只有依靠合作社广大群众的力量才能解决。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65页

9. 全面规划，加强领导

至于对于合作化运动的检查工作，中央、各省委、区党委、市委和地委必须十分抓紧，每年不是进行一次，而是应当进行几次。一有问题就去解决，不要使问题成了堆才去作一次总解决。批评要是及时的批评，不要老是爱好事后的批评。例如今年七个月内，单是中央召集地方负责同志讨论农村合作化问题的会议，连同这次会议在内，就有了三次。实行这种因地制宜、及时指导的方法，就可以保证我们的工作少犯一些错误，犯了错误也可以迅速纠正。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36页

要有全国的、全省的、全专区的、全县的、全区的、全乡的关于合作化分期实行的规划。并且要根据实际工作的发展情况，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规划。省、专、县、区、乡各级的党和青年团的组织，都要严重地注意农村问题，切实地改善自己对于农村工作的领导。各级地方党委和团委的主要负责同志都要

抓紧研究农业合作化的工作，都要把自己变成内行。总而言之，要主动，不要被动；要加强领导，不要放弃领导。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39页

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就是我们的方针。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42页

我们希望全国二千几百个县的县级领导机关，密切地注意全县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情况，发现问题，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及时地召开全县的合作社主任的会议，或者全县的重点合作社主任的会议，作出决定，迅速推行。不要等到问题成了堆，闹出了许多乱子，然后才去解决。领导一定要走在运动的前面，不要落在它的后面。在一个县的范围内，党的县委应当起主要的领导作用。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67—468页

全面规划应当包括：第一，合作社的规划；第二，农业生产的规划；第三，全部的经济规划。农村全部的经济规划包括副业，手工业，多种经营，综合经营，短距离的开荒和移民，供销合作，信用合作，银行，技术推广站等等，还有绿化荒山和村庄。我看特别是北方的荒山应当绿化，也完全可以绿化。北方的同志有这个勇气没有？南方的许多地方也还要绿化。南北各地在多少年以内，我们能够看到绿化就好。这件事情对农业，对工业，对各方面都有利。

还有什么规划呢？还有文化教育规划，包括识字扫盲，办

小学，办适合农村需要的中学，中学里面增加一点农业课程，出版适合农民需要的通俗读物和书籍，发展农村广播网、电影放映队，组织文化娱乐等等。还有整党建党、整团建团、妇女工作，还有镇压反革命。在整个规划里面都要有这些部分。

规划应当有这么几种：（一）乡村合作社的规划。每个合作社应当有个规划，虽然小也应当有规划，让他们学会搞这一套。（二）全乡的规划。我们全国有二十二万多个乡，搞二十二万多个乡的规划。（三）全县的规划。我们希望每一个县搞一个。现在，有的县已经搞出了很好的规划，看了很有味道。他们思想解放，天不怕地不怕，没有什么脚镣手铐的束缚，规划搞得很生动。（四）全省（或自治区、各市郊区）的规划。这里面着重全乡的规划，全县的规划。要抓住这两个环节，迅速作出一批，比如一个省里面搞三四个县的规划，发出来要各地仿照办理。

合作化的规划，要分别不同地区规定发展的速度。

《农业合作化的全面规划和加强领导问题》（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75—476页

我国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能不能和国家工业化的进度相适应，合作化运动能不能健康地发展，少出毛病，保证增产，就看各级地方党委的领导重心是不是能够迅速地和正确地转移到这一方面来。工作组是必须派的，但是必须讲清楚，他们去是为了帮助那里的党组织，而不是代替它们，使它们自己不动手，专门依赖工作组。贵州的这个乡，自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转变工作态度以来，只有五个多月，就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不是依赖工作组，而是自己动手了，党员也不怕困难了。这种转变，首先要靠各级党委的书记——省委和自治区党委的书记，地委和自治州委的书记，县委和自治县委的书记，区委书记

记和支部书记，他们应当把整个农业合作化的任务拿起来。怕麻烦，怕困难，面临着这样伟大的任务自己不动手，仅仅委托给农村工作部，或者工作组，这种态度，不但任务不可能完成，而且会要闹出很多的乱子来的。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538页

（三）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2页

国家重点搞重工业，但还必须搞地方国营工业（不要盲目性），搞国家资本主义，搞手工业合作化。手工业是洋，不是海。手工业一般要有发展，也有一部分要淘汰。搞手工业合作化比农业合作化还要难，这两者又都比搞国家资本主义困难，对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农业不能采用剥夺的办法，因为他们是脚踏实地的劳动者，既不是资本家，下面又没有工人。对于他们，只能经过劝说，启发自愿，准备劝多少年，一步一步地实现。不搞地方国营工业，不搞国家资本主义，不搞手工业合作化，就不能完成重点建设。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88页

组织铁、木业合作社为农业生产服务，下乡修理农具，这个办法很好，农民一定欢迎。中国手工业几千年来就有这样做的。组织合作社以后，提高了技术，就能更好地为农民服务。

《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六年三月四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1页

手工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同半机械化、机械化生产比较，最高最低相差达三十多倍。每人每年平均产值，国营现代化工业是二万元到三万元，半机械化、机械化的合作社是五千元，百人以上的大型合作社是二千元，小型合作社是一千五百元，个体手工业是八百至九百元。把劳动生产率作一个比较，就清楚了：手工业要向半机械化、机械化方向发展，劳动生产率必须提高。

《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六年三月四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1—12页

手工业的各行各业都是做好事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有。还有工艺美术品，什么景泰蓝，什么“葡萄常五处女”的葡萄。还有烤鸭子可以技术出口。有些服务性行业，串街游乡，修修补补，王大娘补缸，这些人跑的地方多，见识很广。北京东晓市有六千多种产品。

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

《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六年三月四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2页

提高工艺美术品的水平和保护民间老艺人的办法很好，赶

快搞，要搞快一些。你们自己设立机构，开办学院，召集会议。杨士惠是搞象牙雕刻的，实际上他是很高明的艺术家。他和我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看着我，就能为我雕像。我看人家几天，恐怕画都画不出来。

《加快速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六年三月四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2页

手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一，它的供产销为什么没有纳入国家计划？手工业这样大，应当纳入国家计划。

《加快速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六年三月四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3页

十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

（一）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利用、限制 和改造的政策

1. 革命胜利后，私人资本主义在中国有一个相当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和必要的

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既然是为了变更现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即为了完成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而奋斗，那末，在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但这只是中国革命的一方面的结果，不是它的全部结果。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加以国际环境的有利，便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

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了。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50页

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里所说的上层小资产阶级，是指雇佣工人或店员的小规模的工商业者。此外，还有不雇佣工人或店员的广大的独立的小工商业者，对于这些工商业者，不待说，是应当坚决地保护的。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54—1255页

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1页

占有大约三百八十万工人、店员的私营工商业，是国家的一项大财富，在国计民生中有很大的作用。私营工商业不仅对国家供给产品，而且可以为国家积累资金，可以为国家训练干部。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一九五三年九月七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92页

国家积累主要靠工业, 不靠农业。国家预算收入平均每年二百七十亿元, 农业只有三十亿, 加上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也不过七十亿左右。我们为什么保存资本家? 因为国家有需要, 对人民有利益, 可以增加工业品。要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同盟, 才能巩固同农民结成的同盟, 因为农民需要工业品进行交换。同时, 还能比较好地稳定物价, 保证市场供应。在过渡时期保存资产阶级, 有极大的作用。

《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71页

工商业者不是国家的负担, 而是一笔财富, 他们过去和现在都起了积极作用。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是现代化的, 不是手工业的。在政治上是要求反对帝国主义的, 有两面性, 有要求革命的一面。人民政权建立以来他们是同政府合作的, 企业又公私合营了。做了这样一些好事, 不能说资产阶级对国家是无用的, 应该说是有用的, 而且是很有用的。

《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76—177页

2. 对私营工商业要采取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

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 是限制私人资本的, 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 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 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 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要达到这一点, 必须经常和企图脱出这条轨

道的私人资本作斗争。而这些私人资本虽然已经纳入这条轨道，他们总是想脱出去的，所以限制的斗争将是经常不断的。

《给刘少奇的信》（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77页

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但是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决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1—1432页

根据地下工厂大量发展的情况，第二个五年计划让不让私人资本主义发展，这要由我们的政策来决定。但政策决定于需要，如果社会对私人资本主义有需要，那还是要发展。私营工厂，十人以上的可能有残留，十人以下的可能有发展，还可能有新生的。社会有需要时，让它发展，想办法管起来，以后再合营。十年搞掉十人以上的私营工厂，这没有什么急躁冒进。改造十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可能不要十年，也许只要七年。

《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统战人士安排问题》（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九日），《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

3. 正确对待私营工商业，防止和克服“左”右两种倾向

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由于新民主主义国家手里有着从官僚资产阶级接收过来的控制全国经济命脉的巨大的国家企业，又有从封建制度解放出来、虽则在一个颇长时间内在基本上仍然是分散的个体的、但是在将来可以逐步地引向合作社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在这些条件下，这种小的和中等的资本主义成分，其存在和发展，并没有什么危险。土地改革后，在农村中必然发生的新的富农经济。也是如此。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经济成分采取过左的错误的政策，如像我们党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期间所犯过的那样（过高的劳动条件，过高的所得税率，在土地改革中侵犯工商业者，不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为目标，而以近视的片面的所谓劳动者福利为目标），是绝对不许重复的。这些错误如果重犯，必然要损害劳动群众的利益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利益。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55页

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反过来，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了。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27页

私营工商业是会长期存在的，我们不可能很快实行社会主

义。到哪一天才需要全面进攻，取消资本家的哪一部分呢？照苏联的例子，时间是很长的。他们一九二九年开始集体化，消灭富农经济，后来又搞快了，因此一九三〇年斯大林有一篇文章《胜利冲昏头脑》。所以必须慎重。

《对私营工商业要有所不同、一视同仁》（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61页

今天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对社会是需要的，有利的。私营工商业统统要拿到政府的翅膀之下来，是有理由的，因为适应了人民的需要，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当然，资本家要拿走一部分利润，那是必需的。……现在我们有广大的国营工商业，需要把这些企业搞好。要有所不同，一视同仁。有所不同者，是国营占领导地位，是进步的，把位置反转过来是不行的，因为私营工商业比较落后，这一点必须公开说明，我曾同几个资本家说过。其他则一般的应当一视同仁，有的是要逐渐才能办到的，如收购、采办、出口以及市场。工资问题将来也是要解决的。在私人工厂中，也可以有模范工作者和劳动英雄，也应当有生产竞赛。总的说来，这种政策对于国家和人民是有利的，这个利是超过对资本家的利益。裁员问题、失业救济问题，都应该是同样的，一视同仁，或者如陈云同志所说的“不分厚薄”。这个精神在《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中已经有了，即统筹兼顾。

《对私营工商业要有所不同、一视同仁》（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61—62页

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

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71页

有所不同和一视同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前者管着后者。

《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251页

“有所不同，一视同仁。”这是公私企业拿来相比较。有所不同，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一个是领导者，一个是被领导者，因此，在对它们的政策方面也有所不同。一视同仁，是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核算、工资待遇、劳动条件等方面，公私企业大体上相同，总目标是增产节约，减少成本。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因为所有权的关系，不能讲完全相同，完全相同是不可能的。你看工人嘛，在私营企业不安心，一到国营企业就安心了。不能抹杀它们之间的不同，但也可大体相同，基本上做到差不多。如果说不能做到大体相同，那就是没有看到上面有政权在工人阶级手里，下面有党和工会的组织嘛，而只看见资本家！那就会将工人阶级分成两部分嘛！如果私营企业生产不能增长，工资不能提高，工人生活不能得到改善，同国营企业相比，岂不是一部分工人倒霉，一部分工人神气？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

资本主义企业的数量不可忽视，其作用是不小的。它有工

人和店员三百八十万，而国营企业也只有工人和店员四百二十万，超过它不多。资本主义企业数量很多，目前少不了它，而我们又有办法逐年把它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目前一脚踢开资本主义企业是不行的，我们也没有资格。现在，我们飞机、坦克、汽车、拖拉机等都不能造，就想把资本主义企业一脚踢开，是不对的，不应急躁冒进。我们应该第一要向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工人做工作，第二要向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做工作。统筹兼顾完全必要，以便我们集中主要精力做国营企业的工作，集中力量搞国防，搞重工业。对资本主义企业不是置之不管，而是要做教育工作，使资产阶级削尖脑袋要来找我们，可以逐步改造。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

对私营企业“有所不同、一视同仁”问题。在所有权方面是一视同仁的，工人所得可以自由支配，资本家分到的红利也可以自由支配。在原料供应、贷款、运输等方面，“不看僧面看佛面”，“佛面”是工人阶级，为了工人，对资本家也需要给以必要的照顾。工资待遇一般原则也是“一视同仁”，高的一般不降，低的也不一定都提，要看具体条件和技术水平。“一视同仁”里面还包括资本家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这方面，形式上是每人一票，但因为工人人数多，实际上工人占优势。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87—288页

一个是领导者，一个是被领导者，一个是不谋私利者，一个是还要谋一部分私利者，等等，这些是不相同的。但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就利润分配上说，约占四分

之三左右),因此可以和应当说服工人,和国营企业一样,实行增产节约、劳动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提高数量质量,这样对公私、劳资都有利。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一九五三年九月七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93页

我们的国家仍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工人阶级的领导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造。

《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统战人士安排问题》(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九日),《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

4. 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裤腿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二百五十万人(工业一百六十万,商业九十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这

样定息也有出路。……要想办法。定息时间要相当长，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公私合营有优越性，比不合营好，工人的积极性提高了，资方的态度也改变了。

《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70—171页

(二) 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 工商业的必经之路

1. 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和平赎买政策

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一定要给资方分红利，十三年准备支出五十万亿元给资本家。这可能成为另外一种方式的购买，比较行得通。工人付给红利，养活资本家。工人和我们党内都应当意识到这一点。这还不是仁至义尽？“新民主主义那么好”，资本家称赞的，就是这一条。

私营企业要多少年才实行国营？可能有先有后，要看发展，看看他们的生活、社会、人心等。今天政府会议上李烛尘讲话，对实行国营表现新的积极性。要培养这样一批人。实行国营，资本家的前途是光明的，今后可当工人，就是拿工钱吃饭。

《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统战人士安排问题》(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九日),《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

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它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或者发行公债来购买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不是生活资料，是生产资料，即机器、厂房这些东西），也不是用突然的

方法，而是逐步地进行，延长改造的时间，比如讲十五年吧，在这中间由工人替工商业者生产一部分利润。……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是采取一九四九年对官僚资本那样全部没收、一个钱不给这个办法好呢，还是拖十五年、十八年，由工人阶级替他们生产一部分利润，而把整个阶级逐步转过来这个办法好呢？这是两个办法：一个恶转，一个善转；一个强力的转，一个和平的转。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方法，是经过许多的过渡步骤，经过许多宣传教育，并且对资本家进行安排，应当说，这样的办法比较好。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99页

对资本家的安排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工作岗位，一个是政治地位，要通统地安排好。政治地位方面，给选举权的问题，无所谓安排了，因为我们早已宣布，对民族资产阶级是不剥夺它的政治权利的，跟对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采取不同的政策。对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要剥夺一个时期，比如地主一般是要五年，有些还要延长，看他表现好，才能改变成分，才给他选票。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合作的政策，他们的政治权利是已经有的，将来阶级成分变了，不是资本家了，变成工人就更好了，因为工人阶级比资产阶级更吃香嘛。过去有钱的人很吃香，现在似乎是要当一当工人阶级才舒服的样子。你们想当工人阶级有没有希望呢？是一定有希望的，我可以开一张支票给你们。这是一个光明的政治地位，光明的前途。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99—500页

对于民族资本，我们分几个步骤进行改造，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公私合营。国家采取了和平赎买政策，分好几年赎买。现在，原属民族资本的那些企业都是由国家管理。

中国过去的资本主义，主要是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资本，占百分之八十，民族资本只占百分之二十。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资本归国家所有以后，资本的主要部分就已归国家所有了。对民族资本我们采取和缓的政策。

《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一九五九年二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页

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不同。我们历来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官僚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把官僚资产阶级这个大头吃掉了，民族资产阶级这个小头，想反抗也没有力量。他们看到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强大，同时我们又采取适当的政策对待他们，所以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他们就有可能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1页

解放以后，民族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是逼出来的。我们打倒了蒋介石，没收了官僚资本，完成了土地改革，进行了“三反”、“五反”，实现了合作化，从一开始就控制了市场。这一系列的变化，一步一步地逼着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不走上接受改造的道路。另一方面，《共同纲领》规定了各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使资本家有利可图的政策；宪法又给了他们一张选票、一个饭碗的保证，这些又使他们感到接受改造就能保持一定的地位，并且能够在经济上、文化上发挥一定的作用。

现在，在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实际上已经成了国家的雇员，对企业没有实际上的管理权。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是拉住它，又整住它。中国民族资本家从来没有统一过，解放前有什么上海帮、广东帮、天津帮之类行会性的组织，解放以后我们帮助他们成立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把他们统一起来，又对资本家区别不同情况，分而治之。这几年每年还给他们一亿二千万定息，实行大规模的收买，收买整个阶级，收买他们整个阶级的几百万人，包括家属在内。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4页

中国资产阶级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官僚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对前者采取没收政策，对后者采取赎买政策。

《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记录》（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第43页

我们用战争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接着没收了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中占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这样才使我们有可能对占百分之二十的民族资本，采取和平的方式，逐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利用他们的经济、文化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第287页

2. 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过渡时期，我们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必须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其性质和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相同的，苏联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但实行的办法则有很多不同。列宁在一九一八年指出的这条道路，我们实行了。资产阶级不接受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别的路走，大势所趋，非走这条路不可。我们对资产阶级不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也没有别的路，因为现在不能没收他们的财产，而且需要他们。使独立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变为受限制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大的进攻，只有有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这五个条件，加上社会主义工业和经济的发展，才能这样搞。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85页

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靠什么条件？第一、社会主义的几千个大工厂；第二、农业合作化，要有计划地、稳步地、积极地、自愿地搞互助合作；第三、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条件，包括党组织和工会，加上我们的领导，可以保证企业转到社会主义，取消资本家的所有权，同时把他们安排好。在这里，头一步是变资本主义为国家资本主义，把独立的、不受限制的、有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变为不独立、受限制、没有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由国家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消灭阶级。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87页

(2) 有了三年多的经验, 已经可以肯定: 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

(3) 《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的方针, 现在应明确起来和逐步地具体化。所谓“明确起来”, 是说在中央及地方的领导人物的头脑中, 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一九五三年九月七日),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91页

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在过去几年中已有很大的进步, 相信再有三年至五年, 这种进步将更大, 所以三年至五年内基本上完成将私营工商业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是有可能的。国营企业的优胜, 则是完成这一任务在物质方面的保证。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一九五三年九月七日),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93页

必须经过国家资本主义,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不这样做, 一切矛盾不能解决, 公私、劳资、资资、劳劳、国劳(公公)的矛盾, 不可终日。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 有三类办法: 第一类, 苏联办法, 不见得完全好, 生产低落, 资产阶级破坏。第二类, 发行公债购买, 十年买完, 但谁出钱买公债、谁付息? 资产阶级也不会那么满意。第三类, 我们现在的办法, 十三年, 工人付给资本家利润, 资产阶级可养活起来, 一段时间, 企业还归他们管着。我

们出了钱，资本家还会调皮？

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是列宁提出的，但苏联没有怎么搞起来。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是否在商业方面多搞了一点国家资本主义？我们现在的办法，不仅使资产阶级不搞破坏，还要使他们的生产增长。还有，我们现在对私营工商业“一下吞不了”。三年半的经验，我们找出这条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道路。

《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统战人士安排问题》（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九日），《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

3. 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

现在的资本主义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和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其领导的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

《对〈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255页

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一九五三年七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82页

国家资本主义是带有进攻性质的，但在总的进攻中有部分退却，如对资本家的“三权”和利润分配。现在资本家的“三权”已经不全，虽然所有权未取消，但管理权公方已经插进去了，他们的“三权”就受到了限制。现在要让一下，特别是在红利上，要给资本家让利，使他们有所得，这就是进攻中的部分退却。所得过少，他们就不愿意来。这里又牵涉到资本主义经济法则问题。我对他们说：“你们不应惟利是图，而要两利是图，劳资两利，一利不行。”“五反”中进攻得太远了，资本家躺下了，要给他一定的利益叫他起来，这就是百分之二十五的红利。应当说服工人作这个让步，以换得国家资本主义；如果不让这一步，资本家无利可图，无利可得，就不能换得国家资本主义。我们调整商业后，商业方面的问题解决了，我们也退却了，退到三七开。工业方面还要让一步，才能解决。……在我们的社会里，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是受限制的经济法则，所谓资本主义经济法则，就是剥削剩余价值，说穿了，就是惟利是图，这一条已经受到了限制。但是现在有些工厂让资本家剥削得太少了，这就不能换来国家资本主义。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85—286页

现在所说的改造，还不是取消资本家私人所有制，使之变为社会主义企业的最后改造步骤，而是指在承认资本家的受限制的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条件下，使资本主义企业逐步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即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用各种方式同国营

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和合作的、受工人监督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这种资本主义企业，已经不是解放前的那种资本主义企业，它们主要是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产，资本家已不能惟利是图。当然，工人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部分利润，在整个盈利中至多占百分之二十五；而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盈利部分，是为国家（所得税）、为工人（福利费）和为扩大企业设备（公积金——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资本主义，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是特殊的、新式的资本主义，即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它带有若干社会主义的性质，有几种程度不同的情况。必须指出，目前不是一切或大多数的资本主义企业已做到了这一步，还需要经过几年努力才可以做到这一步，但是一定可以做到这一步。在国家资本主义中，公私合营是有社会主义成分的，它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是把一切国家资本主义，比如接受加工订货，都叫做半社会主义是不妥当的，应该说它是带有若干社会主义的性质。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86—287页

4. 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

（5）公私合营、全部出原料收产品的加工订货和只收大部产品，是国家资本主义在私营工业方面的三种形式。

（6）私营商业亦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这方面经验较少，尚须研究。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一九五三年九月七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91—292页

有些资本家对国家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他们仍没有改变惟利是图的思想；有些工人前进得太快了，他们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我们应向这两方面的人们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地（争取尽可能快些）适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即使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部分地是为资本家谋利的——这样就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了。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配，有一个表：

所得税	34.5%
福利费	15%
公积金	30%
资方红利	20.5%
总计	100.0%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一九五三年九月七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92页

宪法中规定，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原则性。要实行社会主义原则，是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一天早晨一切都实行社会主义呢？这样形式上很革命，但是缺乏灵活性，就行不通，就会遭到反对，就会失败。因此，一时办不到的事，必须允许逐步去办。比如国家资本主义，是讲逐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只有公私合营一种形式，而是有各种形式。一个是“逐步”，一个是“各种”。这就是逐步实行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以达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原则，要达到这个原则就要结合灵活性。灵活性是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形式不是一种，而是“各种”，实现不是一天，而是“逐步”。这就灵活了。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6—327页

定息拿多长的时间?这个问题,应当说八大已经解决了。七年之病,三年之艾。原则是要解决问题,时间服从原则。这问题处理得好坏,影响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宗教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在国际上也有影响。共产党不想在这上面省几个钱,要说服工人,向他们说明定息的时间长比短好。可以虎头蛇尾,七年虎头,五年蛇尾,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如果还需要延长,到第四个五年计划还可以拖下去。

《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68页

我们团结的主要对象、定息的主要对象是大的资本家,这些人是主客不是陪客。小的资本家是附属性质,替大的资本家加工订货,不起主导作用。我们不要使对国家经济起重要作用的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提出中小路线是没有把问题搞清楚。当然,中小资本家也有作用,也要照顾。

《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69页

我主张把占百分之九十的中小资本家不划入资产阶级范围,拿到的定息只够买几包香烟的,就叫他们小资产阶级。资方代理人也是属于小资产阶级范围,叫上层小资产阶级。过去我们也这样搞过,在土改当中,有种小地主,就叫他小土地出租者,不叫他地主。资方代理人或拿定息很少的资本家,如果一定不愿意干,要劳保,可以把他们划出来,但不是今年,是明年、后年,以免百分之九十的人不要定息,使那百分之十拿定息的人过不去。是否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建议,请你们考虑,政府也要考虑。中小资本家愿意放弃定息就放弃,不愿意放弃的

就让他拿下去。

《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毛泽东文集》

第7卷第179页

关于定息的时间问题，大家很关心。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原则，就是要解决问题，不要损害资本家的利益，特别是不要损害大资本家的利益。是大资本家对国计民生的作用大，还是中小资本家对国计民生的作用大？中小资本家人数多，占资本家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但他们对国家经济生活的作用不大，对国家经济生活作用大的，还是大资本家。你们会说我照顾大资本家，不照顾中小资本家，是右倾机会主义。不是不照顾中小资本家，中小资本家人数很多，不注意安排是错误的，要替他们解决各方面的问题。我们党内有过中小路线，应当承认中小路线是不对的。对中小资本家必须照顾，现在我们把他们放在小资产阶级范围内来解决。农民是小资产阶级，是乡村的小资产阶级，城市也有小资产阶级，其中就包括中小资本家。从公私合营和国有化来说，大资本家对国家的意义更大。所谓大也是比较而言的，并不是说中小资本家就没有意义了。没有中小资本家，没有手工业，我们就不能生活。没有农民我们就没有饭吃。不对大资本家很好地照顾，占百分之九十的中小资本家都摘掉了帽子，剩下的占百分之十的大资本家就会感到面子上不光彩，说别人都是红色的，我们还是白色的，不好看。我们不能这样做。

定息到底搞多长时间，中共中央讨论过，认为时间太短了不好，赎买就要真正的赎买，不是欺骗的。花不了多少钱。有人问究竟还有多少年？大家都很关心。我们以七年为期，即今年明年加上第二个五年计划共计七年。八大文件里已经有这个

意思，现在和你们商量。工人可能会反对，中小资本家也可能会反对。工人会说太便宜了资本家，照工人的想法最好马上就取消定息。中小资本家认为搞一二年就行了，为什么要那样长。所以有两个抵触，第一个是工人，第二个是占百分之九十的中小资本家。这就需要说服。要赎买就要赎买到底，不要半赎买、半没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实际上本钱也不大，工业私股资金只有十七亿元，折合美金七亿元不到，只有那么一点。我们国家怎么会不受欺侮呢？帝国主义欺侮我们是有理由的，民族资本只有这么一点嘛。要赎买就全部赎买，不要省这几个钱，不要虎头蛇尾，有始无终。要说服工人，不要损害大资本家的利益，这对整个国家是有利的。我说还可以拖一个尾巴，拖到第三个五年计划，你们看怎么样？七年是虎头虎身，如果还没有解决问题，还可以拖长一点，总要天理人情讲得过去。中小资本家人数多，要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大资本家人数少，但他们的资本多，比中小资本家对国家的作用来得大，所以中小路线是不对的，应该是大中小路线。工商联大会的代表中，中小资本家占多数。

《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毛泽东文集》
第7卷第179—181页

我国政府对私营资本主义企业的加工定货，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在解放区，例如东北的一些城市，早已经存在。在全国解放以后，就得到普遍发展。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第109—110页

教科书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问

题，说得不对。它只说了我们对民族资本的改造政策，没有说我们对官僚资本的没收政策。对于民族资本，也没有说我们是经过了三个步骤，即加工定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来实现对它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每个步骤来讲，如加工定货，也是逐步前进的。公私合营也经过了从单个企业的公私合营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过程。由于我们的国家一方面掌握了原料，另一方面又控制着市场，同时又对资本家贷给流动资金，这样就使民族资本家不能不接受改造。实行这样的改造政策，不仅生产没有受到破坏，而且有些私营工厂在过去几年中还进行了部分的扩建。资本家由于在过去几年中有利可图，有些人也还自愿地向工厂进行投资。我们在处理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有很丰富的经验，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例如，公私合营以后给资本家定息，就是一个新经验。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4—115页

5. 改造要有准备有步骤，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要有准备地搞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准备则不要搞。搞国家资本主义要有条件，包括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条件。要像过去打仗一样，不打无准备之仗。干部要就地取材，培养训练工厂的工会主席和支部书记。要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地变私人资本主义为国家资本主义，大体上要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完成。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89页

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不是一切）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因此不应该发生震动和不安。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一九五三年九月七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91页

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一九五三年九月七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92页

关于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时间问题，有人说，现在锣鼓点子打得紧，胡琴也拉得紧，担心搞得太快。我们说，社会主义改造是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还有个尾巴要拖到十五年以后，总之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苹果不熟摘下来吃就是酸的。现在是协商办事，这样大的事情，与全国人民有关的大事，当然要协商办理。如果大家不赞成，那就没有办法做好。有些事缓点比急要好，但是否现在锣鼓点子就不要打紧了，戏就不唱了？不是的，现在还是要劝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

《工商业者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88页

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东西要说开。当然也要注意，不要一说开就晚上睡不着觉，就神经衰弱，说是明天早上就要共产了。不是的。我们讲几年准备，要经过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加工订货；第二个步骤，公私合营；第三个步骤，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议嘛。究竟哪一年国有化，我们总是要跟你们商量

嘛。国有化不会是像扔原子弹那样扑通下地，全国一个早上就全部实现，而是逐步地实现的。现在来说，还是一个宣传教育问题。通过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地做工作，慢慢地使我们的新制度往大家的脑筋里面钻进去一点，把不安的心理逐步减少，增加核心分子，扩大核心集团，让大家认识到新制度确实可行，确实有益。如果新制度不能证明比旧制度大为有利，那新制度就不可取了。新制度所以应该采取，就是因为比旧制度有利得多，不是只对少数人有益处，而是对全国人民都有益处。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98—499页

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是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这样看起来慢，实际上反而快。早两天我跟朋友们说过，就是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样的话是好话。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比较自然。这不是“听其自然”的那个“自然”，而是讲，经过说服，经过教育，经过批评，克服许多困难而达到的“自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一定会有困难的，也一定会有破坏的。……总而言之，社会主义改造要减少损失，要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要充分准备，准备工作越充分，这个事情就越能办好。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503页

(三) 对私营工商业者的教育、 培养和改造

1. 加强教育，从中培养一批觉悟较高的核心人物

这种对于反动阶级的改造工作，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才能做到。这件工作做好了，中国的主要的剥削阶级——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即垄断资产阶级，就最后地消灭了。剩下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就可以向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进行许多适当的教育工作。等到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即实行私营企业国有化的时候，再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7页

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例如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个人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或者如先生所说“没有劳动，没有生活，不从劳动以外求生活，不从自力以外求生活”，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于少数进步分子说来是可能的，当作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宣传。

《给黄炎培的信》（一九五二年九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36页

对于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我同意先生的意见，可以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使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

发生兴趣，我想这是可行的，也是有益的。在中国的条件下这样的人可能出现，特别是在几年之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更加壮大，更加显示它对于国家和人民的伟大贡献的时候，这样的人可能逐步地多起来。

《给黄炎培的信》（一九五二年九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37页

每个城市要好好做几个大资本家的工作，我自己也在做。几年来经验证明，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或者说多数，是可以教育的。他们是民主人士，可以教育。荣毅仁说，资本家分三种人，一是自愿进社会主义的，二是被拉进社会主义的，三是被社会主义扫掉的。他希望头两种人多些。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

需要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一九五三年九月七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92页

我想劝一些人，每个大中城市有那么几十个、百把两百个觉悟比较高的核心人物，经过他们去说服大多数人，这样比我们去说更好。要有一些人早些下决心拥护共产，因为迟早是要共产的。

……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委员有三百人左右，各省各市还有一批会员，合起来就有好几万人。在这些中间争取一批人，早点建立决心，不是立即共产，而是作思想准备，接受社

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教育。现在先搞半共产。农民在一九六〇年以前也只搞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总之是要逐步地做，不使人们感到突然。生产关系、生活方式都要逐步改变，不要突然改变，最后是要改变的，但是要安排好，要使这些人过得去。一个工作岗位，一个政治地位，都要安排好。

《工商业者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89—490页

要加强宣传教育工作。现在，听到各大城市工商界都有学习的组织，我们很高兴。参加学习的人应该逐步地扩大，每个城市要有几千人，要逐步地有更多的人来学习应该学习的东西。这里有个问题，就是要有比较少数的核心人物。这次召集会议，我们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要求，希望每一个大城市有几十个、几百个核心人物。在工商界里面，这些人比其他的人要觉悟一些，要进步一些，经过他们来教育其他的人。这一点是不是可能呢？应该是可能的，我们看，过去这几年，工商界已经有一些人觉悟程度是比较高的，他们懂得国家的方针、政策，因此我们觉得完全可以设想：经过工商联、民建会、各民主党派的工作，壮大这么一个队伍，达到全国有几千人。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96页

对民族资本家的改造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的，我们给他们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六年了，我们还打算再给他们三年的时间，一共九年。这样做对工人农民是有利的，生产不中断，市场上群众需要的商品不短缺，物价稳定，货币购买力稳定。现在我们革民族资产阶级的命，取消他们对生产资料的

私有制。我们的办法是教育资本家，给他们上课、开会，让他们进行自我批评，我们也对他们进行批评帮助，并鼓励他们积极的一面，打通他们的思想。资本家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没有痛苦的，不是没有斗争的。我们动员了广泛的社会力量来帮助他们进行改造工作。不但工人对资本家作斗争，资本家家庭里的进步子女也同父母作斗争。这样，六年后的今天，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就被纳入社会主义改造的轨道了。

《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60—61页

2. 公私合营后，私营工商业者要继续学习，以企业为基地进行改造

资产阶级还有两面性，一面进步，一面落后。如果认为只有一面性，那就不需要改造了，说只有一面性，是不利于改造和进步的。我们的任务是又鼓励又批评，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自然界和社会的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对立统一的。

《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70页

定息取消了，资本家也还要改造。

《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71页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爱国的阶级，但是不要说是红色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中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颜色不一，思想状态不一，并且有两面性，有进步的一面，有落后的

一面，这是合乎事实的。因此，就有一个任务，就是学习。如果说都是好的，那就不符合事实了，也就不要学习了，变成圣人。一个人不要满足，世界上的事情有很多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要加紧学习。我们承认自己的缺点，这是有好处的，这样我们就有一个任务，要学习。

《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毛泽东文集》

第7卷第178页

有人说，中国资产阶级现在已经没有两面性了，只有一面性。这是不是事实呢？不是事实。一方面，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另一方面，他们现在还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拿定息，这就是说，他们的剥削根子还没有脱离。他们同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还有一个不小的距离。怎么能说已经没有了两面性呢？就是不拿定息，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也还需要一个相当的时间继续进行思想改造。如果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了两面性，那末资本家的改造和学习的任务也就没有了。

应该说，这种意见不仅不符合工商业者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工商业者大多数人的愿望。在过去几年中，大多数工商业者都是愿意学习的，并且有了显著的进步。工商业者的彻底改造必须是在工作中间，他们应当在企业内同职工一起劳动，把企业作为自我改造的基地。但是经过学习改变自己的某些旧观点，也是重要的。工商业者的学习，应当以自愿为基础。许多工商业者在讲习班里学习了几十天，回到工厂，同工人群众和公方代表有了更多的共同的语言，改善了共同工作的条件。他们从亲身的经验懂得，继续学习，继续改造自己，对于他们是

有益的。刚才所说的那种认为不需要学习，不需要改造的意见，并不能代表工商业者中大多数人的意见，只是少数人的意见。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3—224页

（四）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 胜利完成的重大意义

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包括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有全国的意义，还有国际的意义。整个世界都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我们在世界上是走在前面的，中国的资本家将来是先进者，我这个支票也是可以开的。中国人是要走在前面的。……当然，我不是讲一切国家都会走我们的方向，而是讲比较落后的国家会跟我们学的。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502页

为什么要搞公私合营，要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了便于把国家发展起来，社会主义比私有制度更有利于发展国家的经济、文化，使国家独立。

《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77页

这里的意思，是把我国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改造民族资本主义，当成例外的、个别的、特殊的经验，否定这种经验的普遍意义。西欧各国和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很高，少数的垄断资本家占了统治地位，同时也还有大量的中小资本家。

据说美国的资本是集中的，又是分散的。如果这些国家革命成功了，对中小资本家怎么办呢？难道统统没收吗？垄断资本要没收，是没有疑问的。中小资本家是不是可以、是不是需要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改造他们呢？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第 112 页

第四编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

目 录

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和基本矛盾	(909)
(一) 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 两个阶段	(909)
(二)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矛盾仍是社会 发展的动力	(909)
(三)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 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911)
(四)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 制度本身不断得到解决	(916)
(五) 社会主义社会还要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	(916)
二、从中国国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	(919)
(一)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特点 结合起来	(919)
(二) 中国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	(920)
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和战略设想	(923)
四、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	(930)
(一) 正确处理十大关系，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 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930)
(二) 从六亿人口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932)
(三) 增产节约，勤俭建国	(934)
(四) 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937)
1. 建设社会主义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	

- 为辅 (937)
2. 中国发展经济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还要同
国外交流，吸收外国资本 (939)
3. 禁运和封锁是坏事，但可以激发我们自力更生
克服困难 (942)
4. 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先进经验为我所用 (943)
5. 学习和借鉴苏联的经验 (946)
6. 学习外国经验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独创
相结合，不能照抄照搬 (949)
- 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953)
- (一) 全党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努力学会做经济工作 (953)
- (二) 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
的条件下，发展工业与发展农业同时并举 (955)
- (三) 国民经济要有计划按比例发展 (961)
1. 社会主义国家要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
经济 (961)
2. 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波浪式前进的，不能过急 (965)
3. 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
平衡 (967)
4. 人类本身的生产要与社会生产相适应，实行
计划生育 (969)
- (四) 发展商品生产，按价值规律办事 (972)
1. 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扩大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不能过早废除 (972)
2. 不能把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
生产同样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977)

3.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一部分生产资料也是商品 (979)
4. 要利用价值法则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981)
5. 不能剥夺农民，坚决纠正“共产风” (982)
- (五) 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平均主义和过分悬殊 (986)
- (六) 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生产与生活的关系 (988)
- (七) 工业 (994)
 1. 发展国民经济要以工业为主导 (994)
 2. 搞工业要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 (994)
 3. 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996)
 4. 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997)
 5. 管理问题是所有制问题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要改善经营管理 (1001)
- (八) 农业 (1003)
 1.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1003)
 - 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工业要支援农业 (1003)
 - 农民的情况如何，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 (1007)
 2. 农林牧副渔要五业并举，综合平衡 (1007)
 3. 提倡科学种田，因地因时制宜，按“八字宪法”办事 (1014)
 4.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必须注意水土保持 (1015)
 5.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1017)
- (九) 财政、金融和贸易 (1020)
 1.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1020)
 2. 做好财政税收工作 (1020)

- 3. 发展商业和对外贸易 (1021)
- (十) 科学技术 (1021)
 - 1. 不搞科学技术, 生产力无法提高 (1021)
 - 2. 必须打破常规, 尽量采用先进技术 (1023)
 - 3. 重视自然科学的学习、研究和应用 (1025)
 - 4. 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1028)
- (十一) 关于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客观规律
 问题 (1030)
 - 1. 从实践中总结经验, 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
 客观规律, 克服盲目性 (1030)
 - 2. 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认识 (1033)
- 六、社会主义政治建设 (1036)
 - (一) 加强人民民主专政, 巩固工农联盟 (1036)
 - (二) 健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036)
 - (三) 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制度 (1036)
 - (四) 建立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1036)
 - (五)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1037)
 - 1.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
 矛盾, 矛盾的性质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 (1037)
 - 2. 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
 的矛盾, 要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 (1039)
 - 3. 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是为了团结
 全国人民向自然界开战, 发展经济和文化 (1045)
 - 4. 要正确对待和处理群众闹事, 把坏事转化为
 好事 (1045)
 - 5.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 阶级斗争还没有

- 完全结束 (1046)
- (六) 健全民主集中制, 造成一个生动活泼的
政治局面 (1048)
- (七) 加强法制建设 (1050)
- (八) 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反对官僚主义 (1052)
- (九) 加强廉政建设, 反对贪污腐败行为 (1052)
- 七、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1053)
- 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1054)
- 九、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维护祖国统一 (1055)
- (一)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决不允许搞“两个
中国” (1055)
- (二)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任何外国不得
干涉; 希望用和平的方法解决, 只在不得已
时才使用武力 (1058)
- (三) 美国侵占台澎与台湾海峡问题, 要由中美
两国通过谈判来解决 (1060)
- (四) 两岸统一后台湾可以允许保留原来的社会
制度 (1064)
- (五) 香港可以暂时不动, 迟几年再收回 (1065)
- 十、民族问题 (1066)
- (一) 实行民族平等, 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
主义 (1066)
- (二) 维护汉族和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内部的
团结 (1070)
- (三) 帮助少数民族争取解放, 发展经济和文化,
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 (1073)
- (四) 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风俗和宗教信仰,

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要慎重	(1078)
(五) 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革可以实行赎买政策	(1082)
(六) 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1084)
(七) 西藏和平解放和西藏平叛	(1086)
十一、宗教问题	(1091)
(一) 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 尊重宗教信仰自由	(1091)
(二) 宗教不能人为地取消, 也需要进行一些 改革	(1092)
(三) 要重视研究宗教, 学习宗教知识	(1094)
十二、工人、青年和妇女问题	(1096)
(一) 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	(1096)
1. 工人阶级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革命的领导 阶级	(1096)
2. 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	(1096)
3. 逐步改善职工的生活, 把工人阶级的眼前利益 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 反对片面的福利观点 ...	(1098)
4. 重视培养工人阶级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队伍	(1101)
5. 工人阶级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 ...	(1101)
(二) 青年和青年工作	(1102)
1. 中国青年在革命中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	(1102)
2. 世界是属于青年的, 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1104)
3. 青年应当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发扬 艰苦创业永久奋斗的精神	(1105)
4. 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必须同工农群众 相结合	(1107)
5. 青年人要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	(1108)
6. 团组织要善于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照顾青年	

特点开展工作	(1108)
(三) 妇女和妇女工作	(1110)
1. 妇女是中国革命中决定胜败的一个伟大力量 ...	(1110)
2. 中国妇女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伟大的人力 资源	(1111)
3. 改善和提高妇女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真正 实现男女平等	(1112)
十三、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	(1115)
(一) 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	(1115)
1. 十月革命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	(1115)
2.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 成为主流，国际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 ...	(1115)
3. 争取国际局势的缓和，辩证地看待紧张和 冷战共处	(1119)
4. 新的世界大战的两种可能性和我们的态度	(1124)
● 世界大战存在着打得起来和打不起来两种可能性， 经过努力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	(1124)
● 我们应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工作	(1128)
● 我们对世界大战的态度，第一是反对，第二是 不怕	(1128)
● 帝国主义如果发动世界大战，只能加速自己的 灭亡	(1130)
● 美国在国外的军事基地是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绞索 ...	(1132)
(二) 帝国主义的本质	(1135)
1.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1135)
2. 帝国主义侵略和扩张的本性不会改变，直至 灭亡	(1138)

3. 发动战争与和平演变，是帝国主义企图消灭社会主义的两手 (1139)
- (三) 国际反帝反霸斗争 (1141)
 1. 两个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 (1141)
 2. 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要破除迷信敢于斗争 (1147)
 3. 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决不容许帝国主义干涉、称霸 (1147)
 4. 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是平等的，决不容许以大压小以强凌弱 (1151)
 5. 支持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1152)
 6. 开展反帝反霸斗争要结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 (1157)
 7. 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战略和策略 (1159)
- (四)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1159)
 1. 外交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基础上 (1159)
 2. 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存在的问题 (1161)
 3. 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反对干涉中国内政 (1162)
 4.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外交方针——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 (1163)
 - 中国必须一边倒，站在社会主义一边 (1163)
 - 新中国的外交要另起炉灶，任何外国同新中国建交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 (1164)
 - 新中国要打扫好房子再请客，同美国迟几年建交比较有利 (1167)

-
5. 主张一切国家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168)
 6. 争取一个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 (1172)
 7. 中国永远不称霸 (1173)

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和基本矛盾

（一）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

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6页

（二）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矛盾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矛盾是永远存在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有人以为一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就十分美好，没有什么坏的东西了，这其实是一种迷信。

《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66页

我们不要迷信，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事

物都有两面：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在我们的社会里，一定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有好人，也有坏人，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正因为是这样，我们才要进行改造，把坏的东西改造成为好的东西。我们必须准备着还有坏的东西，否则一个问题出来了，就会认为不得了了。

《不要迷信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69页

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迅速地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祖国的更加美好的将来，正摆在我们的面前。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国的六亿人民正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地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的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4页

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这样，就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

矛盾。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3页

这一段只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不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说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不说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样一来，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在他们那里被否定了，辩证法在他们那里就中断了。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因为不一致，才有团结的任务，才需要为团结而斗争。如果总是十分一致，那还有什么必要不断进行团结的工作呢？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3页

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这个说法不妥当。矛盾才是动力，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矛盾的方法。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3页

（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

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他以为他那个天下稳固了。我们不要以为天下稳固了，它又稳固又不稳固。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4页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

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4—215页

必须懂得，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

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

《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势》(一九五七年七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49—550页

斯大林说雅罗申柯的经济学,是没有经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这个批评是对的。但他自己的这本书,根本不谈政治,结果成为没有政治的政治经济学。他不谈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不谈上层建筑如何适应经济基础,不谈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是一个重大的缺点。我们则搞整风,下放干部,两参一改,干部参加劳动,破除不适当的规章制度等等。

《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记录》(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十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第66—67页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认为,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分配形式三个方面。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

《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记录》(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十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第67页

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0—131页

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这三个方面。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时期内是有底的，例如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整个国民经济变成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以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还是全民所有制。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总要不断地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度，时间很长，多少万年都是同样性质的，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却有很多变化。可以设想，将来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还会有无穷的变化，但是所有制方面不会有多大变化。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5—136页

在一定时期内，即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例如我们的国营企业，解放以后，一直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而在这十年中间，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变化却是很大的。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

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5页

（四）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经过 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得到解决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3—214页

（五）社会主义社会还要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

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51—652页

社会主义会有缺点的，将来还要发展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也要分阶段。旧的制度不行了，新的制度就要起来代替。生产力总要向前发展，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这就推动着社会不断前进。

《工商业者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90页

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在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稿上加写的话》（一九五八年八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360页

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过渡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社会主义阶段的一些东西必然是要灭亡的。就是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也还是要发展的。它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吗？难道那个时候只有量变而没有不断的部分质变吗？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8页

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

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8—109页

现在我们说共产主义社会分两个阶段，即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这是马克思在当时社会发展条件下所做的科学预见。进到高级阶段以后，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一定会出现新的阶段，新的目标一定又会提出来。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下卷第706页

二、从中国国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

（一）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特点结合起来

各国应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结合起来。中国的经验，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即使是好的经验，也不一定同别的国家的具体情况相适合。照抄是很危险的，成功的经验，在这个国家是成功的，但在另一个国家如果不同本国的情况相结合而一模一样地照搬就会导向失败。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

《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64页

“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个提法好。一八四八年有一个《共产党宣言》，在一百一十年以后，又有一个“共产党宣言”，这就是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的莫斯科宣言。在这个宣言中，就讲到了普遍规律和具体特点相结合的问题。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6页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2页

（二）中国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

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的明确的认识和解决，是我党当前的重要任务。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0页

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

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古代有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现在被我们废除了，或者即将被废除，在这点上，我们已经或者即将区别于古代，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在今天，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说来，还是和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即是说，同古代近似的。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0—
1431页

我认为，中国有两条缺点，同时又是两条优点。

第一，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

第二，我们的革命是落后的。虽然辛亥革命打倒皇帝比俄国早，但是那时没有共产党，那次革命也失败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在一九四九年，比苏联的十月革命晚了三十七年。在这点上，也轮不到我们来骄傲。苏联和我们不同，一、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二、后来又有了一个十月革命。所以许多苏联人很骄傲，尾巴翘得很高。

我们这两条缺点，也是优点。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

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3—44页

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介绍一个合作社》（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五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77—178页

我们的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所谓穷就是生活水平低。为什么生活水平低呢？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什么是生产力呢？除人力以外就是机器。工业、农业都要机械化，工业、农业要同时发展。所谓“白”，就是文盲还没有完全消灭，不但是识字的问题，还有提高科学水平的问题。有很多科学项目，我们还没有着手进行。因此，我们说我们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但是，比起蒋介石统治时期，我们是前进了一步。比蒋介石时期好，但并没有解决问题。还要多少时间呢？还要几个五年计划才能基本上解决机械化的问题和工农业扩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说中国有进步，初步有些成就，但是并未根本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根本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同斯诺的谈话》（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16—217页

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目标和战略设想

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除了这些以外，还要有各种国际条件的配合。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但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看到，这个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是一定会巩固起来的。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8页

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6页

要安下心来，使我们可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你们也要安下心来，搞现代化的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

《中尼边界要永远和平友好》(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62页

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上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援助,其中主要地是苏联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3—1434页

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到那时,是不是就很伟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9页

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虚夸和骄傲，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

《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50页

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我们的任务要求我们必须很好地处理我国人民内部的关系——特别是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很好地处理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同时，必须很好地继续发展同伟大的先进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亲密合作，也要发展同资本主义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合作。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90页

我们现在是处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六万万人口的东方国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家基本上工业化，并且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决不会不遇到困难的，如同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所曾经遇到过

的许多困难那样，也许还会要遇到比过去更大的困难。但是，同志们，我们共产党人是以不怕困难著名的。我们在战术上必须重视一切困难。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困难，我们都要采取认真对待的态度，创造必要的条件，讲究对付的方法，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将它们克服下去。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92—393页

有人问，将来的趋势如何？趋势就是：大约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据我看，就是这么个趋势。不过还可以加一点，在上一次党的代表会议上也讲过了，大约在五十年到七十五年的时间内，就是十个五年计划到十五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可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结论（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

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现在已不存在障碍中国发展的力量。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将来这种状况会改变的，可是这已不是我这一辈的事，也不是我儿子一辈的事。

《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24页

事物总是发展的。一九一一年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

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纪念孙中山先生》（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56—157页

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两千万吨钢，再过十五年，可能爬到年产三千万吨钢。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吗？那末，在十五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

《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25—326页

苏联的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现在还没有超过美国，我们则差得更远。人口虽多，但是劳动生产率远远比不上人家，还要继续紧张地努力若干年，分几个阶段，把我们的国家搞强大起来，使我们的人民进步起来。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4页

我们的国家还是个穷国，要搞得好一些至少要几十年。蒙

哥马利元帅说需要五十年时间。我说至少要五十年到一百年，一个世纪不算长，欧洲、美洲花了几个世纪才到今天的程度，我们用一个世纪超过就算好了。

《同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和王后的谈话》（一九六一年十月五日），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80页

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你们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十六世纪不算，那还是在中世纪。从十七世纪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在十七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发展资本主义了，经过三百多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现在这个样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1—302页

我国现在正在进行建设，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用几十年。对整个非洲来说，要赶上西方国家的水平，也要几十年。如果我

们几十年能赶上，就算很快了。西方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都有几百年的建设历史。它们几百年建成这个样，我们几十年赶上，时间不是并不那么长吗？我们要有信心。

《反对外来干涉，实行八项原则》（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526 页

四、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

(一) 正确处理十大关系，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十大关系：

- (一) 重与轻、农关系
- (二) 沿海与内地关系
- (三) 经济与国防关系
- (四) 国家与生产单位（工厂、合作社）与个人关系
- (五) 中央与地方关系
- (六) 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
- (七) 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及其他人关系（长期共存）
- (八) 敌我关系
- (九) 人民内部关系（是非关系），一家与百家关系（百家争鸣）
- (十) 中国与外国关系

《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提纲）》（一九五七年二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314—315页

最近几个月，中央政治局听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从中看到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综合起来，一共有十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

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

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
第23—24页

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这些矛盾在实践中是否能完全处理好，也要准备两种可能性，而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但是，像我们常说的那样，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
第44页

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在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
第369—370页

（二）从六亿人口出发，统筹兼顾， 适当安排

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在延安的时候，就采取这个方针。……现在是我们管事了。我们的方针就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包括把国民党留下来的军政人员都包下来，连跑到台湾去的也可以回来。对反革命分子，凡是不杀的，都加以改造，给生活出路。民主党派保留下来，长期共存，对它的成员给予安排。总而言之，全国六亿人口，我们统统管着。比如统购统销，一切城市人口和农村里头的缺粮户，我们都管。又比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对那些全家没有人就业的，还要救济，总以不饿死人为原则。所有这些，都是统筹兼顾。这是一个什么方针呢？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战略方针。实行这样一个方针比较好，乱子出得比较少。这种统筹兼顾的思想，要向大家说清楚。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86—187页

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我们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在蓬勃地发展着，成绩很大，但是，在目前社会大变动的过渡时期，困难问题还是很多的。又发展又困难，这就是矛盾。任何矛盾不但应当解决，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决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我这样说，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呢？当然不是。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他们是能够想出很多好的办法来的。而这也就包括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我们应当指导社会团体和各地群众这样做。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7—228页

（三）增产节约，勤俭建国

为了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就要付出很多的资金，而资金的来源只有增产节约一条康庄大道，这是应为全党同志所明白了解的。因此，中央于一九五一年十月召开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决定了这一方针；并于同月至十一月一日经过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通过了这一方针。……必须认识：这一方针不是消极的，而是具有重大积极意义的。它是既保证朝鲜战争能够胜利又保证国内物价继续稳定的方针，它是积累资金、取得经验、加速国家经济建设的方针，它又是整肃党纪、提高工作效率和转移社会风气的方针，总而言之，它是带动我们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全局都将迅速进步，并奠定将来伟大建设基础的方针。

《实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07—208页

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几十年以后也需要执行勤俭的原则，但是特别要提倡勤俭，特别要注意节约的，是在目前这几十年内，是在目前这几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47页

任何社会主义的经济事业，必须注意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设备，尽可能改善劳动组织、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实行劳动竞赛和经济核算，借以逐年降低成本，增加个人收入和增加积累。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61—462页

要提倡勤俭持家，勤俭办社，勤俭建国。我们的国家一要勤，二要俭，不要懒，不要豪华。懒则衰，就不好。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结论（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

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发动一个增产节约运动。增产必须在原料有保证和社会需要的条件下进行，同时必须保证质量和减少工伤事故。节约是有希望的，必须在不降低质量和减少工伤事故的条件下讲求节约。在企业、事业和行政开支方面，必须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作风，厉行节约。在生产和基本建设方面，必须节约原材料，适当降低成本和造价，厉行节约。

《国家预算要保证重点建设又要照顾人民生活》（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60页

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这是一个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9页

我们必须逐步地建设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但是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业，并且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在去年十一月中共二中全会更着重地提出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方针以后，几个月来已经开始发生效果。这一次节约运动必须彻底地持久地进行。反对浪费，同批判其他缺点错误一样，好比洗脸。人不是每天都要洗脸吗？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工人、农民、手工业者，总之，我们六亿人口都要实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在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中间，现在滋长着一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苦，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这是很不好。我们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要求精简机关，下放干部，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就是克服这种危险倾向的一个方法。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40页

学会过日子。包括农村、城市，要留有余地，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增产节约。

《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七月二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81页

（四）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1. 建设社会主义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9页

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建设，都是依靠发挥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为主，以争取外国援助为辅，这一点也要弄清楚。那种丧失信心，以为自己什么也不行，决定中国命运的不是中国人自己，因而一切依赖外国的援助，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我们在肯定这一点之后，又必须肯定另一点，即应当继续努力同苏联和一切兄弟国家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同世界上一切兄弟党、人民革命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取得他们的同情和援助。如果我们不肯定这一点，那也是完全错误的。

《同兄弟国家团结一致，同一切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45页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独立自主地搞建设》（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80页

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主张,各国尽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更应当搞好。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8—129页

我们这些国家,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对外援要争取,但哪个为主,要考虑。自力更生好办事,主动。

《中尼边界要永远和平友好》(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58页

什么都靠别人,靠不住。自己要有志气,有干劲。外国援助和帮助是可以的,但不能干涉内政。

同胡志明的谈话(一九六〇年八月十日)

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5页

革命是自主,建设也是自主。当然不是不要国际援助,自力更生为主,国际援助为辅。

同越南劳动党代表团的谈话(一九六三年六月四日)

要发展自己的工业和农业。不要依靠外国。可以进口外国技术，利用外国的技术人员帮助你们训练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但是要自己搞。

《同苏丹政府友好代表团团长马哈古卜谈话纪要（节录）》（一九七〇年六月二十四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06页

2. 中国发展经济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还要同国外交流，吸收外国资本

我们没有别的本钱，只有一桩，就是老百姓。人多，地大，是我们的两桩本钱。至于建设近代化的国家，那需要很多的时间、精力。我们这类国家，如中国和苏联，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而不是国外市场。这并不是说不要国外联系，不做生意。不，需要联系，需要做生意，不要孤立。有两个基本条件使我们完全可以合作：一、都要和平，不愿打仗；二、各人搞自己的建设，因此也要做生意。

《同英国工党代表团的谈话》（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40页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帮助民族主义国家建立独立经济。

对外贸易只能起辅助作用，主要靠国内市场。

《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641页

如果中国真正赢得了独立，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四亿五千万人民的生产和消费能力

不仅仅是中国人才会对它关心的事情，而且能吸引许多国家。我国几亿人民一旦真正得到解放，他们巨大的生产潜力一旦被解放出来，并被用于各个领域的创造性活动，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全世界的文化水平。……

在我们赢得独立之后，中国将同友好国家商订互助、互利和互相同意的条约。

《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一九三六年七月、九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93页

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中国过去未能利用外国资本使中国人真正得到好处，外国资本给群众带来很少好处，或者根本没有好处。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也只有自由的中国，由于生产性经济的广泛发展，才能够偿还这种外国投资的本金和利息。

合法的外债将得到承认。凡是为建设目的和用于建设的外债，我们都将认为是合法的。我们将不承认任何“政治借款”，也不承认任何用于打内战、打红军或其用途违背整个中国人民利益的借款。我们将承认用于建设铁路、电讯、无线电、航空线，发展工业或农业，救济灾荒等等的借款。

《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一九三六年七月、九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93—394页

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如果那时英、美、法等国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如果这些国家不来打中国的话，那末，中国政府将对外来投资及外人在中国财产给以保障（付以代价）。

同美国合众社记者罗伯特·马丁的谈话（一九三九年二月）

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是不可能的。从中国境内肃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者的集中表现），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而欲达此目的，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是不可能的。……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将要犯绝大的错误。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3页

“我们要做生意。”完全正确，生意总是要做的。我们只反对妨碍我们做生意的内外反动派，此外并不反对任何人。大家须知，妨碍我们和外国做生意以至妨碍我们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不是别人，正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团结国内国际的一切力量击破内外反动派，我们就有生意可做了，我们就有可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了。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3页

你们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其范围和数量要有一个大概的计算。

《对苏贸易应从统筹全局出发》（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5页

只要有可能，就发展同世界上任何愿意和我们往来的国家的通商贸易关系。

《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六年八月、九月），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150页

中国不仅要自己料理自己，自己过生活，还应该对别的国家和民族进行帮助，对世界有些益处。同别的国家一样，不仅要为自己而且还要对世界做些贡献。和别的国家互相帮助，发展经济关系，尤其是我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之间互相了解、交流经验，很有必要。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

《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日），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71页

3. 禁运和封锁是坏事，但可以激发我们自力更生克服困难

封锁这件事，除了它的消极的坏处一方面之外，还产生了一个积极的方面，那就是促使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而其结果则居然达到了克服困难的目的，学得了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古话，对于我们，是完全自觉地被理解的。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节选）》（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62页

美国现在搞禁运，我们愿意它搞。它不禁运，我们就要同它搞贸易，就要同英国、法国、西德等等国家都搞贸易，但是由于经济落后，我们还拿不出东西同它们搞。当然我们的口号是反对禁运，它搞禁运我们就骂它，这也是外交攻势。到第二个或第三个五年计划后它解除禁运时，那我们就会有些东西同

它搞贸易，到那时我们可以同它建立关系。

《中国外交方面的某些政策问题》（一九五七年三月、九月），《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87—288页

4. 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先进经验为我所用

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

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着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个斤斗，像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比如，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1—42页

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现在，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
第43页

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问题我们也应当研究，以便达到知己又知彼的目的。他们的技术科学，只要是对于我们有用的，我们也应当学习。

《对彭德怀在中共八大发言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193页

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要善于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兄弟党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

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17页

完全不错，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主要的还是要学苏联。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42页

世界各国，什么地方有好东西，统统学来。这是件好事。外国有好东西为什么不学？学了究竟有好处，还是有坏处？这是讲学好东西，包括苏联的经验在内，是学他们的好经验，学我们用得着的东西。可是，有时也学了一些我们用不着的东西。这个责任不能由苏联专家担负，而应由我们自己担负。这是指对苏联经验随便硬搬，十个指头中间有一个指头学得不对。我们提出的口号是学习先进经验，但也把一部分不适合中国的经验学来了。这也有一个好处，不适合的经验我们再改进，这样就能得到一个比较正确的经验。一个国家总有它的特点，不适合这个特点就行不通。

《要学习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一九五八年四月二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13页

每个民族都有长处，都有缺点。你们的国家也是这样。柬埔寨也有许多长处。所以要学习每个民族的长处，不管这些民族的大小。同这些国家互相交流经验，这样比较好。……

我不是反对西方的一切，而只是反对那些帝国主义压迫人、欺侮人的东西。它们的文化科学我们要学习。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要在破除迷信的条件下学习西方。

《中尼边界要永远和平友好》（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58—159页

5. 学习和借鉴苏联的经验

我们要进行伟大的五年计划建设，工作很艰苦，经验又不够，因此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我们现在学习苏联，广泛地学习他们各个部门的先进经验，请他们的顾问来，派我们的留学生去，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应该采取真心真意的态度，把他们所有的长处都学来，不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且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一切我们用得着的，统统应该虚心学习。对于那些在这个问题上因不了解而产生抵触情绪的人，应该说服他们。就是说，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三年二月七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63—264页

我们工作中间还有些问题需要谈一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页

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它有许多东西我们可以学。当然，是要学习先进经验，不是学习落后经验。我们历来提的口号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谁要你去学习落后经验呀？有一些人，不管三七二十一，连苏联人放的屁都是香的，那也是主观主义。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91页

对苏联的东西还是要学习，但要有选择地学，学先进的东西，不是学落后的东西。对落后的东西是另一种学法，就是不学。他错误的东西，我们知道了，就可以避免犯那个错误。他那些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一定要学。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有益的东西，我们都要学。找知识要到各方面去找，只到一个地方去找，就单调了。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92页

苏联的建设经验是比较完全的。所谓完全，就是包括犯错误。不犯错误，那就不算完全。学习苏联，并不是所有事情都硬搬，教条主义就是硬搬。我们是在批评了教条主义之后来提倡学习苏联的，所以没有危险。延安整风以后，“七大”以后，我们强调学习苏联，这对我们是不吃亏的，是有利的。在革命这方面，我们是有经验的。在建设这方面，我们刚开始，只有八年。我们建设的成就是主要的，但不是没有错误。错误将来还要犯，希望少犯一点。我们学习苏联，要包括研究它的错误。研究了它错误的那一方面，就可以少走弯路。我们是不是可以

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事情很明显，在十月革命以后，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忽视或者不认真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不认真研究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且按照本国的具体条件，有分析地、创造性地利用这些经验，那末，他就不能通晓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就不能正确地解决本国的革命和建设的问题；那末，他就会或者陷入教条主义的错误，或者陷入修正主义的错误。我们需要同时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而在目前，反对修正主义的倾向尤其是迫切的任务。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15页

要使我们的同志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样迷信。对苏联经验，一切好的应当接受，不好的应当拒绝。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70页

在与自然界作斗争方面，我们的第一个先生是苏联，我们首先要学习苏联，但是美国也是我们的先生。

《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日)，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72页

6. 学习外国经验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独创相结合，不能照抄照搬

我们要向先进的国家和民族学习，学习对本民族有用的东西，但不是所有的方面都要学别的民族，而要保持本民族的特点。

《同达赖喇嘛的谈话》（一九五五年三月八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13页

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像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77页

我们信仰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我们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不是硬搬苏联的经验。硬搬苏联经验是错误的。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和农业的合作化是跟苏联不同的。

《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76页

国际方面，要和苏联、一切人民民主国家及各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友好，讲国际主义，学习苏联及其他外国的长处，这是一个原则。但是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精神，学习与独创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
第366页

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教训就是理论和实践相脱离。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这个道理没有运用到经济建设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唯物论;二者是对立的统一,也就是辩证法。为什么硬搬,就是不讲辩证法。苏联有苏联的一套办法。苏联经验是一个侧面,中国实践又是一个侧面,这是对立的统一。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不是择其善者而从之。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
第366页

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重工业工作、计划工作、银行工作和统计工作方面,特别是重工业和计划方面,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统计几乎全部是抄苏联的。教育方面搬得也相当厉害,例如五分制、小学五年一贯制等,甚至不考虑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卫生工作也搬,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鸡蛋,不能喝鸡汤,因为苏联有一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和喝鸡汤,后来又说能吃了。不管人家的文章正确不正确,中国人都听,都奉行,总是苏联第一。商业搬得少些,因为中央接触较多,批转文件较多。轻工业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也少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农业合作化未受教条主义影响,因为中央直接抓,中央这几年主要抓革命和农业,商业也抓了一点。

各个部门存在教条主义的情况不同，需要分析比较，找出原因。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68页

要学苏联，不是硬搬，而是有选择的学，一定要将一切有用的东西都学来，无用的东西则反面学，以我为主，不是盲从。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一九五八年五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97页

必须认真学马、学苏。不学，少学，不认真学，都是错误的。好的，坏的，不好不坏的都要学。不是搬，而是分析，研究，理解。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要认真学，非学不可。

自己长了一个脑筋，为什么不独立思考。

马、列是指导，不是教条，教条论是最无出息的，最可丑的。

要产生自己的理论。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一九五八年五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203—204页

我们要学习苏联，但首先要考虑到我们自己的经验，以我们自己的经验为主。

《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89页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是总照抄。我们不懂嘛，只好抄苏联的。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我们就不照抄了，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我们自己找出了一套办法。你们也要经过这个过程。

在一个时期抄外国的，这是必要的，抄一个时期之后就不要再抄了。学生在学校受教育，就是抄教员的，几年毕业之后就成了教员。你们一定有些可以当教员的。真的，这不是假话，没有一百年到一千年都当学生的道理。我们过去当学生，现在还在当学生，如尖端科学，苏联、美国、英国有，我们没有，这就要向它们学习。

《中尼边界要永远和平友好》(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58页

苏联把专家撤走，撕毁了合同，这对我们有好处。我们没办法，就靠自己，靠自己两只手。……苏联撤走专家，到现在已经三年了，我们的工业建设搞出了许多自己的经验。离开了先生，学生就自己学。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是一条真理。过去我们就是由先生把着手学写字，从一九二一年党成立到一九三四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纲领由先生起草，中央全会的决议也由先生起草，特别是一九三四年，使我们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从那之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把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口号就是在延安整风时提出的。这个口号写进了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那里面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要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外国经验，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只能供参考。

《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一九六三年九月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38—339页

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一) 全党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努力学会做经济工作

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8页

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9页

我在一九四九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经说过：“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时间过去了八年。这八年中，革命一个接着一个，大家的思想都集中在那些问题上，很多人来不及学科学，学技术。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各级党委可以在党内事先酝酿，向干部讲清楚，但是

暂时不要在报上宣传，到七月一日以后我们再大讲特讲，因为那时候基层整风已经差不多了，可以把全党的主要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面去了。注意力移到技术方面，又可能忽略政治，因此必须注意把技术和政治结合起来。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0—351页

现在是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火。革命尚未全成，同志仍须努力。要革地球的命，现在我们只能革地球表面的命。在整风以后要准备把注意力逐渐移到搞技术革命。要认真学习，搞试验田，到工厂当学徒，要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文学等。要搞十年到十五年，第二个五年计划要学得差不多，第三个五年计划要更进一步。

《在整风以后要准备把注意力逐渐移到搞技术革命》（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党的文献》1991年第6期

过去我们在建设方面用的心太少，主要是搞革命去了。现在革命比较松了一口气，就要来搞建设，搞技术革命。

《现在革命比较松了一口气，就要来搞建设，搞技术革命》（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日），《党的文献》1991年第6期

我们真正认真搞经济工作，是从去年八月才开始的。我就是。去年八月前，主要不是搞建设，而是搞革命。许多同志都是这样，把重点放在革命、社会改革上，而不是放在改造自然界方面。

《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72页

（二）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 发展工业与发展农业同时并举

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40—241页

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

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我们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是稳定的。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4页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重工业是不是不为主了？它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但是，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

加重的结果怎么样？加重的结果，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重工业也可以积累，但是，在我们现有的经济条件下，轻工业、农业积累得更多更快些。

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

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
第24—25页

农业本身的积累和国家从农业取得的积累，在合作社收入中究竟各占多大比例为好？请大家研究，议出一个适当的比例来。其目的，就是要使农业能够扩大再生产，使它作为工业的市场更大，作为积累的来源更多。先让农业本身积累多，然后

才能为工业积累更多。只为工业积累，农业本身积累得太少或者没有积累，竭泽而渔，对于工业的发展反而不利。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0页

工业化的道路，可以和苏联有些不同。

……重工业还是优先，但走新的道路是否比苏联那样（二十一年内增加1400万吨钢）工业化速度反而快些？如果给我们二十一年（从1950—1970），是否可以基本上工业化，而不止1800万吨钢（由90万吨开始）？

这个问题我们还缺少经验，总之要有广大市场，要看六亿至八亿人口。

《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提纲）》（一九五七年二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314页

讲到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当然，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但是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现在，要着重宣传农业。

《关于农业问题》（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10页

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要把农、轻、重的关系研究一下。过去搞过十大关系，就是两条腿走路，多快好省也是两条腿，现在可以说是没有执行，或者说是没有很好地执行。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

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重工业我们是不会放松的，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如果真正重视了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安排好了轻、农，也不一定要改为农、轻、重。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现在讲挂帅，第一应该是农业，第二是工业。

《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七月二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78页

我们现在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以及其他几个同时并举。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记录》（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十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第33页

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它的社会生产也不能不断增长。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前几年东欧各国也有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统计局的材料，说我国日用品销于农村的占百分之六十三左右。不实行工农业并举，这怎么能行？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1页

我国人民现在还要像苏联那个时候一样，忍受一点牺牲，但

是只要我们能够使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都同时高速度地向前发展，我们就可以保证在迅速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适当改善人民的生活。苏联和我们的经验都证明，农业不发展，轻工业不发展，对重工业的发展是不利的。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1页

这里说到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五七年苏联的生产资料生产增长了九十三倍，消费资料生产增长了十七点五倍，问题是，九十三同十七点五的比例，是否对发展重工业有利。这么多年来，消费品生产只增长了那么一些，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又不讲“物质刺激”呢？要使重工业迅速发展，就要大家都有积极性，大家都高兴。而要这样，就必须使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轻重工业同时并举。

在农业区，我们也要搞工业。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2页

关于工农业的关系问题，要说工业向农业要求扩大市场，也要说农业向工业要求增加各种工业品的供应。要保证农民得到更多的工业品，保证农民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2页

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多为重工业创造一些积累，从长远来看，对人民是有利的。只要农民和全国人民了解到，国家在买卖农产品和轻工业品方面赚的钱是用来干什么的，他们就会赞成，不会反对。农民自己已经提出了农业支援工业的口号，就

是证明。当然，赚钱不能过分，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不能够完全等价，但要相当地等价。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2页

工业的发展当然要快于农业。但是，提法要适当，不能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否则一定会发生问题。拿我们的辽宁来说，这个省的工业很多，城市人口已经占全省人口的三分之一。过去因为总是把工业放在第一位，没有同时注意大力发展农业，结果本省的农业不能给城市保证粮食、肉类、蔬菜的供应，总是要中央从外省往那里运粮，运肉类，运蔬菜。主要的问题是农业劳动力紧张，没有必要的农业机械，使农业生产的发展受到限制，增长较慢。过去我们因为看到这里的工业多，在给他们任务的时候，总是要他们多抓工业。没有了解到，恰恰是因为那里的工业比重大，更应该注意好好地抓农业、发展农业，不能只强调抓工业。工业发展了，城市人口增加了，对农业的要求也就更多了。因此就必须使农业能够和工业得到相适应的发展。在农村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必须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更多地增加农产品的生产。

我们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所谓并举，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并不是要平均使用力量。例如，一九六〇年估计可生产钢材一千三四百万吨，拿出十分之一的钢材来搞农业技术改造和水利建设，其余十分之九的钢材，主要还是用于重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建设，在目前的条件下，这就是工农业并举了。这样做怎么会妨碍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加快

发展工业呢？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2—123页

我们把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公式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几个同时并举；每一个并举中间，又有主导的方面。例如，中央和地方，以中央为主导；工业与农业，以工业为主导。农业上不去，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东欧各国过去几年都是这样的。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4页

（三）国民经济要有计划按比例发展

1. 社会主义国家要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

人类的发展有了几十万年，在中国这个地方，直到现在方才取得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自从取得了这个条件，我国的面目就将一年一年地起变化。每一个五年将有一个较大的变化，积几个五年将有一个更大的变化。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503页

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

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统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调整。有时因为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情况，发生矛盾，破坏平衡，这就叫做犯错误。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5—216页

计划机关是什么？是中央委员会，是大区和省、市、自治区，各级都是计划机关，不只计委、经委是计划机关。计划要靠全党来搞，靠大家来搞。计划有可能搞好，有可能搞不好。正像斯大林说的，可能和现实不能混为一谈。要把可能变成现实，就必须认真研究客观经济规律，必须学会熟练地运用客观经济规律，力求制定出能够正确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计划。

《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记录》（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十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第33页

恩格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这是对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国民经济的平衡是通过危机达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平衡。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认我们对必要比例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教科书说“自发性和自流性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存在是不相容的”，可以这样说。但是不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没有自发性和自流性。我们对规律的认识，不是一开始就是完善的。实际工作告诉我们，在一个时期内，可以有这样的计划，也可以有那样的计划；可以有这些人的计划，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计

划。不能说这些计划都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实际上是，有些计划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规律，有些计划不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规律。

认为对比例关系的认识，不要有个过程，不要经过成功和失败的比较，不要经过曲折的发展，这都是形而上学的看法。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8页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使不平衡得到调节，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因为消灭了私有制，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所以就有可能自觉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个客观规律，以造成许多相对的平衡。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9页

“社会主义计划化建立在严格的科学基础上”，这个当作任务来提，是对的。问题在于能否掌握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掌握到什么程度；在于是否善于利用这个规律，能利用到什么程度。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9页

计划是意识形态。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过去我们计划规定沿海省分不建设新的工业，一九五七年以前没有进行什么新建设，整整耽误了七年的时间。一九五八年以后，才开始在这些省分进行大的建设，两年中得到很快的发展。这就说明，像计划这类意识形态的东西，对经济的发展和不断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快慢，有着多么大的作用。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9页

教科书说，“计划性意味着经常地自觉地保持着比例”。这里的“经常”、“自觉”，如果当作任务来提，是对的，但要实现这个任务是不容易的。斯大林说过，苏联的计划还不能说已经完全反映了规律的要求。

不以规律为计划的依据，就不能使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的作用发挥出来。

要经常保持比例，就是由于经常出现不平衡。因为不成比例了，才提出按比例的任务。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这种矛盾是经常的、永远存在的，教科书不讲这个观点。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要求我们按比例和综合平衡。例如，经济发展了，到处感到技术人员不够，干部太少，于是就出现干部的需要和干部的分配的矛盾，这就促进我们多办学校，多培养干部，来解决这个矛盾。

在计划工作上，什么账都不算，一切听其自然，或者四平八稳，要求丝毫漏洞也没有，这两种做法都是不对的，其结果都要破坏比例。

既然按比例和不按比例、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永远存在，这就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满足，任何时候都会有新的问题提出来要求我们解决。要使我们和人民和干部懂得这一点。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第382—383页

计划工作中的各种平衡表，也是暂时的、过渡的、有条件的，因而是相对的。不能设想，有一种平衡表是没有条件的，是永远适用的。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第 422 页

2. 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波浪式前进的，不能过急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平衡，矛盾，斗争，发展，是绝对的，而平衡，静止，是相对的。所谓相对，就是暂时的，有条件的。这样来看我们的经济问题，究竟是进，还是退？我们应当告诉干部，告诉广大群众：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虽然有下马，总是上马的时候多。我们的各级党委，各部，各级政府，是促进呢？还是促退呢？根本还是促进的。社会总是前进的，前进是个总的趋势，发展是个总的趋势。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工业要有生产节奏，农业也要有，商业、文教、政治都要有点节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是快和慢的对立的统一。在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下，波浪式地前进，这是缓和急的对立的统一，劳和逸的对立的统一。只有急和劳，就是片面性。如果专搞劳动强度，不休息，那怎么行呀？湖北有个县委书记，不看农民的情绪，腊月二十九还让修水库，结果民工跑了一半。做事总是有缓有急，是苦战和休整的统一。打仗也是有节奏的。从前打仗，两个战役之间必须有一个休整、补

充和练兵的时间，不可能一个接一个地打。但在中央苏区，那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就是反对休整，主张“勇猛果敢，乘胜直追，直捣南昌”，那怎么行呢？苦战和休整的对立的统一，这是规律，而且是互相转化的。没有一种事情不是互相转化的。急转化为缓，缓转化为急，劳转化为逸，逸转化为劳。苦战和休整，也是如此。劳和逸、急和缓有同一性，苦战和休整也有同一性。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72页

我们搞革命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曾经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怎么行？没有耐心是不行的。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40—441页

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要提高经济、文化水平，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和文化教育，需要一个过程。我们现在提出了“多、快、好、省”这个建设经济、文化的口号。可以快一点，但不可能很快，想很快是吹牛皮，你们不会相信，我也不相信。比如走路，总要花些时间。我们已经干了十年了，但是如你们所知道的，我们工业才这么一点，农业还是手工业式的，也许再有十年才会有些进步。

《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71页

教科书没有接触到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波浪式前进。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点波浪也没有，这是不可能设想的。……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

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门、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有了头年的计划，又要有第二年的计划；有了年度的计划，又要有季度的计划；有了季度的计划，还要有月计划。一年十二个月，月月要解决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计划常常要修改，就是因为新的不平衡的情况又出来了。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0—121页

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这同人走路一样，走一阵要休息一下。军队行军有大休息、小休息，劳逸结合，有劳有逸。两个战役之间也要休息整顿。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36页

3. 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

全国的平衡还是需要的。有一个同志讲，地方要有独立性，同时还要有全国的平衡，我看这句话很好。有一些事情地方是不享有独立性的，只有国家的统一性；另一些事情地方是享有独立性的，但也还需要有全国的平衡，没有全国的平衡，就会搞得天下大乱。……还是要有全国的平衡，没有平衡，没有调剂，我们全国的大工业、全国的工业化就搞不起来。我们在讲地方的独立性、讲地方独立自主的时候，要注意不要走向极端，偏到另一方面去了。当然，在现在地方缺少独立性的时候，强调一下地方的独立自主，是很有必要的。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55—56页

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比如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钢、铁等种种东西，缺一样就不能综合平衡。我们有些人办事时总是忘了一两个条件。比如炼铁，没有耐火砖不行，于是他们就把原来做盘子用的陶土拿去搞耐火砖，这样盘子就不够了，因此就要到另外地方去找耐火材料，把原来的陶瓷生产恢复起来。这个事情是很复杂的，每个行业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工业、农业、商业、交通事业都可能碰到。

《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日），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73页

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

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

《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七月二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80页

要经常保持比例，就是由于经常出现不平衡。因为不成比例了，才提出按比例的任务。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这种矛盾是经常的、永远存在的，教科书不讲这个观点。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要求我们按比例和综合平衡。例如，经济发展了，到处感到技术人员不够，干部太少，于是就出现干部的需要和干部

的分配的矛盾，这就促进我们多办学校，多培养干部，来解决这个矛盾。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9—120页

4. 人类本身的生产要与社会生产相适应，实行计划生育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12页

过去有些人批评我们提倡节育，但是现在赞成的人多起来了。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

《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53页

中国人多也好也坏，中国的好处是人多，坏处也是人多。

同全国学联负责人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四日）

我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8页

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我看人类是最不会管理自己了。工厂生产布匹、桌椅板凳、钢铁有计划，而人类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了，这是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中国六亿人口，增加十倍是多少？六十亿，那时候就快要接近灭亡了。……关于这个问题，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或者设一个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

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在这里，我想提一下我国的人口问题。我国的人口增加很快，每年增加的，大约在一千二百万以上。在许多人口稠密的城市和乡村，要求节制生育的人一天一天多起来了。我们应当根据人民的要求，作出适当的节制生育的措施。这个工作的推行，应当得到人民的自愿合作。

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控制在六亿人口（控制一个时期少增长，以待条件具备，再作适当增长）。

《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作结束语的提纲》（一九五七年三月一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362页

我们靠精耕细作吃饭，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我看一个

人平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足够吃。当然，还是要节制生育，我不是来奖励生育。

《关于农业问题》（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07页

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可行的。

《关于农业问题》（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08页

抓人口问题恐怕也是三年试点，三年推广，四年普遍实行。行不行？十年不搞，将来又增加八亿。来个十年计划，三年宣传试点，再有三年推广，过去六年了，还剩下四年，就普及推广，看可能不可能？……在多数地方，在那个人多的地方，逐步试点、推广和普及，逐步达到计划生育。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我主张中学要上课，要教育怎么样生孩子，怎么样养孩子，怎么样避免生孩子，要生就生，要生就不要生。人类在这上头完全是无政府，自己不能控制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将来要达到完全能够控制自己，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大家合群，不大家同意，是不可行的。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人类还不能掌握这个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几亿人口还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我看要搞到七亿人口，就会紧张起来。……要做宣传，要尽可能做宣传。我是赞成节育的，并且赞成有计划地生育的。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四) 发展商品生产，按价值规律办事

1. 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扩大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能过早废除

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我们的经济学家不喜欢经济学，苏联也是这样，认为谁说到价值法则谁就不名誉似的，表现在雅罗申柯写的一封信上。这些人不赞成商品生产，以为苏联已经是共产主义了，实际上还差得很远。我们搞社会主义只有几年，则差得更远。

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时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我们在一九五〇年也曾有过这种危险。现在运输情况不好，出现半断流的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

提高生活。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34页

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这方面，斯大林讲了许多理由。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方面呢？有就限制它嘛！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35页

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印度的铁路、纺织比中国发达。去年我们生产粮食三千七百亿斤，其中三百亿斤作为公粮，五百亿斤作为商品卖给国家，两项合起来商品粮还不到粮食总产量的四分之一。粮食以外的经济作物也很不发达，例如茶、丝、麻、烟都没有恢复到历史上的最高产量。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否则公社发不出工资。例如河北省分三种县，一种只够吃饭，一种需要救济，一种除吃饭外还能发点工资。发工资又分几种情况，有的只能发几角钱。因此，每个公社在生产粮食以外还要发展能卖钱的东西，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产品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35—436页

恩格斯曾经说过，“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产品在旧社会对人是有控制作用的。斯大林对恩格斯的这个公式所作的分

析是对的，斯大林说：“恩格斯在他的公式中所指的，不是把一部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而是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即不仅把工业中的生产资料，而且也把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都转归全民所有。”“恩格斯认为，在这样的国家中，在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同时，还应该消除商品生产。”现在我们的全民所有是一小部分，只占有生产资料和社会产品的一小部分。只有把一切生产资料都占有了，才能废除商业。我们的经济学家似乎没有懂得这一点。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38页

劳动、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统统是农民的，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的，因此产品也是公社所有。他们只愿意用他们生产的产品交换他们需要的商品，用商品交换以外的办法拿走公社的产品，他们都不接受。……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是共产主义者要考虑的。必须在产品充分发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同志们，我们建国才九年就急着不要商品，这是不现实的。只有当国家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可能使商品经济成为不必要而消失。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40页

工农商并举，提得很好，一定要这样做。贬低商业，商不挂帅，工农两业是不会发展的。

《发展商业和副食品生产》（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69页

人民公社应该按照满足社会需要的原则，有计划地从两方面发展生产，既要大大发展直接满足本公社需要的自给性生产，又要尽可能广泛地发展为国家、为其他公社所需要的商品性生产。通过商品交换，既可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又可以换回等价物资，满足公社生产上和社员生活上日益增长的需要。如果公社只搞自给性生产，不搞商品生产，不进行商品交换，农民不把粮食等农产品和工人生产的工业品交换，那么工人怎么能有饭吃，农民怎么能够有衣穿，怎么能够得到拖拉机等农业生产资料？如果公社不把自己多余的产品卖给国家，卖给其他公社，怎么能够得到货币收入，哪里有钱分给社员？京、津、沪郊区农村之所以比较富裕，是因为这些地方商品生产比较发展，商品交换比较发达。社会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社员的需要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公社的生产不可太单调，不能只生产自己需要的东西。在发展自给性生产的同时，要多搞商品生产，要尽可能多地生产能够交换的东西，向全省、全国、全世界交换。

《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记录》（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十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第38—39页

现在，我们的国家只占有了一部分生产资料，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就想立刻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想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物资调拨。这样做，就是剥夺农民。斯大林分析恩格斯的话是对的。只有国家把一切生产资料都占有了，社会的产品十分丰富了，才有可能废除商业，商品交换才能过渡到产品交换。

《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记录》（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十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第40页

我们国家能够调拨的产品，只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生产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公社的集体农民，只愿意用他们生产的商品来换取他们需要的商品。所有权还在他们那里，你不给他东西，不给他货币，不用买卖的形式同他们进行交换，他们就不愿意把东西让给你。……我们要看到农民确有共产主义精神，但不要只看到这一面，还要看到人民公社的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他们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还是集体所有。

《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记录》（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十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第54页

我们才九年，就急着不要商品，这种主张是不对的。只有当一切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了，只有当社会产品大为丰富了，而中央组织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有可能使商品经济不必要而消失。相反，只要两种所有制没有变成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商品生产就还不可能废除，商品交换也还不可能废除。在两种所有制存在的时间内，必须经过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去引导农民大大发展社会生产，……

《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记录》（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十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第56页

只要还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

《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记录》（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十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第57页

这段里关于商品存在的条件，阐述得不完整。两种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

《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记录》（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十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第58页

2. 不能把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同样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和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我以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果木、皮毛。现在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把陕西的核桃拿来吃了，一个钱不给，陕西的农民肯干吗？把七里营的棉花无代价地调出来，会马上打破脑袋。这是不认识五亿农民，不懂得无产阶级对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37—438页

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我国还有没有资本家剥削工人？没有了，为什么还怕呢？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斯大林的话完全正确，他说：“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主的东西。”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当时已经有了商品生产的意思。……在奴隶时代商品生产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斯大林说，商品生产“替封建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斯大林的这一说法不很准确，应该说：封建社会这个母胎中已经孕育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上，我的报告中就说到限制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问题，对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不是漫无限制地任其泛滥。从一九五〇年开始，我们让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发展了六年之久，但同时已经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对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一九五六年，他们实际上空手过来了，斯大林所说的“一切决定性的经济条件”，我们已经完全有了。斯大林说：“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这句话很重要。已经把鬼吃了，还怕鬼？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把五亿农民引导到全民所有制。商品生产是不是有利的工具？应当肯定说：是。为了五

亿农民，应当充分利用这个工具发展社会主义生产。要把这个问题提到干部中进行讨论。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39—440页

“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这个说法对。我国现在的情况是，已经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已经把资本家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现在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国家和人民公社，这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有本质差别的。现在我们有些同志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怕商品干什么？不要怕。因为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有工人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有各级党组织，有成千成万的党员，有广大的贫下中农作为我们的依靠，我们可以发展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记录》（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十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第48—49页

3.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一部分生产资料也是商品

限于个人消费品吗？不，在我国，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具也是商品。是否会导致资本主义呢？不。

《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注》（一九五八年），《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第18页

“生产资料不是商品”，我们是，又不是。生产资料在我们还有一部分是商品。现在，我们的国家只占有了一部分生产资

料,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就想立刻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想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物资调拨。这样做,就是剥夺农民。

《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记录》(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十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第40页

斯大林说,苏联的“特种的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这看来很不妥当。它的活动范围不限于个人消费品,在我国,有些生产资料,例如拖拉机等生产资料是属于商品的。

《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记录》(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十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第59页

斯大林根据商品是一种可以转让所有权的产品这个理由,说苏联的生产资料不能列入商品的范畴,这值得研究。在我们这里,很大一部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就是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调拨的产品。也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我们不仅把拖拉机等农业生产资料卖给公社,而且为了公社办工业,把一部分工业生产资料卖给公社。这些产品,都是商品。国家卖给人民公社以后,它的所有权转让了,而且在公社与公社之间,还可以转让这些产品的所有权。

《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记录》(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十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第63页

4. 要利用价值法则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所有的经济单位（包括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都要利用价值规律，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便不断地改善经营管理工作，合理地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以利于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

《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记录》（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十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第59—60页

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一个公社竟可以将原高级社的现金收入四百多万元退还原主，为什么别的社不可以退还呢？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

《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一九五九年三月、四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4页

算账才能团结；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一身清净；算账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账才能教会五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一九五九年三月、四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5页

5. 不能剥夺农民，坚决纠正“共产风”

斯大林说，有一种“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应当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我国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只会使台湾高兴。我们在一九五四年犯过点错误，征购粮食太多了，全体农民反对我们，人人说粮食，户户谈统购，这也是“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不知道农民手里到底有多少粮。这还是征购，只是过头了一点，农民就反对。曾经有过这种经验，犯过这种错误，后来我们就减下来了，决定只征购八百三十亿斤。现在农民的劳动，同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种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料等）一样是他们自己所有的，因此有产品所有权。不知道什么道理，我们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显然把这些问题忘记了。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38—439页

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所谓“共”各种“产”，其中有各种不同情况。有些是应当归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公共事业所需要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要的刀锅碗筷等。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了社的，如鸡鸭和部分的猪归社而未作价。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

人劳动成果的情况。当然，这里面不包括公共积累、集体福利、经全体社员同意和上级党组织批准的某些统一分配办法，如粮食供给制等，这些都不属于无偿占有性质。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看看我们的历史吧。我们只是无偿剥夺了日德意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和地主的一部分房屋、粮食等生活资料。所有这些都是侵占别人劳动成果，因为这些被剥夺的人都是不劳而获的。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我们没有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是实行赎买政策。因为他们虽然是剥削者，但是他们曾经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现在又不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采取赎买政策，就使我们在政治上获得主动，经济上也有利。同志们，我们对于剥削阶级的政策尚且是如此，那末，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节选）》（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13页

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彻底纠正“五风”》（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20页

退赔问题很重要，一定要认真退赔。大多数都要由各地自己退赔，县、社一定要拿出一部分实物来退赔，现在拿不出实物的，可以给些票子，这就叫兑现。十二条已经向农民讲了，现在农民鼓着眼睛看着我们能不能兑现，不兑现不行。在两三个月内把兑现问题解决了，农民积极性就来了。

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几间茅屋能办公就行。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它不是白手起家的，是“黑手”起家的。所有县、社的工业，房屋，其他财产等，凡是平调来的，都要退赔，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县、社干部可能会不满意，但是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群众，得到农民满意，得到工农联盟。我们在井冈山时期红四军的布告中就讲平买平卖，“八项注意”中就有买卖公平这一条。平买平卖就是等价交换。我们历来主张买卖公平，等价交换。

《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27页

公社在短短时间内，搞来了那么多东西，怎么搞来的？那不是白手起家的，要坚决退赔。县、社两级和有关部门都要退赔，有实物退实物，有钱退钱。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副食品基地，我们都同意过。几个大办一推行就成了一平二调。县、社干部不满意不要紧，我们得到了农民群众的满意，就得到了一头。机关、学校、工厂、部队，谁平调了谁赔。社、县、省这一头赔了，少了，那一头就有了；这一头空了，那一头就实了。那一头就是几亿农民。要纠正“共产风”，就要真兑现，不受整、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苦一下、痛一下，这样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一平二调是上面搞出来的，谁搞谁负责。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

退赔也要有界限，在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副食品基地等方面，要由国家退赔一部分。应当由国家退赔的，不能让县、社赔。退赔要让县、社两级干部思想上搞通，不通就不能改正。

这几年我们有些东西搞多了，搞快了，自己挨整是必要的。现在看来，建设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

看来“五风”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产风”和瞎指挥风。首先要把它们整掉。究竟哪些是生产瞎指挥风要搞清楚，不然就会变成无指挥、无计划。

《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27—228页

“共产风”必须反，不能掠夺农民，这是马列主义不许可的。

《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30页

无产阶级不能剥夺劳动者，不能剥夺农民和城市小生产者，只能剥夺剥夺者，这是一条基本原则。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是剥夺劳动人民的，他们使那些小生产者破产，才有了无产阶级。他们剥夺的方法比我们一些人“高明”一点。他们是逐步逐步地使小生产者欠账、破产，而我们一些人是一下子就把人家的东西拿过来。用这种方法来建立社有经济、国有经济是不行的。比如收购农副产品压级压价，非常不等价，搞得太凶，脱离群众。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34—235页

（五）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平均主义和过分悬殊

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这样两个原则，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内人们决不能不严格地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

《对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六二年一月十日、二十四日、二月二十三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8页

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红军人员的物质分配，应该做到大体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饷平等，因为这是现时斗争环境所需要的。但是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因为这不是斗争的需要，适得其反，是于斗争有妨碍的。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91页

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则见之于物质生活方面罢了。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91页

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

的。我们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

《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9页

平均主义的薪给制抹杀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差别，也抹杀了勤惰之间的差别，因而降低劳动积极性，必须代以计件累进工资制，方能鼓励劳动积极性，增加生产的数量与质量。军工生产暂时不能实行计件工资制，亦应有计件奖励制度。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节选）》（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64页

穷队富队拉平的平均主义分配办法，是无偿占有别人的一部分劳动成果，是违反按劳分配原则的。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一九五九年二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62页

我以为，产品本来有余，应该向国家交售而不交售的这种本位主义确实是有的，犯本位主义的党员干部是应该受到批评的，但是有很多情况并不能称之为本位主义。即令本位主义属实，应该加以批评，在实行这种批评之前，我们也必须首先检查和纠正自己的两种倾向，即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同

时，许多公社和县从生产队抽取的积累太多，公社的管理费又包括很大的浪费，例如有一些大社竟有成千工作人员不劳而食或半劳而食，甚至还有脱产文工团。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节选）》（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页

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0页

（六）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生产与生活的关系

我们的重点必须放在发展生产上，但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二者必须兼顾。福利不可不谋，不可多谋，不谋不行。现在，不顾人民生活，不顾人民死活的干部还不少。贵州有一个团曾经占了农民的大量田地，这是严重侵犯人民利益的行为。不顾人民生活是不对的，但是重点还是要放在生产建设上。

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二日）

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

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

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页

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低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但是就是这样，如果粗心大意，也还

是会犯这种或那种错误。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

合作社同农民的关系也要处理好。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得适当。合作社所拿的部分，都是直接为农民服务的。生产费不必说，管理费也是必要的，公积金是为了扩大再生产，公益金是为了农民的福利。但是，这几项各占多少，应当同农民研究出一个合理的比例。生产费管理费都要力求节约。公积金公益金也要有个控制，不能希望一年把好事都做完。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
第29—30页

一九五六年的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就业有所增加，人民是高兴的。但是，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是渐进的，支票不可开得过多。过高的要求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开地反复地解释。

《国家预算要保证重点建设又要照顾人民生活》（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59页

钱和材料只有这样多，一九五七年的年度计划，在某些方面必须比一九五六年作适当压缩，以便既能保证重点建设，又能照顾人民生活需要。

《国家预算要保证重点建设又要照顾人民生活》（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60页

前几年建设中有一个问题，就像有的同志所说的，光注意“骨头”，不大注意“肉”，厂房、机器设备等搞起来了，而市政建设和服务性的设施没有相应地搞起来，将来问题很大。我看，

这个问题的影响，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也许还在第三个五年计划。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合作社的积累和社员收入的比例，也要注意。合作社要利用价值法则搞经济核算，要勤俭办社，逐步增加一点积累。今年如果丰收，积累要比去年多一点，但是不能太多，还是先让农民吃饱一点。丰收年多积累一点，灾荒年或者半灾荒年就不积累或者少积累一点。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0页

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1页

很值得注意，是一个带全国性的问题，注意工作，忽视生活，必须立即引起全党各级负责同志，首先是省、地、县三级的负责同志的注意，方针是：工作生活同时并重。

《关于工作、生活同时并重方针的批语》（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530页

生产和生活两方面，必须同时抓起来。不抓生活，要搞好

生产是困难的。生产好，生活好，孩子带得好，这就是我们的口号。

《对谭震林、廖鲁言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情况报告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541页

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一个教训》（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51—452页

这本书在谈到物质利益的时候，不少地方只讲个人的消费，不讲社会的消费，如公共的文化福利事业。这是一种片面性。我们农村的房屋还很不像样子，要有步骤地改变农村的居住条件。我们居民房屋的建设，特别是城市居民的房屋，主要应当用集体的社会的力量来搞，不应当靠个人的力量。社会主义社会，不搞社会集体福利事业还成什么社会主义？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下卷第475页

我们必须把安排人民生活、安排公社积累和安排国家需要

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同时统筹兼顾。这样，才算真的作到了全国一盘棋。否则所谓一盘棋，实际上只是半盘棋，或者是不完全的一盘棋。一般说来，一九五八年公社的积累多了一点。因此，各地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规定一九五九年公社积累的一个适当限度，并且向群众宣布，以利安定人心，提高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73页

人们生活的需要，是不断增长的。需要刺激生产的不断发展，生产也不断创造新的需要。人们对粮食的需要，在数量方面总不能是无限制的，但是在品种方面也会变化。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7页

我国一九五七年的积累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七，一九五八年占百分之三十六，一九五九年占百分之四十二。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是逐年增加的。可能一九五九年增加得多了一点，比重大了一些。我们过去有过一种怀疑，苏联也有这样说法，就是说，积累比重太高了有危险。这个问题要看生产增长的情况。如果生产增长得很快，在这个基础上，即使积累的比重大一些，人民生活还能够逐步改善，也可以是没有危险的。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下卷第671页

(七) 工 业

1. 发展国民经济要以工业为主导

资本主义长期着重发展轻工业。我们把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公式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几个同时并举；每一个并举中间，又有主导的方面。例如，中央和地方，以中央为主导；工业与农业，以工业为主导。农业上不去，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第171—172页

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公报》（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1962年9月29日

2. 搞工业要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

我们现在还不一般地提自动化。机械化要讲，但也不要讲得过头。机械化、自动化讲得太多了，会使人们看不起半机械化和土法生产。过去就曾经有过这样的偏向，大家都片面追求新技术、新机器，追求大规模、高标准，看不起土的、半洋半土的，看不起中小的。提出洋土并举、大中小并举后，这个偏向才克服。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5页

反对分散建设资金，如果是说建设单位搞得过多，因而都不能按期竣工，这当然是要反对的。如果因此就反对建设中小型企业，那就不对。我国新的工业基地，主要是在一九五八年大量发展中小型企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今后钢铁工业在建设一些大型基地的同时，还要建设一批中型和小型的钢铁基地。过去的中小型企业对钢铁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拿一九五九年来说，全国全年生产的生铁是二千多万吨，其中一半是由中小型企业生产的。今后中小型钢铁企业对钢铁工业的发展还要起很大的作用。许多小的会变成中的，许多中的会变成大的，同落后的会变成先进的、土法的会变成洋法的一样，这是客观发展的规律。

我们要采用先进技术，但不能因此否定落后技术在一定时期的必不可免性。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下卷第 543—544 页

我们实行这样的方针，不只是由于技术落后，人口众多，要求增加就业。我们在大型企业的主导下，大量地发展中小型企业，在洋法生产的主导下，普遍地采用土法生产，主要是为了高速度。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第 204—205 页

在工业建设方面，搞小型企业，土法生产，这两条首先是钢铁工业部门提出来的，也是他们首先实行的。目的是为了多搞钢铁。“十大关系”中还没有这两条，但是中央和地方同时并

举这个方针，已经包含了这方面的因素。实行这个方针，就必然引出大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洋法土法生产同时并举这两条来。因为要发挥地方积极性，开始时主要靠中小企业和土法生产。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下卷第 719 页

3. 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所谓沿海，是指辽宁、河北、北京、天津、河南东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在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也没有犯大的错误，只是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这要改变一下。

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不说十年，就算五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等第五年打起来再搬家。从现有材料看来，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和积累一般都很快，全部投产以后，四年之内，除了收回本厂的投资以外，还可以赚回三个厂，两个厂，一个厂，至少半个厂。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做？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

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

这不是说新的工厂都建在沿海。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至于沿海原有的轻重工业的扩建和改建，过去已经作了一些，以后还要大大发展。

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所以这这也是一个对于发展内地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
第25—26页

4. 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中央要发展工业，地方也要发展工业。就是中央直属的工业，也还是要靠地方协助。至于农业和商业，更需要依靠地方。总之，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

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
第31页

中央的部门可以分成两类。有一类，它们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有一类，它们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定工作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由地方去处理。

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拿我们自己的经验说，我们建国初期实行的那种大区制度，当时有必要，但是也有缺点，后来的高饶反党联盟，就多少利用了这个缺点。以后决定取消大区，各省直属中央，这是正确的。但是由此走到取消地方的必要的独立性，结果也不那么好。我们的宪法规定，立法权集中在中央。但是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办法，宪法并没有约束。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不是高岗的那种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
第31—32页

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

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够框得太死。当然，也要告诉下面的同志哪些事必须统一，不能乱来。总之，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这种从全国整体利益出发的争权，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的争权，不能叫做地方主义，不能叫做闹独立性。

省市和省市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地方和地方的关系，也要处理得好。我们历来的原则，就是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2—33页

我们党有这么一段历史，要想一想这段历史。曾经有很集中的时期，那就是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也曾经有很分散的时期，不应当分散的也分散了，那就是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那个时期地方的权力太大了，有一段时间事实上等于没有中央了，后头才逐步纠正过来，这是完全必要的。记得有一次会议上，我一共念了八个文件，这些文件的内容是讲需要集体领导，不要分散主义。现在我们讲，过分的集中是不利的，不利于调动一切力量来达到建设强大国家的目的。在这个问题上，鉴于苏联的教训，请同志们想一想我们党的历史，以便适当地来解决这个分权、集权的问题。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52页

都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实行不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权，哪些企业由谁去管，这些都是有关建设的重大问题。中央不能只靠自己的积极性，还必须同时依靠地方的积极性。过去中央有

些部门，把地方办的事业不当作自己的，只把直属的企业看成自己的，这种看法妨碍了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去年有些基本建设单位实行了投资包干制，就大大发挥了这些单位的积极性。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6—127页

在我们这里，同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但是有的由中央部门直接管，有的由省、市、自治区管，有的由地区管，有的由县管。都是全民所有制，归谁管，归哪级管，只要一个积极性还是要两个积极性，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经常注意解决的很关重要的问题。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8页

我们对各省的提法一向是：凡是自己能够生产的，就自己尽可能地发展，只要不妨碍全局。

欧洲的好处之一，是各国林立，各搞一套，使欧洲经济发展较快。我国自秦以来形成大帝国，那时以后，少数时间是分裂、割据，多数时间保持统一局面。缺点之一是官僚主义，统治很严，控制太死，地方没有独立性，不能独立发展，大家拖沓沓，懒懒散散，过一天算一天，经济发展很慢。

现在，我们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全国各省又是统一的，又是独立的。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如此。从政治上来说，各省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控制，独立地解决本省的问题；而中央的重大决议，又都是中央同各省商量，共同作出的。……从经济上来说，中央要充分发挥地方积

极性，不要限制、束缚地方积极性。我们是提倡在全国统一计划下，各省尽可能都搞一整套。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只要能就地取材，就地推销，凡能办的事情，都尽可能地去办。不能办的事情，当然不要勉强去办。这里要注意，原料供应，产品销售，地方应当服从中央的调度安排。以前曾经担心，各省都发展了各种工业，像上海这样的城市的工业品会没有人要。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我们的各种工业品并不是多了，而是还很不够。上海最近提出了向高大精尖发展的方针，他们还是大有事情可做的。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下卷第 755—756 页

5. 管理问题是所有制问题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要改善经营管理

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134 页

这里还要谈一下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比如我们现在开会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

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地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个人是这样，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也是这样。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9页

关于企业的独立自主，列宁所说的独立自主，应搞到什么程度，请大家注意研究。我想，企业无非是这样两类：一类是生产过程的企业，工业是厂矿，农业是生产合作社；一类是流通过程的企业，就是运输业和商业。这些企业应当有怎样一种独立性呢？我这里是随便这么讲，表述不是很准确，叫做要有点“独立王国”。高岗的那种独立王国当然是应该反对的。这里的所谓“独立王国”，是说要有半独立性，或者是几分之几的独立性，公开的、合法的“半独立王国”。我这个话不能上宪法，不能上党章，也不能上决议案。总之，如果因为反对独立王国就把一切独立自主都反掉了，没有一点自主权了，那事情也很难办。这个问题是很值得研究的。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53页

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4—125页

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

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不能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就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创造性合作。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9—130页

中央部门管的和地方各级管的企业，都在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具有一定的自治权。有没有这种自治权，对促进生产的发展，还是阻碍生产的发展，关系很大。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8页

（八）农 业

1.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 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工业要支援农业

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公报》（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1962年9月29日

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

首先，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吃肉吃油问题，以及其他日用的非商品性农产品问题。这个农民自给的部分，数量极大。比如，去年生产了三千六百多亿斤粮食，商品粮包括公粮在内，大约是八百多亿斤，不到四分之一，四分之

三以上归农民。农业搞好了，农民能自给，五亿人口就稳定了。

第二，农业也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商品性的农产品发展了，才能供应工业人口的需要，才能发展工业。要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商品率。有了饭吃，学校、工厂少数人闹事也不怕。

第三，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村是轻工业的重要市场。只有农业发展了，轻工业生产才能得到足够的原料，轻工业产品才能得到广阔的市场。

第四，农村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比如，化学肥料，各种各样的农业机械，部分的电力、煤炭、石油，是供应农村的，铁路、公路和大型水利工程，也都为农业服务。现在，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无论是发展轻工业还是发展重工业，农村都是极大的市场。

第五，现在出口物资主要是农产品。农产品变成外汇，就可以进口各种工业设备。

第六，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

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99—200页

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大家知道，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

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些时间，我国的钢产量仍然可能由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即一九四三年的九十多万吨，发展到二千万吨，或者更多一点。这样，城乡人民都会感到高兴。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41页

几年来偏重于工业的宣传（这在当时也对），所以在社会上大家都学工业，志愿搞工业，觉得搞工业最光荣，搞农业就认为不光荣。好处是把工业搞起来了。现在要改变一下，要宣传农业，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没有农业就没有基础，许多轻工业大部甚至全部都要依靠农业。……两支手，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业，现在要好好搞农业。

关于整风、两类矛盾等问题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九日）

粮食、钢铁、机械是三件最重要的事。有了这三件，别的也就会有。三件中，粮食及其他农产品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我们应当十分注意农业问题。

《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农业大有希望〉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280页

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党内通信》（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49页

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凡此种种，可以多收。既已多收，可以多吃（主要猪吃，部分人吃，例如菜）。

好好地精细地安排过日子。是否可以按照一九五七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一九五七年的日子不是过得还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

《粮食问题》（一九五九年七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83—84页

在这几年内抓紧检查督促，务必达到藏粮于民的目的，绝对不可以购过头粮。

《给李先念的信》（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五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436页

● 农民的情况如何，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

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我认为，情况根本上是好的。合作化完成了，这就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同个体农业经济之间的大矛盾。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9—220页

农民同盟军问题的极端重要性，革命时期是这样，建设时期仍然是这样。无论在什么时候，政治上犯错误，总是同这个问题相关联的。

《对刘少奇八大二次会议工作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三日、二十四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223—224页

2. 农林牧副渔要五业并举，综合平衡

发展多种经营，剩余劳动力就有出路了。现在的小社和初级社，对于充分地利用劳动力和诸种生产资料，还是一种束缚。到了办大社和高级社的时候，就可以冲破这种束缚，而使整个生产力和生产向前发展一大步。那时候，更加需要发展多种经营，发展为城市和为乡村服务的许多大规模的事业。这样，才能充分利用整个生产力，首先是人力。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61页

农村副业，就全国说来，一个很大的部分是为农村服务的，但是必须有一个不小的部分为城市服务和为出口服务，将来这部分可能扩大起来。问题是国家要有统一的计划，一步一步地去掉盲目性。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532页

有必要号召各农业生产合作社立即注意开展多种经营，才能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每年增加个人的收入，否则就是一个很大的偏差，甚至要犯严重错误。河北省的粮食产值只占该省全部农业产值的百分之二十八多一点，而粮食以外的农产物则占百分之七十一多一点，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数目字。河北省产棉花较多，产粮食较少，其他各省情形与此有些不同，但是粮食产值似乎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十，而粮食以外作物及副业的产值至少占百分之五十，或者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我们如果不立即注意这个问题，不论在社员的收入方面，合作社的积累方面，国家的积累方面，势必都要大受影响。

《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注意多种经营》（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67页

农业也要综合平衡，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个方面。

《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日），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73页

所谓农者，指的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平衡。蔬菜是农，猪牛羊鸡鸭鹅兔等是牧，水产是渔，畜类禽类要吃饱，才能长起来，于是需要生产大量精粗两类饲料，这又是农业，牧放牲口

需要林地、草地，又要注重林业、草业。由此观之，为了副食品，农林牧副渔五大业都牵动了，互相联系，缺一不可。

《发展商业和副食品生产》（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69页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定可以做到有菜吃，有油吃，有猪吃，有鱼吃，有菜牛吃，有羊吃，有鸡鸭鹅兔吃，有蛋吃。我们应当有志气、有决心做到这一项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伟大意义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应当有信心做到这一项事情。一切为了人民利益，望各级党委接到这个指示以后，精心筹划，立即动手办起来。不但大中城市，县城及四乡集镇都要照此办起来。各级党委要有一个专门管副食品的书记或精心从事的干部。

《对中央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九年七月三日、四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327页

农业、畜牧业的经营，还一定和各地大、中、小片各种类型的（用材林、薪炭林、其他各种经济林、防风防沙防潮林和风景林）林业经营相结合。总之农、林、牧三业要结合。

《在廖鲁言〈关于农业方面的几点意见〉上加写的话》（一九五八年三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64页

农，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业。五业中农林牧三结合对于土地的合理利用最为必要。

《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二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575—576页

苏联伟大土壤学家和农学家威廉斯强调地说，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这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为儿子了。这就是三者平衡地互相依赖的道理。美国的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我国也一定要走这条路线，因为这是证实了确有成效的科学经验。

《关于发展畜牧业问题》（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1页

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斯土壤学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种三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3页

南北各地在多少年以内，我们能够看到绿化就好。这件事情对农业，对工业，对各方面都有利。

《农业合作化的全面规划和加强领导问题》（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75页

森林是很宝贵的资源。

《同黑非洲青年代表团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83页

要发展林业，林业是个很了不起的事业。……林业，森林，草，各种化学产品都可以出。所以，苏联那个土壤学家讲，农林牧要结合。你要搞牧业，就必须搞林业，因为你要搞牧场。这个绿化，不要以为只是绿而已，那个东西有很大的产品。森林这个东西是多年生，至少是二十五年生，这是南方；在北方，要四十五年到五十年。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六日）

农业方面，除粮、菜外，饲养猪羊，解决肉食，也是很要紧的。

有些人以为喂猪浪费粮食，但是我们的经验证明，不是喂猪浪费粮食，而是不喂猪浪费粮食。一则无猪必抛弃剩饭剩菜，而这项剩饭剩菜，在大的机关及连队里是相当多的。二则吃肉少则吃饭多，吃肉多则吃饭少。故喂猪增加肉食，不但为保持健康所必需，且在经济上亦是合算的。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解放社 1944 年 1 月
订正再版第 200 页

养猪是关系肥料、肉食和出口换取外汇的大问题，一切合作社都要将养猪一事放在自己的计划内，当然省、专、县、区都应有自己的计划。猪的饲料是容易解决的，某些青草，某些树叶，番薯藤叶和番薯都是饲料，不一定要精料，尤其不一定要用很多的精料。除了合作社公养以外，每个农家都要劝他们养一口至几口猪，分作几年达到这个目的。某些少数民族禁止养猪的和某些个别家庭因为宗教习惯不愿养猪的，当然不在此内。发展养猪事业要有一套奖励办法，浙江省上华合作社的经

验可供各地参考。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59页

牲口是动力。一部分牲口是肉食奶食（老牛、菜牛、奶牛）。粪可肥田。皮、毛、骨、角，大有用处。吃肉多，吃粮少，动物蛋白优于植物蛋白，人的体格会更发展，会更健康。猪是肉食，又有肥料。在三、五、七年以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肥料的主要出路是猪，是一亩田一头猪。

《粮食问题》（一九五九年七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84页

看来，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除少数禁猪的民族以外，全国都应当仿照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的办法办理。在吴桥县，集资容易，政策正确，干劲甚高，发展很快。关键在于一个很大的干劲。拖拖沓沓，困难重重，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这些都是懦夫和懒汉的世界观，半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雄心壮志都没有，这些人离一个真正共产主义者的风格大约还有十万八千里。我劝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将不正确的世界观改过来。我建议，共产党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以及管理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党组织，将养猪业，养牛养羊养驴养骡养马养鸡养鸭养鹅养兔等项事业，认真地考虑、研究、计划和采取具体措施，并且组织一个畜牧业家禽业的委员会或者小组，以三人、五人至九人组成，以一位对于此事有干劲、有脑筋而又善于办事的同志充当委员会或小组的领导责任。就是说，派一个强有力的人去领导。

《关于发展畜牧业问题》（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0页

大搞饲料生产。有各种精粗饲料。看来包谷是饲料之王。美国就是这样办的。苏联现在也已开始大办。中国的河北省吴桥县，也已在开始办了，使人看了极为高兴。各地公社养猪不亚于吴桥的，一定还有很多。全国都应大办而特办。要把此事看得和粮食同等重要，看得和人吃的大米、小麦、小米等主粮同等重要，把包谷升到主粮的地位。

《关于发展畜牧业问题》（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0—101页

有人建议，把猪升到六畜之首，不是“马、牛、羊、鸡、犬、豕（豕即猪）”，而是“猪、牛、羊、马、鸡、犬”。我举双手赞成，猪占首要地位，实在天公地道。

《关于发展畜牧业问题》（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1页

我国的肥料来源第一是养猪及大牲畜。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如果能办到了，肥料的主要来源就解决了。这是有机化学肥料，比无机化学肥料优胜十倍。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而且猪又有肉，又有鬃，又有皮，又有骨，又有内脏（可以作制药原料），我们何乐而不为呢？肥料是植物的粮食，植物是动物的粮食，动物是人类的粮食。由此观之，大养而特养其猪，以及其他牲畜，肯定是有道理的。以一个至两个五年计划完成这个光荣伟大的任务，看来是有可能的。

《关于发展畜牧业问题》（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1页

3. 提倡科学种田，因地因时制宜，按“八字宪法”办事

要因地因时制宜。农业的地区与时间不同，发展的方法也不同。……我们指导农业，要依各种不同地区而采取不同方法，一种地区以深耕为主，另一种地区以扩大耕地面积为主。在时间上也要有分别：在有荒可开时，以奖励开荒为主；在荒地开尽时，就要转为以奖励深耕为主了。不但在大的区域之间要有分别，就是在一县、一区、有时甚至在一乡之内，也要有这种分别。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解放社 1944 年 1 月
订正再版第 18—19 页

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个高产的国家。

《关于农业问题》(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307 页

种试验田的经验，值得普遍推广。县、区、乡和合作社的领导干部，都搞那么一小块田，试验能不能达到高产，用什么方法达到高产。

《关于农业问题》(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309 页

“八字宪法”中，首先应该是“土”，第二是“肥”，“水”要放在第三位，然后是种、密、保、工、管。

关于宣传工作问题的谈话(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党内通信》（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48—49页

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党内通信》（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49页

4.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必须注意水土保持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也应予以极大的注意。

《我们的经济政策》（一九三四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32页

兴修水利是保证农业增产的大事，小型水利是各县各区各乡和各个合作社都可以办的，十分需要定出一个在若干年内，分期实行，除了遇到不可抵抗的特大的水旱灾荒以外，保证遇旱有水，遇涝排水的规划。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在合作化的基础之上，群众有很大的力量。几千年不能解决的普通的水灾、旱灾问题，可能在几年之内获得解决。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51页

一九五九年冬，全国参加搞水利的人有七千七百多万。我们要继续搞这样大规模的运动，使我们的水利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从一年、二年或者三年来看，花这么多的劳动，粮食单位产品的价值当然很高，单用价值规律来衡量，好像是不合算的。但是，从长远来看，粮食可以增加得更多更快，农业生产可以稳定增产。那末，每个单位产品的价值也就更便宜，人民对粮食的需要也就更能够得到满足。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7页

一九五九年以前，我们的农业生产，主要靠兴修水利。一九五九年我国七个省遇到很大的旱灾，如果没有过去几年的水利建设，要不减产而能增产，是不能设想的。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7页

短距离的开荒，有条件的地方都可以这样做。但是必须注意水土保持工作，决不可以因为开荒造成下游地区的水灾。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66页

在垦荒的时候，必须同保持水土的规划相结合，避免水土流失的危险。

《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稿的修改和给周恩来的信》（一九五六年一月七日——九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页

5.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改良农具运动应该推广到一切地方去，它的意义很大。这是个伟大的革命，是个技术革命的萌芽，它有伟大的意义，它带着伟大革命的性质。几亿农民在搞这个事，这个事情一搞，并不亚于机械化。同过去比较，把人力节省一倍、两倍、三倍、四倍，有到十倍的，这不是革命？这个东西一来，就否定过去的肩挑等，它是肩挑等的反面。将来走向进一步，就是搞机械化。

《改良农具运动是一个伟大的革命》（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日），《党的文献》1991年第6期

改良农具运动应推广到一切地方。

它的意义极大，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迅速有效。现代化机械与改良农具的对立统一。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一九五八年三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13页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

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党内通信》（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49页

用机械装备农业，是农、林、牧三结合大发展的决定性条件。

《关于发展畜牧业问题》（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1页

我们要实现全盘机械化，第二个十年还不行，恐怕要第三个十年以至更长的时间。在一个时期内因为机器不够，要提倡半机械化和改良农具。最近苏北发明一种挖泥的新技术，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样的办法，应该大大提倡。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5页

为了农业机械化，多产农林牧副渔等品类，要为地方争一部分机械制造权。所谓一部分机械制造权，就是大超额分成权，小超额不在内。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又此事应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否则地方有条件也不会热心去做。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

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所以，农业机械化，要同这几方面联系起来，才能动员群众，为较快地但是稳步地实现此种计划而奋斗。苏联的农业政策，历来就有错误，竭泽而渔，脱离群众，以致造成现在的困境，主要是长期陷在单纯再生产坑内，一遇荒年，连单纯再生产也保不住。我们也有过几年竭泽而渔（高征购）和很多地区荒年保不住单纯再生产的经验，总应该引以为戒吧。现在虽然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是最好地同时为国家的办法，还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老话）的口号，究竟能否持久地认真地实行，我看还是一个问题，要待将来才能看得出是否能够解决。苏联的农业不是基本上机械化了吗？是何原因至今陷于困境呢？此事很值得想一想。

《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一封信》（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427—428页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第197页

(九) 财政、金融和贸易

1.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参见第二编“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第 675—481 页)

2. 做好财政税收工作

国家的预算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里面反映着整个国家的政策，因为它规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举例说，概算草案中关于养活所有旧军队和旧公教人员的问题，这就是政策问题。人民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应该采取负责的态度，只有这样才是对人民有利的。

《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毛泽东文集》第 6 卷第 24 页

个人所得税是一切财政制度上了轨道的国家都实行的，这不但是为了国家的收入，而且是为了养成国民对于国家事业的关心的一种物质的表现。

《对薄一波关于一九五三年国家预算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三年二月九日、十三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4 册第 52 页

公债一方面是人民的储蓄，一方面又是人民对国家关心的一种表现，它是爱国主义的。

《对薄一波关于一九五三年国家预算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三年二月九日、十三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4 册第 52 页

只能是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

虑事情，要以客观规律来办事。……建设也有客观规律，搞多了，不行。就是有了钱，还是要打歼灭战。财政收入不要打得太满了，打满了危险！过去我们吃过亏，把财政收入打得满满的，把基本建设战线拖得长长的。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要说服地方同志，工业、农业、国防和其他建设事业只能搞那么多了，只有那么多钱。安排要少些，多做少说。必须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过去讲是讲了，但是没有做。这几年留了，要保持。

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时的谈话（一九六四年五月）

（另参见本编第 988—993 页）

3. 发展商业和对外贸易

（参见本编第 939—943 页，第 972—979 页）

（十）科学技术

1. 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中的改革将还是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大型的农业机器必定有所增加，但还是不很多。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的改革将是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同时并进，大型农业机器的使用将逐年增多，而社会改革则将在一九六〇年以后，逐步地分批分期地由半社会主义发展到全社会主义。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

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由于我国的经济条件，技术改革的时间，比较社会改革的时间，会要长一些。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大概需要四个至五个五年计划，即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时间。全党必须为了这个伟大任务的实现而奋斗。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38—439页

我们要摸农业技术的底。搞农业不学技术不行了。

《关于农业问题》（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09页

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帝国主义现在是处在衰落时代，我国，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处于上升的时代，世界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一九六三年九月、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40—341页

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

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科学研究有实用的，还有理论的。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要培养一批懂得理论的人才，也可以从工人农民中间来培养。我们这些人要懂得些自然科学理论，如医学方面、生物学方面。

《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51页

2. 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

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页

搞经济，我们也有了一些经验，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安排经济，对人、对资本家、对民主党派、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我们比较学会了，我们有二十二年根据地的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六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

《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01页

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

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拿汽车来说，我们这样的大国，最少应该有三四个像长春汽车厂那样的制造厂。就是在搞大的、洋的方面，我们也不能指望人家。一九五八年提破除迷信，自己动手。经过一九五九年春夏的一段反复，证明自己来搞，是可以做好的。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6页

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有可能，都应该越来越多地掌握这类为人民谋福利的新技术。

《对〈列宁主义万岁〉一文送审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六〇年四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140页

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

《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八日），《党的文献》1996年第1期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

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一九六三年九月、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41—342页

3. 重视自然科学的学习、研究和应用

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有人认为中国历来就没有自然科学,这是不对的。中国自有人类生活以来都要吃饭,要吃饭就要进行生产,就有自然科学的萌芽,后来并逐渐发达,不过过去没有把自然科学发展成为一个体系罢了。

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但是自然科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却被阻碍了它的发展,所以要改造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四〇年二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69页

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

《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四〇年二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70页

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

《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27页

要老百姓不敬神，就要有科学的发展和普及。科学不发展、不普及，敬神在他们是完全需要的。如果多有几个阿洛夫这样的人物，当然就没有人再敬送子观音了。有了科学知识，迷信自然就可以打破，没有这一着，他还是要迷信的。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20页

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93页

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和技术指导工作，系统地建立、充实和提高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和技术指导工作的机构。

《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稿的修改和给周恩来的信》（一九五六年一月七日——九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页

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出的号召》（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12页

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2页

自然科学分两个方面，就自然科学本身来说，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谁人去研究和利用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

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

过去干的一件事叫革命，现在干的叫建设，是新的事，没有经验。怎么搞工业，比如炼铁、炼钢，过去就不大知道。这是科学技术，是向地球开战，当然这只是向地球上的中国部分开战，不会向你们那里开战。如果对自然界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不清楚，就会碰钉子，自然界就会处罚我们，会抵抗。比如水坝，如修得不好，质量不好，就会被水冲垮，将房屋、土地都淹没，这不是处罚吗？

《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72页

三大革命运动中的科学实验，主要是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不能完全采用实验的方法。例如研究政治经济学

不能用实验方法，要用抽象法，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的。

《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52页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对政府工作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270—271页

你们学自然科学的，要学会用辩证法。

《同毛远新谈教学问题》（一九六六年二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18页

4. 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

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0页

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这个问题要在干部中议一议，开个干部大会，议一议我们还有什么本领。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0页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技术发展有平衡，也有不平衡。例如解放初期，我们的地质工作人员只有二百来人，地质勘探情况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极不平衡，经过几年来努力加强工作，这种不平衡已经走向平衡。但是，技术发展的新的不平衡又出现了。我国目前手工劳动还占很大比重，同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需要不平衡，因此有必要广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来解决这个不平衡。特别值得注意的，新的技术部门出现以后，技术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更加显著，例如，我们现在要搞尖端技术，就感到许多东西不相适应。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0页

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急需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及时解决运动中的问题，使运动引导到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上去。

《加强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领导》（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八日、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52—153页

我国工业交通战线，农林牧副渔战线，财政贸易流通战线，文教卫生战线和国防战线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全民运动，正在猛烈发展，新人新事层出不穷，务请你们精心观察，随时总结，予以推广。

《加强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领导》（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八日、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53页

对每一具体技术改革说来，称为技术革新就可以了，不必再说技术革命。技术革命指历史上重大技术改革，例如用蒸汽机代替手工，后来又发明电力，现在又发明原子能之类。

《对空军部队技术革新情况报告的批语》（一九六九年六月六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9页

（十一）关于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客观规律问题

1. 从实践中总结经验，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克服盲目性

现在是搞建设，搞建设对于我们是比较新的事情。早几年在中央范围内就谈过，我们希望建设中所犯的错误的，不要像革命中所犯的错误的那么多、时间那么长。我们搞建设，是不是还要经过十四年的曲折，也要栽那么多筋斗呢？我说可以避免栽那么多筋斗。因为过去栽筋斗主要是个思想问题，是不认识、不

觉悟的问题。

《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01页

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因为才进行七年,还需要积累经验。对于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过斤斗,取得了经验,然后才有全国的胜利。我们要求在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较取得革命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一些,同时不要花费那么高的代价。代价总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代价那么高。必须懂得,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矛盾的,即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这个矛盾,也将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即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它和解决它。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41—242页

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跟做诗不一样,要懂得做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

《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47页

革命事业是不容易的,是科学,经济建设也是科学。

《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72页

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一九六〇年六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
第8卷第198页

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我今天讲的就是总结经验，我下回还要讲。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民主革命从建党到胜利是二十八年。社会主义才搞了十一年，我看再加十一年，二十二年行不行？我在一个小册子里讲过：民主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过斤斗，取得了经验，最后才得到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经验的时间是不是可以缩短一点。这是一种设想。现在看起来，我们大家都觉悟了，就可以缩短时间。民主革命是二十八年，如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搞二十二年，比民主革命减少六年，也还要十一年。是不是能够缩短？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好比人害病一样，有些病他害过就有了免疫力，我还没有害过就没有免疫力。

《总结经验，教育干部》（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
第8卷第276页

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0页

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3页

2. 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认识

本来，好、省是限制多、快的。好者，就是质量好；省者，就是少用钱；多者，就是多办事；快者，也是多办事。这个口号本身就限制了它自己，因为有好、省，既要质量好，又要少用钱，那个不切实际的多，不切实际的快，就不可能了。……我们讲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客观的必然性，要研究它。成都会议

提出：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一条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一条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凡是主观、客观条件许可能够办到的事，就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去办；主观、客观条件不许可的事，就不要勉强去办。工农业并举之外，还提出大中小、洋土这样几个同时并举。这些，看来行之有效。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看来还灵。我们提出的这一套，是不是符合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否就是这些？是否还会栽筋斗？都还需要继续在实践中得到检验。时间要几年，或要十年，甚至更长。

《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记录》（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十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第28页

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六年春，同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凑，提出了《论十大关系》。当时还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选举演说，苏联在一九二一年产钢四百多万吨，一九四〇年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二十年中增加了一千四百万吨。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提出了多快好省，……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7页

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

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这种情形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间，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这件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点。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5页

六、社会主义政治建设

（一）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工农联盟

（参见第三编“关于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第727—739页）

（二）健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参见第三编“关于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第754—757页）

（三）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参见第三编“关于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第739—754页）

（四）建立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参见第三编“关于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第757—758页）

（五）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1.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矛盾的性质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

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

《给黄炎培的信》（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四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
第164页

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

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

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4—205页

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5页

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当然，敌我问题也是一种是非问题。比如我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些内外反动派，究竟谁是谁非，也是是非问题，但是这是和人民内部问题性质不同的另一类是非问题。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6页

许多人觉得,提出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个新的问题。事实并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中国共产党忠实地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原则。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过去我们已经多次讲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并且在工作中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很多干部和人民都在实际上懂得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又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新问题呢?这是因为过去国内外的敌我斗争很尖锐,人民内部矛盾还不像现在这样被人们注意的缘故。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1—212页

我国人民内部的矛盾,在知识分子中间也表现出来了。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这里就存在着他们如何适应新社会需要和我们如何帮助他们适应新社会需要的问题。这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4页

2. 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

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但是应该注意仍然存在的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旧思

想和旧习惯的改造，要在巩固团结他们的方针下，继续进行长期的教育。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的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要知道，在人民方面来说，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

《国家预算要保证重点建设又要照顾人民生活》（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60—161页

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主张和风细雨，当然，这中间个别的人也难免稍微激烈一点，但总的倾向是要把病治好，把人救了，真正要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不是讲讲而已。第一条保护他，第二条批评他。首先要保护他，因为他不是反革命。这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人民内部，对犯错误的人，都用保护他又批评他的方法，这样就很得人心，就能够团结全国人民，调动六亿人口中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

《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修改》（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283页

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

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5—206页

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6页

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一九四二年，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解决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就是教条主义者和广大党员群众之间的矛盾，教条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左”倾教条主义者从前采用的党内斗争方法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我们在批评“左”倾教条主义的时候，就没有采取这个老方法，而采取了一个新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方法是在一九四二年整风的时候采用的。经过几年之后，到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果然达到了全党团结的目的，因此就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在这里，首先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从这个经验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把这个方法推广到了党外。在各抗日根据地里，我们处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处理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几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几部分干部之间的关系，都采用了这个方法，并且得到了伟大的成功。这个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可以追溯到更远。自从一九二七年我们在南方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开始，关于处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以及其他人民内部关系，就是采用这个方法的。不过到了抗日时期，我们就把这个方法建立在更加自觉的基础之上了。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对民主党

派和工商界也采取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0—211页

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通常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匈牙利事件所表现的那种范围相当广泛的对抗行动，是因为有内外反革命因素在起作用的缘故。这是一种特殊的也是暂时的现象。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企图实现他们的阴谋。匈牙利事件的这种教训，值得大家注意。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1页

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呢？对于明显的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事情好办，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就行了。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情形就不相同。禁止这些思想，不允许这些思想有任何发表的机会，行不行呢？当然不行。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

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2页

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有些人对别人总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了整自己，民主就越小越好。我看在文学、新闻等方面，解决问题要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上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

《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4页

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解决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的已被历史证明有效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坚持这种方法。

《对于一封信的评论》（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380—381页

人民内部矛盾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如果双方采取的态度和政策不适当的话。可能不转化为敌我矛盾，而能始终当作人民内部矛盾，予以彻底的解决，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矛盾及时适当地加以解决的话。

《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452—453页

3. 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向自然界开战，发展经济和文化

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6页

4. 要正确对待和处理群众闹事，把坏事转化为好事

我们是不赞成闹事的，因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而闹事总会要造成一些损失，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相信，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很守纪律，很讲道理，决不无故闹事。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国已经没有了发生群众闹事的可能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一）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二）如果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

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应当在处理闹事的过程中，进行细致的工作，不要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要“草率收兵”。对于闹事的带头人物，除了那些违犯刑法的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法办以外，不应当轻易开除。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6—237页

在我们的社会中，群众闹事是坏事，是我们所不赞成的。但是这种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乱子有二重性。我们可以用这个观点去看待一切乱子。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7—238页

5.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

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6页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

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0页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现在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优胜的条件。政权的基本力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手里。共产党有强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在我们的工作中尽管有缺点，有错误，但是每一个公正的人都可以看到，我们对人民是忠诚的，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同人民在一起把祖国建设好，我们已经得到巨大的成就，并且将继续得到更巨大的成就。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1页

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

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1页

现在一方面有社会主义世界同帝国主义世界的严重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就我国内部来说，阶级还没有最后消灭，阶级斗争还是存在的。这两点必须充分估计到。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1页

（六）健全民主集中制，造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这些道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

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可以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9页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6—297页

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多数是好人，我们中华民族是个好民族。我们这个民族是很讲道理的，很热情的，很聪明的，很勇敢的。我希望造成这么一种局面：就是又集中统一，又生动活泼，就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两方面都有，不只是一方面，不是只有纪律，只有集中，把人家的嘴巴都封住，不准人家讲话，本来不对的也不准批评。应当提倡讲话，应当是生动活泼的。凡是善意提出批评意见的，言者无罪，不管你怎么尖锐，怎么痛骂一顿，没有罪，不受整，不给你小鞋穿。小鞋子那个东西穿了不舒服。

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九五七年七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43—544页

我今天的讲话……中心是讲了一个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在党内、党外发扬了民主的问题。我向同志们建议，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有些同志还没有民主集中制的思想，现在就要开始建立这个思想，开始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11页

（七）加强法制建设

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法律是上层建筑。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我们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守革命法制，……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97—198页

肃反要坚持，有反必肃。法制要遵守。按照法律办事，不等于束手束脚。有反不肃，束手束脚，是不对的。要按照法律放手放脚。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98页

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为着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9—210页

解放以后，我们肃清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一些有严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被处了死刑。这是完全必要的，……

……我提议今年或者明年对于肃反工作全面检查一次，总结经验，发扬正气，打击歪风。中央由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员会和政协委员会主持。在检查工作的时候，我们对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不要泼冷水，而要帮助他们。向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泼冷水是不对的。但是发现了错误，一定要改正。无论公安部门、检察部门、司法部门、监狱、劳动改造的管理机关，都应该采取这个态度。我们希望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委员、人民代表，凡是有可能的，都参加这样的检查。这对于健全我们的法制，对于正确处理反革命分子和其

他犯罪分子，会有帮助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8—219页

在我们社会里，也有少数不顾公共利益、蛮不讲理、行凶犯法的人。他们可能利用和歪曲我们的方针，故意提出无理的要求来煽动群众，或者故意造谣生事，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对于这种人，我们并不赞成放纵他们。相反，必须给予必要的法律的制裁。惩治这种人是社会广大群众的要求，不予惩治则是违反群众意愿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7页

（另参见第三编“关于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第813—816页）

（八）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反对官僚主义

（参见第八编“关于党的建设”，第2146—2160页）

（九）加强廉政建设，反对贪污腐败行为

（参见第八编“关于党的建设”，第2139—2145页）

七、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参见第六编“关于思想宣传工作和文化工作”，第 1551—1593 页，第 1594—1629 页，第 1631—1649 页，第 1650—1657，第 1658—1696 页）

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参见第五编“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和国防建设”，第 1451—1467 页）

九、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维护祖国统一

（一）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决不允许搞“两个中国”

我们进入联合国的条件是：只能一个中国，不仅要进入联合国大会，而且要进入安全理事会和其他各种组织，否则就不干。

同曹聚仁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十月四日）

台湾的情况现在有变化。美国现在想搞垮蒋介石。它正在扶植一派，想用这派人来代替蒋介石。现在我们需要帮助蒋介石来反对美国。因为问题是：蒋介石好些呢，还是美国所扶植的更亲美的势力好些？台湾像目前这样作为美国的半占领地好些呢，还是台湾成为美国完全的占领地好些？

美国、英国这些国家要搞“两个中国”的阴谋，它们想一方面承认我们，一方面又承认台湾。我们的方针是：承认我们就不能承认台湾。我们不怕它们不承认。美国愈晚承认愈好，这样我们可以更好地清理内部。它要是我们这里有使馆，它就要在我们内部搞各种破坏活动。这是我们实际的政策。在对外方面，我们同美国也进行谈判，这是为了在外交上采取攻势。这个谈判已经搞了一年多，到目前之所以一直没有破裂，是因为双方都想把谈判破裂的责任加在对方身上。只要它愿意谈下去，我们就陪它谈

下去,谈几十年也可以,看样子有可能长期拖下去。

同英国,我们不同它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只同它建立半正式的外交关系,同它采取若即若离的方针。

关于参加国际组织问题,如奥林匹克委员会、联合国的附属机构等,……我们的看法是:如果这些组织内有国民党代表在,我们就不参加;如果参加了,那就是承认“两个中国”。

《中国外交方面的某些政策问题》(一九五七年三月、九月),《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86—287页

华沙谈的,是一个美国人走路的问题。美国人同我们讲生意,想以金、马换台、澎,造出两个中国来。他们的梦多么甜蜜啊!停火,停火,再一个停火!我们不知道美国官员们究竟有多少常识,看起来似乎不很多吧。说他们代表美国自己谈这个问题吧,中美之间并未开战,无火可停,他们不能代表自己。说他们代表你们吧,也是冒充。你们的领导人反对华沙谈判,并且讥笑停火。你们没有委托美国人当代表。假如委托了,我们也不同意。为什么我们中国两个政党不去直接谈判,要委托一个外国做代表呢?这种谈判,我们感到羞耻,因此不可以谈。华沙谈的,只能是一个中美关系问题,一万年也是如此。

《中美两国没有开战,无火可停》(一九五八年十月),《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60页

蒋、社会谈,你们吃了一点亏,你们只有代表“自由中国”发言的权利了;再加上小部分华侨,还许你们代表他们。美国人把你们封为一个小中国。十月二十三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十月十六日杜勒斯预制的同英国一家广播公司所派记者的谈话,杜勒斯从台湾一起飞,谈话就发出来。他说,他看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中国,并且说,这个国家确实存在,愿意同它打

交道，云云。谢天谢地，我们这个国家，算是被一位美国老爷看见了。这是一个大中国。美国人迫于形势，改变了政策，把你们当作一个“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其实并非当作一个国家。这种“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在目前开始的第一个阶段，美国人还是需要的。这就是孤立台湾。第二个阶段，就要托管台湾了。国民党朋友们，难道你们还不感觉这种危险吗？出路何在？请你们想一想吧。此次蒋社会谈文告不过是个公报，没有法律效力，要摆脱是容易的，就看你们有无决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28页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企图搞“两个中国”，一个大中国，一个小中国。他们说，德国有东德、西德两个，为什么不能有两个中国？我们说德国是战败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我们的敌人，按照波茨坦协定的规定分为两个。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个同盟国。按丘吉尔、罗斯福、蒋介石参加的开罗会议的规定，台湾从日本手里归还中国。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日本人暂时占领了，日本失败后应归还中国。蒋介石失败后跑到台湾，在台湾建立政府。全世界还有许多国家同台湾当局有外交关系。我们反对“两个中国”，蒋介石也反对“两个中国”，我们有一致之处，有共同点。

《不能把台湾问题上的国际问题同国内问题混淆起来》（一九五九年十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89—90页

你们不要学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英国同我们只有一

个分歧，就是它对台湾的地位不肯定。第一，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台湾，这是好的；第二，英国现在在联合国投我们的票，这也是好的；第三，英国同美国都搞“两个中国”，这点上表明它是美国的代理人。我们同英国已有十来年的外交关系，它也像你们那样，要我们派个大使去，它派个大使来。我们说不行，再搞十五年，甚至几十年也可以，我们不派大使去。联合国进不了，那也不要紧。十五年没有进联合国，我们也活下来了，再让蒋介石“大元帅”在联合国呆上十五年、三十年、一百年，我们照样活下去。要我们承认“两个中国”或者是“一个半中国”，那都不行。

《中法之间有共同点》（一九六四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71—372页

（二）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任何外国不得干涉；希望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只在不得已时才使用武力

在过渡时期中，我们不要忘记祖国的一部分神圣领土台湾还没有解放。解放台湾的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希望一切有爱国心的台湾军政人员，同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不管采用什么方法，我们相信，解放台湾的正义事业是一定能够取得胜利的。美帝国主义者企图长期占领台湾并从而继续威胁我国的活动，终归是要失败的。

《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六年八月、九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142—143页

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一点，周恩来总理在几年前已经告诉你们了。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方有关的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的问题。……台湾的朋友们，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熄灭。这就需要谈判。当然，再打三十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究竟以早日和平解决较为妥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一九五八年十月六日），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21页

台、澎、金、马整个地收复回来，完成祖国统一，这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神圣任务。这是中国内政，外人无权过问，联合国也无权过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26页

美国人下死劲钳制台湾当局，不许他们和我们举行和谈，一心一意要干涉中国内政。美国人非常惧怕和平，非常惧怕国共两党重新接近，谈出一个和平局面来，妨碍他们孤立台湾和托管台湾的阴谋计划。我们必须击破这个计划。我们希望台湾当局有一天甩掉美国人那只钳制魔手，派出代表，举行和谈。我们的和谈是真和谈，谈成了，内战就可以宣告结束，全体中国人团结起来，一致对付外来的威胁，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三告台湾同胞书》（一九五八年十一月），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53—454页

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点我们是要坚持的。虽然

如此，我们不打。美国人在那里，我们去打吗？我们不打。美国人走后，我们就一定打吗？那也不一定。我们要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台湾问题。我国好多地方就是用和平方法解决的。北京就是用和平方法解决的，还有湖南、云南、新疆。

《同斯诺的谈话》（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17页

只有等待人民觉醒，起来斗争。中国等了一百多年，大陆才解放，台湾也许要等几十年。全世界统统解放还要等更长时间。对台湾，我们也不准备用武力去解放，原因之一是在台湾有美国军队，我们军队进攻，就要同美国打仗。

《受压迫的人民总是要起来的》（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36页

（三）美国侵占台澎与台湾海峡问题， 要由中美两国通过谈判来解决

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周总理在声明中已表示我们愿意同美国人坐下来谈判。在亚非会议期间，我们同五个科伦坡国家和泰国、菲律宾曾谈过台湾问题。一切问题应通过谈判来解决，打仗的办法不好。

《中国和巴基斯坦应该成为好朋友》（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04页

台湾是我们的，那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步的，是内政问题；跟你的交涉是国际问题。这是两件事。你美国跟蒋介石搞在一起，这个化合物是可以分解的。比如电解铝、电解铜，用电一解，不

就分离了吗？蒋介石这一边是内政问题，你那一边是外交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关于国际形势问题》（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14页

美国侵占台澎与台湾海峡，这是中美两方有关的问题，应当由两国举行谈判解决，目前正在华沙举行。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国有利，因为它可以取得主动。迟走不利，因为它老是被动的。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一点是常识，美国人应当懂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并无战争，无所谓停火。无火而谈停火，岂非笑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一九五八年十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21页

我们打金门是内战问题。杜勒斯的方针是叫我们和蒋介石都不打。我们说，你们管不着，这是我们中国的地方，我们打不打是我们的事，你们不要多管；我们和你们美国只在一点上有关系，就是要求你们从台湾撤军。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在日内瓦、华沙同美国谈判。美国要签订一个声明，要蒋介石不打我们，要我们也不打蒋介石。我们说不行，金、马、台、澎问题是我们的内政，你们管不着，惟一的问题就是请你们搬家。

看来我们和美国还得谈下去。它不赞成我们，我们也不赞成它，谈多久我们不知道。已经谈了三年半，恐怕还会谈十年，这是世界上最长的谈判。你们不要怕我们会打台湾。我们打金、马是为了帮助蒋介石，因为美国想把金、马让给我们，自己占

据台湾。我们放弃金、马，都给蒋介石。蒋介石一困难，我们就打金、马，美国就可以让蒋介石继续做总统。

《关于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一九五九年五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63页

美国有“战争边缘政策”，主要是为台湾问题而想出来的。去年我们也采取“边缘政策”。我们打金、马和蒋介石的增援船只，蒋介石就请美国帮助。美国人来了，但只在十二海里以外。我们光打蒋介石的船，不打美国船。美国船升起国旗，叫我们不要打它。美国一炮也没有打我们，我们也没有打它。所以大家都在战争边缘上。

美国空军很守规矩，它总是和我们的海岸保持一定的距离。有一次我们打下一架美国飞机，因为它越了境，但美国不做声，不要我们赔。

《关于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一九五九年五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63—64页

我们历来都讲，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一定要解放台湾，解放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用和平的方法，一个是用战争的方法。万隆会议时，周恩来总理就声明过，愿意同美国坐下来谈判。后来就谈了，一气谈了四年，先在日内瓦，后到华沙；先是一个星期一次，后来是两个星期一次、一个月一次，现在是两个月一次。双方都不想中断谈判，美国曾经中断过一个时期，后来我们去了一封信，说不谈不好，并且提出了谈判时间。他们说，限定时间，他们不能遵守，但是谈判可以恢复。我们说谈判可以拖一年，后来金门一打炮，谈判就恢复了。谈判地点，根据美国的意见迁到了华沙。在谈判中，我们只是向他

们提出一点，就是要他们从台湾撤军，撤军就没事了嘛。剩下的就是我们同蒋介石的事了，我们可以同蒋介石公开谈判。可是，美国不干，他们怕蒋介石同我们谈判。我们在金门打了炮，实际上并不是战争。我们并不想一下子把台湾等地拿下来，可以把它们放在蒋介石的手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没有关系。金门、马祖可以不拿下来，并不想为此而打仗。

《关于台湾问题》（一九五九年五月、十月），《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80—381页

台湾问题很复杂，又有国内问题，又有国际问题。就美国说，这是一个国际问题。国际问题只能通过和平道路解决，不能用武力解决。我们还在同美国谈判，可是美国没拿出名堂来。以前我们在日内瓦谈，现在在华沙谈，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要求美军撤出台湾，他们不干，我们只能等，他们要多少时间撤出，我们就等多少时间。我们不会首先同美国打起来的，同志们放心好了。就蒋介石说，台湾是一个国内问题。是否一定要用武力解决呢？也不是，我们准备同蒋介石谈判，但他不干。我们没有办法，可能有一天会打起来的。国内问题有两个解决办法，和平解决或武力解决。有人把台湾问题上的国际问题同国内问题混淆了起来。台湾只有一千万人口，几年不收回台湾（包括金门在内）也不要紧。

《不能把台湾问题上的国际问题同国内问题混淆起来》（一九五九年十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89页

我们要的不只是金门、马祖这两个岛屿，而是整个台湾和澎湖列岛。这个问题可能要搅很长的时间。现在已经搅十一年了，比方再过两个十一年吧，或更长的时间，都有可能。因为

美国政府不愿意放弃台湾。它不愿意放弃，我们也不去打，我们和它谈判，先在日内瓦，后来在华沙。它在台湾，我们也不会打。我们要谈判解决，不要武力解决。这条道理美国政府早已知道。金门、马祖我们也不去打，我们过去有过公开声明的。因此，战争的危险是没有的，美国可以放心继续霸占台湾。今年已经是十一年了，又过十一年，再过十一年，不是三十三年了吗？也许在第三十二年，美国会放弃台湾的。

《同斯诺的谈话》（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11页

（四）两岸统一后台湾可以允许保留原来的社会制度

台湾只要同美国断绝关系归还祖国，其他一切都好办。现在台湾的连理枝是接在美国的，只要改接到大陆来，可派代表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台湾一切可照旧。

同曹聚仁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十月四日）

大陆这么大，台、澎、金、马只是一大点点几小点点，让他们在那里搞他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他们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你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你的一套。

同曹聚仁的谈话（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

如果台湾不作为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它归还中国，那末台湾的社会制度问题也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在联合国只能有一个代表》(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三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69页

(五) 香港可以暂时不动, 迟几年再收回

至于香港, 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 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关系, 小部分是割让的, 大部分是租的, 租期是九十九年, 还有三十四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 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这一点也许你们不了解。

香港人就是我们中国人。香港是通商要道, 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 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不动它并不是永远不动它, 英国现在安心, 将来会不安心的。

《受压迫的人民总是要起来的》(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36—337页

十、民族问题

(一) 实行民族平等，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

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37页

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他们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一九四三年对于伊克昭盟蒙族人民的屠杀事件，一九四四年直到现在对于新疆少数民族的武力镇压事件，以及近几年对于甘肃回民的屠杀事件，就是明证。这是大汉族主义的错误的民族思想和错误的民族政策。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83—1084页

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38页

有些地方民族关系很不正常。此种情形，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即是国民党思想，必须立刻着手改正这一方面的错误。凡有少数民族存在的地方，都要派出懂民族政策、对于仍然被歧视受痛苦的少数民族同胞怀抱着满腔同情心的同志，率领访问团，前往访问，认真调查研究，帮助当地党政组织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是走马看花的访问。

根据不少材料看来，中央认为凡有少数民族存在的地方，大都存在着尚未解决的问题，有些是很严重的问题。表面上看来平静无事，实际上问题很严重。二三年来在各地所发现的问题，都证明大汉族主义几乎到处存在。如果我们现在不抓紧时机进行教育，坚决克服党内和人民中的大汉族主义，那是很危险的。在许多地方的党内和人民中，在民族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大汉族主义的残余的问题，而是严重的大汉族主义的问题，即资产阶级思想统治着这些同志和人民而尚未获得马克思主义教育、尚未学好中央民族政策的问题，故须进行认真的教育，以期一步一步地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应在报纸上根据事实，多写文章，进行公开的批判，教育党员和人民。

《批判大汉族主义》（一九五三年三月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69—270页

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不要以为只是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也很大地帮助了汉族。有些同志总是在那里吹，我们可帮助了你们，就没有看到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我国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的地方，是什么人住的？是汉族住的，还是什么人住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的地方是少数民族居

住的。那里物产丰富，有很多宝贝。现在，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很少，有些地方还没有帮助，而少数民族倒是帮助了汉族。有些少数民族，需要我们先去帮助他们，然后他们才能帮助我们。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很大地帮助了汉族，他们加入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就是在政治上帮助了汉族。少数民族和汉族团结在一起了，全国人民都高兴。所以，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帮助。那种以为只有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没有帮助汉族，以及那种帮助了一点少数民族，就自以为了不起的观点，是错误的。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05页

西藏人怕汉人，总是小的怕大的，这个不奇怪。由于过去汉人的反动统治阶级统治你们压迫你们，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所以产生了对汉人害怕，印象不好。因此，我们今后必须很好地多办些好事，才能使西藏人民慢慢相信汉人是帮助他们的，不是搞他们的。过去我同张经武、范明都谈过，要他们对我们的干部讲，我们进藏是诚心诚意帮助的，不是代替的，而且帮助还要帮助得好，不能让人家不舒服。同时我也对他们讲，要以这两条来考验我们的干部。虽然这样，但是你们也应该对他们进行帮助，随时提出意见，不对的要改正，如果不改正，你们可以提出意见，把他们调回来。

《同班禅额尔德尼的谈话》(一九五五年三月九日),《毛泽东西藏工
作文选》第119页

大汉族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汉族这么多人，容易看不起少数民族，不是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所以必须严格地反

对大汉族主义。当然，少数民族中间会要发生狭隘民族主义的，那也要反对。但是，这两个东西，主要的、首先要反对的是大汉族主义。只要汉族同志态度正确，对待少数民族确实公道，在民族政策上、民族关系的立场上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是资产阶级的观点，就是说，没有大汉族主义，那末，少数民族中间的狭隘民族主义观点是比较容易克服的。现在大汉族主义还是很不少的，例如包办代替，不尊重人家的风俗习惯，自以为是，看不起人家，说人家怎么样落后等等。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结论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

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的政策是比较稳当的，是比较得到少数民族赞成的。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

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论人口，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压倒优势。如果汉人搞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那就很不好。而土地谁多呢？土地是少数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

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就在劳动人民中间也不容易很快消除。所以我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并且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早两年已经作过一次检查，现在应当

再来一次。如果关系不正常，就必须认真处理，不要只口里讲。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
第33—34页

我国少数民族有三千多万人，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但是居住地区广大，约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所以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在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关系比较从前大有改进，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在一部分地区，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还严重地存在，必须给以足够的注意。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7页

（二）维护汉族和少数民族以及 少数民族内部的团结

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民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清朝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这种团结是各方面共同努

力的结果。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

《在庆祝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宴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68页

在西藏人民中,佛教有很高的威信。人民对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信仰是很高的。因此,协议中不但规定对宗教应予尊重,对寺庙应予保护,而且对上述两位藏族人民的领袖的地位和职权也应予以尊重。这不但是为和解藏族内部过去不和睦的双方,也为使国内各民族对藏族领袖引起必要的尊重。

《必须恪守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50—51页

帝国主义过去敢于欺负中国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各民族不团结,但是这个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足以战胜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强盛的国家。

《给西北各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的复电》(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11页

自然,在建设祖国和为西藏民族谋福利的道路上,我们是会遇到一些困难的;帝国主义和反动破坏分子也会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成为我们前进的障碍。因此,必须提高警惕,加强国防,巩固汉藏民族之间和西藏内部的团结,严防帝国主义间谍特务和其他反动破坏分子的阴谋活动,并克服我们建设祖国和为西藏民族谋福利的道路上的障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西藏僧俗人民的幸福前途。你和西藏人民如果在这一方面遇到困

难，中央人民政府会帮助你获得妥善的解决。

《给达赖喇嘛的信》（一九五三年三月八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93页

我们要和各民族讲团结，不论大的民族、小的民族都要团结。例如鄂伦春族还不到两千人，我们也要和他们团结。只要是中国人，不分民族，凡是反对帝国主义、主张爱国和团结的，我们都要和他们团结。团结起来，按照各民族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进行工作。有些地方可以做得快一点，有些地方可以做得慢一点，不论做快做慢都要先商量好了再做，没有商量好就不勉强做。商量好了，大多数人赞成了，就慢慢地去做。做好事也要商量着做。商量办事，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的地方。国民党势力大就压迫人。他们不仅压迫少数民族，还压迫大多数汉人。

《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参观团代表的谈话》（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11页

我们大家应当努力，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我国各民族间的团结，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汉、藏民族间以及藏族内部的团结，共同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

《在庆祝藏历新年宴会上的祝酒词》（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四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12页

我们对西藏民族寄予的希望很大，将来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这点要说清楚，民族之间的帮助是互相帮助。西藏民族在政治上给我们的帮助很大，民族团结搞好了事情就好办。

《同达赖喇嘛的谈话》（一九五五年三月八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16页

少数民族自己内部也可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代替你打倒我、我打倒你，你毒死我、我毒死你的办法。你们西藏可以商量商量，破除老办法，采取新办法，用互相批评互相帮助的办法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用互相信任代替互相不信任。藏族和汉族过去互相不信任，慢慢地就可以互相信任。你们前藏、后藏、昌都过去也互相不信任，今天也要用互相信任来代替。

《同藏族人士的谈话》（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5页

（三）帮助少数民族争取解放，发展经济和文化，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说：“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

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上述孙先生的民族政策。共产党人必须积极地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这个政策而奋斗；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并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他们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84页

西藏地方大、人口少，人口需要发展，从现在二三百万发展到五六百万，然后再增至千几百万就好。还有经济和文化也需要发展。文化包括学校、报纸、电影等等，宗教也在内。过去的反动统治，清朝皇帝、蒋介石，都是压迫剥削你们的，帝国主义也是一样，使得你们人口不得发展，经济削弱了，文化也没有发展。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不要压迫、剥削你们，而是要帮助你们，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就是要执行帮助你们的政策。开始进去的时候不会有帮助，三四年之内也不可能有多多的帮助，但以后就能帮助你们的，那是一定的。如果共产党不能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那共产党就没有什么用处。

《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谈话的要点》(一九五二年十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39—240页

过去两年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之间的相互了解以及汉藏两个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是有进步的，西藏地方对中央以及藏族和汉族之间都是一天一天靠拢的，相信将来会更加靠拢。

整个中国现在还很落后，需要发展。这是因为过去有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压迫的关系。他们现在已被我们赶走了，这四年来我们就有很大进步。在国家经济恢复以后，今年开始了第一个国家建设的五年计划，预计在三个五年计划以后，我们的大工业就建立起来了。苏联在三十六年前赶走了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坏人，建设了三十六年才有现在的成绩。我们建设起来比苏联还要快些，因为我们有苏联的帮助。中国人口很多，有五

万万几千万，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土地也很广大，有三个五年计划就能建设得很好了，对西藏就会有更大的帮助了。

《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参观团代表的谈话》(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11—312页

帮助各少数民族，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和进步都是有希望的。

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发展，主要靠西藏的领袖和人民自己商量去做，中央只是帮助。这点是在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里写了的。但是要做，还得一个时间，而且要根据你们的志愿逐步地做。可做就做，不可做就等一等；能做的，大多数人同意了，不做也不好。可以做得慢一些，让大家都高兴，这样反而就快了。

总之，我们的方针是团结进步，更加发展。

《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参观团代表的谈话》(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12页

在我们的国家里，许多地方还很落后，西藏也是落后的，这是应该承认的。我们承认落后是有好处的，我们可以向先进的国家学习，向苏联学习。这样，我们向先进的民族和国家学习，在我们内部各民族互相学习，亲密团结，共同建设，那末我们各民族都有希望，全国都有希望。

《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谈话》(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09—110页

你所提的把在西藏工作的汉族干部当成自己的干部的观点是对的。在西藏工作的汉族干部是去帮忙的，不是代替的。实

行区域自治是真正的自治，主要是依靠西藏自己的干部。但为了取得汉民族的帮助，我们可以向自治区内派少数的汉族干部去全心全意地帮忙。我们曾对派去西藏工作的汉族干部强调说，要全心全意地去帮忙，为了帮忙，性命也可以放弃，要把忙帮好，不准帮坏。但在这一点有些人的思想上还不通，不愿在那里工作，天天喊叫要回来，这还是为汉族打算，而没有为藏族打算，给东西时也设法少给一些等等，都是为汉族打算。有些人主观主义严重，很急躁，觉得别人落后，看不惯人家，实际上他们忘了自己也落后过。现在汉族较进步一些，也是从落后过来的。

《同达赖喇嘛的谈话》(一九五五年三月八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14—115页

西藏几年来有进步，每年都有进步。西藏今后是会发展的，人口要发展，财产要发展，文化教育也要发展。宗教学校也可以办。几十年后，西藏情况就会有很大改变。你们要学释迦牟尼的样子，为广大群众着想，为全西藏人民谋利益。释迦牟尼领导人民搞改革并没有饿死啊！

《接见西藏地区参观团、西藏青年参观团负责人等的谈话》(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28页

在经济文化方面，藏族是落后的，汉族也落后，比美国、英国、法国、苏联、波兰落后，比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东德落后，比日本也落后，不要以为只是你们落后。我们的目的是使大家都发展起来，我们要经过几个五年计划来克服这种落后状况。我们支援你们，你们自己也要发展。你们应该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发展文化。经济

不发展，人口也不能发展，文化发展了，可以帮助经济发展。

《同藏族人士的谈话》（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6页

解放军到西藏，要给人民办好事，不然要解放军干什么？修了两条公路是好事，但这还只是为做好事准备了有利的条件。好事要西藏地方自己做，我们可以帮助。你们也可以搞五年计划这么一套，一年也可以搞一个计划，标准是提高人民的生活。人民生活提不高，便不能持久。

《同藏族人士的谈话》（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6—7页

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究竟怎样才适合，要好好研究一下。

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4页

（四）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风俗和宗教信仰，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要慎重

团结少数民族很重要。全国少数民族大约有三千万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须谨慎对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一个条件成熟了，其他条件不成熟，也不要进行重大的改革。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要改革。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是可以改革的。但是，这种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没有群众条件，没有人民武装，没有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就不要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改革工作。我们一定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团结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

《不要四面出击》（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75页

中央的这个政策，不但对西藏是如此，对国内一切占少数的兄弟民族都是如此。因为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项固有制度的改革以及风俗习惯的改革，如果不是出于各民族人民以及和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们自觉自愿地去进行，而由中央人民政府下命令强迫地去进行，而由汉族或他族人民中出身的工作人员生硬地强制地去进行，那就只会引起民族反感，达不到改革的目的。

《必须恪守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50页

拉萨等地物价高涨，康藏公路短期难通，军队生产今年尚难自给，我们对西藏人民的物质福利一时尚难有所改进。总之，我们在西藏的基础在目前和今后一年至两年内还是不稳固的。因此，我们在政治上必须采取极端谨慎的态度，稳步前进，以待公路修通、生产自给并对藏民物质利益有所改善之后，方能谈得上某些较大的改革。

《对西藏在政治上必须采取极端谨慎的态度》（一九五二年四月一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60页

分地的问题，与宗教问题有所不同。在汉人区域已经分了土地，这里对宗教仍然是保护的。少数民族地区分不分土地，由少数民族自己决定。西藏地区现在谈不上分地，将来分不分，由你们自己决定，并且由你们自己去分，我们不代你们分。

《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谈话的要点》（一九五二年十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39页

为了照顾少数民族特别是西藏的情况，在草案第六十一条中写了第三款，即：“各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具体形式，按照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大多数人民的意愿规定。”……我对西藏代表团说过，我们不强迫你们，你们搞不搞土地改革，搞不搞选举，由你们决定。十七条协议不实行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一定要实行。但其中哪一条你们现在不愿实行，可以暂时不实行，可以拖。因为协议上并没有说哪年哪月哪天一定要实行。已经拖了三年，如要拖，可再拖三年。三年过去后，还可拖三年，拖它九年也可以。不能干人家反对干的事情，要等待人民的觉悟。我们相信人民一定会觉悟。我们曾发表过社论说：汉族干部不能干西藏人民所不愿干的事，要按大多数人民的

意愿办事。

《西藏自治区的具体形式由西藏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决定》（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04—105页

你们将来的改革，也不能一下子搞社会主义，要分好几步走。改革以后，贵族、喇嘛还要过和以前相等的生活。要不要改革，是你们自己的事，你们商量。改了以后，贵族、喇嘛的生活还是照旧，不能改坏。这些都由你们来定，你们不想改，还是改不成。

《接见西藏地区参观团、西藏青年参观团负责人等的谈话》（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26页

对西藏地区的土地改革要采用不同的办法，要采用云南的办法。云南有土司，他们也是贵族，那里是通过和平协商的办法进行土地改革的，人民满意，土司也满意。总之，贵族的生活不变，照老样子，可能还有些提高。宗教信仰也全照老样子，以前信什么，照样信什么。宗教信仰自由，可以是先信后不信，也可以是先不信后信。

《同藏族人士的谈话》（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页

西藏现在不是搞合作社的问题，而是进行民主改革的问题。什么时候进行，由你们自己去决定。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要由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下决心，要由西藏的僧俗官员和寺院里的喇嘛、堪布们决定。要有一个酝酿的时期，一年、二年、三年，通过讨论，打通思想。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两方面的意见都可以讲。多酝酿、多讨论有好处，大家都讲，慢慢地就讲通了。贵族、喇嘛有好多人

害怕改革，你们回去后要对贵族、喇嘛多做工作，不论如何改革，对他们的政治地位、生活水平都要维持。

《同藏族人士的谈话》（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5页

中央和毛主席历来认为改革一定要得到达赖、班禅和僧侣领导人的同意，要各方条件成熟，方能实行。现在无论上层和人民条件都不成熟，所以目前几年都不能实行改革，中央认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是不能实行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也还要看情况如何才能决定。但如果受外国指挥的反革命分子不通过协商而一定要通过反叛和战争破坏十七条协议，把西藏情况打烂，那就有可能激起劳动人民起来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西藏。目前应把在六年内不改革的方针在党内藏族上层普遍加以传达，工委可以在最近约自治区筹委会和噶厦的主要官员座谈，向他们说清上述中央的方针。

《关于西藏在六年内不实行改革的方针》（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54页

经过各族人民几年来的努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绝大部分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西藏由于条件还不成熟，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看情况才能决定。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7页

西藏面积不小，有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十二个民主德国。可是西藏地区的人口只有一百二十万。有人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长久不解决西藏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党过去很少与藏族接触，我们有意地把西藏的社会改革推迟。过去我们和达赖喇嘛达成的口头协议是，在一九六二年以后再对西藏进行民主改革。过早了条件不成熟，这也和西藏的农奴制有关。西藏劳动群众占百分之九十五，剥削者占百分之五，也就是说有六万人是剥削者。我们要分化他们，争取一部分。现在条件成熟了，不要等到一九六三年了。

《关于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一九五九年五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61页

西藏社会制度经过改革，从封建农奴制度改变成了农民个体所有制，要安定一个时期。

《同班禅额尔德尼的谈话》（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216页

（五）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革可以 实行赎买政策

少数民族地区的地主和汉族地区不同，汉族地区的地主在土地改革以后剥夺了选举权，不能做官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地主在民主改革以后不剥夺选举权，还可以做官。对少数民族中的地主应该宽一些。我们对资本家都是赎买政策，对他们应该比对资本家更宽大一些。

《在听取甘孜、凉山两个自治州改革和平乱问题汇报时的谈话》（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47页

至于贵族,对那些站在进步方面主张改革的革命的贵族,以及还不那么革命、站在中间动动摇摇但不站在反革命方面的中间派,我们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个人的意见是:对于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庄园,是不是可以用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即实行赎买政策,使他们不吃亏。比如我们中央人民政府把他们的生活包下来,你横直剥削农奴也是得到那么一点,中央政府也给你那么一点,你为什么一定要剥削农奴才舒服呢?

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贵族坐在农奴制度的火山上是不稳固的,每天都觉得要地震,何不舍掉算了,不要那个农奴制度了,不要那个庄园制度了,那一点土地不要了,送给农民。但是吃什么呢?我看,对革命的贵族,革命的庄园主,还有中间派的贵族,中间派的庄园主,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那方面,就用赎买政策。我跟大家商量一下,看是不是可以。现在是平叛,还谈不上改革,将来改革的时候,凡是革命的贵族,以及中间派动动摇摇的,总而言之,只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边的,我们不使他吃亏,就是照我们现在对待资本家的办法。并且,他这一辈子我们都包到底。

《关于西藏平叛》(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
第41页

西藏事件很好,我们很乐观。当然,要消灭农奴制,进行社会改革,要向群众讲道理,这还需要时间。有这样一个问题,解放军到西藏已经九年了,西藏为什么不改革?这是我们有意的,把这块地方放慢一步,这是有计划地放慢。这倒不是因为群众基础。西藏的一些上层分子心在外国,不在中国。我

们放慢改革，原来讲一九六二年以后再商量改革问题。现在他们打了炮，就把改革提前了四年。因此，打炮也是好事。

《同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九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84页

我看西藏可以分成左、中、右、叛四种人。所谓“右”，指的是那些并未拿起枪参加叛乱，也没有跑到印度，但是态度很顽固，反对我们、反对改革的人。对这四种人，在政策上应当有所不同。

你们站在爱国、进步方面，是左派，不要怕丧失你们的庄园以后没有饭吃。对左派和中间派，要采取赎买的政策，保证改革以后生活水平不会降低。

《西藏平叛后的有关方针政策》(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96页

把上层人士的工作搞好,对爱国上层三千多人要搞好团结,真正实行赎买,长期合作,给他们安排一定的职位,安排好他们的生活。思想改造不要急,要作为长期的任务,要他们自觉地改造,急了改造不好。不要动不动开斗争会。

《同班禅额尔德尼的谈话》(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214页

(六) 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各级政权机关均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在目前时期应一律组织联合政府，即统一战线政府。在这种合作中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此外，青海、甘肃、新疆、宁夏、陕

西各省省委及一切有少数民族存在地方的地委，都应开办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或干部训练学校。请你们注意这一点，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

《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0页

西藏每年有些人来内地参观是很好的。此外，每年还可以选送一些青年来内地学习，长期学习和短期学习都好。因为这样可以更多地培养一些建设西藏的民族干部。

《给班禅额尔德尼的信》（一九五四年四月），《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06页

民族区域自治地区要搞建设，便要有自己民族的干部，自己的科学家。青年要学科学，有很多科学要学，像电呀、机器呀这些东西。西藏地方大，地下有很多好东西。要有使用机器的人才，要有农业科学家，要有地质科学家。汉人也是一样。在反动派统治下，中国的科学不发达，但我们一搞起来就相当快。例如全国解放时，我们的地质科学家只有一百多人，不到二百人，搞了六年，已经发展到几千人了。现在柴达木盆地正在开采石油，离青藏公路不远，你们可以去看看。培养人才要慢慢来，不是几个月、几年的事，你们要有计划地培养科学干部。

《同藏族人士的谈话》（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7页

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必须学当地民族的语言。少数民族的干部，也应当学习汉语。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60页

西藏改革后也要办工业，要西藏人自己办，工程师、技术人员都要有藏族的，因此要注意培养藏族的科学技术干部。

《同班禅额尔德尼等的谈话》(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208页

西藏有好几千青年干部，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岁左右，这是好事，是很好的事。西藏人中不仅要有行政干部，还要有文教、医疗、宗教等各方面的干部，而且还要有科学技术干部。将来逐步发展起来，在每个专区有个中学，各县都有小学。汉人要学藏话，藏人要学汉语。在这里的大学里也要有藏人学习。藏人要有开飞机、办工厂、开汽车、搞地质、搞气象等各个方面的人才。

各兄弟民族都如此，先是汉人帮助，慢慢地本民族的人才出来了。

《同班禅额尔德尼的谈话》(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219—220页

(七) 西藏和平解放和西藏平叛

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

《给班禅额尔德尼的电报》(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3页

西藏是中国领土，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人民解放军

必须进入西藏。

《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02页

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地方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

《对西藏问题任何外国无置喙的余地》(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八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34页

现在,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在友好基础之上,经过多次商谈,已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这个协议是符合于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利益,同时也符合于全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从此,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在伟大祖国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得以永远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和异民族的压迫,站起来,为西藏人民自己的事业而努力。我希望你和你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地实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尽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开进西藏地区。

《给达赖喇嘛的信》(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70页

此次进军系在和平协议下的战备进军,各部万勿以和平协议已成而松懈战斗意志与战斗准备,因协议虽然签字,但尚未付诸实施,同时帝国主义必会用各种阴谋手段来破坏我们和平解放西藏的实现,因此应提高警惕性,随时都有应付意外情况的充分准备,同时必须加强部队的政策纪律教育,以保证解放西藏巩固国防任务的圆满实现。

《军委关于进军西藏的训令》(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279页

一切进入西藏地区的部队人员和地方工作人员必须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必须恪守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必须严守纪律，必须实行公平的即完全按照等价交换原则去进行的贸易，必须防止和纠正大民族主义倾向，而以自己的衷心尊重西藏民族和为西藏人民服务的实践，来消除这个历史上留下来的很大的民族隔阂，取得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的衷心信任。如果这些部队和工作人员中有违反民族政策的协议的行为，如果他们不守纪律，如果他们欺负西藏人民和不尊重与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人物，如果他们犯了大汉族主义的原则错误，那末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就应负责及时纠正。同时，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则有批评的权利和向上级人民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反映和报告的权利。这个原则，不但对藏族是如此，对一切兄弟民族都是如此。

《必须恪守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 51 页

西藏情况和新疆不同，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西藏均比新疆差得多。……西藏至少在两三年内不能实行减租，不能实行土改。新疆有几十万汉人，西藏几乎全无汉人，我军是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民族区域。我们惟靠两条基本政策，争取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第一条是精打细算，生产自给，并以此影响群众，这是最基本的环节。公路即使修通，也不能靠此大量运粮。印度可能答应交换粮物入藏，但我们的立脚点，应放在将来有一天万一印度不给粮物我军也能活下去。

《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一九五二年四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 6 卷第 226 页

我们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办法，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地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但也要准备对付坏分子可能率领藏军举行叛变，向我袭击，在这种时候我军仍能在西藏活下去和坚持下去。凡此均须依靠精打细算，生产自给。以这一条最基本的政策为基础，才能达到目的。第二条可做和必须做的，是同印度和内地打通贸易关系，使西藏进出口趋于平衡，不因我军入藏而使藏民生活水平稍有下降，并争取使他们在生活上有所改善。

《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一九五二年四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26—227页

西藏是个了不起的地方，占全国面积的八分之一。我同达赖说过，不要以为西藏落后，地方小，西藏地方可不小。西藏如果不参加祖国的大家庭，这个家庭的事便不好办了，西藏在祖国大家庭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同藏族人士的谈话》（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6页

世界上的资产阶级对我们平叛总是要大叫大骂的，因为他们认为西藏实际上是他们的地方，不是我们的。他们的第一个论据说西藏人不是中国人，西藏人是西藏人，不是汉人。其实，我们国家里不是汉人的多得很，内蒙古是蒙古族人，维吾尔族是突厥族系的人，还有其他少数民族，都不是汉人。在中国六亿七千万人口中，少数民族有三千六百万人。不仅一百二十万西藏人不是汉人，其他三千四百多万人也不是汉人。叛乱分子说西藏要求独立，而所谓“独立”，就是要把西藏给外国。马克

思说过民族自决，但是叛乱分子的“民族自决”就是站到外国那边去。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西藏一共有二百二十万人。讲民族自决，是由一百一十八万人自决呢？还是由两万反动派去自决？他们要的是两万农奴主反动派的自决。我国有的少数民族过去有自己的武装。武装应该是劳动人民的武装，不是农奴主的武装。现在的问题是要把枪从农奴主的肩上换到劳动人民的肩上。这个问题引导到一个理论问题，即阶级斗争最后总是要打一仗，要和平过渡很困难。西藏这么一小块地方，反动派只有两万人，这么少，还是要打一仗，他们要同我们较量一下。所以我同外国同志们谈话，总要讲，要做好思想准备，不要在精神上解除武装，不要想不打一仗就能夺取政权。公开讲，我们要从两方面提，首先提愿意和平解决问题，和平过渡夺取政权。第二，资产阶级向我们开炮，我们就要打。

《同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九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84—185页

如果达赖赞成我们的主张，我们希望达赖回来。只要他赞成两条，第一，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二，在西藏要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革，他就可以回来。……如果达赖对以上两条不改变他现在的态度，我们就不欢迎他；如果他改变态度，我们就真正欢迎他。现在要达赖改变态度，赞成不分裂国家，赞成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革，是很难的。但是，世界形势一变，情况就会不同。

《关于中印关系和达赖喇嘛回国问题》(一九五九年十月六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206—207页

十一、宗教问题

(一) 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尊重宗教信仰自由

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存在。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以保护。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1092页

各民主党派和宗教界要进行教育，不要上帝国主义的当，不要站在敌人方面。拿佛教来说，它同帝国主义联系较少，基本上是和封建主义联系着。因为土地问题，反封建就反到了和尚，受打击的是住持、长老之类。这少数人打倒了，“鲁智深”解放了。我不信佛教，但也不反对组织佛教联合会，联合起来划清敌我界限。

在全国政协常委一届三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一九五二年八月四日）

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

《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谈话的要点》(一九五二年十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39页

宗教信仰也全照老样子,以前信什么,照样信什么。宗教信仰自由,可以是先信后不信,也可以是先不信后信。在中国,信仰宗教的人不少。信耶稣教的有八十万人;信天主教的有三百万人;信伊斯兰教的有一千多万人;信佛教的更多,有几千万人;还有信道教的,数目也很大,约有一千多万人。人们的宗教感情是不能伤害的,稍微伤害一点也不好。除非他自己不信教,别人强迫他不信教是很危险的。这件事不可随便对待。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也还会有信仰宗教的。

《同藏族人士的谈话》(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页

(二) 宗教不能人为地取消,也需要进行一些改革

宗教在阶级社会更加发展,并为剥削阶级所利用。因之,宗教的消灭,只有在人类消灭了阶级并大大发展了控制自然和社会的能力的时候,才有可能。

《对习仲勋在中共新疆省第二届代表会议上的报告的批语》(一九五二年九月九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539—540页

西藏的宗教和在国内其他地方的宗教一样,是已经受到尊重和保护,并且还将继续受到尊重和保护。只要人民还相信宗教,宗教就不应当也不可能人为地去加以取消或破坏。

《给达赖喇嘛的信》(一九五三年三月八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93—94页

进步分子主张改革，旧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西藏地方大，现在人口太少了，要发展起来。这个事情，我跟达赖讲过。我说，你们要发展人口。我还说，你们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赞成你们信。但是，有些规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们一百二十万人里头，有八万喇嘛，这八万喇嘛是不生产的，一不生产物质，二不生产人。你看，就神职人员来说，基督教是允许结婚的，回教是允许结婚的，天主教是不允许结婚的。西藏的喇嘛也不能结婚，不生产人。同时，喇嘛要从事生产，搞农业，搞工业，这样才可以维持长久。你们不是要天长地久、永远信佛教吗？我是不赞成永远信佛教，但是你们要信，那有什么办法！我们是毫无办法的，信不信宗教，只能各人自己决定。

《关于西藏平叛》（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
第40—41页

关于宗教，我们的政策很明白，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看来，宗教寺庙也需要进行改革。……

青海有个地方，大概是香日德，改革中有个庙被群众砸了，干部去阻止，群众同干部还起了冲突。其他地方的寺庙，我们都保护下来了。对宗教寺庙，过去人民政府就是保护的。五台山有些喇嘛庙，在土地改革中农民要砸，我从那里经过，给制止了。现在，被砸过的寺庙，当地人民政府正在组织重修。

你们在精神上要有准备。改革以后，有一个时期喇嘛可能要减少。有些喇嘛要回家，但他们不是不信佛教了。当然年老的还是愿意留在寺庙。你们要把工作范围放广大一点，在寺庙和不在寺庙的佛教徒都是归你们领导的。宗教寺庙如何改革，我

想你们应该考虑一个办法。

《西藏平叛后的有关方针政策》(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56页

(三) 要重视研究宗教, 学习宗教知识

我们要将全中国都搞好, 再把眼光放大, 要把全世界都搞好。佛教的教义也有这个思想。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的。他主张普渡众生, 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 他不当王子, 创立了佛教。因此, 你们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 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受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有共同之处的。当然有许多不同之点。

《同达赖喇嘛的谈话》(一九五五年三月八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14页

我赞成有几千人学经, 成为佛学知识分子, 你看是不是他们同时还要学些社会科学、自然科学, 懂得政治、科学、文化及一般知识。比如你, 在宗教方面是专长, 如果不懂得政治、科学、文化和缺少一般知识, 那你的领导工作就很难做。

佛学不可不学。我们办了个佛学院, 两年毕业, 专搞政治。我看这个办法不行, 得搞四年, 再拿两年专门研究佛学。政治上好, 在佛学方面却没有学问, 还是不行的。我国现在有佛学学问的人, 你当然是一个, 其他除了喜饶嘉错以外还有谁? 很少吧?

……

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信教, 我们不懂得宗教。我赞成有一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宗教的经典, 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

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中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是不行的。

《同班禅额尔德尼的谈话》（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215—216页

宗教问题，有几千人学经，学政治和各种知识；同时使他们懂得过去有十一万喇嘛，现在留下几千人专门学经，有近十万人从事生产，这对发展经济和人口有很大好处。

《同班禅额尔德尼的谈话》（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216页

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现代佛学》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其他刊物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

《加强宗教问题的研究》（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53页

十二、工人、青年和妇女问题

（一）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

1. 工人阶级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革命的领导阶级

（参见第二编“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第400—403页；第八编“关于党的建设”，第1853—1865页）

2. 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

中国工人阶级，二十年来，在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展开了英勇的斗争，成了全国人民中最有觉悟的部分，成了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和领导者。中国工人阶级联合农民和一切革命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斗争，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这个功劳是非常之大的。但是中国革命尚未成功，还须付出很大的气力，团结自己，团结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团结知识分子，团结一切革命的人民。这是极大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这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责任，这是整个工人阶级的责任。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最后解放，只能在社会主义实现的时代，中国工人阶级必须为此最后目的而奋斗。但是必须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阶段，才能进到社会主义的阶段。所以，团结自己和团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当前的任务。

《〈中国工人〉发刊词》(一九四〇年二月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27页

中国工人阶级,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开始以自觉的姿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而斗争。一九二一年,产生了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使中国的解放斗争进入了新阶段。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三个时期中,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了极大的努力和极有价值的贡献。在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特别是在收复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斗争中,中国工人阶级将起着极大的作用。在抗日结束以后,可以预断,中国工人阶级的努力和贡献将会是更大的。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81页

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同时即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27—1428页

在劳资关系中,应当依靠工人阶级,而不是依靠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是不能依靠的。这些都是必须坚持的原则，我们不要为某些现象所迷惑。

《关于土地改革和财经工作》(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5—26页

兹将邓小平同志一月八日的报告转给你们,可以看出西南工作的概况。其中提到西南已开了一次城市工作会议,着重地批判了党内较为普遍的看不起工人的思想,明确依靠工人阶级应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应把它贯彻到各项工作各个部门中去等语。……请你们考虑,腾出一段时间,在五月一日以前,召开一次城市工作会议,着重地研究和解决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问题,工厂管理问题,工会工作问题,为四中全会讨论这个问题准备意见。

《加强城市工作,依靠工人阶级》(一九五一年一月、二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32—133页

向干部做教育,明确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45页

3. 逐步改善职工的生活,把工人阶级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反对片面的福利观点

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得优益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这是宗旨所在,希望劳工会诸君特别注意的。

《所希望于劳工会的》(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6页

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将采取调节劳资间利害关系的政策。一方面，保护工人利益，根据情况的不同，实行八小时到十小时的工作制以及适当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保障工会的权利；另一方面，保证国家企业、私人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在合理经营下的正当的赢利；使公私、劳资双方共同为发展工业生产而努力。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82页

解放区劳资关系必须取合作方针，以达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无论公营、私营，都是如此。任何工厂，工会与党支部必须与厂方协同制定生产计划并协同执行之，力求以较低之成本，得较多较好之产品，从此获得较多之盈利，劳资双方有利。工人之福利必须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中求之，任何片面的过火要求，都将破坏解放区的经济。

《关于工业与工运问题的方针》（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四日、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01—102页

必须指出，直到现在，中国共产党内，还有不少的党员，不少的干部，不少的工会工作人员，甚至有不少的担负高级领导职位的领导人员，并不了解党的工业政策与职工运动的路线。他们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他们只知道片面的、狭隘的、近视的所谓“工人利益”，而不能稍微看远一点。他们忘记了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四年时期内实行过的那种“左”倾冒险主义的工业政策与职工运动路线曾经给予工人阶级、劳动人民与革命政府以何等重大的损害。他们完全不研究一九三七年以来十一年内中共中央历次发布的正确的工业政策与职工运动方针。他们

固执地抵抗党的路线。许多党的地方领导机关在长时期内，甚至没有正式讨论与宣传解释过中央的路线，以致于使得工运工作同志完全不了解中央的路线，他们竟达到如此麻木不仁的地步。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党的一切地方领导机关必须严肃地讨论中央的路线及全部工业政策与工运方针，坚决地纠正一切危害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及革命政府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想、政策与办法，迅速地使工业建设与工人运动走入正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聚积一切力量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反对职工运动中的“左”倾冒险主义》（一九四八年二月五日），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48—49页

应当向工会同志和工人群众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决不可只看到眼前的片面的福利而忘记了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应当引导工人和资本家在当地政府领导下，共同组织生产管理委员会，尽一切努力降低成本，增加生产，便利推销，达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支援战争的目的。许多地方所犯的错误就是由于全部、大部或一部没有掌握上述方针而发生的。

《关于工商业政策》（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85页

力争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工人生活。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八日），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45页

在实施增产节约的同时，必须注意职工的安全、健康和必不可少的福利。如果只注意前一方面，忘记后一方面，那

是不对的。

《必须注意职工的安全、健康和福利》(一九五二年八月三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第54页

在指出“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这种说法不甚确切时,不要使工人们觉得今后好像只要生产,不要福利了,而要说明这句话不如“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工人的生活”这样说较为确切些。

《对“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口号的意见》(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一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第57页

拿工人讲,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页

4. 重视培养工人阶级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队伍

(参见第六编“关于思想宣传工作和文化工作”,第1658—1696页)

5. 工人阶级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当然,剥削者的改造和劳动者的改造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改造,不能混为一

谈。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3页

（二）青年和青年工作

1. 中国青年在革命中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

在二十年前的今天，由学生们参加的历史上叫做五四运动的大事件，在中国发生了，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运动。“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这是全国除开顽固分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认的。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

《青年运动的方向》（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65页

二十年前，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的青年，是真正的模范青年，因为他们反对卖国政府，在五四运动中流了血，参加了那样的斗争。这些青年是革命的先锋队，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独立、自由、幸福，进行了那样的斗争，英勇得很。到今天留下下来的还不少，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北青年救国会中的许多优秀分子，就是那时候留下来的。那时候的革命青年，后来有不少成为共产党员。

《永久奋斗》（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90页

数十年来，中国已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在这一群人中间，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辛亥革命前的留学生运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运动，就是显明的例证。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41页

五四运动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如果没有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是不可想像的。有些人以为学生运动没有力量。但是事实怎样呢？广大学生群众的五四运动，推动“六三”全国性的罢工、罢市、罢课的反帝和反卖国政府的斗争，发展成为全民族的运动。五四运动以后，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五卅运动，发动了北伐战争，造成了第一次大革命。那末，很明显，没有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是不可能的。五四运动的的确确给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思想，准备了干部。

至于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

《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51—252页

一二九运动发生在红军北上抗日到达了陕北之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帮助了一二九运动，同时，一二九运动也帮助了红军，这两件事的结合，就帮助了全民抗战的发动，帮助了中华民族，增进了全民族的利益。

《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53页

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口号是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亦即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蒋介石颁布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蒋介石的军警宪特同学生群众之间，到处发生冲突。蒋介石用逮捕、监禁、殴打、屠杀等项暴力行为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学生运动因而日益扩大。一切社会同情都在学生方面，蒋介石及其走狗完全陷于孤立，蒋介石的狰狞面貌暴露无遗。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过去五四运动时期和一二九运动时期的历史经验，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24—1225页

2. 世界是属于青年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在莫斯科大学会见中国留学生时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50页

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

《在莫斯科大学会见中国留学生时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51页

世界是青年的，长江后浪催前浪，譬如积薪、后来居上。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一九五八年五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95页

3. 青年应当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发扬艰苦创业永久奋斗的精神

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政治方向可以有許多不同的方向，你们要学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这就是要打日本、怎样打日本、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能打倒的正确的政治方向。

《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一九三八年四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16页

我看你们都是没有胡须的，没有胡须的人名之曰青年，青年人是有勇气的，但你们要到长了胡须的时候（自然女同志是不会生胡须的），到老到死，都不动摇，不退缩。革命的过程，像在波涛汹涌的江河中行船，怯懦者常常会动摇起来，不知所措。在革命的大浪潮中遇到困难便动摇退缩的人在历史上是有的，希望你们中间没有这样的人，你们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建设新中国而永不退缩，勇往直前，要坚决地为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奋斗到底！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是为了自己的家，而是为了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家，牺牲一切。所以第一个决心是要牺牲升官，第二个决心是要牺牲发财，第三更要下一个牺牲自己生命的最后的决心！现在你

们牺牲升官、发财及吃小米饭、爬清凉山的初步决心是有了，但没有最后的决心是不够的，你们更要有为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牺牲自己贡献生命的决心！

《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一九三八年四月九日），《毛泽东文集》
第2卷第119页

中国的青年运动有很好的革命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永久奋斗”。我们共产党是继承这个传统的，现在传下来了，以后更要继续传下去。

《永久奋斗》（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
190页

什么是模范青年？就是要有永久奋斗这一条。其他的当然也要有，如刚才冯文彬同志讲过的智育、德育、体育、美育、群育等等，但据我看来，“永久奋斗”才是最主要的一条，没有这一条，什么都是空的。……我们说：永久奋斗，就是要奋斗到死。这个永久奋斗是非常要紧的，如要讲道德就应该讲这一条道德。模范青年就要在这一条上做模范。其他方面要做模范的是非常多的，例如，在政治上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光有这个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不够的，过了三年五年，就把它丢了，那还不是枉然？所以，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后，还要坚定，就是说，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个方向是不可动摇的，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气来坚持这个方向。这样的青年，才是真正的模范青年。这样的道德，才算是真正的政治道德。

《永久奋斗》（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
190—191页

今天在座的模范青年，要跟这些反共分子作斗争，反对妥协投降，反对反共。你们的前途是光明的，你们要代表全国大多数的老百姓，代表一切爱国的人，抗日的人，求中国独立、自由、幸福的人，并且是要永远的代表他们。将来你们老了，教育你们的儿子也要代表他们，儿子再告诉儿子，孙子再告诉孙子，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并且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传遍全中国，不达目的不止。我们一定要这样努力去做，长期去做，一定要把革命干成功，干到底。模范青年们，你们要切记这一点——“永久奋斗”。

《永久奋斗》（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93—194页

要提倡勤俭建国。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气力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实际的想法。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6页

4. 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必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

（参见第六编“关于思想宣传工作和文化工作”，第1683—1689页）

5. 青年人要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

十四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们，要学习，要工作，但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如果对青年长身体不重视，那很危险。青年比成年人更需要学习，要学会成年人已经学会了的许多东西。但是，他们的学习和工作的负担都不能过重。尤其是十四岁到十八岁的青年，劳动强度不能同成年人一样。青年人就是要多玩一点，要多娱乐一点，要跳跳蹦蹦，不然他们就不高兴。以后还要恋爱、结婚。这些都和成年人不同。

我给青年们讲几句话：一、祝贺他们身体好；二、祝贺他们学习好；三、祝贺他们工作好。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77页

我只给你们讲三句：第一，青年人既要勇敢又要谦虚；第二，祝你们身体好、学习好、将来工作好；第三，和苏联朋友要亲密团结。

《在莫斯科大学会见中国留学生时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51页

6. 团组织要善于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照顾青年特点开展工作

青年团要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但在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当中，要有自己的独立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一九五二年我同团中央的同志谈话，出了两个题目要团中央研究，一个是党如何

领导团的工作，一个是团如何做工作。两个题目，都包含了如何照顾青年的特点。各地方党委反映，对青年团的工作是满意的，满意就在配合了党的中心工作。现在要来个不满意，就是说青年团的工作还没有适合青年的特点，搞些独立的活动。党和团的领导机关，都要学会领导团的工作，善于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照顾青年特点，组织和教育广大青年群众。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76页

青年团要照顾青年的特点，要有自己的系统的工作，同时又要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并不是什么新发明，老早就有了的，马克思主义历来就是这么讲的。这是从实际出发。青年就是青年，不然，何必要搞青年团呢？青年人和成年人不同，女青年和男青年也不同，不照顾这些特点，就会脱离群众。你们现在有九百万团员，如果不注意青年的特点，也许就只有一百万拥护你们，八百万不拥护你们。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79页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多数，同时注意先进青年。这样，可能有些先进分子不过瘾，他们要求对全体团员都严一些。这就不那么适当，要说服他们。团章草案规定的义务多了，权利少了，要放宽一点，使多数人能跟上去。重点要放在多数，不要只看到少数。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79页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

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希望各地的党组织，协同青年团组织，注意研究如何特别发挥青年人的力量，不要将他们一般看待，抹杀了他们的特点。当然青年人必须向老年人和成年人学习，要尽量争取在老年人和成年人同意之下去做各种有益的活动。老年人和成年人的保守思想是比较多的，他们往往压抑青年人的进步活动，要在青年人做出了成绩以后他们才心服，本文就是很好地描写了这种情况。对于保守思想当然是不应当妥协的，那末好吧，就来试试看，成绩出来了，他们也就同意了。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66页

（三）妇女和妇女工作

1. 妇女是中国革命中决定胜败的一个伟大力量

妇女占人口的半数，劳动妇女在经济上的地位和她们特别受压迫的状况，不但证明妇女对革命的迫切需要，而且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以后对妇女要有切实的口号，作普遍的宣传。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98—99页

妇女在革命战争中的伟大力量，在苏区是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在查田运动等各种群众斗争上，在经济战线上（长冈乡是主要依靠她们），在文化战线上（许多女子主持乡村教育），在军事动员上（她们的扩大红军与慰劳红军运动，她们的当短

夫),在苏维埃的组织上(乡苏中女代表的作用),都表现她们的英雄姿态与伟大成绩。这里女工农妇代表会的领导与推动,是紧要的关节。女工农妇代表会,首先应该抓紧妇女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跟着这些问题的动员,联系到一切政治的动员。在这一点上,许多地方的注意是非常不够的,就是长冈乡也还缺乏充分注意。每个乡苏维埃,都应该把领导女工农妇代表会的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上。

《长冈乡调查》(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14页

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到之之法,艰苦奋斗,世无难事,有志竟成。有妇人焉,如旱望云,此编之作,伫看风行。

给延安出版的《中国妇女》杂志的题词(一九三九年六月一日),
《毛泽东题词墨迹选》第21页

2. 中国妇女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

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生产活动,具有极大的意义。在生产中,必须实现男女同工同酬。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52—453页

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要发动妇女参加劳动,必须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58页

3. 改善和提高妇女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真正实现男女平等

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是密切地联系着的，妇女解放运动应成为社会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存在着。离开了社会解放运动，妇女解放是得不到的；同时，没有妇女运动，社会解放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要真正求得社会解放，就必须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来参加；同样，要真正求得妇女自身的解放，妇女们就一定要参加社会解放的斗争。

《妇女们团结起来》（一九三九年三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69页

依据男女平等原则，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提高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发挥妇女在经济上的积极性，保护女工、产妇、儿童，坚持自愿的一夫一妻婚姻制。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36页

妇女工作者本身必须学得农村经济知识，了解妇女生产内容，才能真正成为农村群众生产的组织者与指导者。许多有能力的女同志必须到合作社去工作。再则许多女党员、女干部必须到国营经济机关中去工作，使国营经济发展起来。那些浮在上层，空闲无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妇女工作者应参加经济工作》（一九四三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8页

团结起来，参加生产和政治活动，改善妇女的经济地位和

政治地位。

《为〈新中国妇女〉杂志创刊号题词》(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04页

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能实现。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53页

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现在还只是开始,真正平等要到社会主义,几十年以后。妇女中有极大的潜在劳动力还没有发挥,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才有发挥的机会。歧视妇女、不重视妇女的事,要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改掉。在中国,妇女有三亿人口,妇女问题一定要安排好,要同男子同工同酬,在合作社、工厂都要一样。妇女要争取到正当地位好困难,因此要一有机会就说,要统筹安排,同工同酬。

《工商业者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91页

不尊重妇女权利的情况,是在阶级社会产生后才开始的。在阶级社会出现以前,有一个女权时代,妇女是占统治的地位,听说那时候她们不需要打扮,而相反地男人却要打扮,以获得她们的欢喜。只有当阶级社会不存在了,笨重的劳动都自动化了,农业也都机械化了的时候,才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农业合作化以后,妇女们参加了生产,在经济上显出了能力。过去她们搞家务多,搞农业生产少,现在她们参加农业生产,权利也增加了。但是合作化后,农业生产还是主要靠体力劳动,妇女又要兼顾家务,所以只有当农业机械化以后,才能根本改变这种

情况。现在，在重工业部门中，主要还是男同志从事劳动，轻工业部门中女同志比较多。

《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51—152页

十三、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

（一）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

1. 十月革命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

（参见第二编“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第435—439页）

2.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成为主流，国际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

法西斯侵略国家被打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和平实现以后，并不是说就没有了斗争。广泛地散布着的法西斯残余势力，一定还要捣乱；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阵营中存在着反民主的和压迫其他民族的势力，他们仍然要压迫各国人民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所以，国际和平实现以后，反法西斯的人民大众和法西斯残余势力之争，民主和反民主之争，民族解放和民族压迫之争仍将充满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克服了法西斯残余势力、反民主势力和一切帝国主义势力，才能有最广泛的人民的胜利。到达这一天，决不是很快和很容易的，但是必然要到达这一天。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给这个战后人民斗争的胜利开辟了道路。也只有这后一种斗争胜利了，巩固的和持久的和平才有保障。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1031—1032页

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目前反动的逆流企图压倒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现在依然如斯大林很早就说过的样子，旧世界有三个大矛盾：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三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这三种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发展得更尖锐了，更扩大了。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所以虽有反苏反共反民主的逆流存在，但是这种反动逆流总有一天会要被克服下去。

《愚公移山》（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103页

现在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60页

如果说，十月革命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那末，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就是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的意义估计不足，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后，代替法西斯德意日的地位而疯狂地准备着新的世界战争、威胁全世界的美国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们，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极端腐败及其濒于灭亡

的恐怖情绪。这个敌人还是有力量的，因此，每一个国家内部的一切革命力量必须团结起来，一切国家的革命力量必须团结起来，必须组成以苏联为首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并遵循正确的政策，否则就不能胜利。这个敌人的基础是虚弱的，它的内部分崩离析，它脱离人民，它有无法解脱的经济危机，因此，它是能够被战胜的。对于敌人力量的过高估计和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计不足，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57—1358页

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是亚非各国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殖民主义者想尽一切办法企图扭转这个形势。但是，正像去年埃及人民和现在叙利亚人民向全世界所表明的那样，殖民主义者的一切阴谋和挑衅一定会遭到最惨重的失败。中国人民坚决支持亚非各国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

《在欢迎印度副总统拉克里希南宴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九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82—583页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苏联的两颗人造卫星上了天，这两件事标志了两大阵营力量对比的新的转折点。十月革命产生了新世界，经过四十年，新世界的力量已经超过了旧世界。现在全世界有二十七亿人口，社会主义各国的人口将近十亿，独立了的旧殖民地国家的人口有七亿多，正在争取独立或者争取完全独立的国家的人口有六亿，帝国主义阵营的人口不过四亿左右，而且他们的内部是分裂的。现在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

《在莫斯科大学会见中国留学生时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49页

世界的风向变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现在全世界共有二十七亿人口，社会主义各国的人口将近十亿，独立的旧殖民地国家的人口有七亿多，正在争取独立或者争取完全独立以及不属于帝国主义阵营的资本主义国家人口有六亿，帝国主义阵营的人口不过四亿左右，而且他们的内部是分裂的。那里会发生“地震”。现在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

《在莫斯科大学会见中国留学生时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50页

现在我感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21页

四分五裂，这就是西方世界的形势。目前正在逐步破裂的过程中，还没有最后破裂，但是向着最后破裂前进，最后破裂是不可避免的。过程时间，可能相当长，非一朝一夕。所谓西方团结是一句空话。团结也是有的，杜勒斯正在努力。但是要求“团结”在美国的控制之下，在原子弹下面要求他的大小伙伴们向美国靠拢，交纳贡物，磕响头称臣，这就是美国人的所谓团结。这种形势，势必走向所谓团结的反面：四分五裂。同志们，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西方世界势必走向四分五裂》（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61页

现在的国际局势，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局势紧张多了。当时，资本主义还有一个相对稳定时期，除了苏联以外，其他国家的革命都失败了，英国和法国很神气，各国资产阶级对苏联也不那么怕。除了德国的殖民地被剥夺以外，整个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并没有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意、日三个帝国主义国家垮台了，英、法也削弱了，衰落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十几个国家成功，殖民体系瓦解了。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再也不能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样的相对稳定了。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第314—315页

3. 争取国际局势的缓和，辩证地看待紧张和冷战共处

我想，不仅战争，就是紧张局势也使制造紧张局势的人一方面得利，另一方面又受到损害。我想问问，究竟是使人民感到安全有利呢，还是使人民每天处于紧张有利？紧张局势会促进人民觉悟，使他们做好准备，抵抗压力。这是有助于革命的。

《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四次谈话》（一九五四年十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69页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殖民主义阵地的缩小，符合于西方国家要求社会解放的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政党的利益，他们从这里找到了有力的同盟军。而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持久和平可能性的出现，则符合一切不愿意战争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所以，就西方国家来说，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力量可以作为我们和平事业的同盟军。我们必须重视西方国家内部的工人运动和人民运动的发展。

《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六年八月、九月)，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140页

社会主义各国的政府和人民是和平的新生活的建设者。我们完全不需要战争，并且坚决反对新的世界大战。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贯地为和缓国际紧张局势而努力。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16页

我们每天都是要求缓和紧张局势，紧张局势缓和了对世界人民是有利的。那末，凡是紧张局势就对我们有害，是不是？我看也不尽然。这个紧张局势，对我们并不是纯害无利，也有有利的一面，什么道理呢？因为紧张局势除了有害的一面外，还可以调动人马，调动落后阶层，调动中间派起来奋斗。怕打原子战争的，就要想一想。你看金门、马祖打这样几炮，我就没有料到现在这个世界闹得这样满城风雨，烟雾冲天。这就是因为人们怕战争，怕美国到处闯祸。全世界那么多国家，除了一个李承晚之外，现在还没有第二个国家支持美国。可能还加一个菲律宾，叫做“有条件的支持”。比如伊拉克革命，还不是紧张局势造成的？紧张局势并不取决于我们，是帝国主义自己造成的，但是归根结底对于帝国主义更不利。这个观点列宁说过的，他是讲战争，他说，战争调动人们的精神状态使它紧张起来。现在当然没有战争，但是这种在武装对立的情况下的紧张局势也是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且使落后阶层想一想的。

《关于国际形势问题》(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09—410页

我想可以公开告诉世界人民，紧张局势比较对于西方国家

不利，对于美国不利。利在什么地方呢？中东紧张局势对于美国有什么利？对于英国有什么利？还是对于阿拉伯国家有利些，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各洲爱好和平的人民有利些。台湾的紧张局势究竟对谁有利些呢？比如对于我们国家，我们国家现在全体动员，如果说中东事件有三四千万人游行示威、开会，这一次大概搞个三亿人口，使他们得到教育，得到锻炼。这个事情对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也好吧，各党派有一个共同奋斗目标，这样一来，过去心里有些疙瘩的，有些气的，受了批评的，也就消散一点吧。就这样慢慢搞下去，七搞八搞，我们大家还不就是工人阶级了。所以，帝国主义自己制造出来的紧张局势，结果反而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我们几亿人口有利，对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各阶级，各阶层，政府，我看都有利。他们得想一想，美国总是不好，张牙舞爪。

《关于国际形势问题》（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16页

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到处制造紧张局势，以期达到它侵略和奴役各国人民的目的。美帝国主义自以为紧张局势总是对它自己有利，但是事实是，美国制造的这些紧张局势走向了美国人愿望的反面，它起了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作用。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如果坚持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势必有一天要被全世界人民处以绞刑。其他美国帮凶也将是这样。

《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新闻稿》（一九五八年九月八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406—407页

整个国际形势是在好转。西方的高压政策、实力地位政策，

或者说是冷战政策，已难以继续下去了。西方统治集团，比如美国集团、英国集团的大部分，都对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抱有恐惧。如果说冷战形势有所缓和，那是因为以往的冷战政策对他们不利了，所以才有些改变，才使形势缓和下来。但情况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他们有两手：使形势有所缓和，这是一手；另外一手，当缓和对他们不利的时候，又挑起紧张局势。这就是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他们的“爱好和平”和我们的爱好和平是不完全一致的。比如美国垄断资本同日本垄断资本，日本垄断资本同日本人民，都是有区别的。垄断资本本身也有区别，有卖国部分和其他部分的区别。即便一个集团内部，例如艾森豪威尔集团内部，也不那么简单，也有两面性。我们有困难，他们也有，他们的困难比我们更多。我们利用他们的困难争取和平是可能的，而且和平时间不会是很短的。就是说，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你们应当利用他们内部的矛盾。他们是一定有困难的，正因为有困难才要缓和，否则何必缓和呢？

《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一九五九年十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91—92页

国际紧张局势是帝国主义制造的，但走向了它的反面。紧张局势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使他们觉得对他们不利了，不利于他们保存资本主义和消灭社会主义的目的了。杜勒斯的那一套对他们所要达到的这个目的是不利的，他们想走出这条很窄的路。如果紧张局势有利于他们达到保存资本主义和消灭社会主义的目的，就不能想像他们会有所改变。看来他们了解到这种不利，要有些改变，而且他们害怕战争。大家知道两次世界大战对他们都不利，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他们将更加不利。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战争打起来对它是很不利的。

缓和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都有利，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兄弟党以及世界和平力量斗争的结果。再有十年和平是很好的，中国和苏联能再搞几个五年计划那好得很。

但是还要看到另一面，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军火工业和夺取外国的利益，需要一定程度的紧张局势。例如在赫鲁晓夫访美以后，美国就在一些国家建立了火箭基地，又在联合国大叫大嚷西藏问题，可见他们还要制造紧张局势。所以我们要警惕。

《同澳共总书记夏基的谈话》（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97—98页

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

我们要有两个方面的准备。一个是继续冷战，另一个是把冷战转为和平共处。

冷战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坏的一面是它有可能转为热战。好的一面是有可能转为和平共处。

我们说有好处，因为美国制造紧张局势，就制造更多反对它的人，例如在南朝鲜、日本、土耳其以及拉丁美洲，很多国家都反对美国人的控制。这是美国人自己造成的。

《同蒙哥马利的谈话》（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81—182页

4. 新的世界大战的两种可能性和我们的态度

● 世界大战存在着打得起来和打不起来两种可能性，经过努力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

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因此，美、英、法同苏联的关系，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是或者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的问题。所谓妥协，是指经过和平协商达成协议。所谓较早较迟，是指在几年或者十几年之内，或者更长时间。

《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九四六年四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84—1185页

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增强起来的经济力量，遇着了不稳定的日趋缩小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这种市场的进一步缩小，就要引起经济危机的爆发。美国的战争景气，仅仅是一时的现象。它的强大，只是表面的和暂时的。国内国外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就像一座火山，每天都在威胁美国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就是坐在这座火山上。这种情况，迫使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建立了奴役世界的计划，像野兽一样，向欧亚两洲和其他地方乱窜，集合各国的反动势力，那些被人民唾弃的渣滓，组成帝国主义和反民主的阵营，反对以苏联为首的一切民主势力，准备战争，企图在将来，在遥远的时间内，有一天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败民主力量。这是一个狂妄的计划。

全世界民主势力必须打败这个计划，也完全能够打败它。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优势是在我们方面，不是在敌人方面。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59页

世界上的反动派是要搞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的危險是充分存在着，但战争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在杨家沟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333页

对国际形势，去年十二月会议曾作过估计。当时党内意见不一致，就在中央委员会中意见也不一致。提法是两种：一种是或者和平或者战争；一种是有战争危险，但是不致爆发战争。有战争危险是共同的，或和或战就不一样。前一种提法，认为全世界人民力量尚不足以制止战争。后一种提法，认为苏联及全世界人民能够动员力量制止战争，美、英反动派对战争也未准备好，我们可以争取时间制止战争，因此，我们有任务动员全世界人民的力量制止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第一次大战后不同，制止战争的可能性更大。第二次大战打败了德、日法西斯，要把他们再扶起来还不容易。美、英反动派确在准备战争，战争危险确实存在着。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民主力量，已超过反动力量（莫洛托夫、日丹诺夫都这样说了，我们党内有些同志，特别是中间派还看不清楚），而且还在继续发展，所以战争危险必须而且必能克服，其条件就是要努力。时间如能争取十年到十五年，就必能制止战争。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一九四八年九月），《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31—132页

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67—68页

第一条，谁怕谁多一点。我看美国人是怕打仗。我们也怕打仗。问题是究竟哪一个怕得多一点。这也是个观点，也是个看法。请各位拿了这个观点去看一看，观察观察，以后一年、二年、三年、四年，就这样观察下去，究竟是西方怕东方多一点，还是我们东方怕西方多一点？据我的看法，是杜勒斯怕我们怕得多一点，是英、美、德、法那些西方国家怕我们怕得多一点。为什么他们怕得多一点呢？就是一个力量的问题，人心的问题。人心就是力量，我们这边的人多一点，他们那边的人少一点。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这三个主义中，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比较接近。而民族主义占领的地方相当宽，有三个洲：一个亚洲，一个非洲，一个拉丁美洲。即使这些洲里头有许多统治者是亲西方的，比如泰国、巴基斯坦、菲律宾、日本、土耳其、伊朗等国的，可是人民中间亲东方的不少，可能是相当多。就是垄断资本家以及中了他们的毒最深的人是主张战争的。除了垄断资本家，其他的人，大多数（不是全体）是不愿意战争的。比如北欧几个国家，当权的也是资产阶级，他们是不愿意战争的。力量对比是如此。因为真理是抓在大多数人手里，而不抓在杜勒斯手里，他们的心比我们虚，我们的心比较实。我们依靠人民，他们是维持那些反动统治者。现在杜勒斯就干这

一套，他就专扶什么蒋委员长、李承晚、吴庭艳这类人。我看是这样，双方都怕，但是他们怕我们比较多一点，因此战争是打不起来的。

《关于国际形势问题》（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07—408页

我们历来是这样估计的，整个国际形势是向好发展，不是向坏。只是有个情况也要估计到，那就是疯子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办？所以，战争的情况也要估计到。和平有可能被破坏，缓和之后又会搞紧张，搞突袭，打大战，等等。对这些情况都估计到了之后，我们说总的看来，形势是向好的方面发展的。从总的情况来看，争取到十年至十五年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假如这种情况实现了，那时要打世界大战，他们比现在更加困难了。那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要比现在大得多。西方国家的矛盾，日美矛盾，由基地和条约而造成的许多矛盾，都很难解决。

《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一九五九年十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92页

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

《关于世界大战的两种可能性》（一九六九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32页

现在到处讲和平，我看危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头几年，不讲和平，不要说要缓和紧张，而现在大讲特讲！没有病，就不要看医生。有病，他就要看医生。现在地球害病，所以要讲缓和紧张，缓和国际紧张，要讲和平。现在给地球治病。我

是持怀疑态度。国际会议这么多，美国这个国务卿到处跑，相当怪！黄昏的时候，燕子忙，飞得低，雨要下了！

《关于国际问题几次谈话的要点》（一九七四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17页

● 我们应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工作

（参见第五编“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和国防建设”，第1461—1463页）

● 我们对世界大战的态度，第一是反对，第二是不怕

世界大战不爆发，当然对中国革命有利得多。苏联不打仗，养精蓄锐，我们有可能得到国际方面的援助。有世界民主力量对我们帮助，这意义是很大的。但是如果我们估计不足，世界大战来了，怎么办？还不是要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么办法？世界大战来了，这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大困难，也是我们的大困难。但是，中国人民，尤其是共产党人，经过了多年战争，对此是不怕的。我们有了精神准备，就会更好一些。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一九四八年九月），《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44页

现在世界各国的人们都在谈论着会不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有精神准备，也要有分析。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苏联，两亿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

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共九亿人口。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8—239页

第一，我们不要打，而且反对打，苏联也是。要打就是他们先打，逼着我们不能不打。第二，但是我们不怕打，要打就打。我们现在只有手榴弹跟山药蛋。氢弹、原子弹的战争当然是可怕的，是要死人的，因此我们反对打。但是这个决定权不操在我们手中，帝国主义一定要打，那末我们就得准备一切，要打就打。就是说，死了一半人也没有什么可怕。这是极而言之。在整个宇宙史上来说，我就不相信要那么悲观。我跟尼赫鲁总理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说，那个时候没有政府了，统统打光了，想要讲和也找不到政府了。我说，哪有那个事，你这个政府被原子弹消灭了，老百姓又起一个政府，又可以议和。世界上的事情你不想到那个极点，你就睡不着觉。无非是打死人，无非是一个怕打。但是它一定要打，是它先打，它打原子弹，这个时候，怕，它也打，不怕，它也打。既然是怕也打，不怕也打，二者选哪一个呢？还是怕好，还是不怕好？每天总是怕，在干部和人民里头不鼓起一点劲，这是很危险的。我看，还是横了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

《关于国际形势问题》（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12页

● 帝国主义如果发动世界大战，只能加速自己的灭亡

如果再要打仗的话，不知道美国军事集团是怎样的想法。他们过去的经验是在两次大战中得到利益和发展，他们希望通过再一次战争得到更大的利益和发展。他们是根据自己的经验这样想的，但是，这只是一方面的经验；另一方面，两次大战以后还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和爱国党派领导的国家。如果再打大战，我看美国不一定得利，而且美国本身就会发生问题。如果再打大战，西亚和非洲的大部或全部、整个拉丁美洲都会脱离帝国主义。

《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四次谈话》（一九五四年十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66页

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但是我看，再打大战，对美国来说是划不来的，整个世界或世界的绝大部分将处于革命状态。我这样说，并不是故意危言耸听，而是根据两次大战的实际情况。如果再打大战，我看对美国没有任何好处，只能使它的统治范围缩小。

《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四次谈话》（一九五四年十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67页

自人类有史以来，只打过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打出个苏联来，第二次打出八亿人口的人民民主国家。自第二次大战后还出现了两类新的国家：第一类是中国及人民民主国家，第二类是独立及半独立的印度、缅甸、印尼等。所以不待事实出现，就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发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世界就要完结。如果有疯子要发动战争，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灭亡的是帝国主义。

《美国可怕，又不可怕》（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06—207页

打仗总是不好的，特别是对西方国家是没有好结果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战争中固然双方都损失物资和生命，但是，历史证明战争有一个政治后果对西方国家是不利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俄解脱了旧有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和许多国家得到了解放。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两种结果：第一，产生了像中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由共产党管事的国家；第二，像在印尼、印度、缅甸这样的许多亚非国家中，民族主义者所领导的运动使这些国家成为独立自主或者接近独立自主的国家。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埃及有了很大的改变，许多近东和中东国家也是如此。虽然美国强了起来，但是西方国家的阵营总的说是削弱了。

《同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谈话》（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11—412页

帝国主义除了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对国内人民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迫害以外，还指望着战争。但是他们能够从战争中指望什么呢？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已经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俄国出现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东欧和东方出现了更多的革命。如果帝国主义好汉们决心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他们除了促使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根本灭亡以外，不会得到什么别的结果。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15—316页

● 美国在国外的军事基地是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绞索

美国现在在我们这里来了个“大包干”制度，索性把金门、马祖，还有些什么大担岛、二担岛、东碇岛一切包过去，我看它就舒服了。它上了我们的绞索，美国的颈吊在我们中国的铁的绞索上面。台湾也是个绞索，不过要隔得远一点。它要把金门这一套包括进去，那它的头更接近我们。我们哪一天踢它一脚，它走不掉，因为它被一根索子绞住了。

《关于国际形势问题》（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07页

现在我们要讲对杜勒斯、艾森豪威尔，对那些战争贩子使用绞索。对美国使用绞索的地方很多。据我看，凡是搞了军事基地的，就被一条绞索绞住了，例如：东方，南朝鲜、日本、菲律宾、台湾；西方，西德、法国、意大利、英国；中东，土耳其、伊朗；非洲，摩洛哥等等。每一个地方美国有许多军事基地，比如土耳其有二十几个基地，日本听说有八百个基地。还有些地方没有基地，但是有军队占领，比如美国在黎巴嫩，英国在约旦。

现在不讲别的，单讲两条绞索：一个黎巴嫩，一个台湾。台湾是老的绞索，美国已经占领几年了。它被什么人绞住了呢？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绞住了。六亿人民手里拿着一根索子，这根索子是钢绳，把美国的脖子套住了。谁人让它套住的呢？是它自己造的索子，自己套住的，然后把绞索的一头丢到中国大陆上，让我们抓到。黎巴嫩是最近套住的，也是美国自己造的一条绞索，自己套上去的，绞索的一端就丢到阿拉伯民族手里。不但

如此，而且是丢到全世界大多数人民手里，大家都骂它，不同情它，大多数国家的人民、政府手里拿着这个绞索。比如中东问题，联合国开了会。但主要是在阿拉伯人民手里套住了，不得脱身。它现在进退两难，早退好，还是迟退好？早退，那末所为何来呢？迟退，越套越紧，可能成为死结，那怎么得了呀？至于台湾，它是订了条约的，比黎巴嫩还不同。黎巴嫩还比较活，没有什么条约，说是一个请，一个就来了，于是乎套上了。至于台湾，就订了个条约，这是个死结。这里不分民主党、共和党，订条约是艾森豪威尔，派第七舰队是杜鲁门。杜鲁门那个时候可去可来，没有订条约，艾森豪威尔订了个条约。这也是国民党一恐慌、一要求，美国一愿意，就套上了。

金门、马祖套上了没有？金门、马祖据我看也套上了。为什么呢？他们不是讲现在还没有定，要共产党打上去，那个时候看情形再决定吗？问题是十一万国民党军队，金门九万五，马祖一万五，只要有这两堆在这个地方，他们得关心。这是他们的阶级利益，阶级感情。为什么英国人和美国人对一些国家的政府那样好？他们不能见死不救。

《关于国际形势问题》（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13—414页

美帝国主义九年来侵占了我们领土台湾，不久以前又派遣它的武装部队侵占了黎巴嫩。美国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建立了几百个军事基地。中国领土台湾、黎巴嫩以及所有美国在外国的军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不是别人而是美国人自己制造这种绞索，并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而把绞索的另一端交给了中国人民、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反侵略的人民。美国侵略者在这些地方停留得越久，套在

它的头上的绞索就将越紧。

《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新闻稿》（一九五八年九月八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406页

美国在全世界钉了许多桩子，把它自己的腿也钉在桩子上了。我们面前有台湾、南朝鲜、日本、菲律宾、南越、泰国，美国在这些国家和地区都钉住了它自己的腿。这是西太平洋地区的情况。在美国看来，好像西太平洋不是我们这些居住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人的，而是美国人的，你们讲讲这公道吗？这是你们的邻居干的事。我们西太平洋地区的人民帮了你们一些忙。我们在西太平洋地区牵住了美国不少的力量，分散了它的力量。

《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一九五九年三月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7—18页

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它侵略南越，干涉老挝，威胁柬埔寨，叫嚣扩大印度支那战争。它力图扼杀古巴革命。它要使西德和日本成为美国的两个重要核基地。它伙同英国一道制造所谓马来西亚，威胁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各国。它占领南朝鲜和中国的台湾省。它控制整个拉丁美洲。它到处横行霸道。美帝国主义的手伸得太长了。它每侵略一个地方，就把一条新的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它已经陷入全世界人民的重重包围之中。

《关于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247—248页

（二）帝国主义的本质

1.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在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前，俄国国内究竟哪一方面拥有真正的力量呢？从表面上看，当时的沙皇是有力量的；但是二月革命的一阵风，就把沙皇吹走了。归根结蒂，俄国的力量是在工农兵苏维埃这方面。沙皇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希特勒不是曾经被人们看作很有力量的吗？但是历史证明了他是一只纸老虎。墨索里尼也是如此，日本帝国主义也是如此。相反的，苏联以及各国爱好民主自由的人民的力量，却是比人们所预料的强大得多。

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提起美国帝国主义，人们似乎觉得它是强大得不得了，中国的反动派正在拿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但是美国反动派也将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证明为并没有什么力量。在美国，另有一类人是真正有力量的，这就是美国人民。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95页

蒋介石反动集团在一九四六年发动全国规模的反人民的国内战争的时候，他们之所以敢于冒险，不但依靠他们自己的优势的军事力量，而且主要地依靠他们认为是“异常强大”的、“举世无敌”的、手里拿着原子弹的美国帝国主义。一方面，以

为它能够像流水一样地供给他们以军事上和财政上的需要；另一方面，狂妄地设想所谓“美苏必战”，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这种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依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全世界各国反动势力的共同特点。这件事，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予世界资本主义的打击的严重性，反映了各国反动派力量的薄弱及其心理的恐慌和丧失信心，反映了全世界革命力量的强大，使得各国反动派除了依靠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就感到毫无出路。但是，在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帝国主义，是否真如蒋介石和各国反动派所设想的那么强大呢？是否真能像流水一样地接济蒋介石和各国反动派呢？并不如此。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58—1259页

现在美帝国主义很强，不是真的强。它政治上很弱，因为它脱离广大人民，大家都不喜欢它，美国人民也不喜欢它。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纸老虎。外表是个老虎，但是，是纸的，经不起风吹雨打。我看美国就是个纸老虎。

《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73页

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开始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许多同志，全国人民，都很忧虑：战争是不是能够打赢？我本人也忧虑这件事。但是我们有一条信心。那时有一个美国记者到了延安，名字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个人就是在苏联住了二三十年，后来被斯大林赶走，以后又被赫鲁晓夫同志恢复了名誉的那位女作家。我同她谈话的时候谈了许多问题，蒋介石、希特勒、日

本、美国、原子弹等等。我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你看，希特勒是不是纸老虎？希特勒不是被打倒了吗？我也谈到沙皇是纸老虎，中国皇帝是纸老虎，日本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你看，都倒了。美帝国主义没有倒，还有原子弹，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纸老虎。蒋介石很强大，有四百多万正规军。那时我们在延安。延安这个地方有多少人？有七千人。我们有多少军队呢？我们有九十万游击队，统统被蒋介石分割成几十个根据地。但是我们说，蒋介石不过是一个纸老虎，我们一定会打赢他。

《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28页

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在面临人民的决死斗争的时候，也还有这样的两重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人民斗争事业处在艰难困苦的时代，出现许多弯弯曲曲的道路。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一九四九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吗？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

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人们难道没有看见听说过这些吗？真是成千成万！成千成万！

《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55—456页

2. 帝国主义侵略和扩张的本性不会改变，直至灭亡

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而有些革命的人们也往往在一个期间内被这种外强中干的现象所迷惑，看不出敌人快要消灭，自己快要胜利的实质。整个法西斯势力的兴起及其进行了几年的侵略战争，正是这种最后挣扎的表现；而在战争中，又以攻击斯大林格勒表现它自己的最后挣扎。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面前，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内的人们也有许多被法西斯的凶恶面孔所迷惑，看不出它的实质。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84—885页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

《将革命进行到底》（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74页

帝国主义者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

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86—1487页

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问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4页

美帝国主义破坏了第一次日内瓦会议的协议，阻挠越南的统一，对越南南方公开地进行武装侵略，打了多年的所谓特种战争。美帝国主义又破坏了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的协议，对老挝进行了露骨的干涉，企图在老挝重新挑起内战。除了存心欺骗的人们或者十分天真的人们以外，谁也不会相信，一纸条约会使美帝国主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或者变得稍为规矩些。

《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越南南方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353页

3. 发动战争与和平演变，是帝国主义企图消灭社会主义的两手

杜勒斯的路线，在他在世的时候就有了。比如他在今年一

月二十八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基本上我们希望果然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这个所谓苏联世界，并不讲苏联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是我们内部起变化。“从而使苏联世界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想实行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他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另一次发言中讲：“决不结束冷战。”看来，冷战全部结束，对他们是不利的。还是这次演说，他说：“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同正义。他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同华东地区各省、市委第一书记的谈话（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敌人的策略是什么？

（1）和平旗子，大造导弹，大搞基地，准备用战争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

（2）和平旗子，文化往来，人员往来，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

《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599页

在非洲，美帝国主义加紧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力图取代老殖民主义者的地位，掠夺和奴役非洲各国人民，破坏和扑灭民族解放运动。

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也严重地威胁着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它还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

平演变”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瓦解社会主义阵营。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54—355页

（三）国际反帝反霸斗争

1. 两个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

美国反苏战争的口号，在目前的实际意义，是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你知道，希特勒和他的伙伴日本军阀，在一个长时期中，都曾经把反苏的口号作为奴役本国人民和侵略其他国家的托辞。现在美国反动派的做法，也正是这样。

……

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现在美国在太平洋控制了比英国过去的全部势力范围还要多的地方，它控制着日本、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半个朝鲜和南太平洋；它早已控制着中南美；它还想控制整个大英帝国和西欧。美国在各种借口之下，在许多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布置，建立军事基地。美国反动派说，他们在世界各地已经建立和准备建立的一切军事基地，都是为着反对苏联的。不错，这些军事基地是指向苏联。但是，在现时，首先受到美国侵略的不是苏联，而是这些被建立军事基地的国家。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93—1194页

现在美国反苏是放烟幕弹，是想独霸世界，首先是损害中国和英国的利益，其次是美苏之间的中间地带，而苏联闭门搞建设，对它毫无影响。所以这种政策一定要失败。

《同三位西方记者的谈话》（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06页

在目前世界上这样四分五裂的形势下，一块铁板那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它们反苏，反共，反对中国，反对人民民主国家，反对我们这个阵线，那是真的；但是，它们那个资本主义世界是很不统一的，四分五裂的。美国现在主要的最大的目的，还是整这个中间地带，就是从日本到英国这些地方，整得这些国家哇哇叫。

《同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团结合作》（一九五四年七月七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34页

所谓反共，这事并不是完全真实的。据我看，美国反共是把当作个题目来做文章，以达到他们另外的目的，首先是占据从日本到英国的这个中间地带。美国在北美洲处在这个中间地带的那一边，苏联和中国处在这一边。美国的目标是占领处在这个广大中间地带的国家，欺负它们，控制它们的经济，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最好使这些国家都弱下去，这包括日本、德国在内。

《同英国工党代表团的谈话》（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39页

当然，帝国主义国家跟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是很厉害的矛盾，但是，他们现在是假借反共产主义之名来争地盘。争什么地盘呢？争亚洲非洲十亿人口的地盘。目前他们的争夺集中在

中东这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特别是埃及苏伊士运河地区。在那里冲突的，有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现在帝国主义争夺的主要场所是亚洲非洲。在这些地区都出现了民族独立运动。美国采用的办法，有文的，也有武的，在中东就是这样。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88页

现在五大洲，除了澳洲，四大洲美国都想霸住。首先是北美洲，那主要是它自己的地方，它有军队；然后是中南美洲，虽然没有驻军，但是它要“保护”的。再加上欧洲、非洲、亚洲，主要是欧亚非，主力是在欧亚两洲。这么几个兵，分得这么散，我不晓得它这个仗怎么打法。所以，我总是觉得，它是霸中间地带为主。至于我们这些地方，除非是社会主义阵营出了大乱子，它确有把握，一来，我们苏联、中国就全部崩溃，否则我看它是不敢来的。除了我们这个阵营以外，它都想霸占，一个拉丁美洲，一个欧洲，一个非洲，一个亚洲。还有个澳洲，澳洲也在军事条约上跟它联起来了，听它的命令。它用“反共”的旗帜取得这些地方好些，还是真正反共好些？所谓真正反共，就是拿军队来打我们，打苏联。我说，没有那么蠢的人。

《关于国际形势问题》（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14—415页

社会主义阵营算一个方面，美国算另一个方面，除此以外，

都算中间地带。但是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也各不相同：有些国家有殖民地，如英、法、比、荷等国；有些国家被剥夺了殖民地，但仍有强大的垄断资本，如西德、日本；有些国家取得了真正的独立，如几内亚、阿联、马里、加纳；还有一些国家取得了名义上的独立，实际上仍然是附属国。中间地带国家各式各样，各不相同，但美国统统想把它们吞下去。

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压迫者、剥削者、欺侮者。美国在中国、在日本、在各国的忠实走狗和美国一起，是矛盾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全世界人民，包括工人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知识分子。英国和法国是帝国主义，但它们是帝国主义美国想吃掉的中等帝国主义国家，同美国有矛盾，日子也很难混，可以作为人民的间接同盟者。

《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各不相同》(一九六二年一月三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87页

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有六国共同市场，都是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的日本，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过去几年法国人闹独立性，但没有闹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矛盾也有明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什么缓和国际形势，不要信那一套。苏、美达成协议，我看不那么容易。大西洋许多国家也不会赞成美国。戴高乐到处说法国不当卫星国，他们是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赫鲁晓夫说我们同戴高乐站在一条线上，其实我们同戴高乐也没有见过面。我们

无论国内、国外，主要靠人民，不靠大国领袖。靠人民靠得住。

《两个中间地带》（一九六三年九月，一九六四年一月、七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43—344页

我们同苏联有外交关系，而且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两个国家，但是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还不如中国同日本自由民主党的关系好，也不如中国同池田派的关系好。这很值得我们大家想一想，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美、苏两国都有核武器，想统治全世界，而自由民主党是受美国控制的。从国际地位来说，日本同美、苏比，占第二位。像这样第二位的国家还有英、法、西德、意大利等。我们还是有工作可做。日本垄断资本同美国并非那样团结。英国同美国比较好，但也不是那样团结。法国使美国感到恼火。西德的地位重要起来了，这样一来，势必会同美国发生对抗。

所以讲到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这种情况看起来比较明显。

《两个中间地带》（一九六三年九月，一九六四年一月、七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44—345页

整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都反对美帝国主义。欧洲、北美、大洋洲也有许多人反对美帝国主义。有的帝国主义者也反对美帝国主义，戴高乐反对美国就是证明。我们现在提出这么一个看法，就是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

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的垄断资本是不满意美国的，现在已经有一部分人公开反对美国；另一部分人依靠美国，但我看，随着时间的延长，日本这一部分人中的许多人也会把骑在头上的美国赶走。

《两个中间地带》（一九六三年九月，一九六四年一月、七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45页

美国现在在两个“第三世界”都遇到抵抗。第一个“第三世界”是指亚、非、拉。第二个“第三世界”是指以西欧为主的一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有些还是帝国主义的国家，这些国家一方面压迫别人，另一方面又受美国压迫，同美国有矛盾。第一个“第三世界”中，有一个地方叫南越，美国就是没有办法把那里的人民压下去。而且这样的事以后还会不断地出现。

不能设想，美国只在两个“第三世界”遇到抵抗，而独独在苏联和东欧会不遇到抵抗。

《赫鲁晓夫的日子不好过》（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57页

我们是第三世界，我赞成第三世界的国家要互相帮助。第三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人怕蚊子，大国怕小国呢。

《关于国际问题几次谈话的要点》（一九七四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18页

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

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

……

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关于三个世界划分问题》(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441—442页

2. 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要破除迷信敢于斗争

(参见第七编“关于政策和策略”，第1736—1747页)

3. 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决不容许帝国主义干涉、称霸

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美国这样地暴露了自己的帝国主义面目，这对于中国和亚洲人民很有利益。美国对朝鲜、菲律宾、越南等国内政的干涉，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全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都将站在被侵略者方面，而决不会站在美帝国主义方面。他们将既不受帝国主义的利诱，也不怕帝国主义的威胁。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因为它没有人民的支持。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八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423页

我们的敌人眼光短浅，他们看不到我们这种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他们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他们也看不到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时代，已由社会主义苏联的成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已由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成立，已由中苏两个伟大国家在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基础上的巩固团结，已由整个和平民主阵营的巩固团结以及世界各国广大和平人民对于这个伟大阵营的深厚同情，而永远宣告结束了。我们的敌人看不到这些，他们还想欺负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还想称霸世界。但是，同志们，我可以断定，他们的想法是狂妄的，是徒然的，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

《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十一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85页

不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历史时期中，曾经发生过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三个帝国主义国家企图称霸世界的事实，这种事实还是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许多人民民主国家没有成立的时候。但是结果如何呢？难道还没有证明这三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企图是狂妄的和徒然的吗？难道不是适得其反，想要称霸的帝国主义却得到了被打倒的结果吗？现在的局面完全不同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许多人民民主国家成立了，世界人民的觉悟程度提高了，整个亚洲和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斗争蓬蓬勃勃地起来了，整个帝国主义体系的力量极大地削弱了，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是我们最亲密的盟国苏联的力量大大地增强了。在这种时候，再有帝国主义国家企图重走过去德、意、日三国侵略者的老路，则其结果不是完全可以料到的吗？总之一句话，今后的世界必须是人民

的世界，世界各国必须由各国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决不能再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横行霸道的世界了。

《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十一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86页

美帝国主义顽固地要干涉各国的内部事务，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事务，例如，在中国干涉解放台湾，在匈牙利制造反革命叛乱。它特别放肆地干涉那些位于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各国的内部事务。美国现在还在策划通过土耳其或以色列侵入独立的叙利亚，还在阴谋颠覆反殖民主义的埃及政府。美国的这种疯狂的侵略政策，不但造成了中东的危机，而且造成了新的世界战争的危机。全世界爱好和平自由的人民都站在叙利亚方面，反对美国和土耳其的侵略者，正如他们在去年十月都站在埃及方面，反对英法和以色列的侵略者一样。苏联政府已经向美国和土耳其提出严重警告，要求他们迅速打消侵略计划。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叙利亚的卫国斗争，坚决支持苏联的正义立场。

帝国主义的豺狼们应该记住，由他们任意摆布人类命运、任意宰割亚非国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16—317页

帝国主义者目前还是在活着，他们依然在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横行霸道。他们在西方世界也依然在压迫他们本国的人民群众。这种局面必需改变。结束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是全世界人民的任务。

《巡视大江南北后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九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431页

我们同美国在台湾问题解决了以后，要恢复外交关系。即使恢复了外交关系，美国如果还像今天这样到处干涉、控制，我们还是要反对。我们要求美帝国主义从亚洲滚出去，从非洲滚出去，从拉丁美洲滚出去，从欧洲滚出去。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美国人去干什么？英国有个上议院议员，就是蒙哥马利元帅，他就反对北大西洋条约中美国人来称霸。

《中法之间有共同点》（一九六四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74页

我们很欣赏法国这种独立政策。不能跟着少数大国转，它们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把英国算在美国那边也可以，但是英国保守党里也有人赞成英国政府的政策。世界在变化，不是一两个大国所能管住的。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来管，不能允许任何外国人干涉。你们说我们也参加了对东南亚的干涉，但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用“空话”来干涉，就是鼓励和支持那里反美的游击战争。这不是秘密，是公开的。全世界任何地方有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以及那里的压迫者的游击战争，我们都毫不掩饰地支持。

《我们很欣赏法国这种独立政策》（一九六四年九月十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42—543页

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国内的事要由国内人民自己解决，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

《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一九七〇年七月十三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90页

4. 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是平等的，决不容许以大压小以强凌弱

我们认为，国家不应该分大小。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一个国家不论多么小，即使它的人口只有几十万或者甚至几万，它同另外一个有几万万人口的国家，也应该是完全平等的。

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不是空话。既然说平等，大国就不应该损害小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在政治上压迫小国，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既然说平等，互相就要有礼貌，大国不能像封建家庭里的家长，把其他国家看成是它的子弟。艾德礼先生批评美国对危地马拉的做法是，就像一个中世纪家庭的父亲替他的儿子找一个自己看得中的媳妇。不论大国小国，互相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

现在南北美洲的情况就像一个中世纪的家庭，美国是家长，其他国家是它的子弟。我们在亚洲不要这种关系。过去日本是想这样干的，它说的是共存共荣，但实际上是要剥削和侵略人家。

《同缅甸总理吴努的谈话》（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78—379页

大国、小国应该平等相待。有这样一种论调：大国是不好惹的，小国是可以随便欺侮的。这种论调是绝对没有道理的。

《大国小国应该平等相待》（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34页

5. 支持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16页

这些国家既不站在帝国主义的一边，也不站在社会主义的一边，而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参加双方的集团，这是适合于它们现时的情况的。

在我们看来是可以的。但是，民族主义国家采取中立立场，帝国主义国家却不喜欢，因为这些民族主义国家的中立是摆脱了它们的控制而取得的。民族主义国家的这种中立也就是一种独立自主、不受控制的立场。我们社会主义阵营欢迎这些国家的这种中立的立场，因为它有利于和平事业，不利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我们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已经独立的国家看成朋友，把还没有独立、正在争取独立的国家也看成朋友。我们支持它们。

《同巴西记者马罗金和杜特列夫人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02页

看来，现在的非洲与过去的非洲有所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九五八年非洲反帝运动有很大的发展。可以料到，今后非洲的反帝运动会比过去发展得更快。至于各国要帮助你们，那毫无问题。各国人民，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已经独立了的

国家，一定要帮助、支持你们。你们需要支持，我们也需要支持，而且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支持。谁来支持我们？还不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这是支持我们的最主要的力量。支持我们的还有西欧的工人阶级。所以是相互的支持。你们那里的反帝运动就是支持我们。苏联、中国把工作做好一点，也就是支持你们。你们可以考虑，中国可以当做你们的一个朋友。我们能牵制帝国主义，使它力量分散，不能集中力量去压迫非洲。

《非洲当前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8页

非洲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更有世界意义。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很多国家都有革命；不只是在几百万人中间，而是在几千万或者更多的人口中进行了革命的民族解放斗争。我们完全同情你们，完全支持你们。同时我们认为，你们的斗争支持了我们，帮助了我们。我们还认为，古巴的斗争帮助了我们，整个拉丁美洲的斗争帮助了我们，南朝鲜、土耳其、南越、日本这些国家的斗争也帮助了我们，整个亚洲人民都帮助了我们。当然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帮助我们的，苏联是帮助我们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之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广大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也帮助了我们。这就分散了敌人的力量，使我们身上的压力减轻了。因为你们帮助了我们，所以我们有义务支持你们。我们是互相支持，互相帮助。

《帝国主义是不可怕的》（一九六〇年五月七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72—173页

被压迫人民争取彻底的解放，首先是依靠自己的斗争，其

次才是国际的援助。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

《接见非洲朋友时的谈话》（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339—340页

我呼吁，全世界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等各色人种中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开明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美国压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种中的反动统治集团。他们绝不能代表白色人种中占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目前，压迫、侵略和威胁全世界绝大多数民族和人民的，是以美国为首的一小撮帝国主义者和支持他们的各国反动派。他们是少数，我们是多数。全世界三十亿人口中，他们最多也不到百分之十。我深信，在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

《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30页

最近，日本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反对美国F—105D型核飞机和核潜艇进驻日本，要求撤除一切美国军事基地和撤走美国武装部队，要求归还日本的领土冲绳，要求废除日美“安全条约”等等。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日本全体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中国人民衷心地支持日本人民的正义斗争。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日本人民伟大的爱国斗争》（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61页

我们不赞成战争。但是，对被压迫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是支持的。对古巴、阿尔及利亚的革命战争，我们是支持的；对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也是支持的。这些革命是他们自己搞起来的。比如古巴，不是我们叫卡斯特罗起来革命，是他自己起来革命的。你们相信吗？是美国叫他革命的，是美国走狗叫他革命的。又如阿尔及利亚，是我们叫本·贝拉革命的吗？以前我们认都不认识这个人，到现在我还没有见过他。是他们自己起来革命的，他们成立了临时政府，我们就承认。他们要求支持，我们就给他们支持。帝国主义说我们是“好战分子”，在某一点上讲也有些道理。因为我们支持卡斯特罗，支持本·贝拉，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反美战争。还有一次，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三年美国侵略朝鲜时，我们支持了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的这一方针是公开宣布的，是不会放弃它的，就是说，我们要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如果不支持，就会犯错误，就不是共产党员。你们知道，阿联总统纳赛尔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支持过阿尔及利亚革命。他不是共产党员能支持阿尔及利亚，难道我们是共产党员就不能支持阿尔及利亚吗？当一百八十多年以前，华盛顿起来反对英国的时候，法国支持了华盛顿，难道当时法国人是共产党员吗？

《支持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78—379页

当前，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美国黑人争取解放的斗争，是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当代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呼吁：世界各国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愿意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人

们，行动起来，给予美国黑人的斗争以强大的声援！全世界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向着我们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们发动持久的猛烈的进攻！可以肯定，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的彻底崩溃，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彻底翻身，已经为期不远了。

《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578—579 页

美帝国主义屠杀外国人，也屠杀本国的白人和黑人。尼克松的法西斯暴行，点燃了美国革命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中国人民坚决支持美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相信，英勇战斗的美国人民终将得到胜利，而美国的法西斯统治必然失败。

尼克松政府内外交困，国内一片混乱，在世界上非常孤立。抗议美国侵略柬埔寨的群众运动席卷全球。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不到十天，就得到近二十个国家的承认。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形势越来越好。东南亚各国人民的革命武装斗争，朝鲜、日本和亚洲各国人民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美以侵略者的斗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北美、欧洲、大洋洲人民的革命斗争，都在蓬勃发展。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585 页

6. 开展反帝反霸斗争要结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

以苏联为首的世界革命统一战线,战胜了法西斯主义的德意日。这是十月革命的结果。假如没有十月革命,假如没有苏联共产党,没有苏联,没有苏联领导的西方和东方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统一战线,还能设想战胜法西斯德意日及其走狗们吗?

《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57页

没有国际进步力量的支持,我们的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帝国主义是世界性的,因此我们有必要调动一切国际进步力量,包括南美洲中美洲北美洲的、亚洲的、欧洲的、非洲的进步力量。

《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62—63页

为了战胜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必须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必须团结不包括敌人在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继续进行艰巨的斗争。

《接见伊拉克、伊朗、塞浦路斯三国代表团时的谈话》(一九六〇年五月九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183—184页

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结局,已经确定无疑了。这是不以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正在采取和准备采取各种穷凶极恶的手段,以图挽救他们的灭亡。在我们两国人民面前和世界人民面前,还存在着很多困难。古巴和各国人民今后的斗争,仍然是艰巨的、复杂的、曲折的。但是,只要各国革命

领导核心广泛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坚持不懈的斗争，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人民前进。我们坚定地相信，各国最广大人民群众一定能够最紧密地团结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取得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保卫民族独立和争取社会解放的正义事业的彻底胜利。

《给卡斯特罗的信》（一九六〇年五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96页

美帝国主义甚至对它在西欧、北美和大洋洲的盟国，也实行“弱肉强食”的政策，力图把它们踩在自己的脚下。

美帝国主义称霸全世界的侵略计划，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到约翰逊，是一脉相承的。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全世界各大洲的人民要联合起来，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要联合起来，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要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55页

中日两国人民要联合起来，亚洲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要联合起来，一切爱好和平国家要联合起来，一切受美帝国主义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及人士要联合起来，结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挫败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保卫世界和平。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日本人民伟大的爱国斗争》（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62页

我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兄弟关系,不是老子对儿子的关系。要巩固团结,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不管什么人,不管是黑人、白人或是黄种人,不管他信什么宗教,是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或佛教,也包括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只要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对帝国主义走狗的,都应该团结,只不包括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内的走狗。

《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一九六四年七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86页

7. 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战略和策略

(参见第七编“关于政策和策略”,第1728—1774页)

(四)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1. 外交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基础上

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例如配合作战、和平会议、通商、投资等等。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84—1085页

中国人民欢迎许多外国政府宣布废除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措施。但是,我们认为平等条约

的订立,并不就表示中国在实际上已经取得真正的平等地位。这种实际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决不能单靠外国政府的给予,主要地应靠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争取,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建设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否则便只会有形式上的独立、平等,在实际上是不会有。就是说,依据国民党政府的现行政策,决不会使中国获得真正的独立和平等。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1085—1086页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不愿意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任何带威胁性的行动。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一九四九年四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61页

我们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

繁荣经济。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66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本日在首都就职，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同时决议：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页

2. 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存在的问题

就是西方国家，只要它们愿意，我们也愿同它们合作。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

《和平为上》（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10页

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相信，这一点，总有一天会要做到的。

《同兄弟国家团结一致，同一切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46页

不管美国承认不承认我们，不管我们进不进联合国，世界

和平的责任我们是要担负的。我们不会因为不进联合国就无法无天，像孙悟空大闹天宫那样。我们要维持世界和平，不要打世界大战。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不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但是，维持世界和平不但中国有责任，美国也有责任。

《同斯诺的谈话》（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17页

中国要和平。凡是讲和平的，我们就赞成。我们不赞成战争。

《支持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78页

3. 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反对干涉中国内政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

《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九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78页

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65页

我国人民不需要也不应当侵占外国任何领土主权，但是我

国人民必须保卫自己的领土主权不受侵犯。

《在北戴河会议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稿上加写的话》（一九五八年八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359页

反对大国欺侮我们。就是说，不许世界上有哪个大国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我讲得很粗。不管资本主义大国也好，社会主义大国也好，谁要控制我们，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允许的。

《中法之间有共同点》（一九六四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70页

4.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外交方针——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

● 中国必须一边倒，站在社会主义一边

处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汉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81页

现在的事情非常明白，如果没有联俄政策，不同社会主义国家联合，那就必然是联帝政策，必然同帝国主义联合。不见一九二七年之后，就已经有过这种情形吗？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一经进一步尖锐化，中国不站在这方面，就要站在那方面，这是必然的趋势。难道不可以不偏不倚

吗？这是梦想。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90页

“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2—1473页

究竟“一边倒”对不对？我们一边倒是和苏联靠在一起，这种一边倒是平等的。我们信仰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我们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不是硬搬苏联的经验。硬搬苏联经验是错误的。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和农业的合作化是跟苏联不同的。

《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76页

● 新中国的外交要另起炉灶，任何外国同新中国建交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

外交关系。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护。

《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九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77页

我们可以采取和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帝国主义者的这种控制权，表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在国民党军队被消灭、国民党政府被打倒的每一个城市和每一个地方，帝国主义者在政治上的控制权即随之被打倒，他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控制权也被打倒。但帝国主义者直接经营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依然存在，被国民党承认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依然存在。对于这些，我们必须分别先后缓急，给以正当的解决。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4页

现美国方面托人请求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英国亦极力想和我们做生意。我们认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关于稳住汤恩伯及外交对策问题》（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85页

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过去美国用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方法干涉中国内政，此项政策必须停止。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

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

《黄华同司徒雷登谈话应注意的问题》（一九四九年五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93页

缅甸政府要求建立外交关系问题，应复电询问该政府是否愿意和国民党断绝外交关系，同时请该政府派一负责代表来北京商谈建立中缅外交关系问题，依商谈结果再定建立外交关系。此种商谈手续是完全必要的，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应如此。如果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公开宣布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则我方亦应去电该国叫它派代表来华商谈建立外交关系问题，同时可将电文大意公开发表消息，如此主动权仍然操在我手。

《资本主义国家同中国建交必须经过商谈》（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17页

估计英代办胡阶森即将到京，望告外交部于胡到后当其来访时提及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初步程序的事宜，即应告以其中最要者为英国与蒋介石反动派残余的关系问题，因英国既已与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即不应同时再与国民党政府作任何外交来往，而英国代表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及其他组织中竟继续承认国民党代表为合法，拒绝接受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这在建立中英外交关系上是不可能不解决的先决问题；其次，英国香港政府对国民党政府在港的官方代表、机关及其所属的一切国家资财采如何态度，也须弄清楚，因这类事情也是属于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的问题，等等，看胡阶森如何答复。

《中英建立外交关系上应解决的先决问题》（一九五〇年二月八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29页

● 新中国要打扫好房子再请客，同美国迟几年建交比较有利

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5页

我还是这样看，迟几年跟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为好。这比较有利。苏联跟美国建交，是在十月革命之后十七年。一九二九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持续到一九三三年。这一年，德国是希特勒上台，美国是罗斯福上台，这个时候，苏美才建交。我们跟美国建交，可能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也就是说，要经过十八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在延安就跟一个美国人讲过，你美国一百年不承认我们这个政府，一百零一年你还不承认，我就不信。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那时美国人跑进中国来一看，就会感到后悔莫及。因为中国这个地方变了，房子打扫干净了，“四害”也除了，他们再找不到多少“朋友”了，散布一点细菌也没有多大作用了。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89—190页

5. 主张一切国家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难道只能和这种社会主义共处,不可以和别的事物共处吗?和非社会主义的事物,像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等能共处吗?我认为,回答也是肯定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同英国工党代表团的谈话》(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39页

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尼赫鲁总理在上月二十九日的演说中就说过,应当按五项原则来受约束,承担义务。如果一个国家说了不做,那末就有理由来指责它,它在人们眼中就输了理。问题是有些大国不愿受约束,不愿像我们两国那样,根据五项原则订立协定。不知道它们有什么想法?据我知道,美国和英国也说,它们要求和平,不干涉他国内政。但是,如果我们要同它们根据五项原则发表声明,它们又不愿意干。

《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四次谈话》(一九五四年十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62页

我们在合作方面得到一条经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五项原则之一就是平等互利。

《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四次谈话》(一九五四年十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64页

凡是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问题，我们都要来解决，这就才能达到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利。合作不能对任何一方有害，否则就不能持久，一定会破裂。不论是朋友之间、国与国之间或是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合作，都是如此。合作一定要有利，否则谁还干呢？

《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四次谈话》（一九五四年十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71—372页

五项原则是一个大发展，还要根据五项原则做些工作。我们应该采取些步骤使五项原则具体实现，不要使五项原则成为抽象的原则，讲讲就算了。现在在世界上就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讲讲算了，另一种是要具体实现。英美也说要和平共处，但是它们是讲讲就算了的，真正要和平共处，它们就不干了。我们不是那样。

《同缅甸总理吴努的谈话》（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74页

我们两国总理发表的联合声明，已经确定了我们相互间关系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中的一条叫做互不干涉内政，另一条叫做平等互利。什么叫互不干涉内政呢？那就是说，一国的国内纠纷，由这个国家自己管，别国不得过问，也不得利用这种国内纠纷。一个国家只能承认别国的人民自己选择的政府。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一九五四年十二月），《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81页

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周总理在声明中已表示我们愿意同美国人坐下来谈判。……一切问题应通

过谈判来解决，打仗的办法不好。

《中国和巴基斯坦应该成为好朋友》（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04页

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支援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我国政府和人民已经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今后还应当做更多的工作，争取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使它们更加发展，以有利于世界的持久和平，也就有利于我国的建设。

《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六年八月、九月），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148页

我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和平，世界各国的人民也都需要和平。渴望战争、不要和平的，仅仅是少数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某些依靠侵略发财的垄断资本集团。由于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不断努力，国际的局势已经趋向和缓。为了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发展同社会主义阵营中各个兄弟国家的友好合作，并且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加强团结。我们必须争取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和平相处的国家，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15—116页

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再就是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当巩固和发展同它们的团结。有了这两种力量的团结，我们就不孤立了。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

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42—243页

我们坚决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和平竞赛，各国内部的事务由本国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解决。我们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样大家知道的五项原则。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16页

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是在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印两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首次提出的，现在和将来，为了两国的根本利益，双方都没有任何理由不将这些原则坚持到底。中国政府人士欢迎印度总理尼赫鲁先生三月二十三日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声明，认为这个声明是友好的。中国方面从来没有干涉过印度的内政，也没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上谈论过印度的内政，并且认为对一个友好国家的内政进行这样的谈论是不礼貌和不适当的。

《关于发表西藏叛乱事件的公报等》（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68—169页

6. 争取一个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

中国是一个正在开始改变面貌的落后国家，经济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国家落后。但是现在正在开始改变面貌，已经取得了改变的可能性。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的。如果诸位同意的话，我们要继续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想，这也是英国、法国所需要的。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穷，如果能得到几十年和平就好了。你们赞成吗？如果赞成，就让我们订一个条约，当然不是今天下午订，订个几十年不打仗的条约。谁要打仗，就反对他。

《同英国工党代表团的谈话》（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40页

我们现在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不愿打仗。假如能创造这样一个环境，那就很好。凡是赞成这个目标的，我们都能同它合作。

《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四次谈话》（一九五四年十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65页

我们认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五项原则也是适合你们国家的情况的，适合亚洲、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的。对我们来说，稳定比较好，不仅是国际上要稳定，而且国内也要稳定。

《同缅甸总理吴努的谈话》（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74页

亚非国家的团结是有希望的，万隆会议已经走了第一步。以后我们应该共同努力，继续工作，团结起来，促进和平。即使有战争，我们也可以把它推迟。我们要争取和平的环境，时间要尽可能的长，这是有希望的，有可能的。如果美国愿意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期都可以，五十年不够就一百年，不知道美国干不干。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美国，我想你们是不会反对的。

《同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谈话》（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13—414页

当然我们是希望不打世界大战的，我们是希望和平的。我们赞成用极大的努力来禁止原子战争，并且争取两个阵营签订互不侵犯协定。争取十年、二十年的和平，是我们最早提出的主张。如果能够实现这个主张，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很有利的。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0页

7. 中国永远不称霸

我们国内的问题是应该而且也可以在国内解决的，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国际合作和帮助。例如，我们人口多的问题，可以用发展生产的方法来解决。我们反对过去希特勒说过的话，他说，人口多就应该向国外扩张，在国外取得东西。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78页

中国党是个马列主义的政党，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我

们认为，侵略就是犯罪，我们不侵犯别人一寸土、一根草。我们是爱好和平的，是马克思主义的。

《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23页

中国过几十年在工业化后，翘尾巴的可能性就更大了。你们回去以后，请告诉你们的下一代，将来中国如果翘尾巴，翘到一万公尺以上，就批评它。要监督中国，要全世界都来监督中国。

《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25页

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

《纪念孙中山先生》（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57页

一九六一年，我同蒙哥马利谈话……他说：“再过五十年，你们就了不起了。”他的意思是说，过了五十年我们就会壮大起来，而且会“侵略”人家，五十年内还不会。他的这种看法，一九六〇年他来中国的时候就对我说过。我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1页

我们的同志和人民，永远不要骄傲，不要固步自封，不要自以为是，永远要谦虚谨慎，实事求是。对外国，永远不要大

国沙文主义，一定要尊重别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能干涉别国的内政，一定要平等相处。对兄弟党，一定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大党小党一律平等的原则，坚持协商一致的原则，绝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

《对彭真在国庆十五周年典礼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三十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175页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408页

第五编

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
战略战术和国防建设

目 录

一、人民军队	(1185)
(一) 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作用	(1185)
1. 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1185)
2.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惟一 宗旨	(1188)
3. 人民军队是完全不同于旧式军队的新型 军队	(1190)
4. 人民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和 生产队	(1193)
(二) 人民军队必须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	(1200)
1.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 指挥党	(1200)
2. 实行党代表制度，支部建在连上	(1202)
3.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同“左”、 右倾机会主义和各种错误观点作斗争	(1203)
(三) 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	(1214)
1. 革命的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	(1214)
2. 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	(1217)
● 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是军队 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	(1217)
● 官兵一致是军队战斗力极其重要的政治基础	(1220)
● 军民一致无敌于天下	(1222)

- 宽待俘虏和瓦解敌军 (1223)
- 3. 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1228)
- 4.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不断纠正错误思想和不良作风 (1233)
- 5. 拥政爱民、拥军优属 (1240)
- (四) 人民军队的民主制度 (1244)
- 1. 军队内部的民主是增强战斗力、支持长期战争的重要武器 (1244)
- 2. 人民军队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 (1246)
- 3. 新式整军运动是军队实行民主的好方法 (1247)
- (五) 人民军队的纪律 (1249)
- 1. 加强纪律性, 革命无不胜 (1249)
- 2. 经常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 (1251)
- (六) 人民军队的军政训练和文化教育 (1253)
- 1. 加强军政教育, 提高部队的军事和政治素质 (1253)
- 2. 加强文化教育,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 (1260)
- 3. 加强练兵, 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练兵运动 (1261)
- (七) 人民军队的后勤保障工作 (1263)
- 1. 军队的后勤保障对于革命战争有决定意义的事业 (1263)
- 2. 军需物资主要取之于敌, 后方也要努力供给 (1264)
- 二、战争 (1268)
- (一) 战争是政治的特殊形式的继续, 是流血

- 的政治 (1268)
- (二) 战争的性质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支持
正义的战争，反对非正义的战争 (1270)
- (三) 战争与和平是可以互相转化的；用革命
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争取和平 (1275)
- (四) 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1278)
- (五) 战争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 (1281)
- (六) 研究战争规律和军事科学，提高驾驭
战争的能力 (1285)
1. 要研究战争及其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掌握战争的全局 (1285)
2. 指挥战争要发挥自觉能动性，使主观指导
符合客观实际 (1291)
3. 要学习军事科学，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1297)
- 三、人民战争 (1300)
- (一) 兵民是胜利之本，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
才能进行战争 (1300)
- (二) 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还要有地方
武装和民兵 (1307)
- (三) 实行全民皆兵，大办民兵师 (1312)
- (四) 以革命根据地为依托，开展人民战争 (1314)
- 四、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 (1320)
- (一) 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规定战争的
指导路线和战略战术 (1320)
- (二) 力争战争的主动权，加强战争的计划性和
灵活性 (1325)
- (三)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1338)

- (四) 持久战的战略方针 (1338)
- (五) 十大军事原则 (1348)
1. 十大军事原则及其形成和发展 (1348)
 2. 战争要以消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
不以保守和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 (1353)
 3. 集中兵力打歼灭战 (1355)
 -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1355)
 - 作战的基本方针是歼灭战 (1366)
 4. 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 (1371)
- (六) 战略和战役、战斗 (1372)
1. 战略的持久与战役、战斗的速决 (1372)
 - 战役和战斗上的速决是战略上持久的必要条件 (1372)
 - 只有战略决战才能解决两军的胜负问题，要在
对我有利条件下进行战略决战 (1376)
 2. 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 (1381)
 - 从战争全体看，进攻是主要的，防御是第二位的，战争中要交替运用 (1381)
 - 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反对消极防御 (1390)
 3. 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 (1393)
 - 战略退却的目的是保存军力待机破敌，是诱敌
深入准备反攻 (1393)
 - 战略反攻要选择时机，在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
条件下进行 (1397)
 4. 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 (1402)
 - 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 (1402)
 - 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
外线作战 (1405)
 - 将内线作战转变为外线作战 (1407)

- (七) 游击战、运动战和阵地战 (1409)
1. 游击战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1409)
 2. 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和方针 (1416)
 3. 游击战的战术原则——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1421)
 4. 游击战的基本作战形式——袭击 (1423)
 5. 运动战是转换战争全局取得最后胜利的主要作战形式 (1427)
 6. 运动战的基本特点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1430)
 7. 运动战的打法：分割包围，各个歼灭；调动敌人，寻机攻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1433)
 8. 基本的是运动战，不拒绝必要和可能的阵地战 (1437)
 9. 游击战要向运动战和正规战发展 (1442)
 10. 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要互相配合 (1448)
- 五、军队和国防的现代化建设 (1451)
- (一) 努力实现国防现代化的目标 (1451)
 - (二) 建设一支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 (1453)
 - (三) 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我们要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工作 (1461)
 - (四) 掌握先进的军事科学和技术装备，提高在现代战争中取胜的能力 (1464)
 - (五) 抓紧研制尖端武器 (1466)

一、人民军队

（一）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作用

1. 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50页

我们党虽然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三四年中，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乃至在其以后的一个时期，对此也还认识不足；但是从一九二四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经过援助国民党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党已掌握了一部分军队。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没有这一时期的红军及其所进行的战争，即是说，假如共产党采取了陈

独秀的取消主义的话，今天的抗日战争及其长期支持是不能设想的。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47—548页

军队和其他武装力量，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部分，没有它们，就不能保卫国家。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一切武装力量，如同其他权力机关一样，是属于人民和保护人民的，它们和一切属于少数人、压迫人民的旧式军队、旧式警察等等，完全不同。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57页

中国人民要自由，要统一，要联合政府，要彻底地打倒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没有一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军队，那是不行的。彻底地站在人民立场的军队，现在还只有解放区的不很大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还很不够。可是，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却处心积虑地要破坏和消灭解放区的军队。一九四四年，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一个所谓“提示案”，叫共产党“限期取消”解放区军队的五分之四。一九四五年，即最近的一次谈判，又叫共产党将解放区军队全部交给它，然后它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

这些人们向共产党人说：你交出军队，我给你自由。根据这个学说，没有军队的党派该有自由了。但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只有很少一点军队，国民党政府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一来，自由也光了。现在的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国民党的民主分子并没有军队，同时也没有自由。十

八年中，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工人、农民、学生以及一切要求进步的文化界、教育界、产业界，他们一概没有军队，同时也一概没有自由。难道是由于上述这些民主党派和人民组织了什么军队，实行了什么“封建割据”，成立了什么“奸区”，违反了什么“政令军令”，因此才不给自由的吗？完全不是。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做。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72—1073页

为创造中国人民的军队而奋斗，是全国人民的责任。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74页

中国解放区的抗日军队，在国民党政府毫无接济又不承认的条件下，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和人民的拥护，得以独力解放了广大的国土和一万万以上人民，抗击着侵华敌军百分之五十六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要是没有这一个军队，中国绝无今天的局面！

《蒋介石在挑动内战》（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39页

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6页

自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背叛祖国,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反革命战争以来,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情况之中。幸赖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援助之下,为保卫祖国的领土主权,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和争取人民的权利,奋不顾身,英勇作战,得以消灭反动军队,推翻国民政府的反动统治。现在人民解放战争业已取得基本的胜利,全国大多数人民业已获得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页

单拿笔杆不行,一手拿笔杆,一手拿枪杆,又是文化,又是武化。

《关于国际形势问题》(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12页

世界上从有历史以来,没有不搞实力地位的事情。任何阶级、任何国家,都是要搞实力地位的。搞实力地位,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军队是阶级的实力。只要有阶级,就不能不搞军队。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0页

2.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惟一宗旨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

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为人民服务》（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04页

因为我们的军队是真正人民的军队，我们的每一个指战员以至每一个炊事员、饲养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部队要和人民打成一片，我们的干部要和战士们打成一片。与人民利益适合的东西，我们要坚持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要努力改掉，这样我们就能无敌于天下。

《坚持为人民服务》（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10页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惟一的宗旨。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有一个很好的内部和外部的团结。在内部——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之间；在外部——军民之间，军政之间，我友之间，都是团结一致的。一切妨害团结的现象，都在必须克服之列。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有一个正确的争取敌军官兵和处理俘虏的政策。对于敌方投诚的、反正的、或在放下武器后

愿意参加反对共同敌人的人，一概表示欢迎，并给予适当的教育。对于一切俘虏，不许杀害、虐待和侮辱。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战略战术。它善于按照变化着的具体条件从事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也善于作运动战。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政治工作，其任务是为团结我军，团结友军，团结人民，瓦解敌军和保证战斗胜利而斗争。

在这个宗旨下面，在游击战争的条件下，全军都可以并且已经是这样做了：利用战斗和训练的间隙，从事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达到军队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之目的，借以克服经济困难，改善军队生活和减轻人民负担。在各个军事根据地上，也利用了一切可能性，建立了许多小规模军事工业。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39—1040页

3. 人民军队是完全不同于旧式军队的新型军队

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

《井冈山的斗争》（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63页

争取有斗争经验的工农积极分子加入红军队伍，改变红军的成分。

从斗争的工农群众中创造出新的红军部队。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94页

红军铁一样的巩固,应使与红军的扩大密切地连接起来,两年以来这一方面的工作,同样得到了好的成绩。现在的红军,已经走上了铁的正规的革命武装队伍的道路,这表现在于:(一)成分提高了,实现了工农劳苦群众才有手执武器的光荣的权利,而坚决驱逐那些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二)工人干部增加了,政治委员制度普遍建立了,红军掌握在可靠的指挥者手中。(三)政治教育进步了,坚定了红色战士为苏维埃斗争到底的决心,提高了阶级自觉的纪律,密切了红军与广大民众之间的联系。(四)军事技术提高了,现在的红军虽然还缺乏最新式武器的采用及其使用方法的练习,然而一般的军事技术是比过去时期大大的进步了。(五)编制改变了,使红军在组织上增加了力量。所有这些,大大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成为不可战胜的苏维埃武装力量。

《武装民众与建设红军》(一九三四年一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339页

我们八路军有很好的品质,我们是全国最好的军队,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与人民结合在一起的军队,是有光荣历史传统的军队。

《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与人民结合的军队》(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86—687页

我们的军队必须在军民关系上、军政关系上、军党关系上、官兵关系上、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关系上、干部相互关系上,遵守正确的原则,决不可犯军阀主义的毛病。官长必须爱护士兵,

不能漠不关心，不能采取肉刑；军队必须爱护人民，不能损害人民利益；军队必须尊重政府，尊重党，不能闹独立性。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历来是好的，现在也是好的，是全国军队中一支最好的军队。

《组织起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934页

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他们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敌。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1078页

通常所说的“共产党军队”，按其实际乃是中国人民在战争中自愿组织起来而仅仅服务于保卫祖国的军队，这是一种新型的军队，与过去中国一切属于个人的旧式军队完全不同。它的民主性质为中国军队之真正国家化提供了可贵的经验，足为中国其他军队改进的参考。

《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7—28页

这个军队的成分是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工农占百分之九十左右，革命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左右，而革命知识分子则是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但懂得用革命精神教育军队，坚决地执行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及其各项具体政策，而且懂得革命的前途是什么，即是说革命将经过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稳步地发展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14页

无产阶级革命军队跟资产阶级军队不同，它是人民的军队。

《革命单搞军事不行》（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97页

4. 人民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和生产队

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86页

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96页

我们有打仗的军队，又有劳动的军队。打仗的军队，我们有八路军新四军；这支军队也要当两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

面生产。我们有了这两支军队，我们的军队有了这两套本领，再加上做群众工作一项本领，那末，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

《组织起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928页

我们的军队既不要国民党政府发饷，也不要边区政府发饷，也不要老百姓发饷，完全由军队自己供给；这一个创造，对于我们的民族解放事业，该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啊！抗日战争六年半中，敌人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实行烧、杀、抢的“三光”政策，陕甘宁边区则遭受国民党的重重封锁，财政上经济上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我们的军队如果只会打仗，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现在我们边区的军队已经学会了生产；前方的军队，一部分也学会了，其他部分正在开始学习。只要我们全体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人人个个不但会打仗，会作群众工作，又会生产，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就会是孟夫子说过的：“无敌于天下。”

《组织起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929页

解放区的军队，已经达到了九十多万。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还需要扩大军队到几个九十万。但是我们还没有外援。就是假定将来有了外援，生活资料也只能由我们自己来供给，这是一点主观主义也来不得的。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需要集中必要的兵团，离开现在分散作战的地区，到一定的攻击目标上去作战。这种集中行动的大兵团，不但不能生产自给了，而且需要后方的大量的物质供给；只有被留下来的地方部队和地方兵团（其数目将还是广大的），还能照旧一面作战，一面生产。照

此看来，我们全军应趁目前的时机，在不妨碍作战和训练的条件之下，一律学会完成部分的生产自给的任务，难道还有疑问吗？

《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105—1106页

军队生产自给，不但改善了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并因而能够扩大军队，而且立即带来了许多副产物。这些副产物就是：（一）改善官兵关系。官兵一道生产劳动，亲如兄弟了。（二）增强劳动观念。我们现行的，既不是旧式的募兵制，也不是征兵制，而是第三种兵役制——动员制。它比募兵制要好些，它不会造成那样多的二流子；但比征兵制要差些。我们目前的条件，还只许可我们采取动员制，还不能采取征兵制。动员来的兵要过长期的军队生活，将减弱他们的劳动观念，因而也会产生二流子和沾染军阀军队中的若干坏习气。生产自给以来，劳动观念加强了，二流子的习气被改造了。（三）增强纪律性。在生产中执行劳动纪律，不但不会减弱战斗纪律和军人生活纪律，反而会增强它们。（四）改善军民关系。部队有了家务，侵害老百姓财物的事就少了，或者完全没有了。在生产中，军民变工互助，更增强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五）军队埋怨政府的事也会少了，军政关系也好了。（六）促进人民的大生产运动。军队生产了，机关生产更显得必要，更有劲了；全体人民的普遍增产运动，当然也更显得必要，更有劲了。

《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107页

抗战八年了，我们开头还有饭吃，有衣穿。随后逐步困难

起来，以至于大困难：粮食不足，油盐不足，被服不足，经费不足。这是伴随着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三年敌人大举进攻和国民党政府发动三次大规模反人民斗争（所谓“反共高潮”）而来的绝大的困难，绝大的矛盾。如果不解决这个困难，不解决这个矛盾，不抓住这个环节，我们的抗日斗争还能前进吗？显然是不能的。但是我们学会了并且正在学会着生产，这样一来，我们又活跃了，我们又生气勃勃了。再有几年，我们将不怕任何敌人，我们将要压倒一切敌人了。

《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108—1109页

军队不但是打仗一项任务，还有做群众工作及从事生产自给两项任务。这个问题，你们必须着重解决。军队的官兵关系与军民关系，亦须于军训中很好解决。不是缺少做地方工作干部问题，而是军队帮助地方做群众工作一项任务强调不足之故，对此加以强调，转变军队作风，地方工作干部就会多起来。

《准备应付必然到来的内战局面》（一九四五年八月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52页

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懂得在城市中善于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善于对付资产阶级，善于领导工人和组织工会，善于动员和组织青年，善于团结和训练新区的干部，善于管理工业和商业，善于管理学校、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善于处理外交事务，善于处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问题，善于调剂城市和乡村的关系，解决粮食、煤炭和其他必需品的的问题，善于处理金融和财政问题。总之，过去军队

干部和战士们所不熟悉的一切城市问题，今后均应全部负担在自己的身上。

《把军队变为工作队》（一九四九年二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05—1406页

国民党只有一百几十万军队，散布在广大地方。当然还有许多仗要打，但是像淮海战役那样大规模作战的可能性就不多了，或者简直可以说是没有了，严重的战争时期已经过去了。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在这一点上决不能松气，如果松气，那就是错误的。但是，军队变为工作队，现在已经要求我们这样提出任务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提出此种任务，并下决心去做，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我们现在正在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随军南下，但是这个数目很小。占领八九个省、占领几十个大城市所需要的工作干部，数量极大，这主要依靠军队本身自己解决。军队就是一个学校，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等于几千个大学和中学，一切工作干部，主要地依靠军队本身来解决。

《把军队变为工作队》（一九四九年二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06页

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特别是在南方各地用北平方式或者绥远方式解决问题的时候是这样。随着战斗的逐步地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就增加了。有一种可能的情况，即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将要使人民解放军全部地转化为工作队，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估计到。现在准备随军南下的五万三千个干

部，对于不久将要被我们占领的极其广大的新地区来说，是很不够用的，我们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这样，干部就够用了，广大地区的工作就可以展开了。我们必须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26页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号召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服勤务者而外，应当负担一部分生产任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

这一生产任务是必须而且可能实现的。

这一生产任务之所以必须实现，是由于国内外反动派所发动的长期的反对中国人民的战争，给了人民以严重的灾害，给了经济以严重的破坏。我们今天要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要医治长期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要从事经济的文化的国防的各种建设工作，国家的收入不足，开支浩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一项巨大困难。克服此种困难的方法，首先是全国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逐步地恢复与发展生产。而人民解放军则必须担负一部分生产任务，方能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克服此种困难。

这一生产任务之所以可能实现，是因为人民解放军绝大多数来自劳动人民中间，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各种生产技能，并曾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担负过生产任务，具有生产的经验与劳动的传统。人民解放军的广大的干部们和老战士们都懂得，军队在参加生产之后，不仅战胜了困难，减少了政府的开支，改善了军队的的生活，并且经过劳动锻炼，还提高了军队的政治质量，改善了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这一生产任务之所以

可能实现，还因为在战争结束了的地区，人民解放军除了担负保卫国防、肃清土匪、巩固治安、加强训练等项任务之外，已有余裕时间参加生产建设工作。所有这些，都是人民解放军能够实现生产任务的条件。

《军委关于一九五〇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7—28页

根据过去的经验，军队的生产运动，必须严格禁止开商店从事商业行为。干部中如有企图以走私、囤积、投机希图暴利的思想，或发现此种行为，必须迅速予以纠正和制止。因为这些不仅违背正确的生产方针，搅乱经济秩序，而且势必发生贪污腐化，毁坏自己同志，为法令所不容许。此外，在进行农业生产时，必须注意不要因开荒引起水患，不要因争地引起人民不满。

《军委关于一九五〇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9页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

《对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语》（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53页

(二) 人民军队必须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

1.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红军无论在什么时候，党及军事的统一指挥机关是不可少的，否则陷于无政府，定是失败。

《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57页

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记得的就是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我们记起了这两点，就可以知道一切思想、习惯、制度何以这样地难改，而党的领导与个人的领导何以总是抗分，长在一种斗争状况之中。红军既是从旧式军队变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的拥护者和一些反对这种思想、习惯、制度的人作斗争，这是党的领导权在四军里至今还不能绝对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原因。不但如此，四军的大部分是从失败环境之下拖出来的（这是一九二七年），结集又是失败之前的党的组织，既是非常薄弱，在失败中就是完全失了领导。那时候的得救，可以说十分原因中有九分是靠了个人的领导才得救的，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这是党的领导权在四军里不能绝对建立起来的第二个原因。明白了这两个原因，我们再来看一看四军党组织以后的历史，更明白个人与党斗争的盈虚消长之机。

《给林彪的信》(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65页

红军历来有一个重大的错误，就是党的机关很少注意军事工作的讨论，因而也没有督促军事负责同志于党的会议中，经常提出关于军事的计划（如训练计划，管理计划，作战计划等）及报告。结果党的讨论离开了军事，军事负责同志也忘记了应该受党的领导和对党作报告，致使红军的军事工作成为一种党的机关和一般党员所不明了的特殊部分，这样不仅对党员军事化一个任务大有妨碍，而且使党与军事分离，有成为党不能领导军事的危险。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805页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47页

如果我们的军队没有共产党领导，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军事工作与革命的政治工作，那是不能设想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而如果没有这种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军队，就不可能是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之所以能够如此英勇坚持，艰苦奋斗，再接再厉，百折不回，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修改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报告加写的文字（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一日），《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506—507页

军队必须放在党委的领导和监督之下，现在基本上也正是这样做的，这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做军事工作的同志是要求中

央和地方党委抓这项工作的。只是因为忙于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工作，近几年来我们抓得少了一些。现在应当改善这种情况。办法也是一年抓几次。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6页

2. 实行党代表制度，支部建在连上

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因为下级干部死伤太多，敌军俘虏兵往往过来不久，就要当连排长；今年二三月间的俘虏兵，现在有当了营长的。从表面看，似乎既称红军，就可以不要党代表了，实在大谬不然。

《井冈山的斗争》（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64页

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现在红军中党员和非党员约为一与三之比，即平均四个人中有一个党员。最近决定在战斗兵中发展党员数量，达到党员非党员各半的目的。

《井冈山的斗争》（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65—66页

自四军成立以后，党从连上建设了普遍的基础，现在上级指导机关对于斗争策略的正确（湘赣边界特委，四军军委前委），边界各县地方党部之建立，群众斗争之发展，使得个人作用渐渐减少，党的领导渐渐加强。

《给林彪的信》（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65—66页

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

《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80页

提高党支部及党员作用。支部不但是发展党员教育党员的学校，而尤其应当成为连队的坚强堡垒。每个党员不仅是模范战士，而同时是非党群众的领导者。

《对山东军事工作的意见》（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六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501页

3.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同“左”、右倾机会主义和各种错误观点作斗争

五次反“围剿”失败，敌人的强大是原因，但战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外交政策之罪，军事冒险之罪，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一书的批语》（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九三七年四月四日），《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06—107页

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十五年的革命和战争，已经锻炼出来这样一条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了。今后战争的新阶段，我们相信，将使这样的路线，根据新的环境，更加发展、充实和丰富起来，达到战胜民族敌人之目的。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186页

正确地规定战略方向，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反对红军的游击主义，却又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战略的速决战，承认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固定的作战线和阵地战，承认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运动战；反对击溃战，承认歼灭战；反对战略方向的两个拳头主义，承认一个拳头主义；反对大后方制度，承认小后方制度；反对绝对的集中指挥，承认相对的集中指挥；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承认红军是中国革命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反对土匪主义，承认严肃的政治纪律；反对军阀主义，承认有限制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权的军事纪律；反对不正确的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承认正确的干部政策；反对孤立政策，承认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最后，反对把红军停顿于旧阶段，争取红军发展到新阶段——所有这些原则问题，都

要求正确的解决。我们现在要讲的战略问题，就是要就中国革命战争的十年血战史的经验，好好地说明这些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191—192页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也不相信“围剿”反复这一规律。在鄂豫皖边区根据地则有所谓“偏师”说，那里的一些领导同志认为第三次“围剿”失败后的国民党不过是偏师了，要进攻红军，就得由帝国主义亲身出马担当主力军。在这个估计之下的战略方针，就是红军打武汉。这和江西的一些同志号召红军打南昌，反对进行使各根据地联成一片的工作，反对诱敌深入的作战，把一省胜利放在夺取省城和中心城市的基点上，以及认为“反对五次‘围剿’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等等，是在原则上一致的。这个“左”倾机会主义，种下了鄂豫皖边区反对第四次“围剿”、江西中央区反对第五次“围剿”斗争中的错误路线的根苗，使红军在敌人的严重的“围剿”面前不得不处于无能的地位，给了中国革命以很大的损失。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195页

丧失根据地的最显著的例子，是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丧失了江西中央根据地。这里的错误是从右倾的观点产生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做了一万二千多公里的长征。然而这种错误，往往有一种“左”倾轻敌的错误为之先行。一九

三二年进攻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正是后来在对付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采取消极防御路线的根源。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198页

从一九三二年一月开始，在党的“三次‘围剿’被粉碎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那个包含着严重原则错误的决议发布之后，“左”倾机会主义者就向着正确的原则作斗争，最后是撤消了一套正确原则，成立了另一整套和这相反的所谓“新原则”，或“正规原则”。从此以后，从前的东西不能叫做正规的了，那是应该否定的“游击主义”。反“游击主义”的空气，统治了整整的三个年头。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变成了逃跑主义。直到党中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的遵义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才宣告这个错误路线的破产，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这是费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啊！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205页

起劲地反对“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说：诱敌深入是不对的，放弃了许多地方。过去虽然打过胜仗，然而现在不是已经和过去不同了吗？并且不放弃土地又能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吗？在敌区或在我区敌区交界地方去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吗？过去的东西没有任何的正规性，只是游击队使用的办法。现在我们的国家已成立了，我们的红军已正规化了。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是国家和国家作战，大军和大军作战。历史不应重复，“游击主义”的东西是应该全部抛弃的了。新的原则是“完全马克思主

义”的，过去的东西是游击队在山里产生的，而山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新原则和这相反：“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敢，乘胜直追”，“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打人”。敌人进攻时，对付的办法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是短促突击，是堡垒战，是消耗战，是“持久战”；是大后方主义，是绝对的集中指挥；最后，则是大规模搬家。并且谁不承认这些，就给以惩办，加之以机会主义的头衔，如此等等。

无疑地，这全部的理论 and 实际都是错了的。这是主观主义。这是环境顺利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环境困难时，则依照情况的变化以次变为拼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这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205—206页

我们现在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的错误的办法，另一方面也反对复活红军幼年时代的许多在现时不需要的非正规性。但是我们要坚决地恢复红军一路走来用以打胜仗的许多可宝贵的建军原则和战略战术原则。我们要把所有一切过去的优良的东西都总结起来，成为有系统的更发展的更丰富的军事路线，以便争取在今天战胜敌人，并且准备在将来转变到新阶段去。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233页

要反对游击战争中的保守主义。保守主义不论是由于贪图安逸而发生的，或由于对敌人力量的过高估计而发生的，均将给予抗日战争以损失，对于游击战争及其根据地的本身也是不利的。另一方面，不可忘记根据地的巩固，而其主要的工作是发动和组织民众，以及游击部队和地方武装的训练。这种巩固，是支持长期战争所必需，也是向前发展所必需的，不巩固就不能有力地向前发展。只知道发展忘记了巩固的游击战争，经不起敌人的进攻，结果不但丧失了发展，且有危及根据地本身之虞。正确的方针是巩固地向前发展，这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好办法。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26页

由此看来，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两个过程和四个战略时期之间，共存在着三个战略的转变。第一个，国内游击战争和国内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二个，国内正规战争和抗日游击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三个，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

三个转变中，第一个转变曾经遇到很大的困难。这里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反对沉溺于游击性而不愿向正规性转变的右的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的倾向，这是由于干部对已经变化的敌情和任务估计不足而发生的。这一方面，拿中央红色区域来说，曾经作了艰苦的教育工作，才使之逐渐地转变过来。又一方面，则要反对过分地重视正规化的“左”的集中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倾向，这是由于一部分领导干部对敌情和任务估计过分，并且不看实情，机械地搬用外国经验而发生的。这一方面，在中央红色区域，曾经在三年的长时间内（遵义会议以前），付

出了极大的牺牲，然后才从血的教训中纠正过来。这种纠正是遵义会议的成绩。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50页

四军中向来就有一些同志是偏于军事观点的，与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路线问题。因长期斗争经验和工农群众的影响，这种单纯观点的头脑，渐渐洗刷了一些，单纯的“打大仗”和“拿几十个州县”的观念比较地减少了，但没有完全消灭，遇有机缘就会发作，特别是在军事失败时候，差不多什么都可以取消，只要枪杆子保存就够了。这些同志在会议时候最厌烦的是讨论宣传和组织问题，在游击工作中发展单纯的军事影响而不去发展政治影响。军阀军队残余的小团体主义是造害红军最大问题之一。少数同志们不但不肯努力去消灭小团体主义，反而有助长小团体主义的倾向。小团体主义不消灭，不能如二、四团一样的完全由集体的党领导，则红军只是一个好听的名词罢了！

《给林彪的信》（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68—69页

流寇思想历来在红军中是很利害的，它的产生是由于四军中的游民成分。党与这种思想曾作过许多的奋斗，但它的尾巴至今还存在，从前代表这种思想的人，至今还不能说是已抛弃这种思想。流寇思想影响到政治方面的最显明的表现，就是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的不同的见解。我们不要忘记，湘赣边界割据问题在四军党内的一致仅仅是表面的罢了，骨子里面是有

一部分同志时时刻刻要脱离边界的斗争，一到危急时候，这些同志马上^①，参加过湘赣边界斗争的人大家明了的。对于建设湘赣边界武装问题，因为要从红军中拨枪，历来成为一个斗争，这是军事观点群众观点两种不同的政治路线发生出来不同见解的表现。

《给林彪的信》（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69页

① 原件中在这里脱漏了三四个字。

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之来源是由于游民、农民与小资产阶级成分中产生出来的个人主义，这与小团体主义、流寇思想、单纯军事观点等等是在一条路线基础上的，只是一个东西。这种思想发展的另一方面必定是分权主义——也是代表游民、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一种思想，而与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无论是阶级的组织——工会，与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共产党，或它的武装组织——红军）不相容的。军委、前委分权的形式所以不能存在就是这个理由。

虚荣心、夸大、英雄思想等等腐败思想，都是以个人主义一个为头发出来的。

《给林彪的信》（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74页

单纯军事观点在红军一部分同志中非常发展。其表现如：

（一）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甚至还有说“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的，则更进一步认为军事领导政治了。

（二）以为红军的任务也和白军相仿佛，只是单纯地打仗

的。不知道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三）因此，在组织上，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

（四）同时，在宣传工作上，忽视宣传队的重要性。在群众组织上，忽视军队士兵会的组织和地方工农群众的组织。结果，宣传和组织工作，都成了被取消的状态。

（五）打胜仗就骄傲，打败仗就消极。

（六）本位主义，一切只知道为四军打算，不知道武装地方群众是红军的重要任务之一。这是一种放大了的小团体主义。

（七）有少数同志囿于四军的局部环境，以为除此就没有别的革命势力了。因此，保存实力、避免斗争的思想非常浓厚。这是机会主义的残余。

（八）不顾主客观条件，犯着革命的急性病，不愿意艰苦地做细小严密的群众工作，只想大干，充满着幻想。这是盲动主义的残余。

单纯军事观点的来源：

（一）政治水平低。因此不认识军队中政治领导的作用，不

认识红军和白军是根本不同的。

(二) 雇佣军队的思想。因为历次作战俘虏兵甚多，此种分子加入红军，带来了浓厚的雇佣军队的思想，使单纯军事观点有了下层基础。

(三) 因有以上两个原因，便发生第三个原因，就是过分相信军事力量，而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

(四) 党对于军事工作没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也是形成一部分同志的单纯军事观点的原因。

纠正的方法：

(一) 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肃清单纯军事观点的理论根源，认清红军和白军的根本区别。同时，还要肃清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残余，打破四军本位主义。

(二) 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特别是对俘虏成分的教育要加紧。同时，尽可能由地方政权机关选派有斗争经验的工农分子，加入红军，从组织上削弱以至去掉单纯军事观点的根源。

(三) 发动地方党对红军党的批评和群众政权机关对红军的批评，以影响红军的党和红军的官兵。

(四) 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

(五) 编制红军法规，明白地规定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士兵会的权能及其和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86—88页

由于红军中游民成分占了很大的数量和全国特别是南方各省有广大游民群众的存在，就在红军中产生了流寇主义的政治

思想。这种思想表现在：一，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二，扩大红军，不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而要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三，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凡此一切流寇思想的表现，极大地妨碍着红军去执行正确的任务，故肃清流寇思想，实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应当认识，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

纠正的方法：

（一）加紧教育，批评不正确思想，肃清流寇主义。

（二）对现有红军基本队伍和新来的俘虏兵，加紧反流氓意识的教育。

（三）争取有斗争经验的工农积极分子加入红军队伍，改变红军的成分。

（四）从斗争的工农群众中创造出新的红军部队。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94页

红军党内对盲动主义已经做了斗争，但尚不充分。因此，红军中还有盲动主义思想的残余存在着。其表现如：一，不顾主观和客观条件的盲干。二，城市政策执行得不充分，不坚决。三，军纪松懈，特别是打败仗时。四，还有某些部队有烧屋行为。五，枪毙逃兵的制度和肉刑制度，也是带着盲动主义性质的。盲动主义的社会来源是流氓无产者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综合。

纠正的方法：

（一）从思想上肃清盲动主义。

（二）从制度和政策上纠正盲动的行为。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94—95页

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在交通和技术进步的今日而企图用流寇主义获得胜利，更是毫无根据的幻想。然而流寇主义在今天的破产农民中还是存在的，他们的意识反映到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的头脑中，就成了不要或不重视根据地的思想。……同流寇主义作思想斗争，将是一个不可少的过程。只有彻底地克服了流寇主义，提出并实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才能有利于长期支持的游击战争。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18—419页

（三）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

1. 革命的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

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连、营、团都有了士兵会，代表士兵利益，并做政治工作和民众工作。

《井冈山的斗争》（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64页

政治工作保证红军的统一与团结。

《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政治军事等问题的通报》（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501页

国民党的军队本来是有大体上相同于今日的八路军的精神的，那就是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时代。那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革命时代有了新精神的军队，其作战方法也自然与其政治精神相配合，不是被动的呆板的作战，而是主动的活泼的富于攻击精神的作战，因此获得了北伐的胜利。现在的抗日战场，正需要这样的军队。

《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80页

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我们说日本技术条件虽优，但它终必失败，除了我们给以歼灭和消耗的打击外，就是它的军心终必随着我们的打击而动摇，武器和兵员结合不稳。我们相反，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官兵一致的。在这上面，就有了一切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的基础。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11页

一、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在抗战中应有其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是根据党的政策与共产党在民族斗争中的独

立性而来的。因此模糊我们政治工作的独立性的原则，无视国民党军队的传统与作法对我们的恶劣影响是不对的。然而所谓政治工作的独立性并不是要我们抄袭内战时期一切作法，相反的我们应当根据民族战争的环境来确定政治工作各方面的具体方针，我们应当使军队的政治工作变成实现党的每个政策的有力武器。

……

四、估计到部队的分散环境和政治工作现状，因此政治工作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应注意：

甲、全般性。反对只顾局部利益与本位主义。

乙、进步性。多研究，多总结，反对保守不求进步。

丙、复杂性，多样性。反对遇事简单公式主义，敷衍了事。

丁、计划性，组织性。反对急躁盲动乱来一顿。

戊、统一性。以使分散与集中、自动与命令求得一致。

己、实际性。反对不着重实际，铺张夸功。

庚、精细性。反对粗枝大叶只顾表面。

辛、战斗性。以求政治工作真正适应于战斗环境。

《对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几点意见》（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93—295页

中国共产党从它参加与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以来，从它参加与领导为这个民族民主革命而战的革命军队以来，就创设了并发展了军队中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种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以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教育群众，是以人民革命的精神教育军队，使革命军队内部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与革命人民、革命政府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完全服从革命政党的政治领导，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并进行瓦解敌军、协和友军的工作，达到

团结自己，战胜敌人，解放民族，解放人民的目的，这就是我们的军队和其他军队的原则区别。我们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就是指的这个意思。

修改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报告加写的文字（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一日），《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506页

一切军队必须加强政治工作。

《三个月总结》（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08页

重要的是政治、根据地、人民群众、党、统战工作，只有会做政治工作的人才会打仗，不懂政治的人就不会打仗。

《革命单搞军事不行》（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97页

2. 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

● 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是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

八路军更有一种极其重要和极其显著的东西，这就是它的政治工作。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有三个，即：第一、官兵一致的原则，这就是在军队中肃清封建主义，废除打骂制度，建立自觉纪律，实行同甘共苦的生活，因此全军是团结一致的。第二、军民一致的原则，这就是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打击危害军民的汉奸卖国贼，因此军民团结一致，到处得到人民的欢迎。第三、瓦解

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办法虽然目前收效尚未显著，但在将来必定会有成效的。此外，从第二个原则出发，八路军的补充不采取强迫人民的方式，而采取鼓动人民上前线的方式，这个办法较之强迫的办法收效大得多。

《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79页

全国一定要学习八路军的样子，真正地做到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用改造军队精神、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去达到目的，只有这样，才能挽回目前严重的局势。

《目前的时局和方针》（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63页

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从这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离了这态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错的，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便决然弄不好。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这些原则要实行有效，都须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那些认为不是根本态度问题而是技术问题的人，实在是想错了，应该加以改正才对。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12页

部队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就是保障部队生产计划与教育

计划的完成及在实施这两项计划时保障自己部队与党政民发生正确的关系，保障自己部队上下级的正确关系，保障经济干部的纯洁。政治工作如果在这些方面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那末，这种政治工作就是失败的。

《关于发展军队的生产事业》(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95页

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在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以及瓦解敌军等项原则的基础上，人民解放军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48页

全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今天军队的同志到会的很多。军队里头怎么样？平时的政治工作跟战时的政治工作是不是有些不同？在战时，要密切联系群众，要官兵打成一片，军民打成一片。这时候，我们有一些缺点，人民还谅解我们。现在是平时，又不打仗，就是训练，如果不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人民对我们的缺点很自然地就难于原谅了。现在实行了军衔制度和其他一些制度，但是，上级跟下级还是要打成一片，干部跟士兵还是要打成一片，还是要准许下级批评上级，士兵批评干部。比如开个党代表大会，给他们一个批评的机会。……军队里头的这种民主，我们曾经搞过，结果是有益的。不要因为有了军衔制度和其他一些制度，而使上下级、官兵、军民、军队同地方的密切关系受到损害。毫无疑问，上下级的关系应当密切，应当是一种同志的关系。干部跟战士的关系应当密切，应当打

成一片。军队跟人民、跟地方党政组织的关系，也应当是密切的。

《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6页

● 官兵一致是军队战斗力极其重要的政治基础

红军在游击时期，其重要任务在打倒阶级敌人，武装工农，帮助地方建立政权，扩大赤色区域。为达到此种任务，所以在战时，要能使官兵一致，奋勇猛进，歼灭敌人，解除其武装而武装工农。在平时，则一面官兵须一致做宣传、发动和组织的工作，一面各级主管官须负责训练本部士兵。

《关于官兵考绩的训令》（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143页

红军虽小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人员是从土地革命中产生，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战斗的，而且指挥员和战斗员之间在政治上是一致的。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90页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今天，对于整个抗日战争，还只能起先锋队的作用，还不能在全国范围内起决定的作用，但是它的一些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优点是足供全国友军采择的。这个军队也不是一开始就像现在的情形，它也曾经过许多的改造工作，主要地是肃清了军队内部的封建主义，实行了官兵一致和军民一致的原则。

《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71页

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为人民服务》（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05页

军队内部的团结，非常之重要。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历来依靠官兵一致，获得了光荣的胜利。但是，中国军阀军队的军阀主义习气在我们军队里的影响，仍然是存在的。有些部队，这种习气还是很严重。一九四五年，应该进行广大的工作，将军队官兵关系中的一切不良现象，例如打人，骂人，不关心士兵的给养、疾病及其他困难，对于士兵的错误缺点不耐心教育说服、轻易处罚，以及侮辱或枪毙逃兵等等恶劣习惯及错误方针，从根本上去掉。许多部队，现在还未重视这一工作，由于不明白这一工作是军队战斗力的极其重要的政治基础。目前开始的一年整训计划，军事整训与政治整训应该并重，并使二者互相结合。整训开始时，还应着重政治方面，着重于改善官兵关系，增强内部团结，发动干部与战士群众的高度积极性，军事整训才易于实施与更有效果。这一工作的实行，应在每一部队内部举行拥干爱兵运动，号召干部爱护士兵，同时号召士兵拥护干部，彼此的缺点错误，公开讲明，迅速纠正，这样就能达到很好地团结内部之目的。

《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38页

官长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态度，要像朋友、同志、兄弟一样地对待战士们。你们当了官长，就要采取这样的态度，不要学国民党军队官长对弟兄们不好。因为我们都是站在一条线上为

人民服务，都准备牺牲性命为全国人民谋利益，为什么要对战士不好呢？一定要好。今后，无论你们到哪一个部队，一定要把官兵关系搞好。你们对战士好，战士一定会以很好的态度对待你们，这样的队伍，是什么敌人也打不散的。

《在抗大七分校的讲话》（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49页

● 军民一致无敌于天下

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民齐心协力，贡献一切给战争。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81页

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12页

八路军也就是老百姓，故军队不要忘本，本就是工农。

八路军有两条规矩，一条就是官兵合作，一条就是军民合作，大家亲亲密密团结起来，日本一定打倒的。

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农工展览会开幕典礼上的讲话（一九四〇年一月十六日），《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160页

我们的军队一向就有两条方针：第一对敌人要狠，要压倒

它，要消灭它；第二对自己人，对人民、对同志、对官长、对部下要和，要团结。

《坚持为人民服务》（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10页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八连颂》（一九六三年八月一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95页

● 宽待俘虏和瓦解敌军

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方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敌军的士兵和营、连、排长被我们俘虏过来，即对他们进行宣传工作，分为愿留愿去两种，愿去的即发路费释放。这样就把敌人所谓“共匪见人就杀”的欺骗，立即打破。

《井冈山的斗争》（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67页

（4）优待敌方俘虏兵，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方法。优待俘虏兵的方法：第一是不搜检他们身上的钱和一切物件，过去红军士兵搜检俘虏兵财物的行为要坚决地废掉。第二是要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俘虏兵，使他们感觉得精神上的欢乐，反对给俘虏兵以任何言语上的或行动上的侮辱。第三是给俘虏兵以和老兵一样的物质上的平等待遇。第四是不愿留的，在经过宣传之后，发给路费放他们回去，使他们在白军中散布红军的影响，反对只贪兵多把不愿留的分子勉强地留下来。以上各项，对于俘虏过来的官长，除特殊情况外完全适用。

（5）医治敌方伤兵，亦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方法。对于

敌方伤兵的医治和发钱要完全和红军的伤兵一样，并且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把上好了药发给了钱的伤兵送返敌军。对待敌方受伤官长亦然。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102页

在敌人枪还拿在手上的时候，为了要减少敌人的战斗力，促成我们的战斗任务起见，应毫无留情地杀伤他。反之敌人已经将枪放下表示投诚了，就不要因愤恨而伤害他，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收缴敌人枪械办法的训令》（一九三〇年九月十二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168页

改变对待俘虏官的政策，一经缴了枪，不但一概不杀，而且要优待他们，不捆绑（除必要时），不剥衣，不打骂，经过保卫局政治部大批地放出去，影响白军官长同我们联合抗日。至于俘虏士兵则要十分优待，不论战场上打得如何激烈，一经缴枪就要把他们当弟兄看待，严禁报复行动。

《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69页

被我们俘虏和解除武装的日军官兵将受到优待。我们不会杀死他们，而是会像兄弟那样对待他们。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使得与我们并无冲突的日本无产阶级出身的士兵站起来反对他们自己的法西斯压迫者。我们的口号将是：“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压迫者法西斯头子。”

《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06页

为加强统一战线的活动与争取白军工作，需要从俘获的白军官兵中施以着重性的政治教育，并特别优待，以便训练出一批可以奔走各方的人材，至少可做联络交通。因此特规定：

1. 凡遇大批俘虏，必须选出一部优秀官兵施以特殊训练。
2. 各个战线上的零星俘虏和投诚的应全部留下训练，概不立即放回。
3. 训练机关，以一部留前方各政治部训练，一部送后方总政治部抗日战线部。
4. 训练内容着重讲统一战线、白军工作。
5. 训练好后应即派出做白军工作，并着重上层活动与军官来往。

《对白军俘虏着重施以政治教育》(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567页

我们的这种政策是坚持的，例如日军现已公开声言要对八路军施放毒气，即使他们这样做，我们宽待俘虏的政策仍然不变。我们仍然把被俘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战的下级干部给以宽大待遇，不加侮辱，不施责骂，向他们说明两国人民利益的一致，释放他们回去。有些不愿回去的，可在八路军服务。将来抗日战场上如果出现“国际纵队”，他们即可加入这个军队，手执武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81页

争取敌伪军的工作，久已成为八路军政治工作三个主要方向之一，也得到了许多成绩，但对战士与干部普遍施以日文日语的教授，并研究各种方法使之善于向敌军士兵与下级官长进行

反侵略统一战线的宣传,还非常不足。争取蒙伪军的成绩较大,但还须更进一步。在这里,搜集与研究敌伪军的全部情况,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在这方面的成绩,还没有达到需要的程度。

《〈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一九三九年一月二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41页

对敌军、伪军、反共军的俘虏,除为群众所痛恶、非杀不可而又经过上级批准的人以外,应一律采取释放的政策。其中被迫参加、多少带有革命性的分子,应大批地争取为我军服务,其他则一律释放;如其再来,则再捉再放;不加侮辱,不搜财物,不要自首,一律以诚恳和气的态度对待之。不论他们如何反动,均取这种政策。这对于孤立反动营垒,是非常有效的。

《论政策》(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67页

对于在战斗中被俘之敌军及伪军官兵,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实行宽大政策,其愿参加抗战者,收容并优待之,不愿者释放之,一律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其有在释放之后又连续被俘者,不问被俘之次数多少,一律照此办理。国内如有对八路军、新四军及任何抗日部队举行攻击者,其处置办法仿此。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37页

对于敌方投诚的、反正的、或在放下武器后愿意参加反对共同敌人的人,一概表示欢迎,并给予适当的教育。对于一切俘虏,不许杀害、虐待和侮辱。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39页

在改造旧军队的工作中，对于一切可以教育的军官，应当给予适当的教育，帮助他们学得正确观点，清除陈旧观点，为人民的军队而继续服务。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74页

为着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我党必须对一切准备进攻和正在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分化的工作。一方面，由我军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的广大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内战军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须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

《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74—1175页

今后前线兵源全部依靠俘虏及某些地方部队之升格，你们及各军对此应有精神准备。今后各区扩兵，征税，编组新部队新兵团，供给标准，脱离生产人数与当地人口之比例等事，均须获得中央批准，方许施行，严禁各自为政，以利持久。今后攻城野战所获俘虏可能大为增加，各区及各军应用大力组织俘虏训练工作，原则上一个不放，大部补充我军，一部参加后方生产，不使一人不得其用。我军战胜蒋介石的人力资源，主要依靠俘虏，此点应提起全党注意。

《襄阳太原济南各地战况及今后的兵源问题》（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七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530页

为着执行歼敌任务，除有计划地谨慎地从解放区动员人民

参军外，必须大量利用俘虏。

《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46页

现在杜聿明部所处情况比较郑洞国部在长春的情况还要坏得多，饥寒交迫，大批投降，正在日趋瓦解。如果敌方内部瓦解的过程有加速扩大的趋势，也许在十天或二十天之后出现长春那样的结果。你们现在应用极大力量，加强政治攻势。用各种名义（你们及各纵各师及敌方来降的官长）写信给敌方各级官长，并将这些信公开地散播，当作一个群众运动，公开地进行这一工作。

《加强对被围之敌的政治攻势》(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456页

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

《读〈新五代史〉批语》，《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70页

3. 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我们红军作战既没有强盛的火力压倒敌人，又没有军用化学可以制胜，全凭着已腾沸的热血、誓死斗争的决心和敌人肉弹相搏，用血去染成赤色区域。所以每次胜利全靠官兵奋勇猛进，以我们的勇敢骇倒敌人。

《加强体力与提高射击技术的训令》(一九三〇年四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150页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为抗大制定的校训（一九三七年十月）

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

《给文运昌的信》（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72页

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政治方向可以有許多不同的方向，你们要学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这就是要打日本、怎样打日本、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能打倒的正确的政治方向。其次要学一个达到及完成这种政治方向的工作作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必得有这种作风才能达到及完成以上的政治方向。再次是要学点战略战术。抗大是军事学校，要学做一个军人，学点军事本领。……总之，你们在这里要学到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灵活的战略战术。有了这三样东西，我们便能够最后战败敌人。

《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一九三八年四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16—117页

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一的。抗大的职员、教员、学生，都是根据这三者去进行教育与从事学习的。

《抗大三周年纪念》（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88页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

的政治方向。

《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新中华报》1939年5月10日

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39页

必须发扬勇敢战斗、不惜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短期内接连打几仗）的优良作风。

《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33页

二十二年的人民解放军的历史证明，只要坚持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保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完全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够打倒的，任何严重的困难都是能够克服的。

《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年的历史经验》（一九四九年七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53页

必须教导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不要骄傲自满，不要以功臣自居，不要看不起起义部队和地方部队，而要谦虚谨慎，耐劳耐苦，对敌人很勇敢，对同志对人民则很和气，借以团结全军全民完成自己光荣伟大的任务。

《人民解放军必须谦虚谨慎维持良好的纪律》（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83页

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于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一九五〇年十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01页

要提倡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

要坚忍。如抗美援朝，我们打痛了美帝国主义，打得它相当怕。这对我们建设有利，是我们建设的重要条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军队受到了锻炼，兵勇、干智。当然，我们牺牲了人，用了钱，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们就是不怕牺牲，不干则已，一干就干到底。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我们的县城只剩下一个，但我们并没有退出边区，吃树叶就吃树叶，就是要有一股狠劲。

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二日）

保持和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特别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这在你们的学院，是和全军一样，必须充分领会和一刻也不可忘记的。

《给军事工程学院的训词》（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52页

作战的双方，都把自己的战线称为铜墙铁壁。在我们这方面，确实是铜墙铁壁。我们的战士和干部机智，勇敢，不怕死。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

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一九四九年在这个地方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子是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当然，还有别的。现在部队的伙食改善了，已经比专吃酸菜有所不同了。但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一个苹果不吃，饿死人没有呢？没有饿死，还有小米加酸菜。在必要的时候，在座的同志们要住棚子。在过草地的时候，没有棚子都可以住，现在有棚子为什么不可以住？军队这几天开会，他们慷慨激昂，愿意克己节省。军队这样，其他的人更要艰苦奋斗。

《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62页

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朱总司令走了四十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过来了。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就吃树皮、树叶。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要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4.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不断纠正错误思想和不良作风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红军的来源和它的成分，五月份统计，全军一三二四名党员中，工人三百一十一，农民六百二十六，小商人一百，学生一百九十二，其他九十五，工人与非工人的比例是百分之二十三对百分之七十七。讨论到个人思想时，不要忘记他的出身、教育和工作历史，这是共产主义者的研究态度。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我们必须和这种思想（主要的是思想问题，其余是小节）奋斗，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凡有障碍腐旧思想之铲除和红军之改造的，必须毫不犹豫地反对之，这是同志们今后奋斗的目标。

《给林彪的信》（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74—75页

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85页

红军第四军在接受中央指示之后，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减少了许多。例如党的决议比较地能够执行了；要求在红军中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等项错误主张，也没有人再提了。但是在实际上，这种减少，只是一时的和表面的现象，还不是极端民主化的思想的肃清。这就是说，极端民主化的根苗还深种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中。例如对于决议案的执行，表示种种勉强的态度，就是证据。

纠正的方法：

(一) 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首先，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其次，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的和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根本不相容的。

(二) 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其路线是：

1. 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

2. 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

3. 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

4. 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其办法是开活动分子会，或开支部以至纵队的党员大会（须看环境的可能），派人出席作报告。

5. 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地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88—89页

四军党内存在着的非组织的观点，其表现如下：

甲、少数不服从多数。例如少数人的提议被否决，他们就不诚意地执行党的决议。

纠正的方法：

（一）开会时要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有争论的问题，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一次不能解决的，二次再议（以不妨碍工作为条件），以期得到明晰的结论。

（二）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

乙、非组织的批评：

（一）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但是红军党内的批评有些不是这样，变成了攻击个人。其结果，不但毁坏了个人，也毁坏了党的组织。这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纠正的方法，在于使党员明白批评的目的是增加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不应当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

（二）许多党员不在党内批评而在党外去批评。这是因为一般党员还不懂得党的组织（会议等）的重要，以为批评在组织内或在组织外没有什么分别。纠正的方法，就是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对党委或同志有所批评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提出。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89—90页

红军中的绝对平均主义，有一个时期发展得很厉害。例如：发给伤兵用费，反对分伤轻伤重，要求平均发给。官长骑马，不认为是工作需要，而认为是不平等制度。分物品要求极端平均，不愿意有特别情形的部分多分去一点。背米不问大人小孩体强体弱，要平均背。住房子要分得一样平，司令部住了一间大点的房子也要骂起来。派勤务要派得一样平，稍微多做一点就不肯。甚至在一副担架两个伤兵的情况，宁愿大家抬不成，不愿把一个人抬了去。这些都证明红军官兵中的绝对平均主义还很严重。

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则见之于物质生活方面罢了。

纠正的方法：应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红军人员的物质分配，应该做到大体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饷平等，因为这是现时斗争环境所需要的。但是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因为这不是斗争的需要，适得其反，是于斗争有妨碍的。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90—91页

红军党内的个人主义的倾向有如下各种表现：

（一）报复主义。在党内受了士兵同志的批评，到党外找机会报复他，打骂就是报复的一种手段。在党内也寻报复；你在这次会议上说了我，我就在下次会议上找岔子报复你。这种报复主义，完全从个人观点出发，不知有阶级的利益和整个党的

利益。它的目标不在敌对阶级，而在自己队伍里的别的个人。这是一种削弱组织、削弱战斗力的销蚀剂。

(二) 小团体主义。只注意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整体的利益，表面上不是为个人，实际上包含了极狭隘的个人主义，同样地具有很大的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红军中历来小团体风气很盛，经过批评现在是好些了，但其残余依然存在，还须努力克服。

(三) 雇佣思想。不认识党和红军都是执行革命任务的工具，而自己是其中的一员。不认识自己是革命的主体，以为自己仅仅对长官个人负责任，不是对革命负责任。这种消极的雇佣革命的思想，也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表现。这种雇佣革命的思想，是无条件努力的积极分子所以不很多的原因。雇佣思想不肃清，积极分子便无由增加，革命的重担便始终放在少数人的肩上，于斗争极为不利。

(四) 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见于享乐方面的，在红军中也有不少的人。他们总是希望队伍开到大城市去。他们要到大城市不是为了去工作，而是为了去享乐。他们最不乐意的是在生活艰难的红色区域里工作。

(五) 消极怠工。稍不遂意，就消极起来，不做工作。其原因主要是缺乏教育，但也有是领导者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或执行纪律不适当。

(六) 离队思想。在红军工作的人要求脱离队伍调地方工作的与日俱增。其原因，也不完全是个人的，尚有一，红军物质生活过差；二，长期斗争，感觉疲劳；三，领导者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或执行纪律不适当等项原因。

纠正的方法：主要是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再则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执行纪律要得当。并要设法改善红军

的物质生活，利用一切可能时机休息整理，以改善物质条件。个人主义的社会来源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当进行教育的时候必须说明这一点。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92—93页

红军的条件在物质上和政治上都开始有了改进，但是还存在着许多不良倾向。例如“游击主义”就是一种弱点，表现于缺乏纪律，极端民主化和组织松懈等等。另一种需要克服的倾向，是“流寇思想”——不愿意安心做建立政权的认真工作，喜欢流动、变换环境以及新奇的经历和事件。还有军阀主义的残余，有的指挥员虐待或者甚至殴打战士，凭个人好恶，对人歧视或者偏爱。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出版，第58—59页

小胜之后，必生骄气，轻视敌人，以为自己了不得。七七一团七亘村受袭击，是这种胜利冲昏头脑的结果。你们宜发通令于全军，一直传达到连队战士，说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个艰苦奋斗的长过程。凡那种自称天下第一、骄气洋溢、目无余子的干部，须以深切的话告诉他们，必须把勇敢精神与谨慎精神联系起来，反对军队中的片面观点与机械主义。

《必须把勇敢精神与谨慎精神联系起来》（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6页

在八路军中，开始向新军阀主义倾向作斗争。这种倾向，表现在红军改编后某些个别分子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以做官为荣

耀)等等现象上面。这个新军阀主义倾向虽然和表现在打人、骂人、破坏纪律等等现象上面的老的军阀主义倾向同其根源(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同其结果(脱离群众);然而它是在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时期发生的,它带着特别大的危险性,所以特别值得注意,需要坚决地加以反对。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92—393页

近年来确实生长了一种军阀主义的毛病,一部分军队工作同志养成了一种骄气,对士兵,对人民,对政府,对党,横蛮不讲理,只责备做地方工作的同志,不责备自己,只看见成绩,看不见缺点,只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例如陕甘宁边区,就有这种现象。经过去年的高级干部会议和军政干部会,又经过今年春节的拥政爱民运动和拥军运动,这个倾向是根本地克服下去了,还有一些残余,还必须继续去克服。

《组织起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34页

在打了这几个大仗以后,那末,不但就军事上来说,而且就政治上和经济上来说,国民党政权是被我们基本地打倒了。基本地打倒了国民党,不等于全部地打倒了国民党,中国尚有许多敌军待我们去歼灭,尚有许多地区待我们去占领和去工作。轻敌的观念无论何时是不应该有的,我们决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

《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29—230页

在军队打了一个胜仗之后,有的同志刚刚同那些左右前后

的人谈得津津有味的时候，尾巴翘得那么高的时候，你就给他提出打第二仗的新任务。把新的任务一提出去，他马上就要想问题，就要做准备工作，那个翘起来的尾巴就下去了，他来不及骄傲。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结论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

5. 拥政爱民、拥军优属

大数量地动员群众去当红军，依靠于：（一）政治上的充分的宣传鼓动，废弃一切强迫办法；（二）充分地优待红军家属；（三）健全的编制与训练地方武装。而优待红军家属，是使群众欢喜去并且安心留在红军部队的一个根本工作，长冈乡、才溪乡的经验，给我们完全证明了。……只有拿经济上的动员配合着政治上的动员，才能造成扩大红军的热潮，达到如像长冈乡、才溪乡一样的成绩。

《才溪乡调查》（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
329—330页

红军在两年中是迅速地扩大了，比之两年前是扩大了几倍。这一方面的得到成功，依靠于广大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并且依靠于动员方法的进步与苏维埃优待红军法令的执行。在一九三三年红五月一个月中间，中央苏区的若干个县中就扩大了近两万的新战士。很多的地方，工农群众潮水一般地涌进红军中去。一切以为群众不愿意当红军，或者以为在新区、边区等处不能扩大红军的机会主义的说法，事实已证明是错误的。然而动员方法之正确，苏维埃优待红军法令之彻底执行，是

迅速完成动员计划的关键。废弃一切强迫命令，实施充分的宣传说服，制裁破坏扩大红军以及领导开小差的阶级异己分子，是动员方法的重要节目。提高红军战士的社会地位到最光荣的标准，给予红军战士一切可能与必要的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待遇，分配外籍红军战士以土地，而发动群众代替他们耕种，为每一红军战士的家属很好地耕种土地，实行消费合作社对于红军家属百分之五的廉价，实行为红军家属开办供给日用必需品的专门商店，实行在国家企业与合作社的盈利中抽出百分之十供给红军家属，号召群众为红军家属的疾病困难募捐接济，号召群众对于红军战士及其家属给予精神上物质上的慰劳。所有一切关于优待红军战士及其家属的法令与办法，实际与彻底的执行，是保证红军踊跃地上前线去及巩固其在前线上的战斗决心的必要与重要的步骤。这些工作，在苏区各地存在着很多的模范，在这些地方的广大工农群众，以手执武器保卫苏区与发展苏区为自己神圣的责任，而大批地不断地涌向前线去。

《武装民众与建设红军》（一九三四年一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337—338页

猛烈扩大苏区，造成有利的战斗环境。这有地方党政力量与我们配合去做。红军指挥员战斗员要尊重地方党政领导机关，拿命令的甚至骂人的态度去对付地方同志是完全不对的。

《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69页

军队干部必须帮助地方干部，地方干部也必须帮助军队干部。如有纠纷，应该双方互相原谅，而各对自己作正确的自我批评。在军队干部事实上居于领导地位的地方，在一般的情形

之下，如果和地方干部的关系弄不好，那末，主要的责任应该放在军队干部的身上。必须使军队干部首先懂得自己的责任，以谦虚的态度对待地方干部，才能使根据地的战争工作和建设工作得到顺利进行的条件。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23—824页

为了使党政军和人民打成一片，以利于开展明年的对敌斗争和生产运动，各根据地党委和军政领导机关，应准备于明年阴历正月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军队方面，重新宣布拥政爱民公约，自己开检讨会，召集居民开联欢会（当地党政参加），有损害群众利益者，实行赔偿、道歉。群众方面，由当地党政和群众团体领导，重新宣布拥军优抗公约，举行热烈的劳军运动。在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运动中，彻底检查军队方面和党政方面各自在一九四三年的缺点错误，而于一九四四年坚决改正之。以后应于每年正月普遍举行一次，再三再四地宣读拥政爱民公约和拥军优抗公约，再三再四地将各根据地曾经发生的军队欺压党政民和党政民关心军队不足的缺点错误，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各方面只批评自己，不批评对方），而彻底改正之。

《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13页

加强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两项工作，进一步地改善军民关系。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和我们解放区人民之间的关系，历来是好的，因此我们能够战胜敌人，巩固与发展解放区。但是，旧军队的习气，同样会传染给我们的，军民关系中的不良现象，例如军队

态度蛮横,损害人民利益,纪律不好,不尊重政府等事,也就时常发生。同时,地方对军队帮助不够,优待抗属工作做得不好等等现象,也就存在着。一九四三年,我们曾经指出了这些工作的重要性,但是许多地方还未重视。一九四五年旧历正月,一切解放区应普遍举行拥政爱民运动与拥军优抗运动,一定要做出显著成绩来。已经有了成绩的,必须继续做,必须检查此两项工作的结果。如果我们的全部军队,官兵上下团结一致,从政治上铁一般地巩固起来了,加上军事技术与战术的训练,又加上人民的拥护,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事业,就有了坚强的保障了。

《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

第3卷第239页

在解放区,一方面,军队应实行拥政爱民的工作,另一方面,民主政府应领导人民实行拥军优抗的工作,更大地改善军民关系。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1090页

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每到一地,就应立即帮助本地人民,不但要组织以本地人民的干部为领导的民兵和自卫军,而且要组织以本地人民的干部为领导的地方部队和地方兵团。然后,就可以产生有本地人领导的主力部队和主力兵团。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如果不能完成此项任务,就不能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也不能发展人民的军队。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1091—1092页

所谓军队与地方的关系,就是我们的军队与农民的关系。忽

略了这一点是不行的，就要犯错误，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个原则，处理好这个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05页

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一九四六年，这两项工作，必须比过去几年做得更好些。这对于粉碎国民党进攻和巩固解放区，将有重大意义。军队中应当从每个指战员的思想问题上解决问题，使他们彻底认识拥政爱民的重要性。只要军队方面做好了，地方对军队的关系必会跟着改善。

《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76页

应指出军队干部必须和本地干部发生正确的关系，好好地帮助他们而不要看不起他们，这点极为重要。分局应召集有军队和地方两方干部在一起的会议，明确地指示任务和双方发生正确关系的重要性。

《中央转发华南分局关于军队干部参加地方领导工作的意见的批语》（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二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185页

（四）人民军队的民主制度

1. 军队内部的民主是增强战斗力、支持长期战争的重要武器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

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井冈山的斗争》（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65页

军队应实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主要地是废除封建主义的打骂制度和官兵生活同甘苦。这样一来，官兵一致的目的就达到了，军队就增加了绝大的战斗力，长期的残酷的战争就不患不能支持。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11页

在我们军队中的党组织，也须增加必要的民主生活，以便提高党员的积极性，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但是军队党组织的民主应少于地方党组织的民主。无论在军队或在地方，党内民主都应是着为巩固纪律和增强战斗力，而不是削弱这种纪律和战斗力。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9页

统一在军事上尤为需要，但是军事的统一，亦应建筑在民主基础上，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部分军队互相之间，如果没有一种民主生活、民主关系，这种军队是不能统一作战的。

《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讲话》（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69—170页

2. 人民军队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

部队内部政治工作方针，是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目前在我军部队中热烈进行的三查、三整，就是用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的方法，达到前两项目的的。

关于经济民主，必须使士兵选出的代表有权协助（不是超过）连队首长管理连队的给养和伙食。

关于军事民主，必须在练兵时实行官兵互教，兵兵互教；在作战时，实行在火线上连队开各种大、小会。在连队首长指导下，发动士兵群众讨论如何攻克敌阵，如何完成战斗任务。在连续几天的战斗中，此种会应开几次。此项军事民主，在陕北蟠龙战役和晋察冀石家庄战役中，都实行了，收到了极大效果。证明只有好处，毫无害处。

应当使士兵群众对于干部中的坏分子有揭发其错误和罪恶的权利。应当相信，士兵对于一切好的和较好的干部是不会不加爱护的。同时，应当使士兵在必要时，有从士兵群众中推选他们相信的下级干部候选人员、以待上级委任的权利。在下级干部极端缺乏的时候，这种推选很有用处。但是这种推选不是

普遍的推选，而是某些必要时的推选。

《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4卷第1275—1276页

军队多次整风，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战时班上建立互助组，实行官兵、军民打成一片，禁止打人骂人，禁止枪毙逃兵。因此士气高涨，战无不胜。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九五七年七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47页

3. 新式整军运动是军队实行民主的好方法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冬季两个多月中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的整军运动。由于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改，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就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的团结。在这个基础上，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了，完全有领导地有秩序地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发扬了。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

《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九四八年三月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94页

这种新式的整军运动，不但在西北方面实行了，在全国人民解放军中都已实行，或者正在实行着。这种整军运动，是在作战的间隙中进行的，并不妨碍作战。这种整军运动，同我党

正确地进行着的整党运动、土地改革运动相结合，同我党缩小打击面，只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严禁乱打乱杀（杀人愈少愈好），坚决团结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大众的正确方针相结合，同我党实行正确的城市政策，坚决地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方针相结合，这样就必然会使人民解放军的威力无敌于天下。

《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九四八年三月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94—1295页

这次休整，采取群众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三查（查阶级成分，查工作，查斗志）和群众性练兵（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方法，发动了全军指挥员战斗员的高度的革命积极性，教好了或清除了一部分军队中的地主、富农分子或坏分子，提高了纪律，讲明了土地改革中的各项政策，对待工商业和知识分子的政策，发扬了军队中的民主作风，提高了军事技术和战术。这样就使得我军极大地增长了战斗力。

《关于情况的通报》（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99—1300页

差不多一切人民解放军的部队，在最近几个月内，都利用了战争的空隙，实行了大规模的整训。这种整训，是完全有领导地和有秩序地采用民主方法进行的。由此，激发了广大的指挥员和战斗员群众的革命热情，明确地认识了战争的目的，清除了存在于军队中的若干不正确的思想上的倾向和不良现象，教育了干部和战士，极大地提高了战斗力。这种民主的群众性的新式的整军运动，今后必须继续进行。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12页

（五）人民军队的纪律

1.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红军的游民成分产生了流寇思想，同时影响到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负责同志亦显然发出不同的意见，一种以为军纪破坏一些城市破坏一些也没有什么大要紧；另一种则与此相反。对于军纪破坏一事，有同志以为宁可没有这次胜利，不可有这次军纪破坏；还有同志则没有这种深刻的感觉，马马虎虎叹息一下就算了。这是最近的例子，以前的例子很多。军纪问题是红军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但因一种人主严，一种人主宽，效果便相消了。在群众的心理上，因为多数人做了、少数人做好，结果便发生不良的影响。

《给林彪的信》（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69页

军队要有统一领导和纪律，才能战胜敌人；正确的自我批评，对于领导和纪律，不但不会削弱它，而且只会增强它。

《坚持为人民服务》（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09页

任何部队，在每一次行动前，必须进行一次公开的集体的纪律教育，并以按照当前具体情况应当注意的具体事项，在不泄露机密的条件下，明确地告诉一切指战员，方能于行动时使一切指战员遵守政治纪律，给人民以良好影响。

《注意加强部队纪律教育》（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54页

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39页

我军到任何地方，原则上不许没收任何商店及向任何商人捐款。官僚资本，在该地成为根据地时，亦只许由民主政府接收经营，不许军队没收或破坏。军队给养应取给于敌人仓库、地主阶级、土地税及政府向商人征收之正当的营业税及关税。没收敌军官佐家属的财产，亦是完全错误的。高家堡破坏纪律的行为，应追究责任，并向全军施行政策教育与纪律教育。

《应向全军施行政策与纪律教育》（一九四八年一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4页

我党我军仍须稳步前进，不骄不躁，以求全胜。我们的口号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即可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94页

我全军对于贪污腐化犯法乱纪情节严重的分子，必须一律予以惩办，不得姑宽。

《在军委给华东军区党委的复电稿上加写的话》（一九五二年二月五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157页

2. 经常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

红军纪律是一种对群众的实际宣传，现在的纪律比前松懈了，因此给了群众以不好的影响。

上门板，捆禾草，扫地，讲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照还，赔偿损失，这些都是红军宣传工作的一种，现在也做得不充分。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98页

一、本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多年，其内容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现在统一规定，重行颁布。望即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至于其他应当注意事项，各地各军最高首长，可根据具体情况，规定若干项目，以命令施行之。

二、三大纪律如下：

（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

三、八项注意如下：

（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41页

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

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

《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62页

我们军队里头要经常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只要你空几个月不搞，就松松散散了。一年要鼓几次气。新兵来了，要进行教育。就是老兵，老干部，只要你不整风，他的思想也要起变化。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多好呀。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再就是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对人民，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要耍骄傲，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

《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249页

（六）人民军队的军政训练和文化教育

1. 加强军政教育，提高部队的军事和政治素质

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担重大的斗争任务。因此，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94页

教授法：

- （1）启发式（废止注入式）；
- （2）由近及远；
- （3）由浅入深；
- （4）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释俗）；
- （5）说话要明白；
- （6）说话要有趣味；
- （7）以姿势助说话；
- （8）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
- （9）要提纲；
- （10）干部班要用讨论式。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104—105页

怎样做新兵及俘虏兵的特别教育：

1. 把红军的生活习惯，如（1）官兵生活平等（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是剥削阶级，士兵不是被剥削阶级），（2）三大纪律及其理由，（3）士兵会的意义和作用，（4）红军中的经济制度（经济的来源，管理经济的组织，经济公开主义及士兵审查制度），（5）经济委员会管理大队伙食和分伙食尾数，（6）废止肉刑辱骂，（7）优待俘虏事项，讲给新兵们俘虏们听。

2. 讲述红军斗争略史。

3. 红军的宗旨：（1）红军与白军所以不同，此点对俘虏兵要详细讲；（2）红军与土匪所以不同；（3）红军三大任务。

4. 讲述红军组织系统。

5. 普通政治常识，如：（1）国民党与共产党；（2）英日美三大帝国主义侵略中国；（3）各派军阀受帝国主义指挥到处混战；（4）分田；（5）苏维埃；（6）赤卫队等。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106—107页

应该把巩固红军放在红军建设的重要地位，使红军不但能够很快扩大，而且能够很快强健起来。应该更进一步提高红军战士的政治教育，使每个红军战士都自觉地为了苏维埃新中国而奋斗到底，使红军成为苏维埃的宣传者与组织者，成为创造新苏区的执行者，使红军战士与广大苏区白区的工农劳苦群众之间发生更加密切的联系。要从政治教育去提高红军的自觉的纪律，使他们明白这是保证战争胜利的重要武器。政治委员制度应该建立到一切红军部队、地方部队与游击队里面去。应该提拔更多的工人成分充当各级军事的与政治的指挥员。红军学

校应当使之成为比较过去更能训练大批高级的与初级的军事政治干部的学校。注意红军中成分的考察，对于地主资产阶级分子混进红军中来破坏红军的企图，应该给予严厉的打击。巩固红军使红军成为铁军的工作，与政治工作同等重要而为现时红军所迫切需要的，就是军事技术的提高。这一任务的解决，在战争的规模日益扩大，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队日益采用新的军事技术的面前，对于我们是绝顶重要的。“学会与提高新的军事技术”的口号，应该深入到每个红军战士中去，红军学校应该为了这一目的去尽他最大的努力。

《武装民众与建设红军》（一九三四年一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342页

切实训练自己，提高方面军的战斗力到很高的程度。一方面着重射击教育与战术教育，一方面着重基本的政治教育与识字教育。我们的射击和射击指挥还有严重的缺点，我们的战斗指挥还非常之不精熟，一定要求得一个彻底的转变。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应该努力提高一步，指挥员要做到能写能看，战斗员要做到认得三百字，要懂得许多革命问题的普通道理。教育首先是干部教育，只有提高了干部的军事政治程度，才能使战斗员的军事政治程度真正提高。提高老干部的程度，创造许多的新干部，这是红军在大战争面前的迫切任务。

《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69页

提高红军干部的政治水平与军事水平，保证红军战争中优秀的与坚强的领导。

《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政治军事等问题的通知》（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501页

随营学校非常必要，你们所需干部主要靠此供给。我们从前线部队抽出大批高级干部开办红大训练，储为将来之用。……前四个月专学政治理论，后四个月政治军事并重。此外，尚有造就连排长的普通科六百人，均长征中之优秀下级干部与战士。

《开办随营学校非常必要》（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603页

教育干部，将干部的政治、军事、文化水平大大提高一步，是执行一切政治军事任务的决定一环。

同杨尚昆给彭德怀、左权等的电报（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第595页

一个军事学校，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77页

红军应利用时机，加强内部政治上的与军事上的训练，加强党在红军中的堡垒作用，重新教育干部，使他们能够负担新形势下的新任务，严整军风纪，学习群众工作，争取成为抗日军队的模范。

《国内和平实现后的形势和任务》（一九三七年三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95—496页

关于抗大分校之教育计划，应当加强军事教育，强化军事生活，以培养初级军事干部为目的，以及重新配备教学方法，训练教育干部，使之更加适合于新的教育对象。这些改变的意见，我们在原则上均同意，惟在几个具体问题上，再提供下面意见：

(一)虽以培养军事干部为目的,但政治教育仍占重要地位,至少亦应与军事教育列于同等地位。因此,在政治课课程内容上,必须教列宁主义,这是政治上武装他们头脑的很基本的问题。此外,民众运动,共产党问题,八路军问题,亦应当作专门课程教,而统一战线倒可放到中国革命运动史以内教。党的建设,只作党内教育,一般的学生只讲共产党问题。国际现势亦不必教,为着重于临时的时事教育。

(二)为了教育深入,必须坚持学校教育方法上少而精的传统,每周上课无论如何不得超过六次。

(三)因此军事教育内容似乎太多,如教育时间仍为八个月,则除以连以下的步兵战术及游击战术为主要内容外,只能教一点战略学(以《论持久战》为教本)及下级干部所必须具备之筑城、兵器、地形的知识。交通、军制、马学、卫生学、典范令,虽亦有其重要性,但以时间所限,恐仍以不教为宜。

(四)学生将来主要在八路军工作,为了加强党的教育起见,党的支部应当公开,并实行党日制。

(五)在八个月的学习期内,最好能给学生到部队中去实习的机会,时间约一个月。

《改进抗大分校教育计划的意见》(一九三九年三月六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455—456页

……要求提高参谋人员的政治素质,把过去部分的技术参谋,提高到战术参谋以及战略参谋的水平,以健全指挥机关的工作,而准备指导新局面下的战争。

《对新四军参谋会议的意见》(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六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458页

抗大以及一切由知识青年所组成的军政学校及教导队的办理方针，应当如下：

（一）把知识青年训练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或同情者，把他们训练成为八路军的干部，确是一个艰苦的工作，我们应努力转变他们的思想，注意于领导他们思想转变的过程，用适当的方式组织学生中的思想上的争论与辩论，实际上这样的学校中一定有资产阶级思想与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二）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因此，教育应当是中心，抗大过去确有注意形式上的铺张，而不大注意教育的倾向，必须严加纠正。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课目不宜过多，阶级教育、党的教育与工作必须大大加强。抗大不是统一战线学校，而是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干部学校。

（三）教育知识青年的原则是：

1. 教育他们掌握马列主义，克服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
2. 教育他们有纪律性组织性，反对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
3. 教育他们决心深入下层实际工作，反对轻视实际经验。
4. 教育他们接近工农，决心为工农服务，反对看不起工农的意识。

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抗大工作的指示（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你们要注意扩大随营学校（或办抗大分校），分为两部分学生，一部分是老兵、老干部，尽量抽调来训练，一部分是青年学生，大量地放手地从平、津、冀东各地招收革命知识分子或半知识分子。只有自力更生地大量创造干部，才能担负创造冀

热察三省伟大根据地的任务。

《挺进军战略任务》(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一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515页

关于培养团级干部,军部可办团级训练队,或称军事整风班亦可,吸收离职的旅、团级干部,并选一部优秀营级干部参加,时间不宜太长,课程可定为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管理教育(带兵、练兵、养兵等军事行政事项)五大项,以提高干部的指挥艺术为中心。关于战术学习,最好采用总结过去战例的互相批评的整风座谈办法,就是要学生报告自己的作战经验,或提出若干问题让学生发表意见,举行辩论之后,然后加以总结。这种根据实践的启发式的具体学习,最合我军干部的需要。以前照本宣科的办法,既不易注入,且难切合实际。延安抗大,正准备冬季开办抗大教员训练班,先教好教员,四个月后回去教学生,其课程也是上述几项。

《对华中部队整训的意见》(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03—204页

三个月经验证明:在一月至六月休战期间,凡依照中央指示加紧进行了军事训练的军队(中央曾反复指示各地应以练兵、生产和土地改革等三项工作为中心任务),其作战效能就高些,否则效能就低得很多。今后各区必须利用作战间隙,加强军事训练。一切军队必须加强政治工作。

《三个月总结》(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08页

我全军将士必须提高军事艺术,在必胜的战争中勇猛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敌人。必须提高觉悟性,人人学会歼灭敌人、唤起民众两套本领,亲密团结群众,把新区迅速

建设成为巩固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39页

2. 加强文化教育,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

我们的军事技术和文化水平还须大大提高。……要以大力来组织文化教育,努力克服文盲,克服我军特别是干部中文化水平低下的弱点。

《增长力量,准备反攻》(一九四二年三月四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78页

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11页

关于地理常识的教育极为重要。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印制长江以南及西北、西南的简明地图一张,图上有大的河流、山脉,有省界,有大城市及中等城市的名称。在省名及大城市名的旁边注明该省该市的人口总数。在各野战军自己担任占领和工作的区域内,标注重要县镇的名称。图幅不要太大,以纵横一公尺左右为适宜。除发给营部以上各级机关每处一张外,如能每个连队有一张,使一切识字的连排长及战士都能阅看,则极为有益。我们认为,此种地图常识的教育,将使指战员们增加勇气和对于任务的明确性。

《对部队进行地理常识教育极为重要》(一九四九年二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55—256页

练武还要练文，注意学文化。

《对部队军事训练的若干指示》（一九六四年六月、七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99页

3. 加强练兵，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练兵运动

普通的兵要训练半年一年才能打仗，我们的兵，昨天入伍今天就要打仗，简直无所谓训练。军事技术太差，作战只靠勇敢。长时间的休息训练是不可能的，只有设法避开一些战斗，争取时间训练，看可能否。为着训练下级军官，现在办了一个百五十人的教导队，准备经常办下去。

《井冈山的斗争》（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64页

没有健强的体力，就有万分的革命精神和志愿也无从施用；没有良好的射击技术，就不能在战场上杀伤得多数敌人，而自己也就多受损失。因此，锻炼身体增进体力，熟习瞄准增进射击效能，是现在红军军事训练中的第一要着。现在规定各部早操时间废除跑步，或多操持枪体操，或徒手体操，在每星期的操课表中须另有体操时间。晚上游戏多做各种运动，如竞走、踢球、演习、叠罗汉……。在休息时间比较长久的時候，可酌量设置简单器械——单杠架、吊绳、吊棍、秋千、吊环、爬城索……（此等器械都可以带走的）施行器械体操和设备些障碍物，施行应用体操——就是做超越竞走。这些事情只要有一个星期以上休息的地方，有相当的地点时就可以举行，派兵士去做并没有困难，而且他们必定也很欢喜来干。另一方面，在学术科施行中都要特别注意射击教育，加多射击教育的时间，举行射

击比赛。以后军部拟在每一个月至两个月之间，召集一次各纵队及军直属队的体力比赛和射击比赛，由各部挑选选手参加，分别给奖，以资鼓励（比赛办法临时再行拟定颁布）。现在各纵队和军直属队就要开始准备，要知道这是增进红军战斗力的惟一要件。

《加强体力与提高射击技术的训令》（一九三〇年四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150—151页

华中部队整训应着重练兵、带兵、养兵、用兵四大项，而以练兵为中心。可参考张宗逊关于冬季练兵的总结报告。其中经验，打破陈规，采用兵教兵、官教兵、兵教官群众运动的练兵办法，是突破历史的新创造。华中各地，应令在职的团级及团级以上干部，有十天左右时间讨论这种练兵新法，使他们学会练兵，保证获得优异的练兵成绩。练兵内容，着重提高战斗技术，着重把投弹、射击、刺杀、土工作业四大基本技术练好。同时，在干部中还应讨论带兵，去创造新的管理方法；讨论养兵，去保证增加生产，改善待遇，增强体力；讨论用兵，去增强作战指挥方法。这四样是当务之急，能在一年内解决得好，我军战斗力可提高数倍，便利去应付战局变化的需要。开这种练兵会，或在军部开会，或在各地分组开，应就便去做，负责师、旅干部应亲自主持。

《对华中部队整训的意见》（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03页

关于练兵指示：（一）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种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二）准备工作中，

除精简老弱（复员）、充实部队、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整理财政等项外，各地必须抓紧练兵工作。（三）三个月来各地练兵工作抓得不很紧，没有造成热潮，有的练了，有的没有练，此种现象应即刻检讨改正。（四）接此指示后，立即下令全军练兵，上级督促检查，将此看成决定胜负的关键之一。（五）练兵内容，军事上练三大技术，练守城，练夜战，政治上提高战胜顽军、保卫解放区之决心与信心。

《关于练兵的指示》（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14页

在练兵中，除练三大技术，练守城，练夜战等项之外，应着重练习攻城战，其中包括练习黄色炸药之使用。

《大量购办黄色炸药着重练习攻城战》（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40页

我们练兵的口号是：“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战士们有很多打仗的实际经验。当官的要向战士学习，把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他的本领就大了。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20页

（七）人民军队的后勤保障工作

1. 军队的后勤保障是对于革命战争有决定意义的事业

充实红军的给养与供给，组织联络前线与后方的军事运输，组织军事的卫生治疗，同是对于革命战争有决定意义的事业。在我们还没有取得若干中心城市与敌人经济封锁的情况之下，这

一任务的进行是极其艰难的，然而两年以来凭借了苏区与白区广大工农群众的积极性，使我们对这事业亦已建立了相当的基础。我们已经在这一方面保证了红军在过去长期中的给养供给与运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成绩。但是当前粉碎五次“围剿”的决战，及以后更加广大的战争，需要我们用更大努力增加这一方面的力量，保证这一方面更加充分的供给。

《武装民众与建设红军》（一九三四年一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340页

应该用一切办法去保障红军的给养供给与运输。苏维埃的财政机关与经济机关，军事系统中的供给运输与卫生机关，应该为着这个共同目标而努力。运输队的动员，应该克服过去的弱点，使红军不致因缺乏运输员而妨碍了运动与作战。一切牺牲一切努力给予战争，是每个苏维埃人员、每个革命分子的责任。

《武装民众与建设红军》（一九三四年一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343页

财政和粮食问题，不待说对于反对“围剿”是有重大意义的。要顾及“围剿”时间的可能延长。应当计算，主要的是红军，再则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在整个反“围剿”斗争中物资需要的最低限度。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02页

2. 军需物资主要取之于敌，后方也要努力供给

胜利后须注意收缴敌之军旗及无线电机，无线电机不准破

坏，并须收集整部机器及无线电机务员、报务员。缴获敌之经理处款项不准分散，纸票不准焚毁，须一律缴部。

《进攻谭道源部的命令》（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197页

我们建立军事工业，须使之不助长依赖性。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依赖帝国主义和国内敌人的军事工业。伦敦和汉阳的兵工厂，我们是有权利的，并且经过敌人的运输队送来。这是真理，并不是笑话。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37页

中国解放区的军队是中国军队中武器最缺乏的军队，他们只能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和在最恶劣条件下自己制造武器。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48页

我们的军队在遭受极端物质困难的目前状况之下，在分散作战的目前状况之下，切不可将一切物质供给责任都由上面领导机关负起来，这样既束缚了下面广大人员的手足，而又不可能满足下面的要求。应该说：同志们，大家动手，克服困难吧。只要上面善于提出任务，放手让下面自力更生，问题就解决了，而且能够更加完善地解决它。

《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105页

后方必须保证新兵与弹药之充分接济，必须迅速建立兵工厂，自造弹药、地雷及必要枪械。后方一切机构应用全力为前

线服务。总之，一切为着前线胜利。

《于有利时机在运动战中打击敌人》(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198页

立即开始在稳固后方建立兵工厂，自己制造枪弹，作长期战争打算。

《退出四平后的军事部署》(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26页

从你们自己起到全军一切将士，都应迅速建立无后方作战的思想，人员、粮食、弹药、被服，一切从敌军、敌区取给，准备在连续作战之后缩编部队，准备打得剩下三千人、四千人一个旅，而战斗意志愈打愈强（彭副司令所部就是如此），俘虏兵即俘即补，重炮不要带去，不要怕后方被敌切断，勇敢地向淮河以北、平汉以东进军。你们各纵过去依赖后方补给心理太重，你们自己亦反映了此种心理，望你们迅速转变，适应新形势。

《迅速建立无后方作战的思想》(一九四七年九月三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98页

对于若干干部似乎认为一定要有定期大休整，要有两三千人一个团的充实的大部队，要有大批民伏、大军随军使用，要有充分的后方粮弹供给，才能打大胜仗，稍有疲劳减员即叫苦连天的思想，转变为一切取给于敌，不靠后方接济，大大减少民伏、大车，节省粮弹，提倡不怕伤亡，连续战斗，善于利用两个战役或战斗之间的空隙进行短时休整（七天、十天或半月），善于捕捉战机，经常保持旺盛士气，多打胜仗，每战确保胜利，一切从打胜仗中解决问题的思想。这后一种思想，必须在各军巩固地建立起来，特别是关内各军必须如此。即使有后

方接济，亦决不可存依赖之心，必须将重点放在依靠前线，依靠野战军从前线自己解决问题。

《西北战场作战经验》（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308—309页

大军进入国民党区域执行无后方的或半有后方的作战，一切军事需要必须全部地或大部地就地自己解决。

《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48页

一九四九年必须使人民解放军的后方勤务工作的组织性和效率在可能和必需的基础上加强起来，以便有效地支援人民解放军向南方各省的大进军。这些工作，包括军火工业的适当的生产计划，军火以外各项军需工业的调整或建立，军械制度的确立，各种供给标准的统一规定，卫生和通讯器材的统一分配，运输和仓库的前后分工以及后方勤务组织与系统的确定等项。

《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33页

工厂、铁道、枪炮等等，这些是物质条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的物质装备，大部分是从美国帝国主义得来的，一部分是从日本帝国主义得来的，一部分是自己制造的。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83—1484页

二、战 争

(一) 战争是政治的特殊形式的继续，是流血的政治

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不懂得它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战争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导战争，就不能打胜仗。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171页

战争是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阶级和阶级、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互相斗争的最高形式；一切关于战争的规律，都是进行战争的民族、国家、阶级、政治集团为了争取自己的胜利而使用的。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182页

(六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

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则，离不开统一战线政策的良好执行，离不开文化的动员，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和敌国人民援助的努力。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抗日军人中，如有轻视政治的倾向，把战争孤立起来，变为战争绝对主义者，那是错误的，应加纠正。

（六四）但是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例如中国的半独立地位，是日本帝国主义政治发展的障碍，日本要扫除它，所以发动了侵略战争。中国呢？帝国主义压迫，早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障碍，所以有了很多次的解放战争，企图扫除这个障碍。日本现在用战争来压迫，要完全断绝中国革命的进路，所以不得不举行抗日战争，决心要扫除这个障碍。障碍既除，政治的目的达到，战争结束。障碍没有扫除得干净，战争仍须继续进行，以求贯彻。例如抗日的任务未完，有想求妥协的，必不成功；因为即使因某种缘故妥协了，但是战争仍要起来，广大人民必定不服，必要继续战争，贯彻战争的政治目的。因此可以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79—480页

战争是特殊形式的政治，是政治的继续，政治也是一种战争。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74页

美国在世界上有利益要保护，苏联要扩张，这个没法子改变。在阶级存在的时代，战争是两个和平之间的现象。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就是说是和平的继续。和平就是政治。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一段话》(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524页

(二) 战争的性质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 支持正义的战争，反对非正义的战争

现在一般资本家宣传说：“对外的战争是有益的，对内的战争是无益的。”我们却要进一步说：“资本家互争利益的国际战争，是无意义的，打倒资本主义的国际战争，才有意义的；军阀们争权夺利的国内战争，是无价值的，被压迫阶级起来推倒压迫阶级的国内战争，才有价值。”

《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4页

古人说：“春秋无义战。”于今帝国主义则更加无义战，只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有义战。全世界一切由人民起来反对压迫者的战争，都是义战。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义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是义战。中国的反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义和团战争，辛亥革命战争，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至现在的土地革命战争，今天的抗日和讨伐卖国贼的战争，都是义战。在目前的全中国抗日高潮和全世界反法西斯高潮中，义战将遍于全中国，全世界。凡义战都是互相援助的，凡非义战都是应该使之转变成为义战的，这就是列宁主义的路线。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61页

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我们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一切反革命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一切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人类的战争生活时代将要由我们之手而结束,我们所进行的战争,毫无疑问地是属于最后战争的一部分。但是我们所面临的战争,毫无疑问又是最大的和最残酷的战争的一部分。最大的和最残酷的非正义的反革命的战争,迫临在我们的头上,我们如果不打起正义战争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就要遭受摧残。人类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人类的旗帜,中国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中国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和中国人的大多数所举行的战争,毫无疑问地是正义的战争,是拯救人类拯救中国的至高无上的荣誉的事业,是把全世界历史转到新时代的桥梁。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74页

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凡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事物开辟道路。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57页

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对于后一类战争,我们共产党人不但

不反对，而且积极地参加。前一类战争，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双方都是为着帝国主义利益而战，所以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坚决地反对那一次战争。反对的方法，在战争未爆发前，极力阻止其爆发；既爆发后，只要有可能，就用战争反对战争，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日本的战争是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内，都应该反对，也正在反对。我们中国，则从人民到政府，从共产党到国民党，一律举起了义旗，进行了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的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欲达此目的，便须决一死战，便须准备着一切牺牲，坚持到底，不达目的，决不停止。牺牲虽大，时间虽长，但是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世界，已经鲜明地摆在我们的前面。我们从事战争的信念，便建立在这个争取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中国和新世界的上面。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要把战争延长到无尽期，我们则要把战争在一个不很久远的将来给以结束。为了这个目的，人类大多数应该拿出极大的努力。四亿五千万的中国人占了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如果能够一齐努力，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创造了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对于争取全世界永久和平的贡献，无疑地是非常伟大的。这种希望不是空的，全世界社会经济的行程已经接近了这一点，只须加上多数人的努力，几十年工夫一定可以达到目的。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

475—476页

我们今天的抗日战争不同于中国一切历史时期的战争，我们的战争是民族革命战争，是进步的战争。不但战争本身的性

质是进步的，而且这个战争是在中国前所未有的进步基础之上进行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不同于一切历史时期的中国，我们有了比之任何历史时期都不相同的进步的人民、进步的政党与进步的军队。在这个基础之上进行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它本身包含着可能继续发展进步的伟大力量。这一点，就是存在于我们方面而使我们足以支持长期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主要的根据。十五个月的经验证明，在原有进步基础上进行着的伟大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已经推动了全中国的进步，旧的民族腐败传统是在破坏着，新的民族进步力量是在生长着，一个全民族统一团结进步发展的伟大过程是在向前完成着。

《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77—378页

在欧洲方面，德意帝国主义集团和英法帝国主义集团之间，为了争夺对殖民地人民统治权的帝国主义大战，是迫在眉睫了。在战争中，为了欺骗人民，为了动员舆论，战争的双方都将不顾羞耻地宣称自己是正义的，而称对方是非正义的。其实，这只是一种欺骗。因为，双方的目的都是帝国主义的目的，都是为了争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统治权，都是掠夺性的战争。在目前，就是为了争夺波兰，争夺巴尔干半岛和地中海沿岸。这样的战争完全不是正义的。世界上只有非掠夺性的谋解放的战争，才是正义的战争。共产党决不赞助任何掠夺战争。共产党对于一切正义的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则将挺身而出而赞助，并站在斗争的最前线。

《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3—24页

战争的性质是根据于战争的政治目的而定的。一切战争分为两类，照斯大林同志的说法，战争分为：（一）正义的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二）非正义的掠夺的战争。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同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一样，是属于第二类性质的战争。因为这两次战争的目的，都是为了掠夺，丝毫也没有其他的目的，丝毫不利于其本国与他国的人民。这就是战争的掠夺性，非正义性与帝国主义性。现在战争的双方，为了欺骗人民，为了动员舆论，都不顾羞耻地宣称自己是正义的，而称对方是非正义的。其实，这只是一种滑稽，一种欺骗。只有民族解放战争与人民解放战争，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援助这两种战争而战的战争，才是正义的战争。

《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四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468页

现在爆发的战争，无论在英法方面，或德国方面，都是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的战争。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世界各国的人民，都应该起来反对这种战争，都应该揭穿战争双方的帝国主义性质，即仅仅有害于世界人民而丝毫不利于世界人民的这种性质，都应该揭穿社会民主党拥护帝国主义战争背叛无产阶级利益的罪恶的行为。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是共产党当权的国家，它对于战争的态度必然是鲜明的两种态度：（1）坚决地不参加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的战争，对于战争的双方，严守中立。因此，苏联红军决不会无原则地参加帝国主义战线。（2）积极地援助正义的、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例如，十三年以前，援助中国人民的北伐战争；一年以前，援助西班牙人民的反抗德意的战争；两年以来，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几个月以来，援助蒙古人民的抗日战争；以

及还必然地会援助将来其他国家其他民族中间可能发生的人民解放的战争和民族解放的战争，还必然地会援助有利于保卫和平的战争。

《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95—596页

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是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企图解脱新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战争的性质，无论在德国或英法方面，都是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战争。全世界共产党都应该坚决反对这种战争，反对社会民主党拥护这种战争贩卖无产阶级的罪恶行为。

《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15页

（三）战争与和平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争取和平

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74页

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到了那时，什么战争也没有了，反革命战争没有了，革命战争也没有了，非

正义战争没有了，正义战争也没有了，这就是人类的永久和平的时代。我们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出发于我们要求消灭一切战争的志愿，这是区别我们共产党人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界线。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74—175页

战争与和平是互相转化的。战争转化为和平，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转化为战后的和平，中国的内战现在也停止了，出现了国内的和平。和平转化为战争，例如一九二七年的国共合作转化为战争，现在的世界和平局面也可能转化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在阶级社会中战争与和平这样矛盾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具备着同一性。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29—330页

人类一经消灭了资本主义，便到达永久和平的时代，那时候便再也不要战争了。那时将不要军队，也不要兵船，不要军用飞机，也不要毒气。从此以后，人类将亿万斯年看不见战争。已经开始了的革命的战争，是这个为永久和平而战的战争的一部分。占着五万万以上人口的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将占着重要的地位，中华民族的解放将从这个战争中得来。将来的被解放了的新中国，是和将来的被解放了的新世界不能分离的。因此，我们的抗日战争包含着为争取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75页

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

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47页

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31页

我们有两条：第一，我们不要战争；第二，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我们对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就是这样进行教育的。

在芬兰首任驻华大使孙士敦递交国书时的谈话（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八日）

在他们看来，战争就是战争，和平就是和平，两个东西只是互相排斥，毫无联系，战争不能转化到和平，和平不能转化到战争。列宁引用过克劳塞维茨的话：“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和平时期的斗争是政治，战争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和平时期不酝酿战争，为什么突然来一个战争？战争中间不酝酿和平，为什么突然来一个和平？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94—195页

战争转化为和平，和平转化为战争。和平是战争的反面，没有打仗哪会有“和平”二字。三八线一打仗是战争，一停战又是和平。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74页

历史的规律是，只有经过革命战争才能消灭阶级，只有消灭了阶级才能永远消灭战争。不进行革命战争，要消灭阶级，我们不相信。没有消灭阶级，要消灭战争武器，这不可能。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0页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对国庆二十周年口号送审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六九年九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66页

（四）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作为人类流血的政治的所谓战争，两军相战的战争，它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消灭敌人，就是解除敌人的武装，也就是所谓“剥夺敌人的抵抗力”，不是要完全消灭其肉体）。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82页

战争的基本要求是：消灭敌人；其另一要求是：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的最有效的手段。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98页

军事上的第一要义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采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避免一切被动的呆板的战法。

《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79页

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都根据于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这个原则,在革命战争中是直接地和基本的政治原则联系着的。例如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政治原则即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在军事上实行起来,就是以军事力量保卫祖国,驱逐日寇。为达到这个目的,在军队本身的行动上,就表现为:一方面,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尽可能地消灭敌人的力量。何以解释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呢?每一战争都须支付代价,有时是极大的代价,岂非和“保存自己”相矛盾?其实一点也不矛盾,正确点说,是相反相成的。因为这种牺牲,不但是为了消灭敌人的必要,也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必要——部分的暂时的“不保存”(牺牲或支付),是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所必需的。在这个基本的原则上,发生了指导整个军事行动的一系列的所谓原则,从射击原则(荫蔽身体,发扬火力,前者为了保存自己,后者为了消灭敌人)起,到战略原则止,都贯彻这个基本原则的精神。一切技术的、战术的、战役的、战略的原则,都是执行这个基本原则时的条件。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原则,是一切军事原则的根据。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06—407页

怎样解释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呢？岂非与“保存自己”相矛盾？不相矛盾，是相反相成的。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是要付代价的，有时是极大的代价。部分的暂时的牺牲（不保存），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我们说，基本上为着消灭敌人的进攻手段中，同时也含了保存自己的作用，理由就在这里。防御必须同时有进攻，而不应是单纯的防御，也是这个道理。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82—483页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从技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止，都是贯彻这个本质的。战争目的，是战争的基本原则，一切技术的、战术的、战役的、战略的原理原则，一点也离不开它。射击原则的“荫蔽身体，发扬火力”是什么意思呢？前者为了保存自己，后者为了消灭敌人。因为前者，于是利用地形地物，采取跃进运动，疏开队形，种种方法都发生了。因为后者，于是扫清射界，组织火网，种种方法也发生了。战术上的突击队、钳制队、预备队，第一种为了消灭敌人，第二种为了保存自己，第三种准备依情况使用于两个目的——或者增援突击队，或者作为追击队，都是为了消灭敌人；或者增援钳制队，或者作为掩护队，都是为了保存自己。照这样，一切技术、战术、战役、战略原则，一切技术、战术、战役、战略行动，一点也离不开战争的目的，它普及于战争的全体，贯彻于战争的始终。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83页

抗日战争的各级指导者，不能离开中日两国之间各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因素去指导战争，也不能离开这个战争目的去指导战争。两国之间各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因素展开于战争的行动中，就变成互相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斗争。我们的战争，在于力求每战争取不论大小的胜利，在于力求每战解除敌人一部分武装，损伤敌人一部分人马器物。把这些部分地消灭敌人的成绩积累起来，成为大的战略胜利，达到最后驱敌出国，保卫祖国，建设新中国的政治目的。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83页

（五）战争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

所谓“唯武器论”，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是主观地和片面地看问题的意见。我们的意见与此相反，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69页

抗战以前，唯武器论大张旗鼓，认为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亡，中国必会作阿比西尼亚。抗战以后，这种议论表面没有了，但暗中流行着，抗战每至一紧张关头，这种议论必兴风作浪一次，认为中国应该停战议和，不堪再战，再战必亡。我们则相反，我们认为中国武器诚不如人，但武器是可以用人努力增强的，战争胜负主要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物。持久抗战的

结果，依据于全民族的努力，中国必能逐渐克服自己的弱点，增加自己的力量，化被动为主动，化劣势为优势；同时敌人方面的困难必逐渐增加，国际方面对我之援助必逐渐增大。综合这些因素，最后必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75页

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假如原子弹能够解决战争，为什么还要请苏联出兵？为什么投了两颗原子弹日本还不投降，而苏联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呢？我们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弹了不起，这是很错误的。这些同志看问题，还不如一个英国贵族。英国有个勋爵，叫蒙巴顿。他说，认为原子弹能解决战争是最大的错误。我们这些同志比蒙巴顿还落后。这些同志把原子弹看得神乎其神，是受了什么影响呢？是资产阶级的影响。……我们队伍中的唯武器论，单纯军事观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作风，个人主义思想，等等，都是资产阶级的影响。对于我们队伍中的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要像打扫灰尘一样，常常扫除。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33—1134页

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94—1195页

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95页

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只是暂时的现象，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也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则占着优势。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是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46页

优势是在民主力量方面，不是在反动力量方面。反动派的金钱和枪炮并不是什么真正的优势，人心讨厌反动派，不赞成反动派，人们团结起来反对反动派，并和反动派作斗争，这个力量才是真正的优势。在蒋介石匪帮发动内战以前，曾经得到美国帝国主义者四十亿美元的帮助，又得到日本一百万军队留下的装备，蒋介石自己有四百多万军队，所有这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比较起来，应该算得是优势了。然而仅仅一年工夫，人民解放军即已打退了蒋介石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这个具体事实，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单是金钱和枪炮的优势，单是

物质的优势，不能算是真正的优势，而只有人心加物质的总和，只有掌握物质的人们，即是说，人民的革命力量，才是真正的优势吗？

《人民的革命力量才是真正的优势》（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69—70页

如果打第三次世界大战，那末这一方有死伤，另一方也有死伤，因此就平衡了。最后决定战争胜负的还是人，看谁拿着武器，看掌握着武器的战士们认为什么对他们最有利，看谁会打仗，而主要的还是前二者。至于说武器的多少，印度国大党和中国共产党在开始的时候都是没有武器的，现在我们都有了武器。

《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四次谈话》（一九五四年十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67—368页

我们的敌人蒋介石有巨大的外国援助，是美帝国主义援助的。他的武装很强大，有兵工厂，有外国人送的武器，如有军舰，有重炮，有坦克，有飞机。这些我们都没有，也没有重炮，也没有飞机，也没有坦克，我们只有步枪和轻炮。我们那些东西是哪里来的？不是兵工厂造的，而是抢来的，是战争中得来的。美帝国主义经过蒋介石把枪炮送给我们，于是我们就有了枪炮。后来我们又有了坦克、重炮，我们就可以打大仗了。一九四九年，我们就基本上解放了大陆。那时他们的空军在我们头上轰炸，也没有把我们吓倒。后来变成他们怕我们，不是我们怕他们，不仅蒋介石怕我们，而且美国人也有点怕我们，因为我们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团结起来了。还是人要紧，是第一位的，武器是第二位的，是次要的。只要把人团结起来，手

里掌握着武器，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就怕我们。当然不是只有打仗这一种方法，还有别的方法。

《帝国主义是不可怕的》（一九六〇年五月七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70—171页

有人说，武器是第一，人是第二。我们反过来说，人是第一，武器是第二。武器同机器差不多，都是人手的延长而已。是人拿在武器手里，还是武器拿在人手里？当然是后者，因为武器没有手，哪个武器有手？我打了二十五年仗，包括朝鲜战争三年。我原来是不会打仗的，不知道怎样打，是通过二十五年的战争过程学会打的。我从没有看见过武器有手，只看见人有手，而人用手掌握武器。

《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一九六四年七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86页

（六）研究战争规律和军事科学， 提高驾驭战争的能力

1. 要研究战争及其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掌握战争的全局

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

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

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不懂得它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战争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导战争，就不能打胜仗。

革命战争——革命的阶级战争和革命的民族战争，在一般战争的情形和性质之外，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性质。因此，在一般的战争规律之外，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不懂得这些特殊的情形和性质，不懂得它的特殊的规律，就不能指导革命战争，就不能在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中国革命战争——不论是国内战争或民族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内进行的，比较一般的战争，一般的革命战争，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质。因此，在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如果不懂得这些，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所以，我们应该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也应该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最后，我们还应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171页

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从时间的条件说，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从战争的性质看，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从地域的条件看，各

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还不止此。对于一个指挥员来说，起初会指挥小兵团，后来又指挥大兵团，这对于他是进步了，发展了。一个地方和许多地方也不相同。起初会在某一熟悉的地方作战，后来在许多地方也会作战，这对于一个指挥员又是进步了，发展了。因为敌我双方的技术、战术、战略的发展，一个战争中各阶段的情形也不相同。在低级阶段会指挥的，到了高级阶段也会指挥，这对于一个指挥员更是进步和发展了。只能适应于一定兵团、一定地方和战争发展的一定阶段，这叫做没有进步和没有发展。有一种人，抱着一技之长和一孔之见，再也没有进步，这对革命虽则在一地一时有些作用，但是没有大的作用。我们要求有大的作用的战争指导者。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173—174页

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

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

要求战役指挥员和战术指挥员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规律，何以成为必要呢？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

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说战略胜利取决于战术胜利的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意见没有看见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下棋如此,战争也是如此。

然而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有的时候,有些局部破坏了或失败了,全局可以不起重大的影响,就是因为这些局部不是对于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战争中有些战术上或战役上的失败或不成功,常常不至于引起战争全局的变坏,就是因为这些失败不是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但若组成战争全局的多数战役失败了,或有决定意义的某一二个战役失败了,全局就立即起变化。这里说的多数战役和某一二个战役,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战争历史中有在连战皆捷之后吃了一个败仗以至全功尽弃的,有在吃了许多败仗之后打了一个胜仗因而开展了新局面的。这里说的“连战皆捷”和“许多败仗”,都是局部性的,对于全局不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这里说的“一个败仗”和“一个胜仗”,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所有这些,都在说明关照全局的重要性。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主要地是依据情况,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丢了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

说到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不但战略和战役的关系是如此,战役和战术的关系也是如此。师的动作和团营动作的关系,连的动作和排班动作的关系,就是实例。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

说重要,说有决定意义,不能按照一般的或抽象的情况去规定,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去规定。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175—176页

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但是全局是由局部构成的,有局部经验的人,有战役战术经验的人,如肯用心去想一想,就能够明白那些更高级的东西。战略问题,如所谓照顾敌我之间的关系,照顾各个战役之间或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照顾有关全局的(有决定意义的)某些部分,照顾全盘情况中的特点,照顾前后方之间的关系,照顾消耗和补充,作战和休息,集中和分散,攻击和防御,前进和后退,荫蔽和暴露,主攻方面和助攻方面,突击方面和钳制方面,集中指挥和分散指挥,持久战和速决战,阵地战和运动战,本军和友军,这些兵种和那些兵种,上级和下级,干部和兵员,老兵和新兵,高级干部和下级干部,老干部和新干部,红色区域和白色区域,老区和新区,中心区和边缘区,热天和冷天,胜仗和败仗,大兵团和小兵团,正规军和游击队,消灭敌人和争取群众,扩大红军和巩固红军,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过去的任务和现在的任务,现在的任务和将来的任务,那种情况下的任务和这种情况下的任

务，固定战线和非固定战线，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这一历史阶段和那一历史阶段，等等问题的区别和联系，都是眼睛看不见的东西，但若用心去想一想，也就都可以了解，都可以捉住，都可以精通。这就是说，能够把战争或作战的一切重要的问题，都提到较高的原则性上去解决。达到这个目的，就是研究战略问题的任务。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177—178页

战争的领导者，如果他们是一些没有战争经验的人，对于一个具体的战争（例如我们过去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的深刻的指导规律，在开始阶段是不了解的。他们在开始阶段只是身历了许多作战的经验，而且败仗是打得很多的。然而由于这些经验（胜仗，特别是败仗的经验），使他们能够理解贯串整个战争的内部的东西，即那个具体战争的规律性，懂得了战略和战术，因而能够有把握地去指导战争。此时，如果改换一个无经验的人去指导，又会要在吃了一些败仗之后（有了经验之后）才能理会战争的正确规律。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

289页

基于战争的特殊性，就有战争的一套特殊组织，一套特殊方法，一种特殊过程。这组织，就是军队及其附随的一切东西。这方法，就是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这过程，就是敌对的军队互相使用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战略战术从事攻击或防御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因此，战争的经验是特殊的。一切参加战争的人们，必须脱出寻常习惯，而习惯于战争，方能争

取战争的胜利。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80页

如果对于整个抗日战争变化发展的行程没有一个大概的估计，我们就只能跟着战争打圈子，让战争把自己束缚起来，而不能将其放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加之以调节整理，造出为战争所必需的条件，引导战争向我们所要求的方向走去，争取战争的胜利。因此必须懂得抗日战争的规律性，才能实现对于它的战略指导，才能决定为战争服役的一切战略、战术、政策、计划与方案。

《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83页

2. 指挥战争要发挥自觉能动性，使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

我们不能要求事实上的常胜将军，这是从古以来就很少的。我们要求在战争过程中一般地打胜仗的勇敢而明智的将军——智勇双全的将军。要达到智勇双全这一点，有一种方法是要学的，学习的时候要用这种方法，使用的时候也要用这种方法。

什么方法呢？那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

许多国家颁布的军事条令书上，都指示了“按照情况活用原则”的必要，又都指示了打败仗时的处置方法。前者是不要指挥员因死用原则而主观地犯错误；后者是当着指挥员主观地犯了错误，或客观情况起了非所预料的和不可抗的变化时，告诉指挥员怎样去处置。

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人办一切事情都难免这种情形，有比较地会办和比较地不会办之分罢了。事情要求比较地会办，军事上就要求比较地多打胜仗，反面地说，要求比较地少打败仗。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

举战术的例子来说。攻击点选在敌人阵地的某一翼，而那里正是敌人的薄弱部，突击因而成功，这叫做主观和客观相符合，也就是指挥员的侦察、判断和决心，和敌人及其配置的实在情形相符合。如果攻击点选在另一翼，或中央，结果正碰在敌人的钉子上，攻不进去，就叫做不相符合。攻击时机的适当，预备队使用的不迟不早，以及各种战斗处置和战斗动作都利于我不利于敌，便是整个战斗中主观指挥和客观情况统统相符合。统统相符合的事，在战争或战斗中是极其少有的，这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双方是成群的武装着的活人，而又互相保持秘密的缘故，这和处置静物或日常事件是大不相同的。然而只要做到指挥大体上适合情况，即在有决定意义的部分适合情况，那就是胜利的基础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178—179页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

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粗心大意的军事家，不去这样做，把军事计划建立在一相情愿的基础之上，这种计划是空想的，不符合于实际的。鲁莽的专凭热情的军事家之所以不免于受敌人的欺骗，受敌人表面的或片面的情况的引诱，受自己部下不负责任的无知灼见的建议的鼓动，因而不免于碰壁，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任何军事计划，是应该建立于必要的侦察和敌我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周密思索的基础之上的缘故。

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

上面说的是一个战略的行动，或一个战役和战斗的行动。经验多的军人，假使他是虚心学习的，他摸熟了自己的部队（指挥员、战斗员、武器、给养等等及其总体）的脾气，又摸熟了敌人的部队（同样，指挥员、战斗员、武器、给养等等及其总体）的脾气，摸熟了一切和战争有关的其他的条件如政治、经济、地理、气候等等，这样的军人指导战争或作战，就比较地有把握，比较地能打胜仗。这是在长时间内认识了敌我双方的情况，找出了行动的规律，解决了主观和客观的矛盾的结果。这

一认识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一种长时间的经验，要了解和把握整个战争的规律是困难的。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在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得到。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179—181页

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因此，学习和认识的对象，包括敌我两方面，这两方面都应该看成研究的对象，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181—182页

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因此，我们红军的指导者，在既定

的客观物质基础即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之上，就必须发挥我们的威力，提挈全军，去打倒那些民族的和阶级的敌人，改变这个不好的世界。这里就用得着而且必须用我们的主观指导的能力。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我们必须提倡每个红军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不但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达到彼岸。指导战争的规律，就是战争的游泳术。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182—183页

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他们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或者是毫无根据地纯主观地说一顿；或者是只根据问题的一侧面、一时的表现，也同样主观地把它夸大起来，当作全体看。但是人们的错误观点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根本的错误，带一贯性，这是难于纠正的；另一类是偶然的错误，带暂时性，这是易于纠正的。但既同为错误，就都有纠正的必要。因此，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
447页

（六一）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

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

(六二)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在既定的客观物质的基础之上，抗日战争的指挥员就要发挥他们的威力，提挈全军，去打倒那些民族的敌人，改变我们这个被侵略被压迫的社会国家的状态，造成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这里就用得着而且必须用我们的主观指导的能力。我们不赞成任何一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离开客观条件，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但是我们必须提倡每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将军。他们不但要有压倒敌人的勇气，而且要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要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到达彼岸。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就是战争大海中的游泳术。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78页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87页

3. 要学习军事科学，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这是一件事。然而还有一件事，即是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这后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指导战争。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181页

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有一个距离，但不是万里长城，而是可以迅速地消灭的，干革命，干战争，就是消灭这个距离的方法。说学习和使用不容易，是说学得彻底，用得纯熟不容易。说老百姓很快可以变成军人，是说此门并不难入。把二者总合起来，用得着中国一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入门既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只要有心，只要善于学习罢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181页

两军敌对的一切问题依靠战争去解决，中国的存亡系于战争的胜负。因此，研究军事的理论，研究战略和战术，研究军

队政治工作，不可或缓。战术的研究虽然不足，但十年来从事军事工作的同志们已有很多的成绩，已有很多根据中国条件而提出的新东西，缺点在于没有总结起来。战略问题和战争理论问题的研究，至今还只限于极少数人的工作。政治工作的研究有第一等的成绩，其经验之丰富，新创设之多而且好，全世界除了苏联就要算我们了，但缺点在于综合性和系统性的不足。为了全党和全国的需要，军事知识的通俗化，成为迫切的任务。所有这些，今后都应该注意，而战争和战略的理论则是一切的骨干。从军事理论的研究，引起兴趣，唤起全党注意于军事问题的研究，我认为是必要的。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54页

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问题我们也应当研究，以便达到知己又知彼的目的。他们的技术科学，只要是对于我们有用的，我们也应当学习。

《对彭德怀在中共八大发言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193页

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有人讲我的兵法靠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孙子兵法》当时我就没有看过。在遵义会议上，凯丰说：你那些东西，并不见得高明，无非是《三国演义》加《孙子兵法》。我就问他一句：你说《孙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

叫什么？请你讲讲。他答不出来。我说：你也没看过，你怎么晓得我就熟悉《孙子兵法》呢？凯丰他自己也没看过《孙子兵法》，却说我用的是《孙子兵法》。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统统都忘记了的。打仗的时候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作出决策，哪个还去记起那些书呢？你们有些人不是学过四大教程吗？每次打仗都是用四大教程吗？如果那样就完全是教条主义嘛！我不是反对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非有不可，我这篇文章里头也讲了的。

《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63页

三、人民战争

(一) 兵民是胜利之本，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谁要是看轻了这个中心任务，谁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工作人员。我们的同志如果把把这个中心任务真正看清楚了，懂得无论如何要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那末，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36页

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也不！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吗？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一个统治者；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起来的时候，那个皇帝还有没有呢？没有了。铜墙铁壁呢？倒掉了。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

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39页

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必须记住这个战争是在中国打的，这就是说，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围；日军要被迫运来他们所需的军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们要用重兵去保护交通线，时时谨防袭击；另外，还要有一大部力量驻扎满洲和日本内地。

《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一九三六年七月、九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06页

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问将不能取得胜利。

《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47页

这次参战的地域虽然是全国性的，参战的成分却不是全国性的。广大的人民群众依然如过去一样被政府限制着不许起来参战，因此现在的战争还不是群众性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而不带群众性，是决然不能胜利的。有些人说：“现在的战争已经是全面性的战争。”这只能说明了参战地域的普

遍。从参战的成分说来则是片面的，因为抗战还只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不是人民的抗战。几个月来许多土地的丧失，许多军队的失利，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现在的抗战虽然是革命的，但是它的革命性不完全，就是因为还不是群众战。

《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75页

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人民完全同意的，战争的进行没有人民参加又是不能胜利的，因此民主集中制成为必要。中国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战争，也是依靠民主集中制取得了胜利。由此可见，如果战争的目的是直接代表着人民利益的时候，政府越民主，战争就越好进行。这样的政府就不应畏惧人民反对战争，相反，这个政府所顾虑的，应是人民的不起来和对于战争的冷淡。战争的性质决定政府和人民的关系，这是一个历史的原则。

《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84页

(三)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作全面抗战。因为只有这种抗战，才是群众战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

(四)国民党主张的片面抗战，虽然也是民族战争，虽然也带着革命性，但其革命性很不完全。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引导战争趋于失败的，是决然不能保卫祖国的。

(五)这是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现时国民党的抗战主张的原则分歧。如果共产党员忘记了这个原则性，他们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抗日战争，他们就将无力克服国民党的片面性，就把共产

主义者降低到无原则的地位，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他们就是对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和保卫祖国的任务犯了罪过。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87—388页

游击战争不能一刻离开民众，这是最基本的原则。

《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74页

抗日战争是要赶走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77—478页

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以前，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这是中国的大缺陷，已经输了敌人一着。抗日以后，政治动员也非常之不普遍，更不说深入。人民的大多数，是从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炸弹那里听到消息的。这也是一种动员，但这是敌人替我们做的，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偏远地区听不到炮声的人们，至今还是静悄悄地在那里过活。这种情形必须改变，不然，拼死活的战争就得不到胜利。决不可以再输敌人一着，相反，要大大地发挥这一着去制胜敌人。这一着是关系绝大的；武器等等不如人尚在其次，这一着实在是头等重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要胜利又忽视政治动员，叫做“南其辕而北其辙”，

结果必然取消了胜利。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80—481页

兵民是胜利之本。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09页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我们方面，军队须有源源不绝的补充，现在下面胡干的“捉兵法”、“买兵法”，亟须禁止，改为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这样，要几百万人当兵都是容易的。抗日的财源十分困难，动员了民众，则财政也不成问题，岂有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而患财穷之理？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11—512页

这个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13页

支持长期战争与争取最后胜利，必须发动全民族各阶层中一切生动力量，而欲达此目的，非从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等各方面力求进步不可。没有各方面的更大的进步，就不能发动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也就不能更进一步地统一团结全民族。

《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81页

国人必须进一步地认识抗战依靠民众这个基本问题。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

《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81页

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基本点，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两个中国之命运》(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27页

人民是最好的鉴定人，他们知道八路军新四军这时数量虽小，质量却很高，只有它才能进行真正的人民战争，它一旦开到抗日的前线，和那里的广大人民相结合，其前途是无限的。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38页

在中国解放区，在民主政府领导之下，号召一切抗日人民

组织在工人的、农民的、青年的、妇女的、文化的和其他职业和工作的团体之中，热烈地从事援助军队的各项工作。这些工作不但包括动员人民参加军队，替军队运输粮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帮助军队解决物质困难，而且包括动员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展开袭击运动和爆炸运动，侦察敌情，清除奸细，运送伤兵和保护伤兵，直接帮助军队的作战。同时，全解放区人民又热烈地从事政治、经济、文化、卫生各项建设工作。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动员全体人民从事粮食和日用品的生产，并使一切机关、学校，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一律于工作或学习之暇，从事生产自给，以配合人民和军队的生产自给，造成伟大的生产热潮，借以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在中国解放区，敌人的摧残是异常严重的；水、旱、虫灾，也时常发生。但是，解放区民主政府领导全体人民，有组织地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各种困难，灭蝗、治水、救灾的伟大群众运动，收到了史无前例的效果，使抗日战争能够长期地坚持下去。总之，一切为着前线，一切为着打倒日本侵略者和解放中国人民，这就是中国解放区全体军民的总口号、总方针。

这就是真正的人民战争。只有这种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民族敌人。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拼命地反对人民战争。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41页

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抗美援朝的胜利和意义》（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55页

国家不分大小，只要充分动员人民，坚决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争，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打败的。

《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七周年的电报》（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458页

（二）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 还要有地方武装和民兵

红军必须继续在武器上给赤卫队以帮助。在不降低红军战斗力的条件之下，必须尽量帮助人民武装起来。……我们红色地方武装的扩大，更是刻不容缓。

《井冈山的斗争》（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66—67页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创造了富有斗争经验的地方武装，这是十分难得的；这个地方武装的力量，加上红军第四军的力量，是任凭什么敌人也不能消灭的。

《井冈山的斗争》（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79页

一切青年壮年的劳动群众都应组织到赤卫军或少先队中去，并且加以好的军事训练与政治训练，一方面保卫地方，一方面准备上前线，这是苏维埃在国内战争中的重要任务。

《长冈乡调查》（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93—294页

广泛的扩大赤少队与游击队，是苏维埃武装民众进行革命战争的极端重要的事业。赤卫军少先队是前线红军的现成后备

军，是保卫苏区的地方部队，并且是从现在的自愿兵役制转变到将来实行义务兵役制的桥梁。而游击队则是新区的创造者，是主力红军不可缺少的支队。两年来，各个苏区中是发展了这些部队，他们的军事政治训练也相当的加强了。他们之加入红军，他们之保卫地方，他们之袭敌扰敌，在历次粉碎“围剿”的战斗中，显示了他们极其伟大的成绩，致使敌人惊为奇迹，成为敌人侵入苏区的绝大的困难。这在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是特别表现了他们的作用。把这个制度广布到一切新开辟的苏区去，极大地扩大他们的组织，加强他们的训练，使这些部队成为红军在革命战争中最可依靠的兄弟，这是苏维埃的重要责任。

《武装民众与建设红军》（一九三四年一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339—340页

应该把赤卫军少先队的新的编制方法推广到苏区的一切地方去，把一切劳动的青年成年男女，全部武装起来。……加强、扩大现有的游击队，最广泛地繁殖新的游击队，收集过去游击战争的丰富经验，极大地加强游击战术的教育与指导，把千百支游击队伸出白区去，伸出到敌人的侧方与后方去，在那些地方袭击敌人，发展群众斗争，创造游击区域，以至发展到创造新苏区，特别在尚未连成一片的各个苏区之间去做这些工作，与主力红军的行动互相配合起来，是苏维埃十分迫切的任务。

《武装民众与建设红军》（一九三四年一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343页

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像一个独臂将军。根据地的人民条件，具体地说来，特别是对于作

战说来，就是有武装起来了的人民。敌人视为畏途，主要地也在这一点。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227页

健强由当地干部率领与地方人民有血肉联系的地方武装是坚持平原的基本条件，特别是这种三角地带其作用更为重大。若无此种地方武装，单靠把主力分散去进行游击是困难的。

《河北平原反“蚕食”斗争的政策》（一九四一年六月九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49页

整训现有的自卫军与民兵，增强他们的战斗力。自卫军与民兵数目还不够，各地除某些个别地方不可能再扩大者外，均应尽量地扩大。九千万人民中，除老幼及患病者以外，一切男女公民，均应组织在自卫军中，在不脱离生产原则下，轮流担任保卫家乡与协助军队的任务。从自卫军中挑选精干分子组织民兵或基干自卫军，在“战斗与生产结合”的原则下，协同军队作战，或者独立自主地作战。

《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
第3卷第237页

中国解放区处在被敌人分割和战斗频繁的情况之下，因为普遍实施了适合人民需要的民兵和自卫军制度，又防止了对于人力资源的滥用和浪费，人力动员却可以源源不竭。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1048页

应当扩大解放区的军队、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并加紧

整训，增强战斗力，为最后打败侵略者准备充分的力量。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1090页

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每到一地，就应立即帮助本地人民，不但要组织以本地人民的干部为领导的民兵和自卫军，而且要组织以本地人民的干部为领导的地方部队和地方兵团。然后，就可以产生有本地人领导的主力部队和主力兵团。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如果不能完成此项任务，就不能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也不能发展人民的军队。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1091—1092页

我军人力资源是民兵，保卫乡村也是民兵，必须迅速扩大民兵组织。

《关于日本投降后党的任务》（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55页

国民党积极准备进攻，你们必须积极准备作战。为此，除加紧练兵，加紧剿匪，加紧解决土地问题外，应注意扩大民兵，加以整训，以便将来作战时动员一部民兵，补充前线之消耗。

《积极准备作战并加强顽军内线工作》（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33页

三个月经验证明：凡民兵、游击队、武装工作队等地方武装组织得好的地方，虽然被敌人暂时占领许多的点线，我们仍能控制广大的乡村。凡地方武装薄弱和领导不好的地方，就给敌人以很大的便利。今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在暂时被敌占领

地区，发展地方武装，坚持游击战争，保护群众利益，打击反动派活动。

《三个月总结》（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08页

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

《对国防问题的意见》（一九三七年八月四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页

更好地将敌后战场上的一切主力军、游击队与民兵的配合作战组织起来，加强对于主力军、游击队与民兵的技术训练、战术训练与政治工作训练，加紧打击敌人，粉碎敌人的“扫荡”。发展武装工作队，加强反“蚕食”斗争，使一切军事干部与政治工作干部学会善于总结战争经验，把反“扫荡”、反“蚕食”的艺术提到更高级的程度上来。

《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一九四三年七月二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5页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有人民自卫军和民兵这样广大的群众武装组织，和它一道配合作战。在中国解放区内，一切青年、壮年的男人和女人，都在自愿的民主的和不脱离生产的原则下，组织在抗日人民自卫军之中。自卫军中的精干分子，除加入军队和游击队者外，则组织在民兵的队伍中。没有这些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它将自己划分为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两部分，前者可以随时执行超地方的作战任务，后

者的任务则固定在协同民兵、自卫军保卫地方和进攻当地敌人方面。这种划分，取得了人民的真心拥护。如果没有这种正确的划分，例如说，如果只注意主力兵团的作用，忽视地方兵团的作用，那末，在中国解放区的条件下，要战胜敌人也是不可能的。在地方兵团方面，组织了许多经过良好训练，在军事、政治、民运各项工作上说来都是比较地更健全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打击敌人，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借以配合各个解放区正面战线的作战，收到了很大的成效。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40—1041页

我军主力集中歼敌的时候，必须同地方兵团、地方游击队和民兵的积极活动，互相配合。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99页

（三）实行全民皆兵，大办民兵师

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

《要大办民兵师》（一九五八年九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81页

民兵师的组织很好，应当推广。这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又是教育组织，又是体育组织。

《巡视大江南北后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九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430页

为了准备条件，在帝国主义如果发动对我国的侵略战争的时候彻底打败侵略者起见，我国应当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

《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一九五八年——一九七二年）〉初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508页

我国的广大劳动人民对于民兵制度是喜闻乐见的，其所以如此，因为他们在长期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斗争中，认识到只有把自己武装起来，才能战胜武装的反革命，才能成为中国这块天地的主人；而在革命胜利之后，他们又看到，国外还有天天声言要灭掉这个人民国家的帝国主义强盗们存在；因此，全体人民决心继续把自己武装起来，并且声言：一心想要抢劫我们的强盗们，你们小心一点儿吧，不要妄想来碰我们这些从事和平劳动的人们，我们是准备好了的。帝国主义如果竟敢发动对我国的侵略战争，那时我们就将实现全民皆兵，民兵就将配合人民解放军，并且随时补充人民解放军，彻底打败侵略者。

《帝国主义如果发动对我国的侵略战争我们将实现全民皆兵》（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90页

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民兵武器要修理好。天上掉下来的、地下冒出来的，怎样对付，要有些办法。

《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一九六二年六月十九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93页

(四) 以革命根据地为依托，开展人民战争

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其意义决不限于边界数县，这种割据在湘鄂赣三省工农暴动夺取三省政权的过程中是有很大的意义的。使边界土地革命和民众政权的影响远及于湘赣两省的下游乃至湖北；使红军从斗争中日益增加其数量和提高其质量，能在将来三省总的暴动中执行它的必要的使命；使各县地方武装即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的数量增加质量提高起来，此时能够与挨户团和小量军队作战，将来能够保全边界政权；使地方工作人材逐渐减少依靠红军中工作人材的帮助，能完全自立，以边界的人材任边界的工作，进一步能够供给红军的工作人材和扩大割据区域的工作人材——这些都是边界党在湘鄂赣三省暴动发展中极其重要的任务。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52页

为边界计，红军若走，则像八月那样的蹂躏，立可重来。赤卫队虽不至完全消灭，党和群众的基础将受到极大的摧残，除山头割据可以保存一些外，平地均将转入秘密状态，如八九月间一样。红军不走，以现在的基础可以逐渐向四周发展，前途的希望是很大的。为红军计，欲求扩大，只有在有群众基础的井冈山四周即宁冈、永新、酃县、遂川四县，利用湘赣两敌利害不一致，四面防守，无法集中的情况，和敌人作长期的斗争。利用正确的战术，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必有俘获，如此可以逐渐扩大红军。以四月至七月那时边界群众的准备，红军大队

若无湘南之行，则八月间红军的扩大是没有疑义的。虽然犯了一次错误，红军已卷土重来此地人和之边界，前途希望还是不恶。红军必须在边界这等地方，下斗争的决心，有耐战的勇气，才能增加武器，练出好兵。边界的红旗子，业已打了一年，虽然一方面引起了湘鄂赣三省乃至全国豪绅阶级的痛恨，另一方面却渐渐引起了附近省分工农士兵群众的希望。以士兵论，因军阀们把向边界“剿匪”当做一件大事，“剿匪经年，耗费百万”（鲁涤平），“人称二万，枪号五千”（王均），如此等类的话，逐渐引起敌军士兵和无出路的下级官长对我们注意，自拔来归的将日益增多，红军扩充，又是一条来路。并且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的。

《井冈山的斗争》（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80—81页

对于目前工作的布置，决定在国民党混战初期，以闽西赣南二十余县一大区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群众的公开割据，深入土地革命，建设工农政权，由此一割据与湘赣边之割据连接起来，形成一坚固势力，以为前进的根基。

《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58页

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第三个问题，是建立根据地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随着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而来的。因为失地的恢复须待举行全国的战略反攻之时，在这以前，敌人的前线将深入和纵断我国的中部，小半甚至大半

的国土被控制于敌手，成了敌人的后方。我们要在这样广大的被敌占领地区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争，将敌人的后方也变成他们的前线，使敌人在其整个占领地上不能停止战争。我们的战略反攻一日未能举行，失地一日未能恢复，敌后游击战争就应坚持一日，这种时间虽不能确切断定，然而无疑地是相当地长，这就是战争的长期性。同时敌人为了确保占领地的利益，必将日益加紧地对付游击战争，特别在其战略进攻停止之后，必将残酷地镇压游击队。这样，长期性加上残酷性，处于敌后的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是不能支持的。

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无后方作战，本来是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因为它是同国家的总后方脱离的。然而，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18页

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大体不外三种：山地、平地和河湖港汊地。

山地建立根据地之有利是人人明白的，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或准备建立的长白山、五台山、太行山、泰山、燕山、茅山等根据地都是。这些根据地将是抗日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我们必须到一切处于敌后的山岳地带去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起根据地来。

平地较之山地当然差些，然而决不是不能发展游击战争，也

不是不能建立任何的根据地。河北平原、山东的北部和西北部平原，已经发展了广大的游击战争，是平地能够发展游击战争的证据。至于能否在平原地区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这一点现在还没有证明；但是建立临时的根据地和小部队的或季候性的根据地，则前者现在已经证明，后者也应该说是可能的。因为一方面，敌人兵力不够分配，又执行着前无古人的野蛮政策，另一方面，中国有广大的土地，又有众多的抗日人民，这些都提供了平原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临时根据地的客观条件；如再加上指挥适当一条，则小部队的非固定的长期根据地之建立，当然应该说是可能的。大抵当敌人结束了他的战略进攻，转到了保守占领地的阶段时，对于一切游击战争根据地的残酷进攻的到来，是没有疑义的，平原的游击根据地自将首当其冲。那时，在平原地带活动的大的游击兵团将不能在原地长期支持作战，而须按照情况，逐渐地转移到山地里去，例如从河北平原向五台山和太行山转移，从山东平原向泰山和胶东半岛转移。但是保持许多小的游击部队，分处于广大平原的各县，采取流动作战，即根据地搬家，一时在此一时在彼的方法，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至于利用夏季的青纱帐和冬季的河川结冰之季候性的游击战争，那是断然可能的。在现时敌人无力顾及和将来顾及也难周到的条件下，确定在现时广泛地发展平原的游击战争，并建立临时根据地的方针，在将来准备坚持小部队的游击战争，至少坚持季候性的游击战争，并建立非固定的根据地的方针，是完全必要的。

依据河湖港汊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客观上说来是较之平原地带为大，仅次于山岳地带一等。历史上所谓“海盗”和“水寇”，曾演过无数的武剧，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

根据地的证据。不过,各个抗日党派和抗日人民,至今尚少注意这一方面。虽然主观条件还不具备,然而无疑地是应该注意和应该进行的。江北的洪泽湖地带、江南的太湖地带和沿江沿海一切敌人占领区域的港汊地带,都应该好好地组织游击战争,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作为发展全国游击战争的一个方面。缺少了这一方面,无异供给敌人以水上交通的便利,是抗日战争战略计划的一个缺陷,应该及时地补足之。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19—421页

在处于敌人后方作战的游击战争面前,游击区和根据地是有区别的。在四围已被敌占但中间未被敌占或虽占而已经恢复的地区,例如五台山地区(即晋察冀边区)的某些县,太行山地区和泰山地区也有这种情形,这些都是现成的根据地,游击队据之以发展游击战争是很方便的。但在这些根据地的其他地方则不然,例如五台山地区的东部北部——即冀西察南的某些部分和保定以东沧州以西的许多地方,在那里,游击战争在开始时期还不能完全占领该地,只能经常去游击,游击队到时属于游击队,游击队走了又属于伪政权,这样的地区就还不是游击战争的根据地,而是所谓游击区。这种游击区,经过游击战争的必要过程,消灭或打败了许多敌人,摧毁了伪政权,发动了民众的积极性,组织了民众的抗日团体,发展了民众武装,建立了抗日政权,游击区就转化成了根据地。将这些根据地,增加到原有的根据地里面去,就叫做发展了根据地。

有些地方的游击战争,全部活动地区开始都是游击区,例如冀东的游击战争。那里已有长期的伪政权,当地起义的民众武装和从五台山派去的游击支队,整个活动地区开始都是游击

区。它们在开始活动时，只能在此区中选择好的地点作为临时的后方，或叫做临时根据地。要待消灭敌人和发动民众的工作开展了之后，才能把游击区状态消灭，变为比较稳固的根据地。

由此可知，从游击区到根据地，是一个艰难缔造的过程，依消灭敌人和发动民众的程度如何而定其是否已从游击区过渡到了根据地的阶段。

有许多地区，将是长期地处于游击区状态的。在那里，敌人极力控制，但不能建立稳固的伪政权，游击战争也极力发展，但无法达到建立抗日政权的目的是，例如敌人占领的铁路线、大城市的附近地区和某些平原地区。

至于敌人有强大力量控制着的大城市、火车站和某些平原地带，游击战争只能接近其附近，而不能侵入其里面，那里有比较稳固的伪政权，这又是一种情形。

由于我之领导错误或敌之强大压力的结果，可以使上述的情形发生相反的变化，即根据地化为游击区，游击区化为敌之比较稳固的占领地。这种情形是可能发生的，值得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特别警戒。

所以，在整个敌占地区，经过游击战争和敌我双方斗争的结果，可以变为三种情况的地方：第一种是被我方游击部队和我方政权掌握着的抗日根据地；第二种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政权掌握着的被占领地；第三种是双方争夺的中间地带，即所谓游击区。游击战争领导者的责任，在于极力扩大第一、第三两种地区，而极力缩小第二种地区。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21—423页

（另参见第二编“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第613—634页）

四、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

（一）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规定战争的指导路线和战略战术

苏联的规律和条令，包含着苏联内战和苏联红军的特殊性，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抄了来用，不允许任何的变更，也同样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这些人的理由是：苏联的战争是革命的战争，我们的战争也是革命的战争，而且苏联是胜利了，为什么还有取舍的余地？他们不知道：我们固然应该特别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因为它是最近代的革命战争的经验，是在列宁、斯大林指导之下获得的；但是我们还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又有许多特殊的情况。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172页

不承认、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中国革命战争有其特点的人，把红军对国民党军队的作战，看做和一般战争相同，或和苏联内战相同。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内战的经验是有世界的意义的。所有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同样，都是以这个经验和列宁斯大林对这个经验的理论综合作为指南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在我们的条件下机械地运用这个经验。中国革命战争的许多方面都有其自己的不同于苏联内战的特点。不估计到这种特点，或否认这种特点，当然是错误的。这点在我们的

十年战争中已经完全证明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186—187页

当着敌人改变其军事原则使之适合于同红军作战的情况的时候,我们队伍中却出现了回到“老套”的人们。他们主张回到一般情况的方面去,拒绝了解任何的特殊情况,拒绝红军血战史的经验,轻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力量,轻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对敌人采用的反动的原则视若无睹。结果,是丧失了除了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三十万人降到了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降到了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总之,是受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他们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实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学到。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我们的这些同志恰是忘记了这一点。

由此可知,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胜利的途径。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187页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呢?

我以为有四个主要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

这个特点,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有发展和胜利的可能性。当着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春天,中国游击战争发生不久,

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区域——井冈山的同志们中有些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个疑问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指出来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題，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把这个问题又作了一次答复。中国革命运动，从此就有了正确的理论基础。

现在把这个问题分开来看一看：

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反动军队中有隶属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和隶属各省军阀的所谓杂牌军这样两部分军队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的不统一，影响到中国统治集团间的不统一。数国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和一国支配的殖民地是有区别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

中国是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准备好了红军的种子，准备好了红军的领导者即共产党，又准备好了参加过一次革命的民众。

所以我们说，中国是一个经过了一次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第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不但基本地规定了我们政治上的战略和战术，而

且也基本地规定了我们军事上的战略和战术。

第二个特点是敌人的强大。

红军的敌人国民党，它的情况是怎样呢？它是夺取了政权而且相对地稳定了它的政权的党。它得到了全世界主要反革命国家的援助。它已改造了它的军队——改造得和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都不相同，而和世界现代国家的军队却大体相同，武器和其他军事物资的供给比起红军来雄厚得多，而且其军队数量之多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常备军。它的军队和红军比较起来真有天壤之别。它控制了全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或命脉，它的政权是全国性的政权。

中国红军是处在这样强大的敌人的面前。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第二个特点。这个特点，使红军的作战不能不和一般战争以及苏联内战、北伐战争都有许多的不同。

第三个特点是红军的弱小。

中国红军是产生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从游击队开始。不但处在中国的反动时期，而且处在世界上反动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比较稳定的时期。

我们的政权是分散而又孤立的山地或僻地的政权，没有任何的外间援助。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同国民党区域比较是落后的。革命根据地只有乡村和小城市。其区域开始是非常之小，后来也并不很大。而且根据地是流动不定的；红军没有真正巩固的根据地。

红军的数量是少的，红军的武器是差的，红军的粮食被服等物质供给是非常困难的。

这个特点和前一个特点是尖锐的对比。红军的战略战术，是在这种尖锐的对比上发生的。

第四个特点是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

这个特点是第一个特点的必然结果。这个特点产生了两方面的情形。在一方面，中国革命战争虽然是处在中国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反动时期，然而能够胜利的，因为它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农民的援助。根据地虽小却有很大的政治上的威力，屹然和庞大的国民党政权相对立，军事上给国民党的进攻以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有农民的援助。红军虽小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人员是从土地革命中产生，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战斗的，而且指挥员和战斗员之间在政治上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则和国民党成了尖锐的对比。国民党是反对土地革命的，因此没有农民的援助。其军队虽多，却不能使兵士群众和许多小生产者出身的下级干部自觉地为国民党拼命，官兵之间在政治上是分歧的，这就减少了它的战斗力。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188—191页

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四个主要的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还可能失败。

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两方面。这两方面同时存在着，即是说，既有有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我

们的十年战争史证明了这个规律的正确性。谁要是睁眼看不见这些根本性质的规律，谁就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谁就不能使红军打胜仗。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91页

（二）力争战争的主动权，加强战争的 计划性和灵活性

一切战争的敌我双方，都力争在战场、战地、战区以至整个战争中的主动权，这种主动权即是军队的自由权。军队失掉了主动权，被逼处于被动地位，这个军队就不自由，就有被消灭或被打败的危险。本来战略的防御战和内线作战，争取主动较为困难些，而进攻的外线作战，争取主动较为容易些。……中国方面，开始时战争颇处于被动，现在因有了经验，正在改取新的运动战的方针，即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速决战和外线作战的方针，加上普遍发展游击战的方针，所以主动地位正在日益建立起来。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10—411页

游击战争的主动权问题，是更加严重的问题。因为游击队大多处于严重的环境，这就是无后方作战的状态，敌强我弱的状态，缺乏经验的状态（这是说那些新成立的游击队）和不统一的状态等等。但是游击战争是能够建立其主动权的，主要的条件就是抓住上述敌人的三个弱点。欺他兵力不足（从整个战争看来），游击队就可以放手争取广大的活动地区；欺他是异民

族，且执行极端的野蛮政策，游击队就可以放手争取千百万人民的拥护；欺他指挥笨拙，游击队就可以放手发挥自己的聪明。一切敌人的这些弱点，正规军也应捉住，作为自己战胜敌人的资本，但游击队尤其应当注意捉住。游击队自己的弱点，可以在斗争中逐渐减少。且其弱点有时正成为争取主动地位的条件，例如正是因为自己弱小，才利于在敌人后方神出鬼没地活动，敌人无奈他何，这样大的自由是庞大的正规军所不能得到的。

游击队的主动权，在敌人举行数路围攻的场合，是难于掌握和容易丧失的。在这种场合，如果估计和处置得不正确，就容易处于被动，因而打不破敌人的围攻。在敌取守势我取攻势时，也有这种情形。所以主动权是从正确的情况估计（敌我双方的情况）和正确的军事政治处置产生的。不合客观情况的悲观的估计和随之而来的消极的处置，无疑地将丧失主动权，把自己抛入被动地位。但是同样，不合客观情况的过于乐观的估计和随之而来的冒险（不需要的那种冒险）的处置，也将丧失主动权，而最后归入悲观者一路。主动权不是任何天才家所固有的，只是聪明的领导者从虚心研究和正确地估计客观情况，正确地处置军事政治行动所产生的东西。因此，是要有意识地去争取的东西，不是现成的东西。

已经因为估计和处置错误，或者因为不可抗的压力，被迫处于被动地位了的时候，这时的任务就是努力脱出这种被动。如何脱出法，须依情况而定。在许多情况下，“走”是必须的。游击队的会走，正是其特点。走是脱离被动恢复主动的主要的方法。但是不限于这一方法。往往在敌人十分起劲自己十分困难的时候，正是敌人开始不利，自己开始有利的时候。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11—412页

游击战争战略原则的第一个问题——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这是游击战争战略原则的最中心的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游击战争的胜利就有了军事指导上的重要的保证。

这里虽说了许多的东西,但一切都环绕于战役和战斗的进攻。主动地位只有在进攻胜利之后,才能最后地取得。一切进攻战也都要主动地组织之,不要被迫地采取进攻。灵活地使用兵力,环绕于为着进攻战这个中心;计划性的必要,主要地也是为了进攻的胜利。战术上的防御手段,离开直接或间接协助进攻,则毫无意义。速决是说的进攻的时间,外线是说的进攻的范围。进攻是消灭敌人的惟一手段,也是保存自己的主要手段,单纯的防御和退却,对于保存自己只有暂时的部分的作用,对于消灭敌人则完全无用。

这个原则,正规战争和游击战争是基本上同一的,只在表现形式上有程度的不同。但在游击战争中注意这个不同是重要的和必要的。正是因为这个不同的表现形式,所以使游击战争的作战方法区别于正规战争的作战方法;混淆了这个不同的表现形式,游击战争是不能胜利的。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15—416页

这里说的主动性,说的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是用以区别于被迫处于不自由状态的。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一个士兵被缴械,是这

个士兵失了行动自由被迫处于被动地位的结果。一个军队的战败，也是一样。为此缘故，战争的双方，都力争主动，力避被动。我们提出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以及为了实现这种进攻战的灵活性、计划性，可以说都是为了争取主动权，以便逼敌处于被动地位，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之目的。但主动或被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分不开的。因而也是和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分不开的。此外，也还有利用敌人的错觉和不意来争取自己主动和逼敌处于被动的情形。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87—488页

主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不能分离的，而被动则和战争力量的劣势分不开。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是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战略的主动地位，自然以战略的进攻战为较能掌握和发挥，然而贯彻始终和普及各地的主动地位，即绝对的主动权，只有以绝对优势对绝对劣势才有可能。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88页

被动总是不利的，必须力求脱离它。军事上的办法，就是坚决地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和发动敌后的游击战争，在战役的运动战和游击战中取得许多局部的压倒敌人的优势和主动地位。通过这样许多战役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就能逐渐地造成战略的优势和战略的主动地位，战略的劣势和被动地位就能脱出了。这就是主动和被动之间、优势和劣势之间的相互关系。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89—490页

我之相对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地位，是能够脱出的，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们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剥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他抛入劣势和被动。把这些局部的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了我们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敌人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这样的转变，依靠主观上的正确指导。为什么呢？我要优势和主动，敌人也要这个，从这点上看，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错误由于对彼己的无知，战争的特性也使人们在许多的场合无法全知彼己，因此产生了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的不确实性，产生了错误和失败。然而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先之以各种侦察手段，继之以指挥员的聪明的推论和判断，减少错误，实现一般的正确指导，是做得到的。我们有了这个“一般地正确的指导”做武器，就能多打胜仗，就能变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这是主动或被动和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之间的关系。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

490页

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观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中外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多得很的。中国如晋楚城濮之战，楚汉成

皋之战，韩信破赵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外国如拿破仑的多数战役，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内战，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在原占优势和主动之敌则反是；由于其主观错误和内部矛盾，可以将其很好的或较好的优势和主动地位，完全丧失，化为败军之将，亡国之君。由此可知，战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待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在斗争中，由于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也可以化优势为劣势，化主动为被动。一切统治王朝打不赢革命军，可见单是某种优势还没有确定主动地位，更没有确定最后胜利。主动和胜利，是可以根据真实的情况，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取得一定的条件，而由劣势和被动者从优势和主动者手里夺取过来的。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

491页

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因而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错觉是什么呢？“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是错觉之一例。“声东击西”，是造成敌人错觉之一法。在优越的民众条件具备，足以封锁消息时，采用各种欺骗敌人的方法，常能有效地陷敌于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因而丧失其优势和主动。“兵不厌诈”，就是指的这件事情。什么是不意？就是

无准备。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懂得这一点，劣势而有准备之军，常可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势，把优势者打败。我们说运动之敌好打，就是因为敌在不意即无准备中。这两件事——造成敌人的错觉和出以不意的攻击，即是以战争的不确实性给予敌人，而给自己以尽可能大的确实性，用以争取我之优势和主动，争取我之胜利。要做到这些，先决条件是优越的民众组织。因此，发动所有一切反对敌人的老百姓，一律武装起来，对敌进行广泛的袭击，同时即用以封锁消息，掩护我军，使敌无从知道我军将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去攻击他，造成他的错觉和不意的客观基础，是非常之重要的。过去土地革命战争时代的中国红军，以弱小的军力而常打胜仗，得力于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了的民众是非常之大的。民族战争照规矩应比土地革命战争更能获得广大民众的援助；可是因为历史的错误，民众是散的，不但仓卒难为我用，且时为敌人所利用。只有坚决地广泛地发动全体的民众，方能在战争的一切需要上给以无穷无尽的供给。在这个给敌以错觉和给敌以不意以便战而胜之的战争方法上，也就一定能起大的作用。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我们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要把他们的指挥员的心尽可能地弄得混乱些，使他们变成疯子，用以争取自己的胜利。所有这些，也都是主动或被动和主观指导之间的相互关系。战胜日本是少不了这种主观指导的。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91—492页

游击战争要取得胜利，是不能离开它的计划性的。乱干一

场的想法，只是玩弄游击战争，或者是游击战争的外行。不论是整个游击区的行动或是单个游击部队或游击兵团的行动，事先都应有尽可能的严密的计划，这就是一切行动的预先准备工作。情况的了解，任务的确定，兵力的部署，军事和政治教育的实施，给养的筹划，装备的整理，民众条件的配合等等，都要包括在领导者们的过细考虑、切实执行和检查执行程度的工作之中。没有这个条件，什么主动、灵活、进攻等事，都是不能实现的。固然正规战争的计划性更大些，游击战争的条件不容许很大的计划性，如果企图在游击战争中实行高度的严密的计划工作，那是错误的；但依照客观条件允许的程度，采取尽可能的严密的计划，则是必要的，须知同敌人斗争是一件不能开玩笑的事情。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14—415页

（八八）现在来说计划性。由于战争所特有的不确实性，实现计划性于战争，较之实现计划性于别的事业，是要困难得多的。然而，“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战争没有绝对确实性，但不是没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确实性。我之一方是比较地确实的。敌之一方很不确实，但也有朕兆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这就构成了所谓某种程度的相对确实性，战争的计划性就有了客观基础。近代技术（有线电、无线电、飞机、汽车、铁道、轮船等）的发达，又使战争的计划性增大了可能。但由于战争只有程度颇低和时间颇暂的确实性，战争的计划性就很难完全和固定，它随战争的运动（或流动，或推移）而运动，且依战争范围的大小而有程度的不同。战术计划，例如小兵团和

小部队的攻击或防御计划，常须一日数变。战役计划，即大兵团的行动计划，大体能终战役之局，但在该战役内，部分的改变是常有的，全部的改变也间或有之。战略计划，是基于战争双方总的情况而来的，有更大的固定的程度，但也只在一定的战略阶段内适用，战争向着新的阶段推移，战略计划便须改变。战术、战役和战略计划之各依其范围和情况而确定而改变，是战争指挥的重要关节，也即是战争灵活性的具体的实施，也即是实际的运用之妙。抗日战争的各级指挥员，对此应当加以注意。

（八九）有些人，基于战争的流动性，就从根本上否认战争计划或战争方针之相对的固定性，说这样的计划或方针是“机械的”东西。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如上条所述，我们完全承认：由于战争情况之只有相对的确实性和战争是迅速地向前流动的（或运动的，推移的），战争的计划或方针，也只应给以相对的固定性，必须根据情况的变化和战争的流动而适时地加以更换或修改，不这样做，我们就变成机械主义者。然而决不能否认一定时间内的相对地固定的战争计划或方针；否认了这点，就否认了一切，连战争本身，连说话的人，都否认了。由于战争的情况和行动都有其相对的固定性，因而应之而生的战争计划或方针，也就必须拿相对的固定性赋予它。例如，由于华北战争的情况和八路军分散作战的行动有其在一定阶段内的固定性，因而在这一阶段内赋予相对的固定性于八路军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种战略的作战方针，是完全必要的。战役方针，较之上述战略方针适用的时间要短促些，战术方针更加短促，然而都有其一定时间的固定性。否认了这点，战争就无从着手，成为毫无定见，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或者这也是、那也是的战争相对主义了。没有人否

认，就是在某一一定时间内适用的方针，它也是在流动的，没有这种流动，就不会有这一方针的废止和另一方针的采用。然而这种流动是有限制的，即流动于执行这一方针的各种不同的战争行动的范围中，而不是这一方针的根本性质的流动，即是说，是数的流动，不是质的流动。这种根本性质，在一定时间内是决不流动的，我们所谓一定时间内的相对的固定性，就是指的这一点。在绝对流动的整个战争长河中有其各个特定阶段上的相对的固定性——这就是我们对于战争计划或战争方针的根本性质的意见。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95—496页

抗日战争应该是有计划的。战争计划即战略战术的具体运用，要带灵活性，使之能适应战争的情况。要处处照顾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以便改变敌我之间的形势。而一切这些，都表现于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同时也就表现于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之中。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97页

灵活性就是具体地表现主动性的东西。灵活地使用兵力，是游击战争比较正规战争更加需要的。

必须使游击战争的指导者明白，灵活地使用兵力，是转变敌我形势争取主动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根据游击战争的特性，兵力的使用必须按照任务和敌情、地形、居民等条件作灵活的变动，主要的方法是分散使用、集中使用和转移兵力。游击战

争的领导者对于使用游击队，好像渔人打网一样，要散得开，又要收得拢。当渔人把网散开时，要看清水的深浅、流的速度和那里有无障碍，游击队分散使用时，也须注意不要因情况不明、行动错误而受损失。渔人为了收得拢，就要握住网的绳头，使用部队也要保持通讯联络，并保持相当主力在自己手中。打鱼要时常变换地点，游击队也要时常变换位置。分散、集中和变换，是游击战争灵活使用兵力的三个方法。

一般地说来，游击队当分散使用，即所谓“化整为零”时，大体上是依下述几种情况实施的：（一）因敌取守势，暂时无集中打仗可能，采取对敌实行宽大正面的威胁时；（二）在敌兵力薄弱地区，进行普遍的骚扰和破坏时；（三）无法打破敌之围攻，为着减小目标以求脱离敌人时；（四）地形或给养受限制时；（五）在广大地区内进行民众运动时。但不论何种情况，当分散行动时都须注意：（一）保持较大一部分兵力于适当的机动地区，不要绝对地平均分散，一则便于应付可能的事变，一则使分散执行的任务有一个重心；（二）给各分散部队以明确的任务、行动的地区、行动的时期、集合的地点、联络的方法等。

集中使用兵力，即所谓“化零为整”的办法，多半是在敌人进攻之时为了消灭敌人而采取的；也有在敌人取守势时，为了消灭某些驻止之敌而采取的。集中兵力并不是说绝对的集中，集中主力使用于某一重要方面，对其他方面则留置或派出部分兵力，为钳制、扰乱、破坏等用，或作民众运动。

按照情况灵活地分散兵力或集中兵力，是游击战争的主要的方法，但是还须懂得灵活地转移（变换）兵力。当敌人感到游击队对他有了大的危害时，就会派兵镇压或举行进攻。因此，游击队要考虑情况，如果可以打时，就在当地打仗；如果不能打时，就应不失时机，迅速地转移到另一方向去。有时为着各

个击破敌人，有刚才在这里消灭了敌人，又立即转移到另一方向去消灭敌人的；也有在这里不利于战斗，要立即脱离此敌转移到另一方向去进行战斗的。如果敌情特别严重，游击部队不应久留一地，要像流水和疾风一样，迅速地移动其位置。兵力转移，一般都要秘密迅速。经常要采取巧妙的方法，去欺骗、引诱和迷惑敌人，例如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即打即离、夜间行动等。

分散、集中和转移的灵活性，都是游击战争具体地表现主动性的东西；死板、呆滞，必至陷入被动地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但领导者的聪明不在懂得灵活使用兵力的重要，而在按照具体情况善于及时地实行分散、集中和转移兵力。这种善观风色和善择时机的聪明是不容易的，惟有虚心研究，勤于考察和思索的人们可以获得。为使灵活不变为妄动，慎重地考虑情况是必要的。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12—414页

（八五）现在来说灵活性。灵活性是什么呢？就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灵活地使用兵力这件事，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战争的事业，除了组织和教育军队，组织和教育人民等项之外，就是使用军队于战斗，而一切都是为了战斗的胜利。组织军队等等固然困难，但使用军队则更加困难，特别是在以弱敌强的情况之中。做这件事需要极大的主观能力，需要克服战争特性中的纷乱、黑暗和不确实性，而从其中找出条理、光明和确实性来，方能实现指挥上的灵活性。

（八六）抗日战争战场作战的基本方针，是外线的速决的进

攻战。执行这个方针，有兵力的分散和集中、分进和合击、攻击和防御、突击和钳制、包围和迂回、前进和后退种种的战术或方法。懂得这些战术是容易的，灵活地使用和变换这些战术，就不容易了。这里有时机、地点、部队三个关节。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不得于部队之情况，都将不能取胜。例如进攻某一运动中之敌，打早了，暴露了自己，给了敌人以预防条件；打迟了，敌已集中驻止，变为啃硬骨头。这就是时机问题。突击点选在左翼，恰当敌之弱点，容易取胜；选在右翼，碰在敌人的钉子上，不能奏效。这就是地点问题。以我之某一部队执行某种任务，容易取胜；以另一部队执行同样任务，难于收效。这就是部队情况问题。不但使用战术，还须变换战术。攻击变为防御，防御变为攻击，前进变为后退，后退变为前进，钳制队变为突击队，突击队变为钳制队，以及包围迂回等等之互相变换，依据敌我部队、敌我地形的情况，及时地恰当地给以变换，是灵活性的指挥之重要任务。战斗指挥如此，战役和战略指挥也是如此。

（八七）古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妙”，我们叫做灵活性，这是聪明的指挥员的出产品。灵活不是妄动，妄动是应该拒绝的。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基于这种运用之妙，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能较多地取得胜利，就能转变敌我优劣形势，就能实现我对于敌的主动权，就能压倒敌人而击破之，而最后胜利就属于我们了。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

军队的使用需要进步的灵活的战略战术，没有这一点，也是不能胜利的。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11页

各纵队的分散作战或集中作战，依敌情的集中或分散而灵活地决定，即敌人分散敌力薄弱时我应集中作战，敌人集中进攻情况严重时我应分散作战。

《南方游击区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450页

（三）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参见第七编“关于政策和策略”，第1728—1736页）

（四）持久战的战略方针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过去已经花去了很长的时间，而要最后地彻底地解决内外反革命势力，我们还得准备再花一个应有的时间，像过去那样地过分的性急是不行的。还得提出一个很好的革命策略，像过去那样地老在狭小的圈子里打转，是干不出大事情来的。不是说中国的事情只能慢吞吞地去干，中国的事情要勇猛地去干，亡国的危险不容许我们有一分钟的懈怠。今后革命发展的速度，也一定比过去要快得多，因为中国的和世界的局面都是临在战争和革命的新时期了。虽然如此，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我们说，时局的特点，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这是现时革命形

势的特点。这是事实，这是一方面的事实。现在我们又说，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又一个特点。这也是事实，这是又一方面的事实。这两种特点，这两种事实，都一齐跑来教训我们，要求我们适应情况，改变策略，改变我们调动队伍进行战斗的方式。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3页

因为反动势力的雄厚，革命势力是逐渐地生长的，这就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在这上面性急是要吃亏的，在这上面提倡“速决”是不正确的。干了十年的革命战争，对于别的国家也许是值得惊奇的，对于我们却好似八股文章还只作了破题、承题和起讲，许多热闹文章都还在后面。往后的发展，在一切内外条件的影响下，无疑地将比过去有大大地增高速度的可能。因为国际和国内的环境已经起了变化，而且会有更大的变化要到来，可以说我们已经脱离了过去的那种慢慢发展的孤军作战的景况。然而不应该打算明天就会成功。“灭此朝食”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因为中国的反动势力，是许多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革命势力没有聚积到足以突破内外敌人的主要阵地以前，国际革命势力没有打破和钳制大部分国际反动势力以前，我们的革命战争依然是持久的。从这一点出发，规定我们长期作战的战略方针，是战略指导的重要方针之一。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33—234页

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分别地说来，战争的双方有如下互相反对的许多特点。

（一〇）日本方面：第一，它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这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基本条件，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不能速胜，就建立在这个日本国家的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上面。然而第二，由于日本社会经济的帝国主义性，就产生了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它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时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内外矛盾，不但使得它不得不举行空前大规模的冒险战争，而且使得它临到最后崩溃的前夜。从社会行程说来，日本已不是兴旺的国家，战争不能达到日本统治阶级所期求的兴旺，而将达到它所期求的反面——日本帝国主义的死亡。这就是所谓日本战争的退步性。跟着这个退步性，加上日本又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这一特点，就产生了它的战争的特殊的野蛮性。这样就要最大地激起它国内的阶级对立、日本民族和中国民族的对立、日本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对立。日本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是日本战争必然失败的主要根据。还不止此，第三，日本战争虽是在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但同时又是在其先天不足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但同样，将达到其所期求的反面，这就是说，它为了解决这个困难问题而发动战争，结果将因战争而

增加困难，战争将连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最后，第四，日本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却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这后一种力量将逐渐地增长，终究不但将把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并将施其压力于日本自身。这是失道寡助的规律，是从日本战争的本性产生出来的。总起来说，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这些就是日本方面的特点。

（一）中国方面：第一，我们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直至北伐战争，一切为解除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革命的或改良的运动，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因此依然保留下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我们依然是一个弱国，我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战争之不可避免和中国之不能速胜，又在这个方面有其基础。然而第二，中国近百年的解放运动积累到了今日，已经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各种内外反对力量虽给了解放运动以严重挫折，同时却锻炼了中国人民。今日中国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虽不如日本之强，但在中国自己比较起来，却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就是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中国今天的解放战争，就是在这种进步的基础上得到了持久战和最后胜利的可能性。中国是如日方升的国家，这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没落状态恰是相反的对照。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从这种进步性，就产生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因为这个战争是正义的，就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第三，中国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这同日本又是一个相反的对比。最

后，第四，由于中国战争的进步性、正义性而产生出来的国际广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总起来说，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这些都是中国的特点。

（一二）这样看来，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这些，就是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这些特点是事实上存在的，不是虚造骗人的；是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段；是贯彻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无的。观察中日战争如果忘记了这些特点，那就必然要弄错；即使某些意见一时有人相信，似乎不错，但战争的经过必将证明它们是错的。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47—450页

（一五）我们的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中日两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战争。在我们的敌人方面，首先，它是快要死亡的帝国主义，它已处于退步时代，不但和英灭印度时期英国还处于资本主义的进步时代不相同，就是和二十年前第

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日本也不相同。此次战争发动于世界帝国主义首先是法西斯国家大崩溃的前夜，敌人也正是为了这一点才举行这个带最后挣扎性的冒险战争。所以，战争的结果，灭亡的不会是中国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集团，这是无可逃避的必然性。再则，当日本举行战争的时候，正是世界各国或者已经遭遇战争或者快要遭遇战争的时候，大家都正在或准备着为反抗野蛮侵略而战，中国这个国家又是同世界多数国家和多数人民利害相关的，这就是日本已经引起并还要加深地引起世界多数国家和多数人民的反对的根源。

(一六) 中国方面呢？它已经不能和别的任何历史时期相比较。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是它的特点，所以被称为弱国。但是在同时，它又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这就是足以战胜日本的主要根据。所谓抗日战争是进步的，不是说普通一般的进步，不是说阿比西尼亚抗意战争的那种进步，也不是说太平天国或辛亥革命的那种进步，而是说今天中国的进步。今天中国的进步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它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有了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十七年的经验。这些经验，教育了中国的人民，教育了中国的政党，今天恰好作了团结抗日的基础。如果说，在俄国，没有一九〇五年的经验就不会有一九一七年的胜利；那末，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没有十七年以来的经验，也将不会有抗日的胜利。这是国内的条件。

国际的条件，使得中国在战争中不是孤立的，这一点也是历史上空前的东西。历史上不论中国的战争也罢，印度的战争也罢，都是孤立的。惟独今天遇到世界上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

的空前广大和空前深刻的人民运动及其对于中国的援助。俄国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也遇到世界的援助，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因此胜利了，但那个援助的规模还没有今天广大，性质也没有今天深刻。今天的世界的人民运动，正在以空前的大规模和空前的深刻性发展着。苏联的存在，更是今天国际政治上十分重要的因素，它必然以极大的热忱援助中国，这一现象，是二十年前完全没有的。所有这些，造成了和造成着为中国最后胜利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大量的直接的援助，目前虽然还没有，尚有待于来日，但是中国有进步和大国的条件，能够延长战争的时间，促进并等候国际的援助。

（一七）加上日本是小国，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这一个条件，于是在强弱对比之外，就还有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这就是中国决不会亡的根据。强弱对比虽然规定了日本能够在中国有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然而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又规定了日本不能横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败，中国决不会亡，必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51—453页

我们也不是不喜欢速胜，谁也赞成明天一个早上就把“鬼子”赶出去。但是我们指出，没有一定的条件，速胜只存在于头脑之中，客观上是不存在的，只是幻想和假道理。因此，我们客观地并全面地估计到一切敌我情况，指出只有战略的持久战才是争取最后胜利的惟一途径，而排斥毫无根据的速胜论。我

们主张为着争取最后胜利所必要的一切条件而努力，条件多具备一分，早具备一日，胜利的把握就多一分，胜利的时间就早一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缩短战争的过程，而排斥贪便宜尚空谈的速胜论。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59页

战争的长期性是确定了的，但是战争究将经过多少年月则谁也不能预断，这个完全要看敌我力量变化的程度才能决定。一切想要缩短战争时间的人们，惟有努力于增加自己力量减少敌人力量之一法。具体地说，惟有努力于作战多打胜仗，消耗敌人的军队，努力于发展游击战争，使敌之占领地限制于最小的范围，努力于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团结全国力量，努力于建设新军和发展新的军事工业，努力于推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努力于工、农、商、学各界人民的动员，努力于瓦解敌军和争取敌军的士兵，努力于国际宣传争取国际的援助，努力于争取日本的人民及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援助，做了这一切，才能缩短战争的时间，此外不能有任何取巧图便的法门。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70—471页

（七二）现在来研究抗日战争中的具体的战略方针。我们已说过了，抗日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是的，这是完全对的。但这是一般的方针，还不是具体的方针。怎样具体地进行持久战呢？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我们的答复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即敌之进攻和保守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

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

（七三）由于日本是帝国主义的强国，我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日本是采取战略进攻方针的，我们则居于战略防御地位。日本企图采取战略的速决战，我们应自觉地采取战略的持久战。日本用其战斗力颇强的几十个师团的陆军（目前已到了三十个师团）和一部分海军，从陆海两面包围和封锁中国，又用空军轰炸中国。目前日本的陆军已占领从包头到杭州的长阵线，海军则到了福建广东，形成了大范围的外线作战。我们则处于内线作战地位。所有这些，都是由敌强我弱这个特点造成的。这是一方面的情形。

（七四）然而在另一方面，则适得其反。日本虽强，但兵力不足。中国虽弱，但地大、人多、兵多。这里就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结果。第一，敌以少兵临大国，就只能占领一部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由是，在其占领区域，则空出了广大地面无法占领，这就给了中国游击战争以广大活动的地盘。在全国，即使敌能占领广州、武汉、兰州之线及其附近的地区，但以外的地区是难于占领的，这就给了中国以进行持久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总后方和中枢根据地。第二，敌以少兵临多兵，便处于多兵的包围中。敌分路向我进攻，敌处战略外线，我处战略内线，敌是战略进攻，我是战略防御，看起来我是很不利的。然而我可以利用地广和兵多两个长处，不作死守的阵地战，采用灵活的运动战，以几个师对他一个师，几万人对他一万人，几路对他一路，从战场的外线，突然包围其一路而攻击之。于是敌之战略作战上的外线和进攻，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就不得不变成内线和防御。我之战略作战上的内线和防御，在战役和战

斗的作战上就变成了外线和进攻。对其一路如此，对其他路也是如此。以上两点，都是从敌小我大这一特点发生的。又由于敌兵虽少，乃是强兵（武器和人员的教养程度），我兵虽多，乃是弱兵（也仅是武器和人员的教养程度，不是士气），因此，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我不但应以多兵打少兵，从外线打内线，还须采取速决战的方针。为了实行速决，一般应不打驻止中之敌，而打运动中之敌。我预将大兵荫蔽集结于敌必经通路之侧，乘敌运动之际，突然前进，包围而攻击之，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迅速解决战斗。打得好，可能全部或大部或一部消灭他；打不好，也给他一个大的杀伤。一战如此，他战皆然。不说多了，每个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这样，我之战略的持久战，到战场作战就变成速决战了。敌之战略的速决战，经过许多战役和战斗的败仗，就不得不改为持久战。

（七五）上述这样的战役和战斗的作战方针，一句话说完，就是：“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这对于我之战略方针“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说来，是相反的；然而，又恰是实现这样的战略方针之必要的方针。如果战役和战斗方针也同样是“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例如抗战初起时期之所为，那就完全不适合敌小我大、敌强我弱这两种情况，那就决然达不到战略目的，达不到总的持久战，而将为敌人所击败。所以，我们历来主张全国组成若干个大的野战兵团，其兵力针对着敌人每个野战兵团之兵力而二倍之、三倍之或四倍之，采用上述方针，与敌周旋于广大战场之上。这种方针，不但是正规战争用得着，游击战争也得着，而且必须要用它。不但适用于战争的某一阶段，而且适用于战争的全过程。战略反攻阶段，我之技术条件增强，

以弱敌强这种情况即使完全没有了，我仍用多兵从外线采取速决的进攻战，就更能收大批俘获的成效。例如我用两个或三个或四个机械化的师对敌一个机械化的师，更能确定地消灭这个师。几个大汉打一个大汉之容易打胜，这是常识中包含的真理。

（七六）如果我们坚决地采取了战场作战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不但在战场上改变着敌我之间的强弱优劣形势，而且将逐渐地变化着总的形势。在战场上，因为我是进攻，敌是防御；我是多兵处外线，敌是少兵处内线；我是速决，敌虽企图持久待援，但不能由他作主；于是在敌人方面，强者就变成了弱者，优势就变成了劣势；我军方面反之，弱者变成了强者，劣势变成了优势。在打了许多这样的胜仗之后，总的敌我形势便将引起变化。这就是说，集合了许多战场作战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胜利以后，就逐渐地增强了自己，削弱了敌人，于是总的强弱优势形势，就不能不受其影响而发生变化。到那时，配合着我们自己的其他条件，再配合着敌人内部的变动和国际上的有利形势，就能使敌我总的形势走到平衡，再由平衡走到我优敌劣。那时，就是我们实行反攻驱敌出国的时机了。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84—487页

（五）十大军事原则

1. 十大军事原则及其形成和发展

为着彻底粉碎陈诚向鲁南之进攻，请你们注意下列各点：（一）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你们将王建安、许世友、宋时轮三部南调是很对的。（二）休整部队，利用敌大举进攻前夜全军休整，

多一天好一天，休整即是胜利。（三）诱敌深入，敌不动我不打，敌不进到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之地点我亦不打，完全立于主动地位。（四）先打弱者，后打强者，可能进攻之敌二十二个旅中，战力较强者约八个旅，较弱者约十四个旅。如我能首先歼灭较弱之十四个旅，此次进攻即算打破，然后再歼较强之八个旅，便很从容。（五）每次歼敌不要超过四个旅，最好是三个旅，一则保证速胜，二则手中留有未使用的大量兵力，可以接着打第二仗。这即是说，将你们手中的全部兵力分为两个集团，轮番作战与休息，准备在一个半月至两个月内连续不断打七八个大仗，彻底粉碎敌之进攻。

《关于彻底粉碎陈诚向鲁南进攻的建议》（一九四七年二月三日），

《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26—227页

我军作战方针，仍如过去所确立者，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先取中等城市及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及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夺取地方是歼敌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须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夺取地方；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一部打正面，以主力打迂回；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与大部兵员（十分之九的士兵及少数下级官佐）补充自己，配合土地改革与发展生产，支持长期战争；今后作战，运动战的可能已减少，主要是攻击敌军阵地，必须用大力加强炮兵与工兵。

《一年作战总结及今后计划》（一九四七年七月十日），《毛泽东文

集》第4卷第262页

我军作战方针，仍如过去所确立者，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包括一次打几个旅的大规模歼灭性战役在内，例如今年二月莱

荒战役，七月鲁西南战役），后打集中强大之敌。先取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和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地方是歼敌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须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之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以求达到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之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一方面，必须注意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上有胜利之把握；另一方面，必须发扬勇敢战斗、不惜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短期内接连打几仗）的优良作风。必须力求调动敌人打运动战，但同时必须极大地注重学习阵地攻击战术，加强炮兵、工兵建设，以便广泛地夺取敌人据点和城市。一切守备薄弱之据点和城市则坚决攻取之，一切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又环境许可之据点和城市则相机攻取之，一切守备强固之据点和城市则暂时弃置之。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兵员（十分之八九的士兵和少数下级官佐）补充自己。主要向敌军和国民党区域求补充，只有一部分向老解放区求补充，特别是南线各军应当如此。在一切新老解放区必须坚决实行土地改革（这是支持长期战争取得全国胜利的最基本条件），发展生产，厉行节约，加强军事工业的建设，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只有这样做，才能支持长期战争，取得全国胜利。果然这样做了，就一定可以支持长期战争，取得全国胜利。

《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32—1233页

作战原则：对敌守备薄弱之据点及城市则坚决攻取之，对敌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又环境许可之据点及城市则相机攻取之，对敌守备强固之据点及城市则避开之，着重点放在调动敌人打运动战及占领广大乡村，消灭反动武装，发动群众，必须准备经过一个困难时期，逐步建立根据地。

《陈谢部的作战范围和原则》（一九四七年九月二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96页

我们的军事原则是：（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战，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

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坚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9) 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10) 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以上这些，就是人民解放军打败蒋介石的主要的方法。这些方法，是人民解放军在和国内外敌人长期作战的锻炼中产生出来，并完全适合我们目前的情况的。蒋介石匪帮和美国帝国主义的在华军事人员，熟知我们的这些军事方法。蒋介石曾多次集训他的将校，将我们的军事书籍和从战争中获得的文件发给他们研究，企图寻找对付的方法。美国军事人员曾向蒋介石建议这样那样的消灭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并替蒋介石训练军队，接济军事装备。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能挽救蒋介石匪帮的失败。这是因为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47—1248页

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在解放战争进入反攻时期提出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运用十大原则，取得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十大原则目前还可以用，今后有许多地方还可以用。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停止的，是向前发展的，十大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

《十大军事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75页

2. 战争要以消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和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

集中主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剩下了钳制力量,自然不免使土地受到损失。然而这是暂时的局部的损失,其代价是突击方向取得了胜利。突击方向胜利了,钳制方向的损失就可以恢复了。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都使我们遭受了土地的损失,特别是在敌人第三次“围剿”时江西红军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了,然而结果我们的土地不但都恢复了,而且还扩大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226页

放弃土地是为了保存军力,也正是为了保存土地;因为如不在不利条件下放弃部分的土地,盲目地举行绝无把握的决战,结果丧失军力之后,必随之以丧失全部的土地,更说不到什么恢复失地了。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
508页

到了战况确实证明不利于我而放弃则反为有利之时,应以放弃地方保存军力为原则,因此必须避免大的不利决战。战略决战,在一二两阶段中都是不应有的,都足以妨碍抗战的坚持与反攻的准备,因此必须避免。避免战略决战而力争有利条件下的战役与战斗的决战,应是持久战的方针之一。于必要时机

与一定条件下放弃某些无可再守的城市，不但是被迫的不得已的，而且是诱敌深入，分散、消耗与疲惫敌人的积极的政策。在坚持抗战而非妥协投降的大前提下，必要时机放弃某些据点，是持久战方针内所许可的，并无为之震惊的必要。

《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92页

以集中力量歼灭敌人为主，不以固守城市为主，并须统筹全局，作长期打算。

《东北作战须统筹全局作长期打算》（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06页

在我军主力未获充分补充休息恢复疲劳以前，及敌未进至有利于我之地形条件以前，宁可丧失一些地方，不可举行勉强的无把握的作战。

《宁可丧失一些地方不可勉强作战》（一九四六年七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67页

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有些时机，为着集中兵力歼击敌军的目的，或使我军主力避免遭受敌军的严重打击以利休整再战的目的，可以允许放弃某些地方。只要我军能够将敌军有生力量大量地歼灭了，就有可能恢复失地，并夺取新的地方。因此，凡能歼灭敌军有生力量者，均应奖励之。不但歼灭敌军的正规部队应当受到奖励；就是歼灭敌军的保安队、还乡队等反动的地方武装，也应当受到奖励。但是，凡在敌我力量对比上能够保守或夺取的地方和在战役上战术上有意义的地方，则必须保守或夺取之，否则就是犯错误。因此，凡能保守

或夺取这些地方者，也应受到奖励。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99—1200页

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主动地寻找好打之敌作战。如届时敌数路密集不利于我，可以临时决定不打。若预先即决定不打，则将丧失可打之机，对于军心士气亦很不利。每次歼敌一个团二个团，并不需要很多兵力，以几个团钳制诸路之敌，集中十个至十五个团即有可能歼敌一个旅（两个团）。

《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八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487页

3. 集中兵力打歼灭战

●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当此反动政权暂时稳定时期，敌人能集中大量军力来打红军，红军分散是不利的。我们的经验，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中央指示我们发展的游击区域，纵横数千里，失之太广，这大概是对我们力量估计过大的缘故。

《井冈山的斗争》（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67页

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城镇。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这样才能耸动远

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的效力。例如我们前年干的湘赣边界政权，去年干的闽西政权，都是这种兵力集中政策的结果。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03页

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

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惨苦的环境，军事指导者首先需要的是独立自主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地位，下文就是失败。

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这里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22—223页

集中兵力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改变敌我的形势。第一，是为了改变进退的形势。过去是敌进我退，现在是企图达到我进敌退之目的。集中兵力一战而胜，这个目的在本战斗就达到了，也给予影响于全战役。

第二，是为了改变攻守的形势。退却到退却终点，在防御战中基本上属于消极阶段，即“守”的阶段。反攻则属于积极阶段，即“攻”的阶段。虽然在整个战略防御中并没有脱离防御性质，然而反攻和退却相较，不但形式上，而且内容上，是

起了变化的东西。反攻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之间的过渡的东西，带着战略进攻前夜的性质，集中兵力就为达此目的。

第三，是为了改变内外线的形势。处于战略上内线作战的军队，特别是处于被“围剿”环境的红军，蒙受着许多的不利。但我们可以而且完全应该在战役或战斗上，把它改变过来。将敌军对我军的一个大“围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各别的小围剿。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分进合击，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分进合击。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将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使之在战役或战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变为战役上或战斗上的强者的地位。这即是所谓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从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着。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223—224页

军事平均主义者到一九三三年，有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的说法，把红军主力分割为二，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那时的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且没有当时可能取得的最大胜利。照我的意见，在有强大敌军存在的条件下，无论自己有多少军队，在一个时间内，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两个。我不反对作战方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但主要的方向，在同一个时间内，只应有一个。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无论哪一个大胜仗，都

可以证明这一点。“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是战略的说法，是对整个战争整个敌我对比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是如此。不是对战役和战术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决不应如此。无论在反攻或进攻，我们总是集结大力打敌一部。……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军事平均主义，到一九三四年第五次反“围剿”时，发展到了极点。“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以为可以制敌，结果为敌所制，原因在于惧怕丧失土地。集中主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剩下了钳制力量，自然不免使土地受到损失。然而这是暂时的局部的损失，其代价是突击方向取得了胜利。突击方向胜利了，钳制方向的损失就可以恢复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225—226页

“堡垒主义的五次‘围剿’时期我们不能集中作战，只能分兵防御从事短促突击”，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敌人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的堡垒主义作战法，完全是红军自己的节节抗御促成的。如果我军在内线放弃节节抗御的战法，再在必要和可能时转向敌人的内线打去，局面必然是另外一种。集中兵力的法则，正是战胜堡垒主义的工具。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226—227页

置红军的支队于次要的作战方向也是必要的，不是一切都要集中。我们主张的集中兵力，是建立在保证对于战场作战的绝对或相对优势的原则上。对于强敌，或关系紧要的战场作战，

应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临之，例如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三十日第一次反“围剿”的第一仗，集中四万人打张辉瓒的九千人。对于弱敌或不关紧要的战场作战，临之以相对优势的兵力也就够了，例如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第二次反“围剿”的最后一战，向建宁打七千人的刘和鼎师，红军只用了一万多人。

也不是说每次都要优势兵力。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用相对劣势或绝对劣势兵力出现于战场。相对劣势，例如某一区域仅仅有一支不大的红军（不是有兵而不集中），为着打破某一优势敌人的进攻，在人民、地形或天候等条件能给我们以大的援助时，以游击队或小支队钳制其正面及一翼，红军集中全力突然袭击其另一翼的一部分，当然也是必要的，并且是可以胜利的。当我袭击其一翼的一部分时，兵力的对比仍适用以优势对劣势、以多胜少的原则。绝对劣势，例如游击队袭击白军大队伍，仅仅是袭击其一小部分，同样适用上述的原则。

集中大军于一个战场作战，受限制于地形、道路、给养、驻处等的说法，也应分别情形去看。这些限制，对于红军和白军是有程度上的区别的，因为红军较之白军能够忍受更大的困难。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227—228页

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敌人一般地都摸熟我们的脾气了。然而敌人不能取消我们的胜利，也不能避免他们的损失，因为何时何地我们这样做，他们不晓得。这一点我们是保守秘密的。红军的作战一般是奇袭。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228页

集中使用兵力,即所谓“化零为整”的办法,多半是在敌人进攻之时为了消灭敌人而采取的;也有在敌人取守势时,为了消灭某些驻止之敌而采取的。集中兵力并不是说绝对的集中,集中主力使用于某一重要方面,对其他方面则留置或派出部分兵力,为钳制、扰乱、破坏等用,或作民众运动。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
2版第2卷第413页

我们历来主张全国组成若干个大的野战兵团,其兵力针对着敌人每个野战兵团之兵力而二倍之、三倍之或四倍之,采用上述方针,与敌周旋于广大战场之上。这种方针,不但是正规战争用得着,游击战争也得着,而且必须要用它。不但适用于战争的某一阶段,而且适用于战争的全过程。战略反攻阶段,我之技术条件增强,以弱敌强这种情况即使完全没有了,我仍用多兵从外线采取速决的进攻战,就更能收大批俘获的成效。例如我用两个或三个或四个机械化的师对敌一个机械化的师,更能确定地消灭这个师。几个大汉打一个大汉之容易打胜,这是常识中包含的真理。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
486页

坚决打击反动者,争取较好者。在打击时,先打一部,再打他部。在作战时,集中全力包围歼灭之。

《坚决打击反动者,争取较好者》(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毛泽
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755页

同意你们集中主力打李品仙何柱国，只以若干可能的力量协助八路夺取陇海与徐州。在打李、何时，不可浪打，不可打得过早，致打成对峙，或仅击溃之。必须有充分兵力，在战役上占绝对优势，并有充分动员准备，待敌进至有利于我之地点，以包围歼灭其一路，再打其余。

《在战役上须占绝对优势不可浪打》(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6页

作战决定于打法，不浪打，非确能聚歼不打，养精蓄锐，以多胜少，例如以五六个团打一个团，可能聚歼。以打胜仗为目的，不以占地为目的，津浦能全占则全占之，不能则占一部，又不能则让顽伪全部代替了日寇位置，亦胜于过去局面，只要日寇投降，大局于我有利。

《华中部队当前任务和作战方法》(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32页

必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例如六个旅或更多)，必须作充分的精神准备与军事准备，必须选择有利于我之地形，这就是说，不要浪打，打则必胜。

《对东北作战问题的补充指示》(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161页

力戒轻敌，每战必须集结全力，打敌一点，以期必胜。

《在四平本溪坚持奋战争取有利于我之和平》(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195页

各部在进行攻击时，应集中主力打敌一点，以期必胜，切忌处处攻击，分散兵力。

《坚守本溪挫敌锐气》(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3卷第200页

蒋军经过整编,其战斗力一般加强,我军对其作战时,必须取集中优势分割歼灭方针,其比例为三对一或四对一,否则不易解决战斗,欲速不达。

《集中优势兵力分割歼灭敌人》(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368页

凡无把握之仗不要打,打则必胜;凡与顽正规军作战,每战必须以优势兵力加于敌人,其比例最好是四比一(四千人打一千人,四万人打一万人),至少是三比一,歼其一部,再打另一部,再打第三部,各个击破之。望以此教育干部,克服战役上及战斗上平均用力、普遍求胜之轻敌观念(此观念在许多干部中是存在的)。

《战役战斗上不要平均使用兵力》(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71页

我粟谭军从午元至未感一个半月内,作战六次,歼敌六个半旅及交通总队五千,造成辉煌战果。而我军主力只有十五个团,但这十五个团是很充实与很有战斗力的,没有采取平均主义的补充方法。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例如未宥集中十个团打敌两个团,未感集中十五个团打敌三个团),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优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

《华中野战军的作战经验》(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75页

歼敌方法，是集中大力打敌一部，例如：苏北午感鱼沟战役集中十二个团（实际使用七个团）歼敌九十二旅两个团，苏中未宥如皋西南战役集中十个团歼敌九十九旅两个团就是好例。这种打法，通全局看来，用力省而成功多，每战必胜，既能全歼，又能速决，必须教育干部普遍采用。野战军补充应有重点，胶济、苏北、苏中三战区各应补充野战军十至十五个主力团，每团二千五百至三千人（国民党有三千余人的大团），给以最好的武器与充足的弹药以为突击力量，勿采平均主义。望本上述战略方针，规划一切。

《山东华中的歼敌方针》（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77—178页

经验告诉我们：第一，必须集中优于敌人五倍或四倍至少三倍的兵力，首先歼灭敌一个至两个团，振起我军士气，引起敌人恐慌，得手后再歼敌第二部、第三部，各个击破之。切不可贪多务得，分散兵力。此点已屡次电告，不知你们已照此实行否？第二，必须准备打五天至七天，歼灭甯平地泉附近之敌，因要一部分一部分地歼敌，又估计敌人是顽强的，故须准备较多时间对付该敌。假如敌人企图西撤，又当别论。

《关于刘邓军作战经验的通报》（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83页

（一）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

（二）在战役的部署方面，当着敌人使用许多个旅（或团）分几路向我军前进的时候，我军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于敌的兵力、至少也要有三倍于敌

的兵力，于适当时机，首先包围歼击敌军的一个旅（或团）。这个旅（或团），应当是敌军诸旅中较弱的，或者是较少援助的，或者是其驻地的地形和民情对我最为有利而对敌不利的。我军以少数兵力牵制敌军的其余各旅（或团），使其不能向被我军围击的旅（或团）迅速增援，以利我军首先歼灭这个旅（或团）。得手后，依情况，或者再歼敌军一个旅至几个旅（例如我粟谭军在如皋附近，八月二十一、二十二日歼敌交通警察部队五千，八月二十六日又歼敌一个旅，八月二十七日又歼敌一个半旅。又如我刘邓军在定陶附近，九月三日至九月六日歼敌一个旅，九月六日下午又歼敌一个旅，九月七日至九月八日又歼敌两个旅）；或者收兵休整，准备再战。在战役部署上，必须反对那种轻视敌人、因而平分兵力对付诸路之敌、以致一路也不能歼灭、使自己陷于被动地位的错误的作战方法。

（三）在战术的部署方面，当着我军已经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包围敌军诸路中的一路（一个旅或一个团）的时候，我军担任攻击的各兵团（或各部队），不应企图一下子同时全部地歼灭这个被我包围之敌，因而平分兵力，处处攻击，处处不得力，拖延时间，难于奏效。而应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即集中六倍、五倍、四倍于敌，至少也是三倍于敌的兵力，并集中全部或大部的炮兵，从敌军诸阵地中，选择较弱的一点（不是两点），猛烈地攻击之，务期必克。得手后，迅速扩张战果，各个歼灭该敌。

（四）这种战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全歼，方能最有效地打击敌军，使敌军被歼一团少一团，被歼一旅少一旅。对于缺乏第二线兵力的敌人，这种战法最为有用。全歼，方能最充分地补充自己。这不但是我军目前武器弹药的主要来源，而且是兵员的重要来源。全歼，在敌则士气沮丧，人心不振；在我则士气高涨，人心振奋。速决，则使我军有可能各个歼灭敌

军的增援队，也使我军有可能避开敌军的增援队。在战术和战役上的速决，是战略上持久的必要条件。

（五）现在我军干部中，还有许多人，在平时，他们赞成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但到临战，则往往不能应用这一原则。这是轻敌的结果，也是没有加强教育和着重研究的结果。必须详举战例，反复说明这种作战方法的好处，指出这是战胜蒋介石进攻的主要方法。实行这种方法，就会胜利。违背这种方法，就会失败。

（六）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是我军从开始建军起十余年以来的优良传统，并不是现在才提出的。但是在抗日时期，我军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主，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辅。在现在的内战时期，情况改变了，作战方法也应改变，我军应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而在蒋军武器加强的条件下，我军必须特别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

（七）在敌处进攻地位、我处防御地位的时候，必须应用这一方法。在敌处防御地位、我处进攻地位的时候，则应分为两种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如果我军兵力多，当地敌军较弱，或者我军出敌不意举行袭击的时候，可以同时攻击若干部队的敌军。例如，六月五日至六月十日，山东我军同时攻击胶济、津浦两路十几个城镇而占领之。又如，八月十日至八月二十一日，我刘邓军攻击陇海路汴徐线十几个城镇而占领之。如果我军兵力不足，则应对敌军所占诸城一个一个地夺取之，而不要同时攻击几个城镇的敌人。例如山西我军夺取同蒲路上诸城，就是这样打的。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过去三个月歼敌二十五个旅时所采用的惟一正确的作战方法。我们集中的兵力必须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三倍于敌，方能有效地歼敌。不论在战役上，战术上，都须如此。不论是高级指挥员，或中下级干部，都须学会此种作战方法。

《三个月总结》（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07页

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

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读〈智囊〉批语》，《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65—66页

● 作战的基本方针是歼灭战

“拼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给敌以杀伤，是作为给敌以歼灭的手段而采取的，否则便没有意义。因给敌以杀伤而给我以消耗，又因给敌以歼灭而给我以补充，这样就不但抵偿了我军的消耗，而且增加了我军的力量。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对于第一、二、三、四次“围剿”，我们的方针都是歼灭战。

每次歼灭的敌人对于全敌不过是一部分，然而“围剿”是打破了。第五次反“围剿”时，采取了相反的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同一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人民赞助、良好阵地、好打之敌、出其不意等条件，都是达到歼灭目的所不可缺少的。

击溃有意义，乃至让敌逃去有意义，只是对于全战斗或全战役中我军主力对确定之敌举行歼灭性的作战而说的，否则便没有什么意义。这又是一种有所失对有所得而有意义的场合。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236—237页

（九八）我们首先可以说，抗日战争是消耗战，同时又是歼灭战。为什么？敌之强的因素尚在发挥，战略上的优势和主动依然存在，没有战役和战斗的歼灭战，就不能有效地迅速地减杀其强的因素，破坏其优势和主动。我之弱的因素也依然存在，战略上的劣势和被动还未脱离，为了争取时间，加强国内国际条件，改变自己的不利状态，没有战役和战斗的歼灭战，也不能成功。因此，战役的歼灭战是达到战略的消耗战之目的的手段。在这点上说，歼灭战就是消耗战。中国之能够进行持久战，用歼灭达到消耗是主要的手段。

（九九）但达到战略消耗目的的，还有战役的消耗战。大抵运动战是执行歼灭任务的，阵地战是执行消耗任务的，游击战是执行消耗任务同时又执行歼灭任务的，三者互有区别。在这点上说，歼灭战不同于消耗战。战役的消耗战，是辅助的，但也是持久作战所需要的。

(一〇〇)从理论上和需要上说来,中国在防御阶段中,应该利用运动战之主要的歼灭性,游击战之部分的歼灭性,加上辅助性质的阵地战之主要的消耗性和游击战之部分的消耗性,用以达到大量消耗敌人的战略目的。在相持阶段中,继续利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歼灭性和消耗性,再行大量地消耗敌人。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战局持久,逐渐地转变敌我形势,准备反攻的条件。战略反攻时,继续用歼灭达到消耗,以便最后地驱逐敌人。

(一〇一)但是在事实上,十个月的经验是,许多甚至多数的运动战战役,打成了消耗战;游击战之应有的歼灭作用,在某些地区,也还未提到应有的程度。这种情况的好处是,无论如何我们总算消耗了敌人,对于持久作战和最后胜利有其意义,我们的血不是白流的。然而缺点是:一则消耗敌人的不足;二则我们自己不免消耗的较多,缴获的较少。虽然应该承认这种情况的客观原因,即敌我技术和兵员教养程度的不同,然而在理论上和实际上,无论如何也应该提倡主力军在一切有利场合努力地执行歼灭战。游击队虽然为了执行许多具体任务,例如破坏和扰乱等,不能不进行单纯的消耗战,然而仍须提倡并努力实行在战役和战斗之一切有利场合的歼灭性的作战,以达既能大量消耗敌人又能大量补充自己之目的。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01—502页

抗日战争的正确要求应该是:尽可能的歼灭战。在一切有利的场合,每战集中优势兵力,采用包围迂回战术——不能包围其全部也包围其一部,不能俘获所包围之全部也俘获所包围之一部,不能俘获所包围之一部也大量杀伤所包围之一部。而

在一切不利于执行歼灭战的场合，则执行消耗战。对于前者，用集中兵力的原则；对于后者，用分散兵力的原则。在战役的指挥关系上，对于前者，用集中指挥的原则；对于后者，用分散指挥的原则。这些，就是抗日战争战场作战的基本方针。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04页

凡只能击溃不能歼灭之仗不要打，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机会歼敌，过于急躁之意见并不恰当。

《不要打只能击溃不能歼灭之仗》（一九四六年八月三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375页

作战时应集中优势兵力打敌一部（例如集中一千五百至二千人包围歼灭保安团五百人），期于速决尽歼，得手后休整数日，再打第二仗，只要每次都是歼灭战，打三四个胜仗，即可开展局面。

《集中优势兵力着重歼灭保安团》（一九四六年九月二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452页

你们作战方针应着重歼灭敌有生力量，然后敌占各据点自然容易为我收复。为实行此方针，应采取围城打援办法。围城之目的不在得城，而在打援。集中七八倍于敌之兵力（例如集中四五个团打敌援兵一个至二个营），每次事前均应有充分准备，不浪打，打则必胜。打时须用包围迂回，以期尽歼。此点对干部应作深刻教育。

《采取围城打援办法歼敌有生力量》（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91页

打大歼灭战的两个条件：（一）以小部兵力钳制敌之其他部分，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一个敌人，决不可同时打两个敌人，也不可将很多兵力使用于钳制方面。（二）以一部打正面，以主力打迂回，决不可以主力打正面，以一部打迂回。希望你们按以上两条检查过去经验，部署新的作战，好好打几个大歼灭战。

《打大歼灭战的两个条件》（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640页

在目前情况下，给敌以歼灭与给敌以歼灭性打击，必须同时注重。给敌以歼灭是说将敌整旅整师干净全部地加以歼灭，不使漏网。执行这一方针，必须集中三倍或四倍于敌之兵力，以一部打敌正面，以另一部包围敌之两翼，而以主力或重要一部迂回敌之后方，即是说四面包围敌军，方能奏效。这是我军的基本方针，这是在敌军分散孤立、敌援兵不能迅速到达之条件下必须实行的正确方针。但在敌军分数路向我前进，每路相距不远，或分数路在我军前进方向施行防堵，每路亦相距不远之条件下，我军应当采取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针。这即是说，不要四面包围，只要两面或三面包围，而以我之全力用于敌之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不以全部歼灭敌军为目标，而以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为目标。这样做，可以减少我军伤亡，其被歼灭之部分可以补充我军，其被击溃之部分可以使其大量逃散，敌能收容者不过一部分，短期内亦难恢复战斗力。

《给敌以歼灭与歼灭性打击须同时注重》（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94—295页

4. 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

对于敌人的一次有计划的“围剿”，如果我们没有必要的和充分的准备，必然陷入被动地位。临时仓卒应战，胜利的把握是没有的。因此，在和敌人准备“围剿”同时，进行我们的反“围剿”的准备，实有完全的必要。我们队伍中曾经发生过的反对准备的意见是幼稚可笑的。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200页

开始准备的时机问题，一般地说来，与其失之过迟，不如失之过早。因为后者的损失较之前者为小，而其利益，则是无备无患，根本上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201页

反“围剿”斗争胜利的程度，是和准备阶段中任务完成的程度密切地联系着的。由轻敌而发生的对于准备的放松，和由被敌人进攻所吓倒而发生的惊惶失措，都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不良倾向。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202页

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49页

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47页

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这一种计算现在仍然不要放弃，以免在事变万一到来时，我们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

《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31页

我们历来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也不打只有准备但无把握之仗。过去打蒋介石，开始有些人犯主观主义错误，后来经过整风，反掉了主观主义，就打了胜仗。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80页

（六）战略和战役、战斗

1. 战略的持久与战役、战斗的速决

- 战役和战斗上的速决是战略上持久的必要条件

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因为反动势力的雄厚，革命势力是逐渐地生长的，这就

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在这上面性急是要吃亏的，在这上面提倡“速决”是不正确的。……因为中国的反动势力，是许多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革命势力没有聚积到足以突破内外敌人的主要阵地以前，国际革命势力没有打破和钳制大部分国际反动势力以前，我们的革命战争依然是持久的。从这一点出发，规定我们长期作战的战略方针，是战略指导的重要方针之一。

战役和战斗的原则与此相反，不是持久而是速决。在战役和战斗上面争取速决，古今中外都是相同的。在战争问题上，古今中外也都无不要求速决，旷日持久总是认为不利。惟独中国的战争不能不以最大的忍耐性对待之，不能不以持久战对待之。有人在立三路线时期讥笑我们的做法为“打拳战术”（说的是打过来打过去才能夺取大城市），讥笑我们要待头发白了才能看见革命的胜利。这种表现急性病的情绪，早已证明是不对了。但是他们的批评意见如果不是放在战略问题上而是放在战役和战斗的问题上，则是非常之对的。原因在于：第一，红军的武器尤其是弹药没有来源；第二，白军有很多支部队，红军只一支部队，打破一次“围剿”要准备迅速的连续的作战；第三，白军各个虽然分进，但多是比较地密集，打它们中间的一个如果不能迅速地解决战斗，其余各个就都来了。为了这些理由，不能不实行速决战。对于我们，几小时，一天或两天解决一个战斗是经常的。只有在“围城打援”的方针下，目的不在打围敌，而在打援敌，对围敌作战是准备着相当地持久的，但对援敌仍然是速决。战略防御时固守钳制方面的据点，战略进攻时打孤立无援之敌，消灭根据地中的白色据点，这些时候也常常给予战役或战斗以持久方针。然而这些持久战，只是帮助而并不妨碍主力红军的速决战。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233—235页

速决战不是心里想要如此做就做得成功的，还须加上许多具体的条件。主要的条件是准备充足，不失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包围迂回战术，良好阵地，打运动中之敌，或打驻止而阵地尚不巩固之敌。不解决这些条件，而求战役或战斗的速决，是不可能的。

打破一次“围剿”属于一个大战役，依然适用速决原则，而不是持久原则。因为根据地的人力、财力、军力等项条件都不许可持久。

但在一般的速决原则之下，反对不正当的急躁性是必要的。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最高军事政治领导机关，估计到根据地的这些条件，估计到敌方情况，不为敌之其势汹汹所吓倒，不为尚能忍耐的困难所沮丧，不为某些挫折而灰心，给予必要的耐心和持久，是完全必要的。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235页

整个的抗日战争，由于日寇是强国，是进攻的，我们是弱国，是防御的，因而决定了我们是战略上的防御战和持久战。拿作战线来说，敌人是外线作战，我们是内线作战。这是一方面的情形。但是在又一方面，则适得其反。敌军虽强（武器和人员的某些素质，某些条件），但是数量不多，我军虽弱（同样，仅是武器和人员的某些素质，某些条件），但是数量甚多，加上敌人是异民族侵入我国，我们是在本国反抗异民族侵入这个条件，这样就决定了下列的战略方针：能够而且必须在战略的防御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

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这是整个抗日战争应该采取的战略方针。正规战争是如此，游击战争也是如此。游击战争所不同的，只是程度上或表现形式上的问题。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08页

从整个的抗日战争看来，只有将正规战和游击战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集合了很多，即从进攻战中打了很多的胜仗，才能达到战略防御之目的，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只有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集合了很多，即是使得很多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都能因迅速解决战斗之故而取得了胜利，才能达到战略持久的目的，一方面争取时间加强抗战力量，同时促进和等候国际形势的变动和敌人的内溃，以便举行战略反攻，驱逐日寇出中国。也只有每战集中优势兵力，不论在战略防御时期也好，在战略反攻时期也好，一律采取战役和战斗中的外线作战，包围敌人而消灭之，不能包围其全部，也包围其一部，不能消灭所包围之全部，也消灭所包围之一部，不能大量俘虏所包围之敌，也大量杀伤所包围之敌。集合很多这样的歼灭战，才能转变敌我形势，将敌之战略包围，即敌之外线作战方针根本击破，最后配合国际的力量和日本人民的革命斗争，共同围剿日本帝国主义而一举消灭之。这些结果，主要地依靠正规战取得，游击战只有次一等的成绩。但是集合许多小胜化为大胜，则是正规战游击战所共同的。游击战争在抗日过程中起着伟大的战略作用，就是说的这一点。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09—410页

战役和战斗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中心点在于一个进攻;外线是说的进攻的范围,速决是说的进攻的时间,所以叫它做“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这是实行持久战的最好的方针,也即是所谓运动战的方针。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87页

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之所谓外线,所谓速决,所谓进攻,与乎运动战之所谓运动,在战斗形式上,主要地就是采用包围和迂回战术,因而便须集中优势兵力。所以,集中兵力,采用包围迂回战术,是实施运动战即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之必要条件。然而一切这些,都是为着歼灭敌人之目的。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02—503页

速决,则使我军有可能各个歼灭敌军的增援队,也使我军有可能避开敌军的增援队。在战术和战役上的速决,是战略上持久的必要条件。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98页

● 只有战略决战才能解决两军的胜负问题,要在对我有利条件下进行战略决战

不到决战的时机,没有决战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进行决战。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3页

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的存在，还没有使敌人失败。这种条件和形势，具备着决定胜败的可能性，但还不是胜败的现实性，还没有实现两军的胜负。实现这个胜负，依靠两军的决战。只有决战，才能解决两军之间谁胜谁败的问题。这就是战略反攻阶段的全任务。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214页

无论何方失败，都直接地、迅速地引起失败者方面的一种新的努力，就是企图挽救危局的努力，使自己脱出这种新出现的不利于我有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而重新创造出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去压迫对方。

胜利者方面的努力和这相反，力图发展自己的胜利，给敌人更大的损害，务求增加或发展有利于我的条件和形势，而务求不让对方完成其脱出不利和挽回危局的企图。

所以，不论在何方说来，决战阶段的斗争，是全战争或全战役中最激烈、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难、最艰苦的，在指挥上说来，是最不容易的时节。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215—216页

速胜论者则不知道战争是力量的竞赛，在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没有起一定的变化以前，就要举行战略的决战，就想提前到达解放之路，也是没有根据的。其意见实行起来，一定不免于碰壁。或者只是空谈快意，并不准备真正去做。最后则是事实先生跑将出来，给这些空谈家一瓢冷水，证明他们不过是一些贪便宜、想少费气力多得收成的空谈主义者。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70页

抗日战争中的决战问题应分为三类：一切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坚决地进行决战，一切无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避免决战，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抗日战争不同于其他许多战争的特点，又表现在这个决战问题上。在第一第二阶段，敌强我弱，敌之要求在于我集中主力与之决战。我之要求则相反，在选择有利条件，集中优势兵力，与之作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上的决战，例如平型关、台儿庄以及许多的其他战斗；而避免在不利条件下的无把握的决战，例如彰德等地战役所采的方针。拼国家命运的战略的决战则根本不干，例如最近之徐州撤退。这样就破坏了敌之“速决”计划，不得不跟了我们干持久战。这种方针，在领土狭小的国家是做不到的，在政治太落后了的国家也难做到。我们是大国，又处进步时代，这点是可以做到的。如果避免了战略的决战，“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虽然丧失若干土地，还有广大的回旋余地，可以促进并等候国内的进步、国际的增援和敌人的内溃，这是抗日战争的上策。急性病的速胜论者熬不过持久战的艰难路程，企图速胜，一到形势稍为好转，就吹起了战略决战的声浪，如果照了干去，整个的抗战要吃大亏，持久战为之葬送，恰恰中了敌人的毒计，实在是下策。不决战就须放弃土地，这是没有疑问的，在无可避免的情况下（也仅仅是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勇敢地放弃。情况到了这种时候，丝毫也不应留恋，这是以土地换时间的正确的政策。历史上，俄国以避免决战，执行了勇敢的退却，战胜了威震一时的拿破仑。中国现在也应这样干。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06—507页

（一〇八）我们主张一切有利条件下的决战，不论是战斗的

和大小战役的，在这上面不容许任何的消极。给敌以歼灭和给敌以消耗，只有这种决战才能达到目的，每个抗日军人均须坚决地去做。为此目的，部分的相当大量的牺牲是必要的，避免任何牺牲的观点是懦夫和恐日病患者的观点，必须给以坚决的反对。李服膺、韩复榘等逃跑主义者的被杀，是杀得对的。在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英勇向前的精神和动作，是在正确的作战计划下绝对必要的东西，是同持久战和最后胜利不能分离的。我们曾经严厉地指斥了所谓“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拥护严格纪律的执行，就是因为只有这种在正确计划下的英勇决战，才能战胜强敌；而逃跑主义，则是亡国论的直接支持者。

（一〇九）英勇战斗于前，又放弃土地于后，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些英勇战斗者的血，不是白流了吗？这是非常不妥当的发问。吃饭于前，又拉屎于后，不是白吃了吗？睡觉于前，又起床于后，不是白睡了吗？可不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呢？我想是不可以的。吃饭就一直吃下去，睡觉就一直睡下去，英勇战斗就一直打到鸭绿江，这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幻想，在实际生活里是不存在的。谁人不知，为争取时间和准备反攻而流血战斗，某些土地虽仍不免于放弃，时间却争取了，给敌以歼灭和给敌以消耗的目的却达到了，自己的战斗经验却取得了，没有起来的人民却起来了，国际地位却增长了。这种血是白流的吗？一点也不是白流的。放弃土地是为了保存军力，也正是为了保存土地；因为如不在不利条件下放弃部分的土地，盲目地举行绝无把握的决战，结果丧失军力之后，必随之以丧失全部的土地，更说不到什么恢复失地了。资本家做生意要有本钱，全部破产之后，就不算什么资本家。赌汉也要赌本，孤注一掷，不幸不中，就无从再赌。事物是往返曲折的，不是径情直遂的，战争也是一样，只有形式主义者想不通这个道理。

(一一〇)我想,即在战略反攻阶段的决战亦然。那时虽然敌处劣势,我处优势,然而仍适用“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的原则,直至打到鸭绿江边,都是如此。这样,我可始终立于主动,一切敌人的“挑战书”,旁人的“激将法”,都应束之高阁,置之不理,丝毫也不为其所动。抗日将军们要有这样的坚定性,才算是勇敢而明智的将军。那些“一触即跳”的人们,是不足以语此的。第一阶段我处于某种程度的战略被动,然在一切战役上也应是主动的,尔后任何阶段都应是主动。我们是持久论和最后胜利论者,不是赌汉们那样的孤注一掷论者。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07—509页

保卫武汉斗争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消耗敌人,又一方面在于争取时间便于我全国工作之进步,而不是死守据点。到了战况确实证明不利于我而放弃则反为有利之时,应以放弃地方保存军力为原则,因此必须避免大的不利决战。战略决战,在一二两阶段中都是不应有的,都足以妨碍抗战的坚持与反攻的准备,因此必须避免。避免战略决战而力争有利条件下的战役与战斗的决战,应是持久战的方针之一。于必要时机与一定条件下放弃某些无可再守的城市,不但是被迫的不得已的,而且是诱敌深入,分散、消耗与疲惫敌人的积极的政策。在坚持抗战而非妥协投降的大前提下,必要时机放弃某些据点,是持久战方针内所许可的,并无为之震惊的必要。

《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92页

2. 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

● 从战争全体看，进攻是主要的，防御是第二位的，战争中要交替运用

作战指挥上的基本原则

（一）战略防御时：

1. 反对单纯防御，执行积极防御。
2. 反对先发制人，执行后发制人（一般的）。后发制人，即诱敌深入，不是所谓“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宁都会议及其后），而是内线作战的正确原则。

（二）战略进攻时：

1. 反对机会主义的估计不足，为扩大战果而奋斗（当由战略防御中的反攻转到战略的进攻时，以及在整个战略进攻的过程中，均应为扩大战略上的战果而奋斗），为夺取先机而奋斗。
2. 反对冒险主义：
 - （1）适可而止，保证已得的胜利（已得胜利是可能丧失的）。

（2）把阵地转到新的方向去，使处在两个大战斗间的红军得着暂时的休息，使苏区得着扩大，并把扩大苏区的任务同创造战场迎接新的战斗的任务联系起来。把两个以上的苏区打成一片和消灭苏区中间及其附近的白色据点（打土围子），不是所谓“机会主义的动摇”（一九三二年党报），而是执行了正确的方针。

（3）发展形势中的推进政策，波浪式的发展，有阵地有后方的发展（即是所谓“巩固地发展苏区”，所谓“同时扩大，同

时深入”），反对冒进政策（敌我对比许可时是例外）。

（4）打城市及敌人巩固了的阵地是有条件的，过去反“上山主义”反“东北路线”是错了的（一九三二年）。

（三）一般原则（不论防御时或进攻时）：

1. 反对只“打”不“走”的拼命主义，又要打，又要走，自然走是为了打的。战争方式的游击性，即没有固定战线，这是由于技术条件落后而决定的中国红军作战的特点，也正是过去军事指导的长处。在这里反“游击主义”是错了的。第五次反“围剿”中企图建立固定战线是失败了。拿这一战线的暂时失利（地方被占）换得别一战线的胜利，这一战线的问题也就可以解决了（地方是可以恢复的）。

2. 争取这种可能，迅速改变红军的技术条件，使没有固定战线的状态改变为一般有固定战线的状态，运动战还是运动战，但大大减少了游击性。没有这个现代的条件，要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不可能的，对于改变技术条件的消极是不对的。

3. 运动战是基本原则，反对“不让寸土”的保守主义的阵地战，主力红军大踏步进退是不可避免的、需要的。

4. 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战略上一个拳头打人，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消灭战；反对分兵主义，反对两个拳头主义，反对战略上的“全线出击”，反对击溃战（战略的及一般战役的）。

5. 战略的持久战，战役的速决战，反对战役持久战，反对“拼消耗”。

6. 要有充分的休息训练，反对无益的急，学习必要的慢。

7. 要有充分的战斗准备。

8. 依情况决定指挥方法，统一决心下的分割指挥是容许的、需要的。

9. 拿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把今天联结到明天，把小的联结到大的，把局部联结到全体，反对走一步看一步。

10. 军事委员会在军事范围内有完全的权力。

《关于战略方针和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79—381页

敌人的“围剿”和红军的反“围剿”，互相采用进攻和防御这两种战斗的形式，这是和古今中外的战争没有两样的。然而中国内战的特点，则在二者的长期的反复。在一次“围剿”中，敌人以进攻反对红军的防御，红军以防御反对敌人的进攻，这是反“围剿”战役的第一个阶段。敌人以防御反对红军的进攻，红军以进攻反对敌人的防御，这是反“围剿”战役的第二个阶段。任何的“围剿”，都是包括这两个阶段的，而且是长期地反复的。

说长期反复，是说战争和战斗形式的反复。这是事实，任何人一看就知的。“围剿”和反“围剿”，是战争形式的反复。敌以进攻对我防御、我以防御对敌进攻的第一阶段，和敌以防御对我进攻、我以进攻对敌防御的第二阶段，是每一次“围剿”中战斗形式的反复。

至于战争和战斗的内容，则不是简单地反复的，而是每次不同的。这也是事实，任何人一看就知的。这里的规律，是“围剿”和反“围剿”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情况一次比一次复杂，战斗一次比一次激烈。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93页

中国国内战争和任何古今中外的战争一样，基本的战斗形

式只有攻防两种。中国内战的特点，是“围剿”和反“围剿”的长期地反复和攻防两种战斗形式的长期地反复，并且包括着一次一万多公里的伟大的战略转移（长征）这样一种东西在里面。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194页

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这种说法当然有它的正确性。革命和革命战争从发生到发展，从小到大，从没有政权到夺取政权，从没有红军到创造红军，从没有革命根据地到创造革命根据地，总是要进攻的，是不能保守的，保守主义的倾向是应该反对的。

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但是也有防御和后退——这种说法才是完全正确的。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

上述两个论断中的前一论断，在政治上说来可以是对的，移到军事上就不对了。在政治上，也只是在某一种情况说来（革命前进时）是对的，移到另一种情况（革命退却时：全部退却，例如俄国在一九〇六年、中国在一九二七年；局部退却，例如俄国在一九一八年的布列斯特条约时）也就不对了。只有后一论断，才是全部地正确的真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机械地反对使用军事防御的手段，不过是一种非常幼稚的思想。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195—196页

为什么从防御说起呢？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失败后，革命成了极深刻极残酷的阶级战争。敌人是全国的统治者，我们只有一点小部队，因此，我们一开始就是和敌人的“围剿”奋斗。我们的进攻是密切地联系于打破“围剿”的，我们发展的命运全看我们能不能打破“围剿”。打破“围剿”的过程往往是迂回曲折的，不是径情直遂的。首先而且严重的问题，是如何保存力量，待机破敌。所以，战略防御问题成为红军作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

在我们的十年战争中，对于战略防御问题，常常发生两种偏向，一种是轻视敌人，又一种是为敌人所吓倒。

由于轻视敌人，许多游击队失败了，红军对若干次敌人的“围剿”不能打破。

革命的游击队初起，领导者对于敌我形势往往看得不正确。他们看见自己在一个地方用突然的武装起义胜利了，或从白军中哗变出来了，一时的环境很顺利，或者虽有严重的环境而看不到，因此往往轻视敌人。另一方面，对自己的弱点（没有经验，力量弱小），也不了解。敌强我弱，原是客观地存在的现象，可是人们不愿意想一想，一味只讲进攻，不讲防御和退却，在精神上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因而把行动引到错误的方向。许多游击队因此失败了。

……

为敌人吓倒而受挫折的例子，是很多的。

和轻敌者相反，人们太看重了敌人，太看轻了自己，因而采取了非必要的退却方针，精神上同样地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其结果或者是游击队失败，或者是红军的某些战役失败，或者是根据地丧失。

丧失根据地的最显著的例子，是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

丧失了江西中央根据地。这里的错误是从右倾的观点产生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做了一万二千多公里的长征。然而这种错误，往往有一种“左”倾轻敌的错误为之先行。一九三二年进攻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正是后来在对付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采取消极防御路线的根源。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197—198页

在军事上说来，我们的战争是防御和进攻的交替的应用。对于我们，说进攻是在防御之后，或说进攻是在防御之前都是可以的，因为关键在于打破“围剿”。“围剿”没有打破以前是防御，“围剿”一经打破就开始了进攻，仅仅是一件事情的两个阶段，而敌人的一次“围剿”和它的又一次“围剿”是衔接着的。这两个阶段中，防御的阶段比进攻的阶段更为复杂，更为重要。这个阶段包含着怎样打破“围剿”的许多问题。基本的原则是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

从国内战争说，假如红军的力量超过了敌人时，那末，一般地就用不着战略防御了。那时的方针只是战略的进攻。这种改变，依靠于敌我力量的总的变动。到了那时，剩下的防御手段，只是局部的东西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200页

何时结束自己的进攻，转入反“围剿”的准备阶段呢？因为当自己处在胜利的进攻中，敌人处在防御地位时，敌人的

“围剿”准备是在秘密地进行的，我们难于知道他们将在何时开始进攻。我们准备反“围剿”的工作开始早了，不免减少进攻的利益，而且有时会给予红军和人民以若干不良的影响。因为准备阶段中的主要步骤，就是军事上的准备退却，和为着准备退却的政治上的动员。有时准备过早，会变为等待敌人；等了好久而敌人未来，不得不重新发动自己的进攻。有时我们的重新进攻刚在开始，又恰好遇到了敌人进攻的开始，把自己处在困难地位。所以开始准备的时机的选择，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断定这种时机，要从敌我双方情况和二者间的关系着眼。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200—201页

战略退却的全部的作用，在于转入反攻，战略退却仅是战略防御的第一阶段。全战略的决定关键，在于随之而来的反攻阶段之能不能取胜。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214页

防御战本来容易陷入被动地位，防御战大不如进攻战之能够充分地发挥主动权。然而防御战是能够在被动的形式中具有主动的内容的，是能够由形式上的被动阶段转入形式上内容上的主动阶段的。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223页

“无条件的进攻”一语不妥，进攻也是有条件的，但进攻是主要的，基本的，中心的。

《进攻是主要的，也是有条件的》（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四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224页

在全国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正确地说，战略反攻）中间，每一游击战争的根据地上面及其周围，也有其小规模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前者是敌取攻势我取守势时的战略形势和战略方针，后者是敌取守势我取攻势时的战略形势和战略方针。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28页

在已将敌之进攻打破，敌之新的进攻尚未到来的时候，是敌取战略守势我取战略攻势的时候。

这种时候，我之作战方针，不在于攻击不可必胜的、固守着防御阵地的敌人；而在于有计划地在一定地区内消灭和驱逐为游击队力能胜任的小敌和汉奸武装，扩大我之占领地区，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补充并训练部队，组织新的游击队。在这些任务做得有了些眉目之后，如果敌人还在守势之中，就可以进一步扩大我之新占领地区，攻击那些敌力薄弱的城市和交通线，依其情况而长久地或暂时地占领之。所有这些，都是战略进攻的任务，目的在于乘着敌取守势之时，有效地发展自己的军事的和民众的力量，有效地缩小敌人的力量，并准备敌人再度向我进攻时又能有计划地和有力地打破之。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31页

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不可在自己的战略进攻中得意忘形，轻视敌人，忘记了团结内部、巩固根据地和巩固部队的工作。在这种时候，须善于观看敌人的风色，看其是否又有向我进攻的朕兆，以便一遇进攻，就能适当地结束我之战略进攻，转入战

略防御，再从战略防御中粉碎敌人的进攻。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32页

古代战争，用矛用盾：矛是进攻的，为了消灭敌人；盾是防御的，为了保存自己。直到今天的武器，还是这二者的继续。轰炸机、机关枪、远射程炮、毒气，是矛的发展；防空掩护部、钢盔、水泥工事、防毒面具，是盾的发展。坦克，是矛盾二者结合为一的新式武器。进攻，是消灭敌人的主要手段，但防御也是不能废的。进攻，是直接为了消灭敌人的，同时也是为了保存自己，因为如不消灭敌人，则自己将被消灭。防御，是直接为了保存自己的，但同时也是辅助进攻或准备转入进攻的一种手段。退却，属于防御一类，是防御的继续；而追击，则是进攻的继续。应该指出：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因此，作为消灭敌人之主要手段的进攻是主要的，而作为消灭敌人之辅助手段和作为保存自己之一种手段的防御，是第二位的。战争实际中，虽有许多时候以防御为主，而在其余时候以进攻为主，然而通战争的全体来看，进攻仍然是主要的。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82页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还在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此次战争的第一个年头内，人民解放军即已在几个

战场上打退了蒋介石的进攻，迫使蒋介石转入防御地位。而从战争第二年的第一季，即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间，人民解放军即已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破坏了蒋介石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企图彻底破坏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现在，战争主要地已经不是在解放区内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了，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内，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还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世界的东方，在这里，共有十万万以上人口（占人类的一半）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到进攻，不能不引起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欢欣鼓舞。同时，对于正在斗争的欧洲和美洲各国的被压迫人民，也是一种援助。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43—1244页

● 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反对消极防御

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据我所知，任何一本有价值的军事书，任何一个比较聪明的军事家，而且

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战略战术，没有不反对消极防御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极防御当法宝。然而世上偏有这样的人，做出这样的事。这是战争中的过失，是保守主义在军事上的表现，我们应该坚决地反对它。

后起而且发展得很快的帝国主义国家，即德日两国的军事家中，积极地鼓吹战略进攻的利益，反对战略防御。这种思想，是根本不合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德日帝国主义的军事家们指出防御的一个重要的弱点是不能振奋人心，反而使人心动摇。这是说的阶级矛盾剧烈，而战争的利益仅仅属于反动的统治阶层乃至反动的当权政派的那种国家。我们的情况不同。在保卫革命根据地和保卫中国的口号下，我们能够团结最大多数人民万众一心地作战，因为我们是被压迫者和被侵略者。苏联内战时期的红军也是在防御形式之下战胜敌人的。他们的战争不但在帝国主义各国组织白党进攻时，是在保卫苏维埃的口号下进行的，就是在十月起义的准备时期，也是在保卫首都的口号下进行军事动员的。一切正义战争的防御战，不但有麻痹政治上异己分子的作用，而且可以动员落后的人民群众加入到战争中来。

马克思说的武装起义之后一刻也不应该停止进攻，这是说乘敌不备而突然起义的群众，应该不让反动的统治者有保守政权或恢复政权的机会，趁此一瞬间把国内反动的统治势力打个措手不及，而不要满足于已得的胜利，轻视敌人，放松对于敌人的进攻，或者畏缩不前，坐失消灭敌人的时机，招致革命的失败。这是正确的。然而不是说，敌我双方已在军事对抗中，而且敌人是优势，当受敌人压迫时，革命党人也不应该采取防御手段。如果这样想，那就是第一号的傻子。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反攻是一个长过程，是防御战的最精彩最活跃的阶段，也就是防御战的最后阶段。所谓积极防御，主要地就是指的这种带决战性的战略的反攻。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14—215页

反对单纯防御的消极的作战方针，采取独立自主的积极的作战方针。

《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54页

战略战术问题。我们采取了其他中国军队所没有采取的行动，主要地是在敌军翼侧和后方作战。这种战法，比较单纯的正面防御大有区别。我们不反对使用一部分兵力于正面，这是必要的。但主力必须使用于侧面，采取包围迂回战法，独立自主地攻击敌人，才能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再则使用若干兵力于敌人后方，其威力特别强大，因为捣乱了敌人的运输线和根据地。就是在正面作战的军队，也不可单纯防御的战法，主要应采取“反突击”。

《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78页

部分的暂时的牺牲（不保存），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我们说，基本上为着消灭敌人的进攻手段中，同时也含了保存自己的作用，理由就在这里。防御必须同时有进攻，而不应是单纯的防御，也是这个道理。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82—483页

3. 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

● 战略退却的目的是保存军力待机破敌，是诱敌深入准备反攻

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战略步骤。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此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是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春秋时候，鲁与齐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

……

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203—204页

战略退却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军力，准备反攻。退却之所以

必要，是因为处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过去却有许多人坚决地反对退却，认为这是“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我们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反对是完全错误的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206页

决定退却终点究在何处，须以整个形势作出发点。在局部形势看来有利于我转入反攻，如果不是同时在全体形势看来也对我有利时，则据此决定退却终点，就是不正确的。因为反攻的开始，必须计算到以后的变化，而我们的反攻总是从局部开始的。有时退却终点应该选在根据地的前部，例如江西第二次、第四次反“围剿”，陕甘第三次反“围剿”时。有时须在根据地的中部，例如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有时则在根据地的后部，例如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这些都是将局部形势联系到整个形势来决定的。江西第五次反“围剿”，我军全然不讲退却，原因在于对局部形势和整个形势都不注意，实在是一种鲁莽灭裂的干法。形势是由条件造成的；观察局部形势和整个形势的联系，应从当时敌我双方所具条件之见于局部的和见于全体的，是否在一定的限度上利于我之开始反攻以为断。

退却终点，在根据地可以大体上分为前部、中部、后部三种。然而是不是根本拒绝在白区作战呢？不是的。我们拒绝在白区作战，仅仅指的对付敌军大规模“围剿”。敌我强弱悬殊，我们在保存军力待机破敌的原则下，才主张向根据地退却，主张诱敌深入，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造成或发现利于反攻的条件。如果情况并不这样严重，或者情况的严重性简直使红军连在根据地也无法开始反攻，或者反攻不利需要再退以求局势之变化

时，那末，把退却终点选在白区也是应该承认的，至少在理论上是应该承认的，虽然我们过去很少这种经验。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209—210页

白区退却终点大体上也可分为三种：第一是在根据地前面，第二在根据地侧面，第三在根据地后面。……对于我们，当敌举行大规模“围剿”时，一般的原则是诱敌深入，是退却到根据地作战，因为这是使我们最有把握地打破敌人进攻的办法。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210—211页

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人们，反对战略退却，理由是退却丧失土地，危害人民（所谓“打烂坛坛罐罐”），对外也产生不良影响。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则谓我退一步，敌之堡垒推进一步，根据地日蹙而无法恢复。如果说诱敌深入在以前是有用的，那末在堡垒主义的第五次“围剿”是无用的。对付第五次“围剿”，只能用分兵抵御和短促突击的方法。

回答这些意见是容易的，我们的历史已经回答了。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其取得是进步的建设。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

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阿比西尼亚的打硬仗，也得到丧失全国的结果，虽然阿国失败的原因不仅仅这一点。

危害人民的问题同此道理。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惧怕一时的不良的政治影响，就要以长期的不良影响做代价。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211—212页

退却开始时机的问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我们在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的退却，如果不恰在那种时机，即是说如果再迟，那至少我们胜利的程度是要受到影响的。退却过早和过迟，当然都有损失。但是一般地说来，过迟的损失较之过早为大。及时退却，使自己完全立于主动地位，这对于到达退却终点以后，整顿队势，以逸待劳地转入反攻，有极大的影响。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212—213页

完全有计划战略退却，在形式上是被逼出此的，在内容上是保存兵力，待机破敌，是诱敌深入，准备反攻。只有不肯退却，仓卒应战（例如硝石战斗），表面上似乎在力争主动，实际上是被动的。战略反攻，则不但内容是主动的，形式上也放弃了退却时的被动姿态。对于敌军说来，反攻是我军强迫它放弃主动权，同时即给以被动地位的努力。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223页

我们历来主张“诱敌深入”，就是因为这是战略防御中弱军

对强军作战的最有效的军事政策。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98页

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敌手。

尔后屡败，契丹均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办法，宋人终不省。

契丹善用诱敌深入战，让敌人多占地方，然后待机灭敌。

《读〈宋史〉批语》，《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78—279页

● 战略反攻要选择时机，在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下进行

准备反攻，须选择和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若干条件，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然后进入反攻阶段。

依我们的过去情形说来，大概须在退却阶段中取得下列诸种条件中至少二种以上，才算是有利于我不利于敌，才好使自己转入反攻。这些条件是：

- （一）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
- （二）有利作战的阵地；
- （三）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
- （四）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
- （五）使敌人疲劳沮丧；
- （六）使敌人发生过失。

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这就是根据地的条件。并且由于这个条件，第四、第五、第六等条件也容易造成或发现。所以当敌人大举进攻红军时，红军总是从白区退却到根据地来，因为根据地的人民是最积极地援助红军反对白

军的。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也有区别；对于封锁消息、侦察、运输、参战等事，中心区的人民比较边缘区为好。所以“退却终点”，在过去江西反对第一、二、三次“围剿”时，都选在人民条件最好或较好的地区。根据地这个特点，使红军的作战比较一般的作战起了很大的变化，也是使后来敌人不得不采取堡垒主义的主要原因。

退却的军队能够选择自己所欲的有利阵地，使进攻的军队不得不就我范围，这是内线作战的一个优良条件。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但是单有这个条件还不够，还要求别的条件和它配合。首先是人民的条件。再则还要求好打的敌人，例如敌人疲劳了，或者发生了过失，或者该路前进的敌人比较地缺乏战斗力。这些条件不具备时，虽有优良阵地，也只得置之不顾，继续退却，以就自己所欲的条件。白区未尝无优良的阵地，但无优良的人民条件。如果其他条件也还未造成或未发现时，红军便不得不向根据地退却。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的分别，也大体是如此。

除地方部队和钳制兵力外，一切突击兵力以全部集中为原则。当着我们向战略上取守势的敌人进攻时，红军往往是分散的。一旦敌人大举向我进攻，红军就实行所谓“求心退却”。退却的终点，往往选在根据地中部；但有时也在前部，有时则在后部，依照情况来决定。这种求心退却，能够使全部红军主力完全集中起来。

弱军对于强军作战的再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拣弱的打。然而当敌人开始进攻时，我们往往不知敌之分进各军何部最强，何部次强，何部最弱，何部次弱，需要一个侦察的过程。往往需要许多时间，才能达此目的。战略退却的所以必要，这也是一个理由。

如果进攻之敌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我们要求强弱的对比发生变化，便只有等到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根据地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某旅参谋长所说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又如“围剿”军西路总司令陈铭枢所说的“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之时，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时候，敌军虽强，也大大减弱了；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此时双方对比，往往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或者敌军的绝对优势改变到相对优势，我军的绝对劣势改变到相对劣势，甚至有敌军劣于我军，而我军反优于敌军的事情。江西反对第三次“围剿”时，红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红军集中于根据地后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为当时的“围剿”军超过红军十倍以上。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

退却的最后一个要求，是造成和发现敌人的过失。须知任何高明的敌军指挥员，在相当长时间中，要不发生一点过失，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敌人会犯错误，正如我们自己有时也弄错，有时也授敌以可乘之隙一样。而且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要这样做，退却的终点，就不能限定于某一地区。有时退到该地区还无隙可乘，便不得不再退几步，待敌发生可乘之“隙”。

退却所求的有利条件，大致如上所述。然而不是说，须待这些条件完全具备方能举行反攻。要同时具备这些条件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必要。但依据敌人当前情势，争取若干必要条件，是以弱敌强的内线作战军队所应该注意的，在这上面的反对的意见是不正确的。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206—209页

反攻阶段中，问题是很多的，主要的如反攻开始问题、集中兵力问题、运动战问题、速决战问题、歼灭战问题等。

这些问题的原则，不论对于反攻说来，或对于进攻说来，在其基本性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反攻就是进攻。

然而反攻不完全是进攻。反攻原则，是在敌人进攻时应用的。进攻原则，是在敌人防御时应用的。在这个意义上，又都有若干的区别了。

因为这个理由，虽然这里把作战的许多问题统统说在战略防御的反攻部门中，而在战略进攻部门中只说些另外的问题，以避重复，但我们应用时，却不可忽略其相同点，也不可忽略其差异点。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216页

反攻开始问题，即所谓“初战”或“序战”问题。

许多资产阶级军事家都主张慎重初战，不论在战略防御或战略进攻皆然，而以防御为尤甚。我们过去，也曾经严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216页

第一次至第五次反“围剿”时期我军作战的经验，证明处在防御地位的红军，欲打破强大的“进剿”军，反攻的第一个战斗，关系非常之大。第一个战斗的胜败给予极大的影响于全

局，乃至一直影响到最后的一个战斗。因此得出下述的结论：

第一，必须打赢。必须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确有把握而后动手。否则宁可退让，持重待机。机会总是有的，不可率尔应战。……

第二，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的序幕。没有好的全战役计划，绝不能有真正好的第一仗。这就是说，即使初战打了一个胜仗，若这个仗不但于全战役有利，反而有害时，则这个仗虽胜也只算败了（例如第五次“围剿”时的洵口战斗）。因为在打第一仗之先，必须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后一仗大体上如何打法，我挨次的一仗胜了，敌军全局将起如何变化，假若败了，又将起如何变化。虽结果不见得乃至决不会尽如所期，然而必须依据双方全局，仔细地切实地想明白。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

第三，还要想到下一战略阶段的文章。若只顾反攻，不顾反攻胜利后，或万一反攻失败后，下文如何做，依然未尽得战略指导者的责任。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尽管往后变化难测，愈远看愈渺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估计前途的远景是必要的。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对于政治是不利的，对于战争也是不利的。走一步应该看那一步的具体变化，据此以修改或发展自己战略战役计划，不这样做，就会弄出冒险直冲的错误。然而贯通全战略阶段乃至几个战略阶段的、大体上想通了的、一个长时期的方针，是决不可少的。不这样做，就会弄出迟疑坐困的错误，实际上适合了敌人的战略要求，陷自己于被动地位。须知敌人的统帅部，是具有某种战略眼光的。我们只有使自己操练得高人一等，才有战略胜利的可能。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张

国煮路线的战略指导之所以错误，主要地就在于没有作到这一点。总之，退却阶段时必须计算到反攻阶段，反攻阶段时必须计算到进攻阶段，进攻阶段时又须计算到退却阶段。没有这种计算，束缚于眼前的利害，就是失败之道。

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这是反攻开始，即打第一仗时，不可忘记的三个原则。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20—222页

反攻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之间的过渡的东西，带着战略进攻前夜的性质，集中兵力就为达此目的。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24页

抗日战争当然没有什么战略进攻，只有战役反攻及战略反攻，是整个战略防御中积极的部分，靠此部分战胜日本，通俗地说，谓之进攻当然也是可以的。

《抗日战争没有战略进攻只有战役反攻及战略反攻》（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229页

4. 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

● 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

（五一）我们可以断言，持久战的抗日战争，将在人类战争史中表现为光荣的特殊的一页。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就是颇为特殊的一点，这是由于日本的野蛮和兵力不足，中国的进步和土地广大这些矛盾因素产生出来的。犬牙交错的战争，在历

史上也是有过的，俄国十月革命后的三年内战，就有过这种情形。但其在中国的特点，是其特殊的长期性和广大性，这将是突破历史纪录的东西。这种犬牙交错的形态，表现在下述的几种情况上。

（五二）内线和外线——抗日战争是整个处于内线作战的地位的；但是主力军和游击队的关系，则是主力军在内线，游击队在外线，形成夹攻敌人的奇观。各游击区的关系亦然。各个游击区都以自己为内线，而以其他各区为外线，又形成了很多夹攻敌人的火线。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战略上内线作战的正规军是后退的，但是战略上外线作战的游击队则将广泛地向着敌人后方大踏步前进，第二阶段将更加猛烈地前进，形成了后退和前进的奇异形态。

（五三）有后方和无后方——利用国家的总后方，而把作战线伸至敌人占领地之最后限界的，是主力军。脱离总后方，而把作战线伸至敌后的，是游击队。但在每一游击区中，仍自有其小规模的后方，并依以建立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这个区别的，是每一游击区派遣出去向该区敌后临时活动的游击队，他们不但没有后方，也没有作战线。“无后方的作战”，是新时代中领土广大、人民进步、有先进政党和先进军队的情况之下的革命战争的特点，没有可怕而有大利，不应怀疑而应提倡。

（五四）包围和反包围——从整个战争看来，由于敌之战略进攻和外线作战，我处战略防御和内线作战地位，无疑我是在敌之战略包围中。这是敌对于我之第一种包围。由于我以数量上优势的兵力，对于从战略上的外线分数路向我前进之敌，采取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作战方针，就可以把各路分进之敌的一路或几路放在我之包围中。这是我对于敌之第一种反包围。再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看来，每一孤立的根据地都处于敌之

四面或三面包围中，前者例如五台山，后者例如晋西北。这是敌对于我之第二种包围。但若将各个游击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并将各个游击根据地和正规军的阵地也联系起来看，我又把许多敌人都包围起来，例如在山西，我已三面包围了同蒲路（路之东西两侧及南端），四面包围了太原城；河北、山东等省也有许多这样的包围。这又是我对于敌之第二种反包围。这样，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的据点（例如太原）和我之游击根据地（例如五台山），好似做眼。如果把世界性的围棋也算在内，那就还有第三种敌我包围，这就是侵略阵线与和平阵线的关系。敌以前者来包围中、苏、法、捷等国，我以后者反包围德、日、意。但是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成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这几个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如果我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苏联及其他可能的国家也各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日本人民运动也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形成一个使法西斯孙悟空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那就是敌人死亡之时了。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完全打倒之日，必是这个天罗地网大体布成之时。这丝毫也不是笑话，而是战争的必然的趋势。

（五五）大块和小块——一种可能，是敌占地区将占中国本部之大半，而中国本部完整的区域只占一小半。这是一种情形。但是敌占大半中，除东三省等地外，实际只能占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依重要性说是一等的，依面积和人口来说可能只是敌占区中之小半，而普遍地发展的游击区，反居其大半。这又是一种情形。如果超越本部的范围，而把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算了进来，则在面积上中国未失地区仍然是大半，而敌占

地区包括东三省在内，也只是小半。这又是一种情形。完整区域当然是重要的，应集大力去经营，不但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文化方面也要紧。敌人已将我们过去的文化中心变为文化落后区域，而我们则要将过去的文化落后区域变为文化中心。同时，敌后广大游击区的经营也是非常之要紧的，也应把它们各方面发展起来，也应发展其文化工作。总起来看，中国将是大块的乡村变为进步和光明的地区，而小块的敌占区，尤其是大城市，将暂时地变为落后和黑暗的地区。

（五六）这样看来，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这个战争，不但将影响到中日两国，大大推动两国的进步，而且将影响到世界，推动各国首先是印度等被压迫民族的进步。全中国人都应自觉地投入这个犬牙交错的战争中去，这就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的战争形态，是半殖民地大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举行的解放战争的特殊形态。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71—474页

● 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

处于战略上内线作战的军队，特别是处于被“围剿”环境的红军，蒙受着许多的不利。但我们可以而且完全应该在战役或战斗上，把它改变过来。将敌军对我军的一个大“围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各别的小围剿。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分进合击，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分进合击。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

优势。将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使之在战役或战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变为战役上或战斗上的强者的地位。这即是所谓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224页

中国的国土有十七八个法国那样大，人口也有几个法国那样多，如果大部分中国土地被日本占领了（可能有此情况），我们还是想办法，因为我们有两个致敌人于死命的区域——内线与外线，这是两个作战的区域。内线便是云、贵、川、湘，大体上就是中央政府管辖的地方，外线便是日本所占领的大块土地的前方。我们一定要努力争取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途，改良政治军事条件，创造新中国的军队，配合着飞机大炮，内外夹攻，这样才能把鬼子赶出全中国。

《对陕北公学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一九三八年三月三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06页

从整个抗日战争看来，由于敌之战略进攻和外线作战，我处战略防御和内线作战地位，无疑我是处在敌之战略包围中。这是敌对于我的第一种包围。由于我以数量上优势的兵力，对于从外线分数路向我前进之敌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和外线作战的方针，就使各个分进之敌的每一个处于我之包围中。这是我对于敌的第一种包围。再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看来，每一

孤立的根据地都处于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中，前者例如五台山地区，后者例如晋西北地区。这是敌对于我的第二种包围。但若将各个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并将各个游击战争根据地和正规军的战线联系起来看，我又把许多敌人都包围起来。例如在山西，我已三面包围了同蒲路（路之东西两侧及南端），四面包围了太原城；在河北、山东等省，亦有许多这样的包围。这是我对于敌的第二种包围。由是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要性。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26—427页

在反围攻的作战计划中，我之主力一般是位于内线的。但在兵力优裕的条件下，使用次要力量（例如县和区的游击队，以至从主力中分出一部分）于外线，在那里破坏敌之交通，钳制敌之增援部队，是必要的。如果敌在根据地内久踞不去，我可以倒置地使用上述方法，即以一部留在根据地内围困该敌，而用主力进攻敌所从来之一带地方，在那里大肆活动，引致久踞之敌撤退出去打我主力；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29页

- 将内线作战转变为外线作战

除了战役战斗计划力争集中兵力和运动战等等条件、务期

在内线（在根据地）消灭敌之有生力量、迅速解决“围剿”以外，当“围剿”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堡垒主义发达的今日，这种手段将要成为经常的作战手段。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236页

我们已令刘邓缩短内线作战时间至四月底为止，准备五月开始（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向中原出动转变为外线作战。华东方面亦请按此计划办理，努力争取于五一以前在内线解决蒋军主力，并完成外线作战的一切准备条件（弹药、新兵、干部、经费等）。

《准备于五月开始转为外线作战》（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毛

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638页

(三) 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

(四) 我军执行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方针，当然要遇到许多困难。因为到国民党区域创立新根据地需要时间，需要在多次往返机动的作战中大量歼灭敌人、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建立人民武装之后，方能创立巩固的根据地。在这以前，困难将是不少的。但是，这种困难能够克服和必须克服。因为敌人将被迫更加分散，有广大地区作为我军机动作战的战场，可以求得运动战；那里的广大民众是痛恨国民党拥护我军的；虽然部分敌军仍然有较强的战斗力，但一般地敌军士气比一年前低落得多，其战斗力比一年前削弱得多了。

(五) 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在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在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只要这两点做到了，我们就胜利了。

《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30—1231页

(七) 游击战、运动战和阵地战

1. 游击战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我们的工农民主共和国是一个国家，但是今天还是一个不

完全的国家。今天我们还处在内战的战略防御时期，我们的政权距离一个完全的国家形态还很远，我们军队的数量和技术较之敌人还差得远，我们的领土还很小，我们的敌人时时刻刻想要消灭我们才快活。从这个上面规定我们的方针，不是一般地反对游击主义，而是老实地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在这里怕羞是没有用的。相反，游击性正是我们的特点，正是我们的长处，正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工具。我们应该准备抛弃游击性，但是今天还不能抛弃。游击性在将来一定是可羞的和必须抛弃的东西，但在今天却是宝贵的和必须坚持的东西。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230页

甲、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惟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

乙、除山西部署已告外，应令河北党注全力于游击战争，借着红军抗战的声威，发动全华北党（包括山东在内）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地但是有计划地组成游击队。为此目的，周是否应与冯治安、黄绍竑等再谈一次，请酌。

丙、为此目的，应着重于高级干部之分配及独立领导的党政军集体机关之组织。要设想在敌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要告诉全党（要发动党内党外），今后没有别的工作，惟一的的就是游击战争。为此目的，红军应给予一切可能的助力。

《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惟一方向》（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3页

太原失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

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则附于八路军，这是华北总的形势。

《太原失守后华北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111页

八路军现在共在四个区域中进行广大的游击战。第一个区域是平汉、平绥、正太、同蒲四铁路中间及其以东以北的地域。这地域拥有坚决反日的一千二百万民众，都与军队密切结合着，这是一个极大的抗战的堡垒。八路军在这里已经立稳了脚跟，虽然敌人正在加紧进攻这个区域，但要驱逐他们是不可能的，歼灭更不可能。八路军的几个大的东进支队已迫近津浦线。第二个区域是平绥以南、同蒲北段以西和黄河以东的晋西北地带。第三个区域是平汉、正太、同蒲中间的晋东南、冀西南地带。第四个区域是晋西南。他们都与地方人民有密切的联系，都随时猛烈地破坏敌人的后方联络线，有了很多大小的胜利，使敌人大减其前进的力量。从这些区域看来，中国失去的不过是几条铁路及若干城市而已，其他并没有失掉。这一实例给全国以具体的证明：只要到处采用这种办法，敌人是无法灭亡中国的。这是将来举行反攻收复失地的有力基础之一。

《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一九三八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01页

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不像苏联，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

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由于中国的进步，就是说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等一全套的东西都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随之也是残酷性，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等也发生了。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又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中，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这件事是同时代进步到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一事分不开的，是同共产党和红军的存在分不开的，这乃是问题的焦点所在。我们的敌人大概还在那里做元朝灭宋、清朝灭明、英占北美和印度、拉丁系国家占中南美等等的好梦。这等梦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现实的价值，因为今天的中国比之上述历史多了一些东西，颇为新鲜的游击战争就是其中的一点。假如我们的敌人少估计了这一点，他们就一定要在这一点上面触一个很大的霉头。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05页

游击战争发展的规模越大，其根据地所处的位置越重要，威胁敌人的战略基地和交通要道越大，敌人对于游击战争及其根据地的进攻也将会越厉害。所以，凡属敌人进攻游击战争越厉害之处，就证明那里的游击战争越有成绩，对于正规战争的配合也就越有作用。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28页

抗日战争三个战略阶段的作战形式，第一阶段，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和阵地战是辅助的。第二阶段，则游击战将升到主要地位，而以运动战和阵地战辅助之。第三阶段，运动战再升为主要形式，而辅之以阵地战和游击战。但这个第三阶段的运动战，已不全是由原来的正规军负担，而将由原来的游击军从游击战提高到运动战去担负其一部分，也许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从三个阶段来看，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为此缘故，在全国的数百万正规军中间，至少指定数十万人，分散于所有一切敌占地区，发动和配合民众武装，从事游击战争，是完全必要的。被指定的军队，要自觉地负担这种神圣任务，不要以为少打大仗，一时显得不像民族英雄，降低了资格，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游击战争没有正规战争那样迅速的成效和显赫的名声，但是“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在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中，游击战争将表现其很大的威力，实在是非同小可的事业。并且正规军分散作游击战，集合起来又可作运动战，八路军就是这样做的。八路军的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反对这个方针的人们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99—500页

在抗日战争的全体上说来，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因为抗日战争的最后命运，只有正规战争才能解决。就全国来说，在抗日战争全过程的三个战略阶段（防御、相持、反攻）中，首尾两阶段，都是正规战争为主，辅之以游击战争。中间阶段，由于敌人保守占领地、我虽准备反攻但尚不能实行

反攻的情况，游击战争将表现为主要形态，而辅之以正规战；但这在全战争中只是三个阶段中的一个阶段，虽然其时间可能最长。故在全体上说来，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不认识这一情况，不懂得正规战争是解决战争最后命运的关键，不注意正规军的建设和正规战的研究和指导，就不能战胜日本。这是一方面。

但游击战争是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的。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原因是大半个中国将变为敌人的后方，如果没有最广大的和最坚持的游击战争，而使敌人安稳坐占，毫无后顾之忧，则我正面主力损伤必大，敌之进攻必更猖狂，相持局面难以出现，继续抗战可能动摇，即若不然，则我反攻力量准备不足，反攻之时没有呼应，敌之消耗可能取得补偿等等不利情况，也都要发生。假如这些情况出现，而不及及时地发展广大的和坚持的游击战争去克服它，要战胜日本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游击战争虽在战争全体上居于辅助地位，但实占据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抗日而忽视游击战争，无疑是非常错误的。这是又一方面。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52—553页

由此可以懂得，我们党的军事战略方针，由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转变为抗日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是何等重要和必要的了。综合其利，有如下十八项：（一）缩小敌军的占领地；（二）扩大我军的根据地；（三）防御阶段，配合正面作战，拖住敌人；（四）相持阶段，坚持敌后根据地，利于正面整军；（五）反攻阶段，配合正面，恢复失地；（六）最迅速最有效地

扩大军队；（七）最普遍地发展共产党，每个农村都可组织支部；（八）最普遍地发展民众运动，全体敌后人民，除了敌人的据点以外，都可组织起来；（九）最普遍地建立抗日的民主政权；（十）最普遍地发展抗日的文化教育；（十一）最普遍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十二）最便于瓦解敌人的军队；（十三）最普遍最持久地影响全国的人心，振奋全国的士气；（十四）最普遍地推动友军友党进步；（十五）适合敌强我弱条件，使自己少受损失，多打胜仗；（十六）适合敌小我大的条件，使敌人多受损失，少打胜仗；（十七）最迅速最有效地创造出大批的领导干部；（十八）最便于解决给养问题。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53页

你们不要看轻这“游击战争”四个字，这是我们十八年艰苦奋斗中得来的法宝。

对陕北公学赴华北抗日前线同学的讲话（一九三九年七月九日），《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130页

游击战争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

《〈共产党人〉发刊词》（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09页

一九三六年我们在全国的军队，包括南方游击队，仅有三万人，到一九三七年增加了一点，也不多。那时候我们的任务是增加力量，长大起来。加一个指头，又加一个指头，再加一个指头，使它长大起来。怎样长法？靠打麻雀战，打游击战。麻

雀满天飞，哪里有东西吃，就飞到哪里去。六中全会时我们特意为游击战列出十八条好处，这个方法好的，八年来证明了这一点。满天的麻雀就是种子，可以发很多芽。有了这个种子之后，党建立了，政权建立了，根据地有了，老百姓有了，饭也有得吃了，干部也锻炼出来了。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30页

2. 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和方针

游击战争对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有很大的战略上的作用。其指导原则应如下：

1. 一切游击队以民族战争的面目出现（日本占领区、自治区及其附近省分称中华抗日义勇军。其他地区——华中、华南，称中华抗日游击队，在这些地方——华中、华南游击队壮大起来时，称中华抗日人民革命军）。土地革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与策略之下执行。

2. 在一切省分发展游击战争，而着重于主要的省分（河北，山西，热察绥，东三省，山东，河南，江苏，浙江，福建，陕甘）。在大江南北原有苏区变为游击区域的地方，使之从恢复形势迅速地提高到发展形势。

3. 地方党对于游击战争，在白区是惟一的指导者，在苏区是主要指导者。

4. 大量地吸引卷入反日浪潮中的白军士兵与青年学生到游击战争中去。

5. 游击队应有根据地，但反对保守主义（这容易给游击队以损害）。

6. 游击队同当地革命民众密切地结合起来。
7. 提高游击战术。
8. 使游击队变为正规的革命军。
9. 游击队是苏区的创造者。
10. 使游击战争增加计划性。

《关于战略方针和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77—378页

关于红军作战，依当前敌我情况，我们认为须坚持下列两原则：

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

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

《关于红军作战的原则》（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页

在晋、在冀、在京，均着重解释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个基本原则，取得他们的彻底了解与同意。

此原则中包含：（一）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现在蒋鼎文还在说刘师应速上前线。彼等用意，或者不明白使用大兵团于一个狭小地域实不便于进行游击战争，如果是这样，可见我们对此原则并未向他们有过彻底坚持的说明；或者他们含有恶意，即企图迫使红军打硬仗。（二）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如不

弄清这一点，必将发生无穷纠葛，而红军之伟大作用决不能发挥。（三）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四）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

《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解释》（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二日），
《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1页

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惟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照样再做。

《关于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9—20页

总的说来，主要的方针有下列各项：（一）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二）和正规战争相配合；（三）建立根据地；（四）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五）向运动战发展；（六）正确的指挥关系。这六项，是全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是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07页

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指挥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是游击战争顺利发展的条件之一。

游击战争的指挥方法，由于游击部队是低级的武装组织和分散行动的特性，不容许高度的集中主义，如同正规战争的指挥方法那样。如果企图拿正规战争的指挥方法施之于游击战争，必然地要束缚游击战争的高度活泼性，而使游击战争毫无生气。高度的集中指挥和游击战争的高度活泼性是正相反对的东西；对于这种高度活泼的游击战争，施之以高度集中的指挥制度，不但不应该，而且不可能。

然而游击战争不是不要任何的集中指挥就能够顺利地发展的。在有广大的正规战争，同时又有广大的游击战争存在的情况之下，使二者适当地配合行动是必要的，这里就需要对于正规战争和游击战争配合行动的指挥，这就是国家参谋部和战区司令官关于战略作战的统一指挥。在一个游击区或游击根据地里面，那里存在着多数的游击队，其中往往有一个至数个作为主力的游击兵团（有时还有正规兵团）和许多作为辅助力量的大小游击部队，还有不脱离生产的广大的人民武装，那里的敌人也往往成为一个局面，统一地对付游击战争。因此，就在这种游击区或根据地里面，发生了统一指挥，即集中指挥的问题。

由此，游击战争的指挥原则，一方面反对绝对的集中主义，同时又反对绝对的分散主义，应该是战略的集中指挥和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

战略的集中指挥，包括国家对于整个游击战争的部署，各个战区里面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的配合行动以及每个游击区或根据地里面对于全区抗日武装的统一指导。在这些上面的不协调、不统一、不集中，是有害的，应该尽可能地求得其协调、统

一和集中。凡关于一般事项，即战略性质的事项，下级必须报告上级，并接受上级的指导，以收协同动作之效。然而集中到此为止，过此限度，干涉到下级的具体事项，例如战役战斗的具体部署等等，同样是有害的。因为这些具体事项，必须按照随时变化随地不同的具体情况去做，而这些具体情况，是离得很远的上级机关无从知道的。这就是战役和战斗的分散指挥原则。这个原则也一般地通用于正规战争的作战，特别是在通讯工具不完备的情况下。一句话，就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34—436页

新阶段中，正面防御的是主力军，敌后游击战争将暂时变为主要的形式。但敌后游击战争在敌我相持的新阶段中，将采取一种新形势发展着。什么是游击战争的新形势呢？即第一、在广大地区中仍能广泛的发展。这是因为在我则土地广大，在敌则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只要我能坚持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并正确地指导之，敌要根本限制我之发展是不可能的。但第二、在某些重要战略地区，例如华北与长江下流一带，势将遇到敌人残酷的进攻，平原地带将难于保存大的兵团，山地将成为主要的根据地，某些地区的游击部队可能暂时地缩小其数量，现在就应准备这一形势的到来。在现在，为了策应正面主力军的战斗，为了准备转入新阶段，应把敌后游击战争大体分为两种地区。一种是游击战争充分发展了的地区如华北，主要方针是巩固已经建立了的基础，以准备新阶段中能够战胜敌之残酷进攻，坚持根据地。又一种是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或正开始发展的地区，如华中一带，主要方针是迅速地发展游击战争，以免

敌人回师时游击战争发展的困难。在将来，为了配合正面防御使主力军得到休息整理机会，为了生长力量准备战略反攻，必须用尽一切努力坚持保卫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在长期坚持中，把游击部队锻炼成为一支生力军，拖住敌人，协助正面。一般说来，新阶段中敌后游击战争是比较前一阶段要困难得多的，我们必须预先看到这种困难，承认这种困难，不可因为前一阶段的发展容易而冲昏了头脑，因为敌人一定要转过去进攻游击战争。然而能够坚持的，一切敌后工作的领导人们必须要有这种自信心。因为民族战争中的游击战争，不论敌人如何的强，总比内战时的条件优良得多。在这里，争取与瓦解伪军以孤立日寇，是非常重要的任务。

《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99—400页

3. 游击战的战术原则——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展是一天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力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来都用这种战术。在湘赣边界时，大概集中兵力一度击溃敌人之后，可以散开工作两三星期（分数大支出去，每大支又

分数小支出去),及至敌人再整军来,我们又集中起来了,再击溃敌人,再分散工作。

《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56页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为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写的对联(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下旬),《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第329页

红四方面军目前应采取相当的诱敌深入到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形便于我们的地方,掩蔽我主力目标,严格地执行群众的坚壁清野,运用广大的游击队,实行四面八方之扰敌、截敌、袭敌与断绝交通等等动作,以疲劳与分散敌人力量,而不宜死守某一点,以便利敌之分进合击。这样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一点后,迅速转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

《对红四方面军粉碎第四次“围剿”的建议》(一九三二年九月中旬),《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286页

我们的战争是从一九二七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失败了,秋收起义在湘鄂赣边界地区的部队,也打了几个败仗,转移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第二年四月,南昌起义失败后保存的部队,经过湘南也转到了井冈山。然而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个十六字诀的军

事原则，立三路线以前的中央是承认了的。后来我们的作战原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这时是军事原则的新发展阶段，内容大大丰富起来，形式也有了许多改变，主要地是超越了从前的朴素性，然而基本的原则，仍然是那个十六字诀。十六字诀包举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发展罢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204—205页

我搞过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的宣传工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也讲过打仗的重要，可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要去打仗。后来自己带人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先打了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大败仗。于是总结经验，总结了十六个字的打游击的经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关于人的认识问题》（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
第8卷第392—393页

4. 游击战的基本作战形式——袭击

游击战争不能一刻离开民众，这是最基本的原则。讲到战术，则游击战争的基本作战形式不是别的，乃是袭击。袭击是攻击的一种，游击战争不注重正规的阵地攻击这种形式，而注重突然袭击或奇袭的这种形式，这是因为游击战争是战略上

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非如此不能达到目的。

《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74页

游击战争袭击战术的要领，一般地可以举出如下十二条：

第一，袭击的基本原则，就是要有秘密而周详的计划，迅速而突然的动作。

第二，游击战争袭击的目的，总的方面，在于消灭小敌，削弱大敌，扰乱敌之侧翼与后方，配合游击部队之政治工作，破坏敌之政权，唤起民众起来抗敌，保持或恢复抗日政权，由此以创造抗日战争的游击根据地，配合正规军作战，因缴获武装使游击队逐渐发展成为抗日的正规军。至于袭击的具体目的，则在各个消灭敌之小部队，扰乱敌之大部队，消灭敌之民团，破坏敌之后方机关，破坏敌之交通路等等。

第三，袭击要选择有利于袭击的条件。无此条件或条件不足时则须注意造成之。……

第四，袭击前之侦察，这是首先重要的。……

第五，袭击的时间问题。……

第六，必须保持袭击计划的秘密。……

第七，袭击部队的开进。……

第八，到达袭击目的地以后的动作。……

第九，冲锋动作：……

第十，袭击后的动作：……

第十一，袭击堡垒、寨子、土围子及城市。……

第十二，扰乱或钳制敌人。……

《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74—81页

上述十二条虽然说到了一般袭击战术的原则，然而主要地是说的袭击驻止之敌。游击战争取得最大胜利的时机，还以袭击正在行动中的敌人为多，所以游击队不应放弃一切当着正在行动而又条件适合的敌人的袭击机会。这种袭击按其性质都是遭遇战，但分埋伏与急袭两种。埋伏是预期遭遇的性质，但采取埋伏的形式。急袭是不预期遭遇而发生的，采取急袭的形式。前者是游击队重要的战术，故说明较详。后者是偶然情况，故只略为述及之。

第一，埋伏即伏击，是游击队有计划地隐蔽配置于敌人必经道路的一旁或两旁，待敌通过时而突然袭击之。……

第二，根据敌人战术、部队素质及地形等各种不同条件，埋伏可以采取一侧埋伏，两侧埋伏，多面埋伏或重层埋伏等几种方法。

第三，埋伏的目的在于：……

第四，埋伏，首先要求明了情况。……

第五，伏击地区的选择。……

第六，埋伏部队的开进：……

第七，伏击实施：……

第八，战斗成功，立即集合部队，处置俘虏，收集战利品及伤员，以便迅速撤去。……

第九，伏击不可能或不成功时的处置：……

第十，扰乱。……

第十一，伏击敌人单个或少数的传令兵、采买、侦探等，则是游击小组或游击队所派出的便衣侦察员的任务。……

第十二，伏击骑兵：……

第十三，伏击汽车：……

第十四，伏击火车：……

第十五，伏击船舶：……

第十六，伏击敌人征发队：……

第十七，伏击敌人运输队：……

第十八，急袭：这是处置不预期遭遇的方法。……

以上十八条都是袭击行动敌人的方法，抗日游击部队应该加以研究。

《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81—87页

游击战争是一般地用袭击的形式表现其进攻的。正规战争虽然也应该而且能够采用袭击战，但是其出敌不意的程度比较小一些。在游击战，速决性的要求是很大的，战役和战斗中包围敌人的外线圈则很小。这些都是和正规战不同的地方。

由此可知，游击队的作战，要求集中可能多的兵力，采取秘密和神速的行动，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很快地解决战斗；而要力戒消极防御，力戒拖延，并力戒临战分散兵力。当然，游击战争中不但战略上有防御，战术上也是有防御的；战斗时的钳制和警戒方面，隘路、险地、河川或村落等处为着消耗敌人和疲惫敌人的抵抗配置，退却时的掩护部队等等，都是游击战争中战术上的防御部分。然而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必须是进攻的，和正规战争比较起来，其进攻性更加大些，而且这种进攻必须是奇袭，大摇大摆大吹大擂地暴露自己，是较之正规战更加不能许可的。游击战争虽然也有坚持数天的战斗场合，例如攻击某个孤立无援的小敌，但一般的作战较之正规战更加要求迅速地解决战斗，这是被敌强我弱的情况规定的了。游击战争本来是分散的，所以成其为普遍的游击战，且在许多任务，例如扰乱、钳制、破坏和做群众工作等，都以分散兵力

为原则；然而就一个游击部队或游击兵团，当着执行消灭敌人的任务，尤其是为着打破敌人的进攻而努力时，就仍须集中其主要的兵力。“集中大力，打敌小部”，仍然是游击战争战场作战的原则之一。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08—409页

在敌人数路围攻的情况之下，游击战争的方针是打破这种围攻，采取反围攻的形态。在敌数路前进，但每路只有一个或大或小的部队，没有后续部队，不能沿途配置兵力、构筑堡垒、修筑汽车路的情况之下，这种围攻是容易打破的。这时，敌是进攻和外线作战，我是防御和内线作战。我之部署应是以次要兵力钳制敌之数路，而以主要兵力对付敌之一路，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袭击战法（主要的是埋伏战），于敌行动中打击之。敌人虽强，经过多次的袭击，也就削弱下来，往往中途撤退，此时游击队又可于追击敌人时继续袭击，再行削弱他。当敌人还没有停止进攻或实行退却之时，总是占据根据地内的县城或市镇，我便应包围这种县城或市镇，断绝其粮食来源和交通联络，等到敌人无法支持向后退走时，我便乘机追击之。一路打破之后，又转移兵力去打破敌之另一路，这样各个地击破敌之围攻。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28—429页

5. 运动战是转换战争全局取得最后胜利的主要作战形式

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

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在地理上，战场这样广大，我们作最有效的运动战，是可能的。日军遇到我军的猛烈活动，必得谨慎。他们的战争机构很笨重，行动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犯阿比西尼亚的错误。战争的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要先用运动战逐渐地破坏敌人军队的精神和战斗力。

《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一九三六年七月、九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05页

运动战，还是阵地战？我们的答复是：运动战。在没有广大兵力，没有弹药补充，每一个根据地打来打去仅只有一支红军的条件下，阵地战对于我们是基本上无用的。阵地战，对于我们，不但防御时基本地不能用它，就是进攻时也同样不能用。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28页

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这和我们过去在国内战争时采用的战法，基本原则是相同的，但亦有某些区别。拿现时这一阶段的情况来讲，集中使用兵力之时较少，分散使用兵力之时较多，这是为着便于在广大地域袭击敌人翼侧和后方。若在全国军队，因其数量广大，

应以一部守正面及以另一部分散进行游击战，主力也应经常集中地使用于敌之翼侧。军事上的第一要义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采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避免一切被动的呆板的战法。如果大量军队采用运动战，而八路军则用游击战以辅助之，则胜利之券，必操我手。

《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78—379页

根据过去七个月作战的经验，在军事上我们若能运用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方式互相配合，必能使敌军处于极困难地位。

《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一九三八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00页

作为战争内容的战略内线、战略持久、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在战争形式上就表现为运动战。运动战，就是正规兵团在长的战线和大的战区上面，从事于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形式。同时，也把为了便于执行这种进攻战而在某些必要时机执行着的所谓“运动性的防御”包括在内，并且也把起辅助作用的阵地攻击和阵地防御包括在内。它的特点是：正规兵团，战役和战斗的优势兵力，进攻性和流动性。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97页

中国版图广大，兵员众多，但军队的技术和教养不足；敌人则兵力不足，但技术和教养比较优良。在此种情形下，无疑地应以进攻的运动战为主要的作战形式，而以其他形式辅助之，

组成整个的运动战。在这里，要反对所谓“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同时也要反对所谓“有进无退”的拼命主义。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97页

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此点，应使全党和全解放区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准备。

《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87页

6. 运动战的基本特点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由于敌人强大和红军技术贫弱所发生的红军作战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没有固定的作战线。

红军的作战线，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作战方向不固定，影响到作战线不固定。大方向虽在一个时期中是不变更的，然而大方向内的小方向则是随时变更的，一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转到另一个方向去。一个时期之后大方向也受了限制，就连这种大方向也得变更了。

革命的内战时期，作战线不能固定，就在苏联也有过这种情形。苏联军队和我们的军队不同的地方，在于其不固定的程度不如我们之甚。一切战争也不能有绝对固定的作战线，胜负进退的变化不许可如此。但是相对固定的作战线往往见之于一般的战争。惟独敌我强弱悬殊像处在目前阶段的中国红军这样

的军队，则是例外。

作战线的不固定，影响到根据地领土的不固定。时大时小时缩时伸是经常的，此起彼落也往往发生。这种领土的流动性，完全是来源于战争的流动性。

战争和领土的流动性，影响到根据地各种建设工作也发生流动性。若干年月的建设计划是不能设想的。计划改变的频繁，是我们家常便饭的事情。

承认这种特点，对于我们是有利益的。从这个特点出发，规定我们的日程，不要幻想有进无退的战争，不要震惊于领土和军事后方的暂时的流动，不要企图建立长时期的具体计划。把我们的思想、工作适应于情况，准备坐下，又准备走路，不要把干粮袋丢掉了。只有在现在的流动生活中努力，才能争取将来的比较地不流动，才能争取最后的稳定。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228—229页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天下也没有只承认打不承认走的军事家，不过不如我们走得这么厉害罢了。对于我们，走路的时间通常多于作战的时间，平均每月打得一个大仗就算是好的。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然而在我们面前有几种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有时不好打；第三，一般地说来，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继续打。以上这些时候，我们都是准备走的。这样的走是许可的，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承认必须的走，是在首先承认

必须的打的条件之下。红军的运动战的基本特点，就在这里。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230页

（九三）运动战的特点之一，是其流动性，不但许可而且要求野战军的大踏步的前进和后退。然而，这和韩复榘式的逃跑主义是没有相同之点的。战争的基本要求是：消灭敌人；其另一要求是：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的最有效的手段。因此，运动战决不能被韩复榘一类人所借口，决不是只有向后的运动，没有向前的运动；这样的“运动”，否定了运动战的基本的进攻性，实行的结果，中国虽大，也是要被“运动”掉的。

（九四）然而另一种思想也是不对的，即所谓有进无退的拼命主义。我们主张以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为内容的运动战，其中包括了辅助作用的阵地战，又包括了“运动性的防御”和退却，没有这些，运动战便不能充分地执行。拼命主义是军事上的近视眼，其根源常是惧怕丧失土地。拼命主义者不知道运动战的特点之一是其流动性，不但许可而且要求野战军的大踏步的进退。积极方面，为了陷敌于不利而利于我之作战，常常要求敌人在运动中，并要求有利于我之许多条件，例如有利的地形、好打的敌情、能封锁消息的居民、敌人的疲劳和不意等。这就要求敌人的前进，虽暂时地丧失部分土地而不惜。因为暂时地部分地丧失土地，是全部地永久地保存土地和恢复土地的代价。消极方面，凡被迫处于不利地位，根本上危及军力的保存时，应该勇敢地退却，以便保存军力，在新的时机中再行打击敌人。拼命主义者不知此理，明明已处于确定了的不利情况，还要争一城一地的得失，结果不但城和地俱失，

军力也不能保存。我们历来主张“诱敌深入”，就是因为这是战略防御中弱军对强军作战的最有效的军事政策。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97—498页

打仗没有什么巧妙，简单说就是两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得赢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集中五个指头割他一个指头。割掉一个，他就少一个，事物是可以分割的，以后有机会又可以割一个，又少一个，只剩八个了，然后有机会再割一个，总之要割掉。所谓割掉指头，就是把敌人搞过来，除打死打伤之外，把官兵、枪枝、弹药都夺取过来，这就叫打得赢就打。那么打不赢呢？就走，走得远一点，使敌人不知你到哪里去了。

《革命单搞军事不行》（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97页

敌人越凶越不要怕它。蒋介石过去不凶？美国不凶？具体到每个战斗的打法就不同了，就要重视它。军队无非是要学会两个东西，一个是会打，一个是会走。会打、会走，军队都要学会。打就吃它一口，吃不了大的吃小的，吃了一口再吃一口。

《对部队军事训练的若干指示》（一九六四年六月、七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99页

7. 运动战的打法：分割包围，各个歼灭；调动敌人，寻机攻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运动战的实行方面，问题是很多的，例如侦察、判断、决

心、战斗部署、指挥、荫蔽、集中、开进、展开、攻击、追击、袭击、阵地攻击、阵地防御、遭遇战、退却、夜战、特种战斗、避强打弱、围城打援、佯攻、防空、处在几个敌人之间、超越敌人作战、连续作战、无后方作战、养精蓄锐之必要等等。这些问题在红军战史中都表现了许多的特点，战役学中应当有条理地叙述到，应当给以总结，……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33页

必须灵活使用化整为零、化零为整之策略，必须善于欺骗敌人，诱其分散，各个击破之。

《在鄂西鄂北豫南灵活作战建立根据地》（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66页

围城打援是歼灭敌人重要方法之一。利用结冰时期有计划地发动进攻，普遍寻找敌之薄弱据点，采用围城打援方法，大量歼敌，转变敌我形势，甚为必要。

《围城打援是歼敌的重要方法之一》（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612页

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力争主动，避免被动。

《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力争主动》（一九四七年二月六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658页

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我军主力不急于北上打榆林，也不急于南下打敌后路。应向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说明，我军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

必经之路。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

《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22—1223页

你们现已取得主动权,如敌南援,你们不去理他,仍然集中全力完成正太战役,使敌完全陷入被动,这是很正确的方针。正太战役完成后,应完全不被敌之动作所迷惑,选择敌之薄弱部分主动地歼击之,选击何部那时再定。这即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作战政策。

《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我的我打我的》(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35页

每次作战计划,以歼灭孤立分散之敌为主,必须对敌方增援有充分之事先准备,但不要将计划重心放在打增援上。因在目前情况下,敌方往往畏惧增援,若决心增援,又往往集中兵力使我不易歼击。

《每战应以歼灭孤立分散之敌为主》(一九四七年七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56页

四路分兵打敌后路,对于敌之主力完全置之不理,是因为正面之敌极端集中,没有好打机会,故应采取先打弱敌,后打强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方针,完全主动作战,将敌抛入被动地位。而在目前情况下,此项方针是可能收效的。

《目前应采取四路分兵各打各的方针》(一九四七年七月四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27页

有三点请你们斟酌：（一）鉴于二万五千里长征时期休息太少，疲劳太甚，减员太多，而那种性急有许多是不必要的；此次我军南进，必须减少不必要的性急，力争少走路、多休息，情况紧张时应当走几天长的，但应跟着休息几天，恢复疲劳。（二）在目前几个星期内，必须避免打大仗，专打分散薄弱之敌，不打集中强大之敌，待我军习惯于无后方外线行动，养精蓄锐，又在有利于我之敌情、地形条件下，方可考虑打大仗。（三）不要希望短期内就能在大别山、豫西、皖西等地建立巩固根据地，这是不可能的，这些都只能是临时立足点。必须估计到我军要有很长时间（至少半年）在江河之间东西南北地区往来机动，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并在歼灭敌人几十个旅之后，方能建立巩固根据地。

《对我军南进的三点意见》（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86页

如敌集结一点不能歼灭，请考虑以一部监视正面，全军主力转至敌后，向三边方向前进数十里至百余里，迫敌后撤回救，然后于运动中歼灭之。

《对集结之敌的打法》（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29页

在整个中原形势下，打运动战的机会是很多的。但要有耐心，要多方调动敌人，方能创造机会。最近时间内，陈唐需要协助刘邓作战。只要刘邓能打一二个好仗，局势就会开始起变化。因此你们到达适当地区后，不是休息三天，而是休息半月左右，全军精心研究技术战术，养精蓄锐。即使有打小仗的机会，主力也不要去打。等候刘邓对张轸作战完全结束，陈唐

到达陇海汴徐线附近，并休息若干天恢复疲劳之后，再采取调动敌人之行动，于运动中歼灭敌人。在打五军、七十五师等部时，不要企图一次打得太多，而要准备一次只打一两个旅，各个歼灭该敌，因为该敌是比较强的。要说服干部不要急于求赫赫之名，急于解决大问题，而要坚忍沉着，随时保持主动。

《多方调动敌人，创造歼敌机会》（一九四八年六月三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02页

8. 基本的是运动战，不拒绝必要和可能的阵地战

基本的是运动战，并不是拒绝必要的和可能的阵地战。战略防御时，我们钳制方面某些支点的固守，战略进攻时遇着孤立无援之敌，都是应该承认用阵地战去对付的。采取这样的阵地战制胜敌人的经验，我们过去已经不少；很多的城市、堡垒、寨子，被我们打开，某种程度的敌人野战阵地被我们突破。以后还要增加这一方面的努力，补足我们这一方面的弱点。我们完全应该提倡那种在情况需要而且许可下的阵地攻击和阵地防御。我们所反对的，仅仅是在今天采取一般的阵地战，或者把阵地战和运动战平等看待，这些才是不能许可的。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30—231页

阵地战，由于我们技术不足，在目前不应看作主要方式。但我们必须建设国防工业，自制重武器与高武器，同时设法输入这些武器，以便能有力地进行防御的与攻击的阵地战，这是非常必要的。有人说，我们只主张游击战，这是乱说的，我们从来就主张

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者的配合。在目前以运动战为主,以其他二者为辅,在将来要使阵地战能够有力地配合运动战。

《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一九三八年二月),《毛泽东文集》

第2卷第100页

第三阶段是持久战的最后阶段,所谓坚持战争到底,就是要走完这个阶段的全程。这个阶段我所采取的主要的战争形式仍将是运动战,但是阵地战将提到重要地位。如果说,第一阶段的阵地防御,由于当时的条件,不能看作重要的,那末,第三阶段的阵地攻击,由于条件的改变和任务的需要,将变成颇为重要的。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

466页

防御的和攻击的阵地战,在中国今天的技术条件下,一般都不能执行,这也就是我们表现弱的地方。再则敌人又利用中国土地广大一点,回避我们的阵地设施。因此阵地战就不能用为重要手段,更不待说用为主要手段。然而在战争的第一第二两阶段中,包括于运动战范围,而在战役作战上起其辅助作用的局部的阵地战,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为着节节抵抗以求消耗敌人和争取余裕时间之目的,而采取半阵地性的所谓“运动性的防御”,更是属于运动战的必要部分。中国须努力增加新式武器,以便在战略反攻阶段中能够充分地执行阵地攻击的任务。战略反攻阶段,无疑地将提高阵地战的地位,因为那时敌人将坚守阵地,没有我之有力的阵地攻击以配合运动战,将不能达到收复失地之目的。虽然如此,第三阶段中,我们仍须力争以运动战为战争的主要形式。因为战争的领导艺术和人的活跃性,临

到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期以后西欧地区那样的阵地战，就死了一大半。然而在广大版图的中国境内作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方面又还保存着技术贫弱这种情况，“把战争从壕沟里解放”的事，就自然出现。就在第三阶段，中国技术条件虽已增进，但仍不见得能够超过敌人，这样也就被逼着非努力讲求高度的运动战，不能达到最后胜利之目的。这样，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将不会以阵地战为主要形式，主要和重要的形式是运动战和游击战。在这些战争形式中，战争的领导艺术和人的活跃性能够得到充分地发挥的机会，这又是我们不幸中的幸事啊！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00—501页

必须力求调动敌人打运动战，但同时必须极大地注重学习阵地攻击战术，加强炮兵、工兵建设，以便广泛地夺取敌人据点和城市。一切守备薄弱之据点和城市则坚决攻取之，一切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又环境许可之据点和城市则相机攻取之，一切守备强固之据点和城市则暂时弃置之。

《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33页

（三）关于攻城方法问题，我们认为必须采取地道作战与地面作战相结合的方法，方能减少伤亡与保证胜利，如果单用地面攻击方法，则伤亡必很大，而且不一定确实保证胜利。

（四）关于歼灭援敌问题，我们认为在有沈阳、锦州这样大的敌军并且必然增援的条件之下（你们应以敌人必然增援为自己作战计划的基础），虽有三个月至四个月时间采取地道作战与

地面作战相结合的方法，还不能确保攻长春的胜利，必须同时在兵力部署上和作战方法上保障取得阻止援敌及歼灭援敌的胜利，方能确保攻长春的胜利。我们认为你们应有不少于五个纵队（最好是六个纵队）在沈阳、长春间援敌必经的道路上构筑必要坚固阵地（利用昌图、四平、公主岭等地敌人原来构筑的阵地加以修理），先行远距离的阻击作战，借以消耗和顿挫援敌，并有能力歼灭援敌一部或大部，方能保障长春的胜利。我们认为以三个月至四个月时间采用地道与地面相结合的作战方法是保障长春胜利的第一个条件，阻止与歼灭援敌则是保障长春胜利的第二个条件，两个条件不可缺一。

（五）这个计划有平分兵力之嫌。但是因为我军采取地道与地面相结合的方法，即一方面用多数的地道向敌要塞下面进攻，一方面在地面上逐步筑垒前进，使敌之反击（敌人必然举行多次的拼命的反击，所以我军前进必须逐步构筑坚强堡垒）只能消耗敌人自己，而不能把我军打出来，因此就可以节省兵力，我军有了大约四个或五个纵队及七个独立师使用于攻城方面也就够了。在作战实施中，依据城敌与援敌两方面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之变化，你们可以酌量调节攻城与打援两方面的兵力，在某种时机将重点放在打援方面（这是首先重要的），在另一种时机将重点放在攻城方面。

《关于攻打长春的几点考虑》（一九四八年六月七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04—105页

攻济打援战役必须预先估计三种可能情况：（一）在援敌距离尚远之时攻克济南；（二）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攻克济南；（三）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尚未攻克济南。你们应首先争取第一种；其次争取第二种；又其次应有办法对付第三种。在第三种

情况下，即应临机改变作战计划，由以攻城为主，改变为以打援为主，在打胜援敌后再攻城。估计到这一点，在你们将全军区分为攻城集团和阻援打援集团之后，两个集团均应留出必要的预备兵力，特别是阻援打援集团应留出强大预备兵力，准备在第三种情况下，你们手里有足够力量歼灭援敌。为达此种目的，你们应着重多道坚固阻援阵地的构筑，以便一方面节省阻援兵力，不使自己的大量兵力消耗和疲劳于阻援作战之中，另一方面使敌大量消耗于我阻援阵地之前。弹药的使用及储备，粮秣的筹集，均须和上述要求相适应，即要注意在第三种情况（最困难的情况）出现时，你们不但在兵力上，而且在弹药和粮秣上，均有办法战胜敌人。只有在你们预先准备好了这一切，才能保证胜利。

《济南作战应准备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战胜敌人》（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577页

人民解放军不但在东北、山东和陕北都恢复了绝大部分的失地，而且把战线伸到了长江和渭水以北的国民党统治区。同时，在攻克石家庄、运城、四平、洛阳、宜川、宝鸡、潍县、临汾、开封等城市的作战中学会了攻坚战术。人民解放军组成了自己的炮兵和工兵。不要忘记，人民解放军是没有飞机和坦克的，但是自从人民解放军形成了超过国民党军的炮兵和工兵以后，国民党的防御体系，连同他的飞机和坦克就显得渺小了。人民解放军已经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

《将革命进行到底》（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73页

9. 游击战要向运动战和正规战发展

游击主义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非正规性，就是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工作方法简单化等。这些东西是红军幼年时代本身带来的，有些在当时还正是需要的。然而到了红军的高级阶段，必须逐渐地自觉地去掉它们，使红军更集中些，更统一一些，更有纪律些，工作更周密些，就是说使之更带正规性。在作战指挥上，也应逐渐地自觉减少那些在高级阶段所不必要的游击性。在这一方面拒绝前进，固执地停顿于旧阶段，是不许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于大规模作战的。

另一方面是运动战的方针，是现在还需要的战略和战役作战的游击性，是无法阻止的根据地的流动性，是根据地建设计划的灵活变更性，是在红军建设上的不要不适时宜的正规化。在这一方面拒绝历史事实，反对保留有用的东西，贸然地脱离现阶段，盲目地跑向可望不可即的、在当前没有现实意义的所谓“新阶段”，同样是不许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于当前作战的。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232页

战争是长期而且残酷，游击战只有向运动战发展才能适应这样的战争。战争既是长期的和残酷的，就能够使游击队受到必要的锻炼，逐渐地变成正规的部队，因而其作战方式也将逐渐地正规化，游击战就变成运动战了。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必须明确地认识这种必要性和可能性，才能坚持向运动战发展的方针，并有计划地执行之。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

2版第2卷第432页

由执行游击战的游击部队化为执行运动战的正规部队，须具备数量扩大和质量提高两个条件。前者除直接动员人民加入部队外，可采取集中小部队的办法；后者则依靠战争中的锻炼和提高武器的质量。

集中小部队，一方面，须防止只顾地方利益因而妨碍集中的地方主义；另一方面，也须防止不顾地方利益的单纯军事主义。

地方主义是存在于地方游击队和地方政府中间的，他们往往只顾地方的利益，忘记全局的利益，或贪图分散活动，不惯集团生活。主力游击部队或游击兵团的领导者们，必须注意到这种情形，采取逐渐地和部分地集中的办法，使地方保有余力能够继续地发展游击战争；采取首先协同行动然后实行合编以及不破坏其建制不撤换其干部的办法，使小集团能够融合于大集团。

单纯军事主义和地方主义相反，乃是主力部队里头的人们只图扩充自己不顾扶助地方武装的一种错误观点。他们不知道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并非废除游击战，而是在广泛发展的游击战之中逐渐地形成一个能够执行运动战的主力，环绕这个主力的仍然应有广大的游击部队和游击战争。这种广大的游击部队，造成这个主力的丰富的羽翼，又是这个主力继续扩大的不断的源泉。所以，主力部队的领导者如果犯了不顾地方民众和地方政府的利益的单纯军事主义的错误，就必须加以克服，使主力的扩大和地方武装的繁殖，各得着适宜的位置。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33—434页

提高质量，须在政治、组织、装备、技术、战术、纪律等各方面有所改进，逐渐地仿照正规军的规模，减少游击队的作

风。政治上须使指挥员、战斗员们认识从游击队到正规军提高一步的必要性，鼓励大家为此而努力，并以政治工作去保障之。组织上须逐渐地具备为一个正规兵团所必需的军事和政治的工作机关，军事和政治的工作人员，军事和政治的工作方法以及供给卫生等的经常制度。装备方面，须提高武器的质量和种类，增加必要的通讯器材。技术和战术方面，从游击部队的技术和战术提高到作为一个正规兵团所必需的技术和战术。纪律方面，提高到整齐划一令行禁止的程度，消灭自由和散漫的现象。所有这些方面的完成，需要一个长的努力过程，不是一朝一夕的工程，然而必须向这个方向发展。只有这样，一个游击战争根据地上面的主力兵团才能造成，更有效力地打击敌人的运动战方式才能出现。这种目的，在有正规军派遣支队或派遣干部的地方，是能够比较顺利地达到的。因此，一切正规军均有扶助游击队向着正规部队发展的责任。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34页

抗日战争的作战形式中，主要的是运动战，其次就要算游击战了。我们说，整个战争中，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说的是解决战争的命运，主要是依靠正规战，尤其是其中的运动战，游击战不能担负这种解决战争命运的主要的责任。但这不是说：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不重要。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仅仅次于运动战，因为没有游击战的辅助，也就不能战胜敌人。这样说，是包括了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这一个战略任务在内的。长期的残酷的战争中间，游击战不停止于原来地位，它将把自己提高到运动战。这样，游击战的战略作用就有两方面：一是辅助正规战，一是把自己也

变为正规战。至于就游击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空前广大和空前持久的意义说来，它的战略地位是更加不能轻视的了。因此，在中国，游击战的本身，不只有战术问题，还有它的特殊的战略问题……在全国的数百万正规军中间，至少指定数十万人，分散于所有一切敌占地区，发动和配合民众武装，从事游击战争，是完全必要的。被指定的军队，要自觉地负担这种神圣任务，不要以为少打大仗，一时显得不像民族英雄，降低了资格，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游击战争没有正规战争那样迅速的成效和显赫的名声，但是“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在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中，游击战争将表现其很大的威力，实在是非同小可的事业。并且正规军分散作游击战，集合起来又可作运动战，八路军就是这样做的。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98—500页

我们党的军事战略的变化问题，值得给以研究。分为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两个过程来说。

国内战争的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战略时期。在前期，主要的是游击战争；在后期，主要的是正规战争。但所谓正规战争是中国型的，只表现在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和指挥上、组织上的某种程度的集中性和计划性方面，其他则仍是游击性的，低级的，不能和外国军队一概而论，也和国民党的军队有些不同。因此，这种正规战，在某种意义上，是提高了的游击战。

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就我党的军事任务说来，也将大体上分为两个战略时期。在前期（包括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两个阶段），主要的是游击战争；在后期（战略反攻阶段），主要的

将是正规战争。但抗日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和国内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有许多不同的内容，因为是用正规性（某种程度上）的八路军去分散执行游击任务；抗日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也将不同于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这是设想在装备了新式武器之后，军队和作战将要起一个大的变革而说的。这时的军队将获得高度的集中性和组织性，作战将获得高度的正规性，大大减少其游击性，低级的将变到高级的，中国型的将变到世界型的。这将是战略反攻阶段中的事业。

由此看来，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两个过程和四个战略时期之间，共存在着三个战略的转变。第一个，国内游击战争和国内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二个，国内正规战争和抗日游击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三个，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49—551页

在长期奋斗中，游击队和游击战争应不停止于原来的地位，而向高级阶段发展，逐渐地变为正规军和正规战争，这也是没有疑义的。我们将经过游击战争，积蓄力量，把自己造成为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決定因素之一。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54页

准备转变。由分散的游击战逐渐转变到正规的运动战，由游击战为主逐渐转变到以运动战为主。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30页

内战时期搞正规化，就是因为忘记了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用脚走的，子弹是会打死人的，没有搞通这一点。军队不生产，专门吃老百姓，吃上几个月，吃上一年，粮食吃完了，只好向后转，开步走，来个万里长征，可谓“英雄豪杰”。现在我们要集中更大的兵力，以多胜少，去打敌人薄弱的地方。你一百人，我一千人，一千人可以消灭你一百人。此外，还要转向正规化。报告里写了这样一条，有哪一天我们得到新式武器，就会更加无敌了，就能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里就包含准备转变的意思。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31页

由于我党我军在过去长时期内是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并且是农村的环境之下，我们曾经允许各地方党的和军事的领导机关保持着很大的自治权，这种情况，曾经使得各地方的党组织和军队发挥了他们的自动性和积极性，渡过了长期的严重的困难局面，但在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损害了革命事业。目前的形势，要求我党用最大的努力克服这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使战争由游击战争的形式过渡到正规战争的形式。过去两年中，军队和作战的正规性是增长了一步，但是还不够，必须在第三年内再进一大步。

《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46—1347页

10. 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要互相配合

根据过去七个月作战的经验，在军事上我们若能运用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方式互相配合，必能使敌军处于极困难地位。我的意见，在目前除应以二三十万精兵组成数个强有力的野战军，从运动战中给敌人前进部队以歼灭的打击之外，还应抽调八九万军队组成二三十个基干的游击兵团，每个兵团三四千人，派坚决而机动的指挥员领导，加强其政治工作，配置于从杭州到包头的敌人阵线前面，从这个长阵线的二三十个空隙中间，打到敌人后方去。如能运用得宜，结合民众，繁殖无数小游击队，必能在敌后方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动千百万民众，有力地配合野战军的运动战，而使敌军疲于奔命。至于阵地战，由于我们技术不足，在目前不应看作主要方式。但我们必须建设国防工业，自制重武器与高武器，同时设法输入这些武器，以便能有力地进行防御的与攻击的阵地战，这是非常必要的。有人说，我们只主张游击战，这是乱说的，我们从来就主张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者的配合。在目前以运动战为主，以其他二者为辅，在将来要使阵地战能够有力地配合运动战。而游击战，在它对于战斗方式说来，则始终是辅助的，但游击战在半殖民地的民族战争中，特别在地域广大的国家，无疑在战略上占着重大的地位。在政治方面，我们已有国内的统一，更拥有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同情和援助。但现在的成绩还不够，还应进一步加强起来。所有上述军事上政治上的加强，都是必须的。只要继续努力，也一定能够加强，这就显示着前途的光明。

《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一九三八年二月），《毛泽东文集》

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的配合有三种：战略的、战役的和战斗的。

整个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所起的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的作用，和给予全国正规军和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鼓励等等，都是战略上配合了正规战争。例如东三省的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未起以前当然不发生配合问题，但在抗战起来以后，配合的意义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至于平绥、平汉、津浦、同蒲、正太、沪杭诸铁路线两旁的游击战争，所起战略的配合作用，更加容易看到。它们不但在现时敌人举行战略进攻时配合正规军起了战略防御的作用；又不但在敌人结束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时，将配合正规军妨碍敌之保守；而且将于正规军举行战略反攻时，配合正规军击退敌军恢复整个的失地。游击战争在战略上的伟大的配合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游击队和正规军的领导者们，都应明确地认识其作用。

不但如此，游击战争还有其战役的配合作用。……在这个任务上，一切处于敌后的游击根据地的领导者们，或临时被派出的游击兵团的领导者们，必须好好地配置自己的力量，各依当时当地的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向着敌人最感危害之点和薄弱之点积极地行动起来，达到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和精神上振奋内线上各个战役作战军之目的，尽其战役配合的责任。如果各游击区或各游击队只是各干各的，不顾战役作战的配合，虽在总的战略作战上仍不失其配合作用，但由于没有战役作战的配合，也就减少了它们的战略配合的意义。这

一点是一切游击战争的领导者应该深切地注意的。为达此目的，无线电通讯之普遍地设置于一切较大的游击部队和游击兵团，实有完全的必要。

最后，战斗的配合，即战场作战的配合，是一切内线战场附近的游击队的任务，这一项当然只限于靠近正规军的游击队，或临时从正规军派出的游击队。在这种场合，游击队应该依正规军首长的指示，担负其所指定的任务，往往是担负钳制部分的敌人，妨碍敌之运输，侦察敌情，充当向导等。没有正规军首长的指示时，游击队也应自动地做这些事。坐视不理，不游不击，或游而不击的态度，是要不得的。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16—418页

大抵运动战是执行歼灭任务的，阵地战是执行消耗任务的，游击战是执行消耗任务同时又执行歼灭任务的，三者互有区别。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01页

五、军队和国防的现代化建设

（一）努力实现国防现代化的目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它将指挥人民解放军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它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它将保卫人民的利益，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它将加强人民的陆海空军，巩固国防，保卫领土主权完整，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

《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

第5卷第348页

在新民主主义建设中，以及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国内外的敌人会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和抵抗，我们还必须大力加强国防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国防，来保障祖国的建设；而发展工农业生产，又是加强国防建设的物质基础。同志们还要知道，胜利了的中国对东方和世界和平的国际责任，而要更好地担承伟大的保卫东方和世界和平的责任，要依靠我们对祖国建设的努力。

《军委关于部队集体转业的命令》（一九五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23—224页

我们国家的国防任务很大。除了工业问题以外，还有建军问题和作战问题。建军和作战，联系到各个方面。我们现在的作战任务是解放台湾，将来的作战任务是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建军中各方面的问题很多，比如兵役制度，……我们军队要提高，编制、装备要改进，训练要改进，而军队的训练是同国民军训相联系的。

《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八日），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54—355页

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95页

现在的国际环境有利于我们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我们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一定要争取这个和平建设的时间。十五年已经过了三年，再有十二年就行了。看样子是可能争取的，要努力争取。我们应当在外事工作方面、国防建设方面加强努力。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结论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

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

就是我们的路线。经济战线上如此，军事战线上也完全应当如此。

《独立自主地搞建设》（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80页

军队训练已经八年多了，连一本战斗条令都没有搞出来，这次要集中一些有丰富工作经验和战斗经验的同志，搞出一本自己的战斗条令来。

《要搞出一本自己的战斗条令来》（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76页

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6页

就是要安下心来，使我们可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

《中尼边界要永远和平友好》（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62页

（二）建设一支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

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这两件事都有赖于同志们和全体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一道，和全国工人、农民及其他人民一道，团结一致，协同努力，方能达到目的。

《在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的祝词》（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95—96页

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到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客观条件已完全具备了这种可能，只需加上不疲倦的主观努力，就一定可以实现。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为此，就需要克服在过去时期曾经是正确的，而现在则是不正确的那种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简单现象和游击习气等等，而必须加强整个工作上、指挥上，而首先又应该是从教育训练上来培养的那种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这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之一。

同时，为了组织这种复杂的、高度机械化的、近代的战役和战斗，没有健全的、具有头脑作用的、富于科学的组织和分工的司令机关不行。过去那种不健全的、效率不高的、甚至是极不胜任的司令机关，今后就必须大大地加强起来；过去那种只重视政治工作（重视政治工作是对的，今后也还必须重视），而忽视参谋工作的现象，必须加以坚决的改变，过去把一些比较弱的、缺乏组织能力的、甚至是犯了一些错误而积极性不高的人来做司令机关的工作，因而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对司令机关的缺乏威信，影响到若干指挥人员不愿意当参谋长、不愿意当参谋，这种现象必须加以根本上的改正。今后必须挑选优秀的、富于组织和指挥才能的指挥员到各级司令机关来，以创造司令机关新的作风和新的气象。这同样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之一。

《对军事学院第一期毕业学员的训词》(一九五二年七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34—235页

军事学院全体的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教员、第一期毕业的学员和正在学习的学员同志们：军委希望你们在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的光荣事业上，继续努力；并希望通过你们的努力，把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的精神，贯彻到所有部队中去。

《对军事学院第一期毕业学员的训词》(一九五二年七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35页

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如果明年再打一年，全部陆军都可以轮流去训练一回。

《边打边谈边稳》(一九五二年八月四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16页

对于现代的军队，组织良好的后方勤务工作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任何轻视后勤工作、以为后勤工作不是重要的专门的科学、不需要有系统的学习、不需要精通业务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必须学习苏联军队完整的后勤工作建设，研究朝鲜战争中后勤工作的状况和经验，以达到我军后勤工作现代化和正规化的目的。

《给后勤学院的训词》(一九五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39页

国防委员会今后的任务是：团结起来，训练我们的军队和人民，逐步建设一支近代化的革命军队。除苏联军队外，我们

要建设世界上第二支强大的近代化的革命军队。现在我们的经济建设有计划，文化建设有计划，军事建设也应当有计划，以便有步骤地达到我们建设强大的近代化的革命军队的目标。这是人民的目标，是宪法规定的目标。

《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八日），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55页

我们的军队，首先是游击队，以后比较正规一些，现在更好一些，但严格地说来，距现代化还相差很远，因此必须努力学习。原子武器出现以后，军队的战略战术和装备都有很大的变化，而在这一方面我们一点都不懂。

从历史上看，我们的建军目标是能够达到的，我们的事业是有希望的。

《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八日），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56页

人民的希望，人民所需要的方向，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各种努力，过去可以北伐，可以解放全中国，可以开始进行国家的建设。今后，在人民拥护的基础上，加上我们的努力，就一定能够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解放台湾，也一定能够建设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

《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八日），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57页

（三）一九四九年必须使各野战军进一步地正规化，这主要地是加强炮兵和工兵，使用铁路、公路和水路的近代运输工具，加强军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坚决地克服现在还是相当严

重地存在于军队中的某些无纪律的状态，并加强司令部的工作。

（四）一九四九年及一九五〇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32页

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设自己的空军和海军，而你们就将是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

《嘉勉重庆号巡洋舰起义官兵》（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70页

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5页

中国是个大国，要有强大的陆、海、空军。我国有那样长的海岸线，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

《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58页

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

《为〈人民海军〉报题词》(一九五〇年一月一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67页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为人民海军题词》(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43页

为了肃清海匪的骚扰,保障海道运输的安全,为了准备力量于适当时机收复台湾,最后统一全部国土,为了准备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从海上来的侵略,我们必须在较长时期内,根据工业发展的情况和财政的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

《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14页

建立空军已经成了我党的迫切任务。

《建立空军已成党的迫切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五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40页

创造强大的人民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

《为空军建军题词》(一九五〇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322页

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保卫祖国,准备战胜侵略者。

《为空军首届英雄模范功臣代表大会题词》(一九五五年三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65页

空降兵要认真地搞起来，搞就要搞得像个样子，不充实的把它充实起来。你们要很好总结经验。

《要把空降兵认真搞起来》(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407页

今后军事建设方面的中心任务，是用一切努力加强炮兵和工兵的建设。各大小军区，各野战兵团，必须具体地解决为了加强炮兵和工兵而发生的各项问题，主要是训练干部和制造弹药两项问题。

《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15页

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炮兵而奋斗。

《为炮兵部队题词》(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335页

野营训练是一种好方法，应该在全军推广这种方法。

《野营训练是一种好方法》(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94页

要注意多搞夜战、近战。训练部队晚上行军，晚上打仗。

《对部队军事训练的若干指示》(一九六四年六月、七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99页

军队无非是要学会两个东西，一个是会打，一个是会走。会打、会走，军队都要学会。打就吃它一口，吃不了大的吃小的，吃了一口再吃一口。

《对部队军事训练的若干指示》(一九六四年六月、七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99页

部队是不是可以大规模地搞游泳训练?游泳训练夏天完全可以搞。部队要学游泳。单靠游泳池不行,要学会在江海里游。不经过大风大浪不行。

《对部队军事训练的若干指示》(一九六四年六月、七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400页

部队要学游泳,所有部队都要学会。学游泳有个规律,摸着了规律就容易学会。整营、整团要学会全副武装泅渡。每师先搞一个团,每团先搞一个营,每营先搞一个连。然后再普及,做到全会。

《对部队军事训练的若干指示》(一九六四年六月、七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400页

部队要练夜战、近战,练二百米硬功夫,每团要培养一个夜老虎连。

《对部队军事训练的若干指示》(一九六四年六月、七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400页

看了北京、济南军区的“尖子”部队的表演,很好。要在全军中普及,光有“尖子”部队是不够的。普及要很快布置,要抓紧这个工作。

《对部队军事训练的若干指示》(一九六四年六月、七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400页

（三）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危險依然存在，我们要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工作

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的袭击。因此，我们在精神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着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92页

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先是说东风压倒西风，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再就如果发生了战争的情况，作了这些补充的说明，这样两种可能性都估计到了。

《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26页

最后一条，就是准备反侵略的战争。头一条讲了双方怕打，仗打不起来，但世界上的事情还是要搞一个保险系数。因为世界上有个垄断资产阶级，恐怕他们冒里冒失乱搞，所以，要准

备作战。这一条要在干部里头讲通。第一，我们不要打，而且反对打，苏联也是。要打就是他们先打，逼着我们不能不打。第二，但是我们不怕打，要打就打。我们现在只有手榴弹跟山药蛋。氢弹、原子弹的战争当然是可怕的，是要死人的，因此我们反对打。但是这个决定权不操在我们手中，帝国主义一定要打，那末我们就得准备一切，要打就打。

《关于国际形势问题》（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11—412页

当然，帝国主义现在是处在衰落时代，我国，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处于上升的时代，世界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一九六三年九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40—341页

为了农业机械化，多产农林牧副渔等品类，要为地方争一部分机械制造权。……又此事应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否则地方有条件也不会热心去做。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

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

《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一封信》(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427—428页

要准备打仗。无论哪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人家就问了：他不来怎么办呢？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不要造手榴弹都要中央配发材料。手榴弹，到处可以造，各省都可以造。什么步枪、轻武器，每省都可以造。这是讲物质上的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准备打仗的精神。不仅是我们的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

人家打来，我们不打出去。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他不得点好处，我看他也不会进来。要使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至于什么飞机、坦克、装甲车之类，现在到处经验证明，可以对付。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38页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408页

(四) 掌握先进的军事科学和技术装备， 提高在现代战争中取胜的能力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除西藏、台湾等处尚待解放，各地残余土匪尚待剿灭之外，已经基本上结束。国家的伟大的经济建设工作和文化建设工作，已经开始。今后人民解放军的任务，除必须解放西藏、台湾及剿灭残余土匪外，主要的就是要进行国防建设，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可能侵略，维持国内治安，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同时，也要尽可能地参加国家的经济建设工作和其他工作。我全体人民解放军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国内革命战争的伟大任务，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爱戴和拥护，今后必须为完成新的任务而奋斗。鉴于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一般的文化水平太低的情况，为了要完成伟大的新任务，就必须提高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的文化科学与技术水平，并从军队中培养大批的从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因此，中央决定，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一个巨大的学校，组织广大指挥员和战斗员，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干部，参加文化学习。

《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一九五〇年八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88页

听说近来敌人的坦克增多了，我军必须增强反坦克武器，足以征服敌人的大量坦克，才能阻止敌人坦克的猖獗和大量歼灭敌人的步兵。

《必须增强反坦克武器》（一九五一年六月一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286页

我们的国家正在为着实现工业化和社会主义而进行大规模的建设，而我国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则继续占领我国的台湾，并继续侵略朝鲜，威胁我国的安全。为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我们必须向苏联的军事科学学习，以便迅速把我军提高到足以在现代化的战争中取胜的水平。

《给总高级步兵学校的训词》(一九五三年一月七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37页

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这一切都不能离开复杂的专门的技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

《给军事工程学院的训词》(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51页

我们必须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知识，学习苏联军事工程建设的丰富经验，学习苏联顾问同志的学习态度和工作态度，学习苏联顾问同志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在学习上应该是虚心诚恳，不要学到一点就自满和骄傲。

《给军事工程学院的训词》(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51—352页

（五）抓紧研制尖端武器

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怎么办呢？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
第27页

一九五〇年，我们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提出精简国家机构、减少军政费用的问题，认为这是争取我国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之一。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军政费用占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这个比重太大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使它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以便抽出更多的资金，多开些工厂，多造些机器。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不但会有很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弹。

这里也发生这么一个问题，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希望军委讨论一下。

现在我们把兵统统裁掉好不好？那不好。因为还有敌人，我们还受敌人欺负和包围嘛！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

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
第27—28页

我还是希望搞一点海军,空军搞得强一点。还有那个原子弹,听说就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一年不是抓一次,也不是抓两次,也不是抓四次,而是抓它七八次。

《要搞一点原子弹氢弹》(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74页

在科学研究中,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

《应抓紧对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一九六二年六月八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92页

死光,要组织一批人专门去研究它。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专门研究它。没有成绩不要紧。军事上除进攻武器外,要注意防御问题的研究,也许我们将来在作战中主要是防御。进攻武器,比原子弹的数量我们比不赢人家。战争历来都需要攻防两手,筑城、挖山洞都是防嘛。秦始皇的万里长城没有多大用处。我们准备做一些蠢事,要搞地下工厂、地下铁道,逐年地搞。

《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52页

第六编

关于思想宣传工作和文化工作

目 录

一、思想政治工作	(1477)
(一)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全党全社会都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1477)
(二) 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	(1481)
1. 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反对强迫命令和压服	(1481)
2.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1486)
3. 思想政治工作要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去做，将解决实际问题同解决思想问题结合起来	(1486)
4. 抓好典型，表彰先进	(1488)
(三) 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教育	(1489)
1. 提倡爱国主义，弘扬民族精神	(1489)
2. 教育群众正确处理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同长远的、全局性的、集体的利益之间的关系	(1495)
3. 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宣传教育，并处理好远大理想和现行政策的关系	(1498)
(四) 加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使之为广大党员、群众所掌握	(1500)
(五) 加强阶级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思想觉悟	(1501)

(六) 加强唯物主义教育, 崇尚科学, 用无神论代替有神论	(1502)
二、宣传工作	(1505)
(一) 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和基本要求	(1505)
1. 要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深入地进行宣传动员工作	(1505)
2. 加强领导, 务使宣传工作完全符合党的路线和政策	(1507)
3. 宣传要看对象, 要有切合实际的内容和形式	(1509)
4. 宣传要实事求是, 既要讲好的形势和光明前途, 又要讲困难和问题	(1512)
(二) 新闻、报刊工作	(1514)
1. 报纸是组织群众、教育群众和指导工作、推动工作的重要武器	(1514)
2. 增强新闻、报刊宣传的党性	(1516)
● 共产党的使命就是党报的使命, 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党的路线和政策	(1516)
● 报纸是有阶级性的, 必须反对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	(1519)
● 要政治家办报	(1520)
3. 办报要面向群众、依靠群众	(1521)
4. 要在报刊上揭露、反击敌人, 报导好、坏典型, 开展讨论和批评	(1525)
5. 报纸不但要务实还要务虚, 要发好议论、写好评论	(1527)
6. 报纸要重视理论工作	(1528)

7. 培养出色的编辑和记者，提高报纸的
 编排水平 (1530)
- (三) 对外宣传工作 (1532)
- (四) 文风问题 (1534)
1. 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文风，反对党八股 (1534)
- 党八股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必须坚决反对 (1534)
 - 要有实际内容，言之有物，有说服力；反对
 空话连篇，言之无物 (1534)
 - 要靠实事求是，靠科学，靠有用；反对装腔
 作势，借以吓人 (1536)
 - 要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反对形式
 主义，现象罗列 (1538)
 - 要有生动活泼的语言；反对语言无味，像个
 瘪三 (1540)
 - 要以高度的责任心，反复研究，拿出精品；
 反对粗心大意，不负责任 (1541)
2. 文章应当具有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 (1543)
3. 讲究逻辑、文法和修辞 (1546)
4. 下苦功学习语言 (1548)
- 三、文化 (1551)
- (一) 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1551)
- (二) 封建主义文化、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和
 资本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文化 (1553)
- (三) 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 (1559)
1. 没有革命文化事业，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是不可能的 (1559)
2. 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

- 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1561)
3.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1566)
4. 新民主主义文化只能由共产主义思想来
领导 (1568)
5. 改变文化落后的面貌，努力实现社会主义
科学文化现代化 (1570)
6.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促进艺术发展、科学
进步和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 (1571)
7. 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借鉴吸收外国进步
文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1579)
8. 保持和发扬中国文化的民族风格、民族
特色 (1588)
- 四、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 (1594)
- (一) 革命文艺事业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 (1594)
- (二) 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
工农兵的 (1595)
- (三) 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惟一源泉 (1601)
- (四) 文艺工作者要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
斗争，深入社会生活 (1602)
- (五) 向工农兵普及，从工农兵提高；在普及的
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 (1609)
- (六) 歌颂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暴露一切
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 (1614)
- (七) 改造旧艺术，推陈出新 (1618)
- (八) 坚持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提倡表现
手法的多样性 (1620)
- (九) 开展积极的文艺批评 (1625)

(十) 诗词创作和欣赏	(1628)
五、科学技术	(1630)
六、教育	(1631)
(一) 教育必须适合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的需要 ...	(1631)
(二) 我们的教育方针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 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633)
(三) 教育要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要与生产劳动 相结合	(1635)
(四) 发展各类教育, 提高干部群众的文化水平 ...	(1639)
(五) 改革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	(1644)
1. 改革教育制度	(1644)
2. 改革课程设置、教材和教学方法	(1646)
七、体育、卫生	(1650)
(一) 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	(1650)
(二) 发展医药卫生事业	(1651)
1. 卫生工作关系到移风易俗, 改造国家	(1651)
2. 中医药是一个宝库, 要走中西医结合的 道路	(1652)
3. 以预防为主的方针	(1654)
4. 救死扶伤	(1655)
5.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1656)
6. 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	(1656)
八、知识分子问题	(1658)
(一) 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	(1658)
1. 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动力之一, 是无产阶级 可靠的同盟者	(1658)
2. 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 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1660)

-
3. 没有庞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 (1663)
 - (二)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1664)
 1. 对知识分子队伍状况的基本估价 (1664)
 2. 尊重和信任知识分子 (1668)
 3. 团结、争取和吸收知识分子为革命和建设服务 (1670)
 4. 对旧知识分子的使用、教育和改造 (1676)
 5. 造就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的宏大队伍 (1681)
 - (三) 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与提高 (1683)
 1. 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 (1683)
 2. 学习马克思主义，深入实际，转变立场和世界观 (1689)
 3. 做到又红又专 (1695)

一、思想政治工作

（一）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全党全社会都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

《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5页

我们已定思想、政治、政策、军事、党务五项为政治局业务中心，而以掌握思想为第一项。

《目前应以整顿内部训练干部为工作中心》（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92页

现在教育工作的意义很大，为了对付目前的时局也好，为了迎接将来的时局也好，都必须加强教育。

《关于整顿三风》（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11页

对付黑暗需要加强教育，迎接光明也需要加强教育，无论怎样讲，我们都需要加强教育。

《关于整顿三风》（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11—412页

部队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就是保障部队生产计划与教育

计划的完成及在实施这两项计划时保障自己部队与党政民发生正确的关系，保障自己部队上下级的正确关系，保障经济干部的纯洁。政治工作如果在这些方面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那末，这种政治工作就是失败的。

《关于发展军队的生产事业》(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95页

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94页

人民的觉悟不是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脑子中的错误思想,需要我们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对于中国人民脑子中的落后的东西,我们要去扫除,就像用扫帚打扫房子一样。从来没有不经过打扫而自动去掉的灰尘。我们要在人民群众中间,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人民认识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动向,对于自己的力量具备信心。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31页

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在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以及瓦解敌军等项原则的基础上,人民解放军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48页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每一个合作社，不经过这样的一场斗争，就不能创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合作社建立以后，还必须经过许多的斗争，才能使自己巩固起来。巩固了以后，只要一松劲，又可能垮台。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49—450页

经济与政治、技术与政治的统一，年年如此。思想、政治是统帅，是君，技术是士兵，是臣，思想、政治又是技术的保证。

《在南宁会议上的结论提纲》（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25页

注意力移到技术方面，又可能忽略政治，因此必须注意把技术和政治结合起来。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1页

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1页

有了正确的政治观点，从政治上想通了，政治统帅了业务，迷信破除，胸怀坦荡，势如破竹了。

《对电力工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批语》（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87页

要加强政治工作。不论文武，不论工厂，农村，商店，学校，军队，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各方面都要极大地加强政治工作，提高干部和群众的政治水平。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6页

要责成省委、地委、县委书记管思想工作，管报纸、学校、文学艺术和广播。

《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47页

各级党委，特别是省、市和自治区一级的第一书记，对于了解工厂、学校以及报纸、刊物的思想政治动向，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解决这些方面的具体问题等项任务，应该立即抓起来，并且教会地、县两级和城市区级第一书记抓起这些工作。不应该只委托宣传部长、文教部长、教育和文化厅、局长这些同志去做而自己不去管它们。

《对〈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修正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七年三月八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371页

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应该把思想问题抓起来。这一点是在座有些同志希望我讲的。现在许多地方的党委还没有抓思想问题，或者抓得很少。这主要是因为忙。但是一定要抓。所谓“抓”，就是要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要研究。我们国内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还有阶级斗争，主要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而且还很尖锐。思想问题现在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应该亲自出马来抓思想问题，只有重视了和研究了这个问题，才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各地方要召开像这次宣传会议一样的会议，讨论当地的思想工作和有关思想工作的各方面的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2页

全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一九五七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6页

（二）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

1. 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反对强迫命令和压服

要把干部中的积极分子、平常分子、落后分子分开，对思想有问题的、党性有问题的人要特别加以注意，采取和他们个

别谈话的方法。这个方法西北局实行过，还有许多机关实行过，产生很好的效果。再一种方法是开干部会。进行个别谈话，开干部会，用这两种方法来做工作。

《关于整顿三风》（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20页

凡愿意同我们合作与可能争取同我们合作的人，都要耐心帮助、教育、改造，很好地同他们合作，从改造中逐步肃清过去反动派的一切遗迹和对他们的政治影响，以马列主义思想代替国民党的反动思想。对那些坚决反对改造和破坏改造的反革命分子与特务，必须打击与镇压。要争取团结多数，他们内部也一样是两头小、中间大，思想激进的可以鼓励，进步缓慢的可以等待。对基本方针要拥护，但允许有差异。对他们不能用粗暴的方法，不能下大雨，要像下小雨一样才能渗透进去。要按照他们的具体情况和能够接受的程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强迫灌注。

《同绥远负责人的谈话》（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1页

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的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要知道，在人民方面来说，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

《国家预算要保证重点建设又要照顾人民生活》（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60—161页

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人

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为着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9—210页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的香花。我们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2—233页

对人民的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解决思想问题，不能

用专制、武断、压制的办法，要人服，就要说服，而不能压服。

《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52页

我们作宣传工作的同志有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这个宣传是逐步的宣传，要宣传得好，使人愿意接受。不能强迫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只能说服人接受。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0页

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是思想问题，对于思想问题采取粗暴的办法、压制的办法，那是有害无益的。知识分子的改造，特别是他们的世界观的改变，要有一个长时期的过程。我们的同志一定要懂得，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工作，不能企图上几次课，开几次会，就把人家在几十年生活中间形成的思想意识改变过来。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以力服人是不行的。对付敌人可以这样，对付同志，对付朋友，绝不能用这个方法。不会说服怎么办？这就要学习。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9页

说还是压？要善于说服，要学会以理服人。

《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90页

我们没有强加于人。在人民内部，尤其是在同志内部，采取强加于人的方法是不好的。我们现在用说服的方法代替了压服的方法。

《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十六日、十八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28—629页

在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以后，这个政权同人民的关系，就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关系了，采用的方法不是压服而是说服。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关系。这个政权只对人民中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犯法分子采取暂时的程度不同的压服手段，作为说服的辅助手段。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1页

用说服而不用压服的方法，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见效甚快。

《骚体有民主色彩，属浪漫主义流派》（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文艺论集》第202页

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

《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247页

（另参见第四编“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第1039—1044页）

2.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参见第八编“关于党的建设”，第2080—2091页)

3. 思想政治工作要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去做，将实际问题同解决思想问题结合起来

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还有许多同志的头脑没有变成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者的头脑，他们只是做了一个方面的工作，即是只知向人民要这样那样的东西，粮呀，草呀，税呀，这样那样的动员工作呀，而不知道做另一方面的工作，即是用尽力量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提高文化。为了革命，为了抗战，我们向人民要东西是完全合理的。我们的同志做了这一方面的工作算是做了他们应做的革命工作，这是很好的。但这只是做了一个方面的工作，而且还不是第一个方面的工作。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为着这个，我们应该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耕牛、农具、种子、肥料、水利、牧草、农贷、移民、开荒、改良农作法、妇女劳动、二流子劳动、按家计划、合作社、变工队、运输队、纺织业、畜牧业、盐业等等重要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这一方面的工作是每个在农村工作的共产党员的第一位工作。只有在做了这一方面的工作，并确实生了成效

之后,我们去做第二方面的工作——向人民要东西的工作时,我们才能取得人民的拥护,他们才会说我们要东西是应该的,是正当的;他们才会懂得他们如不送出粮草等等东西给政府,则他们的生活就不会好,就不会更好。这样我们的工作才不是勉强的,才会感觉顺利,才会感觉真正和人民打成一片了。这就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每个同志(军队的同志也在内)都要好好去研究。只有在我们的同志懂得并且实行了这样两方面工作的配合时,我们方能算得上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的革命家,否则我们虽也在做革命工作,虽也是一个革命家,却还不是一个完全的革命家。而且,对于某些同志说来,他们还是一个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者,因为他们只知道向群众要东西,却不知道或不愿意给群众一点东西,引起群众讨厌他们。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希望大家十分注意,并向全党宣传这个道理。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节选)》(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67—468页

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地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保证。这一工作是艰巨的,必须根据农民的生活经验,很具体地很细致地去做,不能采用粗暴的态度和简单的方法。它是要结合着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不能孤立地去做。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50页

(另参见第一编“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第270—274页)

4. 抓好典型，表彰先进

有什么好的工作方法呢？我看最近开劳动英雄大会、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大会、劳动英雄与战斗英雄大会，就是一种好的工作方法。

《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97页

从军队中、农村中、工厂中及政府机关中，用群众民主选举的方法选出优秀分子，充当战斗英雄、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给予奖励与教育，经过他们去鼓励与团结广大的群众。

《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
第3卷第241页

凡当选的英雄模范，须勤加教育，力戒骄傲，方能培养成为永久模范人物。如果只有赞扬，没有教育，骄傲落选，将是必然现象，此点请加注意。

《对英雄模范须勤加教育》（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46页

在开展反坏人坏事的广泛斗争达到了一个适当阶段的时候，就应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

《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一九五三年一月五日），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55页

“无证民不信，不信民不从”，搞典型才有证据，才能说服人。

同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的谈话（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三) 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教育

1. 提倡爱国主义，弘扬民族精神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61页

让那些汉奸卖国贼以及一切无气节的奴才们，在日本帝国主义暴力前面高喊“中国无力抗日”吧！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子孙是誓不投降，誓不屈服的！我们要为大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最后一滴血！中国决不是阿比西尼亚！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华民族，终有一天在地球上的东方，雄壮地站起来，高举着民族革命最后胜利的旗帜，同全世界一切自由解放的民族携手，连那个帝国主义成分除外的日本民族也在内，统治着整个的地球，统治着光明灿烂的新世界！让我们的敌人在我们的联合战线面前发抖吧，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33页

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了民族自尊与人类正义，为了中国人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决不让日本法西斯不付重大代价而达到其无法无天的目的。我们的方法就是战争与牺牲，拿战争对抗战争，拿革命的正义战对抗野蛮的侵略战。这种精神，我们

民族的数千年历史已经证明,现在再来一次伟大的证明,……

《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13页

全民族的第一个任务,在于高度发扬自尊心与自信心,克服一部分人的悲观情绪,坚决拥护政府继续抗战的方针,反对任何投降妥协的企图,坚持抗战到底。这一任务,比过去任何时期为重要。

为此目的,必须动员报纸、刊物、学校、宣传团体、文化艺术团体、军队政治机关、民众团体,及其他一切可能力量,向前线官兵、后方守备部队、沦陷区人民、全国民众,作广大之宣传鼓动,坚定地有计划地执行这一方针,主张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妥协,清洗悲观情绪,反复地指明最后胜利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指明妥协就是灭亡,抗战才有出路,号召全民族团结起来,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我们一定要自由,我们一定要胜利,用以达到全国一致继续抗战之目的。

为此目的,一切宣传鼓动应顾到下述各方面。一方面利用已经产生并正在继续产生的民族革命典型(英勇抗战、为国捐躯、平型关、台儿庄、八百壮士、游击战争的前进、慷慨捐输、华侨爱国等等),向前线后方国内国外广为传播。又一方面,揭发、清洗、淘汰民族阵线中存在着与增长着的消极性(妥协倾向、悲观情绪、腐败现象等等)。再一方面,将敌人一切残暴兽行的具体实例,向全国公布,向全世界控诉,用以达到提高民族觉悟、发扬自尊心与自信心之目的。须知这种觉悟与自信心之不足,是大大妨碍着克服困难与准备反攻的基本任务的。

《高度发扬自尊心和自信心》(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39—40页

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以汉族的历史为例,可以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3页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

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32页

动员报纸,刊物,学校,宣传团体,文化艺术团体,军队政治机关,民众团体及其他一切可能力量,以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

自信心与自尊心，反对任何投降妥协的企图，坚持抗战到底，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我们一定要自由，我们一定要胜利。

纪念山东《大众日报》创刊一周年的题词（一九四〇年一月一日），
《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155页

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组成的力量打倒我们的敌人。中国民族是一个能战斗的民族，俄罗斯人在十月革命以来所创造的战胜帝国主义与国内反动派的伟绩，中国人亦能创造出来。今后数年的时间必能证明这一点。

《我们完全有把握彻底打倒蒋介石反动集团》（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316页

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百余年来，前仆后继。无数先烈的鲜血，洒遍了锦绣山河；亿兆后起的人民，表现了英雄气概。

《复李济深等五十六人电》（一九四九年二月二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53页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别了，司徒雷登》（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95—1496页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闻一多等人之外，还在过去的三年内，用美国的卡宾枪、机关枪、迫击炮、火箭炮、榴弹炮、坦克和飞机炸弹，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现在这种情况已近尾声了，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

《别了，司徒雷登》（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96页

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3—344页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5页

中华民族就是这样一个坚决战斗的民族。虽然在我们的斗争过程中，有时曾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我们不是靠观音菩萨来救命，而是靠自己的双手去克服困难。

《朝鲜战局和我们的方针》（一九五〇年九月五日），《毛泽东文集》
第6卷第92页

我们的敌人认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前摆着重重的困难，他们又用侵略战争来反对我们，我们有可能克服自己的困难，没有可能反击侵略者。出于敌人的意料之外，我们居然能够克服自己的困难，居然能够反击侵略者，并获得伟大的胜利。我们的敌人眼光短浅，他们看不到我们这种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他们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

《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十一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85页

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
第43页

在资本家中要宣传把个人的事情和国家的事情联系起来，提倡爱国主义，总要想到国家的事情。在农村里过去曾提过

“要发家，种棉花”的口号，结果大家只管家了，后来觉得这个口号提得不对，改为“爱国发家，多种棉花”，这就把家和国联系起来。你们也要把家和国联系起来，这个国家你们也是有份的。

你们这个会的中心是要讨论你们自己的事情，同时也要联系到国家的事情，回去宣传教育时也要联系到国家的事情。我们要提倡爱国主义。为什么要搞公私合营，要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了便于把国家发展起来，社会主义比私有制度更有利于发展国家的经济、文化，使国家独立。

《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77页

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护公共财产为全体国民的公德。

为《新华月报》创刊号的题词（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题词墨迹选》第109页

2. 教育群众正确处理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同长远的、全局性的、集体的利益之间的关系

应当向工会同志和工人群众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决不可只看到眼前的片面的福利而忘记了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

《关于工商业政策》（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85页

拿工人讲，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

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页

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0—31页

应该承认：有些群众往往容易注意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长远的、全国性的、集体的利益。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6页

要保证人们吃饱饭，然后人们才能继续生产。没有这一条是不行的。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惟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教科书中不也是常说“精神鼓励”原则吗？同

时，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3页

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教科书对于为前途、为后代总不强调，只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常常把物质利益的原则，一下子变成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有一点偷天换日的味道。他们不讲全体人民的利益解决了，个人的利益也就解决了；他们所强调的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这种倾向，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表现。历史上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英勇牺牲，他们也不是为个人的眼前利益，而是为他们这个阶级的利益，为这个阶级的后代的利益。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4页

公是对私来说的，私是对公来说的。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4页

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像他们那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那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只看到足下,不想到前途,不想到远景,那还有什么千里旅行的兴趣和热情呢?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6页

3. 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宣传教育,并处理好远大理想和现行政策的关系

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并且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4页

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6页

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

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6页

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把二者混为一谈，无疑是很不适当的。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6页

任何地方的共产党必须将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另一件全然不同的事物即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区分开来，因为后者是这个思想体系的最终目标。

特别是在中国，我们必须严格地将观察、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共产主义方法，同我们实际采用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加以区别。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实现新民主主义政策是我们的近期目标。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方法，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我们现在的社会革命的民主阶段；而没有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我们就不能将共产主义哲学正确地运用于中国的实际。

《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82页

（四）加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使之为广大党员、群众所掌握

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还须要我们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没有这样一种努力是一切都不成功的。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9页

人们的实践，特别是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的实践，没有不同这种或那种政策相联系的。因此，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否则，党员和群众就会脱离我们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错误的政策。

《关于工商业政策》（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86页

我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并且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4页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四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595页

（五）加强阶级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思想觉悟

你们部队经过两个月整训，从农民那里学会了诉苦运动，提高了觉悟，增强了团结。如果我们两百万军队都通过诉苦运动团结起来，就没有打不败蒋介石的道理。

《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6页

由于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改，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就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的团结。

《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九四八年三月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94页

青年们没有见过地主剥削、资本家剥削，也没有打过仗，没有看见过什么是帝国主义。就是现在二十几岁的人，当时也只有十岁左右，对旧社会什么也不知道。所以由他们的父母、老年人讲一讲过去，很有必要，不然不知道过去那段历史。

《同斯诺的谈话》（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407页

(六) 加强唯物主义教育，崇尚科学， 用无神论代替有神论

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7页

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

《关于农村调查》(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8页

我们要反对主观主义，就要宣传唯物主义，就要宣传辩证法。但是我们党内还有许多同志，他们并不注重宣传唯物主义，也不注重宣传辩证法。有些同志听凭别人宣传主观主义，也安之若素。这些同志自以为相信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却不努力宣传唯物主义，听了或看了主观主义的东西也不想一想，也不发议论。这种态度不是共产党员的态度。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27页

解放区的文化已经有了它的进步的方面，但是还有它的落后的方面。解放区已有人民的新文化，但是还有广大的封建遗迹。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这些都是群众脑子

里的敌人。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

《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11页

专制主义者利于人民愚昧，我们则利于人民聪明，我们要使人民都能逐渐地离开愚昧状态与不卫生的状态。各地政府与党组织，均应将报纸、学校、艺术、卫生四项文教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里面。

《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41页

在反唯心论的斗争中间，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干部队伍，使我们广大干部同人民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结论（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

要用唯物论代替唯心论，用无神论代替有神论。

《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31页

在社会主义社会，改造人们的世界观，为工人阶级造就新的知识分子，使教育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辩证唯物论不是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我们要用这种世界观教育全体人民，首先是劳动农民，改变各种

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第 300 页

二、宣传工作

（一）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和基本要求

1. 要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深入地进行宣传动员工作

政治宣传的普及乡村，全是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功绩。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5页

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96页

紧急动员全体工农劳动群众，以最积极的革命热情和实际行动来为争取战争胜利而努力而斗争，因此各级政府立即实行对于全苏区工农群众充分的政治动员，使每个工农分子，都了

解这一战争关于本身前途的意义，关于苏维埃在全国胜利的重要关节，认识现全国革命力量增大和反革命的挣扎，来鼓起工农群众的战争热情和阶级的决心，积极的准备和参加前线和后方的战争中一切实际工作，去为粉碎敌人大举进攻而战斗，这是我们阶级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

同项英等发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二号命令——关于战争紧急动员》（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三日），《红色中华》1932年10月16日

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80页

在党政军民中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建立起持久抗战胜利信心，争取持久，准备艰苦奋斗，是一切工作的重心。

《各方动员战胜敌人对晋察冀边区的围攻》（一九三八年十月二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69页

我们要在人民群众中间，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人民认识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动向，对于自己的力量具备信心。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31页

必须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使一切指战员明了任务的光荣与重要性，指出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与在解放区作战的不同，指出战胜国民党的各项条件，使一切人具有克服困难的决心与勇气，具有远征意志，完成充分的精神准备。

《做好到国民党区域作战的准备工作》（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77页

在几万万农民中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就全国来说，时间还不算很久，经验还不算很多。特别是我们还没有在全党进行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工作，这就使得很多的同志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提起注意，不明了这个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得党内的意志还不统一。现在我们党的六中全会很快就要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即将作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新的决议。我们应当根据这个决议做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工作，使得全党的意志统一起来。

《〈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序言》（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398页

宣传工作做得不好，可能使我们处于被动，犯错误。

《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640页

2. 加强领导，务使宣传工作完全符合党的路线和政策

一切报纸刊物宣传，分局均须抓紧，使不违背党的政策。

给朱瑞的电报（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404页

整个通讯社及报社的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分局必须经常注意，加以掌握，使我们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

《增强报刊宣传的党性》（一九四二年九月、十月），《毛泽东新闻工
作文选》第98页

最近一时期内各地宣传曾发生若干不适合目前党的政策的事件。……查各地中央局、中央分局对当地通讯社工作及报纸工作注意甚少，对宣传人员及宣传工作缺乏指导，尚不认识通讯社及报纸是革命政策与革命工作的宣传者组织者这种伟大的作用，尚不懂得领导人员的很多工作应该通过报纸去做。西北中央局已经发表了一个关于报纸工作的决定，各地亦应仿此办理，改正过去不讨论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的习惯，抓紧对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拿《解放日报》所发表的关于如何使报纸增强党性的许多文件去教育我们的宣传人员，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

《通讯社和报纸的宣传应符合党的政策》（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54—455页

过去几个月的宣传工作，正确地反映和指导了战争、土地改革、整党、生产、支援前线这些伟大斗争，帮助了这些斗争取得了伟大成绩，并且在宣传工作中占着主要成分，这是必须首先承认的。但是也必须看到一些错误缺点。其特点就是过左。其中有些是完全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立场和完全脱离中央路线的。望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其宣传部，新华总社和各地总分社，以及各地报纸的工作同志们，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中央路线，对过去几个月的宣传工作，加以检查，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务使对于战争、土地改革、整党、工人运动这些伟大的斗争，对于这一整个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保障其获得胜利。

《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81—1282页

各地领导机关（包括中央局、区党委两级）对于报纸、通讯社等极端重要的宣传机关放弃领导责任，或者虽未放弃领导，但是抓得不紧，听任许多错误观点广泛流行，宣传工作极不严肃。此种状况，必须坚决改正。改正方法之一，是中央局（分局）及区党委（省委）对于自己的报纸，必须于每天出版之前，由一个完全懂得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政策的同志，将大样看一遍，改正错误观点，然后出版。各地领导同志，必须以严肃的科学的态度对待宣传工作。

《必须以严肃科学态度对待宣传工作》（一九四八年六月三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01页

3. 宣传要看对象，要有切合实际的内容和形式

宣传要切合群众的斗争情绪，除一般地发布暴动口号外，还要有适合群众斗争情绪尚低地方的日常生活的口号，以发动日常斗争，去联系着那些暴动口号。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98页

到一个地方要有适合那个地方的宣传口号和鼓动口号，又有依照不同的时间（如秋收与年关，蒋桂战争时期与汪蒋战争时期），制出不同的宣传和鼓动口号。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99页

这一借谷运动的完成，一定要靠着很好的宣传鼓动工作，宣传言词要非常通俗，并要用各种方法，如演新剧，化装讲演，贴标语，出画报等，使那些尚未请求借谷的群众一体明白，成为

全体农民群众自愿借谷的一个大运动。对那些未曾自动请求的群众，一定要禁止不做宣传而用强借摊派的命令主义方法。若用强借摊派的方法，不单会使苏维埃脱离群众，而且谷子一定要比用宣传方法借得少些。

同项英等发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二
十号——为革命群众借谷供给红军》（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红色中
华》1933年3月6日

要按照当地环境提出具体口号。如在落后的村子，要找出落后的原因，提出发动群众的具体口号。比如该地有反动地主威胁群众，因此群众不敢积极起来斗争，必须提出捉起这个地主的口号。又如当地政府人员犯了脱离群众的严重错误，使得群众不满意，就要从揭发这些人员的错误着手宣传，以发动群众斗争。

《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一九三三年六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
第270页

村的群众大会，是极能够教育群众、动员群众执行苏维埃任务，提高群众斗争情绪的，应该把它看作一种重要的动员与教育群众的方法。许多地方不注意开这种群众大会，那是不对的。

《乡苏怎样工作？》（一九三四年四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
第353页

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现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有的一些，沧海一粟，而且方法不合民众口味，神气和民众隔膜，必须切实地改一改。其次，不是一次动员就够了，抗日

战争的政治动员是经常的。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这样的背诵是没有人听的；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81页

教育工农，是用共产党员的口，用文章，主要的还是用党的抗日的行动，使工农懂得要抗日要反对汉奸势力的目的。

《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45页

关于宣传工作，如果不了解敌友我三方的宣传状况，我们就无法正确地决定我们的宣传政策。

《改造我们的学习》（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2页

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许多人常常以为自己写的讲的人家都看得很懂，听得很懂，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他写的和讲的是党八股，人家哪里会懂呢？“对牛弹琴”这句话，含有讥笑对象的意思。如果我们除去这个意思，放进尊重对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讥笑弹琴者这个意思了。为什么不看对象乱弹一顿呢？何况这是党八股，简直是老鸦声调，却偏要向人民群众哇哇地叫。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吗？

《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36页

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

《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37页

“建军五百万”，“消灭敌人五百个旅的正规军”，“大约五年左右基本上打倒国民党”，这些话简单明了，是口号式的。口号的作用，就是好讲好传。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一九四八年九月），《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44页

这篇文章里所描写的“四对比、五算账”，就是向农民说明两种制度谁好谁坏、使人一听就懂的一种很好的方法。这种方法有很强的说服力。它不是像有些不善于做宣传的同志那样，仅仅简单地提到所谓“或者走共产党的道路，或者走蒋介石的道路”，只是企图拿大帽子压服听众，手里并无动人的货色，而是拿当地农民的经验向农民作细致的分析，这就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60—461页

4. 宣传要实事求是，既要讲好的形势和光明前途，又要讲困难和问题

我们应当把世界进步的情况和光明的前途，常常向人民宣传，使人民建立起胜利的信心。同时，我们还要告诉人民，告诉同志们，道路是曲折的。在革命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物，还有许多困难。……我们要承认困难，分析困难，向困难作斗争。

《关于重庆谈判》（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63页

在农民群众中，有系统地和反复地宣传我党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在向农民作宣传的时候，不但要解释合作化的好处，也要指出合作化过程中会要遇到的困难，使农民有充分的精神准备。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25页

宣传的时候要作得恰当，要实事求是，对情况的估计、分析，应该是好的就说好的，坏的就说坏的，有多大程度的缺点就说多大程度的缺点，不要夸大。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97页

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

《如实公开报道灾情》（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74页

（二）新闻、报刊工作

1. 报纸是组织群众、教育群众和指导工作、推动工作的重要武器

《时事简报》是苏维埃区域中提高群众斗争情绪、打破群众保守观念的重要武器，在新争取的区域对于推动群众斗争更有伟大的作用。因此，本部决定要红军和当地政府普遍地举办起来。

《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一九三一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59页

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

《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9页

各部门利用报纸做工作的事，我想还要讨论一次，以促中央各部门同志的注意。各根据地当局也还未把报纸看作自己极重要武器，我想要写一电报（或须用书记处名义），提出此种任务。

《关于报纸和翻译工作问题给何凯丰的信》（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41页

《解放日报》在边区已成为一个组织者。没有《解放日报》，在这样一个人口稀少、地域辽阔、在全中国算是经济文化很落后的地区工作，是很困难的。有一个《解放日报》，就可以组织

起整个边区的政治、文化生活。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11页

我们地委的同志，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反映政治、军事、经济并且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武器，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个武器。要以很大的精力来注意这个工作，使它一年比一年进步。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11页

过去我们学会了一种工作方式，就是开会。这个方式各处盛行，多年以来我们就没有放弃过这种工作方式。如果你们再把办报这种工作方式采用起来，那末许多道理和典型就可以经过报纸去宣传。现在我们要学会这种工作方式。现在我们边区，开会是最重要的工作方式，报纸发出去就可以省得开许多会。我们可以把许多问题拿到报纸上讨论，就等于开会、开训练班了，许多指示信可以用新闻来代替，所以报纸可以当做重要的工作方式和教育方式。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12页

这样来办报，全边区可以有千把种报纸，这叫做全党办报。一个机关也可以办报，党员非党员都可以参加，这叫做党与非党联盟。这样一来，我们的报纸可以起很大的作用。过去在这一点上注意不够，现在要各机关首长负责，把报纸当做自己很好的工作方式。我们有很多的政治、经济工作，如果办好报纸，就可以使这些工作做得更好。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13页

报纸这个东西是反映和指导政治经济工作的一种武器。

《报纸是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武器》（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15页

同志们是办报的。你们的工作，就是教育群众，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务，和党的方针政策。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19页

第一书记（其他书记也是一样）要特别注意报纸和刊物，不要躲懒，每人至少要看五份报纸，五份刊物，以资比较，才好改进自己的报纸和刊物。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九五七年七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51页

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

《给刘建勋、韦国清的信》（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38页

2. 增强新闻、报刊宣传的党性

● 共产党的使命就是党报的使命，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党的路线和政策

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建设

这样一个党的主观客观条件也已经大体具备，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帮助进行这件伟大的工程，不是一般党报所能胜任的，必须有专门的党报，这就是《共产党人》出版的原因。

《〈共产党人〉发刊词》（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02—603页

延安《新中华报》自改为共产党机关报以来，已一年了。这个小型报，依我看，是全国报纸中最好的一个。其主要的原因，一是共产党办的，二是在民主政治下。没有这两个同时具备的条件，要办得这样好，是不可能的。

《纪念〈新中华报〉新刊一周年》（一九四〇年二月七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49页

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各地应注意接收延安的广播。重要文章除报纸、刊物上转载外，应作为党内、学校内、机关部队内的讨论与教育材料，并推广收报机，使各地都能接收，以广宣传，是为至要。

《关于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五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54页

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

《延安〈解放日报〉发刊词》（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52页

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是本报的使命，……

《延安〈解放日报〉发刊词》（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53页

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地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18页

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18页

办好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19页

各地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

《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27页

要抓报纸。中央，各级党委，凡是出版报纸的地方，都要把办报看成大事。今年这一年，报纸上片面地、不合实际地宣传要改善人民生活，而对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

朴素、同甘共苦这些东西，很少宣传，以后报纸的宣传重点要放到这方面来。广播电台讲的那些东西，恐怕也是从报纸上来的。所以，要把新闻记者、报纸工作人员和广播工作人员召集起来开会，跟他们交换意见，告诉他们宣传的方针。

《宣传勤俭建国，提倡艰苦朴素》（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83—184页

- 报纸是有阶级性的，必须反对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

报上的宣传要看对人民有利无利。

在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
《人民日报》1968年9月1日

听说你们那里有人提出通讯社的消息有没有阶级性的问题。在阶级消灭之前，不管通讯社或报纸的新闻，都有阶级性。资产阶级所说的“新闻自由”是骗人的，完全客观的报道是没有的。美国的通讯社和报纸，现在也报道一下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情形，它是想做生意，所以做些姿态出来给人看看，因为经济危机压迫着它。

《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3—264页

党外报纸当然不应当办得和党报一模一样，应有它们自己的特色。但是，它们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和其它报纸一致的。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相同。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

们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展开辩论，以求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的认识。新闻记者中，有一部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也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也应当考虑、研究、批评这个错误观点。教条主义的新闻观点和八股文风，也是应当批判的。这一方面的东西是很讨厌的。党报，包括本报在内，在这一方面犯有错误。这一方面的错误，在辩论中也必须展开批判。这样一来，在新闻问题上就要作反“左”反右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08—509页

● 要政治家办报

省报问题是一个极重要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同《广西日报》的编辑们一道，包括版面、新闻、社论、理论、文艺等项。钻进去，想了又想，分析又分析，同各省报纸比较又比较，几个月时间就可以找出一条道路来的。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重要任务，你们自己、宣传部长、秘书长、报社总编辑，要共同研究。第一书记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的。

《给刘建勋、韦国清的信》（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38页

对国际问题应该有研究，有一定的看法，不要临时抱佛脚，发表感想式的意见。对许多国际问题都要有基本的看法，应该有比较深刻的议论。现在对国际问题的意见，有些是感想式的。

《报纸一个时期要有一定的方向》（一九五八年九月），《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09页

报纸宣传，报纸编辑工作，最近一两个月比较杂，看不出方向，究竟搞什么？今年春天，发表《从梅林看全国》的社论时是有方向的。最近一两个月，东西很多，方向不大明了。报纸应该有方向，在最近就要转变过来。省报也应当如此。

报纸一个时期要有一定的方向，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过来。

《报纸一个时期要有一定的方向》（一九五八年九月），《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09—210页

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

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曹操批评袁绍，“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没有头脑。还批评袁绍有其他缺点，兵多而分工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地虽广，粮虽多，完全可为我所用。

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

《要政治家办报》（一九五九年六月），《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15—216页

3. 办报要面向群众、依靠群众

《时事简报》的新闻，特别是本地的和近地的新闻，一定要是与群众生活紧密地关联着的。如牛瘟、禾死、米荒、盐缺、靖卫团、赤卫队、AB团造谣、共产党开会等等，都是与群众生活密切关联的，群众一定喜欢看。凡属不关紧急的事不登载。

《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一九三一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64页

一个报纸既已办起来，就要当作一件事办，一定要把它办好。这不但是办的人的责任，也是看的人的责任。看的人提出意见，写短信短文寄去，表示欢喜什么，不欢喜什么，这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使这个报办得好。

《〈中国工人〉发刊词》（一九四〇年二月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28页

《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报纸刊物，应吸收广大党外人员发表言论，使一切反法西斯反日本帝国主义的人都有机会在我党党报上说话，并尽可能吸收党外人员参加编辑委员会，使报纸刊物办得更好。党报工作者必须学会善于吸引党外人员在党报上写文章、写通讯的方式和方法。某些党报工作者的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态度，须受到批评。

《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一九四二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97页

《解放日报》自去年四月改版后有进步，摸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报纸材料的来源就无穷了。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要点》（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1页

办报和办别的事一样，都要认真地办，才能办好，才能有生气。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我们的报上天天讲群众路线，可是报社自己的工作却往往没有实行群众路线。例如，报上常有错字，就是因为没有把消灭错字认真地当做一件事情来办。如果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报上有了错字，就把全报社的人员集合起来，不讲别的，专讲这件事，讲清楚错误的情况，发生错误的原因，消灭错误

的办法，要大家认真注意。这样讲上三次五次，一定能使错误得到纠正。小事如此，大事也是如此。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19页

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同志们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往往不懂事，对于实际事物往往没有经历，或者经历很少。……报社的同志应当轮流出去参加一个时期的群众工作，参加一个时期的土地改革工作，这是很必要的。在没有出去参加群众工作的时候，也应当多听多看关于群众运动的材料，并且下工夫研究这些材料。……报社的同志也要经常向下边反映上来的材料学习，慢慢地使自己的实际知识丰富起来，使自己成为有经验的人。这样，你们的工作才能够做好，你们才能担负起教育群众的任务。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20页

你们的报纸搞得活泼，登些琴棋书画之类，我也爱看。青年不爱看可以不看，各有各的“条件反射”。一种东西，不一定所有的人都爱看。

《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2页

报纸是要有领导的，但是领导要适合客观情况。马克思主义是按客观情况办事的，客观情况就包括客观效果。群众爱看，证明领导得好；群众不爱看，领导就不那么高明吧？有正确的领导，有不正确的领导。正确的领导按客观情况办事，符合实际，群众欢迎；不正确的领导，不按客观情况办事，脱离实际，

脱离群众。使编报的人感到不自由，编出来的报纸群众不爱看，这个领导一定是教条主义的领导。我们要反对教条主义。

《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2页

报纸有一些专业化也好，好像《大公报》那样，开放自由市场的时候，我就爱看它，因为它登这一类的东西多，又登得快。但是，太过于专业化，有时就容易枯燥，人家看的兴趣就少。搞专业的人也要看专业之外的东西。

《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2页

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板起面孔办报不好。你们赞成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

《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2—263页

这封信的风格脱去了知识分子腔，使人高兴看下去。近来的文章和新闻报导，知识分子腔还是不少，需要改造。这封信在广东党内刊物上发表，由新华通讯社当作一份党内文件发到北京的。其实，这类通讯或文章，完全可以公开发表，无论对当地同志和全党同志都有极大好处。

《介绍一封信》（一九五八年七月三日、三十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302页

这两个座谈会所提出的意见，有很多都值得注意，应当采纳。他们的意见，无非是说，不应当关门办报，应当面向群众，要有大方向，又要新鲜活泼。

《对解放军报社两个座谈会情况简报的批语》（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三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518页

4. 要在报刊上揭露、反击敌人，报导好、坏典型，开展讨论和批评

我们现在不能再放任了。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派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

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哄”。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勾联俄国丧权辱国”。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我们说：“请看事实”。

《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关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

《〈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2—23页

简报上的许多材料，都应当公开报道，并发文字广播，三五天一次，方能影响运动的正确进行。如本号凤城县的好事例及各地的不好事例，凡典型性的，都应当公开报道。

《重视典型报道》（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五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76页

关于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的三字方针。

开，就是要开展批评。不开展批评，害怕批评，压制批评，是不对的。

好，就是开展得好。批评要正确，要对人民有利，不能乱批一阵。什么事应指名批评，什么事不应指名，要经过研究。

管，就是要把这件事管起来。这是根本的关键。党委不管，批评就开展不起来，开也开不好。

《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的方针》（一九五四年四月），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 177 页

群众来信可以登一些出来，试试看。政府和有关的业务部门有不同意见，报馆可以和他们研究商量一下，在报上加以解释，再看结果如何。一点不登恐怕不大好，那样业务部门会犯官僚主义，不去改进工作。

《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262 页

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时候要为人家准备楼梯，否则群众包围起来，他就下不了楼。反对官僚主义也是这样。“三反”的时候，有许多部长就是中央给他们端了梯子接下楼来的。过去搞运动是必要的，不搞不行，但是一搞又伤人太多，我们应该接受教训。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有些人对别人总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了整自己，民主就越小越好。我看在文学、新闻等方面，解决问题要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上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

《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264 页

对人民内部问题进行批评，锋芒也可以尖锐。……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是尖锐得要帮了人而不是伤了人。

《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5页

关于百家争鸣问题，完全学术性的，在报上争来争去不会有影响。至于政策性的，恐怕就要分别一下情况。但是划范围也有困难，因为政策那么多。比如，你们说的节育和晚婚的宣传，报上文章一多了，有人就以为要修改婚姻法，赶快去结婚。这样，报纸也难办。在旧社会，报纸上的东西老百姓看了等于不看，现在报上一登可不同了。如果发现宣传上产生一些不良后果，可以写文章来解释说明，但是我们报上的文章往往不及时。至于范围怎样划法，各报可以自己回去研究。

《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5页

此版右角甘薯问题，很有兴趣，可以一看。这种讨论，是非常之好的。科学讨论，《人民日报》要多起来，要多得占篇幅五分之一左右，岂不是很好吗？请你们于衣食住行用五大要政讨论一下。一塘死水，需要搅动一下了。

《〈人民日报〉要多登科学讨论文章》（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86页

5. 报纸不但要务实还要务虚，要发好议论、写好评论

要在消息中插句把两句议论进去，使看的人明白这件事的意义。但不可发得太多，一条新闻中插上三句议论就觉得太多了。插议论要插得有劲，疲沓疲沓的不插还好些。不要条条都

插议论。许多新闻意义已明显，一看就明白，如插议论，就像画蛇添足。只有那些意义不明显的新闻，要插句把两句议论进去。

《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一九三一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61页

现在大家对报纸的反应比较好，报纸有进步，新闻、评论都有进步，但还要改进，不要满足。

评论大家写，各版包干是好办法。总编辑是统帅，要组织大家写，少数人写不行。

组织形式，这种“生产关系”有没有妨碍“生产力”的发展，要研究。各部门，各版可以竞赛。

写评论要结合情况和政治形势。转变要快。写得不要刻板，形式要多样化。政论应该像政论，但并不排斥抒情。

《组织大家写评论》（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03页

搞新闻工作，光务实，不务虚，不好。有了看法，有了意见，就要找机会、找题目发挥。

《报纸一个时期要有一定的方向》（一九五八年九月），《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09页

6. 报纸要重视理论工作

大公报、中国青年报的理论水平高于人民日报及其他京、津、沪各报，值得深省改进。人民日报社论不涉及理论（辩证法、唯物论），足见头脑里没有理论的影子，所以该报只能算是第二流报纸。

《关于〈人民日报〉等报纸的理论水平的批语》（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45页

《人民日报》要注意发表学术性文章，发表历史、哲学和其他的学术文章。

抓哲学，要抓活哲学。我写文章，不大引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报纸老引我的话，引来引去，我就不舒服。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列宁就很少引人家的话，而用自己的话写文章。当然不是说不要引人家的话，是说不要处处都引。

《〈人民日报〉要重视理论工作》（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二月），《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17页

《人民日报》要搞理论工作，不能只搞政治。《人民日报》最近组织一些学术讨论，这样做好。《人民日报》对教学改革问题发表过文章没有？《文汇报》上一篇文章《不可能什么都懂》，可以看看，可以转载。

《〈人民日报〉要重视理论工作》（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二月），《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17—218页

《人民日报》历来不注重思想理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文章很少，自然科学文章更少，把这个理论阵地送给《光明日报》、《文汇报》和《新建设》月刊。这种情况必须改过来才好。现在他们有了改的主意了，请书记处讨论一下，并给他们解决干部问题为盼！

《关于〈人民日报〉要注重思想理论工作的批语》（一九六四年二月三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20页

7. 培养出色的编辑和记者，提高报纸的编排水平

本地消息，至少占两版多至三版。排新闻的时候，应以本地为主，国内次之，国际又次之。对于外地与国际消息，应加以改造。对新华社的文章不能全登，有些应摘要，有些应印成小册子。不是给新华社办报，而是给晋绥边区人民办报，应根据当地人民的需要（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否则便是脱离群众，失掉地方性的指导意义。

《怎样办地方报纸》（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20页

凡新闻，标题必须有内容。原题并无内容，不能引人注目。

《关于标题、导语和综合报道》（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一月），《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57页

标题要吸引人看，这很重要。

《组织大家写评论》（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04页

编排的技巧性和编排的政治性是两回事，就《光明日报》说来，前者不足，后者有余。技巧性问题是完全可以改的。在编排技巧方面改一改，面目一新，读者是会高兴的。这件事也难，本报有志于此久矣，略有进展，尚未尽如人意。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29页

各省、市、自治区要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己的

科学家和技术人才，自己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家，要有自己的出色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和记者。

《培养出色的编辑和记者》(一九五七年七月),《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01页

报社的人应该经常到下边去，呼吸新鲜空气，同省委关系要搞好。下去又做工作，又当记者。不要长住北京，要活动一些。要经常到外边跑一跑。

《组织大家写评论》(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03页

做报纸工作的，做记者工作的，对遇到的问题要有分析，要有正确的看法、正确的态度。

《记者头脑要冷静》(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43页

记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静的头脑，要作比较。

……

记者要善于比较。……记者要善于运用这种方法。不要看到好的就认为全好，看到坏的就认为全坏。如果别人说全好，那你就问一问：是不是全好？如果别人说全坏，那你就问一问：一点好处没有吗？

记者的头脑要冷静，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这种思想方法，首先是各新华分社和《人民日报》的记者、北京的编辑部要有。不要人家讲什么，就宣传什么，要经过考虑。

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头脑要清楚，要冷静。

《记者头脑要冷静》(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43—444页

（三）对外宣传工作

加强国际宣传（电影、画册、报章、共同宣言、代表团等），取得各国的同情援助，抵货，不卖军火给日本而卖给我们。

《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一九三七年十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58页

新华社这几年做了一些工作。但是，驻外记者派得太少，没有自己的消息，有，也太少。为什么不派？没有干部？中国这么大，抽不出人？是不是中宣部过去没有管？

应该大发展，尽快做到在世界各地都能派有自己的记者，发出自己的消息。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82页

在我们自己方面，对外宣传不要夸大。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谦虚谨慎，把尾巴夹紧一些。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92页

一般地说，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他们怎样宣传，是他们的事。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

《对外宣传不要强加于人》（一九六七年——一九七〇年），《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431页

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

《对外宣传不要强加于人》(一九六七年——一九七〇年),《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431页

第一，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第二，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这样的宣传易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运动。

《对外宣传不要强加于人》(一九六七年——一九七〇年),《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432页

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

《对外宣传不要强加于人》(一九六七年——一九七〇年),《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432页

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已说了多遍了。至于他们除马列主义外，还杂有一些别的不良思想，他们自己会觉悟，我们不必当作严重问题和外国同志交谈。只要看我们党的历史经过多少错误路线的教育才逐步走上正轨，并且至今还有问题，即对内对外都有大国沙文主义，必须加以克服，就可知道了。

《对外宣传不要强加于人》(一九六七年——一九七〇年),《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433页

(四) 文风问题

1. 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文风，反对党八股

- 党八股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必须坚决反对
(参见第八编“关于党的建设”，第1926—1929页)

- 要有实际内容，言之有物，有说服力；反对空话连篇，言之无物

报告的内容要有切实的材料与意见，只讲空话的报告要取消。

《乡苏怎样工作?》(一九三四年四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
第348页

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

《〈鲁忠才长征记〉一文按语》(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58页

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

“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负幼稚的人，在他们中间散布坏影响，造成坏习惯。

《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33—834页

现在是在战争的时期，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延安虽然还没有战争，但军队天天在前方打仗，后方也唤工作忙，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欢写长报告。他们辛辛苦苦地写了，送来了，其目的是要我们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吗？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

《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34页

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又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我们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不是说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战争时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有内容的文章。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演说也是一样，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演说，是必须停止的。

《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34页

在写请示文电或写报告时，必须注意文字的简明扼要，条理清楚，便于阅读。现在有很多文电，既嫌冗长，又嫌杂乱。其

原因，是未经压缩，说了许多无须说的空话，或者没有分清条理，把杂乱无章的草稿随便往上送。其结果，使领导同志对这些文电很难看，或者就没有看，等于白写。今后一切向上级机关请示或报告情况和对下级发布指示的文电，所有起草和批阅文电的同志，必须以负责的精神，至再至三地分清条理，压缩文字，然后发出，否则应受批评。但压缩是指分清条理，去掉空话，并不是说可以省略必不可少的词类，可以违背语法，也不是说可以不顾文字的形象性和鲜明性。有些写得好的报告，虽然篇幅颇长，却能引人入胜，使人不厌其长。有些写得不好的报告，虽然篇幅不长，却使人难看。这里的区别就在是否有条理，是否说空话和是否合文法。

《中共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中的文字缺点的指示》
(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101页

凡是使人看不懂，看了之后觉得头痛，没有逻辑（内部联系），没有论证，因而没有说服力的文件，以后千万不要拿出来。

《对赵尔陆关于重工业生产建设方面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批语》
(一九五九年五月三十日、六月十七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280页

● 要靠实事求是，靠科学，靠有用；反对装腔作势，借以吓人

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和行动总要稍为科学一点才好，而一部分同志则恰恰与科学正相反对，一篇演说、一个行动已可以找出很多的矛盾出来。说话完全不顾及这话将要发生的影响，不管对不对，乱说一顿便了。“你乱说就是，横直他们只晓得那多”，这是何种非科学的态度！

《给林彪的信》(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70页

有些党八股,不只是空话连篇,而且装样子故意吓人,这里面包含着很坏的毒素。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鲁迅曾经批评过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科学的东西,随便什么时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评的,因为科学是真理,决不怕人家驳。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东西,表现在党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却生怕人家驳,非常胆怯,于是就靠装样子吓人;以为这一吓,人家就会闭口,自己就可以“得胜回朝”了。这种装腔作势的东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的。凡真理都不装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做下去。

《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34—835页

无论对什么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为这种吓人战术,对敌人是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这种吓人战术,是剥削阶级以及流氓无产者所惯用的手段,无产阶级不需要这类手段。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至于以装腔作势来达到名誉和地位的目的,那更是卑劣的念头,不待说的了。总之,任何机关做决定,发指示,任何同志写文章,做演说,一概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要靠有用。只有靠了这个才能争取革命胜利,其他

都是无益的。

《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35—836页

当着自己写文章的时候，不要老是想着“我多么高明”，而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你参加革命的时间虽然长，讲了错话，人家还是要驳。你的架子摆得越大，人家越是不理你那一套，你的文章人家就越不爱看。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7页

● 要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反对形式主义，现象罗列

写文章，做演说，著书，写报告，第一是大壹贰叁肆，第二是小一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还有大ABCD，小abcd，还有阿拉伯数字，多得很！幸亏古人和外国人替我们造好了这许多符号，使我们开起中药铺来毫不费力。一篇文章充满了这些符号，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不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说来说去还是一个中药铺，没有什么真切的内容。我不是说甲乙丙丁等字不能用，而是说那种对待问题的方法不对。现在许多同志津津有味于这个开中药铺的方法，实在是一种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来分类，不是按照事物的内部联系来分类的。单单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使

用一大堆互相没有内部联系的概念，排列成一篇文章、一篇演说或一个报告，这种办法，他自己是在做概念的游戏，也会引导人家都做这类游戏，使人不用脑筋想问题，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质，而满足于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既有问题，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这里所讲的分析过程，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常常问题是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这样，就不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能济事。因为这种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形式主义的方法，在我们党内很流行，所以必须揭破它，才能使大家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所办的事才能办好，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胜利。

《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38—839页

一切较长的文电，均应开门见山，首先提出要点，即于开端处，先用极简要文句说明全文的目的或结论（现在新闻学上称为“导语”，亦即中国古人所谓“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唤起阅者注意，使阅者脑子里先得一个总概念，不得不继续看下去。

《纠正文字缺点》（一九五一年二月），《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67页

我们现在有些文章，神气十足，但是没有货色，不会分析问题，讲不出道理，没有说服力。这种文章应该逐渐减少。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7页

- 要有生动活泼的语言；反对语言无味，像个瘪三

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吗？

《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37页

我们“生造”的东西太多了，总之是“谁也不懂”。句法有长到四五十个字一句的，其中堆满了“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许多口口声声拥护鲁迅的人们，却正是违背鲁迅的啊！

《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44页

我们要感谢这篇文章的那位没有署名的作者。他用满腔的热情，生动的笔调，详尽地叙述了一个区的合作化过程，这对于全国的合作化事业会有不小的贡献。我们希望每个省、每个专区、每个县都有一篇到几篇这样的文章。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490页

这个报告写得清简节约，又具体生动，又概括，是一个好报告。有些报告写得太长，结果无人看，或者看一半就丢下了。

《对中央转发高扬文的蹲点报告的批语和批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277页

● 要以高度的责任心，反复研究，拿出精品；反对粗心大意，不负责任

我们每天都要洗脸，许多人并且不止洗一次，洗完之后还要拿镜子照一照，要调查研究一番，生怕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你们看，这是何等地有责任心呀！我们写文章，做演说，只要像洗脸这样负责，就差不多了。拿不出来的东西就不要拿出来。须知这是要去影响别人的思想和行动的啊！一个人偶然一天两天不洗脸，固然也不好，洗后脸上还留着一个两个黑点，固然也不雅观，但倒并没有什么大危险。写文章做演说就不同了，这是专为影响人的，我们的同志反而随随便便，这就叫做轻重倒置。许多人写文章，做演说，可以不要预先研究，不要预先准备；文章写好之后，也不多看几遍，像洗脸之后再照照镜子一样，就马马虎虎地发表出去。其结果，往往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仿佛像个才子，实则到处害人。这种责任心薄弱的坏

习惯，必须改正才好。

《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40页

写一个传单要和熟悉情况的同志商量。列宁就是根据这样的调查和研究来写文章做工作的。

《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42页

第一条：“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

讲的是“留心各样的事情”，不是一样半样的事情。讲的是“多看看”，不是只看一眼半眼。我们怎么样？不是恰恰和他相反，只看到一点就写吗？

《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43页

不调查，不研究，提起笔来“硬写”，这就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44页

孔夫子提倡“再思”，韩愈也说“行成于思”，那是古代的事情。现在的事情，问题很复杂，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还不够。鲁迅说“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

《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44页

请注意：我们发出的任何一件东西，必须是精制品。

给陆定一的信（一九四八年二月四日）

除四害通知尚有缺点，不扎实，轻飘一些。这是因为没有研究各地已经取得的丰富经验，你脑子里对此问题还很不懂的原故。现在有大堆经验了，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将全国各省、市、县见于报纸的经验一齐找来仔细看一遍，边看边想，形成成套思想，然后下笔成文。至少改三遍、五遍，找彭真、刘仁及北京有经验的除害干部二三人及科学家二三人开一二次会，发表意见，修正文件，字斟句酌，逻辑清楚，文字兴致勃勃。文件可以长一点，达一千字至二千字左右也可以。总之使人看了感觉解决问题，百倍信心，千钧干劲，行动起来。内容要把人人振奋，改造国家，带动消灭人病、牲口病、作物病的道理讲清楚，这是理论。然后讲办法，也要讲得入情入理，使人觉得切实可行，没有外行话。要写这一部分，也要认真研究，下苦功钻一下。

《给胡乔木的信》（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36页

2. 文章应当具有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

我希望这个报纸好好地办下去，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

《〈中国工人〉发刊词》（一九四〇年二月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28页

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就需要这种战斗的风格。用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来的。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22页

本文作者懂得党的路线，他说得完全中肯。文字也好，使人一看就懂，没有党八股气。在这里要请读者注意，我们的许多同志，在写文章的时候，十分爱好党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也不讲究文法和修辞，爱好一种半文言半白话的体裁，有时废话连篇，有时又尽量简古，好像他们是立志要让读者受苦似的。本书中所收的一百七十多篇文章，有不少篇是带有浓厚的党八股气的。经过几次修改，才使它们较为好读。虽然如此，还有少数作品仍然有些晦涩难懂。仅仅因为它们的内容重要，所以选录了。哪一年能使我们少看一点令人头痛的党八股呢？这就要求我们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同志注意这件事，向作者提出写生动和通顺的文章的要求，并且自己动手帮作者修改文章。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67页

有人说，发长篇大论可以避免片面性，写短篇的杂文就不能避免片面性。杂文是不是一定会带片面性？我在上面讲了，片

面性往往是难免的，有些片面性也不是不得了。要求所有的人看问题都必须很全面，这样就会阻碍批评的发展。但是，我们还要求努力做到看问题比较全面，不管长文也好，短文也好，杂文包括在内，努力做到不是片面性的。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7页

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做经济工作的同志在起草文件的时候，不但要注意准确性，还要注意鲜明性和生动性。不要以为这只是语文教师的事情，大老爷用不着去管。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作起来做。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9页

这个文件看了两遍，觉得不大满意，不能动员群众。这次会议各类文件，以农村类文件为最好，每样事情交代清楚，前后次序有逻辑性，文字通顺，一般具有鲜明性和准确性，特别是人民公社一件为最好。其次，是陆定一同志论教育的文章，虽较长，理论水平颇高，逻辑性、准确性、鲜明性三者都具。其次，是民兵决议，写得很好，使人读得下去，读过后很舒服。其次，是商业类文件，也不错，可读。工业类文件要考下等了。有

一个较好的，就是那个不长的意见书，读得下去，提纲挈领。“说明要点”最差，我读了两遍，不大懂，读后脑中无映象。将一些观点凑合起来，聚沙成堆，缺乏逻辑，准确性、鲜明性都看不见，文字又不通顺，更无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态。其原因，不大懂辩证逻辑，也不大懂形式逻辑，不大懂语法学，也不大懂修辞学。我疑心作者对工业还不甚内行，还不大懂。如果真懂，不至于不能用文字表现出来。所谓不大懂辩证逻辑，就工业来说，就是不大懂工业中的对立统一，内部联系，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分别，因此构思写文，不可能有长江大河、势如破竹之势。

《对北戴河会议工业类文件的意见》(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367—368页

此件已阅，写的可以，是好的。但有骨头，无血肉，感到枯燥乏味，则是缺点。望你们在今后几个月内，搞出一个有骨有血有皮有毛的东西出来。要有逻辑有论证。否则仍然是形而上学的东西。十几年来，形而上学盛行，唯物辩证法很少人理，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

《对国家计委关于编制长期计划的程序问题报告的批语》(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十三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262页

3. 讲究逻辑、文法和修辞

文字结构必须学会合乎文法，禁止省略主词、宾词及其他必要的名词，形容词和副词要能区别其性质，等等。

《致胡乔木》(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90页

中央认为此种文字缺点的纠正，将使我们同志的头脑趋于精密，工作效能有所提高，故须予以重视，对已存缺点认真地加以改革。

《纠正文字缺点》（一九五一年二月），《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68页

我们的同志中，我们的党政军组织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中，我们的文学家教育家和新闻记者中，有许多是精通语法、会写文章、会写报告的人。这些人既然能够做到这一步，为什么我们大家不能做到呢？当然是能够的。

修改《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加写的文字（一九五一年六月六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411页

讲一点请你们注意写文章的问题。我希望在座的都变成“国文教员”。你们的文章写得很不错，也许略有缺点。你们要注意帮助人家，把文章的作风改一改。现在许多同志的文章，空话连篇的也有，但比较少；主要的缺点就是古文多，半文半白的味道很大。写文章要讲逻辑。就是要注意整篇文章、整篇说话的结构，开头、中间、尾巴要有一种关系，要有一种内部的联系，不要互相冲突。还要讲文法。许多同志省掉了不应当省掉的主词、宾词，或者把副词当动词用，甚至于省掉动词，这些都是不合文法的。还要注意修辞，怎样写得生动一点。总之，一个合逻辑，一个合文法，一个较好的修辞，这三点请你们在写文章的时候注意。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结论（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

用字太硬，用语太直，形容词太凶，效果反而不大，甚至使人不愿看下去。宜加注意。

《对〈文艺报〉“再批判”特辑编者按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九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9页

这里逻辑不清，相当混乱，故作如此修改。所谓逻辑，有一个必须遵守的通用原则，就是“全量大于部分”，或者说，“大比小为大，小比大为小”。说话，作文，必须注意及之。

《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二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568页

4. 下苦功学习语言

一个人七岁入小学，十几岁入中学，二十多岁在大学毕业，没有和人民群众接触过，语言不丰富，单纯得很，那是奇怪的。但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现在我们有許多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也不学语言。他们的宣传，乏味得很；他们的文章，就没有多少人欢喜看；他们的演说，也没有多少人欢喜听。为什么语言要学，并且要用很大的气力去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我们不是硬搬或滥用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适用的东西。因为中国原有语汇不够用，现在我们的语汇

中就有很多是从外国吸收来的。例如今天开的干部大会，这“干部”两个字，就是从外国学来的。我们还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现在中党八股毒太深的人，对于民间的、外国的、古人的语言中有用的东西，不肯下苦功去学，因此，群众就不欢迎他们枯燥无味的宣传，我们也不需要这样蹩脚的不中用的宣传家。什么是宣传家？不但教员是宣传家，新闻记者是宣传家，文艺作者是宣传家，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也都是宣传家。比如军事指挥员，他们并不对外发宣言，但是他们要和士兵讲话，要和人民接洽，这不是宣传是什么？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只要他不是哑巴，他就总有几句话要讲的。所以我们的同志都非学习语言不可。

《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37—838页

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

《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41页

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

的词语。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3卷第850—851页

三、文 化

(一) 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认识的基本观点。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
第663—664页

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我们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忘记这个基本观点。

这样说来，问题是很清楚的，我们要革除的那种中华民族旧文化中的反动成分，它是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的；而我们要建立的这种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它也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旧文化的根据；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乃

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
第664页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
第694页

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
第695页

中国自从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以来,中国社会就逐渐改变了性质,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变成了半封建社会,虽然封建经济还是占优势。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封建经济说来,它是新经济。同这种资本主义新经济同时发生和发展着的新政治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而在观念形态上作为这种新的经济力量 and 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没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这些阶级的政治力量,所谓新的观念形态,所谓新文化,是无从发生的。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
第695页

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99页

以社会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文化必须是反映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反映到我们的国民文化也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但就整个社会来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形成这种整个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所以还不能有这种整个的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5页

至于文化,它是政治、经济的反映,又指导政治、经济;它反映军事,又指导军事。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09页

文化是反映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但它同时又能指导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09—110页

(二) 封建主义文化、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文化

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9页

帝国主义列强……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9—630页

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

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地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中国已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在的中国,在日本占领区,是殖民地社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而不论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都是封建半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作为统治的东西来说,这种社会的政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

这些统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就是我们革命的对象。我们要革除的,就是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政治、旧经济和那为这种旧政治、旧经济服务的旧文化。而我们要建立起来的,则是与此相反的东西,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

经济和新文化。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
第664—665页

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東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
第694—695页

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国的革命力量,它们是反对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的。这些旧东西是由两部分合成的,一部分是中国自己的半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另一部分是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而以后者为盟主。所有这些,都是坏东西,都是应该彻底破坏的。中国社会的新旧斗争,就是人民大众(各革命阶级)的新势力和帝国主义及封建阶级的旧势力之间的斗争。这种新旧斗争,即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这种斗争的时间,从鸦片战争算起,已经整整一百年了;从辛亥革命算起,也有了差不多三十年了。

但是如前所说，革命亦有新旧之分，在某一历史时期是新的东西，在另一历史时期就变为旧的了。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百年中，分为前八十年和后二十年两个大段落。这两大段落中，各有一个基本的带历史性质的特点，即在前八十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属于旧范畴的；而在后二十年，由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便属于新范畴了。旧民主主义——前八十年特点。新民主主义——后二十年特点。这种区别，在政治上如此，在文化上也是如此。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
第695—696页

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前，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那时的所谓学校、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说基本上，是说那中间还夹杂了许多中国的封建余毒在内）。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可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
第696—697页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98页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98页

资产阶级顽固派，在文化问题上，和他们在政权问题上一样，是完全错误的。他们不知道中国新时期的历史特点，他们不承认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他们的出发点是资产阶级专制主义，在文化上就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一部分所谓欧美派的文化人（我说的是一部分），他们曾经实际赞助过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剿共”，现在似乎又在赞助什么“限共”、“溶共”政策。他们不愿工农在政治上抬头，也不愿工农在文化上抬头。资产阶级顽固派的这条文化专制主义的路是走不通的，它同政权问题一样，没有国内国际的条件。因此，这种文化专制主义，也还是“收起”为妙。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4页

诚然，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3卷第855页

封建社会有封建文化，封建文化是宣传封建主义的道理。资本主义社会也有资本主义的文化，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没有文化，也没法建立起来。现在中国还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不占优势，所以中国的文化也是很弱的。在真正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文化提高了生产技术。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老资本主义，而是新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10页

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1083页

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

《不要四面出击》（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73—74页

（三）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

1. 没有革命文化事业，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的水平，这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同样有极大的重要性。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25—126页

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为着动员民众一切力量，加入于伟大的革命斗争，为着创造革命的新后代，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于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红色中华》二苏大特刊第3期

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

的重要性。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8页

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五四”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47页

如果不发展文化，我们的经济、政治、军事都要受到阻碍。现在我们是被拖住了脚，落后的东西拖住了好的东西，比如不识字、不会算账，妨碍了我们的经济、政治、军事的发展。假如我们都能识字，文化高一点，那我们就会更快地前进。所以我提议，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提出发展文化这个问题，请大家考虑考虑，调查研究一下。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10页

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11页

为着战胜日本侵略者，于充分注意军事、政治、经济之外，还要注意文教工作。

《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

第3卷第241页

为着提高解放区人民大众首先是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群众的觉悟程度和培养大批工作干部，必须发展解放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解放区的文化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在推进他们的工作时，应当根据目前的农村特点，根据农村人民的需要和自愿的原则，采用适宜的内容和形式。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1091页

它为现在的革命战争与将来的革命建设而服务，没有它，革命战争与革命建设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面前还有强大的敌人与艰苦的战斗，因此，我们十分需要广大有力的革命文化事业，为战胜敌人克服困难之共同目标而奋斗，为独立、民主、和平的新民主主义中国而奋斗。

修改新华社社论《五四运动二十八周年》加写的文字（一九四七年

五月三日），《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卷第186页

2. 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彻底些说吧，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几年来风驰雨骤，成长得好，与成长得不好，还依然在未知之数。诸君，我们如果晓得全世界尚没有真正的新文化，这倒是我们一种责任呵！

《发起文化书社》(一九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早期文稿》
第 498 页

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2 卷
第 663 页

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所谓中华民族的新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2 卷
第 665 页

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2 卷
第 692 页

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
第698页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但是就整个政治情况、整个经济情况和整个文化情况说来,却还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新民主主义的。因为在现阶段革命的基本任务主要地是反对外国的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是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的革命。就国民文化领域来说,如果以为现在的整个国民文化就是或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这是不对的。这是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宣传,当作了当前行动纲领的实践;把用共产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去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当作了中国民主革命阶段上整个的国民教育和国民文化的方针。以社会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文化必须是反映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反映到我们的国民文化也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但就整个社会来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形成这种整个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所以还不能有这种整个的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由于现时的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部分,是它的一个伟大的同盟军;这种一部分,虽则包含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因素,但是就整个国民文化来说,还不是完全以社会主义文化的资格去参加,而是以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资格去参加的。

.....

由此可知，现阶段上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4—706页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6页

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7页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在这点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7页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8页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8—709页

现在许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了，这很好。但是“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有些人则连“少许”还没有实行，却在那里提倡“化”呢！所以我劝这些同志先办“少许”，再去办“化”，不然，仍旧脱离不了教条主义和党八股，这叫做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没有结果的。

《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41页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同样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58页

要求取消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发展民族的科学的的大众的文化教育；……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64页

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78页

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83页

3.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98页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他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的环境里，他忍受着，反抗着，正如陕北公学的同志们能够在这样坏的物质生活里勤谨地学习革命理论一样，是充满了艰苦奋斗的精神的。

《论鲁迅》（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2—

43页

鲁迅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的，但他会杀回马枪，朝着他所经历过来的腐败的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的恶势力进攻。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他近年来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与自由而斗争。鲁迅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的远见。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

鲁迅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的斗争精神。刚才已经提到，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

鲁迅的第三个特点是他的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

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痕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他具备坚决的心。……

综合上述这几个特点，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鲁迅的一生就贯穿了这种精神。所以，他在文艺上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论鲁迅》（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3—44页

文艺是一支军队，它的干部是文艺工作者。它还要有一个总司令，如果没有总司令，它的方向就会错的。鲁迅、高尔基就相当于总司令，他们的作品，他们说的话，就当作方向的指导。

《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31页

4. 新民主主义文化只能由共产主义思想来领导

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97页

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98页

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4页

由于现时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但是这种领导，在现阶段是领导人民大众去作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所以现在整个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还是新民主主义的，不是社会主义的。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5—706页

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55页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16页

5. 改变文化落后的面貌，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现代化

我们中国是处在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情况中。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

《中共中央给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贺电》（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毛泽东文艺论集》第129—130页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5页

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

《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8页

过去说中国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打球也不行，游水也不行，女人是小脚，男人留辫子，还有太监，中国的月亮也不那么很好，外国的月亮总是比较清爽一点，总而言之，坏事不少。但是，经过这六年的改革，我们把中国的面貌改变了。我们的成绩是谁也否认不了的。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7页

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8页

就是要安下心来，使我们可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

《中尼边界要永远和平友好》（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62页

6.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促进艺术发展、科学进步和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

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对学术问题的不同意见不应禁止谈论》（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9页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54—55页

我们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还谈到这一点，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这个问题曾经谈过。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他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大的范围内，让杜威来争鸣好不好？那不好嘛。让胡适来争鸣好不好呢？也不好。那么说胡适要回来可以不可以呢？只要他愿意回来，是可以回来的，让我们批评过他以后再回来，就批评不着他了嘛，批评已经过去嘛。只有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香港报纸、台湾报纸在北京出版是不是许可？应该不许可，不许可有好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

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五月二日)，《毛泽东文艺论集》第144—145页

我们坚持对立统一的观点，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放香花的同时，也必然会有毒草放出来。这并不可怕，在一定条件下还有益。

有些现象在一个时期是不可避免的，等它放出来以后就有办法了。比如，过去把剧目控制得很死，不准演这样演那样。现在一放，什么《乌盆记》、《天雷报》，什么牛鬼蛇神都跑到戏台上来了。这种现象怎么样？我看跑一跑好。许多人没有看过牛鬼蛇神的戏，等看到这些丑恶的形象，才晓得不应当搬上舞台的东西也搬上来了。然后，对那些戏加以批判、改造，或者禁止。有人说，有的地方戏不好，连本地人也反对。我看这种戏演一点也可以。究竟它站得住脚站不住脚，还有多少观众，让实践来判断，不忙去禁止。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95—196页

统一物的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有个次。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在一定的意义上，这可以比作原子里面的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一个原子分两部分，一部分叫原子核，一部分叫电子。原子核很小，可是很重。电子很轻，一个电子大约只有最轻的原子核的一千八百分之一。原

子核也是可以分割的，不过结合得比较牢固。电子可有些“自由主义”了，可以跑掉几个，又来几个。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也是对立统一，有主有次。从这样的观点看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有益无害的了。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97页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呢？它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我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事例。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

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9—230页

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2页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那末，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

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这是一些政治标准。为了鉴别科学论点的正确或者错误，艺术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当然还需要一些各自的标准。但是这六条政治标准对于任何科学艺术的活动也都是适用的。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难道有什么有益的科学艺术活动会违反这几条政治标准的吗？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3—234页

在座的，有些是党内的，也有党外的，共产党的道理你们也懂得一点，就是要推动，要统一思想，要有共同语言。不然你说官僚主义，他说不是。你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说不放；放了一点，有些不好的东西出来，就慌了手脚。总而言之，很怕放就是了。我们主张百花齐放，有的人很怕百花，现在百花齐放的环境还没有造成。

《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50页

我们的文化教育政策……采取有领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还没有造成放的环境，还是放得不够，是百花想放而不敢放，是百家想鸣而不敢鸣。

《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53页

文艺批评怎么样了？这也要看到知识分子是两头小、中间大这个基本状况，这就是为什么要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缘故。为什么有人怕放呢？就是没有看到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希望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好、文化提高，要经过他们去教育中国几亿人民。

《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54页

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这对于为人民而写作是有利的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你写错了，那末，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斗争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8页

“放”还是“收”？这是个方针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同志们在讨论中间是不赞成收的，我看这个意见很对。党中央的意见就是不能收，只能放。

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

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8—279页

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9页

我们主张放的方针，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也不要怕毒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不怕批评，它是批评不倒的。共产党、人民政府也是这样，也不怕批评，也批评不倒。错误的东西总会有的，并不可怕。最近一个时期，有一些牛鬼蛇神被搬上舞台了。有些同志看到这个情况，心里很着急。我说，有一点也可以，过几十年，现在舞台上这样的牛鬼蛇神都没有了，想看也看不成了。我们要提倡正确的东西，反对错误的东西，但是不要害怕人们接触错误的东西。单靠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人接触不正常的现象，禁止人接触丑恶的现象，禁止人接触错误思想，禁止人看牛鬼蛇神，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当然我并不提倡发展牛鬼蛇神，我是说“有一点也可以”。某些错误东西的存在是并不奇怪的，也

是用不着害怕的，这可以使人们更好地学会同它作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0—281页

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

《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91页

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苏联同志不理解。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范围的、人民内部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革命不在内。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

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党的文艺政策应当调整》（一九七五年七月），《毛泽东文艺论集》第231页

7. 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借鉴吸收外国进步文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

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3—534页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7—708页

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55页

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3卷第860页

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

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然而我们中国有些人却崇拜旧的过时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不仅不适用而且有害。这样的东西必须抛弃。

《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91页

关于继承文化遗产问题，我并不赞成牛鬼蛇神，可以让它演出来，批评一下。文化遗产中有许多毒素和糟粕呢！对一些传统剧目过去我们禁了几年，别人有些反感，现在开放了，也可以批评，但批评要说理。一些有牛鬼蛇神的戏，看看也可以，我们看的《封神演义》不是牛鬼蛇神吗？社会上有牛鬼蛇神，剧本里有也不稀奇。中国人不一定很相信鬼，演来看看也没有什

么可怕。许多青年都不懂什么是牛鬼蛇神，让他们看看也不要紧。拿个更好的东西来代替它当然很好，但还拿不出来，就让它演吧！对牛鬼蛇神，戏是看，鬼不一定相信。

《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57页

民歌与古典诗的统一，以外国诗作参考。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一九五八年五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202页

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我们要注意区别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不同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

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加以利用。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我所了解的是这样，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这样。至于充分利用文化遗产，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中国古典著作多得很，现在是分门别类地在整理，用现代科学观点逐步整理出来，重新出版。

《应当充分地批判地利用文化遗产》（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25页

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6—707页

外国文化也一样，其中有我们必须接受的、进步的好东西，而另一方面，也有我们必须摒弃的腐败的东西，如法西斯主义。

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

《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92页

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

收外国文化。苏联所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文化的范例。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1083页

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的。在封建时代，唐朝兴盛的时候，我国曾经和印度发生密切的关系。我们的唐三藏法师，万里长征去取经，比较后代学外国困难得多。有人证明，我们现在用的乐器大部分是西域来的，就是从新疆以西的地区来的。我们这个民族，从来不拒绝接受别的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时候，特别是中日战争我国失败到辛亥革命那一段时间，就是说从一八九四年到一九一一年那一段时间，全国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学习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学习他们的科学，有一个很高的高潮。那时，我们的先辈（在座的也有）很热诚地参加学习西方的活动，许多留学生到日本、到西洋去。那一次学习，对我们国家的进步是有很大的帮助的，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现在还给我们留下了很大一批自然科学工作者，一批宝贵的遗产。

《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三年二月七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64页

文化交流，现在就可以做啦！日本歌舞伎剧团来了，它的演出很好，我去看了很高兴，对促进两国人民的谅解有帮助，在艺术上对我们也有所帮助。我们可以相互地取长补短，相互帮助。

《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的谈话》（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86页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1页

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比如学医，细菌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病理学，这些都要学。也要把中国的好东西都学到。要重视中国的东西，否则很多研究就没有对象了。中国历史上有好多东西没有传下来。唐明皇不会做皇帝，前半辈会做，后半辈不会做。他是懂艺术的，他是导演，也会打鼓，但是没有把东西传下来。还要靠你们。你们是“西医”，但是要中国化，要学到一套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

学了外国的，就对中国的没有信心，那不好。但不是说不要学外国。

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某一点上有独特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1页

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要《死魂灵》，也要《阿Q正

传》。鲁迅翻译了《死魂灵》、《毁灭》等等，但是他的光彩主要不在这方面，是在创作。

中国的文化应该发展。外国的乐曲不会听，不会奏，是不好的。外国作品不翻译是错误的，像西太后反对“洋鬼子”是错误的。要向外国学习，学来创作中国的东西。

演些外国音乐，不要害怕。隋朝、唐朝的九部乐、十部乐，多数是西域音乐，还有高丽、印度来的外国音乐。演外国音乐并没有使我们自己的音乐消亡了，我们的音乐继续在发展。外国音乐我们能消化它，吸收它的长处，就对我们有益。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

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这样争论就可以统一了。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保守主义，这两个东西对中国都是不利的。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

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

这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

非驴非马也可以。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是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

西洋的东西也是要变的。西洋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都好，我们要拿它好的。我们应该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分。

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鲁迅的小说，

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

你们是学西洋的东西的，是“西医”，是宝贝，要重视你们，依靠你们。不要学西洋的东西的人办事，是不对的。要承认他们学的东西是进步的，要承认近代西洋前进了一步。不承认这一点，只说他们教条主义，不能服人。教条主义要整，但是要和风细雨地整。要重视他们，但是要说服他们重视民族的东西，不要全盘西化。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2—83页

画男女老少裸体 Model 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

《关于绘画、雕塑使用模特问题》（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419页

画画是科学，就画人体这问题说，应走徐悲鸿素描的道路，而不走齐白石的道路。

《关于绘画、雕塑使用模特问题》（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毛泽东文艺论集》第230页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关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批示》（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艺论集》第227页

8. 保持和发扬中国文化的民族风格、民族特色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4页

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7页

我们要向先进的国家和民族学习，学习对本民族有用的东西，但不是所有的方面都要学别的民族，而要保持本民族的特点。比如，我们中国的文工团到外国去演戏，演我们民族的戏剧、歌舞，大受别国人民的欢迎；如果我们全学外国的戏剧等在外国演出，人家是不欢迎的。一个民族能在世界上在很长的时间内保存下来，是有理由的，就是因为有其长处及特点。

《同达赖喇嘛的谈话》（一九五五年三月八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13页

手工业的各行各业都是做好事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有。还有工艺美术品，什么景泰蓝，什么“葡萄常五处女”的葡萄。还有烤鸭子可以技术出口。有些服务性行业，串街游乡，修修补补，王大娘补缸，这些人跑的地方多，见识很广。北京东晓

市有六千多种产品。

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

《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六年三月四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2页

提高工艺美术品的水平和保护民间老艺人的办法很好，赶快搞，要搞快一些。你们自己设立机构，开办学院，召集会议。杨士惠是搞象牙雕刻的，实际上他是很高明的艺术家。他和我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看着我，就能为我雕像。我看人家几天，恐怕画都画不出来。

《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六年三月四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2页

说中国民族的东西没有规律，这是否定中国的东西，是不对的。中国的语言、音乐、绘画，都有它自己的规律。过去说中国画不好的，无非是没有把自己的东西研究透，以为必须用西洋的画法。当然也可以先学外国的东西再来搞中国的东西，但是中国的东西有它自己的规律。音乐可以采取外国的合理原则，也可以用外国乐器，但是总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

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现在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搞，听凭人选择。外国的许多东西都要去学，而且要学好，大家也可以见见世面。但是在中国艺术中硬搬西洋的东西，中国人就不欢迎。这和医学不同。西医的确可

以替人治好病。剖肚子，割阑尾，吃阿斯匹灵，并没有什么民族形式。当归、大黄也不算民族形式。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

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像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76—77页

我们当然提倡民族音乐。作为中国人，不提倡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不行的。但是军乐队总不能用唢呐、胡琴，这等于我们穿军装，还是穿现在这种样式的，总不能把那种胸前背后写着“勇”字的褂子穿起。民族化也不能那样化。乐器是工具。当然工具好坏也有关系，但是如何使用工具才是根本的。外国乐器可以拿来用，但是作曲不能照抄外国。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77页

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点，只要有人欢迎。全盘西化，有人提倡过，但是行不通。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接受，不接受是没有道理的，也不利。第二国际曾经否定这些基本原理，但是被列宁驳倒了。中国也有过“第二国际”——江亢虎的社会党，影响很小。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十月革命就是俄国革命的民族形式。社会主义的

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西洋的一般音乐原理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样就可以产生很丰富的表现形式。

中国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烤鸭是有特殊性的，别国比不上，可以国际化。穿衣吃饭也是各国不同。印度人穿的衣服就和中国人不同，它是适合印度的环境的。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一定说用刀叉的高明、科学，用筷子的落后，就说不通。

历史总是要重视的。历史久，有好处也有坏处。美国历史短，也许有它的好处，负担轻，可以不记这么多东西。我们历史久，也有它的好处。把老传统丢掉，人家会说是卖国，要砍也砍不断，没有办法。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77—78页

民族形式可以掺杂一些外国东西。小说一定要写章回小说，就可以不必；但语言、写法，应该是中国的。鲁迅是民族化的，但是他还主张过硬译。我倒赞成理论书硬译，有个好处，准确。

……音乐的基本原理各国是一样的，但运用起来不同，表现形式应该是各种各样的。比如写游记，我们一起去游香山，游的地方虽然一样，但是每个人写出来的就不一样。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0—81页

历史名字要保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名字为什么不要，瑞蚨祥、同仁堂一万年要保存。全国有名的招牌要拍下照片来，有许多招牌的字是写得好的，不留下来后代就不知道了。

把《申报》取消了，我不高兴。《解放日报》可以恢复为《申报》。党报也可以用原来的名字。我年青时到乡下走亲戚，那里都叫卖《申报》，可见深入人心。内容改变，名称保存。王麻子、东来顺、全聚德要永远保存下去。内容是社会主义的，名称是封建时代的也可以。“长城”和“省”，就是从元朝开始这样叫的。

《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71页

你们提到中国的画家在抄袭西方的画法，这种情况是存在的。这种抄袭已经有几十年、近百年了，特别是抄袭欧洲的东西，他们看不起自己国家的文化遗产，拼命地去抄袭西方。我们批评这种情况已有一段时间了，这个风气是不好的。不单是绘画，还有音乐，都有这样一批人抄袭西方，他们看不起自己民族的东西。文学方面也如此，但要好一些。在这方面，我们进行过批评，批评后小说好一些，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在文化方面，各国人民应该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对人类有所贡献。各国文化有共同点但也有差别。共同点是都在同一时代，都处于二十世纪的下半个世纪，总有共同点。但是如果大家都画一样的画，都唱一样的曲调，千篇一律就不好了，就没有人看，没有人听，没有人欣赏。

《应当充分地批判地利用文化遗产》（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25—226页

这些东西，都是历史文化遗产，要好好保存，不要把它毁

坏了。

参观白云山寺院古迹后的谈话（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卷第 246 页

沙河、清河、海淀、西山系重要文化古迹区，对一切原来管理人员亦是原封不动，我军只派兵保护，派人联系。尤其注意与清华、燕京等大学教职员、学生联系，和他们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时减少损失。

《充分注意保护北平工业及重要文化古迹》（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 5 卷第 227 页

四、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

（一）革命文艺事业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

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3卷第848页

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3卷第861页

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

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或多元论，而其实质就像托洛茨基那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过分强调到错误的程度，但也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估计不足。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3卷第865—866页

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和别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较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对于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不认识这一点，是不对的。还有，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3卷第866页

（二）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 首先是为工农兵的

在促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运动中，在文艺协会都有很重大的任务。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

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伟大的光荣任务。

《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62页

发展抗日文艺，振奋军民，争取最后胜利。

《为“战地文化资料展览会”题词》（一九三九年），《毛泽东文艺论集》第25页

这种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群众的。因此，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8页

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48页

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3卷第853—854页

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

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所早已解决了的。列宁还在一九〇五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中，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讲的了。其实不然。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当然，现在和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一起从事于伟大解放斗争的大批的文化人、文学家、艺术家以及一般文艺工作者，虽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暂时的投机分子，但是绝大多数却都是在为着共同事业努力工作着。依靠这些同志，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文艺工作者，有许多是抗战以后开始工作的；有许多在抗战以前就做了多时的革命工作，经历过许多辛苦，并用他们的工作和作品影响了广大群众的。但是为什么还说即使这些同志中也有对于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没有明确解决的呢？难道他们还有主张革命文艺不是为着人民大众而是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吗？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3卷第854页

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

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3卷第855—856页

我这样说，不是说在理论上。在理论上，或者说在口头上，我们队伍中没有一个人把工农兵群众看得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不重要的。我是说在实际上，在行动上。在实际上，在行动上，他们是否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对工农兵还更看得重要些呢？我以为是这样。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

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种研究和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但他们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东西。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3卷第856—857页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我说某种程度，因为一般地说，这些同志的轻视工农兵、脱离

群众，和国民党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倾向是有的。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比如说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吧，这也是原则问题，但是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3卷第857—858页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3卷第863页

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3卷第864页

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例如，某种作品，只为少数人所偏爱，而为多数人所不需要，甚至对多

数人有害，硬要拿来上市，拿来向群众宣传，以求其个人的或狭隘集团的功利，还要责备群众的功利主义，这就不但侮辱群众，也太无自知之明了。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64—865页

有人说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也不要了，我看为工农兵服务是不错的。你不为工农兵还为谁？资产阶级也要改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也要是工人阶级，你说不要为他们服务，中国就没有其他人了。

《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52页

（三）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惟一源泉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惟一的源泉。这是惟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

造出来的东西。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3卷第860页

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惟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3卷第861页

作品是通过艺术形式对于社会存在的反映，同时又给予社会以影响。

《对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一文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八年二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95页

（四）文艺工作者要深入工农兵群众， 深入实际斗争，深入社会生活

你们是青年艺术工作者，现在的大千世界都是属于你们的，都是你们活动的园地。你们的艺术作品要有充实的内容，便要到实际生活中去汲取养料。你们不能终身在这里学习，不久就要奔赴各地，到实际斗争中去，正如你们唱的《游击队员之歌》中所说的，“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你们不但要在口里唱，而且要实际地去那样做。没有丰富的实际生活经验，无从产生内容充实的艺术作品。要创造伟大的作品，首

先要从实际斗争中去丰富自己的经验。艺术家固然要有伟大的理想，但像上马鞍子一类的小事情也要实际地研究。过去一个研究《红楼梦》的人说，他曾切实地把大观园考察过一番。现在你们的“大观园”是全中国，你们这些青年艺术工作者个个都是大观园中的贾宝玉或林黛玉，要切实地在这个大观园中生活一番，考察一番。

《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24页

到群众中去，不但可以丰富自己的生活经验，而且可以提高自己的艺术技巧。夏天的晚上，农夫们乘凉，坐在长凳子上，手执大芭蕉扇，讲起故事来，他们也懂得胡适之先生的八不主义，他们不用任何典故，讲的故事内容却是那么丰富，言辞又很美丽。这些农民不但是好的散文家，而且常是诗人。民歌中便有许多好诗。我们过去在学校工作的时候，曾让同学趁假期搜集各地的歌谣，其中有许多很好的东西。这里存在着一个极大的不协调，就是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与美丽言辞的人不能执笔写作，反之，许多能写作的人却只坐在都市的亭子间，缺乏丰富的生活经验，也不熟悉群众生动的语言。我们都知道高尔基，他的生活经验丰富极了，他熟悉俄国下层群众的生活和语言，也熟悉俄国其他阶层的实际情形，所以才能写出那样多的伟大作品。

《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24—125页

我们召集了三次座谈会，有一百多同志到了，有党内的，也有党外的。这次会开得还算好，其目的就是要解决刚才讲的相

结合的问题，即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我们党的干部相结合，和工人农民相结合，以及和军队官兵相结合的问题。

如何结合呢？分两个方面，要向两方面的人做工作。对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来说，他们要与军队工作的同志、党务工作的同志、政治工作的同志、经济工作的同志接触，要与这些同志结合；对其他方面的人，则告诉他们要与文学家、艺术家接触、结合。总之，要向两方面做工作，要告诉双方各应采取什么态度。

关于文艺工作者方面的问题，我们也应该了解。这方面有些什么问题呢？就是想不想结合和如何结合的问题。首先是要结合还是不要结合，回答是要结合；那末接下来就是如何结合法，即怎么样结合的问题。这中间就要解决思想上的问题，其中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要破除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才能够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才能够有马列主义的党性。解决了这个思想上的问题，才能够在思想上与无产阶级、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有了这样的基础，才可能在行动上和工农兵、和我们党相结合。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总是要格格不入的。一个人从事一种事业，如果时间很长了，一定会发生很多习惯，一定会发生许多偏向。许多文艺工作者生长在国民党统治的社会或封建社会，旧社会的影响有的受得多，有的受得少，有的根底浅，有的根底深，有着程度的不同。这些东西如果不加以指明，如果不使他们把这些东西来一个自觉的破坏，逐渐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那末就会成为这些同志在行动中完全同工农兵和党相结合的一个障碍，阻碍他们这个结合的过程的速度，阻碍他们自己的进步。所以在整顿三风中间，一切同志都要整顿，文艺界也包括在内，其目的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破除，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

《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25—426页

我们主要的基础是什么？是工农兵。要不要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文艺家呢？需要的，但是主要的基础是在工农兵。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他们的作品才能开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家是能够帮助我们的，其中一部分有决心工农化的，他们脱胎换骨，以工农的思想为思想，以工农的习惯为习惯，这样来写工农，也就能教育工农，并提高成为艺术。在阶级社会中有文人，在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有专门的文学家、艺术家。将来大批的作家将从工人农民中产生。现在是过渡时期，我看这一时期在中国要五十年，这五十年是很麻烦的，这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家和工人农民结合的过程。在此期间，有点麻烦，出点乱子，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政策是要小心地好好引导他们自觉地而不是勉强地和工农打成一片。少数人不能打成一片，要容忍他，这是思想问题，不能勉强，不能用粗暴的态度。我们的总方针是争取文学家、艺术家中的大多数人和工农结合，使得他们看中低级的东西，看中普通的文艺工作者。专门家有责任指导普通的文艺工作者。是不是只有指导的责任呢？不是的，还要学习，要从普通的文艺工作者那里，从人民身上吸收养料，不然便要悬在空中，这是非常危险的。高尔基很高，但他和下面有着广泛的联系。他和农村有通讯联系。他看到一个十三岁小孩的信非常欢喜，改了几个字把它发表出来，在《海上述林》中便有。高级文艺工作者也只有和普通文艺工作者，和人民发生联系，才有出路，他才有群众，才有牛奶吃，这是老百姓给他的，不然便是空的。

《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30—431页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结合的问题。我们要求我们的同志,在军队、政府、教育、民运、党务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对文学艺术工作者,不论是低级的还是高级的,要采取欢迎的态度,恰当的态度,对他们的缺点要采取原谅的态度;而在文艺家方面,对于工农兵的缺点也是要采取原谅的态度。有缺点,不原谅是不行的,将来一定还要有问题。

《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31—432页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48页

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在陕甘宁边区,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这个问题和在国民党统治区不同,和在抗战以前的上海更不同。在上海时期,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在抗战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范围曾有过一些扩大,但基本上也还是以这些人为主,因为那里的政府把工农兵和革命文艺互相隔绝了。在我们的根据地就完全不同。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根据地也有学生,但这些学生和旧式学生也不相同,他们不是过去的干部,就是未来的干部。各种干部,

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向他们好好做工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3卷第849—850页

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而为要了解他们，熟悉他们，为要在党政机关，在农村，在工厂，在八路军新四军里面，了解各种人，熟悉各种人，了解各种事情，熟悉各种事情，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于这些，以前是一种什么情形呢？我说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什么是不熟？人不熟。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疏得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什么是不懂？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3卷第850—851页

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这就是说，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

容和正确的方向。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3卷第852页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惟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3卷第860—861页

因为思想上有许多问题，我们有许多同志也就不大能真正区别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并由此弄出许多错误。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如果同志们在新的群众中间，还是像我上次说的“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那末，不但下乡要发生困难，不下乡，就在延安，也要发生困难的。有的同志想：我还是为“大后

方”的读者写作吧，又熟悉，又有“全国意义”。这个想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大后方”也是要变的，“大后方”的读者，不需要从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听那些早已听厌了的老故事，他们希望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告诉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所以愈是为革命根据地的群众而写的作品，才愈有全国意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76页

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

《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12页

（五）向工农兵普及，从工农兵提高；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

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用同志们的话来说，就是：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

有些同志，在过去，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提高是应该强调的，但是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提高，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那就错了。我在前面说的没有明确地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的事实，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出来了。并且，因为没有弄清楚为什么人，他们所说的普及和提高就都没有正确的标准，当然更找不到两者的正确关系。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用什么东西向他们普及呢？用封建地主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

西吗？用资产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都不行，只有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因此在教育工农兵的任务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提高的问题更是如此。提高要有一个基础。比如一桶水，不是从地上去提高，难道是从空中去提高吗？那末所谓文艺的提高，是从什么基础上去提高呢？从封建阶级的基础吗？从资产阶级的基础吗？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础吗？都不是，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也不是把工农兵提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而这里也就提出了学习工农兵的任务。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3卷第859—860页

什么是文艺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呢？这两种任务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

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

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普及工作若是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一月两月三月，一年两年三年，总是一样的货色，一样的“小放牛”，一样的“人、手、口、刀、牛、羊”，那末，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岂不都是半斤八两？这种普及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就中国范围来说，革命和革命文化的发展不是平衡的，而是逐渐推广的。一处普及了，并且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了，别处还没有开始普及。因此一处由普及而提高的好经验可以应用于别处，使别处的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得到指导，少走许多弯路。就国际范围来说，外国的好经验，尤其是苏联的经验，也有指导我们的作用。所以，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正因为这样，我们所说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3卷第861—863页

除了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以外，还有一种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这就是干部所需要的提高。干部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他们所受的教育一般都比群众所受的多些；比较高级的文学艺术，对于他们是完全必要的，忽视这一点是错误的。为

干部，也完全是为群众，因为只有经过干部才能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如果违背了这个目的，如果我们给予干部的并不能帮助干部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那末，我们的提高工作就是无的放矢，就是离开了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原则。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3卷第863页

总起来说，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在这中间，既有从初级的文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被提高了的群众所需要、或首先为群众中的干部所需要的高级文艺，又有反转来在这种高级的文艺指导之下的、往往为今日最广大群众所最先需要的初级的文艺。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3卷第863页

我们的专门家不但是为了干部，主要地还是为了群众。我们的文学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我们的戏剧专门家应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小剧团。我们的音乐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歌唱。我们的美术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美术。一切这些同志都应该和在群众中做文艺普及工作的同志们发生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帮助他们，指导他们，一方面又向他们学习，从他们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使自己的专门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3卷第863—864页

就算你的是“阳春白雪”吧，这暂时既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顾骂人，那就怎样骂也是空的。现在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统一的问题，是提高和普及统一的问题。不统一，任何专门家的最高级的艺术也不免成为最狭隘的功利主义；要说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为清高，群众是不会批准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65页

讲革命性是从抗日到马列主义，即从低级到高级。在艺术上，我们采取的政策和革命性一样，也是从低级到高级，即是从萌芽状态起，一直到高级的，到托尔斯泰、高尔基、鲁迅等最精湛的。艺术性高的我们要，低的我们也要。像墙报、娃娃画娃娃，我们也要，那是萌芽，有发展的可能性，有根在那里。

《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29页

如果普通的文艺工作者没有高级的指导，他的方向就可能出错，他就会长期地停留在低级阶段不能提高。

《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31页

我们的艺术要搞几样确实为老百姓所欢迎的东西。现在老百姓连好的春联都没有，我们还只是谈提高，这只能是空谈。现在边区的主要问题，还是一个普及问题。群众艺术生活太贫乏了，我们做文艺工作的同志要从多方面努力。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18—119页

“艺术应该将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似乎不但是指创作时“集中”起来，而且是指拿这些创作到群众中去，使那些被经济的、政治的、地域的、民族的原因而分散了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了政治原因，但其他原因仍在）“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能借文艺的传播而“联合起来”，或者列宁这话的主要意思是在这里，这就是普及工作。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把他们提高起来”。

《给周扬的信》（一九四四年四月二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23页

（六）歌颂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暴露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

态度问题。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哪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对于这三种人需要有三种态度。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他们的抗战，我们是赞成的；如果有成绩，我们也是赞扬的。但是如果抗战不积极，我们就应该批评。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动的道路，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

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3卷第848—849页

“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爱可以是出发点，但是还有一个基本出发点。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我们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是社会使他们感觉到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命运的结果。我们恨日本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结果。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

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吗？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3卷第870—871页

“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这里包含着许多糊涂观念。文艺作品并不是从来都这样。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相反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反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3卷第871页

“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这种讲法和前一种一样，都是缺乏历史科学知识的见解。从来的文艺并不单在于暴露，前面已经讲过。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

之类的描写。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3卷第871—872页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是否废除讽刺？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3卷第872页

“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

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73页

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8页

（七）改造旧艺术，推陈出新

推陈出新。

为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的题词（一九四二年十月），《毛泽东题词墨迹选》第54页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

《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88页

在艺术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话剧，而且要有秦腔和秧歌。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旧戏班，利用在秧歌队总数中占百分之九十的旧秧歌队，逐步地加以改造。

《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12页

你们平剧院接受旧的艺术，还要创造新的艺术。旧的艺术是有缺点的，尤其是它的内容，我看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历史本来不是帝王将相创造的，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可是在旧戏中，比如孔明一出场就神气十足压倒一切，似乎世界就是他们的，劳动人民不过是跑龙套的。世界上本来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工人、农民，我们住的房子，都是他们双手盖起来的，土豪劣绅连个柱子都搬不动，可是许多的旧戏却把劳动人民表现成小丑。当然，旧戏中也有些剧本是好的，如《打渔杀家》之类。有些旧戏你们可以改造它，用自己的创造力掌握了这门艺术，并且从政治上来个进步，你们就可能写些新的东西。

《改造旧艺术 创造新艺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325—326页

(八) 坚持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提倡表现手法的多样性

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有些亭子间的人以为“老子是天下第一，至少是天下第二”；山顶上的人也有摆老粗架子的，动不动，“老子二万五千里”。

.....

作风应该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

《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毛泽东文艺论集》第13页

对我们来说，艺术上的政治独立性仍是必要的，艺术上的政治立场是不能放弃的，我们这个艺术学院便是要有自己的政治立场的。我们在艺术论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艺术至上主义者。我们主张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但这并不是那种一味模仿自然的记流水账式的“写实”主义者，因为艺术不能只是自然的简单再现。至于艺术上的浪漫主义，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它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有积极的、革命的浪漫主义，也有消极的、复古的浪漫主义。有些人每每望文生义，鄙视浪漫主义，以为浪漫主义就是风花雪月哥哥妹妹的东西。殊不知积极浪漫主义的主要精神是不满现状，用一种革命的热情憧憬将来，这种思潮在历史上曾发生过进步作用。一种艺术作品如果只是单纯地记述现状，而没有对将来的理想的追求，就不能鼓舞人们前进。在现状中看出缺点，同时看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这才是革命的精神，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有这样的精神。

《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21—122页

艺术上每一派都有自己的阶级立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方面的,但在统一战线原则之下,我们并不用马克思主义来排斥别人。排斥别人,那是关门主义,不是统一战线。但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这就是鲁迅先生的方向。你们鲁迅艺术学院要遵循鲁迅先生的方向。

《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22页

艺术作品要有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作品好比饭菜一样,要既有营养,又有好的味道。中国人是最会做饭菜吃的,做菜的时候适当地调配各种材料,加上油盐酱醋各种佐料,经过巧妙的烹调,便产生一种美味,并且保持了营养成分。大师傅做得一手好菜,要有一个长期实践的过程,不是学一天便做得好的。他们做菜,用的材料和别人一样,却能做出好的味道来,这就要研究各种材料的调配和时间火候的掌握。艺术至上主义者是只注重味道好不好吃,不管有没有营养,他们的艺术作品内容常常是空虚的或者有害的。艺术作品要注重营养,也就是要有好的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比如现在唱京戏,在戏报上已经看不见《游园惊梦》之类的东西了,因为那样的戏在今天卖不了座。演旧戏也要注意增加表现抗敌或民族英雄的剧目,这便是今天时代的要求。艺术作品还要有动人的形象和情节,要贴近实际生活,否则人们也不爱看。把一些抽象的概念生硬地装在艺术作品中,是不会受欢迎的。

《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22—123页

鲁迅艺术学院要造就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生活经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艺术工作者。……没有这种伟大的理想,是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的。但只有理想还不行,还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与良好的艺术技巧。中国近年来所以没有产生伟大的作品,自然有其客观的社会原因,但从作家方面说,也是因为能完全具备这三个条件的太少了。我们的许多作家有远大的理想,却没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不少人还缺少良好的艺术技巧。这三个条件,缺少任何一个便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

《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23页

至于艺术技巧,这是每个艺术工作者都要学的。因为没有良好的技巧,便不能有力地表现丰富的内容。艺术技巧是多方面的,并不只限于语言。但是,对于艺术工作者来说,掌握语言的能力确是非常重要的。我看鲁迅先生便是研究过大众语言的。你们一定要下一番苦工夫去学习和掌握艺术技巧。

《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25页

这两种倾向,在我们的许多同志的思想中是存在着的。许多同志有忽视艺术的倾向,因此应该注意艺术的提高。但是现在更成为问题的,我以为还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所以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70页

再一种就是问题严重的。他们离彻底地运用马列主义的思想,达到革命性、党性与艺术工作的完全的统一还差得很远,就

是说，头脑中间还保存着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这个东西，如果不破除，让它发展下去，那是相当危险的。这个东西，在文艺界的同志中或多或少都有一点，新党员当中有，老党员当中也有。当然，这种缺点严重的也只是一部分同志。他们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文学艺术要不要为工农大众，服务于工农大众，向工农大众普及，再从向他们普及中间来提高等还没有解决。他们的这些问题也都是可以解决的。此外也还有像这样的问题，在对作品的评价上，有的同志说是抹杀了艺术性，也有的说是抹杀了革命性。所谓抹杀革命性，就是说，只要是艺术的东西，只要是艺术水平高的文学艺术作品，就认为是好的。他们特别强调这一方面，而对立场问题，观点问题，马列主义基本观点问题，向工农兵取材问题，给谁读的问题，与工农兵密切结合或完全为工农兵这些问题，认识不清楚。

文艺家要向工农兵取材，要和工农兵做朋友，像亲兄弟姐妹一样。如果对这方面轻视，不看重，那是一个偏向，就是比较地忽视革命性（当然忽视的程度也有轻重的不同）。如果说有偏向的话，这就是一个严重些的偏向。当然也不是说个个都有这个偏向，但是有许多人都有忽视革命性这一个偏向。他们忽视学习马列主义，忽视拿马列主义的思想来破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头脑中的影响。他们的思想和实践、思想和行动不统一，想是这样想，做却是那样做，做的事和想的东西不相符合。这是理论和实践的分离。想的是为工农，做的事不为工农；想的是为工农做事，在工农中间的朋友却很少；想的是为工农，对工农干部却不了解。这种“想”，实际上是不彻底的，就是说，对革命性没有强调得好。这种偏向在文学艺术界的同志中很多，应该很好地检讨一下。

还有没有其他偏向呢？有的，这就是太强调革命性而忽视

艺术性，认为只要是革命的东西，标语口号式的也好，艺术上不像样子的东西也行。这就把文学艺术降低到和普通东西一样没有区别了，因为别的东西是不采取文学艺术这种艺术形态的。现在强调革命性，就把文学艺术的革命性所需要的艺术形态也不要了，这又是一种偏向。我们只是强调文学艺术的革命性，而不强调文学艺术的艺术性，够不够呢？那也是不够的，没有艺术性，那就不叫做文学，不叫做艺术。这个偏向在俄国曾经发生过，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听说也有过，似乎只要讲几句马列主义，只要讲几句无产阶级，就是好东西。不注重艺术形式的问题，只注重作品的政治内容，这就把艺术与其他东西的区别取消了。说艺术无须乎带有什么特殊性，它在革命工作中也不是特殊部门，这种看法同样是一种偏向。

《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27—429页

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

《为鲁迅艺术学院周年纪念题词》（一九三九年五月），《毛泽东文艺论集》第24页

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有不同。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作曲、唱歌、舞蹈都应该是这样。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76页

表现形式应该有所不同，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如此。特

别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但是，应该是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同就成为八股。过去有人搞八股文章，搞了五六百年。形式到处一样就不好。妇女的服装和男的一样，是不能持久的。在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时期内，妇女不打扮，是标志一种风气的转变，表示革命，这是好的，但不能持久。还是要多样化为好。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0页

要有思想性，也要有艺术性。

《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56页

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的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九）开展积极的文艺批评

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应该发展，过去在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同志们指出这一点是对的。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68页

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

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这里所说的好坏，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呢？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我们的文艺批评是不要宗派主义的，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但是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因为这些所谓文艺，其动机，其效果，都是破坏团结抗日的。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这种分别，当然也要看社会效果。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

又是政治标准，又是艺术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呢？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3卷第869—870页

文艺批评问题，我想提出来谈谈。这方面的文章我读得不多，读了一点，感觉恰当的批评不多，经过研究的，有分析的，事前跟作家谈过的，真正是对作家有所帮助的，不是骂一顿的，不很多吧？有些批评粗暴得很。对待这类批评，鲁迅有个办法，就是不理。现在文艺批评可以说有三类：一类是抓到痒处，不是教条的，有帮助的；一类是隔靴搔痒，空空泛泛，从中得不

到帮助的，写了等于不写；一类是教条的，粗暴的，一棍子打死人，妨碍文艺批评开展的。是不是这样？

《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54—255页

这次对电影的批评很有益，但是电影局开门不够，他们的文章有肯定一切的倾向，人家一批评，又把门关得死死的。我看大多数批评文章提出的问题，对于改革我们的电影是很有益的。现在的电影，我就不喜欢看，当然也有好的，不要否定一切。批评凡是合乎事实的，电影局必须接受，否则电影工作不能改进。你们报上发表的文章，第一个时期批评的多，第二个时期肯定的多，现在可以组织文章把它们统一起来，好的肯定，不好的批评。

《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1页

（十）诗词创作和欣赏

《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

《给臧克家的信》（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84页

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范仲淹的上两首，介于婉约与豪放两

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

《对范仲淹两首词的评注》（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毛泽东文集》
第7卷第304页

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以上随便谈来，都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给陈毅的信》（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
第421—422页

五、科学技术

(参见第四编“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第1021—1030页)

六、教 育

（一）教育必须适合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的需要

执行苏维埃的文化教育政策，开展苏维埃领土上的文化革命，用共产主义武装工农群众的头脑，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实施义务教育制度，增加革命战争中动员民众的力量，同样是苏维埃的重要任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四、二十五日），《红色中华》二苏大特刊第3期

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四、二十五日），《红色中华》二苏大特刊第3期

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因此全民族的第十个任务，在于实行如下各项的文化教育政策。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

大批的抗日干部。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一切这些，也必须拿政治上动员民力与政府的法令相配合，主要的在于发动人民自己教育自己，而政府给以恰当的指导与调整，给以可能的物质帮助，单靠政府用有限财力办的几个学校、报纸等等，是不足完成提高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之伟大任务的。抗战以来，教育制度已在变化中，尤其战区有了显著的改进。但至今还没有整个制度适应抗战需要的变化，这种情形是不好的。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二者间的不配合现象亟应免除。

《论新阶段》(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16—617页

关于文化教育政策。应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的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

《论政策》(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卷第768页

一九四九年的国民教育计划(大学教育，各种专科教育，中学教育，小学教育和成人补习教育)必须适合当前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的需要。

《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34页

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

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现在我国不仅有许多到了学习年龄的儿童没有学校可进,而且还有一大批超过学龄的少年和青年也没有学校可进,成年人更不待说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55页

几千年来的教育,确是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而社会主义教育乃是工人阶级手中的工具。

《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一九五八年八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98页

(二) 我们的教育方针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6页

学校要大力进行思想教育,进行遵守纪律、艰苦创业的教育。学生要能耐艰苦,要能白手起家。我们不都是经历过困难的人吗?社会主义是艰苦的事业。我们以后对工人、农民、士兵、学生都应该宣传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学校中要提倡一种空气,教师与学生同甘共苦,一起办好学校。应当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不要使他们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今后无论谁去

招生都不要乱吹，不要把一切都讲得春光明媚，而要讲困难，给学生泼点冷水，使他们有思想准备。学生谈恋爱的风气应当加以扭转。婚姻法有关结婚年龄的规定不必修改，但要劝青年晚点结婚。教育部应当编写一些课文，专门论述艰苦奋斗的，从小学到大学都要讲。

要加强学校政治思想教育，每省要有一位宣传部长、一位教育厅长亲自抓这项工作。

《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46—247页

大学、中学都要求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要削减课程，要恢复中学方面的政治课，取消宪法课，要编新的思想、政治课本，要下决心从党政两系统抽调几批得力而又适宜于做学校工作的干部去大、中学校工作，要赋予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以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

《关于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问题给周恩来等的信》（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398页

儿童时期需要发展身体，这种发展要是健全的。儿童时期需要发展共产主义的情操、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就是我们时代的德育。这二者同智育是连结一道。二者都同从事劳动有关，所以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总结以上所说，我们所主张的全面发展，是要使学生得到比较完全的 and 比较广博的知识，发展健全的身体，发展共产主义的道德。

《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一九五八年八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98—399页

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

大不一样。

《关于派军队干部训练学校师生的谈话》(一九六六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161页

(三) 教育要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延安的学校应照此种精神去办。这是理论与实际联系的学校, 不是单纯的概论学校。

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第二期工作报告上的批示(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323页

政治、经济、文化, 是我们延大学习的内容, 一定要学好, 要会做这方面的工作, 要为实际服务, 不搞教条主义, 不脱离实际。

《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54页

你们的事业, 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 勤工俭学, 不要国家一分钱, 小学、中学、大学都有, 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 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 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 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 吸取经验, 回去试办。初时学生宜少, 逐渐增多, 至江西这样有五万人之多。

再则, 党、政、民(工、青、妇)机关, 也要办学校, 半工半学。不过同江西这类的半工半学不同。江西的工, 是农业、

林业、牧业这一类的工，学是农、林、牧这一类的学。而党、政、民机关的工，则是党、政、民机关的工，学是文化科学、时事、马列主义理论这样一些的学。所以两者是不同的。

《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日），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82页

清华大学有工厂。它是一所理工科学学校，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但是，大学文科不好设工厂，不好设什么文学工厂、历史学工厂、经济学工厂，或者小说工厂。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工业和农业。不然，学生毕业，用处不大。如学法律的，如果不到社会中去了解犯罪情况，法律是学不好的。不可能有什么法律工厂，要以社会为工厂。

《教师要向人民群众学习文科要以社会为工厂》（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149—150页

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

《改造学校教育让学生接触社会实际》（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493页

延安的青年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在学习革命的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他们在实行生产运动，开发了千亩万亩的荒地。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谓盛矣。但是他的学生比起延安来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欢什么生

产运动。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耕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

《青年运动的方向》（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2卷第568页

一切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凡是可能的，一律试办工厂或者农场，进行生产，做到自给或者半自给。学生实行半工半读。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这些学校可以多招些学生，但是不要国家增加经费。

一切高等工业学校的可以进行生产的实验室和附属工场，除了保证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以外，都应当尽可能地进行生产。此外，还可以由学生和教师同当地的工厂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文集》第
7卷第360页

一切农业学校除了在自己的农场进行生产，还可以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并且派教师住到合作社去，使理论和实际结合。农业学校应当由合作社保送一部分合于条件的人入学。

农村里的中小学，都要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合同，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农村学生还应当利用假期、假日或者课余时间回到本村参加生产。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文集》第
7卷第360页

大学和城市里的中等学校，在可能条件下，可以由几个学校联合设立附属工厂或者作坊，也可以同工厂、工地或者服务行业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

一切有土地的大中小学，应当设立附属农场；没有土地而邻近郊区的学校，可以到农业合作社参加劳动。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60—361页

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

视察天津大学时的谈话（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三日）

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

《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一九五八年八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99页

几千年来，都是教育脱离劳动，现在要教育劳动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大体上有这样几条：一条是教育劳动相结合，一条是党的领导，还有一条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大家懂得，没有问题了，党的领导现在可能问题也不多了，中心问题是教育劳动相结合。现在苏联对这个问题也想改革，他们正在搞一个文件在那里酝酿。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讲了的，教育必须与劳动相结合。

《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八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396页

一九五八年，改革了教育制度，实行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这是一件大事。

《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640页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

一九五八年的一次谈话，《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出版，第11页

（四）发展各类教育，提高干部 群众的文化水平

言世界改良进步者，皆知须自教育普及使人民咸有知识始。欲教育普及，又自兴办学校始。其言固为不错。然兴办学校，不过施行教育之一端。而教育之全体，不仅学校而止，其一端则有家庭，一端则有社会。

《学生之工作》（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52页

革命战争与苏维埃建设事业，要求苏区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一般的提高，亦只有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工农群众才有享受教育的权利与可能。一年来苏维埃对于文化教育事业已在着力的进行。小学，夜学，识字运动，与俱乐部运动，已在各地广泛发展起来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苏维埃大学，与红军大学的建立，工农剧社与蓝衫团运动的发展，所有这些，都表明苏维埃文化建设事业已进入了发展的阶段中。中央政府最近已宣布以马克思共产主义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基本方针。中央政府正在制定小学教育制度与颁布社会教育的具体办法。要使所

有苏区的劳动民众都受到教育，开展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已成为苏维埃建设任务的重要部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两周年纪念对全体选民的工作报告书》（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四日），《红色中华》1933年10月27日

其次是文化建设，要建立完备的小学教育制度，要发展消灭文盲运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两周年纪念对全体选民的工作报告书》（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四日），《红色中华》1933年10月27日

组织民众的文化生活，将过去地主资产阶级统治时代完全没有享受教育可能的广大民众，进到日益提高文化程度的地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红色中华》二苏大特刊第3期

女大的成立，在政治上是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它不仅是培养大批有理论武装的妇女干部，而且要培养大批做实际工作的妇女运动的干部，准备到前线去，到农村工厂中去，组织二万万二千五百万妇女，来参加抗战。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

《在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日），《新中华报》1939年7月25日

继续推行消灭文盲政策，推广新文字教育，健全正规学制，普及国民教育，改善小学教员生活，实施成年补习教育，加强干部教育，推广通俗书报，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

倡科学知识 with 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保护流亡学生与失学青年，允许在学学生以民主自治权利，实施公务人员的两小时学习制。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36页

我们来一个五年计划，去年算一年，今年是第二年，在这五年中间，使陕甘宁边区一百四十万老百姓，加上党政军十万人，一共一百五十万人，统统把文盲消灭掉，把边区人民的文化提高到一个必要的程度。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10—111页

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83页

提高文化，消灭文盲，要靠识字组。当然这也要以自愿为原则。开始不妨组织一两个组，约一些人识字，……

什么人教呢？就是老百姓教老百姓。……识字组也可以民教民，认识十个字的就可以当组长，认识一百个字的就可以当委员长。

我们还要编一些书，搞一些关于生产知识等方面的书，作为教材。学生要学会打算盘，学会写信，学会记账，学会写路条。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15页

现在的教育，一个是普通教育，包括社会教育、识字教育；再一个是干部教育。有了这两种教育，就可以把整个边区变作一个大学校，每一个乡就是一个学校。所有的老百姓和干部都在这个大学学校里学习生产，学习文化。几年之内，边区的群众文化就会比其他地方都高，比武汉、重庆等一些大城市都要高。只要好好搞，五年到十年就可以搞得很好，就会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就会有很大的发展，这绝不是空话。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17页

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不但要有新式学校，而且要利用旧的村塾加以改造。

《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11—1012页

这样的技术夜校，每个乡，在目前至少是大多数的乡，都应当办起来，青年团的各级组织应当管这件事。农民的学习技术，应当同消灭文盲相结合，由青年团负责一同管起来。技术夜校的教员，可以就地选拔，并且要提倡边教边学。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50—451页

农民组织了合作社，因为经济上的需要，迫切地要求学文化。农民组织了合作社，有了集体的力量，情况就完全改变了，他们可以自己组织学文化。第一步为了记工的需要，学习本村本乡的人名、地名、工具名、农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语汇，大约两三百字。第二步，再学进一步的文字和语汇。要编这样两种

课本。第一种课本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各就自己那里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编。每处自编一本，不能用统一的课本。这种课本不要审查。第二种课本也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根据一个较小范围的地方（例如一个县，或者一个专区）的事物和语汇，加上一部分全省（市、区）的和全国性的事物和语汇编出来，也只要几百字。这种课本，各地也不要统一，由县级、专区级或者省（市、区）级的教育机关迅速地加以审查。做了这样两步之后再第三步，由各省（市、区）教育机关编第三种通常应用的课本。以后还要有继续提高的课本。中央的文化教育机关应当给这件事以适当的指导。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55—456页

还有什么规划呢？还有文化教育规划，包括识字扫盲，办小学，办适合农村需要的中学，中学里面增加一点农业课程，出版适合农民需要的通俗读物和书籍，发展农村广播网、电影放映队，组织文化娱乐等等。

《农业合作化的全面规划和加强领导问题》（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75页

各省是不是还有私立中学？私立中学还是可以办的，办了之后政府不要去接收。私人办了，又被接收，私人办学的积极性就高不起来了。

办戴帽中学还是一种好办法。中学办在农村是先进经验，农民子弟可以就近上学，毕业后可以回家生产。如果说教师比较差，可以从好的中学抽调一部分来支援，抽肥补瘦，抽多补少。

如果说办学质量差，孔夫子还没有受过这样的教育呢。这是要解决农民子女就近读中学的问题，唱戏也还有草台班子嘛。在农村，教育要强调普及，不要强调提高，不要过分强调质量。课程也可以简单些，有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农业生产知识、政治等八九科就可以了，其他的今后还可以自学。这些学校主要是解决农民生产劳动中需要的知识，如要升学也不限制，成绩好的学生可以升学，有的就不一定升学。苏联著名文学家高尔基没有进过中学，还不是自学出来的！萧楚女也没有进过什么正规的学校，办报还不错嘛。戴帽中学的这个帽子不要摘掉，有条件的要多戴一点，学校应该分散在农村里头，摘掉是不好的。

《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45—246页

（五）改革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

1. 改革教育制度

创造新学校，施行新教育，必与创造新家庭新社会相联。新教育中，以创造新生活为主体。

《学生之工作》（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54页

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办法，一概废弃。

《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48页

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

《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56页

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71页

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23页

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把那一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

《教育制度要改革》（一九六四年七月五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96页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

《改造学校教育让学生接触社会实际》（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492页

2. 改革课程设置、教材和教学方法

在教学方法上，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教员不根据学生要求学什么东西，全凭自己教，这个方法是不行的。教员也要跟学生学，不能光教学生。现在我看要有一个制度，叫做三七开。就是教员先向学生学七分，了解学生的历史、个性和需要，然后再拿三分去教学生。这个方法听起来好像很新，其实早就有了，孔夫子就是这样教学的。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16页

此事宜速解决，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学习和开会的时间宜大减。病人应有特殊待遇。全国一切学校都应如此。

《给马叙伦的信》（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九日、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83页

关于学生健康问题，前与先生谈过，此问题深值注意，提议采取行政步骤，具体地解决此问题。……其中第三项即谈到此问题，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

《给马叙伦的信》（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九日、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83页

现在初中学生上课的时间也多了一些，可以考虑适当减少。积极分子开会太多，也应当减少。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娱乐、休

息、睡眠，这两方面要充分兼顾。工农兵青年们，是在工作中学习，工作学习和娱乐休息睡眠两方面也要充分兼顾。

两头都要抓紧，学习工作要抓紧，睡眠休息娱乐也要抓紧。过去只抓紧了一头，另一头抓不紧或者没有抓。现在要搞些娱乐，要有时间，有设备，这一头也要来个抓紧。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77—278页

我们的教学计划、教科书都是全国一致的。这种做法是不是有问题？各省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教材？各省是不是感到受限制？

《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45页

中学应当有政治课。政治课要联系实际，生动有趣，不要教条式的，要使中学生知道一些为人在世的道理。讲猴子变人的社会发展史如果同历史课有重复，历史课可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讲起，讲胜利，讲困难，不过猴子变人还要讲，阶级斗争也要讲。课本要两三年修改一次，使之不脱离实际。

《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47页

苏联的教材，应当学的就要学，不应当学的就不要学。你们要来一个改革，不要照抄外国的，一定要符合中国的情况，并且还要有地方的特点。农业课本要由省里编，地理可以编地方地理，文学也要有乡土文学，历史可以有各省自己的史料。课程要减少，分量要减轻，减少门类，为的是全面发展。

《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47—248页

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

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

《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22页

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

课程讲的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

《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23页

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改革学校课程设置的和讲授方法》(一九六四年三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76页

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

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上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回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的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

《教育制度要改革》（一九六四年七月五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96—97页

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

《关于学校要减轻学生负担的批语》（一九六五年七月三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391页

七、体育、卫生

（一）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体育者，人类自养其生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

《体育之研究》（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66页

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顾知之者或寡矣，或以为重在智识，或曰道德也。夫知识则诚可贵矣，人之所以异于动物者此耳。顾徒知识之何载乎？道德亦诚可贵矣，所以立群道平人己者此耳。顾徒道德之何寓乎？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

《体育之研究》（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66—67页

今世百科之学，无论学校独修，总须力能胜任。力能胜任者，体之强者也；不能胜任者，其弱者也。强弱分，而所任之区域以殊矣。

《体育之研究》（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71页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给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的题词(一九五二年六月十日),《毛泽东题词墨迹选》第139页

凡能做到的,都要提倡做体操,打球类,跑跑步,爬山,游泳,打太极拳及各种各色的体育运动。

《把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50页

(二) 发展医药卫生事业

1. 卫生工作关系到移风易俗, 改造国家

中央认为各级党委对于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的缺乏注意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缺点, 必须加以改正。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极力发展这项工作。对卫生工作人员必须加以领导和帮助。对卫生工作必须及时加以检查。在经费方面, 除中央预算所列者外, 应尽其可能在地方上筹出经费。必须教育干部, 使他们懂得, 就现状来说, 每年全国人民因为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 可能超过每年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 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 而决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

《必须重视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一九五一年九月九日),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76页

清洁卫生, 人人振奋, 移风易俗, 改造国家。

《对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修改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二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06页

把卫生工作看作孤立的一项工作是不对的。卫生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低弱的体质，使身体康强，环境清洁，与生产大跃进，文化和技术大革命，相互结合起来。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懂这个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意义。因此必须大张旗鼓，大做宣传，使得家喻户晓，人人动作起来。

《把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50页

2. 中医药是一个宝库，要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

近来延安疫病流行，我们共产党在这里管事，就应当看得见，想办法加以解决。我们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李鼎铭同志是中医，还有些人学的是西医，这两种医生历来就不大讲统一战线。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下，到底要不要讲统一战线？我不懂中医，也不懂西医，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治不好病还有医术问题，不能因为治不好病就不赞成中医或者不赞成西医。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

《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54页

在医药方面，更是如此。陕甘宁边区的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许多人民还相信巫神。在这种情形之下，仅仅依靠新医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新医当然比旧医高明，但是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不为人民训练医生，不联合边区现有的一千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

实际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的死亡。

《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12页

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

给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的题词（一九五〇年），《毛泽东题词墨迹选》第122页

对中医问题，不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问题，要把中医提高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问题。

新来的外国东西重视了，对自己本国的东西倒轻视了。

关于卫生部工作和中西医结合问题的两次谈话（一九五四年六月五日、七月九日）

西医要向中医学。

第一，思想作风上要转变。首先要尊重我国有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看得起中医，也才能学得进。

第二，要建立机构。建立研究机构。不尊重，不学习，就谈不上研究，不研究，就不能提高。总是有精华和糟粕的嘛。

关于卫生部工作和中西医结合问题的两次谈话（一九五四年六月五日、七月九日）

我们中国的医学，历史是最久的，它有丰富的内容。当然还有糟粕。在医学上，我们是有条件创造自己的新医学的。从战国时代直到现在，我国的人口是上升的，这里面中医就有一部分功劳嘛。西洋医到中国来，也不过百把年，当然，西医是近代的，有好的东西。但什么都是“舶来品”好，这是奴化思

想的影响。

关于卫生部工作和中西医结合问题的两次谈话（一九五四年六月五日、七月九日）

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我们要西医学中医，道理也就是这样。……应该学外国的近代的東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如果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药理学等等，再来研究中医、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马克思讲过，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些。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78—79页

要把根本道理讲清楚：基本原理，西洋的也要学。解剖刀一定要用中国式的，讲不通。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1页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23页

3. 以预防为主方针

宣传卫生，就应该给群众治病。在五年到十年之内，我们要求得在科学知识普及方面的进步，医药卫生应该放在我们的计划里，和生产计划同时并进。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19页

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1083页

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

给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的题词（一九五二年），《毛泽东题词墨迹选》第145页

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

《致沈钧儒》（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464页

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若干种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鼠疫、脑炎、牛瘟、猪瘟等。

《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509页

4. 救死扶伤

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给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的题词（一九四一年），《毛泽东题词墨迹选》
第46页

尊重护士，爱护护士。

为护士节的题词（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题词墨迹选》第53页

5.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关于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问题》（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387页

中国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不为农村服务，还叫什么为人民服务！

脱离群众，把大量的人力物力用在高、难、深的研究上，所谓尖端。对一些多发病、常见病、普遍存在的病，如何防预，改进治疗，没人注意，或放很少的人力。这并不是不搞尖端，而是少数人搞，大量的应放在农村，重点在农村。

同医务工作人员的谈话（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6. 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

还有一个除四害，讲卫生。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这四样东西，我是很注意的。只有十年了，可不可以就在今年准备一下，动员一下，明年春季就来搞？因为苍蝇就是那个时候出世。我看还是要把这些东西灭掉，全国非常讲卫生。这是文化，要把这个文化大为提高。要来个竞赛，硬是要把这些东西灭掉，人人清洁卫生。各省也可以参差不齐，各县也可以参差不齐，将来横直看哪个是英雄。中国要变成四无国：一无老鼠，二无麻雀，三无苍蝇，四无蚊子。

《关于农业问题》（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08页

除四害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是一个破除迷信的运动。……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

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

今冬必须在全国各地开始大举进行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各地尚未动员的必须立即动员起来。

《中央关于在全国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4页

卫生工作，这两年因为忙于生产大跃进，有些放松了。现在应该立即抓紧布置，抓紧总结经验，抓紧检查、竞赛、评比。……要把过去两年放松了的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并且一定要于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这三年内做出显著的成绩，首先抓紧今年的卫生运动。

《把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49页

环境卫生，极为重要，一定要使居民养成卫生习惯，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

《把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50页

八、知识分子问题

(一) 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

1. 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者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

《五四运动》（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59页

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

所有这些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中的中农的地位有某些相像，都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日益走向破产和没落的境地。

因此，这些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这些小资产阶级也只有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40—641页

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

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数十年来，中国已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在这一群人中间，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辛亥革命前的留学生运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运动，就是显明的例证。尤其是广大的比较贫苦的知识分子，能够和工农一道，参加和拥护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大的传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41页

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或者已经觉悟，或者正在觉悟起来，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74—675页

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群众要有知识分子，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42页

2. 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要保护革命知识分子，不蹈过去的覆辙。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不能胜利。国民党和我们力争青年，军队一定要收容大批革命知识分子。要说服工农干部，吃得下，不怕他们。工农没有革命知识分子帮忙，不会提高自己。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政府中，党部中，民众运动中，也要吸收革命知识分子。

《反投降提纲》（一九三九年六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33页

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18页

许多军队中的干部，还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还存在着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许多我们办的学校，还不敢放手地大量地招收青年学生。许多地方党部，还不愿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这种现象的发生，是由于不懂得知识分子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不懂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懂得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和为工农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懂得资产阶级政党正在拼命地同我们争夺知识分子，日本帝国主义也在利用各种方法收买和麻醉中国知识分子的严重性，尤

其不懂得我们的党和军队已经造成了中坚骨干，有了掌握知识分子的能力这种有利的条件。

《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18—619页

如果知识分子跟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结合起来，就是说，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末，事情就好办了。拿破仑说，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但是，要是没有铁做的毛瑟枪，这个笔杆子也是无用的。你们有了笔杆子，再加一条毛瑟枪，根据拿破仑的说法，那末，你们就有三千零一支毛瑟枪了。有了这，什么帝国主义也不怕，什么顽固分子也不怕。有了这，这些狗子敢来咬一口吗？

《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57页

工人阶级应欢迎革命的知识分子帮助自己，决不可拒绝他们的帮助。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自己就不能进步，革命也不能成功。

《〈中国工人〉发刊词》（一九四〇年二月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28页

我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对于知识分子觉得特别宝贵。党中央在两年多以前作过一个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决定，要争取广大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是革命的，愿意参加抗日的，一概采取欢迎态度。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15页

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发表以后，还有好些问题没有解决，所以需要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样，天天讲，使得在军事、政府、党务、经济、教育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对文化人、知识分子采取欢迎的态度，懂得他们的重要性，没有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斯大林在联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理论问题来讲的。任何一个阶级都要用这样的一批文化人来做事情，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是一样，要有为他们使用的知识分子。在他们这个阶级完全知识化以前，还要利用别的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以我们要慢慢地来，要进行宣传解释，光是写几篇文章作几次演说办不了事，一定要具体地一步一步地来，没有一次就成功那样容易的事。

《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32页

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五四”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47页

知识分子不一定是理论工作者。我们党里头，知识分子的增加是很好的现象。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42页

中国是一个被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国的人民解放斗争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因而知识分子问题就特别显得重要。而在过去半世纪的人民解放斗争，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斗争中，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今后的斗争中，他们将起更大的作用。因此，今后人民的政府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82—1083页

3. 没有庞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

新中国需要很多的学者及技术人员，你们向这方面努力是很适当的。

《给蔡博等的信》（一九四六年一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86页

你们开的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再讲一声，我们欢迎你们。

《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七月六日），《毛泽东文艺论集》第131页

建设工业要有工程师，办学校要有教授，要团结他们，没

有他们是不行的。当然，没有新人也不行。割断历史是不行的，好像什么都是我们白手起家，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八日），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59页

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

《关于农业问题》（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
309页

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比培养“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行，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这些人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文集》第
7卷第360页

（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1. 对知识分子队伍状况的基本估价

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同样，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只有跟共产党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

《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文
集》第2卷第256页

在事实上，和我们合作的知识分子不但是抗日的，而且是

有民主思想、倾向于民主的。没有民主思想，他们根本就不会来。而且在和我们合作的人中，大多数人的思想都变成了马列主义的思想，共产主义的思想，也就是说，大多数人变成了党员，他们的思想不但是抗日的、民主的，而且成了无产阶级的。

《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25页

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七年中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这部分人目前虽然还是少数，但是正在逐渐增多。当然，知识分子中间有一些人现在仍然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这部分人只占少数。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4—225页

全国知识分子就算五百万吧，五百万里面究竟有多少人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有十分之一没有？十分之一就是五十万。他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并且相当懂得，用来指导行动。搞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不算是懂得马克思主义。若有十分之一，那就是好事。文艺界有多少这样的人？有十分之一就很好了。还有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抵触的，其中有些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抱敌对情绪的，不只是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但他不是特务，又不拿刀子杀人，他就是发牢骚，有时也写点文章。这样的人是否也有十分之一？这些人多数不说话，沉默地抵抗。恐怕这两头都没有十分之一，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没有十分之一，挂名的不算，教条主义的不算，抵触马克思主义的也没有十分

之一。对马克思主义，党内有不信的，党外倒有相信的。现在两头去掉，剩下中间的还有百分之八十左右，还是大多数。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但不一定相信马克思主义，用它来指导创作的就更少了。

《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51页

中国究竟有多少知识分子，没有精确的统计。有人估计，各类知识分子，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和普通知识分子在内，大约有五百万左右。这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的。他们对社会主义还有怀疑，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他们还是爱国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中间，顽固地要走后一条路线的人。这后一条路线，在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这种人在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学技术界、宗教界里都有，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这种人在五百万左右的人数中间，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三。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五百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在这些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人的中间，有许多人对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工作，许多新问题如何了解，如何对待，如何答复，还不大清楚。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8—269页

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如果拿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说：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就五百万的总数来说，这些人是少数，但是他们是核心，有力量。多数人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也学了一点，但是还不熟悉。其中有些人还有怀疑，还没有站稳脚跟，一遇风浪就会左右摇摆。在五百万总数中占大多数的这部分知识分子，还是处在一种中间的状态。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抱着仇视态度的人，是占极少数。有一些人虽然不公开表示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实际上不赞成。这种人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会有的，我们应该允许他们不赞成。例如一部分唯心主义者，他们可以赞成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但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宗教界的爱国人士也是这样。他们是有神论者，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不能强迫这些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总而言之，可以这样说，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状况是：赞成而且比较熟悉的，占少数；反对的也占少数；多数人是赞成但不熟悉，赞成的程度又很不相同。这里有三种立场，坚定的，动摇的，反对的三种立场。应该承认，这种状况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还会存在。如果不承认这种状况，我们就会对别人要求过高，又会把自己的任务降低。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9—270页

2. 尊重和信任知识分子

对知识分子的关系，过去与现在也是一贯的保护政策，优待技术人员、文化人员与艺术家，对他们都采取尊重的态度。

《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82页

我们解放区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好人。他们的缺点甚至错误，可以在工作中改造。他们是人民事业的宝贵资本，他们应该被重视。他们中有许多人从事军事、政治、经济工作，另有许多人从事文化、教育、艺术、卫生工作。所有这些人员，都应该被重视。

《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41页

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82页

我们要重视理论工作者，看得起他们，把他们看成我们队伍中很有学问的人，有修养的人，要尊敬他们。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42页

因为整风审干，好像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大公平。好像天平，这一方面低了一点，那一方面高了一点。我们

这个大会，要把它扶正，使知识分子这一方面高一点。是不是要反过来？那也不是。我们要欢迎他们为我们党服务，为我们党的利益而奋斗，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经济部门，我们的群众团体，要吸收广大知识分子为我们服务，我们要尊敬他们。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43页

还有技术干部，上一次我讲的时候漏掉了，今天补充一下。有各种技术工作干部，例如做通讯方面和经济方面带有技术性工作的干部，对做各种技术工作的同志，不论是军队里面的、政府里面的、党组织里面的，我们都要尊重他们，承认他们有功劳，全党同志要看得起他们，过去在政治待遇上搞得不好，今后要搞好。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07页

在任何企业中，除厂长或经理必须被重视外，还必须重视有知识有经验的工程师、技师及职员。必要时，不惜付出高薪。

《企业管理委员会应有工程师、技师及职员参加》（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88页

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我们有许多同志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用生硬的态度对待他们，不

尊重他们的劳动，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不适当地干预那些不应当干预的事务。所有这些缺点必须加以克服。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5页

3. 团结、争取和吸收知识分子为革命和建设服务

为了造就革命的知识分子，为了发展文化教育，利用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为苏维埃服务，这也是苏维埃文化政策中不能忽视的一点。

《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方针和任务》（一九三四年一月），《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35页

今后应该注意：（1）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只要是愿意抗日的比较忠实的比较能吃苦耐劳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多方吸收，加以教育，使他们在战争中在工作中去磨练，使他们为军队、为政府、为群众服务，并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对于不能入党或不愿入党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应该同他们建立良好的共同工作关系，带领他们一道工作。（2）在这种大量吸收政策之下，毫无疑问应该充分注意拒绝敌人和资产阶级政党派遣进来的分子，拒绝不忠实的分子。对于这类分子的拒绝，应取严肃的态度。这类分子已经混进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和政府者，则应依靠真凭实据，坚决地有分别地洗刷出去。但不要因此而怀疑那些比较忠实的知识分子；要严防反革命分子陷害好人。（3）对于一切多少有用的比较忠实的知识分子，应该分配适当

的工作，应该好好地教育他们，带领他们，在长期斗争中逐渐克服他们的弱点，使他们革命化和群众化，使他们同老党员老干部融洽起来，使他们同工农党员融洽起来。（4）对于一部分反对知识分子参加工作的干部，尤其是主力部队中的某些干部，则应该切实地说服他们，使他们懂得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工作的必要。同时切实地鼓励工农干部加紧学习，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5）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日寇占领区，基本上适用上述原则，但吸收知识分子入党时，应更多注意其忠实的程度，以保证党的组织更加严密。对于广大的同情我们的党外知识分子，则应该同他们建立适当的联系，把他们组织到抗日和民主的伟大斗争中去，组织到文化运动中去，组织到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去。

《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19—620页

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中央盼望各级党委和全党同志，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

《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0页

在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斗争中，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顽固派又正在极力争取知识分

子，因此，争取一切进步的知识分子于我们党的影响之下，是一个必要的重大的政策。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51页

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应吸收一切较有抗日积极性的知识分子进我们办的学校，加以短期训练，令其参加军队工作、政府工作和社会工作；应该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任用和放手地提拔他们。

《论政策》（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68页

现在华北、华中各个根据地，陕甘宁边区，特别是延安，有大批的文艺工作者，有已经成了专门家的，还有许多没有成家，是做普通文化工作、艺术工作的，这种人更多。这种现象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对我们根据地，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现象呢？是一种很好的现象，绝不是坏现象。这个情况，在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颁布之后，要更加好。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正式表明我们党欢迎并吸收大批的知识分子，不管是什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是抗日的就应该吸收。

《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25页

在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各种力量里面，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他们的思想和作品都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比较地倾向于革命，比较地接近于劳动人民。因此，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争取他们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战线上来，是

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67页

在东北,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动向,对于我们建立根据地,同争取将来的胜利关系极大。因此,我党对于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工作,特别是争取工人和知识分子,应当充分注意。鉴于抗战初期我党争取工人和知识分子进入根据地注意不够,此次东北党组织除注意国民党占领区的地下工作外,还应尽可能吸引工人和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和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82页

对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冒险政策。中国学生运动和革命斗争的经验证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可以参加革命或者保持中立的,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只占极少数。因此,我党对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采取慎重态度。必须分别情况,加以团结、教育和任用,只对其中极少数坚决的反革命分子,才经过群众路线予以适当的处置。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69—1270页

关于知识分子部分,说得不完全,是不妥的。原件说地主出身者是地主,富农出身者是富农,中农出身者是中农,这是说社会出身,这是对的。但必须补充说,根据知识分子所从事的职业,例如参加军队者是军人,参加政府工作者是政府职员,

参加生产企业者是工人、职员、技师或工程师，参加文化工作者是教员、记者、文艺家等，并将着重点不放在社会出身方面，而放在社会职业方面，方可避免惟成分论的偏向。

《对知识分子应避免惟成分论的偏向》（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97页

现在我们的政权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可以吸收资产阶级民主分子、知识分子代表资产阶级参加（这一条比十大纲领缓和一些），经济上则没收官僚资本（这一条比十大纲领激烈一些）。这是与六大决议案有区别的。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一九四八年九月），《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39页

过去六年中，各地党组织都没有注意吸收甚至拒绝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关门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必须纠正。中央组织部应当负责订出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年度计划和几年计划。

《对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477页

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出的号召》（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12页

对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的问题处理不好的话，对革命事业是不利的。对资产阶级的办法，中国就与苏联不同。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人数虽少，但是他们有近代文化，

我们现在还是要团结他们。……资产阶级在近代文化、近代技术这些方面，比其他阶级要高，因此必须团结他们，并且把他们改造过来。资产阶级掌握的文化，有些是旧的、用不到的，但是许多东西用得到。音乐家中的许多人在思想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我们这些人过去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从那方面转过来了，他们为什么不能过来呢？事实上已经有许多人过来了。团结他们是有利于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的。要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改造，把他们化过来。在座的都是“西医”，是学西洋音乐的，要依靠你们。请吹鼓手来办音乐专门学校是不行的，这些事还是要靠你们办。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79—80页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太少了。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他们。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0页

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

《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知识分子》（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64页

4. 对旧知识分子的使用、教育和改造

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只要我们做得恰当，他们是会欢迎我们的帮助的。

《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12页

对于旧文化工作者、旧教育工作者和旧医生们的态度，是采取适当的方法教育他们，使他们获得新观点、新方法，为人民服务。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83页

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党内也好，党外也好，有他的动摇性，也有他的革命性。动摇性是他们坏的一方面，但是一般地说来，能够用教育的方法去克服。从党内来说，延安整风就是一个证明。艺术家和作家，对文艺座谈会这样的方法也赞成，从前他们不知道怎样做，我们党给他们指出方针，向他们进行教育工作，不是命令主义，而是逐渐使他们自觉，这就很有成效。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18页

对广大知识分子阶层，如学生、教员、律师、医生、工程师等要慎重对待。这些人过去给资产阶级服务，现在受革命运动影响，经过教育，可以给我们做事。

《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5页

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就是那些唯心论者，我们也有办法使他们不反对我们。他们讲上帝造人，我们讲从猿到人。有些知识分子老了，七十几岁了，只要他们拥护党和人民政府，就把他们养起来。

《不要四面出击》（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74—75页

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在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的时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议。现在，这个建议已经逐步地变为现实。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十一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83—184页

为了改善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进一步地进行对于知识分子的改造，大批地培养知识分子，以加速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必须加强党的领导。

《对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476页

对于只有严重错误思想、甚至反动思想、而没有反革命行为的高级知识分子，不应该将他们作为反革命分子对待；而应该采取严肃批评和耐心教育的方针，使他们逐步地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对于这种人，应该给以充分的时间，耐心等待他们的进步。

《对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476页

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旧思想和旧习惯的改造，要在巩固团结他们的方针下，继续进行长期的教育。

《国家预算要保证重点建设又要照顾人民生活》（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60页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我们敢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

我们准备用这个放的方针来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改变他们现在的面貌。像我在上面所说的，我国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愿意进步的，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在这里，我们所采取的方针有很大作用。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是思想问题，对于思想问题采取粗暴的办法、压制的办法，那是有害无益的。知识分子的改造，特别是他们的世界观的改变，要有一个长时期的过程。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9页

资产阶级和曾经为旧社会服务过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人总是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总是留恋他们的旧世界，对于新世界总有些格格不入。要改造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不可用粗暴方法。但是必须估计到他们的大多数，较之解放初期是大为进步了，他们对我们提出的批评，大多数是对的，必须接受。只有一部分不对，应当解释。他们要求信任，要求有职有权，是对的，必须信用他们，必须给以权责。

《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72页

全国有几百万资产阶级和曾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需要这些人我们工作，我们必须进一步改善和他们的关系，以便使他们更有效率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以便进一步改造他们，使他们逐步地工人阶级化，走向现状的反面。大多数人一定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73页

在我们的国家里，鉴别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恶，有几个标准。主要是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74页

资产阶级和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要不要改造？他们非常之怕改造，说改造就出那么一种感，叫做“自卑感”，越改就越卑。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应当是越改造越自尊，应当是自尊感，因为是自己觉悟到需要改造。那些人的“阶级觉悟”很

高，他们认为他们本身不要改造，相反要改造无产阶级。他们要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而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我看，多数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经过踌躇、考虑、不大愿意、摇摆这么一些过程，总归是要走到愿意改造。越改造就越觉得需要改造。

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改造，可以逐步地改造过来，改造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我讲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如果不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有作“梁上君子”的危险。

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

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承认有改造的必要。

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

为什么要思想改造？就是为了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些老知识分子会要逼得非变不可，因为新知识分子起来了。讲学问，你说他现在不行，他将来是会行的。这批新的人出来了，就对老科学家、老工程师、老教授、老教员将了一军，逼得他们非前进不可。我们估计，大多数人是能够前进的，一部分是能够改造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

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

不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需要改造，就是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因为在各方面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也需要进行改造。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一九五九年十二

月十日——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第120页

教科书说,我们吸收资产阶级分子来参加企业的管理和国家的管理,可以这样说。但是,我们同时提出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改造的任务,帮助他们改变自己的整个世界观,或者改变他们在个别问题上的个别观点。教科书却不提对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改造。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第122页

5. 造就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的宏大队伍

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给予中国人民的灾难中,包括着民族文化的灾难。特别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文化事业和教育事业,进步的文化人和教育家,所受灾难,更为深重。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他们必须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事艰苦的工作。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82页

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要继续巩固和

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页

我们要造就知识分子。现在我们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旧中国留下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有十万，我们计划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毕业生和专科毕业生）。到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方面就有了十八年的工作经验，有了很多的科学家和很多的工程师。

《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01—102页

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个任务，应当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基本上解决。十年至十五年以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准备着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全体人民，人人都要懂得这个任务，人人都要努力学习。有条件的，要努力学技术，学业务，学理论，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这个新部队，包含从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九五七年七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50页

我们要在这十年内（科学规划也是十二年，还有十年），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我们的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都要努力争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各级特别是省、地、县这三级要有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计划，不然，时间过去了，人还没有培养出来。中国有句古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树人，减少九十年，十年树人。十年树木是不对的，在南方要二十五年，在北方要更多的时间。十年树人倒是可以的。我们已经过了八年，加上十年，是十八年，估计可能基本上造成工人阶级的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专家队伍。十年以后就扩大这个队伍，提高这个队伍。

《关于农业问题》（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09—310页

无产阶级必须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这跟资产阶级要造就它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一样。一个阶级的政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那是不行的。美国没有那样一些知识分子，它资产阶级专政怎么能行？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一定要造就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包括从旧社会来的经过改造真正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

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

（三）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与提高

1. 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

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

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

《五四运动》（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59—560页

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同样，在革命队伍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只有知识分子跟工人、农民正确地结合，才会有无攻不克、无坚不摧的力量。因此，知识分子要同共产党结合，要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要同革命武装队伍结合，要同八路军新四军结合。

《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56页

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41—642页

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

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15页

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裤，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51—852页

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

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这不光是讲初来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过前方，在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做过几年工作的人，也有许多是没有彻底解决的。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3卷第857页

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3卷第877页

从城市到农村工作的知识分子，不容易了解农村现时还是以分散的落后的个体经济为基础的这种特点；在解放区，则还要加上暂时还是被敌人分割的和游击战争的环境的特点。因为不了解这些特点，他们就往往不适当地带着他们在城市里生活或工作的观点去观察农村问题，去处理农村工作，因而脱离农村的实际情况，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这种现象，必须用教育的方法加以克服。

中国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应该觉悟到将自己和农民结合起来的必要。农民正需要他们，等待他们的援助。他们应该热情地跑到农村中去，脱下学生装，穿起粗布衣，不惜从任何小事情做起，在那里了解农民的要求，帮助农民觉悟起来，组织起来，为着完成中国民主革命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即农村民主革命而奋斗。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79页

关于知识分子，我也讲一个例子。去年春节，杨家岭的秧歌队到安塞演出，正赶上安塞的劳动英雄开会，我们杨家岭的娃娃同志、青年同志和劳动英雄一起扭秧歌，这说明关系好了，我说从此天下太平了。从前躲飞机也不走一条路，现在在一起扭秧歌了。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02页

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62页

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他们愿意为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并且懂得如果离开社会主义事业，离开共产党所领导的劳动人民，他们就会无所依靠，而不可能有任何光明的前途。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1页

无论资产阶级思想也好，小资产阶级思想也好，在知识分子中还是占大多数的，他们还没有跟群众打成一片。我看还是跟工农兵打成一片才有出路，不能打成一片，你写什么呢？光写那五百万知识分子，还有身边琐事？不能永远只写这些人，这些人也会要变的。

《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55页

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知识分子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如果一辈子都不同工人农民见面，这就很不好。我们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文学家、艺术家、教员和科学研究人员，都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机会去接近工人农民。有些人可以到工厂农村去看一看，转一转，这叫“走马看花”，总比不走不看好。另外一些人可以在工厂农村里住几个月，在那里作调查，交朋友，这叫“下马看花”。还有些人可以长期住下去，比如两年、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就在那里生活，叫做“安家落户”。有一些知识分子本来就是生活在工人农民里面的，例如工业技术人员本来就在工厂，农业技术人员和乡村学校教员本来就在

农村。他们应该把工作做好，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我们要把接近工农群众这件事，造成一种风气，就是说要有很多知识分子这样做。当然不能是百分之百，有些人有各种原因不能去，但是我们希望尽可能有比较多的人去。也不能一下子大家都去，可以逐步地分批地去。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2页

我看知识分子都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找朋友，真正的朋友是在工人、农民那里。要找老工人做朋友。在农民中，不要轻易去找富裕中农做朋友，要找贫农、下中农做朋友。老工人辨别方向非常之清楚，贫农、下中农辨别方向非常之清楚。

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

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对调查报告〈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批语和修改》（一九六八年九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557页

2. 学习马克思主义，深入实际，转变立场和世界观

学生们的书本知识是什么知识呢？假定他们的知识都是真理，也是他们的前人总结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写成的理论，不是他们自己亲身得来的知识。他们接受这种知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必须知道，就一定的情况说来，这种知识对于他

们还是片面性的，这种知识是人家证明了，而在他们则还没有证明的。最重要的，是善于将这些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际中去。所以我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经验尚少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些。

有什么办法使这种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呢？惟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16页

最后一个问题是学习，我的意思是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这就是说，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52页

“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

括而不能代替物理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那末，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家，这些情绪应不应该破坏呢？我以为是应该的，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3卷第874页

我们要在党内外五百万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中，宣传并使他们获得辩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我们将会组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而这是我们极为需要的，这又是一件大好事。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

东文集》第6卷第395页

广大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有了进步，但是不应当因此自满。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

倒退是没有出路的。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经起了变化，资产阶级思想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这就使大量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不但有了改变的必要，而且有了改变的可能。但是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应当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事实上必定会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始终不愿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愿意接受共产主义，对于这一部分人不要苛求；只要他们服从国家的要求，从事正常的劳动，我们就应当给他们以适当工作的机会。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5—226页

说到马克思主义修养不足，这是普遍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好好地学。当然，学是要自愿的。听说有些文学家十分不喜欢马克思主义这个东西，说有了它，小说就不好写了。我看这也是“条件反射”。什么东西都是旧的习惯了新的就钻不进去，因为旧的把新的压住了。说学了马克思主义，小说不好写，大概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跟他们的旧思想有抵触，所以写不出东西来。

在知识分子当中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很有必要的，要提倡大家学它十年八年，马克思主义学得多了，就会把旧思想推了出去。但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也要形成风气，没有风气是不会学得好的。

《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0—261页

现在要争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来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有个初步了解，而不是要

求他们一下子贯通。马克思主义的创造者马克思本人，也不是一下子就全部贯通的。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出版，只是马克思主义体系形成的开始，还不是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完成。要求知识分子一下子都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个要求是不现实的。

《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4页

如果在今后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能够有比较多的人接受马克思主义，能够有比较多的人通过工作和生活的实践，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生产的实践、科学的实践，懂得比较多的马克思主义，这样就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0页

知识分子又是教育者。我们的报纸每天都在教育人民。我们的文学艺术家，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我们的教授、教员，都在教人民，教学生。因为他们是教育者，是当先生的，他们就有个先受教育的任务。在这个社会制度大变动的时期，尤其要先受教育。过去几年，他们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有些人并且很用功，比以前大有进步。但是就多数人来说，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完全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那就还相差很远。有些人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自以为有学问了，但是并没有读进去，并没有在头脑里生根，不会应用，阶级感情还是旧的。还有一些人很骄傲，读了几句书，自以为了不起，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可是一遇风浪，他们的立场，比起工人和大多数劳动农民来，就显得大不相同。前者动摇，后者坚定，前者暧昧，后

者明朗。因此，如果认为教人者不需要再受教育了，不需要再学习了，如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只是要改造别人，改造地主、资本家，改造个体生产者，不要改造知识分子，那就错误了。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说所有的人，我们这些人也在内。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即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人，无产阶级立场比较坚定的人，也还是要再学习，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问题。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我们当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要做好先生，首先要做好学生。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学是不成的，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贫农下中农学习，在学校则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据我看，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多数人是愿意学习的。我们的任务是，在他们自愿学习的基础上，好心地帮助他们学习，通过适当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学习，而不要用强制的方法勉强他们学习。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0—272页

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如果不把过去的一套去掉，换一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和工人农民的观点不同，立场不同，感情不同，就会同工人农民格格不入，工人农民也不会把心里的话向他们讲。知识分子如果同工农群众

结合，和他们做了朋友，就可以把他们从书本上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自己的东西。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又在同工农群众的接近中，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有所了解，那末，我们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如果这样，大家的工作就一定会做得好得多。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3页

青年学生和工农结合，参加生产劳动，是改造世界观和学到实际技术知识的重要途径。

《对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和〈人民日报〉编者按的批语和修改》（一九六八年七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508页

3. 做到又红又专

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6页

也是十年计划，十年内必须精通工业、农业各种技术业务，将自己和许多人都变得“又红又专”，基本上完成建立无产阶级

知识分子队伍的伟大任务。对此，各级均要有计划。“十年树人”极为必要，非此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加上过去八年，十八年树人，估计可以基本造成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的专家队伍。

《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94页

知识分子要同时是红的，又是专的。要红，就要下一个决心，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这并不是要读很多书，而是要真正弄清什么叫无产阶级，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只有无产阶级有前途，其他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一定要共产党领导等等问题。

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

第七编

关于政策和策略

目 录

一、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性	(1703)
(一)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1703)
(二) 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全靠党的斗争策略 的正确和坚决	(1705)
(三) 必须加强党的政策和策略的教育	(1709)
二、制定与执行政策、策略的原则和要求	(1714)
(一) 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对人民负责	(1714)
(二) 党的具体工作路线和政策不能脱离总路线 和总政策	(1716)
(三) 必须做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	(1717)
(四) 政策和策略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做相应的 调整	(1717)
(五) 要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恰当地 统一起来	(1720)
(六) 掌握政策界限，防止出现偏向	(1723)
三、实践是检验政策和策略的标准	(1726)
四、对敌斗争的政策和策略	(1728)
(一)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1728)
1.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1728)
2. 在战略上把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看作纸老虎， 在战术上把它们看作真老虎	(1728)
3. 既要反对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也要反对	

轻敌思想	(1733)
(二) 破除迷信，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1736)
(三) 用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	(1745)
1. 用革命的两面政策反对反革命的两面政策	(1745)
2. 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1747)
3.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1751)
4. 谈判的原则和策略	(1754)
● 边谈边打，谈打结合，只有打好，才能谈好	(1754)
● 谈判要以有利于人民为原则，让步不能伤害人民的根本利益	(1755)
● 把握通过谈判与敌达成妥协的可能性	(1760)
● 对谈判和达成的协议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1762)
● 及时揭露敌人的和谈阴谋，教育人民不要上当	(1764)
(四) 分化瓦解并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	(1769)
1. 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	(1769)
2. 孤立和打击当前最主要的敌人，不要四面出击	(1773)
3. 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	(1774)
(五) 合法的公开的斗争要同非法的秘密的斗争相结合	(1776)
1. 学会武装斗争与和平斗争、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统一的政治科学	(1776)
2. 秘密斗争应注意隐蔽精干，公开斗争应利用一切合法的形式	(1779)
五、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	(1783)
(一)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	

- 统一战线 (1783)
- (二) 在统一战线内部要分别情况区别对待, 在
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 (1783)
- (三) 发展进步势力, 争取中间势力, 孤立顽固
势力 (1791)
1. 发展进步势力, 争取中间势力, 孤立顽固势力,
是对于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 (1791)
 2. 发展进步势力 (1794)
 3. 争取中间势力 (1797)
- 争取中间势力是统一战线极严重的任务, 必须采取
十分慎重的态度 (1797)
 - 对中间势力的动摇态度进行适当的说服和批评, 争取
他们采取中立、对我同情和向我靠拢 (1803)
4. 孤立顽固势力 (1808)
- (四) 又联合又斗争 (1815)
1. 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政策 (1815)
 2. 合作是有原则的、积极的, 让步要有限度、
有条件 (1816)
 3. 统一战线内部, 既要反对“一切联合, 否认
斗争”, 也要反对“一切斗争, 否认联合” (1820)
 4. 又团结又斗争, 以斗争求团结 (1822)
 5. 又打又拉, 打是手段, 拉是目的 (1828)
 6. 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 (1830)

一、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性

（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中国共产党是在复杂的环境中工作，每个党员，特别是干部，必须锻炼自己成为懂得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战士，片面地简单地看问题，是无法使革命胜利的。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793页

就要使同志们懂得，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

《改造我们的学习》（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2页

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所谓经验，就是实行政策的过程和归宿。

《关于工商业政策》（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86页

没有全般的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中国革命是永远不能胜利的。最可怕的是领导同志的自满自是，自己缺乏策略观点与

政策观点，而又对中央的指示熟视无睹（不细看这些指示，不研究这些指示，忙于不应当忙的事务工作，而忽视了策略指导与政策指导这种自己责任上的主要工作）。我们要求你们每两个月做一次（每年共六次）的综合性的工作报告，就是要求你们将这种策略与政策的规定、策略与政策在实行后的结果及根据这种结果而作出的你们的自我检讨（这些就是你们日常工作的主要工作）向我们作报告。

转发邓小平寅齐电给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负责同志的电报（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四日），《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三——一九四九）》下卷第 295 页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关于情况的通报》（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1298 页

各野战军前委及各军区对部队推行党的政策与策略是否有没有抓得很紧的事。如果有这样的事，必须从前委与军区自己领导方面加以检讨。须知政策与策略，是我党我军的生命。

《政策和策略是我党我军的生命》（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 5 卷第 83 页

我们打了二十二年，曾经吃过大败仗，三十万军队剩下了二万多，后来转变了，这主要是个政策问题，与其说我们打的是军事战，还不如说打的是政治战。因而，注意政策问题很必要。

《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的谈话要点》（一九六〇年九月三十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9 册第 298 页

（二）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全靠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

我们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四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的组织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壮大，原因就在于湘赣边界的共产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党的特委和军委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因为这些策略的适当，加上地形之利于斗争，湘赣两省进攻军队之不尽一致，于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个月中的各次胜利。虽以数倍于我之敌，不但不能破坏此割据，并且不能阻止此割据的日益扩大，此割据对湘赣两省的影响则有日益加大之势。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的时候，反而采取统治阶级政治破裂时候的战略，分兵冒进，致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51—52页

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我们在今年二月以前，是比较地执行得好的。三月湘南特委的代表到宁冈，批评我们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于是改变原来前委的领导人，政策一变。四月全

军到边界后，烧杀虽仍不多，但对城市中等商人的没收和乡村小地主富农的派款，是做得十分厉害的。湘南特委提出的“一切工厂归工人”的口号，也宣传得很普遍。这种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近来逐渐改变这种政策，情形渐渐好些。在遂川特别收到了好的效果，县城和市镇上的商人不畏避我们了，颇有说红军的好话的。草林圩上逢圩（日中为市，三天一次），到圩两万人，为从来所未有。这件事，证明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了。豪绅对人民的税捐很重，遂川靖卫团在黄坳到草林七十里路上要抽五道税，无论什么农产都不能免。我们打掉靖卫团，取消这些税，获得了农民和中小商人全体的拥护。

《井冈山的斗争》（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78页

我们的斗争目的是要从民权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我们的任务第一步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发动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政权，完成民权主义革命。由这种斗争的发展，跟着就要执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这些伟大的革命任务的完成不是简单容易的，它全靠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倘若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是错误的，或者是动摇犹豫的，那末，革命就非走向暂时的失败不可。须知资产阶级政党也是天天在那里讨论斗争策略的，他们的问题是怎样在工人阶级中传播改良主义影响，使工人阶级受他们的欺骗，而脱离共产党的领导，怎样争取富农去消灭贫农的暴动，怎样组织流氓去镇压革命等等。在这样日益走向尖锐的短兵相接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之下，无产阶级要

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

《反对本本主义》（一九三〇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5页

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要把不平衡的状态变到大体上平衡的状态，还要经过很长的时间，还要花费很大的气力，还要依靠党的策略路线的正确。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2—153页

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话），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84页

战争过程中，只要我能运用正确的军事的和政治的策略，不犯原则的错误，竭尽最善的努力，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将随战争之延长而发展，必能继续改变着敌我强弱的原来程度，继续变化着敌我的优劣形势。到了新的一定阶段时，就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势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61页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则，离不开统一战线政策的良好执行，离不开文化的动员，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和敌国人民援助的努力。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79页

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然是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如果有什么一种三民主义，它是没有农工政策的，它是并不真心实意扶助农工，并不实行“唤起民众”的，那就一定会灭亡。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92页

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和正确的政策，依靠群众，来争取战争的胜利。

《在杨家沟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330页

蒋介石孤立，是因为他代表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压迫人民的。有人说共产党是蒋介石逼出来的，“消灭了一个共产党，同时制造了十个共产党；消灭了十个共产党，同时制造了一百个共产党”，结果弄得人人离心，个个厌恶，共产党越来越大。这是一方面的真理。但是，还有另一方面的真理，就是我们政策的正确。如果我们的政策不正确，比如侵犯了中农、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开明绅士、知识

分子，对俘虏处置不当，对地主、富农处置不当，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那就还是不能胜利，共产党会由越来越多变成越来越少，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国共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在理论上不是不存在的。

《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2—23页

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

《关于工商业政策》（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86页

最近几个月，我党在战争、土地改革、整党整军、发展新区和争取民主党派等方面均有成绩，在这些工作中所发生的偏向有了着重的纠正，或正在纠正中，这样就可以使整个中国革命运动走上健全发展的轨道。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

《关于情况的通报》（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98页

（三）必须加强党的政策和策略的教育

必须了解，阶级斗争与阶级联合（统一战线）的教育都是阶级教育，二者不可缺一。以前一时期强调斗争教育是必要的，否则不能达到反磨擦的胜利。现在只知团结不知斗争的

现象尚有,但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放松了统一战线的策略教育。决不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是重要的。

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〇年七月六日),《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197页

加紧争取同盟军又不失自己立场的策略教育是必要的,老本与形式主义都是无用的。

《目前时局与党的政策》(一九四〇年七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92页

军队政治机关与军队各级干部,尤其是军政干部,必须了解与掌握党的政策与策略。应当承认军队干部对党的政策策略的了解与掌握是非常不够的,因此必须加强干部中策略教育,使其成为干部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项。

《对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几点意见》(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93页

各根据地必须坚决地执行中央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指示,加强党内的策略教育,纠正过左思想,以便长期地不动摇地坚持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全国和各根据地上,要反对对时局认为国共已最后破裂或很快就要破裂的错误估计以及由此发生的许多不正确的意见。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一九四一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79页

我党对党内对人民所施行的教育,也是包括这两方面性质的教育,就是教导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如何

和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各个不同的阶层在各种不同的形式上联合抗日，又和他们的各种不同程度的妥协性、动摇性、反共性作各种不同程度的斗争。

《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一九四一年五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85页

在党内要使全党都明了中共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在今天它已成为团结全国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决定因素，它的政策，关系全国抗战的成败与全中国人民的命运。因此每个党员都要正确懂得如何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方针，要加强策略教育与学习党在二十年革命斗争中的丰富经验。

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的指示》（一九四一年六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140—141页

向各级在职干部与训练干部的学校，进行关于了解客观情况（敌、友、我三方）的教育。鼓励那些了解客观情况较多较好的同志，批评那些尚空谈不实际的同志；鼓励那些既了解情况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评那些既不了解情况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使这种了解情况、注意政策的风气，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气密切联系起来。

《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62页

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当然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

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99页

我们有些同志有时可能没有透彻理解我们的政策，在执行政策过程中犯了错误，对这样的同志必须进行批评和教育。

《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89页

你们必须向全体指战员进行在新区工作的策略与政策教育，此点不知你们在此次休整中已做了没有，如果没有或不足，你们应在作战中补足之，此种教育极为重要。

《在宽大机动中大量歼灭敌人》（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81—82页

不注重政策与策略的教育，不使这种教育贯彻到底，使全体指战员充分明了，不加检查，让单纯军事观点占了统治地位，不尖锐全面彻底地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向这种错误观点让步妥协或者隐瞒这些现象不向前委或军区反映，而前委或军区则不向或少向中央反映，只将战绩向上级及中央反映，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不对的，是离开了或多少离开了党的路线的，必须认为是极端严重的现象，应当立即加以检讨。

《政策和策略是我党我军的生命》（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83页

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地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我们正在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有关土

地改革的各项政策，都应当在报上发表，在电台广播，使广大群众都能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协力来做。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18页

市委书记和市长必须委派懂政策有能力的人担任。市委书记和市长应该对所属一切工作人员加以训练，讲明各项城市政策和策略。城市已经属于人民，一切应该以城市由人民自己负责管理的精神为出发点。如果应用对待国民党管理的城市的政策和策略，来对待人民自己管理的城市，那就是完全错误的。

《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一九四八年四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24—1325页

为了保证胜利，一九四九年还要进行普遍的和深入的政策教育工作。说是“学会了”，并不等于不要再学了，我们还要学习很多东西。说是“偏向已经纠正了”，并不等于说党内已经没有任何偏向，或者将来也不会再发生偏向。现在党内还是存在着某些偏向，将来也还是会发生偏向的，我们还是必须随时地注意纠正党内的偏向。

《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32页

二、制定与执行政策、策略的原则和要求

（一）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对人民负责

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而特别是顾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的。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在土地关系上，我们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过活。在劳资关系上，我们一方面扶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发展实业的政策，使资本家也有利可图。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合力抗日。这样的政策我们叫做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这是真正适合现在中国国情的政策；我们希望不但在陕甘宁边区实行，不但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并且在全国也实行起来。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8页

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95页

掌握政策,任何行动不要脱离群众。扩兵是必要的,但决不可超过人民财力负担的限度。收集物资也是必要的,但决不可只顾军队,不顾人民,尤不可损害人民利益。

《关于日本投降后党的任务》(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55页

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28页

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

《党内通信》(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3页

我们各方面政策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发展生产,促进生产,对生产有利。

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第四中心小组会议上的插话(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五日)

（二）党的具体工作路线和政策 不能脱离总路线和总政策

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不是违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而是坚决地执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我们在实际斗争中没有一项政策不适合这种任务。我们的政策，包括没收地主土地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在内，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范畴内私有财产制的界限以外，并没有实行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60页

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56页

我党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规定了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各项具体的政策。但是，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各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16页

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4页

（三）必须做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

（参见第一编“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第213—248页）

（四）政策和策略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做相应的调整

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2页

时局的特点，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特点。这是事实，这是一方面的事实。现在我们又说，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又一个特点。这也是事实，这是又一方面的事实。这两种特点，这两种事实，都一齐跑来教训我们，要求我们适应情况，改变策略，改变我们调动

队伍进行战斗的方式。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3页

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5页

为什么要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呢?

……我们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规定的十大政纲,不但代表了工农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了民族的利益。但是现在的情况,使得我们要把这个口号改变一下,改变为人民共和国。这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8页

为什么共产党现在又申明取消工农民主专政和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呢?这个理由我们也早已说明了,不是这种制度和办法根本要不得,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引起了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使联合全民族各阶层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成了必需,

而且有了可能。……关于这种政策改变的客观原因和时间性，我们曾经毫不含糊地说明了自己的观点。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一贯地坚持了并发展了第一次国共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即革命的三民主义，所以共产党能于强寇压境民族危急之际，及时地提出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这种惟一能够挽救危亡的政策，并且不疲倦地实行之。

《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68—369页

在目前反共高潮的形势下，我们的政策有决定的意义。但是我们的干部，还有许多人不明白党在目前时期的政策应当和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有重大的区别。必须明白，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决不会变更的；过去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政策，现在不应当再简单地引用。

《论政策》（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62页

精兵简政何以是克服物质困难的一个重要的政策呢？很显然，目前的尤其是今后的根据地的战争情况，不容许我们停留在过去的观点上。我们的庞大的战争机构，是适应过去的情况的。那时的情况容许我们如此，也应该如此。但是现在不同了，根据地已经缩小，在今后的一个时期内还可能再缩小，我们便决然不能还像过去那样地维持着庞大的机构。在目前，战争的机构和战争的情况之间已经发生了矛盾，我们必须克服这个矛盾。敌人的方针是扩大我们这个矛盾，这就是他的“三光”政策。假若我们还要维持庞大的机构，那就会正中敌人的奸

计。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所以我们说，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政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九四二年九月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81—882页

战争已经在大陆上基本结束，和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的情况（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生死斗争，胜负未分）完全不同了，国家可以用贷款方法去帮助贫农解决困难，以补贫农少得一部分土地的缺陷。因此，我们对待富农的政策应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70页

（五）要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恰当地统一起来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在资本主

义各国，在没有法西斯和没有战争的时期内，那里的条件是国家内部没有了封建制度，有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基于这些特点，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地推翻资本主义。在那里，是长期的合法斗争，是利用议会讲坛，是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那里的组织形式是合法的，斗争形式是不流血的（非战争的）。在战争问题上，那里的共产党是反对自己国家的帝国主义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了，党的政策是使本国反动政府败北。自己所要战争只是准备中的国内战争。但是这种战争，不到资产阶级处于真正无能之时，不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有了武装起义和进行战争的决心之时，不到农民群众已经自愿援助无产阶级之时，起义和战争是不应该举行的。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而不是与此相反。所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所曾经这样做，而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证实了的。

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

版第2卷第541—542页

目前是战略进攻中部分的策略后退（隐蔽政策）。但在战略上，在总的方面，仍然是进攻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政策）。

《目前时局与党的政策》(一九四〇年七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
第2卷第289页

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6页

原则性要灵活执行。应当是那样,实际是这样,中间有个距离。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79页

我们的宪法草案,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的原则贯串在我们整个宪法中。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原则。我国现在就有社会主义。宪法中规定,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原则性。要实行社会主义原则,是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一天早晨一切都实行社会主义呢?这样形式上很革命,但是缺乏灵活性,就行不通,就会遭到反对,就会失败。因此,一时办不到的事,必须允许逐步去办。比如国家资本主义,是讲逐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只有公私合营一种形式,而是有各种形式。一个是“逐步”,一个是“各种”。这就是逐步实行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以达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原则,要达到这个原则就要结合灵活性。灵活性是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形式不是一种,而是“各种”,实现不是一天,而是

“逐步”。这就灵活了。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6—327页

在生产问题上,一方面,合作社经济要服从国家统一经济计划的领导,同时在不违背国家的统一计划和政策法规下保持自己一定的灵活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参加合作社的各个家庭,除了自留地和其他一部分个体经营的经济可以由自己作出适当的计划以外,都要服从合作社或者生产队的总计划。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1页

我们这回十二国是不是开谈判?六十几个党是不是开谈判?实际上是在开谈判。也就是说,在不损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下,接受人家一些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自己一些可以放弃的意见。这样我们就有两只手,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做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

《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32页

(六) 掌握政策界限,防止出现偏向

在所有基本点上,我们的政策从一开始就是正确的。首先,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政策是正确的。这个基本政策是让人民

群众自己组织起来，为实现民族独立，为建立民主制度，为在私有制基础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进行革命。只是在把这些基本政策应用于具体情况时，有时才容易出现某种偏向，有“左”的，有右的。然而，这些偏向并不是全党性的，也不是党内某个派别的，而是党内某些人的。从这些错误中，全党都学到了很多東西。

《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90页

我感觉各地所犯的许多错误，主要的（坏人捣乱一项原因不是主要的）是由于领导机关所规定的政策缺乏明确性，未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公开明确地分清界限。其所以未能明确分清界限，是由于领导者自己对于所要做的事缺乏充分经验（自己没有执行过某种政策的充分经验），或者对于他人的经验不重视，或者由于不应有的疏忽以致未能分清政策的界限。其次，是由于领导者虽然知道划分政策的界限，但只作了简单的说明，没有作系统的说明。根据经验，任何政策，如果只作简单的说明，而不作系统的说明，即不能动员党与群众，从事正确的实践。以上两种情况，各中央局与中央均应分担责任。我们过去有许多工作，既未能公开地（此点很重要，即是说在报纸上发表，使广大人们知道）明确地分清界限，又未能作系统的说明，不能专责备各中央局，我自己即深感这种责任。

《政策和经验的关系》（一九四八年三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74—75页

最近几个月，中央集中全力解决在新形势下面关于土地改革方面、关于工商业方面、关于统一战线方面、关于整党方面、

关于新区工作方面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的问题，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偏向，而主要是“左”的偏向。我们党的历史情况表明，在我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右的偏向，而在我党和国民党分裂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左”的偏向。现在的“左”的偏向，主要的是侵犯中农，侵犯民族资产阶级，职工运动中片面强调工人眼前福利，对待地主和对待富农没有区别，对待地主的大中小、恶霸非恶霸没有区别，不按平分原则给地主留下必要的生活出路，在镇压反革命斗争中越出了某些政策界限，以及不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党派，不要开明绅士，在新解放区忽视缩小打击面（即忽视中立富农和小地主）在策略上的重要性，工作步骤上的急性病等。这些“左”的偏向，在过去大约两年的时间里，各解放区都或多或少地发生过，有时成了严重的冒险主义倾向。

《关于情况的通报》（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97页

三、实践是检验政策和策略的标准

我们任何一项政策的正确性都必须由群众来检验，而且事实上一直是这样做的。我们自己也不断检查我们自己的决定和政策，一旦发现错误就加以改正。我们从所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得出结论，并尽可能广泛地加以实施。通过这些方法，共产党同人民大众的关系就能不断得到改善。

《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88—189页

这个决议不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而且是全党性质的，同全国人民有关联的，对全党与全民负责的。哪些政策或者其中的哪些部分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如果讲得合乎事实，在观念形态上再现了二十四年的历史，就对今后的斗争有利益，对今后党和人民有利益。正确和错误的标准自然是马克思主义，但人民利益同样是标准。人民对于各党派的情形并不很了解，但懂得根据他们的政策来作判断。

《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2页

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

生产力的。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79页

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

《关于工商业政策》（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86页

惟政策与经验的关系一点，似应了解为凡政策之正确与否及正确之程度，均待经验去考证；任何经验（实践），均是从实行某种政策的过程中得来的，错误的经验是实行了错误政策的结果，正确的经验是实行了正确政策的结果。因此，无论做什么事，凡关涉群众的，都应有界限分明的政策。

《政策和经验的关系》（一九四八年三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74页

四、对敌斗争的政策和策略

（一）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1.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参见第四编“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第 1135—1138 页）

2. 在战略上把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看作纸老虎，在战术上把它们看作真老虎

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以一当十，是我精神，以十当一，是我实力。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必倒，胜败之数，不辩自明。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 1 卷第 383 页

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25 页

美帝国主义外强中干，蒋介石也是如此，都是可以打倒的。拿破仑、希特勒最后不是都被打倒了吗？我们说中美反动派外

强中干，要藐视他们，这不是单单为了鼓励自己，而是有事实根据的。

《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97页

我们要估计到，同蒋介石再打下去，如果消灭他七十五个旅以后，美国还会加强援助，那时新的困难又会出现。因此我们一方面要藐视他们，非此不足以长自己志气，灭敌人威风，而另一方面又要重视他们，每一仗都要谨慎周密，不要疏忽。

《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99页

美帝国主义是个纸老虎，它的强大是表面的、暂时的。它不可能像流水一样地援助蒋介石。对美帝国主义，对蒋介石，总的方面我们应该轻视他们，但对具体的敌人就不能轻视，如果轻视就会犯原则性的错误。原则性有两个，对总的敌人我们是轻视的，对具体的敌人不能轻视。我记得我在红大讲过这个道理。当时有个同志说：“你讲了这么多道理，这也是道理，那也是道理，老子打起仗来，没有那么多道理，就是一冲。”我跟这个同志讲，你有你的道理，你的一“冲”是对的，但是，你只有一“冲”就不对了，要再加一“冲”，变成两“冲”。勇敢是一“冲”，智谋又是一“冲”，有勇无谋只是一“冲”，智勇双全才是两“冲”。……战略上我们必须轻视敌人，这是一“冲”。什么帝国主义都不可怕，他们矛盾很多，问题很多。美国有危机，在外部苏联反对它，在内部人民反对它。蒋介石那里人心不齐，军心不齐。美国援助蒋介石我们不怕，胡宗南有二十万人我们不怕。但是在具体问题上我们不能轻敌，这又是一“冲”。我们

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在战斗中要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地夺取。总之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7页

全世界帝国主义和中国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统治，已经腐烂，没有前途。我们有理由轻视它们，我们有把握、有信心战胜中国人民的一切内外敌人。但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不论是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或思想的斗争），却又决不可轻视敌人，相反，应当重视敌人，集中全力作战，方能取得胜利。当着我们正确地指出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应当轻视敌人的时候，却决不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也轻视敌人。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67页

我们共产党人是以不怕困难著名的。我们在战术上必须重视一切困难。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困难，我们都要采取认真对待的态度，创造必要的条件，讲究对付的方法，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将它们克服下去。根据我们几十年的经验，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困难，果然都被克服下去了。种种困难，遇到共产党人，它们就只好退却，真是“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这里就得出一条经验，它叫我们可以藐视困难。这说的是在战略方面，是在总的方面。不管任何巨大的困难，我们一眼就看透了它的底子。所谓困难，无非是社会的敌人和自然界给予我们的。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国内反革命分子以及他们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等等，都不过是垂死的力量，而我们则是新生

的力量，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对于他们，我们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只要想一想我们自己的历史，就会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在一九二一年刚刚建党的时候，只有几十个人，那样渺小，后来发展起来，居然把国内的强大敌人给打倒了。自然界这个敌人也是有办法制服它的。不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因此，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是有科学根据的。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92—393页

我们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是从战略上来说的。从整体上来说，要轻视它。从每一局部来说，要重视它。它有爪有牙。要解决它，就要一个一个地来。比如它有十个牙齿，第一次敲掉一个，它还有九个，再敲掉一个，它还有八个。牙齿敲完了，它还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认真做，最后总能成功。

从战略上说，完全轻视它。从战术上说，重视它。跟它作斗争，一仗一仗的，一件一件的，要重视。现在美国强大，但从广大范围、从全体、从长远考虑，它不得人心，它的政策人家不喜欢，它压迫剥削人民。由于这一点，老虎一定要死。因此不可怕，可以轻视它。但是，美国现在还有力量，每年产一亿多吨钢，到处打人。因此还要跟它作斗争，要用力斗，一个

阵地一个阵地地争夺。这就需要时间。

《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
第7卷第73—74页

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它，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两个人，那时他们就说全世界资本主义要被打倒。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它，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田只能一块一块地犁。就是吃饭也是如此。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能够吃下去。但是具体地吃，却是一口口地吃的，你不可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叫做各个解决，军事书上叫做各个击破。

《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28—329页

要在战略上蔑视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看成纸老虎，不算数；但是在战术上和每件具体工作上，却要重视它们，要认真地对待它们。帝国主义由真老虎变成半真半假的老虎，再变成完全的假老虎，即纸老虎，这是一个事物走向反面的转化过程，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进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结束之前，老虎还可能要活一个时期，还能咬人。因此，打老虎要一拳一拳地打，要讲究拳法，不能大意。

《同巴西记者马罗金和杜特列夫人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05页

这里我想回答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既是真的，又是纸的，这是一个由真变纸的过程的问题。变即转化，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走向反面。一切事物都是如此，不独社会现象而已。我在几年前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向阶级敌人作斗争是如此，向自然界作斗争也是如此。

《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55—456页

3. 既要反对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也要反对轻敌思想

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99页

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当湘赣边界割据的初期，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当时湖南省委的不正确的估量，把阶级敌人看得一钱不值；到现在还传为笑谈的所谓“十分动摇”、“恐慌万状”两句话，就

是那时（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统治者鲁涤平的形容词。在这种估量之下，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蒋桂战争尚未爆发之前）约四个月期间内，敌人的第三次“会剿”临到了井冈山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提出来了。其实，那时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蒋桂冯混战的形势业已形成，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00页

为着了解敌人的情况，须从敌人方面的政治、军事、财政和社会舆论等方面搜集材料。分析这些材料的时候，要足够地估计敌人的整个力量，不可夸大敌人过去失败的程度，但也决不可不估计到敌人内部的矛盾，财政的困难，过去失败的影响等等。对自己方面，不可夸大过去胜利的程度，但也决不可不足够地估计到过去胜利的影响。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01页

亡国论者看敌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胜论者看敌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这些都是错误的。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14—515页

必须告诉干部，对于国民党势力切不可估计太低，也不可以为国民党将向东满和北满进攻，因而产生不耐烦作艰苦工作的情绪。这样说明时，当然不要使干部觉得国民党势力大得了

不得，国民党的进攻是不能粉碎的。应当指出，国民党在东北没有深厚的有组织的基础，它的进攻是可以粉碎的，这就给我党以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但是，国民党军队现在正向热辽边境进攻，如果没有受到打击，他们不久即将向东满和北满进攻。因此，我党必须人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在西满和热河，坚决地有计划地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在东满和北满，则是迅速准备粉碎国民党进攻的条件。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81页

迭获胜利后，干部骄傲轻敌之心理必然会发生，你们应严格防止之，首先是领导者自己应防止此种心理之发生。

《晋察冀野战军准备配合东北作战》(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318页

我们自己的命运完全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我们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和全世界民主力量一道，只要大家努力，一定能够打败帝国主义的奴役计划，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使之不能发生，推翻一切反动派的统治，争取人类永久和平的胜利。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60页

反对对敌人的力量估计过高。例如，惧怕美帝国主义，惧怕到国民党区域作战，惧怕消灭买办封建制度、平分地主土地

和没收官僚资本，惧怕长期战争等。这些都是不正确的。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67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后，代替法西斯德意日的地位而疯狂地准备着新的世界战争、威胁全世界的美国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们，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极端腐败及其濒于灭亡的恐怖情绪。这个敌人还是有力量的，因此，每一个国家内部的一切革命力量必须团结起来，一切国家的革命力量必须团结起来，必须组成以苏联为首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并遵循正确的政策，否则就不能胜利。这个敌人的基础是虚弱的，它的内部分崩离析，它脱离人民，它有无法解脱的经济危机，因此，它是能够被战胜的。对于敌人力量的过高估计和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计不足，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58页

轻敌的观念无论何时是不应该有的，我们决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

《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30页

（二）破除迷信，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99页

在一般的速决原则之下，反对不正当的急躁性是必要的。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最高军事政治领导机关，估计到根据地的这些条件，估计到敌方情况，不为敌之其势汹汹所吓倒，不为尚能忍耐的困难所沮丧，不为某些挫折而灰心，给予必要的耐心和持久，是完全必要的。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35页

危险是存在的。但总的前途是光明的。

在危险环境中表示绝望的人，在黑暗中看不见光明的人，只是懦夫与机会主义者。

《反投降提纲》（一九三九年六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15页

总的前途是光明的，但必然经过长期的斗争与曲折的斗争。短期的与直线的胜利是没有的。

《反投降提纲》（一九三九年六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16页

反动派为了消灭革命力量，就采取杀人的办法，以为屠杀会使革命者退却，可以停止或缩小中国的革命运动。他们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但一切却和他们的主观愿望相反，事实是他们杀人越厉害，革命队伍发展就越大。

《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演说》（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33页

革命一定要胜利，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来延安的美国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说给你开一张支票，你回到美国去，将来再见面时还是这些人，因为中国是人民的。这是一种前途。中国是反动派的，这是又一种前途。现在美国政府赫尔利所实行的政策是反动的，是赞助中国反动派的。现在我们党有清醒的头脑，有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一定能胜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一定要把黑暗的中国从地球上除掉，建设一个光明的中国。

《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演说》（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37页

美国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它的这个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但是，美国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这里包括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和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32—1133页

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

《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54页

不管中外反动派如何猖獗（这种猖獗是历史必然性，毫不

足奇),我们是能够战胜他们的。各地领导同志,应当向党内一部分同志,即对于国内国际有利形势认识不足、因而对于斗争前途怀抱悲观情绪的人们,作充分的解释。必须明白,敌人还有力量,我们自己也还有弱点,斗争的性质依然是长期的,残酷的。但是我们一定能够胜利。

《三个月总结》(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09页

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强大仅仅是暂时的,他们的进攻是可以粉碎的。所谓反动派进攻不能粉碎的神话,在我们队伍中不应有它的位置。

《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15页

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汪精卫一模一样,充当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将中国出卖给美国,发动战争,反对中国人民,阻止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前进。在这种时候,如果我们表示软弱,表示退让,不敢坚决地起来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中国就将变成黑暗世界,我们民族的前途就将被断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地进行了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反对蒋介石的进攻。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45页

我们认为世界是人民的,不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的。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的横行与猖獗,不过是暂时的现象,他们的一切阴谋诡计,连同他们本身在内,均将被人民所揭露,所抛弃。

同李济深等联署的《中国各民主党派反对北大西洋公约联合声明》
(一九四九年四月三日),《人民日报》1949年4月4日

我们讲的是对付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不是讲对付任何别的人。对于这些人,并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刺激也是那样,不刺激也是那样,因为他们是反动派。划清反动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引起革命派内部的警觉和注意,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才能孤立反动派,战而胜之,或取而代之。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3页

所有这一切侵略战争,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这就是精神条件,没有这个精神条件,革命是不能胜利的。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84页

“准备斗争”的口号,是对于在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的问题上,特别是在中国和美国的的关系的问题上,还抱有某些

幻想的人们说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被动的，还没有下决心，还没有和美国帝国主义（以及英国帝国主义）作长期斗争的决心，因为他们对美国还有幻想。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和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或者相当大的距离。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4卷第1488页

帝国主义拿来吓唬我们的原子弹和氢弹，也没有什么可怕。世界上的事情，总是一物降一物，有一个东西进攻，也有一个东西降它。看《封神榜》就知道，哪有一个“法宝”是不能破的呀？那样多的“法宝”都破了。我们相信，只要依靠人民，世界上就没有攻不破的“法宝”。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04页

我们称美帝国主义为纸老虎，它还叫嚣，不相信。可以这样说，战争如果打起来，在战争初期和表现形式上，它可能是铁老虎，可是到后来便会成为纸老虎。因为美帝国主义不得人心，人民反对它，它只能是在铁老虎的形式中包含纸老虎的实质。希特勒也是如此的，但纸老虎的成分美帝国主义还多一点。美国的军队到处不受人欢迎。美国有三百万军队，驻在世界各地却有一百五十万。这样把自己的力量钉死了，无法打仗。看样子美国现在是想霸占些地方，不一定就会打起仗来。只要有五十年的和平，我们便可进行十个五年计划。同时在五十年间，在美国控制下的各国人民无法容忍，便要起来摆脱美国的控制。但是美帝国主义真的要打，我们也不怕。我们不要打，它打来，那末便要扫它几下。在亚、非、欧，扫它是有把握的。如果打

起来，三个洲都会变成一个腔调。因为我们有力量，对帝国主义我们并不怕。

《美国可怕，又不可怕》（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206 页

蒋介石统治中国，得到全世界各国政府的承认，统治了二十二年，力量最大。我们力量小，原先有五万多党员，经过反革命的镇压，只剩下一万多党员。敌人到处捣乱。但还是照这个规律：强大的失败，因为它脱离人民；弱小的胜利，因为它同人民联系在一起，为人民工作。结果，也就是这样。

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很强大，国民党的军队被赶到了偏僻的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也只能在敌后农村开展游击战争。日本占领了中国的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但是，日本军国主义，还有德国希特勒，也是照这个规律，没几年就倒了台。

……

经过抗战时期，打日本，我们的军队发展到了九十万。然后是解放战争。我们的枪炮不如国民党。国民党军队四百万，打了三年，累计起来，被我们消灭了八百万。在美帝国主义帮助下的国民党打不赢我们。强大的打不赢，弱小的总是胜利。

现在美帝国主义很强，不是真的强。它政治上很弱，因为它脱离广大人民，大家都不喜欢它，美国人民也不喜欢它。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纸老虎。外表是个老虎，但是，是纸的，经不起风吹雨打。我看美国就是个纸老虎。

整个历史证明这一点，人类阶级社会的几千年的历史证明这一点：强的要让位给弱的。美洲也是这样。

只有帝国主义被消灭了，才会有太平。总有一天，纸老虎

会被消灭的。但是它不会自己消灭掉，需要风吹雨打。

《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
第7卷第72—73页

帝国主义者长期以来散布他们是文明的、高尚的、卫生的。这一点在世界上还有影响，比如存在一种奴隶思想。我们也当过帝国主义的奴隶，当长久了，精神就受影响。现在我国有些人中还有这种精神影响，所以我们在全国人民中广泛宣传破除迷信。过去中国人中有恐美病，要去掉它的影响。

《同黑非洲青年代表团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82页

帝国主义历来就是吓唬人的，有时也动手打人，我们就是不要被它们吓倒，不要怕它们。对西方的崇拜是一种迷信，这是由历史形成的，现在这种迷信正在逐渐破除。说西方是先进的，这也是一种迷信；恰恰相反，它们是落后的。自然，它们有一点东西，无非是几斤钢铁和几个原子弹；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它们在政治上是落后的，是腐败的，是低级趣味的，所以我们看不起它们。

《同巴西记者马罗金和杜特列夫人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04页

由于历史和社会习惯的影响，人民中间迷信的人还很多，要做艰苦的说服工作来破除迷信。在我们这里，过去亲美、崇美、恐美的人很多，特别是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也有许多劳动群众，他们不喜欢美国人，但是怕美国人。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帮助他们逐渐消除这种恐惧心理。

崇拜美国的人说美国科学和工业都很发达，了不起，什么

都好，甚至有人说美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好。后来经过慢慢说服，他们知道美国的月亮不一定好，也许中国的月亮还好一点。

《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一九五九年三月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0—21页

中国得到的教训是这样：有压迫，就有反抗；有剥削，就有反抗。帝国主义，不管是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或其他帝国主义，都是可以打倒的。国内反动派，如蒋介石，不管多么强大，也都是可以打倒的。这就是中国的历史情况。

《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一九六四年七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84页

我们还没有核武器，但谁吓唬我们是不行的，我们从来就不接受强大力量的威胁。不接受这样的威胁，在我们力量再小的时候也是如此。

《我们很欣赏法国这种独立政策》（一九六四年九月十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42页

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

《关于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248页

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

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585—586 页

实际上现在世界上帝国主义的日子不大好过。它们怕第三世界，既怕你们这些人，也怕我们这些人。要破除迷信，不要迷信那个什么帝国主义。当然，我不是说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都要反对，也不是说帝国主义国家的技术不可以学习，而是说对帝国主义的政治的迷信，对它们那套欺骗，要破除。要破除对帝国主义的这种迷信不容易，它在一些人中根深蒂固。你看，帝国主义多了不起，它们有那么多原子弹、氢弹，飞机到处飞，海军到处跑，到处占领别人的国家，比如美国出兵柬埔寨。但它们那个办法是老牌帝国主义英国的做法。英国不是到处占领吗？现在它比较乖乖的了。

《帝国主义怕第三世界》（一九七〇年七月十一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587—588 页

（三）用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

1. 用革命的两面政策反对反革命的两面政策

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他们能够拉了我们队伍中的坏分子跑出去，我们当

然也能够拉了他们队伍中的“坏分子”（对于我们是好分子）跑过来。假如我们能够从他们队伍中多拉一些人出来，那敌人的队伍就减少了，我们的队伍就扩大了。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7—158页

日本帝国主义以迫蒋投降为目的的军事进攻，现已告一段落，继之而来的必然是诱降活动。这是敌人一打一拉、又打又拉的老政策的重演。我们必须揭穿它，反对它。

《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4页

我们的方针，既要确定同蒋介石谈判，同时准备蒋一定要打。蒋采取两面策略，我们就学他，也实行两手。我们没有因谈判而影响军事行动，集中了军队，打了三个大仗，东北也派去了干部。

《抗战胜利三个月来的局势和今后若干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76页

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针对这种情况，人民的民主势力对于反动势力，亦应采取同样的原则。

《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九四六年四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85页

自古以来，反动派对民主势力就是两条原则：能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留待将来消灭之。英国现在先消灭政府内部的共产党，对社会上的共产党就慢慢来。我们对反动

派也应采取同样的两条原则，我们今天实行的是第一条。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一九四八年九月），《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32—133页

2. 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对敌斗争，挤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不挤，我们生了两只脚就无立足之地。据聂荣臻同志回来说，晋察冀挤了一些地方回来，晋东南挤了一百四十万人口的地方回来。六年的抗战，在敌后我们被敌人挤得好似由茶壶底到茶壶腰，再挤到茶壶顶，现在我们一定要从茶壶顶往下挤一些才行。蒋介石如果要挤我们，要挤边区，我们就准备非同他挤不可。

《切实执行十大政策》（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72页

我们的阵地只能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力量只能一点一点地聚集，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二十四年的经验证明：想一手抓一个天下是抓不到的，土地是一寸一寸地争来的，叫做“寸土必争”。我们的敌手，日本人和蒋介石，对我们也是寸土必争。我们的枪是一支一支地增加，地方是一小点一小点地扩大，然后合起来就壮大了，就可以夺取天下。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19页

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这是经过调查研究以后才

找到的办法。这个调查研究很重要。看到人家手里拿着东西了，我们就要调查一下。他手里拿的是什​​么？是刀。刀有什么用处？可以杀人。他要拿刀杀谁？要杀人民。调查了这几件事，再调查一下：中国人民也有手，也可以拿刀，没有刀可以打一把。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发现了这个真理。军阀、地主、土豪劣绅、帝国主义，手里都拿着刀，要杀人。人民懂得了，就照样办理。……不久以前，国民党调了六个师来打我们关中分区，有三个师打进来了，占领了宽一百里、长二十里的地方。我们也照他的办法，把在这宽一百里、长二十里地面上的国民党军队，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之。我们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绝不让国民党轻而易举地占我们的地方，杀我们的人。当然，寸土必争，并不是说要像过去“左”倾路线那样“不放弃根据地的一寸土地”。这一回我们就放弃了宽一百里、长二十里的地方。七月底放弃，八月初收回。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26—1127页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于人民，这是一个问题；但是，胜利果实究竟落到谁手，能不能归于人民，这是另一个问题。不要以为胜利的果实都靠得住落在人民的手里。一批大桃子，例如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那是要被蒋介石抢去的。蒋介石勾结着美国帝国主义，在那些地方他们的力量占优势，革命的人民还基本上只能占领乡村。另一批桃子是双方要争夺的。太原以北的同蒲，平绥中段，北宁，郑州以北的平汉，正太，白晋，德石，津浦，胶济，郑州以东的陇海，这些地方的中小城市是必争的，这一批中小桃子都是解放区人民流血流汗灌溉起来的。究竟这些地方能不能落到人民的手里，现在还不能说。现

在只能讲两个字：力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29页

国民党一方面同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又在积极进攻解放区。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不算，直接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有八十万。现在一切有解放区的地方，都在打仗，或者在准备打仗。……为什么国民党要动员那么多的军队向我们进攻呢？因为它的主意老早定了，就是要消灭人民的力量，消灭我们。最好是很快消灭；纵然不能很快消灭，也要使我们的形势更不利，它的形势更有利一些。和平这一条写在协定上面，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实现。……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军队共计三万八千人，我们出动三万一千人。他们的三万八千被消灭了三万五千，逃掉两千，散掉一千。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关于重庆谈判》（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56—1157页

“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从前不去是对的，这次去也是对的，都是针锋相对。这一次我们去得好，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他们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我们，我们去了，可是他们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要由我们提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

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成立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

《关于重庆谈判》（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4卷第1159页

宋朝的哲学家朱熹，写了许多书，说了许多话，大家都忘记了，但有一句话还没有忘记：“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即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道，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身。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4卷第1478页

我们的方针应当是，把社会主义国家巩固起来，寸土不让。谁要我们让，就一定要跟他斗争。出了这个范围，让他们去闹。那末，我们要不要讲话呢？我们是要讲话的。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斗争，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们就是要支持。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88页

3.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我们有两条原则：第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即是说人家不捣乱我，我就不打人；第二条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一原则要抓得紧，一定要有力。

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一九三九年二月五日）

我们要站在自卫的立场反击国民党的进攻，一个是自卫，一个是反击。一切国民党的大小进攻，必须给以反击，给以回答。不论是文的也好，武的也好，特别是武的，只要它进攻，就要把它消灭干净。我们曾经提出，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我和国民党的联络参谋也这样讲过，我说我们的方针：第一条，就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就是说，我们不打第一枪。第二条，就是《左传》上讲的“退避三舍”。你来，我们就向后转开步走，走一舍是三十里，三舍是九十里，不过这也不一定，要看地方大小。我们讲退避三舍，就是你来了，我们让一下的意思。第三条，是《礼记》上讲的“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就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还在一九三九年我们就提出了这个口号，现在还是这个方针。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25—326页

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以后，中国与外国的反动派又想要把我们打倒，把中国人民打倒，下决心要把中国一切人民的民主力量、革命力量统统消灭。那时或者就是这样的情况，那全国

就是黑暗的，延安也是黑暗的，中国像沉到大海里去了，每天都是夜晚不见太阳，黑暗得很，要再过上几十年恐怖日子。这是一种可能性。或者是另外一种可能性，另外一个样子，那就是把黑暗势力压下去，把拿刀子杀人的人压下去。中外新闻记者们去年来延安的时候，问了我一些问题，就包括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但如果谁拿刀子杀人，要来杀我们，我们就有办法对付。

《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演说》（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36—437页

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这个内战是他强迫我们打的。如果我们打不赢，不怪天也不怪地，只怪自己没有打赢。但是谁要想轻轻松松地把人民已经得到的权利抢去或者骗去，那是办不到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27—1128页

共产党主张成立联合政府，就为制止内战。现在蒋介石拒绝了这一个主张，致使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然而，制止蒋介石这一手，是完全有办法的。坚决迅速努力壮大人民的民主力量，由人民解放敌占大城市和解除敌伪武装，如有独夫民贼敢于进犯人民，则取自卫立场，给以坚决的反击，使内战挑拨者无所逞其伎。这就是办法，也只有这个惟一的办法。

《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50页

十年内战，不是因为全国一切愿望和平害怕战争人士的呼吁（例如过去的“废止内战大同盟”之类的呼吁）而停止，而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要求和张学良杨虎城所领导的东北军西北军的武装要求而停止的。三次反共高潮以及其他无数次挑战，不是因为共产党的无限制的让步和服从而打退的，而是因为共产党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严正自卫态度而打退的。如果共产党毫无力量，毫无骨气，不为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到底，十年内战何能结束？抗日战争何能开始？即令开始，又何能坚持到今天的胜利？

《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50—1151页

对国民党进攻，必须站在自卫立场坚决反击之，但须打得好，不要浪打，打则必胜。

《站在自卫立场坚决反击国民党进攻》（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48页

我们解放区的地方，他们要拼命来争。这个问题好像不可解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地争呢？在我们手里，在人民手里，不是很好吗？这是我们的想法，人民的想法。要是他们也是这样想，那就统一了，都是“同志”了。可是，他们不会这样想，他们要坚决反对我们。不反对我们，他们想不开。他们来进攻，是很自然的。我们解放区的地方让他们抢了去，我们也想不开。我们反击，也是很自然的，两个想不开，合在一块，就要打仗。

《关于重庆谈判》（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57页

蒋介石对我们的方针是一不给自由，二要消灭你，不允许

我们在保存一块地方的条件下订城下之盟。因此我们的方针只能是打的方针，这是确定了的。

《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97页

4. 谈判的原则和策略

- 边谈边打，谈打结合，只有打好，才能谈好

江南江北我军主力各就现地集结整训，恢复疲劳，养精蓄锐，准备于顽军进攻时，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打，打则必胜，每次消灭其一部，各个击破之）。打得几个大胜仗，威震大江南北，对于促成国共谈判非常有利，顽军亦不敢轻视你们。

《目前党的方针及新四军的工作部署》(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3页

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

《准备对付蒋介石大打的作战部署》(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21页

我前方部队，必须鼓励士气，继续英勇作战，千万不可有丝毫的松懈，不要作此次可以和下来的打算，而应作此次和不下来、还须继续打、还须给敌人以大量的消耗和歼灭，然后才能和下来的打算。只有我们作了此种打算，才于争取最后胜利

有益处，否则是没有益处的。

《要作给敌人以大量消耗和歼灭后才能和下来的打算》（一九五一年七月九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295页

我们和敌人进行的谈判能成功固好（成功的可能性较大），即使不成功，我们也确有把握使战争继续打下去，直到争取胜利为止，同时毫不妨碍国内的国防建设和其他建设，各项工作均可蓬蓬勃勃地发展下去了。

《谈判即使不成功也确有把握打下去》（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09页

● 谈判要以有利于人民为原则，让步不能伤害人民的根本利益

共产党向国民党要求的，是请他们结束十年来的老政策，转变到新的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的政策。这些要求，表现在共产党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中，那就是关于召集救国代表大会，人民民主自由，改善人民生活，迅速准备抗战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愿意改变苏维埃与红军的名义，取消同国民党的对立，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没有疑义的，共产党的这种步骤，是对国民党一个大的让步。但这种让步是必要的，因为这种让步是建立在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原则上面，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与紧急性。这叫做双方让步，互相团结，一致抗日。

《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90页

我们共产党人声明：不管国民党当局现在还是怎样坚持其错误政策和怎样借谈判为拖延时间、搪塞舆论的手段，只要他

们一旦愿意放弃其错误的现行政策，同意民主改革，我们是愿意和他们恢复谈判的。但是谈判的基础必须放在抗日、团结和民主的总方针上，一切离开这个总方针的所谓办法、方案，或其他空话，不管它怎样说得好听，我们是不能赞成的。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69页

今天的方针是七大定下来的，七大的方针就是反对内战的方针。当前内战的威胁是存在着的，但国民党有很大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大的内战，和平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进攻还是退却？主要的当然还是进攻，是在和平中的进攻，但部分的会有退却。解放区一万万人口、一百万军队，蒋介石是不会完全承认的。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在数量上作些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以局部的让步换取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养精蓄锐来迎接新形势。对这种让步我们要有准备。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8—9页

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并不许发纸币，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

《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53—1154页

谈判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只有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

的条件下才能达到妥协。我们准备让步的第一批地区是广东至河南的根据地，第二批是江南的根据地，第三批是江北的根据地，这要看谈判的情况，在有利条件下是可以考虑让步的。

《赴重庆谈判前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5页

在实现全国和平、民主、团结的条件下，中共准备作重要的让步，包括缩减解放区的军队在内。

《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5页

有些同志问，为什么要让出八个解放区？让出这八块地方非常可惜，但是以让出为好。为什么可惜？因为这是人民用血汗创造出来的、艰苦地建设起来的解放区。所以在让出的地方，必须和当地的人民解释清楚，要作妥善的处置。为什么要让出呢？因为国民党不安心。人家要回南京，南方的一些解放区，在他的床旁边，或者在他的过道上，我们在那里，人家就是不能安心睡觉，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争。在这一点上我们采取让步，就有利于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国内外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

《关于重庆谈判》（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59—1160页

这一次谈判，它们造谣说：共产党就是要地盘，不肯让步。我们的方针是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容许作一些让步，用这些让步去换得全国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我们过去和蒋介石办交涉，也作过让步，并且比现在的还大。……国民党宣传说，共产党就是争枪杆子。我们

说，准备让步。……是不是要把我们的枪交给他们呢？那也不是。交给他们，他们岂不又多了！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关于重庆谈判》（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60—1161页

我方权利所在，必须力争，彼方无理要求，必须拒绝，但总的精神是求得在不吃亏的基础上解决纠纷，而不是使纠纷扩大。

《力争东北停战及制止全国内战的对策》（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17页

第二次大战后，各国革命力量所处的地位是比第一次大战后要好得多，而不是要差些。对美蒋的压力与要求，我们应当有所让步，但主要的政策不是让步而是斗争。如果我党既有相当的让步，而对其无理压迫与无理要求又能出以坚决的斗争，则其结果比较付出更多更大的让步反而要好些；如无坚决斗争精神，则结果将极坏。

《对付美蒋的主要政策不是让步而是斗争》（一九四六年七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46页

我们允许南京反动政府派出代表和我们进行谈判，不是承认这个政府还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而是因为在这个政府手里还有一部分反动的残余军事力量。如果这个政府感于自己已经完全丧失人民的信任，感于它手里的残余反动军事力量已经无法抵抗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而愿意接受中共的八个和平条件的話，那末，用谈判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使人民少受痛苦，当然是比较好的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的。最近北平问题的和平解

决，就是一个实例。

《中共发言人就和平谈判问题发表谈话》（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43—244页

陷于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已经脱离了一切群众。我们正在准备和南京反动政府进行谈判。南京反动政府方面在这个谈判中的推动力量是桂系军阀，国民党主和派和上海资产阶级。他们的目的是使联合政府中有他们一份，尽可能地保存较多的军队，保存上海和南方资产阶级的利益，力求使革命带上温和的色彩。这一派人承认以我们的八条为谈判基础，但是希望讨价还价，使他们的损失不要太大。企图破坏这一谈判的是蒋介石及其死党。蒋介石还有六十个师位于江南一带，他们仍在准备作战。我们的方针是不拒绝谈判，要求对方完全承认八条，不许讨价还价。其交换条件是不打桂系和其他国民党主和派；一年左右也不去改编他们的军队；南京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员允许其加入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对上海和南方资产阶级的某些利益允许给以保护。这个谈判是全面性的，如能成功，对于我们向南方进军和占领南方各大城市将要减少许多阻碍，是有很大利益的。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5—1436页

贵方既然同意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

《复李宗仁电》（一九四九年四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76页

在谈判中该让的就必须让，该坚持的就必须坚持。根据总方针，这些具体活动做得恰当，是可以和下来的，就可以达到联合多数、孤立少数（就是美国人）的目的。

《同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团结合作》（一九五四年七月七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32—333页

● 把握通过谈判与敌达成妥协的可能性

在重庆，有些人认为，蒋介石是靠不住的，是骗人的，要同他谈判出什么结果是不可能的。我遇到许多人都给我这样说过，其中也有国民党员。我向他们说，你们说的是有理由的，有根据的，积十八年之经验，深知是这么一回事。国共两党一定谈判不好，一定要打仗，一定要破裂，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还有另外一个方面，还有许多因素，使得蒋介石还不能不有很多顾忌。这里主要有三个因素：解放区的强大，大后方人民的反对内战和国际形势。我们解放区有一万万人民、一百万军队、两百万民兵，这个力量，任何人也不敢小视。

《关于重庆谈判》（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57—1158页

蒋介石的主观愿望是要坚持独裁和消灭共产党，但是要实现他的愿望，客观上有很多困难。这样，使他不能不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我们也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来邀请，我们讲现实主义去谈判。

《关于重庆谈判》(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4卷第1158页

《会谈纪要》上所发表的和平方针和若干民主协议,一方面是写在纸上的,还不是现实的东西;另一方面也是由各方面力量决定的。解放区人民的力量,大后方人民的力量,国际形势,大势所趋,使得国民党不得不承认这些东西。

《关于重庆谈判》(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4卷第1159页

(一)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因此,美、英、法同苏联的关系,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是或者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的问题。所谓妥协,是指经过和平协商达成协议。所谓较早较迟,是指在几年或者十几年之内,或者更长时间。

(二)上述这种妥协,不是说在一切国际问题上。这在美、英、法继续由反动派统治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这种妥协,是说在若干问题上,包括在某些重大问题上。但是,这一类的妥协在目前短时期内还不会很多。美、英、法同苏联的通商贸易关系则有扩大的可能。

《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九四六年四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84—1185页

美、英反动派确在准备战争,战争危险确实存在着。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民主力量,已超过反动力量(莫洛托夫、日丹诺夫都这样说了,我们党内有些同志,特别是中间派还看不清楚),而且还在继续发展,所以战争危险必须而且必能克服,其

条件就是要努力。时间如能争取十年到十五年，就必能制止战争。我们不应提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我们应该提或者较迟妥协或者较早妥协的问题，最近在柏林问题上就是这样。

我们讲的妥协，不是讲在一切问题上都能妥协，如要做出决议取消殖民地那就不可能，而是讲在若干问题上可能妥协。这种妥协，是讲国际问题，而不是国内问题；不是一切问题，而是若干问题，包括重要问题在内。一九四七年苏、美、英等国就同意、罗、匈、保、芬五国订了和约。对德、奥和对日的和约，虽然很难订，但也终究会订下来的。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一九四八年九月），《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31—132页

还有像希特勒、蒋介石、沙皇，也都是无可救药，只能打倒，因为他们对于我们说来，是绝对地互相排斥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没有两重性，只有一重性。对于帝国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在最后说来也是如此，它们最后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意识形态也是一样，要用唯物论代替唯心论，用无神论代替有神论。这是在战略目的上说的。在策略阶段上就不同了，就有妥协了。在朝鲜三八线上我们不是同美国人妥协了吗？在越南不是同法国人妥协了吗？在各个策略阶段上，要善于斗争，又善于妥协。

《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31页

- 对谈判和达成的协议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待到国民党对于你们无可奈何的时候，可能在两党谈判中

被迫承认你们的力量，而允许作有利于双方的处置。但是你们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必须依靠自己手里的力量，行动指导上的正确，党内兄弟一样的团结和对人民有良好的关系。坚决依靠人民，就是你们的出路。

《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54页

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这是达成了协议的。还有没有达成协议的。解放区的问题没有解决，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

《关于重庆谈判》（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56页

美、英、法同苏联之间的这种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量作了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

《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九四六年四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85页

所谓妥协当然不是在一切问题上的妥协，这是不可能的。美、苏迟早要妥协。将来，美国还要和苏联大做生意，这就需要进行妥协。这种妥协是民主的妥协，而不是机会主义的妥协。苏联是个大国，它的妥协可能会对中国、法国、意大利等国人民的斗争产生一定

的影响,但绝不是大国之间妥协了,其他各国人民也都要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的方针应当是按照不同的情况进行不同的斗争。

《在杨家沟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333页

我们既然允许谈判,就要准备在谈判成功以后许多麻烦事情的到来,就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只要我们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不论是全面的和平谈判,或者局部的和平谈判,我们都应当这样去准备。我们不应当怕麻烦、图清静而不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也不应当糊里糊涂地去接受这些谈判。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6页

● 及时揭露敌人的和谈阴谋,教育人民不要上当

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现在正在所谓“召开国民大会”和“政治解决”的烟幕之下,偷偷摸摸地进行其内战的准备工作。如果国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的阴谋,阻止它的准备,那末,会有一个早上,要听到内战的炮声的。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51页

对各地美军,仍应避免冲突;对国民党军队,则看彼方态度,彼打我亦打,彼停我亦停。对谈判,我党已有所让步,但国民党贪得无厌,提出很多无理要求,应予拒绝。美国反动派

与中国反动派面前均有许多困难，我们对于他们的困难条件应当有足够估计，以便利用他们的困难进行坚决的但是适当的斗争，争取时局好转。若干中间人士必以为我们宣言所取态度太强硬，应向他们解释：美国和中国反动派均利用人民对他们的丑恶行为认识模糊，欺压人民，从中取利；我们应当尖锐揭穿，方能使彼辈在人民面前孤立起来，方能打退其进攻。

《“七七”宣言发表后应采取的策略方针》（一九四六年七月六日），
《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44—145页

谈判主要是为了教育人民，这个目的是达到了。代表团不能早回来，一定要在开“国大”以后，这样战争与分裂的责任才清楚，才不致失去人心。打起仗来，人心如不属我，我就输了。教育人民历来是我们党的任务，要一直坚持下去。现在究竟谁要打谁要和，人民已经知道了；美国政府的欺骗，人民也更清楚了。我们党本身也需要教育，也有一个教育过程。

《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99页

目前美蒋所提和谈，如过去一切和谈一样，全属欺骗性质，因其军事失败，企图取得休息时间，整军再战，我们切不可上当。

《给陈瑾昆的信》（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17页

为着取得休息时间补充军队，重新进攻，为着向美国取得新的借款和军火，为着缓和人民的愤怒，蒋介石又在施行新的骗术，要求和我党恢复所谓和谈。我党方针是不拒绝谈判，借以揭露其欺骗。

《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4卷第1215页

在几次庄严的停战协定被蒋介石撕毁得干干净净之后，在用刺刀向着要和平反内战的学生群众之后，除了存心欺骗的人们或者政治上毫无经验的人们之外，什么人也不会相信蒋介石的所谓和谈了。

《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之中》（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27页

敌人和平运动公开出现以后，估计将产生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可能暂时迷惑一部分人民；另一方面，则将对国民党军队及其后方发生动摇和瓦解的作用。由于这后一种原因，国民党虽然正在准备发动和平阴谋，但仍有极大顾虑。针对这两方面的可能性，我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揭露工作，应依敌方和平运动发动后的情况，一方面，坚决揭露敌人和运的欺骗性，使群众不被欺骗；另一方面，号召群众起来反对假和平，要求真和平。

《变敌人的假和平运动为人民的真和平运动》（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09页

我们不要完全拒绝谈判，这是要考虑到人民觉悟的问题。那时可能有两种情形，或者拒绝和谈，或者进行和谈。但现在就要对国民党可能搞的和谈骗局进行揭露。如果群众觉悟，要打下去，认识到和谈就是让敌人休息后再打，是费力的，那我们就打。如果群众没有这种觉悟，要和，那就进行和谈，一面谈，一面打，并在谈判中教育群众，向群众解释和谈究竟是怎么回事，事实上还是要继续打下去，不上敌人的当。总之，那时看人民的觉悟，党内党外群众的觉悟，但始终不要把和谈的门

关死。无论在党内党外，都不要犯这个错误。还有美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给我们造成的困难，这个困难我们也是能够克服的。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一九四八年九月），《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45页

中国第一名战争罪犯国民党匪帮首领南京政府伪总统蒋介石，于今年一月一日，提出了愿意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中国共产党认为这个建议是虚伪的。这是因为蒋介石在他的建议中提出了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等项为全国人民所不能同意的条件，以为和平谈判的基础。这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旬日以来，全国人民业已显示了自己的意志。人民渴望早日获得和平，但是不赞成战争罪犯们的所谓和平，不赞成他们的反动条件。在此种民意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声明：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中国共产党认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如果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中的人们，愿意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而不是虚伪的反动的和平，那末，他

们就应当放弃其反动的条件,承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个条件,以为双方从事和平谈判的基础。否则,就证明他们的所谓和平,不过是一个骗局。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88—1389页

我们认为南京行政院的这个新建议是没有理由的,打了这么久这么大和这么残酷的战争,自应双方派人商讨和平的基本条件,并作出双方同意的停战协定,战争才能停得下来。不但人民有这种希望,就是国民党方面亦有不少人表示了这种希望。如果照南京行政院的毫无理由的“决议”,不先行停战就不愿意进行和平谈判,则国民党的和平诚意在什么地方呢?南京行政院的“决议”是做出来了,不先行停战就没有和平谈判的可能了,和平之门从此关死了,而如果要谈判,则只有取消这个毫无理由的“决议”,二者必居其一。如果南京行政院不愿意取消自己的“决议”,那就是表明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并无与其对方进行和平谈判的诚意。人们要问:南京方面果有诚意,为什么不愿意商讨和平的具体条件呢?南京的和平建议是虚伪的这样一个论断,难道不是已经证实了吗?

《中共发言人评南京行政院的决议》(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92页

但是,南京反动政府是否愿意接受中共所提出的反映全国人民公意的八个条件,现在谁也不知道。现在所知道的,就是在南京反动政府方面放出了许多虚伪的装腔作势的和平空气,企图欺骗人民,以达其保存反动势力,获得喘息机会,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之目的。全国人民应有清醒的头脑,决

不可被那些伪善的空谈所迷惑。

《中共发言人就和平谈判问题发表谈话》（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44页

（四）分化瓦解并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

1. 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

无论蔡廷锴们将来的事业是什么，无论当时福建人民政府还是怎样守着老一套不去发动民众斗争，但是他们把本来向着红军的火力掉转去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不能不说是有益于革命的行为。这是国民党营垒的破裂。九一八事变以后的环境能够使国民党营垒分裂出这样一部分人，为什么今天的环境反倒不能造成国民党的分裂呢？我们党内持这样一种论点的人是不对的，他们说，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营垒是统一的，固定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使它起变化。他们不但不认识今天的严重环境，并且连历史也忘记了。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46页

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破裂的。这种破裂，表现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表现于冯玉祥、蔡廷锴、马占山等风头一时的抗日人物。这种情况，基本地说来是不利于反革命，而有利于革命的。由于中国政治经济的不平衡，以及由此而生的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增大了这种破裂的可能性。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47页

在整个地分析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在大震动中的姿态时，还有一个方面应该指出，那就是：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这是半殖民地的环境，即许多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环境所造成的。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过去这种狗打架的事情多得很，我们不去说它。于今只说被蒋介石禁闭过的国民党政客胡汉民，不久以前也签名于我们所提出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的文件。胡汉民所依托的两广派军阀，也在所谓“收复失地”和“抗日剿匪并重”（蒋介石的是“先剿匪，后抗日”）的欺骗口号之下，同蒋介石对立。你们看，不是有点奇怪吗？并不奇怪，这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痛的矛盾。但是这点争斗，这个缺口，这种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却是有用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48页

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了完全征服中国的政策。因此，便把若干其他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推入次要的地位，而在这些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扩大了矛盾的裂口。因此，便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这就是说，中国不但应当和中国人民的始终一贯的良友苏联相联合，而且应当按照可能，和那些在现时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以抗日

为目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52—253页

所谓帝国主义两大阵线，两大统一战线，不是说双方同盟诸国间没有矛盾与斗争，矛盾与斗争是存在的，而且是严重的。例如英、美、法三国相互之间，三国与其他小国之间，是有矛盾与斗争的。又如德、意、日三国相互之间，三国与其他小国之间，也是有矛盾与斗争的。

也不是说各个阵线是固定的，不生变化的。相反，它们是不固定的，要生变化，而且已经生了变化。

……

就是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尚有可供革命利用之矛盾，因此，必须利用之。苏联必须利用之，印度必须利用之，中国必须利用之，一切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必须利用之。

《目前时局与党的政策》(一九四〇年七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86—288页

虽然共产党是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但是既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同日本结成同盟承认“满洲国”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我们的策略原则，仍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

《论政策》(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64页

我们要对许多国家，比如英国、法国、加拿大这一类国家，比如印度、缅甸这一类国家，凡是有可能的，都要进行工作。甚至像泰国这样的国家，它在我国附近，也是怕我们的，也要进行工作。同时对美国要使它分化，使它孤立，孤立以后它总要分化的。在目前世界上这样四分五裂的形势下，一块铁板那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它们反苏，反共，反对中国，反对人民民主国家，反对我们这个阵线，那是真的；但是，它们那个资本主义世界是很不统一的，四分五裂的。

《同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团结合作》（一九五四年七月七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34页

买办资产阶级始终是帝国主义的走狗，革命的对象。买办资产阶级又分属于美国、英国、法国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集团。对买办集团的斗争，要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首先对付其中的一个，打击当前最主要的敌人。例如，过去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有亲英、亲美的和亲日的。我们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就利用英、美和日本的矛盾，首先打倒日本侵略者和依附于它的买办集团。然后，再去反对美、英侵略势力，打倒亲美、亲英的买办集团。地主阶级里头也是有派别的。最反动的是少数，那些爱国的，赞成反对帝国主义的，就不要放在一起打。还必须分别大地主和小地主。在一个时候，打击的敌人不能太多，要打少数，甚至对大地主也只打击少数最反动的。什么都打，看起来很革命，实际上为害很大。

《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34—135页

总之，对于国际问题的观察，我们认为还是这样：帝国主义之间闹，互相争夺殖民地，这个矛盾大些。他们是假借跟我们的矛盾来掩盖他们之间的矛盾。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矛盾，这里很有文章可做。这是关系我们对外方针的一件大事。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89页

2. 孤立和打击当前最主要的敌人，不要四面出击

对于中国战场，如果打倒了大头子希特勒，那末二头子日本法西斯也一定被打倒。大后方有一部分人弄不清楚这一点，不赞成先打倒希特勒，这是不对的。现在全世界结成了整个的反法西斯战线，任何国家都不是孤立地作战，所以在决定战略的时候，不应只从一个国家的眼前利益来看，而要看先打败哪一个法西斯国家对于整个反法西斯阵线最为有利。这样来看，就可以知道，打倒了希特勒，解决日本便会是很顺利的了。

《英勇斗争的二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七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页

苏、英、美团结的巩固与对德、意法西斯决战的实现，将不但是德、意法西斯的失败，也是日本法西斯的失败。因为侵略国的首领是希特勒，希特勒的失败就是一切法西斯的失败。有些中国人不希望同盟国先打败希特勒，或者是因为头脑不清醒，或者是因为不愿意希特勒法西斯制度归于失败，也就是不愿意日本法西斯失败，否则是不能解释的。

《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一九四三年七月二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7页

无论如何，只应该把打击面放在真正的封建剥削阶级的范围以内，绝对不许可超出这个范围。在人民解放军所到的原先是国民党统治的地方，打击面还要缩小些。在那里，首先只打击大地主、豪绅、恶霸、地主武装、保甲制度、特务分子，依照战争胜利与根据地巩固的情况，依照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逐步地发展到消灭全部封建制度。

《把打击面放在真正的封建剥削阶级范围内》（一九四八年一月），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2页

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

《不要四面出击》（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

75—76页

3. 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

应该坚决地镇压那些坚决的汉奸分子和坚决的反共分子，非此不足以保卫抗日的革命势力。但是决不可多杀人，决不可牵涉到任何无辜的分子。对于反动派中的动摇分子和胁从分子，

应有宽大的处理。对任何犯人，应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对敌军、伪军、反共军的俘虏，除为群众所痛恶、非杀不可而又经过上级批准的人以外，应一律采取释放的政策。其中被迫参加、多少带有革命性的分子，应大批地争取为我军服务，其他则一律释放；如其再来，则再捉再放；不加侮辱，不搜财物，不要自首，一律以诚恳和气的态度对待之。不论他们如何反动，均取这种政策。这对于孤立反动营垒，是非常有效的。

《论政策》（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67页

本军对于蒋方人员，并不一概排斥，而是采取分别对待的方针。这就是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对于罪大恶极的内战祸首蒋介石和一切坚决助蒋为恶、残害人民、而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公认的战争罪犯，本军必将追寻他们至天涯海角，务使归案法办。本军警告一切蒋军官兵，蒋政府官员，蒋党党员，凡是尚未沾染无辜人民鲜血的人们，切勿跟那些罪犯们同流合污。凡是已经做过坏事的人们，赶快停止作恶，悔过自新，脱离蒋介石，准其将功赎罪。本军对于放下武器的蒋军官兵，一律不杀不辱，愿留者收容，愿去者遣送。对于起义加入本军的蒋军部队和公开或秘密为本军工作的人们，则给予奖励。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38—1239页

为着确保城乡治安、安定社会秩序的目的，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当地人民解放军或人民政府投诚报到。凡自动投诚报到，

并将所有武器交出者，概不追究。其有抗不报到，或隐藏武器者，即予逮捕查究。窝藏不报者，须受相当的处分。

《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58页

凡非首要的反动分子，只要悔罪，亦须给以生活出路。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12页

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不可偏废。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72页

（五）合法的公开的斗争要同 非法的秘密的斗争相结合

1. 学会武装斗争与和平斗争、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统一的政治科学

把运动放到广泛的群众基础上去，从关门主义解放出来，公开运动同秘密工作相结合。

《关于战略方针和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79页

党内许多干部对于策略问题上的片面观点和由此而来的过

左过右的摇摆，必须使他们从历史上和目前党的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作全面的统一的了解，方能克服。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仍然是过左的观点在作怪。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许多人不能认真地执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因为他们把国民党的反共政策看得不严重；同时，又有许多人不能执行发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政策，因为他们把国民党简单地看成漆黑一团，表示束手无策。在日本占领区域，也有类似的情形。

《论政策》（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65页

必须明白，在日本人与国民党有巩固统治的一切地方（这种地方占全国十分之九以上的区域），绝对不能采取流血的武装斗争形式，而只能采用不流血的和平斗争形式。

和平斗争也有两种，一种是合法的公开的斗争，另一种是非法的秘密的斗争，但都是不流血的、不暴动的、非武装的斗争形式，二者统一起来，就是在敌人统治区域的策略路线。

《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节选）》（一九四一年），《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40页

公开工作之外，还要有秘密工作与之相配合，这就是党的秘密组织工作，群众的秘密组织工作（作为群众公开组织的核心），党派的秘密联合行动，秘密的情报工作，公开组织与公开斗争的事先秘密准备等。没有这一方面的工作，是不能存在于敌人统治区域的，公开工作也失了灵魂。临时中央则不但不愿意进行公开合法工作，也不愿意认真进行秘密工作，凡事爱暴

露，爱显劲，爱称英雄，爱在明天早上胜利，结果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在敌人统治区域把党闹个精光，一点群众力量也闹个精光。

由此看来，临时中央的所谓“各种形式”，只是一句空话，其实他们只有一种形式，就是打、闹、叫，此外一点也没有。他们完全不知道中国的特点是武装斗争与和平斗争的统一，在和平斗争方面，又是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的统一。这是极复杂的政治科学的一整套，中国共产党人如不学会这一整套政治科学，是无法胜利的。

《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节选）》（一九四一年），《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41页

到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的方法，应从总结已有经验中取得，并应在以后的工作中，不断去总结经验，将群众中创造的各种好方法普遍化。但应指出：党在内战时期在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方法，一般是错误的，是不能采用的，应该批判这种错误，以免重复。而在抗战以来，各根据地在其附近敌占区与某些小城市进行了极有成效的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配合的工作，在某些大城市，也有许多好的工作。在这些工作中，其方法一般是正确的。如果将我们在敌占区与小城市的工作经验，加以适当改造，就可移用于大城市、中等城市和交通要道。各地应用心研究适合每一个地点、每一种群众、当时环境的合法与非法相配合的斗争形式。

《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62—163页

我们还要准备在合法工作中去进攻，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

要学会作合法斗争。这对于我们是一个新环境，和北伐、内战、抗日三个时期都不同，因为这是和平时期。我们很需要利用这样一个时期来教育全国人民，来锻炼我们自己。学会了做许多工作，才有能力去搞全国、搞大城市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9页

2. 秘密斗争应注意隐蔽精干，公开斗争应利用一切合法的形式

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则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同时，充分地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地方性和全国性的突然事变。在国民党区域，党的机关应极端秘密。东南局和各省委、各特委、各县委、各区委的工作人员（从书记至伙夫），应该一个一个地加以严格的和周密的审查，决不容许稍有嫌疑的人留在各级领导机关之内。应十分注意保护干部，凡有被国民党捕杀危险的公开或半公开了的干部，应转移地区荫蔽起来，或调至军队中工作。在日本占领地区（大城市、中小城市和乡村，如上海、南京、芜湖、无锡等地）的方针，和在国民党区域者基本相同。

《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一九四〇年五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56—757页

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政策，是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的工作，一方面采取荫蔽精干的政策；是在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上采取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

政策。

《论政策》(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63页

一切日本人及国民党有巩固统治的区域都必须采取合法的公开的斗争形式。中国虽然不是民主的法治的国家,人民没有政治自由,尤其在日本统治区域对人民压迫得更厉害;但是政府的法律、社会的习惯,依然有很多地方可以利用,有很多矛盾、间隙、漏洞是可以被我们利用的。必须采取合法的能够公开的各种各色的斗争形式,才有人来,才能一般地避免政府的逮捕与解散,才能保全力量与积蓄力量。临时中央却是拼命反对这种形式。有许多本来是非法的斗争,也要采用公开合法的形式才有胜利可能。例如罢工,是非法的,如果我们要争取胜利,避免失败,就必须利用当时当地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条件,可罢则罢之,不可罢则已之,罢而不胜则停之。做得入情入理,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才能存在与胜利。而临时中央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是下令“用一切力量组织反日罢工”。又如反日,是非法的,但亦可以利用社会的舆论与各种政治间隙去进行某些工作。临时中央却只是高叫一顿,乱撞一顿,结果是任何稍为广大的、稍为持久的反日运动也做不起来。

《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节选)》(一九四一年),《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40—341页

在敌占区,党和抗日团体的组织,只能秘密进行,因此应该注意精干、隐蔽,严防特务分子混入。但各种普通群众组织与群众活动,就应该公开利用一切可能的合法形式去进行。例如,利用已有各种伪组织(新民会、自卫团等),或成立各种灰

色社会团体，或建立纯粹的但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社会职业机关与职业活动（茶馆、饭店、荐头房等），甚至利用工厂、工房、学校、店铺，在为了共同欺骗与应付敌人汉奸，保护中国人的口号下，成立其中所有人员某种无定形的联盟，亦是一种很好的群众组织形式。我们常看到根据地附近乡村中全村人联盟，共同欺骗与应付敌人汉奸的严密组织和分工，这种办法，应该运用到城市某些工厂、工房、学校、店铺中去。应从保护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把群众联合起来，例如减轻负担，免除骚扰，隐藏物资以及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均可以成为群众联合活动的出发点。而敌人对华“新政策”的欺骗做作，则大可成为我们和群众利用的合法口号。其次，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区各阶层人民中的极高威信，亦可成为我们城市工作的有利资本，许多人以听到我军消息，与我军建立某种联系，取得我军某种证件为荣耀者，我们应该利用这种情形去促进人民的团结，但这在敌区是非法的，应该十分隐蔽地有限度地去利用。

《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63—164页

在城市工作方法上，应反对两种偏向：一是粗心大意，不负责任，大喊大叫，莽冲莽撞的冒险主义方法；一是根本不动，单纯隐蔽，不去联系群众与进行群众工作的尾巴主义方法。正确方法是在一切可能的与合法的范围内，去联系与团结尽可能广大的群众，去提高群众的觉悟性、组织性，而使精干的秘密组织与秘密活动隐藏在广大群众之中，隐藏在群众的合法活动之中。而在举行起义以前，一切组织形式与斗争形式，均应避免定形的与系统的形式，采用各种不定形的与分散的方式，以期多得胜利，减少损害。

《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64页

总之,我们应放手使用各种各样干部去进行各种各样工作,并使各种人的各种工作都分开进行,不混杂在一起,多头地与分路地去做。但同时又必须保持党的秘密组织之精干、纯洁与可靠,在一切大、中、小城市及铁路、公路上建立起党的多数可靠据点,作为伟大城市工作的领导骨干,形成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局面。

《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65—166页

到城市去做秘密工作,不要像《水浒传》里的好汉,行不改名,坐不更姓,而是要改名换姓。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庄没有秘密工作就打不开,如果内部没有动摇,内部不发生问题,就很难解决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33页

五、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

（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参见第二编“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第 550—577 页；第三编“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第 744—748 页）

（二）在统一战线内部要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在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

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分别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有同外国资本和本国土地关系较多的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145 页

国民党的三中全会，由于其内部有亲日派的存在，没有表示它的政策的明确和彻底的转变，没有具体地解决问题。然而由于人民的逼迫和国民党内部的变动，国民党不能不开始转变它过去十年的错误政策，这即是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

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种初步转变，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是表现出来了。今后的要求是国民党政策的彻底转变。这就需要我们和全国人民更大地发展抗日和民主的运动，进一步地批评、推动和督促国民党，团结国民党内的主张和平、民主、抗日的分子，推动动摇犹豫分子，排除亲日分子，才能达到目的。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55页

对于各部分的国民党人，应当采取不同的政策。对于那些丧尽天良的坏蛋，对于那些敢于向八路军新四军阵地后面打枪的人，对于那些敢于闹平江惨案、确山惨案的人，对于那些敢于破坏边区的人，对于那些敢于攻打进步军队、进步团体、进步人员的人，我们是决不能容忍的，是必定要还击的，是决不能让步的。因为这类坏蛋，已经丧尽天良，当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时候，他们还要闹磨擦，闹惨案，闹分裂。不管他们心里怎样想，他们是在实际上帮助了日本和汪精卫，或者有些人本来就是暗藏的汉奸。对于这些人，如果不加以惩罚，我们就是犯错误，就是纵容汉奸国贼，就是不忠实于民族抗战，就是不忠实于祖国，就是纵容坏蛋来破裂统一战线，就是违背了党的政策。但是这种给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以打击的政策，全是为了坚持抗日，全是为了保护抗日统一战线。因此，我们对于那些忠心抗日的人，对于一切非投降派、非反共顽固派的人们，对于这样的国民党员，是表示好意的，是团结他们的，是尊重他们的，是愿意和他们长期合作以便把国家弄好的。谁如果不这样做，谁也就是违背了

党的政策。

《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一九四〇年二月一日），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16—717页

（4）亲日派大资产阶级早已彻底投降日本，准备傀儡登场。欧美派大资产阶级则尚能继续抗日，但其妥协倾向依然严重存在。他们采取两面政策，一面还要团结国民党以外的各派势力对付日本，一面却极力摧残各派势力，尤其尽力摧残共产党和进步势力。他们是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顽固派。（5）中间力量，包括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因为他们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主要统治力量之间有矛盾，同时和工农阶级有矛盾，所以往往站在进步势力和顽固势力之间的中间立场。他们是抗日统一战线中的中间派。（6）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进步力量，最近时期有一个大的发展，基本上已经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根据地。他们在全国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中的影响是很大的，在中间势力中亦有相当影响。在抗日战场上，共产党所抗击的日寇兵力，同国民党比较起来，几乎占到了同等的地位。他们是抗日统一战线中的进步派。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44—745页

国民党是一个由复杂成分组成的党，其中有顽固派，也有中间派，也有进步派，整个国民党并不就等于顽固派。因为国民党中央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等反革命磨擦法令，并实行动员他们一切力量进行普遍全国的思想政治上军事上的反革命磨擦，有些人就以为整个国民党都是顽固派，这种看法

是错误的。现在的国民党中，顽固派还站在支配其党的政策的地位，但在数量上只占少数，它的大多数党员（很多是挂名党员）并不一定是顽固派。这一点必须认识清楚，才能利用他们的矛盾，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用极大力量去团结国民党中的中间派和进步派。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50页

一切共产党员须知：只有抗战到底，才能团结到底，也只有团结到底，才能抗战到底。因此，共产党员要作抗战的模范，也要作团结的模范。我们所反对的，只是敌人和坚决的投降分子、反共分子，对其他一切人，都要认真地团结他们。而所谓坚决的投降分子、反共分子，在任何地方都只占少数。我调查了一个地方政府的成分，在那里办事的有一千三百人，其中坚决反共的只有四十至五十人，即是说，不足百分之四，其余都是希望团结抗战的。我们对于坚决的投降分子和反共分子，当然是不能容忍的，对他们容忍，就是让他们破坏抗战，破坏团结；所以必须坚决反对投降派，对于反共分子的进攻必须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地打退之。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做，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对于团结抗战不利的。但对于凡非坚决投降和坚决反共的人，则必须采取团结政策。其中有些人是两面派，有些人是被迫的，又有些人是一时之错，对于这些人都应争取他们，继续团结抗战。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做，那就是“左”倾机会主义，也是对于团结抗战不利的。

《团结到底》（一九四〇年七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59—760页

就抗战营垒（与敌人营垒区别）分：顽固派或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则是统治的阶级，动摇的阶级，不是中间派，把它们当做中间派，混淆了人民的视听。

中产阶级及上层小资产阶级——中间派。

下层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进步派。

《目前时局与党的政策》（一九四〇年七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90页

要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非亲日派（即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区别。

《致萧向荣》（一九四〇年），《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61页

对于反共顽固派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即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坚决反共的方面是加以孤立的政策。在抗日方面，顽固派又有两面性，我们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动摇的方面（例如暗中勾结日寇和不积极反汪反汉奸等）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顽固派在反共方面也有两面性，因此我们的政策也有两面性，即在他们尚不愿在根本上破裂国共合作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在他们对我和对人民的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方面，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将这种两面派分子，和汉奸亲日派加以区别。

《论政策》（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63—764页

即在汉奸亲日派中间也有两面分子，我们也应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待之。即对其亲日的方面，是加以打击和孤立的政策，

对其动摇的方面，是加以拉拢和争取的政策。将这种两面分子，和坚决的汉奸如汪精卫、王揖唐、石友三等，加以区别。

《论政策》（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64页

既须对于反对抗日的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主张抗日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又须对于主张抗日但又动摇、主张团结但又反共的两面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两面性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上述各项不同的政策，都是从这些阶级关系的区别而来的。

《论政策》（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64页

我们在外交政策上，是和国民党有区别的。在国民党是所谓“敌人只有一个，其他皆是朋友”，表面上把日本以外的国家一律平等看待，实际上是亲英亲美。我们则应加以区别，第一是苏联和资本主义各国的区别，第二是英美和德意的区别，第三是英美的人民和英美的帝国主义政府的区别，第四是英美政策在远东慕尼黑时期和在目前时期的区别。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

《论政策》（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64—765页

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将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没有或较少买办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最反动的大地主和开明绅士及一般地主加以区别，这是我党争取中间派和实行“三三制”政权的理论根据，这是去年三月以来中央就屡次

指出了的。这次反共高潮再一次地证实了它的正确性。

《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一九四一年五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83页

中间派是动摇的,中国的政治力量是两头硬中间软。假如中国有农民党,我们也要与它区别。这是要我们共产党员弄清楚,惟有区别才能领导。

《对〈联合政府〉的说明》(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73—274页

国民党是一个复杂的政党。它虽被这个代表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反动集团所统治,所领导,却并不整个儿等于这个反动集团。它有一部分领袖人物不属于这个集团,而且被这个集团所打击、排斥或轻视。它有不少的干部、党员群众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团员群众并不满意这个集团的领导,而且有些甚至是反对它的领导的。在被这个反动集团所统制的国民党的军队、国民党的政府机关、国民党的经济机关和国民党的文化机关中,都存在着这种情形。在这些军队和机关里,包藏着不少的民主分子。这个反动集团,其中又分为几派,互相斗争,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统一体。把国民党看成清一色的反动派,无疑是很不适当的。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47页

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在农村中,一方面应坚定地解决土地问题,紧紧依靠雇农、贫农,团结中农;另一方面在进行解决土地问题时,应将一般富农、中小地主分子和汉奸、豪绅、恶霸

分子，加以区别。对待汉奸、豪绅、恶霸要放严些，对待富农、中小地主要放宽些。在一切土地问题已经解决的地方，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应对整个地主阶级改取缓和态度。对一切生活困难的地主给以帮助，对逃亡地主招引其回来，给以生活出路，借以减少敌对分子，使解放区得到巩固。在城市中，除团结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切进步分子外，应注意团结一切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在国民党军队中，应争取一切可能反对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

《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87—1188页

关于开明绅士问题。抗日时期，我党在各解放区政权机关（参议会和政府）中同开明绅士合作，是完全必需的，并且是成功的。对于那些同我党共过患难确有相当贡献的开明绅士，在不妨碍土地改革的条件下，必须分别情况，予以照顾。其中政治上较好又有工作能力者，应当继续留在高级政府中给以适当的工作。政治上较好但缺乏工作能力者，应当维持其生活。其为地主富农出身而人民对他们没有很大恶感者，按土地法平分其封建的土地财产，但应使其避免受斗争。对于过去混进我政权机关中来、实际上一贯是坏人、对人民并无好处而为广大群众所极端痛恨者，则照一般处理恶霸分子的办法交由人民法院审处。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70页

我们早已宣布，对民族资产阶级是不剥夺它的政治权利的，跟对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采取不同的政策。对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要剥夺一个时期，比如地主一般是

要五年，有些还要延长，看他表现好，才能改变成分，才给他选票。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99—500页

（三）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 孤立顽固势力

1. 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是对于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

必须认清目前国内国际尚存在着许多利于我们争取继续抗战、继续团结和继续进步的客观条件。例如，日本对华方针依然是非常强硬的；英美法和日本之间的矛盾虽已部分缩小，但并未真正协调，而且英法在东方的地位又被欧战削弱，因而所谓远东慕尼黑会议很难召集；苏联积极援助中国。这些都是使国民党不易投降妥协和不易举行全国反共战争的国际条件。又如，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坚决反对投降，坚持抗战团结的方针；中间阶级也反对投降；国民党内部投降派和顽固派虽然握有权力，但在数量上只占少数。这些都是使国民党不易投降妥协和不易举行全国反共战争的国内条件。在上述情况下，党的任务就在于：一方面，坚决反抗投降派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又一方面，积极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力争国民党中的大多数，力争中间阶层，力争抗战军队中的同情者，力争民众运动的深入，力争知识分子，力争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抗日武装、抗日政权的发展，力争党的巩固和进步。如此双管齐下，就有可能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

危险并争取时局的好转前途。

《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12—713页

凡阻碍抗日进步势力发展并向我攻击之反动势力与顽固派，我必须坚决反击之，对于这种人，原则上决不能丝毫让步。而我应极力争取并与之共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乃是一切进步的与比较进步的势力。对于中间势力如于学忠、李明扬等，我应采取中立他们的政策。

《集中力量发展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65页

这就是我们党的两条政策：一方面，团结一切进步势力，团结一切忠心抗日的人，这是一条政策；一方面，反对一切丧尽天良的坏蛋，反对那些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这是又一条政策。我们党的这些政策，为了达到一个目的，这就是力争时局好转，战胜日本。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任务，就是团结一切抗日的进步的势力，抵抗一切投降的倒退的势力，力争时局的好转，挽救时局的逆转。这就是我们的根本方针。

《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一九四〇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17页

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45页

在估计目前时局的时候，应懂得，一方面，投降危险是大大地加重了；另一方面，则仍未丧失克服这种危险的可能性。目前的军事冲突是局部性的，还不是全国性的。是彼方的战略侦察行动，还不是立即大举“剿共”的行动；是彼方准备投降的步骤，还不是马上投降的步骤。我们的任务，是坚持地猛力地执行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三项惟一正确的方针，用以达到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目的。如果对时局的估计和任务的提出发生过左过右的意见，而不加以说明和克服，那也是绝大的危险。

《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一九四〇年五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55页

在一切国民党区域，党的基本方针，同样是发展进步势力（发展党的组织和民众运动），争取中间势力（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杂牌军队、国民党内的中间派、中央军中的中间派、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各小党派，共七种），孤立顽固势力，用以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

《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一九四〇年五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56—757页

对于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

《论政策》（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63页

党的路线是联合广大的人民及资产阶级的中派和左派，打倒法西斯残余势力和资产阶级中的反革命势力。这是党历来的路线。对资产阶级中最顽固的、不能妥协的势力要反对；凡是

能妥协的就联合。

《关于时局的四条分析》(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

第4卷第97页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反对了和这种投降主义思想相类似的思想,即是对于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让步,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扩大人民的军队,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我党对于这样一种软弱无能的腐朽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决地执行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治路线,坚决地扩大了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这样,就不但保证了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保证了我党在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战争时期,能够顺利地不受损失地转变到用人民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反革命战争的轨道上,并在短时期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

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58页

2. 发展进步势力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呢?一方面是在保持自己已经取得的阵地。这是我们的战略出发地,丧失了阵地说一切无从说起了。但是主要的目的还在另一方面,这就是为了发展阵地,为了实现“动员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个积极的目的。保持阵地和发展阵地是不可分离的。几个月来,更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左翼群众是在我们的影

响下团结起来了，国民党营垒中的新生力量是在增长中，山西的群众斗争是发展了，党的组织在许多地方也发展了。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94页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左翼集团是共产党率领的群众，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我们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去扩大和巩固这个集团。这一任务的完成，是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的基本条件，是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起来的基本条件，是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的基本条件，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条件。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95页

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国，就是发展全国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等等的民众运动，就是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就是扩大争民主的宪政运动到广大人民中间去。只有一步一步地发展进步势力，才能阻止时局逆转，阻止投降和分裂，而为抗日胜利树立坚固不拔的基础。但是发展进步势力，是一个严重的斗争过程，不但须同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作残酷的斗争，而且须同顽固派作残酷的斗争。因为对于发展进步势力，顽固派是反对的，中间派是怀疑的。如不同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收到确实的成效，就不能抵抗顽固派的压迫，也不能消释中间派的怀疑，进步势力就无从发展。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45—746页

在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斗争中，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顽固派又正在极力争取知识分子，因此，争取一切进步的知识分子于我们党的影响之下，是一个必要的重大的政策。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51页

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西北、华北、华中、华南愈发展，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愈发展，则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性愈增加，我党在全国的文章就愈好做。如果采取相反的估计和策略，以为我愈发展，彼愈投降，我愈退让，彼愈抗日，或者以为现在已经是全国分裂的时候，国共合作已经不可能，那就是错误的了。

《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一九四〇年五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56页

在所有这些解放区内，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部必要的政策，建立了或正在建立民选的共产党人和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合作的政府，亦即地方性的联合政府。解放区内全体人民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所有这一切，使得中国解放区在强敌压迫之下，在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和进攻的情况之下，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之下，能够屹立不摇，并且一天一天发展，缩小敌占区，扩大自己的区域，成为民主中国的模型，成为配合同盟国作战、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国人民的主要力量。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44—1045页

3. 争取中间势力

● 争取中间势力是统一战线极严重的任务，必须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间集团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我们的任务，是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95—396页

在抗日战争中，……许多中小地主出身的开明绅士即带有若干资本主义色彩的地主们，还有抗日的积极性，还需要团结他们一道抗日。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38—639页

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但是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些条件是：（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没有这些条件，中间势力就会动摇起来，或竟变为顽固派向我进攻的同盟军；因为顽固派也正在极力争取中间派，以便使我们陷于孤立。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47—748页

我鲁南、胶东部队，须积极行动，消灭一切最反动的投降反共势力，扩大抗日根据地。惟须极力争取中间势力，对一切尚能与我合作抗日之部队及虽然不好但尚未向我进攻之部队，均须极力联络，不得侵犯其一人一枪。

《目前八路军在华北华中方针》（一九四〇年四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80页

由于没有使中下级干部彻底了解，由于上级没有事先预防与及时检查，致使许多地方犯有极左错误，主要是在土地政策，劳动政策，财政政策，锄奸政策，对待知识分子政策，对待俘虏政策，对待国民党人员政策，以及我之政权组织上表现过左。其结果是缩小了我之社会基础，引起中间势力害怕，给日寇、汪逆与顽固派以争夺群众团聚反动力量的机会。待错误形成再去纠正，已使我们受到极大损失。现在华中工作正在发展（山东亦然），你们必须预防下级执行政策时犯过左错误，你们必须懂得“左”倾错误是当前主要危险，必须及时检查下级工作，纠正过左行动，否则在敌人与顽固派的夹攻中要取得我党我军发展与巩固的伟大胜利，要长期坚持根据地，是不可能的。此事望你们尖锐地提起全党全军注意，切勿等闲视之。

《防止执行政策时犯“左”倾错误》（一九四〇年十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02页

我们在皖南事变前所取《佳电》的立场，对于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争取中间派。因为如果不经过反复多次的经验，中间派对于我党为什么必须向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为什么只能以斗争求团结，放弃斗争则没有任何的团结，就不能了解。地方实力派的领导成分

虽然也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但是因为他们和统制中央政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分子有矛盾，故一般地亦须以中间派看待之。上次反共高潮中反共最力的阎锡山，这一次就站在中间立场；而上次居于中间立场的桂系，这一次虽然转到了反共方面，却和蒋系仍然有矛盾，不可视同一律。其他各地方实力派更不待论。我们同志中却有许多人至今还把各派地主阶级各派资产阶级混为一谈，似乎在皖南事变之后整个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叛变了，这是把复杂的中国政治简单化。如果我们采取了这种看法，将一切地主资产阶级都看成和国民党顽固派一样，其结果将使我们自陷于孤立。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

《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一九四一年五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83页

我们在政治上要孤立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中的右翼）和在经济上保护他们，二者似乎矛盾，其实并不矛盾。在蒋介石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这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一样立即打倒他们，那时，还将有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其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在经济上，则将在长时间内容许他们存在，并使他们的经济在政府法令许可下有一个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利经济之恢复与发展。对于在平分土地后生长出来的新富农也是如此。在这个问题上的过左性急，是错误的。

《对待自由资产阶级须防止过左倾向》（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312页

依附劳动人民反对反动派的民族资产阶级左翼分子以及从封建阶级分裂出来的少数开明绅士，他们也是革命者。但是这两者都不是敌人或革命者的主体，两者都不是可以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在政治上非常软弱的和动摇的阶级。但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由于也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迫害和限制，他们又可以参加人民民主革命，或者对革命守中立。他们是人民大众的一部分，但不是人民大众的主体，也不是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但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性，又因为他们可以参加反对美蒋，或者在反对美蒋的斗争中采取中立的态度，因之我们便有可能和必要去团结他们。……在抗日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是动摇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之间的抗日的参加者。在现阶段，民族资产阶级的多数是增长了对美蒋的仇恨，他们中间的左翼分子依附于共产党，右翼分子则依附于国民党，其中间派则在国共两党之间采取犹豫和观望的态度。这种情况，使得我们有必要和可能争取其大多数，孤立其少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对这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必须慎重地加以处理，必须在原则上采取一律保护的策略。否则，我们便要在政治上犯错误。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一九四八年三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88—1289页

开明绅士是地主和富农阶级中带有民主色彩的个别人士。这些人士，同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有矛盾，同封建的地主、富农也有某种矛盾。我们团结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

有什么大的力量，也不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有什么重要性（他们根据封建制度占有的土地，应当在取得他们同意之后交给农民分配），而是因为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反美蒋斗争时期，在政治上曾经给我们以相当的帮助。在土地改革时期，如果有少数开明绅士表示赞成我们的土地改革，对于全国土地改革的工作也是有益的。特别是对于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地主富农的家庭出身），对于争取全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大部分同土地有联系），对于争取全国的开明绅士（大约有几十万人），以及对于孤立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蒋介石反动派，都是有益的。正因为开明绅士有这些作用，他们也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统一战线中的一分子，所以，团结他们也是一个必须注意的问题。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一九四八年三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89—1290页

我们对于开明绅士的要求，在抗日时期是赞成抗日，赞成民主（不反共），赞成减租减息；在现阶段是赞成反美、反蒋，赞成民主（不反共），赞成土地改革。只要他们能够这样做，我们就应该毫无例外地去团结他们，并且在团结中教育他们。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一九四八年三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90页

由于对美国和蒋介石存着某种幻想，对我党和人民具有足以战胜一切内外敌人的力量表示怀疑，并因此认为所谓第三条道路尚有存在可能、将自己处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地位的某些民主人士，在国民党的突然的攻势之下，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最后终于在一九四八年一月间采用我党的口号，声明反蒋

反美，联共联苏。对于这些人，我们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的政策，对他们的某些错误观点则作适当的批评。在将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时，邀请他们一部分人参加政府工作是必要的和有益的。这些人的特点是从来不愿意接近劳动群众，又习惯于大城市的生活，不愿轻易到解放区来。虽然如此，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基础，即民族资产阶级，却有其重要性，不可忽视。因此，应当争取他们。

《关于情况的通报》（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98页

白崇禧经常说，“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他是怕对了。我们在所有江淮河汉区域，不仅是树木，而且是森林了。不仅生了根，而且枝叶茂盛了。在去年下半年的一个极短时间内，我们在这一区域曾过早地执行分配土地的政策，犯了一些策略上的“左”的错误。但是随即纠正了，普遍地利用了抗日时期的经验，执行了减租减息的社会政策和各阶层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这样，就将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阶层，均联合或中立起来，集中力量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势力及乡村中为最广大群众所痛恨的少数恶霸分子。这一策略，是明显地成功了，敌人已经完全孤立起来。

《中原我军占领南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86页

争取中间势力很重要。在中国，在南北美洲，民族资产阶级都起着很大的作用。他们人数不多，但影响很大，在某些时候甚至比工人阶级的影响还大。所以对这些人的争取工作就很重要。现在，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不但要作斗争，同时要团结

他们，要给他们利益，这样他们才能拥护社会主义改造。给什么利益呢？一是给他们工作，二是给他们选举权。

《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60页

第三国际在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的一个决议中说，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要反对资产阶级。这个决议没有区别中国资产阶级的两个部分，甚至认为中间派比蒋介石更危险。当时的“左”倾冒险分子执行了这条错误路线，结果把自己完全孤立起来。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1页

● 对中间势力的动摇态度进行适当的说服和批评，争取他们采取中立、对我同情和向我靠拢

现在的时期，同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时期有什么分别呢？那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现在正在走向殖民地。九年以来，他们抛弃了自己的同盟者工人阶级，和地主买办阶级做朋友，得了什么好处没有呢？没有什么好处，得到的只不过是民族工商业的破产或半破产的境遇。因为这些情况，我们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在今天的时局下，有起变化的可能性。变化的程度怎样呢？总的特点是动摇。但在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45页

对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的克服，依靠群众的力量和正确的政策，否则资产阶级将反过来克服无产阶级。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6页

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这是不同的三部分人，但都是目前时局中的中间派。中等资产阶级就是除了买办阶级即大资产阶级以外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虽然同工人有阶级矛盾，不赞成工人阶级的独立性；但他们在沦陷区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在国民党统治下则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限制，因此他们还要抗日，并要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力。在抗日问题上，他们赞成团结抗战；在争取政治权力问题上，他们赞成宪政运动，并企图利用进步派和顽固派之间的矛盾以达其目的。这一阶层，我们是必须争取的。开明绅士是地主阶级的左翼，即一部分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地主，他们的政治态度同中等资产阶级大略相同。他们虽然同农民有阶级矛盾，但他们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亦有矛盾。他们不赞成顽固派，他们也想利用我们同顽固派的矛盾以达其政治上的目的。这一部分人，我们也决不可忽视，必须采取争取政策。地方实力派，包括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两种力量在内。他们虽然同进步势力有矛盾，但他们同现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损人利己的政策亦有矛盾，并想利用我们同顽固派的矛盾以达其政治上的目的。地方实力派的领导成分也多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因此他们在抗日战争中虽然有时表现进步，不久仍然反动起来；但又因为他们同国民党中央势力有矛盾，所以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他们是可能在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采取中立态度的。上述三部分中间势力，我们的政策都是争取

他们。但这种争取政策，不但同争取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有区别，而且对于各部分中间势力也有区别。对于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当作基本同盟者去争取的；对于中间势力，则是当作反帝国主义的同盟者去争取的。中间势力中的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可以同我们共同抗日，也可以同我们一道共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但他们害怕土地革命。在对顽固派的斗争中，其中有些人还可以在一定程度内参加，有些则可以保持善意的中立，有些则可以表示勉强的中立。地方实力派，则除共同抗日外，只能在对顽固派斗争时采取暂时的中立立场；他们是不愿同我们一道建立民主政权的，因为他们也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间派的态度是容易动摇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化；我们应当针对着他们的动摇态度，向他们进行适当的说服和批评。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46—747页

在今天华中的条件下，一方面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较我军占优势，另一方面在那里聚集着各种不同系统的地方军和杂牌军。如果由于我们努力争取友军工作的结果，使在汤恩伯、李品仙等部向我进攻时，不仅有许多杂牌军采取中立或发生对我同情的实际行动，而且即在汤、李所部中亦发生一部分人反对内战同情我军的运动，则不仅对我华中反磨擦的武装斗争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同时将给予全国反共投降阴谋以严重的打击，因此立即动员一切可能的党政军民力量去进行争取友军工作，成为你们今天最中心任务之一。

《动员一切力量进行争取友军工作》（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四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06—307页

根据各方面经验，“抗战到底，团结到底”、“大敌当前，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军队不打中国军队”、“一切中国的同胞、中国友军联合起来抗日救国”、“反对内战，反对中国人自相残杀”等口号，仍是思想上瓦解反共军队和争取友军对我同情的有力武器。如发生磨擦战争时，望将这些口号，在我军驻地周围及友军驻扎境内，到处书写和张贴，尤其要设法动员民众和同情分子在汤恩伯、李品仙等部所经过的一切地带，遍贴遍写这类标语口号。当汤、李部队开近我防区周围时，发动大规模的联欢运动，即在战斗行动开始后，亦不要放松火线上呼团结抗日口号及部分谈判妥协的工作。同时，对汉奸部队或顽军等，这类口号切忌乱用，根据过去经验，乱用这类口号，反足增加反共军之反感和团结。

《动员一切力量进行争取友军工作》（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四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07—308页

我党我军中过去把黄埔生看作一个笼统的反共集团的传统观念是错误的、有害的。在目前严重时局，急须改正此观念，利用一切机会与黄埔生军人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不要刺激他们，而应以民族至上的观念来打动他们，使他们不肯投降日寇，使他们对反共战争取中立或消极态度，这对挽回危局有重大意义。

《利用一切机会对黄埔系军人进行统战工作》（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18页

应尽量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因为这是中国人民坚持民族抗战的最可靠的武装力量。对于国民党军队，应继续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政策，尽量地发展交朋友的工作。应尽可能地吸收那些同情我们的国民党军官和无党派军官参加八路军新四

军，加强我军的军事建设。在我军中共党员在数量上垄断一切的情况，现在也应有所改变。……在我党我军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已经巩固地建设成功的现在时期，大量地吸收同情分子（当然决不是破坏分子），不但没有危险，而且非此不能争取全国同情和扩大革命势力，所以是必要的政策。

《论政策》（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69页

（二）对民主同盟的恢复活动，对李济深等国民党反蒋派，对在美的冯玉祥，对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派，不管他们言论行动中包含多少动摇性及错误成分，我们应采积极争取与合作态度，对他们的错误缺点，采取口头的善意的批评态度。

（三）要在报纸上刊物上对于对美帝及国民党反动派存有幻想、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反对共产党的某些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公开的严重的反动倾向加以公开的批评与揭露，文章要有分析，要有说服力，要入情入理。

（四）对一切应当争取的中间派的错误观点，在报纸刊物上批评时，尤其要注意文章的说服力。

《对可以争取的中间派应采取积极争取与合作态度》（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5页

在占领绍兴、宁波等处时，要注意保护宁波帮大中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以利我们拉住这些资本家在上海和我们合作，或者减少他们的捣乱行为。

《占领吴淞嘉兴等地应注意的问题》（一九四九年五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90—291页

先进的人们，共产党人，各民主党派，觉悟了的工人，青

年学生，进步的知识分子，有责任去团结人民中国内部的中间阶层、中间派、各阶层中的落后分子、一切还在动摇犹豫的人们（这些人们还要长期地动摇着，坚定了又动摇，一遇困难就要动摇的），用善意去帮助他们，批评他们的动摇性，教育他们，争取他们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不要以为胜利了，就不要做工作了。还要做工作，还要做很多的耐心的工作，才能真正地争取这些人。争取了他们，帝国主义就完全孤立了，艾奇逊的一套就无所施其伎了。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4卷第1487—1488页

积极利用城市的各界代表会议及各县的全县代表会议，将一切施政中的重大问题逐一提出自己有了准备的想过了的有了办法的问题向会议作报告，并交付讨论，征求他们的意见。此种会议，党员及完全可靠的左翼分子总共超过二分之一，能保证通过我们的意见即够，以便团结大批的中间分子及一部分必须拉拢的右翼分子，使他们向我们靠拢。

《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一九四九年九月二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36页

4. 孤立顽固势力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翼集团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这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一方面害怕战争对于他们的财产的破坏，另一方面害怕民众的起来，他们的投降倾向是必然的。他们中间，许多人已经是汉奸，许多人已经是亲日派，许多人是

准备作亲日派，许多人在动摇中，仅仅个别有特殊情况的分子是坚决的。他们中间有些人之所以暂时加入民族统一战线，是被迫的和勉强的。一般地说来，他们之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是为期不远的。目前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中的许多最坏的分子，正在策动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是谣言的制造厂，“共产党暴动”、“八路军退却”一类的谣言，今后将要与日俱增。我们的任务是坚决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并且在这个斗争中，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96页

全党努力，同一切爱国进步分子，一切爱国进步的国民党人员（上层的、中层的、下层的群众）亲密联合在一块，并和他们一道（如果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必须和他们一道，不是我们单独）去动员群众，开展反投降斗争，公开揭穿反共即准备投降的实质，以孤立投降派与反共分子，以便继续抗日。

《反投降提纲》（一九三九年六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17页

目前要极力争取的，用党的全力去争取的，是克服投降可能，争取多数抗日，拥护并帮助并监督并批评国民党与蒋，使之能够从反汪斗争中、从今后发展中克服投降倾向，这是目前的中心任务。

《反投降提纲》（一九三九年六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32页

应强调团结，强调统一，强调国共长期合作，而不是强调其他东西。也只有强调这些才能克服投降危机，也只有强调这些才能更好地准备自己，应付可能的事变。一切为了孤立投降

派而不是使自己孤立。

《反投降提纲》（一九三九年六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32页

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仍然是当前时局中的最大危险，目前的反共现象和倒退现象仍然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准备投降的步骤。我们的任务，仍然是协同全国一切爱国分子，动员群众，切实执行我党《七七宣言》中“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以准备反攻力量。

《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16页

《封神演义》里有一个申公豹，是姜子牙的不肖师弟，他脸向后长，眼朝后看。现在在抗战阵营中，就隐藏有这么一群“申公豹”，一批专门倒退的人，他们拖住中国要倒退。这是现在中国的黑暗势力压迫光明势力，这叫做压迫的自由。然而，全中国的青年和工农大众也有另外一种自由，这叫做反抗黑暗势力的自由。我们不准黑暗势力把中国拖向后退。我们有没有把握不准他们那样做呢？是有的，重要的根据就是现在的人不容易被欺骗了，全国老百姓是不好再欺骗了。现在大多数人就不准他们这样压迫，要反抗他们的压迫；不准他们投降，要坚持抗战；不准他们分裂，要坚持团结；不准他们倒退，要坚持进步。这一群“申公豹”，看他们怎样收场！

《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55—256页

对河北与山西境内的任何军队，不论是中央军、晋绥军及石友三，如果它进攻八路地区，我应在自卫原则下，在有理有

利条件下，坚决反抗并彻底消灭之。应号召我八路全体军队，号召两省全体人民，坚决打击一切从抗日阵线后面进攻者，应公开普遍宣传“从抗日阵线后面进攻的就是汉奸”，“打倒进攻八路军的汉奸”，“打倒进攻决死队的汉奸”，“打倒破坏抗日根据地的汉奸”。只有造成全体军民反汉奸反进攻的热潮，并给实行进攻者以彻底打击，才能停止那些阴谋家冒险家的诡计，才能分化他们内部，才能使动摇的军队不敢参加进攻，才能与努力进行军队中统一战线工作（此工作要十分加紧）作有效的配合。

《坚决打击一切从抗日阵线后面进攻者》（一九四〇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67页

中国资产阶级顽固派如不觉悟，他们的事情是并不美妙的，他们将得到一个自寻死路的前途。所以我们希望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坚持下去，不是一家独霸而是大家合作，把抗日的事业弄个胜利，才是上策，否则一概是下策。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衷心劝告，“勿谓言之不预也”。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82—683页

有很多的顽固分子，他们是顽固专门学校毕业的。他们今天顽固，明天顽固，后天还是顽固。什么叫顽固？固者硬也，顽者，今天、明天、后天都不进步之谓也。这样的人，就叫做顽固分子。要使这样的顽固分子听我们的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35页

中国现在的事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即使颁布一种

好宪法，也必然被封建势力所阻挠，被顽固分子所障碍，要想顺畅实行，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的宪政运动是争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认已经民主化的事实。这是一个大斗争，决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35页

中国现在的顽固派，正是这样。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我并不是随便骂他们，我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36页

天下的顽固分子，他们虽然今天顽固，明天顽固，后天也顽固，但是不能永远地顽固下去，到了后来，他们就要变了。比方汪精卫，他顽固了许多时候，就不能再在抗日地盘上逞顽固，只好跑到日本怀里去了。比方张国焘，他也顽固了许多时候，我们就开了几次斗争会，七斗八斗，他也溜了。顽固分子，实际上是顽而不固，顽到后来，就要变，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也有变好了的，也是由于斗，七斗八斗，他认错了，就变好了。总之顽固派是要起变化的。顽固派，他们总有一套计划，其计划是如何损人利己以及如何装两面派之类。但是从来的顽固派，所得的结果，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他们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我们曾说张伯伦“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现在已经应验了。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37页

我看将来的结果，决不是顽固取消进步，倒是进步要取消顽固。顽固分子要不被取消，除非他们自己进步才行。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38页

我们常劝那些顽固分子，不要进攻八路军，不要反共反边区。如果他们一定要的话，那他们就应该做好一个决议案，在这个决议案的第一条上写道：“为了决心消灭我们顽固分子自己和使共产党获得广大发展的机会起见，我们有反共反边区的任务。”顽固分子的“剿共”经验是相当丰富的，如果他们现在又想“剿共”，那也有他们的自由。因为他们吃了自己的饭，又睡足了觉，他们要“剿”，那也只好随他们的便。不过，他们就得准备实行这样的决议，这是不可移易的。过去的十年“剿共”，都是照此决议行事的。今后如再要“剿”，又得重复这个决议。因此，我劝他们还是不“剿”为妙。因为全国人民所要的是抗日，是团结，是进步，不是“剿共”。因此，凡“剿共”的，就一定失败。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38页

要是顽固派仍然反对宪政，那结果一定和他们的愿望相反。这个宪政运动的方向，决不会依照顽固派所规定的路线走去，一定和他们的愿望背道而驰，它必然是依照人民所规定的路线走去的。这是一定的，因为全国人民要这样做，中国的历史发展要这样做，整个世界的趋势要我们这样做，谁能违拗这个方向呢？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38—739页

我们一定要把事情办好，一定要争取民主和自由，一定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如果不是这样做，照顾固派的做法，那就会亡国。为了避免亡国，就一定要这样做。为了这个目的，就要大家努力。只要努力，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还要懂得，顽固派到底是少数，大多数人都不是顽固派，他们是可以进步的。以多数对少数，再加上努力，这种希望就更大了。所以我说，事情虽然困难，却是大有希望。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39页

在我党我军内部，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振奋精神，发扬勇气，团结干部，扩大力量，巩固军队和巩固党。在对中间派的关系上，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争取动摇的中间派，支持同情的中间派，否则都是不可能的。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

《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一九四〇年五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55页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始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国共产党是与人为善的，一切在抗日战争中犯过错误的人，中国共产党与以反省改悔的机会，仅仅对背叛民族利益而又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的人，方才与以坚决的打击。

《延安〈解放日报〉发刊词》（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53页

打败日本侵略者，是中国人民的神圣的权利。如果反动分

子要想剥夺中国人民的这种神圣的权利，要想压制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要想破坏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那末，中国人民在向他们劝说无效之后，应该站在自卫立场上给以坚决的回击。因为中国反动分子的这种背叛民族利益的反动行为，完全是帮助日本侵略者的。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66页

（四）又联合又斗争

1. 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政策

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8页

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又一方面，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这样便把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了。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9页

要加强群众运动。所谓准备群众即指此。不是降低阶级斗争就能够克服投降，只有正确地开展阶级斗争，以与统一战线

相配合，才能克服投降。单有统一而无斗争是非常危险的。群众是我们的最后依靠，也是抗战的最后依靠。

《反投降提纲》（一九三九年六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34页

还有更多的同志不了解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不了解统一战线政策和阶级政策，从而不了解统一战线教育和阶级教育的一致性。他们认为在皖南事变后需要特别强调所谓统一战线教育以外的阶级教育。他们至今还不明白：我党在整个抗日时期，对于国内各上层中层还在抗日的人们，不管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中间阶级，都只有一个完整的包括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两面性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即使是伪军、汉奸和亲日派分子，除对绝对坚决不愿悔改者必须采取坚决的打倒政策外，对其余的分子也是这种两面性的政策。我党对党内对人民所施行的教育，也是包括这两方面性质的教育，就是教导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如何和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各个不同的阶层在各种不同的形式上联合抗日，又和他们的各种不同程度的妥协性、动摇性、反共性作各种不同程度的斗争。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政策，二者不可分割，这一点不弄清楚，很多问题是弄不清楚的。

《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一九四一年五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84—785页

2. 合作是有原则的、积极的，让步要有限度、有条件

为了和平、民主和抗战，为了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曾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向他们保证下列四项：

（1）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

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2）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3）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4）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这些保证，是必需的和许可的。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根据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在政治比重上的变化而改变国内两个政权敌对的状态，团结一致，共同赴敌。这是一种有原则有条件的让步，实行这种让步是为了去换得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战。然而让步是有限度的。在特区和红军中共产党领导的保持，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自由的保持，这就是让步的限度，超过这种限度是不许可的。让步是两党的让步：国民党抛弃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政策，共产党抛弃两个政权敌对的政策。我们以后者换得前者，重新与国民党合作，为救亡而奋斗。如果说这是共产党的投降，那只是阿 Q 主义和恶意的污蔑。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58—259 页

不抗日战争则已，既然要干了，并且已经干起来了，又已经暴露出严重的危机了，还不肯改换一套新的干法，前途的危险是不堪设想的。抗日需要一个充实的统一战线，这就要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加入到统一战线中去。抗日需要一个坚固的统一战线，这就需要一个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这个统一战线的行动方针，同时也就是这个统一战线的一种约束，它像一条绳索，把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一切加入统一战线的团体和个人都紧紧地约束起来。这才能说得上坚固的团结。我们反对旧的那一套约束，因为它不适应于民族革命战争。我们欢迎建立一套新的约束代替旧的，这就是颁布共同纲领，建立革命秩序。必

须如此，才能适应抗日战争。

《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67页

因为中国是处在半殖民地地位，目前则更处在亡国灭种关头，连半殖民地地位都在危险中。党派与阶级虽不同，这个共同的地位则一，就此决定了两党不但能合作抗日，并且能合作建国。但合作是在一定纲领下的合作，是有原则的合作，是真正的合作，而不是苟合与貌合。如果离开纲领与原则，必变成苟合与貌合，这是任何有原则的政党所不许可的。有纲领有原则的合作，如同朋友之间的道义之交，只有这种道义之交，交情才能长久。

《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一九三八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02页

统一战线中有什么互让呢？有的。我们曾经在政治上作过一些让步，那就是停止没收土地，改编红军，改变苏区制度，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让步，这是为了建立统一战线团结全民共同对敌的必要步骤。我们的友党也作了让步，那就是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等等。这种为了团结抗日为了长期合作的互让政策，是很好的，很对的。只有政治上糊涂或别有用心的人，才会说：共产党投降了国民党，或国民党投降了共产党。

《论新阶段》(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31—632页

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我们必须巩固和扩大我党我军，同时也应赞助友党友军的巩固和扩大；人民要求政府满

足自己的政治经济要求，同时给政府以一切可能的利于抗日的援助；工人要求厂主改良待遇，同时积极作工以利抗日；地主应该减租减息，同时农民应该交租交息，团结对外。这些都是互助的原则和方针，是积极的方针，不是消极的片面的方针。互让也是如此。彼此不挖墙脚，彼此不在对方党政军内组织秘密支部；在我们方面，就是不在国民党及其政府、军队内组织秘密支部，使国民党安心，利于抗日。“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正是这种情形。没有红军的改编，红色区域的改制，暴动政策的取消，就不能实现全国的抗日战争。让了前者就得了后者，消极的步骤达到了积极的目的。“为了更好的一跃而后退”，正是列宁主义。把让步看作纯消极的东西，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许可的。纯消极的让步是有过的，那就是第二国际的劳资合作论，把一个阶级一个革命都让掉了。中国前有陈独秀，后有张国焘，都是投降主义者；我们应该大大地反对投降主义。我们的让步、退守、防御或停顿，不论是向同盟者或向敌人，都是当作整个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是联系于总的革命路线而当作不可缺少的一环看的，是当作曲线运动的一个片断看的。一句话，是积极的。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7—538页

我们是珍重合作的，但必须他们也珍重合作。老实说，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是他们自己性命交关的大问题，我们不得不尽最后的忠告。如若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

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

《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76页

3. 统一战线内部，既要反对“一切联合，否认斗争”，也要反对“一切斗争，否认联合”

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除基本农民以外），实为代表两个极端政策的极明显的例证。而这两个极端的政策，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

《论政策》(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63页

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

《论政策》(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63页

十年内战时期的经验，是现在抗日时期的最好的和最切近的参考。但这是指的关于如何联系群众和动员群众反对敌人这一方面，而不是指的策略路线这一方面。党的策略路线，在现在和过去是有原则区别的。在过去，是反对地主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在现在，是联合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就是在十年内战的后期，对于向我们举行武装进攻的反动的政府和政党，和对于在我们政权管辖下一切带资本主义性的社会阶层，没有采取不同的政策，对于反动的政府和政党中各个不同的派别间，也没有采取不同的政策，这些也都是不正确的。那

时，对于农民和城市下层小资产者以外的一切社会成分，执行了所谓“一切斗争”的政策，这个政策无疑是错误了。在土地政策方面，对于十年内战前期和中期所采取的、也分配给地主一份和农民同样的土地、使他们从事耕种、以免流离失所或上山为匪破坏社会秩序，这样的正确的政策，加以否定，也是错误的。现在，党的政策必须与此不同，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也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如同一九二七年的陈独秀主义那样），而是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阶层，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但对他们中间存在着的投降敌人和反共反人民的动摇性反动性方面，又应按其不同程度，同他们作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现在的政策，是综合“联合”和“斗争”的两重性的政策。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792—793页

国民党的反共和我们不得不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自卫斗争的这些情况，党内又生长了一种过左的偏向，例如以为国共合作就要破裂，因而过分地打击地主，不注意团结党外人士等。但是这些过左偏向，也被我们克服过来了。我们指出了在反磨擦斗争中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指出了在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和以斗争求团结的必要，保持了国内和根据地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学习和时局》（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43页

4. 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

统一战线下，统一是基本的原则，要贯彻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记统一。同时，不能不辅助之以斗争的原则，因为斗争正是为了统一，没有斗争不能发展与巩固统一战线。适合情况的斗争是需要的，对付顽固分子，推动他们进步是必要的。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四日）

我们要懂得，统一战线里是一定有磨擦的。这个统一战线的名词里已经包含着磨擦的意思，因为讲统一，起码是两个以上才有可能，如果只有一个，“孤掌难鸣”，就不会有磨擦，但一有两个，两个手掌就拍得响了，磨擦就难免的。统一战线有一万年，磨擦也有一万年，有统一战线就有磨擦存在。因为有不同，所以有磨擦，不过我们是尽一切力量使磨擦减少。

……亲爱团结是统一战线的原则，然而更要反磨擦这一条，没有这一条就不行，只有坚持这一条原则，才能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关于目前战争局面和政治形势》（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51—152页

统一里有斗争，天下万物皆然。如果有人认为只有团结而没有斗争，那他就还没有学通马克思主义。统一与斗争是统一战线的两个基本原则，那末这两者是不是半斤与八两呢？或者说斗争更重于统一呢？回答都是否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一个基本原则便是统一，这就是说要跟朋友讲亲爱、讲团结、

互相帮助等等；但还有一个原则是斗争，那就是劝解、说服、教育等等，这是不可缺少的一个原则。

《又团结、又斗争》（一九三九年二月五日），《党的文献》1995年
第4期

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不可偏废，但以统一为主，“磨而不裂”。

《反投降提纲》（一九三九年六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22页

在抗日战争中，亲日派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已经投降，或准备投降了。欧美派大资产阶级（顽固派）虽然尚留在抗日阵营内，也是非常动摇，他们就是一面抗日一面反共的两面派人物。我们对于大资产阶级投降派的政策是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坚决地打倒他们。而对于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则是用革命的两面政策去对待，即：一方面是联合他们，因为他们还在抗日，还应该利用他们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又一方面是和他們作坚决的斗争，因为他们执行着破坏抗日和团结的反共反人民的高压政策，没有斗争就会危害抗日和团结。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39页

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一真理，已经逐渐为党内同志们所了解。但不了解的依然还多，他们或者认为斗争会破裂统一战线，或者认为斗争可以无限制地使用，或者对于中间势力采取不正确的策略，或者对顽固势力有错误的认识，这些都是必须纠正的。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45页

顽固势力，目前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势力。这些阶级，现在分为降日派和抗日派，以后还要逐渐分化。目前的大资产阶级抗日派，是和降日派有区别的。他们采取两面政策，一面尚在主张团结抗日，一面又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极端反动政策，作为准备将来投降的步骤。因为他们还愿团结抗日，所以我们还有可能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里面，这种时间越长久越好。忽视这种争取政策，忽视同他们合作的政策，认为他们已经是事实上的投降派，已经就要举行反共战争了，这种意见是错误的。但又因为他们在全国普遍地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反动政策，不实行革命三民主义这个共同纲领，还坚决反对我们实行这个纲领，坚决反对我们超越他们所许可的范围，即只让我们同他们一样实行消极抗战，并且企图同化我们，否则就加以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压迫，所以我们又必须采取反抗他们这种反动政策的斗争策略，同他们作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这就是我们对付顽固派两面政策的革命的两面政策，这就是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48页

如果我们能够在思想上提出正确的革命理论，对于他们的反革命理论给以坚决的打击；如果我们在政治上采取适合时宜的策略步骤，对于他们的反共反进步政策给以坚决的打击；如果我们采取适当的军事步骤，对于他们的军事进攻给以坚决的打击；那末，就有可能限制他们实施反动政策的范围，就有可能逼迫他们承认进步势力的地位，就有可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而使他们陷于孤立。同时，也就有可能争取还愿抗日的顽固派，延长其留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时间，就有可能

避免如同过去那样的大内战。所以，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同顽固派的斗争，不但是为了防御他们的进攻，以便保护进步势力不受损失，并使进步势力继续发展；同时，还为了延长他们抗日的的时间，并保持我们同他们的合作，避免大内战的发生。如果没有斗争，进步势力就会被顽固势力消灭，统一战线就不能存在，顽固派对敌投降就会没有阻力，内战也就会发生了。所以，同顽固派斗争，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避免大规模内战的不可缺少的手段，这一真理，已被一切经验证明了。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48—749页

强调团结与斗争问题

1. 我们历来是强调团结的，今后还是一样——对付一切抗战派。
2. 我们历来是强调斗争的，今后还是一样——对付一切投降派。
3. 我们又强调团结又强调斗争——对付一切又抗日又反共的顽固派。
4. 有时强调团结，有时强调斗争——依顽固派的态度是团结为主还是反共为主而定。
5. 斗争为了团结——为了延长合作时间。
6. 不论哪一方面（政治，军事，文化），目前时期都以团结为主。但不论哪一方面，都同时有斗争。因为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是没有变化的。
7. 即在目前时期，某些地方，反磨擦斗争还可表现为地方高涨，例如苏北。

《目前时局与党的政策》（一九四〇年七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
第2卷第290—291页

统一就是联合，独立就是斗争。什么叫独立性呢？你站在这里，没有人叫你站开，这就不发生独立性的问题；在你站的位置上别人也想站，要赶你走，这就发生独立性的问题了。斗争、磨擦是为了统一，是统一的手段，这叫一打一拉，又打又拉，有理、有利、有节。在不妨碍统一下的独立自主，也就是希望团结得更好。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
2卷第402页

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他们的抗战，我们是赞成的；如果有成绩，我们也是赞扬的。但是如果抗战不积极，我们就应该批评。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动的道路，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3卷第849页

在一个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实行如过去某些同志所实行过的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或者“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都是错误的政策。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3卷第867页

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

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则，必须坚持，不可忘记。

《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54页

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这是我党既定方针，也是国民党被迫不得不走的道路，这在双十重庆协定上已经规定下来。但国民党力图在最近几个月内控制更多地方，力求他们在华北、东北占优势，力图削弱我党我军，以便在有利于他们的条件下实现和平妥协，故在目前过渡阶段上发生了大规模的猛烈的军事斗争（不能把目前这种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误认为内战阶段已经到来）。这一不可避免与已经到来的当前形势，我党必须认识清楚，必须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到团结之目的这一方针，毫不动摇地争取目前斗争的胜利，以便有利地转到和平发展的新阶段。

《目前时局及今后六个月的任务》（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41页

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几个政策问题》（一九五〇年四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9页

在我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

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4—35页

对民族资产阶级要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团结他们一起反对帝国主义，支持他们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言行；对他们反工人阶级的、反共的反动言行，进行适当的斗争。只有一个方面是错误的：只有斗争，不要团结，是“左”倾错误；只有团结，不要斗争，是右倾错误。这两种错误我们党都犯过，经验很痛苦。后来我们总结了这两种经验，采取了“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必须斗争的就作斗争，可以团结的就团结起来。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团结他们，取得反对帝国主义的胜利。

《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35—136页

5. 又打又拉，打是手段，拉是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它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地作战，不积极地反汪反汉奸，有时还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变和一月十七日的命令那种地步，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这些事实，也在这次反共高潮中再度地证明了。极端地

复杂的中国政治，要求我们的同志深刻地给以注意。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既然还在抗日，其对我党既然还在一打一拉，则我党的方针便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只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天没有完全叛变，我们的这个政策总是不会改变的。

《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一九四一年五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82页

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包括一切还在抗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内的，是全民族联盟，不但是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在抗日一点上确是如此，在民主一点上则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坚决的反对力量，但在我根据地内则大地主大资本家为保存其经济利益为向我作合法斗争亦可赞成我之民主政权。故在抗日过程中，不论在全国范围内在根据地内，除汉奸外，对大地主大资本家是一拉一打政策，拉其抗日，打其反共反民主，但目前拉还是主要的，打是辅助的，打是达到拉之手段。

《抗战中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行一拉一打政策》（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56页

给汉奸、豪绅、恶霸、反动分子以严重打击，只要是真正群众的行动，则不是错误而是必需。大城市中豪绅地主的大声叫喊是必然现象，我们绝不应为其所动。但是到了群众斗争已经胜利、清算减租已经实现之时，党便应当劝告群众，对地主阶级由打的政策改变为拉的政策。例如让逃亡地主还乡，给地主以生活上的出路，并联络开明绅士参加某些工作等。拉的政策，其目的在于减少反对力量，使紧张空气和缓下来，因此是必需的。但应注意

不要拉得过早，损害群众利益与影响群众情绪。

《纠正群众工作中错误的几个问题》(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03—104页

6. 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

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同顽固派斗争，必须注意下列几项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说，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应懂得利用顽固派的矛盾，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应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在接着的一个时期中，双方实行休战。这时，我们应该主动地又同顽固派讲团结，在对方同意之下，和他们订立和平协定。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在他们举行新的进攻之时，我们才又用新的斗争对待之。这三个原则，换一句话来讲，就是“有理”，“有利”，“有节”。坚持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并使顽固派尔后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不敢轻易同敌人妥协，不敢轻易举行大内战。这样，就有争取时局走向好转的可能。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49—750页

如果我们军事反攻在主要地区没有一时期的停止，虽然我们军事行动的性质仍是自卫性质，但在中间派看来，会觉得我们过激过分，而有可能失去中间派的同情。所以不论对巩固自己力量说来，在对争取中间派同情说来，都有使双方军事斗争暂时告一段落之必要。

《争取对内和平，巩固已得阵地》（一九四〇年三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71—272页

反磨擦斗争必须注意自卫原则，不应超出自卫的范围。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则对全国的影响和统一战线是很不利的。尤其对中央军应注意此点，因国共合作主要就是同中央军的合作。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朱德、彭德怀等的电报（一九四〇年三月十四日），《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177页

在反对顽固派向我进攻的斗争中，在该顽固分子没有转变为公开伪军与公开当汉奸时，具体指出某人投降日寇或指某人是汉奸并且向外宣传及陈报国民党是不适当的。这样做不但社会上不了解，失去中间派同情，及引起国民党的愤激，而且妨碍我们在反磨擦告一段落时又同顽固派讲团结的统一战线工作。因此以后除公开转变为伪军及公开降敌者外，不得公开具体指某人为汉奸。特别对中央军要谨慎，有向我磨擦者，只应搜集其磨擦材料陈报，切忌轻易戴大帽子。并应使干部明白，所谓国共合作，主要就是同中央军合作，我全体干部在加强对一切军队的团结说服工作中，要特别着重对中央军的团结说服工作。现当整个西北、华北的反磨擦军事斗争告一段落之时，各方亟应加紧这种统一战线工作，各军事政治工作领导同志应负

指导计划之责。

《对顽固派的斗争策略》（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77页

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日本的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因此，对于一切反共顽固派的防共、限共、反共的法律、命令、宣传、批评，不论是理论上的、政治上的、军事上的，原则上均应坚决地反抗之，均应采取坚决斗争的态度。这种斗争，应从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出发，也就是自卫的原则、胜利的原则和休战的原则，也就是目前每一具体斗争的防御性、局部性和暂时性。对于反共顽固派的一切反动的法律、命令、宣传、批评，我们应提出针锋相对的办法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只有向顽固派采取这种强硬态度和在斗争时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才能使顽固派有所畏而不敢压迫我们，才能缩小顽固派防共、限共、反共的范围，才能强迫顽固派承认我们的合法地位，也才能使顽固派不敢轻易分裂。所以，斗争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国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

《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一九四〇年五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54—755页

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

《论政策》（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63页

我党在这次反共高潮开始时采取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退让

政策（去年十一月九日的电报），取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情，在皖南事变后转入猛烈的反攻（两个十二条，拒绝出席参政会和全国的抗议运动），也为全国人民所赞助。我们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对于打退这次反共高潮，是完全必要的，且已收得成效。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一九四一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79页

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需要一整套的战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人民革命力量的仇恨和残忍，不但为过去十年的反共战争所证明，更由抗日战争中的两次反共高潮特别是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的皖南事变所完全地证明了。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循。这次反共高潮中项英同志的机会主义的失败，全党应该引为深戒。但是斗争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的，三者缺一，就要吃亏。

《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一九四一年五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82—783页

各地对于国民党人员应继续采取诚恳协商，实事求是，有理有节的态度，力戒骄傲夸大有害无益的态度，借以争取更进的好转。

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国民党十中全会问题的指示》（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461页

我们始终站在团结国民党抗日的立场上，但遇到反共磨擦则要同它斗争，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日本又不能大举进攻共产

党，将国民党引导到对敌斗争一个目标上去。在反磨擦中，我们是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使磨擦斗争归于缓和，我们对于三次反共高潮都是如此。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工作报告》（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38页

我们对国民党的方针，是又团结又斗争。讲到斗争，我们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我们是在自卫的立场上和它斗，我们是有理的；这斗争是局部的，对我们有利才斗；但这种斗争又是暂时的，为了团结我们是有节制的。反过来讲，自卫的、局部的、暂时的斗争，要有利于团结。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16页

对于国民党的进攻，我们是站在自卫立场上反击的。超过这个自卫的立场，我们就要犯错误。但有些同志劲来了，就忘记了这一点，这是不好的。基本是自卫的立场，有了这样的立场，就不会犯错误。自卫就是有理，局部就是有利，暂时就是有节，这就是有理、有利、有节。违反了方针，就会犯错误。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27页

放手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条件下，而不是冒险。有理、有利、有节，就是放手而不冒险。这一个方针一直到全国胜利都是不会改变的。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77页

出了斯科比，中国变成希腊。这种情况我们要用各种方法来避免，如果发生了，就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我曾经同国民党的联络参谋讲过，我们的原则是三条：第一条不打第一枪，《老子》上讲“不为天下先”，我们不先发制人，而是后发制人。第二条“退避三舍”，一舍三十里，三舍九十里，这是《左传》上讲晋文公在晋楚城濮之战中的事，我们也要采取这样的政策。第三条“礼尚往来”，这是《礼记》上讲的，礼是讲究往来的，“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你来到我这里，我不到你那里去，就没有礼节，所以我们要到你们那里去。我叫国民党的联络参谋把这三条告诉胡宗南，希望他们也采取“不为天下先”、“退避三舍”、“礼尚往来”的政策，这样就打不起来。他们不喜欢马克思主义，我们说：这是老子主义，是晋文公主义，是孔夫子主义。无论斯科比来了也好，蒋介石来了也好，我们都是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原则。不打第一枪这个原则我们要谨记，从一个时期来看好像不一定有利，但从长远来看则是很有利的。当然到了该打的时候，就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89页

我们的方针仍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到团结，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不可能设想在蒋介石的高压下，不经过斗争就可以取得我们的地位。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7页

减租与反奸清算，二者都不可少，应当研究各地工作的具

体内容，善于领导，使群众斗争有广大发动，而又适可而止，做到有理、有利、有节。

《纠正群众工作中错误的几个问题》（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04页

不向国民党挑战，如国方向我“蚕食”或进攻，我必须坚决将其击退，收复失地，否则彼方得寸进尺，大内战将来得更快。但我必须坚守自卫立场，不向彼方主动进攻，纠纷发生，经过斗争之后由执行小组加以调处，使我处于有理有利之地位。

《力争东北停战及制止全国内战的对策》（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16页

鉴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个敌人不打倒，人民就不能解放，因此，我们一定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兴趣，因为他们和地主阶级有密切的联系。他们又是压迫和剥削工人的。因此，我们要同他们作斗争。但是，为了争取民族资产阶级跟我们一道反对帝国主义，对他们的斗争要适可而止，要有理、有利、有节。就是斗争要有道理，要有胜利的把握，取得适当胜利的时候要有节制。

《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35页

第八编

关于党的建设

目 录

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	(1847)
(一)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1847)
1. 中国共产党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列主义的指导下成立的	(1847)
2. 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和觉悟是产生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条件	(1848)
3. 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849)
4.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国家政治经济现象的结果，是人民的需要	(1850)
5.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的历史改变了方向	(1851)
(二) 党的领导是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1852)
1. 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	(1852)
2. 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只能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	(1853)
3.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在长期实践中的选择	(1865)
4. 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	(1868)

- (三)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 (1871)
- 二、党的性质、宗旨和指导思想 (1875)
- (一)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1875)
- (二)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 (1876)
1.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最大利益和整个中华
民族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为人民为民族谋
利益的政党 (1876)
 2. 中国共产党要代表民族和人民的要求，
就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1880)
 3. 中国共产党要为建立民族和人民的
新文化而奋斗 (1881)
 4. 中国共产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883)
- (三)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
主义 (1885)
1.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1885)
 2.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是
普遍真理 (1886)
 3.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 (1888)
 4.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1888)
- 三、党的纲领和路线 (1889)
- (一) 党的纲领 (1889)
1. 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最低纲领是实现新民主主义 (1889)
 2. 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 (1891)

- 3. 要实现党的远大目标，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 (1893)
- (二) 党的路线 (1895)
 - 1.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1895)
 - 2. 党是在同“左”右倾错误路线斗争中巩固和发展的 (1898)
- 四、党的建设的意义 (1902)
 - (一) 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着的 (1902)
 - (二) 建设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伟大的工程 (1905)
- 五、党的思想建设 (1910)
 - (一) 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解决思想入党问题 (1910)
 - (二) 要建设大党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武装党员、干部 (1913)
 - (三) 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1918)
 - 1. 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1918)
 - 2. 反对宗派主义、本位主义、地方主义和山头主义 (1918)
 - 3. 反对党八股 (1926)
 - 4. 反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 (1929)
 - (四) 反对党内“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 (1934)
 - 1. “左”右倾错误的特征、表现及危害 (1934)
 - 2. “左”右倾错误产生的根源 (1941)
 - 3. 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左”，也反右 (1947)
 - (五) 开展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 (1953)
 - (六) 整风 (1956)

1. 整风是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 (1956)
 2. 整风是为了转变思想和作风, 增进党的团结和统一, 推进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 (1958)
 3. 整风的主要对象是高中级干部, 特别是高级干部 (1964)
 4. 整风的方法 (1965)
 - 坚持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 (1965)
 - 坚持团结——批评——团结, 既要弄清思想, 又要团结同志 (1968)
 5. 整风的意义 (1974)
- 六、党的组织建设 (1979)
- (一) 坚持党的根本组织制度民主集中制 (1979)
 1. 民主集中制就是民主和集中的统一, 自由和纪律的统一 (1979)
 2. 集中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 要充分发扬民主, 反对压制民主 (1980)
 3. 民主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1991)
 - (二) 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 (1993)
 1. 党内的团结党同人民的团结是争取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最基本条件 (1993)
 2. 团结是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 (1999)
 3. 全党必须团结在中央的周围 (2000)
 4. 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及犯过错误的同志一道工作 (2001)
 5. 创造团结和睦的条件和气氛, 各方面干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帮助 (2002)
 6. 巩固党的团结与统一, 反对分裂, 反对搞

- 阴谋诡计 (2014)
- (三) 严格党的纪律 (2015)
1. 党的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增强党的团结
与统一的重要保证 (2015)
 2. 加强对党员的纪律教育, 提高组织纪律性 (2017)
 3. 党内最重要的纪律是个人服从组织, 少数
服从多数, 下级服从上级, 全党服从中央 (2018)
 4. 严肃党纪, 对党员要执行比群众更加严格
的纪律 (2019)
 5. 健全请示报告制度, 加强集中统一, 反对
无纪律无政府状态 (2020)
- (四) 发展和整顿党的组织, 加强基层组织
建设 (2027)
1. 为了战胜敌人, 建设新中国, 共产党必须
发展自己的组织 (2027)
 2. 为纯洁党的队伍, 必须整顿党的组织 (2031)
 3. 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2034)
- (五) 健全党委制 (2035)
1. 要贯彻民主集中制, 必须加强党的集体领导 (2035)
 2. 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的重要制度; 实行
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结合 (2038)
 3. 党委书记要当好“班长”, 充分发挥党委
“一班人”的作用 (2040)
- (六) 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 (2041)
1.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 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2041)
 2. 坚持任人惟贤的路线、政策和德才兼备的
干部标准 (2044)

3. 干部要又红又专 (2045)
4. 领导干部要努力成为无产阶级政治家 (2048)
5. 善于识别和使用干部 (2049)
6. 爱护和关心干部 (2050)
7. 教育和培养干部 (2052)
8. 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 (2054)
9. 审查干部，纯洁队伍 (2061)
10. 清除、撤换腐化了的分子和实在不行的
干部 (2068)
- (七) 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原则 (2070)
 1. 党的中央委员会要由能够实行党的代表
大会路线的同志组成，要反映各方面的
革命力量 (2070)
 2. 中央委员会应该包括各种人才，将来应有
许多工程师、科学家 (2072)
 3. 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承认并决心改正错误
还可以入选 (2074)
- (八) 组织工作要服从和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
和中心工作 (2077)
- 七、党的作风建设 (2079)
 - (一) 党的三大作风 (2079)
 - (二) 理论联系实际 (2080)
 - (三) 密切联系群众 (2080)
 - (四) 批评和自我批评 (2080)
 1.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强党
的战斗力的武器 (2080)
 2. 对自己的缺点错误要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 (2084)

-
3. 正确对待批评，正确开展批评 (2086)
- 八、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 (2092)
- (一) 共产党员的理想和信念 (2092)
- (二) 共产党员的立场 (2094)
1. 必须站在党的立场，也就是站在无产阶级
和人民大众的立场 (2094)
2. 不要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对待人民 (2096)
- (三) 共产党员的品格 (2097)
1. 襟怀坦白，忠心耿耿，个人利益服从党的
利益 (2097)
2. 顾全大局，一切从全党利益出发 (2099)
3. 脚踏实地，无所畏惧，立志改革 (2100)
4.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2102)
5. 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怕困难，勇于牺牲 (2103)
6. 独立思考，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2111)
7. 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 (2114)
8.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2114)
- (四) 共产党员要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的世界观 (2116)
- (五) 共产党员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
起来 (2117)
- (六) 关于党性与个性问题 (2119)
- 九、执政党建设中的几个问题 (2124)
- (一) 坚持“两个务必” (2124)
1. 革命胜利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
更艰苦 (2124)
2. 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

- 的作风 (2125)
3. 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2132)
- (二) 坚持反腐倡廉 (2136)
1. 反腐败是一场严重的长期的斗争 (2136)
2. 厉行廉洁政治, 反对贪污和浪费, 依法
严惩腐败行为 (2139)
- (三) 坚持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 (2146)
1. 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是党和政府在
长时期内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2146)
2. 领导干部要打掉官风, 以普通劳动者的
姿态出现 (2159)
- (四) 加强对党和党员、干部的监督 (2161)
1. 共产党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2161)
2. 党内任何人都要接受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
监督 (2162)
3. 共产党要接受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的监督 (2164)
- (五) 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 (2165)
- 十、同外国共产党的关系 (2167)
- (一) 维护和加强同各国共产党的团结 (2167)
- (二) 坚持平等协商, 反对搞父子关系 (2168)
- (三) 革命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 必须从本国
实际出发处理自己的事情 (2171)

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

（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1. 中国共产党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列主义的指导下成立的

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发生的。十月革命对世界的觉醒，对中国的觉醒，影响是很大的。五四运动时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有了觉悟，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一年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3页

中国共产党是产生在“五四”之后，五四运动又是产生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的号召之下组织起来的，是共产国际派人来帮助组织的，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有国际代表到会。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3—404页

整个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性的大战，是在一九一四年发生的，……这次战争是破坏的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是损

害人类利益的战争，是抢夺市场的战争，这是它的消极方面。但是它也产生了积极的方面，就是出现了俄国十月革命，在很多国家中产生了共产党，很多国家的无产阶级产生了自己的先锋队，我们中国就是一个。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8—289页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一九一九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1页

2. 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和觉悟是产生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条件

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72—673页

虽然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乃是由于中国本身有了觉悟的工人阶级，中国工人阶级自己创造

了自己的党——中国共产党。

《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0页

中国工人阶级,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开始以自觉的姿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而斗争。一九二一年,产生了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使中国的解放斗争进入了新阶段。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81页

3. 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99—700页

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4页

4.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国家政治经济现象的结果，是人民的需要

十年前并没有八路军，因为两党破裂才出来了一个八路军，以此推知即使今天把八路军解散，甚至把共产党解散，谁能担保中国境内不再出一个八路军，不再造一个共产党？要知这些东西不是凭空发生的，并非真如某些人们的见解是若干共产党领导分子从心所欲造出来的，或真是所谓“不合国情”的，而实实在在是国家政治经济现象的结果。

《给范长江的信》（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93页

其实，他们所谓只有三民主义与国民党为适合国情，乃是最不适合国情的假三民主义与假国民党，而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乃是完全适合国情的。

《反投降提纲》（一九三九年六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20页

中国已经有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这是和古代不同的。由于这一点，中国已经有了新的阶级和新的政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0页

二十二年前我们什么也没有，二十八年甚至连共产党也没有。为什么过去没有的东西今天会有呢？就是因为人民需要。从前我当小学教员时，只是靠教书吃饭，没有想到要搞共产党，共产党是后来因为人民需要才成立的。

《依靠群众办好铁路建设事业》(一九四九年七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05—306页

5.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的历史改变了方向

一九〇三年产生了布尔什维克，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就使得全世界历史改变了方向。一九二一年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就改变了方向，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改变了方向。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97页

中国共产党就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57页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14页

（二）党的领导是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1. 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

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页

我们欲革命成功，必须势力集中行动一致，所以有赖于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党来发号施令。

《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5页

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7页

为什么要有革命党？因为世界上有压迫人民的敌人存在，人民要推翻敌人的压迫，所以要有革命党。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

义时代说来，就需要一个如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人民要想推翻敌人的压迫，简直是不可可能的。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11页

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57页

中国和俄国的历史经验证明：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要有一个成熟的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0页

2. 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只能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立即积极参加民主革命，站在民主革命的前头。无产阶级代替资产阶级的地位，无产阶级政党代替资产阶级政党的地位，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二）》（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党的文献》1992年第4期

在工农兵苏维埃时候，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再失败。

为中共湖南省委起草的给中共中央的信（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日），《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第 211—212 页

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48 页

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的惟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建立，大区域产业支部之创造，正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最大任务，但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之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成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沉溺于农村游击主义是最大的错误，但畏惧农民势力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不得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 1 卷第 55 页

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

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0页

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使用的拆台政策，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7页

自一九二四年开始的中国革命战争，已经过去了两个阶段，即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阶段和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的阶段；今后则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这三个阶段的革命战争，都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中国资产阶级虽然在某种历史时机可以参加革命战争，然而由于它的自私自利性和政治上经济上的缺乏独立性，不愿意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彻底胜利的道路。中国农民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是愿意积极地参加革命战争，并愿意使战争得到彻底胜利的。他们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然而他们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业群众则具有无政府思想），所以他们不能成为战争的正确领导者。因此，在无产阶级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时代，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责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在这种时候，任何的革命战争如果没有或违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

败的。因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因此，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话），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183—184页

一九二七年至现在的土地革命战争，是在新的情况之下进行的。战争的敌人不但是帝国主义，而且是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联盟。民族资产阶级则做了大资产阶级的尾巴。领导这个革命战争的惟有共产党，共产党已经形成了对于革命战争的绝对的领导权。共产党的这种绝对的领导权，是使革命战争坚持到底的最主要的条件。没有共产党的这种绝对的领导，是不能设想革命战争能有这样的坚持性的。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184页

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而且继续领导着轰轰烈烈的光荣的胜利的革命战争。这个战争不但是解放中国的旗帜，而且是具有国际的革命意义的。世界的革命人民的眼睛都望着我们。在新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上，我们将引导中国革命走向完成，也将给东方和世界的革命以深刻的影响。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185—186页

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既然退出革命，而且投靠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变为人民的敌人，则革命的动力便只剩下了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政党，便只剩下了共产党；革命的组织责任，便不得不落在惟一的革命政党共产党的肩上。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60页

在某种历史环境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制度的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它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就要动摇变节，这一规律，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证明了。因此，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并且只有充分发扬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坚持性和彻底性，才能克服资产阶级的那种先天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而使革命不至于流产。……依现时的情况说来，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在今天，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还带着很多的被动性和保守性，对于共产党发起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长久的时期中表示不敢接受，就是证据。这种情况，加重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责任。抗日救国的总参谋部的职务，共产党是责无旁贷和义不容辞的。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61—262页

党在十五年中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有了它的伟

大的成绩。这是第一点。

党在今后还要并且能够继续与发展过去的英勇坚决的精神，领导中国革命走到胜利的目标，我们有此自信心。这是第二点。

《关于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一九三七年六月三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505页

拿从辛亥革命开始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的情形来看，也有了若干特殊阶段。特别是在资产阶级领导时期的革命和在无产阶级领导时期的革命，区别为两个很大不同的历史阶段。这就是：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根本地改变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农民革命的大发动，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彻底性，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时期不可能出现的。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14—315页

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远的如辛亥革命，因为那时还没有无产阶级的自觉的参加，因为那时还没有共产党，所以流产了。近的如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这时有了无产阶级的自觉的参加和领导，因为这时已经有了共产党，所以能在一个时期内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又因为大资产阶级后来背叛了它和无产阶级的联盟，背叛了共同的革命纲领，同时也由于那时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还没有丰富的革命经验，结果又遭到了失败。抗日战争以来，因为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所以团结

了全民族，发动了和坚持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45页

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论就其斗争阵线（统一战线）来说，就其国家组成来说，均不能忽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地位。谁要是想撇开中国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就一定不能解决中华民族的命运，一定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问题。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所要造成的民主共和国，一定要是一个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其中占一定地位起一定作用的民主共和国。换言之，即是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联盟的民主共和国。这种共和国的彻底完成，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有可能。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49页

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的。而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51页

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

够担负的。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52页

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实行,则是中国共产党单独进行的。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72—673页

中国工人阶级,二十年来,在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展开了英勇的斗争,成了全国人民中最有觉悟的部分,成了中国革命的领导者。

《〈中国工人〉发刊词》(一九四〇年二月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27页

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一切对于共产党的污蔑,其目的都在使抗战失败,以利投降。

《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4—805页

我们要有一个团结的队伍去打倒我们的敌人,争取胜利,而队伍中间最主要的、起领导作用的,是我们的党。没有我们的党,中国人民要胜利是不可能的。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7页

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97—1098页

六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坚决实行了对农民、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甚至于对地主的领导权。在我们解放区搞减租减息、交租交息，地主也跟着我们走。由于坚决实行了这样一个领导权，我们发展了军队、解放区和我们的党。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14页

在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达到高潮的时期，我党领导机关的投降主义分子，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败。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反对了和这种投降主义思想相类似的思想，即是对于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让步，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扩大人民的军队，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我党对于这样一种软弱无能的腐朽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决地执行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治路线，坚决地扩大了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这样，就不但保证了我党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保证了我党在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战争时期，能够顺利地不受损失地转变到用人民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反革命战争的轨道上，并在短时期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些历史教训，全党同志都要牢记。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57—1258页

中国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有长期的革命斗争的经验。这种革命斗争经验的集中表现，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建设新国家的伟大的领导能力。

《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60页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由于受到几重敌人的压迫，得到了锻炼，具有了领导中国人民革命资格。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0页

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多次领导过革命，都失败了，就是明证。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9页

党是有能力领导全国人民进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我们党已经胜利地领导了一个伟大的人民民主革命，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人民民主专政，也就一定能够领导全国人民，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于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22—423页

我们必须相信：（1）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2）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两点是事物的本质和主流。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30—431页

应该肯定，我们的中央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我们的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我们的党能够领导民主革命，这已经在历史上证明了，又能够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现在也证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胜利了。

《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03—104页

共产党有强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在我们的工作中尽管有缺点，有错误，但是每一个公正的人都可以看到，我们对人民是忠诚的，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同人民在一起把祖国建设好，我们已经得到巨大的成就，并且将继续得到更巨大的成就。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1页

他们违背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诺言，他们企图摆脱这种领导。而只要没有这种领导，社会主义就不能建成，我们民族就要受到绝大的灾难。

《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73页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03页

中国的民主革命，可以说是几个政党联合进行的，但是以共产党为首。中国有两次革命：一九四九年以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解决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统治的问题，那时我们没有触动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后一次革命，想必你也知道，就触及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以及个体手工业与个体农业的所有制。对这些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经过了几个步骤。后一次革命经过几年，已基本完成。这两次革命，都是以共产党为领导进行的。

《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一九五九年二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页

落后的国家能够变为先进的国家，……只要一个国家变成团结的国家，只要这个国家有先进的领导，不要很长的时间，有几十年的时间就可以翻过来了。要超过世界最强大的美国，尽多一百多年，也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胜于资本主义制度，我们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优胜于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资本主义需要三百多年才能发展到现在这

样的水平，我们肯定在几十年内，至多在一百多年内，就可以赶上和超过它。

《对林彪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63页

3.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在长期实践中的选择

中国蕴藏着极其巨大的潜力，这些力量，在一个伟大的斗争的时期是能够组织起来投到强大的抗日战线上去的。在一九二七年以来反革命发动的长期内战中，中国人民早已对这股力量有了很多认识，并且找到了一个依靠共产党来领导它斗争的好办法。

《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一九三六年七月、九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00页

中国共产党是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战争，在十五年的长岁月中，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革命战争的最前线。

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亿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的历史成就，使得今天处在民族敌人侵入的紧急关头的中国有了救亡图存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有了一个为大多数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长时间内考验过因此选中了的政治领导者。现在共产党说的话，比其他任何政党说的话，都易于为人民所接受。没有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十五年间的艰苦奋斗，挽救新的亡国危险是不可能的。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84—185页

中国共产党从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已经二十四年了，其间经过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这样三个英勇奋斗的历史时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到了现在，我们的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中国的重心不在任何别的方面，而在我们这一方面。

《两个中国之命运》（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27页

由于在抗战时期正确地执行了我们党的路线，坚决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敌人，建设新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抗日战争，就把国民党挤到了那样一个地位，即影响低落，势力缩小，而把我们党放在了这样一种地位，即成为抗日救国的重心，全国广大的人民都拿眼睛望着我们。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15页

中国没有单独代表农民的政党，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没有坚决的土地纲领，因此，只有制订和执行了坚决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认真奋斗、因而获得最广大农民群众作为自己伟大同盟军的中国共产党，成了农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领导者。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75页

和国民党相反，中国共产党不但在解放区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信任；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民党控制的大城市，也得

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如果说，在一九四六年，在蒋介石统治下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还有一部分人怀着所谓第三条道路的想法，那末，在现在，这种想法已经破产了。由于我党采取了彻底的土地政策，使我党获得了比较抗日时期广大得多的农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由于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蒋介石的压迫和我党坚决保护群众利益的正确方针，我党获得了蒋介石统治区域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的同情。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56—1257页

现在有许多人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寄托在人民解放军身上。最近看到外面的报刊如《观察》杂志上有文章这样说：“假如二十年来的统治，不是如此腐败无能，何致使许多人觉得前途茫茫，中心彷徨，转而寄托其希望于共产党？”傅斯年到过延安，他骂宋子文，在文章中说：世界上出了怪事，哪有资本家拥护共产党？硬是宋子文搞的。宋子文是封建买办阶级的一个代表。去年春天有个人写文章，说：现在全国人民对现政权可谓人人离心，个个厌恶。秋天这个人又写文章，说蒋介石和中国现政府业已失去民心，如在太阳底下的影子。周副主席到上海，很多资本家请他吃饭。我们丢了张家口，有资本家掉了眼泪，共产党的张家口竟然跟资本家的眼泪发生了关系。对这些资本家，还有像西安大华纱厂的资本家，我们把他们放在中产阶级范围内，要跟他们合作。他们跟帝国主义联系很少或者没有联系，跟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有区别，并且受着官僚资本的压迫。现在中间阶层有许多人找不到出路，把希望寄托

在我们身上。

《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2页

中国革命的怒潮正在迫使各社会阶层决定自己的态度。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大群大群的人民正在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革命阵营一方面来，中国反动派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人民解放战争愈接近于最后胜利，一切革命的人民和一切人民的朋友将愈加巩固地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坚决地主张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彻底发展革命势力，一直达到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实现统一的民主的和平。

《将革命进行到底》（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78—1379页

4. 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5页

无产阶级怎样经过它的政党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呢？首先，是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例如我们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这样的基本口号，又提出了“停止内战”、“争

取民主”、“实现抗战”的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没有这种具体目标，是无所谓政治领导的。第二，是按照这种具体目标在全国行动起来时，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应该提起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共和国的一切任务而奋斗时，共产党员应该作到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会情况，依靠群众的多数，得到群众的拥护。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62—263页

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来，阶级的专政与党的专政是有分别的东西，党只是阶级的最觉悟的一部分人的组织，党应当而且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起领导作用，党不应当而且不能代替阶级去实行专政。

同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的谈话(一九三八年二月二日)，《解放》第31期

所谓共产党对工农的领导，可以分为政治上的领导与组织上的领导两方面。像在陕甘宁边区和在华北八路军的游击区，这些地方的工人农民，共产党不但在政治上领导着，而且组织上也领导了。其他区域，在有共产党组织的地方，那些地方的工人农民，凡是赞成共产党的主张，他们就是接受了共产党的政治上的领导，如果已经组织起来了，那末，也已有了组织上的

领导。

《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44—245页

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一九四〇年三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42页

在这里,我们要讲清领导的性质。什么叫做领导?它体现于政策、工作、行动,要在实际上实行领导,不要常常叫喊领导。常常叫喊领导,人家不愿听,就少说些。对领导权要弄清其性质,而不要天天像背经似地去念。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28页

党中央及各级党委对政府、对财经工作、对工业建设的领导责任是:(一)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都必须统一由党中央规定,制定党的决议、指示,或对各有关机关负责同志及党组的建议予以审查批准;各中央代表机关及各级党委则应坚决保证党中央及中央人民政府一切决议、指示和法令的执行,并于不抵触中央决议、指示和法令的范围内,制定自己的决议或指示,保证中央和上级所给任务的完成。(二)检查党的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情况。

《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责任》(一九五二年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52页

（三）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

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83—184页

所谓屈服，别的政治集团怎么讲，我不知道，说到共产党，那末，从它诞生的一天起，它就是一个独立的政党，从来也没有一天、半天、一小时或者一分钟放弃过它的独立性，从来也没有向什么个人或什么集团或什么党派屈服过。要共产党屈服，这大概是比上天还要困难些吧？

《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40页

中国共产党在其诞生之时，即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并根据此种纲领在各个时期规定了各种具体实施的政策。二十二年中，全体党员和全国广大的人民群众在一道，为着实现此种纲领与政策，为着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为着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流血牺牲，前仆后继，举行了轰轰烈烈英勇顽强的斗争。不管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难，他们总是坚决前进，绝不徘徊，绝不畏缩，终于使全国人民从黑暗中找到光明，从绝路中找到生

路。二十二年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我党奋斗的方向，是使中华民族起死回生的完全正确的方向，并将在今后的历史实践中继续坚持下去，直到完全胜利而后已。

《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一九四三年七月二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6—47页

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在这二十四年之中,经过共产主义的小组,经过北伐战争,轰轰烈烈壮大起来了。但中间被人家拦腰一枪打在地上,爬将起来又和他打,叫做土地革命。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主要是北伐战争,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是国内战争,一九三七年至现在是八年抗日战争。……这二十四年我们就是这样走的:七年是从建党到北伐战争,十年国内战争,八年抗日战争。我们党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2页

我们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政党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觉悟,最有预见,能够看清前途。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97页

我们党是一个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这是全世界公认的。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6页

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革命是伟大的革命，我们的建设事业是伟大的建设事业。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8页

在七次大会以来的十一年中，我们在一个地广人多、情况复杂的大国内，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在两个革命的实践中，证明了从七次大会到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14页

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这是必须肯定的。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4页

共产党被人们认为最有纪律，最有道德，具有最适合人民愿望的路线和政策，……

《关于反华问题》（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二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93页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50页

领导我们革命事业的核心是我们的党。这次大会总结经验，首先要使全党更加团结。我们党，到六月为止，有一千零七十三万党员。对这一千多万党员，要进行广大的教育工作、说服工作、团结工作，使他们在人民中间更好地起核心的作用。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7—88页

我们的党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14—115页

二、党的性质、宗旨和指导思想

（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18页

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战斗部队。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7页

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

《论鲁迅》（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2页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无产阶级里头出了那样一部分比较先进的人，组织成一个政治性质的团体，叫共产党。共产党里当然还有别的成分，有别的阶级如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有别的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但出身是一回事，进党又是一回事，出身是非无产阶级，进党后是无产阶级，他的思想、他的行为要变成无产阶级的。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05—306页

(二)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最大利益和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为人民为民族谋利益的政党

共产党人决不将自己观点束缚于一阶级与一时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热忱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

《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83页

共产党现在是忠诚地为建立统一战线而合作，并更为它的扩大与加强而努力。这种态度与政策，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因为这是代表了中国工农大众的最大利益，也是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共产党坚决地持守它的方针，一定要为实现它的方针而努力奋斗。

《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让步》（一九三七年），《党的文献》1995年第4期

我们要使得男子没有痛苦，女子也没有痛苦，大家都没有痛苦，大家有饭吃，大家有衣穿，大家有工做，把中国革命搞到彻底的胜利。这是共产党中央的号召与主张，我们全国的共产党员，不论男女，都赞成这种主张，拥护这种主张，并为这种主张的实现而奋斗。希望全国男女同胞都要为实现这种主张而奋斗，我们共产党人是永远站在争自由与争平等的人们一起的。

《妇女们团结起来》(一九三九年三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70页

在党外要深入地宣传中共二十年来的历史,是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历史。它最忠实地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

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的指示》(一九四一年六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140页

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9页

国事是国家的公事,并非一党一派的私事。共产党的惟一任务,就在团结全体人民,奋不顾身地向前战斗,推翻民族敌人,为民族与人民谋利益,绝无任何私利可言。

《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一九四二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95页

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

《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9页

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他们生根于人民之中,他们是人民的儿子,又是人民的教师,他们每时每刻地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他们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

此他们就能获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

《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一九四三年七月二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7页

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的党是人民的代表，我们要使人民觉悟，使人民团结起来。

《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一九四三年八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58页

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

《切实执行十大政策》(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71页

我们的党员在中国人口中当然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只有当这一小部分人反映大多数人的意见，并为他们的利益而工作时，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才是健康的。

《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86—187页

中国共产党在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二十四年中，创造了这样的地位，就是说，不论什么政党或社会集团，也不论是中国人或外国人，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如果采取不尊重中国共产党的意见的态度，那是极其错误而且必然要失败的。过去和现在都有这样的人，企图孤行己见，不尊重我们的意见，但是结果都行不通。这是什么缘故呢？不是别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意见，符合于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中

国人民的最忠实的代言人，谁要是不尊重中国共产党，谁就是在实际上不尊重最广大的中国人民，谁就一定要失败。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1087页

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1096页

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同志们，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当了人民的代表，必须代表得好，……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28页

应当说，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打仗，是为人民求解放；和平解放，团结改造，也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同绥远负责人的谈话》（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0页

我们的方向就是人民的方向，这是载于宪法的。

《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八日），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58页

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

《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一九六八年），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581页

2. 中国共产党要代表民族和人民的要求，就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

《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46—147页

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1079页

3. 中国共产党要为建立民族和人民的新文化而奋斗

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63页

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

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97—698页

“中国共产党是在二十年代初期，在俄罗斯革命的思想推动之下建立起来的”。艾奇逊说对了。这种思想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思想，和艾奇逊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的“为以往的侵入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相比较，不知要高出几多倍。其明效大验，就是和中国旧的封建主义文化相比较可以被艾奇逊们傲视为“高度文化”的那种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要打败仗。被中国人民学会了的科学的革命的新文化，第一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第二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又一名走狗蒋介石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对于中国红军的拦阻，第三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第四仗最后地结束了美国和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及其走狗蒋介石等一切反动派的统治。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14—1515页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16页

4. 中国共产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77页

为群众服务,这就是处处要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也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

《论合作社》(一九四三年十月),《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解放社1944年1月订正再版第242页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为人民服务》(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04页

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如果我们改正了这个缺点,那我们就能团结更广大的人民,我们的事业就能获得更大的与更快的发展。

《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
第3卷第243页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惟一的宗旨。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1039页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1094—1095页

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

《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一九五七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5页

品德就是忠实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一九五八年五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202—203页

我们是共产党，是要帮助人民的。如果不帮助人民，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没有人民就会垮台。

《同卡翁达、布迈丁谈话内容的通报》(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380—381页

(三)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1.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致罗璈阶信》(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54页

在全党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64页

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86页

我们党走过二十八年了,大家知道,不是和平地走过的,而是在困难的环境中走过的,我们要和国内外党内的敌人作战。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69页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50页

2.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是普遍真理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3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17页

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20页

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1093页

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1094页

我们的前人没有料到世界会发生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样重大的历史事变，更没有料到中国会进步到有共产党领导的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样的队伍，同时他们也没有料到中国革命会这样长还没有胜利。他们那时在敌人压迫面前只是开始起来反抗，至于下文如何，我看是还没有考虑成熟。不像我们现在开七大这样，对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对当前的形势和前途都有明确的认识，因此我们有巩固的信心。我们的前人没有预料到这些，也不能怪他们，他们那时还没有革命的社会科学、还没有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我们是用科学社会主义武装头脑的人，看清楚社会前途的人，我们比他们进步，我们要完成他们没有完成的事业。

《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演说》（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35页

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

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0页

3.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参见第一编“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第204—208页）

4.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参见第一编“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第209—213页）

三、党的纲领和路线

（一）党的纲领

1. 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是实现新民主主义

我们不但要完成民主革命，而且要使革命转变到将来的社会主义方向去！我们不但要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要消灭地主阶级，而且现在就要准备着，准备到了将来，到了适当的时期，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像苏联现在所做的一样，最后还要进到共产主义，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办法，进到最自由光明伟大的世界去。只有到了这种时候，才是人类最后的解放，才是人类最后的胜利！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闭幕词（一九三四年二月一日），《红色中华》二苏大特刊第7期

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政治经济纲领。其最高的纲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和三民主义有区别的。其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亦比国内任何党派为彻底。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59页

共产主义是在革命发展的将来阶段实行的，共产主义者在现在阶段并不梦想实行共产主义，而是要实行历史规定的民族革命主义和民主革命主义，……

《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67—368页

中国目前阶段一定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即彻底战胜日寇与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将来阶段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即实现更进步的更完满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给施方白的题词（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二日），《毛泽东题词墨迹选》第2页

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为此而奋斗，绝对不能半途而废。……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51—652页

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共产党是有现在的纲领和将来的纲领，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分的。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86页

共产主义于民主革命阶段之外，还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因此，于最低纲领之外，还有一个最高纲领，即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纲领。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88页

中国革命要完成什么任务呢？中国共产党到底要办什么事情呢？就是要办两件事，要换两回朝。

第一，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改变为民主主义社会，即新民主主义社会。……

……

第二，共产党还要办一件事，还要换一个朝，就是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社会。

《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一九四三年八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56—58页

2. 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

凡是愿意为人类解放事业奋斗而又真正研究和懂得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人，一定会承认马克思主义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最高的理想，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共产主义社会是全人类最美满最愉快最幸福的社会，绝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

同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的谈话（一九三八年二月二日），《解放》第31期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

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86页

马克思主义宇宙观教给我们，要懂得将来还要进步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来还要进步，直到阶级没有了，政党也不要了，共产党、国民党一概不要，八路军、新四军也不要了。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9页

只有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高度的发展，并使共产主义的制度得以建立起来之后，就是在建立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制度之后，社会上一切人们生活上的平等才可能实现。

修改“新华社信箱”《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加写的文字（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在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稿上加写的话》（一九五八年八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360页

3. 要实现党的远大目标，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

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义者不相同的。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6页

在中国，任何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同时具有现时实际任务与将来远大理想两种责任的。并且应该懂得：只有现时的实际任务获得尽可能彻底的完成，才能有根据有基础地发展到将来的远大理想那个阶段去。所谓将来的远大理想，就是共产主义，这是人类最美满的社会制度，……

《论新阶段》（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27—628页

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最后解放，只能在社会主义实现的年代，中国工人阶级必须为此最后目的而奋斗。但是必须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阶段，才能进到社会主义的阶段。所以，团结自己和团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当前的任务。

《〈中国工人〉发刊词》（一九四〇年二月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27页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或讥笑；对于这些，我们必须给以坚决的排击。对于那些善意的怀疑者，则不是给以排击而是给以善意的和耐心的解释。所有这些，都是异常清楚、异常确定和毫不含糊的。

但是，一切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中国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为着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使中国人民脱离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和建立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农民解放为主要内容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亦即孙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义性质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中国而奋斗。我们果然是这样做了，我们共产党人，协同广大的中国人民，曾为此而英勇奋斗了二十四年。

对于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如果不为这个目标奋斗，如果看不起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对它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

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59—1060页

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的东西，我们叫作社会主义。在这个阶段内，全党全民的任务是完成社会主义的建设。

《对〈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修改和信件》（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日、十二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513页

（二）党的路线

1.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一九二七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机会主义的时候，中国革命就重新发展了。后来，中国革命又受了敌人的严重的打击，是因为我们党内产生了冒险主义。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冒险主义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又重新发展了。由此看来，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3页

全党大多数干部，在过去几年，特别是在一九四八年，有系统地学会了在农村工作中，在城市工作中和在军事工作中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有系统地纠正了右的和“左”的偏向。许多同志在过去长时期内没有学会的东西，一个年头内都学会了。这样，就使党的总路线在全党内能够贯彻执行。这是一个最伟大和最根本的胜利。这是我党政治成熟程度的极大的增长。这样一件事就指明：我党在不要很久的时期内是能够有把握地取得全国政权的。

《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31—232页

二十二年的人民解放军的历史证明，只要坚持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保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完全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够打倒的，任何严重的困难都是能够克服的。

《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年的历史经验》（一九四九年七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53页

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490页

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三十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三万人，就是说，不到三十

万人的十分之一。究竟是那三十万人的军队强些，还是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强些？我们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过那样大的苦头，就得到锻炼，有了经验，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所以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比起过去那个三十万人的军队来，要更强些。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9页

为什么我们过去虽然犯了许多错误，把南方的根据地统统失掉，被迫举行一万二千五百公里的长征，但是没有被消灭掉，保存了一部分力量，继续搞革命，最后取得胜利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封建剥削、帝国主义剥削很厉害，这是客观原因，是经常存在的；另一个是主观原因，就是要是不克服一九三四年以前那种在党内占统治地位、把革命引向失败的教条主义的话，我们的革命早就垮台了。经过遵义会议，我们改变了错误的路线。终于我们这些人从少数变成了多数，党没有发生分裂。张国焘搞分裂，另外成立了一个中央委员会，当时就有了两个中央委员会，但我们终于还是克服了张国焘路线。红军原来有三十万人，经过万里长征，剩下不到三万人，不足十分之一。党员最初也有三十万左右，经过长征，只剩下几万。但是，这时我们不是更弱而是更强了，因为我们取得了经验教训，我们的路线比较正确了。

《毛泽东有关遵义会议的部分论述》（一九四五年五月——一九六四年三月），《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

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242页

2. 党是在同“左”右倾错误路线斗争中巩固和发展的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除了犯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两个错误之外，还犯过了下述的两个错误：其一，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的结果。这个错误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的遵义会议时纠正过来了。其二，是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发展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纪律，使一部分红军主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然而由于中央的正确领导，红军中党员和指挥员战斗员的觉悟，终于也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了。所有这些错误，对于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和战争，当然是不利的，然而终于被我们克服，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红军是从这些错误的克服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85页

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

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186页

党是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并且得到伟大的成绩，今后还要领导革命达于彻底的胜利，这是由于党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与斗争方法而得来的。党在过去犯过许多大的、小的、“左”的、右的、不合于马克思主义原则性的错误，党也从对这些错误的斗争中锻炼得更强些，革命成绩也从克服错误的斗争中得出来。现在还存在着将来也会要发生的错误，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给以解决与给以防止。这就是我们党的理论与实际的发展观。

《关于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一九三七年六月三日），《毛

泽东文集》第1卷第506—507页

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以前，我们党反对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李立三同志的“左”倾机会主义。由于这两次党内斗争的胜利，使党获得了伟大的进步。五中全会以后，又有过两次有历史意义的党内斗争，这就是在遵义会议上的斗争和开除张国焘出党的斗争。

遵义会议纠正了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性质的严重的原则错误，团结了党和红军，使得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转到了抗日的前进阵地，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由于巴西会议和延安会议（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是从巴西会议开始而在延安会议完成的）反对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全部红军会合一起，全党更加团结

起来，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斗争。这两种机会主义错误都是在国内革命战争中产生的，它们的特点是在战争中的错误。

.....

以上这些教训和成功，给了我们今后团结全党，巩固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一致，胜利地进行抗日战争的必要的前提。我们的党已经从两条战线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了。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0—532页

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也是在自己同各种错误路线作斗争的过程中使自己获得了锻炼，因此取得了伟大的革命胜利和建设胜利的。

《共产党人对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9页

他们当时的主要错误，就是教条主义，硬搬外国的经验。我们党清算了他们的错误路线，真正找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道路。因此，才有可能在第四个时期，在蒋介石进攻我们的时候，把蒋介石打倒，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33页

错误还是要犯的，不可能不犯，犯错误是正确路线形成的必要条件。正确路线是对错误路线而言，二者是对立的统一。正确路线是在同错误路线作斗争中形成的。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75页

我们党曾经犯过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使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就是同蒋介石合作的北伐战争遭到了失败。后来批评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武装斗争，但斗争中又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我们叫它教条主义的错误，后来又批评了这种错误。没有这些错误和纠正错误，就不能找到正确的道路，取得胜利。

《非洲是斗争的前线》（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64—465页

四、党的建设的意义

（一）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着的

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

《〈共产党人〉发刊词》（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05—606页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共产党人〉发刊词》（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06页

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当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着分裂统一战线的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会要后退一步。同样，当我们党正确地处理革命武装斗争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

确地处理这个问题时，那末，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也就会要后退一步。十八年来，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是这样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的。这一论断，很明显地，已经被十八年党的历史所证明了。倒转来说，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更正确地处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这一论断，也是很明显地被十八年来的党的历史所证明了。

《〈共产党人〉发刊词》（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05页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中国共产党的党的建设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在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中间发展起来和锻炼出来的。……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一定时期中同资产阶级联合，党就不能前进，革命就不能发展；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又如果我们党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不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武装斗争，同样党也就会瓦解，革命也就会失败。

《〈共产党人〉发刊词》（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08—609页

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游击战争，就不能了解我们的政治路线，也就不能了解我们的党的建设。我们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武装斗争。十八年来，我们党是逐步学会了并坚持了武装斗争。

我们懂得，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十八年来，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

《〈共产党人〉发刊词》（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09—610页

我们今天怎样建设我们的党？要怎样才能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个问题，考察一下我们党的历史，就会懂得；把党的建设问题同统一战线问题、同武装斗争问题联系起来看一下，把党的建设问题同联合资产阶级又同它作斗争的问题、同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联系起来看一下，就会懂得。

《〈共产党人〉发刊词》（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13—614页

十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

《〈共产党人〉发刊词》（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13页

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

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我们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我们曾和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右的和“左”的。凡在这三件事上犯了严重错误的时候，革命就受挫折。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80页

（二）建设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伟大的工程

党在十五年中造成与造成着革命的与布尔什维克的传统，这是我们党的正统，包括政治上的、组织上的、工作作风上的一切好的东西，这是不能否认的。没有这个传统，就不能说明为什么能够维持党，团结党，巩固党，克服党内错误，并同敌人作坚决战斗而得到革命的成绩，造成阶级及人民信任的大政党的地位。

《关于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一九三七年六月三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507页

过去我们党的队伍小，只有很少的党员，现在党员的数目也并不多，但现在担负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的任务，需要我们建设一个大党。……我们要建设的一个大党，不是一个“乌合之众”的党，而是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这样就要有大批的有学问的干部做骨干。这个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要时刻注意，我们要率领几万万人民革命，现在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

《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79页

这个党内刊物定名为《共产党人》。它的任务是什么呢？它将写些什么东西呢？它和别的党报有些什么不同呢？

它的任务就是：帮助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建设这样一个党的主观客观条件也已经大体具备，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

《〈共产党人〉发刊词》（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02页

在某种程度上说来，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全国性的党，也已经是一个群众性的党；而且就其领导骨干说来，就其党员的某些成分说来，就其总路线说来，就其革命工作说来，也已经是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和布尔什维克化的党。

那末，现在提出新的任务的理由何在呢？

理由就在：我们现在有大批的新党员所形成的很多的新组织，这些新组织还不能说是广大群众性的，还不是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还不是布尔什维克化的。同时，对于老党员，也发生了提高水平的问题，对于老组织，也发生了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和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的问题。党所处的环境，党所负的任务，现在和过去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很大的不同，现在的环境是复杂得多，现在的任务是艰巨得多了。

《〈共产党人〉发刊词》（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03页

党的组织已经从狭小的圈子中走了出来，变成了全国性的

大党。党的武装力量，也在同日寇的斗争中重新壮大起来和进一步坚强起来了。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更加扩大了。这些都是伟大的成功。然而，大批的新党员还没有受到教育，很多的新组织还没有巩固，他们同老党员和老组织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大批的新党员、新干部还没有足够的革命经验。他们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还不懂得或懂得不多。他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完全的统一的理解，还相距很远。在过去发展党的组织的工作中，虽然中央着重地提出了“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的口号，但实际上是混进了许多投机分子和敌人的暗害分子。统一战线虽然建立了并坚持了三年之久，可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却时时刻刻在企图破坏我们的党，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和顽固派所指挥的严重的磨擦斗争在全国进行着，反共之声喧嚣不已。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和顽固派，并想以此作为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分裂统一战线和拉了中国向后倒退的准备。大资产阶级在思想上企图“溶解”共产主义，在政治上、组织上企图取消共产党，取消边区，取消党的武装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任务，无疑是克服这种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险，尽可能地保持民族统一战线，保持国共合作，而争取继续抗日、继续团结和继续进步；同时，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不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遭受意外的损失。为达此目的，就要巩固党的组织，巩固党的武装力量，并动员全国人民，进行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的坚决的斗争。这种任务的完成，依靠全党的努力，依靠全体党员、党的干部、党的各地各级组织实行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斗争。

《〈共产党人〉发刊词》（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12—613页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共产党人〉发刊词》（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14页

我党各级领导机关和全体同志，应该提高对当前时局的警觉性，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的危害中国革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不致遭受意外的损失。

《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17页

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而中国共产党则从自己建党的一天起，就把这样的两重任务放在自己的双肩之上了，并且已经为此而艰苦奋斗了整整十八年。

这样的任务是非常光荣的，但同时也是非常艰巨的。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因此，积极地建设这样一个共产党，乃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52页

要完成这两个革命，就要造就一个真正符合这四条标准的

革命政党。我们党成立二十二年了，经历了三个革命时期，但还没有造就好，我们党还不统一，水平也还低。如果我们的党更统一了，水平更高了，那末可以断定，中国革命就不是像今天这个样子。二十二年的历史已经过去了，我们要从今天做起。我们办党校，就是要使我们同志的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提高一步，使我们党更加统一。中国的社会经济情况使得我们党里有很多的“剧团”，说得粗一点就是有好多“戏班子”。在一个班子里，不论是唱主角的，唱配角的，跑龙套的，他们都是很亲热的，并且有个原则：我这个班子可以批评你那个班子，但是你这个班子不可以批评我这个班子。这就叫宗派主义。我们党内有两种宗派主义，一种是教条主义的宗派主义，搬洋教条，夸夸其谈；还有一种是经验主义的宗派主义。我们在山头上斗争的时间很长了，十年内战时期共患难，现在又有六年抗战，这便结成了班子，各个班子的活动是不统一的，而且水平较低。但是我们的任务很艰巨，要进行两个革命，都要在我们手里完成。我们要把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提高，使我们党更统一，不结班子，结成一个大党。每一个人都能够不怕牺牲，能够无限忠心，能够联系群众，能够独立工作，能够遵守纪律，团结一致地坚决地向敌人斗争。

《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一九四三年八月八日），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60—61页

我们要不要胜利，要不要在全国胜利？如果要的话，就要有一个有纪律的、思想上纯洁的、组织上纯洁的党，合乎统一的标准党。

《时局问题及其他》（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61页

五、党的思想建设

（一）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 解决思想入党问题

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

《井冈山的斗争》（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77页

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担重大的斗争任务。因此，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94页

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

那一套？他们哪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因此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3卷第875页

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3卷第875—876页

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

《山东有可能成为战略转移的枢纽》（一九四二年七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35页

我们的党校里也有争夺领导权的一种斗争，就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中，主要的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例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散漫性、自发性这样一些东西。党校第一部的同志从

去年一直学到现在，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整顿三风，接受路线教育和马列主义教育，这是无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阶级在思想上争领导权。

《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一九四三年八月八日），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56—57页

作为党来说，作为领导思想来说，我们和农民要分清界限，不要和农民混同起来。这对于农民出身的同志可能不容易理解，“我就是农民，为什么不能和农民混同呢？”我说你现在叫做共产党员，农民是你的出身，出身和入党是两件事情，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是这一点要慢慢地搞清楚，一年搞不清楚，两年，两年搞不清楚，三年，……我说不要和农民混同，是说要把农民提高一步，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17—318页

我们党现在已有了一百二十一万党员。其中绝大多数是在抗日时期入党的，在他们之中存在着各种不纯正的思想。在抗日以前入党的党员中，也有这种情形。几年来的整风工作收到了巨大的成效，使这些不纯正的思想受到了很多的纠正。今后应当继续这种工作，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更大地展开党内的思想教育。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1094页

许多年来，特别是从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以来，我们在加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现在，比起整风运动以前，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已经

提高了一步。但是我们还有严重的缺点。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16页

共产党里头还是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些人组织上进了党，思想上还没有通，甚至有些老干部跟我们的语言也不一致。所以，经常要谈心，要个别商谈或者集体商谈，要开多少次会，做打通思想的工作。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91页

（二）要建设大党必须用马克思主义 基本理论武装党员、干部

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2—533页

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3页

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3页

发起学习运动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是我们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共产党在全国的党员过去是几万个,现在有几十万,将来会有几百万,这几十万、几百万共产党员要领导几千万、几万万人的革命,假使没有学问,是不成的,共产党人就应该懂得各种各样的事情。因此,要领导革命就须要学习,这是我们发起学习运动的原因之一。

其次,是工作中的缺陷迫切需要克服。现在我们的队伍里面发生了这样一个矛盾,就是我们的干部不学习便不能够领导工作。有些老干部,他们从前在其他部队里搞过一个时期,一切工作都是靠下命令;但是在我们红军里,单靠发命令就不行了。人家不听你,就打人,结果,工作就领导不起来,战士逃

跑的很多。在部队中发命令，这是威风，但光有威风而没有本领是无用的。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所有的干部，在有威风之外，还要有本领，这就要学习。现在我们的有些战士，他们识字比营长识得多，他们从前一个字也不认识，现在能认得五百、一千、二千、三千，能写短短的文章，登在墙报上。我们的营长、连长，在指导员上课的时候，不去听课，他们以为这课是战斗员听的，他们去听，未免要“失格”了！为了要维持“格”，结果，他们不但文章不会做，许多东西都不知道，战士反而比他们高明。因此，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下去就不成了，再开就一定要进货。我们干部的“进货”，就是学习本领，这是我们许多干部所迫切需要的。我们的干部要使工作做得好，就要多懂一点，单靠过去懂的一点还不够，那只是一知半解，工作虽然可以做，但是要把工作做得比较好，那就不行，要工作做得好，一定要增加他们的知识。无论党、政、军、民、学的干部，都要增加知识，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

现在看到我们的有些教员，他手里的一本政治常识，还是中央苏区时代出版的，他对这本书上的东西相当熟，因为大概他已教过七八十遍了，但是其他东西就不知道了，真是“两眼不看书外事，一心只管政治常”，他不知道结合新的形势把书上的东西加以进一步的发挥。在民众团体里，在军队中，在支部中，这种情形也有看到。我们现在要打破这种现状，改善我们的工作，就要加紧学习。

使学习成为迫切需要的第三点，是我们党的特点。过去我们党的队伍小，只有很少的党员，现在党员的数目也并不多，但

现在担负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的任务，需要我们建设一个大党。……

我们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学习是我们注重的工作，特别是干部同志，学习的需要更加迫切，如果不学习，就不能领导工作，不能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这领导工作、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便是我们学习运动的直接原因，我们六中全会关于学习运动的决议，是非常重要的。

《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77—179页

六中全会以后中央发起的全党干部学习运动，对提高全党干部的理论文化水平，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反投降提纲》（一九三九年六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24页

理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注意的太不够，今后应加紧理论研究。

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的讲话（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一日），《新中华报》1940年6月28日

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因此我们党内要学习理论。从前我在六中全会上讲过，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是很低的，现在比较过去是高了一些，但是还不够。现在我们党当然有些进步，但从中国革命运动的要求来说，我们的理论水平还不够。革命要求我们能说明中国的革命运动，说明这个运动的各个方面，说明它的内部联系，包括军事、政治、文化、经济，整个革命工作的各个侧面及其内部联系，并总结

经验，把它提高起来，使之条理化、系统化。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41—342页

我党的理论水平，必须承认还是低的，必须提高一步。这样大的党，在许多基本理论问题上或是不了解，或是不巩固，如划阶级就表现了我们党理论水平之低。党内有许多新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对许多基本观点不知道，对许多问题不会解释。……我们在理论上要提高，还要普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要当作一个政治任务来注意这个问题，……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一九四八年九月），《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37—138页

我们有些高级干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上也有不同的语言，原因是学习还不够。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41页

我们要作出计划，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我们现在有许多做理论工作的干部，但还没有组成理论队伍，尤其是还没有强大的理论队伍。而没有这支队伍，对我们全党的事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国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95—396页

在反唯心论的斗争中间，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干部队伍，使我们广大干部同人民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

《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论唯物论和无神论》第76—77页

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观察和处理国际斗争中的新问题。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0—201页

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每个省市自治区都要把理论工作搞起来，有计划地培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评论家。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三）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1. 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参见第一编“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第258—269页）

2. 反对宗派主义、本位主义、地方主义和山头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革命队伍中的幼稚病。坚持关门主义

策略的人们所主张的，就是一套幼稚病。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5页

地方主义是存在于地方游击队和地方政府中间的，他们往往只顾地方的利益，忘记全局的利益，或贪图分散活动，不惯集团生活。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33页

宗派主义现在也有。在延安，首长才吃得开，许多科学家、文学家都被人看不起。宗派主义是排挤非党干部的一种风气，即排外主义。同时也排内。闹独立性、不服从决议、没有纪律的现象，必须整顿。

《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4页

中央的决定及中央同志的演说，在另外许多同志中，并没有引起深刻的注意。其原因，或则是有些同志过去犯了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相当的严重，一时尚没有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不愿意作深刻的自我批评，不愿意迅速地改正自己的错误；或则是有些同志自以为过去并没有犯过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路线错误，因此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不知在他们自己过去与现在的思想中行动中，也曾有过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因素，也曾犯过某些错误。例如容易冲动，以感想代政策，对于敌、友、我三方情况懂得很少也安之若素，对客观事物缺乏科学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精神，而有自以为是的精神，这些便都是主观主义的错误因素。再则，例如在党内闹独立性，把发扬

独立工作能力、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这些正确的东西，与不服从上级、不服从多数、不服从中央、将个人与党对立、个人超过了党（个人突出）、个人英雄主义（与民族英雄主义、群众英雄主义相区别的）这些错误的东西，混淆起来。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上，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上，在本军干部与友军干部的关系上，在老干部与新干部的关系上，不注意互相帮助互相团结，而是一个轻视一个，甚至一个欺负一个。……许多地方既尚存在着各种不正常的内部关系，这些便都是宗派主义残余在党内的表现。至于党员与非党员，党的干部与非党干部之间的关系，则更加存在着非常之大的隔阂，不了解，不关心与轻视，而其责任则主要应由党员及党的干部担负之，……在党内与党外的关系上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宗派主义错误这一点，并未为一切或大多数同志所深刻注意，这是真确的事实。凡此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

《中宣部宣传要点》（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89—391页

由于二十年的锻炼，现在我们党内并没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派主义了。但是宗派主义的残余是还存在的，有对党内的宗派主义残余，也有对党外的宗派主义残余。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铲除这两方面的祸根，才能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和团结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21页

什么是党内宗派主义的残余呢？主要的有下面几种：

首先就是闹独立性。一部分同志，只看见局部利益，不看见全体利益，他们总是不适当地特别强调他们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总希望使全体利益去服从他们的局部利益。他们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们忘记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张国焘是向党中央闹独立性的，结果闹到叛党，做特务去了。现在讲的，虽然不是这种极端严重的宗派主义，但是这种现象必须预防，必须将各种不统一的现象完全除去。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21页

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要清除干净。要使我们全党的步调整齐一致，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我们一定要反对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22页

必须反对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本位主义的倾向。谁要是别人的困难不管，别人要调他所属的干部不给，或以坏的送人，“以邻为壑”，全不为别部、别地、别人想一想，这样的人就叫做本位主义者，这就是完全失掉了共产主义的精神。不顾大局，对别部、别地、别人漠不关心，就是这种本位主义者的特点。对于这样的人，必须加重教育，使他们懂得这就是一种宗派主义的倾向，如果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24页

局部和全体的关系，个人和党的关系，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关系，军队和军队、地方和地方、这一工作部门和那一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都是党内的相互关系。在这种种方面，都应该提高共产主义精神，防止宗派主义倾向，使我们的党达到队伍整齐，步调一致的目的，以利战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整顿党的作风，必须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我们如果不要主观主义，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就必须扫除党内宗派主义的残余，以党的利益高于个人和局部的利益为出发点，使党达到完全团结统一的地步。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25页

宗派主义的残余，在党内关系上是应该消灭的，在党外关系上也是应该消灭的。其理由就是：单是团结全党同志还不能战胜敌人，必须团结全国人民才能战胜敌人。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25页

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上，二十年来做了艰苦的伟大的工作；抗战以来，这个工作的成绩更加伟大。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所有的同志对待人民群众都有了正确的作风，都没有了宗派主义的倾向。不是的。在一部分同志中，确实还有宗派主义的倾向，有些人并且很严重。我们的许多同志，喜欢对党外人员妄自尊大，看人家不起，藐视人家，而不愿尊重人家，不愿了解人家的长处。这就是宗派主义的倾向。这些同志，读了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之

后，不是更谦虚，而是更骄傲了，总是说人家不行，而不知自己实在是一知半解。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25—826页

一切宗派主义思想都是主观主义的，都和革命的实际需要不相符合，所以反对宗派主义和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应当同时并进。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26页

现在比较严重的是山头主义。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1）小资产阶级的广大；（2）长期被分割的农村革命根据地；（3）思想教育的缺乏。这种东西相当妨碍我们内部的合作，在党、政、军、民关系上表现还很严重。长征过的老干部容易强调从军队来的力量，这也是有道理的，当年没有红军北上是不可能现在有这样大的力量，而只能进行游击战争。这一点，本地负责同志应向本地干部作解释。而南方来的负责同志也要向外来干部解释清楚，如果没有本地的干部和党组织及群众的基础，工作也是不能搞好的。……头一条，要说明红军干部有成绩。最初本地干部把八路军当作“神”，后来又认为一钱不值，现在要来一个否定之否定，就是说不是“神”，或者说是有点缺点的“神”。第二，外来干部同本地干部要多交谈，要了解当地历史，要与本地干部合作，在这方面要有自觉性。现在基础是本地同志，老干部要自觉地认识这一点。

《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95—96页

目前在我们党内严重地存在和几乎普遍地存在的乃是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例如由于斗争历史不同、工作地域不同（这一根据地和那一根据地的不同，敌占区、国民党统治区和革命根据地的不同）和工作部门不同（这一部分军队和那一部分军队的不同，这一种工作和那一种工作的不同）而产生的各部分同志间互相不了解、不尊重、不团结的现象，看来好似平常，实则严重地妨碍着党的统一和妨碍着党的战斗力的增强。山头主义的社会历史根源，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的特别广大和长期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根据地，而党内教育不足则是其主观原因。指出这些原因，说服同志们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觉性，打通同志间的思想，提倡同志间的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以实现全党大团结，是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

《学习和时局》（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40页

我们的根据地还是被敌人分割的，不是连成一个整体的。一个地方的革命党、革命军队起来打敌人，就很自然地形成各个集团、各个山头。所以我说山头主义是中国社会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特殊情形的产物，应该承认这个东西。要消灭这个东西，需要我们开办党校来分析，来讲清楚。但是，只有在将来全国胜利了，有了大城市，到处交通很便利，报纸能够销到全国，电讯能够通到各地，开会也很方便，那个时候才会彻底消灭山头主义。现在不仅我们党校讨论山头主义，延安各个机关也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提倡各个机关开会，曾经在各个根据地奋斗的人、各部分军队的人开会，检讨历史，进行自我批评加以分析，其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消灭山头，使它溶化，全党都变成一个整体。

《时局问题及其他》(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53页

我们要肃清山头主义,就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这样才能缩小山头,消灭山头。所以我们要承认有山头,不承认也不行,承认以后要照顾各个部分,各个集团,各个历史不同的部分、不同的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45页

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而不是山头。山头它有什么坏?清凉山有什么坏?太行山有什么坏?五台山有什么坏?没有。但是有了山头主义就不好。因此,对这些问题要分析,任何一块根据地中,也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有山头主义。山头主义的情绪,也有各种各样的程度上的不同,比如一、四方面军就有不同,一方面军里又有好几个部分,昨天傅钟同志讲了。有一、二、四方面军的区别,还有三军、七军、十军等的区别,因为在各个地方工作,情况不同,关系搞得不好,这就有山头主义倾向,但有些也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造成的。昨天傅钟同志讲了山内山外的关系,彼此间关系好,山头主义就可以消灭。但许多事情还带着盲目性,工作就做不好,这就要先分析一下。现在我们在这里搬石头,搞关系。现在我们来他一个总结性的办法,把大小石头纷纷搬开,这样关系就会好一点,山头就少了,山头主义也就少了,这样就搞掉了一半;再把相互关系搞好一点,那一半也没有了。有山头而没有主义,另外来一个主义叫做马克思主义,叫做山上的马克思主义。

《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63—364页

一定要认识山头。从前我们说要承认山头，承认世界上有这么一回事，或者讲认识山头更确当一点，要了解它。照顾也一定要照顾，认识了以后才能照顾，照顾就能够逐步缩小，然后才能够消灭。所以消灭山头，就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缩小山头，这是一个辩证关系。山头的关系搞好了，首先是山内的，然后是山外的，山头主义很快就可以消灭了，所以不要怕。将来许多年之后，全国铁路如网，飞机也比这几天来往的要多，那时，你再找山头就没有了。没有全国产业的发展、交通的便利，要彻底消灭山头主义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的革命发展了，根据地也更多了、壮大了，如果我們去掉盲目性，比较善于处理矛盾，那末问题就一定能够解决得比较好。

《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64页

对于有些在党外人士面前爱摆老爷架子，宗派主义作风极为严重的同志，应当认真地给以批评和教育，端正他们的态度和作风。

《对中央转发统战部关于加强地方政协工作意见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276页

3. 反对党八股

党八股是藏垢纳污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害人的，不利于革命的，我们必须肃清它。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27页

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

《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30页

一个人写党八股，如果只给自己看，那倒还不要紧。如果送给第二个人看，人数多了一倍，已属害人不浅。如果还要贴在墙上，或付油印，或登上报纸，或印成一本书，那问题可就大了，它就可以影响许多的人。而写党八股的人们，却总是想写给许多人看的。这就非加以揭穿，把它打倒不可。

《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30页

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我们为什么又叫它做党八股呢？这是因为它除了洋气之外，还有一点土气。也算一个创作吧！谁说我们的人一点创作也没有呢？这就是一个！

《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30页

“五四”时期的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反对封建主义的老八股、老教条的运动，后来被一些人发展到了它的反方面，产生了新八股、新教条。它们不是生动活泼的东西，而是死硬的东西了；不是前进的东西，而是后退的东西了；不是革命的东西，而是阻碍革命的东西了。这就是说，洋八股或党

八股，是五四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动。

《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31页

党八股这种东西，一方面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因素的反动，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或发展，并不是偶然的東西。

《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32页

如果“五四”时期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是革命的和必需的，那末，今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也是革命的和必需的。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这个工作，五四运动时期还不过是一个开端，要使全国人民完全脱离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统治，还须费很大的气力，还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如果我们今天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则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另一个形式主义的束缚。至于我们党内一部分（当然只是一部分）同志所中的党八股的毒，所犯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不除去，那末，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拿不正确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而对于老八股和老教条在全国人民中间的影响，以及洋八股和洋教条在全国许多人中间的影响，也就不能进行有力的斗争，也就达不到加以摧毁廓清的目的。

《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32—833页

现在来分析一下党八股的坏处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仿照八股文章的笔法来一个“八股”，以毒攻毒，就叫做八大罪状吧。

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

党八股的第二条罪状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

党八股的第三条罪状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

党八股的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

党八股的第五条罪状是：甲乙丙丁，开中药铺。……

党八股的第六条罪状是：不负责任，到处害人。……

第七条罪状是：流毒全党，妨害革命。第八条罪状是：传播出去，祸国殃民。

《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33—840页

党八股如不改革，如果听其发展下去，其结果之严重，可以闹到很坏的地步。党八股里面藏的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毒物，这个毒物传播出去，是要害党害国的。

《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40页

4. 反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

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

《纪念白求恩》（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60页

闹这类独立性的人，常常跟他们的个人第一主义分不开，他们在个人和党的关系问题上，往往是不正确的。他们在口头上虽然也说尊重党，但他们在实际上却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刘少奇同志曾经说过，有一种人的手特别长，很会替自己个人打算，至于别人的利益和全党的利益，那是不大关心的。“我的就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这种人闹什么东西呢？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在他们掌管一部分事业的时候，就要闹独立性。为了这些，就要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也搬进共产党里来了。这种人的吃亏在于不老实。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821—822页

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作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

《给毛岸英的信》（一九四七年十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
第306页

现在有些干部争名夺利，惟利是图。在评级过程中，有那样的人，升了一级不够，甚至升了两级还躺在床上哭鼻子，大概要升三级才起床。他这么一闹，就解决了一个问题，什么干部评级，根本不评了，工资大体平均、略有差别就是了。以前北洋军阀政府里有个内阁总理，叫唐绍仪，后头当了广东中山县的县长。旧社会的一个内阁总理可以去当县长，为什么我们的部长倒不能去当县长？我看，那些闹级别，升得降不得的人，在这一点上，还不如这个旧官僚。他们不是比艰苦，比多做工

作少得享受，而是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这类思想在党内现在有很大的发展，值得我们注意。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

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

《反对自由主义》（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59页

自由主义有各种表现。

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这是第一种。

不负责任的背后批评，不是积极地向组织建议。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心目中没有集体生活的原则，只有自由放任。这是第二种。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这是第三种。

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这是第四种。

不是为了团结，为了进步，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确的意见斗争和争论，而是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这是第五种。

听了不正确的议论也不争辩，甚至听了反革命分子的话也

不报告，泰然处之，行若无事。这是第六种。

见群众不宣传，不鼓动，不演说，不调查，不询问，不关心其痛痒，漠然置之，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把一个共产党员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这是第七种。

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这是第八种。

办事不认真，无一定计划，无一定方向，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是第九种。

自以为对革命有功，摆老资格，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工作随便，学习松懈。这是第十种。

自己错了，也已经懂得，又不想改正，自己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这是第十一种。

还可以举出一些。主要的有这十一种。

《反对自由主义》（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59—360页

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

《反对自由主义》（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60页

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

《反对自由主义》(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60页

自由主义者以抽象的教条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们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不准备实行之,或不准备完全实行之,不准备拿马克思主义代替自己的自由主义。这些人,马克思主义是有的,自由主义也是有的: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是自由主义;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对己是自由主义。两样货色齐备,各有各的用处。这是一部分人的思想方法。

《反对自由主义》(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61页

自由主义是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冲突的。它是消极的东西,客观上起着援助敌人的作用,因此敌人是欢迎我们内部保存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性质如此,革命队伍中不应该保留它的地位。

《反对自由主义》(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61页

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

《反对自由主义》(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61页

一切忠诚、坦白、积极、正直的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反对一部分人的自由主义的倾向,使他们改变到正确的方面来。这是思想战线的任务之一。

《反对自由主义》(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61页

差不多在延安就是这样，自由主义的思想相当浓厚，也可以说在某些部门中间非常浓厚。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共产党员是不应该有的。

《关于整顿三风》（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
第414—415页

（四）反对党内“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

1. “左”右倾错误的特征、表现及危害

不顾主客观条件，犯着革命的急性病，不愿意艰苦地做细小严密的群众工作，只想大干，充满着幻想。这是盲动主义的残余。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87页

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
295页

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

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5页

“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

《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日、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62页

当着群众还不觉悟的时候，我们要进攻，那是冒险主义。群众不愿干的事，我们硬要领导他们去干，其结果必然失败。当着群众要求前进的时候，我们不前进，那是右倾机会主义。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20页

稳步不前，右了，超过实际可能办到的程度勉强去办，“左”了，这都是主观主义。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03页

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

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03页

有人问：什么叫“左”右倾？过去我们讲过，事物在空间、时间中运动。这里主要讲时间，人们对事物的运动观察得不合实际状况，时间还没有到，他看过头了，就叫“左”倾，不及，就叫右倾。……总而言之，事物在时间中运动，到那个时候该办了，就要办，你不准办，就叫右倾；还没有到时候，你要勉强办，就叫“左”倾。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结论（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

所谓机会主义，就是这里有利就干这件事，那里有利就干那件事，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章程，没有一定的方向，他今天是这样，明天又是那样。比如王明就是如此，从前“左”得不得了，后头又右得不得了。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95页

在人民内部，有些人对于肃反问题的看法，也有一些不同。有两种人的意见，和我们的意见不相同。有右倾思想的人不分敌我，认敌为我。广大群众认为是敌人的人，他们却认为是朋友。有“左”倾思想的人则把敌我矛盾扩大化，以至把某些人民内部的矛盾也看作敌我矛盾，把某些本来不是反革命的人也看作反革命。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都不能正确地处理肃反

问题，也不能正确地估计我们的肃反工作。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6—217页

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不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工农运动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而只依仗其暂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其结果是帝国主义命令它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伸出千百只手来，首先把蒋介石拉去，然后又把汪精卫拉去，使革命陷于失败。那时的革命统一战线没有中心支柱，没有坚强的革命的武装队伍，四面八方都造起反来，共产党只得孤军作战，无力抵制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的各个击破的策略。那时虽然有贺龙、叶挺一支军队，但还不是政治上坚强的军队，党又不善于领导它，终归失败了。这是缺乏革命中心力量招致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6—157页

由于没有使中下级干部彻底了解，由于上级没有事先预防与及时检查，致使许多地方犯有极左错误，主要是在土地政策，劳动政策，财政政策，锄奸政策，对待知识分子政策，对待俘虏政策，对待国民党人员政策，以及我之政权组织上表现过左。其结果是缩小了我之社会基础，引起中间势力害怕，给日寇、汪逆与顽固派以争夺群众团聚反动力量的机会。待错误形成再去纠正，已使我们受到极大损失。

《防止执行政策时犯“左”倾错误》（一九四〇年十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02页

土地革命的后期，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革命的长期性这两个基本特点而产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例如以为第五次“围剿”和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斗争是所谓革命和反革命两条道路的决战，在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过左的劳动政策和税收政策）和富农（分坏田），在肉体上消灭地主（不分田），打击知识分子，肃反中的“左”倾，在政权工作中共产党员的完全独占，共产主义的国民教育宗旨，过左的军事政策（进攻大城市和否认游击战争），白区工作中的盲动政策，以及党内组织上的打击政策等等，不但在今天抗日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这种过左政策，适和第一次大革命后期陈独秀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相反，而表现其为“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除基本农民以外），实为代表两个极端政策的极明显的例证。而这两个极端的政策，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

《论政策》（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62—763页

从“九一八”至遵义会议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所谓两条战线斗争是主观主义的。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拿了衡量一切的他们自己的路线，是不根据于客观实际而仅仅根据于主观愿望，胡乱制造出来的。以机会主义的思想去衡量别人的思想，于是到处都发现“机会主义”，正如有鬼论者到处见鬼一样。第二，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既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主观主义的政治路线，又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于是对于凡不合他们胃口的一切人都看作是“机会主义者”。他们对于事既不用唯物的

辩证的方法，对于人自然也不用这种方法。而要作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如果离开了唯物的辩证的方法，就会只是胡闹一顿，决无好结果可言。第三，他们连什么叫做“两条战线斗争”也是一点不懂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者们主观地狂妄地采取所谓两条战线的方法，完全离开了具体的科学的研究工作，故其结论不能不是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主观主义的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把党内对于这个方法的思想弄得极其混乱与模糊起来了。许多人都晓得要作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但许多人都不晓得究竟如何做，成了一句不值钱的口头禅。第四，“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主观主义的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亦即他们的乱斗法，自然就不能如《联共党史》在其结束语中所说的，既要同“党内机会主义集团——‘经济主义者’，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民族主义倾向者”作斗争，并将他们加以粉碎（结束语第四条）；又要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党与党员在工作中所犯的错误（结束语第五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乱斗法，没有可能将这二者（对付敌人和对付犯错误的同志）加以区别，而把用于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了同志，在党内造成了一种乱斗的习惯，不分青红皂白，大事小事，一律都是“最坚决无情的斗争”，到处都是“仇恨”与“斗争的积极性”，造成党内离心离德、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这种反科学的小资产阶级主观主义的乱斗法，如果不肃清，党要达到真正的团结与统一是不可能的。

《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节选）》（一九四一年），《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45—347页

犯急性病的人连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也不要，结果自己变成了空军司令，队伍越打越小。我们党有两次变小过，大起

来又小了，大起来又小了。头一次，五万多党员剩下没有多少；后来一次，三十万党员也剩下没有多少。按比例说，头一次的损失还小些，五万多人剩下万把人，剩下了五分之一；后来三十万剩下不到三万，只有二万五千左右有组织的党员，还不到十分之一。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09页

陈独秀对于反革命向人民的进攻，不是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结果在一九二七年的几个月内，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统统丧失干净。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28页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机会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左”，先是表现在城市工作方面，不但把自己孤立了，而且到后来在城市简直立也立不住了，只好退到农村。到了农村，他们又有军事斗争方面的“左”和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方面的“左”。他们把赤白对立绝对化；对中小资产阶级实行过左政策，片面强调工人利益而把工商业很快搞垮了；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并损伤了一部分中农的利益。当然，我们党在农村中还是有群众的，不能说是在农民中完全孤立。总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实行“左”的政策的结果，我们没能孤立蒋介石，而是孤立了自己。

《在杨家沟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330页

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

路线，给我们党带来了很大的损失，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把我们党在农村中的大部分根据地搞垮了。

《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33页

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都是在十年内战时期产生的。……第三次是王明路线，时间最长，统治全党达四年之久。这条路线是共产国际制造的。当时，王明发展了李立三的错误，在军事、政治、组织等一系列问题上，坚持错误的冒险主义，结果把南方根据地丢掉了，只好两条腿走路。一万二千五百公里的长征是光荣的，但实际上是由于犯了路线错误，被敌人追赶得不得不走的。

《毛泽东有关遵义会议的部分论述》（一九四五年五月——一九六四年三月），《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

2. “左”右倾错误产生的根源

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99页

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当湘赣边界割据的初期，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当时湖南省委的不正确的估量，把阶级敌人看得一钱不值；到

现在还传为笑谈的所谓“十分动摇”、“恐慌万状”两句话，就是那时（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统治者鲁涤平的形容词。在这种估量之下，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蒋桂战争尚未爆发之前）约四个月期间内，敌人的第三次“会剿”临到了井冈山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提出来了。其实，那时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蒋桂冯混战的形势业已形成，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但是在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中央二月来信就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00页

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在红军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所以有这种抓住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00页

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

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怀疑这一点而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转变，如像过去某些同志所谓民主革命在重要省分开始胜利之日，就是革命开始转变之时，是不对的。这是因为他们看不见中国是一个何等样的政治经济情况的国家，他们不知道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完成民主革命，较之俄国要困难得多，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60—161页

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一书的批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九三七年四月四日)，《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9页

“左”的与右的相通，因为都离开过程之正确的了解，到达于不顾过程内容，不分析具体的阶段、条件、可能性等抽象的一般的空洞见解。因此，他们两极端就会于一点。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一书的批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九三七年四月四日)，《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12—113页

看起来好像革命的“左”倾意见，来源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急躁病，同时也来源于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部保守性。他们看问题仅从一局部出发，没有能力通观全局，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联结，把部分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联结，捉

住一局部一时间的东西死也不放。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212页

为什么只是“左”的传统?这是由于几种原因:(一)民族与社会的双重压迫,造成群众生活与党的环境的极端困难,这些困难压迫着我们(这是“左”比右总要好些的 viewpoints 的来源)。(二)党内小资产阶级与幼年无产阶级成分的存在且占大的数目。(三)党还只有十五年历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的传统还不十分深厚,解决问题还不能样样带马克思主义原则性,还没有很早及人人都学好唯物辩证法。(四)在克服错误路线时(主要在克服立三路线时),在斗争策略、宣传教育、党内关系这三个问题上的错误,没有得到彻底的克服,有些一时是进步,过后又发作起来。这三个问题上的错误,在一个长时期中没有彻底地提出并解决过。由于这四个原因,所以我们党内还存在着若干表现“左”的不良的习惯或传统。至于右的东西,则因为环境不容许这种东西的存在,又克服得比较彻底,所以不成其为错误传统或不良习惯。

《关于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一九三七年六月三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508页

倾向来源问题

右倾——从地主资产阶级影响来的。

“左”倾——从农民小资产阶级影响来的。

客观的——上列二种。

主观的——教育不足(自我批评不足)。

《目前时局与党的政策》(一九四〇年七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
第2卷第291页

过去没有做过认真研究理论和研究历史的工作，对犯错误的人只是惩罚。没有认清立三路线的错误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急性病是在小资产阶级十分广大的社会中的一种必然性，不是个人的偶然现象，而是社会现象。

《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93页

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内战时期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过去在国际上也有这种现象，例如在巴黎公社时期犯“左”的布朗基主义错误，后来又犯第二国际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个规律是由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采用的政策会反映到无产阶级党内来。例如，中国资产阶级蒋介石在抗战时期采用联共政策时，我们党内容易产生右倾错误；在皖南事变时，便产生“左”倾错误，有人认为是又一次“马日事变”，主张举行全国暴动等等，资产阶级一触，我们即跳。

《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93—94页

如果我们在全体上过高估计敌人力量，因而不敢推翻他们，不敢胜利，我们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不采取谨慎态度，不讲究斗争艺术，不集中全力作战，不注意争取一切应当争取的同盟者（中农，独立工商业者，中产阶级，学生、教员、教授和一般知识分子，一般公务人员，自由职业者和开明绅士），我们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67—1268页

我们党的历史情况表明，在我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右的偏向，而在我和国民党分裂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左”的偏向。

《关于情况的通报》（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97页

过去发生“左”的偏向，是因为大家没有经验。没有经验，就难免要犯错误。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要有一个过程。去年六月到现在的短短时期内，经过反右和反“左”的斗争，使大家都知道了反右、反“左”是怎么一回事。没有这样一个过程，大家是不会知道的。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21—1322页

这里，最基本的道理，就是他们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代表小资产阶级里头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群众广大的国家。小资产阶级中间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是动摇的。比如富裕中农，大家看到，无论在哪个革命中间，他们总是动摇的，不坚定的，高兴起来可以发狂，悲观起来可以垂头丧气。他们的眼睛经常看到的是他们那一点小财产，无非是一两匹牲口呀，一辆大车呀，十几亩地呀。他们患得患失，生怕失掉这些东西。这种人跟贫农不同。中国的贫农在北方占百分之五十，在南方占百分之七十。我们党，拿成分来说，基本上是工人和贫农组成的，即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组成的。半无产阶级也是小资产阶级，但是它的坚定性要比中农好得多。我们党也吸收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在一千多万党员里头，大中小知识分子大概占一百万。这一百万知识分子，说他们代表帝国主义不好

讲，代表地主阶级不好讲，代表官僚资产阶级不好讲，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也不好讲，归到小资产阶级范畴比较适合。他们主要代表小资产阶级范畴里哪一部分人呢？就是城市和农村中生产资料比较多的那一部分人，如富裕中农。这一部分知识分子党员，前怕龙后怕虎，经常动摇，主观主义最多，宗派主义不少。……所以，王明、李立三的问题，不单是他们个人的问题，重要的是有它的社会原因。这种社会原因在我们党内的反映，就是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遇到重要关头就要动摇。这种动摇就是机会主义。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94—95页

3. 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左”，也反右

只有发动两条战线斗争的火力去清除这些障碍，才能推动查田运动更加迅速的前进。开展反右倾的思想斗争，反对对于查田运动严重意义的估计不足，反对对地主富农的妥协投降，反对群众斗争的尾巴主义领导，是每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同时要把侵犯中农的危险唤起全体党员的注意。要“严厉打击任何侵犯中农利益的企图”。因为这是目前查田工作中已经明显表现出来的十分严重的危险。对富农的不正确观念，也无疑要影响到中农上去。一切命令主义的蛮干，对于联合中农是最大的危害。两条战线斗争的火力扫荡了查田运动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物，查田运动就可以大踏步前进，它的彻底胜利就有了充分保障了。

《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一九三三年），《斗争》第24期

我们党内存在着某种错误的传统,这就是群众工作问题上,宣传教育问题上,党内关系问题上的“左”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公式主义、命令主义、惩办主义的方式方法与不良习惯的存在,这在全党还没有克服得干净,有些还正在开始系统地提出来解决。新的环境与任务迫切要求对这个问题来一个彻底的转变,我们也正在转变它。

《关于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一九三七年六月三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510页

十七年来,我们的党,一般地已经学会了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斗争的武器,从两方面反对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0页

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必须切合于具体对象的情况,决不应主观地看问题,决不应使过去那种“乱戴帽子”的坏习惯继续存在。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2页

“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一定的质含有一定的量”是对的,不如说“一定的质被包含于一定的量之中”,但重要的是从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使之区别于其他异质,作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在此。

《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日、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61页

两条战线斗争

（一）反对右的：

看不见投降反共危险；
屈服于国民党的压力；
对时局无出路（失却前途）；
没有阶级立场；
在艰苦斗争面前恐惧消沉。

（二）反对“左”的：

黑暗的中国，黑暗的世界，黑暗的边区，黑暗的自己；
准备破坏统一战线，否认国共合作，不要三民主义，把自己孤立起来盲干。

《反投降提纲》（一九三九年六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27—228页

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发展路线，一方面要反对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这就是党在财政经济工作中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93页

在纠正偏向时，须着重于干部思想上打通，不要着重于犯错误的责任，对于他们领导群众艰苦奋斗，还须给以勉励与安慰，以便好好地将“左”倾偏向纠正过来，而不是泼冷水。

《关于工业与工运问题的方针》（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四日、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01页

凡在土地斗争尚未深入的地方，发生右倾观点，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土地斗争；凡在土地斗争已经深入的地方，则发生“左”倾观点，给许多中农甚至贫农胡乱戴上地主、富农等项帽子，损害群众利益。以上两类错误均须纠正，而这两个文件则主要是为纠正“左”倾错误而发。目前正当各解放区开展与深入土地斗争之时，土地会议之召集，土地法大纲之颁布，给了右倾观点以严重打击，这是完全必须的。但随着斗争之深入，“左”倾现象势将发生。此项文件发至各地，决不应成为妨碍群众斗争的借口，而应在放手发动农民群众彻底平分土地的坚决斗争中，适当地纠正业已发生与业已妨碍群众利益的过左行动，以利团结雇农贫农，坚决保护中农（这是确定不移的政策），正确地执行土地法大纲，消灭封建半封建制度。

《在土地改革中注意纠正“左”倾错误》（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322页

我们既要反右，又要反“左”，以便划清界限，避免造成自己的孤立和失败。现在反右，第一是反对对敌人估计过高，不敢到国民党区域去作战，害怕美国。美国在中国搞得这样久，现在可以摸清楚它了，其实它并不可怕。刘邓等三路大军出兵国民党区域，一个月就解决了棉衣问题，这证明到国民党区域去作战也不可怕。第二是反对对中间派的认识模糊不清，对他们的动摇性估计不足。对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右翼分子，在政治上的打击同经济上的消灭是两件事，不能混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者曾混淆了这两点。现在，我们在对待中间派的问题上是既须反右又须反“左”。第三，在土改、整党工作中反对右的倾向，是反对一些干部对消灭封建阶级、驱除党内坏分子的斗争立场动摇，软弱无力。当然也

要反对“左”的倾向，内战时期更容易犯“左”的错误。消灭封建阶级的斗争，同对美蒋的斗争一样，要求我们在全局问题上要大胆，在具体斗争上要谨慎。然而我们有些同志却相反，重视抽象之敌，小视具体之敌。在土地问题上反“左”主要是反对对中农的冒险政策，哪怕只发生一户中农被错当作地主来整，我们也必须十分注意纠正。

《在杨家沟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331页

当“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共产党员要反对这个潮流，如同在抗日时期反对投降倾向的潮流一样。

《在杨家沟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335页

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例如：军队在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左”倾；在打败仗或者未能多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右倾。土地改革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68页

戒“左”戒右。有人说，“‘左’比右好”，许多同志都这么说。其实，也有许多人在心里说，“右比‘左’好”，但不讲出来，只有诚实的人才讲出来。有这么两种意见。……我们党内不但有喜欢“左”的，也有不少喜欢右的，或者中间偏右，都是不好的。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03页

必须注意防“左”。防“左”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机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说要“左”倾,“左”倾机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

《农业合作化的全面规划和加强领导问题》(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77页

一切确实发生“左”的偏向的单位就要采取措施加以克服,不要讳言“左”的偏向。同必须克服右的偏向一样,我们必须认真地克服“左”的偏向,才能使肃反运动自始至终地得到健康的发展。

《必须认真克服“左”的偏向,使肃反运动健康发展》(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426页

真正的教条主义分子觉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要革命。但是对于革命事业的损失说来,“左”比右并没有什么好,因此应当坚决改正。有些错误,是因为执行中央方针而犯的,不应当过多地责备下级。

《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70页

有的同志提的,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这几句话是好的。

《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29页

（五）开展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

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不过从前因种种原因把它隐蔽了，到近日来才暴露出来。其实从前的隐蔽是错误的，现在的暴露才是对的，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只有赶快调和敷衍了事，抹去了两方的界线，以归到庸俗的所谓大事化为小事才是退步，我想这回是不会发生可怕的恶结果的。白砂会议后不到几天，问题已经在党内群众中热烈地讨论起来了，我想同志们一定要求这问题的彻底弄清楚，一定不肯调和敷衍，模棱两可，是非不分，而且一定能选择并拥护一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前进的意见。四军改造的工作由此可以完成，四军的党由此可以得到一极大的进步，这是绝对无疑的。

《给林彪的信》（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64页

有争论的问题，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一次不能解决的，二次再议（以不妨碍工作为条件），以期得到明晰的结论。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89—90页

同中国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是相对的，……党内的一致亦然，一切过程之一致皆然。

思想斗争所以是经常的方法。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一书的批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九三七年四月四日),《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91—92页

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6页

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

《反对自由主义》(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59页

马列主义的方法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条,反对自发论的思想是又一条。在去年高干会议以前,自发论的思想是很流行的,例如财政经济非常困难,就是不去想办法解决,而是让各种学说自流,让工作自流。在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也很多,不作批评,不作斗争,对工作不加严厉的督促等。我们共产党员不能有自由主义,要力争上游,反对消极倾向,要批评错误,以斗争求团结,要同人民打成一片,克服困难,改造世界,这才是马列主义。

《切实执行十大政策》(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74页

我们党内自然也时常会发生意见分歧,但这些分歧都能通

过讨论和分析这种民主的方式加以解决。如果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决议的正确性仍然不信服，那末，在党的会议上经过彻底辩论以后，他们就会服从决议了。

《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88页

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族或职业团体，党员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因为政见相同结合起来的。政见不同就要有争论，争论时要分清界限。

《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3—284页

历来的经验说明一条：思想斗争必须中肯。现在有一句话，就是要思想交锋。好比打仗，你一刀杀来，我一刀杀去，两把刀子要打中，这叫交锋。思想不交锋，就缺乏明确性和彻底性，这个不好。在这一次会议上，我们就在思想上交锋了，有明确性了，有彻底性了。这个办法，首先一个好处是帮助大多数同志把问题弄清楚，再一个好处是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结论（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

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2页

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斗争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8页

（六）整 风

1. 整风是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

我党近年的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些不好的东西，就正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合抗战建国的需要。

《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2页

我们在一九三七年以前入党的党员，剩下的不过数万人，而我们现在的党员是一百二十多万，其中大多数是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他们有很可爱的革命积极性，并愿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但是，他们是带了他们原来的不符合或不大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入党的。这种情形，就是在一九三七年以前入党的党员中也是存在着的。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矛盾，一个绝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不进行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整风运动，我们还能顺利地前进吗？显然是不能的。但是，我们在大量干部中解决了和正在解决着这个矛盾——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其中有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甚至地主阶级的思想，而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之间的矛盾，即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

间的矛盾，我们的党就能够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统一地（不是完全统一地）大踏步地但又是稳步地前进了。在今后，我们党还会、也还应该有更大的发展，而我们是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下更好地掌握将来的发展了。

《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108页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内部的整风运动，是一般地收到了成效的。这种成效，主要地是在于使我们的领导机关和广大的干部和党员，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在这点上我们党是比抗日以前的几个历史时期，大进一步了。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52页

我们过去说过，整风运动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整风就是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整风中间，我们一定可以更多地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4—275页

共产党整风，青年团整风，是思想斗争。要提高一步，真正学点马克思主义。要真正互相帮助。有什么缺点，主观主义有一点没有呀？官僚主义有一点没有呀？我们要真正用脑筋想一想，写一点笔记，搞那么几个月，把马克思主义水平、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提高一步。

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

2. 整风是为了转变思想和作风，增进党的团结和统一，推进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

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三股歪风，有它们的历史根源，现在虽然不是占全党统治地位的东西，但是它们还在经常作怪，还在袭击我们，因此，有加以抵制之必要，有加以研究分析说明之必要。

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12页

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12页

我们要在党内发动一个启蒙运动，使我们同志的精神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间解放出来，号召同志们对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加以抵制。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27页

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种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而是剥削阶级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它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洋八股，或党八股。

《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33页

现在共产党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就是合乎人民公意的政策。在执行这个政策中，常常要遇到许多障碍，比如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为了纠正这些不良作风，我们提出了整顿三风。

《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9页

我们把马列主义搞通，把主观主义反倒，这是加强教育的更深刻的方法，更彻底的方法。如果我们全党干部在现在这一两年以内，能够把作风有所改变，扩大正风，消灭不正之风，这样一个目的达到了，我们内部就能够巩固，我们的干部就能够得到提高，我们也才能够有本事迎接将来的光明世界，掌握这个新的光明的世界。

《关于整顿三风》（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11页

现在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要把我们的学风、党风、文风改变，扩大正风，缩小和消灭歪风。

《关于整顿三风》（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
第413页

要把反对主观主义这件事搞得彻底，一定要搞好，我们一定要下这样一个决心。如果搞得不好就再搞，再搞没有搞好还得重搞，要搞彻底。有人反对就要说服，说了不服，还要再说，一定要使其心悦诚服。总而言之，一定要干到底，一定要整顿三风，来一个彻底的思想转变。

《关于整顿三风》（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
第414页

这次整顿三风，由中央的同志分头领导，……在这次学习检查中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是改变作风，团结内部，就是决定上写的改变观点，改变思想方法，改变作风，团结干部，团结全党。

《关于整顿三风》（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
第419页

整顿三风搞得好不好，对目前，对将来，对领导整个革命，关系很大，我们一定要下决心把这样的事做好。

《关于整顿三风》（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
第422页

在整顿三风中间，一切同志都要整顿，文艺界也包括在内，其目的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破除，转

变为无产阶级思想。

《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26页

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75页

我们正处在艰难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在敌人后方抗拒着极其强大的敌人,我们的环境很艰苦,战争的时间还很长。但是这种长期的艰苦的斗争,正好锻炼我们自己,使我们用心地想一想,绝不粗枝大叶,自以为是;使我们认真去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以及老一套的党八股作风,而拿出完全的负责的态度与高度的创造力来。

《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2页

这几年全党的工作中有一个整风,就是要在思想上准备胜利,很快我们党要开七大,也是在思想上准备胜利,准备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胜利。客观条件有了胜利的可能性,我们现在要加紧主观条件的准备。

《时局问题及其他》(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57页

全党整风运动即将开始,这件事已成当前一切工作向前推进的中心环节。这一环节不解决,各项工作便不能顺利地向前

推进了。

《关于指导全党整风运动问题给胡乔木的信》（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四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367页

整风，整主观主义，重心放在教条主义；整宗派主义，他们总是想一家独霸，他们总是觉得六亿人口太多了，少一点才好；整官僚主义，多得很。好几年没有整风了。

《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49页

整风就是整顿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共产党内的整风，在抗日时期进行过一次，以后在解放战争时期进行过一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又进行过一次。现在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不愿意的就不参加。这一次整风，主要是要批评几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一个是主观主义，一个是官僚主义，还有一个是宗派主义。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3—274页

在我们的工作中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缺点和错误也还不少。因此我们要进行整风。我们自己来批评自己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会不会使我们的党丧失威信呢？我看不会。相反的，会增加党的威信。抗日时期的整风就是证明。它增加了党的威信，增加了同志们的威信，增加了老干部的威信，新干部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4页

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如果我们把作风整顿好了，我们在工作中就会更加主动，我们的本事就会更大，工作就会做得更好。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5页

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所以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的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更好地同党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5页

我们党现在准备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这次整风，就是整顿三风，整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听说去年评级的时候，就有些人闹得不像样子，痛哭流涕。人不是长着两只眼睛吗？两只眼睛里面有水，叫眼泪。评级评得跟他不对头的时候，就双泪长流。在打蒋介石的时候，抗美援朝的时候，土地改革的时候，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他一滴眼泪也不出，搞社会主义他一滴眼泪也

不出，一触动到他个人的利益，就双泪长流。……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

《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一九五七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4—285页

党的整风指示，日内即可发出，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

《关于整风和干部参加劳动》（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94页

共产党整风，是一个统一体两种作风之间的斗争。在共产党内部如此，在整个人民的内部也是如此。

《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69页

一定要把整风坚持到底。全党要鼓起干劲，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尽可能地纠正一切工作上、作风上、制度上的缺点和错误。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4页

3. 整风的主要对象是高中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

此次整风是全党的，包括各部门各级干部在内，所谓各部门，就是不但有地方，还有军队，所谓各级，就是不但有下级，而且主要与首先的对象是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只要把他们教育好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在一个根据地内，

主要应着重教育边区与地委两级，其次是县一级，只要他们有了正确方向，区、村干部的毛病就易纠正。我说这点，是想引起你注意抓紧党、政、军、民、学各方面高级干部的学习领导，克服在他们中存在着的三风不正的残余。我们在延安亦是特别抓紧高级组的学习，着重阅读与自我反省，已发现许多同志的毛病，正在纠正中，你们那里可作参考。

关于整风问题给聂荣臻的电报（一九四二年七月四日），《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391—392页

整风，主要是整高级干部（犯思想病最顽固的也是这些干部中的人），将他们的思想打通，一个根据地大约有一百至二百人（包括各中央局、分局委员在内）；其次是中级干部，每一根据地有数百至数千人；再次才是下级干部。有些根据地把这个方向弄颠倒了。

《争取在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页

4. 整风的方法

- 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一

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27—828页

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种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而是剥削阶级所需要的。……

要做对于这些东西的肃清工作和打扫工作，是不容易的。做起来必须得当，就是说，要好好地讲理。如果说理说得好，说得恰当，那是会有效力的。说理的首先一个方法，就是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们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

《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33页

我们自整风以来就是治病救人的，在清查党内历史问题中有人怀疑好像不是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现在我们的方针，还是在思想上要清算彻底，作组织结论要慎重和适当。

《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93页

过去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除反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外，有

两次大的斗争，即反陈独秀错误路线与反李立三错误路线的斗争。那时在思想上没有进行很彻底的讨论，但结论作得严重，因此未能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前车之覆并没有成为后车之鉴。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在思想上弄清楚。现在中央指定读五本理论书，是学习世界革命的经验。过去没有做过认真研究理论和研究历史的工作，对犯错误的人只是惩罚。

《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93页

治病救人是说，为了救人而去治病。人本来是好人，但病菌进去了，得了病，就请医生看一看，吃点药，治好了。要救人不治病不行，要治病不救人也不行，无论偏向哪一方面都不好，都应该改正。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7页

以后还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凡属在党内犯了错误的，都要给他分配工作。不仅要欢迎他积极找我们谈，我们也要找他谈，向他做工作。我们党内有许多同志懂得要向傅作义做工作，要向民主人士做工作，但只要一个人一挂上共产党员的招牌，就不向他做工作了，这是不好的。对于有错误的同志，我们还是要做工作。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65页

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中央决定后，先发通知，把项目开出来。比如，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和群

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如果上半年发通知，下半年整风，中间隔几个月。凡是贪污了的，要承认错误，在这期间把它退出来，或者以后分期退还，或者连分期退还也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免了，都可以。但是总要承认错误，自己报出来。这就是给他搭一个楼梯，让他慢慢下楼。对于其他错误，也是采取这个办法。预先出告示，到期进行整风，不是“不教而诛”，这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有人说，如果用这个办法，到下半年，恐怕就没有什么好整了。我们就是希望达到这个目的，希望在正式整风的时候，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都大为减少。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整”人是又一件事。不到某人“严重违法乱纪”是不会受“整”的。什么叫“严重违法乱纪”？就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害，而这种损害，是在屡戒不听一意孤行的情况下引起的。其他普通犯错误的人，更是治病救人。这是一个恰当的限度，党内党外一律如此。“整”也是治病救人。

《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75页

● 坚持团结——批评——团结，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

干工作要有一个重心，今天我们教育工作的重心，在自己考虑一下、研究一下，自己反省一下，重心在自己，自己正确的东西便把它扩大，不正确的东西便把它清除、取消。要使我

们所有的学生、干部都了解，在整顿三风时重心在自己。要帮助别人，首先要提高自己，自己不进步，要帮助别人是难的，这一点要讲清楚。我们在座的同志要以身作则，自己进步，要反复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历史、自己现在的工作，好好地反省一下，要做模范。

《关于整顿三风》（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18页

整风是一个伟大的党的思想斗争，实行此种斗争的武器就是自我批评。有自由主义偏向的人则不愿拿起这个武器，尤其是许多上级与高级干部害怕自我批评，这种现象必须在此次整风中着重地纠正过来。

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一九四三年四月），《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434页

我们的目的是揭发路线错误，又要保护同志，不要离开这个方向。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我们要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要强调个人问题，因此我们的组织结论可以宽大些。这个方针现在就要宣传解释，使同志们了解实行这个方针的必要。思想要弄清，结论要宽大，对党才有利。我们反对四中全会后党内斗争的错误方针，因此要采用宽大政策，否则便成了四中全会的学生，便不能弄清思想问题，吸取经验教训。

《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94页

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以为鉴戒。

《学习和时局》（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38页

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学习和时局》（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38页

中国共产党经过多年的实践，学会了把自己做的事情加以分析，并且要从团结全党出发。从团结全党出发是第一，加以分析批评是第二，然后再来一个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方法，这就是辩证法。

《时局问题及其他》（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56页

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1096页

全党应在一九五〇年的夏秋冬三季，在和各项工作任务密切地相结合而不是相分离的条件之下，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用阅读若干指定文件，总结工作，分析情况，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等项方法，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72页

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主张和风细雨，当然，这中间个别的人也难免稍微激烈一点，但总的倾向是要把病治好，把人救了，真正要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不是讲讲而已。第一条保护他，第二条批评他。首先要保护他，因为他不是反革命。这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人民内部，对犯错误的人，都用保护他又批评他的方法，这样就很得人心，就能够团结全国人民，调动六亿人口中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这次整风的方法同抗日时期的整风一样，就是先研究一些文件，每个人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开

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发缺点和错误的方面，发扬优点和正确的方面。在整风中间，一方面要严肃认真，对于错误和缺点，一定要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一定要纠正；另一方面又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采取“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4页

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此点请你们注意。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此点也请你们注意。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

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为妥。

《组织党外人士继续对党的缺点错误展开批评》(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96—297页

我们根据列宁关于密切联系群众、承认群众的首创精神、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在多年的革命实践中,得出了整风的方法,而目前的社会主义自我教育运动又一次说明了这个方法的正确性。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18页

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一九二一年党的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二十四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中间经过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到一九四五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时间。那是一次细致的整风,采用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就是说,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只要认识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帮助他认识,帮助他改正,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那次整风帮助全党同志统一了认识。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么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之后,才得到完全解决的。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8—299页

5. 整风的意义

整顿三风这件事保证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和党的组织成分的纯洁。

《英勇斗争的二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七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3页

整顿三风和发展生产这样两项工作，发生了根本性质的效果，使我党在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两方面，立于不败之地。

《学习和时局》（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43页

抗战时期有两个关节就是整风和生产，没有这两项党就不能前进。两万五千共产党员发展到几十万，绝大多数是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如果不整风党就变了性质，无产阶级其名，小资产阶级其实，……只有经过整风才把无产阶级的领导挽救了。

《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4页

没有整风和生产这两个环子，革命的车轮就不能向前推进，党就不能前进了！……整风是前进的精神基础，生产是前进的物质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39页

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

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

《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107—1108页

过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犯过主观主义的错误，有右的也有“左”的。陈独秀、张国焘是右的，王明是先“左”后右。延安整风的时候，集中反了教条主义，附带反了经验主义，二者都是主观主义。理论与实际不结合，革命就不能胜利。整风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二日）

民主革命时期，对主观主义的错误，用整风的办法解决了，团结了全党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和犯过错误的同志，大家从延安出发，奔赴各个战场，全党一个劲，取得了全国胜利。

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二日）

我们过去用整风方式搞了好几年，批判了教条主义，独立自主地按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办事，才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2页

在长征路上，我们开始克服王明“左”倾路线。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遵义开会，但未完全解决问题。抗日初期又出现了王明路线，但这次是右的。以后我们用了三年半时间进行整风运动，研究党的历史，学习两条路线，终于说服了犯过错误的同志，然后才能在一九四五年召开的七次大会上，团结了

全党。

《毛泽东有关遵义会议的部分论述》（一九四五年五月——一九六四年三月），《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

从一九二一年建党，到一九四五年七大以前，二十四年中我们党在思想上没有完全统一过，先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后是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学派很多，各搞各的。主要有两派：一派是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一派就是非教条主义。延安整风和七大以后，我们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政策上、文化政策上、党的建设上都有了一整套统一的东西。为什么后来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没发生错误呢？为什么有些东西过去反对它的人也赞成了呢？比如在军事上，过去有的人怕打烂坛坛罐罐，要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人，主张正规战，反对游击战，而这一时期对诱敌深入等都通了。这就是因为教育了干部，特别是延安整风教育了干部。

《总结经验，教育干部》（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75—276页

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

《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387页

自从去年党的全国土地会议决定采取新的方针，展开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以后，差不多在一切解放区都召开了有关整党和土地改革的大的干部会议，批判了存在于党内的右倾思想，揭发了党内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的成分不纯或者作风不纯

的严重现象。而在以后，在许多地区，又采取适当的步骤，纠正了或者正在纠正着“左”的偏向。这样，就使我党在全国的工作，在新的政治形势和政治任务之下，走上了健全发展的轨道。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12页

党在最近一年内，一方面基本上克服了并正在继续克服着党内某种程度存在着的成分不纯（地主富农分子）、思想不纯（地主富农思想）和作风不纯（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不良现象，另一方面又克服了和正在继续克服着跟着大规模发动农民群众解决土地问题的斗争而产生的，部分地但是相当多地侵犯了中农，破坏了某些私人工商业，以及某些地方越出了镇压反革命的某些政策界限等项“左”的错误。经过过去三年、特别是最近一年的伟大的激烈的革命斗争，和对于自己错误的认真的纠正，全党的政治成熟程度是大进一步了。

《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43—1344页

绝大多数同志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是从延安整风以来的又一次整风会议，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我们互相了解更多了，思想更加统一了，使得我们有了共同的认识。本来我们是有共同认识的，但是在若干问题上，我们中间还是有不同意见的，经过这一次会议，统一了我们的认识。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思想的、政治的以及许多政策的共同认识的基础上，就可以使我们党更好地团结起来了。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94页

整风以前我们有许多干部有两条：一条叫官气较多，二条叫政治较少。不是要反五气吗？五气的头一气就是官气。经过整风，没有整好的还有一些，但是大多数人是以前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跟工人农民打成一片，人们感觉跟国民党时期确实不同了。

《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八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379页

六、党的组织建设

（一）坚持党的根本组织制度民主集中制

1. 民主集中制就是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

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样才能做到：一方面，确实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另一方面，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9页

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57页

我们党历来就讲民主，但是有些时候、有些地方不够民主。我们党历来也是讲集中的，但是有些时候、有些地方集中得不恰当或者集中不够。民主要有很高程度的民主，集中也要很高程度的集中，这两个东西有没有矛盾呢？有矛盾的，但是可以统一的，民主集中制就是这两个带着矛盾性的东西的

统一。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99页

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9页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6—297页

2. 集中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要充分发扬民主，反对压制民主

没有集中，就不能胜利，就要失败，就要被消灭，所以没有集中不行。但是我们要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建立高度的集中。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00页

这是一个开会的方法问题。先把报告草稿发下去，请到会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再作报告。报告的时候不是照着本子念，而是讲一些补充意见，作一些解释。这样，就更能充分地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

这个方法是一个什么方法呢？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0页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如果大家对问题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吗？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

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3—294页

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4页

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争中显出了它的效力，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方能普遍地真实地应用于群众组织。

《井冈山的斗争》（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72页

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在反动和内战时期，集中制表现得多一些。在新时期，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8页

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大批

能干人材的创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9页

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生产的家长制占优势的国家，又在全国范围内至今还没有民主生活，这种情况反映到我们党内，就产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这种现象，妨碍着全党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同时，也就影响到统一战线中、民众运动中民主生活的不足。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9页

在我们军队中的党组织，也须增加必要的民主生活，以便提高党员的积极性，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但是军队党组织的民主应少于地方党组织的民主。无论在军队或在地方，党内民主都应是为着巩固纪律和增强战斗力，而不是削弱这种纪律和战斗力。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9页

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9页

我们工作作风中的一项极大的毛病，就是有些工作人员习惯于独断专行，而不善于启发人们的批评讨论，不善于运用民

主作风。当然，这是拿我们解放区的这种作风与那种作风作比较，而不是拿我们解放区与国民党区域作比较。我们解放区是民主的地方，国民党那里是封建的地方，这两个地方是原则上区别的。但是，我们队伍中确有许多人尚未学会运用民主作风，旧社会传染来的官僚主义作风，依然存在。别人提不得不同的意见，提了就不高兴。只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为怕碰钉子，受打击，遭报复，人们不敢大胆提意见。这是一种很不好的作风，这种作风阻塞着我们事业的进步，也阻塞着工作人员的进步。我提议各地对此点进行教育，在党内，在党外，都大大地提倡民主作风。不论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不是恶意攻击，允许大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各级领导人员，有责任听别人的话。实行两条原则：（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如果没有“言者无罪”一条，并且是真的，不是假的，就不可能收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效果。

《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
第3卷第242—243页

党这个军队也是一样，没有统一纪律，没有民主集中制，没有民主或者没有集中都不行。像封建社会皇帝专政是不行的，那是封建时代的事。我们实行革命人民的民主，它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旧民主是不同的，它是更广泛的民主。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37页

中央和各级领导机关的领导同志，要注意听人家的话，就是要像房子一样，经常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为什么我们

的新鲜空气不够？是怪空气还是怪我们？空气是经常流动的，我们没有打开窗户，新鲜空气就不够，打开了我们的窗户，空气便会进房子里来。我们的房子是什么房子呢？是政治房子、政治工厂。开工厂就得有原料，有工人，有技师、工程师。原料为什么不够？人员为什么不够？就要想想自己的责任。有没有贴广告？广告大不大？有没有出高价收买原料？事实上原料并不要花什么钱，只要贴上“欢迎”两个字，各种原料就源源而来。所以各种各样的意见，都要让它发表，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老话，但很有意义。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39—340页

要广开言路，打开窗户。封建专制时代还有那么几个开明的皇帝能广开言路，何况我们共产党呢？我们更要广开言路，打开窗户，不要怕打开窗户可能吹进沙子来。进来一点尘土，坏处有一点，但并不大，而开窗户透空气的利益却很大，我们要从这种利害关系上看这个问题。我们是干革命的，还怕民主？还怕人家发表意见？你说对了就可以说出一个正确的道理来，说错了也不要紧，说错了还可以让人知道一条错误的道理，所以要实行高度的民主。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99页

我们要学会听闲话，我们长两个耳朵就要听闲话。我们的党员有意见要在组织里面讲，不许在组织外面讲，这是一个原则。但是还有在组织以外讲的，那是闲话，这也是事实。我不

是提倡小广播，不是要大家在七大以后去大搞小广播，我是说小广播是存在的，哪一年也有一点，我们要去听，去收集材料。这些材料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误的，一种是正确的。正确的收集起来，错误的也收集起来，都把它当作原料。我们现在是开工厂，七大就是开政治工厂，我们中央也是开政治工厂，这个工厂没有原料怎么行呢？原料贫乏制出的东西就不像样子，所以我们要收集原料。打开窗户就使原料有来源，我们还要登广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登广告就是为了要收集原料，为了使我们的政治工厂的原料多一些，其中包括小广播这种原料在内。如果我们扩大民主，把小广播合法化，把“黑市”变成合法的，原料就会多起来。大家有意见，有气，就应该打开窗户，让他们把气出完，把意见都说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同志，统一意志，集中意志，形成高度的集中。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99—400页

我们要习惯听闲话，准备多听闲话，把听闲话当作收集舆论的机会。党校闲话很多，我们让他讲，这叫合法的闲话（军队里叫作怪话）。闲话有两种，一种是好人讲的，一种是坏人讲的。如果是好人讲的，说明你这个领导在工作上很可能有问题。我们讲党要听闲话就是这个道理，注意收集不同的意见。意见一致了就不会发生不团结现象，不团结就是因为有不同的意见而又得不到解决。我们需要像拣破铜烂铁一样将不同意见收集起来，经过融化，准备修正我们思想上、工作上的毛病和错误。……工作中间犯错误，哪一个人会没有呢？犯了错误就要改正，叫作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们准备收集不同的意见，并且已

经有了决议，不同的意见公开地讲出来，什么意见都可以讲。正确路线的领导之下也会有缺点错误，如黄河之水滚滚而流中间还会有几个小泡，我们多收集各种意见，认清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样就可以减少盲目性。

《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8—29页

实现党内民主的办法，是实行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的制度。我们党内是有民主的，但是还不足或者缺乏，现在要增加。办法是用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代替干部会议。干部会议的好处是迅速、便利，召集比较容易，代表会议要保存干部会议的好处，不要太繁杂了。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一九四八年九月），《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37页

下面干部的话，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听了以后要加以分析。对正确的意见，必须听，并且照它做。中央领导之所以正确，主要是由于综合了各地供给的材料、报告和正确的意见。如果各地不来材料，不提意见，中央就很难正确地发号施令。对下面来的错误意见也要听，根本不听是不对的；……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41—1442页

七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的党内生活有些呆板，不活泼。四中全会是应该召开的，反对了高岗那一种破坏性的煽动，增强了党的团结。这以前，我们党内有相当一些同志不够警觉，不够自觉，上了高岗的当。所以，把高岗这个“围子”塞起来是必要的。如果不塞起来，还让他再搞一年，那我们的党就会被

搞得很乱。可是在高岗问题被揭露出来以后，我们党内又产生了另外一种现象：谨小慎微，莫谈国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家都生怕犯那个错误。现在我们就讲清楚，国事有两种：一种是破坏性的，一种是建设性的。像高岗那种破坏性的国事就不要去谈，但建设性的国事就要大谈特谈，因为它是建设性的。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50页

对于下级所提出的不同意见，要能够耐心听完，并且加以考虑，不要一听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就生气，认为是不尊重自己。这是以平等态度待人的条件之一。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5页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1页

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

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2页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惟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3页

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但是，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我在一九五七年这样说过，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党内党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3页

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省委的同志，地委的同志，县委的同志，你们回去，一定要让人讲话。在座的同志们要这样做，不在座的同志们也要这样做，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

党内民主，让人讲话。……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是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让他保留意见。只要服从决议，服从多数人决定的东西，少数人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见。在党内党外，容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是有好处的。错误的意见，让他暂时保留，将来他会改的。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真理，可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是少数。列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是少数。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经验，在陈独秀统治的时候，在“左”倾路线统治的时候，真理都不在领导机关的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他们的学说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不被多数人承认，反而被看作错误的东西，当时他们是少数。我们党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7—308页

不要给人乱戴帽子。我们有些同志惯于拿帽子压人，一张口就是帽子满天飞，吓得人不敢讲话。当然，帽子总是有的，刘少奇同志的报告里面不是就有许多帽子吗？“分散主义”不是帽子吗？但是，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在头上，弄得张三分散主义，李四分散主义，什么人都是分散主义。帽子，最好由人家自己戴，而且要戴得合适，最好不要由别人去戴。他自己戴了几回，大家不同意他戴了，那就取消了。这样，就会有很好的民主空气。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们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9页

有些同志还没有民主集中制的思想,现在就要开始建立这个思想,开始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11页

必需容许少数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有充分发表意见和保留意见的权利。

《对中央关于正确对待单干问题的规定草稿的修改》(一九六二年八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125页

3. 民主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其路线是:

1 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

2 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

3 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

4 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其办法是开活动分子会,或开

支部以至纵队的党员大会（须看环境的可能），派人出席作报告。

5 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地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89页

一部分同志，只看见局部利益，不看见全体利益，他们总是不适当地特别强调他们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总希望使全体利益去服从他们的局部利益。他们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们忘记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21页

这个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这个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8页

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9页

（二）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

1. 党内的团结党同人民的团结是争取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最基本条件

中央内部的团结一致，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

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等给任弼时的电报（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第586页

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8页

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最基本的条件。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5页

只要中央与高级干部是团结的，全党必能团结。

只要共产党团结，必然无坚不破。

《反投降提纲》（一九三九年六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28页

我们大会的方针是什么呢？应该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简单讲，就是一个团结，一个胜利。胜利是指我们的目标，团结是指我们的阵线，我们的队伍。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7页

起决定作用的一点是我们内部的团结，只要我们自己团结一致，敌人是不能压倒我们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8页

一九四五年四月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中央委员会和全党领导骨干，表现了比较抗日时期更为良好的团结。这种团结，使得我党能够应付日本投降以后整三年内国际国内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变，并在这些事变中使中国革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摧毁了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广大人民中的政治影响，抵抗了国民党的再一次叛变，打退了它的军事进攻，使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到了进攻。

《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42页

我们这次大会跟七大有相同的性质。那一次，为了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我们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那一次对政治问题的解决、对党内历史问题的解决，那一次的选举，达到了团结全党、使革命在全国胜利的目的。

《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00页

党内的关系如何，关系极大，关系到能不能团结全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

《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02页

团结旗帜的必要。为全民族在几个五年内建成强大国家，必需铁的纪律，必须团结起来。

《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一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522页

我们要全国民众团结起来，用团结的力量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用团结的力量去建立一个新中国。然而这不是一件短时期的工作，所以我们必须“继续努力，以求贯彻”。

在抗大第四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一九三八年八月一日），重庆
《新华日报》1938年9月1日

团结自己，团结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团结知识分子，团结一切革命的人民。这是极大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这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责任，这是整个工人阶级的责任。

《〈中国工人〉发刊词》（一九四〇年二月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27页

有两种团结是绝对必要的：一种是党内的团结，一种是党同人民的团结。这些就是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全党同志必须珍爱这两个无价之宝。

《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2页

我们的党，在北伐战争时期，不超过六万党员，后来大部分被当时的敌人打散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不超过三十万党员，后来大部分也被当时的敌人打散了。现在我们有了一百

二十多万党员，这一回无论如何不要被敌人打散。只要我们能吸取三个时期的经验，采取谦虚态度，防止骄傲态度，在党内，和全体同志更好地团结起来，在党外，和全国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就可以保证，不但不会被敌人打散，相反地，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掉，并且在消灭他们之后，把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建设起来。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97页

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能团结多数人，团结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其他民主分子，那就不算是一个好共产党员。世界上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呢？要共产党干什么呢？共产党有无存在之必要呢？叶青说中国共产党没有存在之必要，那是反动派的提法，我们不赞成。我们自己也可以提出要不要共产党的问题，是因为世界上的小米太多，剩下了，非请我们吃不可，因此需要共产党，还是因为房子太多，专门要有一批房子给共产党住呢？当然都不是。世界上需要共产党，就是为了团结大多数人，组织军队，打倒敌人，建设新中国。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48页

以后在我们面前困难是一定会有的，但不管困难有多大，只要我们注意依靠和团结广大群众，就是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不管是共产党员或不是共产党员，只要是想把中国搞好的人，都要团结他们，这样困难就可以克服，……

《依靠群众办好铁路建设事业》（一九四九年七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06页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两年中，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些胜利，我们是依靠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才获得的。在国内，我们是依靠了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巩固团结。在国际范围内，我们是依靠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巩固团结以及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深厚同情。由于这样，我们就获得了各方面工作的伟大胜利，这是我们的敌人所没有料到的。

《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十一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84—185页

首先要使全党更加团结。……单有党还不行，党是一个核心，它必须要有群众。我们的各项具体工作，包括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等等工作，百分之九十不是党员做的，而是非党员做的。所以，要好好团结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一道工作。过去，在团结全党和团结党外人士方面，我们还有许多毛病。我们要在这次大会上和大会以后进行宣传教育，把这方面的工作好好加以改进。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7—88页

就国内的条件来说，我们胜利的获得，是依靠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并且广泛地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进行伟大的建设工作，在我们的面前，摆着极为繁重的任务。虽然我们有一千多万党员，但是在全国人口中仍然只占极少数。在我们的各个国家机关和各项社会事业中，大量的工作要依靠党外的人员来做。如果我们不善于依靠人民群众，不善于同党

外的人员合作，那就无法把工作做好。在我们继续加强全党的团结的时候，我们还必须继续加强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继续巩固和扩大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认真地纠正在任何工作环节上的任何一种妨害党同人民团结的不良现象。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15页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4页

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将变为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在这里，决定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9页

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目的一定可以达到。

《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一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524页

要把党内、党外的先进分子、积极分子团结起来，把中间分子团结起来，去带动落后分子，这样就可以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只有依靠这些团结，我们才能够做好工作，克服困难，把中国建设好。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6—307页

2. 团结是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

团结干部在党的路线周围。

《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与任务》(一九三七年九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0页

我们讲团结,是从团结全党出发,不是从团结一个山头出发,不是从团结小部分人出发。如果不谨慎,头一步走得就不对,就不是为了团结,第二步分析工作、批评工作也不很妥当,那末,落下去的地方就必然是不团结。

《时局问题及其他》(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57页

在党内,在革命队伍内,我们有一条方针,就是团结,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00页

我们要把我们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不论什么同志,只要他是愿意服从党纲、党章和党的决议的,我们就要和他团结。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97页

我们这次大会强调团结精神，就是要在一个原则下团结起来，在正确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是头脑清醒的团结，不是盲目的团结。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19页

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

《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27页

3. 全党必须团结在中央的周围

全党同志必须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任何破坏团结的行为都是罪恶，只要共产党人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会被我们战胜的。

《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2页

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7—298页

4. 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及犯过错误的同志一道工作

我们要下决心不怕麻烦，下决心和犯过错误的同志合作。你不大来，我就去；你口里有许多闲话，我长了耳朵，这个耳朵听不完那个耳朵听；你说那边窗户开得不够，我就连这边也打开。要练习和那些曾经同我闹过纠纷、有过原则分歧的人，打击过我以及开除过我的党籍的人合作。我们在要求他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这个原则下去同他团结、合作。这一条，的确要练习，不练习就做不到，练习就可以做到。

《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62页

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不论在地方上或部队里，都应该注意这一条。对党外人士也是一样。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们当中还有犯过很大错误的人，不要嫌这些人，要准备和他们一道工作。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43页

反对宗派主义，特别值得谈一下的，就是要团结那些跟自己作过斗争的人。他跟你打过架，把你打倒在地，你吃了亏，脸上无光，而你并不那么坏，却封你一个“官”，叫机会主义者。至于打得对的，那就应该打，你本来是机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打呢？我这里是讲打得不对的，斗争得不对的。如果那些人

后头改变了态度，承认打你打错了，封你为机会主义王国的国王是不妥的，只要有这一条就行了。如果个别的人还不承认，可不可以等待呢？也可以等待。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至于那个意见相同的，已经团结了，就不发生团结的问题了。问题就是那个还没有团结的。所谓还没有团结的，就是那些意见不相同的，或者缺点大的。比如，现在我们党里头，有许多组织上入了党而思想上还没有入党的人，他虽然没有跟你打过架，交过手，但是因为他思想上还没有入党，于是乎做的事情就势必不很妥当，有些缺点，或者做出一些坏事。对这一部分人，要团结他们，教育他们，帮助他们。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92页

5. 创造团结和睦的条件和气氛，各方面干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帮助

遵义会议与克服张国焘错误之后，我们的党是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最团结最统一的时期了。现在我们党内，无论在政治路线上，战略方针上，时局估计与任务提出上，中央委员会与全党，意见都是一致的。这种政治原则的一致，是团结的基本条件。党员与党员，干部与干部，领导者与领导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习惯上所谓人事关系，我们也学会了许多正确的恰当的方法，造成了在正确政治原则下的和衷共济的空气，有了更好的相互关系。由于地区的广大，情况的复杂，工作部门的不同，不同的意见是难免的，应该的，党内民主的实际，就是

容许任何不同意见的提出与讨论。也正是由于民主方法，保证着交换意见，并使之概括起来作出结论，形成全党一致的方针。在这里，客观地与全面地看问题的态度，不杂主观成见与意气，不要片面的看问题，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我们也逐渐地学会了，这又保证着党的团结。我们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自以为是的成见与意气用事的作风，是无用的长物。经过了十七年锻炼的中国共产党及它的领导人员，已经有了老练的作风了。所有这些，就能保证中央以至全党的团结一致，就能在全民族中形成一个团结一致的核心与重心，推动抗战进到胜利。同志们，全党团结起来，全民族团结起来，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论新阶段》（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60—661页

亲爱的同志们，摆在我们肩头的任务是很重大的。完成这些任务，必须要依靠我们全体更加百倍的团结和发扬忍苦耐劳，永不疲倦的战斗意志。我们应当在上下级间，在指挥员与战士间，在全体人员相互间，认真加强团结友爱，互相照顾的关系，克服其间的任何冷酷无情、不知友爱和隔阂与不团结现象，在这种钢铁般的团结与艰苦奋斗的努力下面，便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没有什么障碍不能战胜，没有什么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增长力量，准备反攻》（一九四二年三月四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78页

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

《给陈毅的信》（一九四四年四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27页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为人民服务》（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05页

一切不公不平之事，必须使之归于公平，以利团结对敌。

《给陈毅的信》（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29页

一切同志，要在这个历史决议案下团结起来，像决议案上说的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过去常说，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那是写文章的词藻。我们这回说，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家庭是有斗争的，新家庭里的斗争，是用民主来解决的。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7页

我们要把同志看成兄弟姊妹一样，从这里能得到安慰，疲劳了，可以在这里休息休息，问长问短，亲切得很。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7页

一切妨害团结的现象，都在必须克服之列。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39页

我们党并不是完全统一的，我们还需要更高的统一，更高

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民主，没有民主，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把意见搞清楚是不可能团结的。许多不公平的事情要逐渐走向公平。哪一天都有不公平的问题，因此我们哪一天也要解决问题。问题是解决了又发生，发生了又解决，我们就是这样地前进。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39页

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朋友，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同我们共产主义者需要更懂得团结，更懂得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懂得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就更能团结，人家就打不散我们。

《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演说》（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37页

各领导干部必须十分虚心，力戒骄傲，十分谨慎，力戒浮躁，十分团结，避免并逐步消除可能的意见分歧，在情况许可条件下实行委员会的民主讨论，集中多数同志的意见，然后坚决执行之。

《南下部队应依据五岭山脉建立根据地》（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40页

我们党中央也是一样，我们党内要有民主，就是对同志要有同志的、朋友的、兄弟的、姐妹的态度。全党团结一致，一百多万党员团结一致，什么敌人我们也不怕。

《在抗大七分校的讲话》（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49页

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不做。

《对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修改》（一九五四年一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435页

在共产党人方面，我们要给这些合作者创造有利的条件，要同他们建立同志式的良好的共同工作关系，要团结他们一起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6页

团结中就包含不团结，有意见分歧就转化为斗争，不可能天天团结，年年团结。讲团结，就是因为有不团结。人总是参差不齐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永久的、无条件的。不团结也是无条件的，讲团结时还有不团结，因此要做工作。只讲团结一致，不讲斗争，不是马列主义。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斗争，才能达到新的团结。团结转化为斗争，斗争再转化为团结。不能光讲团结和一致，不讲矛盾和斗争。苏联就只强调一致，不讲矛盾，特别是不讲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没有矛盾和斗争，就没有世界，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老讲团结，就是“一潭死水”，就会冷冷清清。一潭死水好？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后浪逐前浪好？要打破旧的团结基础，经过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党是这样，阶级是这样，人也是这样。团结、斗争、团结，这就有工作做了。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73页

事关大局，出以公心，不应当避嫌。我历来认为，同志之

间有隔阂，有问题，应当耐心商量，多做谈心工作，不宜急躁，也不应久拖不决。

《在李德生报告上的批语》（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228页

党应好好保护新党员新干部，主要责任在老党员老干部身上。新老党员新老干部之间，一定要搞好，如弄不好，老党员老干部负其主责。有完全的理由给新党员新干部以原谅，而对老党员老干部则没有这种理由。此问题过去存在着某些不正确观点。这事，与主力部队和地方游击部队的关系大略相同。

要从新党员中提拔大批的干部。

《反投降提纲》（一九三九年六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32—233页

要提拔地方干部。没有地方干部——中级的，高级的，不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反对“钦差大臣”的倾向，反对轻视“土包子”，取消“土包子”这个称呼。

《反投降提纲》（一九三九年六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33页

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必须团结，必须反对宗派主义倾向。因为许多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新四军到后才创立的，许多地方工作是外来干部去后才发展的，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必须加以很好的注意。我们的同志必须懂得，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完全团结一致，只有本地干部大批地生长了，并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内才能生根，否则是不可能的。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必须

互相取长补短，才能有进步。外来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这些方面，总要差些。拿我来说，就是这样。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的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一些陕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我们到山西、河北、山东以及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同志，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不但如此，即在一个根据地内部，因为根据地内的各个区域有发展先后之不同，干部中也有外来本地之别。比较先进区域的干部到比较落后的区域去，对于当地，也是一种外来干部，也要十分注意扶助本地干部的问题。就一般情形说来，凡属外来干部负领导责任的地方，如果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弄得不好，那末，这个责任主要地应该放在外来干部的身上。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同志，其责任就更大些。现在各地对这个问题的注意还很不够，有些人轻视本地干部，讥笑本地干部，他们说：“本地人懂得什么，土包子！”这种人完全不懂得本地干部的重要性，他们既不了解本地干部的长处，也不了解自己的短处，采取了不正确的宗派主义的态度。一切外来干部一定要爱护本地干部，经常帮助他们，而不许可讥笑他们，打击他们。自然，本地干部也必须学习外来干部的长处，必须去掉那些不适当的狭隘的观点，以求和外来干部完全不分彼此，打成一片，而避免宗派主义倾向。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22—823页

军队干部必须帮助地方干部，地方干部也必须帮助军队干部。如有纠纷，应该双方互相原谅，而各对自己作正确的自我批评。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23页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问题。抗战以来，我党有广大的发展，大批新干部产生了，这是很好的现象。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老干部通常总是不多，比所需要的数量少，而且由于宇宙自然法则的关系，他们已部分地开始衰老死亡下去。”他在这里讲了干部状况，又讲了自然科学。我们党如果没有广大的新干部同老干部一致合作，我们的事业就会中断。所以一切老干部应该以极大的热忱欢迎新干部，关心新干部。不错，新干部是有缺点的，他们参加革命还不久，还缺乏经验，他们中的有些人还不免带来旧社会不良思想的尾巴，这就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残余。但是这些缺点是可以从教育中从革命锻炼中逐渐地去掉的。他们的长处，正如斯大林说过的，是对于新鲜事物有锐敏的感觉，因而有高度的热情和积极性，而在这一点上，有些老干部则正是缺乏的。新老干部应该是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以便团结一致，进行共同的事业，而防止宗派主义的倾向。在老干部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地方，在一般情形之下，如果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弄得不好，那末，老干部就应该负主要的责任。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24—825页

从前我们批评内战时期白区工作的领导路线有问题，有某些时候应该说是错误，因而使白区工作受了很大的损失。过去说损失百分之百，现在看没有到那样的程度，还剩下一些，大部分是损失了。领导路线是错误的，应该受批评。批评的目的，是为了今后好好地工作，不要再犯那样的错误，并不是说所有在白区工作的同志、干部没有功劳。这就像南方根据地丢掉了，

并不等于说红军战士和干部、地方同志和干部他们没有功劳，没有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一样。白区工作的同志中，没有坐过班房还活着的、没有坐过班房牺牲了的、坐过班房还活着的、坐过班房牺牲了的这几部分人，他们为党为无产阶级作了英勇斗争，他们拿着命去拼，因为这样才坐了班房，少数侥幸逃脱的没有坐班房，应该估计到他们斗争的成绩。

《时局问题及其他》（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67页

在推进解放区的各项工作时，必须十分注意扶助本地人管理本地的事业，必须十分注意从本地人民优秀分子中大批地培养本地的工作干部。一切从外地去的人，如果不和本地人打成一片，如果不是满腔热情地勤勤恳恳地并适合情况地去帮助本地干部，爱惜他们，如同爱惜自己的兄弟姊妹一样，那就不能完成农村民主革命这个伟大的任务。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91页

缺点中间有一个，就是背上了一点东西，比如讲多走了路，多走了二万五千里，就增加了身上的包袱。我不是讲每一个同志，或者具体指某些同志，请同志们不要见怪。但是有相当一些同志，走了二万五千里，变成了一个包袱，增加了他的负担，变成了一个驼子，因为他背的包袱太大了。……青年同志也有他们的包袱。他们的眼睛尖，耳朵听得很远，眼明手快，这是他们的长处，但青年同志说老头子“昏庸老朽”，那可不行。青年同志不要讲人家“昏庸老朽”，老头子也不要讲人家“年幼无知”。大家都是从幼年来，年幼知道得少，会慢慢地多

起来。人家懂得的东西不如你知道得多，但你也不是什么都知道。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44—345页

我们每到一处，不要当钦差大臣，要先看到人家的长处。大家都是新民主主义解放区的，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同志，不应该发生看不起的问题。内战时期我们曾在这个问题上吃了很大的亏。我们延安的同志大多进过党校，在座的同志是参加七大的，你们懂得的东西更多，这是很好的。将来出去，人家一定很尊重你们，需要你们去传达七大精神，大家眼望延安，信仰延安，但是同志们，我们一定要采取上面所说的态度，不当钦差大臣，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鉴于历史上受了很大的痛苦，不自觉的盲目性实在要不得，要来一个自觉性，自觉地注意这一点。每到一个地方，就要尊重那个地方的人民，那个地方的军队，那个地方的政府，跟他们搞好关系。这是共产党员的义务。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46页

在座的多数同志是老干部，因为你们富有经验，领导正确，所以被选为代表，这是很好的。在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做工作的同志，数目虽小，没有他们却不行，因为他们很有经验。但是如果把经验当作包袱，那就不好，要轻轻快快。对同志们讲一个数目吧！现在，抗战时期入党的有一百一十几万，北伐和内战时期入党的顶多还有两万人，我们算一下，总共一百二十来万。这两万人的眼睛，不要只看着自己，还要看到那一百一

十几万。……两万人的眼睛要看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要尊重他们，不要使他们感觉这两万人是不好接近的，是不好谈话的，要谈话的时候，先要想几天几夜，跟你谈话时到底怎样讲法。要使他们像胡适之说的“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也就是要打成一片，使新老干部团结起来。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47—348页

老干部与新干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其实质就是一个同农民的关系问题，现在如此，将来还要加上一个同城市人民的关系问题。我们三番五次地讲这个问题，远的不说，就讲一九四二年开始的整风提出的宗派主义倾向，就包括了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这些问题在内。这两个问题是带历史性质、普遍性质的问题，是历史的、普遍的问题，不是暂时的、个别的问题。了解这一点，我们就明白这个问题是从农业地区革命斗争中提出来的，因为我们长期活动在农业地区，因此是农业地区的长期的、普遍的问题，或者是历史的、普遍的问题。为什么是历史的问题呢？同志们想一想，内战时期苏区为什么垮台，路线问题当然是一个原因，但与这个问题也有关系的，就是对于当地人民总是不信任，外来人非常相信自己，因此使苏区垮台了。白区工作也是这样，“钦差大臣”一到哪个区域，那里的工作就跟着垮台。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01页

所有干部一样的光荣。各个方面军，各个军团，各个军队，都一样的光荣。在沦陷区、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同志，在解放

区工作的同志，都一样的光荣。军事工作、政权工作、经济工作、党务工作、文化工作，从事这五大门工作的同志，也是一样的光荣。不能说某些部分特别光荣，另外一部分就不光荣。过去我们有盲目性，做过一些不好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一个长期的严重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要承认各个部分都是一样的光荣，对于各个部分都要加以照顾，不要有一点态度不好，欺负任何一个部分，看轻任何一个部分。在这方面，凡是过去搞得不对的都要承认错误。今天，当着大会代表们的面我再讲这样几句，就是凡是我们的对不起人的事情，不论是我亲自做的还是别的同志做的，都应该承认错误，并且加以改正。军队的同志，地方的同志，凡是过去我们没有搞好的，估价不适当的，让你们恼了气的，我们都应该承认错误，修正错误。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06—407页

有各种技术工作干部，例如做通讯方面和经济方面带有技术性工作的干部，对做各种技术工作的同志，不论是军队里面的、政府里面的、党组织里面的，我们都要尊重他们，承认他们有功劳，全党同志要看得起他们，过去在政治待遇上搞得不好，今后要搞好。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07页

现在每个解放区，都有大批外来干部做各级领导工作。东北各省，此种情形尤为显著。对于这些外来干部，各地领导机关，务须谆谆告诫他们，以充分的热情和善意，爱护本地干部。将识别、培养和提拔本地干部，当作自己的重要任务。只有这样，我党在解放区才能

生根。外来人轻视本地人的作风，应当受到批评。

《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76—1177页

6. 巩固党的团结与统一，反对分裂，反对搞阴谋诡计

巩固党的组织和党内的团结与统一，提高铁的纪律。在目前，任何破坏党内的团结与统一的行为，都是最大地帮助了敌人。严厉地批评与纠正一切小组织的行动，加强对于党内原则的教育，提高党与主要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

《巩固与发展晋察冀根据地》(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215页

在反倾向的斗争中，反对两面派的行为，是值得严重地注意的。因为两面派行为的最大的危险性，在于它可能发展到小组织行动；张国焘的历史就是证据。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这就是两面派行为的表现。必须提高干部和党员对于两面派行为的注意力，才能巩固党的纪律。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2页

对于我们的党说来，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为鉴戒，务必使党内不要重复出现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他们的这种活动完全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采取的那一类丑恶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过：“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与意图是可耻的事。”我们是共产党

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91页

不准组织秘密集团。我们不怕公开的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这种人，当面不讲真话，当面讲的尽是一些假的、骗人的话，真正的目的不讲出来。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7页

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242页

（三）严格党的纪律

1. 党的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增强党的团结与统一的重要保证

十七年来，尤其是五中全会以来的党的斗争经验，证明了有在党内，八路军与新四军内，继续坚持铁的纪律的必要。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在过去，由于克服了张国焘一类破坏纪律的倾向，保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日战争的顺利执行。在今后，

又必须坚持这种纪律，才能团结全党，克服新的困难，争取新的胜利。

《论新阶段》（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51页

为什么说在组织问题上我们的党区别于资产阶级的政党，也区别于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因为像共产党这样的严肃性和纪律性，是任何其他阶级的政党所没有的。无产阶级是被压迫的阶级、手里没有权力的阶级，要从被压迫的地位、没有权力的地位求得解放，取得权力，非有严肃的纪律不可，必须坚持集中统一、思想一致、行动一致，保持党的纯洁性。这样的党，是自有政党以来从未有过的模范党派。

《时局问题及其他》（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60—261页

党这个军队同人民的其他军队比较有许多特点，它是先进的部队，是有组织的先进部队，比较别的组织更有组织性，更加严密，更加统一，共同为着一个目标奋斗。一个军队，要有统一纪律，要听号令：立正，稍息，向左看，向右看，开步走，瞄准放。不然敌人在前面，一个往东放，一个往西放，是要被敌人消灭的。党这个军队也是一样，没有统一纪律，没有民主集中制，没有民主或者没有集中都不行。……党是人民中优秀分子的结合，大家是自觉地愿意受约束，就是承认党纲、党章，服从党的决议案，愿意自我牺牲。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36—337页

2. 加强对党员的纪律教育，提高组织纪律性

经验证明：有些破坏纪律的人，是由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党的纪律；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张国焘，则利用许多党员的无知以售其奸。因此，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除了上述四项最重要的纪律外，还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8页

无论在军队或在地方，党内民主都应是为着巩固纪律和增强战斗力，而不是削弱这种纪律和战斗力。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9页

我党我军仍须稳步前进，不骄不躁，以求全胜。我们的口号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即可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94页

党章确实应当充分体现纪律性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没有纪律是不行的。但是纪律太死了也不行，妨碍创造性的发挥，这样的纪律是不好的，应当不要。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54页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多好呀。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再就是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对人民，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要耍骄傲，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

《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249页

3. 党内最重要的纪律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90页

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8页

在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强调要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多数服从少数，这个少数是代表多数的）。

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二日）

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7页

4. 严肃党纪，对党员要执行比群众更加严格的纪律

严格地执行纪律，废止对纪律的敷衍现象。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90页

中国人民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不允许在它的行列中有官吏的舞弊。对于侵吞公款，和盗窃财产的任何犯罪者，规定严重的处罚，在最严重的场合是死刑。犯有这样罪状，共产主义者，是比非共产主义者更重地处罚着。

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一九三六年七月、九月）

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给雷经天的信》（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9页

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说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

厉害，还硬，这是上了书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上就有。

《关于整顿三风》（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16页

共产党员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有一些丧失朝气、丧失革命意志和坚持错误的人，在屡戒不改的情况下，党委应当予以正当处理，重者绳之以纪律。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九五七年七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47—548页

5. 健全请示报告制度，加强集中统一，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

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方法。报告文字每次一千字左右为限，除特殊情况外，至多不要超过两千字。一次不能写完全部问题时，分两次写。或一次着重写几个问题，对其余问题则不着重写，只略带几笔；另一次，则着重写其余问题，而对上次着重写过的只略带几笔。综合报告内容要扼要，文字要简练，要指出问题或争论之所在。

《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64—1265页

我们所以规定这项政策性的经常的全面的报告和请示的制

度，是因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仍然有一些（不是一切）中央局和分局的同志，不认识事先或事后向中央作报告并请求指示的必要和重要性，或仅仅作了一些技术性的报告和请示，以致中央不明了或者不充分明了他们重要的（不是次要的或技术性的）活动和政策的内容，因而发生了某些不可挽救的、或难以挽救的、或能够挽救但已受了损失的事情。而那些事前请示、事后报告的中央局或分局，则避免了或减少了这样的损失。从今年起，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改正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各中央局和分局是受中央委任、代表中央执行其所委托的任务的机关，必须同中央发生最密切的联系。各省委或区党委，同各中央局和分局也须密切联系。当此革命已进入新的高潮时期，加强此种联系，极为必要。

《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65页

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并且照过去规定，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从今年起，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此项报告和请示的内容是：关于该军纪律，物质生活，指战员情绪，指战员中发生的偏向，克服偏向的方法，技术、战术进步或退步的情况，敌军的长处、短处和士气高低，我军政治工作的情况，我军对土地政策、城市政策、俘虏政策的执行情况 and 克服偏向的方法，军民关系和各阶层人民的动向等。

《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65—1266页

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于自己攻占及管理的城市似乎还

没有作过一次认真的研究，亦没有将城市工作的比较完全的经验向中央作过反映。……像石家庄这样重要的经验，是由中工委总结的。两年前张家口的经验，我们是从中工委的丑皓电才看到的。这种在重大问题上（不是小问题或技术问题，而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极端恶劣的习惯，在七大以后并未根绝，现在已相当严重地影响了党的工作的发展。

《各地应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71—72页

没有全般的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中国革命是永远不能胜利的。最可怕的是领导同志的自满自是，自己缺乏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而又对中央的指示熟视无睹（不细看这些指示，不研究这些指示，忙于不应当忙的事务工作，而忽视了策略指导与政策指导这种自己责任上的主要工作）。我们要求你们每两个月做一次（每年共六次）的综合性的工作报告，就是要求你们将这种策略与政策的规定、策略与政策在实行后的结果及根据这种结果而作出的你们的自我检讨（这些就是你们日常工作的主要工作）向我们作报告。

转发邓小平黄齐电给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负责同志的电报（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四日），《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卷第295页

中央不止一次地向各地各军领导同志指出，中央的一切政策必须无保留地执行，不能允许不得中央同意由任何下级机关自由修改。但在日本投降以后的两年多时间内，不少地方在关于土地改革的政策方面，在关于工商业及工运的政策方面，在关于打人杀人的政策方面，在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面，在宣传教育的政策方面，以及在其他某些方面，地方党和军队的领导机

关不得中央同意，甚至不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即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前委及其他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的同意，自由地迫不及待地粗率地冒险地规定及执行明显地违背中央路线和政策的某些政策。地方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恶劣作风，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恶劣作风，多报功绩少报（甚至不报）错误缺点的恶劣作风，对于原则性问题粗枝大叶缺乏反复考虑慎重处置态度的恶劣作风，不愿精心研究中央文件以致往往直接违反这些文件中的某些规定的恶劣作风，仍然存在。所有这些不良现象，中央要求一切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严肃地注意加以改变，并指导所属中级及下级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同样严肃地注意加以改变，一遇此类现象，立即明确地毫不含糊地予以指出并予以纠正。

《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一九四八年四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86页

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我党已经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直接的道路上，这一形势要求我们全党全军首先在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面，在军事上的战略及重大战役方面的完全统一，经济上及政府行政上在几个大的区域内的统一，然后按照革命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地考虑在军队的编制和供应上，在战役行动的互相配合上，以及在经济上在政府行政上（那时须建立中央政府）作更大的统一。

总之，革命形势要求我党缩小（不是废除）各地方各兵团的自治权，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而在各地区和各部分则统一于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据我们所知，各地区和各部分的内部对于受中央委托的机关存在着极大的极不正常的和极有害的不统一状态）。各地领导同志必须迅速

完成在这方面的一切必要的精神准备和组织准备。

《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一九四八年四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86—87页

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

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封面上的批语（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卷第303页

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即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将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这种状态，给予革命利益的损害，极为巨大。各级党委必须对这一点进行反复讨论，认真克服这种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

《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32页

希望你们严格督促所属厉行报告制度，你们则应以身作则严格遵守对中央的报告制度，……彻底消灭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正确态度，彻底纠正存在着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

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严格执行报告制度给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的指示（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卷第327页

在军队中对于重要的训练计划和作战计划、训练经过和作战经过、政策教育和执行政策经过等重大事项，事前既不请示，事后又不报告，仍然将自己所指挥的野战兵团或军区机关部队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对于中央发动党内反对这种无纪律状态的危险倾向，仍然没有认真的检讨和反省这样一种现象，是还没有完全消灭的。我们现在向一切兵团及军区的负责同志们提出警告，在战争第三年内，我们将要求你们严格执行及时的和完备的报告制度，将这件事作为一种绝对不允许违反的指令。对于事前请示事后报告的内容，必须是有分析有结论的，而不是空洞无物的；必须是既说优点长处，又说缺点错误，而不是只说优点长处不说或少说缺点错误的。

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各野战军、各军区及各中央局、分局的电报（一九四八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卷第 335 页

你们这次检讨是有益的，这样，你们就可以脱出被动状态，取得主动。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没有像你们现在所作的这种认真的自我批评，就不可能脱出被动，取得主动，就不可能克服完全不适用于现在大规模战争的某种严重地存在着的经验主义、游击主义、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就不可能克服在你们领导之下的各部门各党委（首先是军队）同样存在着的这种不良现象。不但你们应当作此种自我批评（你们已经作了），一切中央局、分局、军区及前委均应当作此种自我批评（他们还未作）。……这一问题的性质是如此重要，即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由小规模的地方性的游击战争过渡到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正规战争，由局部胜利过渡到全国胜利。这是许多环节在目前时期的一个中心环节，这一个环节问题解决了，其他环节就可以

顺利解决。

《执行报告制度的重要性》(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25页

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及前委克服自己及自己属下的经验主义、游击主义、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仿照东北局办法,在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及前委的一次至几次会议上加以认真检讨,实行自我批评,规定克服办法,仍有完全必要。不能因为做几次综合报告,就不检讨这个长期在党内首先在各高级领导机关内存在着尚未解决仅在近来才开始认真解决的关系重大的问题。

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各地改进向中央做综合报告工作的指示(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卷第337页

现在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在党内已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从中央机关、中央代表机关,一直到各地,报喜不报忧,瞒上不瞒下,封锁消息。村有杀人之权。一个干事可以把一个大工厂的厂长(资本家)搞死,九个照顾变成了九个不照顾,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一些人因为没有分田,他们嗷嗷待哺。这些状态必须改变。中央同志要以全力来做这件事,要在战争的第三年内,在全党全军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一九四八年九月),《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38—139页

由于我党我军在过去长时期内是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并且是农村的环境之下,我们曾经允许各地方党的和军事的领导机关保持着很大的自治权,这一种情况,曾经使得各

地方的党组织和军队发挥了他们的自动性和积极性，渡过了长期的严重的困难局面，但在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损害了革命事业。目前的形势，要求我党用最大的努力克服这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使战争由游击战争的形式过渡到正规战争的形式。

《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46页

（四）发展和整顿党的组织，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1. 为了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共产党必须发展自己的组织

凡属同意党的纲领政策而工作中表现积极的分子，不念其社会关系如何，均应广泛地吸收入党，尤其是陕甘支队及二十五军经过长征斗争的指战员，应更宽广地吸收入党。……凡属经过长征的分子，一律免除候补期。

同周恩来给彭德怀、杨尚昆等的电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第500—501页

普遍地建立共产党组织，注意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到处应该有秘密党的组织。

《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一九三七年十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57页

大大发展党，建立与健全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办一两个较大的学校训练政治军事群众团体及政府的干部，党办训练班。

《以最快速度创造巩固的冀晋豫根据地》（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204页

为了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共产党必须扩大自己的组织，向着真诚革命、信仰党的主义、拥护党的政策、并愿意服从纪律、努力工作的广大工人、农民和青年积极分子开门，使党成为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党。在这里，关门主义倾向是不能容许的。但是在同时，对于奸细混入的警觉性也决不可少。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机关，时刻企图破坏我们的党，时刻企图利用暗藏的汉奸、托派、亲日派、腐化分子、投机分子，装扮积极面目，混入我们的党里来。对于这些分子的警惕和严防，一刻也不应该放松。不可因为怕奸细而把自己的党关起门来，大胆地发展党是我们已经确定了的方针。但是在同时，又不可因为大胆发展而疏忽对于奸细分子和投机分子乘机侵入的警戒。只顾一方面，忘记另一方面，就会犯错误。“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这才是正确的方针。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3—524页

大量地发展党，吸收进步分子入党，建立连队的支部和生活，使之成为领导连队斗争的核心。一切忽视党的发展与工作，是目前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最有害的。

《长期艰苦奋斗创造冀热察根据地》（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五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414页

巩固党问题（组织上的紧缩政策）。去年三月会议决定大大

发展党之后，党已在全国有了大数量的发展。现在的任务是巩固它，故须暂时地一般地停止发展。当然不是一个也不准入党，有些地方还是应发展。停止发展为的是便于清理、除奸和教育，将来还是要再发展的。

《反投降提纲》（一九三九年六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32页

只要是愿意抗日的比较忠实的比较能吃苦耐劳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多方吸收，加以教育，使他们在战争中在工作中去磨练，使他们为军队、为政府、为群众服务，并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

《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19页

在这种大量吸收政策之下，毫无疑义应该充分注意拒绝敌人和资产阶级政党派遣进来的分子，拒绝不忠实的分子。对于这类分子的拒绝，应取严肃的态度。这类分子已经混进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和政府者，则应依靠真凭实据，坚决地有分别地洗刷出去。但不要因此而怀疑那些比较忠实的知识分子；要严防反革命分子陷害好人。

《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19页

我们共产党不是谁想入就能入，党章规定要经过支部大会表决通过，入党是有条件的，但出党是自由的。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85页

在一切新占领区域必须谨慎地发展党的组织。对于上层知

识分子入党尤须采取严格地审查的方针，在大城市内尤其要注意这一点，宁少勿滥。

《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34—235页

鉴于我们的党已经发展到四百五十万人，今后必须采取谨慎地发展党的组织的方针，必须坚决地阻止投机分子入党，妥善地洗刷投机分子出党。必须注意有步骤地吸收觉悟工人入党，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分。在老解放区，一般地应停止在农村中吸收党员。在新解放区，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前，一般地不应在农村中发展党的组织，以免投机分子乘机混入党内。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72页

城市及新区建党必须采取慎重的方针。城市着重在产业工人中建立党的组织。乡村须在土改完毕始能吸收经过教育合于党员条件者建立党的支部，在头两年内乡村支部一般不要超过十个党员。无论在城市和乡村，均应对于愿意接受党的教育的积极分子，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经过这种教育然后将其中确实合于党员条件者吸收入党。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46页

在一切大的和中等的私营企业的工人、店员中建立党的支部，加强党的工作。

《关于“三反”、“五反”》（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九五二年五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01页

各地党组织都没有注意吸收甚至拒绝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关门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必须纠正。

《对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477页

2. 为纯洁党的队伍，必须整顿党的组织

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75页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七年，十一年时间内，我们党的组织，由几万党员，发展到了二百七十万党员，这是一个极大的跃进。这使我们的党成了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党。这使我们有可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并打退蒋介石的进攻，领导一万万以上人口的解放区和二百万人民解放军。但是缺点也就跟着来了。这即是有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混进了我们的党。他们在农村中把持许多党的、政府的和民众团体的组织，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歪曲党的政策，使这些组织脱离群众，使土地改革不能彻底。这种严重情况，就在我们面前提出了整编党的队伍的任务。这个任务如果不解决，我们在农村中就不能前进。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52—1253页

这种严重情况,就在我们面前提出了整编党的队伍的任务。……党的全国土地会议彻底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并规定了适当的步骤和方法。这些步骤和方法,现在正和平分土地的决定一道在各地坚决地实施。其中首先重要的,是在党内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彻底地揭发各地组织内的离开党的路线的错误思想和严重现象。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53页

全党同志必须明白,解决这个党内不纯的问题,整编党的队伍,使党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个方向,并领导他们前进,是解决土地问题和支援长期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的环节。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53页

在整党问题上,关于既反对忽视成分、又反对惟成分论的宣传,有些地区不够有力,甚至有惟成分论的错误宣传。

《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81页

关于整理党的基层组织的工作,你们已经根据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采用晋察冀解放区平山县的整党经验,即是邀集党外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党的支部会议,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借以改变党的组织的成分不纯或者作风不纯的现象,使党和人民群众密切地联系起来。你们这样做,将使你们有可能健全地完成对于党的组织的全部整理工作。

对于那些犯了错误但是还可以教育的、同那些不可救药的分子有区别的党员和干部，不论其出身如何，都应当加以教育，而不是抛弃他们。你们已经执行了或者正在执行着这个方针，这也是对的。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08页

这种违反政策及命令主义的工作作风，是不能忍耐的，必须实事求是，彻底检查，切实纠正，并以结果报告中央。各省各县有同样情形的，必须检查纠正，并厉行整党整干，彻底纠偏。

《中央关于转发北京市委摘报的一封来信的批语》（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一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335页

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这是主要方面，必须加以肯定，并向各级干部讲明白。但是存在着问题，必须加以整理，并对新区建党采取慎重的态度，这方面也要讲明白。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45页

整党，应以三年时间实现之。其步骤，应是以一年时间（一九五一年）普遍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使所有党员明白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并训练组织工作人员。同时，进行典型试验。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45—146页

军事系统各部门，特别是后勤部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

义的情况极为严重。很多党员，甚至负责干部，沉埋于事务工作，政治思想极不发展，党内生活极不健全，因此许多人陷入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许多人本位主义极为浓厚，只顾小局，不顾大局。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必须在整个军事系统，特别着重在后勤部门，展开整党整风，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严重斗争，并号召一切指战员参加这个斗争。

《关于“三反”、“五反”》（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九五二年五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91页

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关于无产阶级政党也要吐故纳新的谈话》（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436页

3. 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提高党支部及党员作用。支部不但是发展党员教育党员的学校，而尤其应当成为连队的坚强堡垒。每个党员不仅是模范战士，而同时是非党群众的领导者。

《对山东军事工作的意见》（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六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501页

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在政府、参议会及一切已有或应有党外人员工作的部门中，党支部的任务是：对于党员进行党的教育，领导党员成为工作的模范，团结党外人员，保证该部门工作任务的完成。

《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一九四二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96页

农村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基层党的活动削弱了,党不管党,只管行政。

《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七月二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81页

企业跟军队一样,一通到底嘛!党委管思想,管政治,管仲裁(冲突),管人,实行监察嘛!

《按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办法要改》(一九六四年一月七日),《党的文献》1993年第2期

(五) 健全党委制

1. 要贯彻民主集中制,必须加强党的集体领导

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关键是巩固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我们历来是反对分散主义的。……

集中与分散是经常矛盾的。进城以来,分散主义有发展。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问题,都要先由党委讨论决定,再由政府执行。比如,在天安门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拆除北京城墙这些大问题,就是经中央决定,由政府执行的。次要的问题,可以由政府部门的党组去办,一切问题都由中央包下来就不行。反对分散主义,是最得人心的,因为党内大多数同志是关心集体领导的。对待集体领导的态度,党内有三种人:第一种人关心集体领导。第二种人不甚关心,认为党委对他最好不管,管也可以。“最好不管”是缺乏党性,“管也可以”是

还有党性。我们要抓他“管也可以”，对缺乏党性要说服教育。不然，各部都各搞各的，中央管不了各部，部长管不了司局长，处长管不了科长，谁也管不了谁，于是王国甚多，八百诸侯。第三种人是极少数，他们坚决反对集体领导，认为最好永远不管。在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强调要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多数服从少数，这个少数是代表多数的）。有意见请提，破坏党的团结是最没有脸的。只有靠集体的政治经验和集体的智慧，才能保证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保证党的队伍的不可动摇的团结一致。

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二日）

集体领导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党组织的最高原则，它能防止分散主义，它能防止党内个人野心家的非法活动（如像中国的张国焘，……），因此必须特别强调和认真实行党组织的集体领导制度，而决不可以不适当地过分地去强调任何个人的英雄作用，决不可以使共产党员由满腔热情地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

《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七日、十三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407页

还有些同志老是很喜欢分散主义，闹独立性，甚至闹独立王国，觉得独裁很有味道。原先是图舒服，立起一个王国来，自己称王。结果怎样呢？结果搞得很不舒服，要受批评。不是有个《大登殿》的戏吗？看那个薛平贵做起王来很舒服，他那个时候没有自我批评。这一点不好。有许多人总是不爱跟人家商量一下。许多同志口里赞成集体领导，实际上十分爱好个人独

裁，好像不独裁就不像一个领导者的样子。当一个领导者不一定要独裁，你晓得！资产阶级有个资产阶级民主，它讲究阶级独裁。无产阶级、共产党也要搞阶级独裁，如果搞个人独裁，那就不好。有事情总是应当跟人家商量一下，在一个集体中间通过，集中多数人的智慧，这比较好。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结论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

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共产党人对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9页

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

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4—295页

同志们，你们回去，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县委的同志，要引导公社党委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首先要建立和加强集体领导。不要再实行长期固定的“分片包干”的领导方法了，那个方法，党委书记和委员们各搞各的，不能有真正的集体讨论，不能有真正的集体领导。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10页

2. 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的重要制度；实行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结合

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近查有些（当然不是一切）领导机关，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甚为浓厚。重要问题的解决，不是由党委会议做决定，而是由个人做决定，党委委员等于虚设。委员间意见分歧的事亦无由解决，并且听任这些分歧长期地不加解决。党委委员间所保持的只是形式上的一致，而不是实质上的一致。此种情形必须加以改变。今后从中央局至地委，从前委至旅委以及军区（军分会或领导小组）、政府党组、民众团体党组、通讯社和报社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当然不是无关重要的小问题或者已经会议讨论解决只待执行的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

地委、旅委以下的党委亦应如此。高级领导机关的部（例如宣传部、组织部）、委（例如工委、妇委、青委）、校（例如党校）、室（例如研究室），亦应有领导分子的集体会议。……委员会又须分别为常委会和全体会两种，不可混在一起。此外，还须注意，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

《关于健全党委制》（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40—1341页

鉴于种种历史教训，鉴于个人的智慧必须和集体的智慧相结合才能发挥较好的作用和使我们在工作中少犯错误，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继续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偏向。必须懂得，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这两个方面，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相结合的。而个人负责，则和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个人独裁，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91—392页

在省、地、县三级或者在省、地、县、乡四级的干部会议上，讨论一次党的领导原则问题。讨论一下这些原则是否正确：“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这几句话里，关于党委的责任，是说大事由它首先作出决定，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加以检查。“大权独揽”是一句成语，习惯上往往指的是个人独断。我们借用这句话，指的却是主要权力应当集中于中央和地方党委的集体，用以反对分散主义。难道大权可以分揽吗？这八句歌诀，产生于一九五三年，就是为了反对那时的分散主义而想出来的。所谓“各方去办”，不是说由党员径直去办，而是一定要经过党员

在国家机关中、在企业中、在合作社中、在人民团体中、在文化教育机关中，同非党员接触、商量、研究，对不妥当的部分加以修改，然后大家通过，方才去办。第三句话里所说的“原则”，指的是：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和个人作用的统一（党委和第一书记的统一），中央和上级的决议。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5—356页

真正的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结合，这个制度必须认真执行。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一九五八年五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204页

3. 党委书记要当好“班长”，充分发挥党委“一班人”的作用

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党的委员会有一二十个人，像军队的一个班，书记好比是“班长”。要把这个班带好，的确不容易。目前各中央局、分局都领导很大的地区，担负很繁重的任务。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党委要完成自己的领导任务，就必须依靠党委这“一班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书记要当好“班长”，就应该很好地学习和研究。书记、副书记如果不注意向自己的“一班人”作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不善于处理自己和委员之间的关系，不去研究怎样把会议开好，就很难把这“一班人”指挥好。

如果这“一班人”动作不整齐，就休想带领千百万人去作战，去建设。当然，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这同班长和战士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这里不过是一个比方。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40页

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不仅“班长”要这样做，委员也要这样做。不要在背后议论。有了问题就开会，摆到桌面上来讨论，规定它几条，问题就解决了。有问题而不摆到桌面上来，就会长期不得解决，甚至一拖几年。“班长”和委员还要能互相谅解。书记和委员，中央和各中央局，各中央局和区党委之间的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40—1441页

“互通情报”。就是说，党委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这对于取得共同的语言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不是这样做，而是像老子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结果彼此之间就缺乏共同的语言。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41页

（六）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

1.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经济建设运动的开展，需要有很大数量的工作干部。这不是几十几百人的事，而是要有几千人几万人，要把他们组织起

来，训练起来，送到经济建设的阵地上去。他们是经济战线上的指挥员，而广大群众则是战斗员。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25页

干部问题是一个有决定作用的问题，我们向你们屡次提出这个问题，不是单从发展一军团的观点出发，而是从发展北方以至全国的革命武装力量出发，要求你们在原则上与实际上更大与更具体的注意。

《东渡前抓紧提拔干部》（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三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436页

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7页

要作为一种任务，在全党和全国发现许多新的干部和领袖。我们的革命依靠干部，正像斯大林所说的话：“干部决定一切。”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7页

只有依靠成千成万的好干部，革命的方针与办法才能执行，全面的全民族的革命战争才能出现于中国，才能最后战胜敌人。

《目前的时局和方针》（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63—64页

在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斗争中，已经涌出并正在继续涌出很多的积极分子，我们的责任，就在于组织他们，培养他们，爱护他们，并善于使用他们。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6页

任何工作，于政策之外，就决定于干部的好坏，……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解放社1944年1月订正再版第231页

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

《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47页

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页

我们党有成百万有经验的干部。我们这些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是土生土长，联系群众，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我们有

这么一套干部：有建党时期的，有北伐战争时期的，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全国解放以后的，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产。东欧一些国家不很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这样一套干部。我们有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2. 坚持任人惟贤的路线、政策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

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惟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惟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惟贤”的路线。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7页

在干部政策问题上坚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风，反对不正派的不公道的作风，借以巩固党的统一团结，这是中央和各级领导者的重要的责任。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7页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

务的。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6页

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个条件的第九条中所说建立领导核心问题,我们应该应用到一切大小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和农村中去。这种领导骨干的标准,应当是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中所举的四条干部标准(无限忠心,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99页

3. 干部要又红又专

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得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于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

《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47页

各级农村工作部的同志,到会的人,要成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专家,要成为懂得理论、懂得路线、懂得政策、懂得方法的专家。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05页

我希望，所有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地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要奋发努力，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一方面要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要搞好经济建设。对于经济建设，我们要真正学懂。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96页

说到办报，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延安办报，历史也很短，全国性办报就没有经验。办学、搞出版、科学研究都是这样。全国有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其中的共产党员不过是一个小指头。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这话有一半真理。现在我们是外行领导内行，搞的是行政领导、政治领导。至于具体的科学技术，比如地质学，共产党是不懂的。但是国民党也不懂。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只造就二百多个地质人才，我们解放七年造就了一万多。这种行政领导的状况，在现在的过渡时期，只好这样，将来是要改变的。

《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4页

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的同志，无论搞工业的，搞农业的，搞商业的，搞文教的，都要学一点技术和业务。我看也要搞一个十年规划。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是错误的。因为那种人实在想白下去，后红不过是一句空话。……但

是单有红还不行，还要懂得业务，懂得技术。现在有许多干部就是一个红，就不专，不懂业务，不懂技术。

《关于农业问题》（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09页

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这个问题要在干部中议一议，开个干部大会，议一议我们还有什么本领。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0页

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有的，但是内容变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1页

政治家要懂些业务。懂得太多有困难，懂得太少也不行，一定要懂得一些。不懂得实际的是假红，是空头政治家。要把政治和技术结合起来，农业方面是搞试验田，工业方面是抓先进典型、试用新技术、试制新产品。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2页

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对陈正人关于社教蹲点情况报告的批语和批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五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266页

4. 领导干部要努力成为无产阶级政治家

使我们的干部不但能治党，而且能治国，要懂得向全中国与全世界人民讲话，并为他们做事，要有远大的政治眼光与政治家的风度。

《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一九三七年十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60页

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门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66页

5. 善于识别和使用干部

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7页

必须善于使用干部。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一切计划、决议、命令、指示等等，都属于“出主意”一类。使这一切主意之实行，必须团结干部，推动他们去做，属于“用干部”一类。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7页

我们是最进步阶级和最进步人民的先锋队，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应该一变历史上的状况，就是说，在我们党内，在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内，是不但有很多的千里马，而且有很多伯乐的，埋没英雄的现象，是不应该有的，一时有这种现象是应该很快消灭的。

修改刘子久关于学习问题给淮北区党委的信加写的文字（一九四四年七月五日），《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527页

要选青年干部当团中央委员。三国时代，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团中央委员尽选年龄

大的，年轻的太少，这行吗？自然不能统统按年龄，还要按能力。团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名单，三十岁以下的原来只有九个，现在经过党中央讨论，增加到六十几个，也只占四分之一多一点。三十岁以上的还占差不多四分之三，有的同志还说少了。我说不少。六十几个青年人是否都十分称职，有的同志说没有把握。要充分相信青年人，绝大多数是会胜任的。个别人可能不称职，也不用怕，以后可以改选掉。这样做，基本方向是不会错的。青年人不比我们弱。老年人有经验，当然强，但生理机能在逐渐退化，眼睛耳朵不那么灵了，手脚也不如青年敏捷。这是自然规律。要说服那些不赞成的同志。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78页

6. 爱护和关心干部

必须善于爱护干部。爱护的办法是：第一，指导他们。这就是让他们放手工作，使他们敢于负责；同时，又适时地给以指示，使他们能在党的政治路线下发挥其创造性。第二，提高他们。这就是给以学习的机会，教育他们，使他们在理论上在工作能力上提高一步。第三，检查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有委托而无检查，及至犯了严重的错误，方才加以注意，不是爱护干部的办法。第四，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地应采取说服的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只有对犯了严重错误而又不接受指导的人们，才应当采取斗争的方法。在这里，耐心是必要的；轻易地给人们戴上“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轻易地采用“开展斗争”的方法，是不对的。第五，照顾他们的困难。干部有疾病、生活、家庭等项困难问题者，必须在可能限度内用心

给以照顾。这些就是爱护干部的方法。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7—528页

不但要关心党的干部,还要关心非党的干部。党外存在着很多的人材,共产党不能把他们置之度外。去掉孤傲习气,善于和非党干部共事,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用热烈的同志的态度对待他们,把他们的积极性组织到抗日和建国的伟大事业中去,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6—527页

对于一切多少有用的比较忠实的知识分子,应该分配适当的工作,应该好好地教育他们,带领他们,在长期斗争中逐渐克服他们的弱点,使他们革命化和群众化,使他们同老党员老干部融洽起来,使他们同工农党员融洽起来。

《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19页

党外的人占百分之九十九,只有他们和我们一起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单靠党员毫无办法,是不是这样?这是不是真理?完全是真理。他们中间有领袖,有干部,我们要帮助他们,培养人民中的优秀分子,同时尊重他们,和他们好好合作。对这些党外干部,将来我们各地的领导机关、组织部门要有调查研究,要有一些办法,教育的办法,团结的办法,比如开座谈会、谈心等等办法,对他们进行帮助和培养。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49页

7. 教育和培养干部

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

《论新阶段》（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16页

每个根据地都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

《论政策》（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69页

教育以对象分，有干部教育、国民教育等项，目前重点应放在干部教育上，而不应放在国民教育上（不是不要国民教育）。以内容分，有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军事教育、文化教育等项，而对于干部，特别就目前时期说来，应着重思想教育，……

《争取在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页

对干部要保存他教育他。教育包括业务教育和理论、思想教育，后一种教育今年要继续努力。

中央直属机关干部要进行理论、思想教育，读马、恩、列、斯的四十本书。干部各种教育中主要是整风教育与思想教育，在各种干部中主要是高级干部的教育。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要点》（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0—11页

训练干部，不仅要训练党内的，而且要训练党外的。冀中

村干部轮训，是大批训练基层干部的办法。政府要办学校，包括大学、专门学校，大批培养各种干部。训练全国各方面工作的干部，是一个大问题。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一九四八年九月），《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37页

人们常常叹气没有干部。同志们，真的没有干部吗？从土地斗争、经济斗争、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群众，涌出来了无数的干部，怎么好说没有干部呢？丢掉错误的观点，干部就站在面前了。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25页

带着新鲜血液与朝气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们，无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可宝贵的，没有他们，革命队伍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但青年同志的自然的缺点是缺乏经验，而革命经验是必要亲身参加革命斗争，最下层工作做起，切实地不带一点虚伪地经过若干年之后，经验就属于没有经验的人们了！

纪念安吴青训班两周年的题词（一九三九年十月五日），《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141页

凡属真正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领导骨干，必须是从群众斗争中逐渐形成，而不是脱离群众斗争所能形成的。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98页

要大胆指导运动，不要前怕龙，后怕虎。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经验中将改造他们自己。要让他们做，在做的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前怕龙后怕虎的态度不能造就干部。必须由上面派出大批经过短期训练的干部，到农村中去指导和帮助合作化运动；但是由上面派下去的干部也要在运动中才能学会怎样做工作。光是进了训练班，听到教员讲了几十条，还不一定会做工作。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19页

8. 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

共产党员对于落后的人们的态度，不是轻视他们，看不起他们，而是亲近他们，团结他们，说服他们，鼓励他们前进。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2页

共产党员对于在工作中犯过错误的人们，除了不可救药者外，不是采取排斥态度，而是采取规劝态度，使之翻然改进，弃旧图新。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2页

我们说犯了错误不要紧，只要认识自己犯的的错误，并且能改正，这就很好，就是很好的同志。

《关于整顿三风》（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16页

凡是政治上过去犯过错误现在改正了的同志，我们都要团结他们，全党要像决议上所说的团结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

《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4页

一个队伍里头，人们的思想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经常是不整齐的。但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有好的态度。家庭里是很少有开除家籍的事情的。阿Q到底姓什么虽不清楚，但也没有听说他曾被开除家籍。阿Q斗争起来也算英勇。他的缺点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加党八股，毫无自我批评精神。人家的疮疤他要揭，他的疮疤人家揭不得。至于教条主义和党八股，那厉害得很，长凳一定要叫长凳，不能叫条凳，叫条凳是路线错误，那样教条主义，那样党八股！但是，写阿Q的作家还是喜欢阿Q的，因为反革命把他枪毙了。所以对于有缺点错误的人，我们要团结。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8页

有些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作了很好的自我批评，我们大会代表都一致地欢迎。在他们讲话的时候，就是希望在大会代表的帮助之下改正错误。我看这讲了一个真理，就是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荷花虽好，还须绿叶扶持”，任何一个人也需要大家帮助的，互相批评，自我批评，大家帮助，才能进步，才能解决问题。从我们全党现在的情况看，从我们这次大会的情况看，以及从我们过去三个时期的经验、抗战八年中的好的坏的事情和整风中的经验看，都可以证明这一真理。

《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70页

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如果不谨慎，还可能再犯错误；没有犯过错误的同志，如果不谨慎，更可能犯错误。因为推起车子走路，跌过跤的和没有跌过跤的，会有有经验和没有经验的不同。推车子没有跌过跤的人更要注意，更要谨慎，说不定正是你高兴自满地说“我就没有跌过跤呀”的时候，恰好跌了跤，翻了车。过去跌过跤的人，往往比较稳一些，眼睛到处望，还有站在两旁的人提醒说：“你要谨慎一点，过去跌过跤呀！”他的帮手也多一点。

《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70页

这个边区是土地革命时期留下的惟一的一个区域，保存了几千干部，其中只有极少数人是腐化得不可救药了，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有些人犯了错误也是可以教育的，他们在工作中出的问题有许多是因为我们在政策上交待得不明确。领导上承担一定的责任，这是一个重要的工作方法。

《在小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71页

对于落后的和犯错误的人，应当采取团结和教育的方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

《关于工会工作的方针》（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26页

对这些同志，我们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就是希望他们改正错误，对他们不但要看，而且要帮。就是讲，不但要看他们改不改，而且要帮他们改。人是要有帮助的。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一个篱笆要打三个桩，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单干

是不好的，总是要有人帮，在这样的问题上尤其要有人帮。看是要看的，看他们改不改，但单是看是消极的，还要帮助他们。对受了影响的人，不管有深有浅，我们一律欢迎他们改正，不但要看，而且要帮。这就是对待犯错误同志的积极态度。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99页

因为犯了错误，他们可能有所警觉，以后不再犯这类错误。害了一次病，取得了免疫力。种了一次牛痘，起预防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00页

关于犯错误的同志，我想只有两条：一条，他本人愿意革命；再一条，别人也要准许他继续革命。本人也有不愿意继续革命的，比如陈独秀不愿意继续了，张国焘不愿意继续了，高岗、饶漱石不愿意继续了，那是极少数的。大多数人是愿意继续革命的。但是还有一条，要准许别人革命。我们不要当《阿Q正传》上的假洋鬼子，他不准阿Q革命；也不要当《水浒传》上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高岗不准人家革命，结果还不是把自己的命革掉了？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结论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

历史的经验证明：犯教条主义错误和经验主义错误的人，绝大多数是能够改正的。这要两条：一方面要有严肃的批评，一

方面要有宽大的态度。没有后一条是不好的，关系就不正常。谁不犯一点错误呢？无论是谁，总要犯一些错误的，有大有小。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比如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除了这样极少数人之外，其他的人都是能够挽救的，都是能够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去改正错误的。我们应当这样做，应当有这种信心。犯错误的本人也应当有这种信心。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结论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

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

《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还是不准。我看在这点上，有些人很有点像假洋鬼子。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无论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还是在党内不准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是不好的。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
第39—40页

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有人说要看他们改不改。我说单是看还不行，还要帮助他们改。这就是说，一要看，二要帮。人是要帮助的，没有犯错误的人要帮助，犯了错误的人更要帮助。人大概是没有不犯错误的，多多少少要犯错误，犯了错误就要帮助。只看，是消极的，要设立各种条件帮助他改。是非一定要搞清楚，因为党内的原则争论，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不允许含糊的。按照情况，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恰如其分的合乎实际的批评，甚至必要的斗争，这是正常的，是为了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对犯错误的同志不给帮助，反而幸灾乐祸，这就是宗派主义。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
第40页

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犯错误的人，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容易犯错误，因为他容易把尾巴翘得高。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
第40页

我们要注意，对犯错误的人整得过分，常常整到自己身上。高岗本来是想搬石头打人的，结果却打倒了自己。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是采取帮助态度还是采取敌视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
第40页

对于党内犯过错误的同志要有正确的政策，帮助他们，而不是把他们整死。批评并不等于一推了事。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同的是，有的犯得多一些，有的犯得少一些；有的改正得早一些，有的改正得晚一些。我们党内曾经有过对犯错误的同志实行“无情打击”的偏向。人总是有情的，何况是对同志呢？“无情打击”只会在党内造成对立，闹不团结，今天我打你，明天你打我，打来打去弄得大家不和气，党的事业不兴旺、不发达，同志们大家都不高兴。后来我们党纠正了这种偏向，帮助在改正错误的同志，能团结的力量越多越好。

《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62页

犯过错误的同志有了经验教训，在这一点上可能比没有犯过错误的同志要强。

《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62页

我说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他们要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应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列宁曾讲过，不犯错误的人全世界一个也没有。……因此，对犯错误的同志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应该有分析，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我们党曾经陷入形而上学——教条主义，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就全部毁灭他。后来我们批判了教条主义，逐步地多学会了一点辩证法。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承认这个观点，对犯错误的同志

怎么办呢？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是要斗争，要把错误思想彻底肃清；第二，还要帮助他。一曰斗，二曰帮。从善意出发帮助他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

《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30—331页

对于犯了错误的人，对于那些不让人讲话的人，要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不要有这样的空气：似乎犯不得错误，一犯错误就不得了，一犯错误，从此不得翻身。一个人犯了错误，只要他真心愿意改正，只要他确实有了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表示欢迎。头一、二次自我批评，我们不要要求过高，检讨得还不彻底，不彻底也可以，让他再想一想，善意地帮助他。人是要有人帮助的。应当帮助那些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如果人家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愿意改正错误，我们就要宽恕他，对他采取宽大政策。只要他的工作成绩还是主要的，能力也还行，就还可以让他在那里继续工作。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9—310页

9. 审查干部，纯洁队伍

只有在认真的深刻的整风学习与展开自我批评的热潮中，审查干部才会彻底。过去对于审查干部，不论延安与外地，大都是形式的。如果能在今明两年（抗战胜利前），经过整风与审查，将多数高级及中级干部的思想打通，又能保存党与军的骨干，那我们就算是胜利了。

《争取在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3页

审查干部也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方法是要从下层总结经验，然后再加以指导，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或者说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惟一的来源、惟一的出路是群众。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要点》（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1页

审查干部，如果仅仅由组织部这个领导机关的少数人孤立地去做，必不可能做好；如果通过某一机关或某一学校的行政负责人，推动该机关该学校的许多人员、许多学生，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员、全体学生都参加审查，而上级组织部的领导人员则正确地指导这种审查，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原则，审查干部的目的就一定完满地达到。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01页

审查干部之方针为：一、首长负责；二、自己动手；三、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四、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五、调查研究；六、分清是非轻重；七、争取失足者；八、培养干部；九、教育群众。必须拿这种实事求是的方针去和内战时期曾经损害过党的主观主义方针完全区别开来，这种主观主义方针就是逼、供、信三个字。

《关于审干的九条方针和在敌后的八项政策》（一九四三年七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52页

我们过去在肃反中有很沉痛的教训。我们这次无论如何不要搞逼供信，要调查研究，要重证据。

同绥德专署专员袁任远的谈话（一九四三年七月）

你们在基本根据地内在反特务问题上不应过分强调前方的特殊性，不应过分强调前方环境与延安环境的区别。如果要强调的话，则应懂得正是在前方战争环境中，更应执行少捉少杀及少捉不杀的方针，才能在严酷环境下正确地保证反特务胜利。为了弄清线索而逮捕的特务分子不得超过当地特务总数百分之五（百人中至多只许捉五人），并且一经坦白，立即释放。立即停止杀人，目前一年内必须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许任何机关杀死任何特务分子。将来何时要杀人，须得中央批准。不用公审大会，而用调查、研究、解释、劝说、斗争、开坦白大会的方法，弄清一切暗藏的特务分子；用极大的热忱、很多的方法（千方百计），争取他们转变为好人。即使是最大最坏的特务头子，亦须争取为我们服务。群众不了解此种宽大政策的作用时，须向群众作明确解释。

《认真执行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指示》（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五日），
《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8期

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少捉少杀及少捉不杀方针，才能保证彻底肃清特务及虽有弄错及诬陷（可能有大部被弄错，可能有一部被诬陷）亦留有最后挽救之余地。所谓少捉，即除直接危害抗日之军事间谍及汉奸现行犯外，对一切特务嫌疑分子为着弄清线索而逮捕者，不得超过嫌疑分子总数百分之五。此点须通知下级注意，以免逮捕过多，难于处理。所谓少杀及不杀，即除直接危害抗日的军事间谍得经县以上机关批准处以死刑，及汉奸现行犯而有武装拒捕行为者得就地格杀外，一切特务分子虽已证据确实亦应不杀一人，争取转变为我所用。此即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方针。应通知下级，对于证据确实的特务分子，一九四四年一年之内不许杀害一人。延安、陕甘宁边区及晋西北

今年反特务运动中清出大批特务，没有杀一人，故虽有许多被弄错的、被诬陷的，因党内错误被误认为特务的，仅有党派问题但未作坏事亦被认为特务的，均得在复查过程中加以平反。此种经验，值得注意。

《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方针》（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86页

为使今后工作更能顺利正确进行，必须认识反奸斗争是一种隐蔽的尖锐的斗争。因为敌人是隐蔽的，所以在未发现特务之前，党内一般的倾向，是麻木不仁，熟视无睹。又因为斗争是尖锐的，所以在已发现特务之后，特别是进入坦白运动之时，党内倾向就容易转入“特务如麻”、“草木皆兵”。这种先右后“左”，常常是反奸偏向的一般规律，而且从右到“左”，时间可能是很快的。……在没有开展反奸斗争的地方，应纠正右的倾向，在已开始发动群众反奸斗争的地方，应防止“左”的偏向。

同康生关于审干坦白运动中应注意的问题给邓小平、滕代远的电报（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496—497页

我们必须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提及九条方针的原则，不警惕不严肃的右倾思想是不对的，不谨慎不精细的“左”倾思想也是不对的。

在一份情况通报上关于反奸斗争的政策加写的文字（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558页

九条方针中，最主要的是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两条，两

条中又以调查研究为最中心关键，凡无调查研究或虽有而是表面的非真凭实据的，一概不能误认为特务，此点特须使一切干部充分认识清楚。

修改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审干反奸问题给晋察冀分局等的指示加写的文字（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四日），《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 563 页

办党校或其他干部学校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党在思想上是纯洁的，是马列主义的；在组织上也要是纯洁的，我们审查干部就是要在组织上使我们党纯洁。

《时局问题及其他》（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 3 卷第 261 页

要分清是非轻重。是则是，是特务、叛徒、自首分子、其他党派分子，怎么办呢？团结他抗战。人家现在愿意抗战，过去走错了路，现在不再走，就算了。我们宣布这一条，主要是帮助这些走错了路的同志。因为党过去有很多缺点，人家害怕，不敢讲，就没有讲，现在讲出来就很好。对于戴错了帽子的，把非当做是的，怎么办？非则非，取掉帽子，赔一个不是。党校也搞错了一些同志，如果在座的有这样的同志，我赔一个不是。

《时局问题及其他》（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 3 卷第 262 页

在审查干部工作中，对被搞错了的人承认错误，赔一个不是，这是我们的进步，是我们全党的一个进步。我们对人民讲的话，作出的决议案，制定的这样那样的政策，都是这样，凡是搞错了的，都要修正错误，赔一个不是，老老实实在地赔不

是。我们要有这样的态度。这叫做什么态度？自我批评的态度。

《时局问题及其他》（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63页

将来我们到北平、上海、南京再去审查干部，做反奸工作时，就会好得多。所以，我说是两条经验：一个是成绩，一个是缺点，这两条都有用处，成绩要发扬，错误要修正。我们采取严肃态度和谨慎态度，这是两条战线的斗争。严肃态度是反对右倾，不严肃就是右倾、自由主义；谨慎态度是反对“左”倾，不谨慎就出乱子。

《时局问题及其他》（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64页

审干中搞错了许多人，这很不好，使得有些同志心里很难过，我们也很难过。所谓“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我们是与天下人共欢乐的。对搞错的同志，应该向他们赔不是，首先我在这个大会上向他们赔不是。在哪个地方搞错了，就在哪个地方赔不是。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07页

有人要求在党章上加一条：“保障党员的政治生命。”同志们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它反映了在审查干部中有的同志受冤屈。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把这一条当作教训，当作武器，这样就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09页

对学生和知识分子，在政策上也不要犯“左”的错误，延安审干就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在杨家沟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332页

无论在农村中，在城市中，在军队中，在机关和学校中，在任何审查党员或干部的会议上，被审查者都有申述理由的权利，这种民主作风决不可少。

《把打击面放在真正的封建剥削阶级范围内》（一九四八年一月），《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4页

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真凭实据的反革命，由机关清查，但是公安局不捉，检察机关不起诉，法院也不审判。一百个反革命里面，九十几个这样处理。这就是所谓大部不捉。至于杀呢，就是一个不杀。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7页

机关肃反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妨碍我们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严肃态度。但是，可以保证不犯无法挽回的错误，犯了错误也有改正的机会，可以稳定很多人，可以避免党内同志之间互不信任。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8—39页

10. 清除、撤换腐化了的分子和实在不行的干部

为了要加强苏维埃政府对革命战争的领导，消除在苏维埃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因此，决定地方苏维埃政府实行继续改选和改造，从改选中洗刷出去非阶级的异己分子及一切对革命战争工作消极怠工的分子，驱逐贪污腐化官僚等分子出苏维埃，吸引积极的新的干部，建立坚强而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府，去实际执行领导革命战争的任务和工作。

同项英等发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五号训令》（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日），《红色中华》1932年9月27日

苏区的工农群众已经夺取了政权，我们要时时刻刻保护这个政权，发展这个政权，使之能尽打击内外反革命势力、增进工农生活福利的重大作用。要使之能尽这种作用，就要用选举的方法，把大批最觉悟最先进最积极的分子选进苏维埃去，而把旧人员中那些不中用的分子淘汰出来，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今年的选举》（一九三三年九月六日），《红色中华》1933年9月6日

逐渐淘汰政权机关中的腐化动摇分子，吸收坚决抗战而有能力的分子加入政府，增强政府战时工作。

《张闻天、毛泽东、刘少奇关于进一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致陈光、罗荣桓、杨尚昆电》（一九三八年四月二日），《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5月出版，第166页

在多数情形下，一个伟大的斗争过程，其开始阶段、中间阶段和最后阶段的领导骨干，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完全同一的；

必须不断地提拔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来替换原有骨干中相形见绌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98页

犯了错误的干部，多数可以教育好，少数教育不好的清除出去，有利无害。这是一个原则问题，相信西北局的同志可以实现这个任务。

《在小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69页

中央建议：落后县、社、队领导干部实在不行的，当机立断，实行撤掉，换上好的。不要婆婆妈妈，优容养奸，贻误大事。

《中央转发山东省委关于生活安排情况报告的批语》（一九六〇年三月十五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62页

中央相信，大多数公社是谨慎、公正、守纪律的，胡闹的只是少数。这个少数公社的所有工作人员，也不都是胡闹的，胡闹的只有其中一部分。对于这些人，应当分别情况，适当处理。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对于少数县委实在不行的，也要坚决撤掉，换上新人。

《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63—164页

（七）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原则

1. 党的中央委员会要由能够实行党的代表大会路线的同志组成，要反映各方面的革命力量

我们要选举一个全党的领导机关，即在大会闭会以后、两次大会之间的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我们采取一个什么标准，用什么原则来进行选举呢？各个代表团的主任反映了许多同志的意见，有这样的，有那样的。主席团认为应该采取这样的标准，就是要由能够保证实行大会路线的同志来组成中央委员会。采取这样一个原则比较好，比较恰当。这样一个原则，应该是我们选举中央委员会的原则。

《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56页

在昨天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之后，有一位同志写信给主席团说，希望注意选举，要选能执行大会路线的同志到中央来。这个方针，主席团已经提出过了，我在这里也代表主席团做过报告，各个代表团也讨论酝酿了好几天，昨天同志们选正式中央委员就是按照这个方针选举的。那末，为什么这位同志在昨天选举之后还要提出这个意见呢？他的意思是说，有些候选人并不知名，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若干缺点和错误，但是在长时期中证明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我们不要因为他不知名甚至有若干缺点错误而不选他。我认为这位同志的意见是很好的，代表了大多数同志的意见。

《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23页

要不要照顾到各方面？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照顾山头的问题。也有两种解决方法，一种是要照顾，一种是不照顾。主席团认为还是要照顾才好。昨天傅钟同志在这里讲了一篇很好的话，我全篇都赞成。在选举上，应不应该照顾山头？应不应该照顾到各方面？我看那个主张不应该照顾山头、不应该照顾各方面的意见，也是一个理想，但事实上行不通，事实上还是要照顾才好，照顾比不照顾更有利益。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内战时期，有苏区有白区，在苏区之内又有这个部分那个部分，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内战之后是八年抗战，抗战时期也有山头，就是说有许多抗日根据地，白区也有很多块，北方有，南方也有。这种状况好不好？我说很好，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这些就没有中国革命。所以这是好事情，不是坏事情。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而不是山头。

《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63页

过去的中央委员会，即七大以前的中央委员会，没有反映这种实际情况，就是说，在组织成分上没有反映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因此这个中央是不完全的，是有缺点的。整风以来，我们提出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在政策上反映了这一点，但在组织成分上还没有反映这一点。这是一个缺点，是不好的。鉴于这一点，我们这次选举就要注意这个问题。新的中央委员会应该反映这方面的情况，要成为一个缺陷最少的中央。完全避免缺点恐怕也困难，但是我们可以要它少一点，也可能使它少一点。

《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65页

我们现在有近一万万人口，将来还要发展，很快也许就有两万万人口，也许还要多一些，因此我们现在就要训练领袖，首先要训练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是我们党的领袖，全党都要拿眼睛来望着它，这就是训练；拿嘴巴哇啦哇啦地讲，这也就是训练；打开窗户，要空气透进来，这也就是训练。我们的中央过去虽然不大，只有二十几个人，也做了事，现在应该扩大一点。所以我们要有意识地训练领导干部，这倒不是说现在要故意地搞“成名干部”，但是有这种可能性的我们还要搞，以便适应发展着的中国革命。

《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67页

新的中央要包含这样一些同志：大批未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一批犯过路线错误而又改正错误的同志；大批有全国影响的同志，大批现在有地方影响、将来可能有全国影响的同志；一批通晓的方面比较多的同志，大批通晓的方面比较少的同志。

《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67页

2. 中央委员会应该包括各种人才，将来应有许多工程师、科学家

每一个中央委员是不是都应该通晓各方面的知识？也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每一个中央委员都应当通晓各方面的知识，一种是每一个中央委员不一定要通晓各方面的知识。主席团认为，前一种意见也是一个很好的理想，是有道理的，如果能做到那

样，当然很好。但是事实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所谓各方面的知识，就是各方面事物发展的逻辑。斯大林讲过：联共中央委员会有各种各样的人才，有文化教育方面的，有经济建设方面的，各方面的都有。我们的新的中央也应该是包罗各种人才的，尽可能地照顾各个方面、各个部分、各个山头。……对知识的要求也是一样，要尽可能地通晓的方面多一点。

我们采取这样的方针：不一定要要求每个人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通晓一个方面或者稍微多几个方面的知识就行了，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就变成了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中央委员会。中国有句老话：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如果我们有各方面的人，每一个人都通晓一方面或者有比较多的专长，选这样几十个人，我们的中央就会比较完全。……我们的选举，就应该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即不是从个人求完全，而是从集体中求完全，从对现实的学习中求完全。

《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65—367页

我们要造就知识分子。现在我们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旧中国留下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有十万，我们计划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毕业生和专科毕业生）。到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方面就有了十八年的工作经验，有了很多的科学家和很多的工程师。那时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所以，有人怀疑我们党能领导科学工作、能领导卫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为你就是

不晓得，你就是不懂。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

《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01—102页

3. 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承认并决心改正错误还可以入选

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应不应该选举？只选没有犯过路线错误的，凡是犯过路线错误的我们就不选，这样一种意见，主席团认为是一种好的愿望，一种好的理想。这种意见是有理由的，因为过去我们吃了亏，原因就在一些同志犯路线错误。……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不选过去犯过路线错误的人，甚至绝对化一个也不选，那就不好，就不恰当。

《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57—358页

如果说对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不应该选举，我看就不如采取这样的原则，即：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但是他已经承认错误并且决心改正错误，我们还可以选他。我们布尔什维克的党在原则上是不含糊的，与资产阶级不同，我们必须有“承认错误并且改正错误”的这样一条原则，在这个原则下去选他。这个原则和不选的那个原则不同，那个原则是一个很好的理想。虽然理想一定要有，但是还要结合一个东西，叫做“现实”。我们是有理想的现实主义，或者叫做革命的现实主义，我们不是无原则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是原则性，现实主义就是灵活性，理想主义的原则性与现实主义的灵活性要统一起来，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凡是犯过错误的一概不选举，这

是理想。但只确定这一条还不够，还缺少一条，就是说，人家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我们就要选举他。我们党必须有一个原则，就是犯错误是不好的，但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是好的。一定要把这后一条加上，这样才是全面的。这两条一定要结合起来，不然就要出毛病，我们就会丧失好处，就可能产生缺点，甚至可能造成错误。

《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60—361页

七次大会的时候，就有很多代表不愿意选他们（不仅是王明，还有相当几个同志）。当时我们说，如果采取这个方针，我们就要犯错误。我们不选举犯错误的人，为什么叫做犯错误呢？因为那是照他们的办法办事。他们的办法，就是不管你是真犯错误，假犯错误，一经宣布你是机会主义，就不要了。如果我们也照这样办，我们就是走他们的路线，就是走王明路线，或者立三路线。这样的事情不干，让我们走王明路线、立三路线，不干。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94页

王明、李立三犯路线错误，要选他们当中央委员，结果就要正确的人或者犯小错误的人空出两个位置来，让他们登台。这样的安排是不是世界上最不公道的呢？从这一点看，那是很不公道的：你看，正确的或者犯小错误的人要把位置让给那个犯大错误的人，这是很明显的很不公道，这里头没有什么公道。如果这样来比，应该承认，是所谓正确不如错误，小错误不如大错误。但是，从另外一点看，就不是这样。他们犯路线错误是

全国著名、全世界著名的，选举他们的道理就是他们出了名。你有什么办法呀，他们是出了名的，你那个不犯错误的和犯小错误的名声没有他们大。在我们这个有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国家，他们是旗帜。选举他们，许多人就会这么说：共产党还是等待他们的，宁可让出两个位置来给他们，以便他们好改正错误。他们改不改是另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很小，只是他们两个人。问题是我们这个社会有这么多小资产阶级，我们党内有这么多小资产阶级动摇分子，知识分子中间有许多这样动摇的人，他们要看这个榜样。他们看到这两面旗帜还在，他们就舒服了，他们就睡得着觉了，他们就高兴了。你把这两面旗帜一倒，他们就恐慌了。所以，不是王明、李立三改不改的问题，他们改或者不改关系不大，关系大的是党内成百万容易动摇的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成分，特别是知识分子，看我们对王明、李立三是怎样一种态度。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96—97页

刚才政治局跟各代表团的负责同志商量，觉得可以增加少数人，如果通不过，也可以减少几个人。七大就是这样，有两位同志，几次在候选名单上提了他们，最后就是没有选上。这次也可能有个别同志虽然在名单中提出了，但是选不上。我们可以建议，但不能强加于人，不能强加于代表们，权利完全在代表们手里头。

《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08页

(八) 组织工作要服从和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和中心工作

大部分中国领土内党的组织工作和民众运动工作是直接联系于武装斗争的，没有也不能有单独的孤立的党的工作或民众运动。一部分距离战区较远的后方（如云南、贵州、四川）和一部分敌人控制的地区（如北平、天津、南京、上海），党的组织工作和民众运动也是配合战争的，只能也只应服从前线的要求。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45页

为了胜利地进行今天的抗日战争，扩大和巩固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我党所领导的游击队，是非常重要的。在此原则下，党应派遣最好的和足够数量的党员和干部上前线。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组织任务须服从于政治任务。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49页

按照马列主义的原则，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如果组织形式已经与斗争的需要不相适合时，则应取消这个组织形式。

《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0页

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

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28页

目前在全党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变农业国为社会主义工业国、改造各种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这样一个历史的时机，我们做组织工作的人，必须全神贯注为保证这个党的总路线而奋斗。我相信，全党组织部门工作的同志是能够担负这个伟大光荣的任务的。

《对刘少奇等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374页

七、党的作风建设

（一）党的三大作风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93—1094页

必须使各级党的领导骨干都懂得，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94页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94页

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96页

（二）理论联系实际

（参见第一编“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第197—213页）

（三）密切联系群众

（参见第一编“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第286—298页）

（四）批评和自我批评

1.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武器

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90页

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
311页

批评是批评别人，自我批评是批评自己。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但作为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

《关于整顿三风》（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
第418页

我们的同志，绝对大多数都是好同志。对于有了毛病的人，一经展开批评，揭发错误，也就可以改正。但是必须开展自我批评，正视错误倾向，认真实行改正。

《组织起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934页

要分析。分析就要批评，批评自己也要批评别人。我们分析一个事物，首先加以分解，分成两个方面，找出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哪些是应该发扬的，哪些是应该丢掉的，这就是批评。对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历史加以分析，这是自我批评；对别人进行分析，就是批评别人。……现在中央有决议案，提倡大家讲话，无论是什么时候，你们凡是看到工作中间有缺点，有毛病，你们就讲。我们工作中间一定会有些毛病，要加以分析，做得正确的就要承认它正确，做得不正确的就要修正，也就是我上次在这里讲过的两条：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们要提倡主动性，经常检查自己所做的事、所说的话、所写的决议，把自己做的工作加以分析，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正确的要坚持，错误的要改正。

《时局问题及其他》（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
卷第253—255页

团结、批评、团结，第二个步骤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国革命要胜利，我们就要采取这种态度。

《时局问题及其他》（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
卷第263页

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

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惟一有效的方法。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96页

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9页

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我希望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都采用这种方法。

《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四日、二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81—82页

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还是要作公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实行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条是不行的。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06页

批评要尖锐。这次有些批评，我觉得不那么尖锐，总是怕得罪人的样子。你不那样尖锐，不切实刺一下，他就不痛，他就不注意。要有名有姓，哪一个部门，要指出来。你没有搞好，我是不满意的，得罪了你就得罪了你。怕得罪人，无非是怕丧失选举票，还怕工作上不好相处。你不投我的票，我就吃不了饭？没有那回事。其实，你讲出来了，把问题尖锐地摆在桌面上，倒是好相处了。不要把棱角磨掉。牛为什么要长两只角呢？牛之所以长两只角，是因为要斗争，一为防御，二为进攻。我常跟同志讲，你头上长“角”没有？你们各位同志可以摸一摸。我看有些同志是长了“角”的，有些同志长了“角”但不那样尖锐，还有些同志根本没有长“角”。我看，还是长两只“角”好，因为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06页

自我批评是我们共产党的办法，后来想在民主党派中试行。现在民主党派内搞开了，民建最近的一次会议，也用了这个办法，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人民内部解决问题的方法。共产党、政府、民主党派、工人、农民、工商界，包括恢复了选举权的地主，都属于人民内部。在人民内部，有缺点，有问题，要从团结出发，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提出意见，提出要求，解决问题，达到团结。

《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74—175页

2. 对自己的缺点错误要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

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方法，就是这样采取的。只有这种立场，才是正确的立场。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74页

自我批评是马列主义政党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是马列主义方法论中最革命的最有生气的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政党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最适用的方法，而在目前则是反对错误思想建立正确作风的最好方法。

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一九四三年四月），《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434页

我们不应该自满，我们还要继续作自我批评，还要继续求进步。我们的生产也要继续求进步。我们脸上有灰尘，就要天天洗脸，地上有灰尘，就要天天扫地。尽管我们在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倾向，在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倾向，已经根本上克服了，但是这些恶劣倾向又可以生长起来的。我们是处在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势力的层层包围之中，我们是处在散漫的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之中，极端恶浊的官僚主义灰尘和军阀主义灰尘天天都向我们的脸上大批地扑来。因此，我们决不能一见成绩就自满自足起来。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

《组织起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35页

共产党人在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一经发觉，就会改正。他们应该不怕自我批评，有缺点就公开讲出是缺点，有错误就公开讲出是错误，一经纠正之后，缺点就再不是缺点，错误也就变成正确了。

《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49页

不要因为有很多人作了自我批评，以为就黑暗了。这些同志是着重讲了他们的缺点错误，没有讲他们的长处，哪一年参加革命，哪里又打了胜仗，哪里有工作成绩，这些话都没有讲。专看他们这一篇检讨，那末就黑暗了。其实，这是一面，在很多同志身上，这是次要的一面。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03页

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的，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負責任，怕負責任，不許人講話，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6页

3. 正确对待批评，正确开展批评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兴旺起来。

《为人民服务》（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04—1005页

小广播就不同，这需要搜集并加以分析。其中有许多是闲话，是没有恶意的；有许多是错误的，但也不一定是恶意的；至于有恶意的也要听，因为只有听了才能发现它的恶意。总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把各种闲话都引到自己的责任上来，这就卸下一个大包袱，不至于多生气。一九四一年边区老百姓中有人说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这就引起我的警觉，分析原因，发现是征粮太重了，于是就发展大生产运动。党校去年有人说我是官僚主义，这也使我下决心到党校去多接近一些人。

《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4—285页

我们不怕人家批评，我们是批不倒的，就是犯过路线错误的也不怕批评，也是批不倒的，只要有改正错误这一条就行。愈是不怕人家批评，愈是敢让人家讲话，给人家讲话的机会，人

家的批评可能会愈少。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99页

我想同志们中间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过冤枉受过委屈的。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比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自己的职务，调离自己的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你晓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也不可能。我是这么看，也许我比较悲观。有那么一些人非常乐观，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一点矛盾也没有了，我就不相信。有矛盾，就要出主观主义，就要犯错误。那些人并不是跟我们前世有冤，今世有仇，从前都不认识，他为什么要整你呢？就是因为思想不同，对问题的看法不一样。后来证明，政策问题上思想统一了，就完全团结了。所谓不团结，都是思想上有距离，政治问题、政策问题上有争论。除开极个别的别有用心钻到党内来破坏的敌对分子以外，所有犯错误的人，不管他犯的错误怎么严重，哪怕是路线错误，也只是思想不对头。既是思想问题，那末改正错误就是改正思想的问题，就是整风学习的问题，讨论研究的问题。而各种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会都是难免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是力争求得一个比较的公平。应该说，我们党的七大的选举，七大以后到现在，党内是比较地公平一些。凡事都是有比较的，不是绝对的，绝对的公平或者绝对的不公平，是不可能的。

《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06—107页

一个人总是会有许多缺点的。如果觉得自己一点缺点也没有，“老虎屁股摸不得”，那就不好了。要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们是靠老实吃饭，不靠摆架子吃饭。……如果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就说不得，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领导人物就说不得，那就不好了。对孔夫子，自董仲舒以来就说不得了，“非圣诬法，大乱之殃”。我们不能这样，我们要实事求是。我们对一切事情都要加以分析：好，就肯定；不好，就批评。

《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
第6卷第346—347页

古语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看这句话要改一下。人，包括圣贤在内，总是有过的，有过必改就好了。我在上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还说过，不要造成偶像，就是不要说谁不能批评，而要说可以批评，但批评要正确，对于批评要分析。

《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
第6卷第347页

一个共产党，一个国民党，这两个党比较起来，谁怕批评呢？国民党害怕批评。它禁止批评，结果并没有能够挽救它的失败。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工农基本群众是在我们方面。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4页

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

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6页

要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的批评。自己要经得起批评。应当采取主动，首先作自我批评。有什么就检讨什么，一个钟头，顶多两个钟头，倾箱倒篋而出，无非是那么多。如果人家认为不够，请他提出来，如果说得对，我就接受。让人讲话，是采取主动好，还是被动好？当然是主动好。已经处在被动地位了怎么办？过去不民主，现在陷于被动，那也不要紧，就请大家批评吧。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这个时候我坐下来，冷静地想一想，两三天晚上睡不着觉。想好了，想通了，然后诚诚恳恳地作一篇检讨。这不就好了吗？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10—311页

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但是

红军党内的批评有些不是这样，变成了攻击个人。其结果，不但毁坏了个人，也毁坏了党的组织。这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纠正的方法，在于使党员明白批评的目的是增加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不应当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90页

许多党员不在党内批评而在党外去批评。这是因为一般党员还不懂得党的组织（会议等）的重要，以为批评在组织内或在组织外没有什么分别。纠正的方法，就是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对党委或同志有所批评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提出。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90页

党内的主观主义的批评，不要证据的乱说，或互相猜忌，往往酿成党内的无原则纠纷，破坏党的组织。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91页

关于党内批评问题，还有一点要说及的，就是有些同志的批评不注意大的方面，只注意小的方面。他们不明白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至于个人缺点，如果不是与政治的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则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们无所措手足。而且这种批评一发展，党内精神完全集注到小的缺点方面，人人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就会忘记党的政治任务，这是很大的危险。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91—92页

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92页

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9—410页

批评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批评，结果是使党团结；一种是不正确的批评，如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的那种批评，结果是使党分裂。我们要发扬正确的批评，反对不正确的批评，这就是整风。要继续将歪风整掉，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团结一致地干，并且一定能干得好。

《切实执行十大政策》（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75页

批评要是及时的批评，不要老是爱好事后的批评。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36页

八、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

（一）共产党员的理想和信念

如果怕声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也决不是真正共产党员了。

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党务报告决议案》时的发言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八日)

首先我要声明的是，有些人说共产党员宣布为三民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就是等于放弃自己的共产主义的信仰，我可以再一次正式代表我们的党郑重声明：这只会是拨弄是非者的谣言，这绝不合乎事实。我们是共产党员，我们宣布愿意与国民党同志们一起去为中山先生的未竟的革命事业——即为中国的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和经济地位平等的三民主义的事业而奋斗，同时，我们绝不会放弃我们自己虔信多年、并为之牺牲奋斗多年的共产主义。

同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的谈话（一九三八年二月二日），《解放》第31期

你们不应当是只能简单地记述社会生活的艺术工作者，而应当有为新中国奋斗的远大理想。这就是说，不但要抗日，还要在抗战过程中为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而努力，不但要为民主共和国，还要有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理想。

《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23页

共产党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达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阶段。

《论新阶段》（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26页

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或讥笑；对于这些，我们必须给以坚决的排击。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59页

共产主义是不可抗御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死难烈士万岁！

为东北烈士纪念馆题写的挽词（一九四八年）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6页

无产阶级必然能够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必然能够战胜资本主义，被压迫民族必然能够战胜帝国主义。当然，在人民前面还有困难和曲折。但是，列宁在三十六年前说得好，“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线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14页

(另参见本编“党的纲领和路线”，第1889—1901页)

(二) 共产党员的立场

1. 必须站在党的立场，也就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

降低党的立场，模糊党的面目，牺牲工农利益去适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将必然引导革命趋于失败。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64页

共产党员对于一切为国为民的事业，应该坚持自己的立场，始终不变地向着战胜日寇建立新中国的方向走去，谁要违背了这种立场，这个方向，谁就丧失了共产党员的资格。

《论新阶段》(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32—633页

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48页

从团结出发，从团结全党出发，从团结一百万党员出发，从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以及讨论其他任何别的问题，就是这个出发点，或者叫做立场。还有什么

别的出发点、别的立场没有？没有了。为了全党与全国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就是我们的立场。

《时局问题及其他》（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53页

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

给中共佳县县委的题词（一九四七年十月十八日），《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卷第245页

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

《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四日、二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80页

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

在国内是如此，在国际范围内也是如此。……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坚定地站在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27页

2. 不要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对待人民

从前许多同志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常常有两个名词：一个叫做“残酷斗争”，一个叫做“无情打击”。这种手段，用了对付敌人或敌对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对付自己的同志则是错误的。党内也常常有敌人和敌对思想混进来，如《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四条所说的那样。对于这种人，毫无疑问地是应该采用残酷斗争或无情打击的手段的，因为那些坏人正在利用这种手段对付党，我们如果还对他们宽容，那就会正中坏人的奸计。但是不能用同一手段对付偶然犯错误的同志；对于这类同志，就须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就是《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五条所说的方法。

《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35页

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72页

对政府与人民中的缺点，即使怎样的严重，亦应该善意的提议，而不能恶意的报复与攻击，才是一个革命军人对待革命政府与革命人民的正当态度，不然就是军阀的态度。

《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与人民结合的军队》（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86页

用霸道对敌人是正确的，对敌人就是要狠，但用霸道对人民、对党、对政府则是错误的，对人民对群众应讲王道。我们要有两种态度，对敌人用霸道，对人民用王道。这一条要记得非常牢固。

《切实执行十大政策》（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69页

我们的军队一向就有两条方针：第一对敌人要狠，要压倒它，要消灭它；第二对自己人，对人民、对同志、对官长、对部下要和，要团结。这是党中央和西北局的方针，也是全体人民所要求的方针。

《坚持为人民服务》（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10页

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8页

（三）共产党员的品格

1. 襟怀坦白，忠心耿耿，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

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

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7页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

《反对自由主义》（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61页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一切为了党，破坏党即是破坏革命。

《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一九三七年十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60页

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2页

2. 顾全大局，一切从全党利益出发

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一切小道理都归大道理管着。国人应从大道理上好生想一想，才好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安顿在恰当的位置。

《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48页

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一个道理。如果某项意见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这就是照顾全局的观点。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5页

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必须善于照顾全局，善于照顾多数，并善于和同盟者一道工作。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6页

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21页

我们历来的原则，就是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3页

全国一盘棋与地方积极性相结合，有矛盾，按全国一盘棋原则去解决。

《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641页

3. 脚踏实地，无所畏惧，立志改革

当着这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迅速地向前发展的时候，我们需要大批的积极分子来领导，需要大批的精练的先锋队来开辟道路。这种先锋分子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他们是不谋私利的，惟一地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他们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往直前；他们不是狂妄分子，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他们在革命的道路上起着向导的作用。目前的战局只是单纯政府与军队的抗战，没有广大的人民参加，这是绝对没有最后胜利的保障的。我们现在需要造就一大批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到底的先锋队，要他们去领导群众，组织群众，来完成这历史的任务。

《论鲁迅》（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2页

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惟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

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

为陕北公学成立的题词(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33页

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在从前,在旧中国,讲改革是要犯罪的,要杀头,要坐班房。但是在那些时候,有一些立志改革的人,他们无所畏惧,他们在各种困难的条件下面,出版书报,教育人民,组织人民,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给我国的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开辟了道路。我们的政权的建立还不过短短几年,人们可以看到,不论在经济方面,在文化、教育、科学方面,都已经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为了达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对于什么困难我们共产党人也是无所畏惧的。但是仅仅依靠我们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有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5—276页

4.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面前都降服了。而在有些人面前呢？却做了畏葸不前的借口。你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未免藏着一些腌腌臢臢的东西。你是任何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的，而在有些人却似乎以脱离群众为快乐。你是处处表现自己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却似乎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当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

《为徐特立六十岁生日写的贺信》（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77—478页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

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纪念白求恩》（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59—660页

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至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纪念白求恩》（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60页

5. 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怕困难，勇于牺牲

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那些地方的工作是很艰苦的。艰苦的工作就像担子，摆在我们的面前，看我们敢不敢承担。担子有轻有重。有的人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拣轻的挑。这就不是好的态度。有的同志不是这样，享受让

给人家，担子拣重的挑，吃苦在别人前头，享受在别人后头。这样的同志就是好同志。这种共产主义者的精神，我们都要学习。

《关于重庆谈判》（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61—1162页

估计到国际国内各种条件，国民党的反共进攻及高压政策是要失败的，必无前途的，因此全党全军必须提高胜利信心，不要为国民党的进攻与高压所吓倒，必须克服可能的悲观情绪。

《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争取时局好转》（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23页

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

《为人民服务》（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05页

我们清楚地懂得，在我们和中国人民面前，还有很大的困难，还有很多的障碍物，还要走很多的迂回路程。但是我们同样地懂得，任何困难和障碍物，我们和全国人民一道一定能够加以克服，而使中国的历史任务获得完成。……须知不论怎样迂回曲折，中国人民独立解放的任务总是要完成的，而且这种时机已经到来了。一百多年来无数先烈所怀抱的宏大志愿，一定要由我们这一代人去实现，谁要阻止，到底是阻止不了的。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53页

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

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

《愚公移山》（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101—1102页

我们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设想过许多困难，我们宁肯把困难想得更多一些。有些同志不愿意多想困难。但是困难是事实，有多少就得承认多少，不能采取“不承认主义”。我们要承认困难，分析困难，向困难作斗争。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不能设想，哪一天早上，一切反动派会统统自己跪在地下。总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面前困难还多，不可忽视。我们和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排除万难，达到胜利的目的。

《关于重庆谈判》（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63页

全党同志都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并准备用百折不回的毅力，有计划地克服所有的困难。反动势力面前和我们面前都有困难。但是反动势力的困难是不可能克服的，因为他们是接近于死亡的没有前途的势力。我们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因为我们是新兴的有光明前途的势力。

《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16—1217页

我们清醒地知道，在我们的前进道路上，还会有种种障碍，种种困难，我们应当准备对付一切内外敌人的最大限度的抵抗和挣扎。但是，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

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60页

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知道一切内外反动派的进攻，不但是必须打败的，而且是能够打败的。当着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45—1246页

二十二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驱逐敌人建立人民政权的区域，必不可免地要经过一个困难的时期。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但须付以必要的时间和艰苦的努力。

《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15页

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不管什么样的困难也不怕。人民解放军的二十二年的斗争史给了我们这样一种经验和信心，只须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明了自己所遇困难的性质，坚决地执行克服困难的各项根本政策，我们就能达到目的。

《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15—316页

我们面前的困难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但是我们确信：一切困难都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所战胜。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5页

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于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一九五〇年十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01页

我们共产党人是以不怕困难著名的。我们在战术上必须重视一切困难。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困难,我们都要采取认真对待的态度,创造必要的条件,讲究对付的方法,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将它们克服下去。根据我们几十年的经验,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困难,果然都被克服下去了。种种困难,遇到共产党人,它们就只好退却,真是“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这里就得出一条经验,它叫我们可以藐视困难。这说的在战略方面,是在总的方面。不管任何巨大的困难,我们一眼就看透了它的底子。所谓困难,无非是社会的敌人和自然界给予我们的。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国内反革命分子以及他们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等等,都不过是垂死的力量,而我们则是新生的力量,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对于他们,我们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92—393页

我们要造就大批的民族革命干部，他们是有革命理论的，他们是富于牺牲精神的，他们是革命的先锋队。

《目前的时局和方针》（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63页

革命的过程，像在波涛汹涌的江河中行船，怯懦者常常会动摇起来，不知所措。在革命的大浪潮中遇到困难便动摇退缩的人在历史上是有的，希望你们中间没有这样的人，你们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建设新中国而永不退缩，勇往直前，要坚决地为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奋斗到底！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是为了自己的家，而是为了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家，牺牲一切。所以第一个决心是要牺牲升官，第二个决心是要牺牲发财，第三更要下一个牺牲自己生命的最后的决心！现在你们牺牲升官、发财及吃小米饭、爬清凉山的初步决心是有了，但没有最后的决心是不够的，你们更要有为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牺牲自己贡献生命的决心！

《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一九三八年四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19页

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

纪念抗大五周年的题词（一九四一年六月六日），《毛泽东年谱（一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303—304页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为人民服务》（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04页

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

《为人民服务》（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05页

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正当北伐战争向前发展的紧要关头，这个代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及其一切革命政策，就被国民党当局的贩卖性的反人民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所破坏了。……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在中国的广大区域内，组织了人民的政府，实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创造了人民的军队——中国红军，保存了和发展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35—1036页

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

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1096—1097页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1098页

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为“四八”被难烈士的题词（一九四六年四月），《毛泽东题词墨迹选》第89页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七律·到韶山》（一九五九年六月），《毛泽东诗词集》第110页

从马克思以来，从来不讲什么计较功劳大小。你是共产党员，是整个人民群众中间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是无产阶级里面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所以，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个口号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对立的。你看我们过去死了多少人，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些老同志，是幸存者，偶然存在下来的。皮定钧同志，你那个鄂豫皖那个时候多少人？后头剩了多少人？那个时候人可多啦，

现在存在的就不那么多了。那个时候，江西苏区，井冈山苏区，赣东北，闽西，湘鄂西，陕北，经过战争有很大的牺牲，老人存下的就不多了，那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0页

6. 独立思考，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一切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货色，我们都要抵制，使它们在市场上销售困难，不要让它们利用党内理论水平低，出卖自己那一套。为此目的，就要同志们提高嗅觉，就要同志们对于任何东西都用鼻子嗅一嗅，鉴别其好坏，然后才决定欢迎它，或者抵制它。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27页

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

《学习和时局》（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48—949页

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没有什么行不通的。每一个根据地及他处只要有几十个领导骨干打通了这个关节，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给陈毅的信》（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29页

所谓真理就是在我们斗争实践中被证明了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东西，它适合人民的要求，使我们取得斗争的胜利。已经被客观事实证明了是真理，那就要承认，而且要坚持；如果有人反对这样的真理，我们就要解释，就要批评。认识了真理就一定要坚持，如果不坚持会怎么样呢？那就不得了。把真理打烂就是把中国人民打烂，把中国无产阶级打烂，把共产党打烂，革命就会失败。所以大真理也好，小真理也好，整体真理也好，部分真理也好，凡是真理都应该坚持。还有一个东西叫做错误，这就是在人民斗争中间不适合的，在斗争中间讲的话不对的，做的事跌了跤子的，写的决议案或者全部不对或者部分不对的。错误的东西应该丢掉，人民不需要的东西应该丢掉，没有理由保持下来。在实际工作中行不通的，话讲错了，事做错了，决议案写错了，就应该修正。如决议案有十条，九条不错，一条错了，那错的一条就要修改，这叫做修正错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要不要采取这种态度？要的。一个共产党员要不要这样呢？要这样的。在党校学习要不要这样呢？要这样的。这就叫做公道。坚持真理是公道，修正错误也是公道。这就是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的辩证法。

《时局问题及其他》（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54—255页

党校出去的同志，都采取一致的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并且到处宣传，对你前后左右的人宣传，到哪里就跟哪里的人宣传。这样，事情就好办了。当然，自己看不到的缺点、错误还很多，那就要准备请人家讲。缺点错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有则说之，无则不说；讲对了很好，讲出了真理；讲的不对也不要紧，言者无罪。

《时局问题及其他》（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55页

以前有一个杞国，有人怕天掉下来，天天忧愁，谓之“杞人忧天”。到现在几千年了，二十四史都没说天掉下来过。就是掉下来，我们同志当中也有几个很高的可以撑住，不要紧。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三番四复的研究，现在还是基本通过，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之后，再拿去精雕细刻。但这样是不是还会有漏洞呢？还可能有。经过十年八年之后，修中共党史的时候可以看出来，如果有漏洞，就是有漏洞，就说“这一条历史过去搞掉了，不对，要重新添上”。这没有什么，比如积薪，后来居上，我们对前人也是这样的。有漏洞就改，原则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6页

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95页

如果我们思想中、工作中有了缺点错误，要随时准备修正，这叫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真理要坚持，有时真理不被大多数人所认识和了解，我们也要反“潮流”。不论是错误是缺点，哪怕是很小的，我们都要准备修正。

《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8页

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

《对吴法宪检讨信的批语和批注》(一九七〇年十月十四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38页

7. 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

(参见第一编“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第249—253页)

8.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共产党员应该到军队中去，到军官学校中去，到保卫队、壮丁队、义勇军、游击队中去，成为政治觉悟、坚决勇敢、刻苦耐劳、遵守纪律的模范，并利用自己的地位以影响其他的将士，改变军队的质量。

《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一九三七年十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55页

共产党员，应与各党各派各界人民一道坚持抗战，为驱逐日寇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并在斗争中起模范作用，不达目的，决不停止！

为《新中华报》的题词(一九三八年六月三十日),《新中华报》1938年6月30日

共产党员应在民族战争中表现其高度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应使之具体地表现于各方面，即应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我们的战争，是在困难环境之中进行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觉悟、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不足，大多数民众的无组织，军力的不坚强，经济的落后，政治的不民主，腐败

现象和悲观情绪的存在，统一战线内部的不团结、不巩固等等，形成了这种困难环境。因此，共产党员不能不自觉地担负起团结全国人民克服各种不良现象的重大的责任。在这里，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1—522页

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2页

共产党员在和友党友军发生关系的时候,应该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坚持统一战线的纲领,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应该言必信,行必果,不傲慢,诚心诚意地和友党友军商量问题,协同工作,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2页

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2页

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因此,共产党员又应成为学习的模范,他

们每天都是民众的教师，但又每天都是民众的学生。只有向民众学习，向环境学习，向友党友军学习，了解了他们，才能对于工作实事求是，对于前途有远见卓识。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2—523页

在长期战争和艰难环境中，只有共产党员协同友党友军和人民大众中的一切先进分子，高度地发挥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才能动员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3页

一切共产党员须知：只有抗战到底，才能团结到底，也只有团结到底，才能抗战到底。因此，共产党员要作抗战的模范，也要作团结的模范。

《团结到底》（一九四〇年七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59页

一切未脱离生产的农村党员，应以发展生产为自己充当群众模范的条件之一。

《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11页

（四）共产党员要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

（参见第一编“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第13—191页）

（五）共产党员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

中国共产党现在提出的这些政策，没有问题的是带着爱国主义性质的。有人说：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他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不要保卫祖国。这是极糊涂的话。中国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他们主张世界大同运动；但同时又是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者，为了保卫祖国，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血。十五年来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人人皆知的事实。这种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并不冲突，因为只有中国的独立解放，才有可能去参加世界的大同运动。

《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84页

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同时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呢？我们认为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对于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所谓“爱国主义”，共产党员是必须坚决地反对的。日本共产党人和德国共产党人都是他们国家的战争的失败主义者。用一切方法使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战争归于失败，就是日本人民和德国人民的利益；失败得越彻底，就越好。日本共产党人和德国共产党人都应该这样做，他们也正在这样做。这是因为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战争，不但是损害世界人民的，也是损害其本国人民的。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中国是被侵略的国家。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

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对于我们，失败主义是罪恶，争取抗日胜利是责无旁贷的。因为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0—521页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纪念白求恩》（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59页

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白求恩同志是实践了这一条列宁主义路线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员也要实践这一条路线。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

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纪念白求恩》（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59页

社会主义国家是完全新型的国家，是推翻了剥削阶级而由劳动人民掌握权力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间的相互关系中，实现着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统一的原则。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19页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要与各国情况相结合；国际主义同爱国主义是统一的。

《要学习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一九五八年四月二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14页

被压迫人民争取彻底的解放，首先是依靠自己的斗争，其次才是国际的援助。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

《接见非洲朋友时的谈话》（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339—340页

（六）关于党性与个性问题

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

《给秦邦宪的信》（一九四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08页

关于个性与党性。这个问题有人在整风中间提出过，外面也有人讲过我们。有一个新闻记者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大公报》上，说共产党是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他们的许多文件上只讲党性，还作出增强党性的决定等等。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我在报告里讲了，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是摧残个性的，使中国人民不能发展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的身体也不能发展，精神也不能发展，都受到了摧残。我曾经讲过：鲁迅的骨头很硬，半殖民地的国家有像鲁迅这样硬的骨头是很可贵的。半殖民地的国家是穷得很的，人民生活痛苦，饱受压迫，于是有那么一些人就变成了洋人的奴隶，即买办。上海有所谓“外国火腿”，就是外国人踢了一脚，算作给一个“火腿”。到过上海的人，还看见过有的公园有“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民族战争就反对这些东西，外国民族压迫中国民族是不行的，我们要独立。外国野蛮的法西斯压迫中国人民，不讲道理是不行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要求独立！中国如果没有独立就没有个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政治上要这样做，经济上要这样做，文化上也要这样做。广大群众没有清楚的、觉醒的、民主的、独立的意识，是不会被尊敬的。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36页

讲到个性与党性，党性就是普遍性，个性就是特殊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础上的。没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没有党员的个性，哪里有党性？党性是共同的性质、普遍的性质，全党每一个人都有性质。比如讲政策上的统一，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的纲领以及各部分的纲领、整风、生产等，应在这些原则上，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这是共同的。至于每

一个党员是不是不相同？当然不相同。个性不能强同，人就有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各种各样的不同，工作也各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党务等的不同。在军事工作方面又有军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的不同，党务工作方面也有根据地、沦陷区等各种工作地区的不同。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程度上人们也不相同，同一个人在幼年时期和年纪大时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也不相同。总之，有工作的不同，地位的不同，性别的不同，年龄的不同等等，抹煞这种不同，就是不让同志们发展长处。这些都不能统一在一条轨道之上。……总而言之，党员是有各种不同的个性，谁要抹煞各种不同的个性是不行的。抹煞各种差别，结果就会取消统一，抹煞特殊性也就没有统一性。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40—341页

在我们党内，在我们解放区，人民有了比较充分的自由，有独立性和个性。而在封建制度下，人民是没有人格、没有自由、没有独立性、没有个性的。马克思说：“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在中国的封建制度下，广大人民也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原因是他们没有财产。独立性、个性、人格是一个意义的东西，这是财产所有权的产物。中国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有财产所有权，他们使大批的人破产，使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破产，财产集中在他们手里，他们自己就有独立性、个性、自由，而广大人民丧失了财产所有权，也就没有个性、独立性、自由，或者是削弱了。因此要恢复他们的个性，就要进行革命斗争，比如我们组织工会，在资本家的工厂里把工人组织起来，在解放区搞减租减息，建立人民的武装和政权，这就使人民有了个性、自由和人格。至

于我们党，它本来就是人民的一部分，当然不会使工人、知识分子、农民出身的党员没有人格。人民有人格，我们党也就有，人民都没有，我们党哪里会有呢？我们要向党员进行教育，使他们自觉，懂得社会上还有很多人没有人格，没有自由，要为他们的自由而奋斗。在我们党领导的解放区，不仅社会上的人都有人格、独立性和自由，而且在我们党的教育下，更发展了他们的人格、独立性和自由。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讲得很清楚，他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同样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一百二十万党员就是一百二十万块木头。这里我记起了龚自珍写的两句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在我们党内，我想这样讲：“我劝马列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要使我们的党员成了纸糊泥塑的人，什么都是一样的，那就不好了。其实人有各种各样的，只要他服从党纲、党章、党的决议，在这个大原则下，大家发挥能力就行了。讲清楚这一点，对于党的进步，对于全体党员积极性的发挥是会有好处的。

有两种个性，即创造性的个性和破坏性的个性。对我们党来说是如此，对社会来说也是如此。创造性的个性是什么呢？比如模范工作者、特等射击手、发明家、能独立工作的干部，不但党外斗争有勇气，党内斗争也有勇气，盲目性少，不随声附和，搞清楚情况再举手，这就是创造性的个性，它同党性是完全一致的，完全统一的。另一种个性，是带破坏性的、个人主义的，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搞所谓标新立异。其实标新立异也有两种：一种是革命的标新立异，比如模范工作者、劳动英雄、发明家，他们提出很多好的意见，比许多人工作更进步，这一种是创造性的革命性的标新立异。另一种是破坏性的标新

立异，它越出了无产阶级轨道，同党性不一致，是小资产阶级的方针、路线和政策，是错误的。马克思讲的独立性和个性，也是有两种，有革命的独立性和个性，有反动的独立性和个性。而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性。我们要使许多自觉的个性集中起来，对一定的问题、一定的事情采取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有统一的意志，这是我们的党性所要求的。有些人所谓的发展个性就是说，我们拥护新民主主义，就必须有另外一批人反对新民主主义，才算是发展个性；我们主张打日本，就一定要有另外一批人反对打日本，才算是发展个性；我们反对汪精卫，就一定要有了一批人拥护汪精卫，才算是发展个性。这种发展个性，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在党性与个性问题上，整风中有党性，也有个性；生产工作中有党性，也有个性；军事工作中有党性，也有个性；政府工作中有党性，也有个性；任何一项凡是我们要做的工作和事情中都有党性，也有个性。这种个性必须是与党性统一的。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15—417页

九、执政党建设中的几个问题

（一）坚持“两个务必”

1. 革命胜利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久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

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8—1439页

2. 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对工作要有谦逊的态度，要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不要得浮肿病，不要以为自己是首长就了不得，要自觉不足。要同他人交换意见，诚意地听取对方的意见。要经常想到自己有缺点，有错误，有不足，这样才能有进步。

……要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妄自尊大。我们看同志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有无谦逊的态度。

《切实执行十大政策》（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74页

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一九三〇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第三次是在一九三一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面前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

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在一九三八年。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似的错误。这一次，又使得受这些同志的错误思想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学习和时局》（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47—948页

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给郭沫若的信》（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27页

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谦虚就不骄，就可以戒骄。从前讲“大贾深藏若虚”，做生意的人本钱大他就藏起来，如像没有一样。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要保持谦虚。在我们的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教训，就是大不得，小了就舒舒服服，没有事情，一大就胀起来了，脑壳胀得很大，骄傲起来了，心里也躁了，躁得很。急躁和骄傲是连在一起的，骄傲就要急躁，急躁的人没有不是骄傲的、不谨慎的、粗枝大叶的。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5页

我们要英勇奋斗，但又要谦虚谨慎。历史的教训就是要我们谦虚谨慎。过去有的同志很急躁，希望革命明天就胜利。但

是可惜没有胜利，一拖拖了十年。有了三十万党员、几十万军队，头大了，急躁起来了，结果只剩了一个陕北。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7页

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在现时，为着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在将来，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只要有正确的政策，只要我们一致努力，我们的任务是必能完成的。

《两个中国之命运》（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27页

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是全党应取的态度。谦虚则不骄，谨慎则不躁，骄与躁是革命工作的大敌。希望你们以此自守，并教育一切干部。

《争取时间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45页

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43页

必须教导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不要骄傲自满，不要以功臣

自居，不要看不起起义部队和地方部队，而要谦虚谨慎，耐劳耐苦，对敌人很勇敢，对同志对人民则很和气，借以团结全军全民完成自己光荣伟大的任务。

《人民解放军必须谦虚谨慎维持良好的纪律》（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83页

要学习，不要骄傲，不能看不起人。鹅蛋看不起鸡蛋，黑色金属看不起稀有金属，这种看不起人的态度是不科学的。中国是大国，党是大党，也没有理由看不起小国小党。对兄弟国家人民要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要有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对外贸易方面，有些人骄傲，妄自尊大，这是不对的。要在全党特别要在出国人员进行教育。要苦学苦干，在十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那时，我国强大了，也要谦虚，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

七届二中全会会有几条规定没有写在决议里面。一曰不作寿。作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

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二日）

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就是到五十年后像个样子了，也要和现在一样谦虚。如果到那时候骄傲了，看人家不起了，那就不好。一百年也不要骄傲。永远也不要翘尾巴。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9页

我们经常说,不要因为我们的工作有成绩就骄傲自满起来,应该保持谦虚态度,向先进国家学习,向群众学习,在同志间也要互相学习,以求少犯错误。在这次党代表会议上,我感觉仍然需要重复地将这些话说一遍。鉴于高岗、饶漱石的反党事件,骄傲自满情绪在我们党内确实是存在着,在有些同志的身上这种情绪还是严重的,不克服这种情绪,就会妨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任务的完成。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90页

有些同志,因为自己是老革命,就骄傲起来,这是很不当的。比较起来,如果说允许骄傲的话,倒是青年人值得骄傲一下。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年纪越大,经验越多,就应当更谦虚。让青年人看到我们确实是有经验的:“这些前辈,确是有点经验,不要看轻他们,你看他们那么谦虚。”四五十岁的人了,因为得了许多经验,反倒骄傲起来,那岂不是不像样子?青年人就要发议论:“你们那些经验就等于没有,还不是跟小孩子一样。”小孩子有点骄傲情绪,那是比较合理的。上了年纪的人,有了这么多经验,还骄傲,把尾巴翘得那样高,可以不必。俗语说:“夹紧尾巴做人。”……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志,首先是老同志,不要翘尾巴,而要夹紧尾巴,戒骄戒躁,永远保持谦虚进取的精神。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02—403页

如果有些共产党人发生骄傲自满和思想硬化的情形，那么，他们甚至也会重犯过去自己犯过的或者别人犯过的错误。这一点，我们共产党人是必须充分地估计到的。

《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六年四月二日、四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0页

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这有什么不好呢？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4页

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17页

腐化、官僚主义、大国主义、骄傲自大，中国都可能犯。现在中国人有谦虚的态度，愿意向别人学习，这也是有原因的，我们没有本钱：一、我们原先没有马列主义，这是学别人的；二、我们没有十月革命，是在十月革命三十二年以后才在一九四九年取得革命胜利的；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是一个支队，不是主力军；四、我们没有工业化，主要是农业和破破烂烂的手工业。因此，就是有人想翘尾巴，也没有本钱，顶多翘一两公尺。但是我们要预防将来，十年、二十年以后就危险了，四十年、五十年以后就更危险了。

《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24页

应当指出,有大量的好同志却被那些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爱好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同志们,亦即官僚主义者,所压住了,现在必须加以改革。凡不虚心地认真地对本地本单位本人作分析,对别地别单位别人作分析,拒绝马克思主义辩证分析方法的同志,要进行同志式的劝告和批评,以便把不良情况改变过来。把向别部、别省、别市、别区、别单位的好经验、好作风、好方法学过来这样一种方法,定为制度。

《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48—349页

我们的同志和人民,永远不要骄傲,不要固步自封,不要自以为是,永远要谦虚谨慎,实事求是。

《对彭真在国庆十五周年典礼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三十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175页

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皦皦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

《给江青的信》(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72页

大家要谨慎小心,无论是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政治

局委员，都要谨慎小心。不要心血来潮的时候，就忘乎所以。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0页

3. 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0页

发扬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精神。

《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12页

这次的抗战，表示出我们民族有这样一个作风，就是不怕一切艰难困苦，不怕一切牺牲，坚持下来。这就保证了我们的胜利。

在陕北公学第二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

共产党也有他的作风，就是：艰苦奋斗！这是每一个共产

党员，每一个革命家的作风。

在陕北公学第二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

没有什么困难、事情能够阻住我们去路的，问题只在坚持正确方针，艰苦奋斗，就能达到目的。

给董柏成的题词（一九三八年），《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

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要把现在许多人中间流行的那种自私自利，贪生怕死，贪污腐化，萎靡不振的风气，根本改变过来。共产党历来更提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抗战中间，就是要纠正一切不利于抗战的错误思想。……这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新中华报》1939年5月10日

人总是要老的，老人为什么可贵呢？如果老就可贵，那末可贵的人太多了。因此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标准。就是说，可贵的是他一辈子总是做好事，不做坏事，做有益于人类的事，不做害人的事。如果开头做点好事，后来又做坏事，这就叫做没有坚持性。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人。他

今年六十岁了，他从同盟会到今天，干了四十年革命，中间颠沛流离，艰苦备尝，始终不变，这是很不容易的啊。从同盟会中留下到今天的人，已经不多了，而始终为革命奋斗，无论如何不变其革命节操的更没有几个人了。要这样做，不但需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且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然就不能抵抗各种恶势力恶风浪，例如死的威胁，饿饭的威胁，革命失败的威胁等等，我们的吴玉章同志就是经过这样无数的风浪而来的。因此，我们要学习他的各方面的好处，但特别要学习他对于革命的坚持性。这是最难能可贵的一件事，这是我们党的光荣，这是中国革命的光荣。

《吴玉章寿辰祝词》（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61—262页

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81页

我们是艰苦奋斗，军民兼顾，和蒋介石统治区的上面贪污腐化，下面民不聊生，完全相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是一定要胜利的。

《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88页

中国人民已经具有战胜困难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能够渡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内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只要我们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只要我们团结一

致，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能在经济战线上迅速地获得胜利。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5页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我庆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7页

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同志们提出，厂长、校长可以住棚子，我看这个法子好，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朱总司令走了四十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过来了。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就吃树皮、树叶。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要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

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每一个人有一条生命，或者六十岁，或者七十岁，或者八十岁、九十岁，看你有多长的命。只要你还能工作就多多少少应当工作。而工作的时候就要有一股革命热情，就要有一种拼命精神。有些同志缺乏这种热情，缺乏这种精神，停滞下来了。这种现象不好，应当对这些同志进行教育。

《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一九五七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5—286页

共产党员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一定要有不畏困难和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去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一定要克服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否则就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九五七年七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47页

（二）坚持反腐倡廉

1. 反腐败是一场严重的长期的斗争

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和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是我们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在这个时期内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793页

“毕其功于一役”，我是在流血的革命这一点上说的，就是说流血的革命只有这一次，将来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那一次就不用流血了，而可能和平解决。但这只是可能，将来是否不流血，还要看我们工作的努力情况。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62页

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实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08页

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

《关于“三反”、“五反”》（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九五二年五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90页

资产阶级分子腐蚀我们和我们反对资产阶级分子对于我们的腐蚀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这个问题不是很快就可以完全解决的。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的文件和对决议草案的修改》（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442页

我们的党，一般说来是很好的。我们党员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贫苦农民。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他们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是，也要看到，我们党内还存在一些问题，不要想像我们党的情况什么都好。我们现在有一千七百万党员，这里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国以后入党的，五十年代入党的。建国以前入党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在这百分之二十的人里面，一九三〇年以前入党的，二十年代入党的，据前几年计算，有八百多人，这两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七百多人了。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5—306页

2. 厉行廉洁政治，反对贪污和浪费，依法严惩腐败行为

各级苏维埃政府要领导群众团体做节省一切开支以充裕战争经费的运动，政府中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如客饭，办公费，灯油杂费，都须尽量减少，尤其纸张信套，更可以节省使用。这一切节省，虽在各部分为数甚少，但积少成多，并可以养成苏区中更加刻苦更加节省的苏维埃工作作风——这是万分必要的。对苏维埃中贪污腐化的分子，各级政府一经查出，必须给以严厉的纪律上的制裁。谁要隐瞒、庇护和放松对这种分子的检查与揭发，谁也要同样受到革命的斥责。同时要注意到经费节省，决不是工作减少，相反的，在刻苦的精神之下，还要使工作的效能更加增大起来。

同项英等发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十四号》（一九三二年七月七日），《红色中华》1932年7月21日

必须反对贪污浪费现象，因为这种现象不但是苏维埃财政经济的损失，并且足以腐化苏维埃工作人员，使他们对于工作失去热忱与振奋精神的元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红色中华》二苏大特刊第3期

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

《我们的经济政策》（一九三四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34页

经济甚紧，外面用费须节省又节省，千万不可过费。无论何时不要丧失我们的立场，不要接受别人的馈赠。只有到了万不得已时，才允许向别人借一点钱用，日后如数归还。一切用费均须报账。因近日接连发生几件浪费事，故向二兄指出此点。并请向雪枫、理治及其他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同志随时提出对此问题的警觉。苦久了的人难免见风华而把握不住，故应作为一个问题，对同志做教育与警戒的工作。

《给叶剑英、刘鼎的信》（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53页

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为什么要取消它呢？只有不要脸的人们才说得出不脸的话，顽固派有什么资格站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同志们，当然不能是这样的。不是取消边区，而是全国要学习边区；不是取消八路军、新四军，而是全国要学习八路军、新四军；不是取消共产党，而是全国要学习共产党；不是要进步的人们向落后的人们看齐，而是要落后的人们向进步的人们看齐。我们共产党是最主张统一的人，我们发起了统一战线，我们坚持了统一战线，我们提出了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谁人能够提出这些呢？谁人能够实行这些呢？谁人能够只要每月五块钱薪水呢？谁人能够创造这样的廉洁政治呢？

《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一九四〇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18页

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实行俸以养廉原则，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需的物质生活及充分的文化娱乐生活。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35页

节约是一切工作机关都要注意的，经济和财政工作机关尤其要注意。实行节约的结果，可以节省一大批不必要的和浪费性的支出，其数目可以达到几千万元。从事经济和财政业务的工作人员，还必须克服存在着的有些还是很严重的官僚主义，例如贪污现象，摆空架子，无益的“正规化”，文牍主义等等。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96页

下面多少单位各自为政，上面没有或缺少在政策原则上与工作内容上的统一的指导、统一的计划与统一的检查，致使各部分不知道什么事是不应该做的，或者明知故犯。于是各自为政，闹独立性的事也发生了；破坏政策原则，破坏政府法令的事也发生了；侵害人民利益的事也发生了；各个经济单位之间，不但没有协助，反而互相斗争，互相妨碍的事也发生了；瞒上不瞒下，瞒上又瞒下，打埋伏，说谎话的现象也发生了；极端浪费，一掷千金，但求铺张，不求实效的现象也发生了；尤其严重的，是在一部分干部之间发生了贪污赌博等极恶劣的现象。有个别的干部是被物质所诱惑，因而不愿忠实于共产主义的神圣事业，完全腐化了；另有若干干部则起了霉，要在太阳底下

晒一晒才能恢复健康。所有这些坏事，所有这些弊端，在一部分军队与一部分机关学校的干部中，都是或多或少地发生过的。今后所有军队与机关学校的一切上级领导机关，必须着重于照顾全局，掌握政策，对所属各单位的生产活动一定要有统一的计划，统一的检查，绝对不容许再有各自为政，闹独立性，破坏政策，破坏法令，侵害人民利益，各单位互相斗争，互相妨碍，以及干部中贪污浪费赌博等现象再行发生。如再有这类现象发生，必须严申纪律，轻者批评，重者处罚，决不可对他们纵容，反而美其名曰“宽大政策”。这就是经济工作中的整顿三风，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执行。

《关于发展军队的生产事业》(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90—691页

在部队生产事业中，应抓紧思想领导，建立和健全生产中的各项制度及领导机关，纠正并防止干部各自为政，贪污腐化，大吃大用，铺张扬厉，不讲节省，不求实效等等极坏的弊病。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解放社1944年1月订正再版第141页

选择政治上与工作能力上比较更强的干部去管理各部门的生产与供给工作。现有的经济干部须加以审查，不称职的及犯贪污腐化错误的人必须调动工作，有些特别严重的并须予以应得的处罚。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解放社1944年1月订正再版第179页

凡在公营经济中做事的公务人员，如果他为他自己个人图谋特殊利得，在我们队伍中就叫做丧失道德的行为，在法律上

就叫做犯了贪污罪。而一切不贪污、不浪费、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人，就算是有很高尚道德的人，应受到党与政府的称赞及奖励。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解放社 1944 年 1 月
订正再版第 208 页

任何地方必须十分爱惜人力物力，决不可只顾一时，滥用浪费。任何地方必须从开始工作的那一年起，就计算到将来的很多年，计算到长期坚持战争，计算到反攻，计算到赶走敌人之后的建设。一面决不滥用浪费，一面努力发展生产。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1019—1020 页

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杜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
第 3 卷第 1048 页

必须十分节省地使用我们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力戒浪费。必须检查和纠正各地已经发生的贪污现象。

《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 《毛泽
东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1188 页

为了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和市镇上的工业生产，在消灭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必须注意尽一切努力最大限度地保存一切可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采取办法坚决地反对任何人对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破坏和浪费，反对大吃大喝，注意节约。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16页

根据过去的经验，军队的生产运动，必须严格禁止开商店从事商业行为。干部中如有企图以走私、囤积、投机希图暴利的思想，或发现此种行为，必须迅速予以纠正和制止。因为这些不仅违背正确的生产方针，搅乱经济秩序，而且势必发生贪污腐化，毁坏自己同志，为法令所不容许。

《军委关于一九五〇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9页

现在必须向全党提出警告：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中央人民政府不久将颁布惩治贪污的条例和惩治浪费的条例，各级领导机关必须仿照实行惩治反革命条例那样，大张旗鼓地发动一切工作人员和有关的群众进行学习，号召坦白和检举，并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督促和检查。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等的处理，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直至枪决。典型的贪污犯，必须动员群众进行公审，依法治罪。

《实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08页

必须毫不迟疑地开除一批丧失无产阶级立场的贪污蜕化分子出党，撤销一批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和那些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塌、毫不称职的分子的领导职务（其中有些也应当开除出党），对于开除这些人出党和撤销这一些人的职务，不应当有可惜的观点，这是毫不可惜的，如果没有开除和撤销他

们的决心则是错误的。过去我们党内对于这类坏人所存在的自由主义思想，必须坚决地加以克服。

《关于转发中南局组织部通知的批语和对中央批语稿的修改》（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一日、二月三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76—77页

反对浪费。在整风中，每个单位要以若干天工夫，来一次反浪费的鸣放整改。每个工厂、每个合作社、每个商店、每个机关、每个学校、每个部队都要进行一次认真的反浪费斗争。今后每年都要反一次浪费。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48页

贪污赃款一定要退，一年退不起，两年，三年，不行十年也一定要退。东西赔光了，要以自己的劳动来偿还，不这样贪污现象消灭不了。

《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28页

今年的中央文件上规定，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在劫者难逃。现在干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点“规律”，以为整“五风”大概整个年把时间，“风”就过去了，就没事了。我们可不能这样搞。我们要学韩文公在《祭鳄鱼文》中所说的办法，“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我就打它、杀它。我们也来个三年不行至五年，五年不行至七年，七年不行至十年，十年还不行，是终不肯改也，那我们就要撤职、查办。

《总结经验，教育干部》（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74—275页

（三）坚持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

1. 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是党和政府在长时期内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必须严厉地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把那些遮塞在苏维埃与民众之间的废物抛开去，这些废物就是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苏维埃人员应该从对于民众的动员与对于民众的说服去执行苏维埃工作，而不应该用强迫命令办法去执行苏维埃工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
《红色中华》二苏大特刊第3期

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40页

我党在“三反”中基本上解决了中央、大行政区、省市和专区四级许多工作人员中的贪污和浪费两个问题，也基本上解决了许多领导者和被领导的机关人员相脱离的这一部分官僚主义的问题；但对于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离开自己工作机关稍为远一点的下情，不了解县、区、乡三级干部中存在着许多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或者虽然对于这些坏人坏事有一些了解，但是熟视无睹，不引起义愤，不感觉问题

的严重，因而不采取积极办法去支持好人，惩治坏人，发扬好事，消灭坏事，这样一方面的官僚主义，则在许多地区、许多方面和许多部门，还是基本上没有解决。即如处理人民来信一事，据报山东省政府就积压了七万多件没有处理，省以下各级党政组织积压了多少人民来信，则我们还不知道，可以想像是不少的。这些人民来信大都是有问题要求我们给他们解决的，其中许多是控告干部无法无天的罪行而应当迅速处理的。

《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一九五三年一月五日），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53—254页

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就我们党政组织的领导任务和领导方法来说，这是交代工作任务与交代政策界限、交代工作作风没有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即没有和工作任务一道，同时将政策界限和工作作风反复地指示给中下级干部的问题。这是对各级干部特别是对县、区、乡三级干部没有审查，或者审查工作做得不好的问题。这是对县、区、乡三级尚未开展整党工作，尚未在整党中开展反命令主义和清除违法乱纪分子的斗争的问题。这是在我们专区以上的高级机关工作人员中至今还存在着不了解和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和不关心基层组织情况这样一种官僚主义，尚未向它开展斗争和加以肃清的问题。

《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一九五三年一月五日），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54页

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各级党委应有决心将为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和清除出党政组织，最严重者应处极刑，以平民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此外，山东文件中全部精神贯注在揭发坏人坏事，这样做是必要的，这样才可以唤起全党同志的注意。但在开展反坏人坏事的广泛斗争达到了一个适当阶段的时候，就应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我们相信，山东和各地这种典型的好人好事是一定不少的。

《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一九五三年一月五日），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55页

现在我们的党政机关中间，存在着一部分很不健康的现象，这就是严重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这些事情，这些坏人坏事。……我们中央机关几十个部门，包括党、政、军。党就是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政就是中央人民政府各委、部、会，计算起来，就有一百几十个单位。应该说其中有很多的部门，不是少数的部门，存在着官僚主义。他们脱离群众，脱离下面的实际情况，关在房子里写决议案，写指示。决议案、指示像雪片一样地飞出去，下面的情况究竟怎么样，能不能执行，不去管。就是坐在房子里头，不下去检查，只是注意所谓布置工作，却没有注意检查工作。

《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三年二月七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65页

我们一定要把领导上的老爷式作风、官僚主义作风、命令主义作风，完全消灭得干干净净。要达到这个目的，不是短时间内所能完成的，需要一个长期过程，需要每一年整风一次，彻底批判那些老爷式的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人们，把他们的缺点改变过来。

《对李富春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报告稿的修改》
(一九六〇年三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109页

官僚主义，是脱离群众，破坏苏维埃与群众的关系，对于苏维埃胜利和发展，有莫大危害，照例敷衍，强迫命令，是官僚主义的重要表现，这是苏维埃政府中绝对不允许存在的。这种官僚主义侵入到苏维埃政府：（一）由于中国半封建社会和国民党的官僚主义之传染。（二）由于农民散漫性的笼罩，缺乏无产阶级的组织性，纪律性。（三）缺乏艰苦奋斗的精神，只图一时便宜，使官僚主义侵入到苏维埃机关，日益生长起来。

同项英等发布的《中央人民委员会紧急决议》（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红色中华》1932年12月5日

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每一个同志喜欢的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即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24页

检查制度是争取苏维埃工作质量速度极其要紧的办法，只

有决定，没有检查，就是官僚主义的领导，它同强迫命令主义是一样有害的。

《乡苏怎样工作?》(一九三四年四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
第357页

全党同志都要善于团结人民群众，这里我想要请同志们学习近日《解放日报》报道的陈宗尧、左齐两位同志的榜样。陈宗尧同志是八路军第七一八团的团长，他率领全团走几百里路去背米，他不骑马，自己背米，马也驮米，全团指战员为他的精神所感动，人人精神百倍，无一个开小差。左齐同志是该团的政治委员，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手，开荒时他拿不了锄头，就在营里替战士们做饭，挑上山去给战士们吃，使战士们感动得不可名状。我们全体党的干部，都要学习这两位同志的精神，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克服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人人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我们就一定会胜利。

《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2—23页

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团结积极分子组成领导核心，不注重和不善于使这种领导核心同广大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因而使自己的领导变成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领导。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而欢喜主观主义地自作聪明地发表许多意见，因而使自己的意见变成不切实际的空论。许多同志，满足于工作任务的一般号召，不注重和不善于在作了一般号召之后，紧紧地接着从事于个别的具体的指导，因而使

自己的号召停止在嘴上、纸上或会议上，而变为官僚主义的领导。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99—900页

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末，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国民党就是只问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以任何一点什么东西的。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也是这样，那末，这种党员的作风就是国民党的作风，这种党员的脸上就堆上了一层官僚主义的灰尘，就得用一盆热水好好洗干净。我觉得，在无论哪一个抗日根据地的地方工作中，都存在有这种官僚主义的作风，都有一部分缺乏群众观点因而脱离群众的工作同志。我们必须坚决地克服这种作风，才能和群众亲密地结合起来。

《组织起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33—934页

无论在地方工作中，在军队工作中，无论是官僚主义倾向或军阀主义倾向，其毛病的性质都是一样，就是脱离群众。我们的同志，绝对大多数都是好同志。对于有了毛病的人，一经展开批评，揭发错误，也就可以改正。但是必须开展自我批评，正视错误倾向，认真实行改正。如果在地方工作中不批评官僚主义倾向，在军队工作中不批评军阀主义倾向，那就是愿意保

存国民党作风，愿意保存官僚主义灰尘和军阀主义灰尘在自己清洁的脸上，那就不是一个好党员。如果我们在地方工作中去掉官僚主义倾向，在军队工作中去掉军阀主义倾向，那就一切工作都会顺利地开展，生产运动当然也是这样。

《组织起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934—935页

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们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关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如果来信不多，本人或秘书能够处理，则不要另设专人。

《必须重视人民群众来信》（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64页

要在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反对官僚主义。现在不少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中存在着很严重的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发生和滋长，是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分不开的。即以中央一级机关来说，许多部门中的许多领导干部，还仅仅满足于坐在机关中写决议，发指示，只注意布置工作，而不注意深入下层去了解情况和检查工作，使自己的领导常常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以致在工作中发生了不少的严重问题。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国家建设，就必须克服官僚主义，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该经常地深入下层，检查工作。如果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克服了官僚主义，下面那些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现象，也一定会

得到克服的。这些毛病都去掉了，我们的国家计划建设就一定会成功，人民民主制度就一定会发展，帝国主义的阴谋就一定会失败，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完全的胜利！

《在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三年二月七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46页

中央人民政府和军委各部门必须尽速召开会议，发动批评和自我批评，深刻揭发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并规定改正的具体办法。中央认为在很多部门中极端缺乏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的状况是完全不能容忍的，这是官僚主义存在和发展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研究加强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的办法。

《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中研究加强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69页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西北局检查组关于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报告，写得很好。这个报告集中地反映了我们党政组织在农村工作中一些严重地脱离农民群众、损害农民及其积极分子的利益的问题，即所谓“五多”问题。“五多”，就是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这些问题，很久就存在了，中央曾对其中有些问题有过指示，要求各级党委予以重视和解决，但是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其原因，是没有将整个问题系统地提出来，尤其重要的是没有在中央、大区、省（市）、专区和县这五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展开反对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斗争。因为区、乡的“五多”，基本上不是从区、乡产生的，而是从上面产生的，是因为在县以上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存在着严重的分散主义和官

僚主义所引起的，有些则是过去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时期的产物，未加改变，遗留至今的。因此，必须在一九五三年内，在执行中央一九五三年一月五日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中，着重地克服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并将那些过去需要而现在已不需要的制度和办法加以改变，方能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区乡工作中的“五多”问题》（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71—272页

和被领导的单位密切联系，抓紧检查，全盘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改正错误，表扬成绩，使工作任务能按计划完成，才算有了合乎情况发展的领导。目前，我们的经济工作中，无领导的现象太多了，必须在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学得做领导工作的能力和方法。领导者无领导，这是官僚主义者，不是领导者。

《关于在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学习做领导工作的批语》（一九五三年四月十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190页

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页

我请同志们注意，请中央各部门的同志们注意，要教育自己的工作人。听说，现在到中央部门办事见不到人，中央部门处理问题拖延不决，这两点相当普遍。地方要解决问题，到中央部门就是见不到人，连处长都不容易见到，有些问题拖了

几年不得解决。应当检查这个问题，看用一种什么方式，又能见到人，又能比较快地解决问题。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53页

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闹事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一九五六年，还有少数合作社社员闹社的事件，主要原因也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于群众缺乏教育。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6页

对那些摧残人民积极性的官僚主义就是要整一下。

《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七月二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79页

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中央现在所要着重地告诉你们

的，是关于官僚主义严重存在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山东省历城县的材料。历城县委在今年三月十四日报告山东省委说，他们那里有积极、消极两方面。积极方面是形势大好，这是主要的。消极方面，他们说，突出的表现是“五多五少”。就是说，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他们这个文件，现在发给你们看看。……这种情况是不能继续下去的，物极必反，我们一定要创设条件，使这种官僚主义走向它的反面。

《反对官僚主义，克服“五多五少”》（一九六〇年三月三十日），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66—167页

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我们要同这种现象作严厉的斗争。另一种是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表面上不怠工，好像在那里努力干。实际上，命令主义地发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暂时在形式上发展了，也是不能巩固的。结果是失去信用，妨碍了合作社的发展。命令主义地推销公债，不管群众了解不了解，买不买得这样多，只是蛮横地要照自己的数目字去派，结果是群众不喜欢，公债不能好好地推销。我们一定不能要命令主义，我们要的是努力宣传，说服群众，按照具体的环境、具体地表现出来的群众情绪，去发展合作社，去推销公债，去做一切经济动员的工作。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24—125页

要反对对于争取大多数群众的忽视与命令主义的工作方

式，只有耐心的艰苦的去做发动群众争取群众的工作，才能取得大多数群众的拥护，达到消灭封建残余的目的。这样的群众工作，是执行阶级路线的惟一保障。

《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一九三三年），《斗争》第24期

党与苏维埃工作人员那个时候，每件工作，都不要忘记群众的大多数。我们要面向群众，是要面向群众的大多数，我们的工作要深入群众，是要深入一切大的小的村庄、一切大的小的市镇里的群众。要严厉反对少数人干的关门主义命令主义错误办法。

《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一九三三年），《斗争》第24期

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95页

命令主义，表面上是在积极发动群众，实际上是用少数人包办及强迫群众服从的办法，代替群众自觉的与有组织的斗争，即用非群众路线代替群众路线……

《纠正群众工作中错误的几个问题》（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03页

中央发了几个文件，反对干涉过多，这有好处。什么是干涉过多呢？不顾需要和可能、不切实际、主观主义的计划，或

者计划倒合实际，但用命令主义的方法去做，那就是干涉过多。主观主义、命令主义，一万年也是要不得的。不仅是对于分散的小农经济要不得，就是对于合作社也是要不得的。但是，不能把需要做、可能做的事，做法又不是命令主义的，也叫做干涉过多。检查工作，应当用这个标准。凡是主观主义的，不合实际的，都是错误的。凡是用命令主义去办事，都是错误的。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03页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中国共产党忠实地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原则。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1页

帝国主义都不怕，为什么反而怕老百姓呢？怕老百姓，认为人民群众不讲道理，只能压服，不能说服，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九五七年七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47页

强迫命令，不好。一定的命令还是需要的。如果什么事情都命令，就不好了。有些事情也并非强迫命令，例如党委的决议，一定要照办。总要有集中。集中的过程要有民主。要提倡民主作风，反对强迫命令。

《记者头脑要冷静》（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43—444页

2. 领导干部要打掉官风，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

当干部的首要放下架子，打破个人英雄主义，忘记自己是什么“长”，忘记自己是中央委员，而到群众中去学习。

《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98页

我们的同志应当注意，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说资格老，多少年革命，这个资格也是可靠的，但同时我们不要靠它。你资格老，几十年，那是真的。可是，你有一天办了一些糊涂事，讲了一篇混账话，人民还是不谅解你。尽管你过去做过多少好事，职位有多么高，你今天的事情办得不好，解决得不对，对人民有损害，这一点人民就不能原谅。因此，我们的同志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靠正确，不靠资格。靠资格吃不了饭，索性不靠它，等于还是什么官都没有做，就是不摆老爷架子，不摆官僚架子，把架子收起来，跟人民见面，跟下级见面。这一条，我们的干部要注意，特别是老干部要注意。一般来说，新干部没有这种包袱，比较自由。老干部对新干部要处在平等的地位。有很多东西，老干部不如新干部，要向他们学习。

《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一九五七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7页

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学习鲁迅。鲁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读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读者共鸣的。

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4—355页

讲一讲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末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再说一遍，要是大多数干部扫掉了官气，剩下的人就是有官气，也容易扫掉了，因为他们孤立了。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

《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78页

我们跟国民党相反，他们是以一个贵族的姿态、老爷派头在人民中出现，我们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出现。

《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八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378页

（四）加强对党和党员、干部的监督

1. 共产党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为了迅速实现以上的任务，必须彻底除掉苏维埃工作人员中的官僚主义，全体选民同志都应该起来注意，监督苏维埃人员不使有官僚主义分子存在。必须使今年的选举运动得到圆满的成功，要使大批工农积极分子经过选举到苏维埃来工作，而把旧有人员中的官僚主义分子洗刷出去，这样才保证了苏维埃各个战斗任务的实现。

同项英等发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两周年纪念对全体选民的工作报告书》（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四日），《红色中华》1933年10月27日

为了巩固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与批评。每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缺点之权。当着国民党贪官污吏布满全国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的时候，苏维埃制度之下则绝对不容许此种现象。苏维埃工作人员中如果发现了贪污腐化消极怠工以及官僚主义的分子，民众可以立即揭发这些人员的错误，而苏维埃则立即惩办他们决不姑息。这种充分的民主精神也只有苏维埃制度下才能存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红色中华》二苏大特刊第3期

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

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9页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同黄炎培的谈话(一九四五年七月),《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610页

对于某些犯有重大错误的干部和党员，以及工农群众中的某些坏分子，必须进行批评和斗争。在批评和斗争的时候，应当说服群众，采取正确的方法和方式，避免粗暴行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应使这些干部、党员和坏分子提出保证，不对群众采取报复。应当宣布，群众不但有权对他们放手批评，而且有权在必要时将他们撤职，或建议撤职，或建议开除党籍，直至将其中最坏的分子送交人民法庭审处。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72页

首先是阶级的监督，群众的监督，人民团体的监督。

《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六年八月、九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136页

2. 党内任何人都要接受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监督

共产党员在各级政府中应该成为坚决勇敢、刻苦耐劳、急公好义、礼义廉耻的模范，并受中央与地方党的严厉监督。

《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一九三七年十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54页

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 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 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 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8页

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 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 全党的党员和干部, 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 才能取得胜利。所谓发挥积极性, 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 负责精神, 工作的活跃, 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 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没有这些, 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 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8—529页

无论任何人, 犯了错误都要检讨, 都要受党的监督, 受各级党委的领导, 这是完成党的任务的主要条件。

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二日)

有人建议一年或者两年开一次这样的会议, 使同志之间互相监督, 我认为可以考虑。谁监督我们这些人呢? 互相监督是好办法, 可以促进党和国家的事业迅速进步。是迅速进步, 不是慢慢地进步。……

……

所以，定期召开会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促使党和国家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05—406页

3. 共产党要接受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的监督

共产党是真心实意想把国事办好的。但是我们的毛病还很多。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10页

为了认真地彻底地纠正各种不良现象，改造党的作风，必须在党内展开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即关门主义）的斗争，在一切地方与一切部门中展开自我批评，并将这种自我批评公开于党外人员之前，毫不姑息，毫不掩饰，以收彻底揭发与彻底纠正之效。

《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一九四二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95页

党外人员对于违犯政府法令或党的政策的党员及干部，除得向法庭或行政机关依法控诉外，并有权向各级党委控告，直到党的中央。

《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一九四二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97页

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4页

各党派互相监督的事实，也早已存在，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见，作批评。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5页

（五）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

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

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

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确的团结方针，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胜利。对于搞阴谋诡计

的人要注意，……

……

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

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一开会就自己讲几个钟头，不让人家讲话。不要开会时赞成，会后又翻案，又说不赞成。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

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前进的。

《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六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85—87页

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六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87页

十、同外国共产党的关系

（一）维护和加强同各国共产党的团结

在国际上，我们要团结全世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首先是团结苏联，团结兄弟党、兄弟国家和人民，还要团结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借重一切有用的力量。这次有五十几个国家的共产党的代表来参加我们的大会，这是很好的事。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8页

我们的原则，就是不管你什么人，外国的党，外国的非党人士，只要是对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有一点用处的，我们就应该团结。首先是要团结几十个共产党，团结苏联。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91页

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理想把我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这样说过：“过去的经验证明：忽视在各国工人间应该存在的兄弟团结，忽视这个应该鼓励他们在解放斗争中坚定地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就会使他们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九十几年前马克思的这个指示，对于我们永远不会过时。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19页

中国人民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也是世界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中国的事业是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部分。我们要团结成一体，全世界人民要大团结。你们的事业也是我们共同事业的一部分，你们每有一个胜利，我们就高兴。我们很高兴看到拉丁美洲的斗争在不断发展。

《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一九五九年三月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6页

我们永远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我们始终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定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巩固地团结起来。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38页

中国共产党人从来珍视中苏团结，珍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珍视一切革命政党和革命力量的团结，珍视全世界革命人民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团结。我们一贯竭尽自己的努力，维护和加强这种伟大的团结，以利于共同对敌。

《给印尼总统苏加诺的复信和对复信的批语》（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421页

（二）坚持平等协商，反对搞父子关系

对斯大林的批评，我们人民中有些人还不满意。但是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这也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现在我们反而

为它斗争了。是父子党，还是兄弟党？过去是父子党，现在有些兄弟党的味道了，但也还有些父子党的残余。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残余不是一天就能搞清的。去掉盖子以后，使人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现在有点反封建主义的味道。由父子党过渡到兄弟党，反对了家长制度。那时的思想控制很严，胜过封建统治。一句批评的话都不能听，而过去有些开明君主是能听批评的。

《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26—127页

我提议同志之间有隔阂要开谈判。有些人似乎以为，一进了共产党都是圣人，没有分歧，没有误会，不能分析，就是说铁板一块，整齐划一，就不需要讲谈判了。好像一进了共产党，就要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才行。……我们可不可以在小房间里头两个人或者几个人谈谈呢？可不可以从团结出发，用帮助的精神开谈判呢？这当然不是同帝国主义开谈判（对于帝国主义，我们也是要同他们开谈判的），这是共产主义内部的谈判。举一个例子。我们这回十二国是不是开谈判？六十几个党是不是开谈判？实际上是在开谈判。也就是说，在不损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下，接受人家一些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自己一些可以放弃的意见。

《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31—332页

去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当时我说过，什么兄弟党，只不过是口头上说说，实际上是父子党，是猫鼠党。这一点，我在小范围内同赫鲁晓夫等同志谈过。他们

承认。这种父子关系，不是欧洲式的，是亚洲式的。

《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86页

只许老爷开腔，不许小的吭气，是不行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不行的。从古以来也没有这样一条被公众承认的不公平的法律。何况，我们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只能采取摆事实说道理的态度，而断断不能采取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全世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一定要团结起来，但是只能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只能在摆事实说道理的基础上，只能在平等商量有来有往的基础上，只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够团结起来。如果只许奴隶主们向奴隶们挥舞指挥棒，口中念念有词，说是“团结，团结”，那其实说的是“分裂，分裂”。天下的奴隶们是不能接受这种分裂主义的。我们要的是团结，坚决不允许一小撮人闹分裂。

《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六三年二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248—249页

这些年来，对于中苏意见分歧，我们采取的态度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通过平等协商消除分歧。今后，我们仍将坚定不移地采取这种态度。

《给印尼总统苏加诺的复信和对复信的批语》（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422页

现在没有第三国际那样的国际组织，没有第三国际组织那样的有权召集国际会议的常设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该也不允许由任何一个党或几个党，违反兄弟党协商一致的原则，片面地决定召开全世界一切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这样

做是非法的，完全错误的，会引起严重的后果的。

《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六四年四月三十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70页

为什么一个党的决定，硬要一切党都服从呢？为什么不服从就算犯了大罪呢？请问这是什么逻辑，什么兄弟党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呢？

《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五日、二十日、二十五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106页

（三）革命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处理自己的事情

（参见第一编“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第300—301页；第四编“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第919—920页，第949—952页）

副 编

对若干历史事件、
人物及文献著作的评述

目 录

一、历史事件	(2183)
鸦片战争	(2183)
太平天国运动	(2184)
义和团运动	(2185)
辛亥革命	(2185)
五四运动	(2189)
国民党一大及大会宣言	(2196)
五卅运动	(2199)
大革命失败	(2199)
南昌起义	(2202)
八七会议	(2202)
中共六大	(2203)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2205)
九一八事变	(2206)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	(2206)
五次反“围剿”	(2207)
长征	(2209)
遵义会议	(2211)
一二九运动	(2214)
西安事变	(2218)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2221)
卢沟桥事变	(2221)

-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2221)
- 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 (2222)
-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2222)
- 国民党三次反共高潮 (2223)
- 中共七大 (2226)
- 重庆谈判 (2229)
- 北平和平解放 (2230)
- 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2231)
- 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 (2232)
- 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2234)
- 高岗、饶漱石事件 (2234)
- 炮击金门 (2236)
- 西藏平叛 (2238)
- 巴黎公社 (2242)
- 第一次世界大战 (2244)
- 十月革命 (2245)
- 第二次世界大战 (2250)
-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2251)
-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战场的开辟 (2254)
- 共产国际及其解散 (2255)
- 苏共二十大和批判斯大林问题 (2259)
- 苏伊士运河事件 (2262)
- 匈牙利事件 (2264)
- 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 (2265)
- 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及
会议宣言 (2265)

古巴革命	(2267)
反对新的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	(2269)
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	(2270)
二、人物	(2274)
纣王	(2274)
孔子	(2275)
墨子	(2279)
屈原	(2280)
孟轲、韩非、叔孙通	(2281)
秦始皇	(2281)
刘邦	(2282)
项羽	(2284)
曹操	(2284)
李世民（唐太宗）	(2285)
李隆基（唐明皇）	(2285)
王勃	(2285)
韩愈	(2286)
唐玄奘（唐僧）	(2287)
岳飞、文天祥	(2288)
李自成	(2288)
徐霞客	(2288)
林则徐	(2288)
洪秀全	(2289)
曾国藩	(2289)
梁启超	(2290)
康有为	(2290)
严复	(2291)

孙中山	(2291)
袁世凯	(2301)
章炳麟 (章太炎)	(2301)
宋庆龄	(2301)
鲁迅	(2302)
何香凝	(2310)
蒋介石	(2311)
汪精卫	(2317)
陈独秀	(2319)
李大钊	(2321)
萧楚女	(2322)
瞿秋白	(2322)
李立三	(2322)
王明	(2324)
张国焘	(2330)
王稼祥	(2332)
陈毅	(2334)
徐特立	(2335)
吴玉章	(2336)
刘志丹	(2336)
张学良	(2337)
冯玉祥	(2337)
邓宝珊	(2338)
傅作义	(2338)
邹韬奋	(2339)
闻一多	(2339)
李公朴	(2340)

章士钊	(2340)
蔡元培	(2341)
柳亚子	(2341)
黄炎培	(2342)
朱自清	(2342)
徐志摩	(2343)
胡适	(2343)
郭沫若	(2344)
黎锦熙、杨昌济	(2345)
陶行知	(2345)
萧军	(2345)
赫拉克利特	(2346)
苏格拉底	(2347)
德谟克里特	(2348)
柏拉图	(2348)
亚里士多德	(2349)
鸠摩罗什	(2349)
释迦牟尼	(2350)
克伦威尔	(2350)
康德	(2351)
黑格尔	(2351)
海克尔	(2351)
华盛顿	(2352)
马克思、恩格斯	(2352)
列宁	(2355)
斯大林	(2357)

普列汉诺夫	(2368)
季米特洛夫	(2369)
德波林	(2369)
高尔基	(2370)
伏罗希洛夫	(2371)
赫鲁晓夫	(2371)
杜勒斯	(2372)
尼赫鲁	(2373)
戴高乐	(2373)
纳赛尔	(2374)
尼克松	(2374)
蒙哥马利	(2374)
斯诺	(2375)
斯特朗	(2375)
杜波依斯	(2375)
柯棣华	(2376)
白求恩	(2376)
马丁·路德·金	(2377)
三、文献、著作	(2378)
望厦条约	(2378)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2378)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2379)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2379)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2381)
共同纲领	(2382)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2382)
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2385)

- 第一个五年计划 (2386)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2386)
- 屈原《天问》 (2389)
- 李斯《谏逐客书》 (2389)
- 司马迁《史记》 (2389)
- 贾谊《治安策》 (2389)
- 枚乘《七发》 (2390)
- 陈寿《三国志·张鲁传》 (2391)
- 裴松之注《三国志》 (2393)
- 范晔《后汉书》 (2393)
- 酈道元《水经注》 (2393)
- 慧能《六祖坛经》 (2394)
- 施耐庵《水浒传》 (2394)
- 吴承恩《西游记》 (2395)
- 笑笑生《金瓶梅》 (2395)
- 冯梦龙《东周列国志》 (2396)
- 蒲松龄《聊斋志异》 (2396)
- 曹雪芹《红楼梦》及《红楼梦》研究 (2397)
- 李宝嘉《官场现形记》 (2401)
- 邹容《革命军》 (2401)
- 鲁迅《阿Q正传》 (2401)
- 赫胥黎《天演论》 (2402)
-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2402)
- 马克思《资本论》 (2402)
- 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 (2403)

-
-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 (2404)
-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 (2405)
-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2405)
- 罗森塔尔、尤金主编《简明哲学辞典》…………… (2408)
-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 (2408)

一、历史事件

鸦片战争

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6页

资本主义外国侵略中国，则差不多有了一百年。一百年来，中国的斗争，从鸦片战争反对英国侵略起，后来有太平天国的战争，有甲午战争，有戊戌维新，有义和团运动，有辛亥革命，有五四运动，有北伐战争，有红军战争，这些虽然情形各不相同，但都是为了反抗外敌，或改革现状的。但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才有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青年运动的方向》（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63—564页

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32页

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斗争，有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光绪二十年的甲午战争，后头又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以后接着是辛亥革命。革命是反对两个东西：一个叫做外国的压迫，一个叫做封建制度的压迫。中国人民对这两个东西总是不满意，总是要起来反抗。起来一次，被打下去，再起来一次，又被打下去，这样的历史差不多有八十年。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8页

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王洪秀全号召广西一班失业农民起来革命，大有社会革命的意义，孙总理也很佩服他。大家只知道打倒他的是清朝政府，而不知真正打倒他的主力军，却是地主阶级。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主阶级的领袖。曾国藩是练团练出身，团练即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武力，他们见洪秀全领导一班农民革命，于他们不利，遂出死力来打倒他。故太平天国之事，不是满汉的战争，实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

《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5页

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9页

我们今天的公祭可以一直上溯到一八四一年平英团那些英

雄们，也祭奠他们。平英团的反英斗争，太平天国运动，都是英勇的斗争。太平天国有几十万军队、成百万的农民，打了十三年，最后南京城被清兵攻破的时候，一个也不投降，统统放起火烧死了，太平天国就这样结束的。他们失败了，但他们是不屈服的失败，什么人要想屈服他们，那是不行的。

《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演说》（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35—436页

义和团运动

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9页

辛亥革命

辛亥年的革命，虽然其本质应该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然因当时多数党员还没有看清此点，黄兴、章炳麟、宋教仁等一班右倾的领袖们只知道国内清朝贵族阶级是敌人，革命的口号变成简单的“排满”，党的组织和内容是极其简单，作战的队伍是极其孤弱。这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有组织的工农群众；当时国内还没有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国际的局面是几个强国霸占了全世界，只有压迫阶级反革命的联合，没有被压迫阶级革命的联合，只有资产阶级的国家，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因此中国当时的革命没有国际的援助。

《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九二五年冬），《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5页

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6页

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远的如辛亥革命，因为那时还没有无产阶级的自觉的参加，因为那时还没有共产党，所以流产了。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45页

很清楚的，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现时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

这个第一步的准备阶段，还是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即中国社会开始由封建社会改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就开始了的。中经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到今天的抗日战争，这样许多个别的阶段，费去了整整一百年工夫，从某一点上说来，都是实行这第一步，都是中国人民在不同的时间中和不同的程度上实行这第一步，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为了完成第一个革命而斗争。而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这个革命，按其社会性质说来，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这个

革命，现在还未完成，还须付与很大的气力，这是因为这个革命的敌人，直到现在，还是非常强大的缘故。孙中山先生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就是指的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66—667页

辛亥革命发生在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觉醒，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全世界无产阶级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还没有实际革命行动，只是准备革命的时候；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还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后备军的时候。……辛亥革命只是在政治上推翻了清朝皇帝，没有彻底。我们写历史时常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其实并不能说完全失败，辛亥革命有它的胜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但后来失败了，没有巩固它的胜利，封建势力代替了革命，袁世凯代替了孙中山。那时无产阶级没有以一个觉悟的阶级走上政治舞台。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2—403页

辛亥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11页

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对英国鸦片侵略的战争，反对英法联军侵略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太平天国战争，

反对法国侵略的战争，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都失败了，于是再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辛亥革命，这就是到辛亥为止的近代中国史。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13页

孙中山先生是个好人，但他领导的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了？其原因：一、没有分土地；二、不晓得镇压反革命；三、反帝不尖锐。

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一九五二年八月四日）

有相当一部分朋友对我们讲“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觉得不妥，在感情上有些过不去。但从社会发展历史上说，辛亥革命确实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

《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44页

孙中山及其一派人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一次。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还有过改良派。对改良派也应该估计有进步的一面。戊戌变法在当时受压迫，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有进步性，它受到顽固派的仇恨。孙中山比改良派又更进一步，他公开号召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和临时革命政府，并制定了一个《临时约法》。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说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45—346页

辛亥革命没有成功，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孙中山的领导集团犯了错误，有缺点。关于这一点，孙中山有过自我批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上曾经说，当时向袁世凯妥协是不对的。

《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
第6卷第346页

我国辛亥革命的时候，无产阶级的数量还很小，还没有自己的政党。那次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跟着资产阶级走。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没有其他阶级、其他政党站在他们的前面，来同他们争夺革命的领导权。那个时候，他们最有生气。他们所办的《民报》、《苏报》、《大江报》，表现得很有朝气，很活跃。辛亥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的政党走向堕落。正如孙中山说的：“革命功成，革命党消”。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二）》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党的文献》1992年
第4期

五四运动

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那个时期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而在“五四”时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有数十万的学生。

这是五四运动比较辛亥革命进了一步的地方。

《五四运动》(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58页

五四运动所反对的是卖国政府,是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政府,是压迫人民的政府。这样的政府要不要反对呢?假使不要反对的话,那末,五四运动就是错的。这是很明白的,这样的政府一定要反对,卖国政府应该打倒。……五四运动正是做了反对卖国政府的工作,所以它是革命的运动。全中国的青年,应该这样去认识五四运动。

《青年运动的方向》(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61—562页

在二十年前的今天,由学生们参加的历史上叫做五四运动的大事件,在中国发生了,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运动。

《青年运动的方向》(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65页

五四运动之成为新文化运动是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所决定,他反过来又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原是中国资本主义本身的要求。

《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一书的批注》(一九三九年五月以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77页

五四运动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如果没有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是不可想像的。有些人以为学生运动没有力量,但是事实怎样呢?广大学生群众的五四运动,推动“六三”全国性的罢工、罢市、罢课的反帝和反卖国政府的斗争,发展成为全民族

的运动。五四运动以后，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五卅运动，发动了北伐战争，造成了第一次大革命。那末，很明显，没有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是不可能的。五四运动的的确确给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思想，准备了干部。

《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51—252页

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所以具有这种性质，是在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

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
第699—700页

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总之，那时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条式的。这就是老八股、老教条。揭穿这种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给人民看，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绩。五四运动还有和这相联系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大功绩；这个反对老八股、老教条的斗争，也是它的大功绩之一。但到后来就产生了洋八股、洋教条。我们党内的一些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则发展这种洋八股、洋教条，成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东西。这些就都是新八股、新教条。这种新八股、新教条，在我们许多同志的头脑中弄得根深蒂固，使我们今天要进行改造工作还要费很大的气力。这样看来，“五四”时期的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反对封建

主义的老八股、老教条的运动，后来被一些人发展到了它的反方面，产生了新八股、新教条。它们不是生动活泼的东西，而是死硬的东西了；不是前进的东西，而是后退的东西了；不是革命的东西，而是阻碍革命的东西了。这就是说，洋八股或党八股，是五四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动。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但在共产党内也不是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发生偏向，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这样看来，党八股这种东西，一方面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因素的反动，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或发展，并不是偶然的東西。我们懂得这一点是有好处的。如果“五四”时期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是革命的和必需的，那末，今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也是革命的和必需的。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这个工作，五四运动时期还不过是一个开端，要使全国人民完全脱离老八股和老教条主

义的统治，还须费很大的气力，还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

《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31—832页

五四运动是发生在欧洲大战、十月革命之后，这时的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已不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后备军，而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后备军了。五四运动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响应，所以比辛亥革命更深刻。……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发生的。十月革命对世界的觉醒，对中国的觉醒，影响是很大的。五四运动时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有了觉悟，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一年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是广泛的统一战线，内部有左翼、右翼和中间势力。在“五四”以后一个月发生了六三运动，全国罢工、罢课、罢市。那时的罢工还是无产阶级自发的运动。我们应该把五四运动中工人的态度研究一下。那时罢工虽然没有共产党领导，但其中总有领头的人。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国民党没有在五四运动中起领导作用，它是站在旁边的。

五四运动准备了大革命，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是产生在“五四”之后，五四运动又是产生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

……

五四运动是有群众，还是没有群众？我认为五四运动是有广大的群众性的，比起大革命来自自然是差些。那时资产阶级、小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统一战线，还没有农民参加，只有广大的工人。到大革命，就有农民参加了。土地革命时，参加的农民就广泛多了，但是统一战线不够广。到抗战，农民参加得更广泛了，比大革命时广，比土地革命时也广，同时有了比过去更广大的统一战线。

五四运动是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带着自发的性质。但是这种自发性和以前的不同，它多少有些觉醒，许多人赞成十月革命，赞成列宁的革命。孙中山曾说，列宁是革命的圣人，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他是作为同盟者来赞成共产主义的。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当时的人们有一个很大的觉醒。五四运动发展到共产党的成立，工人运动向前发展了，这才有后来的国共合作。所以不说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于共产党的成立和以后的历史，也就不能说得清楚。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3—404页

中国从五四运动起，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五四运动是群众发动的，是群众的队伍在街上公开反对自己的敌人。开始只是觉悟的、先进的学生参加，发展到“六三”时，在上海已经不只是学生，而且有广大的工人、商界参加，后来，汉口、长沙，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都卷进这个潮流里去了。五四运动有中国最觉悟的分子参加，当时的觉悟分子有陈独秀、李大钊。在五四运动中有左翼、右翼，陈独秀、李大钊是代表左翼的。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共产党，但已经有少数人有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9—290页

国民党一大及大会宣言

中华革命党改成中国国民党时，又加入一批中产阶级的非革命派，此时而且有一部分代表买办阶级的分子混了进来，他们站在党的支配地位，孙先生及少数革命派领袖拿了仍不能革命。乃于去年一月毅然召集第一次党的全国大会，明白决定拥护工农阶级的利益，从工农阶级中扩张国民党的组织，并且容纳共产派分子入党。

《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九二五年冬），《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7页

我们共产党人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承认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相同。但是这种三民主义是什么三民主义呢？这种三民主义不是任何别的三民主义，乃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我愿顽固派先生们，于其“限共”、“溶共”、“反共”等工作洋洋得意之余，也去翻阅一下这个宣言。原来孙中山先生在这个宣言中说道：“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其真释具如此。”就可知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是真三民主义，其他都是伪三民主义。只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对于三民主义的解释才是“真释”，其他一切都是伪释。这大概不是共产党“造谣”吧，这篇宣言的通过，我和很多的国民党员都是亲眼看见的。

这篇宣言，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历史时代。在这以前，三民主义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旧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

命的三民主义，是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89页

国民党不懂得组织国民党，致力于国民革命三十九年，就是不开代表大会。我们加入国民党以后，一九二四年才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由我们帮它办好，其中有一个鲍罗廷，当顾问，是苏联共产党员，有一个瞿秋白，是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员。孙中山这个人有个好处，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找我们。鲍罗廷说的话他都听。那时候叫做“以俄为师”，因为他革命三十九年老是失败。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3页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订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黄埔军校，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因而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扫荡了广东的反动势力，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举行了胜利的北伐战争，占领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打败了北洋军阀政府，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斗争。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35页

孙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

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这是孙先生的伟大的政治指示。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他一切民主分子，必须尊重这个指示而坚决地实行之，并同一切违背和反对这个指示的任何人们和任何集团作坚决的斗争，借以保护和发扬这个完全正确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原则。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1056—1057页

孙中山先生在一九二四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所解释的三民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我党在现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里的若干基本原则，是互相一致的。应当指出，孙先生的这种三民主义，和我党在现阶段上的纲领，只是在若干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东西，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东西。我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比之孙先生的，当然要完备得多；特别是孙先生死后这二十年中中国革命的发展，使我党新民主主义的理论、纲领及其实践，有了一个极大的发展，今后还将有更大的发展。但是，孙先生的这种三民主义，按其基本性质说来，是一个和在此以前的旧三民主义相区别的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当然这是“中国今日之必需”，当然“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为本党的最低纲领而奋斗和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而奋斗，在基本上（不是在一切方面）是一件事情，并不是两件事情。因此，不但在过去和现在已经证明，而且在将来还要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是革命三民主义的最忠诚最彻底的实现者。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1061页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亲自领导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著名的宣言。这个宣言上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除了谁领导谁这一个问题以外，当作一般的政治纲领来说，这里所说的民权主义，是和我们所说的人民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7—1478页

五卅运动

五卅运动 空前的反帝。在此运动中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内容：如收回租界，收回海关，收回司法权，撤退驻华海陆军等。民众因此认识什么是不平等条约。此运动因奉系军阀高压失败。但有一成绩：即上海、香港的工人起来了。

《两年来宣传工作的回顾》（一九二六年一月八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8—9页

大革命失败

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不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工农运动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而只依仗其暂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其结果是帝国主义命令它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伸出千百只手来，首先把蒋介石拉去，然后又把汪精卫拉去，使革命陷于失败。那时的革命统一战线没有中心支柱，没有坚强的革命的武装队伍，四面八

方都造起反来，共产党只得孤军作战，无力抵制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的各个击破的策略。那时虽然有贺龙、叶挺一支军队，但还不是政治上坚强的军队，党又不善于领导它，终归失败了。这是缺乏革命中心力量招致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6—157页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基本地说，是在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合作之下进行的。然而当着革命和战争的紧急关头，首先由于大资产阶级的叛变，同时也由于革命队伍中机会主义者的自动地放弃革命领导权，这次革命战争就失败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84页

这里要了解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经验。

那时，精神上没有准备，是失败的主要原因；现在，必须要有准备。

那时，不能再是民族战线，但我们也有太绝对的地方；现在，必须坚持长期的民族战线。

那时，是革命的整个失败，党的路线是退却然后进攻；现在，没有路线上的退却问题，现在是继续进攻中发生局部的暂时的战术上的保守或隐蔽随即准备进攻的问题（如果投降变为事实的话）。

那时，因为反动时期到来，党又没有准备，没有经验，以致队伍混乱，步骤错误（如盲动主义）；现在，则在沦陷区，并

准备在投降者占领地，应该作有秩序的退守（有的暂时的，有的长久的）或反攻，而在其他区域则继续进攻方针。

那时，新党员大批脱党或叛变；现在则在某种情况下也有可能发生这类事情，故须先有准备。历史经验——革命转变关头（哪怕是暂时的局部的转变）垃圾的跌落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坏事；但须注意好好带领新党员，尤其是大批青年学生，他们将来是有用的。

那时，国内国际的情况是黑暗的，现在基本上是光明的。

那时，中央是被机会主义统治着，改造后的中央亦无经验；现在没有这种情形。

那时，尚没有造成大批干部骨干；现在已经造成了。

《反投降提纲》（一九三九年六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18页

过去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这也就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

《〈共产党人〉发刊词》（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08页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这时有了无产阶级的自觉的参加和领导，因为这时已经有了共产党，所以能在一个时期内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又因为大资产阶级后来背叛了它和无产阶级的联盟，背叛了共同的革命纲领，同时也由于那时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还没有丰富的革命经验，结果又遭到了失败。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45页

大革命为什么失败？除了客观原因之外，还有主观原因，就是蒋介石不让我们放手，汪精卫也不让我们放手，我们自己也就不敢放手。那时我们应该大大放手，但我们却不敢放手，所以失败了。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77页

北伐战争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蒋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国主义，成了压迫和剥削中国人的反革命首领。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11页

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及当时全国各地的许多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的。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反动派宣布了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即决定率领人民反抗蒋介石反革命。八一南昌起义就是当时一连串革命起义的第一个起义。

《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14页

八七会议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名义上反对政治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实际上重新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两个会议的内容和历史作用

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两个会议都没有着重地涉及战争和战略的问题，这是当时党的工作重心还没有放在战争上面的反映。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48页

中共六大

六次大会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十分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党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武装暴动。

《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54页

我们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规定的十大政纲，不但代表了工农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了民族的利益。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8页

当着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春天，中国游击战争发生不久，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区域——井冈山的同志们中有些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个疑问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指出来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題，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把这个问题又作了一次答复。中国革命运动，从此就有了正确的理论基础。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88页

我认为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指出了革命的性质，提出了十大政纲，指出形势是两个高潮之间，反对速胜论，指出要争取群众。六大的基本精神是有群众观点的，不要群众的是李立三。在蒋冯阎战争爆发后，李立三便认为革命形势到了高潮，没有准备好群众条件也要暴动。

《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95页

应该指出，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是基本上正确的，因为它确定了现时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确定了当时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批判了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发布了十大纲领等，这些都是正确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亦有缺点，例如没有指出中国革命的极大的长期性和农村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极大的重要性，以及还有其他若干缺点或错误。但无论如何，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我党历史上是起了进步作用的。

《学习和时局》（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
3卷第939页

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未解决根据地问题，而提出准备暴动，夺取大城市。这在六大到现在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将在七大以后去实行，七大以后我们必须实行这条方针。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工作报告》（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41页

六大决议案有一些错误，但根本上是对的。它根据对于当

时形势的估计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十大纲领，今天我们所做的基本上仍未超过这个纲领。第一条我们正在做，第二条也在做，但策略上可以考虑，还有第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条，今天我们基本上还是这十条。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一九四八年九月），《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39页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名义上反对政治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实际上重新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两个会议的内容和历史作用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两个会议都没有着重地涉及战争和战略的问题，这是当时党的工作重心还没有放在战争上面的反映。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48页

过去有同志认为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非法的。现在看到洛甫在他的反省笔记中说到，对临时中央共产国际来电批准过，五中全会也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根据这一点应当说是合法的，但选举手续不完备。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后应该报告有关的情况，他们没有报告是不好的。确定了上述问题后，就好检讨四中全会是不是政治路线的错误。四中全会得到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承认，这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政治内容是不好的。

《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92页

四中全会是否根本错了？现在弄清楚了，四中全会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共产国际的问题为什么不提？故意不提的。共产国际现在不存在了，我们也不把责任推给共产国际。

《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3页

九一八事变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只是日本侵略的范围暂时还限于东北四省，就使人们觉得似乎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一定再前进的样子。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43页

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6页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

在苏维埃运动后期，五中全会的精神，提倡搞社会主义革命，否认革命发展不平衡，认为当时的斗争是两条道路的决战。这些都比立三路线的“左”倾在政治上表现得更完备。

《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2页

过去有同志认为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非法的。现在看到

洛甫在他的反省笔记中说到,对临时中央共产国际来电批准过,五中全会也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根据这一点应当说是合法的,但选举手续不完备。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后应该报告有关的情况,他们没有报告是不好的。

《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92页

关于一九三一年上海临时中央及在其后由此临时中央召开的五中全会是否合法的问题。中央认为是合法的,但应指出其选举手续不完备,并以此作为历史教训。

《学习和时局》(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
3卷第939页

五次反“围剿”

丧失根据地的最显著的例子,是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丧失了江西中央根据地。这里的错误是从右倾的观点产生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做了一万二千多公里的长征。然而这种错误,往往有一种“左”倾轻敌的错误为之先行。一九三二年进攻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正是后来在对付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采取消极防御路线的根源。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198页

江西第五次反“围剿”,我军全然不讲退却,原因在于对局部形势和整个形势都不注意,实在是一种鲁莽灭裂的干法。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209—210页

由于干部没有经验，对于战略退却不相信，在第一次和第四次反“围剿”的初期，第五次反“围剿”的整期，在这个问题上都遭遇了很大的困难。第一次反“围剿”时，由于立三路线的影响，干部的意见，在没有被说服以前，不是退却而是进攻。第四次反“围剿”时，由于军事冒险主义的影响，干部的意见是反对准备。第五次反“围剿”时，干部的意见开头是继续军事冒险主义反对诱敌深入的观点，后来是变成了军事保守主义。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213页

军事平均主义，到一九三四年第五次反“围剿”时，发展到了极点。“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以为可以制敌，结果为敌所制，原因在于惧怕丧失土地。集中主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剩下了钳制力量，自然不免使土地受到损失。然而这是暂时的局部的损失，其代价是突击方向取得了胜利。突击方向胜利了，钳制方向的损失就可以恢复了。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都使我们遭受了土地的损失，特别是在敌人第三次“围剿”时江西红军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了，然而结果我们的土地不但都恢复了，而且还扩大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225—226页

统治着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的所谓“正规战争”的战略

方针，否认这种流动性，反对所谓“游击主义”。反对流动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是得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华里的长征。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229页

对于第一、二、三、四次“围剿”，我们的方针都是歼灭战。每次歼灭的敌人对于全敌不过是一部分，然而“围剿”是打破了。第五次反“围剿”时，采取了相反的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237页

长征

差不多一年半以来，中国的三支主力红军都在作阵地的大转移。从去年八月任弼时同志等率领第六军团向贺龙同志的地方开始转移起，接着就是十月开始的我们的转移。今年三月，川陕边区的红军也开始转移。这三支红军，都放弃了原有阵地，转移到新地区去。这个大转移，使得旧区域变为游击区。在转移中，红军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们拿着整个局面中的这一方面来看，敌人是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对的，因为这是事实。但是有人说（例如张国焘）：中央红军失败了。这话对不对呢？不对。因为这不是事实。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一个虾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它说：

“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我们说，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个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敌人在一个方面（占领我军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在另一个方面（实现“围剿”“追剿”计划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这样说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完成了长征。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

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49—150页

红军经过了万里长征，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吴起镇。当时敌人还在进攻我们，那年的十一月下旬，在富县我们还打了三个胜仗。在祝捷声中，在十二月十日，一听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我们心里好不欢喜！红军同志完成了这么伟大的长征，学生同志在北平发动了这样伟大的救亡运动，两者都是为解放民族和解放人民而斗争，其直接意义都是推动抗日战争。

《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51页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不简单的，假定我们这里在地球上对钻一个洞，从美国钻出来，恰好是一万二千五百公里多一点。长征结束时，我们的军队没有剩下多少。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打我们，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都犯了错误，才被迫来了个大搬家。到了遵义，进行了自我批评，才纠正了错误。

《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56—357页

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纠正了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性质的严重的原则错误，团结了党和红军，使得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转到了抗日的前进阵地，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由于巴西会议和延安会议

(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是从巴西会议开始而在延安会议完成的)反对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全部红军会合一起,全党更加团结起来,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斗争。这两种机会主义错误都是在国内革命战争中产生的,它们的特点是在战争中的错误。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0页

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则主要地是反对战争中的机会主义,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这是战争环境的反映。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48页

由此看来,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两个过程和四个战略时期之间,共存在着三个战略的转变。第一个,国内游击战争和国内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二个,国内正规战争和抗日游击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三个,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

三个转变中,第一个转变曾经遇到很大的困难。这里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反对沉溺于游击性而不愿向正规性转变的右的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的倾向,这是由于干部对已经变化的敌情和任务估计不足而发生的。这一方面,拿中央红色区域来说,曾经作了艰苦的教育工作,才使之逐渐地转变过来。又一方面,则要反对过分地重视正规化的“左”的集中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倾向,这是由于一部分领导干部对敌情和任务估计过分,并且不看实情,机械地搬用外国经验而发生的。这一方面,在中央红色区域,曾经在三年的长时间内(遵义会议以前),付

出了极大的牺牲，然后才从血的教训中纠正过来。这种纠正是遵义会议的成绩。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50页

只在到了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党才彻底地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奠定了后来战胜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共产党人〉发刊词》（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11—612页

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

《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3页

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就是积极拥护四中全会的人，也就是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犯过路线错误的人，出来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他们和其他同志一道反对这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个账挂在我身上，我要声明一下，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倾路线的一切同志，包括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中的很重要的某些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59页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会。

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好多别的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和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

《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24—425页

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把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一九六三年九月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39页

一二九运动

第一，一二九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同志们都知道，刚才李昌同志也讲过。然而，我们应该进一步了解：它是在什么政治环境下产生的呢？它有什么政治意义呢？它给中国政治上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红军经过了万里长征，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吴起镇。当时敌人还在进攻我们，那年的十一月下旬，在富县我们还打了三个胜仗。在祝捷声中，在十二月十日，一听到北平一二九

运动的消息，我们心里好不欢喜！红军同志完成了这么伟大的长征，学生同志在北平发动了这样伟大的救亡运动，两者都是为解放民族和解放人民而斗争，其直接意义都是推动抗日战争。所以，一二九运动在历史上讲，是抗日战争准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有些人说，一二九运动不如五四运动，就是说，前者不及后者的政治意义伟大。这对不对呢？不对。我们认为这两者的意义是同样伟大的。

……

至于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

我们看看，一二九运动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发生的。一方面，它是在共产党被认为绝对无权、绝对不合法的国民党统治区，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剿共”战争时期，在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双管齐下的情况之下发生的。在过去的所谓“剿共”战争中，共产党和红军处境的艰难是无须多说的。后来红军长征了，一走走了二万五千里，人家在后面也“欢送”了二万五千里，并且在前面还有“欢迎”的，在天上加上“送礼”的，这礼物名曰炸弹。尽管“欢送”者一程一程地相送，“欢迎”者一站一站地相迎，红军仍然到了陕北。但敌人还是用子弹作礼物，前后迎送。这就是说，红军到了陕北，还是处在被“围剿”的环境中。这就是军事“围剿”的情形。文化“围剿”怎么样呢？敌人的“碉堡”是建筑在学校里、书报杂志上以及社会文教团体里，也大有“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之势。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鲁迅先生的杂感，就可以知道。他的抨击时弊的战斗的杂文，就是反对文化“围剿”，反对压迫青年思想的。另

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已占领了东北，酝酿着“华北特殊化”，并积极准备灭亡全中国。因此，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大家都要干，要打日本帝国主义。可是，有一些人偏偏不赞成。不过，他们也是要打的，打的是谁呢？是共产党，是青年学生，是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全国老百姓对他们说：你们打的方向弄错了，我们坚决反对。这就是一二九运动所处环境的另一方面。一二九运动以后，事情就逐渐好办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民党政府只打共产党不打日本帝国主义的办行不通了，不得不放弃“剿共”政策而走准备抗战的路，这就开了国民党的三中全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在事实上宣告成立。对于这些，一二九运动的功劳都是很伟大的。

这里，有一点应该特别注意，就是红军长征和一二九运动的密切关系。一二九运动发生在红军北上抗日到达了陕北之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帮助了一二九运动，同时，一二九运动也帮助了红军，这两件事的结合，就帮助了全民抗战的发动，帮助了中华民族，增进了全民族的利益。

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推动了全国团结抗战潮流的发展。一二九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红军走到陕北打了胜仗，而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侵略中国的情况之下发生的。广大青年学生起来反对当局对他们的压迫，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个运动的发生，轰动了全国。它配合着红军的北上抗日行动，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使抗日运动成为全国的运动。所以，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要拿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的关系相比，那末很明显，一二九运动和抗日战争的关系更密切，两者相隔的时间更短，因为一二九运

动有红军长征的胜利互相配合。总之，一二九运动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在一二九运动以后，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反帝国主义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第二，反对黑暗势力压迫青年学生和压迫知识分子，这件事情现在也是更好办了；而黑暗势力压迫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这件事情却是更难办了。一二九运动就证明了这一点。黑暗势力压迫进步思想，压迫到最后，黑暗势力总是失败的。一二九运动前，他们进行了八年多的反共教育，是有计划地进行的。学校里的一切有政治倾向的课程，首先都是以反对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为原则；对教员中被认为是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都要排斥和迫害。从一九二七年下半年起，他们用这种教育训练了八年多，不幸得很，却训练出一个“一二九”来。这在国民党内那些反共的先生们看来，当然是一件天大的憾事。有些人说，“一二九”是学生造反。这一点学生们是承认的，的确是造反。但是，造谁的反呢？是造压迫学生者的反，造思想“围剿”者的反，造宣传假三民主义的人们的反。他们造反的目的就是要实行真三民主义，也就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他们为铲除一切实行真三民主义的障碍而造反。这样的反要不要造呢？要造的，要造的，第三个还是要造的。

……

第三，一二九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怎样呢？毫无疑问，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起了骨干的作用。没有共产党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首先是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给了青年学生一个明确的政治方针；其次是红军到了陕北，配合了北方的救亡运动；再次是共产党北方局和上海等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这样，才使一二九运动发生，并使之在全国各阶层开展起来，形成了全民族救亡运动的巨大政治力量。青年学生好比

是一二九运动的柴火，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差用火一点。点火的人是谁呢？就是共产党。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同样，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只有跟共产党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同样，在革命队伍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只有知识分子跟工人、农民正确地结合，才会有无攻不克、无坚不摧的力量。因此，知识分子要同共产党结合，要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要同革命武装队伍结合，要同八路军新四军结合。

《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51—256页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群众，在我们党领导之下，发动了英勇的爱国运动，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把这种爱国运动推广到了全国各大城市。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36—1037页

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惊传蒋氏被幽，事出意外。然此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张杨均贵党中央委员，且属“剿共”军领袖，然亦坚请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观其宣布之八项主张，实为全国人民之所言，厉行不暇，何可厚非。今日之西安事变，不过继福建事变、两广事变之后，鼎足而三耳。三者皆贵党中抗日救国之贤豪，不满蒋氏降日卖国

之所为而蹶然掲出正义之旗耳。若漫不加察，一意孤行，行见同类之事变，将遍发于国中，祸患之纷乘，欲收拾而无术。

《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68页

西安事变的发动，确系受下列数种势力的影响：（一）张杨部队及西北革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二）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三）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发展；（四）各省实力派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五）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六）世界和平阵线的发展。这些都是无可讳言的事实。

《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46页

西安事变爆发，国家处于重大危险面前，其危险性就在日本必然地乘机进攻，其得和平解决，实是如天之福。

《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81页

自从日本侵略开始以来，我们就是愿意停止内战的，因为只有国内和平，才能对日抗战。四年前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军队订立抗日协定的宣言，前年的八一宣言，去年的致国民党书等等，无不是表示我们诚恳地愿意同国民党建立新的统一战线。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介石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损害。当西安事变中，日本军阀方面，宁、沪、平、津一部分中国人方

面，都说西安事变是共产党的阴谋。这种说法完全不合事实。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与国内改革问题上，因政见不同而发生的，完全是一件突发的事变，我们事前全不知道。

《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88页

伟大西安谈判顺利地和平解决，成为开始在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也走到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举国抗战开始一个过渡的时期。

同张闻天关于国内和平实现后的形势及党与红军的任务给任弼时的电报（一九三七年三月六日），《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第659—660页

直至西安事变发生，在一九三六年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全权代表才同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取得了在当时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是两党停止内战，并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

《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62—363页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民党政府只打共产党不打日本帝国主义的办行不通了，不得不放弃“剿共”政策而走准备抗战的路，这就开了国民党的三中全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在事实上宣告成立。

《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53页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国民党内部主张抗日的两派爱

国分子——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联合起来，勇敢地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对日妥协和对内屠杀的反动政策，举行了有名的西安事变。同时，国民党内的其他爱国分子，也不满意国民党当局的当时政策。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当局被迫地放弃了内战政策，承认了人民的要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37页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在卢沟桥事变的前夜，即一九三七年五月，我们党召集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国代表会议，这个会议批准了党中央自一九三五年以来的新的政治路线。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37页

卢沟桥事变

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卢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

《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52页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国民党中国民革命军中的抗日情绪在日益增涨，大多数的领袖与党员是能够和我们及人民一道从事于抗日救亡的事业

的。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诚然至今还不满人意，但是业已开始了它的转变，三中全会的决议，可以看作这种开始转变的证据。

《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90—491页

三中全会在法律上确认伟大西安谈判顺利的和平解决，成为开始在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也走到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举国抗战开始的一个过渡的时期。

《国内和平实现后的形势和任务》（一九三七年三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95页

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

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

《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25页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六中全会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没有六中全会，今天的局面不会有这样大。当时如果不克服那么一种倾向，即对放手动员

群众这样一条路线不赞成、有所畏惧、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束缚起来的倾向，如果不赞成放手动员群众，发展自己，发展八路军、新四军，扩大解放区，不被国民党反动派的政策所束缚同时又不脱离统一战线这个原则，那末，今天的局面就不一样。参加六中全会的是一些什么人呢？还不就是这么一批人。没有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对这条路线的赞助和拥护，六中全会就不可能纠正右倾投降倾向。但是，在六中全会的文件上，在六中全会的记录上，看不出我们尖锐地批评了什么东西，因为在那个时候，不可能也不应该提出批评，而是从正面肯定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在实际上解决了问题。

《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59—360页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会。

《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24页

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共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在苏联养病后回国带回来的，由王稼祥同志传达的。

《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25页

国民党三次反共高潮

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

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自日寇和德意订立三国同盟之后，为急谋解决中日战争，遂积极努力，策动中国内部的变化。其目的，在借中国人的手，镇压中国的抗日运动，巩固日本南进的后方，以便放手南进，配合希特勒进攻英国的行动。中国亲日派首要分子，早已潜伏在国民党党政军各机关中，为数颇多，日夕煽诱。至去年年底，其全部计划乃准备完成。袭击皖南新四军部队和发布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不过是此种计划表面化的开端。最重大的事变，将在今后逐步演出。

《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71—772页

（一）从何白《皓电》（去年十月十九日）开始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至皖南事变和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达到了最高峰；而三月六日蒋介石的反共演说和参政会的反共决议，则是此次反共高潮的退兵时的一战。时局可能从此暂时走向某一程度的缓和。……

（二）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一九四一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78页

自武汉失守以来，国民党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在这三次反共高潮中都有国民党军队袭击共产党军队的事实。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九年冬季至一九四〇年春季，那时国民党军队袭占了陕甘宁边区八路军驻防的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城，并且使用了飞机。在华北，派遣朱怀冰袭击太行区域的八路军，而八路军仅仅为自卫而作战。第二次是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先

是何应钦白崇禧以《皓电》（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送达朱、彭、叶、项，强迫命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限期一个月一律开赴黄河以北。我们答应将皖南部队北移，其他部队则事实上无法移动，但仍答应在抗战胜利后移向指定的地点。不料正当皖南部队九千余人于一月四日遵命移动之时，蒋先生早已下了“一网打尽”的命令。自六日起十四日止，所有皖南国民党军队果然将该部新四军实行“一网打尽”，蒋先生并于十七日下令解散新四军全军，审判叶挺。自此以后，华中华北一切有国民党军队存在的抗日根据地内，所有那里的八路军新四军无不遭受国民党军队的袭击，而八路军新四军则只是自卫。第三次，是从本年三月至现在。除国民党军队在华中华北继续袭击八路军新四军外，蒋先生又发表了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一书；调动了大量河防部队准备闪击边区；发动了全国各地所谓“民众团体”要求解散共产党；动员了在国民参政会内占大多数的国民党员，接受何应钦污蔑八路军的军事报告，通过反共决议案，把一个表示团结抗日的国民参政会，变成了制造反共舆论准备国内战争的国民党御用机关，以至共产党参政员董必武同志不得不声明退席，以示抗议。总此三次反共高潮，都是国民党有计划有准备地发动的。

《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一九四三年十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22—923页

六中全会来了一个纠正，许多同志了解了这个问题。六中全会以后，还有人觉得国民党很好，很漂亮，后来出了一个《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又出了一个第一次反共高潮，出了这两件事情以后，国民党“跳加官”戴的一副假面具脱掉了，他那个不好看的样子就露出来了，这时我们一些同志就逐渐觉悟了。

以后又有第二次反共高潮即皖南事变，第三次反共高潮，一九四三年七月要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到这个时候，我们党内就大体上肃清了对国民党的幻想。消除了认为国民党不要改造，中国就可以有救，日本就可以被赶出去的思想；改变了认为主要的不是依靠我们自己，发展我们的力量，发展解放区，使八路军、新四军不受限制的思想；树立了要放手动员人民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的领导下打倒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思想，在广大的人民中间，在同志们的脑子中间，展开了一幅新图画。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13页

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这个党过去打过整整十年的反革命内战。在抗日战争中间，在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三年，它发动过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每一次都准备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内战，仅仅由于我党的正确政策和全国人民的反对，才没有实现。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23—1124页

中共七大

我们这个大会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们应该讲，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我们这个大会要打

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

《两个中国之命运》（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25页

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做了三件事：第一，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第二，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三，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今后的任务就是领导全党实现党的路线。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代表们对三个报告发表了很好的意见。许多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从团结的目标出发，经过自我批评，达到了团结。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

《愚公移山》（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101页

现在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个是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两个大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这两条路线在互相斗争着。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的路线的领导之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

《愚公移山》（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103页

这一次我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套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路线、纲领、政策。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少数个人的头脑里想出来的和发明的，而是亿万中国人民在他们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几十年奋斗的结果，取得了经验，才形成我们现在七大的决议案和文件。

《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演说》（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31—432页

七大把七大以前所存在的问题都讲了，没有那一次的总结，就不能有日本投降后的大进步。我们党现在与抗日时期不同了。那时，在一九四〇年以前，就别扭得很，在军事上，在政策上，例如群众运动、减租减息，许多地方都不一致，对党的历史上前两个时期都没有总结。七大作了总结，这才有了抗战胜利后这三年解放战争的胜利。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一九四八年九月），《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41页

我们这次大会跟七大有相同的性质。那一次，为了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我们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那一次对政治问题的解决、对党内历史问题的解决，那一次的选举，达到了团结全党、使革命在全国胜利的目的。

《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00页

在七大召开以前，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七大成为团结的大会，实现了全党思想的统一。

《总结经验，教育干部》（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75页

重庆谈判

这一次，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谈了四十三天。谈判的结果，已经在报上公布了。现在两党的代表，还在继续谈判。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这是达成了协议的。还有没有达成协议的。解放区的问题没有解决，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

《关于重庆谈判》（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56页

这次我到重庆，见了蒋介石，我们的代表和他们的代表谈了四十多天，谈出了一点东西。有两条，第一条中国要和平，第二条中国要民主，我们提出来，他们没有理由反对，只好赞成，在双十节签订了协定。但同时他们又准备了很多军队进攻解放区，共有八十万，包围陕甘宁边区的还不算，要算进去就有一百万以上。已经打了好几仗，头几仗他们都没有争到面子。仗还要打下去，如果我们打赢了，可能会得到和平，那时候我们派代表同他说：“蒋委员长，我们从前谈判过，我们还是和平吧！”我们是不要打的，那时候就可能和平了。如果是他们打赢了，我们解放区就要变成黑暗的地方，……

《在抗大七分校的讲话》（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47—48页

双十协定没有解决解放区问题，因为他们不愿承认解放区。几个月后，我们还要要求他们承认解放区，不承认是不行的，这是中国的大势。这就是共产党、八路军的任务，解放区人民的任务。

《在抗大七分校的讲话》（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48—49页

北平和平解放

用谈判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使人民少受痛苦，当然是比较好的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的。最近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就是一个实例。

《中共发言人就和平谈判问题发表谈话》（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44页

战败了，一切希望都没有了，比较好的一条出路，是军队离城改编，让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和平地接收城防和市政，这是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为什么天津不肯这样做呢？难道天津的“工业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不应当保全吗？难道天津的“国家元气”应当受损伤吗？为什么一月二十二日应当“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而在一月十三日就不应当，而令天津的和平解决不能实现呢？基本的原因是傅作义将军还想打一打。天津打败了，二十九个钟头内十几万人解除武装，陈长捷、林伟俦、杜建时等一齐被俘，北平孤立了，毫无希望了，决心走第二条路，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可能性从此产生。……和平地解决北平问题的基本原因是人民解放军的强大与胜利，难道还不明显吗？

北平人民，包括劳动人民、资产阶级及绅士们在内，一齐渴望和平解决，又是一个原因。……

北平和平解决的又一个原因，是近二十万的国民党军队除少数几个死硬分子外，从兵士们到将军们，一概不愿打了。天津失守后的傅作义将军代表了这种情绪，下了出城改编的决心。

《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49—251页

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此次人民解放战争之所以胜利，是由于全国人民不畏强御，团结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一致奋起，相与协力，从而使人民解放军获得各方面的援助，使人民的敌人完全陷于孤立，胜负之数，因以判明。……欲求人民解放斗争获得最后胜利，必须全国一切民主力量同德同心，再接再厉，为真正民主的和平而奋斗。

《复李济深等五十六人电》(一九四九年二月二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53页

全国人民拥护自己的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这一次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到现在，业已三年了。这一次战争是由国民党反动派在获得外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之下发动的。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撕毁了一九四六年一月的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发动了这一次反人民的国内战争。可是，仅仅三年时间，即已被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所打败。不久以前，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和平阴谋被揭穿以后，人民解放军即已奋勇前进，横渡长江。国民党反动派的都城南

京，已被夺取。上海、杭州、南昌、武汉、西安，已被解放。现在，人民解放军的各路野战军，正在向南方和西北各省，举行着自有中国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大进军。三个年头中，人民解放军共已消灭反动的国民党军五百五十九万人。截至现时为止，残余的国民党军，包括它的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和后方军事机关军事学校等在内，只有一百五十万人左右了。肃清这一部分残余敌军，还需要一些时间，但已为期不远了。

这是全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整个世界，除了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对于中国人民的这个伟大的胜利，没有不欢欣鼓舞的。中国人民反对自己的敌人的斗争和世界人民反对自己的敌人的斗争，其意义是同一的。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齐看见了这样的事实：帝国主义者指挥中国反动派用反革命战争残酷地反对中国人民，中国人民用革命战争胜利地打倒了反动派。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64—1465页

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
版第4卷第1480页

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

我们的会议之所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因为三年以前我们曾和蒋介石国民党一道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那次会议的

结果是被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破坏了，但是已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次会议证明，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一道，是不能解决任何有利于人民的任务的。即使勉强地做了决议也是无益的，一待时机成熟他们就要撕毁一切决议，并以残酷的战争反对人民。那次会议的惟一收获是给了人民以深刻的教育，使人民懂得：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决无妥协的余地，或者是推翻这些敌人，或者是被这些敌人所屠杀和压迫，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2—343页

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自己的议程中将要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的所在地以及采取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年号。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3页

我们的会议包括六百多位代表，代表着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这

就指明，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2页

在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领导之下，我们的会议齐一心志，按照新民主主义的原则，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于北京，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采用了义勇军进行曲为现时的国歌，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世界公元，选举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7—348页

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49—350页

高岗、饶漱石事件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我国现阶段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罪

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的复辟开辟道路。全党在中央委员会团结一致的领导下，已经把这个反党联盟彻底地粉碎了，我们的党因此更加团结起来和巩固起来了。这是我们在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中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对于我们的党说来，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为鉴戒，务必使党内不要重复出现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他们的这种活动完全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采取的那一类丑恶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过：“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与意图是可耻的事。”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91页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一九五三年，我们党内又出现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这个反党联盟代表国内外的反动势力，而以危害革命事业为目的。如果不是党中央发觉得早，及时地击破了这个反党联盟的话，党和革命事业的损失将会是不堪设想的。

《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六年四月二日、四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5页

炮击金门

金门打炮，这是真打，但是基本上还是文打。我们没有跟任何外国人开战。美国人要我们停火，每天都要我们停火。我们没有跟你打仗嘛！为什么停火？我们中国就没有跟你美国人开过战，就没有打枪，我们只是跟我们的蒋委员长、蒋总统打。

《杜勒斯是世界上最好的反面教员》（一九五八年十月二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55页

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你们的领导者们过去长时期间太猖狂了，命令飞机向大陆乱钻，远及云、贵、川、康、青海，发传单，丢特务，炸福州，扰江浙。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打一些炮，引起你们注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一九五八年十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20页

接着就是金门事件。我们不想叫美国休息，在联合国通过美国军队撤出黎巴嫩决议的第二天，我们就向金门岛开炮，闹得全世界摸不到我们的底。杜勒斯也忙得很，从东太平洋调动兵力，兵力不够，又从地中海调。杜勒斯自己讲，这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一次海、空军的集中，美国把它仅有的十二艘航空母舰中的六艘开来了。

《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一九五九年三月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9—20页

去年打金门，那里没有美国军队，只有美国一个工作组，十几个人。这个地方和美国没有条约关系，而台湾却和美国有条

约关系。我们打金门是内战问题。杜勒斯的方针是叫我们和蒋介石都不打。我们说，你们管不着，这是我们中国的地方，我们打不打是我们的事，你们不要多管；我们和你们美国只在一点上有关系，就是要求你们从台湾撤军。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在日内瓦、华沙同美国谈判。美国要签订一个声明，要蒋介石不打我们，要我们也不打蒋介石。我们说不行，金、马、台、澎问题是我们的内政，你们管不着，惟一的问题就是请你们搬家。

看来我们和美国还得谈下去。它不赞成我们，我们也不赞成它，谈多久我们不知道。已经谈了三年半，恐怕还会谈十年，这是世界上最长的谈判。你们不要怕我们会打台湾。我们打金、马是为了帮助蒋介石，因为美国想把金、马让给我们，自己占据台湾。我们放弃金、马，都给蒋介石。蒋介石一困难，我们就打金、马，美国就可以让蒋介石继续做总统。

美国有“战争边缘政策”，主要是为台湾问题而想出来的。去年我们也采取“边缘政策”。我们打金、马和蒋介石的增援船只，蒋介石就请美国帮助。美国人来了，但只在十二海里以外。我们光打蒋介石的船，不打美国船。美国船升起国旗，叫我们不要打它。美国一炮也没有打我们，我们也没有打它。所以大家都在战争边缘上。

《关于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一九五九年五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63页

我们历来都讲，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一定要解放台湾，解放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用和平的方法，一个是用战争的方法。万隆会议时，周恩来总理就声明过，愿意同美国坐下来谈判。后来就谈了，一气谈了四年，先在日内瓦，后到华沙；先是一个星期一次，后来是两个星期一次、一个月一次，现

在是两个月一次。双方都不想中断谈判，美国曾经中断过一个时期，后来我们去了一封信，说不谈不好，并且提出了谈判时间。他们说，限定时间，他们不能遵守，但是谈判可以恢复。我们说谈判可以拖一年，后来金门一打炮，谈判就恢复了。谈判地点，根据美国的意见迁到了华沙。在谈判中，我们只是向他们提出一点，就是要他们从台湾撤军，撤军就没事了嘛。剩下的就是我们同蒋介石的事了，我们可以同蒋介石公开谈判。可是，美国不干，他们怕蒋介石同我们谈判。我们在金门打了炮，实际上并不是战争。我们并不想一下子把台湾等地拿下来，可以把它们放在蒋介石的手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没有关系。金门、马祖可以不拿下来，并不想为此而打仗。

《关于台湾问题》（一九五九年五月、十月），《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80—381页

西藏平叛

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五十九年不回来，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

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希望达赖回国。如果他愿意回国，能够摆脱那些反动分子，我们希望他回国。但是，事实上看来他现在难于回国。他脱离不了那一堆人。同时，他本人那个情绪，上一次到印度他就不想回来的，而班禅是要回来的。那时，总

理劝解，可能还有尼赫鲁劝解，与其不回不如回。那个时候就跟他这么讲：你到印度有什么作用？不过是当一个寓公，就在那里吃饭，脱离群众，脱离祖国的土地和人民。现在，还看不见他有改革的决心。说他要改革，站在人民这方面，站在劳动人民这方面，看来不是的。他那个世界观是不是能改变？六十年以后也许能改，也许不要六十年。而现在看来，一下子要他回来也难。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看来，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但是，我们文章不做绝了。

《关于西藏平叛》（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
第45页

西藏叛乱，世界资产阶级找到了好题目。中国有句老话：虱多不痒。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反动派，骂我们骂得太多了，也就不痒了。你们了解西藏问题吗？

……

四月十八日，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已占领了所谓的麦克马洪线的几个重要据点。广大的西藏群众与解放军站在一起，他们痛恨他们的领导者——农奴主。西藏叛乱有很多地方与匈牙利事件不同。只讲一点，即群众基础不同。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匈牙利事件时，群众思想混乱，一九五七、一九五八两年经过了党的工作才转变过来。西藏的农奴并不站在西藏教皇大炮那边，大多数站在我们这边。也有些人看不清楚。大部分同我们站在一起要求解放。西藏事件很好，我们很乐观。当然，要消灭农奴制，进行社会改革，要向群众讲道理，这还需要时间。有这样一个问题，解放军到西藏已经九年了，西藏为什么不改革？这是我们有意的，把这块地方放慢一步，这是有计划地放慢。这

倒不是因为没有群众基础。西藏的一些上层分子心在外国，不在中国。我们放慢改革，原来讲一九六二年以后再商量改革问题。现在他们打了炮，就把改革提前了四年。因此，打炮也是好事。世界上的资产阶级对我们平叛总是要大叫大骂的，因为他们认为西藏实际上是他们的地方，不是我们的。他们的第一个论据说西藏人不是中国人，西藏人是西藏人，不是汉人。其实，我们国家里不是汉人的多得很，内蒙古是蒙古族人，维吾尔族是突厥族系的人，还有其他少数民族，都不是汉人。在中国六亿七千万人口中，少数民族有三千六百万人。不仅一百二十万西藏人不是汉人，其他三千四百多万人也不是汉人。叛乱分子说西藏要求独立，而所谓“独立”，就是要把西藏给外国。

《同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九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 183—184 页

雅鲁藏布江以南、喜马拉雅山国境线以北广大地区平叛战斗，已经基本结束，得到很大胜利。这是当地人民群众对平叛战争热烈拥护与人民解放军英勇战斗两方面相结合而完成的。……全世界反动派，以胡适为代表，忘记了一件事，日本打中国，反革命打革命，中国平叛匪，以革命打反革命，二者完全相反，胜败判然不同。

《西藏人民群众拥护人民解放军平叛，亲如家人》(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 189 页

达赖上次来北京时，我同他谈过话，谈得很好。他向我保证，回去一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实行改革，但看来他还是处在一种矛盾当中。在他下面的索康、赤江、帕拉这些人都是很坏的。达赖有那样一个很坏的环境。这些人是把他向外、向反

对中央的方向拉的；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聪明人，他能够想到，他离开西藏、离开人民、离开祖国之后，下面的文章不好做。他写给谭冠三的信就流露了这个思想。

达赖，现在一个可能是回来，一个可能是不回来。最近印度报纸放出来的空气是他要回来。但是，达赖的两个声明，完全是反对中央，反对祖国大家庭，要求西藏独立的。这样，回来的路，达赖就自己堵塞了。据我看，达赖的声明是索康、帕拉等人的作品，同时得到印度某些人的同意。达赖如果赞成这两个声明，就不能回来，要回来就要改变态度，站在反对这两个声明的立场，拥护中央。要达赖从那个环境出来，离开索康、赤江、帕拉等人，办法很难想，这全靠他个人的意志，个人想办法。我们是留有余地的，还选举他做人大副委员长，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委员的位子也给他留着。留有余地，我们的态度就很主动。其他的叛国分子，他们也可以回来，但是要改变态度。回来也不能再当噶伦，要不然和你们就没有区别了。

《西藏平叛后的有关方针政策》（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56—57页

如果达赖赞成我们的主张，我们希望达赖回来。只要他赞成两条，第一，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二，在西藏要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革，他就可以回来。尼赫鲁对于这两条并不反对，尼赫鲁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也说应当在西藏进行改革。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两条达赖都反对。世界上的事是常常有变化的。西藏惟一的女活佛已经从印度回来。所以，留有余地，比较好。……如果达赖对以上两条不改变他现在的态度，我们就不欢迎他；如果他改变态度，我们就真正欢迎他。现在要达赖改变态度，赞成不分裂国家，赞成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革，是很难的。但是，

世界形势一变，情况就会不同。许多白俄不是已经回国了吗？达赖还年轻，他才二十多岁。

《关于中印关系和达赖喇嘛回国问题》(一九五九年十月六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206—207页

达赖周围有许多人，对达赖影响不好。当然也不能说达赖是进步的，他自己不那么进步。他到外国去发表的一些言论，做的一些事，是反对祖国的。他们说，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是独立王国。第二就是改革问题，他们不赞成。

《同班禅额尔德尼等的谈话》(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208页

巴黎公社

巴黎公社，是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巴黎工人阶级起来的第一次革命的运动。那年正当前清同治十年，到今日恰是五十五年了。我们要问，这种运动为什么不发生于百年以前，而发生于五十五年前的今日呢？我们知道，凡属一种运动发生，不是无缘无故的，必有客观的条件。查巴黎公社，在中国鸦片战争之后三十年，这三十年中，继续订有《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足证明欧洲各国，已有能力向东方猛烈地发展，已由资本主义进为帝国主义，国内已形成伟大的工人阶级，所以才有此种壮烈的工人革命运动产生。

《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3—34页

民国六年俄罗斯工人起来革命，推翻资本家政府，成功了劳工专政，使世界上另开了一条光明之路，其价值的重大为何

如?俄国的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以自己的力量,来求人类真正的平等自由,它们的意义是相同的,不过成功与失败不同而已。所以我们可以说: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果——俄国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继承者。

《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4页

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化为家长社会、封建社会以至于今日之国家,无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阶级斗争的演进。巴黎公社便是工人阶级第一次起来打倒统治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革命。

《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4页

巴黎公社存在不过七十二天,何以失败这样快呢?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作指挥——我们欲革命成功,必须势力集中行动一致,所以有赖于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党来发号施令。当时巴黎公社,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党,以致内部意见纷歧,势力分散,而予敌人以可乘之机,这是失败的第一个原因。(二)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我们对敌人仁慈,便是对同志残忍。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十四年国民政府打倒杨、刘肃清反革命派的胜利,全赖对于敌人取绝对严厉的手段,不丝毫妥协,因为我们不用严厉的手段对付敌人,敌人便要用极残酷的手段对付我们了。巴黎公社,对于敌人不取严厉处置,还容许敌人占住金融机关,调集军队,所以终被敌人覆灭了。各同志要鉴往知来,惩前毖后,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

致命的打击”这句话。我们要革命，便要从此学得革命的方法。

《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5—36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

历史上的一切战争，依其性质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正义的战争，一是非正义的战争。例如二十几年前的欧洲大战，就是一个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那时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强迫人民为帝国主义的利益作战，违反人民的利益；……

《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83—384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非正义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那时世界上还只有一个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和别国的很少数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而那时各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都是赞成帝国主义战争的，其党员则绝大多数是还不觉悟的。这是三十年前的情形。

《英勇斗争的二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七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0页

文明社会五千年来，才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次世界大战，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二十世纪的时代，资本家撞了资本家，市场少了，有的抢到的地方广一些，有的抢到的地方狭一些，因此打起来。这就是所谓帝国主义时代。整个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性的大战，是在一九一四年发生的，在座的凡是三十岁以上的人就会知道，记得此事。这次战争，刚才讲了，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反映，世界经济发展到那种程度，就

要出这种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已预料到了这一点。这次战争是破坏的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是损害人类利益的战争，是抢夺市场的战争，这是它的消极方面。但是它也产生了积极的方面，就是出现了俄国十月革命，在很多国家中产生了共产党，很多国家的无产阶级产生了自己的先锋队，我们中国就是一个。跟着世界战争来了一个世界革命时期。首先在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后来接着有德国革命、匈牙利革命、意大利革命，但是这些都被打垮了。因为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还是分裂的，有共产党，有社会民主党，无产阶级的觉悟也不够。胜利的只有俄国的十月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世界的面目、历史的方向就变了。世界历史几千年以来都在发展着，进步着，但只有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才产生了新的方向。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8—289页

十月革命

民国六年俄罗斯工人起来革命，推翻资本家政府，成功了劳工专政，使世界上另开了一条光明之路，其价值的重大为何如？俄国的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以自己的力量，来求人类真正的平等自由，它们的意义是相同的，不过成功与失败不同而已。所以我们可以说：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果——俄国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继承者。

《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4页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的变化，同样地而且还特别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通过了各国内部和中国内部自己的规律性而起的。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3页

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的时代。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67页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将世界历史划分为两个时代，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流行了。

《时局问题及其他》（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49页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世界的面目、历史的方向就变了。世界历史几千年以来都在发展着，进步着，但只有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才产生了新的方向。奴隶社会及其以后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人剥削人的社会。十月革命后的新的历史方向，就是取消人剥削人的制度。俄国人民已经得到了胜利。许多国家都有了共产党。我们党一九二一年建立，到今年已经有了二十四年的历史。日本共产党一九二二年建立，印度共产党一九二〇年建立。东方几个大国如此，其他如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美国的共产党，大体上都是这个时期产生的。一九一九年，列宁组织了第三国际。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9页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他先进分子上了共产主义的一课。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始于一八四三年（鸦片战争后三年），但由一八四三年到一九一七年，七十四年之久，影响主要限于欧洲，全世界大多数人还不知道有所谓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开始在欧洲走路，走得比较慢。那时我们中国除极少数留学生以外，一般人就不知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比飞机飞得还快。飞机从莫斯科到这里也不止一天吧，但这消息只要一天，即是说，十一月七日俄国发生革命，十一月八日中国就知道了。那个时候，把俄国的革命党叫做过激党。七十多年马克思主义走得那样慢，十月革命以后就走得这样快。因为它走得这样快，所以一九一九年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五四运动以后，很快就晓得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的口号。在这以前，哪个晓得提这样的口号呢？不知道！这样的口号，这样明确的纲领，从中国无产阶级产生了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起，就提出来了。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0—291页

从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四年，十一年后，世界上来了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七年，又是三年，来了一个十月革命。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七年，十四年，十月革命胜利了。没有一九〇三年在俄国出现布尔什维克派，没有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中的活动，就没有十月革命。没有十月革命，我们中国会不会有共产党呢？当然中国大批的无产阶级产生了以后，总

会产生党的，所以不能说不会产生共产党，但要拖到什么时候才能产生，就不知道了。一九〇三年产生了布尔什维克，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就使得全世界历史改变了方向。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97页

十月革命给世界人民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十月革命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这条革命战线是在列宁，而在列宁死后是在斯大林的英明的指导之下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

《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57页

十月革命的光芒照耀着我们。苦难的中国人民必须求得解放，并且他们坚信是能够求得解放的。一向孤立的中国革命斗争，自从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就不再感觉孤立了。我们有全世界的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援助。

《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59页

关于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人类第一个最伟大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德、意、日帝国主义是第二个最伟大的胜利，中国革命是第三个最伟大的胜利。历史的次序也是如此排列的。不能设想，没有十月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的胜利而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61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0页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0—1471页

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以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就进入政治斗争，经过曲折的道路，走了二十八年，方才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2页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

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14页

四十年前，苏联人民在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作为新世界的开路先锋，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

《欢迎、欢送伏罗希洛夫的四次讲话》（一九五七年四月、五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27页

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它附带地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十月革命一开始，就宣布了土地国有令，但是完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在革命胜利以后还用了一段时间。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3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世界的面貌全变了，反法西斯的同盟国中有社会主义国家，有资本主义国家，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都参加了这个反法西斯战争，这是一个正义的战争。

《英勇斗争的二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七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0页

如果说，十月革命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那末，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就是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的意义估计不足，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57—1358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和许多国家得到了解放。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两种结果：第一，产生了像中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由共产党管事的国家；第二，像在印尼、印度、缅甸这样的许多亚非国家中，民族主义者所领导的运动使这些国家成为独立自主或者接近独立自主的国家。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埃及有了很大的改变，许多近东和中东国家也是如此。虽然美国强了起来，但是西方国家的阵营总的说是削弱了。

《同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谈话》（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11页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而有些革命的人们也往往在一个期间内被这种外强中干的现象所迷惑，看不出敌人快要消灭，自己快要胜利的实质。整个法西斯势力的兴起及其进行了几年的侵略战争，正是这种最后挣扎的表现；而在战争中，又以攻击斯大林格勒表现它自己的最后挣扎。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面前，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内的人们也有许多被法西斯的凶恶面孔所迷

惑，看不出它的实质。自从八月二十三日德军全部渡过顿河河曲，全面地开始攻击斯大林格勒，九月十五日德军一部打入该城西北部工业区，至十月九日苏联情报局宣布红军突破该区德军包围线为止，共计进行了四十八天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空前苦战。这一战终于胜利了。在这四十八天中，这个城市每天的胜负消息，紧系着无数千万、万万人民的呼吸，使他们忧愁，使他们欢乐。这一战，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在这四十八天中，世界人民的注视斯大林格勒，和去年十月间世界人民的注视莫斯科，其关心程度，是有过之无不及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84—885页

四十八天中，红军的保卫斯大林城，和去年保卫莫斯科市有某种相同。这就是说，它使得希特勒今年的计划也像他的去年计划一样，归于失败。其不同点，则在莫斯科保卫战之后，虽然接着举行了冬季反攻，可是还要遭到今年德军的一个夏季进攻，这是因为一则德国及其欧洲伙伴尚有余勇可贾，二则英美拖延开辟第二条战线的缘故。而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之后，则形势将和去年完全两样。一方面苏联将举行极大规模的第二个冬季反攻，英美对第二条战线的开辟将无可拖延（虽然具体时间仍不能计算），欧洲人民也将准备着起义响应。另一方面，德国及其欧洲伙伴再也无力举行大规模的攻势了，希特勒只好把整个方针转入战略防御。只要迫使希特勒转入了战略防御，法西斯的命运就算完结了。因为像希特勒这样法西斯国家的政治生命和军事生命，从它出生的一天起，就是建立在进攻上面的，

进攻一完结，它的生命也就完结了。斯大林格勒一战将停止法西斯的进攻，这一战是带着决定性的。这种决定性，是关系于整个世界战争的。

希特勒面前遇着的，是三个强大敌人：苏联、英美及在其占领区的老百姓。在东线，是屹立不动的红军壁垒和整个第二冬季以及连续下去的红军反攻，这是整个战争和人类命运的决定的力量。在西线，即使英美还采取着观望和拖延的政策，但等到有死老虎可打的时候，第二条战线总是要建立的。希特勒还有一个内部战线，就是德国、法国及欧洲其他部分正在酝酿着的一个伟大的人民起义，只待苏联举行全面反攻和第二条战线炮响，他们将以第三条战线出来响应。这样，三条战线夹击希特勒，就将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的伟大历史过程。

拿破仑的政治生命，终结于滑铁卢，而其决定点，则是在莫斯科的失败。希特勒今天正是走的拿破仑道路，斯大林格勒一役，是他的灭亡的决定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87—888页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苏联红军从斯大林格勒开始进攻，扭转了世界的历史，随后又有英、美在北非与太平洋的进攻，把联合国的防御与退却形势，转变到了进攻形势，苏联红军的伟绩，起了决定作用。

《纪念联合国日，保卫西安与西北！》（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72页

四十年前的十月革命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怎么现在又有转折点呢？还是有的。打希特勒，在一个时期，有一二年

时间，希特勒占了上风。那时，希特勒不但占领大半个欧洲，而且打进苏联，苏联让出了一大块土地，可见希特勒一时占了上风。斯大林格勒一战成为转折点，从此希特勒就走下坡路，苏联就势如破竹一直打到柏林。这不是一个转折点吗？据我看来，斯大林格勒一仗，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21—322页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战场的开辟

第二战场的开辟，其影响不仅在欧洲，而且将及于太平洋与中国。中国要前进，世界要前进，我们必须取得最后胜利。

第二战场的开辟，是经过长期发展的结果，是经过莫斯科、德黑兰会议发展而来的，在这些会议上决定了从东、西、南三面打击敌人。第二战场现在是实现了，三面打击希特勒的计划是实现了，……

全中国所有抗战的人们，应该集中目标，努力工作，配合欧洲的决战，打倒日本军阀。现在时机是很好的。

《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讲话》（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67页

第二战场的开辟是同盟国战争合作的发展，其总的性质，现在与过去比较，是没有变化的。但是第二战场开辟有与斯大林格勒反攻某种相同的意义。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以前，是法西斯凶焰高涨，反法西斯力量被打与退却的时期，赖有苏联的进攻结束了过去的阶段，开辟了新的阶段。接着，北非与太平洋相继有了进攻。这是同盟国从防御到进攻的一个大转变。第二战

场开辟，在进攻中又前进了一大步，如果没有它，就不能打倒希特勒。现在欧洲已进到了决战阶段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个新阶段，特别在军事方面。我已说过，第二战场开辟的影响会是很广泛的，直接影响欧洲，将来亦会影响到太平洋与中国。但就目前来说，对中国的影响似乎不会很大，你们可以看见，外面情况虽然甚好，但是中国的问题还要靠中国人自己努力，单有国外情况的好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讲话》（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68—169页

共产国际及其解散

共产国际的解散，正如外国通讯社所报道的，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从四天以来全世界各国，不论是反法西斯阵营中的还是法西斯侵略者阵营中的，不论何党何派，对此问题都加以极度注意，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共产国际为什么要解散呢？难道它不是为全世界工人阶级谋解放和为反法西斯战争尽力的吗？

是的，它是这样的。共产国际是列宁手创的。在它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在帮助各国建立真正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上，在组织反法西斯斗争的伟大事业上，有其极巨大的功劳。共产国际在中国人民中的影响，是很大的。其原因就在于，中国虽然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却在二十二年中连续不断地进行了三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这就是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而共产国际对于这三次革命运动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在北伐战争前夜，共产国际帮助了孙中山先生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促使国民党在一九二四年实行改组，并缔结了国共两党的

合作。当时蒋介石先生曾衔中山先生之命到过莫斯科，国民党的代表还曾列席过共产国际的会议。这些就足以证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和在中国人民中的影响是何等巨大，再不必说对以后的土地革命战争和近年的抗日战争的援助了。

《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9—20页

既然共产国际对中国以及各国有很大的功劳，那末，为什么又要宣布解散呢？按照马列主义的原则，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如果组织形式已经与斗争的需要不相适合时，则应取消这个组织形式。现在，共产国际这个革命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斗争的需要了，如果还继续保存这个组织形式，便反而会妨碍各国革命斗争的发展。现在需要的是加强各国民族共产党，而无须这个国际的领导中心的必要了。其所以如此，主要的是由于以下三个理由：第一，因为各国内部以及各国之间的情况，都比过去更为复杂，其变化也更为迅速，统一的国际组织已无法适应这种非常复杂而且变化迅速的情况。正确的领导需要从仔细研究本国情况出发，这就更加要由各国共产党自己来做。远离各国实际斗争的共产国际，在过去情况比较单纯，变化比较还不很迅速的时候是适合的，现在就不适合了。第二，法西斯强盗在法西斯阵营和反法西斯阵营各民族之间划分了深刻的鸿沟，反法西斯国家中有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殖民地的、半殖民地的各种类型的国家，法西斯国家及其附庸国中也有很大的差别，此外还有各种情况的中立国。为了迅速地 and 有效地组织一切国家的反法西斯斗争，国际性的集中组织早已感到不大适宜，这种情况至近来乃特别显著。第三，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在政治上已经

成熟。以中国共产党为例可以说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经过三次革命运动，这些革命运动是连续不断的，是非常复杂的，甚至比俄国革命还更复杂。在这些革命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自己的身经百炼的优秀干部。自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共产国际即没有干涉过中国共产党的内部问题，而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

《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0—21页

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为了削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应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

《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2页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总的来说是功大过小，犹如玉皇大帝经常下雨，偶尔不下雨还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不能有今天的。他们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他们。

《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3页

过去共产国际对中国无产阶级、中国人民有很大的帮助，帮助中国无产阶级创造了中国共产党，有过很大的功劳，共产国际解散时我们党的决定上说到了这一点。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18页

我们党有这样一段历史。在北伐战争时期，我们党是比较活泼的，五万多党员，生气勃勃，但是由于后一个时期陈独秀的右倾路线错误，革命失败了。后来我们就搞武装斗争，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这个时期，党内出现过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一连搞了七八年。当然，这中间也有正确的时候，例如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后有一个短时期，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有一个短时期，六届三中全会以后有一个短时期。三中全会也有缺点。这三次“左”倾路线都跟共产国际有关系，特别是王明路线。第一次“左”倾路线同共产国际的关系不是很大；第二次“左”倾路线从共产国际学了一些东西，但那个总的路线算是中国自己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就不同了，连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案都是俄国人给写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的统治长达四年之久，造成的损失最大，革命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50—51页

过去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它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了百分之九十，把白区几乎搞垮了百分之百。少奇同志在八大的报告中也谈到这一点。为什么不公开说明这就是斯大林的路线呢？这也有原因。苏联可以公开批评斯大林，我们公开批评就不那么好。我们应该和苏联搞好关系。也许过一些时候可能公开提出。世界上的事总是这样，事实就是事实。那时第三国际做了许多错事。第三国际前后两段还好，中间有一大段不好：列宁在世的时候好，后来季米特洛夫负责的时候也较好。中国第一次王明路线搞了四年，对中国革命的损失最大。

《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20页

共产国际解散后我们比较自由些。

《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21页

苏共二十大和批判斯大林问题

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整个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三十九年的时间,许多革命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是还有缺点和错误。如同一个成绩出现了接着又创造新的成绩一样,一个缺点或错误克服了,新的缺点或错误又可能产生,又有待于我们去克服。而成绩总是多于缺点,正确的地方总是多于错误的地方,缺点和错误总是要被克服的。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列宁说:“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执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

级，以至于群众。”苏联共产党遵循列宁的遗教，现在正在认真地对待斯大林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犯的某些性质严重的错误及其所遗留的后果。由于其后果的严重性，所以苏联共产党有必要在肯定斯大林的伟大功绩的同时，又尖锐地揭露斯大林所犯的错误的实质，号召全党以此为戒，坚决地消除这种错误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深信，经过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这一次尖锐的批判之后，过去被某些错误政策所严重地压抑了的一切积极因素，必将普遍地活跃起来，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将比较过去更好地团结一致，为了建设一个人类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和争取全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奋斗。

《共产党人对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21页

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

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去年这一年，国际上闹了几次大风潮。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大反斯大林，这以后，帝国主义搞了两次反共大风潮，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两次大的辩论风潮。在这几次风潮中，欧洲美洲有些党受的影响和损失相当大，东方各国的党受的影响和损失比较小。苏共“二十大”一来，有些从前拥护斯大林非常积极的人，这时候也反得很积极。我看这些人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问题不作分析，也缺乏革命道德。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你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这个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一百八十度，好像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斯大林问题牵涉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国党都牵涉到了。

对苏共“二十大”，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太过了。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正常的反映。但是，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它们“鼻子”很灵，懂得气象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后头帝国主义几棍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几棍子，连赫鲁晓夫的腔调都不得不有所改变，他们又摇过来了。大势所趋，不摇过来不行。墙上一菟草，风吹两边倒。摇过来不是本心，摇过去才是本心。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

一九五六年，斯大林受到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他们不挂斯大林的像，我们挂。一九五〇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订立了中苏友好同

盟互助条约。对中长路、合股公司、国境问题，我的态度是：第一，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第二，如果你一定要坚持，我可以接受，但保留意见。这是因为要顾全整个社会主义的利益。还有两处势力范围，东北和新疆，不准第三国的人住在那里，现在取消了。批判斯大林，使那些迷信他的人清醒了一些。要使我们的同志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样迷信。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
第370页

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他们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苏共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其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至今不敢拿出来同苏联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见面，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报告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报告，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报告。

《对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六三年九月），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373页

苏伊士运河事件

埃及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全中国人民都支持埃及，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全世界人民都支持埃及。全世界最少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支持埃及，只有一小部分国家反对埃及，另外有一部分国家采取中立。

据我看，美国也同意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它不会帮助英国从埃及手里把运河夺回去，这样对美国也没有好处。美国另外有它的目的。对美国说来，运河在英、法手里和在埃及手里没有什么区别。它本来就不期望实现“杜勒斯计划”。美国是想借这机会把英、法从中东赶出去，以便建立它自己的势力。苏联、阿拉伯国家、印度和科伦坡国家都支持埃及，有苏联在，英国、美国、法国就不敢轻易行动。这次埃及巧妙地利用了帝国主义国家间、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间、帝国主义国家和民族独立国家间的矛盾。你们还要利用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是不统一的。

《中国人民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七日），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247—248 页

在中东，出了一个苏伊士运河事件。一个人，叫纳赛尔，把运河收归国有了；另外一个人，叫艾登，出一支兵去打；接着，第三个人，叫艾森豪威尔，要赶走英国人，把这个地方霸起来。英国资产阶级历来老奸巨猾，是最善于在适当的时候作出妥协的一个阶级。现在它把中东搞到美国人手里去了。这个错误可大啦！这样的错误，在它历史上数得出多少呀？这一回为什么冲昏头脑犯这个错误呢？因为美国压得太凶，它沉不住气，想把中东夺回去，阻止美国。英国的矛头主要是对埃及的吗？不是。英国的文章是对付美国的，美国是对付英国的。

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当前世界斗争的重点。当然，帝国主义国家跟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是很厉害的矛盾，但是，他们现在是假借反共产主义之名来争地盘。争什么地盘呢？争亚洲非洲十亿人口的地盘。目前他们的争夺集中在中东这个具有重大

战略意义的地区，特别是埃及苏伊士运河地区。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87—188页

匈牙利事件

匈牙利事件是出了好，还是不出好呢？既然有问题就不能不出，出了反而好，有脓包总要出脓。匈牙利事件主要是因为本国的工作没有做好，一概硬套苏联的办法，没有照顾到本国的具体情况。因此得出一条教训，我们要根据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来办事。

《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78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共产党，东欧一些国家的党，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党与群众的联系，这些他们都不讲了，空气不浓厚了。结果出了个匈牙利事件。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匈牙利事件不是好事，这是大家清楚的。但是它也有二重性。由于匈牙利的同志们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间处理得正确，结果匈牙利事件由坏事转变成了一件好事。匈牙利现在比过去巩固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也都得了教训。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8页

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

苏联发射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人类进一步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从此开始了。

《在莫斯科机场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13页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苏联的两颗人造卫星上了天，这两件事标志了两大阵营力量对比的新的转折点。

《在莫斯科大学会见中国留学生时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49页

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及会议宣言

我们这回十二国是不是开谈判？六十几个党是不是开谈判？实际上是在开谈判。也就是说，在不损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下，接受人家一些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自己一些可以放弃的意见。这样我们就有两只手，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做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

《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32页

六十八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庆祝，这是一个有伟大意义的事件，它表现

了社会主义国家以苏联为首的团结一致，表现了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结一致。社会主义阵营必须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也必须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共产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苏联的两颗人造卫星上了天，这两件事标志了两大阵营力量对比的新的转折点。十月革命产生了新世界，经过四十年，新世界的力量已经超过了旧世界。现在全世界有二十七亿人口，社会主义各国的人口将近十亿，独立的旧殖民地国家的人口有七亿多，正在争取独立或者争取完全独立的国家的人口有六亿，帝国主义阵营的人口不过四亿左右，而且他们的内部是分裂的。现在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

《在莫斯科大学会见中国留学生时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49页

六十几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开会是从从来没有过的事，从来也没有这样大的规模。

《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22页

我非常高兴，非常庆幸我们的会议开得很团结。这次大会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的上升的朝气、东风压倒西风这么一种形势。我们有很多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是年年见成效的。于是乎反映在我们六十几国共产党大会上一股朝气，并且一致承认要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就是苏共中央。

《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29页

现在很好，在莫斯科开了一次会，很多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决定了一个根本的纲领。刚才讲的，纲领上也有：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要与各国情况相结合；国际主义同爱国主义是统一的。过去一个很长时期没有这样的纲领，现在有了这个纲领，它已经成为全世界各国共产党所接受的纲领。

《要学习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一九五八年四月二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14页

“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个提法好。一八四八年有一个《共产党宣言》，在一百一十年以后，又有一个“共产党宣言”，这就是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的莫斯科宣言。在这个宣言中，就讲到了普遍规律和具体特点相结合的问题。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6页

古巴革命

古巴革命是在美国身边放炸弹。不能把它看作只是古巴的事件或只是拉丁美洲的事件，这也是世界性的事件。

《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一九五九年三月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0页

请你们看一看古巴。古巴在什么地方？离美国很近，飞机航行距离只要半小时。古巴人民原来是手无寸铁的，古巴的统治者巴蒂斯塔在几年中杀死古巴人两万之多。你们也可能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多。古巴可不是大国，只有六百多万人口，离美国那么近，巴蒂斯塔又杀死过两万人。但是，一九五六年十

一月，古巴的民族英雄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八十二人，从墨西哥坐了一只船，到古巴登陆。同政府军作战打了败仗，八十二人只剩下十二个人，其中有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他们只好转入山区，开始游击战争，打了两年多，抢了许多枪炮，还抢了坦克，巴蒂斯塔只好跑了。你们看，古巴人民原来是手无寸铁，而巴蒂斯塔政权是武装到牙齿的，美国那么大的国家支持它，又离得那么近，但是人民团结起来就把巴蒂斯塔赶跑了。你们有没有人到古巴去过？如果没有人去过，我建议你们到古巴走一趟。这么个小国敢于在美国身旁搞革命，所以研究古巴的经验很有必要，古巴的革命有世界意义。

《帝国主义是不可怕的》（一九六〇年五月七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72页

古巴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和反对巴蒂斯塔集团、买办资本、封建主义的斗争。今后它走哪个方向还得看。它反帝、反封建是肯定的、坚决的。

《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各不相同》（一九六二年一月三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88页

对被压迫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是支持的。对古巴、阿尔及利亚的革命战争，我们是支持的……这些革命是他们自己搞起来的。比如古巴，不是我们叫卡斯特罗起来革命，是他自己起来革命的。你们相信吗？是美国叫他革命的，是美国走狗叫他革命的。

《支持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78页

反对新的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

新的日美“安全条约”是为了压迫日本广大人民，是以中苏为敌、以亚洲人民为敌的侵略性的军事同盟条约，它对亚洲和世界和平是严重的威胁，同时也必将把严重的灾难带来给日本人民。中日两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当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

《坚决支持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的斗争》（一九六〇年五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79页

去年日本社会党领袖浅沼稻次郎访华时在北京发表演讲，说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当时一部分人认为这种说法太过火。现在日本人民的斗争，大大超过了去年的这种说法，斗争的范围和规模之大，是去年所没有想到的。这次斗争是从反对“安全条约”爆发的，其基本性质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它在日本的代理人岸信介，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因为条约是日美反动派在众议院强行通过的。就是说日本革命的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工人罢工不是提经济口号，而是提的政治口号，这在世界上是少见的。并且，有高级知识分子参加斗争，如东京大学校长茅诚司在“六一五”惨案发生的第二天，就召开了全校抗议大会，率领大家上街示威游行。牺牲者是东京大学学生，叫桦美智子，现在全世界闻名。她父亲叫桦俊雄，是中央大学教授，专攻法律。好像有好几千名教授都组织起来了，妇女也赶上去了，还有和尚等宗教界人士也出来了，工人、学生是主力。明天还要有更大规模的罢工。

《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00—201页

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

目前，越南人民正在抗击着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英勇地进行着抗美救国的伟大斗争。这场斗争，不仅是为了保卫越南的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同时也是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共同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越南人民坚强地屹立在反美斗争的最前线，狠狠地打击、削弱和牵制着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力量和战争力量，从而也就有力地支持了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保卫和平的革命斗争。

现在，在越南战场上，英勇善战的越南人民越战越强；美帝国主义不断遭到失败。美帝国主义的纸老虎面目已经被英雄的越南人民进一步戳穿。越南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衷心赞扬和钦佩。全世界人民都站在越南人民一边，同情和支持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坚信英雄的越南人民必能击败帝国主义的侵略，取得最后的胜利。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的电报》（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448页

英雄的越南人民在以胡志明主席为首的越南劳动党的英明领导下，在抗美救国战争中，消灭了美国侵略者大量有生力量，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胜利。越南人民的英勇斗争大灭了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威风，大长了世界革命人民的志气。中国人民热烈地祝贺兄弟的越南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美帝国主义在越南遭到惨败，就是因为他们所进行的是一场赤裸裸的侵略战争；他们所面临的是越南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人民战争。越南人民坚强不屈、英勇奋战，极大地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使美国侵略者陷入灭顶之灾，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个国家单独抗击和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光辉典范。越南人民的胜利向全世界证明，美帝国主义这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是完全能够被打败的。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二周年的电报》（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407—408页

八年来，英雄的越南南方人民发扬了英勇顽强、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人民战争，消灭了美伪军和仆从军大量有生力量，把美国侵略者打得焦头烂额，走投无路。越南南方人民在抗美救国战争中取得的伟大胜利，为最后击败美帝国主义，实现解放南方、保卫北方、进而统一祖国的伟大目标，打下了基础，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作出了贡献。

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实践又一次证明：美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它的力量是有限的，在人民战争面前，是经不起打的，是完全可以打败的。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八周年的电报》（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612页

英雄的越南人民为了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高举胡志明主席“决战决胜”的旗帜，同美帝国主义进行了十余年浴血战斗，终于促使美国政府签订越南停战和平协定，同意限期撤出美国及其盟国的全部武装力量，并且确认越南人民的基本民

族权利和越南南方人民的自决权，从而为越南人民在没有外来武力干涉的情况下解决自己的问题创造了条件，为实现越南的和平、独立、统一、民主和繁荣开辟了前景。

巴黎协定的签订，是越南人民在军事、政治和外交战线上长期斗争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是越南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团结战斗的伟大胜利，也是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的共同胜利。

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的胜利就像自己的胜利一样，感到由衷的高兴。你们在长期抗战中表现出来的顽强革命精神和大无畏英雄气概，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钦佩和赞扬。你们的光辉榜样，证明了小国能够战胜大国，弱国能够战胜强国，有力地鼓舞着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反帝革命斗争。你们的英勇斗争和伟大胜利，将作为当代民族解放战争的光辉典范而载入史册。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问题巴黎协定正式签订的电报》（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九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342页

越南南方军民经过长期的英勇奋战，彻底摧毁了南越傀儡政权，终于解放了西贡。这是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人民坚持长期革命武装斗争的伟大胜利。……

英雄的越南人民，为了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高举胡志明主席“决战决胜”的光辉旗帜，不屈不挠，前赴后继，进行了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先后打败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特种战争”、“局部战争”和“越南化”战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巴黎协定签订之后，越南人民在新的形势下，对于西贡傀儡集团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破坏巴黎协定、拒

绝实现民族和睦、疯狂屠杀人民的罪行，进行了坚决的自卫反击战，终于以革命战争打败了反革命战争，取得了完全解放越南南方的辉煌胜利。你们的胜利，开创了越南解放新的时代，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你们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一切斗争中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为全世界人民的反帝革命事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越南人民的胜利，再次有力地证明，一个国家的人民，哪怕是一个小国的人民，在维护祖国独立、自由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事业中，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不怕挫折，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够打败任何貌似强大的敌人，取得斗争的最终胜利。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南方军民彻底摧毁南越傀儡政权解放西贡的电报》（一九七五年四月三十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29—430页

二、人 物

纣王

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完全错误的。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只是损失太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以致亡了国。说什么“血流漂杵”，纣王残暴极了，这是《书经》中夸张的说法。所以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39页

纣王是很有本领的人，后来吴王把他说得很坏。他的俘虏政策做的不大好，所以以后失败了。我们俘虏政策和他的不一样，我们对俘虏是宽大，是进行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工作的。

路经济南时在火车上召开的座谈会上的谈话（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为什么纣王灭了？主要是比干反对他，还有箕子反对他，微子反对他。纣王去打徐夷（那是个大国，就是现在的徐州附近），打了好几年，把那个国家灭掉了。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他这个国家为什么分裂？就是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反对派。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武王头一次到孟津观兵回去了，然后又搞了两年，他说可以打了，因为有内应了。纣王把比干

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微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通外国。给纣王翻案的就讲这个道理。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纣王自杀了，他不投降。

《同吴芝圃等人的谈话》（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党的文献》
1995年第4期

孔子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伯达的指出是对的；但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理论就没有正确实践”的意思差不多。如果孔子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然而事实上不是如此，所以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此点似宜在文中指出，以免读者误认“名不正言不顺”而“事”也可“成”。“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则是实为主，分别就在这里。又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

《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日、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60—161页

依照现在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日、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62页

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例如“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了（现在我们说的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还有仁义对举，“义者事之宜”，可说是“知”的范畴内事，而“仁”不过是实践时的态度之一，却放在“义”之上，

成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

《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日、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62—163页

孔子在认识论上与社会论上的基本的形而上学之外，有它的辩证法的许多因素，例如孔子对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等等关系的说明。

《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日、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63页

自古以来真正有学问的人，不是从学堂里学来的。孔夫子的孔夫子主义，不是一下子从学堂里学到的。他的老师叫做项橐，这是有书为证的，“昔仲尼，师项橐”，在《三字经》里记载着。但是他的主义不是全部从项橐那儿学到的，他是在当先生的时候，在鲁国做官的时候，才有他的孔夫子主义的。

《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83页

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关于人的基本特性及其他》（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84页

关于孔夫子的缺点，我认为就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吾自得了子路而恶声不入于耳”，“三盈三虚”，“三月而诛少正卯”，很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期间的谈话（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六日——十八日）

郭沫若曾经用很多材料证明，孔夫子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是革命党，到处参加造反。说孔夫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是孟子讲的。其实当时孔夫子周游列国，就是哪里造反他就到哪里去，哪里想革命他就到哪里去。所以此人不可一笔抹煞，不能简单地就是“打倒孔家店”。

《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45页

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件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学生樊迟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话，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做“小人”。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54页

孔子是教育家，也是音乐家，他把音乐列为六门课程中的第二门。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1页

我们共产党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但说是圣人，我们也是不承认的。

在武昌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

孔夫子出身贫穷，放过羊，当过吹鼓手，还做过会计。会

弹琴、射箭、驾车子，还搞历史书。他学会了“六艺”。孔子的教育只有六门课程：礼、乐、射、御、书、数，教出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四大贤人。

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二月三日）

我们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是孔子、老子等。

同威尔科克斯夫妇的谈话（一九六四年二月九日）

孔门充满矛盾论。

《在一九六五年〈哲学研究〉第四期上的批语》（一九六五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496页

墨子

题目

似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学”较好。

《关于〈墨子哲学思想〉一文给陈伯达的信》（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56页

中庸问题

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这里有几点意见：（1）是在作两条战线斗争，用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来规定相对的质。（2）儒墨两家话说得不同，意思是一样，墨家没有特别发展的地方。（3）“正”是质的观念，与儒家之“中”（不偏之

谓中)同。“权”不是质的观念，是规定此质区别异质的方法，与儒家“执两用中”之“执”同。“欲”之“正”是“利”，使与害区别。“恶”之“正”是“害”，使与利区别而不相混。“权者两而无偏”，应解作规定事物一定的质不使向左右偏（不使向异质偏），但这句话并不及“过犹不及”之明白恰当，不必说它“是过犹不及之发展”。(4)至于说“两而无偏，恰是墨子看到一个质之含有不同的两方面，不向任何一方面偏向，这才是正，才真正合乎那个质”，则甚不妥，这把墨家说成折衷论了。一个质有两方面，但在一个过程中的质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必须要有所偏，必须偏于这方面，所谓一定的质，或一个质，就是指的这方面，这就是质，否则否定了质。所以墨说“无偏”是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不是不要向一个质的两方面之一方面偏（其实这不是偏，恰是正），如果墨家是唯物辩证论的话，便应作如此解。

《关于〈墨子哲学思想〉一文给陈伯达的信》（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57—158页

历史上只有禹王，他是做官的，他也耕田，手上也起了泡，叫做胼胝；还有一个墨子，也是一个劳动者，他不是官，而他是比孔子更高明的圣人。

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屈原

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

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六）》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党的文献》1994年第
5期

屈原是中国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在一千五百年前写了许多爱国的诗，政府对他不满，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没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就把他死的一天作为节日，这一天就是旧历五月五日端午节。在这一天，人民吃粽子。粽子是把糯米用一种叶子包起来制成食品。人民把这种食品投在河里喂鱼，使鱼吃饱了不伤害屈原。

同尼赫鲁的谈话（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孟轲、韩非、叔孙通

孟轲、韩非、叔孙通辈，都是纵横家。

《读〈智囊〉批语》，《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65页

秦始皇

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末，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
2版第2卷第624页

一股风一来，本来是基本上好的一件事，可以说成不好的；本来是基本上一个人好的人，可以说他是坏人。比如我们对于秦

始皇，他的名誉也是又好又不好。搞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没有人讲他好的，自从资本主义兴起来，秦始皇又有名誉了。但是，共产主义者不是每个人都说秦始皇有点什么好处，不是每个人都估计得那么恰当。这个人大概缺点甚多，有三个指头。主要骂他的一条是焚书坑儒。一个古人，几千年评价不下来，当作教训谈谈这个问题，同志们可以想一想。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二月三日）

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

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的谈话（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秦始皇是好皇帝。

同各中央局书记的谈话（一九六四年八月三十日）

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

同埃及副总统沙菲的谈话（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刘邦

汉高祖是流氓，也是无产阶级推倒贵族阶级的革命，不过

在农业社会里，他们革命成功后，又做起皇帝，自己又变成贵族阶级了。

《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5页

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六)》(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酈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酈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酈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酈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酈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酈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5页

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

《读〈史记〉批语》（卷八《高祖本纪》），《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21页

项羽

楚霸王项羽在中国是一个有名的英雄，他在没有办法的时候自杀，这比汪精卫、张国焘好得多。但项羽尚有一个缺点，从前有一个人在他自杀的地方做了一首诗，问他你为什么要自杀，可以到江东去再召八千兵来打天下。我们不学汪精卫、张国焘，要学项羽的英雄气节，但不自杀，要干到底。

在抗大的讲话（一九三九年四月八日）

曹操

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操）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

《致李敏、李讷》（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文艺论集》第306页

历史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营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

同人民日报社负责同志等的谈话（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

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

《要政治家办报》（一九五九年六月），《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15页

李世民（唐太宗）

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

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读〈智囊〉批语》，《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65—66页

李隆基（唐明皇）

唐明皇不会做皇帝，前半辈会做，后半辈不会做。他是懂艺术的，……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1页

王勃

是去交趾（安南）路上作的，地在淮南，或是寿州，或是江都。时在上元二年，勃年应有二十三了。他到南昌作《滕王阁诗序》说，“等终军之弱冠”。弱冠，据《曲礼》，是二十岁。勃死于去交趾路上的海中，《旧唐书》说年二十八，《新唐书》说二十九，在淮南、南昌作序时，应是二十四、五、六。《王子安集》百分之九十的诗文，都是在北方——绛州、长安、四川之梓州一带、河南之魏州作的。在南方作的只有少数几首，淮南、南昌、广州三地而已。广州较多，亦只数首。交趾一首也无，可见他并未到达交趾就翻船死在海里了。有人根据《唐摭言》、

《太平广记》二书断定：在南昌作序时年十三岁，或十四岁。据他做过沛王李贤的幕僚，官“修撰”，被高宗李治勒令驱逐，因为他为诸王斗鸡写了一篇檄英王鸡的文章。在虢州时，因犯法，被判死，遇赦得免。这个人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反映当时封建盛世的社会动态，很可以读。这个人一生倒霉，到处受惩，在虢州几乎死掉一条命。所以他的为文，光昌流丽之外，还有牢愁满腹一方。杜甫说，“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是说得对的。为文尚骈，但是唐初王勃等人独创的新骈、活骈，同六朝的旧骈、死骈，相差十万八千里。他是七世纪的人物，千余年来，多数文人都是拥护初唐四杰的，反对的只有少数。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贾谊死时三十几，王弼死时二十四。还有李贺死时二十七，夏完淳死时十七。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

《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批语》，《毛泽东文艺论集》第239—241页

韩愈

韩愈是提倡古文的，其实他那个古文是新古文，道理是没有什么的，只要文章是新的。人家说好的，他说坏，人家说坏的，他说好。

《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56页

在艺术上，周扬同志告诉我说，舞台艺术要为观众留余地，

不要把一切话讲尽了，一切动作做尽了。等这个戏看完之后，人们在那里想一想，发发议论，这是成功的戏。我看不仅是戏剧，文学也是这样，写小说也是这样，做诗也是这样。韩愈做诗，他就是统统把话讲完了。人们批评他的缺点，就是他的文章同诗都是讲完了，讲尽了，不能割爱。特别是他那首《南山诗》，搞那么多。

在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九年四月五日）

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

《给陈毅的信》（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421—422页

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①，一分为二为宜。

《致刘大杰》（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二日），《毛泽东文艺论集》第338页

①一九七五年八月，复旦大学刘大杰为修改自己的著作《中国文学发展史》给毛泽东写信。他认为，韩愈虽非法家，但也不是醇儒，不能一概否定。

唐玄奘（唐僧）

中国历史上也有翻译工作，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他取经回来后设翻译馆，就翻译佛经。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18页

我们的唐三藏法师，万里长征去取经，比较后代学外国困难得多。

《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三年二月七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64页

岳飞、文天祥

文天祥、岳武穆就是为国家尽忠，为民族行孝的圣人。

在延安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李自成

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

《给李鼎铭的信》（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28页

徐霞客

明朝那个江苏人，写《徐霞客游记》的，那个人没有官气，他跑了那么多路，找出了金沙江是长江的发源。“岷山导江”，这是经书上讲的，他说这是错误的，他说是“金沙江导江”。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林则徐

中国人民不走帝国主义者道路，由来已久，不仅由今日开始，一百多年来，林则徐、洪秀全、孙中山等，都没有跟随着帝国主义，我们要继承这种事业和精神，团结广大的人民，坚

决地反对帝国主义。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洪秀全

我们知道领袖农村无产阶级向清朝贵族及地主阶级作农民革命的洪秀全，乃孙中山先生最初革命思想的渊泉。

《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九二五年冬），《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6页

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69页

曾国藩

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主阶级的领袖。曾国藩是练团练出身，团练即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武力，他们见洪秀全领导一班农民革命，于他们不利，遂出死力来打倒他。

《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5页

梁启超

伯达此文及老墨哲学诸文引了章,梁,胡,冯^①诸人许多话,我不反对引他们的话,但应在适当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说明他们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但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本上区别的,梁基本上是观念论与形而上学,胡是庸俗唯物论与相对主义,也是形而上学,章,冯……(章,冯二家我无研究),等等。若无这一简单的申明,则有使读者根本相信他们的危险。

《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日、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64页

^①指章炳麟、梁启超、胡适、冯友兰。

康有为

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69页

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1页

严复

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69页

孙中山

我们的伟大领袖孙中山先生应乎中国被外力、军阀、买办、地主阶级重重压迫的客观环境，为我们定下了革命的三民主义。我们的伟大领袖虽死，革命的三民主义不死。

《〈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发刊词》（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15页

我们的已故领袖孙中山先生看清楚我们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于是定下了革命的民族主义。又看清楚帝国主义借以剥削中国人民的重要工具，是军阀、大商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又定下了革命的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革命的民族主义叫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革命的民权主义叫我们反抗军阀，使中国人民自立于统治地位。革命的民生主义叫我们反抗大商买办阶级，尤其是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动势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阶级，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

《〈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发刊词》（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15—16页

孙先生的主义、遗教，绝对是为了“救苦”，绝对不是为了“发财”；绝对是使人类从压迫阶级解放出来，绝对不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无论将孙先生的主义、遗教如何曲解，这个意义绝对不能变动。

《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九二五年冬），《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9页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曾经因为孙先生与共产党合作加以坚决执行而取得人民的信仰，成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胜利的革命的旗帜。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59页

孙中山先生曾经下决心改造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因而奠定了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的基础。

《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71页

孙先生的伟大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他的三民主义的纲领，统一战线政策，艰苦奋斗的精神。当我在广东会见孙先生的时候，正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先生手订的三民主义新纲领，已被通过于大会，那就是有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时还开始实行了以国共合作做基础的统一战线政策，这个统一战线，包括对内联合共产党与工人农民，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有名的“三大政策”，即建立于此时。孙先生的三民主义纲领与统一战线政策，实为处在半殖民地国家的大革命家对于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不但如此，孙先生的伟大，还在他的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再接

再厉的革命毅力与革命精神，没有这种毅力，没有这种精神，他的主义与政策是不能实现的。如像刚才读过的《总理遗嘱》开头一句所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在这四十年中间，经过了多少艰难曲折，然而孙先生总是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再接再厉。当着多少追随者在困难与诱惑面前表现了灰心丧志乃至投降变节的时候，孙先生总是坚定的。孙先生是坚持其主义的。在他一生，他的三民主义只有发展而无弃置。孙先生从没有弃置其主义于不顾的时候，他始终坚持了三民主义，并且发展了三民主义，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就表现了三民主义的发展。对统一战线也是一样，孙先生不但坚持了而且发展了统一战线，从为着推翻清朝而联合各个革命派别与会党，发展到为着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而采取联合苏俄、联合共产党与联合工农的新政策。所有这些，同他的不怕艰难挫折、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毅力或革命实践精神相结合，就表现了孙先生的伟大革命家模范。……所以我们纪念孙先生，如果不是奉行故事的话，就一定要注意这样的三项：第一，为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第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而奋斗；第三，发扬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精神。我以为这三项是孙先生留给我们的最中心最本质最伟大的遗产，一切国民党员，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爱国同胞，都应接受这个遗产而发扬光大之。判断一个人究竟是不是孙先生的忠实信徒，就看他对这三项宝贵遗产的态度如何而定。

《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11—113页

从孙中山组织革命的小团体起，他就进行了几次反清的武装起义。到了同盟会时期，更充满了武装起义的事迹，直至辛

亥革命，武装推翻了清朝。中华革命党时期，进行了武装的反袁运动。后来的海军南下，桂林北伐和创设黄埔，都是孙中山的战争事业。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45页

孙中山先生远在五四运动以前，就是当时政府的叛徒，他反对了清朝政府，并且推翻了清朝政府。他做的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很对的。因为他所反对的不是反抗帝国主义的政府，而是勾结帝国主义的政府，不是革命的政府，而是压迫革命的政府。

《青年运动的方向》（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62页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已经五十多年了；至于资本主义外国侵略中国，则差不多有了一百年。……但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才有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孙先生开始的革命，五十年来，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

《青年运动的方向》（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63—564页

这种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

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92—693页

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0页

对孙中山讲得是否太多了?不多。我们要善于引用他,这没有害处,只有好处,列宁也要我们发挥他。他的遗嘱中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这两条是基本策略,他关于民主讲得最好,要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美国共产党现在把华盛顿、林肯都当作自己的旗帜,我们就有孙中山,而且有一段姻缘,曾经和他合作过。……对党内一些人存在不尊重孙中山的情绪,应该说服。

《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74—275页

孙中山这个人有个好处,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找我们。鲍罗廷说的话他都听。那时候叫做“以俄为师”,因为他革命三十九年老是失败。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3页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订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黄埔军校，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因而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扫荡了广东的反动势力，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举行了胜利的北伐战争，占领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打败了北洋军阀政府，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斗争。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1035页

孙中山是中国最早的革命民主派，他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乡村农民，实行武装革命，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是可惜，在他掌握政权的时候并没有主动地实行过土地制度的改革。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1075页

孙中山这位先生，要把他讲完全。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讲历史辩证法的。孙中山的确做过些好事，说过些好话，我在报告里尽量把这些好东西抓出来了。这是我们应该抓住死也不放的，就是我们死了，还要交给我们的儿子、孙子。但是我和孙中山还有区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比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差，新民主主义的确比三民主义更进步，更发展，更完整。现在的新民主主义在将来还会发展得更加完整。我们党内有一种情绪，不喜欢孙中山，这种情绪在相当广大的党员中存在着。认真说，这种情绪是不大健全的，是还没有真正觉悟的表现。这是反映

了内战时期的情绪，那时候，因为环境不同，连孙中山也不要了。那个时期为什么我们不大讲孙中山？因为我们被国民党一下子打倒在地，爬起来也红眼了。蒋介石手里打着孙中山的招牌到处乱杀人，这时候，群众对孙中山也就不喜欢。在十年内战中不要孙中山，这也很难怪，因为我们的力量小得很。在抗战初期，我们的力量也还小，所以那时候我们要孙中山所发生的影响不大，因为人家还看不起我们。将来我们的力量越大，我们就越要孙中山，就越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21—322页

一九一九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1页

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以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就进入政治斗争，经过曲折的道路，走了二十八年，方才取得了基本的胜利。积二十八年的经验，如同孙中山在其临终遗嘱里所说“积四十年之经验”一样，得到了一个相同的结论，即是：深知欲达到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孙中山和我们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观，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去观察和处理问题，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怎样和帝国主义作斗

争的问题上，却和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基本上一致的结论。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2页

孙中山主张“唤起民众”，或“扶助农工”。谁去“唤起”和“扶助”呢？孙中山的意思是说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但这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孙中山的四十年革命是失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在帝国主义时代，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到胜利，原因就在此。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9—1480页

孙先生以大半辈子的光阴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寻找救国真理，结果是失望，转而“以俄为师”，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吗？显然不是。孙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难的中国人民，一齐被“西方的影响”所激怒，下决心“联俄联共”，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奋斗和拼命，当然不是偶然的。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15页

中国人民不走帝国主义者的道路，由来已久，不仅由今日开始，一百多年来，林则徐、洪秀全、孙中山等，都没有跟随过帝国主义，我们要继承这种事业和精神，团结广大的人民，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清朝，早被推翻了。什么人推？孙中山领导的党和人民一

起推。孙中山力量很小，清朝的官员看不起他。他多次起义总是失败。最后，还是孙中山推翻了清朝。大，不可怕。大的要被小的推翻。小的要变大。推翻清朝以后，孙中山失败了。因为他没有满足人民的要求，比如没有满足人民对土地的要求，对反帝的要求。他也不晓得镇压反革命，当时反革命到处跑。后来，他就失败于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之手。袁世凯的力量比孙中山的大。但还是照这个规律：力量小的，同人民联系的，强；力量大的，反人民的，弱。尔后，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同我们共产党合作，把袁世凯留下来的军阀系统打败了。

《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
第7卷第71—72页

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纪念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

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

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

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

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纪念孙中山先生》（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
7卷第156页

孙先生是一个谦虚的人。我听过他多次讲演，感到他有一

种宏伟的气魄。从他注意研究中国历史情况和当前社会情况方面，又从他注意研究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情况方面，知道他是很虚心的。

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纪念孙中山先生》（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57页

我们不崇拜秦始皇、汉武帝，不崇拜唐太宗、宋太祖，也不崇拜孔子。我们只崇拜孙中山，因为他搞辛亥革命有功。

同胡志明的谈话（一九六〇年八月十九日）

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

《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一九六三年九月、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41页

要开一个会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孙中山领导革命的时候并没有共产党嘛，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张推翻满清，也搞武装斗争。保皇党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两个广东人。孙中山也是广东人。所以，不要忘了孙中山。

同越南劳动党代表团的谈话（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

袁世凯

一九一一年，孙中山成立了民主政府，但只存在三个月。后来袁世凯在北京先当总统，后当皇帝，也只当了三年就倒台了。袁世凯做皇帝对中国人民很有教育意义，大家都骂他。袁世凯欺骗人民，表面说要搞共和国，结果弄得民不聊生。

同阿富汗副首相纳伊姆的谈话（一九五九年九月八日）

章炳麟（章太炎）

章太炎所以坐班房，就是因为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驳康有为书》。这篇文章值得一看，其中有两句：“载湉小丑，不辨菽麦”，直接骂了皇帝。这个时候章太炎年纪还不大，大概三十几岁。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三月）

章太炎青年时代写的东西，是比较生动活泼的，充满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精神，以反满为目的。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三月）

宋庆龄

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

《给宋庆龄的信》（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41页

鲁迅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他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的环境里，他忍受着，反抗着，正如陕北公学的同志们能够在这样坏的物质生活里勤谨地学习革命理论一样，是充满了艰苦奋斗的精神的。陕北公学的一切物质设备都不好，但这里有真理，讲自由，是造就革命先锋分子的场所。

鲁迅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的，但他会杀回马枪，朝着他所经历过来的腐败的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的恶势力进攻。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他近年来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与自由而斗争。鲁迅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的远见。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他在一九三六年就大胆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现在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的见解是那樣的准确，那樣的清楚。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我们为了永久纪念他，在延安成立了鲁迅图书馆，在延长开办了鲁迅师范学校，使后来的人们可以想见他的伟大。

鲁迅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的斗争精神。刚才已经提到，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有些不彻底的革命者起初是参加斗争的，后来就“开小差”了。比如德国的考茨基、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就是明显的例子。在中国这等人也不少。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最初大家都是左的，革命的，及到压迫来了，马上有人变节，并把同志拿出去献给敌人作为见面礼。鲁迅痛恨这种人，同这种人做斗争，随时教育着训练着他所领导下的文学青年，教他们坚决斗争，打先锋，开辟自己的路。

鲁迅的第三个特点是他的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痕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他具备坚决的心。他在一篇文章里，主张打落水狗。他说，若果不打落水狗，它一旦跳起来，就要咬你，最低限度也要溅你一身的污泥。所以他主张打到底。他一点没有假慈悲的伪君子的色彩。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这条疯狗，还没有被我们打下水，我们要一直打到它不能翻身，退出中国国境为止。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精神，把它运用到全中国去。

综合上述这几个特点，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鲁迅的一生就贯穿了这种精神。所以，他在文艺上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论鲁迅》（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2—

鲁迅的手与脑均是共产党员的，然而他自始至终不是党员，而是非党布尔什维克。

在陕北公学的讲话（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我们对艺术应持什么观点？在这个问题上，过去中国有过很大的争论。大家可能知道，徐志摩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银针在幽谷中怎样响法，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一个艺术至上主义者。那时像他这样主张的人很多，他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另一方面是鲁迅先生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艺术论者。他们在艺术论上的争论，有长期的历史，现在不能去细说它。

《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21页

对于艺术工作者来说，掌握语言的能力确是非常重要的。我看鲁迅先生便是研究过大众语言的。你们一定要下一番苦工夫去学习和掌握艺术技巧。

《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25页

鲁迅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他却一生都为着老百姓的利益而奋斗，甚至舌敝唇焦，生肺病而死。所以我们非常尊崇鲁迅。

在抗大纪念“七一”“七七”及突击运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三八年七月九日）

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

过农民斗争之故。

《致周扬》(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毛泽东文艺论集》第259页

文化“围剿”怎么样呢?敌人的“碉堡”是建筑在学校里、书报杂志上以及社会文教团体里,也大有“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之势。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鲁迅先生的杂感,就可以知道。他的抨击时弊的战斗的杂文,就是反对文化“围剿”,反对压迫青年思想的。

《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52页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98页

第三个时期是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新的革命时期。……这一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这两种“围剿”,在帝国主义策动之下,曾经动员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反革命力量,其时间延长至十年之久,其残酷是举世未有的,杀戮了几十万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摧残了几百万工人农民。从当事者看来,似乎以为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是一定可以

“剿尽杀绝”的了。但结果却相反，两种“围剿”都惨败了。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这三者都是积极的结果。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吗？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2页

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72页

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77页

那个时候，国民党有两种“围剿”，即军事的“围剿”和文化的“围剿”。军事的“围剿”就是反对红军；文化的“围剿”

就是反对新文化，反对包含着革命思想的文学艺术，也就是反对以鲁迅为首的在白区的革命的文化艺术。

《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24—425页

文艺是一支军队，它的干部是文艺工作者。它还要有一个总司令，如果没有总司令，它的方向就会错的。鲁迅、高尔基就相当于总司令，他们的作品，他们说的话，就当作方向的指导。如果普通的文艺工作者没有高级的指导，他的方向就会会错，他就会长期地停留在低级阶段不能提高。

《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31页

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某一点上有独特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鲁迅对于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都懂，但他不轻视中国的。只在中医和京剧方面他的看法不大正确。中医医死了他的父亲。他对地方戏还是喜欢的。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1页

鲁迅翻译了《死魂灵》、《毁灭》等等，但是他的光彩主要不在这方面，是在创作。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2页

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鲁迅的小说，

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3页

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用了一番功夫研究，又经过自己的实践，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特别是他后期的杂文，很有力量。他的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

《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53—254页

你们赞成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他的杂文写的方面很多，政治、文学、艺术等等都讲，特别是后期，政治讲得最多，只是缺少讲经济的。鲁迅的东西，都是逼出来的。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逼着学的。他是书香门第出身，人家说他是“封建余孽”，说他不行，但鲁迅还是写。

《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3页

有人说，几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杂文，怎么能作分析呢？我说，怎么不能呢？鲁迅不就是这样的吗？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7—278页

学习鲁迅。鲁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读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读者共鸣的。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5页

我是赞成朱自清的风格。朱自清是清华大学一个教授，他的文章写得好，另一个侧面不好，就是不神气。第一个神气的是鲁迅，他的话是口语。鲁迅的杂感，你看那个《阿Q正传》不是口语？“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什么“儿子打老子”之类都是口语。

在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九年四月五日）

鲁迅的战斗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人家说他讲话南腔北调，他就出《南腔北调集》。梁实秋说他背叛了旧社会，投降了无产阶级，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说他的文章用花边框起来，他就出《花边文学》。《申报》的《自由谈》编者受到国民党的压力，发牢骚说，《自由谈》不要谈政治，只准谈风

月，他就出了《准风月谈》。国民党骂他是堕落文人，他的笔名就用隋洛文。他临死时还说，别人死前要忏悔，宽恕自己的敌人，但他对自己的“怨敌”，“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战斗精神和方法。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一）》（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

鲁迅是中国黑暗时代的伟大革命战士、文学战线的领导者。他写的是一首旧体诗，有四句，原诗为：“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这一首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写的，说明他在完全黑暗的统治下看到了光明。

《日本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一九六一年十月七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84页

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

《给江青的信》（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71—72页

何香凝

先生一流人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景仰奋兴者有全国民众，不独泽东等少数人而已。承志在此甚好，大家都觉得他好，望勿挂念。十年不见先生，知比

较老了些，然心则更年青，这是大家觉得的。

《给何香凝的信》（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512页

蒋介石

蒋介石氏在西安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和西北人民的抗日的要求，首先命令进行内战的军队撤离陕甘两省，这是蒋介石氏转变其十年错误政策的开始。这对于指挥内战、制造分裂、并欲在这次事变中置蒋氏于死地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的阴谋，给了一个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的失望，已显而易见。蒋氏此种觉悟的表示，可以看作国民党愿意结束其十年错误政策的一种表示。

《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45页

蒋介石代替孙中山，创造了国民党的全盛的军事时代。他看军队如生命，经历了北伐、内战和抗日三个时期。过去十年的蒋介石是反革命的。为了反革命，他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央军”。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这个基点，他是抓得很紧的。对于这点，我们应向他学习。在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45—546页

蒋介石也是这样，他打日本是好的，压迫人民是不好的，在他还打日本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忍一口气，不提打倒蒋介石。蒋介石搞的是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资本主义。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84页

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大家知道，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果然胜利被等来了，这位“委员长”现在要“下山”了。八年来我们和蒋介石调了一个位置：以前我们在山上，他在水边；抗日时期，我们在敌后，他上了山。现在他要下山了，要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24页

此人历来是不知感恩的。蒋介石是怎样上台的？是靠北伐战争，靠第一次国共合作，靠那时候人民还没有摸清他的底细，还拥护他。他上了台，非但不感谢人民，还把人民一个巴掌打了下去，把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这段历史同志们都是知道的。这一次抗日战争，中国人民又保卫了他。现在抗日战争胜利了，日本要投降了，他绝不感谢人民，相反地，翻一翻一九二七年的老账，还想照样来干。蒋介石说中国过去没有过“内战”，只有过“剿匪”；不管叫做什么吧，总之是要发动反人民的内战，要屠杀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25页

至于蒋介石呢，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现在这块绊脚石却要出来垄断胜利果实，要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仍然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不许有丝毫的改变。这样就发生了斗争。同志们，这是一场很严重的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29页

蒋介石同我们相反，他完全是依靠美国帝国主义的帮助，把美国帝国主义作为靠山。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这一贯是蒋介石方针的基本点。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32页

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人，他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他将中国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因而引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然后，他失魂落魄地拔步便跑，率领一群人，从黑龙江一直退到贵州省。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果然，胜利到来了，他叫人民军队“驻防待命”，他叫敌人汉奸“维持治安”，以便他摇摇摆摆地回南京。只要提到这些，中国人民就知道是蒋介石。蒋介石干了这一切，他是不是人民公敌的问题，是否还有争论呢？争论是有的。人民说：是。人民公敌说：不是。只有这个争论。

《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49页

现在我们对蒋介石的态度和抗战时期有些不同，但不是原则上的不同，在抗战时期我们同他实际上也是斗争多、妥协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虽有一些作用，但其妨害也很大。抗战时期，我们对蒋的政策是，把绳子套在他的脖子上拉他同我们一道走。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凡能对我们进攻之处无不进攻。如果我们不坚决抵抗，没有这个准备，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局面。我们在抗战中的主要

同盟军是农民，其次是民族资产阶级。蒋介石在抗战中有某些作用，但比起丘吉尔在英国反德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就不如。

《对中国革命新高潮的说明》（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22页

蒋介石现在的内战政策，不是偶然的，这是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贯反人民政策的必然结果。早在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就忘恩负义地背叛了国共两党的革命联盟，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从此建立独裁统治，投降帝国主义，打了十年内战，造成日寇侵略。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德报怨，协同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释放蒋介石，希望蒋介石悔过自新，共同抗日。但是蒋介石又一次忘恩负义，对于日寇则消极应战，对于人民则积极镇压，对于共产党则极端仇视。前年（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中国人民又一次宽恕蒋介石，要求蒋介石停止已经发动的内战，实行民主政治，团结各党派和平建国。但是毫无信义的蒋介石，在签订停战协定、通过政协决议、宣布四项诺言以后，随即将其全部推翻。人民方面，虽则再三忍让求全，但是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之下，决心不顾国家民族的死活，向人民作空前的全面的进攻。从去年（一九四六年）一月停战协定宣布到现在，蒋介石先后动员了二百二十多个正规旅和近百万的杂色部队，向中国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手里用血战夺取过来的解放区，实行大举进攻，先后侵占了沈阳、抚顺、本溪、四平、长春、永吉、承德、集宁、张家口、淮阴、菏泽、临沂、延安、烟台等城市和广大的乡村。蒋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实行三光政策，同日本强盗的行为完全一样。去年十一月，蒋介石召集了伪国大，宣布了伪宪法。今年三月，

蒋介石驱逐了共产党的代表。今年七月，蒋介石下了反人民的总动员令。对于全国各地反对内战、反对饥饿、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的人民运动，对于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和公教人员的争生存的斗争，蒋介石的方针就是镇压、逮捕和屠杀。对于国内各少数民族，蒋介石的方针就是实施大汉族主义，摧残镇压，无所不至。在一切蒋介石统治区域，贪污遍地，特务横行，捐税繁重，物价高涨，经济破产，百业萧条，征兵征粮，怨声载道，这样就使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以蒋介石为首的金融寡头，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则集中了巨大的财富。这些财富，都是蒋介石等利用其独裁权力横征暴敛、假公济私而来的。蒋介石为着维持独裁，进行内战，不惜出卖国家权利于外国帝国主义，勾结美国军队留驻青岛等地，从美国招致顾问人员，参加内战的指挥和军队的训练，残杀自己的同胞。内战的飞机、坦克、枪炮、弹药，大批从美国运来。内战的经费，大批从美国借来。蒋介石则以出卖军事基地、出卖空海航权、签订奴役性商约等项比袁世凯卖国行为还要严重多倍的条件，作为酬谢美国帝国主义的礼物。总而言之，蒋介石二十年的统治，就是卖国独裁反人民的统治。到了今天，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都认识了蒋介石的滔天罪恶，盼望本军从速反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36—1237页

孙中山死了，蒋介石起来。在二十二年的长时间内，蒋介石把中国拖到了绝境。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1页

蒋介石背叛孙中山，拿了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专政作为压迫中国平民的工具。这个反革命专政，实行了二十二年，到现在才为我们领导的中国平民所推翻。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8页

有一个蒋介石比较好，是不是？你们觉得有一个好还是没有好？没有蒋介石中国人民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团结起来，也不能武装起来。单是马克思主义是不能把中国人民教育过来的，所以我们除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教员以外，请了另外一个教员，这就是蒋介石。噢！这个人在中国可做了很有益的事情，一直到现在还在尽他的历史责任。他的历史任务现在还没有完结，他还在当教员，他很有益处呀！不拿薪水，美国人发薪水给他，我们一个钱都不花，可是他给我们当教员。

《杜勒斯是世界上最好的反面教员》（一九五八年十月二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55页

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日本人暂时占领了，日本失败后应归还中国。蒋介石失败后跑到台湾，在台湾建立政府。全世界还有许多国家同台湾当局有外交关系。我们反对“两个中国”，蒋介石也反对“两个中国”，我们有一致之处，有共同点。

《不能把台湾问题上的国际问题同国内问题混淆起来》（一九五九年十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90页

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

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

《给江青的信》（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73页

汪精卫

汪精卫，“五四”以前曾慷慨激昂地去杀宣统皇帝的保护人——摄政王。他在那时候是非常英勇的。但是这几天消息不大好，他从河内溜到上海，从上海溜到日本的京城去见日本的天皇，同日本内阁的首相平沼商议事情，讨论“精卫平沼协定”。我们不讲他这个协定里的字有多少，条文有几条，总之，就是“灭亡中国”四个大字。

三十年前的汪精卫，二十年前的康白情、罗家伦、张国焘，他们都很英勇，但是都有一个缺点，就是奋斗比较差，没有“永久奋斗”的精神。

《永久奋斗》（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90页

什么是异党？日本走狗汪精卫的汉奸党是异党，因为它和抗日党派在政治上没有丝毫共同之点，这样的党，就应该限制。……现在汪精卫有三个口号：反蒋、反共、亲日。汪精卫是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敌人。

《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89—590页

在抗日战争中，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以汪精卫为代表，已经叛变，已经变成汉奸。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34页

如果有人还想从今日起，再“剿”十年，那就已经是新的“剿共”典型，同旧的多少有点区别。但是这种新的“剿共”事业，不是已经有人捷足先登、奋勇担负起来了吗？这个人就是汪精卫，他已经是大名鼎鼎的新式反共人物了。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82页

我们共产党人屡次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灭华方针是坚决的。不管日本掉换什么内阁，它的灭亡中国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基本方针是不会变更的。中国亲日派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汪精卫，看了这种情形，吓得发疯，跪倒在日本面前，订立了日汪卖国条约，把中国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他还要成立傀儡政府，和抗日政府相对立；还要成立傀儡军队，和抗日军队相对立。他对于反蒋近来不大提了，据说已经改为“联蒋”。反共是日汪的主要目的。他们知道共产党抗日最彻底，国共合作则力量更大，他们就用全力分裂国共合作，使两党各自孤立，最好是两党打起来。这样，他们就利用国民党内部的顽固派，到处放火。

《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一九四〇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15页

陈独秀

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陈君平日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德谟克拉西”（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他。

《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05页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3页

对陈独秀应该承认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有功劳的，大体上如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

《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3页

五四运动有中国最觉悟的分子参加，当时的觉悟分子有陈

独秀、李大钊。在五四运动中有左翼、右翼，陈独秀、李大钊是代表左翼的。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9—290页

北伐胜利，轰轰烈烈。可是这一时期的末尾一段，我们党搞得不好，出了一个陈独秀主义。后来，陈独秀反对我们，搞成托陈取消派。但是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德苏战争以后，斯大林在一篇演说里把列宁、普列汉诺夫放在一起，《联共党史》也说到他。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4页

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就是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不能领导群众前进，而且反对群众前进。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20页

当时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抛弃了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

《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32页

开头是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组织了“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八十一个人发表声明，分裂我们党，没有搞成，他们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

《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242页

李大钊

五四运动有中国最觉悟的分子参加，当时的觉悟分子有陈独秀、李大钊。在五四运动中有左翼、右翼，陈独秀、李大钊是代表左翼的。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9—290页

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4页

萧楚女

要自学，靠自己学。萧楚女没有上过学校，不但没有上过洋学堂，私塾也没有上过。我是很喜欢他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教书主要靠他。他是武昌茶馆里跑堂的，能写得很漂亮的文章。

《要自学，靠自己学》（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83页

瞿秋白

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

《为〈瞿秋白文集〉题词》（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28页

李立三

在一九三〇年的立三路线时期，李立三同志不懂得中国内战的持久性，因此看不出中国内战发展中“围剿”又“围剿”、打破又打破的这种长期反复的规律（那时已有湘赣边界的三次

“围剿”，福建的两次“围剿”等），因此在红军还幼小的时代就命令红军去打武汉，命令全国举行武装起义，企图使全国革命迅速胜利。这就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95页

立三路线的错误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急性病是在小资产阶级十分广大的社会中的一种必然性，不是个人的偶然现象，而是社会现象。无产阶级的社会存在也是一种必然性，无产阶级思想是革命热情与实际精神相结合。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是用改造与感化的方法，引导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进入社会主义。对小资产阶级不能采用急躁的消灭的方针。

《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93页

李立三在大革命时代也有功劳。

《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3页

内战时期犯“左”倾错误的李立三同志，第一次大革命之前，曾和少奇同志一起在安源做过工人运动，后来五卅运动中在上海也起了很大作用，也有功劳。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4页

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就是李立三。他们当时的主要错误，就是教条主义，硬搬外国的经验。我们党清算了他

们的错误路线，真正找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道路。因此，才有可能在第四个时期，在蒋介石进攻我们的时候，把蒋介石打倒，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33页

一九二八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神气起来了。从一九三〇年六月到九月，他搞了三个多月的立三路线。他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他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到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就倒台了。

《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243页

王明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的结果。这个错误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的遵义会议时纠正过来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85页

如何帮助王明同志改正错误？许多同志都讲了，王明同志的发言很不好。他昨天后半段的发言，比较有些进步。问题是他现在失掉了主动性，是被动的，其原因在于他没有自我批评，不愿意承认错误及其错误的基本点。他的“主动性”还停留在四中全会及十二月会议上，而那些是错误的，已经受到了批判，那是一条完整的错

误路线，“左”的右的都有。在中国产生这样一条错误路线，恐怕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社会现象在党内的反映。

至于王明是否有个人野心，这一点他是不承认的，我认为也没有十分必要一定要他承认。但他承认了个人主义，这就是说不以人民利益为第一，而以个人利益为第一了。其实，个人而成了主义，这也就很可观了。个人野心，他觉得不好承认，实际上内战时期及抗战时期两次错误路线的总司令是他，虽然他并没有总书记、总司令的称号，名称只是什么委员等等，但那是没有关系的。实质是他企图按照他的面貌来改造党，这在内战时期表现为小资产阶级的形态，在抗战时期表现为资产阶级的形态。这种现象，在世界上别的国家也发生过。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上一部分人有这种思想，王明是他们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内战时期的错误路线，讲完全一点是王明、博古路线，简单一点称王明路线也可以。抗战时期的错误路线，总司令就是王明，是他单人独枪担当的。立三路线的总司令是李立三，而不是向忠发，虽然向忠发是总书记。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王明路线在内战时期是“左”，在抗战时期是右，但它的阵容起了一些变化。王稼祥、洛甫在遵义会议就已觉悟了，六中全会后博古等也觉悟了，经过整风和路线学习，这些同志更觉悟了，而王明仍未觉悟。七大时，王明写过声明书，但两个月后他说那是被迫写的，想不承认。直到这次发言，他还未觉悟。他昨天发言的后半段说了些老实话，我们欢迎他这一点进步，看他以后怎样做。

党内曾经有些人想按照他们的口味来改造党，但没有达到目的；可是，要是他们达到了目的，那就坏了。这个问题的性质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整风运动提高了同志们的嗅觉，缩小了教条主义的市场。有人说，这是阴谋，是要取

而代之。其实，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也是要取而代之。王明对党内“左”、“中”、“右”一齐打，打了“左”派（反立三路线）打“中”派（反周恩来、瞿秋白的“调和路线”），打了“中”派打“右”派，把老人打得差不多了。许多人讲篡党、篡军、篡政，是确有其事的，是从四中全会开始的，不是从五中全会开始的，一直到王明在共产国际，到他从苏联回国，到六中全会。六中全会，一滴酒精使微生物缩小了。两个钦差大臣，一个是王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来传达了所谓“国际路线”；一个是王稼祥，一九三八年夏天回来也传达了国际路线，但他传达的和王明的“国际路线”不同。……但是王明的头脑里，仍有微生物，还没有消毒。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63—265页

我们党有这样一段历史。……党内出现过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一连搞了七八年。当然，这中间也有正确的时候，例如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后有一个短时期，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有一个短时期，六届三中全会以后有一个短时期。三中全会也有缺点。这三次“左”倾路线都跟共产国际有关系，特别是王明路线。第一次“左”倾路线同共产国际的关系不是很大；第二次“左”倾路线从共产国际学了一些东西，但那个总的路线算是中国自己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就不同了，连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案都是俄国人给写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的统治长达四年之久，造成的损失最大，革命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50—51页

斯大林有正确的地方，也有不正确的地方。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就是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他主张打倒一切，否认同资产阶级的团结。在社会上是打倒一切，在党内则闹不团结。后来他的右倾错误也是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这一点我们没有公布，因为我们自己也有责任。

《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65页

特别是王明，他在七次大会的时候，为了应付起见，写了一个书面声明，承认中央路线正确，承认七大政治报告，愿意服从大会的决定。但是，后头我跟他谈话，他又翻了，他忘记那个东西了。他回去一想，第二天又说，我写过这个东西，是承认了错误的。我说，你那个时候承认，如果现在不承认了，你也可以撤回去。他又不撤回去。后头，在二中全会上，我们希望他讲一讲他自己的错误，但是他讲别的东西，只讲我们这些人怎么好怎么好。我们说，你这些话可以不讲，你讲一讲你王明有些什么错误，他不干。他答应在二中全会以后写反省。但是后头他又说，他有病，用不得脑筋，一动手写，他那个病就来了。也许他是故意这样，那也难说。他一直害病，这次大会也不能出席。是不是选举他呢？还有李立三同志选不选？谅解李立三的人比较多一些，谅解王明的人就比较少。像小平同志讲的，我们如果选举他们，意义还是跟七次大会选举他们一样。七次大会的时候，就有很多代表不愿意选他们（不仅是王明，还有相当几个同志）。当时我们说，如果采取这个方针，我们就要犯错误。我们不选举犯错误的人，为什么叫做犯错误呢？因为那是照他们的办法办事。他们的办法，就是不管你是真犯错误，假犯错误，一经宣布你是机会主义，就不要了。如果我们也照

这样办，我们就是走他们的路线，就是走王明路线，或者立三路线。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93—94页

过去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它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了百分之九十，把白区几乎搞垮了百分之百。……中国第一次王明路线搞了四年，对中国革命的损失最大。王明现在在莫斯科养病，我们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他是我们党的教员，是教授，无价之宝，用钱都买不到的。他教育了全党不能走他的路线。

这是我们第一次吃斯大林的亏。

第二次是抗日战争的时候。王明是可以直接见斯大林的，他能讲俄文，很会捧斯大林。斯大林派他回国来。过去他搞“左”倾，这次则搞右倾。在和国民党合作中，他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一切都服从国民党。他提出了六大纲领，推翻我们党中央的十大纲领，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不要自己有军队，认为有了蒋介石，天下就太平了。我们纠正了这个错误。蒋介石也“帮助”我们纠正了错误。王明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则是“一个耳光，赶出大门”。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王明则用嘴上课。

《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20—121页

从内战开始到遵义会议这一时期，即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我们党发生了三次“左”倾路线，而在一九三一年至一

九三四年的王明路线最为厉害。当时苏联反托派胜利了，斯大林的地位开始巩固，在理论上又战胜了德波林学派，而共产国际远东部实际上又是米夫在负责，他的作用太大了。这些条件使教条主义得以形成。中国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差不多都是在苏联受到影响的，当然也不是所有去莫斯科的人都是教条主义者。当时去苏联的许多人当中，有些人是教条主义者，有些人不是；有些人联系实际，有些人不联系实际，只看外国。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67页

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我们同国民党停战，同日本帝国主义打仗。这个时候，我们的同志可以公开到国民党地区的城市里去了。原来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王明又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他先是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最“左”的方针，这时他又执行了最右的方针。他也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教育了我们党。

《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33页

王明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发表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就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

《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243页

张国焘

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发展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纪律，使一部分红军主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然而由于中央的正确领导，红军中党员和指挥员战斗员的觉悟，终于也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了。所有这些错误，对于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和战争，当然是不利的，然而终于被我们克服，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红军是从这些错误的克服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185页

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过去张国焘的干部政策与此相反，实行“任人唯亲”，拉拢私党，组织小派别，结果叛党而去，这是一个大教训。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

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7页

由于巴西会议和延安会议（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是从巴西会议开始而在延安会议完成的）反对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全部红军会合一起，全党更加团结起来，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斗争。……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则是革命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他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只有克服了它，才使得本质很好而且作了长期英勇斗争的

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广大的干部和党员，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统制之下获得解放，转到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面来。……至于张国焘的组织路线，则是完全离开了共产党的一切原则，破坏了党的纪律，从小组织活动一直发展到反党反中央反国际的行为。中央对于张国焘的罪恶的路线错误和反党行为，曾经尽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去克服它，并企图挽救张国焘本人。但是到了张国焘不但坚持地不肯改正他的错误，采取了两面派的行为，而且在后来实行叛党，投入国民党的怀抱的时候，党就不得不坚决地开除他的党籍。这一处分，不但获得了全党的拥护，而且获得了一切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的人们的拥护。共产国际也批准了这一处分，并指出：张国焘是一个逃兵和叛徒。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0—531页

在反倾向的斗争中，反对两面派的行为，是值得严重地注意的。因为两面派行为的最大的危险性，在于它可能发展到小组织行动；张国焘的历史就是证据。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这就是两面派行为的表现。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2页

三十年前的汪精卫，二十年前的康白情、罗家伦、张国焘，他们都很英勇，但是都有一个缺点，就是奋斗比较差，没有“永久奋斗”的精神。

《永久奋斗》（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90页

张国焘是向党中央闹独立性的，结果闹到叛党，做特务去了。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21页

在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没有成功。长征前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二万五千人。中央苏区八万，到陕北只剩下八千人。张国焘搞分裂，不愿意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逃跑了。

《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243—244页

王稼祥

王稼祥同志是犯过错误的，在四中全会前后犯过路线错误，此后也犯过若干错误。但是，他是有功劳的。他的功劳主要有这样几件：

第一，四中全会以后，中央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央苏区。代表团有三个人，任弼时同志、王稼祥同志、顾作霖同志。第一次反“围剿”结束后，他们就来了。王稼祥同志参加了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的战争。在当时，我们感觉到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任弼时、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反对“削萝卜”的主张就不会那样顺利。所谓“削萝卜”，就是主张不打，开步走，走到什么地方碰到一个“小萝卜”，就削它一下。那时，

我们主张跟敌人打，钻到敌人中间去，寻找敌人的弱点，打击敌人。主张“削萝卜”的人反对我们，说我们的办法是“钻牛角”。当时，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虽然以后在苏区的两个大会上，即中央苏区党代表大会和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王稼祥同志是有错误的，但上面所说的那一点，却是他的功劳。王稼祥同志是在第四次反“围剿”末期负伤的。

第二，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会。

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好多别的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和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共

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在苏联养病后回国带回来的，由王稼祥同志传达的。

第三，此后，王稼祥同志就一直在中央工作。虽然他在工作中也有缺点，如在政治工作中就有很大缺点，但是他也做了很多好事，如一九三九年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一九四一年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一九四二年关于党的领导一元化的决定、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及建军的四号指示等，都是他起草的。增强党性的决定是他与王若飞同志合作，在他领导之下起草的；建军的四号指示是他与叶剑英同志合作，在他领导之下起草的。

至于他有些缺点，如对干部的关系，这是大家知道的。但上面这些是大家不大知道的，是中央内部的事，我今天在这里必须讲一讲。

他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的。

《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24—426页

两个钦差大臣，一个是王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来传达了所谓“国际路线”；一个是王稼祥，一九三八年夏天回来也传达了国际路线，但他传达的和王明的“国际路线”不同。王稼祥带回来国际文件，成了一滴酒精，滴下去，微生物缩小了。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64页

陈毅

关于抗战时期皖南、苏南的工作，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

线的，不能与项英同志一概而论。无论是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

《陈毅在内战和抗战时期是有功劳的》（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五日），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04页

徐特立

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奋斗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面前都降服了。而在有些人面前呢？却做了畏葸不前的借口。你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腌腌臢臢的东西。你是任何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的，而在有些人却似乎以脱离群众为快乐。你是处处表现自己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却似乎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当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

《为徐特立六十岁生日写的贺信》（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77—478页

吴玉章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今年六十岁了，他从同盟会到今天，干了四十年革命，中间颠沛流离，艰苦备尝，始终不变，这是很不容易的啊。从同盟会中留下到今天的人，已经不多了，而始终为革命奋斗，无论如何不变其革命节操的更没有几个人了。要这样做，不但需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且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然就不能抵抗各种恶势力恶风浪，例如死的威胁，饿饭的威胁，革命失败的威胁等等，我们的吴玉章同志就是经过这样无数的风浪而来的。因此，我们要学习他的各方面的好处，但特别要学习他对于革命的坚持性。这是最难能可贵的一件事，这是我们党的光荣，这是中国革命的光荣。

《吴玉章寿辰祝词》（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61—262页

刘志丹

刘志丹同志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

《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一九四三年八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60页

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

为刘志丹陵园纪念碑题写的碑文（一九四三年），《解放日报》1943年5月6日

张学良

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

《给张学良的信》（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49页

冯玉祥

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当着革命军向武汉前进，以至打到武汉、打到河南的时候，发生了唐生智、冯玉祥参加革命的事情。冯玉祥于一九三三年在察哈尔还曾经和共产党一度合作，建立了抗日同盟军。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46页

冯先生连年为民主事业奔走呼号，此次归国，对于中国人民民主事业，定多贡献，今忽遭此意外，实为国家民族之损失。

同朱德悼念冯玉祥逝世的唁电（一九四八年九月七日），《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卷第342—343页

邓宝珊

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

《致邓宝珊》（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50页

傅作义

日寇西侵，国难日亟。先生统率师旅捍卫边疆，今夏小试锋芒，已使敌人退避三舍。观乎报载以死继之之言，跃然民族英雄之抱负，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王，气为之壮，诚属可贺可敬。

《致傅作义》（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82页

北平和平解决的又一个原因，是近二十万的国民党军队除少数几个死硬分子外，从兵士们到将军们，一概不愿打了。天津失守后的傅作义将军代表了这种情绪，下了出城改编的决心。不管傅作义过去如何反动透顶，华北人民如何恨之入骨，这件事总算是做得对的。只要他以后向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面走，愿意向人民低头，在军队改编问题上予以协助，不起阻碍作用，而不再企图高踞在人民头上压迫人民，人民解放军就有理由向人民说明，赦免他的战犯罪，并给他以新的出路。

《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51页

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贵将军与有劳绩。贵将军复愿于今后站在人民方面，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这是应当欢迎的。

《对傅作义通电的复电》（一九四九年四月二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72页

邹韬奋

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悼念邹韬奋逝世的题词（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题词墨迹选》第76页

闻一多

先生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

《给李公朴、闻一多家属的唁电》（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三日、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57页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别了，司徒雷登》（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95—1496页

李公朴

先生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今为和平民主而遭反动派毒手，是为全国人民之损失，抑亦为先生不朽之光荣。

《给李公朴、闻一多家属的唁电》（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三日、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57页

章士钊

章士钊没有过反共言论。他在重庆帮过我忙，请我吃饭。我问怎么办？他说：三十六计。

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

《给章士钊的信》（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417页

章士钊先生所著《柳文指要》上、下两部，二十二本，约百万言，无事时可续续看去，颇有新义引人入胜之处。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

全书》),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如有此举,亦是好事。此点我已告章先生,要他预作精神准备,也不要求八十五龄之老先生改变他的世界观。

《致康生》(一九六五年八月五日),《毛泽东文艺论集》第336页

蔡元培

二十年后忽见我敬爱之子民先生,发表了崭新不同于一般新旧顽固党之簇新议论,先生当知见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无数量人也!从同志从朋友称述先生同情抗日救国事业,闻之而欢跃者,更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全民族之诚实儿女,毫无疑义也。

《给蔡元培的信》(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43—444页

柳亚子

看了柳亚子先生题画,如见其人,便时乞为致意。像这样有骨气的旧文人,可惜太少,得一二个拿句老话说叫做人中龙凤,只不知他现时的政治意见如何?

《给何香凝的信》(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512页

广州别后,十八年中,你的灾难也受得够了,但是没有把你压倒,还是屹然独立的,为你并为中国人民庆贺!“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饮茶”,这是你几年前为我写的诗,我却至今做不出半句来回答你。

《致柳亚子》(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44页

诗及大示诵悉，深感勤勤恳恳诲人不倦之意。……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

《给柳亚子的信》（一九四五年十月四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9页

黄炎培

黄炎培、江问渔等所领导的职业教育社在江、浙两省知识分子中有颇大影响，因为黄、江等不仅在文化教育界有地位，而且是经营工商业的民族资本家著名代表。

《注意吸收民族资本家及其代表参加根据地建设》（一九四〇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00页

朱自清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别了，司徒雷登》（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95—1496页

我是赞成朱自清的风格的。朱自清是清华大学一个教授，他的文章写得好，另一个侧面不好，就是不神气。

在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九年四月五日）

徐志摩

徐志摩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银针在幽谷中怎样响法，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一个艺术至上主义者。那时像他这样主张的人很多，他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另一方面是鲁迅先生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艺术论者。他们在艺术论上的争论，有长期的历史，现在不能去细说它。艺术至上主义是一种艺术上的唯心论，这种主张是不对的。

《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21页

胡适

伯达此文及老墨哲学诸文引了章，梁，胡，冯^①诸人许多话，我不反对引他们的话，但应在适当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说明他们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但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本上区别的，梁基本上是观念论与形而上学，胡是庸俗唯物论与相对主义，也是形而上学，章，冯……（章，冯二家我无研究），等等。若无这一简单的申明，则有使读者根本相信他们的危险。

《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日、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64页

^①指章炳麟、梁启超、胡适、冯友兰。

再讲一个中国人的议论。此人在台湾，名为胡适。他讲，据他看，这个“革命军”（就是叛乱分子）灭不了。他说，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占领了安徽，但是没有去徽州。什

么道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复杂。日本人连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那个山共产党敢去？我说，胡适这个方法论就不对，他那个“大胆假设”是危险的。他大胆假设，他推理，说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末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产党难道敢去吗？因此结论：共产党一定不敢去，共产党灭不了那个地方的叛乱武装。现在要批评胡适这个方法论，我看他是要输的，他并不“小心求证”，只有“大胆假设”。

《关于西藏平叛》（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44页

郭沫若

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

《致郭沫若》（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21页

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

《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88页

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给郭沫若的信》（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27页

要读历史。我赞成郭沫若先生那个古史研究。读历史的人不等于是守旧的人。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黎锦熙、杨昌济

先生^①及死去了的怀中^②先生，都是弘通广大，最所佩服。

《致黎锦熙信》（一九二〇年六月七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8页

①指黎锦熙。

②怀中，即杨昌济。

陶行知

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悼念陶行知逝世的题词（一九四六年八月），《毛泽东题词墨迹选》第91页

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忽闻逝世，实为中国人民之巨大损失。

悼念陶行知的唁电（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五日），《解放日报》1946年8月11日

萧军

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

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

《给萧军的信》（一九四一年八月二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64页

赫拉克利特

第二个伟大哲学家是赫拉克利特。他的大功，在发现了辩证法大纲。他是唯物论者，和他以前的哲学家同样，主张宇宙是水、火、气、土四种原素构成的。而他则谓火是基本的原素，这是他的唯物一元论。然而他的主要功绩，是在发现万物不断变化与变化由于内在的对立斗争这两个辩证法的根本思想。首先，他由宇宙是物质构成的这种见解，到达于万物普遍变化的主张。他说：“土灭生火，火灭生气，气灭生水，水灭生土”。又说：“宇宙是永久之火”，用以比喻万物的不断变化。又说：“人不能再渡同一河流”，也是比喻自然与社会的变动不居。据他看，宇宙在时间空间上都是无限的，不断变化着。不但如此，他还指出了变化的原因。他认为，万物由于内在对立物的斗争，而由一种形态转为另一种形态。一切都是在矛盾中进行的。他说：“斗争是万物之父”，“斗争随处都有，真理就是不和”。这样，他用一般的方法表示辩证法的思想，这是人类认识史上的第一次，所以他有辩证法父亲之称。

《读李达著〈社会学大纲〉一书的批注》（一九三八年一月——三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20—222页

苏格拉底

作为第一个同唯物论斗争而提倡了观念论的道德论与认识论的代表——苏格拉底，其积极意义是提起了从来没有被提过的道德论与认识论，把哲学引进了社会与思维两个领域，在道德论上提起了知识与行为关系的辩证法，在认识论上提起了普遍与个别关系的辩证法。这些是他的大功绩。然而他的思想是反动的与观念论的。他的道德论，主张知识决定行为，认求知是到达道德的手段，恶是无知的产物，善是知的产物，这有其一面的真理。但第一、他所谓知，就是了解祖先的风俗习惯，因而主张复古，排斥新知，主张传统的贵族主义，排斥新兴的民主主义，所以他是反动的。第二、他只知知识给与行为的影响，而不知知识的来源在行为（实践），行为是决定知识的基础，又是检查知识的标准，所以他是观念论的。他的认识论，主张认识的目的，在于从感性的个别到达于理性的普遍，这是对的。但他认为后者是前者的基础，这就是观念论了。

《读李达著〈社会学大纲〉一书的批注》（一九三八年一月——三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27—230页

苏格拉底注重伦理学，他不是唯物主义者，也不是辩证法的理论家，但是他注意研究伦理学和宪法，同敌人作斗争。他的一辈子过得不开心，结果死得也很惨。

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的谈话（一九六四年二月九日）

德谟克里特

德谟克里特的大功绩，是他的原子论的物质观。虽然是很原始的与机械的唯物论，却对后世的原子论学说给了重大的影响，发生了哲学指导科学的作用。他反对观念论哲学，提倡了完全唯物论哲学。他认物质的构成，都是由于极微小的不可入的微粒即原子；而其运动，是由这种原子与空虚的空间相结合。不可入的原子运动于空虚的空间之中，原子们互相为种种的分离与结合，因而组成物质世界的多样性。他把物质、人类、灵魂、思想，都看作本质相同而形态互异的诸原子的种种结合。这样，他对万物都一一给以相当的特殊的形态。他认原子和空虚以外没有任何东西的存在，完全否定了神。他认运动是与物质不能分离的，而空虚是物质运动的条件。他的原子与空虚的关系，表现有与非有的统一。他的这种物质运动观，虽是机械的力学的运动，但他看成物质变化的根本法则，看成宇宙的后果必然性，他已企图在物质本身之中探求其自己运动的原因了。

《读李达著〈社会学大纲〉一书的批注》（一九三八年一月——三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22—224页

柏拉图

柏拉图的思想是客观观念论，其全部体系都是反动的与错误的。他认只有理念是永久的真实的存在，世界与人存在以前，理念就存在了的。世界与人的思维都是理念的产物，是理念的影子。这是将真实世界的头脚颠倒了彻底的观念论体系。由此，他就造出理念的论理学，主张认识的对象是理念而不是感

觉世界，认识的方法是依据空洞无物的概念以从事于思维。但是柏拉图的积极作用，也就在他的理念论理学。因为在他的理念论理学中，表示了概念对于思维的作用。这个概念在思维中的作用的指出，在人类认识史上有开创的意义。

《读李达著〈社会学大纲〉一书的批注》（一九三八年一月——三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30—231页

柏拉图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他写了一本书叫《理想国》，他发展了唯心主义，后来的亚里士多德批评了他的唯心主义。

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的谈话（一九六四年二月九日）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是一位大学者，比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水平高。他对于自然科学的许多方面有研究，批评了柏拉图的唯心主义，创立了形式逻辑。欧洲在中世纪时，对亚里士多德是很崇拜的。在比较近代的德国，康德的老师就是亚里士多德。

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的谈话（一九六四年二月九日）

鸠摩罗什

你们晓不晓得鸠摩罗什？他在后秦时出生在西域龟兹国，后来到长安，住了十二年，死在长安。中国大乘佛教的传播，他有功劳。西藏过去有无《金刚经》？这个经的汉译本就是鸠摩罗什和他的弟子们翻译的。

《同班禅额尔德尼等的谈话》（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209页

释迦牟尼

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的。他主张普渡众生，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创立了佛教。

《同达赖喇嘛的谈话》(一九五五年三月八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 114 页

释迦牟尼原来也是贵族，是个王子，但他和人民一起搞改革，得到人民的拥护，因而人民就纪念他。

《接见西藏地区参观团、西藏青年参观团负责人等的谈话》(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 126 页

从前释迦牟尼是个王子，他王子不做，就去出家，和老百姓混在一块，作了群众领袖。

《同班禅额尔德尼等的谈话》(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 209 页

克伦威尔

人民是懂事情的。终究还是人民决定问题。正因为克伦威尔代表人民，所以国王才被迫让步。

他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

在历史上克伦威尔是有威信的。

《同蒙哥马利的谈话》(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192 页

康德

康德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天文学中的星云学是他创立的。此人还搞了十二个范畴，这十二个范畴都是对立的统一，但他不能解释这些问题。他说事物的本质是不可知的，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黑格尔的先生就是康德。

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的谈话(一九六四年二月九日)

黑格尔

生活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期的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对于辩证法曾经给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他的辩证法却是唯心的辩证法。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3页

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他大大地发展了唯心主义的辩证法。他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先生，也是列宁的先生，也是我们的先生。

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的谈话(一九六四年二月九日)

海克尔

海克尔写的一本书^①里头有相当丰富的材料，他不承认自己是唯物主义者，实际上是唯物主义者。

《同斯诺的谈话》(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406页

^①指海克尔的《宇宙之谜》。

华盛顿

华盛顿是代表美国人民的。

《同蒙哥马利的谈话》（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
第8卷第193页

华盛顿所起的革命作用，我们应当承认，他当时起了很先进的作用，是很进步的。还有林肯也一样。

《同斯诺的谈话》（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
411页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
287页

直到无产阶级运动的伟大的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综合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的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部分，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

理论，才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3—304页

马克思不但参加了革命的实际运动，而且进行了革命的理论创造。他从资本主义最单纯的因素——商品开始，周密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商品这个东西，千百万人，天天看它，用它，但是熟视无睹。只有马克思科学地研究了它，他从商品的实际发展中作了巨大的研究工作，从普遍的存在中找出完全科学的理论来。他研究了自然，研究了历史，研究了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这样，马克思就成了一个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最完全的知识分子，他和那些仅有书本知识的人有根本的区别。马克思在实际斗争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概括了各种东西，得到的结论又拿到实际斗争中去加以证明，这样的工作就叫做理论工作。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16—817页

在第三十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我曾经提到《联共党史》结束语第二条对马克思、恩格斯就批评过。恩格斯有个别原理是错误的，应该抛弃，拿新的原理来代替它。比如，恩格斯主张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采取议会制共和国的形式，但是列宁根据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认为采取苏维埃共和国的形式比较好。可见恩格斯的看法是错误的。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都曾经说过，英国的革命可以采取和平革命的方式，并且估计英国革命将会早日到来。马克思、恩格斯都很想革命快

点胜利，但实际上革命却总是没有胜利，又有什么办法。古语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看这句话要改一下。人，包括圣贤在内，总是有过的，有过必改就好了。

《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
第6卷第347页

唯物主义并不等于马列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就已经有唯物主义，资产阶级曾经发挥了唯物主义，例如法国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也不是马克思发现的，例如德国过去有唯心辩证法。马克思是改造了这两种东西。他把唯物主义改造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联系的、发展的。为什么会有发展呢？因为有矛盾存在。他把辩证法改造成为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正确的反映客观世界的辩证法，这与德国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不同。至于马克思、列宁关于个别问题的结论做得不合适，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因为受当时条件的限制，例如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西方几个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结论。

《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一九五九年二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页

我们党里有人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是错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〇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〇八年的《唯物主义和

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9页

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40页

列宁

我们是赞成列宁的吗？如果是的话，就得依照列宁的精神去工作。不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不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也不是自以为是，夸夸其谈；而是要照着列宁那样地去做。

《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42页

布尔什维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方法，创造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布尔什维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前没有过，这是列宁所领导的党在俄国创造的。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用这个理论和策略搞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斯大林接着又搞了三个五年计划，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苏联。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7页

列宁主义学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那些地方发展了呢?一,在 worldview, 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发展了它;二,在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策略方面,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上发展了它。列宁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开始,革命中间就有建设,他已经有了七年的实践,这是马克思所没有的。我们学的就是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列宁的著作,特别是革命时期的著作,生动活泼。他说理,把心交给别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和敌人斗争,也是如此。

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谈话(一九五八年四月六日)

列宁在从事研究工作的后期,指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帝国主义阶段,看出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有可能引起世界大战,有可能首先在一国或几国爆发革命,在东方国家中也有这种可能。

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研究了这个问题,并且得出结论: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当然,他没有预料到在什么国家首先取得胜利。

《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一九五九年二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页

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曾经指出俄国存在用和平手段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当时俄国有两个政权并存，列宁根据那时特有的一些条件，设想布尔什维克通过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来夺取政权。后来到了七月就不行了，资产阶级政府用武力镇压群众的革命运动，于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决定准备武装起义的方针，用暴力夺取政权。

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宁对全党讲得很清楚，写了许多文章，说明革命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不用暴力是不行的。他极力反对孟什维克主张通过议会斗争进行革命的论调。

《同澳共总书记夏基的谈话》(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95页

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40页

斯大林

斯大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的朋友。中国人民对于斯大林的敬爱，对于苏联的友谊，是完全出于诚意的，任何人的挑拨离间，造谣污蔑，到底都没有用处。

《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58页

斯大林同志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并对于世界

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作了极其杰出和极其广泛的贡献。中国人民在反抗压迫者的艰苦斗争中，深切地感觉到斯大林同志的友谊的重要性。

《在莫斯科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大会上的祝词》（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195页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斯大林同志三十多年来不断的关怀、指导和支持，是完全分不开的。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后，斯大林同志和在他领导下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又给予了慷慨无私的援助。斯大林同志对于中国人民这样伟大的深厚的友谊，中国人民永远感念不忘。

《关于悼念斯大林逝世的命令和唁电》（一九五三年三月六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90页

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对于某些重大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六年四月二日、四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1页

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

《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六年四月二日、四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2页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〇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2页

斯大林有正确的地方，也有不正确的地方。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就是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他主张打倒一切，否认同资产阶级的团结。在社会上是打倒一切，在党内则闹不团结。后来他的右倾错误也是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这一点我们没有公布，因为我们自己也有责任。斯大林大体上是七分功劳、三分错误。如果说他是八分功劳、两分错误，同志们不会通过；说他是六分功劳、四分错误，也不会被通过。但否认他的正确的东西是不对的。

斯大林问题不是个别人、个别国家的事情，而是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事业中的事情。对斯大林的错误，大家心里都不会好

过。《人民日报》编辑部的那篇文章是由我们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经过六七次的修改才发表的。

《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65页

什么事情都不能过分，过分了就要犯错误。斯大林基本上是正确的，是有很大功绩的，但是他犯了很大的错误，做了很多错事。斯大林就是过分了。镇压反革命分子本来是好事，但是过了分，把革命同志也看做反革命分子，就是一个大错误。

《不要迷信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70页

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90页

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虽然听说有些什么东西有二十年了，但总是暂时的、部分的，是可以纠正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我们说过，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91页

苏联可以公开批评斯大林，我们公开批评就不那么好。我们应该和苏联搞好关系。也许过一些时候可能公开提出。世界上的事总是这样，事实就是事实。那时第三国际做了许多错事。第三国际前后两段还好，中间有一大段不好：列宁在世的时候好，后来季米特洛夫负责的时候也较好。中国第一次王明路线搞了四年，对中国革命的损失最大。王明现在在莫斯科养病，我们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他是我们党的教员，是教授，无价之宝，用钱都买不到的。他教育了全党不能走他的路线。

这是我们第一次吃斯大林的亏。

第二次是抗日战争的时候。王明是可以直接见斯大林的，他能讲俄文，很会捧斯大林。斯大林派他回国来。过去他搞“左”倾，这次则搞右倾。……

第三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以后。斯大林和罗斯福、丘吉尔开会，决定把中国全部都给美国，给蒋介石。当时从物质上和道义上，尤其是道义上，斯大林都没有支持我们共产党，而是支持蒋介石的。决定是在雅尔塔会议上作出的。斯大林把这件事告诉了铁托，在铁托自传中有这段谈话。

……

第四次，就是说我是半个铁托或准铁托。不仅苏联，就是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有相当一些人曾经怀疑中国是否真正的革命。

《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20—122页

斯大林提倡辩证唯物主义，有时也缺乏唯物主义，有点形而上学；写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但做的常是历史唯心主义。他有些做法走极端，个人神化、使人难堪等等，都不是唯物主

义的。

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我不太喜欢看他的著作，只看过《论列宁主义基础》、批判托洛茨基的一篇长文章、《胜利冲昏头脑》等。他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我更不爱看。他和列宁不同，列宁是把心给别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则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他的著作中都有这种气氛。我见到他以后就更不高兴了，在莫斯科的时候和他吵得很厉害。斯大林有脾气，有时冲动起来，讲一些不大适当的话。

我曾写过一些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一共三篇：一篇是在延安庆祝他六十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的祝词，第三篇是他死后《真理报》要我写的。我向来不愿祝贺人家，也不愿人家祝贺我。但到莫斯科去祝寿，不歌颂他，还能骂他不成？他死后，苏联需要我们的支持，而我们也要支持苏联，就写了那篇歌功颂德的文章。这不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而是对苏联党的。延安的那篇文章，我抛掉了个人感情，把他当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那篇文章还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不是出于内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矛盾的，感情上不愿写，但理智上不这样不行。

《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25—126页

对斯大林的批评，我们人民中有些人还不满意。但是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这也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26—127页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在研究资产阶级的东西,研究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且跟它们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斯大林就比较差一些。比如在他那个时期,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说成是德国贵族对于法国革命的一种反动。作这样一个结论,就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全盘否定了。他否定德国的军事学,说德国人打了败仗,那个军事学也用不得了,克劳塞维茨的书也不应当读了。

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他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他第一条讲事物的联系,好像无缘无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联系呢?就是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各种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侧面。他第四条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又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93—194页

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他以为他

那个天下稳固了。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在斯大林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有矛盾。他把斯大林搞得那么不像样子，我们不赞成。因为搞得那么丑嘛！这就不是你一国的事，这是各国的事。我们天安门前挂斯大林像，是符合全世界劳动人民愿望的，表示了我们同赫鲁晓夫的基本分歧。斯大林本身，你也要给他三七开嘛！斯大林的成绩算它七分，错误算它三分。这也未必见得准确，错误也许只有两分，也许只有一分，也许还稍微多一点。总而言之，斯大林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这一点，我们同赫鲁晓夫有不同意见。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斯大林领导苏联党做了伟大的工作，他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但是他在一个长时间内发展了形而上学，损害了辩证法。个人崇拜就是形而上学，任何人不能批评他。我看苏联的四十年是一个辩证法的过程。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观点，这些观点见之行动，达于极点，势必走到它的反面，再来一个辩证法。

《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33页

中国的革命是违背斯大林的意志而取得胜利的，“真洋鬼子”不许革命。党的七大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建立新中国。抗日时期我们同王明的争论，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到一九三八年八月为止，我们提十大纲领，王明提六大纲领。按

照王明的做法，即斯大林的做法，中国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我们革命胜利了，斯大林又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革命，我们也不辩护。抗美援朝战争一打，这种怀疑才消除了。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71页

斯大林这位同志有点老爷味道，辩证法不甚懂，唯物论也不甚懂，未用到实际工作中，相互关系没有搞好，相当僵硬。

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谈话（一九五八年四月六日）

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与季诺维也夫是一样的。

《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86页

苏联的经验要学。普遍真理要遵守，这就是《莫斯科宣言》里所写的那九条。要学习所有的经验，正确的经验要学，错误的经验也要学。错误的经验是：斯大林的形而上学、教条主义。他不完全是形而上学，有一部分辩证法，但大部分是形而上学。你们叫做个人崇拜，是一个东西。斯大林很爱摆架子。

《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87页

但在我们的关系中，也有过问题，主要与斯大林有关。有三件事：第一，两次王明路线。王明是斯大林的后代。第二，不要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第三国际已经解散了，还下命令，说你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国民族有灭亡的危险。然而我们并没有灭亡。第三，我第一次去莫斯科时，斯大林、莫

洛托夫、贝利亚就向我进攻。

《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88页

你回去以后说了我们的好话。你对斯大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斯大林还是怀疑。只是到朝鲜战争时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和其他各国兄弟党对我们的怀疑。

这种怀疑是必然的:“第一,你们反王明;第二,不要你们革命,你们非革命不可;第三,到莫斯科要斯大林订条约,要收回中长路,那么神气。”在莫斯科,科瓦廖夫招待我,费德林当翻译。我发了脾气,拍了桌子。我说,我在这儿有三个任务:一、吃饭;二、睡觉;三、拉屎。

《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88页

斯大林支持王明路线,使我们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当革命处在关键的时候,他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革命胜利后,他又不信任我们。他大吹自己,说什么中国的胜利是在他的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一定要彻底打破对他的迷信。斯大林对中国所做的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

《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93页

斯大林后来也很好了,中苏订了条约,帮助了朝鲜战争,搞了一百四十一项。当然,这不都是他个人的功绩,是整个苏共中央的功绩。因此,我们不强调斯大林的错误。

《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94页

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它的社会生产也不能不断增长。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1页

把斯大林丑化,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他们把自己和斯大林区别开来,是要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党的文献》1992年第5期

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但是,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是相同的,他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就是在苏联,也是如此。我们同苏共领导人的争论,是同一部分人的争论。我们希望说服这一部分人,以利于推进革命事业。这就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对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六三年九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369—370页

对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错误方面，应当作为历史教训，使苏联共产党人和各国共产党人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这也是有益的。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只要是总结得正确，合乎历史实际，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对于一切共产党人，都是有益的。

《对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六三年九月），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371页

倍倍尔、卢森堡等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远不能和斯大林相比。斯大林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应当更加慎重些。

《对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六三年九月），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371页

普列汉诺夫

普列汉诺夫以为主客统一带有与实践活动无关的直观性，这是因为他不了解辩证法的本质（对立统一法则），所以不能在辩证法上了解认识论，他的反历史主义是同费尔巴哈一样的。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一书的批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九三七年四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0—21页

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德苏战争以后，斯大林在一篇演说里把列宁、普列汉诺夫放在一起，《联共党史》也说到他。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4页

季米特洛夫

季米特洛夫同志是个好同志，他帮过我们很多忙。抗日战争中，他帮助我们抵抗了右倾机会主义。这个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就是过去“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人王明。

同新共主席威廉斯的谈话（一九六三年九月九日）

德波林

德波林不知主客相互渗透是在社会实践中实现的，只有机械的性质（外的、直观的），没有辩证的性质，从实践分离了认识。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一书的批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九三七年四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1页

从苏联哲学界批判德波林学派的文章中看出，德波林学派有这样一种见解，他们认为矛盾不是一开始就在过程中出现，须待过程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出现。那末，在那一时间以前，过程发展的原因不是由于内部的原因，而是由于外部的原因了。这样，德波林回到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和机械论去了。拿这种见解去分析具体的问题，他们就看见在苏联条件下富农和一般农民之间只有差异，并无矛盾，完全同意了布哈林的意见。在分析法国革命时，他们就认为在革命前，工农资产阶级合组的第三等级中，也只有差异，并无矛盾。德波林学派这类见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不知道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

盾，差异就是矛盾。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6—307页

高尔基

我们都知道高尔基，他的生活经验丰富极了，他熟悉俄国下层群众的生活和语言，也熟悉俄国其他阶层的实际情形，所以才能写出那样多的伟大作品。

《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25页

至于学历短的人，我可以举高尔基为例，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文学“博士”，但他没有进过小学，也没有进过中学，大学更没有进过，他写的文章却是天下第一。

《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84页

文艺是一支军队，它的干部是文艺工作者。它还要有一个总司令，如果没有总司令，它的方向就会错的。鲁迅、高尔基就相当于总司令，他们的作品，他们说的话，就当作方向的指导。

《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31页

高尔基很高，但他和下面有着广泛的联系。他和农村有通讯联系。他看到一个十三岁小孩的信非常欢喜，改了几个字把它发表出来，在《海上述林》中便有。高级文艺工作者也只有

和普通文艺工作者，和人民发生联系，才有出路，他才有群众，才有牛奶吃，这是老百姓给他的，不然便是空的。

《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31页

伏罗希洛夫

伏罗希洛夫同志是苏维埃国家和苏联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之一。几十年来，他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苏联国防力量的增强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并且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伏罗希洛夫同志是中国人民最亲密的同志和朋友。

《欢迎、欢送伏罗希洛夫的四次讲话》(一九五七年四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26页

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

他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

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

他怕东欧各党和世界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而相信我们。

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

《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601页

赫鲁晓夫现在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十三个国家中，支持他的并没有占多大的多数。罗马尼亚就同他不一致，波兰也只能算半个支持。他是要控制别人，像美国人一样。他要人家搞单一经济，这行不通，罗马尼亚不干，古巴也在同他吵。

《赫鲁晓夫的日子不好过》（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58页

杜勒斯

杜勒斯比较有章程，是美国掌舵的。这个人是个想问题的人，要看他的讲话，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要翻英文字典。杜勒斯是真正掌舵的，省委要指定专人看《参考资料》。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美国的政治掮客杜勒斯，爱管闲事，想从国共两党的历史纠纷这件事情中间插进一只手来，命令中国人做这样，做那样，损害中国人的利益，适合美国人的利益。就是说，第一步，孤立台湾；第二步，托管台湾。如不遂意，最毒辣的手段，都可以拿出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27页

去年，我们学了杜勒斯的“战争边缘政策”，杜勒斯当了我们的先生。他的“战争边缘政策”是对着我们的，我们也用“战争边缘政策”对付他们。

《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一九五九年三月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9页

尼赫鲁

尼赫鲁是个什么人呢？他是印度资产阶级的中间派，同右派有区别。整个印度的局势，我估计是好的。那里有四亿人民，尼赫鲁不能不反映四亿人民的意志。

《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一九五九年五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51页

戴高乐

我们对戴高乐有两方面的感觉：第一，他还不错；第二，他有缺点。

说他还不错是因为他有勇气同美国闹独立性。他不完全听美国的指挥棒，他不准美国在法国建立空军基地，他的陆军也由他指挥而不是由美国指挥。

法国在地中海的舰队原来由美国指挥，现在他也把指挥权收回了。这几点我们都很欣赏。

另一方面他的缺点很大。他把他的军队的一半放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战争，使他的手脚被捆住了。

《同蒙哥马利的谈话》（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90页

获悉夏尔·戴高乐将军不幸逝世，谨对他，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表示诚挚的悼念和敬意。

《悼念戴高乐逝世的唁电》（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一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51页

纳赛尔

西方国家骂纳赛尔总统是个野心家，是个希特勒，说他想统治阿拉伯世界。但是我们认为，纳赛尔总统是亚非地区的民族英雄，因此帝国主义才不喜欢他。纳赛尔总统的做法很聪明，他有时硬，有时软，有时用一种很和平的办法。这次和“五国委员会”的会谈，他就用很和平的声调把他们送回去了。

《中国人民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七日），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248—249 页

尼克松

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也有，但比较地少一点，你信不信？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

《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436 页

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

《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436 页

蒙哥马利

英国有个上议院议员，就是蒙哥马利元帅，他就反对北大西洋条约中美国人来称霸。他反对加拿大同美国关系太密切。我那次同他说你去找戴高乐将军。那是在一九六一年他第二次访

华时，大概他没有去，他是保守党。我问他，持你这种意见的只有你一个人吗？他说，不，还有人。他坚决反对美国在欧洲称霸，他并不是共产党员。

《中法之间有共同点》（一九六四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74页

斯诺

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悼念斯诺逝世的唁电》（一九七二年二月十六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289页

斯特朗

献给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

《献给斯特朗的花圈上的挽词》（一九七〇年四月二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89页

杜波依斯

杜波依斯博士是我们时代的一位伟人。他为黑人和全人类的解放进行英勇斗争的事迹，他在学术上的卓越成就，和他对中国人民的真挚友谊，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记忆里。

《悼念杜波依斯逝世的电报》（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357页

柯棣华

印度友人柯棣华大夫远道来华，援助抗日，在延安华北工作五年之久，医治伤员，积劳病逝，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悼念柯棣华的挽词(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题词墨迹选》第55页

白求恩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白求恩同志是实践了这一条列宁主义路线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员也要实践这一条路线。……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

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至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纪念白求恩》（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59—660页

马丁·路德·金

最近，美国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突然被美帝国主义者暗杀。马丁·路德·金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但美帝国主义者并没有因此对他宽容，而是使用反革命的暴力，对他进行血腥的镇压。这一件事，深刻地教训了美国的广大黑人群众，激起了他们抗暴斗争的新风暴，席卷了美国一百几十个城市，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显示了在两千多万美国黑人中，蕴藏着极其强大的革命力量。

《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77页

三、文献、著作

望厦条约

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一八四〇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的国家之一，这即是白皮书上提到的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订的一八四四年的望厦条约。就是在这个条约里，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强迫中国接受美国人传教也是一条。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

《“友谊”，还是侵略？》（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4卷第1505—1506页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这个约法很简单，据说起草时也很仓卒，从起草到通过只有一个月。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5—326页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只有全面的民族抗战才能彻底地战胜日寇。然而要实现全面的民族抗战，必须国民党政策有全部的和彻底的转变，必须全国上下共同实行一个彻底抗日的纲领，这就是根据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孙中山先生所手订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精神而提出的救国纲领。

中国共产党以满腔的热忱向中国国民党、全国人民、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提出彻底战胜日寇的十大救国纲领。中国共产党坚决相信，只有完全地、诚意地和坚决地执行这个纲领，才能达到保卫祖国战胜日寇之目的。否则，因循坐误，责有攸归；全国丧亡，嗟悔无及。

《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54页

共产党在卢沟桥事变之后，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这个十大纲领，符合于马克思主义，也符合于真正革命的三民主义。这是现阶段中国革命即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初步的纲领，只有实行了它，才能挽救中国。一切和这个纲领相抵触的东西，如果还要继续下去，就会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69页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个决议不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而且是全党性质的，同全国人民有关联的，对全党与全民负责的。哪些政策或者其中的哪些部分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如果讲得合乎事实，在观

念形态上再现了二十四年的历史，就对今后的斗争有利益，对今后党和人民有利益。正确和错误的标准自然是马克思主义，但人民利益同样是标准。人民对于各党派的情形并不很了解，但懂得根据他们的政策来作判断。国民党致力国民革命凡五十年了，其中做了些好事，但做了更多的坏事，所以人民不喜欢它。我们做了好事，但也犯了些错误。现在的决议就是说这些问题，所以是关系于全国人民的。

这个决议有两个问题：做不做？如何做？不做就是怕犯错误。看趋势是要做，但决议现在还有缺点，还需要修改，所以今天也只要求基本通过。我想决议的基本思想是不错的，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需要纠正，使革命不受损失。至于各个历史问题的叙述是否完全正确，那就不一定了。我们现在只能准备在二三十年后来看，这个决议还是功大过小，那就很好了。

《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2页

我们在这个短短的历史决议案中，要把二十四年的历史都写进去，那就更不容易。自然我们还不是修党史，而是主要讲我们党历史上的“左”倾错误，讲党史上一种比较适合于中国人民利益的路线与一种有些适合但有些不适合于中国人民利益的路线的斗争，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这个问题经过了几年的酝酿，现在比较成熟了，所以写出决议案把它解决了。至于抗战时期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成熟，所以不去解决它。这个历史决议案，在将来来看，还可能有错误，但治病救人的方针是不会错的。

历史决议案上的问题，是关系到多数人的问题还是少数人的问题？我说是关系到多数人的问题，关系到全党和全国人民

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谦虚谨慎，不要骄傲急躁。这是多数人的问题，也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少数人的问题是容易解决的，比如提名字，提上一两个人的名字，那并不难，但多数人的问题并不是那样容易解决的。我们这次写历史决议案是很谨慎的。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6—297页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中美商约是不平等条约，准许美国人在中国随便购置房屋、地产，建工厂，开商店，美国船只可以到中国内河航行。以前日本人在“二十一条”中曾要求在中国的一部分——满洲做到这些事情，结果遭到全中国人民的反对。

《同三位西方记者的谈话》（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05页

我们公开表示将来一定要废弃，解放区现在就没有实行这一条约。对于中美商约，我们表示反对，十一月四号是中国新的国耻纪念日，这个商约应该废止，另订平等商约。

《同三位西方记者的谈话》（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05页

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签订的中美商约，是要把中国变为美国的殖民地，这不会因美军撤出中国而发生变化。

《对中国革命新高潮的说明》（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19—220页

蒋介石政府所长期施行的极端反动的财政经济政策，现在

被空前的卖国条约即中美商约所加强了。在中美商约的基础上，美国的独占资本和蒋介石的官僚买办资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控制着全国的经济生活。其结果，就是极端的通货膨胀，空前的物价高涨，民族工商业日益破产，劳动群众和公教人员的生活日益恶化。这种情形，迫使各阶层人民不得不团结起来为救死而斗争。

《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25—1226页

共同纲领

新政协讨论通过我们提出的《共同纲领》，是我们同资产阶级直接交锋的开始。资本家想要我们只搞农业，由他们搞工商业和交通运输，这怎么行？

《同绥远负责人的谈话》（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4—15页

我们有伟大而正确的《共同纲领》以为检查工作、讨论问题的准则。《共同纲领》必须充分地付之实行，这是我们国家现时的根本大法。

《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四日、二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77页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利益。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

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

《准备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一九五〇年一月二日、三日)，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8页

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准备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一九五〇年一月二日、三日)，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0页

我们曾经指出，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是巩固革命胜利的两个基本条件。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

《缔结中苏条约和协定的重大意义》(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一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31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我们的政府做了一件重要的工作，签订了中苏条约。这件工作对于我们国家，有重大的意义。全国人民对此都有所表示。在座的同志们中间，今天有许多人说了话，都说是有伟大的意义的。我们是处在一种什么情况之下订这个条约呢？就是说，我们打胜了一个敌人，就是国内的反动派，把国外反动派所扶助的蒋介石反动派打倒了。国外反动派，在我们中国境内，也把他赶出去了，基本上赶出去了。但是世界上还有反动派，就是我们国外的帝国主义。国内呢，还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有朋友……。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我们

同苏联的友谊，应该在一种法律上，就是说在条约上，把它固定下来，用条约把中苏两国的友谊固定下来，建立同盟关系……。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这个条约是爱国主义的条约。同志们刚才提到这一点，这是对的。这个条约又是国际主义的条约，它是国际主义的。

《缔结中苏条约和协定的重大意义》（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一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132 页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的中苏条约，巩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一方面使我们能够放手地和较快地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一方面又正在推动着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民主反对战争和压迫的伟大斗争。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 6 卷第 67 页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不但对新中国的建设有了极大的帮助，而且在反对侵略、维护远东及世界和平与安全上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一周年给斯大林的贺电》（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二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2 册第 123 页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一个伟大的和平条约，是中苏两国间伟大友谊的标志。五年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个条约在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方面的伟大作用，今后的生活和实践将更加显示出这个条约的巨大力量和无限光辉。

《毛泽东等祝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的电报》（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二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5 册第 37 页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缔结，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它对于中苏两国的繁荣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已经发挥并且还将继续发挥巨大的影响。

《毛泽东等祝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周年的电报》（一九六〇年二月十三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27页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根据中苏两国人民传统的革命友谊和团结对敌的共同愿望而签订的。这个条约符合中苏两国人民、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伟大的中苏同盟的巩固和加强，有利于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有利于确保我们两国的共同安全，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共同事业。

《毛泽东等祝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五周年的电报》（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三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333页

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现在，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在友好基础之上，经过多次商谈，已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这个协议是符合于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利益，同时也符合于全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从此，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在伟大祖国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得以永远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和异民族的压迫，站起来，为西藏人民自己的事业而努力。

《给达赖喇嘛的信》（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70页

第一个五年计划

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实现党的总路线的一个重大的步骤。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应该根据实际经验，认真地讨论这个计划草案，使它的内容能够比较妥当，而成为切实可行的计划。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90页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不是正确?我赞成这种意见,就是说,从前四年的情况可以看得清楚,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本正确。至于错误,确实有,这也是难免的,因为我们缺少经验。……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一部分是苏联帮我们设计的,大部分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这个宪法草案所以得人心,是什么理由呢?我看理由之一,就是起草宪法采取了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群众的意见相结合的方法。这个宪法草案,结合了少数领导者的意见和八千多人的意见,公布以后,还要由全国人民讨论,使中央的意见和全国人民的意见相结合。这就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领导和广大积极分子相结合的方法。过去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今后也要如此。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采用这个方法。这次我们采用了这

个方法，就得到了比较好的、比较完全的宪法草案。

在座的各位和广大积极分子为什么拥护这个宪法草案呢？为什么觉得它是好的呢？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总结了经验，一条是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

第一，这个宪法草案，总结了历史经验，特别是最近五年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它总结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经验，总结了最近几年来社会改革、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政府工作的经验。这个宪法草案也总结了从清朝末年以来关于宪法问题的经验，从清末的“十九信条”起，到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到北洋军阀政府的几个宪法和宪法草案，到蒋介石反动政府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一直到蒋介石的伪宪法。这里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我们这个宪法草案，主要是总结了我国的革命经验和建设经验，同时它也是本国经验和国际经验的结合。我们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宪法类型的。我们是以自己的经验为主，也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我们的宪法是新的社会主义类型，不同于资产阶级类型。我们的宪法，就是比他们革命时期的宪法也进步得多。我们优越于他们。

第二，我们的宪法草案，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的原则贯串在我们整个宪法中。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原则。我国现在就有社会主义。宪法中规定，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原则性。要实行社会主义原则，是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一天早晨一切都实行社会主义呢？这样形式上很革命，但是

缺乏灵活性，就行不通，就会遭到反对，就会失败。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九五四年六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5—326页

我们的宪法草案公布以后，将会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九五四年六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8页

我们的宪法有我们的民族特色，但也带有国际性，是民族现象，也是国际现象的一种。跟我们同样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国家很多，人口在世界上占多数，我们有了一个革命的宪法，人民民主的宪法，有了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对这些国家的人民会有帮助的。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九五四年六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9页

我们的这个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还不是完全社会主义的宪法，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我们现在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和应当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宪法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九五四年六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9—330页

屈原《天问》

《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

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

李斯《谏逐客书》

李斯的《谏逐客书》，有很大的说服力。那时候各国内部的关系，看起来是领主和农奴的关系，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战车、武士。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六）》（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司马迁《史记》

像《史记》这样的著作和后来人对它的注释，都很严格、准确。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六）》（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贾谊《治安策》

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原》、《鹏鸟》二赋不阅。贾谊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固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

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

《致田家英》（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39页

枚乘《七发》

此篇早已印发，可以一读。这是骚体流裔，而又有所创发。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据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你看，《七发》的气氛，不是有颇多的批判色彩吗？“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一开头就痛骂上层统治阶级的腐化。“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这些话一万年还将是真理。现在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无论是知识分子，党、政、军工作人员，一定要做些劳动，走路、游水、爬山、广播体操，都是在劳动之列，如巴甫诺夫那样，不必说下放参加做工、种地那种更踏实的劳动了。

《骚体有民主色彩，属浪漫主义流派》（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文艺论集》第201—202页

“客曰：今如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不欲闻之乎？”指出了要言妙道，这是本文的主题思想。此文首段是序言。下分七段，说些不务正业而又新奇可喜之事，是作者主题的反面。文好。广陵观潮一段，达到了高峰。第九段是结论，归到要言妙道。于是太子高兴起来，“忽然汗出，霍然病已”。用说服而不用压服的方法，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见效甚快。这个法子，有点像我们的“处理从

宽”。首尾两段是主题，必读。如无兴趣，其余可以不读。

《骚体有民主色彩，属浪漫主义流派》（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毛泽东文艺论集》第 202 页

枚乘，苏北淮阴人，汉文帝时为吴王刘濞的文学侍从之臣。他写此文，是为给吴国贵族们看的。后来“七”体繁兴，没有一篇好的。《昭明文选》所收曹植《七启》，张协《七命》，作招隐之词，跟屈、宋、贾、枚唱反调，索然无味了。

《骚体有民主色彩，属浪漫主义流派》（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毛泽东文艺论集》第 202—203 页

陈寿《三国志·张鲁传》

大约有一千七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张鲁的祖父创教人张陵，一名张道陵，就是江西龙虎山反动透顶的那个张天师的祖宗，《水浒传》第一回描写了龙虎山的场面。三国时代的道教是遍于全国的、群众运动的。在北方有天公将军张角三兄弟最为广大的革命的群众运动，他们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苍天，汉朝统治阶级。黄天，农民阶级。于吉在东吴也有极大的群众运动，是那时道教的一派。张道陵、张鲁是梁、益派。史称这派与北方派的路线基本相同。其后，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

脱贫困，丰衣足食。在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从天公将军张角到天王洪秀全。宋朝的摩尼教，杨么、钟相，元末的明教、红军，明朝的徐鸿儒、唐赛儿、李自成，清朝的白莲教、拜上帝教（太平天国）、义和团，其最著者。我对我国历史没有研究，只有一些零星感触。对上述性质的分析，可能有错误。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是就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张角、张鲁、黄巢、方腊、刘福通、韩林儿、李自成、朱元璋、洪秀全等等）来说，则是可以确定的。

《读〈三国志集解〉批语》（卷八《魏书·张鲁传》），《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43—147页

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末北方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张陵（一称张道陵，其流风余裔经千年转化为江西龙虎山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极端反人民的张天师道，《水浒传》第一回有洪太尉误走魔鬼戏极神气的描写，一看使人神旺，同志们看过了吧？）、张衡、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米道。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

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读〈三国志集解〉批语》（卷八《魏书·张鲁传》），《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48—151页

裴松之注《三国志》

李贤贤于颜师古远甚，确然无疑。裴松之注三国，有极大的好处，有些近于李贤，而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此之谓欤？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章太炎说，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英豪巨眼，不其然乎？

《读〈后汉书〉批语》（卷一《光武帝纪》），《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29—130页

范晔《后汉书》

《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

《读〈后汉书〉批语》，《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31页

酈道元《水经注》

我看《水经注》作者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不到处跑怎么能写得那么好？这不仅是科学作品，也是文学作品。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慧能《六祖坛经》

我不大懂佛经，但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人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代六祖（慧能）的佛经《六祖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

《同班禅额尔德尼等的谈话》（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209页

施耐庵《水浒传》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关于〈水浒〉的评论》（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57页

《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13页

吴承恩《西游记》

“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些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不信这些。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所谓“此言果然不差”，便是这样认识的。

《读〈绘图增像西游记〉批语》，《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74—75页

笑笑生《金瓶梅》

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这部书写了宋朝的真正社会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揭露了统治者和被压迫者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细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女性的。

《谈〈红楼梦〉》（一九五九年——一九七三年），《毛泽东文艺论集》第206—207页

《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么。

《谈〈红楼梦〉》（一九五九年——一九七三年），《毛泽东文艺论集》第207—208页

冯梦龙《东周列国志》

《东周列国志》值得读一下。这本书写了很多国内斗争和国外斗争的故事，讲了很多颠覆敌对国家的故事，这是当时社会的剧烈变化在上层建筑方面的反映。这本书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的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的经济基础，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六）》（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东周列国志》基本上是正确的，按照《左传》编写的。写这本书的是民间一个作家。

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蒲松龄《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的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

表现作者的封建主义，然亦对农民有些同情。^①

《读〈聊斋志异〉批语》，《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81页

①批在《聊斋志异》中的《白莲教》开头的文字旁。

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的和平等的。^②

《读〈聊斋志异〉批语》，《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82—83页

②批在《聊斋志异》中《小谢》开头的文字旁。

曹雪芹《红楼梦》及《红楼梦》研究

《红楼梦》这部书，现在许多人鄙视它，不愿意提到它，其实《红楼梦》是一部很好的小说，特别是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比如它描写柳湘莲痛打薛蟠以后便“牵马认镫去了”，没有实际经验是写不出“认镫”二字的。

《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23—124页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付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52页

《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

《谈〈红楼梦〉》（一九五九年——一九七三年），《毛泽东文艺论集》第205页

《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

《谈〈红楼梦〉》（一九五九年——一九七三年），《毛泽东文艺论集》第206页

《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他写的是很细致的、很精细的社会历史。他的书中写了几百人，有三四百人，其中只有三十三人是统治阶级，约占十分之一，其他都是被压迫的。牺牲的、死的很多，如鸳鸯、尤二姐、尤三姐、司棋、金钏、晴雯、秦可卿和她的一个丫环。秦可卿实际是自杀的，书上看不出来。贾宝玉对这些人都是同情的。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这部书写了宋朝的真正社会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揭露了统治者和被压迫者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细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

《聊斋志异》是尊重女性的。

《谈〈红楼梦〉》（一九五九年——一九七三年），《毛泽东文艺论集》第206—207页

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1—302页

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么。

《谈〈红楼梦〉》（一九五九年——一九七三年），《毛泽东文艺论集》第207—208页

《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作历史读的。开头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

如铁。”《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来有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很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还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谈〈红楼梦〉》（一九五九年——一九七三年），《毛泽东文艺论集》第208—209页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曹雪芹的家是在雍正手里衰落的。

《关于人的认识问题》（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93页

许世友同志，你现在也看《红楼梦》了吗？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他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第四回里边有一张“护官符”，那上面说：“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

《谈〈红楼梦〉》（一九五九年——一九七三年），《毛泽东文艺论集》第209—210页

李宝嘉《官场现形记》

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

《谈〈红楼梦〉》（一九五九年——一九七三年），《毛泽东文艺论集》第207页

邹容《革命军》

四川有个邹容，他写了一本书，叫《革命军》，我临从北京来，还找这本书望了一下。他算是提出了一个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他只有十七岁到日本，写书的时候大概是十八九岁。二十岁时跟章太炎在上海一起坐班房，因病而死。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鲁迅《阿Q正传》

大家知道，死去不久的鲁迅，在他的一篇小说上，描写了一个叫做阿Q的人，这个阿Q，在任何时候他都是胜利的，别人则都是失败的。让他们去说吧，横直世界上是不少阿Q这类人物的。

《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90页

《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

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 Q 革命。其实，阿 Q 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还是不准。我看在这点上，有些人很有点像假洋鬼子。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无论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还是在党内不准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是不好的。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39—40 页

赫胥黎《天演论》

《天演论》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

《对姚文元关于最近学习情况等问题报告的批语》（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第 193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出版，只是马克思主义体系形成的开始，还不是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完成。

《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264 页

马克思《资本论》

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写成的，先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各部分，然后加以综合，得出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来。

《关于农村调查》(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80页

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7页

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9页

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

列宁为了批判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在俄国党内兴起的有神论(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而去系统地研究哲学史,写出了《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费了巨大的精力。

《关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批语》(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二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270页

《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就是列宁批判马赫的,不容易读,然而必须读。此书反对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他们悲观失望。一九〇五年党涣散,列宁自己长期研究多少年,

才写出来的。因为理论基础不一致。

在庐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九年八月一日）

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之后，社会民主工党的大部分人悲观失望，出现了“造神派”，如卢那察尔斯基等人。这些人都是唯心主义者，列宁为了批判他们，写了一部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44页

列宁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只讲清楚了唯物论，没有完全讲清楚认识论。

《关于人的认识问题》（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
第8卷第389页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

斯大林在他的名著《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说明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的时候，他分析了列宁主义所由产生的国际环境，分析了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已经发展到极点的资本主义的诸矛盾，以及这些矛盾使无产阶级革命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并造成了直接冲击资本主义的良好的条件。不但如此，他又分析了为什么俄国成为列宁主义的策源地，分析了沙皇俄国当时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以及俄国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国际的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原因。这样，斯大林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矛盾的普遍性，说明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又分析了沙俄帝国主义在这一般矛盾中所具有的特殊性，说明俄国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策略的故乡，而在

这种特殊性中间就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斯大林的这种分析，给我们提供了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互相联结的模范。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18—319页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

斯大林主持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比较厚一点。这本书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又有历史，又有理论，它是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成功的历史，这本书要读。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50页

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的材料。《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

《改造我们的学习》（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2—803页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要再看一遍。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要研究一下，都要研究这本书的第

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过去看，不感兴趣，现在不同了。这三章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也有一些写得不妥当，再有一些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

第二章、第三章，讲商品和价值法则，你们有什么看法？我相当赞成其中的许多观点，把这些问题讲清楚很有必要。斯大林认为在苏联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在我们国家就不同，生产资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我们把农业机械卖给合作社。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35页

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要好好读，要多读几遍。过去看这本书，不感兴趣，现在不同了。为了我们的事业，结合当前的实际问题，学习经济理论著作，比脱离实际专门读书，要好得多，容易懂。目前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都要研究，花几个月时间，好好组织一下这个学习。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我认为正确的方面是主要的，一、二、三章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也有一些写得不妥当，再有一些恐怕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不要轻易否定这本书。书要从头到尾读，要逐章逐节读，并且进行讨论。单看《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不看后边的几封信，有些问题不易了解。

《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记录》（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十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第25—26页

斯大林说雅罗申柯的经济学，是没有经济问题的政治经济

学。这个批评是对的。但他自己的这本书，根本不谈政治，结果成为没有政治的政治经济学。他不谈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不谈上层建筑如何适应经济基础，不谈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是一个重大的缺点。

《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记录》（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十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第66—67页

斯大林是第一个写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本书中讲的许多观点，对我们极为有用，愈读愈有兴趣。但是，他这本书，只谈经济关系，不谈政治挂帅，不讲群众运动。报纸上讲忘我劳动，其实每小时都没有忘我。在他的经济学里，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阴阴森森的。……他讲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好处是提出了问题，缺点是把框子划死了。

《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记录》（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十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第69—70页

坚决退赔就是教育我们党，教育我们的干部。我看现在就是要拿六十条之类，加上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那本书，作为学习材料。斯大林的书是什么时候写出来的呢？他是从一九一七年起，经过三十五年，直到一九五二年才写出来的。斯大林是在他们干了三十五年以后写成那本书的。我们还只干了十一年，现在如果由我们写那样的书，我就不相信能写好。现在不是到处在编教科书吗？我看编出来也用不得，还要用斯大林那本书。

《总结经验，教育干部》（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77页

罗森塔尔、尤金主编《简明哲学辞典》

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辞典里说：“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这就是说，这些根本对立的现象，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它们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联结，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94页

建议读两本书。一本，哲学小辞典（第三版）。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两本都在半年读完。这里讲《哲学小辞典》一书的第三版。第一、二版，错误颇多，第三版，好得多了。照我看来，第三版也还有一些缺点和错误。不要紧，我们读时可加以分析和鉴别。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样，基本上是一本好书。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

《关于读两本书的建议》（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五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446页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

学习苏联，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科书有缺点，但比较完整。缺点如第一章讲和平过渡，通过议会夺取政权，哪有那回事？在西藏都不可能，一定要有武装。

《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七月二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76页

教科书不承认现象和本质的矛盾。本质总是藏在现象的后面，只有通过现象才能揭露本质。教科书没有讲人们认识规律要有一个过程，先锋队也不例外。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5页

看来，这本书没有系统，还没有形成体系。这也是有客观原因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还没有成熟，还在发展中。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5页

世界上没有不能分析的事物，只是：一、情况不同；二、性质不同。许多基本范畴，特别是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本教科书就没有运用这样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事物。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6—107页

这本书提到了国家，但没有加以研究，这是这本书的缺点之一。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1页

不能说这本书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能说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特别是写法不好，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来研究

问题，不从历史的叙述和分析开始自然得出结论，而是从规律出发，进行演绎。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8页

这本书的另一个缺点，是先下定义，不讲道理。定义是分析的结果，不是分析的出发点。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但是，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个大功劳，不管里面有多少问题。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9页

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原理、原则是结果，这是要进行分析，经过研究才能得出的。人的认识总是先接触现象，通过现象找出原理、原则来。而教科书与此相反，它所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绎法。形式逻辑说，人都要死，张三是人，所以张三要死。这里，人都要死是大前提。教科书对每个问题总是先下定义，然后把这个定义作为大前提，来进行演绎，证明他们所要说的道理。他们不懂得，大前提也应当是研究的结果，必须经过具体分析，才能够证明是正确的。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9页

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同时作者们没有辩证法。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9—140页

教科书说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说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都没有提到对敌人的镇压，也没有提到阶级改造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党的文献》1992年第5期

苏联教科书的整个结构是从所有制变革开始，这样一种写法，原则上是可以的。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一）》（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

这本书虽然有些地方也承认矛盾，但不过是附带地提起。说明问题不从分析矛盾出发，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一个最大的缺点。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一）》（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

写书要有批评对象，就会有生气。这本书，没有展开对错

误观点的批判，所以看起来很沉闷。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一）》（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

这本教科书有点像政治经济学辞典，总是先下定义，从规律出发来解释问题。可以说是一些词汇的解说，还不能算作一个科学著作。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一）》（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

教科书只批评人家，对苏联发生了什么错误和缺点，却一句不讲。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一）》（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

这本书看起来是书生的话，不像革命家的话。文章不讲逻辑，甚至形式逻辑也不讲，表明经济学家不懂经济实践，他们对经济问题不很内行。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一）》（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

这本书有严重缺点，有原则错误，但是现在还不能说它完全错误，不能说它完全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一）》（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

斯大林在世时定下的这本书的架子，就不太高明。他死后的修改本，内容上删掉了斯大林的一些好东西，增加了二十次代表大会

的不少坏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退步，而书的架子没有什么大的变动。但是，出了本书总有好处，可以供我们发议论。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一）》（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

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是若干观点有严重错误，部分地又是严重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还不能说是完全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有严重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书。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一）》（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

分工合作，集体写书，可以是一种方法。看起来，这本书是几个人分工写的，你写你的，我写我的，缺少统一，缺少集中。因此，同样的话反复多次讲。而且常常前后互相矛盾，自己跟自己打架，没有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体系。要写一本科学的书，最好的方法，是以一个人为主，带几个助手。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一）》（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

后 记

长期以来,广大读者特别是从事理论宣传和社会科学教学、研究工作的读者,希望有一部选摘毛泽东各方面的重要论述,比较全面、系统、准确地反映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和基本内容的工具书出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毛泽东文集》和毛泽东其他重要著作集陆续出版,编辑这样一部书的条件更加成熟。我们从一九九八年开始编辑工作,经过五年时间,编成了这部大型理论工具书《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

本书由逢先知任主审,杨胜群、汪裕尧任主编,卢洁、张民、边彦军、刘芳莲任副主编。张积毅、赵福亭、唐洲雁、薛培松、李顺义、张秀娟、陶永祥、王朝祥、梁营、邵忠勇按分工任有关编的编辑。主编和副主编按分工承担或参加了有关编的编辑工作。

在编辑过程中,滕文生、金冲及、龚育之、侯树栋、李捷、冯蕙、刘武生、鲁振祥、张诚、陈晋等同志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的有关同志,参加了编辑提纲或部分书稿的审读工作,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本书编辑工作可能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